

基督教在河北
传播系年

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厅长张宝岩题



利玛窦



南怀仁墓



罗马教廷特使“嘉乐”墓碑



教宗克雷孟十六世，曾与清康熙帝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圣保禄石棺



德国进神父



慈宁大主教
1935年7月在临卅庄总修院
举行总修院落成典礼



1926年9月，6名华籍主教与罗马教廷代表在上海合影。



1926年建成的西湾子天主堂



献县原圣心堂内景



献县原圣心堂外观



东园教堂



东园圣母



何间天主堂



1869年11月在天津三岔河口崇禧观原址建成的法国天主教堂圣母得胜堂(今狮子林桥东口望海楼教堂)



1870年天津教案中被烧毁的望海楼教堂



1900年被义和团再次烧毁的望海楼教堂



天主教西开教堂，建于1916年，系天津教区主教府所在地。



工商学院鸟瞰



工商学院内的新疆博物院



工商学院主楼



《益世报》的副刊



工商学院建筑平面图



益世报馆外景

前 言

1989年春,我开始系统研究河北省天主教的历史和现状,多方搜集了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相关史料,也顺便做了涉及基督新教和东正教的笔记。到了1997年夏天,时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委员的基督教研究者文庸先生邀请我参加由他倡议的《中国基督教编年史》的研究工作,并把我的研究范围限定在现今河北省和天津市行政区划以内。本着“述而不作”的原则,我采取了编年体书摘的形式,尽可能把有关史料编排起来,几个寒暑下来,竟然有了几十万字,这就是本书的由来。本书之所以把资料下限定在1941年,一是篇幅够大了,二是日本侵华使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华基督教各派都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而面临着空前的变局,特别是天主教正酝酿着传教体制的重大改变,此后它的历史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把本书正文分成五编,是基于我对中国基督教历史断代的认识。几千年来,基督教一直向外传播,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而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又几乎都是主张宗教宽容的,然而由于中西文化存在着质的不同,基督教传入中国真正站稳脚跟竟花了差不多1000年,在这以后还用了200年左右来巩固它,其间不断出现反复。近代不平等条约把外国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列为重点内容之一,国人引以为耻,基督教的“洋教”或曰“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色彩便被凸显出来,而原来基本上只属于文化层面的民教冲突则迅速被政治化为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由于晚清统治者在不同时期所采取宗教宽容的“度”的不同,当然也由于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和激化程度不同,相对孤立的天津教案和此伏彼起的义和拳教案在处理方案上便大相径庭,但结果竟都是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中国也被动地开始同国际接轨(例如正式采用基于基督教的公元纪年),基督教终于走上了中国化之路。应该看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直到现在中国都有适合它生存的土壤,但它的信徒作为国家的公民,其行为却可以用法律加以规范或用先进的世俗意识形态加以引导,这已经为许许多多历史事实所证明并且正在为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所证明。

后面编排四则附录,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为了说明我所遵循文庸教授规定的范围,特整理了一篇关于河北省政区沿革的资料作为附录一。二是为了给读者一个微观的视角以补充正文多从宏观着眼并为编年体所限的不足,从1951年的有关登记材料中选取了天主教永年教区的一份作为附录二;从20世纪60年代初天主教献县教区众神甫在赵振声主教带领下翻译整理的多份史料中选取了1964年9月译自拉丁文原著的《天津工商学院简史》作为附录三;从1998年8月出版的《中国基督徒史》中选取了第20章《天主教村庄》的导语和“东间的两个宗派”一节作为附录四。此外,除照录原著的注解外,我

还做了一些脚注,对原著的文字和标点也做了一些校订,供读者参考。

本书完稿后曾先后交给几个重要的专业出版社审议,均因可以理解的缘故未能达成出版协议。2002年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邂逅蔡世华先生,并且通过他得以与天津古籍出版社的诸位领导结识。在他们切实的支持和鼓励下,这本书稿终于正式进入了出版流程,为表示庆贺,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张宝岩厅长欣然亲笔题写了书名。要说明的是,它的初稿形成于1995年,曾在内部印行(天主教中国主教团副团长、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景和主教为之作序,文庸教授见书后也写信给我)。当时采取了引文和综述并存的叙事方式,为的是节省篇幅;包括文庸教授在内的数位学界前辈指出,这样处理很不严谨。他们认为,作为历史资料,应该保持它们的本来面目,必要的删节是可以的,但要用省略号标明,这样大家才会放心地加以引用。我很乐意接受他们的批评,于是改用了现在的“录以备考”的方式。这些史料所反映的历史事实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读者自有主见;我所做的,不过是尽量淡化依附于原著的为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主观因素,尽可能全面、客观地摘录与基督教在河北的传播这个主题有关的文本,为其他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修桥铺路。

最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本书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所长、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的题签。任老在百忙中审阅了部分清样,表示赞成这种“只求翔实,不加议论”的写法,并希望能看到其他地方的分卷。

感谢任老。感谢刘景和主教和张宝岩厅长。感谢文庸教授。感谢20多年来给予我良好的工作环境的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为本书提供一部分出版经费。感谢我的朋友福建师范大学的林金水教授、河北省文物局的陈耀林先生、河北大学的吕志毅教授和河北省天主教《信德》编辑部的张士江神甫。感谢天主教天津教区和河北信德文化研究所合作资助本书付梓。感谢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各位领导和本书的责任编辑蔡世华、王公恂先生。感谢尊敬的读者,希望您有耐心把这本读书笔记翻阅一遍并惠赐批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新的一年即将开始,而我的工作还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

解成 于石家庄

目 录

第一编	基督教的三次传入(635—1722)	(1)
第二编	清朝中叶基督教的传播与被禁(1723—1845)	(34)
第三编	清朝晚期基督教的传播与天津教案(1846—1890)	(71)
第四编	清朝末年基督教的传播与庚子教案(1891—1904)	(229)
第五编	民元前后基督教的传播与教会的本地化(1905—1941)	(402)
附录		
一	唐、元河北省境域及明清以来河北省政区概述	(491)
二	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 登记表(永年教区)摘要	(492)
三	天津工商学院简史	(514)
四	《中国基督徒史》第20章《天主教村庄》(节录)	(558)
	辑录的文献资料目录	(560)

第一编

基督教的三次传入(635—1722)

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

樊国荫^①《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二份《中国开教的初期》第一章《谁在中国开教》载：

“二、聂斯多略派至中国

“福音传至中国，似乎当归东方教会……”

“聂斯多略是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以为……在耶稣有二性二位，二性各有其位，因而玛利亚不当称为天主母，只可称为人母，而天主住在此人中……”

“这学说否认天主圣子与人性结合为一位，使耶稣受难受死失去了救赎的价值。……四三一年在以弗所第八届大公会议中，聂斯多略被罚，失去了宗主教位，从者遣散。”

“然而波斯王世世代代与希腊人为敌，欢迎聂斯多略派人。……由此聂斯多略派传亚洲……”

“公元第七世纪，聂斯多略派随着亚美尼亚富商进入中国……”

“公元六三五年，一群聂斯多略派人由阿罗本领导来至中国。”

朱谦之^②《中国景教》“一、景教与基督教”载：

“(一)景教释名——景教与火祆教——景教与摩尼教——景教与伊斯兰教

“景教(Nestorianism)是东方封建社会的产物。作为宗教，它是罗马天主教会所称为的异端(Heresy)，景教徒即聂斯托尔派(Nestorians)应该就是异端者(Heretics)了……。意译之即‘Luminous Religion’。据李之藻撰《读景教碑书后》：‘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据钱念劬^③撰《归潜记》(丁编之一)：‘景教者，基督旧教之聂斯托尔派也……。入中国后，不能不定一名称，而西文原音弗谐于口，乃取《新约》光照之义，命名曰景。景又训大，与喀朵利克(Catholique)原义亦合，可谓善于定名’。考碑文‘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潘绅^④撰《景教碑文注释》(第13页)引《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九节，及第八章第十二节，又第九章第五节言‘我在世即世之光’为证。”

“(二)景教与天主教——自称“景教后学”之天主教徒——洪钧^⑤、钱念劬之聂斯托尔派说

“中国学者从洪钧撰《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九景教考)始断定景教为今之基督教，说‘天主教之入中土，实自唐景教始’。……他说：‘又西国古书，在中国东晋时(公元三百七十五年)有聂斯托尔(拉

^① 樊国荫(1875.5.2—1963.3.9)，法国如拉(Jura)省蒙罗特地方人。遣使会士。1902年11月6日来华，1907年6月9日成为神父，遂至北京教区传教。1910年调至保定，1932年9月8日回北平。1934年任教区大修院院长。1946年在天津任首善堂(天津教区账房)助理。1951年回巴黎遣使会总院。1963年完成该著后在巴黎逝世。

^② 朱谦之(1899—1972)，字惜率，福建福州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1920年赴日本留学两年，从事哲学研究。此后在上海暨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③ 钱念劬，字名恂，以字行，浙江归安人。清朝末年先后在中国驻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东京等使馆任职，后任中国驻日本、俄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公使。民国初年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湖州中学代理校长。

^④ 潘绅，清朝末年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教员。

^⑤ 洪钧(1839—1893)，字文卿，号陶士，江苏苏州人。出身于商人家庭。清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状元。光绪九年(1883)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三年(1887)，回家服丧，三月返，受命为驻德、俄、奥、荷四国特命公使。十七年(1891)回国。《元史译文证补》作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在俄国任职时。

丁文作聂斯托鲁(期)[斯]为东罗马教士,著书立说,名盛一时,教王以其贤,擢为康斯坦丁诺白尔之主教。其人倡议耶稣为主教之圣人,非即上天之子,不立附会穿凿,一时攻之者蜂起,教王乃集众主教焚其书,流之于亚美尼亚,忧愤而死。当时附其说者皆遭屏逐,散居东方,自称聂斯托尔教,浸淫东来,自里海以东以至中土。西人据此以考景教碑下东西两行乃西里亚^①文字,必是聂斯托尔教人久居其地,用其文字著之于碑。其说甚确。至云大秦则假旧名以为焜耀也。……《归潜记》(丁编之一)……要语如下:“……聂说败,并禁其传道,聂乃出奔波斯,逾四年,窜死。四九八年聂派之徒独开会议于波斯,定名曰喀朵利哥司(Catholicos)派。自是聂派由波斯逐渐而东,以至中国。……华人但知其从波斯来,不知其非波斯教。读《长安志》《册府元龟》知初名其寺曰波斯,继乃更名大秦。大秦之为国也,本非西名,聂派人始以中国向有之文,名其所从来耳。”

“聂斯托尔原为叙利亚人,其教创在波斯,是聂斯托尔自身表示其与西方教会之罗马加特力教会等不同,好称东方教会(Church of The East 或 Easterns)。……这‘东方教会’一名乃适用于在罗马帝国版图以外的教会,尤其是适用于波斯帝国领地之基督教徒,所以我才说景教是东方封建社会的产物。”

781年 德宗建中二年

阿·克·穆尔^②《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二章《唐朝》“一、西安基督教碑”载: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

“大秦寺僧景净述。

“秦尼斯坦教父,区主教兼长老亚当^③。

“……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

“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问道禁闾。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④,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愿刻洪碑,以扬休烈。词曰:

……

赫赫文皇,道冠前王。

……

明明景教,言归我唐。

翻经建寺,存歿舟航。

……

高宗纘祖,更筑精宇。

和宫敞朗,遍满中土。

^① 即叙利亚。

^② 阿瑟·克里斯托芬·穆尔(Arther. Christopher. Moule 1873—1955),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士。1898—1908年在中国传教。1908年回国教书。1933—1938年任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及历史讲座教授。1940—1945年任曼福德大学校长。本书完成于1930年。

^③ 原注:大秦(Ta-ch'in)[也称犁鞞(Li-chien)或拂菻(Fu-lin),即罗马],常常十分含糊地被用来指东罗马,这里也许特别指叙利亚,即景教发源地,而不是指这些(可能是伊朗的)传教士的祖国。……景净和亚当是同一人。……秦尼斯坦即中国。

^④ 627年(太宗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始设河北道，辖今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及京、津两市。

……

玄宗启圣，克修真正。
御榜扬辉，天书蔚映。

……

肃宗未复，天威引驾。

……

祚归皇室，祚氛永谢。

……

代宗孝义，德合天地。

……

香以报功，仁以作施。

……

建中统集，聿修明德。

……

六合昭苏，百蛮取则。

道惟广兮应惟密，

强名言兮演三一。

主能作兮臣能述，

建丰碑兮颂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①，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

“在主教之长公教主大主教马·哈南宁恕^②之时。

“希腊纪元1092年(公元781年)，吐火罗(Tahuristan)巴尔赫城(Balkh)长老米利斯之子克姆丹京都区主教耶质蒲吉长老立此石碑。碑上所录是救主之法和诸长老向秦尼诸帝所讲之道。”

845年 武宗会昌五年

刘昫^③《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载：

“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又奏：‘……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八月制：‘……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雕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朕博览前言，旁求輿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馀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馀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

《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二章《唐朝》载：

“四、有关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的若干单独史料

^① 原注：此日是公元781年2月4日星期日。按：此日也是辛酉年正月七日。古代还有一种太岁纪年法，把太岁在酉的那一年称为“作噩”；又把十二音律分配给十二月，称正月“太簇”。“大耀森文”是波斯语“日曜”的音译。日曜日就是星期日。

^② 原注：……哈南宁恕是公元774—780年的大主教，虽然他在他的继承者780年5月被任命之前很早就去世了，但很可能他的死讯在公元781年2月以前还未传到中国。

^③ 刘昫(887—946)，字耀远，五代涿州归义(今河北密城东北)人。后唐庄宗时任太常博士，后晋时官至司空、平章事。后晋天福五年(940)至开运二年(945)主持修撰《唐书》(《旧唐书》)200卷。

“(9)“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景教)穆护祓、袄教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①

1229年 元太宗元年

《陈垣^② 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元也里可温教考》第十五章《总论》载:

“元起朔漠,先据有中央亚细亚诸地,皆昔日景教(聂斯托尔派)流行之地也。既而西侵欧洲,北抵俄罗斯,罗马教徒、希腊教徒之被掳及随节至和林者,不可以数计;而罗马教宗之使命,如柏朗嘉宾、隆如满、罗伯鲁诸教士,又先后至和林。斯时长城以北,及嘉裕关以西,万里纵横,已为基督教徒所遍布矣。燕京既下,北兵长驱直进,蒙古、色目,随便住居(详《廿二史札记》),于是塞外之基督教徒及传教士,遂随军旗弥漫内地。以故太宗初元(宋绍定年间)诏旨,即以也里可温与僧道及诸色人等并提。”

《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八章《蒙古帝国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徒——根据东方史料》载:

“称呼基督教徒的第二个词、也是更常用的一个词是也里可温[Yeh-li-k'o-wen(即 Arkagun)]。根据多桑(d'Ohsson)的说法,13世纪的《世界征服者史》解释说,蒙古人称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中国作者用此词称景教僧侣,或者简单地称基督教僧侣,也不太确切地称基督徒。这里给人一个印象,有时他们也明确表示他们认为也里可温一词既是国家名,又是宗教名。这个词的来源虽然还不清楚,但其含义可以认为是明确的。”^③

1233年 太宗五年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基督教入华史》载:

“二、元代之也里可温教

“……所发现之圣旨碑,最早者,太宗五年,在赵州之后柏林禅寺。其中有:凡是也里可温与道教……一律不得骚扰等语。”

^① 原注:《旧唐书》第18卷第604页。这项敕令注明日期是“会昌十五年七月庚子”,但查七月没有“庚子”日。《唐书》第8卷第245[页]注的日期是八月“壬午”或公元845年9月12日,第52卷第1361页记得很模糊,说是“武宗即位”时。八月的“庚子”日是公元845年9月30日。穆护祓是穆护袄之误。胡僧的人数,《唐书》第1卷的记载是二千。《旧唐书》第18卷(上)第604—606页中的这一整段十分重要,但文字太长不宜全录。当时决定毁掉帝域内的全部佛寺。后有人上一奏议,要求准于上州各留寺一所,其上都、东都(即长安和洛阳)“两街”请留十寺,各寺留僧十人。御纳: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其合行香,官吏宜于道观(这是希望每州保留一寺的借口)。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每寺留僧三十人。结果(长安)左街(或东街)留慈恩寺、荐福寺,右街(西街)留西明寺、庄严寺。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救出后限一月纳官,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结果是: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馀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拆招提兰若四万馀所,收膏腴上田数十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②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少年时参加科举考试,未中。1905年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1907年考取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辛亥革命时期创办《震旦日报》,1913年当选民国众议院议员。后潜心于治学和任教。曾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和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一度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③ 原注:前引《中亚蒙古史》第290页;多桑《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第2卷第234、235、264页。据推测,也里可温这个词是希腊文 *αρκων* 的对音,或是叙利亚口语 *arkum*(副主教)的对音,或者与土耳其语 *arkhun*(肤色白的)有关系。此词也可能和马可·波罗所说的 *argon*(阿儿浑)不是同一回事。参看,德沃利亚:《铭文注释》(Notes d'Epigraphic),第41、80—82页;沙晓的文章,载《通报》1904年第420(7)页;伯希和的文章,载《通报》1914年第636页。

约 1290 年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

徐宗泽^①《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四章《元代之聂斯脱里异教》载：

“马哥·李罗 Marco Polo^②在其游记中云：‘由喀什葛尔以东，直至北京，沿路一带，几无一处无聂派基督教徒也。’又曰：‘在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皆有聂斯脱里派，及其教堂。’”

《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五章《〈马可波罗游记〉摘录》载：

“十七、此城也有若干基督教徒，他们还有一所教堂。”^③

张星娘^④《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五章《元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三三 马祖长和赵世延”附《元代中国各地教堂考》载：

“直隶长芦镇^⑤有基督教堂一所，教徒若干人。派别不明。（据《马哥李罗游记》卷二第六十章）”

1294 年 至元三十一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二份《中国开教的初期》第二章《若望孟高维诺，北京第一任总主教》载：

“一、教宗尼古拉四世遣若望孟高维诺至中国京城

“……一二八九年孟高维诺带着几个同伴及教宗的诏书至热阿治国的君臣那里去。最后一封信使他至中国蒙古皇帝处，而实际上这封信是答覆元世祖忽必烈因威尼斯商人尼古拉及马飞波罗兄弟回欧时所带给教宗格来孟四世的书信。

“元世祖请教宗遣至少一百名博学士，以便教自己人民宗教及欧洲科学的原理。

“当时教宗格来孟已去世，他的继位人于一二七一年给元朝的使者覆书，并派二位道明会士伴之，战事将他们阻止在小亚西亚。而波罗兄弟带了尼古拉的十五岁儿子马可于一二七五年回至北平。

“……一二八九年教宗尼古拉四世当答覆亚美尼亚王，乃趁机会遣孟高维诺直至中国。

“他自印度至北平的历史不详。他在哪一年抵达？没有一定文件，大约是一二九四年。他带的信本是写给忽必烈的，但他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已于一二九三年去世。

“他的继位人是他的孙子铁木耳号成宗。……新君登基后，并没有变更蒙古人对宗教的自由……”

① 徐宗泽(1886—1947)，字润农，教名若瑟，上海青浦人。曾留学国外，得哲学博士和神学博士学位。民国12年(1923)起主编天主教《圣教杂志》，兼任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亦称图书馆)主任司库。抗日战争爆发后杂志停刊，专心致力于藏书楼工作，多年来搜集地方志二千余种，著作有《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等。

② 马哥·李罗(1254—1324)，又译作马可·波罗，威尼斯人。1274年夏与其父亲、叔父抵达上都觐见忽必烈，在华应差。1290年底三人奉忽必烈之命送阔阔真公主往伊儿汗国。伊儿汗国是元朝西北诸藩之一，其领土东与察合台汗国和印度为邻，西与埃及和欧洲相望，北与钦察汗国接壤，南濒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后回威尼斯。1298年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被俘虏，关进牢狱。在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狱友法国小说家鲁思·梯切洛笔录，成《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东游记》)，此书最早的版本名为《对世界的描绘》。

③ 原注：《马可波罗游记》第128页。此城即哈寨府。此前，人们认为哈寨府即直隶省的河间府。查利格诺反对此说，他认为这是现真定府的旧称恒山(《马可波罗之书》第3卷第2页)。这句话只见于雷泰沙的著作和米兰手稿。

④ 张星娘(1888—1951)，字亮生，又字亮丞。江苏泗阳人。1902年考取北洋大学，1906年被选派赴美国留学，1909年哈佛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又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生理化学，取得学位。1912年8月回国。1919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1926年应聘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还先后在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授。1926年完成《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初稿，于1930年正式出版。全书共分六大册，一百余万字，分8个题目：一、上古时期中外交通；二、中国与欧洲交通；三、中国与非洲交通；四、中国与阿拉伯交通；五、中国与亚美尼亚交通；六、中国与犹太交通；七、中国与伊兰(伊朗)交通；八、中国与中亚及土耳其交通。1946—1950年曾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⑤ 原注：《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沧州景城郡属县七，中有长芦县，附近有盐山县，《金史》卷二五《地理志》沧州清池县领镇五，长芦其一也。

“但在当时蒙古帝国中，不只有聂斯多略派人，在蒙古军队中整队由各种礼仪的客籍教友组成：俄国南部希腊礼仪的亚兰 Alains 人最多，其余是天主教的热阿日人、匈牙利人等。忽必烈组织蒙古帝国建都北京时，天主教已广扬如此。

“蒙古人对各宗教派别不分彼此，都以为是信仰‘基督的教’，皆加以公开承认。”^①

方豪^②《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孟高维诺》载：

“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是我国第一个天主教区的创始人，也是以教廷正式使节(Legatus Apostolicus)名义来华的第一人。一二四七年生于义大利南部萨来诺(Salerno)附近的孟高维诺·洛勿拉(Montecorvino Rovella)。为方济各会士。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抵大都，即北平，觐见元帝，元帝加以礼待，准在大都传教。”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五章《罗马教廷与蒙古通使史略》载：

“元代之信奉天主教者，大抵皆系西域各部落人……”

1305年 成宗大德九年

《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七章《方济各会》载：

“5. 教皇使者约翰修士的信。

我是方济各会的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我于我主纪元1291年离开波斯讨来思城^③进入印度。我在印度圣多默使徒教堂居留十个月。在印度各地受我洗礼者约百人。同行者宣道会之尼古拉·皮斯托亚修士在此去世，葬于圣多默教堂内。我继续前进，来到鞑靼皇帝辖地契丹国。鞑靼皇帝号称大汗。谒见皇帝时，我呈上教皇国书，并要求皇帝本人信奉我主耶稣基督圣教。但彼迷信偶像过深，难以改宗。但皇帝对基督徒甚为恩待，我与他现已同处十二年。景教徒名义上信奉基督，而实际远离基督教信仰。他们在东方势力颇大，竟不许举行其他仪式的任何基督徒甚至建立一所小教堂，也不许刊印不同于景教信仰之任何经义。因这些地方从未来过任何一位使徒或其门徒。景教徒自己或者收买他人惨酷迫害我，宣称我非教皇派来的使者，而是一奸细、巫人和骗子。此后不久，他们又制造伪证，说教皇派来者系另一位使节，他给皇帝所带财物非常之多，而在印度被我杀害，所带财物被我所掠。如此诽谤延续五年之久。他们常常押我于法庭，以死相威胁。最后，蒙上帝保佑，由于某些人忏悔，皇帝始知我清白无罪，是受敌诬陷，于是皇帝将诬陷者及其妻室逐放。

此段生活历程，我确实孑然独行，有十一年未行忏悔。科隆省德国人阿诺德修士来我处至今仅第二年，我在汗八里^④建一教堂，此地是大汗的主要居处。该教堂在六年前建成。我还在那里建造一钟楼，其中置钟三口。据估计，在此经我施洗者约六千人。若无上述毁谤中伤，受我施洗者应在三万人以上。我经常举行洗礼。我陆续收养四十名儿童，他们是异教徒之子，年龄在七至十一岁之间，尚未教他们教义。我为他们施洗后，教他们拉丁文字母和圣教礼仪。我为他们抄写三十首《附谱圣咏》、两篇《圣务日课》。其中十一名^⑤儿童现已懂得礼仪，他们组成数个唱歌班，每周

① 原注：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三册，九七页：“元代对基督教各宗派，多不详为辨别，统称曰十字教……亦称也里可温。”

② 方豪(1910—1980)，字杰人，笔名芳庐、绝尘、圣老，浙江余杭人。出生于基督教圣公会家庭。1922年入杭州天主教修道院攻读。1929年入宁波圣保罗神哲学院深造。1935年开始在嘉兴等县传教，并从事宋史研究。1938年到云南，佐于斌复刊《益世报》。1940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在天主教会任指导司铎、主任司铎。曾任台湾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先后参加德、法、意、澳、日等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1975年7月教皇保罗六世授予名誉主教加“蒙席”衔。1980年12月20日病逝台北。著有《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等书。

③ 即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城)。

④ Cambalich，即元大都(今北京城)。

⑤ 原注：罗马梵蒂冈契吉图书馆手稿1、Ⅲ. 262页的记载是“其中十二人”。

轮流在圣堂服务,不论我在堂与否。其中有数儿童正在抄写《圣咏》及其他所需文书。皇帝陛下也颇喜听他们歌唱。我敲钟,和儿童们共同举行每日祷告,直到仪式完毕。不过我们是默唱,因我们没有附乐谱的祈祷书。……

我主纪元1305年1月8日写于契丹国汗八里。”

1307年 大德十一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孟高维诺》载:

“1307年(大德十一年)春,罗马教宗闻孟氏传教成绩优异,特设汗八里即北平总主教区,委孟氏为总主教,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指中国南部)各处主教等;统理远东教务,有简授主教和划分教区权;非重大事件,不需请示教宗,只须承认教宗为教会领袖,并从教宗领取总主教授带,但授带的传袭,须有教宗的许可。”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五章《罗马教廷与蒙古通使史略》载:

“管理中国圣教主教制之概观

“……圣教会是有系统有组织有制度之社会也。在世代表耶稣基督而统治圣教会者有枢机主教、总主教、主教、司铎等等。圣教会是无国界、普世之公教会也;其统治也,有罗马之中央组织及地方省区之组织。中央组织,教皇之下有枢机组成之圣院。枢机有选举教皇之权,大多数居罗马,平时则分掌罗马各部事务;枢机居外省者,则领袖一方之神级。至于地方省区之组织,即教皇派遣主教分牧全球也。全球教区可分为常法教区与传教区。常法教区隶属于罗马会议部。会议部之职为选择主教、巡察主教区、增设新教区等,欧美各国之教务多属此部管辖。传教区属于传信部,亚非澳三洲之教务多隶此。管理常法教区之神长称为本主教。本主教者,直辖治下之教友而为其神牧。管理传教区域之神长称为宗座代牧。宗座代牧者代教皇管理一方之教友也(参考《圣教杂志》十五年第四期)。元代,圣教在吾国极盛一时,领洗入教者有三万多人。罗马教皇格肋孟第五闻孟高未诺在中国开教之成绩,乃于一三〇七年特遣方济各会士七人有主教品者来到北京将祝圣孟高氏为北京总主教,并授以统理远东教务,有简授主教之权。方济各会士七人实抵北京惟有三位。三位主教乃于一三〇八年依圣教礼仪祝圣孟高未诺为北方总主教,四位主教共居北京五年。”

1320年 仁宗延祐七年

《中国景教》“九、唐以后之景教”载:

“(二)景教寺院——大秦寺遗址问题——义宁坊——崇圣寺——整屋的大秦寺——元代的十字寺——崇福司之任命——景教寺院之所在地

“元代的景教寺院名十字寺。据《元史》卷八十九《百官志》,当时掌管景教的是崇福司。崇福司的权限及其历史是:‘崇福司秩二品,掌领默尔、根锡、尔奔、伊噜勒昆(一作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司使四员从二品,同知二员从三品,副使二员从四品,司丞二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一员从八品,令史二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二人,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为院,置领院事一员,省并天下伊噜勒昆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夏为司,复定置以上官吏。’……现只将佐伯氏书中(《支那基督教研究》第一册,第471页)所列景教寺院所在地名列之如下:……(27)汗八里(北京)(28)房山(29)涿州(30)长芦镇(31)河间县(32)大名……”

1326年 泰定帝泰定三年

《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八章《蒙古帝国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徒——根据东方史料》载：

“7. 有一封很重要的、但很少为人所知的信，1892年2月28日由方济各会的约瑟·马利亚·韦拉写于济南。这封信经过进一步研究，似乎表明它所依据的材料有些是错误的，但仍值得引证一段。此信是写给马塞利诺·西沃扎的，现摘录于下：

……我须谈谈我们山东教会之开端，我的记述系根据济南府教堂档案中偶然发现的一份手稿。从纸张和书写风格可以很容易看出，此稿已有很久历史。据此稿记载，著名教士乌迪内的圣鄂多立克于1326年经过临清州，此地是山东省会济南西面的一个二等城市。他从北京转回时，曾在临清州传教并使我们的神圣宗教扎根于此。他在此地居住三年，使此前他留此地之基督教徒信仰得以坚定。甚为清楚，他在此地还留下一位同道，名叫伯纳多神甫。此姓名只在距临清州二里路的一块墓碑上始辨认出来。此地有两墓，一是伯纳多神甫的，一是另一主教的，姓名已无法辨认，因手稿藏于一用蜡密封的瓶，取出后刚一接触便化为灰尘。还有一青铜小箱，其中有戒指一只，挂胸十字架一副，其上刻有圣方济各神甫之印，从形状判断，是13世纪的遗物。按中国习惯，碑石立于墓前，此碑因年长日久已经断作数块，其上字迹只能看出葬于1387年。”^①

1328年 致和元年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五章《罗马教廷与蒙古通使史略》载：

“北京总主教于一三二八年逝世。”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基督教入华史》载：

“三、明代之天主教

“……一二九〇年正式派蒙高未诺来，后授为北京的总主教。他在中国三十六年，享寿八十三，死于中国。据其著作，中国当时有六万多教徒。然因蒙主教不与士大夫往来，故其名几无人知道。”

1330年 顺帝至顺元年

《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五章《元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三三马祖长和赵世延”附《元代中国各地教堂考》载：

“直隶北京城内聂斯脱里派教堂数目，无记载可考。惟据各种情形观之，当不少也。新来之加特力派圣方济各会于一三〇六年（元成宗大德十年）有教堂二所。至一三三〇年左右（元文宗至顺元年）增至三所。教徒六七千人。（据孟德高维奴遗札及孙丹尼牙总主教之《大可汗国记》）。”

1342年 至正二年

《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五章《元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二七

^① 原注：《方济各会在巴勒斯坦及其他各地传教史》（Le Missioni Franco-Scane in Palestina ed in altre regioni della Terra），第2卷第八册，1892年8月31日，第475—481页。参看，赫伦：《基萨主教及其坟墓之湮没》（Bishop della Chiesa and the story of his lost grave），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1923年第132—199页。这篇文章使人难以怀疑，这两个墓就是基萨的伯纳多主教（1721年去世）和坚神甫（1755年去世）的；但那份古手稿仍是一个谜。赫伦博士1924年写信告诉我：“很抱歉，我必须告诉你，教区代主教说，他们找不到这样一份手稿的踪迹；他叫一位图书馆员查询了他们的图书馆和档案，结果未发现任何证据可资证明，济南的方济各会教士曾经有过这样一份手稿。”

《马黎诺里^① 游记》摘录”载：

“过沙山^②，乃至东方帝国都城汗八里。……大汗见大马、教皇礼物、国书……大喜。见吾等后，更为欢悦。恩遇极为优渥。……居留汗八里大都几达四年之久。……汗八里都城内，小级僧人^③有教堂一所，接近皇宫。堂内有总主教之寓所，颇为壮丽。城内他处，尚有教堂数所，各有警钟。教士衣食费用，皆由大汗供给，至为丰足。大汗见吾辈家乡念切，无意流连，乃许归还教皇，携其赠物并三年费用。临行，设宴欢送，宣言请教皇复派余或他人有红衣主教品级者，来至汗八里充主教。盖东方人士，不论其是否基督教徒，皆崇仰主教也。同时，来者须亦为小级僧人。盖彼方人士，相识者只此级僧人而已。”

1368年 至正二十八年

萧若瑟^④《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二《自元太祖至顺帝末》载：

“顺帝北迁

“当顺帝北去时，在朝供奉之奉教人员多随之俱去。其留而未去之教士、教友与圣堂三座，遭元末明初之乱，多被屠毁。”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二份《中国开教的初期》第二章《若望孟高维诺，北京第一任总主教》载：

“六、中国教务及北京总主教区的结束

“……元朝的第一京城上都^⑤被毁灭，不但宫殿、石碑，连教堂都被拆了，一切都完了。孟高维诺付洗的二三万教友荡然无存。”

1498年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二份《中国开教的初期》第三章《葡萄牙人与中国教务》载：

“一、葡萄牙国的商人来到中国

“……回教人控制了地中海后，乃转向东方，把握了远东的道路。

“当时没有人想绕道非洲而行。是西班牙及葡萄牙后来将开辟这条路，以宣扬福音。

“义国热那亚人哥伦布为西班牙服务，往西面进行；而葡萄牙人则循非洲而进，逐渐绕过全洲……

“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哥伦布发现一块地，他以为是印度，就是未来的美洲。

“葡王命伦斯各·达伽玛……于一四九八年五月抵印度马拉巴海岸加利古特。

“当时在西班牙及葡萄牙二国中起了争执，此发现的地方当归于谁？

“乃至圣座前，它当时是国际和平的法庭。教宗亚立山六世于一四九三年五月由班国二百海里自南至北划了一线，在线以东属葡国，以西的属班国。今日当说经线三十度以东或西的，而当时经纬线尚未划定。

“稍后葡人占领了加利古北面的卧亚城及麻六甲。……卧亚城不久变成了葡国属地，设政治及教

① 马黎诺里(Giovanni dei Marignoli)，生卒年不详，大约生于1290年之前。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方济各会士。1338年偕另外31人奉罗马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之命出使元朝，4年后抵达大都。1345年西归。1354年，马黎诺里受德皇卡尔四世之召至布拉格，负责改修波希米亚编年史，便将其东行历程插收于书中。1820年德国人梅纳特将这一部分辑出，刊于波希米亚科学学会会报，即成今《马黎诺里游记》一书流传于世。

② 原注(节录)：《元史》卷四〇《顺帝本纪》载：“至正二年，秋，七月，佛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佛郎国即欧洲，盖波斯等处所用之名辞也。法国伯希和据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推算谓在一三四二年八月十九日。

③ 指基督教方济各会传教士。

④ 萧若瑟(1858—1924)，字静山，河北省交河县(今泊头市)人。耶稣会士。另有《圣教史略》传世。所著法文手稿一部由会友刘斌译成中文以“献县教区义勇列传”为名于1931年出版。

⑤ 应改为“大都”。上都是元朝的夏都，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北。

务的人员,建立了一座圣堂,未久就成为印度与中国及日本的总主教区。”

1558年 世宗嘉靖三十七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二份《中国开教的初期》第三章《葡萄牙人与中国教务》载:

“二、建立澳门

“一五一七年,葡国的航海家由麻六甲动身,绕过越南,而至广东省的广州附近。……经过多次失败后,乃于一五五七年方准许他们在珠江口澳门半岛居住……”

“澳门对中国传教事业贡献颇大:避教难的传教士可以找到安息,准备进入中国的,可作为暂时栖身之所,同时有初学院、修道院,可以安心攻读,准备来日传教事业。”

“三、中国传教事业的恢复

“……教宗愿意遣传教士至一处时,只能派会士,不便派欧洲教区的神父,而当时传教修会很少;另一方面,教宗遣传教士时,不能支持五六月的旅费,亦不能维持新教区的经费,更无法保护外教人处的新教会,所以只得接受葡国君主的经济援助及保护,他愿意在外教人中推广天主的神国,愿意竭力协助传教士。既然只有葡国人能至远东,似乎当给他们几种特恩,以便他们供给外教人处传教士的物质。”

“一五一六年教宗良十世及后代其他教宗给葡王推荐主教等特恩,这就是所谓保教权。”

“保教权使当时在印度及中国设立了天主教会;葡王当供给相当数字的神职界人员,为在已克服或将克服的地方宣传福音。然而传教区不断地增加,葡萄牙一小国,自然不能有这么多的传教士,于是葡王亦请他国协助。大家都当得到里斯本及以后卧亚总主教的同意,然后乘葡国船而至远东。”

“后来保教权已实际无用,有时且有害,圣教会乃减少所赐的特恩,又逐渐取消它,因为已不合时代的需要。”

“一五三四年十一月五日教宗保禄三世在远东成立了卧亚教区,属里斯本管。第一位主教为方济各会士若望亚布克。一五五八年二月四日,教宗保禄四世立卧亚为好望角以东的总主教区。”

1598年 神宗万历二十六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二份《中国开教的初期》第四章《耶稣会士来华》载:

“一、耶稣会士至中国,直至北京

“……耶稣会士……用和平的方法进入了中国。……这是由二位义国耶稣会士范礼安与利玛窦的努力而达成功的。”

“一五七三年范礼安任印度传教区的省会长。一五七四年,他带了四十一名班国、葡国、意国会士由里斯本起程。”

“上峰给他指定三十四岁的意国会士罗明坚,他于一五七八年与三位会士抵卧亚,其中有利玛窦。……明年罗氏至澳门。”

“一年后,罗氏……有意入中国内地……当请求广东省的总督的准许,他住在肇庆。……总督准许他住在城边的一座寺内。”

“一五八二年八月利玛窦……去肇庆与罗氏同居……开始读中文。”

“一五八五年,葡人孟三德与他们一齐工作。”

“……罗明坚去罗马……于一五八八年起程。总长派他从事别的工作,不回中国了。”

“二、四个阶段

“利玛窦与孟三德当单独负起责任来……”

“利氏看出当离开肇庆了……乃请求总督准许住在韶州。”

“……他乃与知县接洽，找到一个适宜的地方。总督批准将这块地赐与他们。二位传教士乃立刻动工，建设了住所名仙花寺。他先已报告范省会长穿僧人的衣服及称僧的不便，即：

- 一、和尚为人民，尤其为学者轻视；
- 二、和尚在官员前不能坐下，在接见时常当跪下；
- 三、人们以为传教士所讲的道理与佛教无异，因服装相同。

“利氏又说，不久以来，中国儒人都视他为西方秀才，朋友都称为利秀才，因此他不经过考试，能以西方秀才自居，所以出外及接见儒人时，能穿儒者衣冠。

“范省会长觉得利氏所说甚有理由，乃赞成他的意见，变换服装。乃遣义国耶稣会士郭居静 Cattaneo 传达这消息：自一五九四年七月，传教士不再剃头，蓄发，卸下僧服。”

“三、第二阶段——南昌

“……兵部侍郎石星乘船去北京，韶州下船，拜见传教士。利氏向他说明有意去北京……

“一五九五年四月十八日，利氏……随着石侍郎前行。途中石侍郎恐怕发生严重后果，乃告诉利氏不易进北京，特别更难住在北京，更好去江西省城南昌……

“利氏随石侍郎到了南昌。……一五九五年五月末，他抵达南京……又回南昌。

“利氏住在一个朋友秀才家中。江西省的王和陆巡抚……乃传见他，准许他住在城内。

“……利氏……买了一栋房子。学者及官员都来拜望他。……利氏既以西方博士自居，他乃大讲西方科学，听者都非常欢迎。他们为他们建造地球仪、日晷、地图等。”

“四、北京来回

“一五九七年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路过南昌，来拜见利氏，应许带他至北京。……他带了郭居静同往。……一五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他登舟。……九月七日抵通州。王忠铭先行，已抵北京。……次日利氏亦抵北京，去拜望王忠铭。他大失所望。……当时情形严重，是完全失败了。

“利氏恐惧被捕，乃随王忠铭的主意，登途回来……停在苏州。”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利玛竇》载：

“利氏初到我国时，(作)[着]僧装，住佛寺。后从瞿汝夔^①劝，始改穿儒服。”

1600年 万历二十八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二份《中国开教的初期》第四章《耶稣会士来华》载：

“五、第三阶段——南京

“王忠铭已回南京，听说利氏在苏州，乃请他在南京居住。利氏立刻去住。一六〇〇年他至南京，买了一屋，仍与文人及官员交游。此时将在韶州所著的《天主实义》一书广为传布，以后在北京曾印过许多版。”

“六、最后阶段——北京

“利氏被任为韶州、南昌、南京三个会院的院长，现在想在北京成立第四座会院。

“太监马堂是一个奸猾的官吏，当送五六艘船的丝进京。他愿引利氏进京……

“郭居静带来进贡的物件，住在南京。一六〇〇年五月十八日，另一位班国耶稣会士庞迪我 Pantoja 伴利氏动身。……马堂听说二位传教士的箱中有宝贵的礼物献给皇上，就起了贪心，想私取一部分……

“我们说马堂用尽各种方法，只拿到几件东西。载他们的船，自一六〇〇年七月直至一六〇一年正月，停在天津。”

^① 原注：瞿汝夔(1550—?)字太素，江苏常熟人。1589年在肇庆初识利玛竇，1591年在韶州从利氏学，1605年3月25日受洗入天主教，圣名依纳爵。按：应作“瞿汝夔(1549—1612)。”

费赖之^①《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9)利玛窦”^②载:

“利玛窦,字西泰(P. Matthieu Ricci),1552年10月6日生……于意大利安科纳(Ancone)边境区的马切拉塔城(Macerata)。

“因(澳门)与韶州、南昌等地相距甚远,管理困难,故监会铎决定另设一名会长,权限相等于省会长,并授权处理有关中国的各项事务。1596年,利玛窦神父被任命为担任此职的又一人,直至他去世之日。身任会长后,他魂牵梦绕的进京之行,更形迫切。他与各地大吏们,以及南昌城中的宗室建安王等频频接触,以求助成其事。适有旧日相识的王忠铭,新任南京礼部尚书,正欲进京朝见,路过韶州,谒见郭居静神父后又去南昌;郭神父先行一步,以此佳音告知利玛窦神父。

“1598年,利郭两神父偕王忠铭从南昌乘船同赴南京。时日本侵略朝鲜,中国出兵援朝,战事消息不利于中国,使南京城中人心惶惶。神父们虽障碍重重,仍雇舟北上,继续进京之行,而王忠铭已先行一步去了北京。

“抵达北京,受到王忠铭的欢迎,并下榻于其家中。时宫中总管太监闻有西洋人前来进贡珍品。很想先睹为快,及见贡品中并无金银财宝,故不为上达。时有流言,认为这些外国人有为日本间谍之嫌,神父们为慎重计,即返回南京。

“利玛窦被这些可喜成绩所鼓舞,遂派郭居静去澳门再求支援。不久,郭居静偕庞迪我神父(P. Didace 或 Jacques de Pantoja)同来,并携有自鸣钟等新奇诸物。这使利玛窦想起了再度进京之计划。在事前已取得南京礼部签发的路照,乃于1600年初,由庞迪我陪同,在一权阉的保护下,以进贡名义启程入京。

“权阉某,实一狡诈之徒,行至山东临清,唆使他的党羽、另一太监马堂,即临清关卡的税监,截夺贡物,并把神父们当作囚徒押送天津卫,又散播恶言以诬告之。后皇上闻有西洋人进贡自鸣钟一事,乃下令召见;时神父们在天津卫已被关押达6个月之久。经一朝臣详查报告后,立命神父们进京。”

《清朝全史》上册第三十七章《西洋文明东渐》载:

“外国人之传道事业

“……一五八〇年(万历九年)耶稣社教士利玛窦(Matheus Ricci)抵澳门,布教于广东之肇庆府。”

“《几何原本》之译述

“利玛窦在肇庆布教之手段,先以其在罗马所习之地理、数学等学科之思想向一般中国人讲演。因知中国当时盛行排外,故首从输入科学思想以博信用,而后乃从事于布教也。彼自附于汉姓,号曰利西泰,因此其室内亦不挂圣母玛利亚之画像,凡所以避中国思想之冲突也。彼于此得制军刘节斋为教徒,又因其劝而至韶州,设立天主堂于其地;复与此地学者某结师弟交,共译述由克德之《几何》,名曰《几何原本》。万历二十六年五月,有从北京经过该府之大官某,其子偶病,乞治于彼。彼知机逸,遂以后事托于补助者加多纳[尔]^③,自为侍医而赴北京。过江西、广东境之庾岭,抵宿南昌数日,渡鄱阳湖,出扬子江,遂抵南京,始与大官分袂焉。在广东赠与地图之官人某,现适为礼部尚书。彼往访问,尚书某见而惊之,谓:‘南京尚非外人可来,若予加以保护,则谗言集于予身。君能谅予者,幸勿留此。’彼不获已,再过江西而至南雄府,遂识王应麟。万历二十七年,遂同王应麟至北京。”

“利玛窦说明帝

“利玛窦入京时,以圣像及时表献于明廷,遂引起万历帝之好奇心。相传帝之左右苦于当时朝鲜战役之糜费,问炼金术于彼。彼谓点铁成金,事属不能。左右咸大失望,从此或有视彼为日本间谍者。应麟深忧彼之前途,再令其返南京。彼在南京之苦心孤诣不可谓无效。……因南京成功,更欲再入北京。

① 费赖之(Louis(Aloys) Pfister 1833—1891),法国耶稣会士。

② 原作者和译者均对所引用的资料随文注明了出处(包括作者、书名、卷码、页码),此处略去,下同。

③ Lazare Cattaneo 汉名郭居静。见上文。

遂使加多纳尔驰赴澳门，多输入传道资金，并携绘画、玻璃器、麻布、时表、地图、火器等物，令加多纳尔留于其地，已偕庞迪我(Didaeus de Pantoja)等八人由运河出广东至山东之临清。有督税官马堂者，遮利玛窦于天津，不许之进。致书于利玛窦曰‘今朝鲜之役未靖，匪徒纵横。足下等来此，闻为弑我皇帝而来’云云。此举乃讽利玛窦纳贿赂耳。利玛窦闻其言，不以为意，滞留津门殆历半岁之久，于万历二十八年十月渐得入北京。是月二十四日献方物而并上表焉。其词如左：

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献土物于皇帝陛下：臣本国穹远，从来贡献不通。逃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沾被馥馥，终身为氓，始为不虚所生。因此辞离本国，航海远来，时历三年，路经三万馀里，始达广东。语言未通，有同啞哑，因僦居而习语文，淹留肇庆、韶州二府，垂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经籍略能记诵而通其旨。乃复越岭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努力，径趋阙廷，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西贡来，差足贵异耳。臣从幼慕道，年齿逾艾，讫未婚娶，都无系累。他非所望，谨以所献之宝像，祝万世，祈纯嘏，佑国安民，实则区区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怜臣诚愿来归，将所献土物俯赐收纳，则益感皇恩浩荡，无所不容，远臣慕义之忧，庶少伸于万一。抑臣在本国忝列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所制观象考验日晷与中国古法吻合。倘皇上不弃疏微，使臣得于至尊之前罄其愚昧，又区区之大愿而未敢必者。臣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此表既上，反对者议使还原地。然利玛窦终得胜利，万历帝赐以第宅。翌年给以天主堂，今北京之南堂即附原于此。”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第一章《中国成为利玛窦神父主持下的独立传教区》载：

“费奇观^①神父在去北京的途中所遇到的困难比别人要多，尤其是来自负责他所搭乘的那条船的宦官。这个家伙在航行的半途想要把神父的行李抛在河岸上，只是给了他几块金锭才使他平息下来。他正是为了金钱才策划这次事端的。他们就要结束航程时，船就在京城的港口里失了事。神父的行李全被抛入河^②中，大多毁坏了，损失估计超过二百金锭，这意味着以后不得不紧缩生活费用。在丢失的宗教用品中有一个特别精致的框子，是带槽涂金的木器，用作神龛的。这次不幸的沉船乃是由于河水反常地上涨造成的，因为那年天气降雨异常，使皇城受到极大的损坏。河水漫上了漕，冲走许多房屋，皇上非常慷慨地下令由他的库中拨出十万金锭来重修房屋和救济穷人。费奇观神父在船失事后上岸，留下钟鸣仁修士和仆人以及从河里捞起来的行李在船上。如果不是因为比河水更凶的水手们把偷来的很多东西都抛出船外，他们还会弄回更多的东西的。全靠上帝的保佑，他们才得以挽回一套八卷本精装的普兰丁(Plantin)版的圣经，它是红衣主教塞维里尼(Cardinal Severini)给中国传教团的礼物。装这些书籍的箱子和其他一些行李都已在河中漂浮了好长时间，然后掠夺成性的水手才把它们打捞起来。他们打开箱子，发现里面只有他们看不懂的书藉，就要了一点钱把它还回神父了，而神父是极乐意付这笔钱的。幸好水并未浸入箱内，书籍的情况良好。后来，在圣母升天节那天，神父们和教徒们以隆重的排场接受这些书藉，还举行了庄严的大弥撒以示庆祝。”

1601年 万历二十九年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三《自明初至万历末》载：

“在京遇寇

“时礼部堂官蔡公，以外部贡献必由本部，而利公乃径由内官以进，不无以此为嫌。利公知其情，乃

^① 费奇观(G. Ferreria, 1571—1649)，葡萄牙耶稣会士。也有人译作“费奇规”。

^② 中译者注：德礼贤注为通州白河。

赴礼部拜谒各当道，备述马堂强留邀功各情，蔡公等方始释然。乃暂循旧例，居利公于夷馆中。”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二份《中国开教的初期》第四章《耶稣会士来华》载：

“六、最后阶段——北京

“……直至此时，利氏住在马堂设备的房屋中，但利氏设法脱离这人手中，因为他命人阻止他人拜谒利氏。利氏也知道马堂将逐他们出国，以夺取皇上将给自己的报酬。

“一事件，使利氏等脱离太监的软禁，即礼部摄理朱国祚以传教士至今未去拜谒他，心中不悦，乃遣人捕他们至礼部。这是三月四日的事。

“利氏被审时承认自抵京后就为马堂所要挟。礼部摄理听了理由后，告诉利氏不必恐惧。事情可解决：暂住礼宾馆，由国库供养。……为得到自由起见，利氏在城区内自己租了一座小屋。

“利氏等入居新屋后，就有许多人来拜望……”

“一二年后，利氏开始教望教者。庞迪我则自初时，已给平民及堂中的仆役讲解要理。利氏写小册，有经文及教义，并为学者写更高超的书籍。”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六章《明末天主教之传入中国》引《正教奉褒》第五张：

“1600年5月18日，利子又进京，行至山东临清，为督税太监马堂拦截，看守利子等于一庙宇。后一再交涉，乃得放行，卒于1601年1月24日到北京。即由马堂嘱咐之太监径将利子所带贡表献于皇上，计天主圣像一幅、圣母圣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自鸣钟二、《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

沙百里^①《中国基督徒史》第8章《利玛窦的行程路线》载：

“北京(1600—1610年)，与大文豪们的对话

“利玛窦……首先由于太监马堂的作梗而被迫滞留在天津，马堂将他投入监狱达6个月。这个脏官搜查了该传教士的行囊，从中发现了一幅带耶稣像的十字架，他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巫术。他抢走了本来准备进献皇上的礼物，甚至还抢走了一个圣餐杯。神父们一行依然于1601年1月4日到达京师，他们在那里受到了礼部官员们的调查。”

第11章《太监与帝国》载：

“太监们的势力

“马堂……同党成员后来在北京施展阴谋，排斥耶稣会士们接触高级官吏。他们的阴谋诡计激起了礼部主客员外郎的愤怒。”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9)利玛窦”载：

“直至1601年1月，神父们才踏进北京城。进呈贡物，见者无不赞赏。皇上对所献天主像和圣母像颇为尊重，置于御前；而对自鸣钟尤为喜爱。利玛窦得以常留北京，实有赖于此，因为京中尚无人能开动此钟。宫中总管太监向神父们正式宣称，皇上不愿他们离去，若他们愿意留在北京，可按月给予必要的俸金。这正合利玛窦的心意，何乐而不为！”

“朝中大小官吏争来祝贺；初犹不惯，稍后逐渐适应。于是租房居住，行动自由。神父们乘机向众宣称，他们此来目的是为传扬天地主宰的真教，既不求职位与爵衔，亦不求赏报，只求能安居老死于此，于愿已足。万历皇帝对此表示默契。”

^① 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 1932—)法国巴黎人。1951年入凡尔赛大神学院。1956年入巴黎外方传教会学习2年，1957年12月21日升为神甫。1978年获巴黎大学中文专业博士学位。1981—1993年间在新加坡主持中华公教联络会的工作。1993年以后为法中联络社的负责人，主持两国天主教徒之间的交流，同时在教会大学任职，是法国著名汉学家。

1605年 万历三十三年

《清朝全史》上册第三十七章《西洋文明东渐》载：

“加特力教与北京传道

“利玛窦入北京后，不四五年，信徒至二百餘。观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等名士之归依，则加特力教之成功，可概见矣。然彼等名士之入教，非绝对信仰教宗，要皆利玛窦诱引法，与中国固有思想不甚背驰；又当时士人对于西洋科学需要颇急，致使然也。利玛窦既译《几何学》及与南北两都人士相接，益知著书为布教便于进行，遂著多种科学书公布于世。当谒见万历帝时，曾呈时表、西琴等物，略动帝之视听，因又为帝著《西琴曲意》一书；然则彼非寻常之僧侣，直一机智之外交家也。且为说明天主之意义著《天主实义》，为述对于儒、佛两教之感想著《二十五言》；又对于莲池和尚之所说而加以驳议，于西教传道之上为极端之奋勉。然以吾人观之，于思想上无大影响。所特异者，彼之布教手段在于讲明科学，是为近世中国之一大恩人也。当其献《万国图志》于帝，奏曰：‘天下有五大洲。其一，为亚细亚，凡国百餘，而中国居第一。其二，为欧罗巴，凡国七十餘，而意大利居第一。其三，为利未亚，亦百餘国。其四，为亚墨利加，土地更大，以境地相连，分为南北二洲。其五，为墨瓦腊尼。于是域中大地尽矣。’彼所称之利未亚，即指今日之亚弗利加；墨瓦腊尼，即指从南亚米利加至南极之一带。……彼著又有方丈餘之《坤輿万国图》《乾坤体义》，清阮元曾收之于《畴人传》中。”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十一章《中国圣教堂拾零》载：

“……起初太监馆利公在皇城外，继而官府居之以夷馆，卒利公在宣武门附近，借屋自居。直至一六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始以五百金元购买房屋，建立正式住屋。”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第七章《欧几里德的第一次中文版》载：

“在北京，神父们靠租赁房子住了六年。……五百金锭就可以购买一所大得足以供他们团体所需的房子，当时他们的团体共有三名教士、两名澳门出生的中国望道士以及两名靠别人供养的学生。这些人再加上一些仆役，对于他们现有的住房来说就太多了，但是手头又没有资金可以购买一所较大的房子，首都的房产价钱很高。

“正当神父们在寻找适合他们需要的住处时，他们听说有一所房子出售，地点很合适，几乎是在城区的中心^①，面积很大，价钱合理。……神父们（以）[于]1605年8月27日迁入他们的新居。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一间漂亮宽阔的礼拜堂。在这完成之后，北京的中心就永久性地建立起来了。……后来又加盖了三间房作为顶层，底层也增盖了三间，使他们有较大的空间和更多的空气。

“此处房产一买下来，神父们就把交易的书面契约送到负责这类事务的户部（门）的主管大臣那里去，请他加盖官印，证明他们在皇城购买一处房产是得到主管大臣的充分同意的。然而，有一件事使他们有点不安。在过去五年当中，从没有人向他们提起房产税的事，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而现在他们却被传去解释欠税的问题。利玛窦神父担心，除了应缴的税款以外，他们还不得不为长期拖欠而付一笔可观的罚款。所以他写了一份请求书，给一位和他这个地区的税收官很熟悉的大臣朋友，请他就有关免除属于士大夫阶级的外国人一般税务负担问题和税收官商量一下。这份请求书的结果是，不仅税收官不再问起关于过去的问题，而且还发布了一份书面文件永远使神父们免税，并把他们住所的名字从向皇上纳贡的地名登记册上勾掉。这份书面文件带来很多好处，除了使他们免去纳税负担以外，它还起官方证书的作用，说明他们作为外国人享受在皇城居住的权利。神父们觉得似乎他们的教会勉强总算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有传教自由了。

“他们在新居安置好之后不久，就去离京城约有三天路程的北直隶保定府（Pantinfu）地区的乡村转了一圈。他们进行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要看一看基督教信仰是否已传播到农村；而他们对他们所发现

^① 中译者注：意大利文写作 Sciuncin（顺承门，即宣武门）。

的情况一点也不感到失望。在他们来到北京之后的一年中,这个地区已有一百五十多名信徒入教,而且人数还逐年继续增加。”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二份《中国开教的初期》第四章《耶稣会士来华》载:

“八、传教士在北京的工作

“一六〇五年五月十日,利氏在一封信中说,在北京有一百五十名教友。他们曾数次迁居,范省长帮他的忙,他在南门附近买了一座房屋,大小房间共有四十五间,一六〇五年八月,他们迁入,设了幽雅小堂。将来北京第一座堂——南堂就起在此间。

“利氏的同伴亦去与乡民交谈,有时将他们聚在一起,给他们讲要理。乡民若表示欢迎,数月后他们又来,给准备好的付洗。他们的成绩不错,特别在保定附近乡间,他们竟付了一百五十个洗。可惜他们没有留下开教地方的名字,只说圣母升天堂。这样现在无法决定是何乡村。然而这种皈依,虽然暗中进行,亦引起外教人的闲话。一六〇七年,利氏等当停止至乡间传教,以后才重新进行。

“……一六〇五年,他报告省会长说,四个会院,共有一千二百名教友。我们只提及利氏同事们的工作。他不能至乡间传教,他最繁重的工作是接见人、访问人及与散居全国的人通讯。”

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章《直隶省的宗座代牧区》载:

“二、保定区

“保定是保定府的首府,在北京的西南一百四十六公里处,管辖十七县。在教会方面,保定区兼管易州,它是一小州,管三县。

“保定及郊外共有八万人……

“第十六世纪时,保定是直隶的省城,比今日更广,是总督、巡抚及清苑知府与知县的驻所。

“保定区在明朝万历廿八年(一六〇〇)耶稣会士至北京前,大约没有听到福音。

“葡籍耶稣会士庞迪我(Pantoyja)及费奇规(Ferreira)于万历卅[三]年(一六〇(四)[五]^①)至万历卅八年(一六一〇)间,曾至保定一带村庄讲道。利玛窦的其他十数位同伴,大都为葡人,起初时不敢走出城外,只劝化数人,但他们希望至乡村传教。

“当利氏与文人交往时,别的耶稣会士走向村庄,有机会时,就与村人攀谈,在适当时间,就讲主要的教理。若有人留心听时,他们就留数日,留下教义及经文册子,然后至别村;过了些时后,他们回来视察他们的教友;这是最初的教友,将来成为此区的教友村庄,其中最重要的,为离北京一百公里的安家庄;耶稣会士遗下的教友约有一百五十人。”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9)利玛窦”载:

“他在日常接见宾客时,常言及他来此的理由,并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他还编撰新书,修订旧作。自此,他不再离开北京,专心于制订各种规范准则,便于日后人们遵照执行,并培育新教友,扶植望教者,其中数人为名公巨卿。翰苑中也有人教者,其一即著名的徐光启,洗名保禄,人称徐阁老。他在1603年受洗于南京罗如望神父(Jean de Rocha),1604年入翰林院,1632年入阁。1605年时,北京奉教人数已逾200人。是年6月,利玛窦曾与开封一犹太教徒艾某(Ngai)接谈;3年后又遣一中国修士赴开封探查在那里发现的圣经及崇拜十字架的信徒。在北京第一位受洗于利玛窦神父的教友,后卒于1624年,洗名本笃。”

“(19)庞迪我^②”载:

“庞迪我,字顺阳(P. Didace de Pantoja),1571年……生于西班牙的 Valdemora^③ 城,属 Seville^④

① 参见下文。

②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注称:“抄本《辨揭》(见本传后书录)作迪峨,北平图书馆藏抄本作迪我,然《明史》卷三二六及《正教奉褒》皆作迪我。”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瓦德莫拉城”。

④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塞维利亚”。

主教区。……当利玛窦作第二次北京之行时，偕庞迪我同行。1603年或1604年，他在北京发四大显愿。

“在北京的最初几年中，庞迪我曾是利玛窦的得力助手，当利玛窦忙于酬酢和著书立说时，‘庞迪我则为准备领洗者讲解教理，因当时他已能善说华语’（Dullaric, Histoire, p. 1019）。1605年，他在北京郊外约24古法里（lieues, 1古法里约合4公里）处的几个村庄中，曾为10至12人付洗。次年，他又去另一村庄为13人付洗，当地居民们热诚欢迎他再去传播信道。”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三《自明初至万历末》载：

“李天经奉教

“有李天经者，直隶吴桥人。进士出身。素与光启善，与西士亦时常往来。厥后被化领洗，圣名伯多禄。光启作相时，天经补山东布政司。嗣以光启荐，调京督办历局事务。”

1609年 万历三十七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9)利玛窦”载：

“1609年9月8日，他在北京创立了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个善会组织‘天主之母善会’。该会宗旨：会员必须精修德表，勤领圣事，救济贫病，帮助丧葬。会员每月聚会一次，聆听会长训导，交流心得，贯彻会规，提出疑问和建议，分组各类善举。”

1610年 万历三十八年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第二十章《利玛窦神父之死》载：

“……他非常慈祥地依次和神父们及教徒们谈话，在五月十一日临近黄昏时，他坐在床上，没有挣扎，身体一动不动，半闭着眼好像睡着了一样；然后他全闭上了眼，在上帝的怀抱中安眠了……”

“在神父弥留时聚集起来了大群教徒。……他们再三恳求，终于说服了一位画家的修士^①画一张利玛窦神父的肖像，作为他们大家的安慰。

“若干时期以来，利玛窦神父不但一直在考虑他自己的死去，而且还盼望在郊外购买一处坟地。事实上，他确已买了一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在所付的价钱上出了问题，卖主撤销了原议。当时，他对神父们说这没什么关系，因为不用多久他们就会有另一块更好的坟地。从他的话来判断，他似乎对以后的事有所预见；而那个时刻真的来到了，是中国皇帝赐给了一处坟地作为利玛窦神父和他的同伴们的长眠之所。不仅如此，他似乎也预见到他自己寿终的时间。他把应耶稣会会长阿瓜维瓦要求他撰写的《中国基督教史》，推延到他临终前的几个月才完成，他烧掉了他全部的信件，给他的著作编了目录，而且编订了两张时间表，一张是教内事务的，一张是关于整个传教工作的。关于整个教会工作的那张，是写给中国传教团监督龙华民神父的，下面的签字是前监督利玛窦……”

“在临终前的几个月中，他曾好几次说：‘亲爱的神父们，在我仔细想过我要努力确定做什么才能最好地推进中国教会的工作时，我得出结论是对它的进展最有利的事莫过于我寿终之日的到来。’”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9)利玛窦”载：

“利玛窦虽身在北京，而心系全国，实为中国传教之中枢。……”

“1610年5月11日傍晚，他……永远安眠于上主的怀抱，年57岁；遗命龙华民神父（P. Longobardi）为其继任者。

“皇上赐予葬地一处，原是一所庙宇，四周有围墙，后成为在京葡萄牙教士的墓地。……神父灵柩由教友们肩抬行进，送丧队伍浩浩荡荡，由一大十字架为前导，穿过紫禁城直达城外葬地。”

① 中译者注：按此人为游文辉。

附录《正教奉褒》上册第五至六页文：

“明万历卅八年，闰三月十八日，利玛窦病故。礼部奏闻，上震悼。各部大臣，翰苑诸公，暨在京绅士，俱赠赙诣唁。四月二十三日，自利玛窦卒后，朝中诸公议请葬地。庞迪我、熊三拔等具疏奏请。帝即将阜城门外滕公栅^①官地二十亩、房屋三十八间，赐给庞迪我等永远承受，以资筑坟营葬，并改建堂宇。”

又录徐秋鑫(光启十一世孙)撰《徐光启与利玛窦》文：

“改建堂宇工程在次年(1611年)夏完成。在横廊左角设一小堂，供罗马圣母大殿的圣母像。因利玛窦生前曾许愿建堂供罗马圣母像，以谢定居中国之大恩。利玛窦安葬日期，择定于是年11月1日‘诸圣节’。”

《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六章《明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二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略传”载：

“利子歿后，中朝诸公议欲请葬地。……上报可。……有籍没杨内官私建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葬利子^②，并为庞、熊诸子恭敬天主、焚修祝盃之所。”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7)龙华民”载：

“龙华民，字精华(P. Nicolas Longobardi)，1559年生……于西西里的 Caltagirone^③ 城，贵族家庭出身。

“1609年，龙华民神父被召赴北京。次年利玛窦神父在病逝前，遗命龙神父为中国教区会长。其就任后着手之第一件事，乃为洗礼经文译成中文，沿用至今^④。

“……龙华民神父又是预感日后出现的‘中国礼仪之争’的第一人。当他仅为一普通传教士之时，对其会长利玛窦的传教观念和方式方法，已有蓄枵之感，但出于对长上的尊敬，不便批评。及其自任会长职后，认为事关良心问题，遂进一步作了研究；而在理论上和实践方法上，得出的结论，与其前任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其他神父们经研究后，则见仁见智，意见分歧；但因在神业上和爱德上必须团结一致，又因立有听命誓愿，都不愿有所流露，故传教事业不受任何影响。”

“(21)费奇观”载：

“费奇观，字模一^⑤ (P. Gaspard Ferreira)，1571年生……于葡萄牙的 Castro-Journao^⑥ 城……1604年，监会铎范礼安神父派他去北京。途中，他曾受到为其带路的某太监的无礼虐待；不幸又在运河中船遭沉没，尽失所有，约值200埃居(ECU)^⑦，以及原拟进贡朝廷的若干贡品；‘唯有《圣经》8卷，幸未浸湿，即被捞起；这部《圣经》是 San Severin^⑧ 枢机主教赠送给神父们的，是由 Pantin 汇集的最新全卷本，神父们隆重地奉为至宝而珍藏之；很多人络绎前来观看，并对此《圣经》印刷之精致、装横之美丽，赞叹不已。人们都说这肯定是一部稀世珍本，既然人们对之如此爱护备至’。

“利玛窦神父为使费奇观神父能熟谙华语，并适应传道工作，除委以培训初学修士达6年之久外，

^① 译者注：“滕公栅栏”的利玛窦墓，位于阜城门外半里的二里沟，即现在的车(各)[公]庄。原墓碑在“文革”中被砸毁，“文革”后重建。利玛窦墓地现已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又据《正教奉褒》载：“十月(11月1日)，玛窦出殡，帝遣大员致祭。顺天京兆王应麟(字玉沙)，素与玛窦善，特撰碑记。”内称：“有籍没杨内宦(太监)私建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牒大司徒(户部尚书)稟成命而界之居。”

^② 原注：利玛窦墓在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滕公栅栏似为明末清初时旧名，今代其地仅名曰栅栏，又曰石门，而滕公之名，竟无人知。与利玛窦墓同行者，东首为南怀仁墓，西为汤若望墓，南首为龙华民之墓。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卡耳塔吉罗内”。

^④ 译者注：便于神父缺席时，由教友代行权付。

^⑤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字模一”。

^⑥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卡斯特罗—朱尔诺”。

^⑦ 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的简称。

^⑧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圣赛维林”。

又委以在京师近郊由庞迪我神父建立的基督徒据点的传道工作。时入教者甚众，费奇观神父乃分其众为三部：‘男子部由徐必登^①修士讲授教义；老年妇女，由费神父自任讲解之职；年轻妇女及少女，则由经过培训的儿童或女孩为之讲解。人们信教热忱如此昂扬，到处传诵着天主圣名，并高唱着《天主经》《圣母经》及其他圣歌，甚至那些无意入教者，也跟着一道咏唱，虽还不懂其意义。’这一年，受洗者有140人，并扩展至其他村庄。在一个邻村中，有一妇女劝化了7个家庭的全部人员，并带他们前来领受洗礼。”

《中国基督徒史》第8章《利玛窦的行程路线》载：

“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②于利玛窦逝世前一个月到达北京，他极其细心地搜集了利玛窦的札记并于1615年用精湛的拉丁文本刊布，其中确有他自行作出的某些篡改和增补。这部著作后来被译作法文并于1618年由金尼阁的一名亲属在里尔出版，书名叫做《基督教远征中华帝国史(1582—1610年)》。”

1615年 万历四十三年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七章《中国天主教——自利玛窦逝世至明末》载：

“(金尼阁)于一六一四年十二月到罗马觐见教皇保禄第五世……

“利玛窦到中国后即任为中国教区会长。金公当时请求者，是中国传教区分离于日本耶稣会省而成为自立省。耶稣会总会长以中国当时教士不满廿，会院不过五处，全中国教友只有千数，即成一自立省恐财力人才有所不能，乃定为副省，将中国与日本同属于一巡阅司铎。”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金尼阁》载：

“一六一五年三月二十日，获得教宗保禄五世的批准，由礼仪部颁令，准许以中文举行弥撒圣祭，诵念《日课》；任用当地人士为神职；并准许翻译《圣经》；举行弥撒时不必脱帽。

“按我国重视‘衣冠必整’，因此大典礼中必戴冠，而西方礼俗则以除冠示敬，故西方弥撒祭服中，并无特制之冠。金氏获得许可后，中国教会乃特定一种‘祭巾’，沿用至清末。民国以后，始渐废除。”

1616年 万历四十四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7)龙华民”载：

“1616年，南京教难爆发时，龙神父正在各省教区巡视，闻讯后立即赶回北京设法缓解。虽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著名人士，出于正义与奉教热忱，都站出来奋力保教，但未能阻止教难继续发展；最终，导致神父们从南京、北京及整个中国，在朝廷命令下被驱逐出境；仅少数几人避居各地朋友家中而获免。之后，除南京外，教难逐渐平静。但1622年，教难再度掀起，一名安德肋^③的教友为了信仰而以身殉教。”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载：

“八、教徒之流品

“……明末天主教，是否偏于士大夫，而忽略一般民众？曰，不然，有南官署牒钟鸣仁、鸣礼两案所载逮捕人犯之供词在。文繁改制为表，可以窥见当时教徒职业之一斑，未尝忽略一般民众也。

①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随文有“(Leitao)”。

②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字四表。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作“安德(Andre)”。

“万历四十五年第一次南京教案”^①人名表二^②

姓名	年岁	籍贯	职业	进教缘由	判案结果
钟鸣仁	55	广东新会	修士	其父入教	送刑部定罪
仁儿	14	直隶保定		由父卖与庞迪我	发僧录收养
龙儿	14	直隶涞水		由伯父卖与庞迪我	同上

1618年 万历四十六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7)龙华民”载：

“1618年，耶稣会总会长 Vitelleschi^③ 神父，将中国副省区从日本省区划出，并将公共财产划分管理，但规定日本省区应每年供给中国省区 500 埃居(ECU)的款项，以资助在中国的传教士之用，并支付从葡萄牙至印度果阿的一切旅费。直至 1635 年，因监会铎取消此项津贴，而使中国教区大受损失。”

1620年 万历四十八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7)龙华民”载：

“1620年……龙华民与阳玛诺^④两神父……得以重归教区从事传教工作，并照常接待朝中官员及学者们的访问。

“至是，龙神父不再远离北京，一面在城中培育日渐增多的新教友；一面在 4 至 10 日路程范围内的地区开辟新教区。”

1636年 思宗崇禎九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7)龙华民”载：

“1636年，他曾去山东济南府听受徐光启孙儿们的告解神工。在他接见的官员中，有异教徒数人改宗而入圣教。……

“归依者既众，而和尚们也嫉之愈急，竟无理由而诉之于城中官府。拘至公堂，官见其老而悯之，并说：‘若非怜你白发长髯，将责你 60 大板。’其同伴则被关入狱中，幸蒙济南友人之助而使之获释。

“每年，他必有数周或数月去新辟教区，以辅导并发展新教徒；至是，他的教区已逐渐扩展到泰安。此前，他总是安步当车，徒步旅行。及年届 79 岁高龄，他的腿力已不能胜任三四日路程的步行之劳，乃

^① 《中国基督教史纲》第九章《南京教难的始末》：“从南官署牍中看见有会审钟鸣礼与钟鸣仁两案。钟鸣仁号叫念江，钟鸣礼号叫若翰，是同胞兄弟，父亲名叫念山，广东新会人，父子同在澳门进教。鸣仁跟随利玛窦进入内地，充翻译之职，在韶州曾遭官厅逮捕，并驱逐出境。后在杭州又遭土人告发，杖而囚禁，赖利氏营救得释。遂随利氏至北京，以其传布福音之故又遭禁錮。一六一(五)[六]年在南京被捕，几次审讯，受种种苦刑与侮辱，经刑部定罪，罚往关外为奴。据说当时有一康姓基督徒名 Matthien Gham 的，愿意代他出关受罪，卒因朝中一新入教的大官援救，乃得免罪。钟鸣仁后在一六二二年病死于杭州。……在这两案审讯的记录，钟鸣礼案则有八人，钟鸣仁案则成年十一人幼童五人。……关于这一次教难的材料，虽不十分充分，但是这次对教会的压迫，我们可以由此知道相当的利害，教会便因此而陷于停顿。”

^② 另 13 人略。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威特勒斯奇”。

^④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随文有“(Emmanuel Diaz Junior)”。阳玛诺(1574—1659)，字演西。1621 年被派至北京，自 1623 年始任耶稣会中国教区副区长或视察员共 18 年，临终前复任该职。

改乘一弩马以代步，直至去世。”

1640年 崇祯十三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汤若望》载：

“汤若望原名 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国人。……字道未，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

“若望抵京后，颇注意于宫中传教，至崇祯十三年(1640)宫中已有信教贵妇五十人、太监五十余人^①、皇族一百四十人。”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七章《中国天主教史——自利玛窦逝世至明末》载：

“全国耶稣会有二会长管理教务。一六四〇年时在华北有傅泛际为会长。其属下驻在北京者有汤若望、龙华民，驻在河南开封者有费乐德，山西者有金尼阁、万密克，陕西者有方德望及郭纳爵，华北五省共有教士八位。”

1641年 崇祯十三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7)龙华民”载：

“1641年，神父从北京去青州途中，遇盗贼抢劫，尽丧所有。……青州府中有一宗室王族，久闻龙华民神父之名，延至其家住宿。……这位宗王深通文学，曾与神父论及圣教教义，深表钦佩；但他以前曾受过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在未彻底消除疑问之前，不愿有所表示。他邀请神父与伊斯兰教中精通可兰经的博学者数人，在其官邸中作一次辩学论道；而该教博士们终于理屈词穷。这位宗王，在良心驱使下，尽遣诸妾，而受洗入教，洗名保禄；全家均随之受洗皈依。影响所及，山东青州^②、济南及其他城中的官员多人亦入教。山东省内有一著名学者，闻其事，曾至宗王府中寻访龙神父，闻道后，亦豁然开朗而接受真理，洗名纳泽尔(Nazaire)。”

“受洗者有时达500人；有一80岁的老人，直等到神父来临为之付洗后，才含着微笑安然离世。在此，他还皈依了一名和尚，一位官员及其全家。此外，在 Wan-ngan^③（怀安？），即两个月的路程内，受洗者达800人。”

1644年 清世祖顺治元年

《中国教友与使徒工作》第二章《顺治及康熙朝》载：

“伍 善会

“我们已经见到圣母会及其他善会，自利玛窦时已经诞生，且产生了良好收获。在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时代——即自明清初年——这些善会已有惊人的发展，在中国以后的传教历史上已不复出现；它们当时在教会的生活里担任着最重要的角色，甚至若不晓得它们的存在，很难明白教会在康熙朝竟发展到那种地步，而且保持不衰。在每一教团，即使人数不多，也拥有一种或数种善会；1644年一共有四百多个。每个善会的会员都在一百以上。

①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作“中宫四十余人”。

② 原作者注，传教于山东省东部的方济各会会士 Kilian Mens 神父向我提出，此处所说的青州，或系直隶省的定州。因在当时方济各会收藏的文件中(1925年3月23日)并无有关此次皈依事件的任何踪迹可查。但高龙龛神父(Colombel, t. I, p. 412)与萧神父(《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四，第213页)均作青州。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万安”。

“这些善会不但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因为各种社团,无论其目标是宗教性或是世俗性的,都很兴盛;而且对教会适合紧急的需要,因为传教士那样少,且散布在广漠的地域上,非有有组织的热心协力者不可;那是传播及维持信仰的惟一方法。……妇女们生活在几乎完全封锁的闺阁中,对她们传教很困难;可是热心而训练有素的善会会员,经常同她们来往,便能运用自如地代替神父教育她们。为此1703年在北京,有八百多位太太照例在城中各市区集合,分担给妇女传教的事宜,而使她们得以归向天主。”

“在多次很少有机会见到神父的教团内,就是赖这些善会维持教友生活;给孩子们有时也给成年人付洗讲道,定时共同念经祈祷,看顾病人,赈济穷人,协助临终的人得善终,尽力设法按教规埋葬死人,勉励信友们在他们的四周扩展天主的神国。”

1651年 顺治八年

《献县天主教志》第一章第二节《天主教的传入》载:

“明清之际,住在北京的外国教士瓦拉(Valat)、步立约(Buglio)等轮流前往河间、献县一带看望奉教者并为之施行圣事。清顺治八年(1651年),献县最早奉教的齐古庄、南皇亲庄建立起教堂。”

1653年 顺治十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80)利类思”载:

“利类思^①,字再可(P. Louis Buglio),1606年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莫乃奥(Moneo)……

“利、安^②两位神父于1648年春抵达北京。……在汤若望神父的请求下,他们恢复了自由,但不得离京他去。皇上知道他们的身份以后,于1653年(据《正教奉褒》记载为1655年阴历十月)拨赐房屋一所,供给膳养,另赐银两置办衣服,并准予按西方格式建造圣堂一座,称‘救世主堂’,俗称‘东堂’。该堂建造费用由洗名儒斯泰的一位曹夫人和皇室中的一位大员捐献。

“利类思神父从东堂出发,不时去走访离城不远的一些堂口,其中主要的有7所,较小的有14所。在走访中,神父为不少人付了洗。”

“(88)安文思”载:

“安文思,字景明^③(P. 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年……生于(葡萄牙)科英布拉(Coimbre)附近的佩特罗加(Petrogas)别墅。”

“他和利类思神父一直并肩工作,除了关心北京教友外,另在正定府发展了堂口7所,保定府2所,河间府一所,在山区也有一所。在某些县城内共有传道室14处,其中若干处各有小堂一所,四乡村镇的小经堂尚不计在内。1663年北京城内成年人领洗的有500余人,省内领洗的有1000余人,次年已有700余人上了领洗录。若非因教难而传教中断,利神父肯定还会有2000余人领洗。”

1654年 顺治十一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7)龙华民”载:

“龙华民神父于95岁时,不慎跌伤,自知不起,请人代诵《耶稣受难始末》,含泪高声说:‘得闻耶稣

① 即“步立约”。

② 见下文。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随文有“葡萄牙大航海家麦哲伦(Magellan—一四七〇—一五二一)之后裔也”句。

死难事而离世,实我之大幸也!’1654年^①12月11日,在微笑中安眠于主怀,整个教区如丧父考。清顺治帝素重其人,在龙神父生前,帝曾命人图其肖像;及龙神父卒,帝赐葬银三百两,并遣大员祭奠。”

1656年 顺治十三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96)汪儒望”载:

“汪儒望^②,字圣同(P. Jean Valat),1599年生。……法国人。

“1656年,为了协助汤若望神父,他被调到北京,由他负责北京周围的教友。当时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位神父虽在北京,但不准出城活动,所以满清入主中国后,汪儒望神父是在北直隶各城镇乡村继续传教的第一人。……”

“汪神父去正定巡访教务时,给763名望教者付了圣洗。6年之后,他再去巡访时,见这些教友依旧信心坚定,勤行善工。他使教友人数又增加了490名,过一年又增加了700名。”

1660年 顺治十七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96)汪儒望”载:

“1660年龙华民神父(P. Longobardi)逝世后,山东济南府的教务就委托给了汪神父……”

“汪儒望神父的传教工作发展很快,从济南府扩展到附近城镇,直达直隶省:计有圣母会8个,天神会一个,小堂及新会口10所,其中一所就有190户家庭……”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八章《中国天主教史——自清入关至康熙朝》载:

“罗马教皇因于一六五八年八月十七日选Mgr de la Motte Lambert为安南代牧主教;又选Mgr Francois Pallu为中国华南代牧主教,并以广东为教区中央点。一六六〇年Mgr Ignace Cotolendi在法国祝圣为主教,受命为中国华北代牧主教,以南京为中央点。但Pallu及Cotolendi二主教均未得入中国境。前者由西班牙人之阻止,令其从美洲仍回欧洲;后者途中病故。此三位代牧均系法人,故葡西两国阻挡此事之实现。盖在十六、十七二世纪时,远东传教事业,葡国政府予以不少之帮助,葡国居保护传教士之地位。任何国籍教士之来华,在事实上当承认此习惯也。”

《燕京开教略》中篇《由明万历间耶稣会利玛窦来华至大清乾隆间遣使会罗旋阁之时》载:

“当是时,印度与中国传教之士皆属葡国保护,东方主教皆系葡人推荐,传教士须由葡庭领取执照,东来时亦须由葡船载送。葡人所许虽多,而俱不能实践。于是教皇收回其保护教务之权,别觅他国。适有法国钦锡公爵之命妇名爱济雍者,自捐路费,乞教皇依诺增爵第十位恩准,派遣教士于东方。教皇依请,即派三位法国主教东来,一名巴吕,一名毛特,一名高多郎第,俱系不在修会之人,来至东方,各往本属传教。高多郎第之属地,即系北京。”

1664年 圣祖康熙三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49)汤若望”载:

“1664年,北京受洗者有700人,上一年有1500人。”

^① 原作者注:据Dunyn Szpot云,龙神父卒于1655年,年96岁。但在龙神父墓碑上则为1654年;在其他传教史中也作1654年。按:Dunyn Szpot,《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杜宁—茨博特”。

^② 即“瓦拉”。

(法)费赖之著 冯承钧^①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四九 汤若望 德意志人”^②载：
 “若望致书欧洲，请速派新会士来华助理；彼曾获得皇帝许可，会士可以自由入境；帝并降敕许其自由传教。由是新入教者日增，一六五〇至一六六四年，共十四年间，华人受洗者逾十万人。”
 王治心^③《中国基督教史纲》第十一章《第二次教难前后》载：

1664年全国教务情形^④

省 别	地 名	教堂数	教徒数
直 隶	北 京	三(南堂、东堂、慈堂)	15000
	正 定	七	不详
	保 定	二	不详
	河 间	一	20006

1665年 康熙四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02)刘迪我”载：

“1665年9月6日，四辅臣作出了判决：除在朝廷供职的4位神父仍留北京外，其他传教士一律发配广州，并宣布天主教为邪教。”

“宣判书中的第二部分，即宣布天主教为邪教的部分，对传教士来说，比第一部分更令人痛心^⑤。神父们联名上诉，抗议有关当局未听取他们的陈述，更不让他们为本人、为教义而提出申辩；而众所周知的天主教教义从未有损于国家利益，相反，对个人、对国家都大有裨益。正因为此，教士们为了保卫天主教教义，始终不惜牺牲一切，甚至舍身流血。由于刑部的官员们已受到杨光先的贿赂收买(他花的贿赂之款不少于白银7万两)，拒不接受上诉，于9月13日即下令依判执行。”

1667年 康熙六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罗文藻》载：

“罗公文藻是国人第一位出任主教的。”

“字汝鼎，号我存。……福建福宁府福安县南福安河西岸罗家巷村人。”

“……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

“……一六五〇年一月一日……改穿多明我会会服，而为初学修士。”

①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汉口人。早年留学比利时，后入法国巴黎大学，1911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继入法兰西学院师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深造。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通晓英文、法文、梵文、蒙古文和吐火罗文，毕生从事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② 原作者和译者的随文注亦略去，下同。

③ 王治心(1881—1968)，名树声，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曾在东吴第三中学、华英学校、上海裨文女学、惠中女学等学校任国文教员。1913至1918年间任基督教刊物《光华报》编辑。1921年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国文和中国哲学教授，编辑《神学志》。1926至1928年间任中华基督教文社主任编辑。1928年起出任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文系主任、教授。1934年后任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1948年从沪江大学退休后刚金陵神学院教授国文和教会史，主编《金陵神学志》。1957年从金陵神学院退休后一直在北京居住。

④ 其他地方略。

⑤ 译者注：杨光先发难的诬告罪状之一，说天主教是制造叛乱的教，因为耶稣是犹太国中的叛逆者；又说来中国的传教士都是在国内因制造叛乱而被驱逐出境者，后杨光先因诬告反坐被处死刑。

“一六五四年……七月四日晋铎。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前后,各省各修会所辖教务,几无不付托罗公视察,公之足迹乃遍历闽、浙、赣、粤、晋、鲁、湘、川、江南(包括苏、皖),以及当时所称直隶省(河北)。

“一六七四年一月四日……教宗格来门十世(ClementusX)……任命罗公为巴希利街(Basilitanensis)主教。传信部并于同年四月五日致函罗公,在本国籍司铎中,如有认为可任主教者,嘱将姓名、年龄、品格等呈报。”

1670年 康熙九年

《燕京开教略》中篇《由明万历间耶稣会利玛窦来华至大清乾隆间遣使会罗施阁之时》载:

“按康熙九年,降生后一千六百七十年,皇上原有谕旨云:‘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各省或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禁止。’不久,又谕曰:‘京邸各省军民人等俱不准信奉天主教。’”

1671年 康熙十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24)南怀仁”载:

“南怀仁(P. Ferdinand^① Verbiest),字敦伯,1623年10月9日……出生于比利时库尔特来^②(Courtrai)附近的一个名比登^③(Pitthem)的小村里。

“南怀仁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不失时机而又审慎地请求皇上让流放在广州的传教士们回归内地,并在全国各地自由传教。皇帝即出谕旨,保证凡在他幼年辅政时期遭受磨难的神父可安心向他呈诉。于是南怀仁和两位同会会士^④奏请追究杨光先等僭越大权,假公济私进行诬陷,禁止宣扬真教并驱逐传教士一案。先是不予受理,后经有关各部及王公大臣等会同审议,历时7天,终于作出决定。

“皇谕公布:天主教教义教规曾被不公正地查禁,今查并无违反国家利益和庶民职守之道。为此,凡被逐教士可仍回原堂从事本职。谕旨并为汤若望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原赐荣衔,又拨巨款为其修建坟茔,并按习俗树碑立传,安置守墓石兽。这道谕旨是在1671年3月颁布的,它为那些倍受忧患6年之久、失去司铎的堂口教友,带来了极大安慰。虽然还没有全面恢复传教自由,但一年之内仍有2万多人领洗入教。翌年即1672年,皇上的舅父领洗入了圣教,还有满清八旗军中的一位统领也改奉天主教。”

1676年 康熙十五年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一二四 南怀仁 比利时人”载:

“一六七六年受命为副区长,综天文、宗教、钦天监、授帝西学诸事于一身。怀仁对于葡萄牙之保护中国传教会固甚感激,然以独受葡萄牙保护,其力容有未足,因谋召法国传教会来京。”

①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作“Ferdinand”。

②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作“库尔特雷”。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作“皮塞姆”。

④ 译者注:利类思、安文思两位神父。

1679年 康熙十八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96)汪儒望”载：

“1679年在山东和直隶两省的交界处，曾掀起一阵非法迫害教友的灾难，地方群氓任意殴打教友，地方官也把教友拘捕投牢。汪神父即向北京呼吁，经南怀仁神父取得保教文件传示张贴后，教难立即平息，秩序恢复正常。”

1683年 康熙二十二年

《清朝全史》上册第四十四章《清俄通商及恰克图条约》载：

“俄国索还雅克萨之俘虏。”

“清廷待遇俄国俘虏甚优，授以官职，赐以裘帽，又编为八旗佐领，安置于北京城内一隅之地，许以信教自由，随本国风俗行祈祷礼拜等事，又进而以国费建设一寺院给予之，故康熙虽应特兰克之请放之使还，俄人皆住于北京，不欲归国。依中国官书所记，康熙二十二年，从尼布楚得来俘虏三十一名，将顺治五年来归之伍朗各里、康熙七年来归之伊番等编为半个佐领，以伍朗各里管理之。后又二回有俘虏七十名，遂编为整佐领，隶于镶黄旗。其措置得宜可知。其中有牧师一名米里者，在北京传教于俄人中，时年已高，俄国商人等恐其死后无人传教，请允许由俄国另派牧师。”

1685年 康熙二十四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96)汪儒望”载：

“1685年，山东临清有一位官员曾亲自培训600多名望教者，并自行出资为他们造了一所圣堂，他写信给汪神父请他去给他们付洗，信上说：‘神父，请来收获由你的神兄南怀仁神父在信仰上和学术上培养出来的一个门生所劝化的成果吧。’”

《中国基督教史略》第六章《中国的东正教》载：

“17世纪中叶，沙俄向东扩张，逐渐蚕食黑龙江上游地区的中国领土。……1685年和1686年，康熙皇帝连续出兵收复失地，攻下了雅克萨，将45名（一说近百名）战俘押送北京，安置在东直门内胡家园胡同，赐给旗人待遇，并将一座俗称‘罗刹庙’的庙宇赐给他们。战俘中有一名东正教司祭，名叫马克西姆·列昂捷夫，就将这座小庙改建成东正教教堂，称索菲亚教堂^①。”

《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三编《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第一章《俄罗斯正教传入中国》第一节《雅克萨地区的自卫反击战和康熙皇帝对俄俘宗教生活的关心》载：

“公元1685年（即康熙二十四年）中国军队在自卫反击战中包围了雅克萨城，‘……在占领阿尔巴津^②之后，即将阿尔巴津城内及其近郊区所有的俄国建筑物都付之一炬。’

“在雅克萨城对沙皇俄国侵略进行的自卫反击战中，曾经陆续俘虏了一些俄国入侵者，计有：公元1681年俘获的三十一人；公元1684年俘获的米哈伊尔等二十二人；公元1685年俘获的华西里·扎哈罗夫等四十六人。根据康熙皇帝的谕旨，前两批均送往北京户部处理，后一批只有六人送往北京。其余四十名送盛京安插。

“在送往北京的五十九名战俘中，有一名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的司祭。清政府按照处理战俘的惯例，发布了命令，其内容如下：‘罗刹归顺人颇多，应令编为一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籍。’因此，

^① 又称尼古拉教堂，后又称俄罗斯“北馆”。

^② 俄国人对雅克萨的称呼。

这些‘阿尔巴津’人(即这批俄国战俘)编在负责保卫京畿的八旗兵的镶黄旗中,为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十七牛录),驻地在北京城东直门内的胡家园胡同。清政府对于俘虏中的军官阶层分别赐予正四品至正七品的官衔,同时还赐给房屋、土地等,并隔一定时间给予津贴。满清皇帝还将胡家园胡同内的一座关帝庙拨给他们作为临时祈祷所,这就是北京人称之为‘罗刹庙’或‘北馆’的来历。被俘的‘阿尔巴津人’则称‘北馆’为‘圣索菲亚’教堂。由于这所教堂里有一帧由俘虏们从阿尔巴津带来的‘显圣者尼古拉’的圣像,而俄国人对于尼古拉圣像通常比对别的圣像更为崇敬,因此,这座教堂又被称为‘圣尼古拉’教堂^①。康熙皇帝还封马克西姆·列昂节夫司祭以七品官衔。当清政府尊重这些战俘宗教信仰的消息传到俄国以后,引起了俄罗斯正教会的十分关注。公元1695年,俄罗斯正教会托博尔斯克都主教伊格纳蒂·李姆斯基·哥萨阔夫托来华商队给马克西姆·列昂节夫司祭送来承认‘圣索菲亚’教堂的证书。按照托博尔斯克都主教伊格纳蒂·哥萨阔夫的指示,这座教堂应该正名为‘圣索菲亚’教堂。并在信中写道:‘你(指马·列昂节夫司祭)被俘虏,这对神圣的事业是有利的,因为基督的正教信仰要依靠你们来加以传播。’你‘不单要为沙皇祈祷,也要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个传播正教的立足点。’”

1688年 康熙二十七年

《燕京开教略》中篇《由明万历间耶稣会利玛窦来华至大清乾隆间遣使会罗旋阁之时》载:

“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七年冬,即降生后一千六百八十八年洋历正月二十九日,领受圣教会礼而卒。……皇上赐帑银七百两,以资建坟树碑。次年五月十一日发引。”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南怀仁》载:

“怀仁字敦伯,一字勋卿,比国人。一六二三年生,一六四一年入耶稣会,一六五九年(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来中国。墓碑(拉丁文)说他卒于一六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又说是‘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十二月二十六日’(中文)。按一六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是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二月二十七日,中文墓碑错一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96)汪儒望”载:

“在1688年的冬季4个月内,汪神父巡访了直隶的所有堂口,并付洗700多人。次年,汪神父曾被一名官员传到衙门并被起诉,罪名是宣传基督教。”

1690年 康熙二十九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二份《中国开教的初期》第六章《宗座代牧区与主教区》载:

“一、恢复圣系统

“一六九〇年四月十四日,教宗亚立山八世建立了北京及南京二个教区,葡王有权推荐新主教,但亦当供给费用^②。”

“下面是中国各省分为三个教区的名单:

广东、广西属澳门主教。

北京主教管辖直隶、山东、山西、蒙古、河南、四川。

浙江、福建、江西、湖广、贵州、云南,归南京主教管辖。”

^① “圣尼古拉”教堂后改名为“圣母安息”教堂。

^② 因有求于葡萄牙派舰队援助威尼斯公国。

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四章《中国教务情形》载：

“二、北京的第一任主教伊大仁

“一六四三年，他生于威尼斯城，在这城内，他进了方济各会……”

“一六九〇年四月十四日，北京教区与南京教区同时成立。因着葡王的推荐——他有权推荐——伊大仁主教 De Ila Chiesa 被任为北京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但教宗的诏书于一六九九年才到达。

“他……平安抵北京。既然没有方济各会的会院及圣堂，他乃住在山东临清，当时山东省由方济各会士管辖。^①”

1692年 康熙三十一年

《燕京开教略》中篇《由明万历间耶稣会利玛窦来华至大清乾隆间遣使会罗旋阁之时》载：

“皇上……谕大学士伊桑阿云：‘西洋人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又修造兵器，效力勤劳。且天主教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其进香之人仍令照常行走。从前部议奏疏，着撤回销毁。尔等……会议具奏。’

“礼部尚书顾八代与同官议毕，即上疏云：‘……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二月初五日奉旨：‘依议。’时降生后一千六百九十二年也。”

1693年 康熙三十二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86)何大经”载：

“何大经，字方济(P. Francois Pinto)，1662年5月29日……出生于葡萄牙科英布拉主教区的 Lougano^②。……1693年又到直隶、山东。他曾在正定府^③治理教务，在1696—1697年间，曾付洗1500多人。”

1694年 康熙三十三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80)郭天爵”载：

“郭天爵，字良贵(P. Francois Simois)，1650年9月8日出生于葡萄牙。……1690年调往中国，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几个月，后去山东和北直隶。在正定城内热诚传教有2年，后因卧病，被召回北京，1694年在京逝世。”

1696年 康熙三十五年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六《自顺治初至康熙末》载：

“教皇简放主教十二员分治中国教务

“……(一六九六年经教宗音诺增爵第十二简放)

“康主教西名德拉介萨^④为北京主教，驻山东临清州，兼辖直隶、山东、关东三省教务。”

① 一说伊大仁1701年入京上任，葡萄牙国王同意耶稣会的请求，不许伊氏在京居留，伊氏只得退居山东临清，建立主教公署。

②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作“卢萨诺(Loucano)”。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作“Ching-ting(疑指正定)”。

④ 即伊大仁。

1698年 康熙三十七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94)法安多”载：

“法安多，字圣学(P. Antoine Faglia)，1663年11月3日……出生于意大利的布雷西亚^①(Brescia)。……1698年在直隶正定府，1700年在山东济南府。”

1701年 康熙四十年

《中国基督教史纲》第十一章《第二次教难前后》载：

一七〇一年全国教务情形^②

会别	数量	省别	
		直隶	江南
耶稣会	住院	六	十六
	教堂	二十一	一百三十
	教士	十一	十五
方济各会	住院		二
	教堂		二
	教士		二

1702年 康熙四十一年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十一章《中国圣教掌故拾零》载：

“康熙时圣教传到地

“……在一六八七年，法国路易十四，亦遣有教士在中国。当时法国耶稣会士之传教处有(一七〇二年)宣化府，怀安，永平府……”

1703年 康熙四十二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73)张诚”载：

“张诚，字实斋(P. Jean Francois Gerbillon)……是第一批法国来华耶稣会会士的第二任会长(任期1700年11月3日至1706年)，确是洪若翰神父称职的会长继任者，是四大显愿会士，1654年6月11日生于洛林省的凡尔登。

“圣堂^③落成后，于1703年12月9日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祝圣典礼。

①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布雷夏”。

② 其他地方略。

③ 北京北堂的前身。

“从此时起,张诚神父当他在北京时,每逢主日就在新堂里宣讲教理,又为教友们谆谆教导各人应尽的本份。同时,他还积极协助各地主教神父:如在山东临清县城内为不久前被任命为北京主教的康和之主教(Mgr. d'Argolis)筹建住所……”

1708年 康熙四十七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260)杜德美”载:

“杜德美,字嘉平(P. Pierre Jarytoux),1668年生……于昂布伦(Embrun)^①。1708年,与雷孝思^②和白晋神父受命测绘中国全国地图。

“在测绘长城、辽东、北直隶和长城以外地区的工作中,杜神父作出了他的一份重要贡献。”

1710年 康熙四十九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264)汤尚贤”载:

“汤尚贤,字宾斋(P. Pierre-Vincent du Tartre),1669年1月22日……出生于法国洛林(Lorraine)省的蓬塔穆松(Pont-a-Mousson)。

“……因他是一位学有专长的数学家,被召去北京工作。其时,有一位在巴多明神父手里领洗的教友,在辽东永平府安家,他经常召集一些佛教徒,向他们讲授圣教要理,收效显著,有不少人表示愿领洗入教。1710年汤尚贤神父被派往那里为80名成年人付洗。因工作需要,会中上又派他去协助雷孝思和杜德美两神父测绘地图的任务。”

“(233)巴多明”载:

“巴多明,字克安(P. Dominique Parrenin),1665年9月1日,出生于法国贝藏松(Besancon)主教区的一个名Grand-Russey^③的小镇上。

“巴神父曾记述:

1710年,当我们在“热河儿”逗留的3个月间,我曾集合了从各省来此经商的教友们,他们都先后3次领了告解圣事。……又在那里给16名望教者付了圣洗。在长城附近,有一位教友向我报告说,那里有好些戍卒认识到我们天主教的各种善行后,正在向往领洗入教。果然,我碰到了40来名戍卒,对教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信德也很坚定……我就给他们付了圣洗,直到当天的傍晚,我才回到皇帝跟前。我就让教理讲解员留下,又把一些教理书本留给他们。……他们又给我介绍了20名已经培训好的同伴,我也给他们付了圣洗。

“当巴神父接到命令随从皇帝回京时,他已在那里建立了4所堂口。

“巴神父又在满清皇室和一些大臣贵族中也奠定了皈依基础,特别是苏努亲王(Sourniama)一家,神父对这位亲王合家在雍正朝因坚持信仰而遭受长期磨难一事,曾有所记述。在由巴神父前后付洗的10000余名婴孩中,有着乾隆帝的皇弟。”

隆德理^④《西湾圣教源流》^⑤第一章《味增爵会以前的西湾子》第一节《西湾子村》载:

“出张家口大境门外,缘清水溪东北进……有一村落,名曰西湾子,据称以溪水抱村向西作湾得

①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作“生于埃夫勒”。

② 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 1663—1679),字永维,法国耶稣会士。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大鲁赛”。

④ 隆德理(Valeer Rondelez 1904—1983),天主教神甫,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士。

⑤ 此书新译本作《西湾子圣教源流》,被辑入2001年由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文化协会与光启社合作在台湾出版的《塞外传教史》一书。编者注称:“原书用字稍为陈旧,且多北方风格,今加润饰,以供读者参考。”其改动之一是把“味增爵会”改为“遣使会”。

名。”

第二节《西湾子村的张姓》载：

“前不多几年，有位司铎在一本册子上记载了西湾村老户的家谱，此外还有村中一位老年人向我口诉可靠的历来相传的古语，并申述往事的由来。从这两方面，可以知道下面的事实：前清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张家住在新营子（西湾村南六十里），那张姓自奉天移至北京，由北京移居张家口外。张姓共分八门，我知道四门，蒙古语唤为‘伍什图’、‘奥木图’、‘六达子’、‘七达子’。原来八门不是教友，因他们底姓名，还在新营子庙里的钟上刻着，惟按相传说在一六四六年，移居到西湾子村。”

第三节《西湾子的第一个教友和第一座小堂》载：

“考查西湾子教友底由来，我们只有一件契据，作可靠的凭证。这契据是张明显画底押（一八四六），明显生在西湾子（一七七〇），按契文便知头一家教友为张姓，头一个教友为明显之曾祖根宗。他进教后，曾劝化了同乡人等进教，不多时，西湾子便有第一个小堂。

“我们知道张根宗底姓名，不晓得他进教的年月，但按考据推算，当在十七、十八两世纪之交。

“当时传教士等在中国究竟怎样？”

“耶稣会底教士们，在朝里有大名望，屡次奉命到蒙古地方，但也屡次声明了他们底希望是来蒙古办理教务。当时皇帝因为怕蒙古民族侵入国境，派下了重兵驻防长城。巴司铎（R. P. Parrenin）多次来到了驻防的兵营里，也相机给他们讲了圣教要理；那么，他们便创立了古北口会堂。在归化城，也有在他们手里奉教底兵士，驻防的兵士更有好些在张家口进了教。西湾子张家的那个信友，估量他也是在巴司铎手里进教。

“在耶稣会教士底书信里，殷司铎（R. P. d'Entrecolles S. J.）述说口外一个堂口底概况，虽然没有提明那村名，他的记叙，却很符合前面我所提的那约文，一七二六年七月二六日，记叙那年复活瞻礼事实。他的记载如下：‘本年复活瞻礼，有口外堂口底一位会长来见我，他说巴司铎随从皇帝北来的时候，给我付洗，这个人虽是新教友，常有种田生活的工作，但也真有传教士底热忱，因着他底善衷，他底兄弟们和亲戚家，连同全村底居民，一百上下人，都进了教，只剩下了两个人，没有劝化过来。他用了我们施舍的款和他们教友一份子地摊款，在一个隐密地方，建筑了一座小堂，到如今没有受地方官查禁，也自由地到堂里聚会诵经。’

“照以上的考核，我们可以结论：一、西湾子头一个教友为张姓中的一人，他在巴神父名下，一七〇〇年前后，领得圣洗；二、当时西湾子已有第一座小堂。”

《中国教友与使徒工作》第二章《顺治及康熙朝》“肆 教友使徒”载：

“永平府及古北口的教团

“在康熙朝供职的巴多明神父（Fr. Parrenin）在1710年所写的一封信中叙述另外一件由在俗教友创建教团的典型例子。康熙帝最看重巴多明神父，二十多年来皇帝常带着他每年出长城巡游。永平府住有一位新教友。巴神父述说：

‘这位热心的教友在那里以出奇的热诚担任了传教士的职务。他招集了大批敬拜偶像的人给他们宣讲教会的真理，效果很大，致使大部分的人要求受洗。他立即来北京找我。适值我随驾去了南方，另一位神父代替我到了永平府，给八十名成年人付了洗。及至我回来，派了一位这里的传道员去坚固那些新教友的信德，正如我所希望的，他希望赢得许多人进教。

另一位教友来向我报告他使驻扎在长城口（古北口）的许多士兵认识了我们教会的卓越优点，他们被他的理论所感动，急切希望受洗。我立即派一位传道员前去再认真地教育他们，只等我随驾去该城时给他们授洗便够了。当这位皇帝路过长城的那天，我便起早前去，我的确看到已准备好而且对信仰很坚强的士兵，他们流着泪向我哀求收他们为信友；我都给他们付了洗，直到傍晚才告别他们去追随皇上；但给他们留下了传道员和我带去的一些教会书籍。’

“恐怕有人认为这些洗礼未免太仓卒；在我们这个时代，情况完全不同，当然向望教者要求更长的

考验时间。但对准备的这样好的人,又非为任何利益的动机所催促,又恐怕多时没有机会再见到一位神父,能够拒绝给他们付洗吗?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些新教友的信德确实坚强。

“巴神父继续写道:

一月以后,这些新教友派一位代表来热河见我,向我报告他们的一位官长决心让他们背教;威胁利诱全归无效,乃以非人道的手段对待他们;他既然是他们的统帅,很可能无故伤害他们;不过即使受极刑而死,他们也决心宁死不背信德。他们说我们所怕的不是他加给我们的虐待,我们所烦恼的是我们当中尚未奉教的战友再不愿听我们的讲劝了,怕的是同我们受一样的虐待。

我回来时又去看他们,他们都以不愧老教友的热诚办了告解;我对他们作了一次很长的训话,最后他们给我介绍训练好了的二十位战友,我给他们付了洗。他们随即又请我在他们当中成立一个善会,将我认为是最有能力的几位做他们的领袖,教育他们,指导他们待人接物。他们每人都秘密写了选票放在一起。我打开一看,发现他们的选择很有见识,因为他们所选的三位最热心,最有知识,对作这个善功也最有空闲。我认可了他们的选举。他们既然在集会的小房内过分拥挤,便向我提议另外买一座能以方便集会的房子。我给了他们五十两银子,不足之数他们自筹,我希望不久将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教团。

“五年以后,巴多明神父再次经过那个地方,发现那个教团果然蒙受了天主的降福,他写道:

它已不是一个开始的传教区,乃是一个已建立起来的传教区,而且对传教很热心。我以前所使人盖的圣堂现在太小了,连前庭在内还容不下人们的半数;我上月路过那里时,又给三十多人付了洗。”

1711年 康熙五十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256)龚当信”载:

“龚当信,字东平(P. Cyr Contancin),1670年5月25日……出生于法国的 Issoudun^①;1711年,他在北京期间,曾探望过居住在宣化府和长城一带的教友,在那里,他曾给70人付了圣洗。‘有8位教友,其中6人是家长,竟从40里外地方赶来领受圣事……他们已和 Tsao-Ta-Tse^② 的鞑靼人同化了。’人们希望通过他们,把天主教传入那里。龚神父还负责某些法籍神父的传教区,在这一年间,曾给1100名成年人付了圣洗;他曾注意到从1700至1712年间,在北京的3处堂口总共劝化5万多人。

“他在1716至1719年间曾任法籍神父住院院长,此后他被调往江西。”

1715年 康熙五十四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伊大仁》载:

“当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教宗通谕寄达中国后,伊主教曾派康和之神父(Carolus Horatij)于康熙五十三年阴历十二月初四日(一七一五年一月九日)往北京公布,为耶稣会士所劝阻。罗马方面昧于中国情形,于一七一五年三月十五日,再颁一谕,首句为……‘从登极之日’,态度强硬,措词较前严厉。次年八月,通谕寄达广州,伊主教再遣康和之人京公布,阳历十一月五日抵京,六日公布,七日即被捕入狱。康熙禁教乃愈益变本加厉。”

《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三编《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第一章《俄罗斯正教传入中国》第五节《清政府的轻信态度和早期俄国“汉学”研究的目的》载:

①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伊苏登”。

②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音译作“糟达子”。

“早在公元1715年4月30日，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到达北京以后，清政府立即给予他们这样的待遇：发给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八百两银子，其它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六百两银子，教堂执事人员每人二百两银子，让他们用这笔钱为自己购置房产。同时，还发给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七百两银子，给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五百两银子，给教堂执事人员每人一百五十两银子，让他们作为购买奴仆的费用。理藩院还按月发给修士大司祭和其它神职人员一定数量的津贴，按中国农历的大月（按三十天计算）和小月（按二十九天计算）进行计算，大月每人发四两五钱银子，小月每人发四两三钱五分银子（合每人每天一钱五分银子）；对每个教堂辅助人员每月则发给一两五钱银子（合每人每天五分银子）。此外，每三年还发四季所需衣服一次，每过五天还送鸡、鸭、鹅、羊等各种食品一次。也就是说，当时驻京传道团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包括薪柴均由清政府供应，这种状况从公元1715年起，一直维持到公元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才告结束。”

1716年 康熙五十五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285)阳秉义”载：

“阳秉义，字履方(P. Francois Thilisch)，1667年……出生于波希米亚^①(Boheme)，1716年9月8日卒于热河。

“1716年1月1日，阳秉义和苏霖两位神父奉命同去长城，因为那里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山石滑坡，堵塞了长城隘口的主要通道；他们负责用机械清除石块。但当地气候严寒对神父身体极为不利，加上旅途遥远，长途跋涉之后已经疲惫不堪，终于染上绝症。”

1717年 康熙五十六年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十一章《中国圣教掌故拾零》载：

“康熙时圣教传到地

“康熙末年，在中国传教之耶稣会，分为日本省及中国省。……在一七一七年……中国省之耶稣会共有住院三十七，公学四。其所在之地如下：北京，正定府……此葡国之耶稣会（但亦意、德、法、比等籍）……”

1722年 康熙六十一年

张泽^②《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三章《乾隆禁下的天主教》第三节《乾隆禁下的传教活动·三、教友传教》“貳 教友自立堂口”载：

“我家在冀中任邱县，当时属于直隶省，因近京畿，所以条件比较好一点。我们张姓家，大约在清康熙末年奉了教，奉教的起因大约是与先已奉教的近处刘姓人家联姻促成的。刘家属汉军旗，清初在北京奉了教，不久来任邱一带圈地定居，号刘千顷。刘家自北京带来了天主教，也从皇家那里带来了教中各种器物，这些器物都称得是精品。笔者幼时曾在石家营堂中见到的有中国乐器、旌、经本、提炉、圣像（三大张，据说是郎世宁所绘），还有南怀仁印制的巨幅《坤舆图》等。这些东西一直保存到了所谓‘文化革命’前夕。经过一百多年的仇教反教运动，这些物品，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失，可知这一带教难不是太严重的，而且任邱一带的老堂口，也未听说有大批背教的事发生。”

^① 1918年以前中欧的一个内陆国家。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今捷克首都布拉格曾是波希米亚最大的城市。

^② 张泽(1925—2003)甫甫，河北任邱人。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历史系。1953年卧病在床。1993年起在河北省神学院任教。另著有《美好大自然》《天儒合一新论》等书。

第二编

清朝中叶基督教的传播与被禁(1723—1845)

1723年 世宗雍正元年

《中国教友与使徒工作》第三章《教难时期(1723—1851)》“壹 圣教会的一般情况”载：

“立法

“……雍正即位的那年，教难便在福建开始了。该省总督公布了一道驱逐西洋教士及关闭教堂的命令；这道命令先寄至北京请求礼部批准；礼部不但批准了，还扩展至各省及所有的传教士，连由康熙帝获得居留票者也不例外；皇上将他愿保留为他利用的神父遣至北京，其他发配至广州，稍后又驱逐至澳门，三百座圣堂被拆毁，或被充公，或改为寺庙。

“从此教会禁止举行一切敬礼及一切传教事项。……这些法令无疑并没有一一严格执行；有过喘息阶段，即有些地带暂时予以容忍。这都系于地方官的好恶与权力。有时官员并非不晓得在他们治下有教友和传教士的存在，但晓得神父们还被朝廷优待，于是便闭上眼睛不加深究；或者为避免被控告疏忽铲除教会的罪名，或者为了避免遣发传教士至京师的麻烦及花费；或者甚至怀有媚神的意念，以遂其腐化之欲，便奏明皇上在他们所辖的境内已没有教徒。

“但窘迫的威胁常如以马尾悬在头上的利剑，稍有风吹草动，便有摇摆而下坠的危险；于是教友被追踪逮捕，以酷刑逼令背教，被判杖刑、坐牢或发配充军。”

“神父

“当神父们尚能在朝廷上立足时，只是致力于与传教无直接关系的工作，如天文、建筑或装饰皇宫以及绘画等。……在北京蒙准开放的圣堂内，他们能举行敬礼，并给四五万教友（这是当时北京一带的教友的数目）施行圣事；教友有时自很远的地方来参加礼仪领受圣体，但神父们在教堂外的活动是被严格禁止的。”

“传道员

“在这段冗长的时期，教友数目的总计是减少。……更应注意的是历雍正及乾隆两朝，传教士们多次报告他们付洗了几十名成年人。”

“会长

“在由神父所供应的行脚传道员之外，还有做教团领袖的‘会长’，神父不在时，他们维持教友们的宗教生活；他们是由教友中选拔出来最热心守规矩的，在共同祈祷时领经，报告瞻礼（节日庆日）的日期，给教友们传达主教神父们的通知，照顾病人，辅助垂危者，监督儿童们的宗教教育。

“这些会长可能隶属于社会各阶层……

“他们负责经理先人遗赠给教团的财产，有时数目很可观。给新生的婴儿代洗，监督婚姻，使符合教会的规定，当时局不太恶劣时，请一位神父来行圣事，保证他的安全，这一切都归会长们操心。他们得收集必要的基金，用为送信者的旅费，传教士及事业的维持费，救助贫病以及官员们婚丧应酬的费用等。对官绅所时时发动的欺压，他们自然又是为首的牺牲品；为避免被控告，导致破产的诉讼和坐牢，常须要他们破费。许多家庭不惜牺牲财富，甚至破产，以保持自己宝贵的信德。”

“一般教友

“也有许多信友不怕冒生命的危险在家中接待神父，隐藏他们，在转移工作时做他们的向导，替

他们送信。许多传道员、守贞的姑娘和普通信友，宁受刑罚、充军发配或死刑，也不肯叛吾主耶稣基督。”

1724年 雍正二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269)冯秉正”载：

“冯秉正，字端友(P. 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年12月16日……出生于Bugey^①地方一门古老的望族家庭的封地‘玛雅^②城堡’(Chateau de Maillac)，属Belley^③主教区。

“我们的教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被查禁；所有传教士，除在北京朝廷上供职者之外，已全部被驱逐出境；所有教堂(300所以上)或被拆毁，或被充作他用；30多万教友失去了他们的神父，成为无牧之羊，并丧失了一切神圣的权利；禁令已四处张贴，在严刑威胁下责令所有教徒放弃信仰，并禁止一切国人信奉。这是200年来用多少心血和辛劳培育起来的传教区所面临的悲惨遭遇！……”

“这是冯秉正神父在1724年(雍正皇帝发动教难期间)写的陈情书中的片断；到1732年，情况仍无变化：‘对过去兴旺发达的这个传教区的前景，我们毫无好转的迹象可言，它还在滑坡，滑向谷底。我们唯一的仰望，就是依靠我们虔敬奉事的上天大主大发慈悲。……我一个人曾给50名成年人付了圣洗，至于受洗的婴孩，为数就更多了。要是环境安静的话，我们是大有希望的！’”

《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二章《雍正严禁下的天主教》第二节《雍正之迫害天主教·二、全国大兴教难》载：

“例如山东布政使费金吾奏疏山东禁教之事^④称：

兹……查得临清州原有西洋人康和子(又作康和之，雍正登极前一年，传信部方济各会士伊大仁主教逝于临清，由康和之代理北京教务)，于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进京，现住京城西直门内仁桥天主堂内，所遗天主堂已改为公所。”

第三节《雍正教禁下的传教活动·一、北京》载：

“在北京城外的海甸正福寺原有方济各会的总铎区，雍正禁教后，这里就不能公开活动了。但也被取消。雍正二年，从临清被逐出的会士康和之副主教来此驻扎，他还能每年赴山东视察教友一次。雍正十二年他返回罗马，继之者为布若望神父。教堂直到嘉庆十年还保留着，虽然早已没有西洋神父存在了。”

《中国基督徒史》第15章《信仰与礼仪》载：

“容于宫中 隐匿于各省

“1724年1月，雍正签署了礼部以这样的措辞而呈奏的本章：

宫中的西洋人有益于治历，他们于宫中还做出了其他效役。但居住在各省中的传教士，却毫无裨益。他们将那些无知的男女，都吸引到其宗教中，以礼拜的名义而男女无别地聚集在一起。帝国为此一无所获……

“在那些于京师有益的欧洲人中，应该包括由4名司铎和6名学生组成的一个布道团。”

①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比热”。

②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迈拉”。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贝莱”。

④ 原注：朱批谕旨；雍正七年条。

1725年 雍正三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四章,《中国教务情形》载:

“三、伊主教的继位人

“伊主教的继位人大都为葡国人,有些根本没有上任。

“I. F. Purification 为义国奥斯定会士,一七二五年被任为北京主教,但因雍正教难,未能入北京。一七三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逝世于澳门。”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213)高嘉乐”载:

“高嘉乐,字怀义(P. Charles de Rezende),1664年11月4日……出生于里斯本。……1696年出发去中国传教区。神父在教区内生活达50年;在正定府28年,在北京22年。在北京时,曾任两处住院院长,1724年任副省会长职。他为人和蔼慈祥,忘我工作,处事审慎周详,深受所有教士的爱戴。他在正定府时,教灵工作成绩斐然(1725年)。他在保定府广扬基督神国的热忱,和劝化教外人的巧妙,已为人们所熟知;他负责那里分布地区很广的16处堂口。

“当雍正朝对教会发难时,高神父已被周围密探当作明确的监视对象,为此会内上级把他调去北京钦天监供职,另派一位中国神父去负责那里的教务,照顾培育当地教友。高神父只是名义上任钦天监职务,其实他一直在城内和郊区奔走,鼓励一些在教难中有畏难情绪的教友,扶持一些因软弱而跌倒的,对所有教友晓以大义,坚持信仰;同时,他还引领一批新教友投入教会怀抱。”

1726年 雍正四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一章《味增爵会以前的西湾子》第四节《耶稣会底教士开教和管理西湾子村》载:

“前清雍正皇帝年间,泰西教士等不得自由传教,当时(一七二四年一月十一日)皇帝出了上谕:(甲)为国有益的西教士准予住在北京。(乙)除澳门外西教士不准居中国。(丙)人民不准进教。到底那时候,还有好些华籍耶稣会底教士,犹能去传教,我知道其中的五位,即樊、郝、程、罗、刘五位中国神父,他们就替西教士出去传教,我确定知道樊司铎在一七二六年来过西湾子,他由北京往新堡子去,为探望自北京充军地那贵族教友。巴司铎在他底书信上(一七二六年八月二四日)记载如下:‘回北京的时候,樊司铎去探望北方堂口地教友,全如我底委令行了,他去了宣化、大东沟、沙城,也给我们述说能很感动我们心地事情。’”

1727年 雍正五年

《中国基督教史略》第六章《中国的东正教》载:

“1727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为沙俄外交代表,并在东江民巷(后称东交民巷)拨地一块建立‘奉献节教堂’,又称俄罗斯‘南馆’。

“从1712—1860年近150年间中国东正教会只建立了13座教堂,总共有155名传教士来华工作。北京是唯一传教中心,信徒不满200名,其中还包括一些雅克萨战俘的后裔。”

《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三编《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第一章《俄罗斯正教传入中国》第三节《“特洛伊木马”进入北京和1727年〈恰克图条约〉的签订》载: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七月十八日由策凌、图里琛等官员同俄罗斯使臣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中有一款是:‘在京城之俄馆,嗣后仅准前来之俄罗斯人居住。至俄使萨瓦请求修庙一节,由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协助于该馆内盖庙。现在京喇嘛一人住该庙,又按请求再准补派三名喇嘛,俟其到达后,照先来喇嘛之例,供以膳食,安置于该庙。凡俄罗斯人等,可按其规矩前往礼拜念经。再将萨瓦留

于京城念书之四名學生以及通曉俄羅斯文、拉丁文之兩名成年人，亦准住此廟，並以官費養之。’根據這個條約，使俄羅斯正教會取得了定期派遣傳教士的權益，並且取得了在北京東江米巷（即以後的東交民巷）建立新教堂的權利。公元1732年‘奉獻節’教堂建立以後，‘顯聖者尼古拉’的聖像由‘聖索菲亞’教堂遷到‘奉獻節’教堂內。”

1729年 雍正七年

《清代禁教時期的天主教》第二章《雍正嚴禁下的天主教》第三節《雍正教禁下的傳教活動·四、其他各地》載：

“雍正七年，山東布政使費金吾在上皇帝奏章上說的，山東濟南西洋人南懷德等於雍正二年轉到北京去後，還留有房產未動，‘因部文未經指明，所以尚有房屋八間，墳地七畝，不敢一併改為公用，以致西洋人仍暗中托人每年潛收租息。’而臨清康熙和之在雍正二年十月進京後，‘尚有房屋三十七間，並地四頃九十二畝，亦係西洋人暗中托人每年潛收租息。’

“臨清所以有如此大的房產土地，是因為那里是北京第一任主教伊大仁（亦作伊大任）的住所。康熙二十九年，北京教區成立，伊大仁被任第一任主教，三十八年祝聖。但伊主教是方濟各會士，而方濟各會在北京無會院，所以常住山東臨清。雍正反教，教士被逐，但房產尚存。費金吾的奏文說西洋人每年還暗地里托人收租，四十來間房，五頃地的租金可能不少，康熙之副主教自北京每年回山東視察一次，主要是照顧那里的教友。雍正九年康熙副主教返回羅馬，繼之者為布若望，同時還有五位屬傳信部的方濟各會神父，分別在山東及直隸的清河、廣平、莒州^①、南皮、東光等處傳教。”

1732年 雍正十年

《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三份《遣使會士至中國傳教》第一章《最初遣使會士至中國的環境》載：

“九、雍正的教難

“一七三二年八月二十日，外國傳教士當迅速離開中國，其中五十三位，廿三位可留在北京，其餘三十位坐小船，由大船保護，於八月二十四日安抵澳門。”

1734年 雍正十二年

《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310）樊守義”載：

“樊守義，字利和（P. Louis Fan），1682年6月13日生，1709年入會，1720年回國（中國），1730年2月2日發助理神職人員願，1753年2月28日卒於北京。

“樊守義神父，1682年出生於山西絳州（據墓碑）。他曾留學意大利，先在都靈，後在羅馬攻讀；1709年在羅馬進入耶穌會。讀完神學後，就領受鐸品。後在里斯本乘船返回祖國，同行的有重返中國的艾遜爵^②神父。艾遜爵神父在航行途中患病臨死時，樊神父在旁送終，并把艾神父遺體帶回廣州安葬。

“康熙帝因急於了解艾遜爵神父奉皇命出使羅馬的消息，立即召樊神父進京。從此，樊神父就在北京度過了牠的一生。神父在北京及其周圍傳揚福音，足跡所及：南至山東，北至長城。

“在整個雍正朝時期（1723—1736），以及乾隆朝（1736—1796）的初期，樊神父曾為被發配邊陲服

^① 莒州在山東不在直隸，疑為“冀州”之誤。

^② 艾遜爵（Joseph-Antoine-Provana），字若瑟，意大利耶穌會士。1695年抵澳門。先後在江西、河南、山西傳教。1702年被召赴京。1708年初奉清康熙皇帝命出使教廷，先到葡萄牙，次年抵羅馬。因病留居意大利，樊守義陪同游歷，1718年回葡萄牙，次年病未愈即欲返華覆命，會友阻之不听。1720年2月7日行至好望角附近歿於舟中。

苦役的苏努亲王一家,作了大量的超性方面的和物质方面的帮助。因为樊神父是中国人,他的行动虽在教难期间也不致引人注目;所以他能直接到亲王们被充军的地点,比较方便地去探望他们。

“樊守义神父,为了去探望他们,几乎每年要作一次鞅鞞之行,伪装成挑货郎担的小贩。……在返回途中,樊神父还不失时机地探望了沿途一些堂口的教友。

“当这些受充军之苦的勇敢信友,有的死了,有的被释放回来后,樊神父就集中精力于传教工作;当时在直隶和辽东两地就只有樊神父一人还能前去探望教友,鼓励他们维护信仰,坚持信心。1735年,副省会长神父特别指出他是一位优秀的传教士;他在上一年度曾给298名成年人和315名儿童付洗,听神工1260人次,送圣体1246人次。1743年,樊神父在正定府,后又在威县。在正定府时,有一位双目几乎完全失明的老学究,在他刚领圣洗之后,双目竟突然完全复明。这个奇迹般的事迹,引起了100多人的归依信奉圣教。”

《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二章《雍正严禁下的天主教》第二节《雍正之迫害天主教·二 全国大兴教难》载:

“京畿顺天府所属文安县、古北口、宣化府等处都有圣堂,这时也都改为官所了。雍正十二年,直隶省高阳、任邱一带也兴起了严重的教难(资料缺乏,待考)。”

1740年 高宗乾隆五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四章《中国教务情形》载:

“三、伊主教的继位人

“……2. 索智能主教 Souza 葡国耶稣会士,一六九七年正月二十六日生于葡国孔布拉 Coimbra 城,一七二六年至中国传教,一七四〇年十二月十九日被任为北京主教。一七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去世。”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三二〇 索智能 葡萄牙人”载:

“索智能(Polycarpe de Souza)主教字睿公,科英布拉城人。……一七二五年随国王若望五世专使赴中国。先传教南京,已而赴北京。一七三二年在北京发四愿。留华十三年后,于一七四〇年十二月十九日被承认为北京主教,于次年在澳门行祝圣礼。然其间不无波折。缘有人在罗马诬其反对宗座所布关于礼仪之命令也。赖葡萄牙国王力持其所提出之人,兼有宣教部人员二人为白其诬,始为教廷承认。”

1743年 高宗乾隆八年

《献县天主教志》第一章第二节《天主教的传入》载:

“乾隆八年(1743年)前后,河间、献县共有分布在两个县城和42个村庄(分属15个堂口)的教徒3000余名。威县一带则有教徒2000名左右,由中国神甫范类斯^①管理。”

1745年 乾隆十年

《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三章《乾隆禁下的天主教》第三节《乾隆禁下的传教活动·三、教友传教》“贰 教友自立堂口”载:

“据乡老言,我村在鸦片战争前存在的旧有的一个土坯小圣堂,可追溯到乾隆的中期,大约是半公开的集体念经行圣事。又据乡老说,那时不时有自北京偷来传教的神父,夜间背著小包袱,来给教友们

^① 即樊守义。

行圣事。对面生的神父，教友们还要考问他是否是真的天主教的神父，然后才领他的圣事。

“有案可查的，乾隆十年，任邱所属的河间府已有教友三千人，每年成人领洗的尚有三四百人。在禁教时期，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很可能有若干像我家乡那样的隐密的堂口，它们没有像宝坻老家庄那样被没籍，可能是因为没有被官府告发的缘故。直到今天，我张家和相近的刘家人数约在千人左右，没有一个是外教的。这证明三百年来，虽然经过了多次教难，但都没有失去信仰。”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七《自雍正至咸丰末》载：

“北京当日情形

“……外省方杀戮教士，拆毁教堂，逼令教民背教，而北京神甫乃能晏然传教，与从前康熙时无甚大异。……自乾隆十年以后，西洋神甫亦能照常传教，北京三堂瞻礼日鸣钟集众，教友济济登堂，神甫宣讲圣道，一如平日。六部大员近在咫尺，皆熟视若无睹也。据当时神甫记载，乾隆时，京都与近畿及关东口外，教友不下四万，每年成丁领洗者足有千人之谱。傅作霖神甫传教直隶，记河间府教友三千，每年领洗人丁约三四百，他处大略相同。京都宗室奉教者五家，或即苏努之后，不可考。此当日中国圣教情形也。”

1746年 乾隆十一年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上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 乾隆朝》辑：

8月29日(七月十三日)^①直隶总督那苏图奏报申禁西洋人行教摺称：

“……乾隆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传：‘现在福建福宁府属有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妇礼拜诵经；又以番银诱骗愚氓，设立会长，创建教堂；种种不法，挟其左道煽惑人心，甚为风俗之害。天主教久经严禁，福建如此，或有潜散各省，亦未可知。传谕各省督、抚等，密飭该地方官严加访缉。如有以天主教西洋人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其西洋人俱递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国，毋得容留滋事。倘地方官有不实心查拿容留不报者，该督、抚即行参处。钦此。’……仰见我皇上严惩邪教以端风俗人心至意。……无如日久法弛，不免潜行勾煽。”

9月7日(七月二十二日)直隶总督那苏图奏报查获习教民人摺称：

“窃巨覆奏‘严行侦访，如有天主教名色引诱男妇聚众念经者即行查拿惩治，其西洋人即递解勒令回国’一摺，奉朱批：‘览。直隶现在有无之处，何不奏明？钦此。’……今访得直隶河间、天津、古北口及近京州邑颇有传习天主教之事。兹查有清苑等县民人刘英儿、赵二、孙玉书、马得明、宋奇圣、杨顿、贾志英等七名，起有经文、十字(记)[架]、念珠等物，陆续拿交保定府。讯供均系匠作愚民，在京师天主堂传习入教，并无西洋人到境及引诱他人入教诵经等情。又据河间府献县禀报‘访有村民周士俊周宗家藏天主教画像、经文、十字架，讯系周宗故父在京带回’各等情。臣伏念天主一教，所重金在西洋倡教、立堂及设立会长煽诱之人。今各犯均系乡愚，所供传自京城天主堂内，止于一身被惑，并无转相勾引之事。应即照例枷责，谕令改悔。将经文、念珠、十字(记)[架]即行销毁，交保严加管束。其供出天主堂传教之傅姓、张姓、戴姓等人是否西洋倡教之人，咨行顺天府尹查明办理外，巨另加根访。如有西洋人在直倡教煽惑及指称会首名色传习、聚众念经者，按律分别治罪递解，断不容其漏网。……至此凡似此等被诱愚民，臣将供出传教之人拿究，其被诱人教者酌(请)[情]立于责惩，将经像销毁，勒令改悔，以示儆戒，毋使羈累，以广皇仁。”

“(朱批)^②：‘止可如此办理，不必过严以滋扰。’”

^① 本书标出的公历(用阿拉伯数字)与夏历彼此对应的日期除《义和团档案续编》《山东教案史料》《山东义和团案卷》全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部分文摘外，均为本书编者所加。

^② 乾隆手迹。

《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三章《乾隆禁下的天主教》第三节《乾隆禁下的传教活动·二、地下活跃的传教士》“壹 乾隆初年”载：

“河北一带，除北京不计外，各地也大都教务发达，如河间府，每年成年人领洗的约有三、四百人。到乾隆十一年，教友总数已达三千人。据《高宗实录》卷二二八记载，有位西洋教士李世辅，曾在北京海淀堂里居住过。在乾隆初年，潜行到直隶、山西、陕西传教多年，授洗了許多人，到乾隆十一年被捕。这期间，中国神父樊守义也在直隶、辽东各地秘密传教，直到乾隆十八年去世为止。”

1747年 乾隆十二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349)魏继晋”载：

“魏继晋，字善修(P. Florian Bahr)，1706年8月6日……出生于西利西亚(Silesie)的福根堡(Falkenberg)^①……”

“魏神父在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字方面，进步神速，成绩显著，一年之后就能当众讲道，如此30年之久；有时在北京城内，有时在周围附近，每逢主日和大瞻礼日，从未间断，有时一天之内早晚两次。他讲道时姿势优雅，内容清晰，使本地满汉听众，都感到娓娓动听，听而不倦。”

“魏神父也曾到过宝坻县传教，离北京约有5天行程(在北京东南约80公里处)，收获很大。那里有两千教友，分散在近百个村庄里；他们每逢主日，分别集合在11处圣堂里，集体念经祈祷，相互勉守教规。1747年，曾为71名成年人和427名儿童付洗，听神工1993人次，送圣体1974人次；下年1748年曾为292人付洗，其中成年人为41名，听神工2314人次，送圣体2224人次。其间，他不时返回皇宫，为了检验乐器，纠正音调，修理管风琴和其他乐器。”

“鉴于他为人审慎明智和办事的丰富经验，他被推举为公学院院长凡6年，任中国和日本两地教区的监会铎者9年，自1762年至去世为止。”

1748年 乾隆十三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351)刘松龄”载：

“刘松龄，字乔年(P. Augustin de Hallerstein)，1703年8月2日……出生于奥地利的Habacen^②，属Carniole省^③，是当地一家古老而显赫的伯爵家族……”

“1748年，有人在皇帝前指控刘松龄和傅作霖两神父：给那些蒙难教友散发经本、圣像、念珠和其他宗教用品。他们因此而被传询。但皇帝对此事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予干预，此后，于1766年，刘神父写信说：“我们在京城和近郊(约一两天路程的范围)有若干传教地点，我们还能顺利地从事传教活动，成果可喜。”

“(353)傅作霖”载：

“傅作霖，字利斯(P. Felix da Rocha)，1713年8月31日……出生于里斯本，在修毕4年哲学和4年神学后，申请去中国并蒙允准。他到达中国后，被派在朝廷任历算工作。虽身在朝廷，但对救灵事业，从未或懈。当他通晓中国语言后，教区领导就委任他负责河间府的堂口管理工作。1743年，那里已有教友3000多人，分属于15个堂口；他曾给200名成年人和161名教外儿童付洗，听神工2487人次。1746年，他付洗357人，听神工2711人次，送圣体2670人次。”

“傅神父学识渊博和圣德不凡的令誉不胫而走，竟使本省总督的夫人也认识真道而皈依圣教。从

^①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作“西利西亚之法耳肯堡”。按：此为德国地名。

^②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哈巴森”。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卡尔尼奥拉州”。

此,这个堂口在总督夫人的关怀下,成为直隶省教友最多、最热心的堂口。

“当1747年的教难时期,傅作霖和刘松龄两神父曾被京畿提督传讯,追查有关向教友散发十字架、圣像、念珠等宗教用品的事件;傅神父直认不讳,是他所为。于是提督向皇帝奏请处置。但皇帝谕令免究。”

1750年 乾隆十五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330)高若望”载:

“高若望^①(P. Jean—Etienne Kao),1705年生,1731年3月8日入会,1741年12月8日发助理神职愿,1766年7月24日卒于北京。

“高若望神父出生于直隶省宣化府。……1745年,高神父在北京;翌年他被派去广州和澳门,原因是由于仇教者正在严密搜捕他,认为他是一个主要的,也是特别得力的宣传教理的人员。……后又返回北京,在法籍神父负责的教区内,大力传扬圣教。1750年,他听神工2450人次,送圣体2042人次,付圣洗:成年人150名,儿童250人;1751年,送圣体2600人次,给成年人付洗91人,儿童151人;1754年,有成年人133名,儿童197名领受圣洗。”

1757年 乾隆二十二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352)南怀仁”载:

“南怀仁,字菽德(Mgr. Godefroid—Xavier de Limbeckhoven),1707年1月9日……出生于维也纳的一门贵显的望族……

“1771年,南主教^②在忧伤焦急中,写信给总会长老楞佐利济神父(P. Laurent Ricci)说:‘既然,五年以来,我生活毫无接济,而葡王在他保教权范围之内,又不准有一个耶稣会会士的存在,连唯一支持我的果阿总主教也把我抛弃了;对我来说,辞职让贤可能是上策。’……

“不仅如此,北京教区的领导任务,二十多年来也压在他的肩上。索智能主教逝世后,按特利腾(Trente)公会议规定:‘一个教区主教缺席,在新任主教尚未产生之前,该教区的行政权当由就近教区的主教兼顾负责。’南怀仁主教于1757年8月31日起,通过发自衡州的一份公函,接管了北京教区的教务。

“随着1773年撤销耶稣会的敕令于1775年6月17日才接到,同时附有发布时应遵守的细则。负责执行这项敕令的,恰恰是这位老耶稣会会士。”

《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三章《乾隆禁下的天主教》第三节《乾隆禁下的传教活动·三、教友传教》“叁 模范传教员”载:

“另一名传教模范李松,是山东历城县城东谷家坟庄人。……于乾隆二十二年同广东人李刚义往广东澳门,引西洋人梅神父到达北京,随后又去山东临清、直隶威县等处传教。”

1759年 乾隆二十四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408)蓝方济”载:

“蓝方济(P. Ignace—Xavier Lan),1727年8月23日……出生于中国的直隶省,早年送往法国留学……1748年在法国进了耶稣会。攻读哲学一年和伦理神学两年之后,于1753年由努瓦荣主教

^① 译者注:高若望神父又名高尚德,字怀久。

^② 1750年5月15日被任命为南京教区主教,1755年7月22日被祝圣。

(Mgr. de Noyon)祝圣为神父,1754年到达澳门,不久就在这一年内,被派往湖广工作。1759年,蓝神父被指名告发,在湖广省的一个重要县城衙门受审……

“人们把他作为一名教友来处理。……蓝神父在受审时,也没有看到任何刑具。就平安地被释放了。

“此后,蓝神父被调到北京,协助法籍神父照管教友。”

1770年 乾隆三十五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430)晁俊秀”载:

“晁俊秀,字济各(P. Francois Bourgeois),1723年3月21日……出生于法国洛林省的 Pulligny (Meurthe)^①……

“1770年,晁神父到离北京约有两三天路程的山区里去,为那里的穷苦山民传布福音。这个教区是赵圣修^②神父开辟的。‘去那里的山路,其艰险是难以想象的:为了绕过山沟里的急湍,就得攀登峭壁,沿着羊肠小道前进,这些小道只有二尺或二尺半的路宽;右边是笔直的悬崖,其高度有像我们法国南锡主教大堂的钟楼那样高;左边是极深的峡谷,踏空一步就得掉入深渊,那里尽是些乱石……我的坐骑曾三次跌倒,四脚匍匐在地,但它既没有擦着右边的石壁,也没有把我摔下左边的深谷。’”

1771年 乾隆三十六年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二册《朱家河堂口的概观》载:

“朱家河的教友……姓范者虽少,其先代却曾出过一位神父,圣名西满,讳天成,号之仁。生于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五十五年,即前清乾隆二十年。十七岁时赴意大利国纳玻里府,入圣家修道院。一千七百八十一年阳历三月二十五号晋升司铎。二年后回中国,传教于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处。一千八百二十八年,道光八年,平安去世。葬处未详,大约在陕西汉中府。”

1772年 乾隆三十七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394)刘保禄”载:

“刘保禄(P. Paul Lieou),1717年10月8日生,1747年10月30日入会,1750年7月27日回国,助理神职人员,1794年8月1日卒于北京。

“刘保禄神父,直隶省宣化府人,先是被派送法国路易公学留学,于1747年入耶稣会。1750年他随钱德明神父回国,并被分配在法籍会士传教区范围内,从北京郊区一直到长城以北的鞑靼地区,管理堂口工作。他满怀热忱,专心耕耘。

“1772年,为了探望一家被流放在外原山东教友,他们已有20多年未见到神父了,刘神父即刻动身前往‘Oulahata’^③,离热河儿约几百里之遥。‘路途既远,且又难走;一路涉山涉水,须经过30多条河流,攀越很多山岭’,其中有的既高又陡,但神父毫不畏缩。他跟着一名带路的,赶了好多天的路程来到了‘Tsikiaeul’^④,在那里他给一家姓何的热心教友施行了圣事,他们也多年未见到神父了;之后,

①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罗兰州之皮里尼(Pulligny)(默尔特)”。

② 赵圣修(Louis des Roberts 1703—1760),字品之,法国耶稣会士。《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说他于1748—1754年任北京法国耶稣会士驻所道长,其领洗被弃婴儿的数量为:1750年2000人,1751年2423人,1752年2662人,1753年4417人。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赤峰”。

④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音译作“七家儿”。

他穿越了‘Maokingtapa’^①山区,终于到了‘Tai-ping-tchoang’(太平庄?)^②和‘Gan-pang-keon’^③,就是一些姓赵的教友们聚居之处。刘神父就给他们讲解圣教要理,也有一些佛教徒来听讲;给30人付了圣洗,其余的准备在明年再来给他们付洗。

“刘保禄神父就这样连续多年,每年到‘Oulahata’探望教友。刘神父于1794年8月1日卒于北京。”

1773年 乾隆三十八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一章《味增爵会以前的西湾子》第四节《耶稣会底教士开教和管理西湾子村》载:

“相传约在第十八世纪,耶稣会底教士来视察西湾教务。……王修士(R. Fr. Attirel S. J.)记载:‘北京教区,每年约有五百领洗的,但不只指在京城内,也包括城外各地方和蒙古。一七七三年,刘司铎统计在各处寻见的教友,且于一七九四年,载于北京教区底教务表上,为西方会堂,计有宣化府、大东沟和桂州。’相传说:若神父们不来西湾子送弥撒,教友们就亲身赴北京去下会,有西湾子张家一人,姓名张国信,第十八世纪末年领洗在北京。一七三二年,山西主教(Mgr. Ferreri)因圣教寡难,来口外避难,只说隐居耶稣会属下的一个小堂口,又没提出西湾子村名,但查他回去所经过的路径,那个堂口该是西湾子。……人们说:向来西湾子没有本堂神父,一个老教友——有人认为张根宗——病势很沉重,有一天,命他底闺女打扫家,预备顶好的饭,为接待一位贵客,以后差他底儿子往南去,也会他儿说了,有一位主教要来。相传这位主教来了以后,也给病人送了终傅。”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八章《宗座代牧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一、任命新京座代牧

“……耶稣会于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为教宗格来孟十四世解散,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又为教宗庇护七世恢复,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又遣传教士至中国。”

1775年 乾隆四十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四章《中国教务情形》载:

“四、耶稣会被解散

“一七七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教宗格来孟十四世以诏书解散耶稣会……

“一七七五年南京主教的副主教,北京的代理人,正式给耶稣会士公布《吾主及救世主》诏书。”

1776年 乾隆四十一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430)晁俊秀”载:

“1772年又掀了一场新的教难。……其间,他写信(用拉丁文)给南怀仁主教……

“‘在此时期^④,我们办起了一个‘热心善会’,有一位教友为举办这个善会,捐献了一千数百两银子作为资助。……由于方守义神父新编的两本教理问答:《进教要理》和《圣事要理》的刊行,使我们在教友家庭中的传道工作起了前所未有的效果。……我们有幸在鞑靼地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传教区,我

①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音译作“毛金大坝”。

②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音译作“太平庄”。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音译作“安邦沟”。

④ 北京南堂失火被毁后的重建时期。

们还计划把这个新教区扩展到黑龙江。我有幸看到驻在那里的两位亲王,其中一位曾亲临我们的堂里,另一位我曾前去拜访过。……他们都很谦和,看来教区前途颇为乐观……

“我们尽力坚持工作。一切照常进行:神业功课仍在堂里举行,教友人数仍然很多又很热心:我们继续讲道,听神工,付圣洗。几位中国神父照样走遍鞑靼那里一些新辟的教区;在两个月的巡视堂口工作中,计听神工达1200余人次,付圣洗成年人50人,儿童150人。我们在那里Ou-la-ha-ta^①教区,情况令人欣慰,教友人数日益增多,亦且虔诚。看来有可能逐渐推进到黑龙江畔。”

1780年 乾隆四十五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四章《中国教务情形》载:

“三、伊主教的继位人

“……3. 安德义主教 Salutti 为义国奥斯定会士,由传信部所遣,一七七八年七月二十日被任为北京主教。

“他听说教宗诏书已发下,但他等了二年。……陕西的闵主教 Burger 接到罗马的命令去祝圣北京的新主教,他到后,发生了一个问题:‘没有教宗诏书前,可祝圣主教否?’

“当时北京有二十六位神父,对问题分成二派:十二位以为安主教可以接受祝圣,十位反对祝圣。闵主教以为教宗诏书确实已发下,乃决定一七八〇年四月二日举行祝圣典礼。祝圣后,北京传教士分为二派,一派不承认新主教,乃将问题呈送罗马。教廷以为二位主教有理。但安主教已于一七八一年九月十六日因中风逝世,是在卧亚将教宗诏书扣留了。”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420)方守义”载:

“方守义,字雅各(P. J. F-Marie-Dieudonne d'Ollieres),1722年11月20日……出生于法国的 Longuyon^②,在 de Bar^③ 公爵的领地内的一家祖先是苏格兰(Ecosse)望族的家庭……

“尽管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教友人数还是减少了。那些出于本性的动机而进教的,或是信德的根基扎得不牢的,在持续不断的迫害和折磨下,终于抵挡不住了。尤其是那些地位高、家产大的教友,他们更形软弱,时刻有丧失信仰的危险。但是不论在外省或京城里,坚强的教友还是有的,只是人数已不多了。

“方神父还设法赶到百里外的乡村去探望教友。1780年10月15日的信上,他写道:‘我还到了长城以外的地区;为了避人耳目,我只能从崇山峻岭间的羊肠小道穿越过去。我每年听神工的数目,已上升到3000以上、4000不到的人次,相等于我们北京法籍神父教区内的三分之一的人次。我的数字要比别人多些,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中国人对本国神父未免有些顾虑。’

“潘廷璋修士在1776年11月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另外一些情况:‘我们的教区……目前尚称平静。教友人数日渐增多。方守义和韩国英两位神父有圣人的美名,事实确也如此。方神父在离北京约有两天路程的一个山区里,几乎把所有那里的居民劝化奉教了。’

“一天,一个可怜的教友请神父去给他垂死的妻子听神工。方神父就同他的教经先生乘车赶去。从那里回来时,方神父满面伤痕,血迹斑驳,衣衫撕破。原来这个人不是真的要神父去行圣事,而是企图向神父勒索钱财。但神父没有钱,他们夫妇俩丧心病狂地用指甲狠抓神父脸部,幸有教经先生和车夫在场把神父救出。事后,方神父既不抱怨,也不再重提此事。”

①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赤峰(?)”。

②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隆居荣城”。

③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译作“巴尔”。

1782年 乾隆四十七年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上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乾隆朝》辑：

2月7日(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署理直隶总督英廉奏报查出信奉天主教之李天一审讯摺称：

“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据宝坻县知县王锡璵稟称‘访获县属老家庄民人李天一家有私造天主教堂聚众念经之事。当即亲赴该村搜获图像，经卷暨为首之李天一、随教之张化陇等八人赴县查讯。据称李天一之故父李文禄曾供天主图像，李天一随同持斋。迨乾隆十年李文禄物故，李天一接奉前教。至三十五年间，李天一在住房左近建造天主堂三间，赴京向天主堂买备天主经卷并一切图像、乐器在堂内悬挂。有同庄之张化陇、张其让、张其汉、张其刚、张其端、王廷秀、田琦、张万宝等八人先后入教。李天一每年赴京中天主堂取《瞻礼单》至庄，按单中瞻礼日期齐集同教人等诵经一日而散，并不在堂饮食，亦无外来入教之人。惟所用香烛、斋供系在教之人均摊买备，此外并无别项敛钱等情’前来。伏查左道邪教，惑众诬民，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即天主一教，亦久在严禁之列。乃李天一胆敢违禁私造教堂聚众念经，实属目无法纪。且查李天一崇奉此教父子两代，历年已久，今称‘随教者仅止八人，并无外来人民’，此语岂可轻信？又臣素闻京中天主堂夷人并不尽皆持斋，亦不别奉神佛，今李天一以念经、持斋为事，恐其以天主教为名而潜以别项邪教影射传习蔓延不法等事，该县均未一一讯明，自当彻底严行根究，以整风俗。”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李文禄、李天一、张全、张化陇等》载：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二日署直隶总督郑大进……奏呈^①如下：

缘李天一籍隶该县老家庄。伊父李文禄向在家内供奉天主图像。李天一自幼即随父入教。乾隆十年(一七四五)李文禄病故。李天一与同庄之张化陇、张其让、张其汉、张其端、田琦、张万保、王廷秀接奉此教，各在本家持斋念经。至三十五年(一七七〇)，李天一因在家拜诵，恐致衰渎，遂令张化陇等各出钱文，即在该犯家隙地内苫盖草房三间；赴京向天主堂西洋家人崔姓讨取《瞻礼单》，并添买天主图像暨经卷、乐器等物，悬设堂内。迨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复有同村之张其刚，因身体多病，希图消灾获福，亦随同入教，与李天一等共有九人，每逢瞻礼日期，齐集教堂诵经一日，至晚即散。教堂内所用，惟香烛斋供，系摊钱公买。此外并无别项敛钱不法情事。又该县朱家铺民人张全，亦系自幼随父崇奉天主教，遗有经像等物。该犯因赴京交纳旗租，与天主堂傅姓家人康姓熟识，向其讨取《瞻礼单》，分给同村素奉天主教之朱大、杨环、杨善暨邻村之郭思哲等，各在家内照依瞻礼日期持斋念经，并未做会敛钱。

“经研审后，报告如左：

委因乡愚，不知天主教亦系有干例禁，是以各就本村之人，私相崇奉，不过不贴门神、不拜佛、不念僧道经，其余仍与齐民一体，并无别项邪教影射并左道异术惑众蔓延情事。虽严加究诘，矢口不移；查验所起经卷图像，亦无违碍不法字句，似无遁情。查天主一教，虽非白莲社等项邪教可比，但其荒诞谬妄，业已久奉例禁。

“于是各教友被处罚如后：

“李天一：

^① 全文见《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上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乾隆朝》辑1782年3月25日(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二日)直隶总督郑大进奏报宝坻县李天一私盖天主教堂聚众念经摺。

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发边卫充军例，应发近边充军；至配所，杖一百，折责四十板。虽年已七旬，不准收赎。

“张化陇、张其让、张其汉、张其端、田琦、张万保、王廷秀、张其刚：

各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个月；满日，各折责四十板。

“张化陇父子同教，虽年逾七旬，亦不准收赎。

“张全等五犯：

讯明与李天一等并非一起，亦无做会敛钱、私盖教堂情事。但查张全曾与京中天主堂傅姓家人康姓往来，讨取《瞻礼单》，亦属滋事不法。张全应于邪教为从军罪上再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责四十板。收受张全《瞻礼单》、各自持斋念经之朱大、杨环、杨善、郭思哲等四犯，应均照违制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

李天一、张全等之父在日曾奉天主教，今讯明均已病故，应毋庸议。至经像，查无违碍，应飭令概行销毁。其乐器等物，仍令变价册报。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即已开始禁教，宝坻县老家庄、朱家铺教友，至乾隆四十馀年仍热诚如昔，历时六十馀年，父子相传，初则在家祈祷，继则出钱盖堂，完全自传、自理、自给，丝毫不赖外力，亦不需教士督促领导，即到京中向在朝廷供奉的西洋教士家人索取《瞻礼单》，只因事涉历法，而瞻礼节日又须阴阳互推，教友实无法自编自印，而其余经像乐器，仍由教友出钱购买，绝不存依赖性，岂不可佳？”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〇，乾隆四十七年二月辛巳（十四日，一七八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曰：

直隶总督郑大进奏：拿获私盖天主教堂、聚众念经之宝坻县李天一、张全等，供系自幼随父入教，与同村之张化陇等私相崇奉。后因到京，与天主堂西洋人熟识，向其讨取《瞻礼单》，并买天主图像及经卷、乐器等物。每逢瞻礼日期，持斋诵经，并无别项敛钱不法情事。李天一应照左道惑人为从例，发边卫充军。张全、张化陇等，应照违制律杖责。经、像、乐器等，概行销毁。下部知之。”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四章《中国教务情形》载：

“三、伊主教的继位人

“……4. 汤士选主教 Gouvea 是葡国人，一七八二年七月十二日被任为北京主教。”

1784年 乾隆四十九年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430）晁俊秀”载：

“汤士选主教（Mgr. Alexandre de Gouvea）被正式宣布为北京教区的新主教；遣使会会士被宣布为接替原耶稣会事业的继任人员；所有教区财产，原封不动地交由遣使会接管。”

文末注解称：

“葡萄牙女王迅即提名葡萄牙人、方济各会会士汤士选 Alexandre de Gouvea 为北京主教，经教宗核准后，在里斯本祝圣主教，随即启程赴任。1784年1月18日接管了教区权力……

“汤士选主教，原是一位常规司铎。……其实，他属于方济各会的第三会^①会员。”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五章《遣使会士初至中国》载：

“一、圣文生对成立新会院的规则

“……最后的耶稣会士——他们的数字没有超过二十位。……其中钱德明 Amiot 及院长晁俊秀 Bourgeois 就操心谁来代替自己。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钱神父乃以院长的名义，请法王路易十六

^① 方济各会各派为在俗教徒设立的组织。

世使巴黎远东传教会士来代替自己,但他们谦辞。……于是法国政府乃直接与教宗联络。

“法王乃向教宗推荐遣使会代替北京的耶稣会士。教宗庇护六世接受了法王的请求;传信部以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七日的公文,规定遣使会士接受耶稣会士的一切事业,有同样的权力及特恩;对财产方面,规定由法王处理。法王乃于一七八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以诏书将中国耶稣会士的财产拨与遣使会士。”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旋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遣使会接理已革耶稣会教务一事既立案后,总统若基耶即派本会修士三人前来中国:一名罗旋阁^①……一名巴保禄^②……一名冀若望^③。……三人由法国启程,于降生后一千七百八十四年洋历八月二十三日抵澳,二十九日至广东。未于乾隆五十年,降生后一千七百八十五年洋历二月初七日,由广东北上,至四月二十九日始抵北京。皇上召见,恩赏如例。已革耶稣会法、葡二国修士与传信部所差之司铎及北京主教汤士选等俱来拜贺。

“按主教汤士选,西名亚立山古未亚,系葡国圣方济各会之修士。遣使会三人抵京后,于本年洋历五月初八日即出谕示,将罗马传信部之部谕与法王类思第十六^④之上谕张贴示众,令知罗旋阁为北京教务总司[铎],即遣往北堂接理事务。已革耶稣会之法国修士俱于主教汤士选之谕下各具花押,以示和衷共济、无抗无违之意。其谕示略曰:

……是日耶稣升天瞻礼后主日,降生后一千七百八十五年洋历五月初八日,余召寓居北堂传教修士等同集本署,先将罗马传信德部一千七百八十三年洋历十二月初七日之谕当众朗读。部谕之意,即系命遣使会修士接理已革耶稣会之法国修士在京传教诸务。次将法国虔奉圣教之王类思第十六位降生后一千七百八十四年洋历正月二十五日由未尔撒耶官所颁之上谕,并罗马传信德部一千七百八十三年洋历十二月十七日特派遣使会修士罗旋阁为中国教务总司铎之谕,宣读一遍。众传教士无不乐从。故余出此(示)谕[示],亲笔签押盖印。又本主教密书司铎与在议传教士等亦押花名。计押名者:北京主教汤士选,钱德明,汪达洪,布尔若华,伯老,传信德部司铎邦西,本主教密书乐德理爵。年月日同上。”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上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乾隆朝》辑:

12月24日(十一月十三日)直隶总督刘峩复奏报查拿天主教案犯王天德等解京审办摺称: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奉上谕:‘据毕沅奏:“渭南县属油河川等处徐宗福、韩奉材家搜获西洋人呢吗方济各即范主教及马诺二名,并起获洋字经本、画像、书信等件,当加研讯。其呢吗方济各系大西洋噫打哩啞人,在陕二十三年。从前有内地人苏神父勾引,由洋至广,复由广至山西、陕西传教。其马诺一名,系粤门人,自幼往西洋学习经典,仍回广东。有陕西渭南人张多明我接到西安居住,后来又在渭南县杜兴智等家内居住。并讯据供出该省汉中府、山西洪洞县、潞安府、大同府及山东、湖广、直隶等省俱有学习天主教及西洋人在彼传教。本年罗马当家寄信内言及‘现派十人分往山、陕、湖广、山东、直隶等省’,现在分别解京并分咨各省缉拿”等语。西洋天主教于雍正年间即奉严禁,不许内地人传习。乃呢吗方济各等初则为内地人勾引至广,继则纷纷潜至各省居住传教,时阅二十馀年,地则连及数省,各该地方官何竟毫无知觉?且西洋人面貌、语言与内地人迥别,即该犯等形踪诡秘,止与同教人往来,而地方有此形迹可疑之人,自当即时访察严拿,不使乡愚互相煽惑。现在陕西省已将呢吗方济各、马诺及延请该犯等在家居住之徐宗福等拿获。若毕沅讯供明确后即遵委委员将各犯迅速解京归案审办。

① Reux,又译作罗广祥。

② Paris,又译作巴茂正。

③ Ghislan,又译作吉德明。

④ 即路易十六世。

其讯出未获之刘西满等各犯，著一并严拿办理。至山东、山西、湖广、直隶各省，据供俱有西洋及内地人辗转传教，最为人心风俗之害。著传谕刘戡、农起、明兴、特成额、陆耀一体严密查拿，将紧要之犯迅速解京，无使该犯等得以闻风远扬，致稽弋获。如各省经此次查办之后，复有勾引西洋人及私自传习邪教之案，则是该督、抚查办不力，漫不留心，将来别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钦此。’……随检查奏片，内开‘本年新派西洋神甫十人，内分往直隶二人，一名汉色勒木，一名阿头大多。又有老刘必约、杨义格拉乌、黑必约三人曾赴直隶传教’等语。伏思西洋人语言、面貌，诚如圣谕‘与内地迥别’，地方各官如果留心查拿，自不难于缉获。臣已檄行按察使暨各道、府、厅、州遴委妥干员役，并咨会提臣派拨弁兵，无论通衢村店、城乡庙宇，一体严密缉拿，西洋人汉色勒木、阿头大多及案内有名各犯务获解京审办。并凛遵圣训，通飭各属：如此次查办之后，复有西洋人勾引传教者，定行严参治罪。再，臣前准广东抚臣孙士毅咨缉蔡伯多禄案内逸犯。因思近京各属从前曾有供奉天主教者，虽屡次严禁，诚恐阳奉阴违，并有与西洋人往来勾引情事，当即淳嘱各属严密访查。现据东安县访有民人王天德并子王瑞，寄居民人高国定、高国宗、高士亮，永清县访有民人刘三，住旗马行舟、马新舟、安向达、安清良等，均因父祖在日曾经供奉天主教，起获图像、经卷、十字架、经幡等项；并据东安县民人韩世瑞首报伊故父韩宾曾奉天主教，将经卷一并呈缴前来。臣现将各犯提集赴省，檄飭藩、臬两司率同委员严讯。虽据坚供并无与西洋人往来，但经卷、图像传自何人，老刘必约等三人既在直隶传教，是否即系该犯等教主，汉色勒木、阿头大多究系何人接引，必需严加讯究。如有传教接引情弊，即将一干人等一并解部归案。”

12月26日(十一月十五日)寄谕直隶、山东、山西等各省督抚著照例办理查緝天主教人犯称：

“……前所以降旨……盖专指西洋人至内地传教者而言。刘戡接奉谕旨，止应飭属留心访緝，将分往直省之西洋人汉色勒木、阿头大多等严緝务获，解京收审。其余如内地民人因祖父传习供奉，业经自知悔改、与现在西洋人并无关涉者，即当将呈出经卷等项销毁，毋庸深究。仍不动声色，为之以渐，以期尽绝根株。刘戡此奏未免不审事体之轻重者。传谕该督：所有现获之王天德、刘三等，如讯无与汉色勒木等勾结接引情弊，即可照例办理，毋庸解京，以省烦恼。”

12月28日(十一月十七日)直隶总督刘戡复奏报查明被获之王天德、刘三等并无与西洋人勾结摺称：

“……所获之王天德、刘三等，连日研讯，并无与西洋人有勾结接引情弊。现在另行照例办理完结。”

12月30日(十一月十九日)寄谕直隶总督刘戡著严飭各属緝拿传教西洋人汉色勒木、阿头大多等犯称：

“昨据农起奏‘现获西洋人安多呢一名，讯供解京’，本日又据毕沅奏到拿获西洋人王亚各比一犯。乃刘戡复奏‘飭属查拿西洋人汉色勒木、阿头大多，尚未访有踪迹’，自系地方官查办不力所致。著再传谕刘戡即严飭员弁将汉色勒木、阿头大多及接引传教之刘必约等一并访获解京，毋令该犯等闻信远扬，致稽弋获。”

1785年 乾隆五十年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上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乾隆朝》辑：

1月1日(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寄谕直隶总督刘戡著将天主堂办事之刘多默解京审讯称：

“据顺天府尹奏‘所有天主堂办事之刘多默已经涿州拿获，解送直省审讯’等语。此等要犯，既经涿州拿获，自应即由该处就近解京审讯，又何必解至保定省城？仍须由省解京，多此一番行折。著传谕刘戡即派委妥员，将刘多默一犯迅速解京。嗣后遇有此等应行解京之犯经近京各州县拿获者，即令径行解送刑部审讯，毋庸转解省城，致滋往返迟延。”

1月6日(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直隶总督刘崧奏报拿获开设天主堂之刘多默一犯解京摺称:

“臣伏查直隶查拿天主教案内有永清县民高国定等曾供与天主堂佣工之涿州人刘姓往来并送有经像等件,是以饬属访拿。兹据涿州拿获刘人杰(教名刘多默)押解到省,正在审讯间,接奉廷寄,飭令委员解京。臣谨遵旨将刘多默即刘人杰一犯檄饬按察使迅速解送刑部查收讯办……”

2月30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寄谕直隶总督刘崧著通饬各属停止查拿西洋人颜、德等四人称:

“前据刘崧奏‘饬查拿西洋人汉色勒木、阿头大多,现在尚未就获’等语。西洋人汉色勒木即颜诗莫,阿头大多即德天赐,杨义格拉乌、里必约即罗机洲、麦守德,四人俱系令汪达洪寄信粤东,经该督委员伴送来京当差应用者,并非汪达洪私行勾引潜赴直省传教之人。著传谕刘崧即通饬各属停止查拿。至接引传教之刘必约亦据毕沅奏报拿获解京。”

3月21日(二月十一日)寄谕直隶、两广、山东各省督抚著严緝西洋人传教案内各犯并将查办西洋人格雷西洋诺案出力官员陈鼎钧等送部引见称:

“据明兴奏‘拿获私赴东省传教之西洋人吧地哩哑度^①并勾引人李松、邵珩等,即行解京’,又另片奏‘西洋人格雷西洋诺亦已拿获,其吧地哩哑度供出一同勾引西洋人之广东人李刚义、直隶人安哆呢即安三及伴送之广东人鄂斯定即陈姓,已飞咨直隶总督、广东督抚严密查缉解京质讯’等语。格雷西洋诺私赴内地传教,见查拿紧急,复藏匿土沟洞内,甚为可恶。现交军机处存记,俟该犯解到时严切审鞫。其李刚义等系内地民人,辄敢为之勾引伴送,亦必须按名拿获解京审讯。著传谕刘崧、舒常、孙士毅,即饬属严拿务获,解京归案审办。……其未获之梅神甫,仍著该抚饬属严緝,毋得日久疏懈,致令远扬。”

3月26日(二月十六日)寄谕直隶总督刘崧、山东巡抚明兴著将严緝传教西洋人吧地哩哑度并勾引传教民人各犯称:

“据明兴奏‘拿获私赴东省传教之西洋人吧地哩哑度并勾引人李松、邵珩审讯起解’一摺内称‘质讯任文皋、胡衡等供称‘梅神甫于去年五六月间曾到伊家,闻说此时已往直隶藁城县郝保禄家去了’等语。’梅神甫既经潜往直隶省,著传谕刘崧即速饬属严緝务获,解京归案审办,毋令远扬。至朱行义妄称神甫,每年接受西洋人番银,自必积有家产,何以明兴摺内称‘例应抄没入官’,又称‘查明该犯并无资产’?……并著传谕明兴再行严切跟究,毋任隐匿。”

同日直隶总督刘崧奏报拿获勾引西洋人传教之民人安三解京审办摺称:

“臣伏查安哆呢即安三,现准山东抚臣明兴知会,系直隶清河县人。当即专差标弁星夜驰赴清河县,督同该县知县萧永庚将安三即安恭保拿获。讯据该犯供称‘现年四十四岁,平日原奉天主教,做泥水匠生理。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内曾同临清州人邵珩送书至广东,于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内同西洋人白、伊二姓回至威县任文皋家居住属实’等情具稟前来。……现获之安三即安恭保系与邵珩一同送书勾引之人,自应钦遵谕旨,解京归案审办。”

4月1日(二月二十二日)直隶总督刘崧复奏拿获与西洋人私交传习天主教之郝保禄案内各犯解部审办摺称:

“乾隆五十年二月十六日奉上谕(略)^②。臣当即专差标弁星夜赴藁城县,督同该县王光照将郝保禄即郝济美拿获。讯据供称:‘伊现年五十九岁,自幼随父奉天主教,与威县任文皋、清河县安三均素相熟识。四十八年九月内令安三赴广东接白、伊二神甫,于四十九年四月内至任文皋家一同相见属实。至梅神甫于上年十二月内由山东武城县来至伊家看望,本年正月初二日又赴同县之何禄家留住。至十六日间,闻差拿甚严,遂与何禄雇赵子彦车辆送梅神甫进京,于正月二十二日至顺城门外,梅神甫即另行雇车进城。’传讯车夫赵子彦,据供‘伊并非奉天主教之人。郝保禄、何禄等雇伊车进京,送西洋人至顺

① “地”、“度”均加“口”旁。下同。

② 见上文。

城门外即行卸载’属实。又查拿何禄,据伊父何文进供称‘伊子何禄于正月内送梅神甫进京后,又于二月十三日进京,至今未回’各等情前来。臣覆查郝保禄胆敢与西洋人交接往来容留,实属玩法。且前获接引白、伊二神甫之安三即安哆呢已经解京审办,现获之郝保禄系同谋接引之人,自应一并解交刑部归案办理。至该犯所供梅神甫已于正月二十二日进京之处是否属实,臣已飞咨步军统领衙门,就近严密踪缉。一面严飭藁城县多差千役分头勒限严拿伙同窝留梅神甫之何禄到案,再行根究。梅神甫实在下落,并飭各属一体严密查拿。”

《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三章《乾隆禁下的天主教》第二节《乾隆朝的教难·九、一七八四——一七八五的大教难》“捌 直隶”载:

“过了二年,又逢上全国性的大教难,影响所及,直隶省的涿州、藁城,以及顺天府各地,都有教友被捕拿的事件发生。如多次接引外国神父的西安人刘必约,接引了意大利籍的两位神父汉色勒木和阿头大多,到直隶涿州传教,就在那里被捕。中国神父被捕的据说多达数十人。原住京师天主堂的葡萄牙籍的梅神父(他就是山东李松引领到临清和威县等地传教的那位神父,他留下的传教地图,后来成了一八〇五年大教难的中心问题)在藁城县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友郝保禄、朱行义等多人。在顺天府被捕的,有教友刘多默等。此外直隶清河县教友安三,圣名安哆呢,接引外国白神父到山东传教,被山东巡抚明兴逮捕,坐牢受刑,自不待言。”

1788年 乾隆五十三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一节《北京味增爵会底司铎承管西湾子》载:

“一七八八年,杨司铎传教于味增爵会属下的各堂口,他大半也来过西湾子。过了八年,罗司铎遣使两位华籍司铎到口外,其中的一位为韩司铎;但韩司铎也没久长在口外传教,因为不久他便升为北堂修道院底副院长。”

1792年 乾隆五十七年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四三〇 晁俊秀 法兰西人”载:

“帝悯西土之被灾,既闻此堂为康熙皇帝敕建,乃赐银一万两,着于原址修复,银万两合法国货币七万五千磅。康熙御赐匾额既焚,帝用朱笔亲书匾额赐之^①。”

“此种继续不断之挂虑,复因内部分裂而加增。”

“此种辄辘延长有八、九年(一七七五至一七八三年),动因乃为法国传教会财产之管理。此种财产为房租、铺租、与城外若干地租。自从法国法院扣押此会一切收入以来,所恃以生活者仅此而已。耶稣会废止以后,迄于教敕公布中国之时,其间距离两年,然会中故旧不乏以共事预先通知者,最初流言到达北京,在一七七四年八月五日。俊秀时为传教会道长。费若瑟神甫还法国时,已将一切财产管理权移交俊秀。有神甫数人,大致为后莅中国者,不满意其道长,以为耶稣会既然不复存在,要求俊秀报告账目,并将传教会财产分配于最后存在诸人。其要求书于一七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提出,由钱德明、汪达洪、甘若翰、贺清泰等同署名。其依据则为教皇禁止旧耶稣会士服从其旧道长之命令。特应在此处急为声明者,钱德明神甫虽在若干时间维持此种异议,不久即与诸人完全脱离关系。”

“俊秀答称彼仍为耶稣会士,在教敕依法公布以前,自视仍为诸人之合法道长。迨至教敕公布以后,敕中如有是语,即向正式当局报告账目,移交一切财产。且云:‘余未将此信札公开,然余知方守义、韩国英、金济时、刘保禄、潘廷璋诸神甫修士等意见与余相同。余并得腊伯都、巴良二神甫之同意。’此

^① 原注,补注云:匾额对联仍与前同,仅易万有真元之元为原而已。

信札作于一七七五年十月二日。但在教敕公布以后,分给各人赡养费甚厚,俾能别居。

“先是未久西尔瓦(Alexandre de Sylva pedrosa Guimaraens)主教抵澳门^①,拟将南怀仁主教久已接收之北京主教区管理权,收归己有,遂确认一切葡籍耶稣会士之职务。俊秀信札云:‘澳门主教向吾人通知耶稣会之消灭。余答称本人既非主教,亦非北京主教区之管理人,阁下除根据一种特别委任外,不能将教敕送达吾人,如将委任依法提出,敢不如命服从。’

“已而澳门主教任命中国副教区最后区长兼会团长高慎思神甫为其代表人兼副主教。由是高慎思神甫与宣教部所任命之脱履圣衣会士兼南京主教副主教之泰雷兹神甫发生管辖权之冲突。传教士分为两派:葡萄牙人拥护澳门主教西尔瓦,法兰西人与宣教部员拥护南京主教南怀仁。

“同时高慎思神甫奉到其主教命令,命将教敕公布,慎思在一七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于大遗憾下为之。顾无委任澳门主教的合法训令之证明,公布视同无效。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泰雷兹神甫始在北京各堂依法宣布废止耶稣会之教敕,诸神甫立即服从。南怀仁主教根据卡斯特里枢机员之训令,命对于财产管理,在表面上不许作何种变更,任命俊秀为传教会财产出纳员。

“由是不满意者继续其反对俊秀之计划。但是法国国王将此问题解决,而其意与南怀仁主教暗合。由教皇之推定的同意,并根据一七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委状,任命俊秀为北京道长,兼法国传教会全会管理员。前道长嘉类思为北京传教会驻巴黎经理员。前曾留学法国之华籍神甫杨德望为驻广州经理员。同时并许每年补助传教会一万二千法郎,以资维持,并限定此款交末一道长手。在此末一道长亡故或有其他故障时,则据一七七九年十一月八日任命,以钱德明神甫代之。此种办法业已通知驻巴黎教皇特派公使与驻罗马法国大使。

“主持异议者……对于此种办法既不甚满足,于是别作企图,设法推举安德义神甫为北京主教^②,希望将其卷入漩涡。此种推举在宣教部方面无不快之感,惟葡国国王颇难承认。但终不免承认之,时在一七七九年也。然安德义神甫未举行祝圣礼,并尚未接到教敕。一七八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南怀仁主教闻讯,即致书于安德义神甫,移让北京主教区之管理权。

“同月山西、陕西二省代主教兼南京副主教比尔热忽抵北京。安德义神甫致书诸葡籍神甫,谓已奉到教敕,其实伪也;命将最后主教法服送来,以备举行祝圣礼。

“法国耶稣会士根据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之教令,严重反对此种未受教敕之祝圣礼。葡萄牙人亦同声反对,并增加一种理由;即葡国国王未曾通知是也。比尔热主教不顾一切,于一七八〇年四月二日在宣教部小礼拜堂中为安德义神甫举行祝圣礼,仅引博尔贾、卡斯特里二枢机员信札与情报书为证。新主教见未经全体承认(传教士二十人,仅有七人加入其党),恚甚,禁止前耶稣会士举行圣事,并将方守义神甫处以除名之罚,教民既惊且惜。其为斯举所利用者,乃前在法国培植之一华籍耶稣会士也^③。

“既而将高慎思神甫与隶属宣教部之方济各会西塔德拉(Eusebe de Cittadella)神甫并处除名之罚,然俱未发生效力。

“当时也,安德义主教之党羽,尤其是汪达洪神甫,自称受宗座任命为管理人,欲用暴行夺取传教会财产。新主教从而维护之。俊秀信札云:‘余奉国王命令,不许任何人侵占此种产业。遂反抗之。由是有人以此事件报告皇帝。’(一七八〇)帝命官吏数人查办此案,俊秀曾被传讯^④。

① 原注:其人“公开反对耶稣会士”。参看《钱德明传》一八五页。

② 原注:安德义神甫,意大利罗马人,脱履奥斯定会士,曾为画师,绘有武功图,事具蒋友仁传后书录。“不甚谙悉华语,供奉十年后离开内廷。科尚言及初次寄达之武功图时,谓有一图最劣,盖出安德义神甫手绘。”(《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一九三、一九四页。)安德义神甫任为主教后,始冠 Salusti 原姓。其姓在诸书写法不一。汉姓名为安德义。

③ 原注:指蓝方济神甫。

④ 原注:第一次传讯在一七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参看俊秀一七八二年五月十日致俄国耶稣会士书。

“查办事毕，奏呈皇帝核准，各国人所住之堂由各国人自行管理，他国人不得参与，并得任意处理其一切财产……”

“俊秀与韩国英、金济时、方守义诸神甫等于一七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曾将此案始末作一报告寄呈印度总主教兼果阿大主教。高慎思神甫是性情和平而有德之人也，亦将全案呈报印度总主教，南怀仁主教同时亦上书罗马。果阿大主教对于关系安德义主教一案之一切经过，皆不以为然，将除名及其他一切惩罚悉皆解除，但因教敕适到，命诸传教士对于安德义主教表示服从。高慎思神甫接书后，如命向安德义主教颂读。主教感动之极，突中风死，时在一七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也。

“同时新主教汤士选^①已受任命，耶稣会之接替人（遣使会士）业已披露，传教会财产应完全移交接替人之手。由是愤怒渐息，人心渐安，余存者虽未能获得福乐，然可得慰藉，而在心神团结之中终其余年。

“耶稣会废止已逾十年，最后诸传教士一一相继去世，余存壮健者其数可计。俊秀一七八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信札云：‘我辈之传教事业已委付于遣使会诸君^②……’

“汤士选主教与遣使会士在一七八五年四月到达，而俊秀在一七八五及一七八六年即云：‘余之继任人罗广祥君研究汉、满语言大有进步；其人幼壮，多材艺，集热诚、信心、健康于一身。余移交管理权已数月矣。余现尚助理之，然彼执行常务，已无须余助。由是余有暇从事教务。’‘罗广祥君诚才，聪敏干练，和蔼可亲；尤可喜者，信心坚而热诚大。不知是彼生存于耶稣会士之中，抑吾辈生存于遣使会士之内。在事实上本堂进行如前，人皆满意。’……”

“俊秀尚延存三年，不断工作。然其力渐衰。……最后染疾，历时仅四、五月，亦无痛苦，一七九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七、八时安然而逝。”

1793年 乾隆五十八年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三九二 钱德明 法兰西人”载：

“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神父字若瑟。……一七一八年生于土伦城。……一七五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抵京师。……居北京四十二年。……自赴华后，迄于一七九三年，每接邮递消息，必有若干噩耗。初为詹森派与哲学家之攻击；一七五九年则为葡萄牙耶稣会士之驱逐；一七六二年则为法国耶稣会之废止与澳门诸神甫之被逮；一七六三年则为西班牙耶稣会士之驱逐；一七六七年则为荷兰地方耶稣会士之驱逐；终为一七七三年耶稣会全体之废止与一七七五年教敕之宣布于北京；既有法国与全欧党人之企图，三民会议之召集，革命之残暴。诸耶稣会士或因苦痛，或因疲劳，或因年高，相继去世。然一七九三年德明去世之时，遣使会士来京已有八年^③，尚有此传教事业未曾完全消灭之慰藉也。

^① 原注：宣教部因教皇之赴维也纳，曾以安德义主教举措为是，宣告其一切行为有效，其北京主教之任命，虽无教敕，可以视为确定。此种决定在安德义主教死后甚久始获知之。葡萄牙王后为反对举行祝圣礼事，曾对罗马提出抗议。安德义主教由是受终身停职处分，应派一副主教执行主教职权。然主教已死矣。主教既死，情势遂变。葡萄牙王后立即提出方济各会士汤士选继任北京主教，经教皇承认，在里斯本举行祝圣礼后，即刻赴任。一七八四年一月十八日到任接事。接任后将两派所受之惩罚悉为解除。嗣后将安德义主教全案撰一长篇记录送至罗马，颇袒俊秀等，并严责其敌举动之非。汤士选主教一名王立山，在俗司铎也。[殆因此利西(J. Ricci)《中国方济各会的体制》未录其名]，然在方济各第三会(Tiers-Ordre)中有其名。

^② 原注：教皇皮埃六世(Pie VI)仅在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七日正式宣布以法国遣使会接替法国前耶稣会士，惟其事世人早已知之。

^③ 原注：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七日宣教部指定遣使会士代替已故之耶稣会士。代替者于一七八五年抵京。补注云：以别一法国传教会，代替北京耶稣会士，俾法国国王之建设得以保存，最初动议盖出自德明。一七七四年时曾示意于伯尔坦，拟请以外方传教会士接替，并建议以四川传教士傅方济为之长。法国政府之意，仍主归耶稣会士传教北京，并由传教会经理员嘉类思神甫随时在法募集新人造派来华。且欲在奉天设一主教，管理东三省与北京等处教务。德明似有任此主教之可能。罗马则采第一计划。质言之，德明之建议，惟外方传教会拒绝来京，遂以遣使会士接替。

“其遗嘱经其侄孙刊布。兹录其要旨如下：

一七四九年余从法国赴中国时已为教士。余居中国，尽余所能，仍以教士自处。是以在此时间中毫无固有产业。

自本会解散以来，脱余意欲为之，将可获有财产；然余意不欲，是以毫无所遗。”

余毫无负债；余曾随时处理因布施所入可以处理之物。至若衣服什物及其他小件物品，应视为属于本堂所有。

所遗文字无足远渡重洋者，余留若干残片以备通讯用外，余篋中一切文字意欲悉付诸火。并请其道长尽焚其来往文字。

“后文处理欧洲寄来之物。个人之物交于传教会道长，惟将其仆所求之时计除外。现金分为三份，二份赠二仆，一份赠其旧侣杨某之子：

此事余三十余年，忠爱诚笃，为此地所罕见，此微物不足以偿其劳也。

钱德明

此囑写成已有年矣，今重读一过，毫无可以增删之文。一七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钱德明”

1805年 仁宗嘉庆十年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上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嘉庆朝》辑：

2月13日(正月十四日)谕著将西洋人德天赐交左翼总兵在圆明园暂行看管称：

“连日臣等传到秦承恩所奏陈若望供出托带汉字书信赴澳门之赵若望、蒋怀仁、张明德三人，逐一询问。据供‘均系内地人，在西洋堂内办事佣工，从前俱曾到过广东贸易，与杨姓、金姓相好。缘陈若望于乾隆五十八、九年间跟西洋人窦云山进京，是以彼此认识。上年九月间，陈若望又由广东至京到北堂投信与张明德相见，因将各信托他带回广东分致’等语。臣等复令赵若望等将所寄各信内情事自行覆述，均与原信相符，尚无别项违碍之处。又传到各堂西洋人贺清泰、南弥德、德天赐、李拱辰等，将西洋字各信令其认识。据李拱辰称‘我系博尔多亚国人。上年九月间接到澳门管事所雇陈若望送到的信，说现有西洋人色拉巴想要进京当差，并询问六年间同我到澳后经患病之毕学源进京后是否病已痊愈等话。我随即写了回信，并写寄我父亲、叔父及问候朋友各信，又有各堂托带问候信函，内索德超亦有三件。俱交陈若望带去，曾给他盘费银十三两、洋钱一个’等语。并据各堂寄信之索德超等各自承认，均称系通候信札是实。查在京天主堂之西洋人俱系奏明来京习艺。其往来书信例应官为收发咨送，不许私行托寄。今索德超、李拱辰等因陈若望回粤便捷，托带书信，均属不合。应俟陈若望解到，质讯明确，归案办理。惟内有路程图样之信，据德天赐承认系伊所寄。并据称‘我是意达里亚国人，在西堂当家。此图内所开地方俱有民人在我们各堂习教。因各堂规矩不同，恐到京时争论，所以分别标记。其有在西堂习意达里亚国教者，以一点为记；有在南堂习博尔多噶里亚国教者，以十字为记；有习吉斯帕尼亚国教者，以尖圈为记。其黑方圈系向有习教的人，此时已没有了。我要寄图与传教正管，使他知道某处住有某堂习教的人，以便来京的人到堂不至争论’等语。臣等传到在京学书之俄罗斯人四贴班伊完译出图内上方西洋字，均系各该标记，与德天赐所供无异。至诘以此图从何处得来，据德天赐称：‘系西堂旧有，我于当家后在旧字匣内检得的。’复诘以你既系检得，何由懂得图内标记？且自登州府至广平一路，既有习教之人，究由何人传授，是否止此一路？抑或尚有别处？德天赐俱不确凿供吐。并传到前在西洋堂当家之闫诗谟，询以该堂果否旧有此图，又称从前并无此项图样。复询之各堂西洋人，亦称均未见过。反覆究讯，总属支离。前经臣等奏，奉谕旨将德天赐交提督衙门暂行看管。复经提讯，坚供如前。查德天赐在京当差，前曾蒙赏给六品顶戴。乃不安本分，私自寄信澳门，已属违例。且熟悉汉

话而所供写寄地图情节始终含糊，难保别无隐情。应请旨将德天赐革去顶戴，交刑部详细研审，得实定拟具奏。”

2月17日(正月十八日)刑部奏为审拟西洋人德天赐私自托人寄送书信一案摺称：

“据江西巡抚秦盘获广东民人陈若望，搜有西洋字及汉字各书信并山东登州等处地里图一张，经军机大臣讯明地里图系天主堂西洋人六品顶戴德天赐托寄，请将德天赐革去顶戴交刑部审拟具奏，等因。奉旨：‘依议。钦此。’当将德天赐押送到部。巨等查天主教曾于乾隆四十九、五十等年节次严查惩办，钦奉谕旨：‘西洋人传教惑众，最为人心风俗之害。除已获解京之吧地哩映等定案时另降谕旨传谕该处夷人外，现在各省神甫名目尤当严禁，内地民人有称神甫者，即与受其官职无异。本应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财物资助，审明后应拟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所有接引传教之人亦应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示惩戒。至内地民人因祖父相传，持戒供奉，自当勒令悔改，即将呈出经卷等项销毁，照例办理。钦此。’圣谕煌煌，自宜共知感畏。何以迄今仍有各处传教之事？虽此时传感已众，势不能逐名究办，亦应将听从西洋传教如号称神甫等项内地民人严行究惩，俾愚民各知例禁，醒悟改悔，以维风化而正人心。当向德天赐详细讯问。诿德天赐一味回护，狡饰支吾。不但不肯供出神甫等项民人姓名，即被惑习教之人亦供年久人多，均不能知其住址名字。复将德天赐之跟役翟喜、萧斌、吴永泰、黄德等查传到案，设法推鞫，并与德天赐质对，德天赐见势不能隐瞒，始据供认：天主堂共有南、北、东、西四堂^①，德天赐在西堂办事。四堂共有先生八人，内姜姓已故，顾姓、何姓、赵姓现在分赴外省传教，卢姓、尤姓、刘姓并厢黄旗汉军马甲周炳德现在各堂讲经讲道，管理一切传教事宜。又于嘉庆七年间将海甸杨家井地方旧有西洋人寓处一所改为圣母堂，分男女两堂。男堂会长六人：已故张廷贤，在逃之杨姓并现获之刘朝栋、赵廷珍、朱长泰，内务府正白旗闲散现在畅春园看门之汪茂德；女堂会长民妇陈杨氏。各讲经传教。每月男女来堂念经，煽惑甚众。并究出习教之西堂代认汉字先生山东惠民县人王世宁、直隶景州人吴西满、山西平遥县人张明禄、山东临清州人简恒、直隶威县人尹思敬、正蓝旗汉军马甲佟恒善、佟明、养育兵佟四、正黄旗汉军马甲蔡永通等分别查传行提去后。旋据各该处先后将先生周炳德，会长刘朝栋、赵廷珍、朱长泰、汪茂德、陈杨氏，习教之吴西满、张明禄、简恒、尹思敬、佟恒善、佟明、佟四、蔡永通，江西拿获之寄信人陈若望及包罗柯即柯永福之弟柯添福押解到部，并声明包罗柯即柯永福逃匿无踪，顾姓、何姓、杨姓、刘姓、赵姓、卢姓、尤姓均躲避未到。巨等当就现犯逐加审讯。据周炳德、刘朝栋、赵廷珍、朱长泰、汪茂德、陈杨氏等供在堂讲经传教惑众属实，并据供出‘近年编造汉字西洋经卷三十一种流传各处，冀图易于煽惑人教人众。其版片现在天主堂存贮。至简恒系于去年到堂，替德天赐带信令直隶威县请人传教。民人费二系在直隶景州习教、李珩系在直隶丰润县传教’各等情。巨等谕以正义，勒其出教，近各该犯奉教甚坚，甘心受法，不愿出教。旗人佟恒善虽非先生、会长，而蛊惑尤深，并有‘虽奉谕旨，亦不敢违背天主’之语，实堪切齿。其被惑习教之旗人佟明、佟四、蔡永通及在西堂认识汉字之先生民人王世宁、民人柯永福之弟柯添福、尹思敬、吴西满一经开导，俱俯首叩头。据供‘实不知天主教是违禁之事。今蒙晓谕，情愿出教’，并据踩踏十字，自称悔悟，尚属出于畏法真心。巨等复向德天赐究讯欲将山东登州一带地里图寄回西洋是何意见，据供‘此图原是乾隆四十九年因传教犯事、业经治罪之梅神父所遗。图内自山东登州至直隶广平府，又自曲阜至直隶景州，俱系西洋传教地方。近日各堂要争往传教，我想将此图寄回西洋，求教主传谕各堂，不许争竞，并无别意。至包罗柯向在登州一带传教，每年的西洋俸洋钱八十五圆。包罗是西洋传教名号，若望亦系传教名号。包罗柯去年还到过天主堂，如今逃往何处，实不知道。至这陈若望亦系去年到京。各堂托他寄带书信送交澳门，不想被江西盘获。各书信内除所寄地里图是求教主传谕，其馀别信均系音问故套，并无违碍，等语。检

^① 《中国教案史》第四章《康、雍、乾三朝教禁(1723年—1820年)》第六节《1805年嘉庆朝大教案》引教士伯若森(Brossen)1816年1月12日书信中文字：“北京城内四隅，有教会四，由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四国教士管理其事。此中除法兰西以外的三国教士，久因管辖京城近郊已经基督教化之一大村落问题，发生争执。德天赐为息此争，上书布教圣省，申陈和平解决意见，并附寄标明传教境界之旧有地图。”

查各信,与所供无异。质之陈若望所供前后情节,亦均与德天赐供吐相符。反覆推求,案无遁饰。查律例内天主教并无治罪专条,自应遵照乾隆四十九年、五十年查办天主教钦奉谕旨办理。此案德天赐本系西洋人,天主教系西洋各国人人遵奉,断不因德天赐来京当差不准奉教之理。但地内民人理宜共遵法度。至各旗世仆,尤应各知根本,不得被惑妄行。除现在脱逃之柯永福,各堂先生顾姓、何姓、尤姓、赵姓、刘姓、卢姓、会长杨姓暨行提未到之费二、李珩严拿催解另办外,其现已到案之寄信人陈若望,在堂讲道之旗人周炳德,会长民人刘朝栋、赵廷珍、朱长泰,旗人汪茂德,或往来寄信,或辗转传惑,均照传教之人发往伊犁成案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该犯于乾隆四十九(年)、五十等年严行惩办之后尚敢怙恶不悛,更属知法犯法;且经再三开导坚不出教,尤为可恶。应将各犯先行重枷枷号三个月,分发各衙门示众,俾众共晓,满日咨送兵部转发。民妇陈杨氏以妇女充膺会长,煽惑多人,未便照例折枷收赎,致仍滋蔓。应请先行发往伊犁交该将军酌给驻防兵丁为奴,并严加管束,毋任再犯。民人简恒曾到天主堂代为寄信直隶威县请人传教,即与该犯传教无异。旗人佟恒善虽非会长,不过仅止习教,但经巨等开导,该犯竟敢以‘虽奉谕旨,亦不出教’之言答覆,其荒谬实出天理人情之外。简恒、佟恒善亦应先行枷号三个月,满日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上旗人汪茂德、周炳德、佟恒善均各销除旗档。德天赐之跟役翟喜、萧斌、黄德、吴永泰暨民人张明禄等五名讯止入教,应照违制律杖一百并先行枷号交城看守,使该犯等于何日情愿出教,即于何日报明释枷,照拟发落。西堂代认汉字之民人王世宁、习教民人柯添福、尹思敬、吴西满,旗人佟明、佟四、蔡永通,一经晓谕,即愿出教,且系真心,应请即行省释,毋庸置议,以为执迷不悟者劝。德天赐或应飭令回堂,或应遣回本国,应候圣裁。西洋人同诗谟等讯不知寄图情事,应请勒交内务府仍令回堂当差。嗣后如有来往书信,仍照旧例官为收发,不得私寄。所刻汉字西洋经卷开单进呈,请旨飭交内务府管理西洋堂务大臣查起版片与已刻各书一体销毁,并由臣部行文各直省督抚、将军、提镇暨在京提督衙门、都察院、五城、顺天府一体严密搜查,如有前项经卷,即行销毁,毋任流传。并再出示晓谕军民旗人,务宜痛加改悔,各保身家,毋得仍蹈覆辙,致干重罪。所有失察传习天主教之该管各官交部分别察议。”

5月28日(四月三十日)内閣奉上諭著軍機大臣照刑部審擬德天賜一案分別辦理稱:

“西洋人信奉天主教,在該國習俗相沿,原所不禁。即京師設立西洋堂,亦只因推算天文參用西法。凡該國情願來京學藝者均得在堂栖止,原不准與內地民人往來滋事。乃德天賜胆敢私行傳播,訊明習教各犯不惟愚民、婦女被其煽惑,兼有旗人亦復信奉并用漢字編造西洋經卷至三十一種之多。若不嚴行懲辦,何以辟異說而杜歧趨?且該國原系書寫西洋字,內地民人無從傳習,今查出所造經卷俱系刊刻漢字,其居心實不可問。……德天賜以西洋人來京當差,不知安分守法,妄行刊書傳教,實為可惡。該部奏請或飭令回堂,或遣回本國,均屬未協。德天賜著兵部派員解往熱河,在厄魯特營房圈禁。仍交夾傑隨時管束,毋許與內地旗民往來交涉,以杜煽惑。”

《清代禁教時期的天主教》第四章《嘉慶朝的天主教》第二節《嘉慶前期的教會·二 外省教會的情況》載:

“嘉慶十年以後的教難,是由於官府搜出了德天賜發往西洋的圖表所致,後來弄清了送出此圖的用意,原來是‘梅神父所遺,圖內自山東登州至直隸廣平府,又自曲阜至直隸景州,俱係傳教地方。近日各堂要爭往傳教,我想將此圖寄回西洋,求教主(教宗)傳諭各堂,不許競爭。’”(《清季外交史料》載德天賜供語)

“……結合前面提到的直隸景州人吳西滿、威縣尹思敬,和山東臨清人簡恒、惠民縣人王世寧,同地圖上的路線完全相符,並且還說他們‘分赴外省傳教’。別的一處又說,臨清人簡恒曾替德天賜到直隸威縣請人傳教,還有民人費二系在直隸景州習教,李珩系在直隸豐潤縣傳教等。可知在這一廣大地區傳教事業相當發達興旺。習教就是保守入教,說明新入教的也不會少。《來往章程集》里也說:‘近來京師內外,被惑之人較多。’京師外即指直隸省和相鄰地區,被惑之人較多,即進教受洗的頗不乏人。”

1806年 嘉庆十一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金世达、沈邦彦》载：

“君讳世达，号逸云，直隶广平府威县人……”

“公出生之时(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正值教难严重之际。十七岁赴北京东堂读书者，即入小修道院读拉丁文也，其时为嘉庆十一年(一八〇六)，教难方兴未艾。到澳门深造，当在嘉庆十六年(一八一—)，正各地教士、教友东藏西躲之时。……公与张绍台、沈邦彦，盖均为味增爵会司铎。少同学，老年又同在松江(云间)一带传教。”

1808年 嘉庆十三年

《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四章《嘉庆朝的天主教》第四节《嘉庆后期的大教难·一 驱逐教士》载：

“毕学源也是遣使会士，居南堂。……早在嘉庆十一年被汤士选祝圣为南京主教(嘉庆九年教廷委任)，仍驻北京。嘉庆十三年，汤主教去世，毕学源为北京署理主教，这时东堂的葡萄牙籍的遣使会士又迁至南堂，这里又归葡国保护。”

1811年 嘉庆十六年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上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嘉庆朝》辑：

10月27日(九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温承惠奏报遵旨委员接获西洋人高临渊等过境片称：

“臣接准部咨钦奉上谕：‘西洋人高临渊等四人著交军统领派员送至良乡县。直隶总督拣派妥员接替，伴送出境。沿途所过地方不许令与内地民人交接往来。等因。钦此。’遵即派委候补通判徐登奎、新雄营都司白明玉带同兵役，前赴良乡县，于八月二十日接获高临渊、颜诗莫、王雅各伯、德天赐四人，小心伴送前进。兹据禀报，于八月二十六日送出直隶景州境交山东省委员接获。沿途俱属安静，并未与内地民人交接往来。”

1815年 嘉庆二十年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上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嘉庆朝》辑：

3月31日(二月二十一日)直隶提督徐锜奏为查出私习天主教犯劝谕自首出教并将失察各员送部议处摺称：

“窃奴才自抵古北口任，飭派员弁带领眼目到处缉拿要犯，总无一获。因思编查保甲，原为除莠安良。古北边城，附近京畿，尤应稽查严密。奴才恐其积久生懈，每于行香看操之后随时抽查，并派署中军参将左营游击卢铭中、千总苏振虎、郝殿元、把总毛元善、张谨等亲为暗访去后，稟有祖习天主教名色前来。奴才耳闻之下不胜骇异。查嘉庆十年五月内准前任直隶督臣颜检抄咨准刑部奏奉谕旨：‘行文直隶总督转行提镇将军及各属出示晓谕，严行禁止，民人毋许入习天主教。并飭查明经本板片一体查销，毋许存留。等因。钦此。’是年六月间，提标左营游击阿洪阿稟报：‘查明千总赵秉恭等旧习天主教，俱知畏法，情愿改悔，将各家存有经卷等项销毁出结(附卷)。等因’各在案。奴才迅即密谕署中军卢铭中、守备章寿恩、千总叶自发、把总毛元善先查千总赵秉恭等自嘉庆十年改悔之后是否仍前入教。当据

卢铭中、章寿恩、叶自发、毛元善同禀：‘查得千总赵秉恭早已悛改，现在并无入教形迹。’嗣赵秉恭禀见，泣诉‘从前祖习天主教，原系愚民被惑。于嘉庆十年遵旨悛改，当将经卷等物呈缴销毁。现已出教多年。既蒙访有天主教，容千总查明，劝令一体改悔’等语。奴才即令署中军卢铭中、把总毛元善、千总赵秉恭等详细确查：无论是兵是民被惑入教，悉令自行投首，以赎前愆。旋据卢铭中等陆续谕令人习天主教之叶遇春、殷夏氏、殷承业、林永庆、贾明德、赵秉纯、赵青明、赵宁前、张允恭、张汉元、赵继德、张起元、张仁、殷承陇、汤兴邦、蒲永禄、王法傑、张万保、崔守成、张惠元、冯有喜、谭德、张万星、赵裕前、国怀卿、闫起亮、梁武德、国怀信、高文焕等各带家藏画像、经卷、念珠、十字架等物自行投告，呈请销毁，宽免治罪前来。奴才一一查询，俱供‘入教以来，沿习已久。平日持戒念经，并无另有传习不法情事。蒙谕免罪，我们情愿出教’等语。伏查嘉庆十年刑部奏申明西洋人德天赐传教惑众一案，奏奉上谕内‘一经晓谕即情愿出教之王世宁等尚知悔过，应行省释。等因。欽此’钦遵在案。奴才查该犯等传教惑众，最为人心风俗之害，虽经劝令自首，恐一时畏罪饰词，亦未可定。奴才虚衷护法，该犯叶遇春等俱各叩头泣诉‘我们如果执迷仍复入教，情愿加倍治罪’等语。核其情词，实系出于至诚，自应照例省释，以为执迷不悟者劝。仍飭各该管员弁严行管束。署中军卢铭中、把总毛元善等能将入习天主教谕以正义，劝令自首，获有二十馀家，当属勤奋。千总赵秉恭从前习教，实系有玷官箴，应行斥革；但自嘉庆十年悛改之后并不持戒念经仍蹈覆辙，经奴才查讯，据实禀诉并劝自首免罪多名，尚知大义。相应请旨将赵秉恭留任供职，再为访查。其失察兵丁习教之各该管员弁未能先事查出，咎无可辞。容奴才查明，开具职名送部，分别议处。”

1818年 嘉庆二十三年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上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嘉庆朝》辑：

3月16日(二月初十日)直隶总督方受畴奏为劝谕习教民人到官具结改悔情形摺称：

“……嗣据束鹿县^①习天主教之高自显等二名、习好话歌之卜兴泰等十九名、习混元教之黄廷美一名、景州平日吃斋念佛之张起瑞等七名、习一柱香教早经改悔之张幅荣等六名、交河县平日吃斋烧香之王兴等七名、献县习一柱香教早经改悔之安成等十一名、习天主教早经改悔之范添祥等五名、习混元教早经改悔之孙连升等四名、习龙天会早经改悔之王芝一名、习念佛会早经改悔之李拔儒一名、晋州习好话歌之师近潮等五十九名、习天主教之曹青一名、无极县习好话歌之赫兴隆等六名、钜鹿县习大乘教之李其庭等一百二十一名，赤城县习天主教之郭三栋等十一名，赵州习天主教之潘子恒等男妇十二名口，共二百七十四名，先后赴各该州县具结改悔。讯据高自显等供称：伊等乡愚野民，妄思消灾求福，沿习各教，或吃斋、念佛、烧香，以致误蹈法网。今蒙宣示皇恩，是以赴案投首。至钜鹿县李其庭等于嘉庆十六年孙维俭等犯案后即畏惧出教，景州张幅荣等、献县安成等均于嘉庆十八年后畏惧出教。尔时心存疑畏，因恐获罪，不敢到官首明。其经卷、图像、十字架或早经烧毁，或仅止口念歌词，并无经像。伊等既已投首改悔，岂有反将经卷等项藏匿不缴情事？该州县究诘至再，各供不移。复追问在逃逆犯祝现等踪迹，据各供称‘素不认识，并未来往，亦不知其现在何处’等语。该州县令习天主教之高自显等当堂踩踏十字架，均各欣然跨过，毫无难色。赴各家搜查，实无经卷、图像及不法器具等物。陆续取结具详请奏前来。臣查高自显等沿习各教并吃斋、念经、烧香，本均有应得之罪。仰蒙皇上恩施，导以湔洗之路，凡习教者准令到官具结改悔，即奏明免罪……”

^① 1986年3月5日改为辛集市。

1819年 嘉庆二十四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一节《北京味增爵会底司铎承管西湾子》载：

“一八一九年正是河南仇教的时候，该地本堂神父刘方济各(Bienheureux Clet)已被逮捕，何司铎^①却自河南逃难到北京。

“北京罗院长，因为估量京中还不妥贴，所以打发他到口外西湾子去传教，藉资休养，然而他因以前曾饱受惊慌，在西湾子，还是心里怔(忡)[忪]不安，因此不多时，他便离开了西湾子往澳门去了(一八二〇)。”

1826年 宣宗道光六年

《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五章《道光帝解除教禁》第二节《道光前期的教会情况》载：

“在北京的西教士只剩了毕学源主教一个人。毕主教感到孤独，他想辞职回国，当时管理北堂的中国神父薛玛窦苦苦挽留，毕主教终于留了下来，独掌北京教务。薛神父除看守北堂外，还管理着修道院，据《燕京开教略》称，有一位入了遣使会的修士滦州人柯儒望在北堂修道。”

1827年 道光七年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施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七年之时》载：

“降生后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皇上降旨，惟令籍没北堂，将地基卖于某官于姓为业。……北堂籍没，薛公悲苦无告，不得已，往投主教毕学源，寓居南堂。主教素重其人，意欲留之左右，生死相依。不意仇者探知其事，控之于官，几被拿获，遂逃往塞外一村，名西湾子村。其村教友颇多，薛公即居其处，潜理北京教务，至道光十四年，降生后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而止。由薛公寓居西湾子后，此村遂为各处教务之总区，而北京之修道院，亦迁于彼矣。”

《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五章《道光帝解除教禁》第二节《道光前期的教会情况》载：

“道光七年，皇帝突然下了一道谕旨，没收北堂，把房屋以五千两银子卖给了一个姓于的官员，大堂也被拆毁，管理北堂的薛神父躲到南堂去投奔毕主教。有个仇教的人去官府控告，薛神父赶忙逃到塞外西湾子村去躲藏。薛神父在那里暗自管理着北堂教友，直到道光十五年，那年有一位法国神父孟振生潜入北京传教。道光九年，在北堂解散的修道院也偷偷迁移到西湾子去了。”

1829年 道光九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六章《北京传教事业衰败》载：

“九、北堂关闭被毁

“……道光九年(一八二九)一个背教的教友，在北京法庭上控告薛神父强占北堂以外的传教产业。薛神父闻风先躲在北京附近，然后去宣化，尚以为不可靠，乃至长城以外的西湾子，该地乃成为治理北堂的地点。他是独一负责人，乃与八位修士一齐居于此地。”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二节《薛玛窦司铎驻节西湾子(时在嘉庆、道光二帝交替的时间)》载：

^① 何依纳爵，华籍遣使会士。

“嘉庆皇帝底时候,教士们另外在京城里受了大灾难,北京北堂末后的院长南弥德司铎(Mr Lamiot M. C.)也被斥流往澳门,他在临行的时候,将职权尽行委任于华籍薛司铎。一八二七年,教禁更行吃紧,薛司铎也被查禁,因此他和属下逃难到北京南堂。过了二年,又叫密探查觉,他便逃到城外,不多时候,就往宣化去了。到底此地还不妥贴,西湾子底教友们就请他来住西湾子,这样,一八二九年,薛司铎偕同李修士及北堂修道院底八位修道生,一齐来到了西湾子堂里,那么,薛司铎便做了西湾子第一任本堂神父。自从他到了这里,西湾子堂口也创立了一个修道院。

“薛司铎驻节西湾子,管理北京北堂所属各地方。为管辖这些地方,共有六位味增爵会底会友,就是薛玛豆、韩若瑟、林味增爵、高多默、宋保禄五位司铎外,另有李味增爵修士。高司铎未得长期传教在蒙古;那时候(一八三二),薛司铎在西湾子堂里患得重病,高司铎来送终傅,也替他代理西湾子底教务。有一天在堂里,高司铎给教友们讲道理的时候,正是讲善终的问题,忽然他昏倒在地,不醒人事,昇到了寝室内,薛司铎反倒给他行终傅圣事,相帮他得了善终(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李味增爵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修士,跟着薛神父来到了西湾子堂里,双目失明,一八三六年九月六日,在西湾子去世了。那高、李二位修士,都葬在西湾子,但我们如今在西湾村后坡上,只见存有高司铎底坟墓和碑碣,并不得知李修士底莹圻之所在云……

“薛司铎驻西湾子时,格外操心于他带来的修道生们,西湾子教友们因此也甘心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他去修道,这样,西湾子有一个青年,名叫郑保禄,也进了修道院。按我们底考查,这个地方,他是头一个晋升铎品的华籍司铎,他生在西湾子村(一八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郑司铎亲笔记录着他在西湾子起首读辣丁文,也被薛司铎打发到澳门去,在那里修道院,入了味增爵会(一八三六),并在斐律宾京城玛尼刺晋升司铎(一八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惟是薛司铎……每日给教友们送弥撒,常给他们机会领圣事,再说他从北京带来了体面地祭衣和乐器,连同北京堂内之珍贵圣物,这样,堂里点缀灿烂,祭衣祭器锦绣辉煌,众教友们触目娱心,颇能奋起热忱,引起大众的欣赏与踊跃瞻礼。……一八三二年,西湾子地方遭了荒年,他把求来的哀矜、积蓄的好些粮食,都赈济了饥民。……他来西湾子底那一年,才有三百零几个教友,过了六年,新旧教友和由他方迁来的教友,数目共增到六百七十六名。”

1830年 道光十年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旋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道光十年,降生后一千八百三十年,有葡国传教士赵姓,名若望加斯特劳者,来京助理,主教毕学源擢为总司铎,当时信友遂称为赵主教。在华传教计十七年,后因为辞主教之尊,西归本国。”

1832年 道光十二年

《献县天主教志》第一章第二节《天主教的传入》载:

“约在嘉庆十四年——道光十二年(1809—1832)间,一位外地的中国神甫杨嘉禄在献县大郭庄传教,逝于传教任上,被安葬在该村教堂地下。”

1834年 道光十四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二节《薛玛窦司铎驻节西湾子 时在嘉庆、道光二帝交替的时间》载:

“薛司铎一人管理西湾子教堂之时,来过两位大客人,就是法国传信会底两位会友,即苏(Mgr. Bruguiere)主教和他底向导司铎。苏主教于一八三四年十月八日下榻于西湾子教堂。原来宗座委任了

他为高丽教区底代牧，他因寻一条平妥路径，所以绕道蒙古为往高丽教区去。他客居西湾子堂里一年多的工夫，曾论西湾子记载了几件事实。他写说：“西湾子是靛出名的村庄，差不多全是教友，他们也热心，也爱神父们。”

1835年 道光十五年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旋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主教毕学源在朝治历，独居南堂。……忽由法国来一同会之友。……法国传教事务，前曾暂归葡国管理，至是又归法国管理矣。会友非他，即近世在直省与塞外广传圣教之奇人，西名若瑟玛尔济亚尔慕理，华名孟振生者是也。按孟振生生于降生后一千八百七年，系法国加奥尔府人。及长，升授神品，由法国启程东来。……其自记路程日报云‘余由法国东来，泛海九月。……由澳抵京，复行七八月之久。途中恐人知觉，令从者将余扮为病人，每晨以茶颧面，使颜色薰黄，每休息旅寓，则以衲褥蒙首，面壁而卧。店伙恐染疫疠，不敢逼视。如此周防，尚不免启人疑窦，几被查获者再。倘经发觉，则首领亦不保矣’等语。孟振生抵京后，潜入城中，与主教毕学源快谈彻夜。……晤后，即往西湾子居住。薛公将传教事务交卸清晰，孟振生任事接理，而法国传教之举由是而复兴矣。”

《中国基督徒史》第19章《西方人的压力》载：

“传教会司铎韩若瑟和薛玛窦

“薛玛窦……1780年生于山西省一个基督徒家庭；当时，罗马教廷传信部将该省教务委托于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他的父母是贫苦农民，也是坚定的基督徒；他们教他祈祷。尽管手头拮据，他们仍供他上学，随后又让他学裁缝。然而，每年秘密到村里探视基督徒的传教士的榜样感化了他，所以他幻想成为司铎。当时山西并无任何培训中心。他那个教区里有几个渴望获得圣职的人已在北京西堂——七难圣母堂被接纳。尽管他身无分文，但仍自己设法踏上了旅途。西堂使他失望：他这个教区的传教士拒绝为这个其貌不扬的青年农民担当责任。他去南堂碰运气，又被拒之门外。最后还是遣使会士罗广祥先生把他接纳进北堂法国传教会。

“1807年发愿后不久，薛玛窦便被祝圣为司铎，随之就骑着小毛驴在乡间巡回。1820年，被送上中国法庭的南弥德先生指定他取代自己职位，担任北京法国传教会长上及直隶省、蒙古、河南、江西、浙江和江南（江苏）诸省长上。但是北京政府不愿给予耶稣会士时期的法国传教会以特殊优惠，从而使一个中国司铎获利。薛玛窦受到了与其学生一起被赶出北堂的威胁。于是，葡萄牙人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派遣钦天监成员毕学源阁下作为与中国政府交涉的代表。毕学源阁下便协助薛司铎给北堂一些修士讲授神学。1838年毕学源阁下去世时，再也没有确保传教会维持的欧洲人了。北堂这一建筑物立即被中国政府收回并卖给了个人。

“薛玛窦及其学生日夜工作以抢救书籍、礼拜仪式所用的祭服等堂内动产；随后，他赴蒙古西（弯）[湾]子定居，那里的讲授教理者和基督徒喜出望外地接纳了他。西（弯）[湾]子传教会因这一出乎意外的加盟而实力倍增，从而成了福音传播中心。不过，被困在澳门的法国传教士名义上依旧是其长上。南弥德先生死后，陶若翰先生接替了他的职位。薛玛窦司铎并未忘记他们。他向他们派遣即将结束神学学业的修士，甚至给他们寄拨款——这些钱来自出售北堂动产和不动产所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刚从法国抵达澳门的年轻教士孟振生匿名进入中国，并在西（弯）[湾]子与薛玛窦接上了头。他写道：

我很年轻，还不到28岁。我缺乏经验，尤其关于中国的经验，既不谙其习俗，又不通其语言。但他把我视为长上，当成上帝的代表；这足以说明他的诚意和虔诚……看着这位可敬的老人在一位初来乍到的小年轻人面前如此谦恭、顺从，我真有点局促不安。”^①

^① 原注：A. 米隆：《关于传教会修会的回忆录》，第3卷《教区》，巴黎塞弗尔街书店1912年版，第575页。

《中国教友与使徒工作》第三章《教难时期(1723—1851)》“贰 苏努的家庭”载：

“苏努二子若瑟及若望之死

“……1835年——即雍正去世后一世纪——孟振生主教(Mgr. Mouly)被任命为蒙古传教区首长，曾发现苏努的后代，这个人数众多的家庭那时只剩下穷无恒产的四位弟兄，三位住在北京，一位住在离北京四十华里的山区，住宅简朴而窄小，却有十五口人。他们很欢迎孟主教；在主教借宿的房间内有一座祭台，虽然简陋却很清洁，供有一尊圣母抱耶稣像，是他们的祖先奉教时耶稣会的神父们送给他们的，曾供奉在北京的府第。这家严守圣教规诫，毫无顾忌；他们所束的红腰带是旗人(镶红旗)的标志，能使他们不受欺诬。”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二节《薛玛窦司铎驻节西湾子(时在嘉庆、道光二帝交替的时间)》载：

“一八三五年六月，人们报告给神父，有衙役们要来清查村子。神父和教友们，仓猝间，慌忙运藏了堂里的东西，神父们也躲藏在村中的密室里。过了一个主日，估量危险过去了，他们回了自己的住宅，只待了三天空气又紧张了，又得逃难，一直到七月六日。在乱事平定的那一天，神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孟司铎(Mr. Mouly C. M.)快要来到。”

第三节《孟司铎驻节西湾子总堂》载：

“一八三五年七月十二日，有一位英年的(二十八岁)法国教士，来到西湾子教堂，那就是孟司铎。……我们可敬的薛司铎，立刻甘心情愿让位与他，并敬畏地接礼新上司了。”

“从薛司铎那一方面观审，孟司铎立刻看重了这位良善地薛神父；孟司铎的信上也表示说：‘这位薛神父，有超等的德行，有善的性情，有作神师和经济学底大本领；自从我和他接洽来往了，我亲眼目睹了他底行为，我更看重了他。他有多么大的能干，多么老实和正直，有多么谦逊，守规矩多么谨小慎微，不但守本会会规，还谨守不拘会中底什么小习惯。’

“新接任的孟大司铎……通知了铎费来西湾子行大避静，但那时神职班不多，计到有孟铎和薛、韩、林、靳、郭五位华铎，连同苏主教和他底襄礼罗司铎。……孟司铎又向那司铎们问询了，蒙古地方有若干教徒，据当时的估计数目，共约二千，此中六百七十六人在西湾子村，另有保守者三十二人，不在此数之内。

“大避静完了以后，各就本传教堂口返任去了；苏主教和他底襄礼司铎，也启行向高丽国去了，到底苏主教没有达到目的地。一八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在半途中，死在如今热河教区别咧沟村。”

第三章《味增爵会驻节西湾子时教友底公教生活》第一节《教友们事奉天主底敬礼》载：

“孟公初至，西湾子信众正建一座新堂，此堂为一入字形，也有神父居室；计七间正瓦房，西房南房各三间。他们用这堂要到一八六二年。到了这一年，因为教友又增多了，味增爵会底司铎，又要给他们建一座新堂。有一件契约载明归正堂公会卖与双爱堂神父旧堂底房舍。这旧堂改为婴孩院，那新堂必另建在别处。一八六二年建造的圣堂，教友们要用到一九二六年。

“孟司铎有了新堂，在他目下，也有了热心教友；教友们多领圣事，另外热心恭敬圣体，及热切爱慕圣母。孟公就设法叫他们在祭礼内多加爱助；大弥撒时，叫他们一齐唱经；他们有汉字译音经本，单唱《吾主矜怜我等》《荣福颂》《大信经》《圣颂》《除免世罪天主羔羊》，别时奏乐，十个儿童领唱经，两笛作和音。

“四外乡村信友们，也都喜欢来这里瞻礼，隆重的礼节，也能增进人底热情。但有若干小村，因无神父，主日不能望弥撒，是以守主日底罢工，每受影响。孟公以前在附近各村，以后在全区，命各处信友，主日后晌拜苦路。

“这位热心神师，也记载过西湾子信众几个好习惯：‘每主日及瞻礼，在堂中有道理。为儿童们，每主日两次念问答，先为男儿五十个，后为女儿七十个。平常有二百多来望弥撒，主日下，全数来与弥撒。主日上午，男教友在堂里通功祈祷，也听讲一节圣人行实；同时，女教友们去到四个教友家(在村中四个部分)，在那里祈祷后，一位女会长提一段圣女行实。’

“西湾子老早就有圣体游街，即每年圣体瞻礼，教众请出吾主耶稣的圣体来，在大街上游行一周。”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七章《蒙古宗座代牧区》载：

“一、孟神父至蒙古

“孟神父至中国，为北京传教事业的历史，是一主要的转变；在他管辖的三十年中，发生了许多出奇的事迹。……一八三一年四月二日在亚眠城升神父；一八三三年九月三十日与顾神父同来中国；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六月十四日……安抵澳门。

“孟振生神父 Mouly 如真福董公一样，属加阿 Cahors 教区。一八〇七年八月二日生于非雪。

“他们到达后第二日，陶若翰 Torrette 神父告诉他们，北京传教事业需要一人去领导，澳门的修道院需要另一人。

“……他先同他们二人一齐求主，然后将二人的名字抽签，指出孟神父去北京，顾神父在修院。

“孟神父装做病人。……夏天初安抵北京外边，他是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二月十二日起程的。

“毕主教知道他来后，不准他进城，怕他损害教会利益，使中国朝廷找到话柄，加重反对城中教友的法律，驱逐独一无二容忍的传教士。……孟神父不得已，不能见主教，乃至法国公墓正福寺，他受到国籍遣使会士韩若瑟神父的欢迎，视他为会长；休息了三日后，他又向西湾子进发，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七月二日抵达该地。

“二、孟神父在西湾子

“这个村庄，自道光九年（一八二九）成为北京传教事业的中心，自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〇）薛神父由南弥德 Lamiot 神父任为代理会长。薛神父领国籍遣使会士欢迎青年会长，如为天主所遣；薛神父毫不犹豫，立即卸任，并写信给总会长说：‘我当如何感谢天主，使你给我们自己，使我们具有本职位的精神，并为训导我们管辖的教友。’

“孟神父对欢迎自己的人亦写说：‘他们都对得起培植他们的先人，他们的会长薛神父德行超凡，并有管理的才能；他虽多才，但诚朴、谦逊，不但谨守会规，并保存本会的习惯。’

“西湾子成为教务的重要中心，不久将成为新教区的中心，当时只是由直隶省少数移民所居，在开垦蒙古人让出的土地。

“它的重要性是由北堂被关闭，及道光九年（一八二九）薛神父将北堂教务迁至此地。他至此地时，只有教友百名左右，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已有六七百名。……虽然穷苦，却以为经堂太小，将它拆了。孟神父抵达时，正在建造一座更大的：道光十五年开始，十八年完成，化了一千元，孟神父帮助百分之十，其余皆由本村及附近所献。这座堂直至民国九年（一九二〇），作为主教座堂。

“三、蒙古神职界及教友的状态

“……孟神父至西湾子二月后，他邀请所有遣使会士至西湾子同作避静；薛神父在这机会中，求会友宽免他在会长任中所犯的一切过错，同时公开正式承认孟神父为新会长，应许听他的命，他真的这样做了。

“除了传教士之外，他也关心教友，他们有多少？依孟神父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的统计，单在蒙古，约有二千名。

“孟神父开始男女教友的避静，恢复教友唱经，以前教难时毕主教曾经取消过。他准许女教友进堂。……女教友聚集在一小堂中，主日及瞻礼日，神父去作弥撒。但为将就当时的风俗起见，他另辟一门。此外将堂分成二间，作八字形，祭台放在八字交叉处；这样，男女教友可以同时念经望弥撒，但彼此不能相见……

“孟神父为使教友守主日及瞻礼日起见，规定主日下午公拜苦路……

“冬天，他召集了多名热心教友，因为冬天有时间可以读书，供他们膳宿，培植他们，然后遣他们至村中教育儿童，主日他们对教友讲道。他亦培植传教先生，他们依照教友的需要及教友儿童的数目，在每处暂住一个时期。

“西湾子的女校，由二位贞女，及二位传教先生的太太管理，有六十名五岁至十六岁的女孩；但她

们不会教要理,乃由一位年高德劭的传教先生,每星期三代理教课。别的地方,在可能范围内,也有仿效的。

“但孟神父最关心的却是修院薛神父至西湾子后,遣修士至澳门南弥德 Lamiot 神父处,使他培植他们。孟神父最初也这样做,只留下备修院,有圣召的儿童在此读拉丁文然后送至澳门。这样,孟神父五六年间,为澳门的圣若瑟修院,准备修生;然自蒙古宗座代牧区成立后,他就不这样做了。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他将小修院迁至小(通)[东]沟,在西湾子西面一百二十公里,保留大修院在主教堂中。

“孟神父虽身在蒙古,但继续管理直隶省遣使会士的教友,约有九千名,散在二百馀处;同时毕主教,以后赵神父 Castro 以北京署理主教名义,管理二万五千教友。”

1836年 道光十六年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上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道光朝》辑:

2月2日(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审拟宣化府赤城县传习天主教人犯情形摺称:

“窃据宣化府属赤城县知县吴庆祺访有传习天主教改悔复犯之温学展等及各自踵习之张庭扬等,会营密往,按名拿获,并在温学展家搜出经卷、图像、十字木架,讯供禀报,当因距省遥远,即飭口北道就近亲提各犯督同审办去后。兹据该道讷清阿申明拟议,由臬司陈崇礼转详前来。臣覆加查核:缘温学展、岳士沅、岳士惠、郭三栋、郭三先、张庭扬、张庭荐、张庭选、张庭栋、温庭保、张思温、张思恭、张思忠、郭士贤、侯幅青均籍隶赤城县,李文增籍隶延庆州;张庭扬系县学生员,余俱种地度日。温学展、岳士沅、岳士惠、郭三栋、郭三先、张庭扬、张庭荐、张庭选、张庭栋、温庭保、张思温、张思恭、张思忠等祖父素习天主教,不知始自何年、传自何人。温学展等均于其父在日跟随入教,念诵天主经语并天主十诫。李文增向在赤城县租赁温学展房屋寄住,因见温学展习教念经,随亦自行诵习。侯幅青与温庭保故父温学忠认识,经温学忠口授经诫。郭士贤系伊故母所传。平素各自在家每八日念经一次,吃斋两日。嘉庆二十二年温学展、岳士沅、岳士惠、郭三栋、郭三先见有首教免罪告示,曾赴县投首取结,详经前督臣方受畴奏准免罪。嗣温学展等五人复惑于邪说‘生前可以邀福消灾,死后能免轮回’,仍各潜行习教,与张庭扬等均未传徒。本年六月十九日,经该县吴庆祺及汛^①弁马桂林访知,会同拿获。并据该学教官访闻,先将张庭扬衣顶详革,由县讯录各供具禀。批飭口北道讷清阿提犯督同研鞠,温庭保、张思温、张思恭、张思忠、郭士贤、侯幅青、李文增咸知畏惧,情愿跨越十字木架改悔出教。惟张庭扬等俱执迷不悟,屡审供认前情。严究各犯,委无私立名号,惑众敛钱。检阅起获经、像,亦无违悖字迹。经臣覆核无异,应即拟结。查例载‘传习天主教听从入教不知悔改者,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如被获到官情愿出教当堂跨越十字木架真心改悔者,概免治罪’等语,此案温学展、岳士沅、岳士惠、郭三栋、郭三先、张庭扬、张庭荐、张庭选、张庭栋各习天主教,始终执迷,罔知悔改,实属怙恶不法。该犯等均系随其故父踵习,讯无私立名号传徒煽惑情事,自应按例问拟。其中虽有弟兄一家共犯,系同习邪教,应一律科断。温学展、岳士沅、岳士惠、郭三栋、郭三先、张庭扬、张庭荐、张庭选、张庭栋九犯均合依‘传习天主教听从入教不知悔改者,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例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照例刺字。温学展、岳士沅、岳士惠、郭三栋、郭三先首后复犯,至配酌加枷号三个月,俱遇赦不赦。温庭保、张思温、张思恭、张思忠、郭士贤亦系随其父母习教,侯幅青、李文增或经人口授经诫或自行诵习,被获到官,均畏法情愿出教,已据当堂跨越十字木架,其改悔尚属真情,应照例免究,交保管束,仍存记档案,后再有犯,加等治罪。起获经像等件,案结销毁。”

^① 明、清两朝对军队驻防地段的称呼。

4月20日(道光十六年三月初五日)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审拟宣化府传习天主教民人刘书林等情形摺称:

“窃据宣化府属宣化县知县王有为访有传习天主教改悔复犯之刘书林等及各自踵习之张玉蓝等,会营密往,按名拿获,并在刘书林等家搜出经卷、图像、十字木架,讯供禀报,当因距省遥远,即伤口北道就近亲提各犯督同审办去后。兹据该道讷清阿审明拟议,由臬司陈崇礼转详前来。臣覆加查核:缘刘书林、李沅善、杨继和、张玉蓝、张士选、高鸿恩、高鸿喜、杨泳安、杨沅潮均籍隶宛平县,谷枝籍隶宣化县,俱种地度日。刘书林等祖父素习天主教,不知始自何年、传自何人。该犯等均于其父在日随同念诵天主教经。刘书林、李沅善、杨继和曾于嘉庆二十二年并道光四年先后被宛平县拿获改悔出教免罪。张玉蓝、张士选、高鸿恩、高鸿喜、杨泳安、杨沅潮、谷枝查无被拿及投首。案据嗣刘书林等各移居宣化县胡家沟等村寄住,刘书林、李沅善、杨继和复惑于邪说‘生前可以邀福消灾,死后能免轮回’,仍潜行习教,与张玉蓝等均无传徒做会;惟谷枝转授其子谷恒山、谷逢亨二人。平日各自在家茹素念经,或朝夕烧香,或朔望礼拜,彼此并不往来。十五年五月间,经马水口都司瑚克伸布访闻,会县拿获禀报,批伤口北道讷清阿亲提研鞫。张玉蓝、张士选、高鸿恩、高鸿喜、杨泳安、杨沅潮、谷枝等七犯咸知畏惧,情愿跨越十字木架改悔出教,屡审供晰前情;严究委无私立名号,惑众敛钱;检阅起获经、像,亦无违悖字迹。经臣覆核无异,应即拟结。查例载‘传习天主教听从人教不知悔改者,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如被获到官情愿出教当堂跨越十字木架真心改悔者,概免治罪’等语,此案刘书林、李沅善、杨继和各随其故父踵习天主教,于被获免罪之后罔知悔改,复敢潜行习教,实属怙恶不法,自应按例问拟。刘书林、李沅善、杨继和均合依‘传习天主教听从人教不知悔改者,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例应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照例刺字。该犯等系免罪后复犯,至配酌加枷号三个月,遇赦不赦。张玉蓝、张士选、高鸿恩、高鸿喜、杨泳安、杨沅潮、谷枝亦系随父踵习,今被获到官,既各畏法情愿出教,当堂跨越十字木架,其改悔尚属真情,应俱照例免罪,仍存记档案,后再有犯,加等治罪。谷枝之子谷恒山、谷逢亨先期外出未获。现讯谷枝虽称‘愿令一并出教’,应仍飭县拘案,讯明另结。起获经、架、图像,均飭销毁。”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三节《孟司铎驻节西湾子总堂》载:

“当孟司铎初来之时,西湾子有教友一百三十家,教外二十家。”

“西湾子教友们,正在那时候,落成了一座新堂。……为建筑这座圣堂,教友们计出法币佛郎七千(一佛郎合中国规银二钱六分至三钱五分)。孟司铎补助佛郎八百。论这座堂,孟司铎记载过:

没有疑惑,这座堂在当时为全中国是第一个华丽的,也是第一个高大的,计长七丈,宽三丈五尺;正祭台为木质雕刻漆镀的,在砖砌的坛上,计长八尺,和北京北堂的正祭台完全一样,所以也能用北堂的台布和那些装饰物品。正祭台后面,悬有十尺幅面的圣像。像上有救世主坐在彩云中,左手托着地球;正祭台两旁,一面悬有无染原罪圣母像,一面悬有圣弥额尔战败路济佛尔像,两像均有九尺大。以上三像为西技师在油布上画的,像框是木材油漆镀金的。我们北京北堂底主保,是耶稣救世主,因此我看着相宜,在这里依然奉一样的主保。一八三六年八月六日,我也行了降福祝圣典礼。在祝圣大堂底那天,铎曹都在堂里,众教友也来与礼,教友们从未见过此礼,没法子可以说出他们底喜欢。

“论这座圣堂,苏主教也记载说:‘此堂为这小村,实在恰好,理当说这座圣堂,在蒙古境内是顶体面的;只怕有官们嫉恨宗教信友,瞥见此堂,要设法仇害他们。’但苏主教所怕于将来发生的事端,以后并未发作,另外在这几年里,天主格外保护了。在这几年内,福建省底教堂,都被焚毁,北京末后的小堂,也被拆毁,西湾子底圣教概况,反见兴旺。一八三六年,孟司铎又载称:

一个公教信徒,不能不叫教外人认出来;教友不做帮助异端的事情,他们的生活和习惯,随时能表显出他们来;况说西湾子已有六百七十六个教友,差不多占全村底人数,村中底大户也是教友,他们来往,和官家有交接,怎么能不叫人认出来呢?周围的外教人,也知道西湾子村底教是

什么教,并知道我们四大瞻礼的日子,有好多人,也进过我们底堂,到如今谁也没有和我们为难。我很想我们大会长^①在世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他在官前很有情面,屡次和官长们携手办事,连外教人们也托他在官场中给办事。多咱他请人会客,自己极谨守小斋的规矩,几时他被邀吃请,因席间的时候延长,他便礼貌地自己辞别主人,到临近地方去念经。”

第三章《味增爵会驻节西湾子时教友底公教生活》第三节《学校和孤儿院》载:

“孟公那时料到了有学问底儿童,关系将来教友及圣教广扬。如说过他多操心了男女儿童教育。一八三六年他记载:

在我们前院,我改组了一处男校,已经有五十个学生。他们在那里念问答,也听道理的详解;他们也读各样道理书,如《圣经》、《圣人行实》、《辩驳异端》……

“……西湾子堂口,在一八三六年,已经有了女学校。……孟公记云:

在我们眼下,有处女校,已经有六十个女学生,尽为八岁至十二岁者。有两位贞女教授,还有大会长和二会长底夫人助教;这四位教员很热心,也很下辛苦。这女校将来做别校的模范,盼望女教师从此校造就出来。第一位贞女住自己的家,第二位住在我为学房建造的屋子里。在这环境中,我们也能开创一孤儿院。如今已经显露出来,这小根基,要有好结果。^②

“学年末尾,在堂里神父监视下,有一个考试。孟公也叙述如下:

圣母圣诞瞻礼(一八三六),我们在堂里开了奖赏,如同在北京底旧习。我们考了男女两学底学生。在男学生底考答,我们满意了;到底我们实在惊讶喜欢女学生底答案,我们随便从道理书中拣出问题来,有五个大女生,很爽快的答应及解释。我们底奖品,为男生奖书籍、毛笔、墨汁……;为女生奖书籍及手巾。都有赏,但按他们底名次,得赏有多寡。”

1837年 道光十七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三节《孟司铎驻节西湾子总堂》载:

“……在一八三七年间,从地方官的嘱语,能明明地看出来,那官长告诉西湾子村底大户们说:‘多咱衙役们来扰害你们,你们就拿棒子拈他们。’”

第四节《西湾子村和高丽》载

“高丽教区代牧苏公去世后,有范主教(Mgr. Imbert)继任为高丽代牧。……他在西湾子堂里,也住了几个月的工夫。……于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经自西湾子村发轫,经时两月之久,而安抵于该教区。”

第五节《西湾子村和蒙古教务》载:

“在这一年,来到一位秦司铎 Mr. Gabet C. M.,系法国味增爵会底会友(一八三七·三·六),他开始在西湾子学习中国言语。为时不久,他往兴和县境大青山东沟村送终傅。

“在复活瞻礼前,又送终傅到承德属下一个小村。在那里他常听人说,距此不远,有几家蒙古人和西湾子教友有来往。……教友们许下神父,要给寻一个喇嘛来,为教他蒙古语。到了圣母升天瞻礼底际,那堂口底两位会长,果然领着一个幼年的喇嘛,来到了西湾子村……

“为学蒙古语,他们用了一本汉字道理书,不多时,那年轻喇嘛,改变了他底旧观念,反倒成了秦司铎底徒弟。……这样,他在一八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入义学房念《要理问答》,做保守教友,圣名叫保禄。当时在西湾子有一台弥撒,为感谢天主及庆贺此地蒙古人第一个进教。次年,保禄在圣味增爵瞻

^① 原随文注:估量这位会长为张明泉。

^② 下文是:“在我这里存有一件约据,就是献给堂里为设立女学一块地基底一件约文(一八四一)。”

礼领了圣洗,以后也做了秦神父底跟随先生。”

第七节《西湾子的修道院》载:

“修道院确乎为当时蒙古教区顶大的一教育机关,也是西湾子堂里顶有名的一部分。传信会自一八三七年,每年约出佛郎一万上下,为修道院底经费。

“有一位味增爵会底神父,在法国传信会新闻纸上这么记载:‘我们在蒙古有一处修道院,神父们从我们教区里造就出来的学生,遣发至澳门;学生住西湾子二年,那时认清他们底圣召,也教给他们辣丁文。以后遴选他们谁有圣神父底资质,就遣发到澳门;在澳门味增爵会底修院保守二年,发了愿以后再攻读圣神父当修的学业。’……那时西湾子产出来的神父们,尽数为味增爵会底会友,至到一八五一年,那劝修生人会底章程才铲除了。”

第三章《味增爵会驻节西湾子时教友底公教生活》第二节《避静和下会》载:

“一八三七年,孟主教写:‘我们今有了大喜乐,就是给三十个男教友讲避静,差不多没有一个人行过避静神工;他们里头,有几个趁这机会回头,别的重新拿定好主意,也有一个三十年没有办过神工的回头了。’这避静神工,一年比一年兴旺,一八三八年,有四十个男人,过了一年有八十二个男人,再过了一年有一百多男人行避静,也从此传开了这避静好神工在本区各堂口。

“这堂周围小村底教友,每年能下会;这下会也好像一个避静。按圣教神长的定章,教士连在顶小的村落,也该去下会。论这下会,那时神父们所有之规矩本上说:到了下会底时候,教友们该接神父到该堂;若他们不太贫寒,该出路费。多咱神父到村中,就到堂里,在祭台上,该有圣水和苦像,放在两个燃着的蜡当中;教友们念《求为传教诵》一段经文。诵经后,神父举手降福教友们,也洒圣水,后来教友领神父进他底室中。第二天,宣布下会规则及次序。第三天,起始开下会神工,会长把教友名册,交到神父。每天神父给教友讲道理,也给他们开神工底机会,不明白道理的,设法给他演习要理,又当操心儿童们底教育。”

1838年 道光十八年

《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五章《道光帝解除教禁》第二节《道光前期的教会情况》载:

“道光十七年,毕学源主教因病辞去监正职,预料他所在的南堂将归官,因此托了在北京的一个姓魏的俄国教士收存他的地契文约。第二年(一八三八)阳历十一月二日离世升天,享年七十一岁。他死后,俄国教堂的魏教士向内务府追索南堂的教会遗产,道光帝下了谕旨,将南堂归魏教士。直到咸丰七年中法续订条约,规定归还天主教堂时,魏教士的继承人又将毕主教托付的文契归还天主堂。不过那里的宅院早被官府拆毁卖掉,只剩下空堂一座了。”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六章《北京传教事业衰败》载:

“十一、毕主教去世

“毕主教晚年多病……乃请四十年来住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人保护。……其中有一位司祭三、四位隐修士及几位青年人,是来学满洲话及中国言语的。司祭……乃迁居南堂……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十一月二日,毕主教去世,享年七十一岁。他安葬后,清廷占了南堂。……将圣堂及住宅门窗封锁,将锁匙交与俄人。为避免纠纷起见,俄人将房屋拆去,材料变买,以便将钱交与毕主教的继位人……

“北京教区的管理权,则归葡国遣使会士赵神父 Castro。他驻在山东,清廷并不知道,所以他不能进京,因为危险太大。他于……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在马尼拉升神父,次年毕主教任他为南京的副主教,依照当时传教区的习惯,他兼管北(堂)[京]区。

“十五、中国的传教事业重新组织

“……3. 在教会组织方面,教廷变更了以前的规则。先是教友属开教的修会管辖,这办法有许多不便,早已需要改革。不久,乃在一传教区内只有一个修会,它当供给经济及传教士,包括长上在内。此

外圣座有意取消教区,而代以宗座代牧区。

“十六、神职界、修院、教友

“……三个教区,由葡籍遣使会士管辖,法籍遣使会士协助之。教区的教友数字,于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虽然没有正确的数目,但可以承认下面的数字:

1、澳门教区:一五〇〇〇

2、北京教区:三四〇〇〇

3、南京教区:四〇〇〇〇

“但北京法国遣使会士也有四万教友,散在直隶、蒙古、浙江、江西及湖北省。”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五节《西湾子村和蒙古教务》载:

“一八三八年,又有一个姓凤底喇嘛也奉了教;我想多一半他也在西湾子学习问答,一八三九年,他领洗入教,取圣名伯多禄。

“……凤伯多禄志坚恒心修道,被遣到澳门大修道院里,在那里修业后,返回西湾子,于一八五四年晋升七品。”

第六节《蒙古教区的总堂》载:

“那时……罗马宗座划出了一个新教区(一八三八·八月十四日),即满洲里、辽东、蒙古三地方合为一新教区,指派了巴黎外方传教会接管。这样,西湾子村也当归于那新教区。”

1839年 道光十九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八章《宗座代牧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一、任命新宗座代牧

“……毕主教去世,三月后,罗马任葡遣使会士 Henriquez^① 神父,为北京的宗座署理。”

1840年 道光二十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六节《蒙古教区的总堂》载:

“一八四零年……这新教区的第一任主教方公^② 上任之时,西湾子底教众,也举行了一个欢迎礼
……

“孟司铎给总会长上书……说:

在西湾子有神父们底居室,并有我们底小修道院;我们在这个地方,得享偌大平安,至于我们每年也能齐在一齐行大避静。若是我们^③ 离开蒙古地方,修道院就要解散,修生们就要打发回家,有许多神父们,也得遣往澳门,在这紧要的环境里,不能不向您声明我们底困难,我们现今几乎没有区域为开教。

“澳门修道院底院长陶司铎(味增爵会)(Mr. Torrette C. M.)^④ 也给罗马传信部上书,奏明西湾子地方,为味增爵会会友是很要紧的地方,既是修道院院址,又是全中国北方的总堂。

“罗马宗座,得悉伊等奏称理由后,又改定西湾子还归属于味增爵会。况且因为一八四零年底上谕,罗马宗座将以前划出的新教区,另把蒙古又划分为一新教区,也拣派孟司铎为新教区底代牧;那么,西湾子堂,也就成了蒙古教区底总堂。

① 即 Gastvo。

② 方主教(Mgr. Verroles),原在四川传教。

③ 原随文注:味增爵会的会友们。

④ 也是遣使会中国省的省会长。

“上面所说的这个消息，等到第二年八月里，才传递到西湾子村。”

第三章《味增爵会驻节西湾子时教友底公教生活》第四节《唤醒教民乡下的旧观念》载：

“孟公心里常惦记教友们，因为好多信友家贫寒，度日艰难。他按能力，每年赈济了他们。一八四零年，他记载上有云：‘此五年内，一个丰年也没有。至于今年我们施的哀矜，比往年大三倍。’那位热心教士，常常思想有一个办法，为提高那穷人底生计。他记云：‘从前我们住北京的神父们，给新教友寻生活，教给他们学欧洲底艺业，如造鼻烟、做炉食等。我在这里也愿意那么办；这里羊毛和胡麻多而且贱，秦司铎和我，估计能教给蒙古地方底教友们织大呢洋布……’从此可征验出来，教士们在西湾子村愿建设一工艺厂，为救济穷人。可惜那好主意没有完成。”

第五节《西湾子教友传教底热情》载：

“教友和外教人也有来往，有时候，他们来参观瞻礼底盛典，他们就惊讶西湾子底儿童受底好教育，另外是因着那孤儿院，他们被感动；这些光景，引领他们进教。到底圣教会在四外传开的原故，不全在才说的光景里。西湾子村有水地坡地无多，居民一年比一年增加，教友因为这环境底压迫，便有移居别处的。一家教友离开这里，那也是一家教友，把他底习惯，缘进到别村。教士也没误过这好机会，也去探望他们到那里，或是派传教先生到那里，有时教友自己在他们新住址开一所问答班，也有时候西湾子教友离家去传教。另外有了许多贞女们离家去远地方，为教女儿们，也劝勉教外女人奉教。孟主教惊讶说：‘这是没有见过的事情，年轻女人往远方，离家数百里，为劝化女流进教。谁见着女先生走，谁受着感动。’

“外村信众也诚恳热待神父派来底先生。论这样地方，孟主教说：‘我收了教友们献的一块田地，从那地得的利银能得足数的钱，为供养女先生。到底，买房舍，修葺破房，预备紧要底家具，用资等费，都归我们供给。’

“冬天底时节，会长和传教先生来往西湾子堂院，三个月的工夫受训练；神父给他们讲道理，也授予讲道的好教授法，连那行传教的司铎开教的各种方法。每天神父为他们提默想，他们也领圣事。一八四零年，已是第二次设训练班。当时虽在口里教友还没有真正自由，在口外圣教会竟是这么广扬，我们岂不该惊讶么。”

1841年 道光二十一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七章《蒙古宗座代牧区》载：

“五、蒙古宗座代牧区的建立

“一八四一年四月十五日，总会长的一封信告诉孟神父圣座已任命他为福所拉 Fussula 名义主教，及蒙古的宗座代牧，但诏书于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七月才寄到。

“孟神父设法辞去这荣誉及职务，并推荐同会士秦神父 Gadet，以为对管理教务比自己更有才能，但罗马及会长皆不以为然。孟神父不得已，只好去找一位祝圣者，最近的是山西的宗座代牧 Salvetti，虽然当走二十五日路。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在太原附近阳曲区红沟子受了祝圣。

“孟主教为北京传教区的领袖及会长，但属澳门的省会长管，当时是 Faivre 神父。他继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九月十二日去世的 Torrette 神父，享年三十九岁。”

第八章《宗座代牧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二、北京教区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葡王还想用他的推荐主教权，委任葡籍遣使会士赵神父 Castro 为北京主教，……然而圣座有意采取另一传教方针，愿任命宗座代牧，所以不愿予以教律上的批准，只给他名义主教衔，而为北京教区的署理人，这样北京教区已是有名无实了。

“赵神父生于一八〇四年，道光五年（一八二五）至中国，道光十年（一八三〇），以毕主教副主教的名义，来至南京；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以北京教区署理人名义来北京，但因当时皇上禁止西洋人进

城,因此他亦不能入城。”

1842年 道光二十二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六节《蒙古教区底总堂》载:

“孟神父接奉宗座的委令(一八四二)后,去到山西,那里底金主教(Mgr. Salvetti)在红沟子天主堂圣了孟公为主教(一八四二,七,二五)。”

第七节《西湾子修道院》载:

“一八四二年,他升了主教以后,把大小修道院分开,也把小修道院迁移到二道河县境大青山小东沟村。孟主教记载,他立意是:‘为叫修道士们,更寂静,少分神,因为隔断了俗牵器尘。’这样,小东沟就成了西蒙古第二个大堂口。”

第三章《味增爵会驻节西湾子时教友底公教生活》载:

“孟司铎在口外传教,常川驻节西湾堂里。一八四二年,他记叙说:‘这几年来,没有另外方法为收新教友,我多操心了那老教友们;因着天主底降福,教友们比较更热心了,也更明白更有学识了。’”

1843年 道光二十三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七节《西湾子的修道院》载:

“小东沟小修道院底院长,第一位为柯司铎。一年后,有翁司铎 Mr. Carayon 接任为院长,这翁公系法国教士,从澳门来时,带来一位修士吴味增爵,赶来到西湾子,他又转往小东沟接任修道院院长。”

第三章《味增爵会驻节西湾子时教友底公教生活》第一节《教友们事奉天主底敬礼》载:

“用祭巾底习惯,教宗从前宽免过;孟司铎晋升主教后,他看顶好再不用这个宽免,所以在一八四三年,命全区取消了这种旧习惯。他那讲义如下:

单有官员在上司前能可被冠;有罪的,虽有钱的,在长官前也不能被冠。我们司铎和信友们,在天主台前是罪人。按中国礼俗,多咱我们在天主台前求恩或求赦,不是连外面也该有一个求恩和谢罪的谦逊样子吗?也常该露着头,在天主台前,好似罪人在长官跟前吗?”

1844年 道光二十四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八章《宗座代牧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六、传教区的组织(省会长及宗座代牧区)

“这里我们当提及中国传教区的一种新制度。直至今时,所有遣使会的省会长都驻在澳门,一旦有遣使会士升为主教,总会长就给他省会长的头衔及权力,管理该教区的遣使会士;从此每位遣使会的宗座代牧就成为省会长,而每一宗座代牧区如遣使会的一省。从此在澳门就没有省会长了。

“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十月四日,孟主教由总会长爱典任为蒙古的省会长;同样,孟主教被任为北京宗座代牧时,孔主教即被任为蒙古的省会长。”

《中国基督徒史》第19章《西方人的压力》载:

“传教会司铎韩若瑟和薛玛案

“韩若瑟1722年生于直隶省一个军中显贵之家。由于父母是基督徒,他从小就受了洗并接受文人的教育。家人打算他走上仕途,因为他是长子而且学习成绩出众。当他表示希望成为传教会司铎时,反对意见甚多。约1790年,他被接纳进入了罗广祥先生六七年前创办的北堂修道院;在吉德明先生指导下,他在那里学习拉丁文和神学,1798年,他从时任北京主教汤士选阁下之手接过了司铎圣职授

任。在其担任圣职的最初岁月，他每年探视十来名基督徒。自15—20年前耶稣会士撤走后，这些修会处于放任自流状态。此外，许多饱受迫害之扰的基督徒离开京畿，躲到了蒙古。韩若瑟毫不迟疑地投身于当时还很少有汉人出入的这些北方草原。

“作为一名出色的司铎，他四出寻访分散在各地的信徒，以此集结起蒙古第一批基督徒核心。任务是艰巨的。他生活俭朴，在当地小庙或基督徒家中过夜。他并非总受欢迎，那些极度贫困、缺乏信仰教育的人们有时会抱怨他吃了他们的饭。然而多数基督徒却赞赏他用纯正官话所作的布道以及他引自《旧约》和《新约》的美好故事。他应吉德明先生之请，与一位讲授教理的文人一起把布赛的《默想录》译成了中文。这一著作不久成了世俗退隐人士的常用读物。约1835年，南京主教兼北京教务监理毕学源阁下表现出对韩若瑟的极大信任（孟振生主教指出，这‘远远超出对自己那些教士的信任’），并选他作忏悔牧师。1844年，在担任圣职47个年头后，他终老于北京西北的基督教中心宣化。其同道薛玛竇在大批基督徒簇拥下主持了他的葬礼。”

1845年 道光二十五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七节《西湾子的修道院》载：

“过了二年，就是一八四五年十二月，翁司铎起身回西湾子，在路上，他出张家口为到口外，被守关的兵士认出他是外国教士，抓住送到衙门里，以后判决罚他回澳门……”

“当翁司铎被捉之时，吴神父已圣神父月馀，他就代理小修院在东沟村。不久郑保禄神父，又升了那小修道院底院长。”

“一八四五年，味增爵会底总会长，解散了澳门底大修道院。孟主教记载说：‘我们底总会长盘算，若是每一位代牧，在他眼底下，有他本教区底修道士，有大益处，因此他解散了澳门修道院；因着这个变动，我们十月间接回来我们本区底大修道士（七位）；在神父住室旁边，我要起造几间房屋，虽然房子规模不大，亦可作修道院底教室。’这样说来，西湾子有了大修道院，这修道院也是味增爵会底保守院。那一年年底，盛神父（Mr. Faivre C. M.（法国）来到西湾子堂，任职大修道院底院长（一八四五）。”

“过了四年，小修道院也迁回西湾子来。”

第三编

清朝晚期基督教的传播与天津教案(1846—1890)

1846年 道光二十六年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施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降生后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皇上钦颁上谕，称美天主圣教之理，晓谕各省大小官员，不准因奉教之故查拿中国奉教之人。上谕云：‘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天主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已依议施行矣。天主教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似应一体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无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勘明确实，准其还给该处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官接奉旨谕后，如将实在学习天主教而并不为非者滥行缉拿，即予以应得处分。其有藉教为恶，及招集远方之人勾结煽诱，或别教匪徒假托天主教名借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仍照现定章程，外国之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将此令谕知之，钦此。”

“按拉蓐尼与中国互订和约之举，虽不能尽遏(波)[迫]害奉教之不情，而潜居内地之西洋修士犹可放心传教，以遂其救人之切志。偶经拿获，亦只遵照和款，送归通商各处而已，不得任意刑戮。教皇际此顺便，即将北京地面立为主教之属地。前所谓赵主教者，自毕学源卒后，代权署理北京教务，教皇即欲擢为此属之主教。赵主教以法国与中国既订和约，北京教务已与葡国无涉，赵主教原系葡人，恐有揜越之嫌，决意不肯受命。教皇又饬蒙古地面主教孟振生转促赵主教遵命受职。不获已，则立孟主教为代管北京之主教。时赵主教正在京南之湖林店村传教，孟主教即至其处，与赵主教面晤，劝其祇领主教职位，自暮达旦，反覆启导，不啻千言万语，甚而长跪不起。赵主教坚意不从，即遍出示谕，晓谕司铎信友人等，俱遵孟主教之命。布置妥协，遂束装西归。后升本国伯而多府主教。于同治八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安然逝世，盛德之名，至今不衰焉。”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八章《宗座代牧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二、北京教区

“……赵神父不肯接受，罗马圣座促他接受，六年间公文不断往来……

“一八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传信部长 Franzoni 枢机写信给赵神父，要他依罗马圣座规定的条件接受主教位，或者将北京教区的管理权交给孟主教 Mouly，同时委任孟主教明智地执行这个命令……

“赵神父固执己见，不肯让步……”

《西湾圣教源流》第一章《味增爵会以前的西湾子》第四节《耶稣会底教士开教和管理西湾子村》载：

“我已经提过张根宗劝化了许多人进教，孟司铎(Mr. Mouly. C. M.)也说：好些口里的教友，迁居到这里，他们底目的，一方面为来求农业生活，一方面为逃脱官方仇教查禁，并为善守教友底本分。但是耶稣会底神父们，屡来送弥撒，却没有常川住在这里，虽然如此，西湾子教友，有祈祷的圣堂，在派有本堂神父以前，就有了四个小堂，一八四六年的约据上，叙述这四个堂底由来，也叙明西湾子堂口已往地若干紧要事项，因这些关系，我将约文完全披露于左：

立献归正堂原基凭据

(文)[立]约人张明显，同族侄国赞、国柜，暨族孙人等。

缘西湾子首先奉教实系张姓故曾祖根宗。自奉教之后，劝勉地户民人，奉教者渐渐广多，并无念经公所。于乾隆年间原筑建公所四间、东西房四间。至乾隆三十三年严查邪教，将公所入官改庙。次年二月内，仍由张天达递呈，奉官断回，将房屋仍交张姓收管。彼时缘人少势孤，将公所房屋拆毁，另将自己住房院东空院一处仍将东西厢房四间盖起，俟后平定之年，再盖念经公所。后至于嘉庆元年六月内张国俊、张国柱、张国信三人将旧堂原料盖起北大堂三间、住房一间，其工费钱款亦系由众教友摊认交付。又至嘉庆十年，因本村教友众多，不能容纳，将旧房拆毁，添买砖瓦木料，盖新房五间。至道光十五年，仍嫌窄小，拆毁重修，建大堂房屋十间。东界不毅，占用何永信奉献地基数丈，并未受价。又十七年间，修盖更衣所，又从何法圣名下买其后院空地一段，价钱壹拾千文，俱无地铺等事。恐其后人不知堂地情由，特立此奉献凭据，永远存照证用。

道光貳拾陆年(一八四六)四月初四日

“我才引据这个约，藉知西湾子头一个圣堂，为乾隆年间所建设，按公历在一七三五年之后；然据殷司铎上面的记载，西湾子头一个圣堂，是在公历一七二六年前后建筑的。这两个年号不相对照，是因为张明显立约，乃叙述一百年以前的事情，谅他又多半系接着传闻，这样，两个年号，虽略有出入，也无害于事实云。”

“西湾子信友们，不但有了小堂，而且也有了一块圣地，我们手里所存的契约，记叙着西湾子教众公议议决，将村后山坡上四十亩地左右，充作村中信友们底公共墓地。”

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八节《孟主教离别西湾子村》载：

“一八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罗马宗座委派孟主教管理北京教区；还兼任蒙古教区代牧。几个月后，孟公便离开西湾子，迁居保定安家庄。他走的时候，在蒙古教区，有秦、古、孔、龚四位泰西教士，还有薛、柯、赵、郑保禄、郑若望和吴司铎六位华铎；在修道院里，有一个念神学底修生(多一半为本处樊味增爵)、六位念哲学底修生，和十二位小修道生，十二中的七位念拉丁文和中文，别的单念中文。

“蒙古教区有了三个大教堂，中为西湾子，西为小东沟，东为苦立图(热河赤峰境内)。”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11月2日(九月十四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盘获法国传教士牧若瑟咨送广东酌办摺^①称：

“窃臣于七月间，据固关营参将潘在田禀报‘七月十六日傍晚有过客二人到关，形迹可疑，盘诘一系夷人，一系山西民人程世直，于车上起获天主教经卷、图像、夷字书信四封、汉字信一封、又一纸，送交并陘县审讯。程世直称‘在山东、直隶交界地方，接该夷人牧若瑟赴山西传教’等语。经该县罗登瀛押解来省，当飭两司督同保定府知府何耿绳讯得：程世直系山西太原府祁县人，种地为生，随伊祖父踵习天主教，自幼听闻，有西洋杜姓在太原府传教，已故多年。本年六月间，同县同教之常安因杜姓故后并无西洋人指授，恐失教内规矩，给伊信函，令至山东武城县十二里庄，找彼处同教人潘会章、胡汶章接请夷人。伊于六月二十七日路过直隶威县，会遇李洛英，询系同教，在其家住宿一夜。次日托李洛英雇人送伊至武城县十二里庄天主堂内。先后找见潘会章、胡汶章，并与夷人牧若瑟见面，邀同坐车回晋，行至固关被获。讯据该夷人牧若瑟供‘系喇嘛晒七品神父，回明国王来中国传天主教，同行共有神父九人，坐火轮船至江南，有同教江南人张姓、李姓，由上海送伊至山东东昌府城外天主堂，又经东昌不知姓名同教人送至武城县十二里庄，其同行神父八人在上海一带传教’等供。诘问夷字书信，系寄与山西赵、杜、梁等姓，封套签上汉字，称系在西洋之中国人所写，其汉字信系胡汶章等寄与常安。覆信又一纸，系十二里庄人胡玛大肋给与该夷人求为忏悔改过迁善之事。委员提到威县民人李济英^②质讯无异。李济英亦系随祖父习天主教，密查平素在家，并无为匪不法。牧若瑟眼碧发卷，确系夷人无疑。

“伏查天主教弛禁一事，上年接准两广督臣曾英等咨会，臣以直隶为畿辅重地，防闲宜密，民间习

^①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上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道光朝》辑此件题为“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盘获喇嘛晒七品神父牧若瑟解身酌办并教民程世直等分别查办摺”。

^② 疑即上文之“李洛英”。

天主教并不滋事之人，自毋庸查拿；而民性蠢愚易惑，一经明示弛禁，设有刁徒藉此勾结影射，其流弊何可胜言？当与司道密商，面为详谕所属各官妥办，原文并未转行。嗣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奉上谕：‘各该督抚惟当于地方官谒见时面飭，随时体访，有传习此教而不滋事者毋庸查拿，但不得宣扬于外，致刁徒得以影射煽惑，别滋流弊。等因。钦此。’

“经臣将遵办缘由，密行覆奏。旋又接准两广督臣函寄摺底，咨行一体查照。臣复悉心熟筹，未敢宣扬于外，仍遵前奉密旨办理缮摺，密陈在案。”

1847年 道光二十七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八章《宗座代牧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二、北京教区

“……孟主教……乃由山上下来，至北京南面六十公里处，赵神父的住所胡林镇，再竭力劝他，赵神父仍坚辞。孟主教写说：‘……我乃将传信部的训令交给他。他退入室内，由我的请求，他给我三封信，一封致神父的拉丁文信，一封致教友的中文信，另一封给我，他证明我对他的离去毫无责任。’

“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六月十五日，赵神父起身往澳门，于是葡国在北京的传教事业乃告完毕。……但圣座为保教权起见，仍让北京教区名字存在九年，孟主教只是署理人而已。”

“三、孟主教驻在安家庄

“赵神父起身赴澳门后，孟主教立刻给教友公布北京教区前任署理人的公函，以劝勉教友好好接受他的继任人，然后将赵神父的拉丁文信亦传给神职界。

“孟主教必须驻在北京教区中心点。……他随从赵神父的意见，驻在安家庄，离保定三十五公里，离北京一百公里。耶稣会士于明万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至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创立了这个教友村。

“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孟主教由国籍遣使会士郑自贵神父伴同，来至安家庄……

“孟主教不能入北京城，委任北京传教的陈玛寰神父，代替自己行就职典礼。

“在正定府传说二位西欧遣使会士林安当神父 Simiand 及吴神父 Privas 策画驱逐赵神父，使孟主教继任，二位中国神父信任了这种谣言，乃派人往澳门，以便迎回赵神父。

“孟主教起初以为这种心情不久就会云消雾散，然而不然，一年后他写出这几句悲伤的话：‘我现在的处境相当困难，澳门的葡人，及大多数新教友，连神父都相信我赶走了赵神父。’他们居然公开反对，以赵神父为他们的正式长上，葡国为他们的保护国家；他们不愿听孟主教的命；正定府及河间府的大多数教友都倾向他们。他们集了大量钱财，派多位传教先生至罗马，反对孟主教篡位，请赵神父回来。在起程的六七人中，有的折回澳门，别的死在路上，只有本村的吴老羊抵达罗马。教宗额我略十六世慈善的接见他，请他将教宗和平及服从的意思转告本国人……

“没有疑惑，这次叛变的主要原因，是大家知道孟主教两袖清风；而葡籍传教士，则由葡王处得到大量的金钱，他们的继位人就没有了。

“传信部固然给孟主教管理北京教区的权力，但没有给他需要的钱财。以前北京主教屡次争取自己的权利，但没有结果。”

“五、孟主教的辅理主教

“孟主教草草组织了他直隶的传教区后，又回到蒙古；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五月，他由蒙古南下，与赵神父作末次的会谈。”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八节《孟主教离别西湾子村》载：

“孟主教……遴选孔司铎 Mgr Daguin 为蒙古教区底副主教。一八四七年三月二日，宗座正式地委孔司铎为孟主教底副主教。”

1848年 道光二十八年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旋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由赵主教西归后，北京各处教务尽归法国修士管理。不久教皇必约第九位^①擢孟主教为北京与直隶省之本主教。孟主教另荐本会一人，名拂老楞爵达干为蒙古地面之副主教。于道光二十八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洋历七月二十五日，亲为举行升圣主教之礼，即孔主教也。是年有遣使会所属之仁慈贞女十二名由法国抵华。溯中国仁慈堂之创设，自是而始。”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八节《孟主教离别西湾子村》载：

“孟主教在北京办理要公后，便到西湾子向孔司铎劝驾，孔司铎因着他底进言，就全随了他底旨意。孟公于一八四八年七月一日，来到这里，第二天，向教友们宣布了，在七月二十五日，要行祝圣孔主教大礼……

“过了瞻礼，孟主教回归北京教区，大约也带走六十八岁的老薛神父，并委他为宣化孟家坟本堂神父。”

第三章《味增爵会驻节西湾子时教友底公教生活》第三节《学校和孤儿院》载：

“……西湾子地方底孤儿院为蒙古全教区第一个孤儿院。

“来口外的時候，孟公听说北京底司铎等，常暗派教友去城里顾慰婴儿们。他在口外，也打发人到各处，叫他们给外教孩子付洗，同时也给他们一点药品；后因外教人把他们底孩子舍给堂里，他不只操心给那婴儿付洗神恩，也给他们医药的慈惠，且也收救他们在一孤儿院内。因为这院里，天主堂救出了婴儿灵魂及肉身底性命，这善功院叫做‘救命会’。赶到法国圣婴会成立了，传教司铎便担负这救孤儿底责任。一八四八年，孔主教记录云：‘圣婴会在我们这里兴旺，不是因为人们狠心，是因为他们家寒；我到如今收下的女儿，俱是因为父母不能养活他们。因为这个慈善事业，那些外教为父母的，也更容易受着圣教会爱情的感动，这爱情也是我们婴孩会底根本。’别位教士也记叙过：有多少人，往远地方草地那里，为收救孤儿；也有西湾子教友收养婴孩会底婴儿们为义子义女的，也有娶婴孩会底闺女做媳妇的。”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八章《宗座代牧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五、孟主教的辅理主教

“……次年七月一日，他回到西湾子。在离开蒙古之前，他曾委任孔神父 Daguin 为副主教，直至回来，代替自己；孔神父曾在澳门修道院任教三年，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至蒙古。

“因着教宗额我略十六世^②的诏书，孟主教可任命及祝圣一位辅理主教管理蒙古代牧区，他自己则管北京教区。孟主教选了孔神父，自当征求他的同意，他因为没有接到总会长的命令，不愿听区会长的命令；孟主教与他辩了一整夜后，最后孔神父才承认圣座在会规之上。

“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七月二十五日，举行祝圣典礼，许多教友由各处来参加典礼，薛、郭二位神父尽赞助之职。

“孔主教被任为代亚特的名义主教，及蒙古的辅理主教。”

1850年 道光三十年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旋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降生后一千八百五十年洋历二月二十日，道光皇帝晏驾，文宗显皇帝嗣立，以次年为咸丰元年。

^① 即庇护九世（1792年5月13日—1878年2月7日），1846—1878年在位。

^② 额我略十六世（1765年9月18日—1846年6月1日），又译作格列高里十六世、格雷戈里十六世。1831—1846年在位。

时发捻为乱,有遣使会之法国修士名蒙代助者,为其所杀。贼中虽无天主教人,而于伪帜之上,却绘十字架形,妄希洋人助己。到处焚毁庙宇,虽系孔子文庙,亦皆焚毁不留。皇上为督抚所欺,误以为天主教人,故查拿教民尤剧于前。”

《献县天主教志》第一章第二节《天主教的传入》载:

“道光三十年(1850年)前后,自河间到大名一带(直隶东南地区)已有教徒 9476 人,建堂口 132 个,另有望教者 62 名。”

1851 年 文宗咸丰元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八章《宗座代牧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六、传教区的组织(省会长及宗座代牧区)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十二月二十四日,总会长写给一切遣使会士传教区的领袖一封公函,请他们至宁波,讨论有关他们传教区的问题;会议的日子定于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八月四日。

“孟主教不愿在长途旅行以前,在北京没有人代替自己。此外他工作的地域甚广,二位主教并不多;况且葡人引起的分裂事件,在几个地方尚死灰欲燃;为此他请求罗马准自己选一位同会士作辅理主教。教宗庇护九世以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的诏书,给他这个权柄,并将阿皮大 Abydos 名义主教衔由他处置。

“但人选问题颇费周折,孟主教先想选国籍遣使会士柯儒望,他曾问长上及传信部的意见;但等候答覆需时一年之久,而孟主教却不能等待,于是他决定选自己的副主教林安当 Simiand,他于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至中国,是北京教区传教士中最年长的,总会长亦曾提过他的名字,大家都赞成。

“于是孟主教召集所有神父至安家庄的小堂内,宣读教宗庇护九世的诏书,任林神父为阿皮大的名义主教。孟主教只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征求林神父本人的意见……被选人坚决辞却……

“他乃选了青年董若翰神父 Anouilh。他……在正定府传教,颇受人的欢迎……

“孟主教决定后,乃登程去宁波,当经过赵州,董神父正在那边传教……

“被选人以为这种突然的任命是天主的圣意,乃如依撒意先知答说:‘我在此地,你遣我吧!主教,你是我的父亲,照你的意思办吧!’

“孟主教……就在这四五百名教友的少营村里,举行祝圣典礼。

“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六月二十二日在一座简陋的小堂内,举行祝圣典礼,祭台前围以草绳。一位国籍神父及陪孟主教至宁波会议的林神父作赞助人。教友手中执戈在村前警戒,以免附近的分裂教友来扰乱典礼,一切经过良好。”

《江南传教史》第一卷第二部分《赵方济主教和徐类思主教时期(1848年至1856年)》第一章《从赵主教任期开始到叛乱战争发生(1845年至1852年)》载:

“教区历史概况

“……他^①在江南逗留的时期是在1851年的最后几个月;后来他同一连串对中国未来教务有影响的大事都有连带关系。

“中华帝国和欧洲列强签订了条约之后,中国皇帝又应允了刺萼尼公使的请求,颁布了开放教禁的上谕。传信部长想给中国传教区建立一种有利于推进教务组织的时间已经到了。

“1848年5月11日,传信部在有关中国教务的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召开中国的宗座代牧全体主教会议的计划,以便在会上商讨关于中国传教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地点拟定在香港。这一计划是由巴黎外方传教会顶萨莫斯主教衔的日本宗座代牧福尔卡德主教首先倡议的,当时福主教正在伺机进入自己代牧区,并担任着香港的临时监牧。

^① 法国遣使会士孟振生,时任蒙古宗座代牧区主教兼北京主教区署理主教。

“在中国的所有宗座代牧都接到这一计划的通知书,附有商讨问题三十四条,使大家能在开会之前先进行认真地研究。

“不少主教对去香港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异议;因为内地一些代牧,至今仍须时常谨慎小心,看来很难前去参加会议。中国政府看到各教区的主持人到最近被英国夺去的土地上集结,很可能引起猜疑。法国驻罗马教廷的大使德库塞尔支持他们的意见,于是在1850年5月28日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取消了在香港举行这次会议的计划。

“然而,举行一些局部地区的宗座代牧会议,周折并不太大,同样也能取得相当大的效果。于是,1851年间,就分别召开了这样的会议。上海也开了,在一定程度上,它显得特别重要。同年,遣使会总会长艾蒂安委任参赞普苏神父来到中国,召集遣使会的宗座代牧在宁波开会,商讨有关该修会所辖教区的教务工作。

“南京主教区署理主教赵方济认为,在上海召开这种会议比较有利,尽管不算正式会议,但对传信部提出的各项问题,可一一加以探讨,并把商讨的结果汇报罗马。^①

“赵主教曾邀请在宁波开会的四位遣使会的宗座代牧和日本的宗座代牧萨莫斯主教福尔卡德来上海,共同对罗马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浙江宗座代牧顾主教因有要事未能出席,但他读了会议记录后,表示完全同意,并签了名。此外,方济各会会士、湖广助理主教诺韦拉正准备回欧,在开会之前路过上海,曾向赵方济和徐类思二主教谈了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所以上海这次代牧会议出席人数尽管只有六位,而实际上,开会记录的确代表了中国东部的所有教区的八位主教的意见。

“1851年11月7日,在上海董家渡主教公署出席会议的有:蒙古宗座代牧兼北京署理主教孟振生,河南宗座代牧安若望,日本宗座代牧福尔卡德,南京署理主教赵方济,蒙古助理主教,南京助理主教徐类思。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议,于12月3日,圣方济各沙勿略瞻礼日那天讨论全部结束。

“在这期间,逢瞻礼庆日就在徐家汇会聚,我们在别处还将讲到。而开会时,是赵方济主教主持议程,福尔卡德主教担任会议秘书。

“传信部所提出的议题,是集中了中国教区在领导、管理方面可能碰到的一切难题,这些问题至今依然存在,而且都很现实;所以我认为把上海的开会记录扼要地介绍一下是有益的。

“第一个问题,提出是否要成立圣统制。除一人之外,所有的主教都赞成并祝愿中国尽早成立按教会法典规定的正规的主教区;这样可使各主教区的领袖们对神职人员和信徒,以及对地方官府们,显得格外有权力;也可使在中国的每一个教省区的省级会议作出统一的安排。安若望主教提出异议,认为目前在中国设立直属传信部的宗座代牧,看来对传教事业更为有利;至于定期举行省级会议,由于地方官的阻挠,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还是无法实现的。

“传信部计划只拟订在中国、高丽、日本建立三个总主教区,这显然是不够的;教省的划分必须增加。在主教区的编制上,必须按照习惯上遵循的行政区的府与县来划分。必须趋向于每一个省要有一位总主教,每一个府有一位主教。按目前来讲,暂时似乎可以划分为六个总主教区:北京区(直隶、山东、蒙古、满洲);西安府区(陕西、山西、甘肃);武昌府区(湖北、湖南、河南);成都府区(四川、云南、贵州);南京区(江苏分两个主教区,另一个设在扬州;江西);福州区(福建、浙江、广东、广西)。将来,满洲和蒙古一旦教友人数足够时,可划为一个特别总主教区。^②

“高丽和日本应当置于中国教会体制之外。

^① 原注:我把保存在传信部的浩瀚而又有价值的记录,简略地摘录一些。见《传录》,第14卷。1851年,六位主教在上海召开商讨有关传信部向中国及其邻邦的所有主教提出的三十四个问题的会议,会议共举行十二次。在1874年的传信部全会记录里,对这次会议大大地表扬了一番。事后,传信部的不少措施就是依据这次会议中的主张而决定的。

^② 原注:把这一规划和目前划分的宗座代牧区为五大区相比较是饶有兴味的;对这五大区随后我将另有记述。在传信部保存有其他宗座代牧于1851年和1852年举行的会议记录,在谈到有关建立中国教会圣统制的主张时,比起这次上海会议来,赞成的人更少些。

“关于选举总主教，每一教省内所有主教以及总主教区内所有中外司铎，都有选举权；‘唯有教省内所有主教，以及总主教区内的外籍司铎有被选举权’。关于选举主教，主教区内所有中外司铎都有选举权，又主教区内所有中外司铎都有被选举权；‘但有一个区别，如被选举的是外籍司铎，只要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不分中外，即可生效；如被选举的系中国司铎，则在所得的三分之二的票数内，必须有全体外籍司铎的票数，才算有效’。在选举区主教时，审查工作由总主教担任，在选举总主教时，审查权则由教省内主教中任职期最长的人担任。

“培育本地神职人员，又是一个引起主教们关心的问题。本地神职人员中有的年龄过大，是否在授予神品之前可以简化神学课程，主教们一致表示反对；认为还是让他们充当传教先生更为有益，遇到特殊情况，可由本主教裁夺。主教们一致认为在修道院中应精心研究中文，但本地的年轻修士却不宜去应科举，避免在应考时碰到与教会禁令冲突的礼仪问题，此外还须谨防傲慢不驯的苗子。

“一般不宜派遣本地的年轻修士前往欧洲求学，至于那不勒斯专为中国修士办的中国公学，则隶属于一种特别的制度，当然不受限制。^①

“福尔卡德主教倡议，在通商口岸，例如在上海举办中心修道院——总修院，那么那里的学业可比一般教区修院的课程高深得多，其他主教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很好的，但实际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时尚难实现’。

“主教们认为，年轻的修士在领受神品之前，先实践一下传教先生的工作，看来是良好的和有益的，但要出于自愿；同样对一些新提拔的本地神父，在开头几年中还需要一个有经验的西洋神父带领。

“传教先生的训练和神职人员的培养同样重要，‘一个教区的好坏和传教先生有着密切关系’。主教们一致认为，要在各教区开办‘公学’或师范学校，专门培训得力的助手。原则上这确是件好事，但实施上尚有困难；一般地说有配偶的传教先生比独身的似乎更好些。

“对教区内的教产问题，我们业已看到，这是罗伯济主教和耶稣会之间发生分裂的主要原因，与会主教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彻底。传信部提案第十一条写道：‘下列规定是否适当，主教和其他一切传教士，不论属于什么修会或什么传教团体，其收到的一切捐献应一律归公，即每一个传教士无权支配任何物资财富，而只能由主教支配，他接收到的一切捐献，不论用什么名义得来的，都应一一向主教上交。’但最后的答复是：‘一致并立即’否决。

“这样的措施是违反教会常规的，而且势必会造成教友们的大量捐助陷于枯竭。‘哪一个修会，哪一个组织会赞成把提供给本会会员的物资财产，让给一个会外人去全权支配？’绝大多数传教士不会接受这种隶属于主教的方式，如强迫执行，必将堵塞大批圣召；会议提出的措施危害性显然很大，一个善良的主教，可能是一个很差的财政管理者，假如他是唯一处置财产的人，他会把整个教区历年的积蓄花费掉。与会主教观察到‘目前中国教区内对物资方面的问题，业已依据各修会或传教团体的各自的组织大纲而妥善地作了安排，看来不必另行修改’。

“对各教区如何在各会口举行开四规活动，不必有什么硬性规定。也无必要全中国发行一本统一的教理范本。原来的经文不宜修改，老一辈传教士在经文里保留的拉丁文字句仍应保留，因教友们已领会其意义并也已经习惯；用中文代替这些字句，如果发音谬误，将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涵义，以致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圣洗圣事中的付洗经文，如果加以修改就会影响其效果。

“所有主教一致反对把原来用文言文或韵文译成的经文和教理问答改为各地区的方言。因教理问答原来已够简易，而且教友们也都能领会其含义；经文用文言或韵文，这同西方许多地区的各阶层教友念拉丁经文一样，只要向教友们解释清楚就行了；再则，用方言编写的经文，会受到尤其是那些文人学士们的蔑视。对专为传教士所颁的种种特权以及对祭服的格式，无须完全划一；神父举行弥撒时按惯例戴的祭巾帽应予保持，已放弃的应当恢复；这是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须适应地方习俗的权宜措施；传教士们普遍按中国形式剃头留辫子，也是遵循风俗习惯的表示。孟振生主教单独主张祭巾帽必

^① 原注：孟振生主教建议，某些中国年轻神父确有突出的才华，至少可以派往罗马考取学位，其他主教对此表示不甚赞成。

须逐步取消,对此他和安若望主教争辩得相当激烈。主教们一致同意向教宗呈请批准,主教们在中国举行宗教礼仪时,自礼仪开始一直到礼仪终止,常戴主教礼冠,以免不停地和祭巾更换。

“对全中国各教区,不需要订出一种全国统一性的瞻礼节日和大小斋期的瞻礼单;各教区主教可以按照他那来自罗马的特权,发行各教区各自的瞻礼单。还应当请示圣父,把至今只限于本地教友免守大斋的特恩,也同样适用于在华的外国教友。一些热心善会非常适合中国人情,应当大力推行。女教友参与宗教礼仪或领圣事时,最好头上要兜纱,但不能以此作为普遍规定。通常女教友在圣堂里,不应单方高唱经文,但允许和男教友们相互轮流朗诵。

“在接受教友们捐献给传教士的钱钞或实物时,确存在一些弊病,每个主教应切实加以防范。公堂补赎(或称明补赎)看来是有效的,中国教友也乐意接受,所以仍应保留,情节严重的由主教亲自处理;对某种罪行,采取罚款方式‘只能偶或使用,并只限于富人,所罚款项,也只能用于有益的事业,账目要公布,让大众知道;这对某些中国教友,特别对一些守财奴尤其必要,非此不足以使他们悔改。’对贞女们,她们不论是集体住或是回家住,都应密切关注。在中国还没有必要公布特兰托公会议的有关婚礼的决议,宣布秘密结婚为无效,但应该严格遵守天主教有关婚礼的种种规章条例。中国的某些风俗,如幼年订婚、领童养媳等等,是许多罪恶和弊病的根源,在教友中,此风虽已日趋减少,但仍应不懈地审慎地加以抨击。

“在中华帝国,骇人听闻的高利贷引起了主教们的注意;他们表示,根据国家规定,百分之三十的合法利率,教友们也可征收,但在利率较低的地区,则应按一般公正的行商惯例为依据。看来有必要向传信部申请撤销1781年针对一些中国契约所作的决定,后来在四川主教会议上又重新提出过;这些决定可能是由于呈报不确而造成的。

“传信部最后提出的是关于学校问题和发展学校的主要办法,主教们的态度虽是诚恳的,但也提出了不少困难。‘创办学校,这是每个主教日夜操心的事,不少教区已在积极筹备,只以江南一省来说,现在已经办有男女学校一百四十所。看来开展这样一项如此重要的设施,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请我们的一些杰出的账房神父,在可能的条件下,对主教们再慷慨一些吧’”^①。

《西湾圣教源流》第三章《味增爵会驻节西湾子时教友底公教生活》第五节《西湾子教友传教底热情》载:

“我们在西湾子储藏有一本宝贵书,就是咸丰元年用毛笔记录的一本书。那书内载蒙古教区每堂口教友底额数。此处只提西湾子村和四外附近村庄教友底额数,其统计表如下:

西湾子	九八九·	七道沟	二三·
五道沟	四五·	高家营	一一七·
四道沟	二二·	桦林背	一九·
黄土梁	四二·	贾麻子沟	六一·
翠花沟	二零·	二道沟	三一·
大南沟	八四·	白桦沟	八一·
门扇川	五零·	和气营	三零·
二道营	二四·	石窑子	六三·
擒虎路沟	二四·	吴东窑	三一·
五号	七一·	大北沟	二零七·

“一八三五年,西湾子有教友六百七十六个,过十六年有一千九百三十四个。”

^① 原注:第三十四个议题的答案。

1852年 咸丰二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八章《宗座代牧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八、北京教区分裂的平息

“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场小小分裂只在赵州(今日赵县)附近若干教友集中点,及河间府少数人。……当时在北京教区有一位神父,担任分裂的领袖,是许若望神父,依葡人习惯又名 Alves;他原籍江西,在澳门圣若瑟修院读书,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由张主教 Rameaux 升为神父,以便与北京的葡国传教士一齐工作。

“孟主教由南方回来以后,想解决这不正常的现象。咸丰二年(一八五二),他视察分裂的中心,他访问了赵州区内三十地区,各处受人欢迎,只有一处,约有二百名教友,不愿接待他。”

第九章《在孟主教晚年,北京教区的概况,蒙古及河南传教区的出让》载:

“三、一八五二年全国遣使会士情形

“一、北京、署理代牧区:

孟主教,北京教区署理主教,蒙古宗座代牧,直隶省会长。

董辅理主教。

客籍神父:林安当 Simiand、高慕理 Aymerie、卫儒梅 Talmier。

中国神父:张保禄、柯儒望、吕景堂、郑自贵、薛玛实,皆为遣使会士。

“二、蒙古宗座代牧区:

孔主教,蒙古辅理主教,蒙古省会长。

客籍神父:龚伯察 Combelles、梁儒望 Gottlicher。

中国神父:周玛实,教区神父^①;吴文生、陈保禄及薛明道,遣使会士。”

1853年 咸丰三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八章《宗座代牧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八、北京教区分裂的平息

“……次年,孟主教愿作最后的努力,乃遣董主教 Anouilh 及卫儒梅神父 Talmier;二人在赵州饱受痛苦,有人恐吓要杀他们,然而不少走人歧途者受了感动,愿服从正权;是年末,只六百教友随从许神父。”

《中国基督徒史》第19章《西方人的压力》载:

“扩展、分割和分离

“教会辖区的此种变化无法不引起传教士间的磨擦及基督徒中的不安,因为后者必须适应负责他们的宗教团体的传教方法及礼拜仪式。例如,某些传教士允许男子在教堂里戴帽子,而另一些传教士却以同样有说服力的理由反对这样做。更严重的是,中国人被误导而忠实于培养他们的神父。北京以南河北省便有这种情况。1847—1853年间,一场小规模教会分立把正定和赵州地区分裂了出去。部分神父和基督徒依然留恋葡萄牙传教区,拒不接受遣使会施行的圣事。这可不合孟振生阁下的口味,他是他辖区的唯一主宰。基督徒们拒不服从他,还威胁要报复他派去的教士。他们宁肯讲授教理者去江南寻找圣油,也不接受他送去的圣物。经济问题似乎激化了局势:葡萄牙的东方教区看来比传教会的清贫教士有钱。由对谁忠诚引发的冲突夹杂着物质方面的动因。”

① 没有加入修会的神甫的通称。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4月23日(三月十六日)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密饬安肃^①等州县侦探教犯确踪事上谕称:

“有人奏‘直隶各属多有教匪’等语。据称安肃县境内有万馀天竺教匪,景州西南有秘密还乡教匪,沧州小梁山南北赵伙地方有回匪。畿辅重地,岂容奸宄潜藏?……着讷尔经额密饬各该州县侦探确踪,设法掩捕,毋得养痍貽患,致令匪类横行。”

4月27日(三月二十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遵旨查办安肃等县传习天主教等情形摺称:

“查天竺教即天主教,起自西洋,流传内地……

“查得清苑、安肃、安州、任丘、肃宁、献县、交河、故城、景州、沧州、青县、涞水、深州、安平、宣化、万全、张家口厅等十七州县厅各有学习天主教者,每处自一二户至数十户不等,统共一百零七户,均茹素诵经,并无为匪不法。……何州何县何人习教以及人数姓名,莫不记载分明。内安肃县安家庄一处,建堂设学,供奉天主,历有年所。溯查道光二十四年冬间,据该前县访得安家庄民人安洛达等十三名有传习天主教之事,当即拿获严讯,仅只茹素念经,并无拜师傅徒、敛钱煽惑情事,当经跨越十字架,情愿改悔具结,于二十五年五月间由司具详,因正值奉天弛禁,免其治罪在案。上年楚粤逆氛不靖,臣恐其潜行勾结,即经密派干员,专驻该县,以编查保甲巡防奸匪为由,不时前往该处,暗中稽察。该庄居民六十馀户,除不入教十数户外,余皆讽经习教,尚无别项不法显迹,人数亦实无万馀之多。

“伏思天主一教蔓延已久,不独直隶一省为然,即直隶亦不独安肃一县为然。”

5月4日(三月二十七日)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孙鸣珂奏请饬拿安肃县安家庄天主教徒摺称:

“臣闻直隶保定府所属安肃县有安家庄,不下数百户,共传习天主教,窝聚已久,不贴门对,不奉祖先、神佛,男妇成群学习拳棒武艺。前七、八年间曾有知县姚某会同该营千总前往查拿,该匪徒恃众拒捕,竟将武弁捆绑。后因有人关说,始行释放。该县禀详上司,畏其势大,未经究办。现今党徒愈众,线索广通,且有屯聚米石、收买铁器及火药等事。”

6月19日(五月十三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查安肃等县传习天主教等情形摺称:

“兹据委员禀称:遵即不动声色,暗访明查,计该县学习天主教者安家庄五十一户,师家庄二十一户,西釜山村四户,崔家庄三户,正村一户。内惟安家庄设有双爱堂即天主堂,多年为习教人诵经公所。该委员等亲诣查勘,内有教读四名,学生二十名,雇工四名,管事一名;米麦谷豆共五十馀石,鸟枪、小洋枪、长枪各一杆,木棍二根,火药约二三斤。隔别研讯,米粮系堂中人食用,枪械为防夜而设。查起习教经卷,语多鄙俚。复详细搜查,此外并无别项军火器械以及广积粮食收存铁器。该委员等传讯总理堂事之朱若翰,据供伊等自弛禁以后,实止供奉天主,习教为善,并无为匪不法。复向地保邻佑及该县现办团练之绅士等访问,咸称该县习教之家实止安家庄等共八十户,委无数百户万馀人之多。平日皆止讽经礼拜,并未学习武艺,亦无买铁屯粮之事。伊等近在一隅,耳目切近,断不肯代为隐饰,自干连累之咎。该委员等查出堂内出入账簿,细阅一切用项,均载其中,实无收买违例物件。并查得道光二十四年间前署安肃县知县姚忠亮访有民人安洛达等传习天主教情事,会同该汛千总葛鸣彪往拿。内王夺儿一犯图脱,拒伤差役王玉章(平复),王玉章将王夺儿格殴成废,提省讯明。安洛达等情愿跨越十字架出教,照例免罪。王夺儿拒捕伤人,加等治罪;因已成废,照律收赎详结。此外别无县营查拿天主教致被拒捕捆绑武弁之案。造具习教姓名清册,绘具天主堂图说,同起获经卷、账本、十字架、图样等件禀送。

“……安肃县距省仅只五十里,传习天主教之家果如原奏所称有数百户、万馀人之多,并学习拳棒、屯聚米石、收买铁器,则不法昭著,非特地方文武不能讳匿,即臣与司道近在一方,亦断不至毫无闻见。兹据委员等在于安家庄天主堂内将可以收藏米石铁器火药之处逐一严密搜查,均无其事。复查阅出入总账,访问地邻绅士人等,咸称实止讽经习教,并无为匪显迹,亦无收买军器。代剖甚力,似属可信……

“除将安肃县习教各户姓名清册并账本各件存库外,理合恭摺覆奏。”

^① 1914年改名徐水。

同日讷尔经额奏陈目前宜缓办天主教摺称：

“伏思邪教惑人，大率意在敛钱。独天主教向不敛钱，设堂习经，主于广行其教。自道光年间弛禁以来，不无逐渐蔓延。即如安家庄等处，原查仅止十户，现查已有八十户，即其明证。从前多方讳饰，近则直行承认，恃其弛禁在先，以为并不犯法，坦然不疑。而地方官亦因历年相安无事，若无不法实迹，遽然掩捕，必致群相惊疑。设有借口，转恐别生枝节。事关大局，固不便无端肇衅，亦不可任听蔓延。臣体察时势，当此贼氛未靖之时，攘外先宜安内。惟有暂示羁縻，俟南省逆焰消灭，民情安定，然后再行徐图设法办理。缓急之间，似不可不权其轻重也。”

8月3日(六月二十九日)察哈尔副都统盛桂奏报拿获习天主教旗人泰保等照例定拟摺称：

“窃据署察哈尔镶黄旗总管巴彦济尔噶勒呈报，因闻该旗所属屯居旗人泰保等有习学天主教情事，当即派员将旗人泰保、阿延泰、依成即毕里棍等三犯先后拿送前来。当即伤司提讯。缘泰保、阿延泰、依成即毕里棍均系京城镶黄旗定德佐领下人，在张家口理事同知所属西湾子及门扇川地方屯居，种地度日。该犯等习学天主教已有两三辈，西湾子民人归入天主教者数十家。该处早年建有天主堂，每隔七日在堂念经，堂内事务是教首民人郑文明、樊瑞等经管。早年有广东同教杨铎等称为神佛，到堂传教念经，近年未去。堂内刊刻经卷，置有房地。泰保之父济尔噶勒于上九月跟随教首孔姓前往关东传教，迄今未回。该犯等只学念经，并不为匪，惟依成即毕里棍情愿出教……”

“查刑例载‘西洋人有在内地传习天主教，私自刊刻经卷，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拟绞监候。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悔改者，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旗人销除旗档。如能悔悟，被获到官，情愿出教，当堂跨越十字木架真心悔改者，概免治罪。倘始终执迷不悟，即照例问拟’等语。今旗人泰保、阿延泰听从入教，不知悔改，应请销除旗档，发遣回城给伯克为奴，以昭炯戒。旗人依成即毕里棍当堂跨越十字木架，情愿出教，应免治罪。查西湾子地方系张家口理事同知所属民地，建盖天主堂，入教民人数十家，按期念经，究竟有无聚众煽惑不法情事，应请敕下直隶总督确切详查究办，以儆奸邪而正人心。在逃之人教旗人济尔噶勒通饬严缉，获日定拟报部核覆。该犯等系该署总管自行访问拿获，失察入教各官处分请免置议。”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九节《孔代牧执掌蒙古教权》载：

“一八五零年，梁司铎(Mr. Gottlicher C. M.)来蒙古传教；多半他传教在西湾子村，因再过三年廉司铎(Mr. Williaume C. M.)来到之时，他和樊司铎还在西湾子村。按我估量那时樊公做本堂，龚司铎为修道院院长。

“那时候，龚司铎患病，同时也在张家口公署内发生一桩教案，有三个教友被拘讯，其中的两个，也露出了龚、梁二位教士。赶这消息传到西湾子，会长们着急地叫神父们快去避难；那患病的龚司铎，夜间往白桦沟逃走，到了那里，身乏汗出，住在一间冷阴房里，因此病更加重。几天后因为教案没有祸延西湾子村，龚司铎硬要回修道院，也就返回来了。可是这村中谣言还多，他往返地隐藏在打窑室内，故此他底病更沉重了，不多日，便逝世升天(一八五三，五，二零)。”

1854年 咸丰四年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旋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咸丰四年，洋历八月十五日，有孟主教递信之人傅江者，为安肃县差人所获，收监候审。孟主教恐累及教众，即自首于官。赖有刺尊尼通商之约，官府不得擅加刑戮，派差送之上海。不久潜归，照常治理教务。

“是时，教皇擢孟主教为直隶省主教之谕旨，适由罗马寄到。教皇又选遣使会士名阿弩弋^①作其副主教，分理正定、顺德二府教务。孟主教遂为直隶全省之主教矣。”

^① 原随文注：华姓董。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4月22日(三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桂良奏陈传习天主教之人应区别妥办摺称:

“安肃等县向多习教民人。……今鲍四经官兵拿获,而胡林村人胆敢纠众夺回,拒伤官兵。……谨遵道光年间钦奉谕旨,将习教而不滋事者毋庸查拿,其滋事各犯遴委明干员弁访闻踪迹,密速缉捕。一面督饬地方文武于安肃等县不滋事之习教民人仍随时严密稽察,妥为弹压。并请密饬载龄等,嗣后如拿获天主教,审系实无别故,酌量释放。”

同日桂良奏报安肃汛盘获法教士孟镇升片称:

“再,正在缮摺间,接据署保定营参将岳克清阿转据安肃汛千总薛玉堂禀称‘在该汛地方盘获西洋人孟镇升一名。询据口称“前交傅降往固安送信,被防堵火营拿获”等语,禀请查办’前来。

“奴才现派岳克清阿会同该县妥为看管,一面委员前往安肃县详细讯问,取有确供,再行奏闻。”

4月23日(三月二十六日)著直隶总督桂良妥办安肃等县习教民人并派人详讯法教士孟镇升事上谕称:

“所有胡林村夺回鲍四人犯,著该督仍遵前旨,派委委员严密查拿,务获惩办。其徐习教之人,既未为匪,(既)[即]不得概行株连,致滋扰累。并饬地方官随时稽查,妥为弹压。另片奏称千总薛玉堂盘获西洋人孟镇升一名,即著该督派员详讯确供,据实具奏。”

4月29日(四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桂良奏报讯取在固安所获法教士孟镇升供词摺称:

“嗣据委员新升磁州知州玉简禀覆:向孟镇升详细盘诘,据称‘来至中国多年,现赴安肃一带传习天主教,因送信人傅姓行至固安所属,被官兵拿获,伊前来探听’等语。……复经密饬玉简协同在籍团练之候补训导张锡纶向孟镇升逐层根诘,据称‘伊来中国已久,言语衣服皆与华人无异。其安家庄系属同教,向有往来。现遣傅姓所送之信,系给固安人鲍姓,信内但言传教之事’。查看随身携带物件,均无违悖形迹。张锡纶又亲赴安家庄教堂密加访察,亦无勾结情事。”

5月12日(四月十六日)著直隶总督桂良俟军务稍平即将法教士孟镇升解回广东事上谕称:

“直隶安肃县一带向多传习天主教。……惟既据孟镇升供称来至中国已久,言语、衣服皆与华人无异,其传习邪教必非仅止安家庄一处。直隶首善之区,岂容此等邪教摇惑人心!既经查出,断难任其久踞。著桂良俟军务稍平,即照向办成案将该夷人孟镇升解回广东,毋许逗留,以靖畿辅。”

11月10日(九月二十日)直隶总督桂良奏为先将法教士孟镇升解往江苏摺称:

“兹查该镇逆匪业经大兵围困,道路现无梗阻,该夷人孟镇升未便于近畿之地令其久留,自应谨遵前奉谕旨起解回粤。惟广东剿办土匪尚未肃清,奴才再四筹酌,将孟镇升先行解往江苏,交吉尔杭阿探明道路,转解广东,或于上海遇有该国使船转递回国。”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九节《孔代牧执掌蒙古教权》载:

“龚公去世后,大半梁司铎接他底位。第二年圣诞瞻礼,凤伯多禄圣了神父,在本区传教。”

1856年 咸丰六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八章《宗座代牧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八、北京教区分裂的平息

“……咸丰六年(一八五六)三月二十一日,孟主教写信给传信部说:‘我带着愉快的心情报告传信部,北京的分裂业已平息;二位分裂的首领,及许神父做了相当的补偿后,改正了他们不良的表率,接受他们的请求,又进入了罗马公教。’”

第九章《在孟主教晚年,北京教区的概况,蒙古及河南传教区的出让》载:

“一、北京教区分为三个宗座代牧区

“在宁波及上海会议讨论议案中,有关于在中国划分新宗座代牧区问题……

“孟主教乃预料罗马不久要划分北京教区。依最后的统计,它有三万六千教友,在当时是一个了不

起的数字。”

“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十二月,他给传信部呈上一个教区划分的计划。”

“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八月,上海耶稣会神父写信给他,告诉他圣座采纳了他的请求,将直隶南部分给他们,任命耶稣会士郎神父 Languillat 为第一任宗座代牧。”

“实际上,这就是罗马决定的三个划分:将一个北京教区分为三个宗座代牧区。取名如下:

1. 北直隶代牧区,主要城为北京。
2. 直隶东南代牧区,主要城为广平府。
3. 直隶西南代牧区,主要城为正定府。

“罗马起初决定将直隶西南代牧区让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但该会不肯接受,乃请孟主教在任命主教前暂时代理;孟主教乃遣他的董辅理主教 Anouilh 前往;一年后,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十二月十四日,罗马任命董主教为直隶西南代牧区的第一任宗座代牧。”

“二、一八五六年划分三个宗座代牧区时,北京教区概况

“一、北京宗座代牧区:

1. 主教住处:安家庄,修院,教友四百。
孟主教,署理主教,
董主教,辅理主教,神学教授。
高慕理神父 Aymerie,初学院院长、账房。
刘永和神父,遣使会士,本堂。
修士三十六名,其中八名在初学院。
2. 北京总铎区,堂口三十处,教友三千。
柯儒望,遣使会士,此区总本堂;同会士杨安德副本堂,尚有一位教区神父。
3. 宣化府总铎区,堂口八十处,教友四千五百。
张保禄,遣使会士,此区总本堂。
薛玛突,遣使会士,二位教区神父,副本堂。
4. 京东总铎区,堂口一百处,教友五千六百。
张若望,遣使会士,此区总本堂,Smorenbug 副本堂。
5. 保定府总铎区,堂口四十处,教友三千。

“二、献县代牧区:

6. 广平[府]总铎区,堂口四十处,教友四千。
7. 河间府总铎区,堂口五十四处,教友六千。
林安当神父 Simiand 为此区总本堂,三位外籍教区神父。

“三、正定府代牧区:

8. 正定府总铎区,堂口七十二处,教友六千。
卫儒梅神父 Taimier 为此区总本堂,二位外籍教区神父。
9. 赵州总铎区,堂口五十处,教友六千。
蔡国贤及一位客籍神父。

“共有教友三八四〇〇名。”

“四、孟主教辞蒙古代牧职

“直至咸丰六年(一八五六),直隶分为三个代牧区时,孟主教一身兼有三职:北京遣使会传教区会长、蒙古宗座代牧及北京教区署理。一八五六年圣座划分北京教区为三个宗座代牧区,任命孟主教为北直隶即北京的宗座代牧,取消了北京教区,他仍旧有蒙古宗座代牧的头衔。

“孟主教以为最后的头衔已不适合了,因为数年以来,蒙古代牧区已由孔主教管辖,为此他将上面理由呈报圣座。数月后于一八五七年,罗马采取了他合理的要求。”

“五、在蒙古所作的革新

“最初的耶稣会士已理会，依照中国风俗，男人不戴帽子是没有礼貌，而圣教会的礼节，却命神父举行弥撒祭献时不戴帽子，于是他们请求罗马准许神父举行弥撒时，可以戴帽；教宗保禄五世给了这种准许与耶稣会士及在中国全部传教士，并说明许的帽子，不是普通帽子，而是为祭献用的特别祭巾。

“于是传教士作了祭巾，是一种四方形帽子，上方联合，但可摇动，二缕下垂，有如主教的礼冠，黑色，饰以金银刺绣，颇似明朝的朝冠。

“孟主教……在蒙古代牧区中取消了祭巾；但被任为北京教区署理后，他不愿在这教区中有所变更……

“传信部至光绪九年（一八八三）才决定在可能范围内，当将中国戴祭巾的习惯逐渐取消；而实际上，直至一九一二年革命时，祭巾才完全取消。

“孔主教作了一种更重要的改革：他任主教的初年，就想在蒙古消除中国妇女缠足的恶习惯，因为生出许多的弊病，许多传教士亦赞成他的看法；但为取消这种普遍的习惯，当有勇气。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孔主教给教友发了一份训令，反对这种习惯。……他劝教友：1、不要给幼小女孩缠足；2、将十岁以下女孩的缠足解放；3、他劝不出嫁的贞女及青年妇女若无不便处，亦这样去做。”

“比国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继续孔主教的作风。此后，蒙古女教友以天足自傲。”

《江南传教史》第一卷第二部分《赵方济主教和徐类思主教时期（1848年至1856年）》第三章《从太平天国战争开始到徐类思主教任期结束（1852年至1856年）》载：

“三、教区内部历史

“……5月25日，正在恭迎圣体游行的时候（圣体瞻礼后八日），徐家汇接到了这个重大的调动消息的正式通知。总会长贝克斯神父来信宣布徐类思主教已转移去湖北，南京主教区已改为委托给耶稣会的宗座代牧区。

“7月26日，徐类思主教从香港发来一封简短而又恰当的信，把传信部的决定，通过年文思神父通知了新代牧区的神职人员和教友们。正如总会长神父给新任的宗座代理主教写的那样，‘这是一种新形势的开始，一位耶稣会会士，作为会士，仍隶属于修会的会长，但作为一位宗座代理主教，就只隶属于传信圣部^①。’

“在决定有关江南教区管理权的同时，传信部又裁决了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从此就增加了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范围。我们已看到，为了符合上海主教集会的要求，北京教区宗座署理孟振生主教在1851年12月20日曾呈请传信圣部，建议把他辽阔的教区划出直隶的西南部给耶稣会，东南部给外方传教会分别管理。

“孟振生主教回到自己的教区之后，发现他呈请的计划，在自己同会的味增爵会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感，他们生怕耶稣会会士成为他们的邻居之后，会同他们发生纠纷。孟主教为了使他们满意，在1852年3月，又呈文传信部，要求撤销他的申请^②。

“此后不久，味增爵会总会长艾蒂安神父本人也上书传信部部长枢机，要求北直隶全省^③保留给自己的修会。他承认自己没有足够人数来完成目前由他的会士们管辖的一切教区，他提请把河南和江西让给耶稣会和外方传教会；这两省现任的两位代牧，可以调到北直隶当新代牧区的主教（1852年7月27日）。

“在此期间，传信部部长枢机还咨询了外方传教会的各修院院长和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的意见。1852年7月26日，巴朗和瓦赞两位外方传教会神父也曾表示，如果味增爵会的上级同意让出的话，他们愿意接受直隶东南部这个代牧区。7月12日，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由于感到人手缺少、物

① 原注：徐类思1856年5月7日信，见《徐档》，卷宗B5。

② 原注：孟振生1856年9月8日致总会长艾蒂安神父的信，见《遣使会回忆录》，第8卷第1077页起。

③ 译者注：直隶省，即今河北省，前称北直隶；因当时江南也是直隶中央的省，故加北字以示区别。

力不足,谢绝接受直隶西南部。他认为最好还是把人力、物力放在南京教区,它已经消耗了会里一切能运用的财力;与其把一个教区托给耶稣会,不如从江南的会士中选出一位宗座代牧来。两年后,这个旧题又重提了。新任耶稣会总会长的贝克斯神父,仍以同样困难为由拒绝了,但为了能符合圣部的愿望,他在作出最后答复之前,先征询当时(1854年7月1日)正在江南巡视的伏伯禄神父的意见^①。

“伏伯禄神父把问题交给大家讨论,咨议神父们认为可以接受新的教区,因为在中国拥有两个教区的话,对人事的调配就比较有利^②。

“贝克斯总会长把这个答复转呈了传信部,并表示耶稣会应该服从而且一定会服从圣座的命令;至于他本人,他认为按照目前的情况,由于人力的不够支配,并不希望再有新的教区;他更希望能为江南教区准备多供应些优秀的工作人员,把江南教区建设得更加巩固牢靠^③。

“1856年初,总会长贝克斯神父获悉直隶西南区划给耶稣会,直隶东南区划给外方传教会^④。外方传教会的修院院长们要求豁免承担献给他们的教区;他们不愿接受的真正理由,是生怕挫伤遣使会神父们的感情,因为他们看到遣使会神父对于划分直隶非常反感^⑤。

“这样,直隶东南部就划给了耶稣会。郎怀仁神父^⑥被指定担任该区第一任宗座代牧,顶衔为塞尔吉奥波利的主教。可怜的郎神父曾意识到自己有当江南主教的可能性,已深自庆幸摆脱了这顶主教冠冕。可是在1856年9月底,来了两份教宗诏书:一份是5月27日,另一份是同年5月30日签发的,交给了他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和数星期之前的年文思神父一样,他在接到教宗的诏书时,同时接到以听命圣愿必须接受的命令。薛孔昭神父同时被任命为将建立的直隶东南教区的会长。

“孟振生主教因没有得到传信部的任何消息,认为他在1851年提的建议已被遗忘了。1856年6月,当江南梅会长神父写信告诉他罗马最后决定的消息时,他感到很不快活,也感到非常突然。他考虑到北京的同会人士的反感,希望耶稣会上级和郎怀仁主教拒绝接受新教区。可惜已迟了一步,郎怀仁主教同年文思神父一样,已接到了圣父以听命圣愿,不接受即犯大罪的命令。

“顶衔塞尔吉奥波利的主教一接到教宗诏书,就写信敬请北京的宗座代牧给他祝圣,祝圣礼于1857年3月22日在南张庄举行。”^⑦

《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一部分《年文思主教时期(1856年至1862年)》第一章《教区概况》载:

“一、1860年英法联军之战

“……耶稣会总会长神父贝克斯向年文思会长转达被任命为江南署理代牧的指令时,同时指示他必须接受任命。并告知,圣父在一次召见他时,曾口头颁示,在中国的两个耶稣会传教区的会士的修会生活,仍由一位会长管理。会长的任命和撤换,按照耶稣会会典办理,并享有前任会长所有的一切职权。

“但根据罗马传信部1851年8月12日关于耶稣会代牧主教的部令规定,教区的代牧主教即是教区内耶稣会的会长,负有领导管理之权。有关修会纪律事项,应遵照该会会典办理。这部令一直执行

① 原注:这些片断都全部保存下来作为附录,以供1856年1月21日传信部召开关于中国教务会议时作参考。见《传特》,第24卷第474页起。会议记录在同一卷里。关于这事有详尽的记载,我在这里仅作了摘要。

② 原注:总会长贝克斯1855年1月20日致伏伯禄信,见《徐档》,卷宗F11。

③ 原注:贝克斯1855年12月3日致伏伯禄信,见《徐档》,卷宗F11。

④ 原注:贝克斯1856年2月20日致梅德尔神父信,见《徐档》,卷宗F11。

⑤ 原注:孟振生1856年9月8日、11月6日致梅德尔和艾蒂安神父信,见《遣使会回忆录》,第8卷第1080、1100页。

⑥ 郎怀仁(Languillat Adrie 1808—1878),字厚甫。

⑦ 原注:见薛孔昭:《郎怀仁主教小传》,第23页。直到那时,人们才发觉在颁给郎怀仁主教权力的诏书里,有一个难以解释的错误。诏书授命他为直隶东南部的宗座代牧主教时,同时又授他为直隶西南地区的临时署理主教,而同时颁给孟振生主教的诏书也授命他为直隶西南地区的署理。祝圣之前,郎怀仁把诏书呈给他的祝圣者检阅时,这错误才被发现。问了传信部,部长枢机答复道:错误是在颁给郎怀仁主教的诏书上。于是,就把诏书退回补发,现保存在徐家汇的是那份纠正后补发的诏书,已不再提及直隶西南地区署理了。(薛孔昭:《郎怀仁主教小传》,第20页。)

到1880年4月4日,即总会长贝克斯得到圣部修改部令的指示时止。

“年文思在开头数月,只顶衔宗座署理代牧。郎怀仁就不同,诏命到后,他即请人祝圣,任直隶东南区宗座代牧,并开始治理该教区。

“1856年11月25日,两位当选者对有关主教和会长之间在实践上的职权范围进行了商讨,‘会长对会士们的管理权既要完整独立,又要不妨碍代牧的行动’^①。耶稣会法国省参赞吕比荣神父于1867年1月28日,对这个问题又寄来了一份意见书。

“年文思在管理教区的最初几年本想兼任会长,直接指挥会士。之后,经过认真考虑,完全听从了总会长神父的不同意见的劝告。总会长认为代牧主教教务繁重,不可能再有馀暇去关心传教士的神修生活以及是否遵守会规等琐事。

“于是,梅德尔神父仍担任会长兼主教的大代权(副主教)之职。”

《献县天主教志》第一章第三节《教区的划分》载:

“1856年5月,罗马教廷决定从法国遣使会管理的北京教区划出一部分归法国耶稣会管理,新教区被称为直隶东南教区。1857年4月1日,郎怀仁在威县赵家庄就任该教区首位宗座代牧。

“直隶东南教区位于东经111度至115度、北纬35度至39度之间。它的北部和东北部是北京教区,西部是直隶西南教区,南部是山东教区。它在直隶省呈不规则的分割形状,南北长约52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120公里,共辖河间、大名、广平3府,深、冀、景、开、磁5州,含东光、任邱、献县、肃宁、河间、交河、饶阳、安平、武强、武邑、衡水、南宫、枣强、新河、阜城、宁津、吴桥、故城、清河、威县、永年、邯郸、鸡泽、曲周、元城、肥乡、大名、广平、成安、魏县、南乐、清丰、长垣33个县。全教区划为4个总本堂区:第一总本堂区辖河间府北部地区及深州,第二总本堂区辖河间府南部地区及冀州,第三总本堂区辖广平府北部和西部地区,第四总本堂区辖大名府及广平府东部地区。每个总本堂区划分为若干本堂区。

“该教区成立时教徒的数字为:

威县 2328	献县 1800	深州 1715	任丘 851	河间 647	南宫 625
交河 393	饶阳 295	冀州 207	清河 142	新河 85	武强 81
肃宁 75	东光 67	衡水 65	枣强 54	安平 50	阜城 45
曲周 35	武邑 22	永年 16	磁州 7	大名 6	
总计 10133 人。”					

1857年 咸丰七年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6月20日(五月二十九日)署直隶总督谭廷襄奏报盘获意大利教士讯明解回江苏片称:

“臣接据署井陘县知县张仲祉禀报,盘获携带神像、经卷夷人张道德一名,并同行之王可元、冯居安二名。当经批饬提省,发交保定府讯供,由司道覆审,解经臣亲提研鞫。据张道德供‘系意大利国夷人,充当七品神傅,供奉天主教,向能通晓汉语。该国归佛啣叭国管辖。伊于道光二十六年间,由海道至广东并江苏、上海一带传教。王可元、冯居安供系山西潞城并山东武城等县人,均素习天主教,与张道德先不认识。本年二月间,张道德欲至山西祁县传教,适王可元在上海县置货,彼此晤面,询系同教,搭伴行走。途遇冯居安,亦询系同教,经王可元雇令服役,四月十一日行至井陘县,即被兵役盘获,等情。查验十字、铜像等物,委系天主教供奉之件,其经卷亦无违悖字句。

“查张道德系外洋夷人,未便听其违约越省传教,应即委员将该夷人解交江苏巡抚,转饬上海领事官遣回本国。王可元、冯居安素习天主教,讯止诵经劝善,尚无别项不法情事,应准免罪,分别递籍保

^① 原注:见《中总》第3卷第3章第21页上年文思1855年12月4日信,又《中总》第3章第22页。

束,毋许复出滋事。”

《献县天主教志》辑:

7月15日郎怀仁致耶稣会法国巴黎省会长函称:

“直隶东南教区拥有3个府城,5个州城,33个县城,合计有41个城市。每个县城拥有至少300个隶属它的村镇,有一些县城拥有上千个隶属村镇。例如献县——教区将来的中心教堂所在地,根据政府人员的报告,就有990个隶属的村镇,平均起来,每村至少有1000居民。按照这个可靠的估计(那3个府和5个州可以暂且不计,这个本来没有什么大关系),如果你用33去乘30万,就可以得出我们教区有一个将近1000万的居民数字,等于法国人口的1/4强。纵然我的计算结果不太准确,它至少足以证明,摆在我们传教士面前的是一块非常广阔的耕种园地。

“难道按天主的计划,我们的一万名新教徒只应当在公审世人的日期举出人证和物证来控诉这个地区的教外人士么?他们是不是更值得充作这个地区的首批信徒和生产更多信徒的种子?但是,在一个这么庞大的教外人士数字之前,试问:你的三个孤苦零丁的孩子怎样才能用福音的酵素使他们全部发酵呢?

“在传教工作人员方面,纵使能够获得一些增援,我们的人数依旧太少。我一想到这个,就不得不叹息着说:关于这个地区,天主大发慈悲的时刻可能还没有来到。谁如果有意达到目的,谁就一定在想办法。几时我一方面看到,只有这么几个传教士来教导这么朴素、这么勤劳、这么温和、这么沉静、这么贫穷的一个民族;另一方面,想到在法国教会的那些基层单位,竟然有那么多教会人员在照顾为数那么少,并且时常顽固难化的信徒,我就只能从我那无比的空虚和无能的心灵深处,向圣达味王大声说:‘天主!你的见解实在神妙难悟……’有什么障碍物阻止传教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直隶呢?难道是由于他们——一如先前圣保禄和他的伙伴们一样——从天主圣神里接到了在亚细亚^①宣传天主训言的禁令么?或者是由于我们这里和先前比提尼亚^②同样地不幸,虽然传教工作人员愿意来,而‘耶稣的圣神却不许他们来’呢?上主啊! [你的禁令]^③究竟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请怜悯我们罢!我们的困难处境,就是我们请求你大发慈悲的唯一理由!始妊无玷的皇后!一千万个噪音,都要为你祝福,并颂扬你那圣洁的胎儿——耶稣。这种一千万人的大合唱,在你那母亲的心中,难道真的只是一团无足轻重的噪音么?

“可敬的神父:我方才把我心中的苦闷,向上天、世人和你稍微表达了一下。请你不要见怪,这样我的心会觉得轻松一些。”

郎怀仁致耶稣会总会长贝克斯(Beckx Pierre)函称:

“现今我再次写我由于多次出外探望病人而间断的信札。我不能不趁此机会向您述说我们景州的教友要求教士的事。他们向我要求去一位神父,是为给活着的人讲道理,特别是为给将死的人行终傅。请您听一听他们为什么如此恳切地要求去一位神父:不久前,有新奉教的夫妇二人,本来就没有后嗣,又住在外教人的村中。丈夫患重病,自觉不久于人世,求人把自己抬到附近的奉教人村中,为能听到教友们的提醒,并念临终经,预备善终。那个村子的教友们很愿意满足他的愿望,就驾车去接神父来给他行终傅。最近的神父住地离那个村子有三百华里,合三十多古法里。可惜那位神父也病倒了,车夫扫兴而归,往返已经用了6天。但教友们没有失望,又去请邻教区的教士。邻教区的教士说自己没有受过此权,不能给邻区的病人行终傅,打发他们回去请自己的本堂神父。于是他们第三次去请,终于请到了一位神父。所幸病人尚未死去,得了临终者所能得的一切圣事。这位教士把那一方教友们的请求给我带来了。……苦恼的教友们为了请到一位神父行终傅,前后共用了14天,走了120古法里,合1200华里,花费了9两银子,合100个法郎。”

① 原译者注:土耳其一带地区的旧称。

② 原译者注:土耳其北部地区的旧称。

③ 原译者注:译者加。

《西湾圣教源流》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八节《孟主教离别西湾子村》载：

“孔主教十年的工夫，作孟主教底副主教；孟公向教宗要求，委任孔副主教为蒙古正主教。一八五七年九月十九日，果然得准所请。”

第九节《孔代牧执掌蒙古教权》载：

“孔主教巡行关东底时候，有一壮年司铎自法国到西湾子，即白司铎(Mr. Bray C. M.)。他为那一年记载说：‘这里十九位修道士，尽是我底汉文教师，他们都很欢乐，也热心；本教区不满六千教友，泰西教士四位(戴、梁、廉、白)，华藉司铎五位(郑保禄、赵玛弟亚、吴味增爵、樊味增爵、风伯多禄)。’”

第三章《味增爵会驻节西湾子时教友底公教生活》第一节《教友们事奉天主教的敬礼》载：

“早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妇女在堂里头戴手帕，神父们也保存这种好习惯。孔主教斟酌妥了，就取消男教友戴帽子底旧习。他曾出过布告说：‘我拿定主意，在本教区保存圣保禄宗徒底道理。我们该当恭敬天主。……天主愿意男人在堂内露着头恭敬他，所以若男人恭敬天主，在堂内不能戴帽子。’我们也全明白孔主教底道理；大约因为口外天寒，教众不全满意他底规例。到底他底理由充足，至少在夏天，教友能善守这个规矩。”

《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一部分《年文思主教时期(1856年至1862年)》第一章《教区概况》载：

“一、1860年英法联军之战

“……1856年10月，广东巡抚手下的官员没收挂有英国旗的划艇‘亚罗’号，并拒绝赔偿。英国人就炮轰了广州的炮台及城市。1856年12月14日，中国人进行还击，烧毁了一切洋行和洋商机构。……1856年12月29日，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马赖神父在广西西林县被杀。……1857年初，英法两国决定以武力迫使中国作出必要的让步。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勋爵和法国全权大臣葛罗男爵，由一支远征军的舰队护送，启程来到中国。

“……广州被攻占后(1857年12月19日)，法、英、美、俄四国向北京朝廷分别发出照会，阐明基督教列强的要求……”

1858年 (咸丰八年)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4月17日(三月初四日)直隶总督谭廷襄奏报天津府查获习教人邱云亭情形片称：

“拿获广东南海县人、在天津开设药铺、向习天主教之邱云亭，起出经牌、十字架及夷书、夷信等件。讯系上海孟掌教令伊在外行善，施药治病，并未传徒煽惑。”

《中国基督教史略》第六章《中国的东正教》载：

“1858年，中俄签订《天津条约》，规定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得人内地自由传教。……传教士团在张家口和汉口建立了两座教堂，但全国东正教受洗信徒并未超过700人。

《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一部分《年文思主教时期(1856年至1862年)》第一章《教区概况》载：

“一、1860年英法联军之战

“……在中国拒绝接受可以接受的条件之后，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并毁坏了大沽炮台；于是北京派来了两位全权大臣；1858年6月13日至27日，在天津，中国同四个基督教列强签订了条约。6月27日同法国签订的条约中的第十三款与传教事业密切相关。

“7月3日，皇帝批准北京条约……

“额尔金勋爵为了表示条约已签订的既成事实，在1858年11月8日至1859年1月1日，带了多艘军舰溯长江而上直至汉口。

“直到1859年3月，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才完成使命，启程返回欧洲。”

1859年 咸丰九年

《郭嵩焘^①日记》第一卷《咸丰时期·咸丰九年》载：

“二月

“廿七日。杜慎庵大令来谈，知为杜文正公从孙，善捕盗，述及河堤捕女盗佛手公主事，甚可听。屢出差安肃，言安家庄天主堂，其来已久^②。堂凡十七进，行教者正副二人，正孟振声，副董纯一，又管事者蔡振基，凡三人。此外从教者数百人。堂屋皆西向，所供天主面西。外开西南二门。男子从教者西门入，妇人从教者南门入，至院以栏槛隔之。安家庄数百户，皆仰给于天主堂者也。有从教者，里人为具保状，始听入门。始至，命持更洒扫堂屋，久乃渐入内厅料理，铺盖饭食皆预备供给。食饭者，人给白布一方，小刀一柄，凿一，勺一，盖西洋食具如此。外仍日给钱六百。百日后，乃为制衣念经。其后厅，招致童子五六岁以下至二十馀岁，授以西洋书。三年，送澳门一考试。取中者分地传教，岁给俸银百馀不等。天主教几遍天下，安家庄乃其根源也。安肃县钱粮徭役，多取办天主堂，穷者争赴之。又命习教年深者充当胥吏，事巨细皆以闻，岁亦给俸百馀金。京师诸显达居址行径，渠无不知者。其行文澳门、上海，驰驿视官程为速。澳门每岁转致万金以助其行教，谓之进表。其天主堂厅后，有隧道窟室，藏小铜炮数十尊，鸟枪之属以百计。其志之广而行之坚如是，是可畏也。”

第二章《味增爵会管理西湾子教堂底经过》第九节《孔代牧执掌蒙古教权》载：

“一八五六年一月一日戴司铎(Mr. Taglabut C. M.)到西湾子，初任教修道院，继升院长。……这位神父来后，孔主教也能出门阅边去。关东那里梁司铎过于忙，孔主教行八百里的路程，为去帮忙。……因劳成疾，竟患重病。当时他谕飭西湾子底戴院长：令他派遣一位神父去为告解，也为交代一区底教务，并相帮他回总堂。戴公便委凤司铎，也吩咐到承德附近各堂口送终傅，这样凤司铎四十日后，驾临苦立图，即孔主教旅居的教堂。

“凤司铎来到底第三天，领了圣事以后，在苦立图永诀了(一八五九·五·九)。孔主教为味增爵会末后的蒙古教区底代牧；是后戴司铎升为副主教，代理这个地方。”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九章《在孟主教晚年，北京教区的概况，蒙古及河南传教区的出让》载：

“六、孔主教去世

“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封斋初期，孔主教一人在教区东部传教，离西湾子有十五日的路程。他自觉病重，写信给他在西湾子的戴副主教 Tagliabue 说：‘请速派一位同会士，使我能告解，并让他继续我的传教工作，我将回堂治疗。’

“戴副主教召了昔日的喇嘛冯伯多禄，派他去帮助生病的孔主教；冯神父路上给各处病人付终傅圣事，四十日后才到孔主教处；他们见面后，主教问他最近的消息，冯神父确有不利消息告诉他，但又怕他难受，没有将所知道的告诉他；主教已看出了，怕人将若干重大灾祸，若干传教士被捕，隐瞒自己。无论如何，主教病势日益加重，他自己请求领终傅圣事；第三日，即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五月九日在冯神父前，他平安逝世，享年四十四岁。”

《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一部分《年文思主教时期(1856年至1862年)》第一章《教区概况》载：

“一、1860年英法联军之战

^①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清道光二十七年进士，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被曾国藩罗致于湘军幕中。咸丰八年入值上书房。同治二年署理广东巡抚，五年因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罢官回籍，在长沙讲学。光绪元年初授福建按察使，八月加授出使英国大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光绪二年冬赴英就任，四年兼任驻法公使。光绪五年称病回籍。光绪十七年病逝。

^② 原随文注：京城西旧有天主堂，国朝禁不许建，遂移置于此。

“……为了同北京朝廷正式交换经两国元首批准的条约，基督教国家的公使们约定于1859年6月在北京换约。法国派了布尔布隆、英国派了额尔金勋爵之弟卜鲁斯担任这个使命。……1859年6月20日，英国一支舰队，由海军准将贺布指挥，法国则只有一艘战舰‘杜坎拉’号，由司令特里科指挥，在白河口集结待命。……6月25日，大沽口炮台以猛烈的炮火迎接了英法联军的登陆……”

“英法在大沽口惨败后，江南的中国官员……请求梅德尔会长，要求他在英法外交官及联军军官前斡旋调解……”

“7月22日在北京署理主教孟振生的陪同下，梅德尔去会见了布尔布隆公使。孟主教是来上海同公使谈他自己教区的事务的……”

“7月，北京的《邸报》上发表了一道带有挑衅性的上谕，极力表扬大沽口袭击的挑起者，并吹嘘蛮夷已全部逐出帝国疆域……”

“12月，在好几个省内又公布了迫害教会上的上谕。……布尔布隆与卜鲁斯两位公使认定北京朝廷的种种失信与粗暴已无法再容忍了。”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12月5日(十一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恒福奏为拟将安肃县所获法教士董文学^①解苏遣回摺称：

“……据安肃县禀称，咸丰九年七月十三日访有佛喇晒夷人董文学在县属安家庄天主堂居住，当即前往确查，金称董文学仅止在该村传教，并无为匪不法。又据定州先期访闻州属北车寄村有聚集男女习教诵经情事，即经往查，起获经卷、图像、十字架等件，讯系教首之物，当将民人萧中伦等传讯，供认听从安肃县安家庄教首董文学传教属实，并不为匪。随将萧中伦等分别保释，经卷、图像、十字架等件逐一点查。其经卷内并无违悖字句，开列清单，由保定府发交安肃县，飭令董文学认明具领……”

“现当办理夷务筹防紧要之际……自应委员将该夷人董文学解交江苏抚臣，转飭上海领事官遣回本国。萧中伦等讯止听从传教，委无别项不法，应毋庸议。”

同日恒福奏为审明习天主教人邱云亭案情拟即递籍管束摺称：

“……缘邱云亭籍隶广东南海县，自幼学习天主教。道光二十三年间由上海至宁波天主堂，为同教子弟教读。教首佛喇晒人孟振生向述中国幼孩痘天者多，北方尤甚，稔知邱云亭祖传种痘，令伊赴直隶一带，与幼孩种痘行医修善。是年邱云亭自宁波起程，由上海请领路票，行至天津，经该前县盘获，讯无为匪不法，验票保释。邱云亭旋至安肃县安家庄天主堂内居住，并在县属之遂县村开设药铺。五年八月间复至天津县城外开设振生堂药铺，行医不收钱资，雇该县民人龚二炊爨，房租薪水由安家庄天主堂支給。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经天津府石赞清访闻邱云亭形迹可疑，委员带领差役将邱云亭拿获，并起获十字架、经牌、夷字书信等件，禀经前督臣批飭将邱云亭解省，发交保定府审办。……因查核起获汉字书信，并无违悖字句。其夷字书信系西洋篆文，直省并无谙习夷字人员，当将夷字书信等件咨请译核。经理藩院咨覆，以俄罗斯文馆查系拉替等字，不能翻译，咨回转飭核议详办。嗣据该府因邱云亭自称自能译汉，经委员监令将夷书逐封译出汉字。查阅信内语句，俱系宁波、上海等处同教人通候之书，亦无违悖字句及牵涉外夷之事。复督同委员严究，邱云亭坚供仅止学习天主教，行医治病，委无传徒惑众，并与外夷探听消息各情事。惟称被获时曾被差役攫取银两衣物。诘被何人攫取，不能确指。复经委提原拿之府役，高二邪外出，先将王吉升、穆盛魁、王盛明、孟万亭、王瑞祥等传解，并檄调带役往拿之委员张子浩来省。提讯王吉生等均供称随同委员往拿邱云亭属实，并无乘机攫取什物；查讯该委员张子浩，据称奉委查拿邱云亭，事甚密速，一经拿获，即同所起物件送府，各役无隙可乘，等情。质诸邱云亭，供仍如前。……当兹海防吃紧之际，未便任其逗留，自应先就本案拟结。至所称失少银衣等物，是否属实，俟高二邪等到案另行究办。”

“直隶为畿辅重地，现当办理夷务之时，筹防紧要。邱云亭既识夷字，又与夷人交接通信，设有疏漏，关系匪轻；未便因其现无私通勾结情弊，任其逗留。自应将邱云亭递回原籍广东南海县严加管束，

^① 是董若翰，而不是1840年死于湖北武昌、1889年11月9日被列入真福品的法籍遣使会士J. G. Perboyre。

毋任复令外出。其所称府役往拿之时曾被攫取银两衣物之处……应饬严缉高二邪，务获研究，如果有攫取银物情事，照数著追，另行移解给领。其同时被获之龚二，仅止受雇炊爨，并无习教情事，应毋庸议。起获十字架、经牌、夷字书信等件，案结分别给还销毁。”

1860年 咸丰十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章《直隶省的宗座代牧区》载：

“二、保定区

“……赵神父有时驻后林，有时驻安家庄；孟主教亦以安家庄作为主教座堂……

“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孟主教第一次进入北京，在此上任；自此时起，安家庄已不是主教的座堂了，而成为保定区的管辖中心！孟主教留下三位神父，任刘永和神父为总本堂；因着刘神父的热心及明智传教，福音在此区中，得以广传。”

第九章《在孟主教晚年，北京教区的概况，蒙古及河南传教区的出让》载：

“八、董主教被送至领事处，邱若瑟充军至广州

“……董主教第一次是以孟主教的辅理主教名义，来至正定府；第二次是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北京分教区时，正定尚未有主教，他来署理，时在该年十二月。董主教愿意至白石口村过圣诞瞻礼，一切经过良好，忽于一八五七年正月一日，定州的知府，率了三百名兵卒，冲进该村，高声说：‘大家不要怕，我不伤害任何人，我只愿见见主教’。教友知道知府的目的，乃请董主教于夜间遁走，他得以脱身。知府在主教房中拿走了权杖、十字架、圣油盒等。

“然后他问教友：主教在何处？他们说他在安家庄，以为知府不会到他管辖以外的地点去找他；知府乃捕了二位传教先生及几位教友，然后回至定州。

“定州知府为什么要逮捕董主教呢？这是因为在法庭上有一件关于宗教的案件。

“宿家庄的教友为曲阳知县所捕，并加重刑，因为他们不愿出钱演迷信的戏。董主教根据中法条约，在法庭前为教友辩护。

“此外，邱若瑟神父奉孟主教命，在天津开了一间小药店，以作将来教堂的准备，因为直至此时，天津商埠尚没有听到福音，至少没有常驻的神父。

“在官员指使下，药店被抢，邱神父以卖国罪名而被捕，因为他与西洋人有来往；他铁链加身，被送至保定府直隶总督处。

“判官向邱神父说‘你们的宗教是假的，因为相反我们的经书，孔子是大圣人，而他不是教友，中国人不当奉洋教’等。

“邱神父勇敢地答复说：‘我们的教不是假的，不违反我国的经书，却和经书与正道符合。孔子不是教友，因为他生活在基督前五百年。天主教不是洋教；对中国人来说，天主也不是外人。’总之，他的答覆甚为中肯，法官不能答，然而邱神父在保定府仍受重刑，他被审百余次。

“皇上知道了这件事，他信了许多攻击天主教及西洋人的妄证，命将董主教送至上海，将邱神父充军至广州。

“咸丰十年（一八六〇）董主教与邱神父一齐动身，一路上因着主教善与人交，受到良好的待遇；走了四月后，他们到了上海；在港口中，董主教见到英法所派的舰队，以要求清廷遵守所订的条约。

“邱神父被遣至广州，不久他又暗中逃回天津，次年他平安去世。

“董主教回来的更快；Piotet 舰队长请主教乘他的军舰，主教立刻接受了。

“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八月一日，英法二国的舰队已至天津的河口；八月十二日攻击大沽炮台；八月二十六日英法军队遂入天津。九月二十一日，占领（百）[八]里桥，使北京失去防卫；十月十八日夏官（按即圆明园）被焚，然法兵并未参与。

“皇帝奔热河，派其弟恭亲王全权行事；他听说孟主教是一位好人并且多谋，使人各处找他，派他

与西洋人交涉；天津的仕绅，认为董主教在城中，也作同样的想法。

“孟主教虽然穿越中国军队的防地，冒着极大的危险，往北京进发，以前他从没有进去过；一位姓张的官员准备恭亲王与二位主教会面；他们先拜谒了都统胜保（按其时胜保已有钦差大臣衔），他向他们说：‘我召集了许多兵卒，以继续战争，你们以为如何？’孟主教答说：‘将军，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易继续作战。’董主教接着说：‘若所有军官都有将军的勇气，这是可能的事，但愿为国家捐身的很少。’胜保对这答复表示满意说：‘西洋人能干，我们不能抵抗他们。’然后他赠给二位主教礼物。

“十月二十二日，二位主教至英法联军中，他们已经决定停战，乃大开北京城门。二位主教对于不必参加谈判，感觉非常欣幸。但十月二十八日恭亲王仍愿接见他们，因为他怀疑英法联军的企图；孟主教请他放心，若中国遵守所订的条约，英法联军一定做到所允许的。恭亲王对这次谈话甚表满意，后来曾向人说：‘孟主教是一位不求私利，正直有德的人。’”

《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一部分《年文思主教时期（1856年至1862年）》第一章《教区概况》载：

“一、1860年英法联军之战

“……1860年3月8日，他俩向北京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赔偿和道歉。两江总督自愿负责将通牒转呈北京。答复送来了，可又只是一场谩骂。两位公使别无他法，只有诉诸武力来解决。

“二、1860年联军战争时期的教区

“孟斗班将军担任法国远征部队总司令，勋爵克灵顿少将任英国远征部队司令……

“3月12日，孟斗班到了上海，余下的远征部队也陆续前来和他汇合。

“6、7月间，太平军再次夺取浙江省城杭州、松江府和近上海的几座县城。

“逃到上海的两江总督自知无力抵抗太平军，只好低声下气地拜会了卜鲁斯和布尔布隆，请求英法联军予以支援。

“英法联军一举两用：一面北上去进攻满清皇帝的军队，另一方面却留在南方保卫上海，攻打皇帝的敌人。

“8月1日联军在天津河（海河）稍北的北塘河口登陆。8月12日至21日，清兵营垒及大沽口炮台全被击溃。26日，英法全权代表进入天津，同清朝廷委派的、并无充分权限的代表们进行了无效的谈判，这样浪费了十五天。9月9日，联军向通州和北京进军。18日，谈判又开始。联军派遣的谈判大员被诱至通州，在一场蓄意策划的袭击中被俘，二十人在被俘期中丧生。9月21日八里桥决定性的胜利，才打开了进入北京的通道。……10月6日，皇帝的夏宫（圆明园）遭到了洗劫。10月18日和19日，英军为了报复通州的被偷袭，便焚毁了夏宫。10月24日清朝廷同英国签订了和约，25日同法国签订了和约，只有此后订的条约对天主教的传教史有关。天津条约的全部条款得到批准，并增加了新的条款。和约第六款规定，皇帝出上谕向全国公布，遵守1846年2月20日道光皇帝的上谕，归还所有在教难期间被充公的圣堂、学校、公墓、财产、房屋等等，如无法归还，则按价折算，由法国驻京代表转交该处奉教之人。此外，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①。

“经过隆重的条约交换仪式以后，10月28日举行了灵柩安葬仪式。在通州袭击中被害的谈判代表们的灵柩被安葬在法国公墓和俄国公墓。29日，在发还给北京的旧耶稣会会士的南堂内，为战事中的牺牲者举行了宗教追悼仪式，并唱了《谢主颂》和《求保护皇帝诵》，由遣使会两位主教孟振生和董若翰主礼。11月，联军撤离了北京，继后又撤离了天津，部分士兵则到上海过冬。”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旋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咸丰六年，降生后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洋历正月二十五日，有广西外国传教会之修士沙布得阩^②

^① 原注：人们知道，条约第六款的法文与中文的原文有出入。中文条文中加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这一句，看来应当由葛罗男爵的译员，外方传教会德拉马神父负责，此后他曾受到严厉的批评（见西蒙：《中国城》，第177页）。尽管中国人知道肇事者是谁，但他们对这条很明确的条文从未提出抗议。法国驻北京的伯尔德密公使在1865年通过一份专约，规定了行仗条款规定权利的细节。1895年，公使施阿兰对条文作了说明。对这个问题，可以参阅方殿华：《南京今昔》，第163页起。

^② 原随文注：华姓罗。

者,为地面官张某拿获,杖一百后,又掌嘴三百,勒索白银五百两,始肯释放。修士曰:‘释我杀我,由汝自便。至为贿赂之事,分文莫与。’官怒,置之囚笼,当日困死。法人以中朝故犯和款,心甚不平。适英人亦与中国构衅,炮击广州府城,焚及总署。衅端既开,不得不重订通商之约。法人与英人合兵一处,遂有咸丰八年大沽之役。次年因天津和议未成,复战于大沽,洋人为僧格林沁所败。至咸丰十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年,大沽失守,又有杨村、八里桥等处之役。是年洋历十月初六初七等日,皇上出狩热河,留恭亲王权朝。数日内,洋人焚圆明园,(卫)[围]困京城。至十二日,恭亲王开安定门,约和罢战。

“是时孟主教适在直隶各处传教,闻中西构兵,不畏锋镝,近至北京,以便相机调处。恭亲王早知其已由上海潜归,置之不问。至此事急,特派大员张锡纶聘之进京,以充翻译。孟主教偕董主教同于是月洋历二十三日来至法国大营。其宣武门内之南堂,自封禁以来,已经三十余年。城开后,有法国随营之钦命司铎名特赖各老者先往勘验。……回营与孟主教商议,欲为阵亡兵弁在大堂举行追亡祭礼,并为法国皇帝纳玻伦第三与法国师旅祝谢天主。……洋历二十五日,各国钦使与恭亲王大会于礼部衙门,互换和约。……洋历二十七日,有法国将军孟督邦^①者亲至南堂验视,又派军工兵弁异列棺槨,装修圣堂。……洋历二十八日清晨,将军孟督邦带领营员兵弁各着本职冠履入堂瞻礼。四城教友早已充(拆)[斥]堂中,孟主教举行大祭,董主教与中国司铎六人赞理助祭,兵弁奏乐歌经……

“洋历二十九日主日,孟主教复自举行谢恩弥撒。

“皇上虽弛崇奉天主圣教之禁,而和款内除通商口岸外,并无准许传教士在内地置买田庄之条。有法国随营司铎代辣马肋^②者于汉文和约内增入此条,而法文和约内并无此等字样。后数年,地方官争论其事,于是驻京法使商于总署,乃于和款之外另订一款,准传教士在内地置买基业,惟于文契中只书卖主某姓名、卖于某处天主堂为公产字样,不必专列某传教士或某教民之姓名。此款准定,始无齟齬。

“是年洋历十一月初五日,咸丰皇帝将恭亲王与英法互换和约各款一一钦准,不久崩于热河。当时秘而未发,故次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仍用先帝国号,即咸丰十一年也。”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12月20日(十一月初九日)恭亲王奕訢等奏为经查只有法教士艾嘉略赴陕川别无他人片称:

“查佛酋葛罗前在京时曾将准入内地护照送到,请盖用印信。臣等因系按照条约,当即盖用给付,附片奏明在案。该国自退兵后留京三人,内有主教孟振声及传教艾嘉略。二人前来法源寺谒见,均系剃去须发,服中国衣冠。臣等询问孟姓,据称在京传教多年,前因天主教未弛禁以前,尚复多方掩饰,混入中土,若不说明,其言语容貌一时无从辨别。现在节次谒见,始知的系西洋人。”

1861年 咸丰十一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九章《在孟主教晚年,北京教区的概况,蒙古及河南传教区的出让》载:

“七、让出蒙古传教区

“孔主教死后,蒙古的署理人为他的戴副主教,以后他将成为北京的宗座代牧。

“此时比国的一位大德的南神父 Verbist 在比国创立了圣母圣心会 Scheut,专至远东传教;会祖请信部给他在一个区域,传信部请他与遣使会接洽。

“总会长与会祖乃决定了这事。以后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南会祖在巴黎遣使会总院正遇到孟主教,乃向他说:‘我们的新修会,愿意在远东有一个代牧区,要求了蒙古,教宗欣诺了,遣使会总长爱典也无问题,但没有你的同意,我不能接受,我来请求你的同意。’

“在遣使会及圣母圣心会之间,一切问题解决后,传信部决定遣使会士仍留在该地,直至新会士来

① 即孟斗班。

② 即德拉马。

临,有了相当数字,并有了传教经验,能接管教区后,才由他们之中选出一位副主教来。”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1月11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察哈尔都统庆昫奏有法教士前往口外西湾子传教片称:

“昨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先据派出巡查地面之防御喜山面禀:‘本日现有由宣化大路来口之骡轿一乘,内坐一人,引马四人,行李大车一辆,轿上插有黄旗,汉字书写“大法国传教修士”字样,入下堡医病卖药店中落轿。其人均系中华衣服,惟坐轿者深目高鼻,须发卷乱,彼下轿入屋,即向西跪,默诵经咒。片时诵毕,有人送与茶合,彼仍跪用饮。食毕少停,即由店中换车起身出口,惟未闻其言语。’旋据值班守口骁骑校奎福报称‘本日有宣化府民人朱通到门口报,大法国夷官谢姓前往口外西湾子地方传教,修士、跟送民人朱通等三名,坐车一辆、大车一辆、箱五个,改时出口’等语……

“当查西湾子民地距口偏东,约在百里内外,其处亦有铺面街市,从前曾有破获天主教之案,与左翼厢黄旗接界。现在虽不禁止传教,奴才仍应飭属不动声色,严密查其行止。”

《教务纪略》卷三下《章程》辑:

4月11日(三月初二日)总理衙门咨各省《通行传教谕单并咨行教民犯案办法》载:

“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准法国送到传教谕单二百五十张请盖用本衙门关防,以便交付各处传教士收执。本王大臣检查该谕单内载‘该教士赴内地,只以传教劝善为务,并无他意,亦丝毫不得干预地方公私事件’等语,相应咨行各直省督抚将军监督查照行文,通飭各府、州、县地方及天津卡隘一体遵照。嗣后遇安分传教之人自应按条约设法保护外,倘该传教士有干预公私事件者,亦应照谕单驳斥不准,一面仍飞咨本衙门核办,以便移法国驻京公使惩治。至内地有随同习教之人,准照法国和约内载第十三款‘业经奉旨恩准听其习教不加究治’外,若已习教而别有不法情事,地方官仍应照所犯之案办理,并将案内所犯情由声明与习教两无干涉,咨报本衙门。其法国传教士等除公私事件不得干预外,如有在地方官呈诉事件者,该地方官亦即公平剖断,一面速报本衙门,毋得视为具文。”

《近代史资料》总第47期裴淑兰整理《天主堂在献县等处的田产》辑:

9月12日(八月初八日)法国钦使发给直隶河间府天主教堂永租仓地的契约^①(附件二)载:

“照得本月初五日据本国人居住中国直隶河间府传天主教之主教郎怀仁报明本大臣,现经直隶河间府正堂景及河间县正堂狄遵行大清国大皇帝、大法国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于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在顺天府城内设立和约章程第六款,情愿将河间府城内大仓地基址出租与本地习教民人得租为业,于本年七月内具立租契送交主教郎台转呈前来。内开:‘为给付永租业契事案。查上年恭奉上谕:“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故不必禁止,等因。钦此。”兹查所有河间府习教之人并无天主堂可以奉瞻拜,今有传天主教之主教郎前来,请烦本县酌指一空地,以便建造天主堂。本县查天主教即系劝人为善,自应酌量给地以为习教之所。立即禀明府宪,现奉宪谕查得大仓地方共地十亩零八分三厘五毫五丝七忽,将此地给付主教郎,以为本地习教民人永远租业,庶便建造天主堂及传教士住房学房等项,但不得私作别用,如有别用,则此契即为废纸。至该地租价,议得每年每亩一钱,共合租价一两零八分四厘,每年十二月十五日由天主堂内派人将次年租价送交县署。今特缮此永远租契送交主教郎收存,俾得本地习教民人永为租业。须至租契者。’又开‘东西阔三十二弓,南段南北阔三十弓,南至南后街官道,东至张庆堂房基,西至更道,计地四亩;东西阔三十三弓二尺,中段南北阔二十弓,计地二亩七分八厘三毫四丝;东西阔二十八弓二尺,北段南北阔三十四弓三尺,东至许贵一房基,西至张雨亭房基,迤西系更道,西至西大街官道,计地四亩五厘二毫一丝七忽,以上共地十亩八分三厘五毫五丝七忽’各等语。本大臣阅悉后,飭将原契登载普中国所有天主堂清册收存,本公署备案。为此给发执照,送交主教郎台自行收存为据,以便河间府传教习教人得以建造天主堂及各项公所,不得擅作别用,并俟转交下任主教永为该处教中公业之契可也。须至执照者。”

“附注:(原文为法文)

^① 裴注:文件背面法文译文,“河间府产权凭证。北京法国外交使团发。1861年9月12日于北京。”

本永租权凭证所指土地沿称‘大仓’，坐落在直隶省河间府城内，共计十亩零八分三厘五毫五丝七忽，现由签署人发给直隶东南代牧赛尔齐奥波里主教即收存为据。郎主教及其合法继承人即下任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对上述土地享有完全的使用权，以供奉天主教瞻拜之用，包括建造教堂、修院和学校等权利，所负义务是每年应于阴历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国帝国政府交纳纹银一两零八分四厘，作为永租产业的租金，并言明上述土地专供天主教宗教敬礼之用。”

9月15日(八月十一日)一等秘书格雷高维斯基签发，法国驻华外交使团给郎怀仁的信(附件三)称：

“我受法兰西驻华特命全权大臣的委托，给你寄上产权凭证一纸，据此你为天主教会在河间府城内取得一块土地的产权。虽说这只是永租权，但实质上从中国法律以及根据最近签定条约的规定法国所取得的权利的观点来看，除了每年交付微不足道的租金外，与其它不动产合法和不受时效约束的产权毫无区别。

“主教大人，全权大臣高兴地看到你勤恳卓越领导的耶稣会传教士负责的传教事业，由于取得了产权，开始在这个你为之献身的国家内外表上公开地扎根了。在这里我们古老的宗教信仰和慷慨的法兰西对你付出的辛劳以及传布福音作出的成就将始终表示赞扬和感到自豪。”

1862年 穆宗同治元年

《教务纪略》卷三下《章程》^① 辑：

“2月(正月)清总理衙门颁发《通行传教谕单》载：

“照得咸丰八年天津议定法国条约第十三款内载‘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又载‘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各等语，除按和约业经行知各省督抚将八年、十年所定各款一体遍行张贴外，又于本年十一月初二日恭奉谕旨：‘嗣后各该地方官于凡交涉习教事件务须查明根由，持平办理。如习教者果系安分守己、谨饬自爱，则同系中国赤子，自应与不习教者一体抚字，不必因习教而有所刻求。各该地方官务须事事公平，分别办理，以示抚绥良善之至意。等因，钦此。’惟此事虽已屡次通行各省督抚遵照办理，然各省中不协情事仍复层见叠出，屡据习教者具呈申诉。惟其不协之由，皆因习教者不欲如往年派摊各项迎神、赛会、演戏、烧香诸冗费。据云此等事件与伊无涉，故不应勉强照摊；而各该地方官暨不习教民人必欲伊等一律摊派，是以时起争端。本爵合再各文知会各省，俾知上意及本衙门所议，庶各省得有一定遵循，不致临事疑虑，用能仰体我皇上一视同仁之意，于习教不习教者无不爱如赤子。且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其大旨与儒释道同，是以康熙年间曾经准行；然伊等亦不能因系教民，遂欲幸免各项公费。如有差徭及一切有益等项，亦应照不习教者一律应差摊派。惟迎神、演戏、赛会、烧香等事与伊等无涉，永远不得勒摊勒派。至地方官若遇有上二项合派之事，必须实按直道分割，不得曲为牵混。比如所派内计公费四成、冗费六成，即应指明习教人止摊四成，其馀六成与伊等无涉，永免勒出。又若因习教人不肯摊与教规相反之无益公费，致被不习教人凌辱殴打并抢掠什物、焚毁田禾等情，该地方官必应为之彻底根究，按律严惩。其抢掠、焚毁各物，亦即责令照数赔偿，务归平允。再，业经与法国酌定，传教士并非官员，故不能干预一切别项公私事件保护习教人等；然伊等均系端方之士，在伊本国皆为人所敬重，其本意原系劝人为善，况现在中国与法国诚心友睦，自应格外厚待，以敦契谊。以后如有传教士用禀呈赴该地方官，若确系理直之事。必应立即秉公办理，不可稍有苛求。”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旋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孟主教……归欧洲与教皇商议传教事宜，于咸丰十一年洋历六月间抵欧。

^① 此件为该书所辑总理衙门致各省督抚咨文《发给谕单样式并禁止摊派教民迎神、演戏等费及教士不预公私事件》的附件。该咨文发于同治元年正月九日(1862年2月7日)。

“……遍游法、意、比、荷诸国，到处详述中国传教情形。……后复归法国，觐见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位。皇帝见之甚喜，特于中国所赔之军饷银中拨发钜款，以资重修北京四堂。复温语垂问云：‘朕于中国传教事务所能为者皆已为矣。倘主教尚有所请，朕亦无不乐为。’孟主教奏云：‘臣所请者，即是乞陛下钦发护照，将臣与所率之传教士及仁慈贞女送至中国，臣愿毕矣。’皇上即允其请。

“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穆宗毅皇帝嗣继大统，国号同治元年。是年洋历二月二十四日，孟主教带领本会修士七名、仁慈贞女十四名，乘坐本国兵船，泛海而东。在途三月，于洋历五月杪抵上海，搭美国轮船北上，行二十一天而抵大沽。时天津仁慈堂之房院早已告竣，仁慈贞女即寓居其内，其传教士等则往望海楼居住。此楼亦国家新赐传教士之宅院。至洋历七月初十日，孟主教奉公进京，照常料理教务。”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法)高若翰(J. Capy)^① 著 宋乐山^② 译《圣婴会首批殉道者》(Les premiers martyrs del O Euvre de la Sainte—Enfance)第二卷第一章《仁爱会修女的事业》载：

“一、仁爱会^③ 修女来津经过

“……修女们在南方的工作^④ 是有收获的，因此孟振生主教很想使北方也能得到这种好处。

“英法联军之役刚刚结束，就要立即打开中国京城的大门和它的口岸，使修女穿着原来的服装前来，这真可称得上是勇敢的创举，甚至是一种冒险——当时，连传教士要想进入这两个城市，也是非化装不可的。然而孟振生主教居然能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将这件事办成了。1862年2月22日，主教带领着4名传教士、2名助理修士和14名仁爱会修女从巴黎动身。9月25日，主教和他的传教伙伴从土伦(Toulon)启航，至7月2日到达天津。船到大沽口，法国炮台司令布代(Buttet)对传教士和修女们给予殷勤款待，随后又用自己的船只把他们送到了天津。

“天津是修女们以后热心服务并将流血殉道的地方，我们从教会方面对它作个简单介绍。

“在1860年的远征以前，天津是没有传教士常年驻足的；这里的居民在全中国来说，是最好游事的，声誉很坏，一个外国人在这座城市根本无法存身。此外，这里的教友数目很小，每年到探望教友的时候，才派去司铎。但是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城市，满怀热忱的孟振生主教很不满意上述情况。真是天予良机！主教打算从仁慈堂入手，使天津(教会)活跃起来。他曾派过一位本国司铎前往天津，他就是吴神父^⑤ 的舅父邱若瑟^⑥。邱精通医道，奉命来津之后，就开了一个药铺，但更重要的目的是给孩子付洗。孰知，不久之后，竟以邱为目标掀起了迫害。据董若翰主教介绍：

事情发生在1858年，也就是说在外国军舰开到天津以前，邱神父在自己的药铺里被捕了。当时他扛枷带锁，有如重犯，先是在本城知府跟前受审多次，而每次问案之后，必受酷刑。他被指控为叛国罪犯，脖子和手脚都带上了锁链；然后被押往直隶首府保定府。到保定以后，仍被投入监牢。案情没有审完；他已身染重病，因而出狱。邱神父所受的迫害是很令人吃惊的。他的药铺被充公了，钱和衣物也被抢走了。这太不公平了，同时事情有关天主的光荣，教友和教外人也鼓动我们到衙门去控告，因此我们不能默不作声。邱神父在官府面前坚决、勇敢地为自己申辩；他以不可征服的态度反驳加给自己的罪名，特别是叛国的罪名。后来要把他释放，却不归还丢失的东西，也不给任何赔偿。他决然地对法官说，既然他本人无罪，那就得弄清楚：他的药铺因何而被抢，钱和

① 译者注：高若翰于1888年来华，在北京教区传教多年。

② 宋乐山(1901或1902—?)，河北省永清县人，遣使会士，1929年升神甫，曾任北京教区天使修院教员。

③ 1633年法国人味增爵和修女罗意斯(Louise de Marillac, 1591—1660)共同创立的天主教女修会。该会修女专事办理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医院等，遍及世界各地。

④ 第一批12名仁爱会修女由当时的遣使会总会长斯德望(Etienne, 又译作爱典)派出。1847年10月23日离开法国，1848年6月21日抵澳门，1852年6月21日，健在的10名修女由法国海军保护赴宁波建立慈善事业。

⑤ 译者注：即1870年与谢福音同道击毙的吴味增爵。

⑥ 译者注：名安遇，字云亭，广东人。

衣物又因何而遭劫。他还说,如不将所丢之物如数归还,他就不划押结案。……结果,丢失的东西是没有追回,目前正在设法和解。

“这位邱神父在1861年8月因患背疽而亡,他将自己的财产完全交给了教会,他的房子也就成了修女们的第一度会院。

“邱神父死后,卫儒梅(Talmier)奉命来天津常驻。据他本人说,他当时是传教士,又是随军司铎,还要管账,当翻译,卖药,给婴儿付洗,一身兼任数职。

“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又是个商埠,距北京约30里^①,中有白河^②及一条小运河相通。天津城建于白河和运河汇聚之处,而运河是贯通中国南北两地的,因此天津也就成了南北商品的重要集散地。白河下流10里而入海,从白河可以到大沽口,相当吨数的船只和兵舰都能从白河溯流而上,直达外国租界之前。城郊市街则分列于白河两岸,中有浮桥相通;河内不断有往来帆船,浮桥也就时开时合。

“1860年,英国人驻于白河右岸,离城不远;法国人则占据了白河左岸,司令部设于望海楼。所谓望海楼是皇上的建筑,是由一座寺庙和一座大花园组成的。后来,法国使节将此建筑赠给了教会,以赔偿教会过去所受的损失,并准许教会利用这颇为有利的地势在天津立住脚跟。先是打算在这里安置修女和他们的事业,经过一番计议,最后决定还是在这里建立教堂和传教士的住处更为重要,以便使之成为这个重要教会的中心。修女们当时就暂且住在了邱神父的住宅里。这所住宅位于河右岸的城厢区,到望海楼去要走15分钟;法国租界则在下游的四五公里处,同样位于河的右岸。”

“二、修女抵津后的活动

“传教士及修女等来津以后,由卫儒梅神父予以接待安置。只有五名修女应当留在天津,其余的传教士和仁爱会修女还要继续兼程前往北京。孟振生主教及阿匝依斯(Azais)修女院长愿意多住几天,以便看看天津五方杂处而又喜好闹事的居民对修女们的态度怎样。

“第一件事是应当学话,这并不那么容易。此外,房子很小,而且连最需要的家具都不全。五把椅子,从小堂到饭厅,从饭厅到自修室,不断地搬来搬去;两口中国大锅是厨房的全套炊事用具。行李在后面,是很久之后才运到的。

“除这些物质方面的困难以外,更严重的是房子里没有一个病人,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任何救济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事业建立起来。修女们觉得自己与这里的居民相处,就像是置身在荒凉的原野上。据天津的第一任修女院长杜特洛伊(Dutrouilh)说:‘欧洲军队新近占领天津,留下的印象是太坏了。特别是妇女,只要我们走到大街上,她们就说看见鬼子了,同时是这样惊惶,恨不得赶快把大门关起来。’

“下面再看看杜特洛伊修女介绍开始工作的情况:

孟振生主教的意图是叫我们先建立收容男女孤儿的仁慈堂,开设施诊所,然后再为病人开办医院。圣婴会给了我们45000法郎,为开办医院也有些捐款。但是到哪里去找愿意受照顾的孩子和病人呢?由天主去安排吧。经卫儒梅的一番劝说,城里的几个女教友听说有的邻居想把孩子送人,就劝他们把孩子给我们送来,结果成功了。当我们收留那个三岁的小女孩——我们的第一个被保护者——的时候,大家是多么兴奋啊!以后,又陆续来了一些更小的孩子,要我们抚养。仁慈堂已经扎下了根,并将扩大、发展下去。

在我们来这里数日之前,城里发生了霍乱,为害不轻,每天要夺走约400人的生命。某晚,孟振生主教由我们这里出去的时候,心里不住在盘算:怎么样给我们引来病人。他在路上发现了一个病垂垂危的工人。主教问他是否愿意叫修女给他治病。那个工人同意了。……同日,有人又给我们送来了这种可怕疾病的患者,在场的传教士就乘机对他们讲论天主。从这一天起,许多

① 译者注:原文 lieue,乃法国里,1法国里合4444公尺,等于8.88华里。以下本书所见之里数皆照此计算。

② 译者注:海河和北运河统称白河。

人都到施诊所为自己家里的病人讨药。最大的麻烦是药物还没有运到；我们必须巧事安排，求天主使那些简单的药方发生效力。我们兴奋地看到，每天都有许多不幸的人在院子里排着队，手里拿着两个碗；我们给他们在一个碗里倒入点补力药酒，在另一个碗里倒上点樟脑酒，叫他们用来给病人擦敷，最后每人给一包芥子面去作芥子药膏。于是他们就满意地回家了。这就是我们为施诊所开张以至发展所采用的办法。

“修女们一来到天津这座骄傲的城市，居民们竟然怀着最初的感激和尊敬承认了她们有公民权利，此情此景的确令人感到欣慰。7月8日，也就是修女抵津6天之后，省会长修女在给总会长写信的时候，对上述情况作了更详细的介绍，她写道：

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禁不住要向您叙述一下我的心情。是的，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我们的门前常常挤满了人群。他们从四面八方来找我们去看望垂危的病人，他们认为，只要我们一走进门，病人就算好了。这是天主上智的安排，给了人们了解我们的机会。我们刚一来到这座城市，就有人对我们提到这里的霍乱闹得很凶。老实说，我一听这句话，心里很是怯懦，我害怕：霍乱！我可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

修女们对于霍乱患者的初期治疗得到了天主的格外降福，许多人得到了痊愈。过了不久，我们就赢得了信任，人们纷纷来向我们讨取治疗这种疾病的药，我们简直无法推脱。我必须限制修女们的热情了，否则，她们人数是这样少，不久就会全都累垮的。为此，我只准许她们到一方一角去活动。至于言语问题又怎样解决呢？有个守贞的姑娘，她能听懂我们的一些话，就叫她充当我们的翻译。此外，我们有些什么药品呢？还不是一点点芥子面、油、红茶和米汤。……

“既然照顾霍乱病人的活动已经使得修女在天津取得了公民权利，法国官员对她们也表示极度欢迎，并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驻北京的法国公使曾经送给她们3箱‘波尔多名酒’，天津领事也去看望她们，送给了她们1箱茶叶，并给她们留下了自己的地址，说是不拘有什么难处，都可以请他帮忙。他巡视了全院，对她们的住宅似乎很感兴趣，只是觉得她们的人手太少了。

“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桩重要的事件，8年以后，在发生屠杀惨案时，我们还要看到这次事件的后果。玛尔大修女对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况曾作如下的叙述：

在前来施诊所的人们中间，有个媳妇，她是某官员的女儿^①。她很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她丈夫最后一次患病的时候，她曾向魔鬼许愿，如果让她丈夫得到痊愈，她就要烧很多香，并且要把自己的女儿献出来。但是她的丈夫死了，因此对于许过的愿也就不放在心上了。这时候，每到夜间，魔鬼就来折磨她们母女。这个可怜的孀妇心地正直诚朴，切望能从魔鬼手中解脱出来。某日，她听到心里有个声音说：“要有人从欧洲来，她们一定能救你。”修女们来津以后，她就每天去施诊所讨药。当时她的女儿已有12岁，孩子是那样瘦弱，我们认为她是得了不治之症，就告诉这位媳妇，我们没有治这种奇怪病症的药。但是母亲并不失望，久而久之，我们就怀疑这是真正的邪魔附体，并对她说明，只有领洗才能有救。她就开始学道理和用圣水了。最后，她要求仁慈堂收下她们母女二人，我们也就答应了。孩子的祖父在南方作知县，他竭力阻止自己的孙女不要污辱门庭，信奉天主教。祖母和姑母奉命来要孩子，想把她带走。而孩子不愿意离开母亲，家里的一切好处都不能使她离开修女，母亲也要求家中把孩子还给她。最后，由大沽口英国驻军的随营司铎费克民^②设法满足了她们母女的合法要求。

“她们母女领洗以后，分别取了玛达肋纳和则济利亚的圣名。母亲把孩子交给了仁慈堂，她自己也在仁慈堂帮忙。为这件事，母女很受家庭的虐待。后来法国领事把这件事提到了中国官府，官府作了令人满意的判决。玛尔大修女对于这件事曾经写到：‘荣誉应归于我们的政府，它的高贵的干涉在全球

① 即曾国藩奏摺中提到的“江西进贤县知县魏席珍之女贺魏氏”。

② 译者注：Fitz Patrick，爱尔兰籍，1862年来华；他在充任大沽口英国军队随营司铎的时候，和天津教会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各地维护了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权利,也维护了宗教和正义的权利。’

“据说,祖父为此曾有心把自己的孙女杀了。教案发生的时候,他曾来天津。可以看到(何)[贺]则济利亚(即女孩)坚决不愿回家。她坚持自己的信仰,最后在流血惨案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三、仁慈堂的扩充

“民众看惯了仁爱会修女,知道她们的施诊所办得不错,因而也就不怕请她们到自己家里去看病人了。几乎每天总有一位修女进城,由一个妇道作伴。人们不仅向她们给成年人讨药,也给孩子讨药。……许多病人在施诊所接受治疗以后,要求会院收留他们。玛尔大修女写道:

……时间许可时,修女们时常分成两人一组到市郊的村庄去寻找病人。晚上回来一计算,总有八个、十个或更多的人领了洗。特别引起我们同情的是那些脚行,他们大半是年轻人,来自中国各地,成群结伙地住在小店里。一旦生了病,就会被人毫不留情地赶出店来,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能躺在那里等死。我们愿意收留他们,在他们患病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安身之处。然而我们的房子太少了,不可能设想在这里给男人再安排住处。我们房子附近有个小庙,里面住着两个老和尚,他们对于自己的菩萨不十分关心,情愿将庙的一部分租给我们,在这里可以容纳12个人。我们就在这里安插了病人,医院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我们收留的第一个病号是个水肿病患者;他奉了教,把自己的小儿子送给了仁慈堂……

“承官府准许,修女们还能自由去天津的一座大育婴堂里看望孩子。这件事尤其不平凡。玛尔大修女写道:

这个育婴堂很欢迎人们去参观,孩子们在这里也比在家里好得多;这在中国可能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外。雇用的保姆需要管饭,工钱也很高,她们被分配到许多房间,每个房间又有一个相当年纪的妇人负责;她们照料孩子,不使缺乏任何东西。天津的盐商很多,也很富,他们为开办这所有育婴堂捐了很多款,并且还轮流到育婴堂里去居住,以担任院长职务。保姆约有六、七十名,每人乳养两、三个孩子;这样,孩子的数目就有一百三、四十个的样子。

修女到天津几个月之后,就听说了这个育婴堂,很想去到那里给孩子们打开升天堂的道路。……但是怎么样才可以进得去呢?领事先生知道了我们的愿望,就把这件事情包下来。领事先生在官府跟前很有面子,他对官府说明:如果修女能以医生身份去看望孩子,为育婴堂将是一件好事。官府答应了这个要求,第二天,就给我们来了请帖。我们去育婴堂的时候,他们还很隆重地接待了我们。接着,就叫我们逐个参观了所有的房间,还告诉一个管事的说,将来孩子生病,就要去请我们来给看病。这个大门口算是为我们敞开了。第一年,我们利用施诊所,利用探访家庭和这个育婴堂,把600名小孩送进了天堂。”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4月13日(三月十五日)恭亲王奕訢等奏为酌给直隶法天主堂地基片^①称:

“上年九月间,据法国哥士耆声称‘现查天主教人在直隶省者,举出正定、顺德两府,定、赵两直隶州,有从前遵旨所建天主堂七十二座,请烦饬拣一二处办理。如宣化府城内原有天主堂一所,不难送还。其正定府城内可能将崇因寺或曾为行宫之房屋地基给予建堂,祈饬地方官酌办’等语。臣等当以正定、宣化二府天主堂自当照约查还。惟所请两处官地,未便通融,只可行文直隶总督饬属另择相当之地抵给。哥士耆旋即出京,德儿位接办此事,叠次到臣衙门商办,晓谕再三。据称‘此地从前虽充行宫,现在坍塌已久,仅存数字,并无人住。如能酌给,即可抵偿七十馀处天主堂,以寡易多,不为奢望’等情。叠与往覆辩论,仍复坚执不从。臣等共同商酌,现在既欲借外国之兵力帮同剿匪,而建言者又屡以此为请,则在我不能不许以一二事以示羁縻。所有正定府天主堂,臣等原拟另给他处,无如该处实无宽大房

^① 同书所辑“7月11日(六月十五日)恭亲王奕訢等奏报法使照请给还正定等处天主堂地基片”内容全同。

屋。倘力为驳斥,一时虽未必遽有他虞,但如该国寻出确切证据,必欲赔偿七十馀处之多,彼时则更难于查还。现在事势至此,又欲资其协助,则此等事似未可稍事拘泥,致生枝节。且查该处自乾隆年间以后未及用,久已坍塌,即与空闲官地无异。臣等当即行知直隶总督,转饬正定府将此地查明交付去后。

“兹据该督文称‘业经点交该国人董若翰承领,开具地基四至点交收摺咨覆’前来,并据德尔位函知该处地方官‘已将该地基给与承领,并恳将宣化府及深州天主堂速为查还’等语。

“查宣化府堂基,该国求在柳川书院及郭姓民房二处内酌给一处。至深州堂基,该国求将城内空闲仓地四五亩租与建堂。臣等先已行知直隶总督,一并飭属核办,现在尚未办结咨覆,应再催令迅速妥办,以免饶舌。”

《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一部分《年文思主教时期(1856年至1862年)》第二章《教务细节》载:

“七、小结 太平军之战后后期的江南教区

“……1862年,应直隶东南教区代牧郎怀仁主教的要求,法国驻北京公使布尔布隆先生和恭亲王谈判后,获得皇帝颁发上谕,正式废除先前的一切禁止天主教的措施。该上谕在4月15日宣布张贴,这是从康熙以来获得的最好的谕旨^①。

“上谕重新提到了这位大皇帝对天主教的恩准;废除自康熙以来各位皇帝所有一切禁教的规定;并命令,以后如修改条例,不再增刊此等禁止明文,并将旧例所载全行删去,木刻版本全部销毁。”

第一章《教区概况》载:

“三、从1860年英法联军到太平战争结束(1861年至1864年)

“……1862年7月31日,教区遭到了意想不到的痛心的损失。年文思主教……在7月底动身去直隶。从天津到张家庄……整个旅程八天。气温酷热,经常在摄氏四十五度以上。他先是局处在一只狭小的破船中,继而又颠簸在破烂的大车上,因此筋疲力尽。7月31日依纳爵瞻礼日,主教感染了霍乱。虽经百般治疗,但不见效,终于在下午一时咽了气。围在他病床前的有正在那里过暑假的直隶东南区的神父们。亲眼见到主教死亡的徐听波神父记述道:‘主教逝世之前,曾作信德宣誓。他虽已病人膏肓,但当会长神父读到宣誓条文“我许愿服从教宗”时,虔诚的临终者尽力撑起。那时他已不能讲话,而仍数次用力咬嚼,重念会长神父所读的宣誓条文。主教一得病,即作了遗嘱。他曾亲取纸张,记明他尚未举行弥撒的数字及其他未尽的职务。……像耶稣会会士年文思主教那样的死,真是何等幸福啊!’^②于是,耶稣会第一任江南代牧主教便安葬在直隶神父们的公墓。他的墓碑上明确地指出:主教对传教的热心,对孤儿的慈爱,对大圣若瑟的虔敬。”

《献县天主教志》第九章第二节《医药卫生》载:

“1862年7月霍乱流行期间,张庄总堂内由法籍吉玉隆修士建起内药房。总堂不仅接待来求治的病人,还派出20名教徒持药到各地巡视。施药的条件是病人入教或在临终前领洗。”

1863年 同治二年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2月7日(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御使华祝三为请飭直隶秉公核办民教案件片称:

“臣闻直隶各州县教匪名目甚多,往往藉天主教为护身之符,一经官弁访拿,该教匪必央出夷人主教者挺身扛帮,硬将匪犯要去,此大患也。臣闻唐山县^③属居民拖欠钱粮,该县杨令飭差催提,而投教

^① 原注:郎怀仁1862年6月26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6卷第215页。上谕由公使馆秘书兼译员丰大业先生译成,并附原文,见《通讯》,第4卷第218页起。特雷夫写了一篇很有趣的回忆录,他在回忆录里叙述了三十五天谈判时的种种波折,他曾寄来多份石印的原稿,至今还保存在我们的档案里。见《法信》2570。

^② 原注:徐听波1862年8月3日信,见《通讯》,第4卷第285页起。

^③ 原名尧山县,金朝改唐山县,1928年复名尧山县,1947年与隆乐县合并为隆尧县。

之士即赴县咆哮。杨令据理辩论,教士怒骂不止,竟令马夫鞭殴凌辱官长,可恶已极,而杨令反以办理不善因此撤任。刁风日盛,地方官何所措手足耶?并请飭下直隶总督确切查明,秉公核办,勿稍回护。”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仁爱会修女的事业》载:

“天津人起初对修女们所表示的那种赞赏渐渐消失了。至1863年9月28日,杜特洛伊修女竟然写道:‘针对我们发生了许许多多的谣言。这里教友很少,因而也不能予以辟谣,我们只好忍耐吧。’狄仁吉(Thierry,法籍)神父于1863年5月来津,他在当年10月20日也写道:

教会和仁慈堂的事业仅仅是个开端,将来当然是会发展的,但是还必须做许多工作。现在只是初步扎下了根,希望将来能够开花结果。我们在这座城市的教友,数目是太少了,尚有成千上万的人需要归化。然而,要感化此地百姓的那种冷硬心肠,非有个会行奇迹的人不可。天津人生性粗野,光讲究物质实惠,净是些漂流不定的船户和水手。风俗是坏极了,同时还有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傲气,对于外国人满腔的鄙视。对于我们,一见面就是一顿辱骂,常向我们跟前吐痰,表示轻蔑。这样一个不怀好意的民族,他们终日埋头于作买卖或其它粗俗事务,对所谓洋鬼子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成见,处在他们中间,只有忍耐和仰赖天主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修女们不顾困难,在为她们的事迹而工作。她们走遍这座大城市,身后时常跟着一大群好奇的人,她们成了大家议论和取笑的对象,要听到多少难以入耳的辱骂呀!幸而她们根本听不懂。比较好听的是称她们女毛子,这个称呼在民间已经习以为常了。有些农村妇女带着孩子来看病,对于修女竟不知道有别的称呼。大部分人见到修女都要吃惊,因为在这个大城市里,妇女几乎从来不出门上街;如果非出门不可,也是躲在轿子里,由两个人抬着走。她们见到这些外国女人明出大迈,禁不住彼此询问:这是男的还是女的?

“自1862至1863年,仁爱会修女的各种事业算是在天津诞生了。要进行更大的发展,这狭小的地势的确是个难以克服的困难。”

《献县天主教志》下编《大事记·1863年》载:

“本年12月3日,在献县张家庄举行了主教座堂奠基典礼。奠基石上用法文镌有如下文字:

教宗庇护九世即位的第十八年,法皇拿破仑三世即位的第十一年,郎怀仁做直隶东南教区主教时,至可敬神父贝克斯做耶稣会总会长时,可敬的戴元英做法国耶稣会省长时,李秀芳神父做本教区耶稣会会长时,总堂的圣心大堂开始建筑;辅理修士吉玉隆为建堂的工程师,在举行隆重典礼时放上了这块基石。这块基石是本教区主教祝圣了的。时在1863年12月3日。此事的见证人有徐听波和卜功堂二位神父,还有张珍和张安二位教友会长。

“是月该教区在张家庄建孤儿院,收养孤儿20名。”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章《天津教案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一、董主教及他向教外人讲道的方法

“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底,董若翰主教 Anouilh 带着满腔的希望,回到正定府;他在北京时,曾得到高级官员的允许,他想迅速实行;人家曾应许他土地,以创立事业。他先在衙门附近租了一座客栈,与其他传教士暂时居住;然后他去拜望城中的知府及其他官员,请求他们依照在北京时所应许的,给他一块适当的土地。

“官员们等候北京的命令,先建议给他中隐寺^①;虽然董主教不大喜欢这栋房屋,但在客栈中更是拥挤不便,就与同会士来此居住。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北京的命令来了,给天主教一大片土地及旧屋,稍加修理,便可居住;以后就在此地建立了许多房屋,为传教士及仁爱修女之用。

“董主教巡视赵州时,发现为感化教外人及维持教友的信德,有许多阻碍;官员们强迫教友出钱唱

① “崇因寺”的错译。

戏、建庙或修庙及为教外人的节庆，实际上并没有条约所允许的自由。于是他印了条约多份，身边常带一份，需要时可以示人。

“在一份写给传信部事业主任的报告中，董主教写他讲道的方法说：‘数月以来，我不但巡视老教友处，亦巡视教外村庄；我不但在屋内讲道，亦在公开场所讲道；有一张桌子、一条椅子，我就开始演讲。九个村庄的人愿意奉教；在二十村庄中，许多家庭摒弃了邪神，有意恭敬天主；在贾庄有七十家，在隆中有五十家。’

“他在日间讲道，一连好几点钟，有时直至半夜，有时一位中国神父或三四位传教先生继续代替他。董主教向教外人讲道时开始说：‘我有皇上的谕旨。’他指着桌子上的谕旨说：‘大家都可信天主教，任何人不能阻挡，连皇上亦不能，官员更不能了。’然后他讲要理。

“有时人家问他说：‘大人，你愿助我控诉教外人吗？’

“他答说：‘若你有理，并好守教会规诫，你放心，我将帮助你。’于是主教往往就要管宗教以外的事了。

“董主教到一地方，人就往来不断，一批出去，另一批又来了，请他帮助解决各种事件。教友中也有人为使主教在官员面前保护他们，不惜加重或使教外人的言行变质。

“教外人为求他协助自己胜诉，往往向主教承诺说：主教若肯包办此事，自己全家或整个村庄将奉天主教。

“无意中，董主教创立了一种传教方法，中国北京几个代牧区亦仿效他。耶稣会士 Leboucq^① 在献县代牧区北部明显地采用了这方法；遣使会士刘永和神父在保定府亦然；别的传教士有时也参加诉讼，人称它为‘诉讼时代’。由条约时开始，约有三十年的历史^②。

“这是困难重重的方法，且弊病多端，很少传教士能善用它，因为往往神父无论如何谨慎，亦常受人欺骗，不主持公议，反而包庇了为非作歹。董主教因他的明智及信德精神，尚能避免这种弊病。

“但帮助他的人太少了，直至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帮助他传教的只有林安德 Simiand 及五位中国神父，其中二位是遣使会士，三位是在澳门升神父的教区司铎。他们升神父后，就能开始工作，客籍神父则不然，他们在中国不到六年，在未能精通中国语言及习惯前，董主教不让他们向教外人传教。遣使会让出蒙古时，他得了白振铎神父 Bray 及五位国籍遣使会神父。”

第二十章《直隶省的宗座代牧区》载：

“二、保定区

“……刘神父在安家庄^③ 修院读完神学，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升神父。因着咸丰十年（一八六〇）的中法条约，传教士享受更大的宗教自由，外教人亦不如以前的猜忌。刘神父仿效董若翰 Anouilh 主教及富成章 Fioritti 神父的方法，有机会时，就在广场中公开演讲，他口若悬河，外教人亦爱听他。

“刘神父使许多村庄都听到福音，因为他胆大敢为，自然免不了有困难；他不怕在法庭中控告欺侮教友的，使官吏判罚他们而得到胜利，因而不少的人皈依了圣教会。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以诉讼传教的方法，有时发生危险；因此刘神父屡次被召至北京，以避免麻烦；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刘神父在东间造了第一座圣堂；然后他去刘家庄工作，造了另一座圣堂，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逝世。”

① 徐昕波 (Leboucq Prosper 1820—?)，字子游，又字博理。法国耶稣会神甫。

② “1860年以后天主教士实行的另一种方法也许更加产生了反效果。这就是对当地的政治和司法广泛进行干涉，以赢得可能的皈依者。通过这种方法人数的中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而传教士仗恃法国的保护来维护这些人的利益，便普遍激起了官府和非基督教平民两方面的仇恨。”（《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99页）

③ 应为“西湾子”。见《圣教源流》附录《在木区修道后供职于他教区的国籍味增爵司铎一览表》。

1864年 同治三年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5月18日(四月十三日)法使柏尔德密为直隶川湘各省教民被害事致奕沂照会称:

“直隶西南平山、灵寿等县,虽距京都甚近,亦皆违背条约,有教民六十馀家被扰破家,既无栖身,复难度日,尽由本国传教士分资养贍。更有教民畏受凌辱,或恐致拷死,不得已只有背教。……又广平府四城门上及各街衢均有揭帖,激励众百姓一同起义,以拒敌奉教人及各外国人。兹将揭帖一道录请贵亲王查阅。……如贵亲王亦阅过直隶总督咨覆,谅亦如本大臣不能不怪直隶总督,以封疆大员,乃设法措词,令人估量奉教人虽不过数百名,竟敢大众合谋,不图别事,独欲欺侮所在百姓;并云奉教人受害,皆其自己起意应得之咎。

“……本大臣不得不照会贵亲王务即认真查办。如果在案犯人,无论大小,未能迅速惩罚,以及各教民被害之处未能照数赔补,虽本大臣心中甚多为难,然不能不告知本国,谓本大臣在此徒然费尽心神筹设和睦良法,为在中国内遵守本国条约可以任人奉教,岂知本大臣所用一切心力,到此年馀,均归无用。”

《西湾圣教源流》第三章《味增爵会驻节西湾子时教友底公教生活》第六节《味增爵会底教士交代蒙古教务》载:

“孔公逝世后,味增爵会底教士,又在蒙古住了几年的工夫。还有四位教士也来蒙古传教,就是罗、雷、谢(MM. Glau、Reiffert、Cl. M. Chevrier)三位司铎(一八六一)和谢修士(R. Fr. J. Chvrier)(一八六四)。味增爵会付梓的周刊上,记叙了他们辞退蒙古底原故:‘因为皇帝颁行上谕给了人民信教自由(一八六一),也因为人民多进教,另外在北京教区,味增爵会底总会长便请求宗座把蒙古教区让与别的传教士。所以罗马传信部将蒙古教区委于比国才成立的圣母圣心会,那会底好些教士们也快要来到这个好教区。’”

第四章《味增爵会在蒙古开教的一段结论》载:

“我在此书内喜喜欢欢的揭出那些中西教士底姓名。他们在生前,圣教会委给他们掌教底权位。在他们中,有四位曾任主教,即孟公先为蒙古教区代牧,后为北京教区代牧;孔公为蒙古教区代牧;戴公先为江西省教区代牧,后为河北省(东)[西]南教区代牧,最后又为北京教区代牧;白公为江西省教区代牧。还有龚、柯二位司铎曾得列名选主教底资格。又有两位司铎,天主拣选他俩在中国舍生,就是谢、吴二位司铎。他俩于一八七零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天津城内被仇教人杀死。”

“我们不能不提味增爵会士在这里修道院内所得的结果,另外有多少本村人人入了味增爵会,也晋升司铎品,如郑保禄、樊味增爵、郑巴尔大撒、陈伯多禄、武若翰。西湾子村四围村乡有郭伯多禄(白桦沟)、张弥厄尔(黄土梁)。还有本村若干修道士在西湾子修道院读书(味增爵会管修道院时候),以后晋司铎品,也在蒙古教区传教,如姚巴尔纳巴、武斐理伯、何老楞佐、郑罢德利爵。又有高家营村两位,即赵伯多禄、赵依纳爵。

“赶圣母圣心会祖南公到西湾子,他立意在西湾子建一纪念碑。孟主教那时任北京教区代牧,不愿他有这番举动,向南公阻止说:‘天主要记录我们为他所做的事情于天册,因为天主是至美丽的,也是至善的,他也要大大地赏报我们,不单看我们所做的事,连我们所有的善愿,也要赏报的。我请你别刻什么在石碑上,这些事情,在天主的簿记里记录了,就彀了。’

“在西湾子虽没立纪念碑,到底在我们圣地梁上有龚、高、张三位味增爵会司铎底茔坟和碑,也就彀一个纪念了。”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九章《在孟主教晚年,北京教区的概况,蒙古及河南传教区的出让》载:

“十三、孟主教获得一位辅理主教

“一日散心时，孟主教打开《世界报(L. Univers)》读到圣座任命苏凤文神父(Guierry)为北京辅理主教……”

“苏凤文主教于一八二五年七月四日生于生斯教区马尼地方。一八四八年十月八日进遣使会，一八五一年升神父，咸丰三年(一八五三)五月抵宁波。……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九月二十二日，他在宁波接到传信部的委任令，任他为大那巴的名义主教，及孟主教的辅理主教，有继任权。”

1865年 同治四年

《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二部分《郎怀仁主教时期(1864年至1878年)》第一章《教区概况》载：

“一、1869年的教难

“1864年9月22日，在教宗庇护九世亲自主持的一次主教会议上，宣布直隶东南区的郎怀仁主教调移江南。提升杜巴尔神父^① 顶衔卡纳特主教，实授直隶东南区的宗座代牧。”

“宗座诏书于1865年2月2日到达直隶。2月19日，郎主教祝圣了他的继任人。2月23日，主教赶往天津，以便及早坐轮船到上海。”

“那时白河尚未开冻，主教还得等待一个月。他便乘此机会同清政府驻天津的北洋三口^② 通商大臣崇厚交了朋友。那时，崇厚诚心表示愿同教士们保持联系。几年之后，只能说是由于他的软弱无能，致使发生了1870年令人发指的惨案。”

“3月22日的早上，这位江南教区的代牧主教到了上海。……郎主教在直隶区的八年正是江南教区内部失和难堪的八年，他幸亏置身于局外，故能抚慰众心，成为众人之父。”

《西湾圣教源流》第三章《味增爵会驻节西湾子时教友底公教生活》第六节《味增爵会底教士交代蒙古教务》载：

“因为比国新成立的圣母圣心会会祖患得重病，又因为别的各样阻碍，所以他们的会友来的日期迟后了些时。”

“那时候，味增爵会底教士们，办理一切事宜，预备交代新会，戴司铎也接了一个新委任：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他离开西湾子，往上海去接受新职。西湾子信友张应魁，圣名方济各，陪伴他到上海。就是这个教友，在那里遇见了从比国来的新神父们。方济各向他们说了我是西湾子村的教友，你们愿我领你们，我就甘心愿意领你们到西湾子。新神父们自然乐从了他底好意，南会主也感谢天主，有这么好地一个忠心教友，好似一位守护天神，领他们来到目的地方。”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六日，白司铎欢迎这些新教士们，就是南怀仁(T. R. P. Verbist)神父，圣母圣心会会祖，连司、韩、郎(RR. PP. Van Segvelt, Hamer, Vranekx)四位教士，还有林修士(Mr Paul Splingaert)。一气都到堂唱《感谢天主涌》后，引他们至居室，也庆贺他们传教前程，能有好效果！”

第五章《圣母圣心会底副主教驻节西湾子》载：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六日，圣母圣心会底四位传教士莅西湾子总堂，其中一位记着祝贺西湾子说：‘尊贵的乡村，远东堂口中底珍宝，给你请安！你远离世界繁华，脱去世俗纷扰，埋没在这大旷野的地方，到底，天主从这山野之中举扬了你，也提高了你底地位，使你高出帝国的美丽城市之上，这就是你自己已完全表显出来你全属于耶稣基利斯督底宗教！’”

“他又记说：‘我们进西湾子村时，心里很感动，因为我们听见雅乐班奏乐，大堂底钟也响起来，并有好些火炮及爆竹的声音，教友们一齐来欢迎我们。人人都穿着过瞻礼的衣服，铎曹和修生等最前迎来，儿童和老人暨男女信友皆列在他们后面，我们一下车，他们竭力地跟着我们往大堂去；那里我们在圣体前跪下，感谢天主赏了我们顺顺当当的一路平安，教友们也高声唱几段经文，我们虽不懂得那经

^① 杜巴尔(Dubar Edouad 1826—1878)，字厄管。

^② 译者注：三口指牛庄、天津、登州三个通商口岸。

文的意思,到底那唱歌底声音,多多地感动了我们。’”

第五章第一节《西湾子堂口底概况》载:

“在那一年,即一八六五年,西湾子区有教友二千七百名,这些教友们散居在二十六村;西湾子本村有教友一千多人。公教占据地址分三部分,即主教府、贞女院、大堂。

“主教府包括神职班居室,另有修道院一处,院中有夏天住的房和冬天住的窑,还有一花园和一马厩。那些房舍尽按本地建筑法修盖的,实在好看。

“修道院里那时有三十多个修生。院中有两座小堂,一堂为主教及副主教用,一堂为修道士用。这堂很美丽,壁上绘有各种花样,祭台为镀金的。若提修道院底规程,和外国一座正式修道院大同小异,修生底课程有中文、拉丁文、哲学、神学等科,只无史、地二门。修生等都很勤勉,因为他们精神不甚强健,神父多照顾了他们,给他们预备好饭,午后休息一小时辰,也劝他们勿过愈专心学问。

“距主教府不远有一处贞女院,那些贞女按味增爵会底修女生活法度生。贞女们管理一处孤儿院,此院占据旧大堂底房舍。靠近这孤儿院,有一座小女学。贞女院另在别的一个院落,收容许多贞女,有院长一人经理院务;她们终日间,除念经外,为大堂及修道院做针线活。

“以上的记述,尽系一位圣母圣心会司铎所载;他还很赞美西湾子底大堂。那堂长为六十五尺,宽为二十五尺,系华式建筑物。圣台所长为二十尺,宽与堂同。在堂中悬有八角灯四对,缎制对联数幅。壁上有各样画像和花草,还有赞美天主底标语。后面有音乐楼,用八柱支撑,是大瞻礼音乐会奏乐的地方。堂中亦有立柱两行分全堂为三部分,天花板系布制,堂顶用布瓦盖覆,堂地以方砖铺成。堂后有一体面大门;堂之近旁,有本堂司铎居室和男学校。大门右边有一华丽的钟楼。

“在大瞻礼日,礼节极为隆重:有三位或六位会长,在大弥撒前来欢迎神父;赶神父和修道士行至大街,就响炮;教友在两旁跪求降福。神父进到堂里穿祭衣时,音乐会便奏起乐来。

“论教友的热心,有一位司铎说:‘瞻礼和主日进堂同罢工的本分,教友们全热心谨守。每瞻礼、主日,有大礼弥撒、大礼圣体降福,于所规定的日子也明供圣体。圣诞瞻礼半夜有大礼弥撒;大瞻礼前,教友多解罪领主;素日亦有许多热心教友领圣事,也有习惯做默想、看圣书等神功的。这些好习惯,使我们想起来比国底那热心教友们,在那里,教友底心全归属于天主,神父和教友仿佛一个牧童和他底羊群似的。’”

第二节《圣母圣心会接受味增爵会底教务职责》载: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圣母无染原罪瞻礼,白院长(味增爵会底司铎)将圣母圣心会接管本区一节向教众宣布。一月后,白公和南怀仁,即圣母圣心会会祖,把全区教务通盘商酌妥当:新会的教士不敷分配,旧会底教士还继续承管西区,设总堂于今兴和县二十三号村;新会的教士便管理中区和东区。新教士共四位,还有林、张二位华铎,这两位司铎未入会,故常在西湾子传教;味增爵会一位老年司铎,就是郑保禄,也暂居西湾子,为教新司铎中国话,并本地的习俗和各堂口底概况。”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九章《在孟主教晚年,北京教区的概况,蒙古及河南传教区的出让》载:

“七、让出蒙古的传教区

“……比国传教士于一八六五年(一八六五)底才至中国,因当等待他们先发圣愿,而发愿事,直到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八月二十四日才得实现。

“最初来的比国传教士为会长及会祖南神父,及后来的致命者 Hamer 神父,与其他二位神父。到了他们对中国的习惯、言语精通,能代替遣使会士后,遣使会士很快的准备离开蒙古。”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仁爱会修女的事业》载:

“孟振生主教答应了要找个比较宽阔、地势更好的地方。经过一番物色,终于在 1864 年从一个大官的手里买到了一处宅院^①。这处宅院的地势很好,它位于白河的右岸,离城很近,1860 年曾经作过英

^① 该宅院在天津东门外海河右岸小洋货街,与望海楼隔岸相望。在此先后建起仁慈堂、医院、施诊所、修女住宅和一座小教堂。

国军队的营房；房价共是 8.2 万法郎，先交了 4.8 万法郎的现款，其余部分限于两年之内交清。

“据玛尔大修女说：‘走进这座房子，不禁会想是天神专门为我们的事业而设置的。男孤儿院和男病房占一面，修女及女孤儿住在另一面。一进大门，迎面就是小堂、施诊所和厨房。’白若翰(Bret, 法籍)神父也说：‘我看过这所房子，修女们对它非常满意，在天津来说真是个好上的地势，又宽绰，又豁亮。如果事业继续发展，将房子全部占用起来是不成问题的。将来我们可以有中国医院、外国医院、仁慈堂、施诊所，一切都很均称、合适。’

“玛尔大修女在她写给圣婴会会长的一封信里，对新院的建立经过介绍得相当详细，我们不妨全部引用：

……必须去看一下房子，不能等到指定的日子再迁居了。孩子们实在等得不耐烦了。现在她们是这样拥挤，一到夜间，连伸展她们那小小身体的地方都没有；炕上的地方很小，每个孩子都要挤掉旁边另一个孩子的地方，往往为此而彼此争吵。一到早晨，她们就得赶快叠被，于是寝室就变成了作坊，到中午又成了饭厅，饭后还得变成课堂。为了安定她们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我们决定找一天带着她们去看一下房子，我们就选定了无染原罪瞻礼(12月8日)，我们大约得走 20 分钟。

外教人很少看到这样的光景！一群小孩穿得很干净，两个一对规规矩矩地一言不发地走着；人们给她们问道，有的就说：‘这是嘛事？’‘这是仁慈堂里的孩子。’旁边一个认识字的人看到我们大门上写的字，就这样回答。第三个又问：‘嘛叫仁慈堂？’另外一个人就解释说：‘就是收留孤儿的地方，要不就叫仁慈堂嘛。’第四个人又问：‘咳！管这些孩子的不是女毛子吗？’……

修缮的时间比我们估计的延长了很多，1865 年的若瑟瞻礼(3月19日)，我们又去看了一次房子，孟振生主教和郎怀仁主教^①、苏凤文主教^②都来了，他们给孩子们分糖，分点心，就像过大瞻礼一样。

最后迁入新院，还是等到了孟振生主教又来天津的时候。当时我们面临着伤寒症的威胁，一位修女和一名女孩已经染上了这种病。当时有个善心的英国医生来给我们治病，他建议我们应及早搬家，以免继续传染。在新宅里工人们还乱嘈嘈地干着活，我们就搬了进去，正好赶上在这里过圣母月(5月)。孟振生主教为祝圣新宅特意赶来天津。……降福后，给两个保守的付了洗，给许多教友行了坚振圣事。午后，外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外学堂是为城里城外的奉教的女孩子而设立的。

不久，我们可能在城里的各区也分别开办学堂，由中国贞女主持，附近的孩子可以前去就学。但是目前还谈不到这些。

现在我们应当收留几个女孩子，别人把她们送给我们来照管。为了尽可能地减轻院中开支，我们打算向她们的父母要一小部分费用。

这一天，我们把男孩子安顿好了，他们共是 31 名，都很规矩，很听话，令人非常满意。他们单有自己的小天地，和女孩子是严格地隔离着的。可惜的是我们只有一个小房间权作小堂，男孩子不能在这里望弥撒和学要理，只好把他们送到(望海楼)天主堂里去。

修建一座小堂，对于城里的女教友来说十分必要。神父的小堂是专为男人用的，女教友不能去，又没有别的堂。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材料，其中有一部分是欧利维叶(Olivier)和德来沃^③先生送给我们的，已由大沽炮台送到了我们这里。

他们听说我们的孩子只吃小米，很感动，就把他们在炮台营房里囤积的上好稻米送给了我们

^① 译者注：Languillat，法籍耶稣会士，1865 年之后，任献县教区主教，按：此注错误。郎怀仁此时正在天津候船赴上海就任江南教区主教。

^② 译者注：Guierry，法籍，当时是孟振生的副主教。按：是辅说主教。

^③ 译者注：Treves，曾任法国驻津领事，索取望海楼基地的手续就是由他向崇厚办理的。

一部分。

现在谈谈我们事业的详细情况：我们共有156名孩子，其中孤儿院的男孩是32名，女孩是35名，另有13名初生儿和76名乳儿；有12名走读女生，其中有5名是不奉教的。比起去年来，这个数字是令人大为满意的。它使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在这个城市里建立起来。

外教人对待我们的态度也大有好转，他们开始明白了，我们不是来挖眼睛的，也不是来作买卖的，因此他们在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疑心了。

付洗情况今年不太好，只有350名。”

1866年 同治五年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2月23日（正月初九日）法署使伯洛内为赵州宁晋县民张洛待计陷法国艾教士事致奕沂照会称：

“案查上年十二月初五日赵州宁晋县双井村民人张洛待计陷本国艾教士，几至殒命。缘张洛待口称伊子著魔，躬请艾传教士至家驱逐。艾教士本不愿去，因其再三央求，遂偕奉教四人前往。迨艾教士入门后，张洛待即抽身锁门，挈子逃走，转瞬间教士所坐桌下突有火药轰发，教士及同去四人均受伤甚重。”

4月（三月）法署使伯洛内为催结宁晋县民谋害法教士事致奕沂照会称：

“前于正月初九日本大臣曾送照会一件。缘宁晋县属双井村民人张洛代同子张书琴商定情愿入教，遂请艾教士到其家中诵经，不意伊父子预蓄杀机，暗埋火药于桌下，迨艾教士偕同四人到屋，入座饮茶，火药突发，将传教士及同往四人均各轰伤，现在仍有伤痕未痊者可据。近于正月三十日一面接准贵亲王照覆一件，言已飭催该地方官查办，一面风闻该处县官得受被告之贿，置之不理。迨后该处董主教以案延日久，亲赴县署催问，而县令亦推脱不见。至再三函请贵衙门催办此事，旋闻该处知县前赴赵州，与该牧商办此事。乃于本月初三日回署传审，明言被告张洛代父子向系安善之人，并无谋害之意。且此火药轰发，实系魔鬼作弄，（返）[反]将代传教士控告之人池金兰掌责一百二十，勒具完案之结。

“本大臣初思，此项事件既有贵衙门飭令办理，自必公正完结，是以平心以待，并无重言。孰意该处州县之官玩褻公务，审理有亏正道，当堂推诿鬼神，置谋害之凶徒于不问，将无罪之原告而掌责。如此居心，曷有天日？贵衙门若无保全之术，本大臣应想一良法保全，不然该处教民及传教士后来必任其杀害，委之鬼作，案即可结，成何事体？现在拟有三条可完此案：第一要按《大清律》之二百八十二条例，应将张洛代父子杖一百、徒三千里，并罚赔银一千两缴主教手，以各分散被伤之人。第二将宁晋知县奏请革职，并令赔银一百五十两，交勒逼具结受其掌责之人。第三赵州知州授意属官恣意妄为，并闻其平素即有与法国人不睦之举，常怀仇怨，亦应请降二级以观自省。倘后不拘何处，系伊治下遇有倾陷习教者，伊均难辞咎。为此相请贵亲王度情准照办理。如果仍复因循不理，本大臣定乘本国军门不日到津，另议办理。”

7月23日（六月十四日）法署使伯洛内为各地官员不肯速结教案等事致奕沂照会^①称：

“……如直省所属之宁晋县一案，离京仅有五百里之遥，竟有父子同谋豫蓄杀机之张洛代，暗埋火药于桌下地内，轰伤传教士及随从之四人，幸得伤而未死。此系明明可指，本大臣曾请贵亲王查办数次，今历六七个月之久，而该宁晋知县与赵州知州及保府官员皆委[诿]为魔鬼之作弄。其代为开脱，显然易见。并闻张洛代父子与暗中授意之人共摊贿银二千两，是以案悬不办。本大臣辗转于心，喜乎？怒乎？现今为此一事筹思一策，不复劳烦贵亲王飞咨催问。倘此案仍不速结，应派本国兵船于海面捕拿漕船，变价分偿受伤之人结案。

“夫教中之理，无非教人良善及相爱相睦，不作非理之事，不贪非义之财，因此与此等贪墨之官心

^① 8月27日（七月十八日）恭亲王奕沂等奏为法国来照情词叵测并现在办理情形摺附件一。

意相反,自然与天主教要作对。凡人到衙门打官司,必须节节花钱,自书差至门印,以及问官,无一不受贿者也。天主教之理,最严禁习教者买上买下,因此习教人上衙门皆空其手。外教人皆知以银孝敬官长、尊敬书差为要紧之事,是以过堂之时官与吏岂能无偏情乎?所有宁晋县一事迟延至今,亦非别故:被告之张洛代先在知县、知州前行贿,后又在保定府行贿二千两,是以各官一口同音,判张洛代父子为良民,伊家害艾传教士及随从之四人实系魔鬼之作弄,与伊等无干。此等无天日之办理,是天主教明明受人残害,到官呈诉,俱属枉然。或由此情急而生不平,逼出事来,聚众将张洛代父子及暗中同恶之人一并毒毆,或冒犯此等不明理之官,本大臣既知其含冤莫申,岂能不出来保护?中国本不欲外国人管中国习教人之事件,既如此,为何不将习教人好好看待,遇有交涉之件秉公办理?若果如此,法国岂能轻为教中出头?所有法国为教中出头者,实系各处官员之偏护偏断,有以勒令而出也。”

8月27日(七月十八日)恭亲王奕訢为驳斥来照不符事实覆法署使照会^①称:

“贵大臣称‘宁晋县张洛代父子同谋轰伤传教士,该问官等诱为魔鬼作弄,并有受贿二千两之事。若案悬不结,应派兵船捕拿漕船,变价分偿受伤之人’等语。本爵查此案,据直督咨称,艾教士同教民池喜真等四人往张洛代家诵经治妖,系教民李洛来相邀,并非张洛代父子起意央请,此系李洛来在县供词。后因高委员偕同该县禀传全案人证,只张姓一造到案,教民一造一人未到。委员等候数日,仍不投审,两造不对质审讯,该问官不得虚实确据,安能骤然含糊完案?至摊银二千两之说,若能指出行贿者何人、过交者何人、受(脏)[脏]者何人,本爵不难立刻查办。若但凭空设词,恐不能折服人心。”

8月28日(七月十九日)法署使伯洛内为再申各地官员不肯速结教案等事致奕訢照会称:

“前于七月初七日接准贵亲王照覆一件,内中所言俱出常谈之外……

“如所称‘宁晋县张洛代一案,据直督咨称艾传教士同教民往张洛代家诵经治妖,系教民李洛来相邀,并非张洛代起意央请’,又称‘高委员偕同知县禀传全案人证只有张姓一造到案,教民一造一人未到’等语。查所称‘艾教士前往诵经,并非张洛代起意央请’之一言,实系捏造,万不可信。且张洛代请艾教士到伊家诵经,非止一次央求,如贵亲王持疑不决,不难立分皂白,可速传艾教士来京当面询问,亦无不可。因伊皆诚实无伪之人,誓不徇私。至所称‘教民一造无一人到案’之一言,本大臣查所有教民一闻此案欲提省,皆赴保府候审,至今已有四个月之久,并未过堂一次。如再以教民不投审塞责,本大臣立刻将在事之教民招齐来京,听候审讯,以验言不投案之伪。再,本大臣曾接董主教来函,言及此案之不得速速完结者,皆高委员偏袒徇情之故。至如摊银行贿之事,虽得于所闻而情实可信,设如举出其人质证,恐于后来探闻别事不便。(切)[窃]思宁晋县及保定府问官如果无私,自必秉公实心办理,一、二日间即可剖判明白,何至延搁七、八个月之久案尚不结,非徇私不办明验乎?殊非本大臣之所喜视。更难耐者,以教民不投案为藉口,本大臣即愿将教民及艾传教士并被告一造均令来京,在贵亲王及本大臣面前从新一询明确后听京官如何定断,本大臣无不依照。”

《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二部分《郎怀仁主教时期(1864年至1878年)》第一章《教区概况》载:

“一、1869年的教难

“新主教到任几个月后,耶稣会总会采纳了郎主教久已想望的一个措施^②,即派遣一位监会铎来巡访中国的各个教区,刚卸任的耶稣会巴黎省省会长戴元英神父^③膺此重任……

“巡视察访共进行了五个月(从1865年12月10日至1866年5月18日),其中从3月中旬至4月中旬在直隶东南。

^① 8月27日(七月十九日)恭亲王奕訢为法国来照情词回测并现在办理情形摺附件二。

^② 原注:“许多原因使我预感到,你将及时来华,不仅是巡阅教区,更是为了组织教区。”(郎主教1863年10月3日致戴元英省会长信。)见潘如汉:《戴元英神父传》,第189页。

^③ 戴元英(Fessard, Michel 1812—1893),字扶群。在视察献县张家庄总堂时,于3月28日为新落成的哥特式大教堂主礼祝圣。该堂长50米,宽21.3米,可容2000余人。在这前后,直隶东南教区在河间府、大名府和广平府均购置了宽敞的住院。4月,戴氏到北京拜会了柏尔德密和孟振生。

“1866 年终,苏州总铎伊宗尹神父用教区经费在城内买得一座房屋。……新屋的所有权受到了省里最高官员的正式承认。

“数天以后,曾因平定太平军叛乱有功,朝廷赏了一个高级顶子的直隶东南教区的徐听波神父来上海做他的第三年卒试。郎主教就派他到苏州,协助伊宗尹神父完成初期的工作,两位神父同到省府拜访抚台,受到了款待;次日,抚台带领全城高级官员,到神父住院回访。”

《西湾圣教源流》第五章《圣母圣心会底副主教驻节西湾子》第二节《圣母圣心会接受味增爵会底教务职责》载:

“南公自己和郎司铎驻西湾子村,管辖总堂、修道院和中区教堂。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五号,韩、林二位司铎去热河西北黑水区传教。司铎暂住总堂到复活瞻礼,因为南副主教已指定一位将晋铎品的大修生同他偕往。复活瞻礼前,南公遣四位神学修生姚、何和赵姓兄弟二人到宣化。孟主教在那里于复活瞻礼望日,圣了他们为神父。到了四月十七日,司公和张、姚二位神父便起程往关东东方小庙儿沟堂口传教。一八六六年和一八六七年两年来到的教士到后,蒙古教区底神职班,共计十六名。还有林、方二位先生,也相帮了传教。林先生后来为教士多下了辛苦,在官界里也有名誉;方先生(Mr. Franzenbach)没有久居西湾子,但他在的时候,施展了他底好技能,为大堂雕刻了华丽的祭台,到一九三八年还用方先生刻的祭台为大堂底正祭台。

第三节《南会组怀仁执掌西湾子教权》载:

“南会祖初到这里,即为蒙古教区底副主教。他在西湾子下了大辛苦,也热切照顾了本区底教务。

“南公开教底主义,一如从前孟公,也愿将众司铎分配到各处堂口;但因神职班缺少,还不能完成这主义,他就鼓励铎曹设法使每一个教友地方有一个小堂;每主日午前教友公拜苦路,午后再进堂诵经。到一八六六年,他记载地有五村都来求他协助建堂。南公通知高家营底教友,将为他们派遣司铎,因为他们自己修盖了小堂;一八六七年,就派狄司铎(R. P. Thys)为高家营底第一任本堂。高家营在西湾子四围堂口里算是头一个分堂,不多几年后,五号也成立一个分堂口。二十年的工夫,中区内驻有本堂底三个堂口,即西湾子、高家营子、五号。”

附表(一)由一八三五年至一八六六年间所有传教于蒙古的味增爵会主教司铎一览表

姓名	生年	在蒙古传教年限	寿终地址	去世年月日
一 孟振生主教	一八零七	一八三五至一八五七	北京	一八六八,十二,四·
二 孔 主教	一八一五	一八四三至一八五九	苦立图(热河)	一八五九,五,九·
三 戴济世主教	一八二二	一八五六至一八六五	北京	一八九十,三,十三·
四 白振铎主教	一八二五	一八五九至一八六六	九江(江西)	一九零五,九,廿四·
五 秦 司铎	一八零八	一八三七至一八四四	里约热内卢(巴西)	一八五三,三,三·
六 古伯察司铎	一八一三	一八四一至一八四四	巴黎	一八零六,三,廿五·
七 翁 司铎	一八一四	一八四三至一八四七	蕲家岗(河南)	一八四七,八,十七·
八 盛 司铎	一八零三	一八四四至一八四六	巴黎	一八六四,五,二·
九 龚伯察司铎	一八一五	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三	西湾子	一八五三,五,廿八·
十 梁儒望司铎	一八二二	一八五零至一八六二	宣化府	一八六七,一,三十一·
十一 廉 司铎	一八一八	一八五三至一八六二?	法国	一八八七,五,八·
十二 谢福音司铎	一八二一	一八六一至一八六六	北京	一八七零,六,廿一·
十三 罗若翰司铎	一八二七	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	? (法国)	一八九五,十,四·
十四 雷 司铎	一八二二	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	德国	?
十五 谢凤来司铎	一八二六	一八六四至一八六六	北京	一八九三,三,三十·

附表(二) 由一七八五年至一八六六年间所有传教于蒙古的味增爵会国籍司铎和会外司铎一览表

表

姓名	圣篆	生年	晋铎年号	在会与不在蒙古传教年限	寿终地址	去世年月日
一 杨(未详)方济各		一七三零	未详	会外 一七八八至?	宣化府	一七九八,十一,十四·
二 韩 若望		一七七二	一七九八	会内 一七九六至?	宣化府	一八八四,六,二十二·

三	申	西禄	一七六九	一八零零	会内	一八零三至?	临江(江西)	一八二七,三,四
四	何	依纳爵	一七八一	一八零八	会内	一八一九至?	和闐州(新疆)	一八四四,十,二十九·
五	薛玛竇	玛竇	一七八零	一八零九	会内	一八二九至一八四八	孟家坟	一八六零,十一,二十九·
六	高	多玛斯	一七八二	一八一二?	会内?	至一八三二	西湾子	一八三二,九,二十二·
七	林	味增爵	一七七九	一八一五	会内	一八一五	宣化府	一八三六,二,三
八	徐	路加	一七九零	一八一九	会内	?至一八二二	宣化府	一八二二,一,二十一·
九	郭	若望	一八零三	一八二六	会内	一八三五左右	陵上寺献县	一八五一,三,二
十	靳天西	岩翰	一八零三	一八三二	会内	一八三五左右	北京	一八六九,十,二十九·
十一	柯儒望	基所	一八零七	一八三八	会内	一八三八?	北京	一八九一,九,十七·
十二	郑	保禄	一八一二	一八三八	会内	一八四五至一八六六	宣化府	一八七三,十二,三十·
十三	赵	玛弟亚	一八一零	一八三八	会内	一八四四至一八六六	北京	一八六九,三,二十一·
十四	郑自贵	若望	一八一五	一八四三	会内	一八四三至?	北京	一八六六,九,二十五·
十五	樊明道	味增爵	一八二一	一八四九	会内	一八四九至一八六六	正定府	一八八三,五,二十·
十六	吴	味增爵	一八二零	一八四五	会内	一八四三至一八六六	天津	一八七零,六,二十一·
十七	风	伯多禄	一八二零	一八五四	会内	一八五四至一八六六	庆云县	一八九三,七,十一·
十八	张	保禄	一八三三	一八五九	会内	一八五九至一八六零	西湾子	一八六零,五,十二·
十九	林道远	伯多禄	一八三七	一八六五	会外	一八六五至一八九一	三十家子热河	一八九一,十一,十六·
二十	张	玛弟亚	一八三九	一八六五	会外	一八六五至一八七四	公沟堰	一八七四,五,(未详)
二十一	李	味增爵 ^①	一七六四	一八一七 ^②	会内	一八二九至一八六三	西湾子	一八三六,九,三·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九章《在孟主教晚年,北京教区的概况,蒙古及河南传教区的出让》载:

“七、让出蒙古的传教区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九月二十四日,另一批比国传教士又来了,使先前的数字获得增加,一切手续办妥后,遣使会士乃往指定的地方,即北京及正定代牧区。谢氏兄弟 C. L. Chevrier、 (一为神父,一为修士)、赵玛竇、郑保禄、吴文生,及昔日喇嘛冯伯多禄归北京;白振铎神父 Bray、樊明道、侯穆远、郭鉴原、张若望、张延安、张振铎属正定。

“当时蒙古代牧区有七八千教友。”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仁爱会修女的事业》载:

“1866年9月修女向总会长报告事业发展的情况说:

我们收留的孩子每年要增加若干,然而还很有再增加的希望。……有几个男孩子已经安置去作学徒工了,一名女孩在本月就要结婚。

我们还有一所为奉教的女孩子设立的学堂,共有20名学生,她们几乎全是愿意守贞的少女,这批学生将来对传教工作会有大贡献;特别是过几年以后,我们按计划在农村也建立起学堂来,她们的作用就更大了。

为了同样的目的,直隶南部的耶稣会神父把六名贞女送到了我们这里,以便训练她们热心,使她们将来成为好教师。这些贞女将来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把她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教给当地仁慈堂的或其他的女孩子。

我们的小医院一直是由管药房的修女代管,还没有一个专门负责的修女,许多事务都交给中国看护去料理。我们耐心地等待您给予我们曾经许下的援助。我们应当买地方盖医院,现在的医院仍然是借用仁慈堂的房子,这些房子将来为给男孩子扩充范围是要用的。

在开支方面,最大数字是每天在施诊所和探访家庭的时候所施舍的药品。仁慈堂负担着其中

① 原随文注:修士。

② 原随文注:发愿。

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只好从救济穷人的基金中提取了。

今年,不仅给410个孩子付了洗,还给6个临危的成年人付了洗。

“玛尔大修女在1866年9月写的一封信中,对多达(Dodat)修女的丧礼作了如下的描述:

……现在我提一提举行丧礼的情况。狄仁吉神父第一次要按奉教国家的习惯举行全套教会礼节。法国和英国的领事赏光参加了丧礼。参加丧礼的还有租界里的许多男女侨民。领事先生在已故修女的棺材上盖上了一面法国旗。他说:“我对于这位修女的圣德致以敬意!她为使我国高贵的国家和圣教会得到光荣而作出了巨大贡献。”

料理妥善之后,大家按下述秩序列队前行:前有中国铜锣开道,十字架在众目昭彰之下穿过城里的大街;仁慈堂的男孤儿手执蜡烛;城里教要理的先生个个都穿上了礼服;在全部行程中(约1小时),神职人员不断地唱着亡者日程经;后面有8个人抬着死者的棺材,紧接着是修女和女孤儿同样手执蜡烛相随;还有些别的人也跟着送殓的队伍。我们的孩子全都身带重孝:男孩子腰围白带,带子有4指宽,下垂到膝盖;女孩子头缠3指宽的白巾,在脑后打一个结,然后下垂齐肩。

这样的礼节在这座从来未见到过这样排场的城市里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说起来你们也许会吃惊,一路上鸦雀无声,人们都结队相随。简直可以相信这是在法国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天主为天津选择了一个又热心,又能牺牲的人,他就是谢福音神父。谢福音大约在1866年底来到了天津。”

1867年 同治六年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4月27日(三月二十三日)法署使伯洛内为任县向教民派收修文庙钱文事致奕沂照会称:

“据保府主教董来函,内称‘顺德府任县知县因补修文庙,勒派教民每亩地制钱十文,并晓示随同粮银一齐完纳。该处教民完纳粮银三次,因无修庙钱资相随,总未征收’等语。本大臣……不得不照会贵衙门,迅飭该处地方官务须收纳粮银外,不许勒索教民修庙等银。倘于此次飭知之后仍复勒派,使地面有不安之情,自必贵衙门深知系地方官办理不善之由。教民如受其累,即难免本大臣随时催问。相应照会贵衙门,并将该主教函致地方官之信稿抄录附阅。”

所附照录主教函致地方官信稿称:

“缘同治二年接奉谕旨,内载‘凡迎神、演戏、修庙、烧香与教规相反无益之各项,永不许摊派教民’等因,钦遵在案。今顺德府任县县主因补修文庙,勒派教民每亩地制钱十文,晓示与粮银一齐完纳。教民完纳粮银三次,因无修庙钱资,总未征收。敝主教恐教民有违国课之(险)[嫌],于本月十二日即派法国传教士面请顺德府核办,蒙谕‘即札该县先将粮银清收。至修庙钱资,限二十日再行核办’,并谕知敝主教‘亦禀请藩宪示一定章’等意。夫修庙钱资,实反教规,万不能出(并);应纳粮银亦不征收,又关国课。因此祈请贵藩宪速札飭顺德府转飭该县,并札所属各县,凡修庙、演戏等项,遵照上谕办理,不致酿成讼端。”

5月22日(四月十九日)法使兰盟为文安县勒令教民出香灯钱事致奕沂照会称:

“照得本大臣接准北堂孟主教来函,内称‘顺天府文安县新村人陈得柱、李树兰均系历代奉教,并无不法。缘本村向有一切杂差,均经上任魏令豁免,改为本村公摊钱一百二十串作为文昌庙香灯之用。然教民陈、李二姓因教中规矩甚严,且于咸丰十年和约后奉有特旨:奉教人不出修庙、香灯、酬神、演戏等钱文。诿意本村乡地刘得宏同本村人约齐公禀本县,造言天主教人扰乱村坊,抗差不办。当经前任曹县主传集奉教人陈、李二姓,当堂勒令交出钱文,并严押班房,不容分辩。迨至去年岁暮,本村人又向伊等索要。是以伊等情急,赴县呈禀,适遇现任县主沈并未传案,只令人传谕乡地刘得宏飭其调处。据刘得宏传言,如不出此项乡资,即改为堤工官项向索矣。且此事之刁难主谋者本县之绅士纪彭龄、郭梦

熊等,向来包庇新村公事,把持衙门。揣其勾串一气之情,实欲致该处教民不能安业’等语。……合即照会贵亲王,咨行顺天府札飭文安县,即行出示晓谕新村人等,俾其明白和约所载并屡奉谕旨,恪遵勿违,一切教中不出之钱不得勉强,亦不得肆行欺凌,方为乡里和睦之道。”

《西湾圣教源流》第五章《圣母圣心会底副主教驻节西湾子》第三节《南会祖怀仁执掌西湾子教务》载:

“头一位圣母圣心会底会友死在蒙古教区者,为司神父;他死在下庙儿沟(一八六七,四,五)。他死的消息,很伤了我会祖底心。但是天主也知道南公底顾虑,仿佛为安慰他,给他打发来了别的一位司神父(R. P. Smorenburg)^①。这位神父并不是年轻没经验的,他已经十几年在华传教;他因宗座宽免,出了他底会,进了圣母圣心会,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间,也来到了蒙古地方传教。”

于华峰^② 编著《古常山郡新志》之九《风俗》载:

“正定佛教与天主教

“……缘正定天主教堂与大佛寺比邻并峙,原系历代皇帝行宫故址,明太祖、清康熙乾隆二帝等均曾驻蹕于此,未悉建于何时。据孟爱神父笔记载称,董若翰主教初到此传教,住于府前街起火小店,客商杂处,扰攘不安,深以为苦!一日,闲步散心,见行宫空寂冷落,幽静可爱,默祷我主保佑,倘得以此为教堂,则善莫大焉。事毕返京,乃依据《天津条约》备文向清廷申请租借,不意,竟蒙御批赏赐,事出望外,不胜雀跃之至,乃于前清同治六年,即1867年,开始兴建高与大佛寺大悲阁相伯仲之主教座堂。

“主教座堂位列中央,南北大门经此以大路贯通,于此分东西两区。东区为主教公署、神父斋舍等,西区为仁慈堂、若瑟修女会等。大路两旁植有洋槐垂柳,行列修剪齐整,林荫相连,气象万千。葡萄园菜园花圃,欣欣向荣,益增幽静雅趣。较之殿宇塌毁不修、我佛蒙尘之大佛寺,形成兴衰鲜明对照,能不令人唏嘘浩叹!

“天主堂占地二十馀公顷,广阔远逊于大佛寺。以其加意经营,规画有方,管理得当,日新月异,蔚为壮观。继增建法文学校、首善完全小学校,不分畛域,招收各界男女学生,有教无类,成绩斐然。女修道院系专为妇女信徒进修习艺之所。还附设本笃罐头工厂、机械修造厂,及发电厂等,自给自足,而且薄利便民。(致)[至]于附设医院,门诊收费低廉,贫苦者免费施药,尤博大众赞美欢迎。较之不事生产、为恶多端之僧侣,真有天渊之别!

“本笃庄系于民国四年,价购县城西南十几华里之滹沱河北岸较高沙滩十馀公顷,约两百多亩,以化荒芜为良田精[神],筑垒斩荆,创建本笃庄,即俗称修道院是也。该院以造就神职人员为宗旨,远离尘嚣,幽静庄严,私立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牛副主教若望等,即出自该庄之学员。并附设孤儿膳养院,以接纳教区流浪无依孤儿,教养兼施,尤博社会嘉许。周围广植柳槐,以防水患。耕之耘之,菜园五谷,阡陌如绘。遥望沙漠绿洲,无不啧啧称奇。

“据云:前清光绪二十六年,正定只有教友二十名;至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增至五千之众。只见其热心公益,实践博爱教条,鲜闻开口‘耶稣’,闭口‘耶稣’,力竭声嘶之布道者。所谓‘至诚感人’、‘以道化人’者,岂斯之谓欤?

“正定教区辖三十二县市,除正属十四县一市外,尚有定县、深泽、曲阳、赵县、宁晋、高邑、临城、隆平^③、尧山^④、邢台、沙河、广宗、钜鹿、任县、内邱、南和等县,教友早已万计矣。”

① 司牧灵,荷籍遣使会士。

② 于华峰(?—1982.12.29),河北省正定县吴兴村人。

③ 1947年与尧山县合并为隆尧县。

④ 1947年与隆乐县合并为隆尧县。

1868年 同治七年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3月4日(二月十一日)法使兰盟为雄县安家庄教堂被焚抢事致奕沂照会称:

“本大臣近接天津来函禀称,于前十日逆匪攻破雄县县城,大肆扰乱。该处安家庄地方应有天主堂一座,该堂之传教士及教民多人预于堂外筑起土墙,以避凶锋。不意贼众蜂拥而入,勒逼传教多士及教民人等随从为匪。该教士等开说大义,誓死不从,致触逆匪之怒,将堂焚抢一空。因此众传教士亦各离散。(限)[现]有逃至天津与本署送信者,并有五六人不知下落而生死难定。”

9月7日(七月二十一日)法使兰盟为请更换任县知县等事致奕沂照会称:

“本大臣近接直省董主教禀函,内言‘正定府所属一带地方,自由本府出示剴切晓谕该处居民,移风易俗,现获民教相安而和睦日笃,深合期望。惟有顺德一郡,尚未一视同仁,仍存尔我之争。若能仿照正定府之示谕,而人同此心,自必亦能回心向善’……

“再,任县知县自奉贵衙门中伤之后,心甚不甘,每思乘机以报复。……本大臣奉请贵亲王,若能将其调换别县,亦属两益之事也。”

10月23日(九月初八日)兰盟为嗣后给传教士护照自必格外留心事致奕沂照会称:

“本大臣于本年九月初五日接准贵亲王照会,内开‘前据顺天府咨报武清县杨村地方通兴店有外国人林福成酒后行凶,扎伤俄国商人遮尔玛耶福身死。该凶并执有传教士林辅臣护照’等因。本大臣阅视之下,殊觉骇异。……从前本馆中虽有一时之误发未缴,而贵亲王未可即疑本馆所发之护照(慢)[漫]无区别,视同儿戏,以动随便滥给之猜。况此护照交林辅臣手,亦有些须解说,因伊当日曾与教士服役而有愿学教士之心故耳。迨后伊又不愿作传教士,前来北京在布国之馆当差,理应即将护照缴回方合。乃竟匿未交出,以备再用,是其大错。

“……嗣后再给教士之护照,自必格外留心,以防冒昧。”

10月30日(九月十五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闻献县勇丁殴伤教士案情形片称:

“前据署献县知县胡桂芬禀报‘天主堂教民刘孟才^①喊控勇丁王得胜等拦截天主堂拉运米面车辆,彼此争殴,将传教士徐博理^②等用枪刀扎砍致伤,并被抢失物件’等情。……又据法国领事官德微理亚并法国传教士徐博理先后函禀前情。当经双方派委员弁札提滋事勇丁并行文统带官刘祺,令将哨官王万山一并解案审办……

“奴才查勇丁王得胜,因拉运火药车辆马匹倒毙,凡有民车,辄令营中伙勇拦截应用。迨传教士徐博理将王兑儿揪去,询问车辆下落,王得胜即率同多人将王兑儿抢回,致相争殴,用枪扎伤徐博理,并伤其跟人,以致车上遗失物件。王得胜身为勇丁,当行军之际擅截民车,并因争殴致伤外国传教人等,实属逞凶,情节较重。惟失物由于争殴,伤人并未致死,于军士擄掠情形不同……

“同治七年九月十五日军机大臣奉旨:王万山著先行革职,该衙门知道。”

11月8日(九月二十四日)总署奏为献县勇丁殴伤教士案应请刑部覆核片称:

“臣等查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来函,以带兵官刘祺营内哨长王得胜及伊子王兑儿因拿车与教士徐博理斗殴,致徐博理及跟役李东桂、徐元良受伤各情,请示核办前来。……旋于八月间准法国使臣兰盟函开‘接教士来禀,徐博理伤已痊愈,因闻知该地方官已将正凶王得胜问斩,心中殊有不忍,请将王得胜斩罪减免,改为永军,并请移咨三口大臣将教士之情出示,明白晓谕’等语……

“臣等复查条约内载‘法国人与中国争闹事件,或一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毁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法国人,由领事官设法拘拿,照法国例治罪’等语。此案

① 刘氏曾捐得清廷六品顶戴功名,又在张庄总堂洋枪队受过训。

② 即徐听波。

王得胜等因运送军火强拉车辆伤人,尚未致死,该犯系中国人,自应照中国例治罪。”^①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八《自咸丰至光绪末》载:

“直隶

“同治七年^②,捻匪入献县境,大肆劫掠。教友遇害者多名,内有贞女二名、教妇一名,皆因贞操不屈遇害。献县总教堂亦被抢掠,所失不赀。然匪纵火烧堂与修院房屋,火燃而自熄,未为大害。杜主教与众神父纷纷避难乱,备受苦楚。修道生被裹胁数名^③,年内皆得生还。”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一册《张家庄被围记》载:

“长毛……的宗旨是为推倒满清,恢复汉族的自由,也算有革命的性质,到底毫无纪律,处处杀人放火,实与乱党无异。前清同治七年阴历正、二月间,长毛从河南北上,蔓延到了献县。合县的居民惊慌失措。往来逃难的人不绝于途。那时张家庄才盖成了耶稣圣心大堂,临近各堂口的教友,另外青年妇女们因为听说长毛们野蛮至极,无异禽兽,怕为自己的贞节有妨碍,都逃到张家庄来了,为得耶稣圣心的保护。阳历二月二十五号下午三四点钟千百成群的长毛闯进了张家庄,逢人便砍。势甚凶猛。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八年阳历二月二十五号,长毛骚扰张家庄总堂的时候,别的支队也闯进了南立车村。”

《清末教案》第四册(《法文资料选译》)二、《传信年鉴》^④辑:

《中国北直隶省的综合报道》^⑤载:

“一些匪徒已把与北直隶东部相邻的几个省洗劫一空,直隶东北部又一次遭到了匪徒们的蹂躏。耶稣会纪隆(Aime Guillon)^⑥修士来简向我们叙述了这个创建还不到12年的传教区所遭受的令人忧伤的考验之详细情况。

耶稣会纪隆修士致布卢瓦大神学院的修道院长的书简

1868年3月13日于天津

……我在前几封信中已不止一次地谈到我们应该在我们居住的村子里修筑防御工事以提防匪徒们来破坏。抢劫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我们必须加强防御措施,基督教徒们已能成功地铸造一般的大炮。这些准备工作足以把一年以来在我们周围制造恐怖事件、进行劫掠的700—800名骑马的强盗赶到远离我们的地方。但在1月中旬前后,有近25000名“长毛”起义军(太平军^⑦)越过黄河,向北直隶扑了过来,他们一路上杀人放火,抢劫行凶。他们已习惯于战争的艰辛,所以民众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就感到恐惧害怕,这种恐惧使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我们要顶住他们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在“长毛”们接近时都可能被吓倒,而我们只得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抵抗。如果需要,那么我们就决定放弃一切抵抗,并向他们做出让步。

这些起义军不只是以抢劫为业,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政治派别。其目的是要驱除鞑虏王朝,以

^① 教会方面对此事的记述大意是:7月14日,驻献县清军哨长王得胜拉运火药,途中马匹倒毙,适逢教徒刘孟才运粮车路过,遂将该车辆扣留使用。刘氏不服,遂报告总堂。傍晚,总堂派徐听波神甫率工友李东桂、徐元良等持灯前往王家,拘走其子王兑儿,追回车辆下落。王氏闻讯后立即带兵役多人抢回兑儿,重伤徐氏。当夜教徒300余人携带洋枪欲图报复。由于王氏驻地已有戒备,未能动手。至次日晨,持械包围的教徒增至1500人。经杜巴尔主教等劝解,教徒们散去,总堂派人至天津向法国领事德微理亚报告。德氏与徐氏各致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严惩王氏等。

^② 一说为1868年4月25日。

^③ 一说为院长、1名教书先生和3名修生。

^④ 译者在《译后记》中说:“《清末教案·法文资料选译》……第二部分是选译由法国里昂年鉴出版社(L'Editeur des Annales)出版的《传信年鉴》(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1856—1900年)。这套年鉴是18世纪《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1702—1781年,其编印本一直持续到1843年)的继续,它主要是刊布由新旧两个大陆(当时欧洲人将西半球的美洲称为新大陆,将欧、亚、非三大洲称为旧大陆)的传教士们寄回法国的书简,同时也包括有关这些地区的传教区与传信事业的文献。”

^⑤ 译者注:译自《传信年鉴》第40卷,1868年。

^⑥ 纪隆(Aime Guillon 1830—1869),又译作吉玉隆。法国人。

^⑦ 应译作“捻军”。

便把一个汉族人再次扶上皇帝的御座。鉴于我们是受法国保护的外国人,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在进攻我们时会顾及到招致欧洲国家的报复之后果,担心由此而使他们事业受到影响。但当我们的基督徒听说了我们打算不进行自卫的意图后,便纷纷从四面八方派出代表来劝我们要进行抵抗。他们向我们许诺给予相当含糊的援助,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劝告和救援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因此在10万之众的皇家王师不敢和他们打仗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决定与这些长毛人为敌,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个无能力的国家当局要保护其居民、要保护自己的形势。平时,由于法国军队在北京享有威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的好战示威演习来保护我们自己。但现在形势则不一样了,一般的示威演习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此外,我们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希望与敌人和解,那么即使在遭受最大损失之危险的情况下,那也最符合我们传教士的特征,最符合放弃武器和把我们交给上帝安排的性格。然而要注意谨慎小心,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当我们在商议时,“长毛军”已开始行动了。他们肆无忌惮地跑遍了白河以西的地区。白河为南北流向,它把这个省平分为两半,它流经献县附近,流向天津,把我们隔在河右岸。有几次,骑兵部队曾来到离我们只有三、四法里的地方。那时到处充满了恐怖气氛,平原上到处是离家出走的人,他们带着能抢救出来的几件行李,妻子小孩紧跟在后,四处流浪,无处藏身,都找不到任何自认为是安全的地方。皇家军队的一些新军借口要追击敌人而每天来来往往,但他们却十分留心地呆在离敌人相当距离的地方。这些军队不但不能使居民们放心,相反他们却几乎像强盗一样进行抢劫破坏,从而使得居民们惊慌失措,不得安宁,悲惨的局势日趋恶化。

这就是我们自一个月以来从我们斜坡的高处作为无动于衷的证人而看到的情景,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已。这种表面的平静却使某些中国人很吃惊,他们认为我们什么都不怕。因此,我们很快就发现有一些基督徒,甚至是某些非基督徒都向我们这里逃跑过来了。我们的村子里挤满了难民,特别是小孩和妇女,因为他们格外害怕落入那帮卑鄙下流的乌合之众的手中。我们一些最明智的基督徒从前对于我们的一些事情很不放心,但当他们听到敌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进发的消息时,便于2月23日这一天主教封斋前的第一个星期日恳求我们进行抵抗并接受他们的救助。他们这一次忠诚申明,同时还随附有一份长长的要求来防守阵地的志愿者名单。危险的紧迫性与这些请求消除了我们犹豫不决的想法。在等待胡博理^①(Leboucq)神父到来期间,我负责加紧准备工作,信使们到各地去向基督徒乃至我所认识的一些非基督徒求援。24小时后,我们就要投入抗击“长毛军”的战斗了。然而,敌人在星期一就已靠近我们。胡博理神父让信使告诉我们说,他已骑马赶一段夜路以便来和我们会合,一路上他还唤醒了即将参战的基督徒。

九点的钟声响了。我们进入防御工事,密切注视着敌人的运动。许多骑兵在平原上奔驰,到处一片混乱,难民也乱成一团。难道这些骑兵是一伙强盗吗?他们向装载着难民的车子涌去,虽不殴打任何人,但却抢走了马匹和骡子。他们正是“长毛军”的先遣队。他们的骑兵抢占了张家桥,然后再从桥上过河。我们的两个驿夫步行赶回来了,因为他们的马被抢走了。基督徒们跑了过来,但他们向西、向北和南方逃走的道路已被截断,只剩下唯一一条可以通行的路,一些武装以长矛和火枪的步兵迅速向我们开了过来。他们都是基督徒,约300人左右。他们离我们不到一公里远了。与此同时,相同数量的骑兵走在“长毛军”的红旗前,从邻近一个村子里冲了出来。我们的基督徒停了下来,重新排开他们的战斗阵势,挥动着旗子,准备迎战他们等待的敌人。“长毛军”被这种情况惊呆了,他们也停了下来,准备战斗。当他们看到反对他们的增援部队从我们的村子出来时就掉转头撤退了。

11点时分,旷野中又恢复了平静,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抢劫者全都返回到张家桥的桥上。一个新的计谋很快开始了。各自有20—30个骑兵的匪帮达上百个之多,每个匪帮分别以白旗、红旗、黑旗和一把小号作为信号,他们游行达一个多小时之久,每个匪帮之间的间隔为三至

^① 应译作“徐博理”。下同。

四个步枪射程。这些匪帮中有一半向北行进，其余的向南进发，他们都是为了去接应东部战线而组成一个可以包围200—300个村庄、献县城和我们的居住地的大包围圈。游行之后，一支骑兵队伍迅速向包围圈的中心进发，并向他们从四方包围的献县城猛扑过去。我看见约有200名骑兵出现在城东门，他们强迫卫兵们打开城门。人们向他们中间射出一排炮作为答复，排炮未造成任何损失。他们立刻下马冲向无人防守的壁垒，该城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被他们攻克了。城市里几乎只剩下一些官员了，王师、民团和大部分的居民早已逃之夭夭了。我们获悉，官吏们在敌人进攻的时候自己也企图逃跑。知县即首席官被他们识破并被杀死在城东门。四天前，胡博理神父经过那里时还看见过他的尸体，衣服都被剥光，只盖着一领破草席。第二位官吏的运气最好，但他也满身是伤，多亏化装才有幸逃了出来。他是我们真诚的朋友之一，这在中国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他对基督徒的信赖胜过他的同伴，因而逃亡到了一个村子里，那里的一家基督徒收留了他并帮他容易地逃跑了。

城市被攻克了，该轮到我們了。敌人忙于去邻近村庄进行破坏抢劫，他们似乎不敢靠近我们。现已1点钟了，被通知来救援我们的基督徒已来不及赶到。我们统计了一下人数，只有近150人。为了安排各岗哨和牢固地阻挡敌人的进攻，我们至少需要800人。抵抗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只能进行谈判和尽快隐蔽我们的防御工事。这时，一支70—80人的骑兵队已来到我们的门口；他们要求‘大人’（当地的大人物或地方守将）出来说话。胡博理神父和我走了出来。胡博理神父和一个刚有26岁的年轻人（即他们的头领）说着话。神父告诉他说我们是法国传教士，我们不想打仗，而且受法国保护，对于他们与皇帝及官员们之间的争端持中立态度。

‘正是这样，我们才丝毫不反对你们，’年轻的头领回答说，‘但我需要马匹，你必须给我一些马。’

‘今天早上已经给过你两匹马了。’

‘那我不知道。我还需要一匹。’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有一匹特别好的马，我把它给你好了。’

那个人立刻提高声调，转过身来以威胁的口气说：

‘我不是要一匹，而是要100匹。’

他们所有的人都声嘶力竭地叫着支持自己的头领，有一部分人甚至下马准备涌进来。

我们被迫退让到最后而继续进行谈判。后来由于不能使该头领做出理想的让步，所以我们邀请他本人进村来。尽管大门敞开着，但他还是不敢进去，他害怕中埋伏。当我要带他进去时，他想让神父留下来作人质。我们告诉他说，他手下的一些人已经通过斜坡，手持矛枪自由自在地在村子里行走，这样才使他放下心来。到达我们的住所时，我先翻墙进院子去打开紧闭的大门，强盗们趁机立刻涌了进来，抢走了我们和一些逃难基督徒的20匹马，接着他们又强迫我们把住房、教室和所有的房门打开。

我于此先不说我们在这五个小时内的悲惨处境。强盗们一看我们没有武装，马上就露出了他们贪财的嘴脸，他们在我们头上挥舞着军刀以强迫我们说出已藏匿的所谓财宝。说实在的，我们此时此刻所担心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早已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上帝。我们唯一关心的是要想法阻挠他们亵渎宗教，保护我们的基督徒、孤儿院的儿童、神学院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已撤退到教堂以便能在上帝的保护下维护自己尊严的500—600名妇女和少女。

我当时曾以为，侵略者抢走了马匹、钱财及住院最珍贵的物品后，他们的贪婪之心就可以满足了，但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胡博理神父和我一直追踪着年轻的首领，目的是想使他变得温和一点，同时也争取他控制一下那帮强盗的野性。当我发现这些狂怒的人中有一人从神学院出来，后面跟着三个扛着我们枪枝的可怜的小学生时，我们正给他打开司库神父的钱柜，给他一些钱和钱柜里其它一些值钱的东西。从这三人的神态来看，他们已被俘虏了。我们向他们跑了过去。跪倒在强盗面前，恳求他可怜他们太年幼。但现在——均无济于事了，他对我们的请求回之一笑，

并且以威胁作为对我们的回答。多亏了我们从内心恳求的上帝和圣母保佑。当我们只是表面上向抢劫者提出请求时,我们终于使得两、三个遭难者获释。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交换,因为当我们急着救出被他们折磨的一些基督徒时,强盗们已返回神学院抓走了另外两个学生。我们三个亲爱的儿童、尊敬的会长神父的传道员和几个基督徒就这样被抢走了。

这些强盗抢够了东西后就走了。他们仅10多人却抢走了40匹马和骡子。这样,他们还剩馀30匹马。然而,正是我们的神父和修士们补足他们的总额。现在说说对我们的追捕,要想逃避经常出现的死亡的威胁是不可能的。主要的是我们成功地摆脱了困境。

这帮强盗走了以后,他们所获得的战利品又引诱来了另一帮。但他们看到没有什么东西可抢时,就打算把我们带走。庆幸的是夜幕降临了,“长毛军”已接到返回其大营的命令,他们就这样离去了,临走时还说第二天再来。他们年轻的将领已被胡博理神父笼络过来了。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才无一人被抓走。他走时对我们说:“你们对我们太轻信了。今天我们对你们还不错,但明天还会有一帮更凶狠可怕的强盗要来。请你们相信我的忠告,不要留在这里了,否则你们都得送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能出好主意的人。因此我们决定想办法迅速逃跑。离开住院时,我们看到路上躺着三具浑身是血的尸体。她们是基督教修女,在自卫反抗时被匕首刺伤了,而强盗们以为她们已被刺死就扔在这里了。可以看出她们当时并没有遭到致命伤。

上百个村庄被烧毁的火光照亮了黑夜。我们必须从这场大火的包围圈内突出去,并且还要注意避开路上的岗哨。我们七个都是欧洲人,五个神父和两个修士,后来我们在旷野里又遇上了四个基督徒、几个孤儿和一个基督教修女,他们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行列。在出发时,我们没找到欧杜安(Audouin)和温斯巴什(Winsbach)修士,我们原以为他们被抓走了,但三天以后,却获悉他们也已逃跑出来了。

我们就这样默默地走着,穿过原野,拖着沉重的步伐踉踉跄跄地行进。路上到处长满了互相交织在一起的野枣树,样子很像我们欧洲的荆棘,我们的衣服被这些树枝挂得破破烂烂。为了避免被敌人控制的村庄,我们不得不绕路而行,因此尽管我们加速赶路,但仍只赶了很少的一段路程。多亏了我们挚友的引路,我们终于能在接近子夜时抵达一个还未遭“长毛军”光临的村庄,并在几户基督徒之家住下了。这些善良的人早已得到了我们遭难的消息,并且以为我们均遭杀害。此时此刻,他们正准备动身出发。我们的到来给了他们很大的安慰。由于我们几个人已累得精疲力尽,所以人们为我们准备了一辆四轮畜力车以便把我们送到更远的地方去。在此期间,他们给我们送来了新鲜食物。我们必须赶在天亮之前迅速走出包围我们的火圈。我们朝位于皇家运河边上的一个大镇保定方向赶路了,因为我们想渡过运河,以便把迫教者隔在河水彼岸。早上七、八点钟时,我们抵达目的地。

当打教者来到时,因患支气管炎而卧病在床的博雷拜尔(de Beaurepaire)神父也只得起来逃跑。为了减轻衣服的重量给他带来的劳累,他不得不脱掉他的一部分衣服,因此他又感到一股寒气向他袭来。就这样,支气管炎还没好又患上了胸膜炎。恐怖甚至袭击到了运河对岸,人们都已逃跑。我们没有粮食吃,也没有减轻病人痛苦所必须的任何东西。等了两天之后,我们只得采取最后的办法,即去天津,因为去那里也许还能找到药剂师,使博雷拜尔神父能得到仁慈的修女们的治疗和护理。于是我在尊敬的会长神父和赫鲁雅尔(Herouard)修士陪同下就出发了,留下杜巴尔(Dubar)主教大人、胡博理神父和傅尔蒙(Fourmont)神父来监视“长毛军”的活动,并且立即返回我们已撤空的住院。从皇家运河到天津间的旅途上也很不顺利。逃跑后的第八天,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我才得以把病人送进医院,多亏修女们的治疗和护理,病人很快就脱离了危险。

3月16日

我们已获悉到了有关住院的消息。在我们出发的当天晚上,一些强盗就占据了它,并在那里进行了两天的洗劫之后才离去。强盗们本想放火烧毁它,但显然是上帝派去了守护者,因为住院

仍屹立在那里,只有两、三间房子的房顶被烧坏。几个被抓走的基督徒也已成功地逃出去了,我们的一个神学院学生已来到我们这里,两个修女被杀害,几个人受重伤。总之,我们失去了两位传道员和两个神学院学生,我们的马匹和骡子都被抢走。住院的家具、教堂、圣器室、药房都被破坏。除了我们能带走的或沿途搜集的一些破烂外,衣服、祭器、祭服、装饰品都没有了。这就是我们的财产所受损失的清单。

· 3月26日

我已回到我们的住所。打教者走了之后,疯狂的百姓由于受到皇家军队和‘长毛军’等强盗们的迫害,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抢走、妻子遭侮辱、房子被烧毁、个人所拥有的一切都遭抢劫后,终于一下子全部挺身而出地向敌人展开了斗争。几天以来,许多被他们突然抓住的强盗或营勇都被残酷地杀害了。基督徒也和他们一样站了起来,但他们只是进行一般的自卫。他们把我们的会口变成了抵抗的中心,已有1200名基督徒带着妻子儿女逃到这里。被召去天津要求法国大使和中国当局给予支持的胡缚理^①神父在得到武器和弹药后,又首先给我寄来了。几天之后,他将在一位教官的陪同下返回住院,后者是受我们大使的委托来训练一支欧式小兵团的官员。如果我们能成功地组织起这样一种可靠的防御体系,我们周围的大批非基督徒就会投奔于我们,这股似乎要摧毁传教区的风暴将有利于扩大我们的影响,将使我们三、四个月以来在这个教区出现的令人如此快慰的归化活动产生一个新的飞跃。到那时,真正可以说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

耶稣会士纪隆

尊敬的胡缚理神父来信声称,一些匪徒抢遍了邻近一些省份后,又刚刚抢劫了北直隶东部一带的地方,而另一帮强盗却长期占据着江南,并在那里屠杀和俘虏了这个省几乎半数的居民。他们在追求一种政治目的的同时,主要是忙于抢劫。

这些抢劫集团于1859年在河南开始组建。从那时候开始,其人员主要是来源于秘密会社。他们的别名为‘老捻子’或‘长毛’。人们还给他们取名为‘红胡子’,因为他们带着用马尾作的胡子,借以恐吓百姓。

他们的头领是河南人,刚满30岁,他让人叫他‘阎王’或魔王,他为人极其凶狠毒辣。他接替的是其叔叔的职位,后者以张洛行之名而著称,他叫张洛禹^②(Tchain-lao-iul)。他总是穿着一件鲜红色的、袖子又大又长的长外衣。他自称是明室的后裔,并想得到天朝的王冠。他的坐骑呈黄色,与其祖先皇帝的宝座相似。他有六位大臣,这些人时刻守候在他身旁,寸步不离,他们坐着绿色的轿子外出旅行。

但这位阎王是什么王子,或者是什么皇帝呢?他只是烧杀抢劫。据说,他的母亲陪着他到处作恶,其母比他更残暴。每天晚上,人们要尽可能地给‘阎王’带来一个属于名门世家的年轻人,他然后使用军刀砍下这个年轻人的头。大家都说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总要杀一个人,我们也掌握有目击者叙述的证词。更有甚者,在他酣睡时还必须要有着火的亮光。人们把他住房的北、南、东、西四周的房屋都放火烧光,然后在他住宅周围再安排600名骑兵来回巡逻,为他放哨。

不管阎王有怎样的企图,然而可以肯定,政治并不是他所统率的强盗们的主要目的。这伙强盗人数达4—5万之众,他们到处为非作歹,制造恐怖气氛。他们去到哪里,(哪)[那]里的老百姓就闻风而逃。皇家军队的士兵比谁都害怕他们,兵卒们总是小心翼翼,丝毫不敢向他们发起进攻。然而,大部分的‘长毛军’只是以一些安装有尖铁头的长竹棍作为武器。一部分人有长矛,少量的人有军刀,枪枝很少。显然,这支起义军的直接目的只是抢劫、杀人或不情愿地征募一些温顺的农

^① 应译作“徐傅理”。下同。

^② 译者注:误,应为张宗禹。

村居民。我们特别担心的是眼看着全国都沦落到极悲惨的境地，饥荒将袭击着那些不久前还想留在他们家里的人。匪徒们将会发展到不计其数，并且将可能得到某些武器。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能组织这样一支队伍，那就无法包围和夺取某些大城市。

“长毛军”上身着妇女装饰，头戴红头巾。他们的裤长齐膝盖，以便让大家看到烙铁在他们腿上打下的一些火印。新征募的人一到，头领们就急忙给他们烙下这样的印号，以便不被皇家军队或官员抓去或被杀害，同时还可防止他们逃跑。他们满脸都被蓬乱的长头发覆盖，让人看到他们就感到害怕。”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章《天津教案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二、董主教逝世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十月间，他带着病去巡视教友，他听到了孟主教于十二月四日逝世的消息。”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旋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孟主教整理一切，劳瘁异常，至是神疲力竭，忽患风痹之症，日见增剧。至同治七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洋历十二月初一日，病已大渐。虽有西医二人诊视，亦皆束手无策。随即赋以圣教终礼，孟主教虔领。至初四日午后申刻，安然逝世，享寿六十二岁。……发引时，人人争先送葬，各输其感念之诚。各国钦使与恭亲王所派之大员及总署各官无不俱来吊唁，其教民之执绋随轺者更难仆数。……路旁观者填街塞巷，不下十数万人。……柩至正福寺，葬于本会修士罗旋阁与冀若望之墓侧，有碑存焉。按孟主教系法国加奥尔府费若克郡人，距生于降生后一千八百七年洋历八月初二日。”

《西湾圣教源流》第五章《圣母圣心会底副主教驻节西湾子》第三节《南会祖怀仁执掌西湾子教务》载：

“一八六八年二月三日，我可敬的会祖由西湾子出发，往热河老虎沟堂口去。到了那里不幸卧病，且病势沉重，竟于二月二十三日逝世了。

“这噩耗报到西湾子，司铎和教友都心中焦灼了。因为他们在这二年内，都认识南主教底良善和爱德；信友们不止在堂里听过他底道理，在神工阁子里受过他底指引，还听过修道士传说，主教多么热心教导学生，屡次在他底屋里另外给那鲁笨修道生上课；且一年前即一八六七年，西湾子遭了荒年，教众都得过他施舍底哀矜，凡求他的，没有不得周济的。为此当时西湾子底会长们会议公决，要把南公底遗骸自老虎沟移来，到底那里教友反对，铎曹又行阻止，终未如意。至一九三一年，汤总会长（圣母圣心会底会首），令将体骸移至比国，安厝于南公立会底大堂里。”

第四节《司、韩二位副主教署理蒙古教务》载：

“南公往热河以前，把副主教底权柄，委于司牧灵司铎。……罗玛宗座后来也照准这继任的情节。

“郎司铎替南公执行会务。返回比国，也升了本会底会首。西湾子村就有司公为副主教，赵伯多禄司铎为本堂，吕司铎（R. T. Rutjes，以后为热河教区底代牧）为修道院底院长。”

1869年 同治八年

《教务纪略》卷四上《成案》辑：

7月某日（六月某日）广平府禀三口大臣《永年县民拆毁教堂十字架议结》称：

“……上年十二月间，法国鄂教士在广平府城价买高姓市宅未成，经前署府德成与署永年县王庶曾查有郡城南街久不存米废仓，租与该教士改建天主堂，房上设有十字架。乡愚无知，讹言久旱不雨系教堂十字架之故。本年四月初七日，乡民进城赴庙求雨，行抵该处，咸以天主教不崇奉神明，以致上千天和，祈祷无灵，纷聚瞻望。维时该武生魏长庆饮醉由彼经过，遂携锯上房，将十字架锯毁。乡民人等皆哄堂聚观。一时人多手杂，不知何人将家具等物砸毁。嗣闻该县飭差查拿，该乡民等即哄然而散。覆讯魏长庆，坚供实因误信传言，委无预谋纠约，亦无抢取什物情事。查此案教堂毁失物件已据该县查明

具禀,内有八音盒、洋枪等物,系该县往勘时堂内无人移存县库,业据送还教堂照收。其余什物,约计估需银一百两,责令赔偿。仍治魏长庆以违制之罪,饬学详革示惩。该教士与绅民人等均遵依完案。”

《馆藏义和团资料》^①辑:

10月20日(九月十七日),法国耶稣会士鄂尔璧^②移会^③广平府正堂长称:

“现据学宪按临贵府,各县文童于出场时有印板《入教明证》,未识系何人所发,各童俱有一张。又每逢三、八日期,在街宣讲圣谕,临散之时,逢人给发,其间均系毁辱传教之人。敝职奉教宗之命,航海九万里,来入中华,原以传教爱民为急务,凡施舍药料,抚育婴孩,设立义学等事。敝教行遍天下,从无伤损于人,何得以奸盗邪淫,如此欺辱?况又迭奉谕旨,准命盖堂传教,如果敝教果有不端,中华皇帝岂肯容留?何待奸徒作此异说?为此移会贵府,烦查文内事理,访查明确,究系何人造作伪词阻碍教务。并祈出示严禁。见复施行,须至移者。”

“计粘《入教明证》一纸。”

10月29日(九月二十六日)又致函广平府长称:

“弟现在曲周境内,教务羁身,未能亲诣贵署面议,故特作函奉达。前晤面时谈及清河县案情,已蒙批饬县主办理,至今并未完案。本月初三日团总王洛为等唆出宋朝宣、宋太贞、宋成相、宋官成、宋连珂、解景士、宋锡恩即宋芳策之子、王秀即王洛为胞侄、宋双鸡即宋洛凌胞侄率领百十余人,恃势聚众行凶,各持器械,村内喊嚷,冒辱天主教人等,先至教民宋修己家,骂打不堪,命在旦夕。又到教民解万祥家,解万祥见事不妥,恐致有伤性命,无奈藏匿粮食囤内,是以未致殒命。各教民家妇女、孩童跪倒齐声呼求,妇女皆被打伤,数处器物砸毁,衣服等项全行抢去,又不敢赴县喊控。曾闻县主有言,习教人来署喊冤禀呈,先责后问。论此情形,王法何在?习教人未犯条款,被害不敢归家安度,均都在外借居。似此逞凶恃强,县主不能为教民伸冤,自此以后教民更不能安度。伏思传教原系奉旨而来,无非劝人行善,奉教与不奉教一体相和,并无别意,伊等所办此事,实系抗违谕旨。弟既为教主,岂忍坐视?务祈阁下将全案人等提郡讯究,并恳亲讯。”

《西湾圣教源流》第五章《圣母圣心会底副主教驻节西湾子》第四节《司、韩二位副主教署理蒙古教务》载:

“一八六九年之冬,司公因要事调往比国。……韩默理司铎在西湾子代替司公二年的工夫,署理蒙古教务。”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章《天津教案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二、董主教逝世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初,董主教回到主教府中,梅慎思 Moscarella 及姜怀义二位神父患了伤寒症,主教亦被感染,但医生说他的病并不严重。数日后,他曾写信给一位同会士说:‘我曾染伤寒症,但已稍愈。’然而病势却重,他自己亦觉出来了。二月九日他写说:‘我将去世,当准备与孟主教为伍了。’次日为圣灰礼仪日,他愿意主持典礼,病势乃加重;二月十七日,他领了临终圣事,精神清晰,次日早晨九点,他安然逝世。”

1870年 同治九年

《馆藏义和团资料》辑:

1月29日(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鄂尔璧移会广平府正堂长称:

“敝堂前在永年县所属之刘汉村置买庄房一所,修盖天主堂,遣本堂执事人任太显往送银两,恐道

^① 此名不副其实。所辑内容为直隶东南教区耶稣会长鄂尔璧等于1869—1873年间给清朝有关地方官员的照会或信函。

^② 鄂尔璧(Gonnet Joseph 1815—1895),字若瑟,直隶东南教区第四、第六任耶稣会长,曾代理过主教。

^③ 清代各官司间互相知照之文,称为移会。外国传教士借用这种形式与官府互通文书。

途不靖，携带朴刀一把，以备防身。今于本日任太显由彼回城，骑着灰色骡马一匹，仍带朴刀行李。不料行至西乡距城十二三里之不识村名地方，陡出二百余人，采住发辮，揪下马来，肆行殴打，并捆送来县。及至堂讯，任太显据实供明，并求县主到本堂照会，而县主竟不察虚实，杖责一百，锁押班房。并闻将任太显衣裳剥去，所带各物亦均抢尽。国家立法，堂讯之时，原应审察虚实，况敝堂近在咫尺，又不照会，藐视敝堂。且迭奉谕旨，民教相安，不准稍有偏向。今县主似此办理，欺辱敝堂实甚。为此合移贵府，烦查文内事理应作何办理之处，见复施行。”

次日移会永年县正堂钱称：

“敝堂于本月二十七日遣执事人任太显赴刘汉村往送银两，因道途不靖，携带朴刀一把，以备防身，及回城时，行至西乡距城十二三里之地方，陡出多人，采住发辮，揪下马来，疑惑所致，并捆送来县一案。任太显实系安分良民，讯无不法情事，乡民实系怀疑。望祈贵县速即开释，并追出原带物件及马匹器械一并发还。望切施行。”

同日致函永年县钱修伯称：

“日昨面晤，深聆教言。……启者，敝堂任太显实系弟遣其出差，不期受此大累。今值过年之期，如在班房，弟心实有不妥，还望从宽令其出押，一俟应讯之时，必当专人送去，应作何办理之处，悉听尊裁。至于马匹，本无要紧，惟骡恋群不吃草料，亦望发还是祷。”

2月17日(正月十七日)鄂尔璧致函清河县赵称：

“兹者，去岁年底有王二庄魏学参将奉教人宋修己捆送，控伊讹借未遂，持刀谋命等情一案。弟曾迭次遣执事人前往伊村探听明白，实系詈骂敝教所致，于数日前弟亦亲至伊村访查无异。即命执事人往见团总王洛为、宋洛林，并原告魏学参及地方人等疏通，情愿息讼，两造仍归和好。私虽说妥，惟现在奉押。敬祈阁下格外施恩，从宽开释，俾得侍奉双目失明之老母，是所切祷。并祈即交与敝堂执事人带回魏村，弟再严行申斥，以免日后滋事。诸费清神，容俟晤谢。”

3月11日(二月初十日)鄂尔璧再移会永年县正堂钱称：

“前准大移，以敝堂任太显已经贵县讯明，虽无不法情事，惟骑马持刀迹涉可疑，致被北胡贾等村绅保董永太怀疑送案。兹准前因，除将任太显省释，同原带马匹等件一并交回，敝堂均已点收清楚。嗣后民教涉讼，还祈审察虚实，从公办理，如有可疑之处，并望随时照会，以便会同办理外，拟合备文移复。为此合移贵县，烦为知照施行。”

3月19日(二月十八日)教民赵吉庆拟就未呈稿^①称：

“肥乡县铁货铺为率领多众持械行凶，乞恩法究，以除凶暴而安良善事。窃身向在治下南街，开设六合顺铁货铺生理，奉天主教几及十年。今年正月初三日，有公盛长钱铺李占奎帖出侮辱天主教刊板《入教明证》一纸，其中言语均系詈骂教主鄂大人之词，看者甚众，互相毁谤。身系奉教之人，不忍坐视，遂于夜静时候，将帖撕去。不料于初四日晚间，李占奎率领伊弟李三、李九并不识姓名三四十人，执持器械，杜门大骂，势欲行凶。身见其人众多，未敢与较，且教主鄂大人正在清河一带传教，未经禀明，亦不敢擅控。今教主回郡，身即禀明，令身具呈。为此叩乞大老爷恩准，法究施行。”

同日鄂尔璧移会肥乡县正堂张称：

“今据贵治南街开设六合顺铁货铺之赵吉庆禀称：有伊对门开设公盛长钱铺之李占奎，于今正月初三日粘出《入教明证》一纸，其间均系侮辱敝教。赵吉庆于夜静时将帖撕去，不料李占奎率领伊弟并不识姓名多人，执持器械，杜门辱骂，势欲行凶。赵吉庆见势凶恶，未敢与较。伊等并声言此帖系曾制军所发。敝职即遣执事人六品顶戴金敏前往探询。及至见面，李三又声称系贵前任庆县主所发。李占奎等所言情节前后不符，如此侮辱行凶，藐视敝教实甚。前经迭奉谕旨，各府、州、县准令盖堂传教，不准稍有阻挠。今贵治李占奎等所粘《入教明证》，究系何人造作伪词阻挠教务，且诈言奉上所发，不得不讯问明确究系何人刊板，以便入奏。为此合移贵县，烦查文内事理，希即传案讯究，见复施行。”

^① 原注：此呈拟于二月十八日递，后因讲和未致成讼。

“计粘《入教明证》一纸。”

3月25日(二月二十四日)教民王洛曜、赵洛全呈邯郸县稿暨批文称:

“具呈王大漠、赵比成^①，邯郸县北张二庄人，为做伪图赖，朦朧县聪，叩宪亲提严究事。缘本年二月十五日，有民村头役王好善、地方王好义手拿告示四张，至民家内，声称伊等赴县点卯，县主当堂发给，不准村民入教，倘要投入天主教，按法国土匪办罪。民等因入教已久，目不识字，未知告示所书何语，将所给告示四张到天主堂找见教主，请示查看，并无印信朱标。教主令民等回家安业。十八日民等方至家内，头役王好善同地方王好义之子王春妮又到民等家内，民等向伊查问所给告示究竟系由何处发给，王好善又改称由刑房经书韩士太所给。民等因伊所说之话前后不对，知伊等朋谋吓诈，拉伊进城禀见县主。王好善等恐到案败露吓诈之计，不愿前往，乘空逃跑。于十九日不知王好善怎样将头做伤一处，捏称伊向民等催讨钱粮不给，将伊殴伤，赴县呈控。蒙县主将民等锁拘到案，堂讯时民等造呈，县主不看，惟以王好善等所禀抗粮不办等词为凭。民等少为分辩，各杖数百，并将手掌打裂，锁押班房。王好善等自此得意回村，又向村人教民孙思贵逼讨粮银。孙思贵因年景消疏，再三央缓，不允。王好善又称如你不封，亦要送官重处。孙思贵心中害怕，回家后愁急自尽身死，现有冯天庆可证。似此吓诈，假做伤痕，威逼人命，王章何在？现在韩长吉、孙永年被责，结气成病，不能起床，命在旦夕。情迫无奈，因此来禀，叩乞大人案下恩准，亲提严究施行。

“批：查此案业据该县暨委员查讯禀复。地方王好义系因催粮与你等口角，斗殴成讼，孙思贵死，由贫病交迫，短见轻生所致取，有该尸亲切实甘结，与传教均不相涉，是否该教民藉词牵砌耸渎，抑原查或有不实，候飭委干员前往会同该县秉公确查讯办，禀复察夺，该教民亦毋得狡执延讼，自贻讼累。”

同日鄂尔璧移会钦命分巡直隶大顺广兵备道钱称：

“前据邯郸县北张二庄奉教人王洛曜、赵洛全禀称‘于本月十五日地方王好义、保长王好善比卯^②回村，据云“太爷吩咐不准百姓奉教，如再奉教定要重处，并下发告示四张，各村地方概行发给”等语。身等思奉教之人，原系明奉谕旨，今太爷忽然禁止，未审何故，不敢不禀明大人察核’等情。据此，查此案前经迭奉谕旨，各府、州、县准令盖堂传教。今邯郸县主亦属大清国臣子，国家立法岂有不遵？今既抗违谕旨，殊非为臣之道。敝堂始闻，尚属不信，曾遣执事人六品顶戴金敏前往密查，不料果有此事，并探闻地方、保长已与奉教人成讼。为此合移贵道，烦查文内事理，希即转飭本府将此案提郡审办……”

“计粘原发《入教明证》一纸。”

3月27日(二月二十六日)邯郸北张二庄教民王洛曜、赵洛全呈稿^③称：

“为捏造异说侮辱教民，叩宪讯究，以安良善事。窃身等向奉天主教，于本月十五日，地方比卯回村，令身等不准奉教，如再奉教，太爷亦要重处，并奉下告示四张，等语。身等思奉教之人原系明奉谕旨，不准阻挠，今阅所发并无印信，何得称为告示？身等当即前往广平府禀明教主鄂大人，而大人因有急务未克分身，又命此事关系官长，细细访查。不料地方于十八日又说非太爷所发，是衙役所给。种种捏造，情难下咽。因此呈明，叩乞大老爷讯究施行。”

同日鄂尔璧移会钦加按察使銜补用道广平府正堂长称：

“前据邯郸县北张二庄奉教人王洛曜、赵洛全禀称‘于本月十五日地方王好义、保长王好善比卯回村，据云“太爷吩咐，不准百姓奉教，如再奉教定要重处，并下发告示四张，各村地方概行发给”等语。身等思奉教之人，原系明奉谕旨，今太爷忽然禁止，未审何故，不敢不禀明大人察核’等情。据此，查此案前经迭奉谕旨，各府、州、县准令盖堂传教。今邯郸县主亦属大清国臣子，国家立法岂有不遵？今既抗违谕旨，殊非为臣之道。敝堂始闻，尚属不信，曾遣执事人六品顶戴前往密查。不料果有此事，并探闻地方、保长已与奉教人成讼，除移本道外，于二月二十五日又闻县主已将奉教人凌虐待毙。今行移会贵

① 即王洛曜、赵洛全。

② 旧时地方衙门中差役的名簿叫《卯簿》。百姓有欠粮的，按卯簿派差役去催缴，如到期不缴，拘衙受刑，叫“比卯”。

③ 原注：此稿系二月二十日早给，未识何日递，地方王好义、保长王好善。

府，烦查文内事理，速将邯鄲县一案提郡严讯。究系何人捏造伪词，阻挠教务，研究明确，见复施行。其所造伪词，即与去岁所移无异，兹不再檄。”

4月2日(三月初三日)又移会称：

“同治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敝堂曾经移会邯鄲县主于比卯时当堂发给《人教明证》，以致地方王好义与奉教人成讼等情一案。不料地方王好义、保长王好善以催纳钱粮为名，将奉教人王大漠、赵比成、韩长吉、孙永年当堂重处，锁押班房。该地方等更为得意，复至本村遇孙思贵，并立刻封粮^①不可。孙思贵因年景荒疏，家中食用尚且不继，恳伊求缓。该地方等大肆狂言：如你不封，亦要送官重处。孙思贵见威逼甚惊，托言到家打算，自缢身亡。为此合移贵府，烦查文内事理，希将邯鄲北张二庄全寨克日提郡审办……”

4月28日(三月二十九日)再移会称：

“子明大兄大人阁下。敬启者，日前邯鄲之案，敝堂两次移会，多蒙屡费清神，即日委员前往审讯。地方王好义已供认伪告示系伊所给，而李公绝不问其所自来，吩咐地方好好催粮，包你无事。命案一层，有伊村刑书韩士太同王好义与尸亲儿媳串通，未经供认，亦作罢论。惟此案起衅之由，因伪告示阻挠教务而起，及至伊等口角，地方做伤，诬禀系由催粮所致。国家立法，地丁钱粮四月完半，十月全完，何得甫经开征，催呼如此紧急，况遇此凶年朝廷发帑救民之际？且案内赵毕成并无地亩，更施严刑，其非催粮已可概见。县主如此办理，侮辱敝堂，未免过甚。况又有命案相连，何能草草结案？还祈阁下将此全案提郡审办，不难水落石出，庶于民教交涉事件迅速持平办理，勿得故为轻重之谕旨相符。”

5月28日(四月二十八日)致函候补邯鄲县戴称：

“弟前在郡城，已悉阁下奉委赴邯鄲讯办北张二庄之案，本拟晋谒，因避嫌疑，故而中止。月之二十三日，在广邑境内晤金先生，谈及此案讯断周详，费神之至，足征高才隐微洞烛，非如李公之含糊结案，实深欣羨。弟本应亲诣清轩，面聆雅教，刻下滞迹威邑，教务羁身，容俟清厘，再图晤叙。”

6月13日(五月十八日)移会钦加升衔威县正堂溥称：

“前于同治七年，有贵治香花营村民赵志善、胞侄赵第六在魏村敝堂读书，所有饭食等项均系垫办。不料至七月间因赵第六骂人，将其戒饬三下，伊即逃跑。既不愿读书，亦听从其便，惟垫办饭食等项钱文，每日按京钱二百文核算，应归敝堂京钱四十馀千文。屡讨不偿，为此合移贵县，烦查文内事理，希将赵志善、赵第六传案，追还垫项。祷切施行。”

同日另一移文称：

“案据杨公平控刘宗尧、刘宗武指地作保借钱等情一案。刘宗尧实系安分良民，伊弟刘宗武素不务正，与杨公平合伙开赌，曾经敝堂将其责送至捕衙责处，有案可稽。后因亏空多端，以致逃跑，刘宗尧虽系胞兄，因宗武不务正业，不服管策，以致手足参商，并不管伊闲事。今敝堂暂将刘宗尧保住令其赶紧找寻宗武，一俟到家，即行送案，与杨公平质讯。为此合移贵县，烦查文内事理，希将原票暂行撤销，以免滋扰。一俟找获宗武，即行送案讯办施行。”

7月12日(六月十六日)移会钦命分巡直隶大顺广兵备道李称：

“同治九年六月十一日据广郡敝堂执事人面禀‘六月初九日二更时分，陡有匪徒十余人越南墙进院，各执器械，因见其势凶恶，身亦即越西墙而出，投奔前来禀明’等语，于六月十四日又有执事人禀称‘于六月十一日，广郡团练总局绅士武汝清带领团勇仍越南墙进院，开放大门，将堂内物件及梁檩木石抢掠一空。身见人数众多，不敢进堂查点，旋闻地方禀县，已将堂门封闭’等语禀诉前来。敝堂思邯鄲重地，若非绅士领头，何敢白日抢掠？应确切查明办理。为此合移贵道，烦查来文事理，希即转飭该府县查明办理……”

同日移会钦加升衔威县正堂溥称：

“同治九年六月十五日，有奉教人由城回家途中拾得给诸位团总一信，拆开查看，系‘定于本月十

^① 旧时称收农业税。

九日合团抄拿天主教’等语。前有同伙三人，一骑马匹。遂即查问。据称‘一系文生董洛益，一系文童王洛廷，住南新庄，在广郡连亭书院从武汝清读书。是晚住宿沙锡集店内，于十六日早向东北而去，走至魏村，有奉教人查问。据云武汝清与奉教人不对，常作匿名揭帖’等语。敝堂细阅信件，虽不敢具名，而其心叵测，万一至期滋事，关系非轻。为此合移贵县，烦查文内事理，祈为先事预防，免至临时掣肘。祷切望切施行。”

7月18日(六月二十二日)又移称：

“同治九年五月十八日，敝堂曾经移会贵治赵第六拖欠饭钱，屡讨不偿一案。今赵第六同母赵戴氏以年景荒歉，补偿无力，托人求缓，前来敝堂，忖度似系实在情形，已允其请。为此合移贵县，请烦查照文内事理，希将原票撤销，姑缓追还施行。”

7月某日(六月某日)移会钦加升衔肥乡县正堂张称：

“同治九年六月十三日，贵治东张寨张赵氏呈控夫弟张四洛鲁阻挠教务，不准念经，撕毁圣像，打落牙齿，并肆行毒殴等情一案。敝堂询问张四洛鲁系教民张文蔚之胞弟，素当地方，伊仗恃充役，屡次滋事，如不严惩禁止，其害非浅。为此合移贵县，烦查新颁上谕传教地方随时保护之意。希将张四洛鲁传唤到案，严究施行。”

8月26日(八月初二日)移会委员广平府永年县信稿称：

“兹者，广郡前次抢堂，维时有执事人田姓看守，不料于六月初十日二更时分，陡有匪徒共有十人由南面越墙进院，势甚凶恶，不敢与较。因思堂门业已关闭，亦即越西墙而出，托人送出南门，在东桥住宿，次日即至弟处面禀。十一日即率领多人抢掠，郡垣重地，匪徒如此猖獗，若无主使之谋画率领，何敢公然横行？且广郡抢堂非一次矣，有案可稽。弟非不知其人，窃愿冀其迁善改过。刻下既安心不息，屡滋事端，不得不揣其本。既蒙阁下拿获多名，由此研讯，不难水落石出。弟本应亲至郡垣，面聆雅教，缘因教务羁身，未遂鄙意，祈宽恕之。俟后讯有端倪，尚希赐复。弟当恭诣琴堂，快谈衷曲也。”

9月7日(八月十四日)信稿称：

“敬复者，顷奉璋章，如亲雅度。郡城敝堂滋事之犯已蒙拿获五名，实深心感之至。其应作何办理之处，国家立法自有定刑，非弟所敢私议。至于此次抢掳，业已禀明法国钦差，亦更不敢擅主。阁下定拟后，迅赐德音，弟当转禀钦差，谅无不遵雅意也。”

9月9日(八月十六日)移会钦加升衔肥乡县正堂张称：

“同治九年八月初九日，贵治郝刘寨地方郝五奎阻挠教务，侮辱敝堂，将教民靳学奎杀死。靳学奎之兄一时情急，误将郝二奎、郝三奎呈控在案。现在敝堂已询问确实，郝二奎、郝三奎虽系同堂念经，实不知情，靳学功呈控之后，方知与郝二奎、郝三奎无干，亦愧悔无极。为此合移贵县，烦查文内事理，希将郝五奎照例治罪外，并将无干之郝二奎、郝三奎释放施行。”

同日移会曲周县邹称：

“兹有贵治冀家庄奉教人张兰在城赶集，下馆吃饭。适有贵役田六旺者，侮辱敝教。张兰听闻，与其分辩，田六旺即率领不知姓名多人，与其殴打一次。张兰被屈，意欲递呈，恳请讯究。田六旺等又将伊殴打并索规费钱五千文。维时张兰无钱，不准回家，托兵书赵清秀作保，始得前来见弟，面禀此事。务祈阁下转饬该役，令其不要此项，以免滋事。有费清神，容当晤谢。”

9月12日(八月十九日)移会钦加升衔永年县正堂钱称：

“同治九年六月十一日，贵郡无知愚民复在敝堂滋事，细查进路，皆由两邻逾墙入院，以致堂内门窗墙垣损坏家俱并遗失各物。现经贵县酌给修偿，并追出失物，照单一并收清，滋事人犯照例治罪。嗣后愚民再有由墙而入者，惟该房主是问。希即传案具结附卷，如遇责任交卸时，祈将敝堂移交后任随时保护，免再滋生事端。祷切望切施行。”

11月1日(十月初十日)移会钦加升衔曲周县正堂邹称：

“同治九年十月初八日，据贵治李、岳等村奉教人面禀‘刘大寨会长贺敬曾被高振即高狗子诬扳为贼，业已拘案。恐受无辜之罪，是以禀明，求为保出’等情，前来敝堂。查高振即高狗子，前亦奉教，素不

务正,屢次训饬,怙恶不悛,敝堂早经弃绝。现在滋事,即祈贵县严行审讯,照例治罪。至妄扳贺敬曾为贼,实系诬陷。贺敬曾实系诚实良民,非特本村知为好人,即四外邻村亦知其良善。况家业足敷过度,何致为匪?推原诬扳之故,实因贺敬曾明饬其非,劝伊改过,以致成仇。为此移会贵县,烦查文内事理,希将贺敬曾释放,高振严办,如讯有贺敬曾不法情事,惟敝堂是问。”

11月30日(十一月初十日)移会元城县杨称:

兹者,日前敝堂失窃,当有执事人贺开单报案,并蒙阁下亲到敝堂查验。内有弟皮袍等物,却无要紧,惟执事人所失之棉被三条、棉褥一条、大夹袄一件、卧龙袋一件、小衫裤各一条、腰带、镶鞋、包袱等物,虽值钱不过二十馀千文,然伊等异常清苦,另置为难,还望费神比捕。如能追出原赃给领,非特伊等感泐隆恩,即弟亦佩云情于无既矣。”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十三《逐渐扩大》载:

“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十位仁爱会修女、两位司铎和几个信友(们)在天津被残杀。”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一章《北堂迁至西什库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十二、苏主教为浙江的宗座代牧

“……田主教 Delaplace 及苏主教 Guierry 同去参加梵蒂冈大公会议,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教廷谕文,将他们的教区互换。”

第十章《天津教案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二、董主教逝世

“……下面是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即董主教去世后一年,正定代牧区各府县的教友数字:

府	县	教友堂口	教友数字
正定府	一四	一四五	八九六〇
定州	三	一五	七九四
赵州	六	一二九	九七二九
顺德府	九	五〇	二一三二
共计	三二	三三九	二一六一五

“上文我们已经说过,咸丰六年(一八五六)时,正定府只有一万二千教友,散在一百廿二个地方。”

“三、戴主教继董主教的位

“戴济世主教 Tagliabue 于一八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于法国爱纳省公溪亚白地方……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六月十七日至中国;先在蒙古工作后调至江西,同治七年(一八六八)九月二十五日,被任为安若望主教 Baldus 的辅理主教;就任后,在祝圣前,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六月二十二日调至正定。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四月戴主教尚未受祝圣,及至正定,十一月十一日田嘉璧主教由北京至正定祝圣他。

“董主教的功绩,不在有三万望教者,而在发起皈依运动;他宣布了天主教有存在的权利,大家可公开地信奉它;他能在新教友中居住,能派遣神父代替自己。而害及传教成绩的,是他没有仔细研究请求作为望教者的目标,大多数是因为听说成为教友后,能得到世间的利益。董主教并没有寻求这事,但既有机会,他就利用了它。

“所以在董主教去世后,皈依运动就停止了。十年间,受洗教友的数字,并没有增加;但至少要保存已有的数字,为此必须培植新教友。

“这是戴主教的职务,他做得非常好。他先增加神父的住所。他说:‘我们必须分散,去使新领洗的成为真实的教友。’

“他就这样进行了;在城中只有几位神父,其余的都分往各村庄去。

“他所用的主要方法,并得到良好的成绩,是在主教座堂及主要教友堂口举行避静。许多人归正

了,教友的生活也改善了,为使多数教友能作避静,共有一千九百十一人作了避静。

“这是良好的方法,以后在这代牧区中,成为正常的事件,直至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中日战争时代。^①”

“八、天津的新教友区

“……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孟主教派邱若瑟神父至天津,设立一间小规模施药房,教友只有数十名,是由乡间来城中求生的。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邱神父去世后卫儒梅神父 Talmier 继他的位,暂住施药房内;他已买了望海楼土地,以便建立神父住所;并将准备安插仁爱会修女。

“孟主教由欧洲回来时,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七月十四日,以盛礼进入北京;他亦带了仁爱会修女同行,将五位留在天津。卫神父于七月二日接待她们,将她们带至邱神父的故居,加以修理,但修女只有必要的物件。她们至少须有三间不同的房屋:小堂、寝室、餐厅。连器具都缺少,五张椅子,必须依照日间不同的时间,由一间搬至另一间。

“修女乐意忍受物质的缺乏,但二星期后,她们却以无工作而烦恼。卫神父有意帮助她们,乃使女教友询问外教家庭,愿否出让太多的子女,她们抱了几个婴孩来。病院亦渐渐开始工作:一个患瘟疫的人来就医,她们整夜医治他,次日他痊愈后,回家告诉大家,修女如何医治他;于是渐渐有人送几个病人来就医。诊疗所更成功,大家来要各种疾病的药,一文不出;但大家对修女却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不久,卫神父去世,修女们非常哀伤。他是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八月十日平安去世。孟主教即派狄仁吉神父 Thierry 代替卫神父,任他为天津本堂。

“修女来后一二年,她们的事业有了基础,但地方太狭小,不能发展,乃买了一栋房屋,是在河边,离望海楼有二三公里。

“舆论似乎更为乐观,修女由一妇女陪同出城。某日,偶然走到附近村庄。一个仆人先去报信,说修女快来了,带着药品,医治患病儿童。于是妇女们携着她们患病的婴孩,修女乃去治疗;如有病重,不能治时,就暗中给他付洗,旁人不知这婴孩已可升天了。

“但修女惊奇孤儿院进步甚慢;教外人不知为什么外国修女要收婴孩,特别女孩。而为育养她们,须花大批的钱。全国谣言四起,说‘传教士刺儿童的眼睛、心肝,以作妙药’。这种谣言亦传至天津;有人相信它,有些人虽不相信,但猜疑西洋人具有不正常的目标^②。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底,狄神父调至北京,谢福音神父 Chrvrier 由蒙古来代替他,我们必须先介绍他,因为他是本案的主要人。

“谢神父年轻时性情不定。他于一八二一年八月十三日生于法国罗亚尔省圣哥大地方,他以为自己有升神父的圣召。他的叔父,是马谷的本堂神父,就教他读书,但因他的性情活泼,不喜坐冷板凳读书的生活,于是弃书就商。到达兵役年龄时,他投入海军,一八四二年他欢欢喜喜地至都隆军港,以为自己的使命是军队生活。但因为他是热心教友,不久,军队中放肆的生活使他不悦。后升为排长,须去圭亚那 Guyane,有机会与传教士接触;与他们交谈后,发觉自己失了圣召;他愈思索,愈懂清神父的生活是最美好,对社会是最有益的生活。

“服役完后,他回法国,至拉尚德小修院,读中学课程,然后在里昂城,读神职界当读的书籍;他有机会遇到亚尔热的巴罗主教;这位主教因为自己教区中神父稀少,来找圣召。

“谢氏勇毅大方,去见主教,愿意跟他去,立刻就被接受了。当时亚尔热的修院是在草创时期,为此缺少许多东西,不能度读书的安适生活;但谢修士喜欢这种严格而多变化的生活;他读了一切当读的

^① 原注:见孟爱理神父 Morelli 著《正定代牧区历史》

^② “1860年以后天主教士设立大批孤儿院。”“这项最主要的天主教慈善事业的宗教根据是出于这种信仰:如果婴儿在洗礼以后不久死去,就能保证他们的灵魂得到拯救。如果一个孤儿没有死去,当然他便在基督教氛围中由修女抚养长大。据说孤儿院有时也接受贫苦母亲的婴儿,稍微给一点钱作为交换,在十九世纪末笼罩于中国许多地区的不安定的情况下。虽然这种机构有着明显的必要,但是它们广泛被中国人误会,成为民众排外情绪的主要焦点。”(《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98—599页)。

书后，一八五四年升神父，被派至亚热尔附近乡村中传教，谢神父找到了他的活动生活了。

“但他谦虚为怀，不喜欢这种自作主张的生活，他愿意弃绝自己，完全将自己献给天主及人灵。一日他听说遣使会士在波斯和中国的工作，他乃写信给总会长，请求入会；总会长考察后，就收了他。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谢神父进了遣使会的初学院后，被派至中国，他于咸丰十年（一八六〇）二月十七日抵达数月后，被调至蒙古，在孟主教权下；他虽年已不惑，仍如青年神父一样工作，但他已有人生经验；为此与别位同会士离开蒙古时，自然恋恋不舍；然而他将来传教的工作是同样伟大，而以传教士最能期望的死亡结束了它。

“他尽心管理仁爱会修女及她们的事外，他亦是天津国籍及客籍教友的本堂；他也是总本堂，要管理好几县；直接负责人是他蒙古的同事吴文生，及昔日的喇嘛冯伯多禄神父。他还是遣使会全中国的账房。

“他住在望海楼，离法国领事馆不远，狄神父曾造了一座小堂，但谢神父至天津的最初数月，就有意造一座大堂；他在想像中已看到二河交流处，圣堂高耸，四方远近皆可望见。他得以实现他的幻想：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五月十六日，苏风文主教 Guierry 行了奠基石礼。

“谢神父就尽力以赴，勇往直前，不怕冒险。在他明智领导之下，仁爱会修女的事业凌云而直上；同时在无数困难中，望教者的数字亦在增加。许多次他在外教人及官员前保护他的教友；他至衙门内找他们，陈述事实，辩论，屡次他使教友胜利。

“仁爱会修女不管民间猜疑，继续作各种慈善事业，她们的人数增加了一半；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初，她们一共十位。

“谢神父因事繁劳心，乃恳求他的朋友吴文生神父至天津帮助他，他达到了目的，自此他有更多时间，训诲他的望教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他的总堂内有二千望教者，散在六十处；前途似乎如锦。”

“九、屠杀的前奏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老百姓中谣言又起，说修女偷婴孩，然后将他们杀害，用他们的眼睛及心肝来做妙药；这次不但愚民信从这种妄言，连上等社会人亦受其影响；以前修女因作各种慈善事业，到处受人欢迎，现在却各处只遇到冷眼怒目，有时居然侮辱她们。

“为明智起见，修女已不至人家中看病了，但诬妄却日益增加，居然举出事实，于是有人信以为真。竟将医院及孤儿院坟墓中的死尸加以研究，说已没有心肝及眼睛了。

“城中官员知道这一切，他们不但不平息这类谣言，反而因他们的容忍，似乎在鼓励它。

“法国领事丰大业 Fontanier，本能够来使中国官员保护天津的西洋人，如条约所规定的；但没有先见之明，他不以为危险即在眼前，且认为不久就会云散雾消像过去很多次一样。虽然谢神父及俄国领事屡次警告他，丰领事仍旧固执己见，以为没有危险。谢神父看出危机日甚一日，乃恳求领事在中国官方说情，领事反大怒，禁止谢神父再到领事馆。

“仁爱会修女想作最后的努力，使丰领事恍然大悟，但他仍然执迷不从，以为还不到行动的时期。

“六月二十日晚间，法国使馆翻译多玛生夫妇，由欧洲抵天津，急欲去北京。有人请他在租界过夜，他乃在法国领事馆过夜。

“法国领事馆离望海楼谢神父的圣母得胜堂只几步路。租界在城东南部，离望海楼二公里在河右边。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亦在望海楼临近，在法国领事馆对面。崇厚并不如其他官员仇恨外人，亦不相信对修女的谣言，但他不愿失去人心，所以不敢有所作为。

“乱民已决定次日焚烧天主堂，屠杀传教士，是一个在暗中煽动人民者所决定的，这人名叫陈国瑞，他以先是绿林出身，出卖了他的同伴，表面上臣服朝廷，乃获任提督。

“他在南方以仇恨西洋人而著名；他由南京北上，一路分发传单，表示反抗西洋人，尤其反对天津的西洋人。抵天津后，他竭力鼓励官员仇恨西洋人，激动人民暴动，而成为当时的主人翁。”

“十、十二位神父，十位仁爱修女，九位西洋人及四位中国人与十二名儿童被杀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六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听见在街上铜锣大鸣，这是叫人集会，暴徒就涌往得

胜圣母堂。知府与知县至堂中搜抄，谢神父伴同他们视察各处，一无所获；二人回来，没有说一句话以平息聚在河边等候命令、涌往天主堂的群众。

“谢神父与通商大臣崇厚素有交谊，于是与吴文生神父到他那里，请他保护，出一告示，发表刚刚搜抄的成绩，并采取治安必要的步骤；他们回来时，并未受到群众的扰乱，谢神父乃利用暂时平静，开始念日课。

“领事听到乱民的喧哗，以为到了行动的时候了，乃急遣他的秘书西满及一位中国文人至通商大臣崇厚处，请他派重兵来保护，崇厚只派三名警官及数名警员。领事见了，呼说：‘怎么，我要求军队，他只派几名警员？’乃大发雷霆，将他们打发回去。

“时已午后，C神父^①正与吴文生神父用膳，忽然城内四面锣声大作，救火队员、捣乱份子手执刀剑，向圣堂冲来。一位骑士由许多随从人护卫着，在人群中出现，大受欢迎，他指向领事馆及天主堂；他就是提督陈国瑞。

“法国领事觉得事情危急，乃决定克服困难，手中拿着手枪，他的秘书亦穿军装，佩着武器，由领事馆旁门走出，至近在咫尺的通商大臣衙门，请崇厚派军队保护。崇厚说自己无法能使乱民息怒，并且不能救传教士的生命，但坚请丰大业不要离开自己的衙门：‘在这里，我保护你的生命，我死后你才会被害。’领事关心自己的客人多玛[生]夫妇及应负责保护的天主堂，胜于自己的生命，不接受崇厚的建议，乃与西满走出，正遇到知县刘杰，丰大业请他平息暴民，知县答说：‘这不是我的事。’于是领事开枪，未中，误中佣人，重伤倒下。群众乃高呼说：‘他杀我们，我们亦杀他！’

“二人挥动着宝剑，但不久即为矛所刺，他们还有力量逃至领事馆，浑身是血，跌倒在地，时为二点。

“群众涌至天主堂前。此时二百余名凶手冲过群众，来至堂门前，门紧闭，乃用力敲门。门将破，谢神父决定自己去开门，与群众理论。他们看见神父温良可亲，最初犹豫不知所措，但他一开口说话，群众就进入庭中大呼；谢神父与吴文生一同逃至圣堂中，将门关上，彼此念《赦罪经》。一门被用武力推开，二人乃逃至更衣所，由窗门跳入领事馆，藏在大石后边，多玛生夫妇已先躲在此处；凶手追至，将二位神父杀害，然后抢掠领事馆及天主堂，洗劫一空，最后纵火焚烧。

“凶手的计划颇为详尽，不枉费光阴；他们乃渡过陈国瑞亲自把守的大河，至天主堂南面五六百公尺的仁爱会修女仁慈堂去。

“不久，凶手就攻破各门，杀了十位修女，将房屋付之一炬；十几位婴孩被熏死，年龄较大的被带至知县处，说是拯救她们。

“为寻找修女罪恶的证据，他们剖解死尸；三点钟时，婴儿院被毁。

“还有别的人亦同遇害：法国商人沙梅松 Chalmaison 听说修女有危险，就去帮助她们，在路上被害；他的夫人装成中国女子，冒险去取她丈夫的死尸，在街上亦为人所杀。西洋人中，三位俄人，由租界回来，也被军队及巡警所害。三四位中国人遇难，许多人受伤。

“第二日，官员开始忧虑这事的后果，通商大臣应许用军队保护租界中的西洋人，这已太晚了。英国领事以棺材将被害者暂时葬在英国公墓中。

“为北京教区是一难题：代牧苏凤文主教 Guierry 在罗马参加梵蒂冈大公会议，天津的唯一西洋神父已被害，谁将负责办理这案件呢？七月十五日北京的二位神父樊国梁 Favier 及董文学 Addosio 与法国代办同至天津，与地方长官商议赔偿事项。

“事件棘手：因为这案件正发生在普法交战时，法国大败，所以不能要求相当的赔偿。但大家同意，将遇害者葬在法国领事馆，八月三日改葬；前日，将棺材由英国公墓运至圣母得胜堂，因为没有完全被烧了；次日，租界中的全部法国人都来参加葬礼，河的两岸，人山人海。狄仁吉神父 Thierry 主持奉安礼，并讲了几句道理。

^① 即 Chrvrier 谢福音。

“必须等北京教区新的领袖上任后，再解决这案件。”

“十一、田主教任北京代牧

“……田嘉璧主教 Delaplace 在参与梵蒂冈大公会议时，得到由浙江调至北京的消息。教宗不能舛错的教条宣布后，他一知道天津的案件，就迅速回中国；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十一月一日他进了北京。

“他当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乃赔款问题：清廷已给法国代办一批款子，为赔偿教会所受的损失；另一批款子是为被害的人。田主教对他不在时所进行的案件，当表示他的意见；他给法国代办写了一封信，可以表示他的性格的高尚。

“他先说在天津的不幸案件中，他注意到三件事：一、凶杀罪；二、对一切西洋人，尤其法国人及天主教传教士的凌辱；三、天津传教事业受了重大的损失。罪当惩罚与我无关，是公使及中国朝廷的事。至于赔偿凌辱，我不但有权，并有责任要求郑重的永久的赔偿，使将来我们的事业得享平安；我希望以皇上的谕旨，立一纪念碑，斥责屠杀人及拥护人。

“至于赔款，我们接受，作为恢复我们房屋的费用，只要实行我们的条件；环境若不太平，我们不愿再行建筑。

“我们绝对不接受对人生命的赔款，我们不愿接受血价；主要原因，是传教士或修女为传教献出他们的工作、血汗、性命，是为奉献，而不是为出卖。

“中国朝廷不愿认错，所以交涉甚久而无结果；数位官员被撤职或调职；二十几位犯人，代替了真罪人，被执行死刑。

“田主教不愿修理圣堂，但因必须顾及天津客籍及中国教友的需要，他用赔款在法国租界中造了一座圣堂。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还没有过去，圣堂已造好了；奉法王圣类思为主保。

“修女亦克制了他们的忧虑，毫不迟缓，来天津代替十位殉教的同伴。但孤儿院容易被人误解，乃决定设一座医院。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田主教将她们送往医院服务。

“传教士也设法将逃散的教友重新聚集拢来，使他们依赖天主，坚定信心，冯伯铎神父在这事上格外努力。”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旒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孟主教卒后，传教士等谨步芳武，不敢怠荒。复于京外各处起建大堂多所。畿南霸州高家庄，距京一百八十馀里，起建一所，名圣伯多禄堂；宣化府城内起建一所，名十字圣架堂；又于天津起建一所，名圣母胜后堂，较他处之堂尤形轮奂。先是，法国使臣请于孟主教，欲将堂基东首之房院让出一半，以为法国领事官署之用，孟主教依请，法领事丰大业即迁居其内。然则此堂建于法国旗麾之下，与法国保护中华传教之义，讵非相宜之尤者耶？”

“同治八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天津大堂告竣，有主教率同领事官与津属各员虔行祝圣大堂之礼。孰料不数月后，鸟革翬飞者竟为灰烬耶！今将天津焚堂之事略述如左。

“天津大堂告竣祝圣后，有本会华法二修士在内主持，一名矢弗列，华名谢福音，乃法国吕多农府人。距生于降生后一千八百二十一年洋历八月十三日，及长，从军美洲，旋升武职。后弃官归隐，力攻圣教格物超性诸学，升授神品，往阿洲公斯当第诺城，充当本堂司铎。降生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洋历（二十）[十二]月二十二日入遣使会，次年洋历八月十二日辞国来华。先在塞外传教，至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教皇特派比国新创之圣母无玷圣心会修士专理蒙古教务，谢福音遂入塞进京。至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升为天津总理司铎。四年之中为主贤劳，兼之和于接人、智于处事，人皆乐与之游。其辅助之中国会友吴姓，圣名味增爵，系广东人，与谢福音同年。先在澳门攻书，入遣使会，升神品后，上司差往塞外传教，二十年之久，始终如一，诚才德兼优之士也。故上司等俱器重之。

“谢、吴二修士在津传教，大著成效，向化人教者甚多。至同治九年，降生后一千八百七十年，洋历五月间，天津地面有匪徒迷拐幼孩，津民疑为传教士主使，于是流言四起，以为仁慈贞女收养孤儿幼

女，专为剜眼剖心、炮制洋药之用。洋历六月初四日，有土匪多人乘机聚众滋闹，擅往仁慈堂空地掘发孩墓，以验虚实。掘出孩棺十数口，孩因掩埋多时，仅存毛骨，匪辈遂谓仁慈贞女剜眼剖心属实，因皆忿恨不平。再孩墓旁原有故法员若理之冢，覆以西式卧碑，碑上镌有十字圣号及故员之职衔姓名，匪等并击碎其碑。依中国律，掘墓发冢，情罪至重；况此次土匪所为尤为狂悖。传教士呈诉于官，官竟不为理论。故匪棍恣肆，益无底止。兹后半月之内，棍徒与匪民不时结伙滋闹，欺虐过往之洋人，复多布散流言，喊杀之声时闻街巷。教民见事危急，往诉谢司铎。谢司铎复将其事告知法领事丰大业。领事以为传教士与仁慈贞女十馀年来济贫医病，津人莫不感颂，相安无事，故谓不必惶惑，是以置之不问。孰知惨祸之至竟在目前耶？

“洋历六月二十日，复有棍徒多人聚于天主堂与领事署前，向院中抛掷砖石，汹汹辱骂，至暮而散。次早二十一日辰刻，忽闻鸣锣之声，凶徒四集，官兵与水火会相继而至，明无好意；群众复飞砖石投击户牖，杀戮焚掠之变势将不免。时有天津府张光藻、天津县刘傑乘舆至堂，名为弹压变乱，实则查勘教堂，以激民心。谢司铎迎二员入内，令遍视各处。二员查验访问，自言毫无不合情事，查毕而出。此时二员倘将传教士无辜之处晓谕百姓，自可解散众心，免生大变；而二员竟一言不发，任其鼓噪，升舆而去。二员来堂查验，丰大业始知事急，特着本爵服色往晤通商大臣崇厚，促其派兵弹压。崇厚谓巨变已成，人力难施。惟令暂匿署中，可保无虞。丰大业叱曰：‘公等华员，遇事退缩可矣；吾乃大法国命吏，何能惧死而隐匿为哉？’言罢辞出。有领署司库官西蒙相随。后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奏，谓丰大业在崇厚署中施放洋枪，自是访问未周，实则并无其事。当时崇厚署中，扎有洋枪队数百名，只须一言，即可保存教堂、法署，而崇厚竟坐视不救。丰大业出署，自知不免，即偕司库西蒙向本署疾驰，满望死于本位，以昭殉国殉职之义。于是二人各执枪械，直突变民，夺路而行。及近天主堂门首，二人已被飞砖击伤头面，几不能立，乃复勉强而前。适遇天津县刘傑查堂而出，丰大业诘之曰：‘乱民伤吾，曷不相救？’刘傑曰：‘不干吾事。’丰大业愤极，始向刘傑施放一枪，误中随役。凶徒闻枪声，惊退数步，丰大业复举枪而前，喝曰：‘当吾者死。’司库西蒙亦掣佩剑在前开路。及至本署，见凶徒已在署中。先是前数日，有驻京法使副员多玛三携眷至津，暂寓领署，于凶徒围署时执枪独立门中二点钟许，凶徒不敢向前。其妻不忍逃避，立于署中假山之旁，距夫数步。适有顽童，年止十五上下，飞一砖，击伤多玛三之颅额。多玛三不屑用枪还击，乃手批其颊。众凶徒见其暂离门阙，遂乘间抢入署中，先将其妻杀死。多玛三奔救时，已被多伤，不能支持，倒于妻侧而死。同时天主堂院中亦被凶徒攻破。谢、吴二司铎避入圣堂中，将堂门紧闭，互行解罪之礼。其馀仆夫俱越墙而逃。凶徒复将门撞开。二司铎由更衣所之后牖跃入领署，正遇凶徒屠杀多玛三夫妇，即将二司铎一并杀死。少顷，丰大业与西蒙入署，甫至假山下，亦被杀死。是六人皆死于法国领事署中也。丰大业头面被刀劈裂，脑浆迸流，复被长枪匕首刺穿右肋，锋镞深入于腹。西蒙与凶徒力战逾时，浑身寸磔。多玛三夫妇俱砍为齑。谢、吴二司铎被凶徒剖开胸腹，脏腑尽涂于地。凶徒等见六人俱死，即褫其衣履，将尸抛于三岔河中^①。复将领署与天主堂抢掠一空，举火焚毁。不一时，两院房楼俱成灰烬，仅馀墙壁。惟堂顶之镀金十字，因钟楼梯焚断，凶徒未得拽下。

“按此次匪徒逞凶，事事俱预筹妥，明系官府暗地主使，为利所饵。故于焚烧天主堂后，即径往仁慈堂，再行杀戮，时方未初。按仁慈堂坐落运河之南，欲至其处，必须先由通商大臣署前之浮桥渡河。若将浮桥拽起，则无人可渡。此时凶徒欲渡，有劣绅陈国瑞乘马立于桥上，不令拽桥。待凶徒尽渡，始扬鞭而去。则知焚堂一事显系官匪密约，尚何疑哉？至乱民等鼓噪狂呼者固属不少，而持械杀戮者不过二百余人，皆以烟煤石灰涂面，使人不识。是时酒醉醺醺，齐向仁慈堂虎吼而奔。贞女等于凶徒焚掠天主堂时无人送信，惟见彼处火焰漫天，十分惊疑；又见本堂附近之各铺，不知何处传来谕令，同时纷纷关闭。贞女等自知大难将近，无人救护，惟一心依托上主，预备为主致命。于是率领男女孤孩齐入小堂。又恐凶徒亵渎圣物，故先将圣体自行领讫，安心等候。不移时凶徒蜂拥而至，砍开大门，杀入院内。贞女等出堂迎难。女院长名玛尔盖，向前谓凶徒曰：‘汝曹欲何为乎？吾等行善救苦，不曾害人，倘欲杀吾，’

^① 原随文注：即漕运入北河处，水深四五丈。领署与天主堂俱在河岸。

不可杀吾孤幼。’言未毕，已被一凶徒砍裂顶门而死。其他六人卫护院长，俱被长枪刺死，砍为数段。其第八名方由更衣所出，亦被杀于庑下。尚余二名，身冒白刃，极力护救幼孩，方将孩等藏于小堂下之地窖，凶徒适至，一并杀之，而弃尸火中。凶徒尽杀贞女，恨犹未息，不即抛之河中，而惨戮其尸，个个剁为肉块，又以枪尖高挑肉块，狂呼大笑，随即投入火中焚化。又有二贞女既杀之后，凶徒与兵勇用长矛二杆各穿一尸，列于大门两旁，以示震慑。凶徒之残恶，可谓极矣。凶徒恣杀贞女，无意伤害幼孩，俱由地窖喝出，令老姬数人携至县中。其尤稚者数孩，不知躲闪，俱被火烟闷死于窖中。凶徒见无可掠之物，遂纵火焚其房院而去。

“时有法国富商名沙尔迈松，携妻某氏，寓于仁慈堂之近处。忽见火起，即飞奔来救。行至半途，被凶徒杀死。其妻当时幸得脱逃。及至天暮，有人见其亦被杀于土桥之下。凶徒又杀俄人三名。后中员向俄谢罪，明言无意杀害俄人，乃误为法人而杀之是也。噫。

“大堂、领署与仁慈堂即焚，有人昼夜送信至京。次日乃洋六月二十二日。在京传教士闻知其事，初犹未信。后递信者接踵而至，始知是实，不胜惊异愁苦之至。洋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居民亦思滋扰，时有莠民土棍聚于北天主堂前。有代主教权之大司铎狄仁吉者，寄书法使，细述情形。星使当即照会恭亲王，请为弹压。恭亲王照覆，谓‘在京之传教士与仁慈贞女俱可照常安居，一切事宜，本王大臣一力承管，保无滋闹情事’等语。恭亲王即命于北天主堂及仁慈堂近处，添派兵丁，昼夜梭巡，莠民始畏惧而散。天津巨变酿成，西国犹未知也。此时中国邮电局犹未设立，驿站不易寄信。惟俄属之恰克图有电通欧，由北京至恰克图电致巴黎，必须十六七日之久。设于失事之洋六月二十二日由京寄电，必待洋七月初十日始可抵法。幸有英国信船于洋七月初一日由津西归，乃得付手信而去。凶徒焚堂之日，法国兵船在北河者只有一艘，事起时飞驰上海乞援。不数日即来炮船多只，泊于北河，以便相机行事。洋七月十二日，法使臣罗淑雅欲亲身往津勘验，偕同司铎二名，由漕运乘舟至津，两岸有官兵数百沿途护送。十五日午正抵津。使臣先往晤会通商大臣崇厚，归后寓紫竹林法租界之客旅。至十八日，使臣请二司铎亲往失事处查验焚杀情形，以便详细呈报。司铎等偕新授天津县正堂马某，与同(察)[倭]多员启行前往，途中时有头二三品大员接送，反央传教士妥为周旋，勿令法国炮船轰击津城。仁慈堂距紫竹林租界不远，二传教士先赴其处查验，见院中什物器具俱被抢劫一空。垣屋颓圮，惟见衣片孩履狼籍其间。小堂中圣像圣龕皆被凶徒打碎，挥掷满地。又见有赭色泥片多块蹂躏泥中，明系仁慈贞女之血和土焚结而成，观之不胜酸楚。二司铎查毕，复往望海楼查验领署与天主堂。因观者甚众，街填巷塞，不得前行，故觅小舟而行。及查验时，见此二处亦皆焚烧之余，然视仁慈堂之惨况，尚属较轻。大堂虽亦被火，然犹屹立未颓，惟堂脊与楹柱焚毁无存。堂之两壁有被焚裂缝者，而堂之正面则宛然如故。且领署中零星什物亦寻获多件，内有领署信印一颗，犹完整未坏。

“二司铎验毕，复乘舟回紫竹林，将三处焚掠杀戮情形详细开明，呈罗钦使。钦使即将所呈寄往欧洲。次日二司铎往县狱中查点婴孩。官府将一税局之房院权借与传教士，以居婴众。又次日洋历七月二十日，传教士将婴孩等以二舟载之送往税局安插。按仁慈贞女等抚育之男女婴孩计一百二十名，于鼎沸时被民间窃去数十名，当下归还者只八十余名，迨五六月后始得一一索还。除尤稚者十一二名被烟熏死外，余皆得寻获，即派女教友数名管理，官府亦派兵丁在大门外把守，不许闲人入内。传教士又置二猛犬于大门内，以防不虞。上海洋船泊于北河者，有英国炮船二艘，法国炮船五艘。天津各员恐其轰击津城，俱(惶惶)[仓皇]无措。又有法国兵舰一艘，因船大不得至津，泊于大沽，其舰官名肋瓦肋，将舰上劲旅带来一支，又载巨炮数尊，以备登岸之用。各船将官兵兵无不奋勇争先，急欲开仗。惟钦使等方主和议，不准冒昧启衅。和议第一款即是索偿焚掠损失之物，朝廷立时允诺。第二款须天津府张光藻、天津县刘傑抵偿性命，朝廷执意不允。罗钦使勒以决书，朝廷仍力拒不允，惟将二员革职充军，钦使只得俯就。未几，二员由军台潜归，即于他处照前服职，钦使无如之何。至凶徒等犯，官府惟枷号数名，逾时即行释放。又有二十名，罪应拟抵立决，闻系官将秋后处斩之犯由狱中如数提出，许以安家银五百两，花棺一口，令其顶名就死，囚等无不乐从，当即斩讫。事毕，罗钦使会同修士等高议殡葬仁慈贞女事宜，即将领署与天主堂院作为茔地。先是，于失事后，修士等至津，将惨死诸人权且殓以薄槨，寄埋于英

国茔地。兹于洋八月初二日，由英茔起出，以便照礼殡葬。又前于失事之次日，即洋六月二十二日，有德国兵轮泊于紫竹林之南岸，洋人等闻凶徒将丰领事与传教士等抛入河中，恐失其尸，即于船旁布一大网。后数日，尸皆漂入网中。见领事官丰大业头焦额烂，不可复识。惟衣袖绣有姓名，始得辨认。司库西蒙尸尚完整。其多玛三夫妇与谢、吴二传教士，俱砍为数段。当即买换宽大新棺，将六人连薄椽装入棺内，覆以黑白殓罩，载之小舟，系于二炮船尾，拖至望海楼。通商大臣崇厚与道府各员，早在其处伺候。罗钦使依西俗对众宣词，法水师提督与代主教权之大司铎狄仁吉亦各抒所怀，率皆挽亡之意。词毕，狄仁吉祝圣奄筭，即将各棺掩埋。近河南首右边，法领事丰大业一棺一墓，多玛三夫妇二棺一墓，富商沙尔味松夫妇二棺一墓，领署司库西蒙一棺一墓；北首左边，谢司铎一棺一墓，吴司铎一棺一墓，四贞女四棺二墓，其他六贞女竟是一棺一墓。缘贞女惨死者共计十名，四名头颅完整尚可辨认，续以砍散之肢，姑成四人完尸；其他六名只馀残骨碎肉，无从辨认，只得收贮一棺。噫，十人遗躯，惟此而已。兹列其姓名如左：

- 第一名，院长，姓玛尔盖，名玛利亚德肋撒，系比国人。
- 第二名，姓未禾来，名玛利亚保理纳，系法国人。
- 第三名，姓安德里天尼，名玛利亚各罗林大，系意大利人。
- 第四名，姓阿当，名玛利亚若瑟拂，系比国人。
- 第五名，姓巴未雍，名玛利亚亚纳，系法国人。
- 第六名，姓肋各辣，名亚美利亚加罗里纳，系法国人。
- 第七名，姓克辣勿兰，名玛利亚赛辣斐纳，系法国人。
- 第八名，姓弟列，名玛利亚亚纳诺爱弥，系法国人。
- 第九名，姓肋女，名玛利亚安日里克，系法国人。
- 第十名，姓奥稣里完，名亚里斯，系英国人。

“洋历八月初四日，殡葬惨死诸人一律完讫，修士等将返紫竹林休息，罗钦使召之船上，密谓之曰：‘现今德国与我国开战，特此告知。’”

“按德法开战之信，曾于洋历七月十九日由法国电寄英国信船。管驾官力未顿之信船于十六日后抵津，即洋历八月初四日也。据此，则办理天津变案，俱在德法开战之先，而修士不知也。事毕，罗钦使即回京驻扎本署。”

“时浙江主教田垒思奉教皇旨升为北京主教，适于是年洋历十月由罗马大公议东归。抵京后，查明天津变乱始末，于次年降生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洋历正月初三日函致罗钦使，谓‘传教士与仁慈贞女惨死，教堂应得之恤款，本主教不敢承领，以其有鬻尸之嫌也。惟领焚毁堂所之赔款，以备重修’等语，钦使深服其见。”

“今欲知天津致变之由，则有人曰：‘仁慈贞女皆是西洋之人，不谙中国风俗，作事难免冒昧，自招其祸，抑或有之。’不知仁慈堂自创建以来已经八年之久，天津人民皆知贞女等悯灾救急之慈，无不敬服。贞女等不时乘车外出，公然行于街市，所至甚远，从无欺凌侮蔑之事。今竟忽成大变，岂尽百姓之过欤？又有人曰：‘购买孤孩，其义不能无疑。’不知所收孤孩并非购买而来，只因孩等父母往往失其天性，将新生婴儿忍心委之沟壑，偶有未死者，人或拾归，送至仁慈堂收养，以活其命。且送孩者必须立契签押，始肯收留，何得诬为别有所图耶？又有人曰：‘贞女等收养孤孩，原为挖眼剖心，配制迷药。中国之人群起攻之，势所必然，何足怪哉？’不知此等谰语皆系有心播造之流言。天津之变，正系流言所致。凶徒等欲证其言之不谬，于焚掠之际，于地窖中搜得二瓶，特呈崇厚验视，具言瓶内所盛皆系婴儿目珠。崇厚开验，见瓶中所盛者，原系西产之圆头葱，腌收以供菹品者也。观者无不绝倒。然而流言之布并非无故也。各国与中国互换和约，惟法国人先教而后商，故官吏乡绅忌之尤甚。即如此次津民为乱，并非变起仓猝，乃处心积虑，预经筹划者也。试观所焚者，法国领署与天主堂也；所杀者，法国领事与随员也，法国传教士与法国贞女也；摧搥蹂践而投诸河者，法国之旗帜也。杀之之故，以其保护传教也。至

杀人之凶徒，皆重赏雇觅之人也。文武各员，片言可弭其祸，乃竟拥兵坐视，非专仇法国与天主教，预经筹定而何？”

《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一部分《郎怀仁主教时期(1864年至1878年)》第一章《教区概况》载：

“二、从1869年至1875年的教难

“……几个月来，控告、诬蔑外国传教士的各种罪行的肮脏小册子已散遍了长江流域。小册子中特别诬蔑当时早已建立、为各教区特别关切的育婴事业。小册子胡说传教士及其本地助手们是偷小孩的拐子。他们所以如此热心收养舍弃的孩子，为的是杀害孩子，挖出他们的眼睛、心、脑子，用以施行邪术^①。

“这些荒谬无稽之谈，连广为散布的文人们自己也未必相信，可是盲目的群众却信以为真，因此激起了公愤，造成了暴乱，使中国各教区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罪责应当由一批文人承担。……由于教区常常能胜利地抵制那些文人们的挑衅，因此就更增长了许多考生和低级官员的复仇狂。在南京，就出现了一个反传教士运动的头面人物——陈国瑞^②。

“陈国瑞的家庭出身不明，只知他年青时就当兵。他追随鞑靼名将僧格林沁，不久成了他的螟蛉子。僧格林沁是1860年大沽和八里桥战役的败将。……1870年4月，陈国瑞来到南京，不遗余力地策划攻击洋人。他和藩台梅启照很友好。当梅担任通州知州时，因虐待属下教友，梅德尔神父与敏体尼领事乘了法国炮舰前往通州逼他订了城下之盟，此举梅启照当然不会忘掉。于是每天从藩台衙门发出大批小册子，其内容即传教士杀小孩的骇人新闻。……陈国瑞雇用的士兵还手擎木牌，牌上贴有红纸，写着煽动仇恨洋人的招贴，纸扇上还贴有鸡毛，表示十万火急……

“在小店里，茶馆里，木牌招贴的擎持者向人们诵读、讲解木板上这些煽动性的标语。时间选得极好，因当时正值报考举人，足有五万多名秀才集结在南京。这批考生们最恨洋人，他们成群结队地经常准备闹事。和尚和算命先生们乘机出售抵制洋人邪法的符咒，使民众更加慌乱；家家户户的门上、墙上以及路头屋顶，都用石灰浆涂上大十字，说是可以制止偷拐孩子的贼匪

“……情况越来越严重。神父们便把发生的一切情况报告南京府台，并邀请府台来天主堂察看……

“新上任的南京知府……被马新贻总督选中去视察天主堂。……于是6月11日清晨，在好多位官员的陪同下，来到神父住院。……弄清了事实真相后，他马上赶去报告总督。……马新贻即宣布全城戒严，派遣百余名士兵设防在住院四周，同时派人到处张贴告示，证明教士无罪，严禁散布谣言。当夜，狱中处决了五名罪犯，并宣告前几天作案盗拐孩子的就是这些人^③。

“陈国瑞见马新贻机智果断，感到阴谋失败，当天就逃出南京去扬州，又从扬州窜到山东，结集了旧部数百人，然后到了天津。6月21日早上，在他的煽动下，激怒而狂热的群众冲进遣使会神父住院，又冲进仁爱会修女住院和邻近的法国领事馆^④，两名神父、十名修女、法国领事，以及多名法国、俄国的外交官，都在这一天惨遭了杀害。……数天后，南京的神父得知天津惨案的详情，才认识到陈国瑞为他们安排的是怎样的命运，也许还要祸及内地个堂口的众弟兄。

“美国领事密妥士先生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一篇为中国官员辩护的文章，即遭到普遍的对。

“7月8日，在洋泾浜圣若瑟堂，为天津大屠杀中牺牲者举行大礼追思礼仪。英、俄、德、意、西、葡、中、法等国人士、天主教教友与基督教信徒聚合一起，悲痛地为亡者祈祷。参加葬礼的有各国领事、各

① 原注：见《天主教传教杂志》第三卷第273页起。

② 原注：费赖之1870年6月16日信。见《天主教传教杂志》第三卷第291页。又《南京新会口的初期》，见《神学院》，1887年，第155页。

③ 原注：见费赖之、高龙肇两神父的信，他俩当时都在南京，所述的都是耳闻目睹的实情。

④ 原注：见高田：《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347页起；又于布内：《周游世界记》第2卷第391页。

国海军军官以及耶稣教牧师十来人。”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6月22日(五月二十四日)俄、日、美、布(德)、比、法、英七国使为请惩办天津教案人犯事致奕沂联衔照会称:

“照得天津府城系京师门户,所有法国领事各官并传教教士、守真女子以及商民人等,均在天津寓住,忽被发狂民众纵凶杀害,并将衙署、教堂焚烧拆毁,其余在彼居住各国官民是否能以保全,至今情形虽无全足确据,尚恐凶多吉少。……试思各国之人皆系各国付与中华赖以保全,而各直省保护之法均无足恃,由天津一处已可概见。是宜迅定善法,务使各省确知秉政者定见,必将各国客民身家保守……其要尤在迅速。盖政令之源,枢要统在京师。津郡距京路程不过三百馀里,尚有此患;外省较远地方,法令更无成效。案内各犯不能迅为惩办,诚恐他省效尤亦所不免。要在使各国闻知此案,亦即得知经将各犯惩治,可期于民寄与贵国定能保其无虞,以解深虑而抒中怀也。”

6月23日(五月二十五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报天津教案经过请飭直隶总督曾国藩来津查办摺称:

“窃天津一带自入夏以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民间谣言甚多,有谓用药迷拐幼孩者,有谓义冢内有幼孩尸骨暴露者,有谓暴露之尸均系教堂所弃者,遂有谓天主教挖眼剖心者,纷纷谣传,并无确据。旋经天津府县拿获迷拐幼孩之匪徒张拴、郭拐二名,讯明正法。民间迷拐之事愈传愈多,街巷为之不靖。旋经民间拿送教堂教读之沈希宝,殴打送官,经天津县刘杰讯明,实系带领学生回家,并非拐带,遂即释放。本月二十日又有桃花口居民拿送迷拐李所之武兰珍一名,天津县讯出有牵涉教堂之王三等情。于是民情汹汹,闾阎蠢动。经天津道周家勋往晤法国领事官丰大业查问王三之事,该领事亦允为查办。奴才以民心浮动,恐滋事端,当见丰大业,约其眼同地方官,讯问犯供,以明虚实;并告以民情蠢动,必须确切查明,方免生事。该领事与其传教士谢福音,约定二十三日已刻,天津道府县押带该犯前赴该堂查看对质。及期,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带匪犯武兰珍前往,面见教士谢福音,亦甚恭顺,指令该犯识认所历之地方房屋。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该道府等遂带犯回署。旋据教士谢福音来奴才署中,面商日后办法,以期民教相安。奴才与该教士议明:嗣后堂中如有病故人口应报明地方官验明,眼同掩埋;其堂中读书及收养之人,亦应报官,任凭查验,以释众疑。该教士均允照办。”

“该教士去后,奴才正拟出示以安民心。未刻,忽闻有教堂之人与观看之众闲人口角相争,抛砖殴打,当派武弁前往弹压。适丰大业来署,当即接见。看其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执利刃,飞奔前来。未及进室,一见即口出不逊。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经人拉住,奴才未便与之相持,暂时退避。该领事进屋,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奴才复又出见,好言告以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该领事奋不顾身,云‘我不畏中国百姓’,遂盛气而去。奴才恐致滋事,当派弁随同护送。詎意该领事路遇天津县刘杰自该堂弹压而回,该领事又向其放枪,未中,误将刘杰之家人打伤。众百姓瞥见,忿怒已极,遂将丰大业毆毙命。传锣聚集各处民人,将该教堂焚毁,并将东门外之仁慈堂焚烧,别处讲书堂亦有拆毁之处,传教、习教中外之人均有伤毙。奴才赶即督同地方文武,并派队弹压。奈百姓人多势众,顷刻之间,杀伤焚毁已经成事,堂中教民亦纷纷逃散。奴才等分投劝解弹压,一面督飭将火扑救,以免延烧民房。其焚烧拆毁教堂共几处,伤毙中外教民若干名,札飭天津府县赶紧查明,详细具报。”

“此事初因掩埋幼孩谣传有挖眼剖心之事,继又因拿获迷拐匪徒供出教堂之人,以致百姓怀疑积忿,有激而成。现在妥为开导,众民渐已解散。事关重大,应请飭下直隶总督曾国藩来津确实查办,以靖地方。”

同日著直隶总督曾国藩迅赴天津与崇厚持平办理该处教案事上谕称:

“……仍著崇厚督同地方文武,将该民人等设法开导,妥为弹压,毋令聚众再滋事端。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

筹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道；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毆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著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等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6月25日(五月二十七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为自请治罪及将天津道府县分别严议等情摺称：

“伏思奴才奉命办理通商多年，不能绥靖地方，以致酿成巨案，有负天恩；天津道周家勋有表率之责，不能事先豫防；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于办理拐案操之过急，以致民情浮动，聚众滋事，均属咎无可辞。相应请旨将奴才治罪，天津道府县分别严议革职，以为办理不善者戒。”

6月25日(五月二十七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陈天津教案缘由并责成天津县不准民间擅自拿人片称：

“再，查津郡百姓与天主教起衅之由，实因愚昧无知，莠民趁势为乱，始而有迷拐人口之谣。于是各处民人率行拿人送交府县，甚至殴打成伤，始行送官。地方官不问由来，即行收讯，于是沿街沿巷百姓拿人之风因此而起，谣言日多，酿成巨案。现在众民解散，尚有匪徒以奉官查拿迷拐为名，或以查拿教民为说，有径入人家以查教为名搜抢，并将男妇送官以为得计。津郡五方杂处，人心浮动，岂可为此乱阶！当责成天津府县剴切晓谕市民，不准民间擅自拿人，并派队分投弹压查拿，严行惩办，目下已渐安贴。”

同日著将崇厚等交部议处等事上谕称：

“……崇厚、周家勋、张光藻、刘杰著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仍著曾国藩于抵津后确切查明，严参具奏。至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人犯均应查拿惩办，并著曾国藩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徇徇。”

同日著直隶总督曾国藩抵津后与崇厚察情妥办事上谕称：

“著曾国藩于抵天津后，与崇厚体察情形，妥为办理。嗣后遇有此等案件，惟当责成地方官严密拿办。并飭该府县剴切晓谕，不准民间擅自拿人，徒滋纷扰。至百姓毆死领事、焚毁教堂各情，尤宜迅速查明，一面檄飭地方官严缉正凶，弹压滋事人众，毋任再起衅端，以安中外人民之心。”

同日法署使罗淑亚为请派委员一同赴津棺殓被杀法人事致奕沂照会称：

“……本大臣系法国大皇帝特派之大臣，缘天津被凶杀之多命皆系法国之人，所焚烧之房产皆系法国之业，是以皆分所应办之事。……现时所应为者，即愈早愈好，本大臣前往天津，以便亲认死尸棺殓埋葬，并可于曾中堂查讯之处随在得闻其详。因此切请贵亲王于总理衙门诸贵大臣之内指派委员相同赴津，订于二十九日起程。”

同日俄署使布策请惩办毆死俄人之人犯事致总署照会称：

“今早接到天津总领事官之报，据称天津居住俄人内三名，于五月二十三日受此实堪恻之命，已属无疑。商人博罗特颇福与其妻二人尸身已于河内寻出，虽其一商人巴索福尚未寻获，亦属毆死无疑。……因本大臣身任俄国钦差，俄人三名被害一事理应向贵国立一切之法，为查找毆死本国人凶犯，按律惩治，以昭炯戒。并设一切法制，或杜将来天津匪徒之变乱。或将来有变，若应剿则即行剿办，并以该城居住之俄人生命财产认真保护。”

6月27日(五月二十九日)直隶总督曾国藩奏覆目前病情并拟赴津办理教案摺称：

“臣查各省打毁教堂之案层见迭出，而毆毙领事洋官，则为从来未有之事。此次法国领事丰大业以激犯众怒，群毆打毙命，案情较为重大。外国于各省教案稍为轆轳者往往挟制多端，如七年扬州、台湾之案，该国均派兵船前往；八年贵州、四川之案，亦带兵船溯江上驶。闻该公使回京之时，颇以携带兵船为得计。此次领事伤毙，该使尤为忿恚，其由香港、上海等处调派兵船来津，乃意中之事。惟该使将调兵船必先与总理衙门商论及之，如总理衙门多方劝阻，令其不调兵船，自为上策。如不能先事阻止，则臣等在津亦必无能阻之势，但立意不欲与之开衅，准情酌理，持平结案，彼即调派兵船，不过虚疑恫喝之举，无所容其疑惧。现闻罗淑亚声称，此案必需请示本国君主，固系张大其事、推波助澜之词。然此

等重案，该使未曾经历，其言不敢自主，或亦实情。总之或调派兵船，或请示国主，计皆展转需时，非一两月间所能速了。目下二者未露端倪，如何办结之法未暇骤行议及。

“惟此案起衅之由，系因匪徒迷拐人口，牵涉教堂。昨据天津镇道来牒，武兰珍所供之王三业经弋获，必须讯取确供。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系确有证据。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即使曲在洋人，而公牍亦须浑含出之。外国既毙多命，不肯更认理亏，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若其曲不在洋人，则津民为首滋事者尤须严查究惩，推求所以激变之由，不能不从此两层悉心研鞠，力求平允，以服中外之心。至传教、习教之人伤毙若干，中国、外国之人无故被害者若干，皆须切实查明。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皆系目前要务，想通商大臣崇厚必能妥为料理。

“……此等重要案件，臣不敢因病推诿，略加调理，练习行步，数日内稍可支持，即当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商办。……法国之在津者丰领事、谢教士既已殴毙，尚无主持之人，各道府趁此时查讯弊端，当易就绪。至该公使将来如何举动，是否调派兵船，臣等随时请旨遵行。”

6月28日（五月三十日）恭亲王奕訢等奏各使馆洋人均怀疑虑请明降谕旨宣布中外摺称：

“臣等连日叠据法国使臣罗淑亚及各国使臣联衔照会，皆以此事关系重大，非寻常各省教案办法所能了，又恐各省谣言四起，人心惶惑，设有不虞，更难结局。坚请中国设法保护洋人并其货产。昨复据俄国使臣来函，声称通州东定岸村闻有匪人欲行焚毁教堂，请为行文保护。又据各国使臣面称，各馆洋人等均怀疑虑，请派人照料。各等语。

“臣等共同商酌，因恐再滋事端，更难措手，当即行文顺天府府尹，转飭通州地方官派役弹压，并约步军统领存诚等来署，密嘱派员分赴各馆左近常川巡查，暗地保护。惟查天津未经滋事以前，该使即有风闻江浙各省因拐掠人口牵涉教堂之言，欲亲赴各地查探等情。是外省人心惶惑，已有传闻，难保不有意外之事。该使臣等请明降谕旨，以安众心，自系为先事豫防起见。伏念津郡业因讹传，酿成巨案，至今百姓犹未深悉原委，似宜趁此宣布中外，解释群疑，免致各处为谣言所惑，群起与洋人、教民为难，或亦防患未然之一法也。”

同日恭亲王奕訢等奏请简派大臣一员亲赍国书前往法国相机办理摺称：

“窃查天津滋事一案，臣等连日往晤法国使臣罗淑亚，筹商办法。该使臣总以案关重大，必待本国之命而行，非伊所敢干预为词。查该使臣遇各省细故，皆暴躁异常，此次反若不甚著急，似伊已有定谋，恐成不测。其翻译官德微理亚声称，此案有四件重情，最要者系拉毁本国旗号，其次伤毙职官，三杀伤本国人命多人，四焚毁教堂。所以伊公使不敢作主，看中国如何办理。……据各国使臣云‘亦知法国因此用兵，于各国商情有碍。惟中国若无妥善办法，各国即欲相助，亦难代为居间排解。且罗淑亚性情躁急，其水师提督尤暴躁非常，现在各海口停泊，难保不遽尔失和，各国亦无词阻止。若赶紧奏请大皇帝特简大员，亲赍国书驰赴法国，先尽中国友谊道理，设伊提督等遽欲逞强，则各国自可从旁代为理阻，否虽爱莫能助’等语。

“臣等查泰西各国向以旗号为重。如有拉毁情事，即与伤其国主无异，每每因此动兵。况加以杀毙领事各节，其势尤为可虞。各国使臣所云自系泰西各国实情，似非虚声恫喝。且恐各国平时联络密于中国，若不从其所请，则各国受损，将来势必协以谋我，其患更深。……相应奏请简派大臣一员亲赍国书前往法国，相机办理，或亦亟图弭衅之一端也。”

同日著各直省督抚严防所属因天津而滋事端事上谕称：

“前因天津地方有匪徒迷拐幼孩，牵涉教堂，民间怀疑起衅，将法国领事官群殴毙命，焚毁教堂，并殴毙多人，兼误杀俄国商民，情形甚属可悯。业经降旨将崇厚及办理不善之地方官先行交部议处，仍令曾国藩确查具奏，并将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人犯严拿惩办。因思各国通商以来，遇有交涉事件，皆有条约可循，中外商民相安已久，朝廷一视同仁，但分良莠，不分民教。各处匪徒如有影射教民作奸犯科者，即应随时访拿，详细究明，从严惩办，岂可任令民间传播谣言，妄行生事？此次天津既有民教滋闹之事，恐各省地方亦不免因此怀疑启衅。著各直省督抚严防所属地方官，务须剴切晓谕，妥为弹压，并

将各处通商传教地方随时保护，毋任愚民借端滋事。”

6月29日(六月初一日)著曾国藩前赴天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查明案情事上谕称：

“曾国藩奏《奉旨飭赴天津，恭摺覆陈》一摺所称‘民教起衅一案，总以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是否确有证据，为案中最要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等语，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即著飭令派出之道员博多、宏武等，会同天津道府，彻底根究，妥筹办理。昨已特命崇厚充出使法国大臣，其三口通商大臣派成林前往署理，以冀潜伐敌谋，消弭隐患。曾国藩眩暈之症现已十愈其八，日内如可支持，即著前赴天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至传教、习教之人伤毙若干，中国、外国之人无故被害者若干，皆须切实查明；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尤为目前要务。并著认真区画，妥速筹办。”

同日恭亲王奕訢等奏为拟函志刚暂驻俄国办理天津教案交涉事宜片称：

“再，天津滋事案内，除法国领事、教士等伤毙外，惟俄国伤毙三人，据崇厚函称现已赶议赔偿抚恤等情。兹法国既经派员前往，案内俄国被害人口虽系出于误杀，亦未便置为缓图。查臣衙门奏派出使泰西各国办理交涉事务大臣志刚、孙家毅现在俄国，据报俟俄国事件完竣后分道旋京，志刚系由陆路等因。臣等拟即迅致函志刚暂住俄国，如已由俄起程，亦即令其折回；并由臣衙门备具照会，将此情形知照俄国执政大臣，以昭睦谊。俟此案办有端绪，再令旋京。”

《湘乡曾氏文献》(七)辑：

某月某日张光藻致吴挚甫函^①称：

“挚甫仁兄年大人阁下：前日匆匆泐布一函，计邀青览。兹闻商宪奏奉谕旨，钦派中堂查办，不胜盼慰之至。惟中堂现在续假，未知能否前来。此间诸事，非得中堂亲临查办，断难了结。谨将目前中外情形并办理掣肘之处略陈左右。津郡百姓设立水会约有七十餘处，每处约数百人。其中良莠不齐，兼有混星在内。端节前后，法国仁慈堂埋葬幼孩多棺，传言有一匣两三尺者，人心正在怀疑。时弟已赴沧州。初八日乡民拿获用药迷拐幼童之匪犯张拴等二名，供已讯实，幕友照例拟绞，未即正法。民间疑天津县有意开脱，群情汹汹，几欲入署抢犯，并有指天主教堂之说。弟于十三日公回，闻知此事，即飭刘令于次日正法，人心始安。至二十日乡民又送到一犯名武兰珍，讯系迷拐桃花口人被获，到堂并未动刑，即供‘迷药系教堂内王三所授，先已迷拐一人，得洋银五块’等语。是时通国皆知，金谓天主教有用药迷人已有实据，众情忿忿不平。刘令势难不问，遂与弟同见商宪。蒙谕本道次早见丰领事查问，丰领事许为查考。至早^②无信，商宪又令刘令往查，被丰领事呵斥而回。廿二日，商宪往见丰领事，初推不管，继乃请助教谢福音查问，教内并无王三其人。遂订于廿三日巳刻本道率同府、县带犯赴教堂指认门径。弟虑观看人多，恐易生变，欲带犯赴院，邀请助教会讯。奈事已约定，遂同前往。迨至教堂查看门庭径路，与犯供不符，质之该犯，坚供即在此地。弟以供情不确，毋庸查办，遂即带犯上院，议以不了为了，即可完案。时值谢助教亦来，商宪与议定：嗣后教堂幼孩，地方查点有病死者，请官验明埋葬，免致物议。该助教允从，遂各回署。即出示晓谕，并将武兰珍先行正法。乃是日未刻，忽闻街上人声鼎沸。传问民人，在官保署前与法国人打仗，是以各火会鸣锣聚众，前往帮助。弟立刻起身行至大街，将各街锣声喝住，谕以：‘外国在此人数无多，即使打仗，何用多人前往？’迨出北门，则拥挤满街，皆是刀枪剑戟。自官署至院约有二三里。比及赶到，则领事风大业已死，天主堂及仁慈堂均已被抢，旋即火起。弟与各官飞奔弹压，而众情汹汹，势尚不退，且闻各国讲书堂亦被抢毁数处，法国洋行同时被抢，尚有各国洋行十数处恐被烧抢，更属无礼。再三安抚开导，始各散去。自此人心不定，谣言四起，三日之内几欲另生他变。迭次出示镇抚，近日稍安。查其起事之由，则因弟等从院上回署后，有闲人在天主堂门外观看，见有教民出入，齐声喝好讥诮。有堂内用人即众所称为鬼奴者出扭一人辮发殴打，于是众人掷砖瓦。其地距

^①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清同治四年(1865)进士，曾国藩幕僚，“曾门四弟子”之一。1889—1902年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时任探州知州。

^② 应为“晚”字，据后文6月30日函可知。

院甚近，该助教遣人告知商宪，当令两巡捕弹压。巡捕到，众人均已敛手。又有堂内用人出来，呵斥巡捕：‘因何不将闲人拿去？’巡捕回称：‘彼不闹事，何用拿他？’适风领事出来，持鞭将巡捕乱打，口称‘尔官保教尔领许多兵来此搅我，我定不依’等语。两巡捕跑回告知商宪，复令一弁前往。乃风领事带一跟丁各执利刃洋枪，将去弁揪住发辫一同上院，脚踹仪门而入，一见商宪即放一枪。商宪暂避入内，随将屋内器具扎毁。经巡捕戈什齐将该领事劝住，商宪复出相见，又向地施放一枪，大肆咆哮，口称‘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等语。商宪向其周旋，伊竟不理，仍复大怒，复持刀枪而出。是时百姓怒极，已执刀枪齐集门外。又各处鸣锣邀集火会，各路民人如潮水涌至。商宪劝其勿走该领事勿走^①，该领事更怒，口称‘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遂复走出。商宪派两弁护送回堂。两旁民人执刀怒视，犹未动手。迨行抵浮桥，适遇天津县刘令劝其暂回院署。该领事突放一枪，中伤刘令跟人。于是众皆忿极，一齐下手，将其主仆杀毙。随即奔往教堂及仁慈堂并洋行，拆毁焚烧。当时有将尸身抛掷河中者，未经查明确数。今查得法国自风大业以下共毙十三人^②，俄国之行路人被杀男女三名。当日众人将教民王姓搜出送县，提拐犯武兰珍质讯，据供即系王三。该犯初不承认，现已供认迷药系神父所授云云。供词尚未的确，且恐一见彼国之人供即推翻，是以奏摺内并未提及。当二十日武兰珍供出天主堂王三之时，顷刻之间通国皆知。弟恐众人即欲滋事，次日谆嘱刘令告知绅士，传谕民人：‘此案虽有犯供，尚无确据，查讯有需时日，民间毋得逞忿，遽向教堂滋□。’百姓先闻此谕，本不肯遽然起事，惟闲人随同观看热闹，事所常有。不图风大业任性妄为，迭触众怒，遂至酿成巨案，实非意料所及。此百姓积忿已极，杀毙领事及拆毁天主堂、仁慈堂并杀伤多命之实在情形也。闹事以后，紫竹林各国领事甚形害怕，当经商宪遣人通知‘百姓已退，决于各国无害’，次日亲往紫竹林安抚。俄国虽被误杀三人，其领事官孔气但以‘混星误杀’为言，并不忿怒。美国领事官密佗士久在中国，人颇和平，亦无他言。余国未遭甚害，均无关系。惟英国与法国向系合同办事，其新来之李领事年纪尚轻，性亦偏急，且其妻曾到仁慈堂与法国诸女教士相契，颇露不平之意；幸英国尚未伤人。将来说合调和，必须俄、美二国，然太迟，则恐兵船一到，受其挟制；更恐该国公使罗书雅喜于生事，或奏调彼国大兵来此，则兵费更难说结。昨蒙商宪传集妥议，不俟中堂到此，即先于都中托人说合。此间则托俄、美二领事挽出英国领事从中调处。此办理外国之事主意如此。至于津郡百姓，自闹事后深恐官拿凶手，各怀疑虑；兼之平日受教民及鬼奴欺者趁此时势或相报复，讹诈抢夺，时或有之。经第三次出示，剴切晓谕，并委员派差分路弹压查拿；又传集各火会董事，谕以‘外国伤人，有银即抵。前此事起仓卒，无为首之人，其烧杀抢夺者多系混星，决不向尔等追问。务各照常安业。各国开设洋行，务须众为保护，庶各国贪做生意，不令法国多事。如有土匪扰害教民，即同地方差役拿获送案。从此勿生事端，静候官长办理。如法国执意复仇，尔等团练固在，尽可拼死拼命，何所畏惧’。各火会绅士均皆乐于从命。从此地方似可稍安。惟商宪调和中外诸事，向来难于持平，此亦时势使然。愚民不谅其心，辄谓偏向外国，早有怨言。此次出示晓谕，显安各国之心，自当严切告戒，意在保护洋行，不许扰害教民，示后有‘如再聚众滋事，即行就地正法’等语。百姓见此告示，颇怀怨恨。土匪幸灾乐祸，布散谣言，竟有与官为仇之意。弟既不便明言，而又虑凶悍愚民变生意外，昨又出示劝谕，以官长百姓如父兄子弟为言：‘子弟在外滋事，父兄不知则已，知则必严加管束。若再纵容庇护，则外人之责其父兄更甚。今子弟殴伤人命，父兄已受大累；而督责训教之下子弟尚不顺受，为父兄者不亦难乎？’如此婉转开导，先情后法，见者颇服其言。目前尚觉安静。惟盼中堂早到，庶可镇抚一切。津郡穷民与混星不下数千之多，平时挑脚、抬轿、营贩为生。此时客商有去无来，外国官商不敢来郡，舟车不通，米粮不到，茶坊酒肆生意全无，各铺虽开，均无买卖，穷民失业，到处三五成群，情形殊为可虑。惟有中堂到此速为查办，使中外相洽而商贾可通，庶足消弭隐患。此目前各国领事及津郡百姓之大概情形也。至于查办此案，更有数难：风大业之寻衅，由于众人

^① 后有“该领事勿走”5字，疑为衍文。

^② 手稿自“确数”至“行路”为一整行。在该行左侧与“查”字平行，添加有“内有仁慈堂女尸五名，天主堂男女尸六名，洋行男女尸二名，内有一尸在河中尚未捞获，现已捞起”句（“现已捞起”4字在该行左侧顶格）。

在其教堂门前滋闹。众人之滋闹，由于武兰珍供出教民王三。据武兰珍供：教堂内有栅栏门，有凉棚。及到彼验看，并无栅栏、凉棚，情形不符，本难凭信。然其供迷药为教民王三所授，且供“王三系天津口音，脸上有白麻”。今果有天津人开药店教民王三，且面上果有白麻。则迷药之得自王三，似非虚捏。王三初不承认，今则供认药系神父所授，神父即已死之堂中助教谢福音。弟知谢某忠厚和平，似不肯作此等事。该犯不认药系自造而必供及谢某，意图卸罪死者，且以药关法国，必将会市，于时翻供，即得生路。其供决不可凭。弟意王三或系天津邪教借天主教为护符，或法国另有邪教隐附于天主教之中，均未可知。从前迷拐幼孩，近日则兼迷男子，不知何所用之。且迷拐之案层见迭出，其中必有假借影射之处。此审结(之)[此]案之难也。廿三日之事变起仓卒，本无预谋纠邀之事，公忿皆因数万人不期而集。若以中国办案而论，自当先缉凶犯。然凶犯并无主名，从何拿起？将明访而拿之，则目睹者不肯作证，耳闻者更不肯直言。即使访得一人实是此案凶犯，猝然拿获到案，而其余数千万人难保不惧而生变。就使不变，而真正杀人放火之犯必将闻风远逃矣。将令阖郡公议献出数人抵罪，而百姓方负气不下，焉肯照办？亦终于观望(观)[而]不成。此缉凶拟抵之难也。外国人命可以财贿作抵，必不得已，或以银两偿其性命。然一命抵银若干，彼无成例，惟多是求。且其中贵贱、男女不同，又有数尸未得，其价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彼此殊费较量。又英国与彼同心，或且相助为虐。俄国三命无端被害，彼更有所藉口。各国讲书堂有被拆毁者，房屋、器皿皆须议赔。倘数国合谋而重索其价，则一时难以说合。此议和给银之难也。以津郡情形则如彼，以查办情形则如此。前信匆匆，未及详叙。兹本拟具奉中堂，因语太冗长，一时不能续写。特请阁下览其大意，代为奉达。宪节应否早临，以挽大局，惟中堂酌定，津郡官绅不胜仰望祈祷之至。专此手泐，奉。”

6月30日(六月初二日)张光藻致某函称：

“敬禀者：前月二十三日民教酿衅杀毙领事拆毁教堂一案，当因民心不定，谣言四起，连日邀集绅士、地方及水会绅民设法安抚晓谕，并时有赴院赴道禀商事件，昼夜奔忙，毫无暇晷。是以此案前后详细情形仅于致吴摺甫直牧信中草率一叙，托其转禀各宪，而公牍未暇禀达也。今初二日早，黄牧自省来津传达宪谕，令将此案颇末详细具禀。遵将民教酿衅滋事缘由及目前中外情形据实禀陈宪鉴。查津郡□□^①杂处，民情浮动，悍回土棍，械斗常闻。自咸丰十年各国通商以来，遂设天主教堂，有入堂念经习教者曰教民，有跟随外国人服役者曰鬼奴。此二种人倚势欺侮平民，事所常有，而商宪维持大局，遇事委曲将就，未能一一持平，民间积怨颇多。本年五月端阳前后，谣传河东地面天主教仁慈堂埋葬幼孩数十棺，有一棺两三尸者，有剃去心眼者。时卑府奉委赴沧州审案，并未知外间有此谣言。迨十三日回郡，道经静海，始闻此言，并闻近获用药迷拐幼孩人犯三名，被天主堂向商宪要去一名，其余二名亦将开脱无事，民情汹汹，势将聚众滋事。卑府回署后面询天津刘令，据称‘商宪要去之人系天主堂教读，并非拐犯。此外有初八日拿获张拴、郭拐二名供认伙同河南人马成用药迷拐幼孩属实，因幕友欲照例分别拟罪，未即正法’等语。卑府因外间谣言日甚，变端不测，当嘱刘令再行研鞫。该犯不特用药迷人，且有符咒妖术，遂令遵照同治三年通飭，先将该犯就地正法，一面通禀在案。自此人心稍安，浮议渐息。而百姓仍疑拐犯系天主堂指使，县官不敢深究，且以河东前葬幼孩多棺，□觉怀疑莫释。卑府密传该地方查询，据称伊见各棺尸身已干，并无挖取心眼形迹，亦未赴县禀报。卑府以谣言已止，遂置不问。乃二十日复有乡民获送拐犯武兰珍一名，讯系用药迷拐桃花口人李所被获属实，未加刑讯，到堂即供‘伊系赵州宁晋人，帮船户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将伊诱入堂中，付伊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伊前在穆庄子拐得行路一人，曾得洋银五元’等语。此供于被获之时伊已据实告知乡民，是以甫经送案而城关四境早已哄传天主堂真有用药迷人之事。是日刘令录取供单来见，卑府以事关教堂，应如何办理之处必须商宪酌夺，当与刘令同往禀见。而商宪亦以外间谣言太甚，势难不为查办，遂令本道往见法国领事丰大业，请其将教民王三送案质对。该领事许为查问有无其人，至晚无信。商宪复嘱刘令前往，该领事忽而变怒，不许查问。次日商宪请亦不来，遂亲往面商。伊仍不管，但请助教谢福音同商，约定次日已刻本

① 手稿影印本字迹难以辨认，下同。疑为“华洋”二字。

道同府、县带犯前往，令其指认教堂门径，并认明堂内有无王三。卑府以押犯亲赴教堂，恐聚观人众，易生事端，遂嘱刘令传谕绅民：‘此事真伪未□，必须积月累旬方能查办得实，外间切勿滋事。’至二十三日日本道率同府、县带犯前往查看，堂内并无栅栏、天棚，核与供情不符；堂内亦无王三。遂同回禀商宪，适谢助教亦到，遂与定义：‘嗣后教堂幼孩，唯官按月查考；如有病故，请官验明埋葬，以免物议。’助教允从，各回本署。即拟出示晓谕，先将该犯正法，不复追究王三。乃是日未刻，丰大业因教堂外偶有闲人观看，堂内人出毆，彼此口角，遂负气带一家人各持利刃洋枪赴院，并将商宪遣去弹压之武弁鞭责。伊径入院署，一见商宪即放洋枪。商宪避入内堂，各员弁将其劝住，始行出见。该领事复放一枪，未中，复盛怒而出，劝阻不住，当命武弁护送。其时，百姓已各持刀械，水会鸣锣齐集。刘令闻信，先往弹压，路遇丰大业，劝其折回院署。丰大业猝放一枪，仅伤跟丁，而百姓遂怒极动手矣。时卑府衙署较远，因闻锣声，询知众已滋事，当即坐轿出门，先将城内锣声喝止。迨出北城，而沿途刀枪林立，人如潮涌，一望无际，天主堂、仁慈堂并法国洋行同时拆毁，人声鼎沸，其变几无底止。卑府当与同城文武分投弹压解散，直至掌灯时始渐散去。幸各国洋行尚未被抢。而自此夜以至二十四、二十五两日，人民惊□，土匪四起。卑府亲往各处巡查并迭次□□□^①禁，终日不能归署。此禀报所以稍迟而情形亦未能详叙也。现查法国被杀男女有尸者十二人，俄国被杀男女三人。外有法国数人尚无下落。二十三日天主堂救出幼孩十人送院，委员讯供，发县收养。其中有供系迷拐来者，但卑府早间尚见其在堂读书，供词恐未的确。仁慈堂救出大小男女一百五十名，卑府逐一讯问，有数十人不知姓名里居，并不知从何而来，想系被拐而卖与堂中者；其余俱系各处教民子女从本籍学堂移至天津者。是日众人搜获教民王三送县，提犯指认对质，确是其人。初不承认，后乃供明：伊系天津人，剃头为业，兄开药铺。伊祖辈即奉天主教，以利诱武兰珍迷拐人口。先拐一人，给过洋银五元。每早在天主堂门外交武兰珍迷药一包，令其出外拐人，并无将武兰珍迷入堂中之事。又曾给安三迷药，令其迷人。质以药从何来，则云‘系谢神父所授’等语。查安三籍隶永清，亦系教民。二十三日在大关桥上拐一厨夫之子欲带赴教堂。适值变乱，遂往西逃，被乡民拿获送县，讯供属实。所拐幼童当经其父认领。该犯迷药亦供王三所授，业经天津县提同对质供明在卷。昨本道率同卑府在县署提讯王三，亦据供认不讳。惟供药系神父所授，殊恐未确。查谢助教人甚忠厚，卑府所知。买人幼童事或有之，迷药必非所授，显系王三卸罪死者，且恐彼国争辨，将来会审，□^②尔翻供，终恐事无把握。查先获张拴、郭拐二犯已供药系在逃之马成所造。王三此药，安知非从马成得来？如此则造药拐人皆系中国之民，于法国无涉矣。王三、安三皆系天主教民，而皆用药迷人。虽所迷之人或卖与教堂，或转卖他处，未必果真杀害，而津民之因迷拐而毁其教堂，实教民王三、安三有以致之，并非尽凭谣言可知。惟商宪因事无确据，恐彼国有所藉口，故欲不加深究。然倭罪于助教，固无以塞法国之口；而开脱王三，更无以服百姓之心。卑府未赴津任，早有成言：凡事涉中外，即惟商宪之命是听，不敢稍参末议也。现蒙中堂派委博、陈二观察先行查讯，二公熟习事机，必能主持于其间矣。闹事以后，民情惊疑不定，既恐外国报仇，又虑官为拿究。河东混星匪徒约有数千，西北回民亦有数千之众，加以水会八十餘处，几及万人，彼此联为一气，几有困兽犹斗负隅相抗之意。商宪屡次出示，彼皆以高抬外国，含怒不平。卑府手无寸柄，惟有羁縻安抚，暂免内变而已。为首滋事人犯束手不能缉获，商宪及天津镇虽有兵勇数千，皆系本地之人，不能得力也。此情外国亦颇知之，将来如何□办之□，中堂必有定见。应否酌带铭军数营（以）前来，以资镇抚，尚求转禀酌夺。近日以来地方稍安，有绅商赴紫竹林请外国人照常往来贸易。昨有美国领事密前来东关行走，安然无事，各国疑虑之心似稍释矣。惟远方商贾不敢遽来，近地居民各怀戒心，而教民之逃在河间一带者日聚日众，既不能归而安业，窃恐其聚而生变。刻下津郡民人既东防法国之兵来，又西虑教民之报复，是以日盼中堂驾临镇抚一切也。法国领事官现经英国公使札委领事官李兼署，数日内法国有小兵船来，即令其在紫竹林停泊，李领事可以作主矣。李领事性亦褊急，幸有俄国孔领事、美国密领事周旋其际，诸事尚可相商耳。所有津

① 手稿影印本空白。疑为“出示严”三字。

② 手稿影印本此字右偏旁为“页”。

郡民教衅始末及目前中外情形，谨述其大概如此。卑府事烦心乱，不暇作楷专禀中堂，伏求以禀内情形转达宪听，是所叩祷。手泐具禀，恭请大人福安，伏乞垂鉴。卑府张光藻谨禀。”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7月1日(六月初三日)醇郡王奕譞奏拟思患预防培植邦本四条摺称：

“伏思自办理和约以来，各国处心积虑，无非剥削中国，惑人心而侵土地，平日借端要求，虚声恫喝，已不堪其扰。此次该酋被戮，教堂被焚，有不自讳其曲极力与我为难者乎！然事之操纵固难，理之曲直自在，虽不能以之喻彼犬羊，正好假以励我百姓。谨拟思患预防培植邦本四条，为圣主陈之：

一、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也。民为邦本，载在圣经。此次衅端，自夷而开，我民茹痛含仇，非一朝夕。一旦激于义愤，致成巨案，正宜加意拊循，激其忠义之气，则藩篱既固，处患无虞，非禁遏刁风可同日语者也。

一、地方官勿轻更动，以洽民望也。风闻天津府县力缉奸宄，颇为百姓爱戴。此次夷酋肆其披猖，擅向崇厚等放枪，立遭诛夷，民知捍卫官长，岂非国家之福？臣愚以谓不可因此概将地方官罢斥左迁，正宜博采舆论，斟酌去留，不惟民望有归，亦可借以慑顽梗也。

一、海防机宜应密筹也。该夷经此惩创必寄信回国，甘心于我。若不早为密防，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请飭下直隶总督暨沿海将军、督抚，统筹胜算，严密奏闻。一面密规民心向背，设法鼓舞，免为诡谲所诱，庶四海之内众志成城，该夷纵竖甲利兵，又乌能逞其技哉！

一、住京夷人宜密察也。臣去年条奏摺中曾列稽查夷人数目一条，今既构衅，据我腹心、睡我榻前者，岂容漫无稽核？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何防范之处，臣不能悉。据理而论，不外乎知其成数，察其行为，阳示大公，暗为布置。趁此患难未作，勿耽苟安，凡该夷一举一动，务得其详，庶临事不致彷徨失措，实为要著。

“以上四条，均为目前急务，可否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国藩斟酌办理？总之，不能使彼不来，要在虽来而不惧，不能逼彼欲战，要在虽战而无虞。然后再讲合约，可免别生枝节。”

7月2日(六月初四日)法署使罗淑亚为请严办天津杀毙法人首从各犯事致奕沂照会称：

“……至三口通商大臣崇前往法国，而本国从厚之待，毫无疑意。然必须得有重权相加，足以正大之议，亦有成效。且本大臣所闻见证之言，一切巷议街谈，皆云崇大人偏于法国，有美好之意，并云津郡地方官等均各办理不善。……附贴被杀之法国男女人数清单送阅。至赔还一节，因时尚未计算，容俟详查。况现在所应办者，即起事之官民罪名速办要紧。”

7月3日(六月初五日)恭亲王奕沂奏报照会法使冀遏兵端等情摺称：

“……至法国使臣罗淑亚自闻津门之事，总以请命本国为词，隐挟制之意。各国使臣均以事情重大，难免用兵，于我则故示关切之谊，于彼则暗为怂恿之谋。迨奉钦派大臣前往法国之旨，臣等面见法国使臣，称述恩命。适因接据崇厚公函以‘该国巡海兵船不日到津，必须远泊紫竹林，与英国巡船同在一处，方免百姓惊疑’等语，遂将此层一并告知。该使臣谓‘现在此事意在修补，不在用力’，并谓‘巡船到津，可与英船同泊’，其意已微露转圜。臣等共同酌度，若不乘机说人，恐稍纵即逝，或被他从旁煽动，办理必益形棘手。而此案现在办法，自以力遏兵船为第一要义。彼族性情，向来遇事皆刻不欲缓，此时距天津起事之日业已经旬，尚无实在相许之事，只以空文往复，恐伊本国及在中国之该国水师兵官不能耐此迁延。万一因无准约遽尔启衅，将来更难收拾。再三审酌，即由臣等备给一切实照会，以安该使臣及其本国之心。词意所指，仍不过缉凶抵偿、赔修教堂及领事寓馆并议恤已毙人命(之)[三]端。揆厥事机，现在即无此照会，日后议抵、议赔亦属势所必然。不如先用切实语气使之忿心稍平，而兵端或因之稍戢。自缮给该使臣照会后，该国翻译官德微理亚于初三日来臣衙门，面称‘收到照会钞寄本国，当不至为浮言所动’等语。虽此后办理各节未易就绪及是否弭衅尚无十分把握，而障水于未澜、摧草于未蔓，或亦豫遏兵船之一端也。”

所附同日恭亲王奕沂为定将认真办理天津教案事致法使照会称：

“……此案凶犯必须确切查拿，严讯杀人之犯。无论贵贱，按例拟抵，并将办理不善地方等官先行交部议处。各教堂、衙署被毁之处，亦应一律修补。其毙命童贞女，甚为惋惜，希贵大臣查明姓氏，开单照会，以便议恤。本国恐有伤睦谊，是以现奉谕旨，特派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双眼花翎·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前往贵国，以著两国实心和好。天津一案，只由民间一朝之衅，定能迅速办结，益昭睦谊。”

7月5日(六月初七日)曾国藩奏报赴津查办日期及伤毙洋人数目摺称：

“……其伤毙人口，据天津县知县禀报，已获尸具妥为棺敛者，法国十三人，俄商三人，其余尚未查确。其焚毁房屋，据天津县知县禀报，法国教堂一处，公馆一处，仁慈堂一处，洋行一处。又误毁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二处。臣与崇厚往返函商，拟先将俄国误伤之人及英美误毁之讲堂速为料理，应赔偿者先与赔偿，不与法国一并议结，以免歧混。此议能否办到，现尚未敢预期。至教堂牵涉迷拐之案，讯供虽稍有端倪，尚未能确指证据。天津倡首滋事之众，弹压虽渐就安戢，然而未敢查拿正凶。二者查办之要，莫大于此；而棘手之处，亦在于此。”

7月6日(六月初八日)著直隶总督曾国藩等先将英美俄国等案先行议结事上谕称：

“……曾国藩拟将误毙俄国人命及误毁英美两国讲堂先行设法议结，不与法国牵混，所见甚是。著即会同崇厚妥为商办，以免轆轳。”

7月9日(六月十一日)英署使威妥玛为天津教案内英女露义萨被杀事致奕沂照会称：

“照得本年五月二十三日津郡民众凶杀在教之守真童数口，据报内有本国阿尔兰地闺女露义萨。此女前数月在西城仁慈堂居住时，本大臣赴堂相拜，见伊在堂经理一切，旋知前赴天津教堂照管。今闻滋事案内一同被害，始知即是其人。此次在津守真童各人惨遭戕害，民气忿激至此，是否别有他故，暂置弗论。要在津民既以该童每收小儿入堂，渐疑或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事，以致动众焚毁法国馆堂。数日以来，更闻外省各处议论沸腾，乃以绝无影响之事，竟尔深信不疑。在愚民无知，尚可原谅，而缙绅士族亦皆众口一词，不但官府出示提及此事，甚至有学问之人妄称各省水旱之灾皆由上天不忍睹此荼毒生灵而归咎于外人。夫仁慈堂守真童之设，究其实意，初在法国于明末十年以前建立善会，其中不止一国之人，无论富贵贫贱，一经出家，俱似无亲可依、无友可恃，专以自承重任至终。司理其事，不分何国何类，凡有疾病困苦人类，均归经管。更有婴儿，或系父母亡故无靠，或系父母无钱养贍，或系父母因贫弃掷，皆为守真童抚育，此不但在中华为然，即在各国，亦见每年不下数百婴儿收入各堂。存者入门奉教，亡者按理葬埋，由来如此，毫无别情。忖思杀孩坏尸，虽在野番，理亦不能以此凶恶举动见疑。彼守真童始终务此仁业，独可以此疑之乎？设小民谬怀此疑，而官长不能设法为之解释，其贻害于中华，伊于胡底？盖出诸学问深沉者，乃以一心救苦之女，指为忍心害理之徒，则百姓于凡属远人何免一律相看，岂非视为仇敌？既视为敌，焉得不思乘机以敌待之？总之，残幼一事，有之固属可恨，无之殊属可笑。而贵国官民绅士均竟深信不疑，一至于此……”

“祈思预防之策，实不过一议；百姓景仰在于绅士，绅士以外人为敌者，皆缘未明外国之实情，则发蒙振愤系贵国秉政之重责。诱启之方，不在托诸空言，尚须用于实行，此防危之至计。再者，以速为要，本大臣不能不附此言及。”

7月12日(六月十四日)内閣学士宋晋奏为天津教案似坐罪偏重百姓应飭曾国藩从实研讯摺称：

“臣伏查自通商以来，各国所住之处，民间久与相安，从未有怀疑散谣之事，惟传教之法国，则到处不能安静，历有明征。果其真能行善，人当欣喜听从，何以所在皆传有损折幼童挖眼挖心等事？是其教中之良莠难齐，该国亦难自保。此次天津滋事，闻因三四月间拍花案多，曾经访获一人讯明正法。嗣又拿获两人，正在研讯，即为法国公使挟请释放，民间遂已滋议。嗣又讯出教堂中有奸民王三主使迷拐，并给人红药等事。随向法国公使查讯，回称并无其人。嗣经天津府县前往搜查，百姓亦聚众相随。该公使不服，径至通商衙门寻衅，开放洋枪，崇厚幸未被伤。嗣路遇天津县，又放一枪，愈致百姓激怒，登时将公使殴毙。随至天主堂于地窖内放出小孩，杀其毛女，烧其洋楼。又至该国所设之仁慈堂，搜出幼孩，并搜出坛装幼孩眼睛。因而又将该堂教夷杀毙，并将天津所有教堂全行拆毁。此天津官商来往都

中所言大抵相同。

“近又闻天津自前月二十三后，大致业已镇定；自奉第二次谕旨后，人心未免惶惶，复有教民向天津府轿中掷砖之事。似此百姓怀疑，教民长恶，更恐别滋事端。臣窃惟和局必当保全，民心尤宜维系。矧天津县于咸丰年间，曾经民团倡义，击退贼匪，先帝深为嘉奖。此次激成众怒，愤杀教夷，自因拐失幼孩太多，痛心疾首；而该公使复叠次放枪，向通商大臣及天津县寻衅，激变亦非无因。且迷拐之事，民间决不猜疑他国，而动辄指名法国，即各省地方滋事，亦大率以此为辞。如谓毫无影响，何至处处凭空捏造，岂天下百姓于他国皆可耦居无猜，而独于法国有不解之冤耶？设使法国意不传教，民间又何从谣言生事耶？”

同日宋晋奏为请飭曾国藩将津案起衅情节向各国解谕摺称：

“法国自传教以来，闻湖南省先有檄文驱逐，至今未敢前往。江西省城，自拆毁教堂以后，亦未能前往。可见人众势盛，传教者未尝不知畏阻。此次天津之事，该国亦必有戒心，不过以兵船为恫喝之辞，期于胁和而已。如果密飭各省暗为防范，津沽海口亦豫筹堵御，为静以待动之计，即偿命赔钱，似较易为说合。至百姓一动义愤，每每一发难收，即使官为箝制，而仓猝之际、偏远之方，岂能时时防范？若因有碍和局，抑制太甚，更恐各省民心因此激变，其患更有甚于法国者，似不可无此远虑。可否一并飭下曾国藩，于海口一面设防，密为布置；一面婉谕各国公使，以百姓之滋闹，总为传教，而传教之起衅，总借口拍花，实于别国毫无干涉？且百姓亦从来于别国无毫发之嫌，若一涉兵端，即于通商有碍，各国似不值为其牵制寒盟。至百姓之变出仓猝，实有非官所及箝制者，亦各国所共见。要之，朝廷绥远之念始终不渝，而众怒难犯之情须臾难料；且各国自通商以来，无虑数千万资本散在各口岸，尤宜和协民心，共相保护。”

同日著直隶总督曾国藩督同博多等将天津教案审明具奏事上谕称：

“曾国藩前奏‘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确实，为全案关键’等语，已得办理此案要领。现在王三业经拿获，起出之幼孩亦经绅士收养，澈底根查，无难水落石出。即著督同博多、宏武等详细研究，审明虚实，剖别曲直，据实具奏。该督素为中外所推，必能明白昭章，使民心允服，而各国亦无异词也。”

7月14日(六月十六日)御史贾瑚奏为请飭步军统领等衙门严缉迷拐幼孩匪徒摺称：

“天津因迷拐幼孩，致酿巨案，业经奉旨查办。近闻京城屡有匪徒迷拐幼孩，因事无确据，未敢上渎宸听。访得崇文门外，有高姓之子名二格者，年十二岁，于本月初九日清晨在本街扫地，忽有匪徒向二格头上一拍，随即跟去。行至兴隆街，遇有羊肉铺作生理人，看见形迹可疑，截住二格盘问。二格形神痴呆，卒无一语，匪徒见事已败露，即时逃去。少顷看者人多，内有认识二格之邻右，睹此情形，即为其家送信，旋即接回，用凉水喷醒。据二格云清晨在门口打扫，忽有不识姓名人向伊头上一拍，登时昏迷，但见身之两傍，俱是河水阻隔，中间仅有小路可走，前面有人引路，不得不跟踪前往，此外别无所知。臣细为查访，实有其事。查例载：‘用药及一切邪术迷拐幼小子女，如人药并获，即照强盗律拟斩立决。’国典森严，该匪徒等胆敢于犖犖重地用此邪术迷人子女，若非严为查拿，按律惩治，何以警凶顽而安良善？”

“臣又闻所拐幼童，或用其目，或剖其心，虽系传述之语，而采生折割，律有明文，又安知非需此而为是也？孺子何知，惨遭荼毒，殊堪悲悯。”

“相应请旨飭下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查拿，并出示晓谕民间：如有遗失子女者，即向各衙门呈报，该衙门立时严缉，但人药并获，即行按律惩办，勿任牵连，致稽显戮。庶匪徒知所警畏，而地面亦可肃清矣。”

7月15日(六月十七日)醇郡王奕譞奏陈津案陈国瑞无端被诬等情摺称：

“……陈国瑞之为将也，落落寡合，动辄招忌，然其纪律尚严，战阵务实，但为诚感，不为势屈。故前随僧格林沁则所向有功，调赴他营则谤毁萃至。臣深爱其人，冀为将来御夷之用，詎无端被诬，冤莫自解。臣昨将该员传见，面加研究。据称‘抵津时，适值民夷构衅，该员在庙寓未出，旋有多人排门请谒，

求为画策，即答以系行路之人，未便越俎。继闻崇厚业经被戕，当赴通商衙门探视。因系讹言，遂与崇厚晤谈而散。至民戮夷人，实未在场，此外亦再无他事’等语。再三究诘，矢口不移，虚诬情形，委无疑义。

“臣平心思索，必因以上二节，讹传遂起，致夷人怀疑莫释，视为仇敌。臣既详讯得实，自应代为直陈，伏乞皇太后、皇上俯念将才难得，人心宜励，请将臣代陈各节，飭下曾国藩秉公查问。勿任狡夷恫喝，勿任劣员锻炼。果属无辜，仍令原伴送官弁同该员回京，臣尚续有陈请驱策之处。谅曾国藩老于断事，崇厚目睹情形，万无因正凶难获，夷人要挟，即妄以无涉之人塞责，自堕名望之理。”

7月21日(六月二十三日)著直隶总督曾国藩确切查奏天津教堂内是否有人眼人心等物事上谕称：

“有人奏‘风闻津郡百姓焚毁教堂之日，由教堂内起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执。该大臣于奏报时并未提及，且闻现已消灭’等语。所奏是否实有其事？著曾国藩确切查明，据实奏闻。”

同日著直隶总督曾国藩速奏迷拐有无确据并暂接通商大臣事务事上谕称：

“崇厚已派出使法国。……其通商大臣事务，著曾国藩暂时接办。成林现已病痊销假，不日亦可驰赴天津，俟该京卿到时，曾国藩即可将通商事务交卸。”

同日直隶总督曾国藩等奏为查明天津教案滋事情形摺称：

“臣国藩抵津以后，逐细研讯教民迷拐人口一节。王三虽经供认授药与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又其籍在天津，与武兰珍原供在宁津者不符，亦无教堂主使之确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名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臣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帖之虚实剖辨明白。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

“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至津民之所以积疑生愤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臣等亲履被烧堂址，细加查勘，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度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不经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中国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即如前任江西进贤县知县魏席珍之女贺魏氏带女入堂治病，久而不还，其父至堂婉劝回家，坚不肯归，因谓其有药迷丧本心。其致疑二也。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说。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及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尸之眼，已堪诧异；又由他处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皆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堂中院落既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病，分类而处，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其致疑四也。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于是时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帖之言信为确据，而又积此五疑于中，各怀恚恨。迨至拐匪牵涉教堂，丛冢洞见胸腹，而众怒已不可遏。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噪，同时并举，猝成巨变。其浮嚣固属可恶，而其积疑则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今既查明根源，惟有仰恳皇上明降谕旨，通飭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洗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并请将津人致疑之端宣

示一二。天津风气刚劲，人多好义，其仅止随声附和者尚不失为义愤所激，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惟当时非有倡首之人预为纠集，正凶本无主名。津郡人心至今未靖，向来有曰混星子者结党成群，好乱乐祸，必须佐以兵力，乃足以资弹压。顷将保定铭军三千人调扎静海，此军系记名臬司丁寿昌统带。该员现署天津道缺，一俟民气稍定，即以缉凶事件委之。该署道督同府县办理，当可胜任。至武兰珍犯供既已牵涉教堂，经臣崇厚饬令地方官赴堂查验，实为解释众疑起见。近日江南亦有教堂迷拐之谣，亦即如此办理。其后丰大业等之死、教堂公馆之焚，变起仓猝，非复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酿成如此巨案，究系官府不能导化于平时，不能预防于先事，现已将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由臣国藩拣员署理。同日另片具奏其杀毙人口，现经确查姓名实数，惟仁慈堂尚有女尸五具未经寻获，其余均妥为棺殓，交英国领事官李蔚海收存。俄国三人，已由该国领事孔气验明掩埋。谨开列清单，恭呈御览。法国公使罗淑亚业经到津，议及赔修教堂事宜，臣等拟即派员经理。余侯议有端绪，续行陈奏。其误毙俄国之人命、误毁英美两国之讲堂，亦俟议结，另行具奏。”

同日曾国藩奏请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等即行革职片称：

“再，法国公使罗淑亚以本月十九日到津。……二十一日，该使忽大发声口，闻有照会臣处一牒，语言躁狠，挟制多端。二十二日投递到臣。据照会内称‘不将府县及提督陈国瑞即行抵命，早晚该国水师提督到津，即令其便宜行事’等语。臣与崇厚妥筹熟商，该府县等实不应获此重咎。惟该使要求之意甚坚，若无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决裂。且地方官事前既疏于防范，事后又不能迅速获犯，其讯办该匪，亦有操之过蹙之处。相应奏明将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二员即行革职，请旨饬交刑部治罪，以示惩戒而维大局。其陈国瑞一员，不知该国有何证据？闻该员现在京城，因照复该使，将陈国瑞交总理衙门就近查办。”

《湘乡曾氏文献》(七)辑：

7月22日(六月二十四日)曾国藩照复法国使臣称：

“查五月二十三日之案滋事凶犯现已严饬新任道府赶紧查拿，断无任令凶徒久稽显戮之理。只缘是日津民聚众过多，不能指实何人为首何人为从。近日访得数名，已令其先行拿案严刑拷讯，务令供出伙党，按名缉获处以极刑，以申中国之法，以纾贵国官商之恨。大约数日之内必可弋获多名，断不至再事迟延。贵大臣尽可放心。至照会内称‘天津府县及提督陈国瑞议以抵命’等语，查陈国瑞以客官路过天津，本属事外之人。前准照会云云，该提督现在都门，本阁部堂昨已咨请总理衙门就近传讯，应俟总理衙门讯明咨复到日再行核办。至此案前任府县办理不善，本阁部堂到津后即将该员等先行撤任。又以案情重大，该府县事前既不能防范，事后又不能速拿凶徒，业经奏明大皇帝将该府县革职从重解交刑部治罪在案。若如照会所称必将该府县议以抵命，查审狱极刑，必须有可诛之心，或有显著之恶。该府县并非下手杀人之人，又无丝毫主使确据，本阁部堂未能指实其罪之所在，难以照办。因思贵大臣当明晰该府县二人有应抵命之罪，可请逐层说明。本阁部堂得有二人罪状实在凭据，自能公平办理。再，本阁部堂到津后查明天津府有事后之三件事：一系五月二十五六间河东匪人抢苏老义等教民数家，张守即前往弹压；一系有一教民与一民人因账目在府涉讼，张守即将民人枷号示众；一系府署把门者系教民，该府欲访查凶手，即令教民密访凶犯，悬有重赏，现在此人仍在府署当差。此三事虽小，足见知府有保护教民之心，无伤害法国之意。至天津县刘令，虽无保护确据，而亦无伤害教堂之心。贵大臣如查有府县罪状，即请一一开示，以便转交刑部定议。中国遇有大狱，皆由部臣作主，疆臣不能擅专。为此再商贵大臣，请烦细核见示。”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7月25日(六月二十七日)恭亲王奕訢等奏为法使要求处决天津府县事已请英使排解摺称：

“查罗淑亚所请，万难允从，而又无计牵制该使，因刻即同赴英馆，将罗淑亚要求过甚各节详细与威妥玛面述；并告以罗淑亚系有意搅乱通商大局，与各国均属不利，将来开衅，若误伤各国人民，法国应执其咎。盖欲以悚动之词，连络各国，使其设法从中排解。威妥玛意亦为然，并潜与布国李福斯会商，

始答云“法国之事，渠等不能作主，只好由总署函致曾中堂覆罗使，请以此案必求立决，果系何罪，必须详讯确情，并准伊等同听，不能仅凭传闻之词，遽行正法；一面由该使函致罗使，劝其不得躁暴，惟从否不能豫决”等语。臣等以威使所云亦系实情，但期其不与法国连络，其余亦未便过求。随旋署将威使大意函致曾国藩，并嘱赶紧防范，以备不虞。将来威使之信能否阻止罗淑亚，尚未可知。惟臣等既与威使有此一番剖辨，即罗淑亚不听其言，或威使不致从中播弄，愈难收拾也。至陈国瑞一节，更属无理取闹。此时罗淑亚既欲置之死地，似未便即令赴津，可否请旨飭下神机营，暂缓伴送至津？恭候圣裁。”

同日著直隶总督曾国藩等据理驳斥法使无理要求并预筹备御事上谕称：

“前据曾国藩奏请将张光藻、刘杰革职交刑部治罪，办理已属过当。此次罗使欲将天津府县同陈国瑞在津正法，断无如此办法，万难允准。著曾国藩、崇厚懍遵前旨，力持正论，据理驳斥，以维大局。

“……所有张秋铭军，即当调赴直境，现应分驻何处，著曾国藩妥筹布置。并著该督催刘铭传兼程赴直，统带铭军，以备缓急。李鸿章所部应否移缓就急，调赴畿疆，著曾国藩悉心筹画，赶紧奏闻。前谕神机营王大臣飭陈国瑞赴津听候曾国藩查问，此时罗淑亚既欲置之死地，未便即令赴津。……已谕令神机营王大臣，暂缓派员伴送赴津矣。”

7月26日(六月二十八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为督臣曾国藩病重请派大臣来津会办教案摺称：

“二十四日罗淑亚又给督臣照会一件，仍请‘将天津府县及提督陈国瑞自行议以抵命，不必解交刑部，无俟法国提督到来，方于犯事地方立决’等语。奴才于二十五日又赴紫竹林，面见罗淑亚及德微理亚，竭力开说。罗淑亚坚执不听，并令德微理亚至督臣行馆，称述罗淑亚之意必欲天津府县及提督陈国瑞抵命，并云‘俟水师提督到后即由提督出示晓谕居民，与督臣会同办理’等语。当经督臣面诘以‘该府县有心伤害洋人有何指证确据’，并‘陈国瑞当时系路过之人，于此事毫无干涉’向其辩论，拟给照复去后。是日并据署天津府知府马绳武带同本地绅民往见罗淑亚，声诉伊等皆系津郡良民，并未滋事。罗淑亚将两次给督臣照会与该绅民阅看，并云‘如有变故，尔等遭害，皆由地方官之故’等语。

“二十六日法国水师提督都伯理到津，持片通候，奴才当即赴该兵船拜晤。都伯理与罗淑亚同见，都伯理所称与罗淑亚无异，并据德微理亚云‘候至二十七日四点钟时，如无切实回信，伊即晋京，将在京之法国人等带同进京至津，随同罗淑亚回到上海’各等语。其决裂情形，露于词色。奴才以事机紧急，当与曾国藩熟商办法。曾国藩甚为焦急，触发病症；前数日本属头晕目眩，闻知此信，呕吐大作，历三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云脉象沉重。奴才于本日辰刻又赴督臣处看视，天津镇陈济清、署天津道丁寿昌、署天津府知府马绳武等一同前往，见督臣言语稍觉清楚，精神仍形委顿，病势增加。

“奴才伏思：天津地方战无可战，守无可守。法国兵船停泊在紫竹林海河一带，逼近东南城根，两岸民房市廛十数万家，且与各国官商杂处。一经决裂，亿万生灵横遭涂炭，且恐震动京师。今早督臣扶病相见，与奴才论及自道光年间办理洋务以来，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战和两歧，未有不败之理。况目前情形尤与从前迥异：一国构衅，各国连衡，兵端一起，沿海沿江各省防不胜防；非特无此兵力，且恐响源立匮。天下大局，关系非轻，督臣忧心如焚，矢以尽瘁。奴才目睹津郡时事势将决裂，督臣又病势加重，焦急万状，不得不据实沥陈。仰求圣恩迅派熟悉情形之重臣来津会办，并请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照法国公使罗淑亚及住京各国公使，以维大局。”

同日著直隶总督曾国藩等与毛昶熙等熟筹办法以力保和局为要事上谕称：

“……本日已谕令丁日昌星速赴津，帮同该督办理。又以丁日昌由苏赴津，即航海前来，至速亦须在旬日以外。因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会办，该督等务当悉心筹画。此案了结，总以愈速愈妙。至天津府县等正法一节既难照办，而为首滋事之犯自应赶紧缉拿。如首犯缉获，则据理辩驳，一切自易转圜。

“崇厚摺内所称……曾国藩所论切中情事，著与毛昶熙、崇厚熟筹办法，总以力保和局为要。惟该国兵船业已到津，意在开衅，现亦不可不预为防范，以备不虞。本日已谕令李鸿章带兵驰赴畿疆，候旨调派。并令傅振邦前赴天津听候该督调遣，其练军及标营官兵已令傅振邦豫为部署候调。张秋铭军著曾国藩仍遵前旨星速调直，妥为布置。”

同日曾国藩奏覆查得洋人挖眼取心等传说毫无确据及近日天津民情摺称：

“臣于二十三日业将大概情形会同崇厚恭摺具陈在案。洋人挖眼取心之说，全系谣传，毫无确据。故彼族引以为耻，忿忿不平。焚毁教堂之日，众（日）[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岂崇厚一人所能消灭？且当时由教堂取出，必有取出之人；呈交崇厚收执，亦必有呈交之人。此等异事，绅民岂有不知？臣抵津后查讯挖眼取心有无疑据，绅民俱无辞以对。内有一人言眼珠由陈大帅自带进京。大帅者俗间称陈国瑞之名也，其为讹传已不待辨。原其讹传所起，由崇厚前月二十四日专弁到京，向总理衙门口称有搜出眼珠盈坛之说，其时仓卒传闻，该弁未经考实，致有此讹。其实眼珠若至盈坛，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即云残害，其尸具又将何归？此可决知其妄者。

“谕旨垂询迷拐一案究竟有无确据。臣查挖眼剖心决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天津之王三、安三，河间拿获之王三纪，静海现留之刘金玉，供词牵涉教堂，在在可疑。臣前奏系力辨洋人之诬，请发明谕，故于迷拐一节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于和局。当时另有片奏密陈迷拐之可疑，旋因虑及偶有漏泄，法使罗淑亚必致又兴波澜，洋人此时断不肯自认理亏，不如浑含出之，使彼有转圜之地，故临发时将密片抽出。将来此案办结，仍当再申前说，请令教堂、仁慈堂均由地方官管辖，庶冀永弭衅端。

“至谕旨垂询传教有碍通商一节。臣上年在京曾与臣文祥论及传教不宜兼设育婴堂，文祥力言其势不能禁遏。禁育婴堂且不能，况能禁传教乎？谕旨垂询现在办法，臣已为昭雪挖眼剖心等事之诬，以平洋人之心；其焚毁教堂公馆，业已委员兴修；王三屡经翻供，现已释还；教民安三迷拐被获，因狱词未定，而该使索之甚坚，亦经暂行释放。至查拿正凶，措手稍难，已饬新任道府拿获九名拷讯党羽。至俄国误伤三人，前经委员与俄国领事官孔气商酌，每伤一人给予恤银五千两，该领事当以请示国主为辞；昨经臣处动用公帑，再为询商。惟法使罗淑亚必欲将天津府县及陈国瑞三人拟抵，经臣照复该使：‘府县并非有心与洋人为难，陈国瑞不在事中，仍复曲徇所情，将该府县奏交刑部治罪。’昨据该使照会，仍执前说，必令该三员抵偿，又遣翻译官德伟力亚来臣处面称：‘必如照会所言，方不决裂。’臣与辩论良久，问该使：‘称府县主使，究有何据？’德伟力亚不能指出，然其辞气始终狡执，未就范围。臣查府县实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该使必欲拟抵，实难再允所求，由臣处给予照复，另录送军机处备查。彼若不拟构衅，则我所断不能允者，当可徐徐自转。彼若立意决裂，虽百请百从，仍难保其无事。

“谕旨垂询近日民情。虽经臣迭次晓谕，而其疾视洋人，尚难遽予解化。良民安分畏事，每欲自卫身家；莠民幸灾乐祸，辄欲因乱抢夺。浮动之意，至今未定。故有邀集众绅往见罗使者，亦有撕毁教堂告示者。现有铭军二千人在此弹压，当可无虞。但臣举措多不愜舆情，堪内疚耳。

“谕旨询及崇厚如可交卸，即著先行来京。现在办理虽有端倪，罗使尚未应允。臣于夷务素未谙悉，且病势日深；崇厚与洋人交涉已久，无事不熟。应请飭令该侍郎暂缓赴京，留此会办，俾臣不至愆事，于大局实有裨益。”

同日曾国藩奏陈天津教案交涉应坚持和局兵端万不能开等情片称：

“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轻易消弭。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臣于五月二十九日覆奏摺内，曾声明立意不与开衅。匝月以来，朝廷加意柔远，中外臣民亦已共见共闻。臣等现办情形，仍属坚持初议，而罗酋肆意要挟，卒未稍就范围。谕旨所示‘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确中事理，洞悉敌情，臣等且佩且悚。目下操纵之权主之自彼，诚非有求必应所能潜弭祸机。此后彼所要求，苟在我稍可曲徇，仍当量予转圜；苟在我万难允从，亦必据理驳斥。惟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若中国无备，则势焰愈张；若其有备，和议或稍易定。现令张秋全队九千人拔赴沧州一带，略资防御。李鸿章前在潼关，臣已致函商论，万一事急，恐须统率所部由秦入燕。此时陕回屡受重创，若令李鸿章入陕之师移缓就急，迅赴畿疆，办理自为得力。英法两国水师提督顷已均在大沽，其请示国主，旬日内当有覆信。法国若仅与津人为难，则称兵必速；若要求无厌，直与国家为难，则构兵较迟。李鸿章若于近日奉旨移军东指，当不嫌其过缓。

“……臣自咸丰三年带兵，早矢效命疆场之志。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定，毫无顾畏。平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朝廷接崇厚之奏，是否已派重臣前来，应否再派

李鸿章东来，伏候圣裁。抑臣更有请者：时事虽极艰难，谋画必须断决。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虽李鸿章兵力稍强，然以视外国之穷年累世专讲战事者，尚属不逮。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所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

“臣此次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

8月4日(七月初八日)比使金德俄固斯德为请速惩办天津教案人犯事致奕訢照会称：

“……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凶党惨害守真女子九人，内有比国二名。……盖此等凶暴残害之事，天下万国历来罕闻，法英比意俄五国俱各有受害之人，此固西国所共关切。而且泰西诸国皆以为传道教士能代西国人宣传西国之仁义道德以及天文地理一切新学，训迪中华民众。忆昔各国和约之内，有‘传教人在中国可以保护’等语。查中国与比国和约第十五款云：‘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十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崇信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此语各国和约中俱已载明，因此凡西国有传教教士，以为和约之言信而不欺，遂来至中华。今知天津凶顽恣其残害，并焚烧拆毁天主、耶稣教堂十数处，彼国焉能漠视？本大臣因思各国所设仁慈堂中守真女子，以止于至善为羡慕，以克己祛私为修为，以安慰困苦医治疾病为责任。临阵之时，能调治受伤之战士；太平之日，能安抚无依之贫民。贤名素著，泰西各国尽人尊崇。乃今死也如斯，在泰西各国史记内初次记载此事，此等可惨可伤之事，未之前闻。本大臣不能不与驻京各国大臣仍复再三知照贵衙门王大臣，以期保护散寓中原各国子民，并请速伸国宪，以惩凶顽。

“……曾、崇二位大臣会衔入奏，但谓天津滋事皆府县二员事前疏于防范，事后又不能捉拿匪犯之过，何以不揭明府县告示之误？英国领事官再三照会三口大臣，宜将‘禁止谣言，拦阻匪犯’之言出示晓谕，总未得有回音。且此二员尤有至大之愆，盖于奉天主教人既捉拿之，复收留在署，用刑拷问。本大臣已明明闻知：天津凶事预先约定时日；至期，火会人等鸣锣聚众，各持凶器杀人放火；事毕，火会人等悉遵号令散去。此事行在白昼之间，且经各地方官与各武官目睹。本大臣又思贵国操政柄二大臣何以未及时查拿恶犯，但于天主教人众究问滋事之由在此案内有无关涉，以致迁延时日，并不查拿造言生事之人？此理本大臣自宜表明。彼谓外国托人迷拐幼孩剜眼剖心，实与不实，不待智者而明也，何必查问教会中有此事否？六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已将谣言之事发微摘伏及迷拐幼孩之人加等治罪’，而未及各国受害之人可怜可悯。前者王大臣枉驾下临，本大臣详议及此，业蒙金诺：‘不日即为代奏，直言天主教仁慈堂与散寓中原各国子民并无此事；若有谣言传播，亦即拿究，置之重典。’如有似此上谕粘贴城市村乡，即为保护散寓中华各外国人良计。……且查问此案，亦宜有驻扎京师各国大臣所选官员一同坐问，以昭公允。”

8月7日(七月十一日)湖广总督李鸿章奏请密饬毛昶熙等查询法使所闻得自何人片称：

“法使罗淑亚必欲将天津府县立即正法。据其照会内称‘所闻所查，实由府县帮同行凶’，又称‘有主使动手之人’，经曾国藩等据理驳斥，该使尚悻悻不平。臣查外国审办命、盗重案，必以证据口供当堂质对确实，反覆研究，乃能定讞，与中国明慎用刑之意略同。窃料该使到津后，必有洋行买办通事及习教无赖之徒从中簸弄，以致颠倒失实。若仅空言驳斥，徒激其怒而启其疑，此案终难妥结。臣愚拟请密饬毛昶熙、崇厚等询问该使所闻得自何人、所查得有何据，须将如何帮同、主使证据交出，由中外大员会同提集该府县当堂质讯。必如外国办案，两造俱肯认供，毫无抑勒翻异，乃可成信讞而服众心。果该府县有此实在重情，亦不能曲为宽贷也。倘该使竟不交出证据，或不肯传往会讯，是其情虚而凶焰亦当渐减。该府县张光藻等想必递有切实亲供，应由该大臣等相机照会法使，仍赶紧访拿真正凶犯，迅速拟抵，较之空言抵制，或者稍易转圜。”

8月14日(七月十八日)著湖广总督李鸿章将所带各营扼扎直隶边境事上谕称:

“现在天津之事未即决裂,若调兵信息早为洋人窥破,必致又生疑忌。著李鸿章于行抵直境时,酌度情形,即将所带各营扼扎直隶边境获鹿一带,或于河北彰德、山西平定等地分扎,总以防回匪窜扰为名。该督务须不动声色,持以镇静,用昭慎密。至正定、广平等处均有洋人教堂,李鸿章务当就近弹压兵民,毋许滋事,免致别生枝节。”

8月16日(七月二十日)著直隶总督曾国藩传谕钱鼎铭派员将张光藻等解津事上谕称:

“本日据军机大臣呈递直隶按察使钱鼎铭禀函。据称‘已革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因患病出省,在顺德府调治,已革天津县知县刘杰亦在密云县治病,已派员分赴守催’等语。览奏不胜诧异。张光藻、刘杰以奉旨治罪人员,即使患病属实,亦应在天津听候查办。乃该革员等,一赴顺德,一赴密云,捏病远避,直视谕旨如弁髦,尚复成何事体?试思该革员等不呈递亲供辨别是非,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等与洋人终日辩诘,何能以空言相抵?朝廷之令该革员等赴津者,实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体会,偷然置身事外,若使洋人闻之,岂不益滋口实?此事关系重大,不可再涉迁延。著钱鼎铭恪遵前旨,星夜派员前往,将该革员等迅解天津,不准藉词托病。仍著将起解日期赶紧覆奏。曾国藩于张光藻等革职后率行给假他出,实属不知缓急。并著派员勒限催提,俟解到日,会同毛昶熙取具该革员等确切亲供,以凭核办。若再托词远避,国法具在,岂能宽宥?”

8月21日(七月二十五日)密云副都统景丰奏报已将已革天津县知县刘杰押津摺称:

“……传问密云县知县唐钺,据称‘已革天津县知县刘杰,系于本月十九日来密云。查问该革员住址,卑职即同委员王霖,由宁姓家中将该革员传出,拟即定期起解’等语。……奴才遵即派委佐领恩福、防御崇荫,飭令协同该委员王霖,将已革天津县知县刘杰于本月二十二日押解起程,送赴天津,听候查办。”

8月22日(七月二十六日)礼科给事中胡毓筠奏请飭令毛昶熙等派员将王三等解京会审摺称:

“窃维天津之案,自曾国藩等查办以来,中外人心,均未能服。又朝廷因又派毛昶熙会同办理,乃众论哗然,日甚一日。推原其故,总由王三、武兰珍不知如何发落,易滋中外之疑也。查曾国藩等奏称,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此案似无可疑矣。而原奏内有‘王三虽经供认授药与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等语,所供若何,所翻若何,中外均不得而知,其何能服中外之心、释中外之疑哉?在洋人且疑曰:‘王三未必认供,其所云认供者,必系曾国藩等袒护百姓也。’在士民且疑曰:‘王三未必翻供,其所云翻供者,必系曾国藩等周旋外国也。’洋人之疑愈积而愈深,忿亦愈积而愈深;士民之疑愈积而愈深,忿亦愈积而愈深;难保不再生事端,万难收拾。彼时欲筹和议而不能,欲顺舆情而不得,为患岂可胜言乎?应请旨飭令毛昶熙等委派官弁,将王三、武兰珍解送京师,暂交刑部看守。倘该犯或有途中逃逸、捏报病故等情,定惟官弁是问。然后我皇上明谕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同审讯,确取王三、武兰珍实供,乘公定议。再奏奉谕旨,宣示中外。明知该犯等无知愚民,不足以上靡宸虑,而案关中外构衅,王三、武兰珍为紧要关键,不得不提讯办明,必如此而后洋人之冤雪,必如此而后士民之惑解。不独曾国藩等办理此案之心可表白于中外,而疑窦一消,时局自定,从此中外可相安于无事矣。”

同日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奏报派员解送已革天津府知府张光藻等情摺称:

“二十一日……午刻据顺德府知府任道熔飞禀,自接臣初次严札,即力催该革员于十八日带病启行。又据十七日派出武弁驰报,十九日在柏乡县途次接遇,委系力疾趲程。并据原派解员候补知县张光镛等禀同前由,复经臣派保定府通判吴保琛驰往望都县一带,严飭革员张光藻及历派各解员,由便捷小路兼程前往,不准绕道省城,以期迅速。至刘杰一员,二十二日亥刻据密云县知县唐钺、原派委员后补知县王霖禀称:‘押解该革员,于二十二日星驰赴津,不敢延误。’”

同日著直隶总督曾国藩等查奏王三即是王二之实在情形事上谕称:

“前据曾国藩奏‘王三屡经翻供,现已释还’,本日据给事中胡毓筠奏‘请将武兰珍、王三解京会讯,以释群疑’等语。前罗淑亚来京告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三并无其人,所获之犯的系王二,并称武兰珍到案并未受刑,其意疑系有串供诬扳等情。嗣据崇厚面奏,所获王三实系王二,与武兰珍所指之人籍

贯、面貌亦不相符，该给事中所请解京会讯，自无庸议。惟王三即系王二一层，该督并未具奏，著曾国藩、毛昶熙查明实在情形具奏。至武兰珍为此案罪魁，该督等是否审讯明确，将来如何定拟，并著一并奏闻。至缉拿正凶一节，著曾国藩等慎遵昨日谕旨，严拿务获，迅速筹办，以免洋人另生枝节。”

同日法署使罗淑亚为妥善办理天津教案事致奕訢照会称：

“照得天津酿成之变，至今已经两月有馀，本大臣难言。除中国未用办理之善法以息本国忿恨之气外，又且中国官于办理此案各种情形于心实有不平，且难望本大臣仍前遂汝在事者愿为之人而有损本国之体面，并有亏本大臣在贵国应行之保护。论天津滋事之百姓，因有主使，在领事官署杀毙领事官暨副领事并在署之客官夫妇及商人等，在教堂中惨杀教士，在仁慈堂中辱杀贞女，并将领事署、天主堂、仁慈堂等处财物抢掠一空，放火烧毁，擅敢拆取本国旗号；此情已属可恶。若论可恶之再能加等者，即恶徒惨杀过情之残忍。至过情之详细，万口传播，大约贵亲王暨诸位大臣皆已详闻其备细，本大臣伤心惨目，不忍再执笔书矣。试问正法凶犯及按第一合理之公正办法，至今有何已行？竟无一毫。且从前之情形有可惜之处，现今之情形实有可责备。夫责备者何？即一切奏摺、公文、信函所言，皆将凶犯之好处代为表出，将被杀负屈之人要定断辜。所欲定断者，乃系天津居民先信毁谤教堂及陷害教士之谣言，由此积疑成忿，激出事端。是焚杀虽惨，尚有可原，因其信谣而至也。相似中国之意，至今总归于不但不正法凶犯，反欲轻减其罪。虽然，本大臣恳请并不能得满足之妥善，至今日复一日，相随者不是从前之真来往，现惟心中不服之情与日加增。

“再……诸贵亲王准许指明中国官褻慢之行为，即在本大臣告天津府县及陈国瑞事内昭显。查本大臣在津郡之时，不肯讯问该官犯，谓此犯应由刑部核办；迨本大臣甫入都门，即闻将该官犯又解回津郡。如此办理，未审有何可取？……况又闻被告之三官犯，二人脱身北行，一人往南奔避。至于太平之完结，无人比本大臣之尤欲。惟至此等之完结，必须中国心地开展，洞明法国所受之害过重。故所应用之办法，惟妥善可补，仍应筹画出常，乃为匀平。”

8月25日(七月二十九日)著直隶总督曾国藩等飭属尽数缉获真正凶犯事上谕称：

“此案缉拿正凶一层，叠经谕令曾国藩督饬地方官严拿务获，乃时将两月，尚未有头绪，未免迁延。兹据丁日昌奏称：‘到津后会同勒限府县购线悬赏，务于数日内将凶犯缉拿。’并称：‘如此大案，总须缉获四五十人，分别斩、绞、军、流，或虚抵多而实抵少。将来凶犯供无前任府县指使，则府县之不能正法，更不烦言而解。’所筹不为无见。……惟此次杀毙者，除法国外，尚有俄、英、比、意等国之人，早成连横之势。且未将为首滋事及下手之人讯明议抵，不但不能与之评理，即议赔一层，亦难论及。曾国藩仍当严饬丁寿昌等先将真正凶犯赶紧尽数缉获，会同毛昶熙、丁日昌、成林悉心研究，按律分别惩办，断不可再有迟逾。至议抵之后，彼时在我有辞，而各国以贸易为重，则因势利导，所议各事或不难一气呵成。

“张光藻、刘杰现已到津，即著曾国藩会同毛昶熙等讯取该革员等确切亲供，先行入奏。丁日昌所调杜文澜一员，已谕知马新贻、张兆栋飭令该员兼程赴津。容闳等业经陆续前来，足敷差委。冯柏年、赵新自可无庸调取。如必须该二员调津，再由丁日昌奏明，候旨办理。”

8月26日(七月三十日)曾国藩奏报已革天津府县到津日期及办理津案情形摺称：

“臣国藩查该府县自六月十六日撤任以后，即行请假离津。臣初见该员等本无大过，不欲于撤任之后更予重咎，故各允其所请，其时尚未奏参也。迨罗淑亚到津，照会臣处，欲将府县拟抵，臣与崇厚酌定革职交部，皆在府县离津数日之后。不惟该员等不及闻知，即微臣初意亦不及此，实非奏参后仍复纵令潜逃。其后奉到七月十一日改解津郡之旨，仰体设法保全之意，即经飞檄催提。而该员等一往顺德特就医药，一往密云安置眷累，相距较远；臣檄臬司委员分提，飞骑兼程而道途回远，水潦阻滞，未能迅速到案。其张光藻以十八日由顺德起程，刘杰以二十二日由密云起程，业由钱鼎铭专摺驰报。二十五日刘杰解到天津，二十七日张光藻亦已解到。臣等拟即会同丁日昌当堂审讯，取具该员等切实亲供，奏明办理。……至拿犯一节，现在已获三十七人，仍严饬地方文武员弁认真购线，将在逃首要凶犯尽数弋获，一面设局派员隔别研讯，不任狡展。首者拟以实抵，从者拟以军、流。如此分别严办，庶足以杜外患

而消乱萌。”

同日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奏陈民气不可挫等五条摺称：

“一、民气不可挫折也。查此次民夷构衅，虽属惑于讹传，实系激于义愤。自列祖列宗以来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所涵濡，薄海臣民，均知同仇敌忾，目视夷人之欺侮中国，实有不平，一旦触事而发，不能自己。此正民情之可见，邦本之不摇，堪用之势，制夷之资也。查夷人向来所畏者，中国民心之固结。故每遇拆毁教堂、杀毙教民之案，不敢与民较，而极力与官争，欲藉官抑民以泄其忿，其不敢轻犯吾民可知矣。诚恐办理夷案者顾虑太多，优容夷人过甚，不暇曲体民心，使民志不伸，其心必散。一旦涣然解体，夷人益无顾忌，愈肆鸱张，虽欲再用民力，而民气不可复振矣。况津民积成愤怒，万一操之太促，抑之过当，办理稍有失乎，或者激生他变，尤事之不可不防者。臣愚以为当益鼓其忠义，而力镇其嚣张，使之能发能收，可静可动，常有凛然不可犯之意。夷人所忌惮而不敢恣纵，亦足隐夺他族之气，而增重中国之威。

“一、赔款不宜轻许也。国家岁入有常。此次军兴，正供不足，半取资于厘税，得以底定东南。而自夷人各口通商，百货被其包揽，除海关而外，厘税已远逊从前。是以陕甘云贵兵饷不敷甚钜，济以百万罗掘，而缺乏如故。幸自上次赔款二千四百万陆续抵清以后，海关四成洋税始归我用。若再许以大宗赔款，不惟海上有事无力应之，即内地剿贼军饷亦无所取给矣。查夷人用兵，兵费严重，向来取办于洋商。若令涓滴皆出自洋商，设遇狡焉思逞，洋商顾惜资本，或阴从而牵制之。若再许以钜款，竭我之脂膏，增彼之利器，使得转以害我，甚非计之得也；何如靳而不予，留我富强之本，常有余力以制之，使夷人不敢轻动耶？历代以来，中土积弱之势，半以精华耗于岁币，欲自振刷而不能。前事之失，可为殷鉴。窃意夷人此次积忿较深，索我赔偿之费必以千百万计。是在办理夷案者坚持定见，如其所望非奢，或可量示体恤；凡无厌之求，一概不许。要当多留余地，为中国自强之计，不可专图目前息事已也。

“一、武备不可遽弛也。夷人贪而无耻，狡而无刚，现虽肆意要挟，万一见我民固结，兵备渐增，知难而退，徐图再逞，亦事之常有。万不可因一日之息争，遂以和好为可恃。既已开此衅端，不能禁我之设备。或以保护洋商，或以弹压内地为名，分扼海口要隘为久驻之计，良将精兵断不可轻易遣撤。此外沿海沿江均当从今整顿，水师而外，助以陆师炮台，务使夷船往来之所、洋商住扎之区均有所顾虑而不敢轻发。伐谋于事前，较应变于事后，事半功倍矣。

“一、将材急宜多备也。此次事起仓猝，除李鸿章而外，几无可应调之人，幸而甫经到关，尚未督军深入。且仅天津一处有警，尚可移缓就急；万一各处同时有警，又将何以为计？查曾国藩、李鸿章皆统兵十馀年，转战数千里，身平巨寇，于将材素皆留心。应请飭下曾国藩、李鸿章慎选谋勇兼优、战守素习者，或足独当一面，或能自领偏师，或长于陆路攻击，或长于水师操纵，各举贤能，不拘一格；或使之练兵待用，或使之驻守要区；庶劳于求贤，逸于任人，有备无患，不至临事无可驱策矣。

“一、沿海宜多修堡垒也。夷人之利器恃乎炮，而炮之灵便恃乎船，若登岸则笨滞矣。如于沿海四五里外船炮力不能及之处，使居民皆以堡垒自卫，则民气愈固，处处皆与夷人为敌。仅留一线内河，官兵以全力制之，较易著手矣。查山东、直隶民俗刚劲，自遭捻乱以来，于堡垒之利、修筑之法，已习见而习闻之，若再教以夹墙、地道避炮之术，精益求精，必能家自为守，以辅兵力之不足。万一不得已而用兵，战胜之后，尽驱夷人于海外河口，扼以重兵，兵民合力，不使更得内犯一步，亦一劳永逸之策也。”

8月27日(八月初一日)法署使罗淑亚为正定、保定二处教堂被兵官扰害等事致奕訢照会称：

“日昨本大臣派德翻译官前赴贵衙门，为‘正定府现在情形，该处戴主教足以见几离开往他处借居’等情。本大臣查今日方得有新闻言之甚详。在该处所有曾中堂之兵，因奏摺中有‘该教堂之门终年扃闭’之言，想欲查看，故相聚多兵，敲开堂门。经看门人向其拦阻，伊等不服，强入如逛任人往来之处，随便各屋各院恣情游历，并升房屋之顶。所牵之马将堂院中所种花草尽皆践踏，并伤损物件。虽未与教士用武，曾向教士询问：‘你堂中共有几人？有俄国人否？皇上不准杀俄国人。’并问堂中之银放在何处。

“查此等非理之人，不皆是兵，尚有顶戴之官。当经堂主报明该处知县，知县随即张贴告示禁阻，并

派差役二人守门，竟属枉然。且该兵弁一口同音，言‘此来者特为除杀在天津所住之西洋人’。且管此兵者，系一总兵官，乃曾中堂之晚辈。愚民闻之，更信所言为实。幸而来津之兵船日见增加，足以保护完全。

“又查保定府城外向有天主堂置买房产一所，为施药铺，凡有贫苦之人有病无力买药者，此处施舍中国药材，并不取值。伊等起意要烧。又查有同重一般之情形。昨天有崇宫保向美国钦差言及李宫保现到天津，有贵亲王二次相告此事实系乌有；昨德翻译官在贵衙门亦闻此言。本大臣实问：为此欲谁受骗？照本大臣所论，李宫保来否，无不妥善。所不妥者，即明知其欲至而尚言否；仍有不妥者，即在天津暗集多兵，名有保护洋人之意，其实视该兵无束之发，显已见有保护之对面；再不妥者，即是将所言之不妥处推置不理，即如天津所办之案，现已两月之久，至今仍如初日。”

8月28日(八月初二日)恭亲王奕訢等奏为接法使照会津案仍归咎官吏为主摺称：

“臣等于七月十六日将法国使臣罗淑亚自津回京赴臣衙门面议天津一案各情缮摺密陈在案。兹于七月二十六日接据该使臣呈递照会一件，累累千言，其词意不甚可解。大致以天津案未得妥善办法，仍归咎于已革天津府县及提督陈国瑞。且称‘法国受害过重，所应用之办法，应筹画出常，乃为匀平，并望于情法两得其平’等语。又据送到洋文一件，声称‘文内述天津滋事情形甚详’，并谓‘此件已钞送各国使臣’，若欲执以为据者。当经臣等将前件洋文交同文馆洋总教习丁韪良翻译汉文去后。

“臣等以天津一案头绪纷繁，若不将自始至终实在情形详细列叙，正言切论，不足折该使臣悻悻之气。当由臣等公同商酌，给予照覆，备述此案颠末，告以‘理所不能办者断不能以曲从；理所应办者，必当如其分量’，仍归到该使臣‘情法两得其平’一语，以箝其口。”

所附同日奕訢为津案办理必须情法两平事致法署使照会称：

“查中外办事，诚(之)[如]米文所云‘必须情法两得其平’。天津一案，若不将自始至终实在情形详细列叙，即“情法”两字，亦属无从悬断。此案津民发难之始，实因匪徒迷拐幼童，妄疑教堂主使而起。其杀伤领事之地，系在通商大臣署外，并不在领事署中。当丰领事往见崇大臣时，若不向崇大臣连放两枪，即放枪后能听崇大臣劝阻，暂在通商大臣署中躲避，亦不致遽为津民杀毙。即如贵大人古得力亦同丰领事到通商大臣署中，彼时经崇大臣留在署中，事后用轿送往紫竹林，即未被害，岂非明证？惟丰领事执意冒险出署，又向知县放枪，致伤县役，津民因而激怒，聚众逞凶，当时情形共见共闻，实系如此。本衙门暨曾中堂奏摺、信函，不过据实声叙此事缘由，究竟该民等不得因见此放枪情形，遽起恃众杀人之意。是以于津民轻听谣言焚烧教堂，曾中堂力为奏请剖雪，重新兴修，而于逞凶妄杀之匪徒，现亦严饬拿办，并未尝谓其情有可原，欲减津民之罪。将来正凶抵罪，即可不辨自明。此外被杀之客民夫妇、商人、教士、贞女，亦均惨伤之至，实系可悯，除拿获正凶议抵外，中国自应设法体恤；抢掠之财物，中国亦应照数赔偿。前次照会，业经大概言明。

“至‘拆毁旗号’一节，实属愚民无知，不晓轻重。曾中堂前经照会贵大臣，中国现在钦奉谕旨，赍奉国书，亲赴贵国，以明大清国大皇帝、大法国大皇帝永敦和好之谊。至天津一府一县，业经因办理不善，革职讯办。先系解京交部审问，因贵大臣赴津，是以改为解津，以便就近听取供词，乃本月十一日甫经奉旨。不意贵大臣已于初九日由津起程回京，遂而相左。现在该员等先后到津，当由曾中堂、毛大臣讯办，不日即将供词送京，一并交部核办。陈提督本系过路之人，前准德翻译来署曾经谈过，并无干涉。崇大臣来函亦云‘陈提督在寓，闻知通商衙门有洋人放枪，赶来看视。其时教堂已烧，崇大臣在衙弹压，适该提督过桥而来，旋即走去’，曾向贵大臣谈及。昨崇大臣到京，本爵面加询问，亦如此说。是陈提督之与津事无涉，确有可信，亦与德翻译在署所称并无干涉之言吻合。总之，此事理所不能办者断不能以曲从，理所应办者必当如其分量。津民聚众逞凶，杀毙丰领事并贵国男女多人，自应赶拿正凶，以之抵命，方为办理持平。本爵应再咨催曾中堂、毛大臣严饬该地方官迅将正凶按名拿获，毋使一名漏网。现已拿获多名。其缉拿未能尽获者，仍饬严拿务获。其府县供词，亦即确取送京，交部核办，毋任再迟，以副贵大臣‘情法两得其平’之意。”

所附8月26日(七月三十日)法署使罗淑亚为德翻译官从无原谅陈提督一语事致奕訢照会称：

“查贵亲王照覆内有德翻译官之说，不得不辩。按德翻译官向本大臣所云，从无原谅陈提督之一语。不必将德翻译其人入于强护之人丛中。”

所附罗淑亚送到《天津滋事记》载：

“罗大臣闻得法民在天津被害，遂尽力查访行凶者为谁，刁唆者为谁。于未出京之时，据所查情形，天津府县与提督陈国瑞罪皆难辞。罗大臣即将此情达之于曾制台，请为详察三人所行，严究惩办。阅数日，即赴津得有确据，使此三人无可推诿。于是复为恳切函催制台将此凶犯究办，内云‘军律既行于天津，审问无须遵循常例’，惟恐延宕时日。若速行结案，既可雪法国之冤而息其仇恨，又可平靖地方，令津民尽知刁唆行凶之辈国法必不轻纵。无如曾制台不能与罗大臣意见相同，其情形遂益难办。罗公使以为当将所以请将府县并陈国瑞正法之故达之总理衙门与各国钦差皆知，然欲以所告三人事端一一详述，必先由曾制台所查为始，方知三人所行何其奸诡、何其凶残。据制台所查明确有：一、民间谣言所告西人与奉天主教之人情事，全系子虚无凭；二、此谣言系由官绅播散，总未见出示（辨）[辨]其讹；三、在天津各衙门，未见有人民以迷拐幼孩之事控告存案。于五月二十三日，法国领事官、副领事、住署之客、教士、贞女，并法俄商人等尽皆毙命，凄惨可悯。其凶险情节无须追述，所要者惟将三人所行据实指明。

“至知府倚恃曾制台保庇，自莅任以来三月之久，常以天津官员谨遵条约为怪，且以遵约为新任官员软弱无能，此语在案可考。但以言语不足泄恨，复以鬼计耸动人民，或以威逼之，使民之轻信者共怀忿怒。揆其意见，乃唆民使以行怪情事人告，虽无稽之谈，民易入耳。此等案件，于能者办之，足以鼓动民怒。适得二人口供讹诈，然二人力弱，所供反复无定。该府将伊等立即致决，乃令知县将二人速行正法。彼时军律尚未宣示，然知县亦未敢谏阻而不行。查按律审断命案，义例多端，该县竟不按律，实为越权而行。此案既与知府牵连而不可脱，至令府县二人互相推诿。知府既得知县同谋，绅民又呈送万民伞并牌位以志感戴。此二物，民有受逼压而捐助者，盖若不捐，则将指作汉奸偏向西人而汕谤之矣。讹诈之口供已经成功，该府所指明道路，民无不欣从。然民所献之物，该府辞而不收，云：‘予作乃分所应为，正法二人，不过开端，予所图乃更有重大之事耳。’该府既知所为皆顺民心，遂率知县出示，愈加煽惑。而口供讹诈之三人，有一尚存，名武兰珍，伊所供与告示之意符合，似作实据：言曾被教士所使之教民迷住，又指明有王三者以魔术引诱人民入教堂。所供之事，民皆喜听，互相传播，既被府县告示耸动，更被供言激发。官员遂借安慰民心为名往查教堂，终无所得，惟扬言曰：‘西人护庇罪犯，不肯交出。’查验教堂与教士住宅时，武兰珍不能指出一物以证其所供。众民于门外拥挤，官员不欲民知查验之无效，遂带武兰珍而回。窃思该犯若令当众食其前言，则事必中止，或知府一言而众怒顿释。适有人以情达于崇大臣，府县于是回署，竟任陈国瑞与河旁人众成其事。知府在衙门闻听鸣锣，火会尽集，各带器械，豫备放火杀人，烧毁公所、教堂。知府闻见人声大哄，出衙，但见火焰冲天；以为此事渐已成功矣，遂仍进署，听任所激之凶徒肆行污毁、拆坏仁慈堂。阅数日，知府见其同谋者于各省均无成功，国家于京师又极其防范此等凶恶，遂虑及所以饰非之法，自谓莫妙于捉拿教民用刑，逼令认罪。但未敢明拿教民，便设计出示，许有捉拿罪犯者皆得重赏，内言不可捉拿教民。后有数人随即拿到，诨意除一人之外，尽系教民，而此人曾领仁慈堂茶粥，身上带有牌照，皆遂用刑使之承招。酷刑骇人听闻。有一人因不肯承认，遂将香炷放于背上，以炙皮肉，如此七日。终又将香炷置于鼻孔中内，以熏烧之，更将骨节挫搥。武兰珍从旁指使如何讯问。教民受此酷刑者今有二人，生死未定。知县于五月二十二日，往领事公署，以危言对丰领事云：‘若不立即用邪术之王三等交于我手，则众怒难逃。’次日领事出崇大臣之衙，欲死于公署。该县唆动百姓，令众攻之，从后喊叫曰‘追赶，追赶’。丰领事已受重伤，即对知县放手枪，惜未打着。知县回署，遇有仁慈堂孩童聚集多人在彼，并若干凶迹，带血插于枪上，中有贞女之两手。时有兵丁当知县目前掌责幼童曰：‘这是为你的婶婶。’该县观看甚乐，听兵丁自夸强奸凶杀之事。

“更有一事，足使为其罪状明显。查私造兵器，虽为例禁，该县于此事之前，已令人制造，今于天津铁铺有兵器出卖。府县所作明为豫谋。盖于二十二日二人偕往崇大臣衙门，欲窥崇大人之意，劝其相从。崇大臣答云：‘天主之道，最为良善。民虽遵行，不致作乱。何以如此逼迫？’可惜崇大人以正言相

规,而二人不纳也。至提督陈国瑞带兵至津,已有数日,早怀不良之意,为官员所素知。迨事端即出,伊离船头,进客店,复骑马独至河岸,与领事公署相近。彼时浮桥经崇大人解开,实有救乱美意。无奈陈国瑞擅自令人将浮桥搭上,致害命流血之众凶一齐渡河。更以语言勉之曰:‘烧罢烧罢,予必借汝。’闻知天津有好孩子,灭外国人罢,毁坏他们房屋。’查陈国瑞平素所行皆与此相类。两年前捻匪抢劫河间府教堂,伊与分赃。伊北米岂无留迹于金陵、镇江、扬州等处乎?且以大员遇此事强辩,欲置身事外,自谓焚杀之时在船上与童子作乐,更当作何等人品呢?兹所引之事,皆有见证可据,足可考信。若徒以风闻而绝无确证,则一事均不敢记载也。若以西法审问,明查证见,三人更无可逃。既在中国,而曾制台并随员冷心缓办,确据尚有如此之多,实出望外。天津居民,无论中外,凡罗公使所得遇见者,无不随口一辞,以为府、县、陈国瑞三人罪状昭昭。惟曾制台视此证据当为捏造谣言,盖制台谓三人无辜而护庇之也。罗公使到津,制台遂令伊所告之三人出境,不使其先能辩明无罪,实为奇怪。府县固未亲手杀人,死者皆被火会等凶手所杀。凶手之姓名在人口唇上,甚有云听人自夸扎死丰领事。行凶之辈固当惩办,然中国之刑部,先当究治起意主使之入。国家若仍如五月二十三以来优游蹉跎,则不免有伤国体。不但法国,即天下各国,必致轻看;国弱无力惩办凶徒,或从恶谋而不愿惩,实为之惊然而深思也。”

8月28日(八月初二日)著直隶总督曾国藩等将津案在逃首要各犯尽数弋获事上谕称:

“……罗淑亚于七月十三日到京后,词气尚为浑涵,现因时隔两旬,津事尚无头绪,遂致主使证据之说持之愈坚,此其明证。若再不迅速办理,此后波折愈多,收拾愈难。曾国藩等务当督饬地方文武员弁认真购线,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弋获,讯明惩办。其现获各犯,亦著详细研究,务得实供,毋任狡展。成林到京后,毛昶熙计已交卸,仍著暂留天津,会同曾国藩筹办一切。丁日昌于洋务情形素称熟悉,此次兼程到津,筹划各事均极认真,即著帮同曾国藩等悉心妥办,务协机宜,以副委任。洋文内有牵涉陈国瑞之语,并著曾国藩等详查确访,据实奏闻。”

8月29日(八月初三日)著直隶总督调补两江总督曾国藩等详讯口供以期早结津案事上谕称:

“提督刘铭传久经战阵,忠勇过人。兹经英翰遵谕令其北来,该提督即于上月二十九日由六安起程,循淮下驶,取道山东赴直。……现在天津之事虽未就绪,尚不至即形决裂,若遽令该提督带兵赴津,恐滋洋人疑惧。前据曾国藩奏‘铭军系百战之兵,但驻防过久,恐于战事稍疏。若令刘铭传亲出统驭,不难顿复旧观’等语,该军现扎沧州、静海一带。即著曾国藩传知该提督驰赴该营,督饬所部将士勤加训练,俾此军悉成劲旅,以备折冲。万一洋人难以理喻,衅端自彼而开,朝廷必假该提督以事权,用展其才……”

“正在寄谕间,据魁玉奏称,两江总督马新贻猝被行刺,因伤出缺,已将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著李鸿章补授矣。……李鸿章现在行抵何处,著即驰赴天津接篆。所部各军,仍著分饬郭松林等于直隶边境获鹿一带及河北彰德、山西平定等地方分扎,以防回匪窜扰为名,不可稍动声色。正定一带,近闻有游勇滋闹洋人教堂情事,著曾国藩、李鸿章檄饬各营将领就近弹压,兵民毋得从中构衅。倘有假冒该营勇丁及别处游勇藉端滋事者,并著随时访拿惩办,绥靖畿疆。”

同日法使罗淑亚为广平府武汝清又欲谋害教众事致奕沂照会称:

“本大臣新又接到广平府教堂来禀,言前与天主教为仇之武汝清今又乘机谋害教众。伊自闻天津之变,恶念复萌,主使为非之人于六月初十日闯入教堂。此系第三次劫抢。经本大臣前在天津请曾中堂委员查办。而所委之员甚无力量。因此特请贵亲王十分用心,妥速办理,不然怕该教堂之鄂教士难无伤害而出危险。”

9月4日(八月初九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陈奉调赴直沿途情形片称:

“臣于初四日行抵井陘,当经奏明暂驻获鹿……”

“至正定教堂一节,臣于初三日过平定州,接总理衙门函称‘七月三十日法国德翻译官面述,正定教士函告城内讹言繁兴,欲与教民为难。又有勇丁放言骚扰,闻系臣带来弁兵,路过该郡’等语。其时臣军均尚在晋西,距正定甚远,并无一人一骑前往直境,何得先有路过骚扰之事?臣沿途所过地方查拿游勇滋事,擒杀不少,营规尚为整肃。惟恐别处弁兵冒充臣营,造谣生事。当经飞饬正定府县严查惩办

去后。据正定府刘秉琳等稟覆“该教士戴济世七月初旬已他往，留洋人梅慎思等两人代管教堂。在城居民，并无讹言，亦无游勇滋扰”等情。适正定镇总兵谭胜达迎谒臣于固关，面询该处静谧如常，兵民与教堂毫无干涉。自系闻臣将至，豫为惊疑遏制之词，彼族恒情，固无足怪。臣拟率亲军马步先至保定布扎，略为休养，料理一切，再行赴津接篆。”

9月9日(八月十四日)俄署使布策为催办天津教案事致总署照会称：

“天津伤害俄人三名已逾两月半之久，无论迭经贵王大臣来文当面取信，所言定将该犯拿获，而办理此案可谓之尚无影响。月余之前即系七月初六日，天津总领事据管理三口通商崇大臣来函，得知获贼五名，乃因其口供不确，飭再悉心研鞫。嗣以地方官照会总领事，得知该五贼之内有质证讯出毆死俄人者三名，而不日乃显得如此质证讯出之人数不实。缘总领事请毛大人将查拿案犯甚属迟延改为迅速，是以天津道府与孔领事七月二十四日照会则称‘供认毆死俄人者但一人而已’。该道府知照犯供，亦以其恳求免罪释放之言为可入，文称：‘因伊实心悔罪之故也。此后是人真犯其罪，盖无所疑。’然委派查核事宜，天津官员并无此意。八月初七日毛大人以‘道府面禀该犯虽曾供认伤害俄人，而至画供时又复翻异’等情知照总领事，以此可拟贼犯未画供之先所认者全无益矣。若果如是，该贼认罪求恩之时，何故未令其画押乎？毛大人知照总领事‘现获人犯虽多，皆狡展所告之罪，并供词闪烁’等因，其于证约应不少，而未见其查获；质问‘其滋事虽系白昼招集多人，地处街市，而足能质证人犯之据全无齐集。’……其查办此案应进而反退后之故，本大臣不能详明于本国。天津地方官以‘津民惶惶之形疏于办理，甚易复于激怒’等情，迭请总领事轸念。盖该处官员不恃以天津兵有数千，而犹恐另滋事端，本大臣不能识其所详也。……本大臣迄今尚未见天津按理事之音，相应预知贵王大臣；其后天津官员避于办理伤害俄人一案所委之任，定激本国生怨；而因本大臣不能将不理本国甚属公平之冀之由申明于本国，其怨更深矣！”

9月12日(八月十七日)恭亲王奕訢等奏陈津案正法人数尚少请令李鸿章迅驰天津会同办结摺称：

“……本日复由军机处钞交曾国藩奏称‘审讯滋事各犯，确有证供应正法者，得七八人；略有证供应治罪者，约二十余人’等语。……查此案情节既大，各国伤毙商民亦多，若正凶仅讯出七八人，即揆之中国寻常命案，亦难议结。……请旨飭令李鸿章迅速驰往天津，会同曾国藩等督飭承审各员，将案内得有证供各犯，再加严鞫，务期确凿允当，妥办早结。”

9月14日(八月十九日)恭亲王奕訢等奏为津案渐有头绪请仍遵前旨将陈国瑞伴送至津摺称：

“本年六月二十五日钦奉谕旨：‘提督陈国瑞现在京城，著派员伴送赴津，听候曾国藩查讯。’……维时臣衙门以罗淑亚在津，其势汹汹，有欲置之死地之心，即经奏准暂缓前往。现在此案渐有头绪，已革府县均经递有亲供，应即仍遵前旨，请由神机营王大臣，令原派人员伴送至津，以凭查讯，讯结仍伴回京。

“再，本月十五日，接据曾国藩函称‘有案内凶犯周起隆在京，藏于该提督寓所’等情。请旨飭令该提督交出，由曾国藩等一并讯办。”

9月14日(八月十九日)恭亲王奕訢等奏报近日与英使辩论津案情形摺称：

“兹于八月十一日，据该使臣递到照会一件，累累千馀言，大意以迟延咎中国，以兵力为恫吓，其措辞甚为难堪。臣等公同商酌，拟令该使臣收还照会。连日前往英馆极力辩论，并告以办理此案中国实系认真，现已将次就绪，可以无庸递此照会，本处亦无可照覆。再三辩驳，惟该使臣语渐驯顺，而照会则不肯收回；并称此件原望中国办理之实心，亦不必定须照覆。臣等刻又密催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迅速筹办，务于本月二十三日将已革府县及各供册送部核办，并将现今讯实之正凶先行拟定罪名……”

9月15日(八月二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预计抵津日期并津案不宜杀戮太过摺称：

“臣于十二日行抵保定。……兹定于二十二日起程赴津……”

“惟曾国藩函称‘现获各犯，供认可正法者七八人，应分别议罪者约二十余人，拟于二十三日先行

奏结’等语，该督臣亦知洋人伤毙较多，要犯议抵，办不及数，难免饶舌。惟津民万众齐心狡赖，又事后深知悔惧，或远扬无踪，或坚不吐供，不比一家一人之事，可以尽数吹求，无碍大局。自丁日昌到后，穷搜力索，捕治已极认真，事关动众，尤虑刑逼株连、附会罗织，致成冤狱而激民怒。不独非中国政体所宜，即揆诸各国平素道理‘不肯轻易杀人，传教专为行善’之意，亦微有不合。所期日后与民相安，岂在一时快意仇忿？若欲示以警戒，正法八人与议罪二十余人，办法不为不重，远近必皆寒心。臣窃料以后各处不至再有此等巨案。若杀戮太过，实为洋人永远之患，尤非各国厚待中国百姓之心。想总理衙门王大臣，必已与各国使臣详切开导矣。巨力所能及，当随时督饬地方官设法访拿讯办，断不肯略存袒护，致令洋人含冤；亦未便过事苛求，转令百姓解体。”

9月16日(八月二十一日)美使倭斐迪为津案惩犯不力致使山东教士不安事致奕沂照会称：

“昨据山东蓬莱县美国狄教士等禀称‘本年七八月间，本地人忽流言“八月十五日济南府有兵到，为天津滋事之故”云云，因而义学中学生散去，舍中雇工等均行四散。当经告知该地方官请为保护，伊推脱公出。因谣言云陆路危险，是以致函告急于烟台美国荷领事；彼时无美国船，遂求救于英水师提督，蒙派兵船二只，直往蓬莱接护本教士眷属人等十八名，一齐下船暂避危地，于初五日抵烟台。至于所遗房屋，已有教士二人拟交与地方官照料，方往烟台。现今请问保存什物之法，并可否搬回’等因前来。

“本大臣未函覆该教士，先行照请贵亲王该教士搬回之事，并踌躇华洋不相安一节。在山东港口居住之洋人，自天津震惊后，本地民及绅士查其情形，有睚眦相视之势，不似旧日之和衷。推原其故，或百姓突怒，藉口欲申失孩之冤；抑或被官绅无故唆怂，怀恶洋人，欲将法人及天主教齐灭之；抑或各国所居一带地方，俱欲同时一律尽灭。本大臣不必细究其故，但论天主教挖眼等谣言，南省各处播扬，最易相信，虽有上谕及曾相剖辩明白，百姓视同虚语，而各港口仍信谣言，皆因各绅董故意惑乱民心。如其抑制谣言，自然华洋和睦；如怀恨洋人，唆怂各处洋人驱逐，必至酿成大患。即如津民现今仍不悔屈杀无辜之罪，民间刻图印于扇面，上画烧毁教堂、流堂中之血，欲传后世，遍告天下，以为快事，当经曾相严禁乃止。迄今三月之久，未闻何犯定罪，是坚津民之心，视此事为无紧要，民亦不以犯国法为非。

“兹闻贵国防御调兵在直隶、山东屯集，而喜乱之民愈簧鼓而肆其谤张，以至商人教士各不能安心。狄教士等闻济南府调兵二千，欲于八月十五日杀洋人，故其教友及跟人劝其速逃，恐难过中秋节。故该教士先行逃避，皆因谣言之轮转，官府不分玉石莠良，任其滋蔓。本大臣前与各国诸大臣酌议‘若不筹善妥法，预保将来，倘再生事端，贵国何以对各国’之语，并与贵亲王、贵大臣商办天津滋事凶犯及唆怂焚毁教堂之人，以期迅速了结，宜在各省彰明出示‘凡传教者原以劝人行善为主，岂肯自作残忍之事？无论何国洋人定不为此’，并晓谕人民不必信谣云云。复查在津办案之大臣，俱是延搁时日，有漠不相关之势。津郡未滋事先，江宁府获有拐孩之犯，不容分诉，即行正法；天津亦如是办理，俱昭迅速。而于无故戕害洋人凶犯，反不能迅速以申国法，于理不合。迄今各国俱惨伤洋官及贞女之苦痛，而切齿于凶徒。且津郡主谋滋事之人，津民皆加以美名，谁为恶首，不难访查缉捕。乃竟无有信讫，不能不致疑于贵国国政。似此办事，各西国向以忠诚交接中国，一旦致失其心，是不和睦之衅，中国自开其端，而西方各大国欲助中国兴盛之心，亦从此冰释矣。

“至本国与中国历来俱以秉公相与，此后若中国守和约之规矩，本国亦不出公道之范围。凡有约各国俱无因津郡一节而起兵衅之意，但贵国亦宜尽身分认真办案为是。兹请贵亲王饬山东登州府地方官设法防御，安慰教士之心，以便该教士等旋居，庶免变生不测，与天津同辙。”

9月18日(八月二十三日)调补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报分别审拟天津教案各犯摺称：

“此案事起仓猝，本无预先纠集之正凶；而洋人多已伤亡，又无当堂质对之苦主。各尸初入水火，旋就掩埋，并未验伤填格，绝无形迹可为物色凶手之资。用是漏网之犯难于掩捕，已获之犯不肯认供。天津无赖之徒有称为混星子者，向以能熬刑自诩，此次辄以为出于义愤，虽酷刑而不畏；而邻右亦不敢出面质证，恐为舆论所讥弹，又虑仇家之报复。欲求罪当情真，定案万难迅速；欲以无辜充数，则问心既有所不忍，而亦不足以服洋人之心。棘手甚多，愈办愈窘。反复筹思，若拘守常例，实属窒碍难行，有不能

不变通办理者。

“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众忿齐发，聚如云屯，去如鸟散，事后追究，断不能辨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但求确系下手正凶，不复究其殴伤何处。此变通办理之一端也。常例：断狱决囚，必以本犯画供为定，其或本犯供词狡展，则有‘众证确凿，即同狱成’之例。此案则各犯恃无尸亲，坚不吐实，旁人又不肯轻易指质，众证亦殊难得。臣等议定：本犯无供，但得旁证二人三人指实，取具切结，亦即据以定案。此又变通办理之一端也。计讯定供证确实者十一人，无供而有确证者四人，共计可以正法者十五名，拟办军流者四人，拟办徒罪者十七人，共计可科轻罪者二十一名。除即将各犯供摺咨送总理衙门暨刑部外，谨先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其情节较重讯有端倪，供证均未确实者尚有十六名，拟归于第二批办理；情节较重在逃未获者尚有十一名，一并开单先呈御览，以释宸廑。将来第二批奏结，或再办首从犯各数名，或与洋人订定抵偿实数，中国如数办到，请旨敕下总理衙门核定，行知臣等，以便遵循。此次定拟各犯，若遂速行处决，将来拿办愈难，应与洋人商定，统俟续奏二批后并案办理。”

9月23日(八月二十八日)调补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报解送已革天津府县起程日期摺称：

“兹派妥员何崧泰、彭爵麒、朱豫复等将已革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迅速解送，定于本月二十八日起程。其陈国瑞一员，顷于二十五日抵津，谨遵圣训，不复令该革员等与之质证。”

同日调补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为请将续获范永换释穆巴缘由片称：

“……前单所开无供之犯均尚不为误人，惟穆巴一名，虽亦素非安分之徒，而此次滋事，实未在场。民人高秋田等指证为砍伤富昌行洋人之犯，查明系属虚诬，其祖母穆李氏具呈天津道衙门，力诉冤屈，求为申理。其后续获范永一犯，系前次单开在逃未获之人。访查该犯，实为放火烧房正凶，曾经函告总理衙门，现由大名缉获到案，供认杀人不讳。虽未认放火一节，而面有轰伤之痕，共见共闻，查核供情，应予正法。惟先后奏定正法之犯共得二十人，办理已不为少，不必再求增加，而第一批正从各犯三十六人，他家皆不诉冤，独穆巴之祖母诉冤，查访亦无行凶实据。臣等熟商，尚可更正，应请旨将第一批内有证无供之穆巴准予开释，另将续获供证确凿之范永归案正法，以示慎重人命之意。”

同日调补两江总督曾国藩奏陈海勃天津府县并津案事出有因片称：

“再，臣曾国藩有密陈者：津郡五月二十三日之案，由丰领事仓猝激变。……府县本无大过，张光藻尤著循声。臣之初意，斤斤保全，尚不欲遽予参撤，岂肯更加以重咎？迨得罗使照会，忽有三员拟抵之说，料敌不审，勿遽失措，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又过听浮议，以为下狱以后，轻重尚可自主，遽将府县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恨。六月二十八日一奏，曾经略述谦衷，而神明之疚，实至今未尝暂弭也。

“……自七月下旬，该革员等提解到津，臣等逐细研讯。洋人主使之说，绝无影响，固已不俟多辩；即科以应得之公罪，亦犹有可原者。以崇厚统率数千之众，不能豫为弹压；以微臣办理两月之久，不能速缉正凶；今欲专责之区区之府县，亦属苟论。惟语言文告之间，讯犯用刑之际，该革员等偶有未检，此等疏忽之咎，地方官皆所时有，准以寻常之法，至重亦不过革职而止；而臣初奏遽交刑部，宜物论纷纷不平。该革员等初闻改解津郡之命，私语窃贺，以为复睹天日；及近闻仍解刑部之命，则又魄散魂飞，怯对狱吏，以为洋人仍执疆臣之原奏，终欲得而甘心。微臣之所深自负疚者此也。

“又有进于此者：各省民教滋事之案层见叠出，臣前奏查明大概情形时，本有密片未上，曾于六月二十八日摺内声明，此案议结之时，再申前请。今臣交卸在即，津案已将第一批人犯奏结，请得而毕其说。自中外通商以来，各国皆相安无事，惟法国以传教一节屡滋事端。即各教流传，如佛、道、回等教，民间皆安之若素；虽西人之耶稣教，亦未尝多事。惟天主教一教屡滋事端，非偏有爱憎也，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从教之众多，不问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滥，故从教者良民甚少，莠民居多。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遵断；赋役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迷拐人口’一节，臣六月二十八日之奏本难保其必无，六月二十三日之奏亦称魏席珍言堂中有药迷人本性。‘挖眼剖心’一节，世间原有此等折割惨毒之人，刑律亦有专治此罪之条。教中既多收莠民，即难保此等人不溷入其中。故臣前奏昭雪‘挖眼剖

心’之诬，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致。虽和约所载‘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而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也者。庸懦之吏既皆莫敢谁何，贤能之吏一治教民则往往获咎以去。此次天津府县，其始不过欲治一教民，其后竟至下狱，已为向来所未有；若部议再与重谴，将来地方官必群以为前车之鉴，谁敢与教民较量？在总理衙门及各疆吏，皆思力全大局，保护教堂；然使教中与平民太不相安，譬如父母保护骄子，为众子与乡里所共恶，则骄子之身必败，而其家必破，是护之而适所以损之。如守近年保护之法，而不思所以变计，终有决裂之一日。臣愚以为中国欲长全和局，外国欲久传此教，则条约不能不酌增，拟请议定：此后天主、仁慈各堂，皆归地方官管辖；堂内收入一人或病故一人，必应报明注册，仍由地方官随时入堂查考；如有被拐入堂，或由转卖而来，听本家查认备价赎取；教民与平民争讼，教士不得干预扛帮。请旨飭下总理衙门，可否就此次议结之时，与各公使商定，豫杜后来弊端。臣所谓有关大局者此也。

“微臣仓卒之误，于此二者未能深究。此案未定，清夜难安。目下张光藻、刘杰等人狱，天下吏民无不环而观望。相应请旨飭下刑部细核该革员等亲供，从轻定议，则可张国维而伸正气者，实非浅鲜。”

9月24日(八月二十九日)德美等四国使臣为办理天津教案情重刑轻事致奕沂联衔照会称：

“本年五月天津凶杀案内之官民，贵国核定如何办理，经致大法国署理钦差大臣罗知照，罗大臣即拟招致本大臣等咸集会议。经于昨日由彼专派属员前赴贵署，向列位大臣相告。今日本大臣等会同闻信，因思此等巨案匪但意外凶残，实与保全驻华远人均甚有关。试想三月之久，贵国秉法仅得如此情重刑轻，试问持平之理、保卫之道二则安在？”

10月5日(九月十一日)刑部奏请将已革天津知府张光藻等发往军台效力摺称：

“……派员将已革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已革天津县知县刘杰，于九月初六日解送到部。

“臣等查阅该革员等先后所具亲供，内称缘本月初八日，该令刘杰拿获迷拐幼孩匪犯张拴、郭拐二名，提讯供认用药迷拐人口不讳。十二日该府张光藻，由沧州公回，督同该县覆讯确凿，遵照同治三年通飭章程，将张拴、郭拐就地正法，一面通禀在案。二十日该县拿获匪犯武兰珍据供用药迷拐属实。并称‘被教民王三迷人教堂，许给洋银，授伊迷药，指令迷拐男女。昼出迷人，夜宿栅栏门席棚内’等语。刘杰录供送府时，因百姓讹传法国仁慈堂埋葬幼孩，多有一棺三两尸者。武兰珍供词，又复牵涉教堂，于是百姓皆疑迷拐人口系教堂所为，纷纷腾议。刘杰面禀张光藻，以拐匪借教堂为护符，必须查明虚实，庶释群疑。当经会禀通商大臣崇厚，飭令天津道周家勋与刘杰往见法国领事官丰大业，商请赴教堂查勘。二十二日，该大臣复与教士谢福音商明，令该道带同府县，于二十三日巳刻押带人犯武兰珍前往查验堂内房棚，与武兰珍供情不符，亦无王三其人。该府县出堂时，见众人拥挤门外观看，刘杰将所查情形向众人面谕，均各散去。禀经该大臣令出示晓谕以释民疑，该府县等回署遵办间。是日未刻，适有闲人在教堂门前窥看，与教堂人口角，百姓因此复聚。谢福音遣人赴诉，该大臣飭令刘杰并派巡捕前往弹压。丰大业将巡捕官殴打跑回，随带跟丁，各持枪刀，同赴通商衙门滋闹。刘杰闻信，立即前往，但闻人声鼎沸，纷传洋人在商署向该大臣开放洋枪，百姓均为不平，愈聚愈众。刘杰赶到，向众民弹压，加以开导，众民亦觉畏惧。正欲解散，适该领事丰大业由商署走出，瞥见刘杰，即对面施放洋枪，刘杰躲避，致将家人高升中伤。众人忿激，将丰大业群殴毙命。张光藻先闻锣声甚闹，遣人打探，群言丰大业在商署开放洋枪，当即飞奔前往。行至浮桥，闻丰大业已死，教堂四面火起，仓惶失措，未能先赴救护，即往该大臣署内商办。刘杰见祸变已作，一面赶赴东门外救护仁慈堂，与大沽协副将张秉铎疾趋，行至中途，望见仁慈堂等处火起，谕令火会速行救灭。火势已大，竭力救护，业已无及。禀经该大臣飭令验明丰大业并被杀之谢福音等各尸伤，备棺装殓，会同文武各官，分投各国洋行住房处所，弹压保护，众始逐渐解散。

“该革员等非特供无主使故纵情事，其何人首先鸣锣，亦不能确凿指出。至未经赶紧缉凶，亦因尔时人心汹汹，恐致激变。虽访有刘二等名，未敢遽然妄拿。惟自认‘临时不能弹压阻止，事后未能迅速

缉获要犯，实属有负委任，咎无可辞’各等供……

“巨等公同酌议，应将已革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已革天津县知县刘杰，均于革职罪上请旨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同日著将津案已革府县从重改发黑龙江并将冯瘸子等十五人斩决事上谕称：

“……该府县责任地方，乃于津民聚众滋事，不能设法防范，致匪徒乘机焚杀戕害多命，又未将凶犯赶紧拿获，情节较重。且该革员等于奉旨交刑部治罪后，张光藻竟敢私往顺德，刘杰亦私往密云，任意逗留，尤为藐玩。张光藻、刘杰均著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以示惩警。

“至津民因怀疑激忿，不遵地方官弹压，辄敢逞凶杀害至二十馀命之多，且将其仁慈堂内贞女惨杀，尤为凶残。现经曾国藩等拿获滋事人犯审明，分别情节轻重，将冯瘸子等十五犯拟以正法，小锥王五等二十一犯拟以军徒。既属情真罪当，即著照所拟，将冯瘸子等即行处决，小锥、王五等分别发配安置。”

10月7日(九月十三日)调补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报续讯津案第二批人犯定拟摺称：

“两旬以来严飭地方文武各员续行访拿，昼夜研讯，又获应正法者五人、应办军徒者四人。除将各犯供词抄咨总理衙门及刑部备查，谨开列清单，续呈御览。此次审明各犯，皆系统行缉获，不在前次附开两单之内。其前单供证未确者，除何四现已治罪外，其余再四讯鞫，迄无定供，亦无确证，碍难定罪，应即随时释放。前单在逃未获者，除杨二现已拿办外，其余购线密拿，迄未缉获，其中尤要之犯应俟缉获之日另行奏结。

“此案事起仓卒，并无预先纠集之人；其后杀人放火，万众喧杂，亦非百姓始意所能料。今中国力全邻好，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办理不为不重……”

10月12日(九月十八日)法署使罗淑亚为希酌赔津案法国所损财物事致奕沂照会称：

“……所有天津五月二十三日各处所被惨杀抢毁之天主堂、领事署、仁慈堂及法国商人等所失之财物，共合计数在二十一万两银，即希贵亲王酌量如何筹款归付之法，请即复知。如要数目细单查看，本大臣可以开写送阅。”

10月13日(九月十九日)俄署使布策为杀害俄人案是否尚有他犯事致总署照会称：

“同治九年九月十四日接准贵王大臣照会，得悉天津滋事十五名人犯被已经相示之谕旨定其正法者，内有杀害俄国三命凶犯三人。嗣又于九月十六日接到照会，咨知本大臣‘本月十五日奉旨，以天津案内又数名人犯及其内供认杀死俄国女人一犯欽定治罪’。贵王大臣见示拟抵四犯口供内，除该犯供认杀害俄国人外，其不法案内再有无他人供词，毫未指出。天津地方官送到总领事除张幅顺外，该匪亲供较曾中堂录送贵王大臣供词加细，并送到亦供认杀害俄国人张立一名口供。……以本大臣九月十三日照会所请‘见示除已拿讯人名外，或尚另有他人亦在事内，有无可疑之故，及若有如此，可否期望必经查获其人’等语尚未见复，相应再请贵王大臣以此案照覆本大臣可也。”

10月19日(九月二十五日)法署使罗淑亚为请指明如何收领天津赔恤银两事致奕沂照会称：

“本大臣于九月二十四日接准贵亲王照会，内开‘本国被害之领事各官、传教士及商民、女修士等，拟共酌给恤银若干，除分别给予领事各官、法商、修女等家属照单给领二十五万两外，其抢毁天津教堂等处财物共合计银二十一万两，现已酌定在天津关洋税项下如款归付’等语。本大臣思揣于天津关收领此银，不知如何为据，即希贵亲王指明，以便收领。至此项数目细单开送，请阅各存，计开：教堂与仁慈堂共银十一万两，法商五万两，领事官署五万两，以上共合计银二十一万两。”

10月24日(十月初一日)恭亲王奕沂等奏为将总署致法国照会呈览摺附件总理衙门为崇厚出使法国事致法国照会称：

“查初办此案之时，罗大臣尝有请将天津府县及提督陈国瑞正法之说。现在如此办法，未甚满贵大臣、贵国罗大臣之意者，实缘于中国诸多窒碍。其中一切情由，崇大臣行抵贵国，自能面达其详。且该府县等业经直隶总督曾等会同讯明，此案实由津民轻信谣言怀疑起衅，并非受地方官主使所致。今将杀人之犯均行正法，并将该革员等问拟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已属从重惩办，以儆将来。至陈提督国瑞

在津流寓养病，系属过路官员，并无干预地方之事，亦经会讯明确，应毋庸议。所有缉凶抵罪一节，中国现已认真办理，使无枉纵。其修葺教堂、赔偿遗失物件共计银二十一万两，经罗大臣照会本衙门照办在案。被害各官商男妇及女修士等，我大皇帝深加悯恻，酌发抚恤银二十五万两，开具人口银数单照会罗大臣，将来按单转为分给。”

同日法署使罗淑亚为缮送赔款银两单据事致奕沂照会称：

“谨依贵亲王所定，拟派德翻译官于天津关收银贰拾壹万两，于江海关收银拾伍万两，于粤海关收银拾万两。本大臣拟就一收领之单，以为收领之据。三处海关收到一关之银，即给一单存照作据。未知所拟之式合乎贵亲王心意否？缮清裁定，以使照行。”

《清末教案》第四册（《法文资料选译》）“二、《传信年鉴》”辑：

《中国传教区的综合报道》^①载：

“几年以来，我们的《年鉴》中几乎没有一期不刊载在中华帝国所发生的殉教事件或仇教的报道。然而，对条约的这些令人生气的残暴践踏从未有过在去年6月在天津才发生的那种残忍程度。众所周知，天津城位于离大海12法里和离北京24法里的地方，它是委托给辣匝禄圣味增爵（Saint Lazare）修会田嘉璧（Delaplace）主教阁下的北直隶宗座代牧区的一部分。正是在那里，在法国驻北京代表机构附近，为法国国旗而发生了谋凶事件，大家将会读到这些谋杀案的报道。我们将从上海传教区司库勒莫尼埃（Lemonnier）先生于7月6日写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院长先生们的一封信简中摘录有关这一教案的报道。我们将把在中国发表于英文报纸上的一些摘录补充进去。

“勒莫尼埃先生写道：

由英国邮车带来的一些电报和报纸将使你们了解天津教案。最近的某些详细的报道使我们得知，它们和大家试图得到的第一批消息一样令人悲痛和愤慨。

去年6月21日，常驻天津的所有法国官员（无论男女，可能有一、两个人除外），确实在大白天（早上九点至下午五点）都被杀害。遇难者计有：法国领事丰大业（Fontanier）先生和他的翻译西蒙（Simon）先生；从法国到北京的公使馆管事多玛三（Thomassin）先生，他和他年轻的妻子为在天津拜访其朋友领事先生而滞留于天津；遣使会会士的司库、修道院院长谢福音（Chevrier）先生和遣使会的一位中国司铎；圣味增爵会的10个修女；在天津的商人沙尔味松（Chalmaison）先生及其夫人。此外，还有三位俄国常驻官员被群氓当作法国人杀害了。在这份名单上，我们还需要加上法国领事馆和遣使会会士司库处的所有仆人，仁慈堂慈善机构所雇佣的全体人员，100多名孤儿被活活烧死在修女院内，最后还有人数不明但数量可观的一批基督徒。然而，你们对天津可怕的大屠杀将只能有一种不全面的看法。

大屠杀的详情细节更令人不寒而栗。法国领事的头颅和面庞布满了伤痕，胸部被长枪刺穿；西蒙先生被伤残到了无法辨认的程度；多玛三先生的头部、脸部和全身都被支解得很可怕，肚子还裂开着；他的妻子被大狼牙棒打死；谢福音院长先生的脑袋被打碎，胸部和腹部都裂开了。圣味增爵的修女们被他们采用难以想象的野蛮方式处死了，她们被活生生地挖掉眼睛，割下乳房，还惨遭群氓们的奸污。

听到发出信号的铜锣声后，这场骇人听闻的屠杀按时结束。当法国人被杀光斩尽时，撤退锣声响起，执行者很有秩序地撤回住地。一些官员和他们的仆从、这场流血惨案的目击者只是在发布命令时才在那里露面。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天津的所有电讯都证实了这一事件。法国领事馆、大教堂和仁慈堂的所有慈善机构都被放火烧毁而变成一堆废墟，类似的情况就无须再补充了。

基本舆论认为天津事件只不过是官员们为了摆脱“夷人”而准备在全帝国演出一台大悲剧的第一幕。在一些分布于长江流域沿岸有欧洲人居住的城市里，一个月来不断发生局部的骚乱和混

^① 译者注：译自《传信年鉴》第42卷，1870年。

乱,这一切使人对于他们在北方开始进攻的真正目标几乎不容置疑了。所以,我很担心我们在内地的教友们。他们在这些遥远的地方会采取什么预防措施呢,难道只能抛弃这些地方,没有任何力所能及的自卫手段,而听凭敌视的官员和一直准备进行抢劫的一群盲目轻率的群氓的摆布吗?

下面是仁慈的10位修女的名字:伊丽莎白·马盖(Elisabeth Marguet)会长,比利时人;若瑟·亚当(Josephine Adarn),同上;维克多·阿德雷奥尼(Victoire Andreoni),意大利人;玛丽·克拉夫林(Marie Clavelin),法国人;台蕾丝·勒怒(Therese Lenu),法国人(来自巴黎);范尚·勒格拉斯(Vincent Legras),法国人(来自巴黎);奥雷莉·勒泰利耶(Aurelie Letellier),法国人;欧仁妮·帕维雍(Eugrenie Pavilion),法国人;路易丝·维奥莱(Louise Viollet),法国人(来自图尔);路易丝·奥苏莉婉(Louise O'Sullivan),爱尔兰人。前九人是一个接一个地按照前面已说过的办法被杀害的。《华北新日报》补充说,敌人把她们的尸体挖出来,碎尸以后分给衙役们。如果相信《纽约自由报》的报道,第10个是路易丝·奥苏莉婉,她在被屠杀时逃到城市中一富商家去了。四个小时后,在返回传教区慈善机构时,由于脚上穿着欧洲式样的鞋而被敌人识破并被逮了。她遭受了同样的酷刑,并与其同伴一样被奸污。两天以后,她的尸体才在河里被找到。

谢福音先生一直和一位中国司铎胡万桑(Vincent Hu)在维多利亚圣母院(Notre-Dame-des-Victoires)祈祷,当杀害丰大业先生和躲避在领事馆的一些法国人的凶手向他们猛冲过来时,他们两个人都做好了殉职的准备。他们被拖到教堂外面,如同前文所述那样被杀害了。敌人把谢福音先生的尸体抛在河里,第二天我们在那里找到了。

7月11日,《上海晚报》报道的如下详细情况是由该报驻天津的一位记者向这家报纸提供的。人们将可以看到中国当局在这次预谋已久的攻击中表现得是多么的折中。

6月22日,能够证明中国人方面的有意策划阴谋的是我的一些在离杀人现场两古罗马里多远的地方干活的人,他们看着火灾对我说:“英国人一点也不用害怕,中国人只跟法国人过不去。”然而就在这天早上,人们看见在新教教堂的钟楼上有一个身带炸弹的中国人,这无疑是要烧毁建筑物。就在这同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另一个衣袖里藏有一支手枪的中国人。

6月23日,被杀害的俄国人一个名叫博罗特颇福(Protopopoff),另一个名叫巴索夫(Bazoff)。博罗特颇福刚刚十分高兴地举行完自己的婚礼。年轻的新娘仅有16岁。

几个遇难者的尸体已被抛到河里去了。人们根据衣服上姓名的开头字母H·F·辨认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

在帝国的许多地方,在内地都张贴有一些告示,告示上向人民指出了大家称之为“天主教”的“劣行”。

6月24日,人们在河里找到了一具中国女尸,她的打扮使人把她当成了一个天主教徒,他们认为她是在仁慈堂这个慈善机构授课。她的尸体被殴打得遍体鳞伤。

6月27日,中国人得知将要发生事端的另一个证据,这就是几天以来,家长早已领回了自己的孩子。450人中几乎只剩下200人了。此外,附近一带的某些商人由于害怕即将发生的事端,早已抛弃他们的房屋逃走了。

城市的首席官员知府早已发布了一项旨在煽动人民反对外国人的声明。6月18日,即大屠杀的三天前,法国领事已提醒崇厚(地方长官)对这项引起城市中重大混乱的声明给予注意。20日和21日,他又提出了另外两项要求,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虽然尚无一名新教教徒被杀害,已有几人被打伤,并且还抢劫了他们的住院。后来,中国人又表示要把从他们这里拿走的东西物归原主。当时其人数达500人的兵弁一直在这混乱不堪的现场,但有人说即使他们来这里了,他们也不会对此做出任何制止。

“另一家报纸《华北新日报》对法国领事之死叙述得清清楚楚:

丰大业先生本人受到了威胁,他的窗玻璃被石头砸碎了,又穿着军装走出了屋子。他叫一个

小官员(此人负责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而又不妨碍之)陪他来到崇厚的衙门,他要求人们对领事馆,对领事馆的人员以及他本人的人身进行保护。这位领事还要求巡抚保护慈善堂的修女和她们的住处,因为他早已听说仁慈修女的处境也很危险。崇厚回答说无权保护刚才向他提到的任何人。领事仍坚持他的意见,因为他手持一支手枪,崇厚出于害怕而突然跑出去了。

于是法国领事又去找另一位官员,这位官员回答说不能给领事任何援助。这次遭拒绝之后,随即就发生了一场争吵。在争吵中,衙门的一个兵弁用矛枪刺了法国领事一下,结果致使其大腿受伤。当他感觉到疼痛时,鲜血已渗透了他的衣服,丰大业先生来到衙门大门并要求让他出去。兵弁和人群似乎觉得有点害怕;但只是一瞬间的害怕。顷刻之后,他们马上向不幸的领事猛扑过去,他们用矛枪刺他,用大刀砍他。在将他令人恐怖的致残之后,就把他的尸体扔到河里去了。“下面是摘自同一家报纸的详细报道:

沙尔昧松先生得知敌人进攻仁慈修女时,便急忙向她们的住处跑去保护她们。但他在街上就被抓了,并且被碎尸。听到这一消息后,其夫人逃到一个中国女基督教徒家中,一直躲到黑夜。后来,她化装成一个中国妇女,冒险出去寻找她丈夫的尸体。经过一番一无所获的寻找后,她想再逃到女基督教徒的家中去。但是崇厚短枪队中的兵弁认出了她,并把她杀死在街上了。

在同一次骚乱期间,敌人还杀害了50名中国土著人,因为他们被怀疑与欧洲人互相勾结。

天津一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在连续几天的时间里,人们要求崇厚采取必要措施,但他仍然不予答复。这次损害如此之大的暴动完全应该归咎于他,因为他和刽子手们勾结在一起,他将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法国对朝鲜的远征于1866年结束的方式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杀害两位主教和七位司铎之后,如果不对朝鲜政府进行惩罚,那就只能对法国在中国的影响造成极大损害。中国人见到朝鲜人杀害了几个法国人后却没有人要求他们赔礼时,就猜想法国同样也会忍受另外的侮辱和新的辱骂。”

《清末教案》第五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一、直隶天津法领事、西教士等被杀西教堂被毁案(1870—1871年)”辑:

6月27日美驻华公使倭斐迪(Fredericle F. Low)致美国务卿斐士(H. Fish)函第12号称:

“本月21日在天津发生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骚乱,向阁下通报这件事,成了我的一项痛苦职责。这场骚乱导致十六名法国人和三名俄国人的死亡,法国领事馆、天主堂和仁慈堂(Sisters of Charity)建筑物的毁坏。除了洋人被杀以外,好几个本地教民以及教会和法国领事馆雇用的内外仆役同时遇难。不幸遇难的华人的确切数目迄今尚未能查清。这场悲剧于本月21日下午发生。直到次日夜间,消息才传到北京。出事地点系在华人城区,离大多数洋人居住的租界约两英里。尽管这样,这一事件却已引起天津租界内所有洋人的极大震惊,担心人们可能会不分国籍地袭击外侨居住区。由于至今没有哪一个洋人胆敢冒险进入这一发生过暴力行动的华人城区,因而使得我们对有关这一可悲事件的起因的情报所知甚少,且其中又有不少消息相互矛盾。由于大部分消息来自华人渠道,因而需要听取各方面报道才能对事件的真相作出合理的结论。即使到现在,我也只能就种种事实向你提出我的看法,而根据日后取得的证据,这些看法还可能需作局部的修正,甚至全部的改变。

“为了使你有可能了解和弄清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重要的是阁下应首先了解天主教会的这些机构在中国创办和管理的历史,因为看来这是这场暴乱的唯一起因。

“在中国开放给洋人居住的许多主要地点,法国仁慈堂似乎都创设了育婴堂和孤儿院这类机构。鉴于中国人不愿意将幼孩交给他们去照管,这些机构的管理人员,便对那些把幼孩交给他们看管的人,按人头逐个提供一笔钱。据说幼孩一经送进他们的孤儿院,其父母、亲属或监护人便不再拥有或不能再行使管理的权利。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断言——住在这里的大多数非天主教徒的外国居民同样相信——这种付予酬金的做法,引诱人们为了获得酬金而替这些机构去拐掠幼孩。他们还断言——我

本人相信确有其事——神父或修女，一向惯于利诱人们将病人膏肓的幼孩送到他们那里，藉以达到临终末刻付洗的目的。这样一来，许多奄奄一息的病孩，便被送到这些机构去受洗礼，而抬走后很快就死去。所有这些做法，加上各地这类机构管理规章中，作为其重要成分的保密制度，以及这类机构与世隔绝的性质，便在中国人心目中产生了怀疑，并引起了住在教会附近的所有老百姓对修女们的深恶痛绝。而且关于修女们或她们的行为的谣言，不管是多么的不可能和荒谬绝伦，都会在无知和迷信的人们当中找到无数乐意倾听和信以为真的人。

“大约在5月末或6月初的一段时间里，天津天主教仁慈堂内时疫流行，大批幼孩死去。于是，风声传开，说是修女们在杀害儿童，把他们的眼睛和心脏挖出，用以配制欧洲到处都在搜求、并不惜以重金收购的某种特效药。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但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早在6月5日，我就已经听说了骚动的消息。百姓不时成群结队地麇集在教堂附近，肆意发表愤激的议论，而且不只一次地要求仁慈堂将幼孩释放回家。据说有一天，人群吵闹得非常厉害，以致修女们害怕会有暴徒诉诸暴力行动，于是同意组成一个五人委员会进行检查。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一听到这一闹事的消息，很快便来到现场。尽管五人委员会已经选出，并已进入仁慈堂内，他竟然阻止了检查，出言不逊把委员们撵出堂外。有人说，他还用手杖来驱逐委员们。随后，天津知县带了一个人进来，令其与修女对质。这个人一直在竭力散播传闻，并说他能指出什么人在搞妖术或其它罪行。可是同修女们面对面对质时，他却承认他所说的并无实据而是谎言。于是，似乎平静了几天。但不久骚动再次发生，而且明显地比前一次更加猛烈，民众坚持要求仁慈堂必须释放所有幼孩。

“在骚乱爆发前一天，知县去见法国领事。就地位和权力而言，知县大约与我们城市的市长相当。知县对领事说，如果不允许对仁慈堂内部进行彻底检查，后果将难以预料。领事把知县这番话看作一种恫吓，他当即答道：县官的级别低于领事，在他们之间不可能就上述目的或任何其它目的进行谈判。21日下午，暴民涌往领事馆门口，高声呐喊，并向领事馆扔石头，丢砖块。这时领事感到没有外援，绝不可能驱散暴民。于是，抱着求援借以镇压骚乱的目的，前往驻扎在天津的中国最高长官崇厚的衙门。尽管崇厚声称，领事曾在他的衙门里用左轮手枪向他射击，但我不相信有这回事。无疑，这位领事是在激动得濒于发狂的状态下走进崇厚的衙门的。他说明了情况后，随即在一些官弁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他才走到街上便遇见一群暴民，人声嘈杂，气势汹汹，在一阵激动中，他拔出他的手枪对群众放了两三枪，我对此是不怀疑的。看来这便成了暴民动手血洗的信号。领事和他的办事员，立即被当场杀死。关于此后情况的种种叙述，大体上都同密妥士(John A. T. Meadows)先生的报告相符，因此我请求阁下参看随函附上的他的信件。我要在这里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它可以表明天津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表明当地百姓普遍下定了明显决心，即在他们臆想中的冤仇未报之前，坚决不让消息传到北京。这一事实是，受托递送密妥士先生信件的信差，离开天津不久便被拦截、拘留、痛殴，然后*Xi et armis*(武装解回)天津。递送文报到别的使馆的一些信差，也碰到类似的遭遇。因此，在两三天内，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侨民异常惊慌，担心这种带有感染性的骚乱会蔓延到这座城市来。这里的本地人几乎同各使馆一样快地获得消息，从而引起了一阵相当大的混乱。正在为北京法国仁慈堂建造一所房子的本地工匠丢下工作不干，天主堂的佣工和法国使馆的部分仆役也都开了小差。

“所传闻的残杀天津修女们的暴行，看来过于恐怖和惨无人道，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情况属实的话，这将有助于表明无知和迷信可以被谣言煽动到何等狂热的程度，而这些谣言之荒谬是任何受过教育和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都无法相信的。目前的报道叙述了这些可怜的人被暴徒从房子里拖出来，用刀枪或剑捅死，眼睛和心脏被挖了出来，尸体被投入正烧毁着房子的熊熊烈焰之中。暴民的愤怒矛头看来是对准天主堂的教士们，而似乎所有法国人都被中国人包括在其内。这种看法可能产生于这样的事实：所有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俱受法国驻北京公使和各开放口岸法国领事的照管和特别保护。加之，所有或几乎所有居住在中国的法国国民都信奉天主教并在散布于帝国各地的天主堂做礼拜。人们认为三个俄国人大概是被错杀，因为暴民误认为他们是法国人。这样推测的正确性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

证明:因为有几位住在天津城里离出事地点不远的英国人、德国人和瑞士人并没有受到侵害或骚扰。还有在天津城内的耶稣教堂,除了家具、书籍这些东西被搬走之外,并没有其它损失。我希望并且倾向于相信,暴民的怒火已经发泄,对‘租界’内的外国居民的真正危险已成过去,尽管世界各国暴民的历史证明这样的事实:在暴动进行的过程中,原先激起暴动的动机时常被忘掉,后来的行动却被纯粹为了抢劫目的而参加进去的那些人所控制。只是从这一点上来考虑,以后的危险似乎还是存在的。直到一艘炮舰到达天津之前,我对于保持安宁和秩序并不感到有把握。英国炮舰奥波森(Opossum)号,据说已在烟台停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能至多二三天会在天津露面。我不知道美国的一些舰队现在何处;但大体可以假定它们都在日本沿岸,因为在那里过夏,气候比在中国海岸要舒适些。

“当屠杀——因为没有别的字眼堪以称呼——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住在这里的各有约国家代表们召集了一次会议,商讨应当采取何种必要的措施,以便对各国侨民实行共同保护。虽然我们所获得的情报少得可怜且不甚连贯,其中还有很多显然是不可信的,但大家认为作为上策,还是不必等待知道详尽细节,而要立即向这里的政府递送一份联衔照会,这对提醒中国主要官员们认识他们应负的责任及促使他们迅速采取恢复秩序与安宁措施是个极佳步骤。因为他们的迅速行动,不但对在天津的而且对在北京的外国居留者的安全都很必要。该照会的抄件随函奉上。平心而论,北京政府曾表现出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办妥的意愿,但它是那样软弱无能,因而需要外国代表们经常的指点和指导,向它指出应采取的适当步骤。我附上本月25日收到的恭亲王发来的照会,该照会陈述了为平息天津事件所采取的行动。此外,在这附近驻扎的可供调动的军队已全部调往天津,驻兵于各仁慈堂附近,以便进行保护。迄今为止已颁布的皇帝谕旨,一并译出寄上。以上我力图将迄今为止所接获的情报的主要内容向你汇报,在接到更进一步的情报之前,我避免评论导致这可怕事件的原因,也不去猜测它对中国与西方国家未来邦交可能产生的影响,但就我们所知道的,以下三件事实已经确定无疑:

“第一,天津仁慈堂或管理其机构的那些人用金钱收买幼孩的行为,是谣言产生的根源,而谣言则起了煽动暴民的作用。

“第二,暴动的矛头指向洋人并非因其为洋人。它倒更像是反对天主教会的一支宗教十字军;其原因也并非特别源于天主教会传授教义,而是因为后者违背中国人的意愿把天主堂孤儿院塞满了幼孩的行为,且其采取的方式又极有可能激起成见,酿成仇恨。所有法国人均被归入犯有此类罪行者的范畴,因为法国政府似乎是所有天主教会的监护人和保护者。

“第三,这位法国领事的行动很不明智,这不但表现在他不赞成使用任何合理手段以消除中国人的成见和平息他们的愤怒情绪上,还表现在他向人群开枪从而促成本地居民与洋人之间的流血冲突上。结果既牺牲了他本人,也牺牲了将自己托付给他保护的那些人。

“我想我完全可以说,英国、俄国和布国(北德联邦)的代表们赞同我的这些意见。

“在就这场暴动的起因表达我的以上意见时,我不想被理解为饶恕或姑息这种可怕罪行及官员们的行为;这些官员即使未直接参与在幕后策划,但也因他们无所作为,而未能采取任何断然行动,平定动乱和保护洋人的生命与财产,而这些洋人是依据条约权利居住在中国土地上,严格按照条约规定的条款从事合法的职业的。”

所附1870年6月24日各有约国家代表^①致恭亲王照会^②称:

“作为驻扎中华各外国政府的代表,我们得知在帝国首都门户之一的天津发生残杀罪行的消息,感到无比的悲痛与愤慨。在天津居留的法国领事、各教士和仁慈堂诸修女,以及其他法国人已遭屠杀,其建筑物已被付之一炬。仅据已经传到北京的未必很准确的情节,已确实有理由担心,狂热的当地百

^① 他们是:布国李福斯(Rehfues)、美国钱斐迪、比利时金德俄因斯德(Aug. T'Kint von Roodenbeck)、西班牙巴周德(Adolfo Paxot)、法国罗淑业(Rochechouart)、俄罗斯布策(Eug. Buetzow)、英国威妥玛(T. F. Wade)。

^② 此外还附有恭亲王1870年6月25日致钱斐迪照会和《京报》(Peking Gazette)6月26日刊登的上谕。

姓不会克制对天津外国居留人采取进一步的过火行动。

“我们并不怀疑明智的中国大皇帝陛下政府,对由此残杀行径而产生的普遍愤慨情绪,定能深表同情,并充分意识到对此负有重大责任,意识到它须采取必要措施以预防暴行重演的职责。这类暴行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定将大大有损贵帝国政府在全世界人士心目中的地位。

“在天津所发生的事件,实际上证明外国人并非到处受到中国地方官员的充分保护。因此贵帝国政府为本身的利益,自应以最明确的行动,表现其坚决保证全体外国人安全的意向,无论他们现在居住在贵帝国领域内的什么地方,这些人已把他们自己托付给贵政府,指望贵政府信守义务。像这样的大灾难,竟然发生在距离北京只有八十英里的地方,我们不能不感到担心,如果不迅速惩罚罪犯,则难保不在距离京城较远,而中央政府权力与效率较弱的地方,出现新的暴乱尝试。在其它国家获悉这一罪行的同时,能被告知罪犯已被依法判刑,这是绝不可少的。这样才会使得每一个国家对于把它的公民托付给中国保护感到放心。”

所附美署理天津领事密妥士6月22日凌晨一时致斐斐迪函称:

“一些天来,在天津的各阶层华人居民当中,出现了洋人(法国人)和华人天主教徒的高度愤慨,据说其原因是仁慈堂的神父和修女们连月来通过其雇员诱拐了许多华人幼孩,如果其中有人死了,便将其眼睛和心脏挖出,供作制药之用。这些传闻近来造成了民众对法国天主教徒的痛恨。我已预感到,如果居留在这里的法国人不采取措施,来消弭华人当中存在的这种印象,恐怕将会爆发一场民众的暴动。今天,(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和他的领事馆助理,携带武器前往崇厚大人衙门。当他们由后者陪伴从衙门走出来,准备返回法国领事馆时,他们遇到了当地知县。该知县把崇厚拦住说话时,丰大业先生用左轮手枪对崇厚和知县开了三枪,还用他的枪托轻敲崇厚的头部。正围着他们的中国百姓,这时冲向丰大业和他的助理,把他们杀死。此时,百姓的情绪变得更加激昂,一大批人拥向天主堂,在那里杀死三个神父和两个取道天津前往北京的法国人,以及所有华人天主教徒。然后,他们放火把天主堂烧掉。群众此时愈聚愈多,地方官无法约束他们。一批群众随即前往修女们所住的仁慈堂,杀死了五个修女和所有华人天主教徒。在街道上碰到的另外三个天主教徒,也约在同时被杀死。仁慈堂的房子也被焚毁。天津的地方官此时已全部来到现场,并劝告百姓散去。但在仁慈堂又发现了幼孩的尸骨,这更使他们怒不可遏。其他国家人员的生命和财产未受伤害。美国和英国耶稣教会中的女士们,来到英国领事馆,同英国领事李蔚海([W. H.]Lay)的妻子呆了一个晚上。”

所附密妥士6月24日致斐斐迪函称:

“本月22日凌晨2时,我曾荣幸地就本月21日此间发生的严重事件给阁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交给北德意志联邦副领事阿恩德([Carl]Arendt)先生,当时他也正在把一封信交给专差送往北京。今天早晨我十分惊讶地收到阿恩德先生退回的原信。从他的来笺中看出信差未能前往北京。因为急于把我到此刻为止所获得的全部情报向你送出,我再给你写这封信。我仍将我的第一封信随函附上,以便将我们当时所获得的关于头一天可怕事件的最初报道向你转达。我现在有可能对我的最初报告作一些修正,因自那时以后,我又获得较准确的情报。在仁慈堂被杀死的人们当中,显然共有九个修女和一些华人。堂里住有30多名女童,已经被人发现,并被送交清朝官员。在天主堂,有一个外国人(法国人)和一个华人神父被杀。法国使馆的达麦生(Thomassen)先生和他的妻子(他们俩从上海乘“满洲号”船来此)及一些华人仆役,也被杀。在坐落于天主堂房产范围内的法国领事馆,被杀死的有领事丰大业先生,副领事西蒙(Simon)先生和一些华人。沙尔味松(Chalmaison)夫妇,是一家商店的经营人,则在靠近南门的店铺里被杀死。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三个俄罗斯西伯利亚人(其中有一对是夫妇)从城里坐轿路过时,恰巧碰见中国百姓正在焚烧仁慈堂,这几个人显然被误认为法国的天主教徒,因为所有瑞士人、德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是耶稣教徒),尽管各个分开住在城里,却没有一个受到骚扰。看来一共有十九个外国人,即法国人和俄国人,在本月21日那天被杀死。

“在租界里的人们自然十分恐慌。但到了21日傍晚5点时,我获悉中国人在毁坏天主堂、仁慈堂,杀害了天主教徒之后,即行散去,并没有骚扰城内的耶稣教堂的任何人。我深信‘租界’不会受到骚扰,

一直到现在情况依然如此。本月22日上午10时,崇厚在海关监督官邸会见了各国领事,他详细描述丰大业伯爵当时的行径像个疯子,他把这许多人被杀死归咎于丰大业向他本人和知县开枪。他对已发生的事件深表遗憾,声称这场骚乱事出意外,百姓成了当天局势的主宰者。山嘉立([C. A.] Stanley)太太和她的一家现住满洲号船上,别的差会的女人,以及商人的妻子福布斯(Forbes)太太和斯塔曼(Stamman)太太也都在那里。华人城内现在已没有外国人居住。崇厚还拯救了一名叫古得力的法国人,他当时赶到崇厚的衙门,受到了照应,直到被送往英国租界。我在极其匆忙中写这封信,因为我急切地想把它立即发出。我对第一封信竟被退回感到十分沮丧。除了‘满洲号’之外,英国‘亚滨号’(Appin)也在天津。‘龙号’业已离开,但一些信件还能在大沽口送交给它。我们将很快看到一艘炮舰到达这里。眼下这里没有兵舰。

“法国领事、副领事、达麦生夫妇、谢福音(Clauda Marie Chevrier)神父,以及俄国人的尸体均已找到,后者已被掩埋。”

7月27日钱斐迪致斐士函第18号称:

“此函有关上月27日我就天津最近的闹事所作的第12号报告,兹荣幸地继续送上各种文件,俾可作为该项可怕事件进一步的阐释。

“自从暴乱发生以后,我一直试图尽可能搜集一切有关事件起因及其细节的情报,以便弄清这场屠杀的责任所在,对有罪的人正在采取何种惩罚措施,以及对所犯暴行作出何种赔偿。

“我在第12号陈报中所表达的关于闹事起因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须稍加修正,但其主要之点,似乎毋庸变动。

“关于法国领事和其他人被杀死以及建筑物遭到破坏的确切事实,仍然存在一些疑点。有关细节的证言存在着互相抵触和矛盾之处,真相也许永远不会水落石出。我觉得没有理由改变或修改我已表达的意见。尽管不能说全部,但绝大部分被害外国人的尸体已经找到。其中许多人被肢解得惨不忍睹,这表明中国暴民的愤怒和残暴,完全可以同美洲大陆的野蛮人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调查越深入,就越可以确定,地方官员与此事有着同谋关系。当他们看到风暴来临时,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范措施。暴民受地方官员和兵勇的直接帮助和支持,这种看法在天津很普遍。

“在社会各阶层间,人们普遍认为幼孩被本地人出于卑鄙的目的所诱拐出卖,事实确实如此,看来这没有什么可疑的。这种勾当被所有阶层所一致谴责,罪犯一经发觉,立即受到严厉的制裁。只要这种行径存在,洋人便难免同样受人怀疑,这也是毫不足怪的。仁慈堂机构行事的保密做法,使得他们极易在无知人们的心目中引起怀疑。此外,还存在着中国士绅对洋人的天然敌意与仇恨。这些人一有机会,便会利用谣言来煽动百姓的排外偏见,并给后者灌输这样的信念:‘蛮夷’是无论怎样残忍的名堂都能干得出来的,其程度达到了只有无知和迷信的人才能相信的荒谬地步。

“类似性质的骚动同时发生在几百英里之外的南京,这似乎是出奇的巧合。很难说这是偶然的,它为在洋人当中的如下流行看法提供了根据:天津骚乱绝不是一场突然发生的地方性的闹事,而倒像是以全部消灭外国侨民为目标而煽起中国人的偏见和狂热情绪的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直到获得比现在所掌握的更有力的证据之前,我是不准备也不会接受对天津案件的这种看法的。

“南京纠纷的情节详见该省总督^①咨呈总理衙门的一份较为明确的报告。这里附上译文(附件B),从报告里可以看出,南京民众的情绪同样地激昂,关于天主堂所作所为也有着同样的传闻,其危险之急迫程度与天津不相上下,但由于那里的地方当局采取了有力行动,加上当地天主教传教士的谨慎行事。他们允许对其机构进行彻底检查,这就避免了一场骚乱。看来后者的配合对于平息老百姓的忧虑,和避免一场群众闹事的爆发是大有帮助的。

^① 译者注:按为两江总督马新贻。

“这里附上几道谕令和告示^①，它将表明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惩办有罪的当事人，并对所犯的侵害行为提供赔偿。

“奉派查办整个案件的曾国藩，目前正在天津着手此项工作。他是这一省的总督（按系直隶总督），是帝国最能干的官员之一。他是一份著名的文件的作者，在1867年那份咨送总理衙门的报告中，他对正在讨论和修改中的英国条约提出了他的意见。凡阅读我们的《外交通讯》的人对他的名字是熟悉的。上述报告尽管被他的政府作为机密文件，但不知道怎么却被外国使馆偷偷地弄到手，并将其译出。该报告的译文见于1868年《外交通讯》，第一部分，第519至521页。曾国藩是个在官场事务中有丰富经验的资深官员，人们通常认为他抱有排外的观点和情绪。然而，无论他个人对洋人持有何种情绪，也无论他多么希望中国恢复到古代的闭关体制去，他所经历的沧桑，已足以使他确信这是办不到的事，任何要通过武力来抗拒在华外人符合条约规定的和平居留的企图，都是愚蠢和疯狂的行动。人们曾使我相信，作为一个官员，他将会尽其所负职责，搜索和惩办罪犯，并诚意地设法预防他日此类暴行的重演。但是，不管对已经发生的事作出什么样的惩处和赔偿，在中国百姓抛弃对洋人的荒谬的邪恶的成见之前，期待今后会有绝对安全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时日，并需要统治阶级施加影响。大官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教育的必要性，住在这里的外交代表正时常敦促他们意识到为此目的而立即采取行动的重要性。

“上谕已任命崇厚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试图去解决面临的难题。这看来是沿着正确方向走出的一步。这表明有意按照西方国家的方式和惯例来处理他们的邦交。

“关于法国将要求什么样的赔偿，大家迄今尚处于疑惑之中。法国代办正期待在今后几天内收到经由俄国发来的电讯指示。他已前往天津，正在同法国舰队司令会晤。外国战舰的庞大舰队眼下已在天津附近。六艘炮艇——法国和英国各三艘——已经停泊在天津河道；一艘法国小型护卫舰在白河口的沙洲外面，英国和法国海军中队的旗舰，以及其它一些舰艇，则在烟台靠泊。此外，北德意志的两艘小型护卫舰和俄国北太平洋舰队的部分舰只，将于近日抵达烟台。

“我已经写信给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上将，告诉他在华北水域保持一定军力的重要性，但在罗杰斯（Rogers）司令到达之前，我怀疑不会作出任何赞同的答复。

“事情的情状的确显得捉摸不定，但我希望最好不必诉诸战争而能达成满意的解决办法。

“推测未来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在你收到这封信之前，无疑已获悉事态的进展，甚至有可能已知道它的结局。

“我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随时可能出现的事变的制约。我首要的职责将是致力于使美国公民将被允许分享其他国家的权利与特权。除此而外，我不认为在一般方式之外，对于利益与未来安全有进一步干预的义务。”

所附丰大业1870年6月21日致罗淑亚函（译本）称：

“我们这里的天津小城，平时如此的宁静，最近这些天来却被在仁慈堂和本领事馆附近喧闹的暴民的喊声所搅扰。人们指控修女们挖取幼孩的眼睛，一些最大胆的人还从育婴堂院子里挖出幼孩的尸体。最近天津道台想要向我出示许多证人的证词，他们据称是受害者，即我们的教士雇人征集来的幼孩的亲属。我毫无困难地向道台证明所有这些谣言完全是恶意捏造。但由于他正式地把问题提出来，在他一再要求之下，我答应关照我们的仁慈堂应当只雇用那些品行可靠的人。

“本月19日会面以后的几个钟头内，天津知县和由崇厚派来的一名代表一同来到我们的领事馆，意图立即对仁慈堂和遣使会诸会士（Lazarist Missionaries）的院落进行正式检查。但由于他大发脾气的无礼举动，还由于他以民情愤激为理由向我进行恫吓，明显地硬要我接受他的看法，而他的上司在几小时前还答应此事应由我自己作出判断。我于是就此中断会晤，提醒他注意，我只打算同三口通商

^① 马新贻致总理衙门咨文[略]、恭亲王致各国代表函、关于对崇厚等人任命的上谕，均为附件。此外还附有恭亲王1870年6月29日复钱斐迪照会、曾国藩1870年7月10日关于天津滋事的告示、曾国藩关于天津滋事及其起因的奏报。

大臣继续商谈这件事；然而我仍然要他对乱子的后果负责，他似乎很乐意以此来恫吓我，而我却相信他本人正是动乱的唯一教唆人。

“我请崇厚派来的那位代表先向崇大人转告我和知县会晤的结果，我还准备亲自向他申诉我对该县官无礼行为的不满。昨天上午，我荣幸地接待了崇厚的来访。他以严厉的措词指责知县，但在说话中间也试图为其辩解。我向他埋怨说，他从前驳斥关于我们教士的无稽谣言的话，地方官们都当做耳边风。之所以这样，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未履行其职责，促使他们采取其不愿采取的行动方针。这样，我就把早就有的‘欧洲人的得力助手’的称号，重新加到他身上。

“这一小小的事件，要不是崇厚出面干预，可能已经酿成祸患，今天看来事情差不多快结束了。此外他还答应几天内要出一道简短告示使得百姓情绪镇定下来。”

所附钱斐迪 1870 年 6 月 30 日致恭亲王照会称：

“我荣幸地奉告，贵亲王昨天的照会，内附关于任命崇厚为钦差大臣出使法国及成林署理三口通商大臣的两道上谕的副本，业已收悉。

“崇厚大臣阁下负责天津商务多年，情况了如指掌。关于该城近来闹事的详细经过，法国领事被杀及后来发生的事情，他是一个见证人。因此，涉及此次骚乱的起因和后来的攻击，他作为钦差大臣，定能充分解释事变发生时的种种情况，并消除法国人民对该严重事态可能产生的忧虑。对这次鼓动的起源、发展和最后爆发，他了如指掌，因此在这时候充任专使，据我看来，不失为一个明智的步骤。

“高级官员成林原任牛庄商务及海关监督(Intendent and collector at Newchwang)，素为该口美国领事所称道，他熟悉通商事务，能够公平而审慎地履行其职责。因此，他被任命为署理三口通商大臣，可能将是大家都满意的人选，我个人也认为甚为相宜。”

8 月 18 日钱斐迪致斐士函第 22 号称：

“天津悲剧产生的恐慌情绪，迄今仍没有平静下来，相反，洋人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看来倒有与日俱增的趋势。

“在天津的耶稣教教士，一直在本地基督徒当中搜集证词，以此为基础提出他们的看法，并将其公开发表。这虽然出于诚意，但根据我从各方面获得的直接的和经过核对的证词来加以判断时，却发现他们的看法与事情的真相远不相符。

“作为上述这些通过报纸公之于众的信件的一个例件，我随函附上山嘉立牧师由天津寄给我的一封信(附件 A)，牧师认为非常有必要把它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在这封信中，你将会看到他提出了他自己的这一看法：天津暴动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国的国民、某一个特定宗教信仰的一个地方性起事，而是一宗重大阴谋的组成部分，这个阴谋是要把居住在中国的所有洋人或斩尽杀绝，或驱逐出境。山嘉立先生的信件里还附了许多本地基督徒的证词或声明。

“一位证人作证说，他被暴民当做‘基督徒’而抓了起来，押解到一所房子或一座监狱里，一直拘留到夜间。在受审查时，他因为能证明自己是一个耶稣教徒和美国一所教堂的成员，便立即被释放，并安全护送到天津外国租界。如果这份证明属实得到其它证词的证实的话，那就足以证明山嘉立先生的看法是错误的，暴民的愤怒是针对天主教士的。

“恫吓要进行攻击的谣言，几乎天天都有人在散播，但经过调查却时常发现并无事实根据，只有一些本地基督徒相信它。这类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往往经过添枝加叶，被说得煞有介事，然后又发送到上海报纸去发表，因此流传得更广。经过报纸译载，中国人也知道了这一消息，他们辗转相告，一直传到该帝国的遥远地方。这一切都是蓄意在洋人当中造成恐慌情绪，而这种恐慌情绪，又导致无知的本地人相信他们真的强大到足以把所有洋人驱逐出境的地步。

“今天我又收到山嘉立先生写给目前停泊在天津港口的美国轮船埃舍洛特号(Ashuelot)上泰勒(Taylor)一封信的抄件，兹一并随函附上(附件 B)。阁下会看出这纯粹是根据‘本地基督徒’的意见而

写成的。这封信的抄件已由山嘉立先生送到北京，并在教士中间传阅，这当然要引起相当程度的惊慌。其中有一部分的陈述，我已知道是不正确的，我希望其余部分也没有事实根据。现送上这份文件，只不过是把它作为逐日都在传播的这种传闻的一份样品，对此外国人多少是相信的，这促使他们的情绪处于激动之中，并对他们的个人安全产生惊慌。

“对耶稣教会礼拜堂进行调查的结果，透露出这样的事实：他们所遭受的损害远超过最初我所相信的那种程度。天津地方官员显得愿意迅速提供赔偿，无论是重修教堂，还是付给合理的损失费。因此我指示副领事去见各教士，确定建造的费用和蒙受的损失，以便中国人迅速地作出赔偿。

“接着在教士、领事和我之间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这些数量颇大的通信的抄件似乎没有寄呈的必要。其实即使要这样做，由于本馆人手不足，事实上也无法办到。尽管这样，我仍随函附上报纸的剪张（附件C），那里面附有英国教士照同一问题给英国领事的答复。美国教士信件中所表明的意思与英国教士的大体相同，但是对于外国政府及其驻华代表的职责，美国人却叙述和解释得更加细致。他们在给我的信的末尾处写道，在获悉法国对赔偿提出何种要求之前，他们不准备与中国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美国和英国教士似乎都有这样的印象，即觉得他们除了自己承担的关心华人精神幸福的任务之外，不知道怎么地又被他们的政府赋予了特别的外交职责。按照他们所作的外交判断，在对最近发生的天津暴动中财产毁损的赔偿要求达成共识之前，法国与中国之间免不了先要打一场战争。我已经通知我们的教士们，他们什么时候准备解决问题，我就什么时候准备提交并敦促落实赔偿损失的公正要求。但在他们愿意行动之前，我将不对此事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所附天津美国公理会山嘉立教士1870年7月9日自天津致倭斐迪函（摘自1870年7月22日《上海差报》“Shanghai Courir”）称：

“正因为中国当局和别的一些人在对天津近来所发生事件的调查中，竭力将之说成是一场专为针对天主教士的群众起事，我才想向你提供足以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的证据。

“起初，谣言更多地专为针对天主教徒，特别是仁慈堂，这是人所熟知的。

“这些谣言很快就针对在天津的全部外国居民，而且确定了一个日期，作出了行动安排，即6月21日（阴历五月二十三日）攻打法国领事馆、天主堂和天津城内及其附近的一些地点，并且确定在这之后的星期五，即6月24日，攻打外国租界。

“这时候我恰好外出巡回布道。大约是上月25日我在离天津500里的德州听到了流传的打算攻打在天津居留的洋人的不确切的谣言。英国圣道堂（the English Methodist Mission）的华先生（William Bramwell Hodge）也在距离约400里的兰陵（音）听到了同样的谣言，说是定以6月21日和24日作为攻打的日期。这两个例子都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而且对外国人的国籍不加区别。

“悲剧发生的那天早晨，道台、府台和知县视察了天主堂，察看了所有的房屋。他们既没有作出任何努力去驱散尾随着他们并聚集在天主堂门前的一大群老百姓，也没有向他们说明并没有找到指控天主教士所干坏事的证据。就在这些官员离开没有多久，火会的锣声敲响，攻击开始了；武将陈大帅（国瑞）带了一些兵丁到场，把浮桥搭上（这座浮桥原来按照崇大人的命令打开，以防止暴民过河），为歹徒闹事提供了帮助。

“听到鸣锣声——这通常是发生火警的信号——各火会成员拿着武器，而不像通常那样拿着消防水桶，纷纷赶到法国领事馆和天主堂。自始至终火会的成员在杀人和捣毁房子方面，比谁都奋勇争先。

“首先是攻打法国领事馆，这在领事前往崇厚的衙门之前实际上就已开始了。住在里面的一些人或所有人，包括刚到达的法国使馆的秘书达生和他的妻子在内，均被杀死，这发生在法国领事离开崇厚的衙门之前。领事本人在由崇厚派遣的官弁的陪同下返回领事馆的途中被人杀死。

“刚捣毁完法国领事馆和天主堂，人群就立即冲向仁慈堂。仁慈堂的十名修女死得特别可怕，她们的院落也被纵火烧毁。

“一部分暴民则冲向耶稣教会的礼拜堂，所有的礼拜堂（计有8座）内任何值钱的东西均被抢光，

不少墙壁被拆毁。另一部分暴徒怒喊狂叫，向外国租界进发，扬言他们的目的是要杀尽洋人，把那里洗劫一空。除了他们的人数过少，和可能违反了原定的计划以外，我们不知道后来究竟什么阻止了这批人的到来。三个俄国人从城里逃出来，尽管他们申辩说‘我们不是法国人’，苦苦哀求饶过他们，但仍然被杀死。所得到答复是：‘谁管这些，凡是洋人我们一个不留。’

“还有人试图向租界教堂的尖阁放火——这无疑是在向暴民发出进行攻打的信号。

“从一开始流氓们就断言并期待总督管辖下的军队前来援助。人们已经确知镇台衙门的兵丁，在捣毁法国领事馆、天主堂和美国公理会(the American Board)的教堂中，居于最积极分子之列。而且，如以上所指出的，暴民在攻打这些地方时，受到了那位姓陈的武将的鼓励，如果不是直接指挥的话。在暴民渡过浮桥时，他说：‘干吧，干吧，孩子们，(把它们)烧了吧!’

“关于仁慈堂修女们出于邪恶的目的，雇人拐骗幼孩，挖掉他们的眼睛、心肝，拿来制药的谣言，并没有任何证据；法国领事在崇厚的衙门里用洋枪或左轮手枪射击的证据也不存在。引证证据同这两种谣言截然相反。事实的真相现在大概不可能探查出来了。

“我要提请注意永裕所作的关于查看墓地——那里有据说是由仁慈堂送去的棺材——的证词。别人也到过那里，并作了相似的证词。那里只有一两副新棺材。他们充其量看到骨头和少许头发，彻底否定了它们是新近才掩埋的意见。

“另请注意余渠雷(音)的证词，它谈的是关于镇台衙门里吹起的号角(他是目击者)对群众产生的影响。联系到(而只有这样联系才能看清楚)他本人和杨先生都亲眼看到的兵丁们积极参与推倒墙壁和抢劫我的教堂的事实，以及有关他们到处打砸破坏和行凶杀人的报道，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实。

“我还想提请注意一道煽动性的告示，其抄件也附此寄上。

“1. 告示上所用的人名中有‘拴’‘拐’的字眼(拴作捆绑解，拐作绑架解)，这样的字眼不大可能被华人选作人名，这就使人一望就知其出于杜撰。

“2. ‘受人指使’这种用语是极令人反感的，其所指含糊不清，完全不适于为官员所用。百姓马上说这指的是天主教士。鉴于百姓当时情绪激昂，他(告示作者)煽动群众的手法再巧妙不过了。

“应该记住，每一个火会都有一个头目或主管人，系由士绅充任，他的名字是在衙门里注了册的。如果主管人不知情或未点头，火会成员是不会像这次那样敢于拿起武器或参加闹事的。这些人胆敢违抗清政府官员的意志或者在后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支持像这次这样的示威行动吗？

“民间自愿组织的武装‘团练’，多年前在叛乱期间即已成立，也有一个文人当首领，名字也列在衙门的名册上，对他同样可以提出相同的问题。团练也卷入了这一可怕的事件。

“在闹事前几天里，常可在这里或那里见到一小队、一小队的火会成员和衙役聚集在一起，对本地基督徒和洋人作出种种讨厌的表示。我可举出山嘉立妻子的经历为例：早在6月5日安息日那一天，有人盯着她的脸，一伙人把她推来推去，用侮辱性的语言骂她。又如特诺克(Tunock 音)先生和妻子在6月19日的安息日去礼拜堂时也发生这样的事：在他们俩穿过聚集在礼拜堂台阶上的一伙人时，后者辱骂他们俩。这种事在过去是很罕见的。有的人还拾起砖头，虽然没有向他们扔过来。

“这一类事实难道不足以说明，当火会成员听到火警信号一响，马上拿起武器，从四面八方奔向法国领事馆时，为什么会那样的不谋而合和行动迅速？

“如果同天主教——特别是仁慈堂——有连带关系的那些人是群众仇恨的唯一目标，为什么法国领事馆竟然是首先攻击的目标？为什么首批受害者之中有住在离天主堂一英里之外的地方的一个法国商人及其妻子？即使说这种仇恨扩展到了他们的同教和同国人，为什么几个俄国人在哀求饶恕而且明明知道他们不是法国人时，却在‘所有洋人都得死’的一片喊声中被残忍地杀害？

“为什么他们在耶稣教礼拜堂极力搜查洋教士，并公开宣称要杀死他们？为什么耶稣教会所有(八所)礼拜堂都被捣毁？为什么中国教民被殴打、被抢劫、被从家里赶出去，拖到府、县官面前，仍然受到咒骂和凌虐？为什么暴民怀着杀人和劫掠的目的向租界进发？

“如果纯粹是民众的运动,为什么在他们的情绪已经处于那样激昂的状态下,府县官员居然还要发布那些蛊惑人心的告示?为什么他们不向各国领事要求彻底查清事情的原委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平息民愤?”

“为什么他们不按照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李氏夫妇的意愿发布一个澄清性质的告示?为什么他们竟然让一大伙人跟随他们,任其聚集在法国领事馆门口,而不作任何努力去驱散他们或纠正百姓的错误指控和观点便扬长而去?老百姓怎么会毫无理由地从一开始就声称官老爷们站在他们一边?”

“为什么兵丁和火会成员对捣毁活动给予了如此有效的协助,如果他们的头目、官长们反对他们这样做的话?”

“7月1日那天,我在离天津50里的一个地方投宿,我听到街上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天津的洋人都死光了,把这个人索性也结果了吧,让他们全完了。’这种想法(且不说这种语言)岂不耐人寻味?”

“虽然曾出过告示禁止携带或打铸武器,但迄今人们一直公然地做着这两件事;在五个地区和其它一些地方,武器都是公开供人随时取用。”

“就我们所能听到的,直到最近为止,未曾试图逮捕过暴民中的任何人。他们之中有些人仍像过去那样大喊大叫地威胁着要攻打租界。”

“最后,针对某些人极力要表明的如下观点,我提出如下严肃抗议。第一种观点是群众反感的矛头过去和现在都只对准天主教。与此相反的证据太过强有力了。即使承认这种观点,人道主义也不能不大声疾呼反对那些残忍的和反基督教的主张,即认为受害者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即使是对恨透了的敌人,也总得给以公正的审判。另一种观点是,暴民只带有群众情绪亢奋的性质。大量证据表明,要不是由于官方的鼓励,像这样的惨剧本来是不会发生的。这几年暴民反对洋人的历史,充满着值得注意的地方。”

“此外,我可否表示这样的希望:这次事件的解决将使这类野蛮行径几乎没有再犯的可能?我并不主张残酷的或报复性的措施;但是凛畏上帝,不论是正义或人道都要求采取坚决的断然的行动。”

“应对这些官员的引导作用进行彻底的调查,对他们的行动加以仔细审查。让他们懂得证据是如此强有力,他们不能把罪责推卸给无知的老百姓,或者赔了几块钱便能洗刷掉斑斑血渍和可怕与伤心得令人不忍说起的残忍行为。”

“美国人虽然没有丧失儿女,但别国人丧失了,因而我们必须站在他们一边,要求充分调查、公正审判,以及对罪犯的严惩不贷。”

“一定要做到这些;然后让其赔偿他们违反条约规定所造成的其本国人民的损失,这些人只是因为救世主的信徒而受到攻击;要他们亲手重建我们的礼拜堂,或充分赔偿其价值。这由我们来选择,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我相信,我们定能达到和平与安全的目的,还将为其真理的更迅速的普及打开道路。”

所附山嘉立教士8月21日致美国汽轮埃舍洛特号泰勒舰长函称:

“在目前流传的许多报道中,这一两天传到我这里的一个消息,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向我提供情报的人,可以说是一个聪明人,他曾在山西省当过知县。他到天津城内我的教堂做礼拜已经有几个月了,而且在最近闹事发生之前,他对我们所传的真道已表示相信。但他同我们并没有特殊关系,而仍像已往那样同他的官场中一些老朋友往来,因此可以设想他是多少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的。他的举止从一开始就给我以一个诚实的中国人的印象,我有理由认为他表达了他对我们的幸福的真诚的信念和渴望。时间将会证明他的看法是否正确。他证实了我前几天已经听到的消息:李鸿章正在率领大约一万三千人马开往这里,其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李只不过是个武将,哪里有或者将有战事,就需要他出场。别人也都这样说。这位昔日的知县还说,中国政府不愿诉诸战争;它愿意处决任何数目的‘歹徒’,并将法国公使罗淑亚伯爵阁下一直要求杀头的那些官员处以流放之刑。按照中国法律,不能处死这些官员;但鉴于公使要求处死他们,因此,中国决定把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民众要求战争,而不考虑最

后将会有什么结果,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在中国(特别是在北方)的寥寥无几的洋人赶走或杀死,这就大功告成了。因此,已经下达上谕,准备发动一场反对洋人的大起义。他坚信这场起义肯定要发生;不管怎样,他知道这里正在做广泛的准备,它会像6月21日事变那样突然在我们面前发生,其对象并不只限于法国人,而包括所有的洋人。他力劝外国传教士马上离开,因为危险正在一天天增加,危机迫在眉睫,它将在8月21日和22日爆发。对于危险已经临头,而外国人仍然满不在乎,并未把大部分兵力调到这里来,他感到非常诧异。他说,中国兵力约有40,000至50,000人,并做了全面准备;一旦准备完毕,就会不作警告地开始攻击。

“以上这些为昨天晚上来看我的一位教师所证实。他向我示警,并表示愿尽力帮助我。他还说道,天津现任道台的兄弟张定一(音),正带着一大批人从江苏开往天津。这件事也为另一个本地教民所证实,他刚从乡下来,今天早晨给我带来了同样的消息。他同样劝我离开。关于种种准备突然攻击、攻击时间和以所有人为对象,所有的报道并无出入。

“记得在天津屠杀发生之前,那时我们对所有报道——其实还不如我们今天获悉的确切——持怀疑态度,结果它真的发生了。我斗胆建议应对那些有情况的和便于观察的地点进行经常性的监视。未雨绸缪永远不会不合时宜,它会拯救在华外国人的生命。”

所附1870年7月29日《上海差报》摘录:

“天津大屠杀

“下列系英国领事与理一视(Jonathan Lees)及郝尔(William N. Hall)两位先生之间关于天津闹事中耶稣教会财产损失问题的通讯:

李蔚海致理一视及郝尔函

1870年7月20日于天津

先生:

我应英国女王陛下的代办之请,来确定最近天津不幸闹事期间英国臣民所受损失的数额。

我已知道,你们的几座礼拜堂被捣毁,损失了许多有价值的财产,我请你在你认为合宜时,对损失作出估计,并将其送给我,以便转交中国当局。

理一视等致李蔚海函

1870年7月21日于天津

阁下:

本月20日承赐示垂询我们所代表的教会在最近骚乱期间蒙受的损失,大函已收悉。

对此,我们不能不表示诧异,这不仅仅因为在这么早的阶段,竟然要求我们提供损失数额,而且因为在更重要问题尚悬而未决之际,居然让我们考虑金钱赔偿问题。

我们迄今还不能确定在当前的危机中将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几乎可以肯定法国人要采取行动,甚至我们自己的政府大概也不会置身局外——姑且不论这一点,倘我们抢先行动,同意对所犯罪行作出任何不能令人满意的宽恕,这恐怕既无用处,也不明智。几乎不需要提醒阁下,在和平获得确实保障之前,我们有权利要求赔偿的损失项目有很多很多,其界限很难确定。鉴于这一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完全陷于无组织状态,所有布道工作将不能不中断好几个月。我们各自的工作人员因此都依赖于我们。我们在该省和在山东省各处的乡下新入教者,都在坐着等本地区爆发新的事件。在这一城市里,本地基督徒仍然每天面临着掠夺和摧残。同时,有种种理由担心,当我们自己出现在街上时,仍然面临着危险。

就我们的教堂而言,即使我们想要按照代办先生的希望去做,也没有这样做的可能。我们的入教者几乎都不敢在废墟一带逗留,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希望能安然无事地去走访他们,或者取得建筑人员对重建费用的估算,更不用说想动工去修复了。我们经过仔细考虑,认为这样的尝试只能以它们重新遭到捣毁而告终,即使我们能找到足够多的胆大的劳工来修筑。

在解决这一不幸事件时,阁下可否原谅我们提出这样殷切的愿望,即不要将我们跟受难的法国弟兄们分开?这不仅是一个感情问题。我们不能不感到我们国家的利益同已发生的事情有密切关系。我们是英国臣民。我们居留在这里,受条约保护,谨慎从事合法的职业。我们的生命受到谋害,我们的财产受到破坏,我们的本地教徒遭到严重的伤害,我们的人格备受攻击。而且,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被暗杀的修女中至少有一个是英国臣民。在已往几个星期里,同本地人作过多次交谈的任何人,几乎都毫不怀疑原来的计划是不加区别地针对所有的外国人。不难理解本地官员何以现在着急制造相反的印象。他们所找的各种藉口在福摩萨(台湾)、扬州和别的一些发生暴行的地方不幸地帮了他们很大的忙,但在这里借口现在已不起作用。因而,他们现在口口声声声明他们同我们的特殊友谊,这明显是虚伪的,它无法把我们跟那些同盟者——他们的利益如此明显地同我们息息相关——分开。

我们请求阁下不要误解我们。我们不是呼吁战争和复仇,我们只是要求公正。我们最坚定地坚持这样的信念,安全和荣誉的道路,将在这关键时刻展现在我们受难者一边。这对我们英国人个人和我们的政府来说都是如此。此外,出于明显的理由,我们认为,这对于中国人本身来说,也不失为最宽大的行动方针。

我们不知道应否为冒昧陈述以上这些见解而表示歉意,因为我们希望它能在阁下或所有其他人心中引起共鸣。因此,我们只有恭敬地向阁下保证,我们将尽可能快地竭力满足女王陛下代办的意愿,并请求阁下向他转达我们在这件事上的种种难处。

谨致英国领事李蔚海阁下。

伦敦会理一视

圣道堂(Methodist Mission Society) 郝尔

1870年7月21日于天津”

8月22日臻斐迪致斐士函(机密)第24号称:

“在我的第18号信件中,我曾向阁下报告,法国代办目前正在天津,参加在最近闹事中不幸遇难者的葬礼;一支庞大的海军兵力业已在天津一带集结;预料法国舰队司令将与该代办在该处会晤;当地的事态显得混乱。我还说每日都在等待法国经由俄国发来的电报指令,它将指明对6月21日暴行提出什么样的赔偿要求;而在这项指令到达之前,将不向中国人提出具体的要求。因此,此时预料结果如何,难免要发生差错。

“罗淑亚伯爵抵达天津才几天,此间各外国使馆惊讶地从中国官员方面获悉,他已要求对当地两位官员进行惩罚(斩首),这两人在暴动中涉有犯同谋罪的嫌疑。伯爵调查过这件事,他对他们有罪深信不疑。此外,如不毫不迟延地执行对这两人的应有的惩处,他将认为有权从北京撤退他的使馆和法国侨民,而将全案交给法国舰队司令去处理。后者将要采取他认为必要的行动,以达到上述要求和维护法国的荣誉。

“中国政府将法国的要求通知了其他外国公使,并向他们作了不能应允该项要求的明确表示,但又说所指的官员已经革职、降级并交刑部议处,如果确有罪责,定当予以严惩;他们不能也不会采取超过这一限度的行动,如果战争是唯一的选择,那也只好作为无可避免的结果而接受下来。我猜测这一答复已经正式通知了罗淑亚先生,但也不能确定。人们认为舰队司令游悲犁(Marie Jules Dupre)在未接到他的政府的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将拒绝执行上述要求;加上法国即将与布国发生敌对行动的消息,也许使得法国海军军官比在没有这种事态时会更加小心一些。法国代办否认已经接获任何指令,很可能在欧洲的备战已经使法国政府倾注了全部注意力,因而一时把这件事搁置下来。这样,迄今为止还未采取任何行动,罗淑亚先生现已回到北京,整个事情被搁了下来。

“局势比一个月以前更加令人不满。那时中国政府表现得愿意答应任何合理的补救要求,目前它似乎无意采取任何积极措施。无疑,欧洲敌对行动的消息,使得他们相信法国在这秋季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不大,而华北的严冬将使一切行动推迟到明年夏天。

“通过联合行动来推行合作政策的原则,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为有利。我认为这种联合行动,要求其他外国代表一齐给法国代办一臂之助,这将使优柔寡断的软弱的中国政府对其臣民采取断然的方针。在处理像这种极为棘手、异常严重的事件上,能获得有约各国道义上的援助与认可,他们就会感到更有力量。联合行动的结果是否能为大家接受,或是否符合我的避免一场战争的愿望,这都是有疑问的。但是,联合行动想要造成持续地影响恭亲王及其同僚的前景,现已经大为削弱了。”

8月24日倭斐迪致斐士函第25号称:

“自从最近天津发生暴动以来,对于它的起因,人们纷纷推测,它究竟是起因于地方性的闹事,还是一桩广泛阴谋的一部分,人们也费尽心机想要弄清楚。”

“在各口岸的大多数洋人都倾向于接受后一种看法,而就我至今所看到的,各家报纸也采取同一观点。已往两个月中,报刊专栏充斥着社论和通讯,如果所说属实,那么每一个外国人应当立即撤离这个国家,而不必等待要他离开的命令。”

“这些人和报刊所主张的赔偿办法,一直是太过分而不合理,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切实际。形形色色的报复措施都提出来了,各种建议的最低要求是使用武力迫使整个中华帝国开放对外交往,从要求较高的将所有中国官吏一律斩首,推翻现政府,乃至将全国置于外国保护之下等等,应有尽有。”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次骚乱是地方性的,限于天津及其附近。我认为距离此城80英里外的本地人,对于预谋发生的暴动是一无所知的。从可靠来源汇集到我这里的所有证词,都只能证实我已经形成的观点。我所担心的危险倒是这场暴动的消息传到远离灾难现场的地方,会对那里的居民产生什么影响。看来中国人极有可能理所当然地相信他们同胞们关于事变起因的传闻,并认为将报复落到据说是干了邪恶勾当的天主教徒头上是有道理的。为了抵销在其它地方的这种影响,在我看来,要紧的是中国最高当局须正式告示,否认有关拐骗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残忍行为的传言的真实性。此外对于暴动的为首者、支持者与教唆者,应当从速从严惩处。”

“我接到汕头副领事就这问题发来的一些很有趣而发人深省的函件,我谨将其中一封的抄件随函附上(附件1)。从他的陈述中可以看出,显然在这一场暴动发生以前,那里的人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类似的一份陈述来自牛庄领事,该口岸同汕头相比离天津近得多。然而,消息都使这两个地方的老百姓产生了激昂情绪。对诱拐的传闻均认为完全可靠和可信,而且在表示他们赞成所采取的报复办法时,老百姓一般很少加以掩饰。”

“你会注意到,汕头领事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光惩办罪犯而不正式否认激起暴民的那些谣传的真实性,将无助于使百姓安静下来。不做到这一点,百姓仍会认为施加刑罚只是屈从洋人的要求,而不是犯了法要抵罪。中国人的说法是‘事情做对了还要受罪,可真难办’,这表达了整个的观念。”

“鉴于民众的这种情绪,后附上谕(附件2^①)不失为一个重要文件,我相信它将产生良好的影响。它虽然不如我希望的那样清晰明确,但对于一向所受的是那种训练的,其迷信程度即使在(美国)萨利姆(Salem)巫术盛行的日子里,也会被认为是过分的那些官吏来说,合理的期望也只能如此。”

“附件3^②是天津知府约在6月10日发布的告示的译文,该项咄咄逼人的告示,被认为在煽动百姓方面起过主要的作用。它确实是咄咄逼人的,蓄意要引起可怕的后果,结果果然如此。”

“附件4^③是另一道上谕的译文,该上谕飭令已被革职的两位府县官员回到天津,以便就地质讯。这两位官员就是法国代办指名要求立即处决的。”

“我不无遗憾地说,中国官员在这整个事件中的拖拉作风对将来很不利。起先他们显得惊慌失措,急着要从各外国代表那里得到他们该怎么办的指点,使得事情既能公正处理,又可避免法国方面动武。后来这种情绪又转变成满不在乎的冷漠态度。这种变化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如我第24号函件中所

① 恭亲王1870年7月29日致送倭斐迪关于天津滋事案的一道上谕。

② 天津知府1870年6月10日的告示。

③ 恭亲王1870年8月10日致倭斐迪照会。

详述的法国代办的行动,以及中国政府获得了法国本国正在作战的消息;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天津全体居民与舆论的压力之下,确定谁是罪犯并绳之以法实际上是困难重重。这些原因很可能使那些官员们原先善意的计划与意图陷于流产。事情怕要一直观望到法国作好使用武力的准备以强迫达成一种解决办法之时为止。

“天津眼下正在制造和售卖一批批扇子,上面有刻绘得很粗糙的火烧房子和在街道上杀人的画面。扇子对华人的影响正像插画对美国人的影响那样。它们的制造是投人们所好,这些刻绘图版使得扇子销路畅旺这一事实,是当地百姓对暴动结果绝不感到遗憾或懊悔的一种确凿证据。此间舆论对天津暴民们的同情,比爱尔兰农民们对打死地主的一位农民的同情,无疑有更大的一致性。如果爱尔兰农民的感情强烈到足以挫败英国政府欲使用通常法律方式把被控伤害地主人身或财产的农民依法论处的所有企图的话,那么面对一个拥有400,000居民(人人或支持屠杀或同情罪犯)的城市,软弱的中国中央政府感到难以确定谁是暴民以及应当如何惩处他们,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正是蕴藏在百姓中间的这种精神,预兆着不祥的事态;除非居民的这种感情迅速发生变化,否则,如果获悉在别处爆发类似的暴动,我将不会感到惊讶。所有在这里的外交代表都在尽力要求这里的政府采取行动,以扭转群众感情的这股潮流,藉以增加居留在这里的他们的侨民的安全系数。我将继续敦促中国官员采取措施以加强外国人的安全与福利,同时也保证这里百姓的和平与利益,以及他们政府的稳定。除此以外,我不觉得有任意活动的自由,即使我有意这样做,何况我并没有此意。”

所附美驻汕头副领事耶士摩(W. Ashmore)7月25日致倭斐迪函(即附件1)称:

“天津屠杀消息传到各遥远口岸后,对当地华人的思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您可能有兴趣想知道这一情况。

“因此我荣幸地向阁下递上迄今为止所作观察的一份摘要。

“首先,我要告诉您,我迅速而准确地获得情报的机会是充分而可靠的,因为同我的布道工作有关,我派有许多助理驻扎在该府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这些助理按照惯例于每周初跟我通讯联系。他们的信件限于与他们的合法工作有关的内容。我们不鼓励他们拉扯到其所在地方的一般闲谈。只有当某些事情引起较不平常的骚动时,他们才将有关的情报递送给我。在天津消息刚散播开来的那一星期里,这些助理们的信件陆续寄到,其中充斥着在中国人中间谈论的相同的传闻。这些助理之间不可能事先互相通信,因此这些信件是出自独立来源的情报,是可用以互相核对印证的。除此以外,我还亲自花了力气通过与个人交谈以确定民众情绪的动向,因此,我对我的陈述更具有信心。

“对于什么是地方性的,什么是一般性的,什么是谣言,什么是事实,在进行了适当区别之后,我觉得我所掌握的情报包含如下几点:

“第一,在最初获悉消息后的一个星期里,这个行政区域的所有城镇全很清楚地知道了消息。情报有三个不同来源:一是香港报纸刊登的消息;二是中国人收到从香港、上海和天津寄来的若干信件——该地区的许多中国人在以上这些地方做生意;三是各衙门对向其打听的人所提供的口头消息。

“第二,在每一个事例中,中国对该事件的说法均被相信。传闻虽有些微差异,但都说洋人为了极其骇人听闻的目的一直在诱拐幼孩;有一个中国官员前往天主教教育婴堂去规劝,神父们却对他下毒手,他被杀害了,也有人说,他遭到了枪击;老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群起自卫,在随之而发生的冲突中,许多中国人及许多洋人被打死。

“第三,对洋人的深恶痛绝突然间冒了出来。这些感情有些是深信诱拐传闻的自然结果;但如果以为所有都可以归结于这个根源,那将是一种错觉。很明显,早已怀有但被压抑着的恶感,正在乘机发泄出来。讲老实话,百姓关于屠杀的普遍心情是庆幸,在某些情况下简直是幸灾乐祸。同我有关系的人一直被恐吓并被告知,毁灭我们其余的人的时候不久会到来。在最初的狂热气氛中,潘大爷属下的兵丁攻打并捣毁了一些与英国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有关的房子。经过控诉后,主管官员惩办了带头闹事的一些人,但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我的一位助理就因为对天津仁慈堂所受的攻击表示过憎恶而受到攻击和殴打,一位下级军官指挥下的一小队兵勇还威胁要杀死他,这发生在他跟那

位军官同乘一只渡船过河的时候。

“第四,为批复崇厚的奏折而发出第一道上谕,指示对诱拐传闻的真相以及为首的闹事者进行调查。在屠杀的最初消息传来了大约一个星期后,这里的人们也知道了这一上谕。这道上谕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人们发表意见比较小心一些。但是这个效果不幸反而证实了群众持有这种看法:仁慈堂确实是干了种种人们传说的无法无天的勾当;而且因为这种指控仍然没有被反驳,痛恨的情绪虽然稍为抑制了一点,但其力度依然没有减弱。即使对处在遥远地方的我们来说,消除这种虚假的印象,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只有通过充分调查后,以上谕宣告指控并非实有其事,才能够有效地做到。法国政府如果不从皇帝方面得到这么一种宣告,它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会使事件的处理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我这样说,是由于有地位和才智的中国人曾对我说,人民大众确实相信他们自己的官员因执行合法的而不令人喜欢的任务而受到打击,认为‘事情做对了,还要受罪,的确是令人难以忍受’。因此事情的真相应当充分披露,然后接着采取措施才会有适当的道义效果。需要当心的是,如果调查委员会只由中国高级官员包办,而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那就不会揭示事情的真相,结果我们在总的评估中就要吃亏。

“第五,很多体面的中国人告诉我,我们未来关系的平安发展,将取决于天津这一难题的解决方式。根据我个人的感觉,现在我要说,好些年来在这里有一种意见正逐渐占据上风,认为是对外国人使用另一种不同的腔调的时候了,必要时可用武力来支持。在与一个小口岸相毗连的这一地区,像这样的一种感情本身倒无关紧要,但它的经常反复的表露将为老百姓所预言的闹事作好心理上的准备。现在既然北方已经发生屠杀,人们非常兴奋,一直怀有想看它的结局如何的强烈愿望。显而易见,这地区的中国人好坏都要受其影响,要么打搅和阻碍我们,要么允许我们能够享受条约权利,过安静的生活。”

10月25日倭斐迪致斐士函第35号称:

“在9月26日我的第31号去文中,我曾向你报告,法国代办召集了他的各国同僚们,告诉他们这里的政府已将对参预天津屠杀者如何判刑的拟议通知了他。他还声称,在作此项通知时,中方曾以某种盛气凌人的态度问他对此项拟议是否感到满意。他对他的同僚们说,当时他的答复是,他本国目前正处于不安定的状况,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他不认为有权代表法国政府发表意见;而且对罪犯的惩办,同所有外国侨居者的安全具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各方面考虑,他觉得需要先召集他的各国同僚们征求意见,然后才能对所提的问题作出答复。

“中方提出如上建议的方式,以及罗淑亚先生有欠明智地(我这样认为)事先让中国官员们知道他打算把这一问题向他的同僚们提出,使得法国人除了不作保留或不加解释地表示他们同或不同意以外,别无选择的余地。基于这些考虑,我认为由英国、俄国、布国和美国的代表们给恭亲王递交一份联合照会是明智的举动。该照会表示我们对中国政府认为对该项犯罪行为已经作出适当的必要的判刑措施的结论表示异议,同时让中国人自己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正当和适宜的行动,如果存在这种可能的话。该联合照会的抄件随函送上(附件1)。

“恭亲王就该联合照会作了答复(附件2^①),告知调查和审判业已结束,一候判决正式宣布,其结果将正式传达给各使馆。他并向我们保证将对所有在中国居留的外国人提供充分保护。

“证实各罪犯业已宣判并立即执行的两道上谕(附件3及4^②)以及我收到这两个文件的答复(附件5),兹一并附上。

“作为预防今冬天津再次发生闹事的一种措施,皇帝已经命令总督仍留驻该处,直到另有命令之时为止(附件6^③)。我还非正式地听说,正在拟议将省会从保定府迁至天津,这样要是真的出现乱子,或担心会出现时,可以更容易随时接近该省最高长官,从而有可能保持当地人与外国人较好的互相了

① 恭亲王1870年9月27日复布美俄英四国代表照会。

② 恭亲王1870年10月5日抄送倭斐迪当日接奉的一道上谕,恭亲王1870年10月10日复倭斐迪照会。

③ 恭亲王1870年10月12日致倭斐迪关于饬令李鸿章仍留天津的上谕。

解。

“法国代办慨然允许我拿了法国署代理领事一份报告的抄件(附件7),该报告可向你提供十六个囚犯被处决的详细情况,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们的情绪。

“对于这些判刑及行刑很可能在百姓中间普遍地引起影响,法国署理领事表示了他的看法,我遗憾地说,它同我一向所期望的大不相同。

“我相信影响要比他预期的为好。我相信,无论在天津及其附近地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在离这些罪犯受审和处决的现场较为遥远的地区,当人们获悉他们受到惩处之后,洋人的安全反而会有所增加。

“因杀死三个俄国人而被判处死刑的四个人尚未行刑。人们告诉我,由于俄国总领事的特殊要求,死刑已缓期执行,为的是希望他们的证词对被指控与屠杀有同谋关系者的判处可能有用处。

“仔细回顾曾经发生的与该事件有关的种种情况——官员们的畏缩与犹豫不决,对逮捕和审讯罪犯的拖延与迟疑顾虑,害怕行刑之际会出现乱子和暴行,在准备行刑时的极端小心以及在实际执行时的保密措施,这些都以一种非常痛苦的方式表明,在面临舆论的反对却被迫履行一项义务时,中国政府是多么的软弱无能。它还使我们可以对恭亲王及其同僚们在与各国交涉时表现出的窘态作出多少合乎公正的估价。

“考虑到以上情况,一个必然的后果是,在看待中国官员们的行动,或者不如说无行动时,我要比那些对总理衙门成员们所面临的困难一无所知的人,取一种更宽大的态度。

“崇厚被任命为赴法大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将在法国作出适当的道歉,并按对方并不过分的要求确定赔偿。他眼下正在作出发前的准备。在他动身之前,我期望能得到给他指示的抄件,得知授权他就天津所犯暴行向法国政府提出善后建议的内容。这些都将在续发的文件中报告。”

所附布美俄英四国驻华代表^① 1870年9月24日致恭亲王照会^② (即附件1)称:

“照得本年五月天津凶杀案内之官民贵国核定如何办理,经致大法国署理钦差大臣罗知照,罗大臣即拟召致本大臣等咸集会议。经于昨日由彼专派属员前赴贵署,向列位大臣相告。今日本大臣等会同闻信。因思此等巨案,匪但意外凶残,实与保全驻华远人均甚有关。试想二月之久,贵国乘法仅得如此情重刑轻,试问持平之理、保卫之道二则安在?本大臣等同心一意,自合迅为转行贵亲王知悉。希为见复。”

所附楼斐迪 1870年10月17日致恭亲王照会^③ (即附件5)称:

“昨接贵亲王本月5日及10日来文二件。其一内开‘所有天津一案已奉上谕,将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冯瘸子等十五犯即行处决,小锥子王五等二十一犯分别发配’,其二内开‘复奉上谕将续拿各犯刘二等五名即行正法,邓老等四犯发配安置’各等因前来。本大臣查此系非常惊变之事,人命巨案,亟应奏知我国家,听其自为裁夺,一俟批示到日,再行照会可也。”

所附法署天津领事李蔚海 1870年10月19日致法国代办关于十六名罪犯行刑经过的报告[抄件](即附件7)称:

“我荣幸地向阁下报告,此间我在津海军高级长官表示6月21日犯了杀人罪的罪犯已判处死刑,他只愿意派遣一名委任军官到场充当见证人。我们经过协商之后,鉴于该事件的重要性,决定最好从停泊在这里的炮舰中委派一名舰长作为代表,率同译员费里德(Alexander Frater)届时前往刑场观看。

“在昨天的一次会晤中,天津知府(马绳武)和我就死刑如何执行的全部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告诉我,由于情绪激动的居民有可能滋事,总督希望在今天日出以前处死已判处死刑者。知府坚持法国军

① 他们是:布国公使李福斯、美国公使楼斐迪、俄国代办布策、英国代办威妥玛。

② 译者注:原译本载故宫博物院《清季教案史料》(一)43~44页,兹照录。

③ 译者注:原译本载故宫博物院《清季教案史料》(一)页四十六,兹照录。

官和译员有必要在这之前的夜间乘小轿子由他派遣的五十名警卫士兵护送下前往刑场；他还希望这样做将不会吸引群众的注意力，因为尽管是凌晨，还是有号啕送终的亲友和许许多多无赖组成的群众成群结队前往的。我反对我们这两位军官在他设想的这样有损尊严的形式下前往刑场，并告诉他我不会在黑夜行刑时派遣任何人出场。他们仍然坚持有必要在指定时间内处决罪犯。经过一番讨论之后，知府提出明确的证据证明，对于这些人即将被处死一事，近三四天来在百姓中间已表现出很大愤激情绪。他还向我透露总督担心会出现严重的骚乱。我说在目前拟议的安排下，我将不会派任何人到刑场去，而把整个事件留给总督按他自己愿意的方式去解决。但我加上一句，我想要有人向我提供一些确实执行死刑的证据。知府认为这可以通过查验处决后装入棺木内的遗骸来解决，他请我在死刑结束之后派一个人来进行检验。他还问我可否接受三口通商大臣通知斩决业已执行的正式公文作为证据。我同意接受。知府说，他很高兴他自己未被要求在刑场出面，他承认不管怎样他是怕去的。在离开之前，知府告诉我，确曾有人送钱给被判处死刑者的家属，但款项系由公众募捐筹集而来。

“在这次会晤之前，我曾指示译员费里德先生于当天清晨去会见知府，安排法国军官和他前往刑场事宜，并以我的名义告诉知府说，期待中国当局采取措施，保证外国人免受骚扰和凌辱。

“知府认为他应当同费里德先生避入私室。在屏退了所有的仆人和佐杂人员之后，他压低声音通报关于行刑的一切安排。即使在那时候，他还不时惊起，觉得有人在偷听。他这样做的原因是所有当局都对天津老百姓的不信任怀有恐惧，他必须传达给费里德先生的那些话怕被泄漏出去。实际上，知府在他自己的衙门里感到如此忐忑不安，以致他最后希望转移到法国领事馆来讨论执行死刑这一问题。不一会儿，他果然来到这里，这就开始了我前面提到的我同他的会晤。

“昨天午夜我派了领事馆的一个信差到天津，指示他注意死刑的执行情况，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带回系在那些囚犯尸身上的死刑执行令，它将给我提供确处死的那些人的名字。费里德先生将他自己印有官衔的一张名片交给那个信差，以备万一巡勇要将他撵走时应急之用。信差充分地超过原先预想地利用了这张名片。靠了它，他在囚犯们被带出监狱之前就已进了县衙门，从那时候起直到囚犯们死时为止，他目击了全过程。他向我报告说，大约二百名巡勇和兵丁从监狱将囚犯护送到知县的公堂，在那里他们被依次排列，一共是十六名。没有一个肯下跪就缚，尽管被喝令这样做。他们一个个都用到处传说的政府赏给的礼物即崭新的丝绸衣衫打扮起来，脚上穿着制作精美的鞋子，梳着像女人模样的各式各样的发式，头上戴着中国大家闺秀常用的头饰。在公堂上有一个人痛骂那位协台，大概他是被后者给抓起来的。

“在前往刑场途中，尽管是凌晨，群众早已云集。犯人们向一批批群众高声叫喊，问：‘我们面可改色？’大伙立刻齐声回答：‘没有！没有！’他们控诉当官的把他们的头出卖给洋人，叫人们用‘好汉’的称呼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人们当即同声高呼。被判死罪的这些人的亲友一路跟随前进，放声恸哭，泪流如注。到达西门外刑场时，罪犯们开始拉长了嗓音高唱，听到这歌唱声，执法官协台下令将他们斩首。罪犯们伸颈就戮，毫无惧色。刽子手一共五六十个人，都是南方的兵勇，行刑很快结束。

“这发生在大约清早五点半钟的时候。刑场由众多兵丁警戒。领事馆的信差被准许取下十六份死刑执行令，将其带走，现在正由我保管着。

“那些杀死俄国人的，我相信，不在处决之列。

“情况比我预料的要平静得多，这大概可以归因于中国当局所安排的保密措施。

“从我最近听到的，这些杀人犯的死不大可能使百姓留下引为前车之鉴的印象，反而有可能加深他们对洋人的敌对情绪。这些被置于死地的人，无疑在民众眼中被视为烈士。我担心，恐怕在当局的心目中也是如此，如果向我所作的报告属实的话。”

12月15日饒斐迪致斐士函第43号称：

“6月21日天津暴民行动给美国公理会华北差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造成的损失和破坏，经仔细估算，总额已确定为4,785天津银两零1钱9分，即约6,700美元。

“被捣毁的财产计有：教堂建筑物一座及与之相毗连的、属于该差会产业的一些适于住人的房屋，和县城另一处从中国人那里租来的一座小礼拜堂。后者的毁损，估算达 285.5 两。

“天津副领事按照我的授权和指示，向当地官员提出了赔偿要求，并已获得解决。他们同意依业主认为满意的方式重建上述租赁的房屋；对于较大的礼拜堂的损失，则以现金赔偿。我对这一结果感到完全满意。关于商讨赔偿要求的全部细节和款项的处理分配，请参阅该副领事给我的报告文件，其抄件随后附上（附件）。

“关于密妥士先生在他的函件中所提到的，山嘉立牧师认为可取的另外对本地基督徒所受损失的赔偿要求，以及类似性质的一切赔偿要求，请参阅我致该副领事的另一文件，其抄件见于我 12 月 5 日上报国务院的第 40 号文件的附件 D。这件事的解决使（我现在所能得知的）美国公民对因天津暴动所蒙受的损失或破坏而提出的所有有关的合法的与正当的赔偿要求，均已获得了处理。

“希望我在房产上所采取的行动能够获得总统阁下的认可。”

所附密妥士 1870 年 11 月 18 日致楼斐迪函称：

“我荣幸地接到阁下上月 17 日的函件，指示我从中国当局取得 4,785 两 1 钱 9 分的款额，以赔偿 6 月 21 日被中国人捣毁的属于美国公理会华北差会的两座天津教堂。接到来件后我立即就此问题致函成林，并将从阁下那里寄来的胪列遭受的损失和逐项提出具体赔偿要求文件的译件递交给他。此后，在我的办事处同马知府就该问题进行了几次会晤，最后我们作出了安排。他在接到我的去文之前业已动工重建在该城西门附近的第二座教堂，其造价为 285 两 5 钱。应山嘉立牧师之请，要求马知府继续抓紧此项工作，使其迅速竣工。此外尚有 4,499 两 6 钱 9 分的款项，应以现金偿还，以满足我国使馆交由我提出的赔偿要求。我现在应向阁下报告，昨晚我已接到马知府的文件，内附前述 4,499 两 6 钱 9 分款额的海关银行的支票一张，今天早晨我已将支票交给这里的旗昌洋行（Messrs Russel & Co.），指示其将款项存入美国公理会华北差会的帐户，我已取得该行出具上述存款的收据，其副本亦随函附上。我还应当向阁下报告，山嘉立牧师前几天访问过我，提到他为了一些同我们差会有关系的中国人拟向中国当局另外提出赔偿要求，如果阁下能就这一问题给我以指示，以便遵循，我将不胜感激。请告诉我应何时向中国当局提出这一要求，尽管我尚未获得阁下就该事件所作的指示，但我认为就此提出另外的赔偿要求一定能得到阁下的批准。”

12 月 27 日楼斐迪致斐士函第 45 号称：

“不久前我从天津接到报告，提到该处百姓筹备给参与今年夏天闹事而被处死的那些人举行一场盛大的丧礼（设醮祭奠），并集资竖立一座牌坊或建造一座祠堂作为纪念。虽然从各方面看来，我们希望负责当局应当尽力防止这类行动，但由我本人或我的同僚们就这件事提出正式的官方抗议，却显得未必恰当得体。但是，我觉得较为可取的是派遣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先生到总理衙门。他用口头传话方式指出这样的丧礼将会聚集一大批百姓，难免要出事，而且这种消息一旦传播出来，将会产生不良影响。他劝告中国政府责成负责官员采取他们认为适宜的措施，予以制止。与此同时，天津副领事受令谒见了总督，友好地向他提出同样的请求。我荣幸地随文附上该副领事关于访谒总督经过的报告的抄件，后者已作出保证，将不准许进行前述的祭奠活动。

“这件事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显示了天津人民忿忿不平的情绪。我本不应该再以此事烦渎尊听，但恐怕谣言一旦传到上海，将会被那里的报纸抓住，给以不适当的突出地位，从而产生使外国人社团持续提心吊胆的后果。”

所附密妥士 1870 年 12 月 22 日致楼斐迪函称：

“我于本月 20 日拜访了李鸿章总督，提出了阁下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上所说的问题，那是关于在北京流行的一则传闻：‘天津百姓正在准备为被斩首的烈士们举行一场盛大丧礼（设醮祭奠）并打算建立一座牌坊或祠堂来纪念他们。’

“总督阁下说，处决后不久天津就已经流传谣言说，百姓打算建造一座祠堂（我们不妨把它翻译为“祭祀祠庙”），以此纪念被处死的那些人。但这种谣言一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立刻召见知府和知县，命令

他们严禁当地居民搞任何此类活动,如果他们确有这种打算的话。他接着说,这些人杀死洋人已经依照中国法律给以惩处,现在既然中外一家,地方官自然不能准许天津百姓建造祠堂来纪念他们。如果有人这样做了,他身为总督将亲自前往现场,把祠堂拆掉。

“无论如何,当地官员决不会准许这样做,但他相信这不会是天津体面居民的打算,而深信谣言只是由聚集在刑场的一些底层人物的议论引起的。我的看法是,总督将不会准许天津居民如阁下本月15日来函所说的那样建造这类的祠堂或庙宇。我当即告诉总督他所说的话我会转告阁下。我还加上一句,来年春天您可能前往还没有访问过的南方口岸,届时也将路过天津。他说,您如果前来天津,他将很高兴会见阁下。”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八《自咸丰至光绪末》载:

“天津教难缘起

“同治九年夏,陈国瑞在南京散播谣言,希图起事,以总督马新贻办事严明,且与西士善,计不得售,乃北上至天津,而焚杀之祸遂兆于此。陈初从僧王打仗,为僧王义子,疾恶洋人特甚。既至天津,乃百方鼓煽,谤教揭帖遍张通衢,极力诋毁。地方官任其所为,毫不查禁。不久,人心多为所惑。津地五方人杂,莠民素多,最易煽乱。此等莠民在津谋食,多无常业,当时人呼为混混儿。”

《中国基督教史纲》第十五章《道光以后天主教的复兴》载:

“天津教案,由陈国瑞一人煽动而成。陈国瑞本是僧格林沁的义子,疾恶洋人特甚。当他在南京时撒播谣言,希图煽起仇教事件,因计不得售,乃北上至天津,(偏)[遍]贴谤教传单。果于六月二十二日发生暴动,围攻天主教堂。官府不加弹压,乱民愈聚愈多,谢吴两神甫即报告法领事丰大业,丰领事即请北洋大臣崇厚保护。崇厚百端推诿,领事与随员及神甫均因而遇害,领事署天主堂亦付之一炬。又焚烧‘仁爱堂’。‘仁爱堂’乃一修女院,内有修女十名,收养孤儿幼女,并施药施诊,行种种慈善事业。是日屋宇被焚,修女被杀,孤儿亦多死伤,并波及邻居法商及俄侨多人丧命,英美福音堂亦遭焚掠。结果,赔偿抚恤,惩办官吏了事。”

《中国基督徒史》第19章《西方人的压力》载:

“传教士的胜利与中国方面的反映

“次年,一场悲剧在天津爆发了。在八里桥战斗中有一位将军的长子被杀。这激起了百姓和官员们对外国人的仇恨。仁爱会修女们收养了一些弃儿,其中30—40个孩子在—场瘟疫中死去了。人们谣传修女们杀害了孩子,而有些中国人也被控拐骗儿童卖给修女。1870年6月21日,胜利圣母堂^①孤儿院被搜查,一群闹事者随即威胁教堂。法国领事试图让地方当局干预,但未果。知县对事态漠不关心,领事便朝他开了一枪。枪没打中,领事及教堂卖烛人却在愤怒的群众的打击下倒下了。谢福音和吴文生神父在胜利圣母堂双双被杀。教堂被焚,女修道院及新建的几个耶稣教徒的机构被毁。10名修女及几名法国人、俄国人和中国人被杀。由于这一血腥的日子,法国向中国政府要求巨额赔偿。但地方当局却未被追究。25万两银子的赔款交到宗座代牧主教之手,他使用于重修教堂和孤儿院。约20名违法的罪犯被处决。”

《近代史资料》(总第47期)裴淑兰整理《天主堂在献县等处的田产》载: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天津法国教会借口‘遭受洗劫’,献县法国教会也借口‘遭到浩劫’,共同向中国政府强索十二万两的赔款。献县耶稣会长鄂纯和(Gonnet)用这些赔款在天津法租界购置了两笔地产^②。第一笔,1870年11月10日买了十一亩九分二厘五毫的房地产,被称作桑特里(Sandri)房地产,买价一万两,房屋出租年收入一千一百两。第二笔,1871年4月23日买了二十一亩二分五厘的房地产,被称作伏歇(Vaucher)房地产,买价一千七百两。之后在此修盖了献县教区驻天津办事处。1873年办事处迁往他处,该房出租,每年收益租金六百两。以后又在这块土地上盖了许多房屋。据

① 应译作“圣母得胜堂”。

② 裴注:河北省博物馆馆藏资料《天津法租界买进的产业》(法文)。

1899年的估计,这些房子出租每年可赢利一万七千至二万两。……‘这笔利息对十六万八千九百一十八两三钱的本金来说是相当丰厚的了。’^①”

《教务纪略》卷三下《章程》辑:

清总理衙门《通行革除禁教明文》^②载:

“同治九年,刑部奏请续纂《大清律例》,已于《礼律》‘祭祀门’内载明:‘一凡奉天主教之人,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皆免查禁。所有从前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概行删革’等语,并将原书内所载‘传习天主教’一条注明‘删除’字,进呈全书”

1871年 同治十年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1月3日(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津案情轻各犯分别等次定拟摺称:

“本年五月间天津民教滋事一案,经前督臣曾国藩奏明,难以拘守常例,变通办理,将情节较轻之于起等二十五犯,分别问拟军流徒罪……”

“臣逐加确核,拟请将于起等五犯,发附近充军;小锥王五一犯,杖一百、流三千里;聂中三等七犯,拟杖七十、徒一年半;穆朝有等十二犯,拟杖六十、徒一年,均各至配折责安置。”

所附定拟军流徒罪犯清单载:

“初次奏案审拟军流罪犯三名:

于起:天津人,年二十二岁,系供认抢富昌洋行豹皮、洋毡等物之犯。

潘二:天津县人,年三十岁,系供认抢仁慈堂木柜、棉袄之犯。

毛三:天津县人,年二十一岁,系地方苏高升、蒋吉升供结在河楼抢出衣物变卖船只之犯。

“二次奏案[审]拟军罪犯二名:

邓老:天津县人,年二十七岁,系供认用木棍打伤仁慈堂服役人之犯。

杨二:天津县人,年二十六岁,系供认乘机攫取河楼内银物之犯。

“以上五犯情同抢夺,殊属不法,应从重拟发附近充军。”

“初次奏案审拟军流罪犯一名:

小锥王五:天津县人,年五十七岁,系地方陈吉升、赵得供结抢仁慈堂衣物并教民胡姓家具之犯。

“查该犯惯于熬刑,坚不吐供,狡猾异常。且系著名混屋子匪首,应从重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初次奏案审拟徒罪人犯十七名:

聂中三:天津县人,年二十八岁,系供认抢取天主堂抛弃钱文之犯。

李火:天津县人,年二十三岁,系供认抢拿教堂洋枪之犯。

孙二:天津县人,年二十四岁,系供认抢拿仁慈堂方桌之犯。

李大:天津县人,年二十九岁,系地方王永和证拿枪赴仁慈堂及自认拾枪之犯。

杨二:天津县人,年三十九岁,系供认在河东乘空拿得洋枪之犯。

古长河:天津县人,年四十七岁,系供认在针市街拿得洋钱之犯。

董四:天津县人,年四十二岁,系供认在仁慈堂拿得银簪之犯。

“以上七犯,情节稍重,各拟杖七十、徒一年半。”

穆朝有:天津县人,年三十六岁,系供认在讲书堂拿取窗户之犯。

① 裴注:河北省博物馆馆藏资料《关于献县修院资金来源的材料》(法文)。

② 此文为清总理衙门1896年9月11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给各省的咨文。

郭三：静海县人，寄住天津西门内，年二十四岁，系供认在讲书堂拿得木椽之犯。

李四：天津县人，年二十四岁，系供认在讲书堂拿得板凳木头之犯。

王五：天津县人，年四十一岁，系供认在讲书堂拿得木板之犯。

崔兆：天津县人，年三十二岁，系供认在讲书堂拿得檀木之犯。

马长顺：天津县人，年二十二岁，系供认在讲书堂拿得书本木板之犯。

尚得：天津县人，系供认在讲书堂拿得盒子之犯。

刘都贵：天津县人，年二十七岁，系供认拾得仁慈堂木头之犯。

滕永：天津县人，年三十八岁，系供认在河楼门口拾得洋枪之犯。

孙二：天津县人，年二十五岁，系供认在河楼拾得洋人洋刀之犯。

“二次奏案审拟徒罪人犯二名：

贾三：天津县人，年三十岁，系供认事后捡取仁慈堂什物之犯。

何四：天津县人，年三十七岁，系供认拾取天主堂衣物之犯。

“以上共二十名，情节较轻，均拟杖六十、徒一年。理合登明。”

5月9日(三月二十日)俄使倭良嘎为同意将津案误杀俄人之人犯区别定罪事致总署照会称：

“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准贵王大臣照会……称‘兹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据通商大臣中堂李咨：‘此案田二等四犯因法人打官滋事，救护情切，误将俄国男女三人扎伤身死……’该中堂又咨：‘并据津郡绅士王鏞等一百四十五名、铺商陈光耀等一百一十五名公禀，内称该犯田二等四人罪有应得，情尚可原，恳请照会。’……’各等因。……本大臣于本年正月十七日照复内叙准全行申送本国京都，俟见示复在案。……本国拟之，若将罪重田二、张幅顺二犯从重办理则足矣，其余二犯可以减等，照其所犯之轻重分别定罪。”

6月28日(五月十一日)法署使罗淑亚为天津望海楼修葺事请令知府照所拟章程完工事致奕沂照会称：

“本大臣于三月中……曾与李中堂会晤，面谈望海楼修建坟墓之事，议及委派天津府马相同法领事官狄及本馆李翻译官三人妥定完善章程，早结此事。旋在上海接到李翻译官禀言所陈‘现拟望海楼坟地之工，天津府马绳武愿备资承办，其一切雇工选匠择员监工等事，皆其经理。并言明于各坟之前立一石碑，将亡人姓字用汉、法文并刊其上，照狄领事官所写之式而刻。并于周围坟墙面河开一墓门，仿照京师西洋坟墓之式。然此式应先派一能工到京看明方妥。再，墓门上嵌之额石，即将总理衙门所出之告示镌刻其上，以期垂久’等语。

“本大臣查禀言所拟周妥可从，是以于准许外，仍加入一言，即‘俟坟工告竣日，务为天津府首先会同法国狄领事官在望海楼交货工程’，方显昭著，接管有人。……请将照会之意咨行直隶总督部堂，催令天津知府按照所拟之章将坟工妥速完结……”

《清末教案》第五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一、直隶天津法领事、西教士等被杀西教堂被毁案(1870—1871年)”辑：

8月5日斐迪致斐士函(摘录)第80号称：

“对被控参与去年天津屠杀的那些人进行审讯的结果，二十人被判处了死刑，除了两名地方官员之外，另有二十五人被发配充军，上述二十人中，宣判犯有杀死法国人的罪行的计有十六名，其余四人杀死了三个俄国人。十六人已被处决，对其余四人的判决，如我当时获悉的，由于俄国公使的建议而暂缓执行。随后我听说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俄国公使不认为四名罪犯的判处，足以充分抵偿所犯的罪行。除非有俄国领事参加的联合检查确定被控告的那些人的罪状，这四人及任何其他人数的处决，也不能就认为罪与罚即已相当。后来终于同意这有争议的四个人按照所建议的方式进行复查。在作了一番彻底的审查之后，俄国总领事满意地认定被控告的四个人之中的两个人确犯有杀死他的侨胞的罪状，至于其他两个人虽然曾有支持和教唆，但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公开的行动。

“当人们获悉复查的结果之后，犯有较轻罪行者的朋友们便向该总领事请愿，请其同意为他们减

刑,所得的答复是任何此类行动将会超越总领事的权限。于是这一案件被提到北京,最后被提到圣彼得堡。俄国公使同意所有判决的执行不妨延缓到接到本国政府的指示之后。事情就这样延搁下来,这是4月初我离开北京时的情况。

“暂住这里度夏的俄国公使现在告诉我,指示业已接到,授权他同意他认为恰当的解决办法,只要它能体现出公正根据这一指示,他已经同意犯有较轻罪状的那两个人不妨减刑为终身充军。俄国公使关于复查该案件的行为,我认为是明智的。这将有助于为日后树立一个先例,如果发生类似的不幸案件的话。而且,这还可以使中国铭记这种真理:处决人数的多寡并不一定符合公正的要求,除非被控告者的罪证确凿无疑。俄国政府表现出的宽大,应当可以给官吏和百姓一种教训,各外国政府只要求惩处那些犯罪者,且必须按照他们犯罪的轻重量刑。

“这里,还可以指出,这次检查的结果大大有助于反驳曾广为人信的这样的说法:去年秋天在天津被处决的人是用钱收买的替死鬼,其中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是无辜的,而真正的罪犯却统统漏网,未受惩处。尽管许多应受惩处的人很有可能逃脱了,但是没有可信的能引起我们注意的证据表明已被处决的那些人是无辜的。”

8月22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George F. Seward)致戴维斯(Davis)函第478号称:

“1870年6月21日,天津发生了屠杀事件。在那里被极为残忍杀死的,计有:法国驻该口岸的领事、法国驻北京使馆的副领事级翻译和他的妻子、一个天主教神父、九个仁慈堂修女、一个经商的法国侨民和他的妻子,另外有三个俄国人(其中一个为妇女)。据说,与法国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为本地儿童办的育婴堂,以及各个商业机构有关系的很多华人,也一同罹难。

“重要的是要了解引起这次屠杀的原因、客观环境以及这个政府对罪犯所采取的方针。了解这些不仅将会明白中国人的性格和心理状态,而且对我们如何跟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中国人打交道,也会有所启发。据说历史会重演。如果这场屠杀是由于某些原因造成的结果,而当这些原因还在起作用时,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屠杀的种种恐怖场面会再现在我们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这一问题突出得令人不寒而栗。这应当成为向人们提出警告的信号。

“对西方各国的公民来说,中国人是一个巨大的谜。有些观察家断言他们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最勤劳的民族。别的一些观察家却声称他们是狡猾、贪婪和残忍的民族。有的人把他们列为第一流的国家,并预言过不了几年他们会改进存在于他们制度中的一些微疵。另外的人则认为他们的民族性腐朽了,他们的种族衰竭了;他们已没有能力接受宗教或政策的改进。很多人的看法是中国人似乎拥有世界财富的主要份额,而且被描写为多少世纪以来,财富源源流入他们的海岸。又有人说,他们的城镇,垃圾狼藉,乞丐遍地。一种意见认为他们的教育如此普及,这个帝国几乎人人知书识字。另一种意见宣称他们正在无知和迷信的深渊中翻滚。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先生以他特有的宽宏大量的性格,以他的想像丰富了中国人较能吸引人的特质。他的见解中有这么多使人振奋和受人尊重的地方,有这么多表现这一时代宽广胸襟的东西,此外有这么多真实而能够论证的东西,他因此唤起了我国人民的热情。他在英国、北德联邦和俄国也多少取得了一些成功。独有法国完全地一贯地不相信他和他的委托人。

“但是,就在这位漫游各国口若悬河的特使执行他的使命之际,在中华帝国相隔很远的各个地区出现了暴行的消息,使人们对他的游说产生了怀疑。距离他死去才几个月,可怕的天津悲剧的消息,便传遍了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之后几个月,从中国获得的一条条的情报都表明这个政府正在准备作战。人们十分忧虑暴力行动会变本加厉,实际上一些小乱子已经发生了。天津的矫正措施既迟缓而效率又很低。不多时有报纸披露该政府已经发布了谕旨,它打算将洋教士从帝国内地驱逐出去,并限制他们在各口岸的活动。蒲安臣先生热情洋溢陈词的最后效果黯然失色了。留下来的印象是中国人对外国人怀有始终不渝的刻骨仇恨。

“考虑到中国人的品质和性情,中国与外国交往的前途和帝国的前途如何呢?在中国居留的洋人中间,占上风的倾向是在万国的天平上把中国人贬到很低的地位,说他们的智能低得可怜,谴责他们

的道德标准，宣称他们死气沉沉、缺乏精力。每一个持这种看法的人，都能随手找到事实来论证他自己的独特见解。

“我自己承认所见与此完全相反。对这一民族的信心，照我看来，是一个直觉的问题。我在这里发现他们对传统的坚定的执着，对生活中提出的各种要求，他们保持着清醒的热忱，而不是得过且过。在他们进步的较低阶段，同困扰着他们的种种贫穷和困难作斗争时，表现出一种诚实的，至少是某种认真的精神，而且能从中引申出道德的教训，他们有一种持久的是非感。这一切构成了民族特性的非常令人满意的基础和基本成份。百姓具有一种实在感，士绅具有学者的本能，渴望进步，并具有以认真和恒心为进步而努力工作的气质。统治者有尊严感，考虑到他们的消息和爱国情绪，其见解是豁达的。谁敢说，这样的民族不会有甚至比以往更加美妙的前途呢？为什么进步和帝国的车轮不会滚滚向前，直到亚洲各国重新看到他们的前途？

“自然，不同民族，一般总是显示出不同的智力和品质。但我们很可能被种种表面现象所欺骗，并归因于血统特点的不同，其实这是可以用环境差异说来加以解释的。

“采用这种观点，我们不妨来考虑天津屠杀事件的原因，正如我们对发生在别处的某一类似事例所做的那样。如果在中国和在其它地方一样，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如果坚持通行的证据法则和公正精神，我们就应当在预谋未经公正地证实之前，把它看成不存在。我们应当通过周密的调查来确定到底是什么引起和驱使着这种预谋。我们应当辨别预谋的发展和当地百姓的一般倾向的区别，如果我们找出存在的特殊情况，使我们能够全部或部分地搞清这次屠杀的起因的话。

“其实，这次屠杀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危险的因素来自广泛的不同的方面。它们汇合而成的巨流是势不可挡的。

“在列举这些原因时，我想要说明以下三点：

“第一，对洋人抱有敌意的一般因素，中国人憎恶和不信任洋人的一般原因。

“第二，这种不信任所采取的形式，实际上指在天津所表现的形式。

“第三，在天津存在和活跃过的一种群情激动的特殊情况。

“在对厌恶洋人的普遍情绪产生影响的诸种因素中，最重要的原因是：

种族偏见

“我们大家知道种族偏见到处存在。美国白人对黑人怀有种种偏见，就是一个现成的强有力的例证。我认为，很难在美国找到一个体面的白人，即使在最进步的平等权利论者当中，愿意同被轻视种族中哪一个人维持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对黑人的憎厌同对印第安人的憎厌有互相的关联。尽管小说和诗歌费了许多笔墨来展现黑人的高尚品质，但却未能对白人轻视黑人感情潮流产生多大影响。同样，中国人来到我们的海岸时，必然会遇到不加掩饰的怀疑和憎恶。我们欢迎从其它国家来的移民，而且没有任何力量强大到足以阻遏任何移民入境的潮流。但对华人的敌意是如此之大，他们的入境被限制到只有它正常流入的零头。

“的确，种族的偏见和反感是这样的强有力，以致当不同血统的人们突然间产生密切的联系时，我们就要面临最严重的后果。问题不是敌对的感情会不会随这种接触而发生，而是不同特性的种族的交往应当怎样进行，才能使其发生最少的冲突。

“中国人何以憎恶洋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由于：

这个帝国的闭关政策

“中国的情况是她在极大程度上能够不靠同外国的交往而取得她自身的发展。她的领土从东部的太平洋延伸到西部的崇山峻岭，这些山地形成了几乎同样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北边是群山和绵延无边的沙漠，南边是热带的丛林。在她的疆域内有许多水道构成绝妙的交通和商业的渠道。还有广阔肥沃的平原。无论在哪里，气候都十分宜人，并因相似的特色而引人注目。

“一个民族生活在如此不受干扰的富足的国家里，它避免同外部世界相接触，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们有一种力量来坚持他们的政策，而这种力量只能用帝国历史的悠久和人口的众多来加以衡量，这些都不是什么可奇怪的事。

“中国人厌恶洋人的第三个原因，可能由于：

他们是无知识的人民

“中国文字约有 25,000 字。熟悉其中的 10,000 字，差不多就足以应付任何较高阶层人士——如政治家——的需要。

“我确信在每一百个中国人中，大约有两个人能阅读各种体裁的著作或古典著作。每一千个妇女中大约有一个这样的人。

“因此，中国人必须被看作一个未受教育的民族。因而他们必然是迷信的和多疑的。他们不能够公正地估量他们观察到的事实的意义和份量。他们很可能想像他们被种种危险和困难所包围，其实这些并不存在。

“第四个原因可能是：

宗教不同

“人们常说中国人对宗教的见解非常宽容；其实基督教传教士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却是由于中国人明显地缺乏宗教感情而引起。

“如果是这样，中国人确实是比较不受许多世纪以来对许多国家的人民心理产生过很大作用的宗教的影响。用不着去缕述在历史上出现过为捍卫宗教信仰或将其强加于人的连绵不断的斗争，以及把种族按祭司或神父的影响分成等级和种姓。对整个人类来说，超自然力量、来生、神赐与神谴等等的观念，是普遍存在的。在这方面，中国人也不能说有例外。否则的话，为什么崇拜更高权力的庙宇在其国土内到处存在？为什么僧道阶层在人口中占有相当可观的比重？

“完全有把握地说，中国有她固有的信仰。如果是这样，那么外来的人想要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就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冷遇。要是我认为除了由教士们所必然引起的问题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不和谐的因素的话，我也会持上述看法。如果教士是一本正经的人，他们将从责任感出发热爱他们的宗教信仰。如果他们干脆是图谋私利的人，他们就要做出种种事情来维护他们的权力和权势。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不能不面临一个阶层的敌意，这一阶层总是在管理国家上扮演着一种重要的角色。

“无论通过通常的办法输入新宗教会不会引起敌对情绪，但可以肯定的是，已采用的输入新宗教的方法，已经显然给政府和人民带来了恶感。

“对天主教传教士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这些例如说，在华西省份有一个主教，住的是一座可以与总督官邸互相比美争胜的宫殿，他乘坐的是只准帝国最高官员使用的那种轿子，在他的主教管区内，从一处到另一处，排场像王侯一般的豪华。又传说天主教神父们要求以平等地位同地方官员文移往来；他们串通教民使地方政府的政令无法贯彻；他们还教民要求各种不寻常的令人反感的豁免特权。事实上，他们正在一国的统治领土内建立一种危及这一国家的统治。

“任何研究过天主教会历史的人，当他听到中国感到十分惊恐的时候，是不可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却能比她更全面地估量实际存在的危险。对于她可能出现的恐惧所作出的任何阐述，都会显出许多幼稚之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她的政治家们居然不去研究外国教会存在所出现的问题，那他们岂不是愚不可及？

“中国人敌视洋人的第五个原因可能是：

鸦片贸易

“1870年香港进口的鸦片价值为(墨西哥银元)	……………\$ 62,988,624
“这一年从中国出口茶叶的价值为	……………\$ 40,376,849
“出口丝的价值	……………32,021,916
“计	……………\$ 72,398,765
“差额	……………9,410,141

“该帝国的有价值的出口产品的七分之六,就这样被白白地消耗在对其人民绝对有害的毒品之中。让有关人们爱怎么掩盖鸦片贸易就怎么掩盖吧,让英国政府和人民去辩称鸦片是中国人食品中的必要的助餐剂吧,事实始终是,洋人同鸦片纠缠在一起是他们文化中的一个污点,也是中国人深恶痛恨洋人的一个起因。

“敌对感情的第六个起因可能是:

治外法权制度

“如你所知道的,中国与西方国家所订的条约规定,后者的公民不受中国地方当局的管辖,而只受他们本国官员的支配。

“这样一种交往条件自然不能不为中国所厌恶。它所根据的是这样一种不加掩饰的看法,即外国不相信中国会公正地对待洋人。这对中国人是一种持久的耻辱,是恶感的成因。这个政府在许多方面是骄傲的政府。这个民族对自己的优越性抱有根深蒂固的信心。因此,当西方国家凭借武力,将他们自己绝不会向别人让步而接受的这样一种不寻常的制度强加于中国时,引起人们深深的反感,杰出的政治家们宣称他们绝不会长久忍受这种侮辱,就不足为奇了。

“很难说这种治外法权制度不会对中国人经常产生不公正的事情。在我们的东方机构里,我们不可能始终拥有明智的、正直的和无偏见的法官,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公正,在涉及到外国人及其利益的时候,他们准备将公正给予被轻视的中国的起诉人。此外,即使给了真正的公正,中国人的利益、感情和偏见也会时常引起最严重的争执。几年前两江总督在提出一些贫苦渔民的渔船被一艘外国轮船撞沉的案件时,声称这类事件频繁发生,已经把沿江的百姓激恼到了这样的地步,他担心如果外国法庭继续拒绝给以赔偿的话,他们会拼命报复。最近,直隶总督对一个类似案件的对华人不利的判决感到恼怒,曾恫吓说要把轮船扣留起来直到作出赔偿为止。上海的百姓一度把本地的县官抓起来凌辱一番,因为他在一桩曾引起他们同情的案件中未能获得有利判决。

“中国人不喜欢洋人的第七个原因是:

外国官民时常表现出的脾气和腔调

“外交代表们有时表现出放肆的态度,伯洛内先生(Claude HenriMarie Bellonet)的举止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蒲安臣先生在1866年《外交通讯》中曾经详述了此事。在北京像这样的例子是罕见的。在那里,外国政府总的说来一向有很好的代表。在各口岸情况就不一样了。商人社团要求领事们要有魄力。这些领事除了向当地官吏表示不满时使用飞扬跋扈的方式以外,常常没有办法显示魄力。在领事的要求下,炮舰被用来解决争端,财产被剥夺,还有人被杀头。

“在外国租界里,欺负性情较温顺的华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来华时间较长的居留者和文雅的洋人对待本地人有相同的体谅心情。新来者、较年轻的人和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则不同,人们常看到他们在大街上把中国人粗暴地推来搡去,在骑马或驾车时用皮鞭抽打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大船和轮船的船主毫不在乎地把本地人的船只撞沉,有时甚至不停下来把不幸遇难的人救起。

“就这样,我们的名誉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心目中大受影响。许多洋人的仁慈、慷慨、对人尊重等

高尚品质,敌不过另一些人表现出来的粗暴和凶残所产生的更明显更有力的相反影响。

“敌对情绪的第八种原因是:

外国报刊上的言论

“在华外人的整体倾向是偏向敢作敢为的办法。我以前曾对此作过解释,并坚持认为这是自然的和值得称赞的。我不佩服这样的人,尽管他们看到了中国制度的许多缺陷和国家的发达状态,却还要认为在中国一切都好。我但愿西方文化的代表们既要有紧迫感,又要尊重人。我们的责任是向中国人指出,他们正在放过绝好机会并处于易受攻击的危险之中。我认为这可以用不引起敌对情绪的方式来做。我知道中国官员和民众都准备接受忠告,他们将从他们尊重其意见的那些人当中寻求它。他们会缓慢地但很扎实地建立起信心。

“外国的报刊表现着洋人的过火倾向,它所刊行的文章往往出之以过激的方式。其情绪并不总是公正的,情报时常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它的表述方式是严厉的。中国人多少知道外国报刊评论里的内容是些什么。

“我不怀疑很多积怨由此而产生。但是总的结果应当是有益的,即使报刊没有完成更多的可取的任务,只是——打个譬喻说——在中国人面前放了一面镜子使他们能在那里照出自己的缺陷。

“在如此详尽地叙述造成中国人恶感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和无可争辩的原因之后,我们能够估量它的发展趋势和规模,但其后果却须由实际所发生的一切来说明。因此我接着来谈这种恶感在天津所表现的形式。

“在这一点上,我的工作变成不愉快的了。我曾说过我对中国人抱有信心。这里将要讲到的故事好像背离了我的这一观点。我必须列举他们的一些迷信。这些迷信是黑暗的和骇人听闻的,这场屠杀的可怕场面将暴露出它们的最坏方面。然后,记住中国人的好感与善意是这样的大,总的说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平稳地进展着,这场屠杀毕竟是我们交往中一段例外的插曲。

“在屠杀发生之后不久,管辖天津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他在最近的帝国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显要的角色——被派遣前来调查事变的起因。同他共事的有三口通商大臣,现在派往法国的大使崇厚,他曾具体地办理了许多具有特殊性质的事务。屠杀发生约一个月后,这些高级官员发布了一道告示(见《英国蓝皮书》,中国部分,1871年第1号,第125页),其中说到天津老百姓对那里天主教机构的人员所提出的各种指控。其内容有下列各点:

“1. 他们用迷药诱拐人。

“2. 他们支解人体用以制药,为达到此目的甚至不惜杀害幼孩。

“3. 天主教神父们沉溺于诱奸妇女。

“马上我就要探讨出于什么实际的或表面的直接理由,中国人竟然相信此类指控,但我先要证明在这个帝国里这一类指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在许多地区为人们所广泛地坚信着的,除了与洋人的交往之外,这一指控主要建立在他们经常抱有的信念和迷信的基础上。

“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指控是拐骗。

“关于这一项,我不妨征引《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70年6月23日如下的一段话:

三十五年前,一位作者曾控诉说,诱拐的事在广州日见猖獗,其办法是‘由诱拐者通知被拐走女孩的父母说,如果能在指定的时间与地点拿出(规定好的)一笔赎金,那个女孩就将送还,否则就要将她贩卖为奴婢’。没有多久,在北京和澳门也提到这种罪行。著名的出版物《京报》说这是‘大干法禁,应予认真追究,并悬为厉禁’。

1833年,我们在《广州通报》(Canton Circular)上也见到这样的控诉:‘在广州及其周围有好几百个拐子,他们时常把年轻女子和幼小儿童拐走,以这种无耻的贩卖为生。’1834年,一位御史向皇帝诉说,在北京也有诱拐儿童和年轻人的事例。

“的确在中国刑律中,对诱拐(掠卖)曾有明确的认定和处刑的规定。由于律例文字冗长繁杂,我觉得只要举出英国驻北京代表威妥玛先生的如下摘要(见《蓝皮书》第40页)便可以了。

在中国刑律则例中有这样的规定:凡以非法手段诱取子女为奴婢,或诱拐妇人子女转卖为妻妾,或假以乞养为名,不分已卖未卖,但被拐之人若不知情,为首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

“这里所说的与洋人有关的迷拐行为,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是指为便利诱拐而使用迷药的行为。

“威妥玛先生在同一地方征引了中国刑律中对使用迷药进行诱拐的如下处罚规定:

若以药饼及邪术迷拐幼小子女,为首绞立决,为从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

“威妥玛先生还从1834年刊行的中国刑律则例中引述如下的一个奇特的案例:

1808年(嘉庆十三年)广东巡抚奏报说,刘阿桂(音)和妻子倪娘(音)乘船到乡下去行乞,有一个名叫李阿三的与他们同行。凑巧李阿三见到一条毒蛇,有一个他不知道姓名的人曾告诉他蛇毒可以炮制迷药,他于是把蛇杀死,将烧剩的灰烬带到船上来。他同刘阿桂商量好用这迷药去迷拐幼孩。

这只船开到开平县的一个村庄,那里恰逢节日演戏,刘阿桂于是让他的妻子倪娘打扮得像一个体面的看戏的女人,把迷药交给她,打发她用她去迷拐女孩。在村子的街上,她遇到秦宏春(音)的女儿秦阿推(音),正在拿钱买饼吃。倪娘把迷药涂在这女孩子的头上,她立即被迷住并跟倪娘向停船之处走去,随后又被刘阿桂强拉到船上。当秦阿推醒来,发出尖叫声时,倪娘用手捂住她的嘴。船随即开走,来到人迹罕到的地方。刘阿桂让倪娘把秦阿推捆绑起来,再上了迷药。之后,她拿一块木板,按在女孩的肩膀上,李阿三压住女孩的手脚,刘阿桂把她的腕关节和踝节部的肌肉割断。

倪娘用针刺穿她的眼睛。他们这样把这女孩收拾弄成残废,是要叫她向人乞讨,藉以维持这一伙人的生计。在这一案件中,李阿三瘐死狱中,刘阿桂和妻子按所犯刑律上规定的用迷药迷拐幼孩罪判处斩首^①。

肢解躯体以便为调制药物取得配剂,为此目的而杀人害命

“我在前面引用过的《北华捷报》的一位作者说道:

师惟善(Porter Smith)医生曾向我证明,用幼孩的人体来制药的说法,对中国人来说是相当熟悉的事。他指出《本草纲目》将药物分为十六大类,最后一类中专门描述至少有三十九种的药材系从不同性别与年龄的人体中撮取。皮肤、骨骼、肌肉、人脑、指甲、汗水、血液、眼泪和其它不胜枚举的分泌物,均可按特定目的用于制药。

“汉口教会医院(the Hankow Medical Mission Hospital)在第六年度报告中,有如下的声述:

中国人相信:人体中任何患病或不健全部分,均可取用别人相同部分的健全器官来修补或更新。

“从同一报告中,我再征引如下一段:

在对华人的医疗手术中被医院切除的眼睛和人体中的其它部分,经常用酒精保藏起来,作为形象的教学用品,而本地人也正是用这一方法从这一类令人作呕的事物中调制实际上供作药用的物品。

“1870年7月22日的《北华捷报》,也从一封北京来信中摘录了如下一段:

^① 译者注:据英文回译。

7月5日的《京报》载有一则趣闻,它一般地与中国文化尤其是与割取人体某一部分以治病的理论有关。两江总督马新贻曾向皇帝上过奏摺,大意说江阴府有一位少女把她手指的两个关节砍去,放在母亲服用的汤剂里一起煎熬。她母亲的病据医师称已无可医治。

该奏摺说,传统的习俗是‘割股疗疾’,过去有过无数先例,现在仍然屡见不鲜。

这位少女的年龄才十五岁,虽然缺乏勇气和力气,但还是尝试这样做了。对孝道中的这种值得称赞的行为,这位总督不消说备加赞扬,此举当然也获得把母亲的病迅速治好的报答。总督请求皇帝对这位孝女特施荣宠,诸如在她里间竖立表彰牌坊以为纪念之类。他说,通过这种办法,将会鼓励普天之下的孝行^①。

“威妥玛先生在他对中国刑律中有关诱拐部分所作的备忘录中,另有如下一则记载:

在一宗案件中,有一个自称能医牙痛的妇女,用人工堕胎办法将私生子流产,然后将其骨骼蒸煮制成迷药,供人受刑时麻醉之用。按照刑律规定,从事或教人使用妖术俾能忍受酷刑痛苦者,为首处绞刑^②。

“天津屠杀案发生前六天,镇江府的道台发布如下的告示:

近来沿(长)江各地幼孩被迷药诱拐的事情屡有发生,地方官员不时从犯人的口供中获悉,拐犯搭乘轮船,将被拐幼孩运至上海售卖,以便购买者将幼孩眼睛挖出,阴处割下,供调制迷药之用。罹害之人殊堪悯侧。拐犯所乘轮船或渡船的船主与华人乘务人员,不乏善良之辈。凡遇有此等不带女眷,而有年幼子女由其监管之乘客,而又言语支吾、形迹可疑者,务要留神监视,于到岸之际密报海关,由海关人员拘送道台处以讯究惩处^③。

“烟台英国领事在1870年7月1日致其在北京的上级的报告中(见《蓝皮书》第77页),记载了同当地中国道台(地方行政长官)在道台官邸所作的一次谈话:

我向道台通报了天津屠杀案的详细情况。当我说到可怕的骚乱起因于早先流行的诱拐事件及法国传教士肢解幼孩的虚假传闻时,他用这样的问题打断了我:‘哦!那么现在请你告诉我,这件事的真相究竟怎样?法国人真的像百姓所说的将幼孩杀死了吗?’

我答道,我为像道台这样消息灵通的人,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而感到惊讶;他应当同我一样清楚知道这些毫无理性根据的诽谤中伤,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尽管由于迷信和无知它被说得活灵活现。我接着说,恰恰因为天津当局明显地同他的观点相似,觉得这类事情有一些可疑的迹象,暴民们才被激惹到如我们已获知的那样的程度。

随后发生了好长时间的争辩。道台坚持认为流传了三百年的指控至少有某种事实根据,而且天主教士们的鬼鬼祟祟的作风和令人讨厌的教义,也激起了民众的恶感,他们是咎由自取。

“一位姓孙(名思寿)的扬州知府,在1868年9月6日的一封信中引用了曾经担任过大军统帅、当时任总督的曾国藩说过的话(见《英国蓝皮书》,中国部分,1868年第二号):

在这几个月中教士们不要回来。我将把他们的案件向总理衙门提出,该衙门将同各国公使商量。待我得知他们已得出结论,确认教士们没有割脑挖眼的事时,我将亲自对扬州士绅和百姓发布告示,嗣后教士们可以回去。

“这类事情举不胜举。对洋人不利的传说和难堪的诋毁,应有尽有。在中国人当中传播的传说和

① 译者注:据英文回译。

② 译者注:据英文回译。

③ 译者注:据英文回译。

诋毁,无不带有他们所熟悉的恶习的色彩,或者牢固地扎根于他们几百年来所浸染的迷信之中。我无需征引那些意在煽动的匿名揭帖或文件。

“我选用的是中国高级官员所公布的事实。我所作的论证是不容置疑的。

“我在曾国藩和崇厚的文告中找到我还可以列举的对洋人的指控,即:

神父们沉溺于诱奸妇女

“对此我毋须多说。人们告诉我说,对天主教神父的独身制绝不相信,是中国人的天然倾向。在这方面就像他们对声名狼藉的佛教和尚的戒色不相信那样。在最近用中文刊印、流行甚广的一本书里面,就收录了许多不同的并含有详细情节描述的关于神父们淫秽行为的任何想像得出的丑恶不堪的故事。我不怀疑这本书受到大部分读者无保留的相信。

“笼统地就这些对洋人所作的种种指控而言,我得说这不应当使我们感到惊讶。首先一点,这些有事实作为根据。

“在中国,洋人或受其雇用的华人,一直在大批地进行诱拐人口的勾当。我指的是苦力贸易,这种活动至今仍在继续。我不怀疑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多少中国人并非出于本愿地被带走,当作奴隶卖掉,为了摆脱这种奴役状态,死可能被认为是个快慰的解脱。每年被贩卖的这种中国苦力的数目,十倍于在天津被杀死的男女洋人总数。

“在天津被指控的诱拐勾当,同苦力贸易的暴行并没有互相关连的直接证据;但是在发生那种暴行的中国南方,同天津的交通往来是频繁的,因此很可以设想南方所发生的事情在天津是知道的,至少知道一个大概。

“除了我们时常进行尸体解剖并用酒精保存畸形人体发育的标本以外,我认为指控洋人支解人体,再没有什么根据了。师惟善医生说,这些标本‘对轻信的中国人来说,往往足以说明问题了’。

“在施行圣餐时所吃的所谓圣饼,据说曾引起了许多荒诞的传说,中国人赋予它以这样的效力,说是能使吃过的人对施圣餐者及其宗教产生迷恋。前面说过的题为《辟邪实录》(“Death Blow to Corrupt Doctrines”)一书,便充斥着神父们给予春药的故事。

“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关于洋人杀害儿童的流言蜚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现象的依据。

“天主教徒据说对儿童受洗后灵魂得救的效验深信不疑。结果是,他们在幼孩病到濒危之际,将他们接到他们的育婴堂施行洗礼。这种做法和死亡的频繁发生,支持了人们相信他们需要幼孩的躯体供施秘目的之用的看法。

“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或者应当说幽闭状态,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怀疑。我从一份著名的《教会通报》(The Missionary Circular)(第一条的注解)的提要中征引一段如下:

中国人的惯例是:本地人办的孤儿院要由院长将收容儿童的有关情况向地方官一一报明。儿童的父母可以同儿童见面。如果有人想要收养某一个幼童,他可以这样做。

如果父母愿意的话,也可以将儿童重新带回家里。据我们了解,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规章制度。可是在中国,幼童一经送进(天主教)孤儿院,便不允许访问见面,父母也不能将其带回,任何人都不能将其收养。这样的方式引起了严重的怀疑。虽然证明并没有搞什么挖眼剖心一类的事,但由于孤儿院管理所采取的保密形式,人们还是疑窦重重。

“关于扬州戴德生(J. Hudson Taylor)牧师所在教堂的一次风潮,我去年曾写过一份详细的报告(见《外交通讯》,1870年号,第349页),分析风潮的一个原因是:那里教堂的男女教友违反了中国人的举止要端庄的观念,人们认为他们表现得显然过于亲昵。

“在中国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忏悔向来是激烈非难的起因。礼拜时允许男女无别地混杂在一起的做法,曾引起谴责,正像罗马的异教徒对基督徒的谴责一样。《教会通报》上也提到这一点。

“在上海的J·巴尔·罗伯逊(J. Barr Robertson)先生,是《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一位能干的作者,

他有力地 and 详尽地讲述了中国人动辄诋毁洋人们的诡秘和恶毒的习惯做法,使我们想起一百五十年前的欧洲和美洲普遍相信的巫术。我转引由莱基(Lecky)收入他的《欧洲的理性主义》一书中的罗伯逊关于巫术这种错觉的一篇论文,论文说到:

信服超自然事物的先入之见是这样的强烈,它从现实的一点小胚芽虚构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巫术体系;围绕着它积聚了无数的各种各样的详细证据;在长达几个世纪内能使所有最有才干的人相信它的真实是无可争议;它经过每一个欧洲国家法院的研讯而未受动摇地传播下去,并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交到可怕的和无怜悯的死神手里。巫术不是由于偶然情况、个别人的怪癖,甚至也不是由于科学上的无知所造成,而是由于一种普遍存在的要在尘世中找出魔鬼的替代者的先入之见。

“巫术错觉有一个奇怪的特色,被指控为女巫的人,还时常很详细地坦承自己的邪恶作用。我们现在明白,在群情激昂的情况下,人们如此害怕他们说不定成了魔鬼般影响的工具,他们终于相信魔力附在他们身上。只是由于人心素质各不相同,所以才有可能有的人自以为亲眼看到天使们一路与他同行,天堂朝着他向上的视野敞开,别的人却时常被魔鬼的幻象所打扰,所有邪恶的势力都降临到他头上。

“因此,对天主教教士的不法行为的相信不疑,有可能在人们中间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使得各种各样的人终于认为他们自己或其家属成员已受到教士们用心狠毒的行为的祸害。

“确实,中国人在不同时间举出了与洋人有直接牵连的犯罪证据。镇江道台所发布的告示即是一例,两江总督在他的报告中也曾直接了当地宣称有此类事情。(见《外交通讯》,1870年号,第366页。)他说:

一名诱拐犯几乎在作案现场被抓获,他在地方官面前供认说,属于天主教机构一个叫朱德欣(Choo-Teh-Shing 音)的是主犯。

“无疑一种重要手段的使用,使民众对于洋人的诡秘行为的看法更加坚定。在中国使用刑讯逼供是常见的。帝国的法律不但准许甚至还要求这样做。如果一个人不曾招供,即使犯了罪也不能惩处他。因此,地方行政长官对他们认为罪证确凿的人施加刑讯,直到取得招供。

“那种刑具造成可怕的伤害。自古以来,它一直是专制和偏狭所选择的办法。用刑的结果,没有哪种证据不能逼出,没有哪种招供不能取得。人宁可死在火刑柱上,也不愿面对让人死千百遍的刑具。谁掌握它,谁就能行使比操纵生死还要大的权力。

“我不怀疑,在中国曾从许多不幸的穷人中逼出了当时流行的迷信所要求的、归罪于洋人的招供。这其中也不一定都存在着蓄意害人的情况。当使用刑讯乃习以为常时,人们便会要求使用它,并拒不相信未受刑讯折磨时所作的供词。另一方面,被怀疑的人预期刑讯难熬,便急急忙忙地供认民众舆论所宣称他犯有的那些罪过。

“在这样简单地回顾了中国人何以不相信和不喜欢洋人的原因以及这种不相信和不喜欢通常所采取的形式——始终指的在天津表现的形式——之后,我现在要谈谈这次屠杀,我此刻的任务是要指出:

天津骚乱的种种特殊情况

“如果逐次对天津概况,对屠杀前的各种事件以及屠杀事件本身作一说明,这些情况便显露无遗。

“天津城位于白河的右岸,离北直隶湾(渤海湾)约60英里。它是本地和外国海运船只航线的起点,又是北京的出海港,城北和城西是一片广袤的地区。人口约400,000人。

“人口稠密的郊区从华人城市旁的河道一直延伸到外国人租界。在崇厚的衙门和法国领事馆附近也盖了许多房子。浮桥连结着这些地区,行人即通过它前往北京及北部地区。人须过桥时便把浮桥搭

上,不用时便将它中心的船只打开,以便让其它船只通过。驻在天津的几个重要的地方官员是通商大臣、道台、知府和知县。

“这些官员中为首的是我曾说过的崇厚。他是满人。据说同皇室有姻娅关系。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一心想受到重用和提升。他在天津已经好多年,成功地将他的政府机构改造成由他负责管理的企业。其举措之一是按照欧洲人的方法训练军队,此外还建立了军火机器局。我同他见过面,并久闻他的名声,我断定他对洋人是友好的,对待他们可能是公正的。

“比他低一级的是道台,洋人有时候称他为州长。他是地方行政官员之首,我得知他管辖着全省的一半地方。在他下面,还有知府和知县。这两人实际上是天津城的保安官员。屠杀事件发生后,由于未能维持治安,他们被革职充军(1870年10月15日上谕,见《蓝皮书》,第224页)。这两人均负司法的职责,并管辖全城的捕快。

“不可能根据任何外国人的叙述来获得有关这场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因为只有极少几个处于现场附近的洋人幸免于难,且他们目击的只是事变的一小部分。一位名叫古得力(Coutres)的先生,当时正在崇厚的衙门里,对于法国领事那时在衙门里或在其附近所受到的最初冲击,他似乎也没有提供详细的叙述,且他所叙述的情节每次都大不相同,这就使人对于他所说的事情,除有其它独立的证据可资佐证者外,都不敢相信。

“然而,有三封现尚保存的信件,对于理解这一问题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第一封信是屠杀事件发生前两天,6月19日,崇厚写给北京总理衙门的;第二封信是6月21日早晨,法国领事写给法国公使的;第三封信是惨案发生那天下午,崇厚写给总理衙门的。

“第一封信,见《蓝皮书》,第12页,其文如下(此处为中文英译件,译略)。

“第二封是丰大业领事的信,译文如下^①。

“第三封是崇厚的第二封信(此处为中文英译件,译略)。

“在此我暂且不作评论,我先提供关于屠杀案的两份陈述,一份来自洋人,另一份来自本地人。第一份载在1870年7月14日的《北华捷报》,是一个自署为‘偶尔投稿者’的人写于天津的。行文如下:

星期二,6月21日,一批中国暴民在中国官员,特别是天津长官崇厚的纵容下,同时攻打法国领事馆、天主教堂和仁慈堂的育婴堂。下午两点钟攻打开始。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的窗户被人用石头砸坏。他感到自己受威胁,便穿着制服离开领事馆,同时坚持要一个中国低级官员(这位小官眼看着暴民闹事却不去阻止他们)陪同他前往崇厚的衙门,在那里他要求后者对法国领事馆和住在馆里的人员,包括他本人,实施保护。他还要求保护仁慈堂和所属的育婴堂,因为那时他听说那里正面临危险。崇厚对他说,他不能给领事所指定的任何人予以保护。于是发生了抗议。由于领事手里拿着他随身带着用以自卫的手枪,崇厚吓得离开了房间。

领事随即转向另一位官员提出了关于保护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无法帮忙。于是发生了争吵,就在这时,衙门的一个兵丁用长矛戳伤了领事的腿部,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色亚麻布长裤的大片。在负伤的情况下,他走到衙门的大门,手里举着一面法国旗子,要求准许通过。士兵和暴民们似乎楞了一会儿,但也只是那么一会儿。他们一齐扑向这位倒霉的领事,用长矛和刀剑把他刺死,尸体经肢解后被扔到河里。

据说领事曾向崇厚或某位官员开过枪,并打死了衙门的一个差役。但有助于弄清事实真相的是:一个名叫古得力的法国人,为了求得保护,正好逃到衙门,呆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他声称,领事直到最后都没有开过枪,而且他瞧见他被一个士兵用长矛戳刺后第一次负伤。古得力先生还目击领事在流血的情况下走向大门,并目睹了残酷杀害的开始。

在这同时,一群暴民在允许法国领事前往崇厚的衙门之后,便立即冲进法国领事馆,残暴地

^① 译者注:译文见本书第15页“斐斐迪致斐士函(第18号)附件1”。按:已在“1870年同治九年”条下摘录。

杀死达麦生先生和他的妻子、谢福音神父和另一位天主教教士。达麦生先生是北京法国公使馆的一位职员，头一天才从法国带着他新婚的年轻漂亮的新娘到达天津的。据报告说，在可怕的死亡降临之前，达麦生先生为了捍卫他自己和妻子，杀死了好几个中国人。

暴徒们在士兵们的带领下，放火烧掉领事馆和天主堂，烧死了所有尚在里面未能逃走的人。在攻打法国领事馆的同时，暴徒和军人包围了法国仁慈堂的育婴堂。放火烧了一部分房屋之后，他们冲进了大门，将所有修女们拖到街上。在那里，她们把她们的衣服剥光，将她们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挖掉她们的眼睛，切割她们的乳房，撕裂她们，把其心脏拉出来，不慌不忙地将其切成一块块，把一份份的肉分给怒火燃烧的暴民。

除了那些可怜的受害者以外，没有一个欧洲人目睹这些竟施之于人类的暴行。那些受害者彼此相对，在经受了可怕的折磨后死去。在那悲惨的临终时刻，除了信赖仁慈的上帝以外，得不到任何的支持，她们正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个野蛮民族中间努力去执行上帝的旨意的。在血腥现场的一些华人观众所说的对那些无辜女性曾采取的其它恐怖做法，不便形诸笔墨。据说，女修道院院长被活活地劈成两半。只有上帝和修女们清楚她们所忍受的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摧残。她们的端庄仪表被蹂躏，贞操被玷污，羸弱的躯体被撕裂，血洒遍地，生命被毁灭在那些杀气腾腾、怒火冲天的野蛮人手中，他们在恐怖的情景中所施加的这一切和其它暴行，是可怕得使人无法面对。

暴民和士兵们用修女们的鲜血泄完愤不久，便动手烧毁整座育婴堂。被收留在附属于育婴堂的孤儿院里的近一百名孤儿在火焰中被烧死了。已被支解的修女们的尸体被投入火坑之中，与她们所慈爱哺育的幼孩同归于尽，燔祭于是完成。诸如此类的恐怖故事说到这里，本来就足够了；但还有一些要讲一讲。博罗特颇福(N. Protopopoff)先生是个俄国商人，他和刚结婚两天的妻子，在城里碰到了同样激愤的暴民和军人，遭到刀矛的刺戳。博罗特颇福先生几乎是应声倒地，并随即被残酷地杀死。他的妻子正骑在一匹精神抖擞的马背上，连忙逃命，可是被人堵截，她转身试图跳过一道明沟，却连人带马跌了进去。她尽力挣扎，躲藏了几分钟，最后被暴民拖出杀死。这两个俄国人的尸体被投到河里，后来由他们的朋友捞上来。他们的衣服被剥得精光，受到了最野蛮的虐待。

沙尔昧松先生是一个法国商人，他听说仁慈堂遭到攻打，便试图去保护育婴堂，但在街上被捉住并被剥得粉碎。他的妻子听到她丈夫的噩耗，躲到一个本地人基督徒家里，一直到夜间。夜里，用中式服装将自己伪装起来，冒险回到她自己的家，想看看她丈夫的遗体。在徒劳的寻找之后，她企图前往那个中国人的家里，但为崇厚的练军中的一些人所识破，当即被杀死在大街上。

另外约有五十个广州人在骚乱中被杀死，他们被人怀疑同欧洲人有密切的关系。

甚至在当天晚些时候，一些歹徒仍然在租界附近徘徊。其中有一个携带装上子弹的手枪被抓获，他供认曾被派遣去枪杀在海关供职的一些欧洲人。

“从上面这惨痛的缕述中松一口气，再转到另一份有关屠杀经过的记述上去，我曾说过这是来自本地人的记述。它是在天津的一个广州人写给住在烟台的同乡的一封通报消息的信。该信件载见《蓝皮书》，第73页：

几个月来天津一直传说，洋人的天主堂、仁慈堂和礼拜堂经常叫本地教民将迷药交给别的一些教民，派他们四出诱拐幼孩，以便将其带到教堂挖眼剖心。这种事进行了好长一段时间，结果被老百姓知道了，有几个拐子被抓获送到官府。审讯之时，他们供认他们的罪行。知县和百姓对此都感到十分痛恨。有些拐子甚至就在天主堂房子附近的地区被发现。

终于，在6月21日上午10点钟，天津知府和知县亲自前往天主堂去勘查，目的是要去抓一个叫做王三的拐骗犯头子，但没有抓到，府县官随即回去。但是百姓仍然磨集在教堂的周围，未曾散去。有些人扔石头并冲进房子里，看门人阻拦不住。里面的洋人手里拿着武器出来恫吓，但群

众反而越聚越多。

法国领事馆靠近天主堂，法国领事看到再也无法维持秩序了，便携同他的副领事前往钦差大臣（三口通商大臣）的住处，两个人手里都拿着枪。他们走了进去，逼着钦差大臣亲自出面维持秩序，但钦差大臣不答应。这两个洋人于是开枪并挥剑刺伤钦差大臣的一位副官。在门口的百姓以为钦差挨打，就一齐呐喊并敲起锣来，顷刻之间，群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法国领事走出衙门，与知县相遇，他又向知县开枪。这使得群众更加怒不可遏，他们紧追领事到教堂门口，把领事和副领事两人当场打死。

接着，他们冲进了教堂，见人就打，同时放火烧房子。教堂房子被烧成平地，紧接着他们继续去烧仁慈堂。在三处地方，他们救出了两百名以上的中国百姓的幼儿，杀死了十六名法国男人和女人。他们抢了针市街上（chen-she street）一家叫做富昌行（Fu-chang-Hong）的商行，在那里一对法国夫妻也被杀死。那时候，老百姓觉得他们的愤怒缓和了一些。人群中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想要抢劫洋人的商行和攻打租界，幸而被受过西式训练的练军所阻止，他们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被召集来的。夜复一夜存心不良的人还在劫掠教民的住宅。

事情发生后，当局出了安民告示，禁止闹事，目前事态渐趋平静，恢复了平时的状况。最近几天，曾侯（国藩）奉命前来天津查办这件事，另一位高级官员也从北京派来维持治安。眼下洋人全部避居租界内，他们在日夜不停地巡逻，以求保障安全。

我写这封信向你通报消息，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这次骚乱使生意完全陷于停顿。

“这些声述和经我核对过的大量证据都反复说到，关于各天主教士不法行为的传闻，约在屠杀事件前一个月就已经明显地流传开了。早在6月5日，倭斐迪公使就已听说出现了激昂情绪（《外交通讯》，1870年，第356页）。其起因可能由于个别人或一群人用心狠毒，也可能由于仁慈堂此时发生的瘟疫（参看前引倭斐迪公使的文件）。我倾向于后一种看法，往后我将讨论这样的问题：到底别人的行为对于形成骚动和屠杀起了多大作用？此外，我只想谈，事情看来同修女们有些牵连。与她们有关联的那个机构里面埋葬尸体的事天天都在发生。她们的大门对大众一向是关得紧紧的。她们雇用代理人去征募幼孩。她们甚至在小孩仅余残喘的时候将其接收进来。人们曾到过墓地，在那里发现修女们送去的棺材里，有的是两具尸体同棺。她们采取这种办法以转移人们对她们日益增长的怀疑。恰在这个时候，有两个人因被控犯诱拐罪而被逮捕处决。继之，地方长官发布告示，宣称幼儿们正在到处被诱拐，他们的脑袋、眼睛和心脏被挖取制药。

“人们能够想像，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它产生于相信有人以神秘莫测的方式在干着可怕的事情——正笼罩着这个大城市。

“最后发生了武兰珍被逮捕和审讯的事。他承认自己是个拐子，但声称他是受天主教徒指使的而非出于本愿。他本身着了迷，并在着迷的情况下出去迷拐别人。

“我们应当花点时间来探究这个奇特的故事。证人声称，他在天主堂里被一个名叫王三的迷拐过。由于王三所给的迷药的影响，他曾诱拐过别人，而王三除了他以外，还迷拐过六个人，并利用他们这些人去掠拐其他人。他讲得头头是道，细致地描绘了迷药、他获准使用的解药、找到他的那些受害者的地方，以及他们的年龄和打扮等。我们还可以从崇厚的函件中得知，有一个晚上，他曾被关在教堂的房间里。

“难以想像会有比这更能激起中国某一城市居民的流言了。这恰好同他们流行的迷信想法相吻合。无疑，故事在不断地传播时又被渲染加重，并从有关洋人恶行的旧故事中举出种种事例作为佐证。它再同目前的激昂情绪和百姓的先人之见联系在一起，这就为他们采取一种可怕的报仇行动准备了足够的条件。

“当时的事态是，为了执行崇厚同谢福音神父所作出的安排，道台、知府和知县于21日上午前往天主堂，一一指查看了该堂及其所属的房子。武兰珍被带去以便确认王三其人（这人的名字确在该教

堂雇用名单之列),但没有结果。当被要求指出他供词中所说的房间时,武兰珍也未能做到。这些官员对他们勘查的结果感到满意,于是向崇厚作了报告。崇厚很快与心平气和的谢福音神父一起参加勘查,两人还安排了今后应遵守的防范措施。如崇厚自己所说,他随后开始准备他答应发布的告示,正当忙于此事之际,却被报来的在法国领事馆和天主堂附近发生骚乱的消息所打断。据崇厚说,不一会儿丰大业先生来到衙门。他声色俱厉地控诉暴民的行动,并要求崇大人同他一起去弹压骚乱。丰大业先生旋即离开衙门,回领事馆去,但在碰见知县时却朝他开枪。崇厚说这成为捣毁和杀人行动的信号。

“崇厚的陈述与丰大业信上说的有一些是完全一致的,此后的情况似乎也可证实他所说的大部分的话了。从别方面情报的来源,我们也许能填补他叙述中的空白,以便形成对这次屠杀事件较完整的概念。

“我在前面曾提到一个名叫古得力的法国人证言。关于丰大业先生及其秘书的死,古得力向李蔚海先生作了如下陈述(见《蓝皮书》,第33页):

关于法国领事和他的秘书的死,我(李蔚海)查询过古得力先生,他是法国人,住在离法国领事馆不远的地方。他告诉我说,那天早晨他听到大声呐喊,并看到百姓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他们喊着“杀洋人”(而不是“杀修女”)。他跑到法国领事馆,发现一片混乱,还看见西蒙先生带着他的文书离开衙门(法国领事馆离衙门大概最近了),法国领事没能找到他的文书同他一起前往崇厚那里。

古得力先生回家后又很快返回,中国人告诉他,领事已经亲自前往衙门抗议暴民的暴行。他(古得力)连忙奔向衙门,却极难获得保护,在院子里的官员正是那些向他逞凶的为首之人。整个晚上他都留在衙门里,次日早晨才同崇厚一起下来。他没有看到领事被杀。

“我们可以设想,中国百姓(正如我们将要看出来的,其中有些人决心要制造麻烦)早就聚集在天主堂和领事馆附近,等着听取勘查的结果;当官员们一无所获走出来时,他们很不满意,随即朝着天主堂和领事馆里面的人叫喊谩骂。这时,领事十分惊慌,认为没有奥援就不可能把暴民驱散,便抱着要求帮助的目的前往崇厚的衙门。缕斐迪公使认为他到达衙门时‘处于濒临发疯的激动状态’^①。

“该领事能够离开领事馆,以及古得力先生两次进出的事实足以证明,直到领事动身前往钦差大臣的衙门稍后的一些时间,群众并没有走到极端。

“我不在这里花时间来探究丰大业先生曾否在崇厚的衙门开过枪。他可能出于无意,也可能在狂怒之下,或者是存心胁迫崇厚和他一起出去平息暴民而开了枪,而崇厚却像中国大部分的官员那样,此时很可能处于无能为力和惊慌失措的状态。

“就算丰大业先生曾向知县开了枪,仍然可以作出同样的解释。或者可以这么说,他看到死亡迫在眉睫,在几乎绝望之际,他或是想孤注一掷地用他的手枪把汹涌而来的群众赶跑,或是仍然相信乱子是由知县一手造成的,因而不甘心不对他报仇而白白地死去。

“当然,能知道所有的事实是很有趣的,不过对我们了解屠杀的实际意义来说,它们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在研究了整个案件之后,我脑海里留下这样强烈的信念:不管法国领事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样的风暴十有八九总是要来的。在那时候,他不过是随风飘荡的一根鸿毛罢了。

“也没有必要缕述屠杀中的恐怖情节。我上面引述的《北华捷报》记者的报道,在这方面已叙述得够详细了。只要说明生命与财产遭到彻底破坏,并出现了折磨人的惨痛情形就足够了。然而,我找不到任何证据来支持该记者关于大批广州人被杀害的陈述。我所引证的那位广州人的信件,对此只字未提,这一事实倒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假定,即并未有文书和广东同乡丧生。同样,我也没有找到有关一大

^① 原注:丰大业先生曾任北京法国公使馆翻译官,据说因为多次在总理衙门咆哮而被解职。总理衙门最著名的成员之一文祥,对他的行为极为反感,以致对一位外国公使说过,他不愿意让他充当翻译官。我还有表明这位领事是那种不能克制自己脾气的人的其它证据。

批小孩(确切地说是任何小孩)在火烧仁慈堂中被活活烧死的证据。还可以发出这样的疑问,修女们是否真的像该记者所描述的那样经受了所有恶魔般的残忍虐待。暴民手下的受害者一般是即时杀死,支解她们的躯体是晚些时候才发生的。

“迄今为止,我所提供的各种报道和意见都表明骚动是逐渐形成的,其高潮即为人们所描述的流血行为。但是,任何人听到像这样一种骚动时,会自然而然地怀疑肯定有一些积极的心怀不满的人在暗中捣鬼,巧妙地把火越煽越旺,而且后来很可能又怂恿杀害行为。举例来说,我们知道丰大业先生就倾向于把知县视为动乱的煽动者。法国驻北京公使罗淑亚伯爵是那样深信知府和知县罪无可逭,因此才要求将他们处死。有些人的看法是:崇厚必定预见到事态的后果,因此尽管他们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现行犯,却认为他不能推卸责任。甚至还有人持有这样的见解:这场屠杀是一个总的阴谋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早就精心策划,企图将洋人统统赶出帝国。

“联系以上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来考察这场屠杀事件,是我的职责。我将尽力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来进行,一方面既不屈从于仅仅是怀疑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不减轻各种事实所具有的分量。但我将始终坚持,凡是未能提出确证的说法,必然是站不住脚的。

“我手头正好有天津的两位牧师:理一视和威廉·N·郝尔(William N. Hall 音)两位先生经精心准备而提出的一种论点,其用意在于证明这场屠杀是一场阴谋的产物,天津城的官绅大概都同这一阴谋有牵连。事实上,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值得重视的论点,因为它是经过仔细认真地起草的,其表述如果不是温和的话,也可说很有分寸,我将详细地予以引用,并逐段地加以论述。该文件系写给英国驻天津领事的,可见于《蓝皮书》和1870年7月14日的《北华捷报》。

“第一段行文如下:

1. 我们谨向阁下提醒,在屠杀发生前的一些天,人们已普遍地知道,已有某种针对洋人的秘密策划;尽管诱拐等等诽谤性的谣言,同法国天主教徒有更直接的关系,但人们所作的威胁决不是专指他们;在闹事爆发前两周,某一耶稣教会的一个女教士被百姓的动作和言语吓得再也不敢像往常那样进城。理一视先生上月13日从北京回来时,发现排外情绪如此激昂,它在所有各耶稣教的教民中引起了普遍的惊慌。本月12日(星期五),理一视先生在他的同事们不在场的情况下,就这一个问题同你进行了一次长谈,特别提到知府发布的那道引人反感的告示,对此,消息灵通的本地人当时已经暗中预料恐怕会发生动乱。你建议可由理一视先生就该项告示向你提出正式的申诉。假如大众的情绪还没有平静下来,作为一种预防措施,那就要求发布一份抵消这份告示的文告。就在那天,发现有人就伦敦会刚刚购置的医院产业发表了威胁言论,使其无法觅雇敢来进行必要维修工作的工匠;星期六(18日)上午,理一视先生按照已经谈妥的那样,申请发布保护性告示;星期日(19日)下午,有人对伦敦会的东门礼拜堂作挑衅性示威,并叫喊‘他们正在这里杀人’,大概是多亏一两位本地基督徒容忍镇静,低声下气,才避免了一场闹事;也就在同一天,特诺克牧师夫妇和一位朋友从河东的礼拜堂走回来时,有人拿起石头,作出要向他们扔来的样子。星期一那天,理一视先生再见到你,指出情况极其紧迫。最后,星期二上午,出于同样的目的,我们两人又走访阁下,那时我们已从许多最可靠的本地人助手那里获得了消息,他们都重申大难临头,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在对理一视和郝尔两人的论点进行了粗略的考察之后,我要回到他们所说的这一问题上来,即有关针对洋人的阴谋的谣言已经流传了一些时候。此刻,我想先探究知府发布的告示及其意义和重要性。理一视和郝尔两位先生的其它部分的叙述,不过证实了业已充分确认的事实,即在屠杀案发生前的一些时日民情汹汹,不断高涨,并且广泛地扩散开来。

“知府的告示,可见于1870年7月22日的《北华捷报》。原文如下^①:

^① 译者注:原文系中文的英译件,从略。

“知县的告示,大意相同。

“知县处决这些人,看来是按照知府的命令执行的。一经推敲,这两道告示的不像样,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不论是知府还是知县的告示,以及我曾经过目的别处的任何文件,对被指称为拐子们的罪行,除了拐子们自己的口供和逮捕他们的官吏的指控以外,都未曾提供更多的证据。在民情汹汹之际,罪犯们被严刑逼供或面对严刑威胁之时,这些证词是多么的没有价值,中国官吏应该是清楚的。另一方面,根据丰大业先生所说,我们发现崇厚谴责地方官员的一番话,指的正是他们下令处决和发布告示的行为。我们还见到曾国藩宣称:‘根据调查,在城内外迄未发现一例丢失孩子的百姓提出过那一方面的控诉。’(《蓝皮书》,第95页)最后,我们还从一个明白事理的中国人那里获得证据。在处决后屠杀前,‘有几位读书人开始准备给知府投递呈文,质询这些人是谁,他们从哪里来;谁的孩子被他们拐了,出于那些已经言明的目的他们又把孩子卖给谁了?他们还追问,为什么不先惩办那些老是收买他们的人,而官员竟然将罪犯处决了’(《蓝皮书》,第35页)。整篇呈文的主旨是指责官吏们仅凭怀疑,就采取了行动。

“这些事实使得地方长官难免要在这一方面受到指责,它虽不能证实确曾存在反对洋人的秘密策划,但它表明,那些官吏如果不是实际上在煽动暴乱,也是在鼓励有可能引起暴乱爆发的那些想法。他们如果不是对洋人主动犯罪,也是随波逐流的人,屈从于情绪激动的群众的要求,宁愿在没有充分的法律与事实根据的情况下,牺牲那两个可怜的下等人。

“我觉得罗马巡抚彼拉多^①(Pontius Pilate)为了顺从群众的大声呐喊,而牺牲了无辜的人,这也正是中国人的特性。两江总督马新贻处决了几个被指称为拐子的人,除非他确实有比他在文件(《外交通讯》,1870年,第366页)中所缕述的事实更好的辩解理由,我觉得也只能把他看作是随波逐流的人。他对洋人并不怀有敌意,即使有的话,他也会认为任性发泄很不明智。他成功地平定了在南京发生的大大危及洋人的一场骚动,便可以证明这一点。几星期之后,这位总督死于一个刺客之手,个中情况如何,始终未明。难道没有这样的可能,一些曾受总督行动之害的人,寻找而且找到了这么一种报仇的方式?至于曾国藩,就其为人来说,在许多方面都是叫人钦佩的,然而却要承担这样的责任:是他给了可按军法处置拐骗犯的笼统的权力,从而使常规的司法程序在天津中止行使,使对两个被指称为拐骗犯的人的处决成为可能。

“理一视和郝尔两位先生接着说:

Ⅱ. 请允许我们这样说,在我们荣幸地向阁下所提出的证据中列举的那些事实证明,无论现在人们如何评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暴民的敌意远不是单纯针对法国人。

这可以从以下各点来证明:

1. 不分青红皂白而且接二连三地捣毁所有的耶稣教礼拜堂,共计八所,包括美国公理会的广泛散布的房子,其破坏之严重,只有最厉害的发作才做得出。
2. 对许多礼拜堂和伦敦会医院(London Mission Hospital)的教士进行仔细调查的结果。
3. 我们的好多教民受到粗暴对待,他们似乎都成为受敌视的人,分别遭到迫害、殴打和抢劫,其中不下十至八户殷实之家,房子被拆毁,东西被抢光。
4. 几个不幸受害的俄国人尽管声称具有(英)[俄]国国籍,但仍无济于事。
5. 暴徒们在完成对仁慈堂的育婴堂恐怖的破坏之后,扬言他们定要冲进租界和烧掉商行。

“暴民在盛怒之下,准备向任何国籍的人,特别是向洋教士下手,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观察到的情况,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假定:他们的敌意原先是指向天主教徒的。这种假定由于这样的事实而得到加强;当暴民正从事杀戮时,他们饶过了几个俄国人,这几个人幸而能够证明他们是俄国人,而不是法国人。

^① 译者注:见《圣经·新约》。

“理一视和郝尔两先生继续说：

Ⅱ. 我们不敢隐瞒我们这样的确信：这些悲惨的事件，曾经得到官方的认可，即使其未曾具有官方的权威。这种确信除了其它依据以外，还有以下的一些依据：

1. 民众情绪激昂，当局肯定早就清楚，但未曾采取平息它的步骤。
2. 相反，知府和知县在屠杀发生前发布的告示，其中所作的指控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3. 在这些告示发布后，送给知府的纪念物品中有一把万民伞和一块匾额，上面有歌功颂德的‘万家生佛’的题词，知府把它们收了下來（据报，一些可信赖的本地人看到了这些纪念物品）。
4. 阁下关于撤销前一告示另行颁发旨在保护生命与财产安全的文告的申请，未被理睬。
5. 闹事的人公然声称同情和赞赏除崇厚以外的所有地方官员。崇厚由于被怀疑同洋人串通，而成为民众痛恨的目标，人们给他起了‘洋人’、‘吃教的’绰号，他的告示被无礼地撕掉。
6. 镇台的言行，它曾在老百姓当中有所传播。
7. 至少在某些场合，如在捣毁美国公理会的房子和几次威胁要攻打伦敦会医院的行动中，兵勇们曾是引人注目的角色。
8. 许多火会和志愿组织都由文人充当他们的头目，他们的名字是在衙门里登记注册了的，很难相信在运动中他们胆敢积极参与明知与官员们的意愿相违背的行动。
9. 直到暴乱发生两周后的今天，没有理由相信当局曾就逮捕和惩处任何一个凶手作过认真的努力，尽管受过西式训练的一大批士兵是官员们所雇用的。

“上述这些论断中的第一和第二点当然抓得不错，但当我们想起如下的事实时，它们就失去说服力了，这就是：虽然丰大业先生获得神父们和他们的教民之助，李蔚海先生获得教士们和他们的教民之助，应该和本地那些官员一样的消息灵通，却都没有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前者直到被府县官敦促后，后者迟到屠杀发生的前一天才认为有此必要。丰大业先生甚至在屠杀事变的当天上午还很小看那场骚乱，李蔚海先生在同一时刻写道，他‘丝毫不担心生命会有实际的危险’（《蓝皮书》，第21页）。

“第三点论断意义不大，因为它很含糊，所列证据同样不能说明问题。在没有确切情报的情况下，那也可以设想百姓之所以赠送纪念物品只不过是认为知府在维护法律秩序的事情上有所贡献，他要是拒不接受，担心反而会进一步助长激昂的情绪。

“关于第四点论断，应当说要求发布与前一告示相反的文告的申请，直到事变前一天才提出，而府县官其实为发布这样的新文告已经准备了几天了。

“第五点论断如果很正确的话，也只不过是提出了不利于府县官而有利于崇厚的假设。

“第六点所说的镇台是掌管巡捕的一个武官。有证据表明他们把这位武官同陈国瑞混淆起来了。此人原先是造反者，后来因为投降归顺，被授以提督的官衔。他是一个好捣乱的家伙，声名狼藉，走到哪里，就在（哪）[那]里煽动对洋人的仇恨。有些记述说他在屠杀发生前已在天津呆了好几个星期，但更可信的意见是，他刚到达那里。人们指责他把浮桥搭起，而崇厚和县官曾命令把它打开，以防止暴民通过浮桥走向育婴堂和租界。人们还说他曾大声喊叫，以鼓励暴民进行破坏活动。根据我的判断，他的罪过与府县官没有关系。

“第七和第八点论断缺乏说服力，除非能证明士兵们、火会和志愿组织的成员们，成批地并伙同他们的头头一起进行屠杀。情况不是这样，尽管在事变爆发的时刻，火会和哨所的铜锣确实敲响了，但它似乎不是作为暴乱爆发的信号，而是暴乱引起人们敲锣。

“第九点论断指的是迟迟未将参与屠杀的人逮捕起来。稍后我将就这点进行论述。

“理一视和郝尔两先生接着说道：

Ⅳ. 府县学生员参与了残杀暴行，这可以从下面的情况来推断：

1. 有一位生员曾主动向一个本地人承认（该本地人的证词已送交阁下），在闹事前一些天，他们这一班人曾派一个代表团去见掌管书院的官员，递交了有关传闻的一份文件。

2. 府县官发布了示谕和不久后书院的关闭,使民情更为激昂。

3. 火会和志愿组织均有文人充当他们的首领,这就导致生员与这些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不可能设想如果不是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有此决心,这些组织能作出如此明显的目标一致的行动。同样,要不是知道其知识界的弟兄们普遍同情他们,他们竟然胆敢进行这样的行动,那也是不可思议的。

“上述第一点中所提到的文件,曾否要求(或打算促成)发布示谕和关闭书院,本地人提供的证据并未说明。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来推测,它可能仅仅是涉及这篇报告中早先提到过的处决那些被指称为拐骗犯的呈文。

“关于第三点,我再说一遍,就我所知,火会和志愿组织的成员们是直到闹事爆发后才出动的。

中国文人^①这一阶层,包括所有曾经通过一次或一次以上政府考试的人。在中华帝国并没有律师。和尚、道士们很少是秀才,医生出身于秀才的更是绝无仅有的事。那么很自然,生员照例是除了谋求一官半职以外,不抱什么目的。所有文官都是考试及格者而且属于文人之列,但讲到文人,一般指没有当官的人。我发现洋人普遍对中国文人有怀疑。他们认为文人对于煽动群众对洋人的恶感和酝酿闹事都是很起劲的。如果他们不怀好意,以其才智、善于写文章、能操纵官吏和政府,以及在帝国中所具有的地位和影响,他们会成为一种危险因素。

“就目前证据所显示的,我们似乎可以同意这样的结论,即文人不应因此而受到指责。我不准备相信事实果真如此。有足够的理由叫人相信,文人不但同群众一样不免受各种的迷信所迷惑,而且激烈反对同洋人的交往。但我得承认,在我仔细地考察了我所复查的论点之后,我满意地发现,除了刚才征引的三点以外,的确没有其它不利于他们的更直接和更有力的论断。

“一般地说,我们应当期望从文人这一阶层中发现中国人的勤奋品性和他们的渊博的知识积累。因此,我们应当期望这一阶层的成员,将是中国人中首先欣赏西方的学术与品质,及我们在科学与实用技术上的成就的人。因此,不应以冷漠的怀疑来排斥这些文人。在这方面传教士们当为外交人员的前车之鉴。他们从汲取已往的教训中获得益处,终于放弃了与文人们进行的全面斗争,现在正在利用中国圣贤已经树立的建筑结构,在那上面建立更加雄伟的基督教大厦。

“我们所要考察的下一段对其观点作了一些有力的阐述:

V. 陆续积累起来的重要证据表明,整个事件并不是突然的爆发,而是经过精心谋划的。就此我们不妨指出下列一些情况:

1. 火会敲锣把暴民召唤到血腥行动上来,而且到了暴行大体干完后,又以与平时召撤信号相同的方式命令火会分别散开。

2. 听到敲锣声,火会的成员们不像往常听到这种信号时抢着去拿水桶之类的用具,而是抢着去拿诸如刀、剑、棍棒之类的武器,这是到处可以看见的。

3. 现已得知,在屠杀事件发生前的上星期二和这星期一,各区火会,特别是河东区的火会,曾召集开会,在激烈辩论之际,有人声色俱厉地发出把洋人全部宰掉的威胁。

4. 有几个外国人曾受到明确的警告,在其中的一两个例子里,有人曾说出了即将爆发的暴乱所采取的方式——烧毁天主堂和育婴堂。阁下应还记得,你曾早在星期二早晨将这一传闻亲自告诉我们。民众对秘密谋划业已知情,一位住在育婴堂附近的英国绅士亲身经历的奇异的事情表明了这一点。他在星期一晚上惊讶地发现,住在他隔壁的房东骤然间把两座房子之间原有的通道用砖块围砌一道墙,打算用来预防万一发生的火警。

5. 隶属于伦敦会的一位教义考问师在乡村度过一些日子之后,于星期四(即6月23日)夜回

① 译者注:指士绅或士大夫。

回到家里来。理一视先生在星期五上午见到了他。他报道说,在离天津约 200 里的运河边的叫做兴济(音)的集镇,他被百姓拘留,人们告诉他在仓埕(音)已经贴出告示,说在天津同洋人发生了纠纷;并要求老百姓遇有诱拐嫌疑的天主教徒,应将其送到衙门以凭究办。由于邻近的一个友好的店主人的疏通,此人获得释放。但这一小事件很有启发性,因为很难理解,星期二发生在天津的事件的消息,竟能在第二天到达该地区。

6. 然而,当你把你已经掌握的证据,同上述事件联系起来考虑时,事情就显得更加清楚了。那证据是,在离济南府仅 180 里,离天津通常至少要走五天旅程的山东的一个县,在那个星期中,百姓中曾流行过这样的说法:将要在农历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这两天攻打天津洋人。更引人注意的是,传闻不仅说到攻打即将进行,而且对洋人的国籍并不加以区别。此外,确定了两个日期,声称第一个日期——二十三日(6月21日),要杀死在天津城里的那些洋人;第二个日期——二十六日,将是天津租界的末日。也许可以允许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知道这样的安排——假定确曾有过的话[——]是否与传说中的官府的影响有着更大关系,此外还要提醒你,星期五那天整天大雨下个不停。

“上述第一点只是重复了以前曾多次提出过的一种说法。我再说一遍,它并没有证据的支持,而且依我看来,先有冲突,后来才有敲锣以及其它事情发生。

“就我们现已看到的而言,上述第二点是否恰当乃取决于我们对第一点的结论。倘若敲锣在冲突之前,那末各组织的成员抓起的是武器而不是抓起他们行业的相应用具或标志,便是预先商定去屠戮的证据。如果他们敲锣在冲突之后,同洋人的冲突的事实已一清二楚,鉴于百姓当时的情绪,那么他们所以抢着去拿武器就可以解释了。

“关于第三点,我们没有怀疑它所根据的证据(《蓝皮书》,第 105 页)表明,在屠杀前一些天,对洋人的恫吓确是常见而露骨。

“第四、第五点看起来比较确实一些,但我尚未得到支持它的证据。

“第六点是无可怀疑的,它确有证据支持。赫尔先生执笔的备忘录谈到了这些,可参见《蓝皮书》第 106 页。

“华(W. B. Hodge)牧师曾在山东省东北部的朱家寨(音)住过好几个星期。几天前,我接到他 6 月 26 日的来信,信中写道:

我们不但从天津朋友,而且同样从本地区广泛流行的传闻中,已经获悉天津这次乱子不小,因为传闻中谈到了天主教会所遭受的破坏。上星期五胡某从三陵卡(音)回来,就已听说这个月的旧历二十三日(上星期二)将有跟洋人的一场大搏斗,接着在二十六日(星期五)还将有第二次。

“关于华牧师来信中上述的摘录,我想说几句话,向华牧师提供消息的人,是我们的一位本地人助手,他被看做是一位小心谨慎和诚实可靠的人。他是从三陵卡听到的传言,并向华牧师作了报告。三陵卡是一个大的村庄,位于山东省东北隅,距离济南府约 160 里。我们认为经过快速行程和漫长驿站从天津前往此地需要五天的路程,我们设想也有可能是在四天内到达。他可能在星期一大早便从三陵卡动身,以便在当天到达华牧师的朱家寨住处。这样从星期二天津惨剧发生,到星期五胡某离开三陵卡,其间只有两天的时间。因此,星期二在天津发生情况的消息完全不可能星期五那天胡某离开三陵卡之前传到那里。加之从华牧师来信的口气来看,他们说的同洋人的搏斗,并不是作为已发生的事情,而不过是作为根据某些预谋和公开宣扬的策划预计要发生的事情来说的。联系到其它各处所出现的类似的恫吓,这一事实似乎具有相当的意义。

“居住在天津的两位本地证人说,他们曾听到 6 月 21 日那天将要屠杀洋人的话。其证词载见《蓝皮书》第 112 和第 113 页。

“我相信在 6 月 21 日之前,确曾有人想在这一天在天津努力搞一场屠杀。我所以相信,一是因为在中国一次次地作过这样的努力,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二是因为证据使得我们得出这一结论。

“屠杀在预计的日期发生,这一事实给人以一个有力根据,推论那是阴谋家造成的。

“如我曾说过的，在中国，经常会出现确定的消灭这一个或那一个外人社团的日期。在直隶湾的一个城市——通州居留的洋教士就曾被人以这种方式选为目标，可是到那一天，每一次都安然度过，尽管有示威行动，但不像所威胁的那样。

“这种事实将使我们难以确信，这些谣传确有根据且最终将付诸实施。谣传时常被散播来吓唬洋人，无疑都带有恶毒的含意。它们总是没有成为现实，因而，一直到屠杀发生之前，在天津流行的那些谣言总是被洋人一笑置之，这与其它地方的人们对不时流传的谣言不予置信没有两样。

“就我对天津屠杀的种种情况所作的考察而言，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表明它是由预先的安排所造成的。请允许我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华牧师所得到的并予以确认的证据和住在天津的两位本地人的报告，究竟含有多大的可能性。

“华牧师的住处离天津有五天路程。北京离天津有两天路程。就目前所知道的来说，计划要进行屠杀的传闻并没有传到北京，也没有传到烟台、牛庄或上海。各地都知道，在天津人多多少少存在着激愤情绪，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存在着一种阴谋。

“关于屠杀的证词曾从许多不同和遥远的渠道涌来。华牧师和两位本地证人的证词，只是给我们提供了称屠杀出于一种阴谋的说法。他们的申述是，在屠杀发生之前他们即已获悉在天津的洋人将在星期二那天被杀的消息。一个在屠杀之前其目的已广为人知的阴谋，在屠杀之后，人们对所有事实都予以强烈注意之时，竟然未被清楚地揭露出来，这难道是可能的吗？

“我倾向于拒绝接受这样的结论：屠杀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实施的，是第二个‘圣巴托罗缪惨案日’^①。但与此同时，我并不想说，那些谋求发生骚乱的人不曾对事件的发展起推动作用。考虑到群众情绪激昂到了狂热地步，考虑到他们很多人正如所发生的那样集结在天主堂和法国领事馆的门前，考虑到正在恶化的局势，如官员们未能找到引起暴民们激愤的人，及教堂建筑物的大门紧闭，任何一桩微小的事件都是可能带来灾难的。一个狂热者发出的狂叫，扔一块石头，人群的涌动，情绪或判断上的一次错误，都有可能酿成一场冲突。给予这种致命的最后一击，甚至多少有些准备地造成导致这最后一击的事件，很可能就是那些作为阴谋家的人所干的。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场屠杀很可能在某些地方有过预先的谋划，也有可能因存心不良者的努力而加快了发展，但它总的来说不是预先安排好的。也许存在过这样的阴谋，但它并不是这场屠杀的显著的特征。它的重要性远不及一次主要事件。我始终依据证据来说话。当然，进一步的证据可能改变我的意见。

“我所以详细地研究理一视和郝尔两位先生的备忘录（这一文件的目的是在于启发人们），是因为我说过我认为它是我所见过的以下这些人所持观点的最有力的阐述，这些人根据有关屠杀事件的证据，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官员和生员阶层，也许还有政府，都是坚决仇视洋人的；因此经常想要加害于他们。这是由于国务院恭敬地考虑了这些看法，我不妨说，这还由于在华的那些人，他们自己没有时间仔细探究种种事实。

“我现在重新考察案情，以便说明‘在天津出现的且并非个别现象的具有令人激愤作用的种种特殊情况’。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些是——

“1. 仁慈堂的育婴堂中的儿童发生了时疫和纷纷死亡。

“2. 有些儿童——被两个尸体装在一具棺木里加以掩埋。

“3. 关于诱拐和支解人体的谣言，修女们接受和征集幼孩并有许多幼孩死去的事实助长了这些传闻，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县官们处决两名被指称为拐子的人并贴出有可能助长对洋人怀疑的告示的随波逐流的——或者还有蓄意的——行为。

“4. 武兰珍的证词，它直接指控天主教徒犯有人们早已认为他们犯有的不法行为。

^① 译者注：1572年8月24日发生的法国天主教派对胡格诺派的火屠杀。

“5. 官吏们未能觉察民情激昂的动向,而且即使觉察了,也未能及早采取行动。

“6. 在屠杀发生的那天上午,对天主教大教堂及其附属建筑的勘查。它把激昂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从而为爆发准备了条件。

“7. 意欲闹事的人作出的努力。

“我本来想进一步谈谈各外国公使和中国政府在屠杀发生后采取的措施。但是这份文报已经达到异常长的篇幅,我也意识到应就此搁笔了。因此,我用下列的话来结束我的报告:

“我们已经知道,存在着各种各样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使得中国人不信任和不喜欢洋人。

“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智识状况偏低,他们以一种迷信的方式,认为洋人沉溺于各种各样使人感到恐怖的行为。

“我们断定:屠杀发生前天津的总的局面,在中华帝国其它地方也可能重新出现,因而其它屠杀事件也可能发生。

“我坚信以上的结论,我建议谨慎行事,并采取预防措施。应通过北京政府作出坚决努力,驳斥在百姓中间流行的关于洋人的无稽之谈。对在百姓当中年年夏天出现的骚动,要迅速有力地应对和反击。一支相当大的海军部队驻于中国的海域,应授权它在任何外国人社团遭到攻击时立即出来捍卫,或在必要时事先采取防范行动。

“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比起两年前来,今天的外国人社团,它们的代表们以及一些外国政府对中国人的了解要多得多。他们一定会非常留神不让骚乱再一次爆发。

“此外,中国政府及其官吏的努力将以和平为目标。王朝是满人的。它在国人中只有少得可怜的拥护者。它保持帝位的希望殊为微小。它不想同外国发生争吵。它已发现说不定可以从洋人的存在汲取力量,而不公平地反对洋人,倒有可能造成它自己的垮台。

“至于中国官吏是否支持,我们的把握不大。但是政府的倾向可能是他们的指针。一般说来,中国官吏是最随波逐流的人。如果他们的政府以降级责罚相威胁,责成他们维持安宁,他们对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会努力去完成的。天津的官吏们这次轻易地逃避了责任,但他们的命运,仍然是别人的前车之鉴。

“中国百姓智识程度较低,习于迷信,满脑子装着洋人狠毒行为的传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像全世界总的来说所认为的那样,是勤奋的,爱和平的,容易管束的。就在我写信的时候,通常在夏天里总会出现的阴谋反对洋人的消息又已到达我这里。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但我仍然有这样的期望,每一次春去夏来会发现有这么一种讲求实际、善于观察的中国人,对洋人更为熟悉,而不愿意不经思考便一味相信对洋人不利的传闻。中华帝国幅员过大,人口过多,这是困难的一面。

“我曾说过我本来想研究中国政府在屠杀发生后采取的种种措施。

“在通常情况下,考察本案的这一部分会是很有教益的。但是我被告知,我的任务中较为有用的部分,现在已经完成。对犯法者没有进行过公开的审判。我们也无从见到被告为自己辩护所提证据的记录。在这样情况下,我们除了叙述中国方面给了什么样的补偿和揣测它是否以公正和坦率的方式作出决定以外,再也不能做些什么了。”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9月28日(八月十四日)德使安讷克为德商收到天津教案赔银事致奕訢照会称:

“兹据天津本国领事官文称‘所有因去岁天津滋事,德意志国商人所讨受亏之银一千二百零三两一节,现在该商已蒙津海关道按数发给’等语,本大臣阅悉一切……”

12月15日(十一月初四日)美使倭斐迪为请速办结蔚州教案事致奕訢照会称:

“昨日何老爷在贵衙门面晤成大臣,述说蔚州为传教有匪徒滋事,今本大臣将贝教士申陈送与贵亲王查阅。何老爷与成大臣商量定准,拟前往蔚州尽心办理,了结此案。此举甚属妥当,一俟贵衙门备函交与何老爷,即当持函前往该处,将函面递该州。现今衅端虽小,如不速为办结,恐酿成大患,故不宜迟延。”

所附美教士贝以撒于蔚州被殴情形申陈称：

“美国传教士贝以撒于十月二十一日约有午正，带领教中人安贵并在学内读书之高喜，在蔚州西门外讲道送书。高喜系西河营人，年十二岁，与伊父俱进教习道，同在馆中居住。贝教士讲完之后，带领高喜回寓。走至西大街，突被恶人拦住，询问高喜为何同你在一处。贝教士将一切实情告知，伊等并不肯听，越发喧闹。安贵揪住一个闹事之人往州署去喊告，贝教士往寓所去，不料这群恶人紧紧跟随，势更凶暴。贝教士情急无奈，只得躲到一个铺中。不多时伊等又将贝教士从铺中拽出，互相乱打，头面俱受重伤，并抢去金壳金绳时辰表一个，值洋钱二百五十元，撕破衣服，失去帽子等物。迨贝教士得脱伊等之手，仍有一大群人跟随围绕寓所。贝教士回寓后，又派两人往州署去呈报，均被差役拦回。约有申正时分，安贵从州署中回来，备述一切，始知州牧堂讯后立放安贵所扭之人，责斥安贵。又云：‘耶稣教不好，你不当人教。’州牧说到耶稣教门与西国之人均用‘洋鬼子’三字毁辱。二十二日午后与贝教士同往之美国达教士带领赵姓往州署去。先则用帖求见，州牧不见；后则投递呈词，州牧始见。达教士面请从严办理此事，州牧一味推脱，云：‘城里人数太多，焉知谁犯此罪？你若拿获，我可办理。此时我怕妄拿无辜。’达教士屡次恳求，州牧均如此回答。达教士又向州牧云：‘此事重大，不可忽略，我教中前有二人被殴，今又有牧师被殴。如若仅仅出一告示，责罚一二人，恐怕将来别滋大事，必至丧命。此事从严办理方妥。’以后州牧只云拿人而已，别无他言。二十四日忽有官人带领一人到贝教士寓所，身带锁链，口称此人已受责五百小板，并云事尚未完，越三四日必将原物送还。二十五日达教士又往州署去催问此事，州牧云：‘已吩咐地保访拿徐犯，若不拿获，必加责罚。’又向达教士云：‘此事紧要，应当速办。’况打贝教士之事，系在午间城中大街，众目共睹，此人并不难拿。前一次请州牧办理，至今已三日，并未捉住一人。州牧云没有一人肯告诉打贝教士者系何人，又云此人已经跑去，又云自己必尽力办这事。达教士临走时，州牧又云：‘限五天必令差役拿获徐犯。如若不获，必定严责差役。’”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施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田主教函致罗钦使后，即命于紫竹林法租界起建新大堂与仁慈堂。先将望海楼贞女等之小堂略加修葺，又于每贞女僮仆之处立大理石柱一楹，上镌每人姓名。一切修工迅速趲赶，不期年而落成。新大堂奉圣王类思为主保，堂之正面饰有雕柱八楹，各高二丈一尺有奇，皆浑珉所成，鍍鏤颇称尽致。其旧钟虽由楼上焚坠，幸未损伤，今复悬于新堂楼中，为招集信友进堂瞻礼之用。天津大堂告竣^①……”

《馆藏义和团资料》辑：

3月18日（正月二十八日），教徒周治安、周清文向曲周县呈控称：

“具呈周治安年五十二岁、周清文年二十四岁，住东乡新营村，距城九十里。为恃强欺懦，聚众逞凶，恩恩拘究，以安民业事。窃身等奉天主教教世，于本月十一日大法国鄂大人赴身村传教，带有钟表等物。有丁陈家庄之陈宗孟要看钟表，先生因不得闲，答以少停片刻再看。陈宗孟出口晋骂，先生与伊讲理，身等力劝，已散。迨料陈宗孟仗恃户大丁多，邀同监生陈宗燕、民人陈宗明、陈东亮、陈东明、高黑第二，并有不识姓名数十人要与鄂大人先生们打架，有三牌^②地方可证。先生见势凶恶，不敢与较，将门紧闭，并有奉教人拦劝。陈宗孟不依，竟将周治安发辫揪落一绺，并有受伤多人。身等受伊侮辱，业已多年，本应呈控；维时鄂大人急往献县公干，命身等待伊回日再告。今鄂大人南旋，为此具呈，叩乞仁明大老爷恩准，拘究施行。”

同日周治安另呈控称：

“具呈周治安，为抗欠累保，屡讨不归，乞准传追事。缘第三口宋洛体于去岁二月间在新庄买牛二头，价京钱六十七千文。维时卖主不依牵走，托身保账。身因与其认识，将钱保住，言明十日还钱。不料至期躲不见面。至三月间给钱十千，后又不见面。至七月间，宋洛体未识在何处买牛二头、驴一头，

^① 该文段未有随文注：后于光绪二十三年，降生后一千八百九十七年，皇上降旨飭直隶总督王文韶转飭天津分行道府张贴告示，派兵弹压，乃得重修大堂，死义诸人俱迁葬于堂中。

^② 原注：即丁陈庄、麦子乌营、辛营村。

从身村经过，身将伊牛、驴留住，与其讨要前欠。遂有白果树新庄之范玉勤、王兴奎、吕金文、徐洛福保住，当给京钱二十千文，下馀三十七千文，与宋洛体无干，约定九月间归还。至期讨要，又约至十月间归还。至期屡讨屡抗，累身垫赔，情实难甘。为此呈明，叩乞仁明大老爷恩准，传追给领施行。”

同日鄂尔璧移会特用府印补直隶州曲周县正堂庆称：

“同治十年正月十一日，敝堂在贵治麦子谷营传教，当有丁陈家庄陈宗孟要看钟表，敝堂执事人因不得闲，答以稍迟片刻再看，不料陈宗孟出口骂，执事人与伊讲理，非特骂益甚，并率领监生陈宗燕，民人陈宗明、陈东亮、陈东明、高黑第二，并有不识姓名数十人，要与敝堂打架。执事人等畏其凶横，将门关闭，有奉教人在彼解劝，竟将奉教人发辫揪落一辮，并有打伤者，有该村地方目睹可证。伏思敝堂奉旨传教，原为劝人行善，不辞九万里风波来入中国。十馀年来，如至麦子谷营，未有不滋事者，敝堂忍耐含怒不言，已经数次。今陈宗孟等如此凶横，目无法纪，如果再不移送，将来受害无穷。为此移会贵县，烦查文内事理，希将陈宗孟等拘案惩办，庶于前奉谕旨不准阻挠教务之意相符。”

4月15日(二月二十六日)又移会称：

“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五日接准大移，以‘辛营村周治安呈控陈宗孟等寻衅殴骂等情一案。据验周治安等均无伤痕，亦无证佐。惟陈宗孟往唤伊子吃饭，致与周治安等口角争吵，并在教主前喊嚷，本应责惩，姑念乡愚，从宽将陈宗孟严加申饬，并饬地方周寿长带同陈宗孟前赴教主前服礼’等情。据此敝堂查周寿长充膺总甲，并非该村地方，骂殴打时，伊并未在场观看，周治安等呈内有三牌地方可证。辛营村虽不大，分作三牌，丁陈家庄地方名陈秉清，麦子谷营地方名高桂林，辛营村地方名陶公美。伊等三人目击可证，并为劝和。至于周治安所受伤痕，具呈时已经匝月，本难验看，所为三牌地方劝和，敝堂等伊回信，以致伤痕痊愈。再，本铎素以宽恕存心，不准周治安等呈控。地方陈秉清等原许令陈宗孟等服礼，不料迟延一月，竟未回音，以致控告。既蒙讯断，令周寿长带领陈宗孟服礼，又经一月有馀，依然置若罔闻。陈宗孟之不法强横益加彰著，藐视敝堂，固无关系；不遵断语，玩法何如？为此合移贵县，烦查文内事理，应作何办理之处，赐复施行。”

5月30日(四月十二日)移会钦加布政使衔大顺广兵备道李、钦加升衔大名府正堂陈称：

“自同治九年秋季起至十年四月初旬止，敝堂迭次专差，前赴开州，置买庄房，以作公所。事到将成，即有绅团阻止，不许置买。今于四月初五日，又在该州西新街，凭中买得郭玉仑庄房一处，言明价值大钱二百九十千文。草契即立，定钱亦交，两相悦服，毫无异说。正在议准日期丈量交价，陡有北邻郭玉岚将敝堂执事人叫去，当面侮辱，不许价买；并邀各街绅民将郭玉仑打骂。似此情形，殊出意外。伏思敝堂置买庄房，通商传教，曾经迭奉大清国大皇帝谕旨‘各府厅州县，租买田房，听其自便，不准阻拦，以敦和好’，有两次和约可稽。今该州郭玉岚任意阻拦，殊干例禁。为此移会贵道府，烦查文内事理。希即转饬该州，先将郭玉岚照例治罪，割切出示，劝谕绅团；并希派委贤员，会同敝堂前往丈量交价。”

7月5日(五月十八日)再移会曲周县正堂庆称：

“兹者麦子谷营陈宗孟一案，前承堂讯令其与弟服礼赔是，守候月馀，竟无音信，是以又为移会。弟闻即出红谕，仍命复礼，又经一月有馀，依然如故。陈宗孟之强横不法，尊断尚且不遵，何况弟系远人，任意欺侮，势所必然。惟屡奉大清国大皇帝谕旨‘如遇民教涉讼，迅速持平办理，毋得意为重轻’，又去岁六月初一日奉上谕，‘著各直省督抚严饬所属地方官，务须割切晓谕，妥为弹压，凡有通商传教，地方随时保护，毋任愚民藉端滋事，钦此’，等因。今陈宗孟之侮辱敝堂，迭次滋事，如果弟不能忍耐，早成大事矣；恐阁下亦有不便之处。今于本月初九日，敝堂专人赴麦子谷营，令周治安与总甲周寿长见面，弟在广平县所属之张洞村等候，知回陈宗孟，使伊等无所借口。不料非特不来，周寿长又将弟辱骂。查周寿长于前数年间迭次与奉教人滋事，弟令奉教人忍耐。今陈宗孟之不肯服礼，实系周寿长护庇之故。”

8月21日(七月初六日)移会大名道李^①称：

“兹有启者：敝堂前在开州置买郭玉仑庄房一所，旋经郭玉岚从中拦阻等情移会在案，即蒙由府转

^① 同日亦移会大名府，文字基本相同。

飭开州办理。嗣因开州公出，以致迟滞。今已三阅蟾圆，想已讯有端倪。弟本应亲诣铃辕，面聆一切，实因道途积水，有碍遄行。是以修函奉询，即祈赐复，以慰焦思。”

8月23日(七月初八日)移会开州正堂荣称：

“兹有启者：四月初旬敝堂曾遣执事人金、任二位先生，在贵署西边买得郭玉仑庄房一处，价值大钱二百九十千文，草契既立，即拟交钱，陡有郭玉岚从中阻拦，不许敝堂置买。忆自去夏直至今春，看妥庄房不少，事到将成，即有拦阻。访闻贵治九团并绅士人等，公议不准卖给。回思敝堂置产，屡奉谕旨‘各府厅州县准令盖堂。钦此’，钦遵在案，是以弟移会贵道、府转飭办理。今已三阅蟾圆，想已办有端倪。刻下仍遣金、任二位先生代躬前往，即祈阁下速将郭玉仑等传案，以便交价。有费清神，容当面谢不尽也。”

10月31日(九月十七日)移会永年县钱称：

“兹有启者：贵治小北汪村有奉教人郝英亮等数家，自奉教以来甚守规矩。惟村中有修庙、唱戏等项钱文一概不出，地方挟仇，每遇差徭钱粮公项，地方并不告知，辄行捏禀，数年以来迭遭拘案。今于本年八月二十六日郝英亮进城封粮，拒书不收；至本月十六日又奉票拘，似此情形，殊难度日。为此函恳阁下，务将郝英亮等钱粮收讫，并谕该村地方嗣后万不再施伎俩，是所至祷。”

11月6日(九月二十四日)移会钦加运同銜即补直隶州永年县正堂钱称：

“贵治南沿村，有敝堂地四亩，又园地二亩，租给本村李祥耕种，每年租价京钱十七千文。九年份欠钱一千八百文，十年份欠钱十千零七百元，屡讨不给，疲玩殊甚。为此移会贵县，烦查文内事理，希将李祥传案，如数追还。”

《西湾圣教源流》第五章《圣母圣心会底副主教驻节西湾子》第四节《司、韩二位副主教署理蒙古教务》载：

“宗座除准予司公辞退，又派巴耆贤司铎(本会总院院长)为蒙古教区新副主教(一八七一，五，一四)。”

第五节《巴司铎任蒙古副主教》载：

“一八七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巴公(T. R. P. Bax)驾临西湾子，同来者有顾、杨(RR. PP. ^① Cuissart et Jansen)二位司铎。西湾子信众为接新主教，有很热烈的欢迎。巴公亲笔记过：‘不提我自北京至张家口那一段道上的光景，单说我们来到万里城跟前，遇见了马司铎与两位华铎和好些骑马的及音乐会；从口到西湾子，约有百里，我们走的很快。迨我临近西湾子村，望见了无数彩幢和旗帜，又有炮声及爆竹声，也听着大堂底钟响，阖村底信友都站在大街上来欢迎我们。’巴公到任，视察本堂底各院落，另外注视了孤儿院，那院计有二百个孤儿……”

“神职班齐到西湾子来欢迎新主教。他们殷勤的说，开教有希望的地点是新营子(南壕堽)，且由此能向蒙古民族劝教，因那时距西营子不远，有许多蒙古居民。所以开会议决，要在西营子试办传教事业。”

“本年十二月八日，新主教召集神职班均到西湾子总堂行大避静神功，也为商量本区底教务。”

1872年 同治十一年

《清末教案》第一册《中文档案(1842—1871)》辑：

1月(同治十年十二月)美副使何天爵为议结蔚州教案事致奕沂照会称：

“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准贵亲王照覆，内开‘美国传教士贝以撒在蔚州被人拦殴，失损物件一案，现已咨行直督李中堂，派员前往该州会同办理，并俟直督李中堂咨复后，再行照复’等因前来。本大臣因思此案情节较重，设办理未尽妥恰，反多未便，是以亲往蔚州会商办理。抵州后，随由该处地方官

^① RR. PP. 是对主教的尊称，意思是“极可敬的先生”。

石牧将案内人犯伤差分头拿获武苍子等七名，会同省委谕令分别轻重，枷责惩办；一面由该处地方官出示晓谕，以戒将来。并将该教士贝以撒所有失损物件，值价银贰百陆拾五两贰钱伍分，亦按条约由该处地方官如数赔交，经本大臣照查收讫，转发该教士祇领。此案相应议结。”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800)》辑：

3月2日(正月二十三日)美使倭斐迪为请飭天津官府照赔教民损失事致奕訢照会称：

“去年腊月二十九日接到来函，内开：‘据天津官府称，以讨索于、杨、张三位先生所遗失之物，因美国教堂被乱民毁坏之故。’当经将来函并函内所载者寄天津美副领事查阅。兹据声覆，署天津府马之稟报远离准实。……查该署府深知所赔偿房子不能作拢总之讨索俱已完结。兹送去以上所言之凭据，即是照录副领事收银单一纸。前银两交与副领事，是为美教士之财物被毁坏；现在所讨索者，是为贵国各先生财物之价值。两件讨索系分开送与贵国国家，欲贵国视我所问者不过是公平两项讨索，先已十分查验，以免有妄然之问讨。中国先生等之东家等告知我先生等之财物，华员所不能信者，实系有此财物，且所有者犹多过此，该署府并无凭据可以显出此讨索为不公。至于地邻之口供云云该署府所引以作证者，为华员所易得，应当将此等口供作较轻于美教士之证言，因美教士有机会知此实在之情形……”

“如我未曾误听，数千两银已给法国大臣作赔偿中国教民所遗失；因被乱民之扰动，在英国大臣讨索中，有华教民之讨索属教堂者。因我欲拟作至公，将美教士之讨索与华教民之讨索分开，地方官不但肯交所应得之银，反说我催讨索，我明知是不公道……”

3月16日(二月初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美使所派委员偕拟照会事致总署咨文称：

“案：查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准贵衙门咨，以本大臣据准补丰润县谔命年、蔚州知州石元喜会稟称‘会审美国教士贝以撒被殴一案，将武苍子等九名分别枷号示众，并将铺商魏拔、刘献二名飭令认罚。所有应赔金表等件价值，由铺商各认一半之半，由蔚州知州赔交一半，先由该州全数垫交’，取有何副使收到银两印结一纸，并交收盖印照会底稿一纸，照抄咨请查核。经贵衙门以‘地方官不应认赔银两’咨行飭知该牧‘嗣后凡遇交涉洋人案，务须按照条约办理，并查明所递照会现存何处，咨覆以凭查办’，等因，当经本大臣札飭准补丰润县谔命年、蔚州知州石元善遵照，并查明前抄照会现存何处，即行呈缴核咨去后。

“嗣于本年二月初六日据蔚州石牧稟称‘蒙钧谕以“美国何天爵付存底稿大有不合，飭将原付印稿刻即申呈”等因。卑职当何天爵付阅底稿之时，亦以名分攸关，未能相信，故令盖用该国印信，执以为凭。兹蒙前因，除将付执印结存案外，理合将附卷印稿稟呈察核，计稟呈美国何天爵付执盖印底稿一纸’等情到本大臣。

“据此，此案前据该州等办结稟覆，内称‘美国何副使又交该州存案用印照会底稿，擅称“贵亲王”、“本大臣”字样’，殊为诧异，是以咨请贵衙门查核。嗣石牧、谔令来省，诘以‘两国委员商办之事应即由该委员等互用照会议结，何以任听何委员擅交照会总理衙门文稿’。据该牧令面称‘何天爵自居美国副钦差，其照会稿末有“副全权大臣何”字样，是其明证。彼不愿与中国委员互用照会平行，因事已议结，碍难强改’等情。

“查洋人往各省，但奉其公使委派，往往藉势诈吓，在地方官只求事之速了，无从辨其官职之有无虚实，即不得不含糊照转。惟洋人每谓中国官骄慢洋官；今中国官以礼待之，何天爵乃不以礼自待。彼以公使委员擅称副全权大臣，僭拟照会恭亲王文稿，用印交该州存案，其骄慢谬妄之甚，尤所罕见。自应由贵衙门照知美公使，将何天爵严行申飭查办，以儆效尤而敦睦谊。”

《馆藏义和团资料》辑：

5月24日(四月十八日)鄂尔璧分别移会钦加按察使銜尽先道特授广平府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长和钦加运同銜即补直隶州永年县正堂钱称：

“案：查奉上谕，在于集市众人传讲圣谕，原为劝勉人心，可谓尽善；敝教奉旨，在于大、广二府传习教道，亦属至美。有治属绅士武汝清，西苏、吕固、苏固等村绅士赵姓等，在于四乡河工众人聚会之地，

以讲圣谕为名,暗传小书一本,逢人各发。不惟谤毁奉教,即英吉利、俄罗斯、暹罗巴^①大西诸国全行污辱。如此行为,所关非轻,可谓违上凌下,有干例禁;近又有在于皮巴掌等村粘贴匿名揭帖,平空污辱,亦有干犯。似此种种违犯,情属难甘。现值兑换和约之年,拟合备文移会。为此合移贵府,烦查文内事理,速即查明,赐一回音,以便具文转详。

“计移送小书一本。”

8月19日(七月十六日)移会大名总兵彭称:

“兹有启者:缘弟在贵治立堂一所,派奉教人闭门看守。今于本年七月初旬,突有兵勇逾墙入堂,毁坏堂中器具、院内果物。经守堂人劝阻,伊反出不逊之言,斗胆侮辱圣教。守堂人见势凶暴,不敢与抗,无可奈何,遂禀弟知。弟谅此事提台大人断不之知,未便呈报。孰料伊得惯便,屡次搅闹不休,侮辱圣教。弟思此事善处无方,遂不得不详陈左右,禱切提台大人严飭兵勇,出一示晓谕,以杜后患。”

9月15日(八月十三日)移会欽加同知街曲周县正堂程称:

“前经迭奉谕旨,敝教在于各府州县传习教道,各处均不应阻止。因敝教向在治属牛家寨设立学堂,适该村耿作林、地方耿洛扬言阻教,未有凭证。突于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耿作林等率领多人,将敝教人员吴福得混行攒打,立逼避教,沿街喊骂。于是月二十九日,又领人将敝教人耿山从家拉出,肆行打骂,立逼挨门赔补。吴福得无奈应允,以致该村奉教人均不敢在家居住。至七月初六日晚,敝教人吴福才自枣园村回家。詎料耿作林协同耿洛协凶恶异常,率领数十人,将吴福才拉出,捆至道旁树上。正遇市期,四乡人云集观看。伊即用粪水强灌,逼令避教方释。至次日早晨尚未放松,将马褂一件剥去。经该村耿九章等作保管理,设酒席三桌,席前服礼。耿洛协讹索京钱十三千文。同耿九章给伊京钱七千四百文。趁不在家时,将奉教人秋禾全行遭害。又沿街喊叫,不依奉教人食村中井水及碾磨等器。适有人赴井打水,耿作林将筒推倒。又雇人耕地,耿作林硬行拦挡。众教友因此告诉情由。敝教未从听信。敝教即于本月初八日,亲至伊村查看。伊等果行无礼。如此无故屡次污辱,敝教人等何以存站?拟合备文移会。为此合移贵县,烦查文内事理,希即飭差将耿作林等严拘到案,按法究惩,以免阻止。”

10月2日(九月初一日)移会永年县正堂宋称:

“本年四月间,有西苏武举李素遭抢告孙兴捏控洞头村教民阎朝付寻畔辱骂官绅、毁坏工段一案。敝教已曾亲至河口探验,并无毁坏;且辱骂官绅亦无证据。曾遣人往见武举李素,伊应此事并不知晓,不知何人捏造。又曾遣执事人至署,面见前任门工李,将事诉清。即贵县前任钱公亦知此事被人捏造,当即将票压住。不料于今年八月又蒙差拘,不知何故。而是年四月间曾有西苏村绅士赵姓等暗传小书一本,污辱圣教,显有证据一节,敝教已曾移送前任钱公,祈其查明。今已四阅蟾圆,并无赐覆回音。乃显有证据之端,敝教尚未深究;而凭空捏造之词,反蒙差役票拘,抑又何耶?为此专恳阁下鉴此情事,将拘票撤销;再祈将暗传小书污辱圣教大干例禁一事详为查明,不难水落石出,庶于‘民教交涉事件迅速持平办理,勿得故为轻重’之谕旨相符,是所禱切。”

12月24日(十一月二十五日)移会邯郸县正堂英称:

“贵治鸭池村有初奉教人家,俱系朴诚,毫不滋事。奈本村地方戴洛飞嫉其奉教有妨己私,遂扬言奉教人不办差徭。经敝教闻知,即遣本堂执事张济亨前往探听明白:奉教人等,并非不出差徭,由地方苛派之故。本堂执事即催令教民秉公交付地方差钱,地方不收。又俾令教民赴城亲自完纳草差,岂料地方手眼串通,不准自完。敝教执事劝说奉教诸人转托本村人戴洛致、三家村人李洛占代将差钱交付地方。地方仍是不收,但言伊不奉教便收差钱。敝教因思奉教人等实情办差,缘何地方不收?显系地方拦阻奉教,有干例禁,恐于民教交涉事件以后不免滋事。为此专恳阁下详审办理,妥为酌纳。”

《西湾圣教源流》第五章《圣母圣心会底副主教驻节西湾子》第五节《巴司铎任蒙古副主教》载:

“一八七二年内,巴公赴南壕堑,为举行圣堂奠基礼,因司铎们在南壕堑已开始改建一座体面的大堂,使当地教外人惊讶公教敬主的宏敞圣殿。巴公令几位司铎学习蒙古语,第二年,也聘请了一位教蒙

^① 即欧洲,今译作欧罗巴。

古文底教席，巴公自己也进学房学蒙古言语。”

1873年 同治十二年

《馆藏义和团资料》辑：

3月8日(二月初十日)鄂尔壁移会邯郸县正堂英称：

“据敝堂传教以来，各府州县已奉谕旨‘听民奉行，均无阻碍’原以专心劝人行善，断不令民免役抗差。现敝堂在贵县传教所有各村，所添奉教人等不一，或三五家，或十数家。凡贵县所属奉教与不奉教，正项差徭自应一例。急公办差，不分异同。倘有地方宵小之类，妨碍己私，嫉妒奉教，捏造衅端，肆行拦阻，妄言奉教人等不办正项差徭，借端渎讼，若不先防，后恐滋事。为此合移贵县，烦查文内事理，希即将各村奉教地方传谕先防，以杜后患。”

3月10日(二月十二日)移会广平县正堂段称：

“敝堂贵县平和店村，有屠户奉教人陈怀锦充行已久。查谕旨一款，庙祀赛神一切等项免奉教人摊派。现蒙贵县差役票传代买猪羊，因未办理，将奉教屠户雇工已传到案。据奉教人既充屠行，除庙祀赛神等外，公费蜡烛，亦应折钱效力。况邻县奉教人充屠行者，油蜡公费，自有帮办成规。贵县不难一定规程，每季宜折钱若干，均无不可。不料于本月(二月)十一日晚，差役不分皂白，将奉教屠户之家一切器物硬行抢去，如此肆行无法。为此合移贵县，烦查文内事理，希即将抢去物件交还。除庙祀外，定伊所当出之项，或折价若干，作一定规，速使交纳。”

3月16日(二月十八日)移会邯郸县正堂英称：

“兹复有启者：因贵县三堤村奉教民李迎光与邻居文生李恩成宅基相连，平素欺压敝教民旧买园基墙地一尺。敝教民素系朴诚，让伊不与兴讼，况又有红约可凭。奈李恩成欺压习惯，近又将教民房屋后墙充毁，侵去滴水两檐，显图搅赖，隐怀阻教。敝教民无奈，达知敝堂，未敢遽信。特遣执事人任、杨二先生前往探验地基文凭，果系不谬。遂与通融和处，伊并不依。教民无奈，禀呈在案。为此专恳阁下秉公讯断，望勿左袒，是荷是禱。”

4月2日(三月初六日)移会永年县正堂王称：

“敝堂在贵治孔村设立学房一座。于本年正月间有贼人窃去檩条子五根、绒毯一条、织锦台帷一件，访查无踪。忽于二月十二日，本村奉教人郭梦龄赶周村集，撞见袁庄袁明珂手持绒毯在集上便卖。遂即认明失物，向伊查问他件。袁明珂口称在周村伊外甥刘大棍家居住，行窃贼人窝在李姓南窑。当下同周村地方手将伊窃去绒毯交给，向伊讨要檩条、帷子，又口称檩条卖在本村东街秦二较盖房使用。台帷一件，伊并不认。……为此合移贵县，烦查文内事理，希将袁明珂、刘大棍速拘到案，失物一并追给严究。”

5月30日(五月初五日)移会邯郸县正堂英称：

“贵治鸭池村数家自去年九月间习教，其人守份朴诚，原不滋事。奈本村地方戴连嫉其奉教妨碍己私，扬言不出正项差徭。敝堂曾于今春二月间移去贵县会文一道，欣接来覆，备悉一切。敝堂又恐教民不实，因设立学堂，着执事人张济亨催令办理正项差务，完交清楚，以后免不滋事。孰料四月间本村演戏，地方戴连嫉奉教人除正项外，不能苛派钱文，着同伙宋得林与教民刘高堂逼索戏钱。刘高堂与伊分说，伊遂与同伙将刘高堂衣剥去。众奉教人见伊如此欺压，不能忍耐，共与理论。伊即邀同伙数十各执器械鸟枪、朴刀，蜂拥喊骂而来。经敝堂执事人张济亨前往再三劝慰，与伊等赔情，不令动手。伊等仍出不逊之言，妄说奉教人等两次差务并未交纳。执事张济亨明知差钱不欠，即与讨账清算。伊并不算，抢先兴讼，强词占理。教民既蒙差传，理宜赴城静候。无奈伊等恐呵教民：‘不日锁拿进城。’教民害怕，多半逃跑。敝堂执事张济亨万不得已，着教民呈诉在案，遂达知敝堂。敝堂因思本村地方既为差务，缘何将吾教民焦六、戴成文捏控在内，且又逼索戏钱，件件殊无情理，显系拦阻奉教，大千国家例禁。如此肆行无法，斗胆妄控，教民何以度日？为此合移贵县，烦查文内事理，希即将两造传齐，严加核夺，则教

民抑屈能申,与喻旨‘不准阻挠教务’之意方相符合。”

6月10日(五月十六日)移会肥乡县正堂詹称:

“敝堂贵治周寨习教良民葛品三被柴庄人胡鹤鸣嫉其奉教,为税契事捏禀在案,已蒙堂讯,前来敝堂苦诉屈情。敝堂素知此人朴诚,其或愚戆,唐突尊威,贵县打之罚之,分所应尔,何庸向敝堂妄聒?然其税契一事,实怀曲衷,敝堂曾细问其由。据伊所买地亩,共价京钱五百八十馀千,所报税价,竭力凑办,已交京钱二十七千有零;税价准谷四分有馀。而家实困窘,不能如数偿补,情实可悯。敝堂为此专恳阁下宏施仁慈,怜视良民,宽恕此项。不惟习教民感戴鸿慈,即敝堂亦佩云情于无既。”

6月17日(五月二十三日)移会大名县正堂崧称:

“贵治新并东路申桥村有敝堂奉教贫民几家,数年以来田荒于水,治生无策。现在为修庙杂项,蒙差催办。敝堂哀此嗷嗷众口升合不给,即准以国家忧恤贫民之意,似乎在可矜可免之例,矧大清国皇帝喻旨一款‘修庙迎神等费免奉教人摊派’耶?为此敝堂专恳阁下宏施仁慈,怜恤贫民,免其摊派。非特民等戴德无涯,敝堂亦佩高情于无既矣。”

6月26日(六月初三日)鄂尔璧移会邯郸县正堂英称:

“前月造署,恭候兴居并陈下悃。喜逢公暇,得聆尊海。……缘贵治东孙寨习教良民张化平具言,其堂侄张虎子素行无赖,嫉妒敝教,与化平不睦,常与本村习教人李文清谤毁殴打,曾经此村敝堂学房执事人贺中魁亲见,嘱习教人忍耐,不令滋事。忽于前月二十四日晚,化平场中火起,烧去麦秸大半。明知为妒党所放,因无证见,亦遂隐忍。又恐毁已瓜田,即于夜间侦探。正值张虎子手持铁锄,将化平瓜秧芟除几尽。化平直前奋打,遂夺其锄。张虎子忿恨不平,回家与其父张连升喊到化平门首,对执事人贺中魁谤毁敝教,将化平父连起打伤左耳,赖本村李有邻拦住。张虎子仍是不平,首先捏控。化平不得已呈诉在案,有夺锄可证。其(渺)[藐]视敝堂执事,毁坏习教人田苗,未有如此之甚者。为此专恳阁下严究此辈,为习教良民作主,俾之安居,则敝堂叨德无涯矣。”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旋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西洋诸国与中邦修好以来,各国钦使屡请面觐中国皇帝而不得。此次联名复请,卒蒙皇上准见,即于紫光阁接见。使臣等各呈国书,皇上一一垂问。觐毕,三鞠躬而出。惟法国新派钦使若拂乐^①于国书外并呈奏摺,具言‘津匪滋事杀戮法国官民一案,崇厚诣法谢罪,虽经办结,但因法德议和,诸事犹未就绪,不暇顾及津案。然而草草了事,法人心实不甘。尚乞皇上恩谕,再行查阅’等语。”

《馆藏义和团资料》辑:

是年直隶东南教区负责人^②致吴桥县典史金函称:

“昨以教务倥偬,未能趋侍。敬遣执事,借候崇安。乃既至贵衙,有先在者一人对使发言称‘奉教者并无好人’,既而又问:‘洋人何日来此?我将往观。’执事闻此,初以为此必非贵衙中人,及讯官阙,始知其为贵厅之介弟也。……敝堂敷教中国,志存观光,越邑过郡,动必以则。往岁经理教事,亲历数省。曾屡谒曾侯及李中堂、崇官保诸大宪,每见其品愈高,其言愈下,进退恪恭,辞气和悦,从未闻一傲慢之语。……即如明府石君,自莅任以来,忝荷垂青。五六年间,以道相尚,常若一日,亦未见有佻侮之举。……今之言曰:‘我将往观洋人。’令弟年近任强,书籍应通,独未闻尧舜与人之语乎?敝堂实为喻人于道之所,却无养狙作剧之端。倘欲游观,随在多有,敝堂勿劳枉驾。……吴川奉教者数千,多属忠厚自安。国课早纳也,从众办差也,其出言不情者亦甚寥寥。或间有一二涉讼,亦为势所不免。即不奉教者,庸讵不履公门乎?今其言曰:‘并无好人。’切计十一,属中游历者十馀载,此等言语实为创闻。敝堂前曾派六品顶戴刘孟才协同进士朱镇海查看宁、吴奉教人,均言蹈矩循规。或者该执事言涉朦胧,亦未可知。石明府今既公出,自有贵厅护理县印。特派二人具禀到案,质对是非。其不好者何人,所作者何事,不妨一一举出。倘令弟以此处不足分割,即转达上宪。敝堂步其后尘,亦乐从焉。”

① 又译作热福理、热复理。

② 原稿本未具名。下同。

其致清河县正堂函称：

“为贵治城西大新庄奉教人刘大等一案。初奉差拘，各处风传抄拿天主教。不惟该村奉教者尽皆逃散，即他处亦皆惊骇。敝堂初闻，未知其由。差执事人确为访问，始知贵县有准临清州会票拘解一节。缘该役到乡，过于铺张，所以人情汹汹。查刘大所欠粮米委已完纳，有粮票可证；但为日无多，该役未知，仍行勒索，故尔彼此争执。时伊不将粮票去出作证，胆敢与较，已属逾法。贵县将伊笞责，聊示薄惩，不逮解发，已属恩施格外。惟念乡民犯法，出于无知，尚属可宥。均系治下赤子，尤望贵县网开一面，恩与调停。如得完结，则均知感戴。”

其致献县知县陆函称：

“城东付家庄奉教人付青，年来偶患痰迷之症，忽发忽正常，沿街叫号，陡至学中搅乱，升屋抛瓦。今闻其病发，忽至西韦村庙中搅扰。村人赵明甫等，不察其病，必欲罚钱若干千。说合未遂，竟以拆庙偷窃等情并将其兄付良呈报到案。窃惟付青迷惘肆闹，理宜自任其咎。若其兄弟，佣工求食，尚莫能给，力实不能代为认罚。望兄洞鉴其情，开一面之网，幸勿任其波及他人。再者，西韦庄孀妇刘芦氏呈报伊兄砸坏家具一案。其夫在日，曾在敝堂执事，因出嗣近族，粗足糊口。伊兄每欲有所分肥，所求不获，即便寻闹。今因求借未允，将该氏院门摘去，砸碎锅碗，以致兴讼。并祈于理政之暇，恩施广被，折以片言，俾各安业。”

其致武邑县彭函称：

“往岁以贵治城北芦家口奉教人芦奇冒充乡地朦胧军官，诬良为盗一案，曾肃一函，尚悬未结。……查芦奇与芦尚连素有嫌畔，故设法陷害。当未稟案，尚知顾忌。今历年余，得荷宽政不加追究，其凶日长。初惟望门辱骂，继更入院寻殴，日加荼毒，迄无止息，玩法已甚。……今专派敝堂执事刘孟才具稟到案，静候质讯。”

其致任邱县马函称：

“兹者十五集村副村崔致洋呈控东八方村奉教人高连玉毁坏坟墓一案，成讼已久，该奉教人并未一相告语。即弟虽知崔某恃势作威，时常欺凌奉教，现已兴讼，无关教事，即亦未尝过问。……乃本月中旬，适自棠疆，前抵郑州，即闻崔姓呈词语涉敝堂，未敢轻信。当派执事人确查，果见伊呈有‘仗恃天主教’字样，心甚莫解。遂先至十五集邻近各村细问牵拉教堂之意。村人皆言：‘呈明教堂，讼则必胜。且尝试教堂有何能为。’其意盖谓官府憎恶教堂，心存制伏也。识量褊浅，至于此极。继更协同该处掌册人至伊莹地，亲为量丈，近莹地块皆不足数。伊又将高姓地块用土封识，约可两弓，不令耕种。俱有本处村人可证，并无毁坏坟墓情节。始知伊之呈案，本图讹诈，故有罚钱若干之议。……自崔某兴讼，本与教堂无涉。该奉教人未尝借教堂之力，伊亦未曾受教堂之害，弟亦并未涉手，竟以‘仗恃天主教’语明载呈词，是固欺凌敝堂也。……敬修寸楮，差执事六品军功肖仲卿声知台左。其因何牵涉敝堂，敬祈兄台赐一察夺。”

其致河间府陈函称：

“往者任丘县奉教人陈有祥呈控陈顺曾等刀伤伊母一案，前在本县成讼已久。缘陈有祥年幼势孤，单户奉教，时备欺压；更兼陈顺曾与该村大姓结党，并力合攻，是以陈有祥屡致负屈，激成府案。□见讼无终尽，当有致颜公祖书函，祈就近转委上县提案审理。旋蒙批准，札委河间县移卷核夺。兄台清明素著，民志自畏，一经电察，无难立剖，中怀块垒，已觉冰释……

河间府陈回函称：

“昨奉惠翰，备聆一是。日前台驾回郡，亲接坐谈，殊欣良晤。……承嘱之件，自应从长办理。本月初三日，该民人刘长楨来署具呈，当经剖切开导，谕以儿女之事，当以尽孝为先，其家翁姑之命，必须遵听，方为孝顺。且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系属天经地义。若违此理，无论[何]官，不能以非理定断，即其女一家亦不相安，万难度日，是爱女反以累女也。且提郡亦不过如此讯问，徒令少年妇女往返跋涉，更非善全之道。兹特遴选干员，前往会审，令其秉公据理核断，使两家戚谊彼此相安，无致终讼。素知阁下深明大义，教孝为心，当令执事人等节其遵断速了，勿贻讼累为要。”

其再致河间府陈函称：

“今承惠示，如获面谈。……昨所呈览一节，徒觉言非当言，惟滋愧赧耳。愿原谅其失，使终尽所怀。来示云：‘儿女以尽孝为先，必须遵听翁姑之命，及出嫁从夫，系属天经。若违此理，万难度日。’固也。夫五伦之德，三从之训，本为人类之公义，亦属敬教之常规，中西原无二理。事逢其变，亦可行权。父母固宜孝顺，而命令庸有乱治，似亦未可执一。查中国历年所颁诏令，谓敬教以劝人行善为本，谓大旨与儒道同功，故不准禁止，并未论定位置。且一家之中，其有一二不奉教者，随在多有，均能彼此相和，盖人各得其本愿，始能相安。假如翁姑习教，儿女不习教，欲儿女之从己也，刑驱而势迫之，岂非大不近情？知此，其翁姑之不习教者可类推矣。使必执遵命之说，瀛郡之翁姑奉教儿女不习教者，莫可更仆。其翁姑固常命之矣，亦概令其遵命否乎？敝堂十数年来，时常飭执事人开导其父母，勿强令其儿女奉教，俾得所本愿，能以相安。至提郡一节，已悔前言之多事矣。”

7月某日(六月某日)致函河间府陈函称：

“日前肃一函，既经入照，复蒙惠示，得悉宁津教案应委干员覆讯。方在静候，复闻宁津大商家庄敝堂所设义学，又被该村土匪商秋醉酒搅扰，又杜门辱骂。馆师肖主治出与理论，即欲兴殴，旋聚合四五十人，各执器械，声言抄拿天主教，将学内书籍砸坏，财物抢去。当派执事确查，类属情实。查宁邑十餘年来颇属清肃，并无此等情节。自去年该县勒逼奉教人使具背教甘结，倡禁习教，以致各处变乱蜂起。至于大柳镇张贴匿名并传播谣言，以有此一节，诚为创见，似非尽属敝堂之过。方今两国诚敦友睦，于本月初六日^①中国皇帝陛见法国使臣，恩礼有加。……盖乃该县意存轩轾而不一视同仁。……兹特派执事人赴辕具禀，敬祈贵府迅速察夺，勿使患乱迭起，是所切祝。”

8月22日(闰六月三十日)鄂尔登移会邯郸知县英称：

“本年大西诸国钦差大臣各奉本国钦命，于前六月五日，同日陛见。蒙大清国皇帝加意法国钦差大臣热复理，备极仁厚，恩礼较前倍隆，言‘二国和好，彼此相交以信，各无猜疑；所传习教人均系中国赤子，自应厚加体恤，仍飭各府州县于凡教务交涉事务，须迅速持平办理’等语。敝堂于前六月间回本堂公干，蒙本国钦差大臣热复理面嘱此语，感激殊深。不料今闰六月底敝堂回至贵县三堤村，奉教人李某至今并未传讯；鸭池、孙庄等村奉教人案件虽蒙堂讯，乃不准奉教人分说，立行打押；加派鸭池奉教人等差务，且有不容奉教之言，似非持平办理。而又当堂特令奉教之家男女人口抄名呈案。其本村地方戴连堂讯后回村，凡奉教之家，沿门叫骂，毁谤圣教，按名抄查奉教人口。敝堂不审何故，岂大清国皇帝不符前谕，另有谕旨，各府州县奉上而行耶？敝堂究不得不询问明确，作如何办理之处，以便据此赴京入奏。……祈将如何办理之处，确切指明。”

8月27日(七月初五日)又移称：

“近接贵县移覆，备悉壹是。……但鸭池村奉教人一案，敝堂近又亲去查问，实系该村地方屡次逼令避教，逞凶辱骂，毁坏教堂门窗。有奉教人五六家曾在本村武学设席款待，伊并不允奉教，其拦阻教教，毋乃太甚。还祈贵县劳费清神，堂讯细究，情形不难水落石出也。”

10月12日(八月二十二日)递帖给成安知县杨称：

“治下西乡邑村有习教贫民井占起、尹福等，因本村米姓侮辱教教，闻两造毁伤，积讼有日。弟现随本堂主教杜公料理此村教务，不遑趋谒。如果两造伤痕平愈，祈阁下速结此案是禱。”

《教务纪略》卷四上《成案》辑：

11或12月某日(十月某日)北洋大臣批文《堤埝工程民教一体修筑》载：

“据霸州知州禀称：卑州应修芦僧河南北两堤，各村已一律开工。乃据高家庄地方傅昶以‘伊村民人陈西玉倚系天主教民，阻挠堤工，抗不遵办’等情禀，经卑州传讯。突于四月十二日陈西玉身负黄袱骑马闯入大堂，口称‘接旨’，大肆咆哮。卑州即接询。据称‘所修均系私堤，伊等现修天主堂，不能出夫修堤’等语，并以所负系属圣旨，必令卑州跪接，狂悖异常。当即恭阅所负黄袱内系同治元年三月所奉

^① 原编者注：应为初五日。

上谕：‘着各该督抚转饬地方官，于交涉教民事务须迅速持平办理，不得意为轻重。等因。钦此。’后系总理各国衙门具奏：‘习教之人于一切应出钱文之事，除正经差徭外，其余祈神、演戏、赛会等项，该教民既不愿与不习教者一律同出，即可免其摊派。等因。’是习教之人所免派者，亦只祈神、演戏等项，并非一切公事概行予免。当向陈西玉开导劝谕。而该教民依势豪横，语多不逊。卑州业经趋诣尹轅，面禀在案。回署后复经传饬去后，该教民并不遵传到案。飭据地方傅昶禀称‘陈西玉复申令本村教民练永大、杨玉方等二十馀户均不遵办，以致村众不服，亦俱观望’等情，卑职复查陈西玉等虽经入教，其正项差徭应随众办理，已有明文。况堤工为一方保障，有益于民，尤非寻常差徭可比。该教民等世居州境，田庐坟墓近在堤身，辄敢倚系教民，出头阻挠，以致不入教之民亦皆不服观望，至今该村工尚虚悬。查天主教既称‘尊崇君上，谨守法度’等语，自非令其藉以抗官。似此倚教抗横，实于地方公事大有窒碍。至该村共应修遥堤三十丈，内有口门一道，计长二十丈。若不赶紧修筑，设遇水涨，关系非轻。该教民始终抗违，卑州不难绳以官法。惟恐有牵涉，不得不据实禀请查核应否照不入教之民一体勒令修筑，并准由卑州将为首阻挠教民量予责惩，以儆其余，俾全堤及早告竣，地方藉以有裨。俯赐批示祇遵。奉批：仰即遵照定章，勒令该教民一体迅速修筑，克日告成，一面将为首之陈西玉认真究明详办，以示惩儆。同治十二年十月。”

12月7日(十月二十八日)北洋大臣札津海关道《文庙捐款民教一律摊派》函称：

“顷据法国领事林椿来署谒见，携有该国热大臣来函并钞寄正定戴主教致府县信稿，及同治元年恭邸刊发谕单，详加披阅。当告以谕单内所载系指明迎神赛会诸费免令教民摊派，至地方差徭及一切有益等事仍应秉公摊派。此次巨鹿县捐修文庙，实系地方极正大有益之公事，与谕单所指迎神赛会不同。孔子为中国至圣。从古及今，自天子至于庶民，无不崇敬。地方捐修文庙，即以崇敬孔圣。教民虽习外国之教，实系中国之人。若只知有天主而不知有孔圣，则与叛民何异？人心所不顺，即为王法所不容。天主教本意劝人为善，即不应收留此等匪人入教。况此案原委，鄙人早经深悉。该县因修理文庙，议令每亩捐钱，数本不多，又出于合邑士民之愿。梁武魁等恃教抗捐，该县将其量加惩责，亦不为过。戴教士不知中国事体，但听教民怂恿，代为出头，本有不合。因念热大臣素讲友谊，既有函商，当为转饬地方官妥筹办理。文庙捐款与别项迎神赛会大有区别，断不能免派，并(属)[嘱]该领事先将此意译复热使转(属)[嘱]该主教等遵照。该领事无可置辞，唯唯而去。兹将热使来信暨抄寄各件一并录致，望即转饬该府县查照，分别妥办。此次文庙捐项，教民仍敢恃教抗捐，自须酌量惩儆；但不可有意苛求，激生事端，是为至要。”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

3月25日(二月二十七日)英使威妥玛为天津及江西抚州有人反洋教事致奕訢照会称：

“又据孟领事官再为函致，本月十一日津城教堂正当行礼之时，忽有人进入堂内，指斥教道，吵闹诟詈；嗣出堂门，仍在街市向人声述前词。虽经旁人劝解，幸未生事，亦合转致贵亲王悉知。”

11月18日(九月二十九日)法使热福理为广平教堂三次被抢等事致奕訢照会称：

“本大臣接准河间主教来函，内称‘近接广平府鄂教士信函。据云“司铎鄂为广郡白昼抢堂，细陈情由，事经守堂人张起口诉；于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有大名府新到之兵勇护守广郡，在南街行客店中安寓。本营大人赖姓不知道部下领队何人，姓名未经清查，于此日未时分，亲领手下兵勇持铁锤撞开堂门，硬向堂中找拿匪人；因而本城练局绅士李洛尚、城捕役杨富并街上众人一齐拥入。其时领队人被城内练局绅士李洛尚、捕役杨富手眼唆使，硬指守堂人张起为匪徒，亲手采住张起发辫，拉到南街店中捆在马棚柱上，抽刀群拥威呵，再三逼令诬认为匪。守堂人张起抵死不认，伊方释刀，用马鞭毒打无算，幸未陨命。彼时张起被采出之后，李洛尚、杨富遂领兵勇并街上人等齐到堂中抢掠一空，屋内箱柜、窗上玻璃多半砸坏，狼藉满地。及晚放回守堂人张起查视，方知被抢情由。铎于九月初二日移会该府县，于初四日亲到堂中查验，果属真实，遂于初九日移会大名道。计前三年间，广郡堂中两次被抢，铎曾宽恕，并未深究。该府县惟存卷，前任交卸，后任随时照料了事。今乃三次被抢，较前更甚，是以细细陈明，祈本国钦差大人商确此案是望”’等词。

“本大臣查自同治九年广平府教堂初次被抢，(后)经广平府正堂长守办结后，不意至今三年之内又被抢三次。前二次被抢，因鄂教士不肯劳乏该处守令，吞忍未究。惟第三次抢掠之人，其胆愈张，其肆愈放。本大臣想如此之敢于藐法者有二意：一为迭扰教堂，使旧习教者而生退心；一为常抢教堂，使新欲习教者而阻进步。此实暗背和约第十三款之法，即希贵亲王设法严惩此肆恶无忌之辈，亦即笃友睦之一据也。”

1874年 同治十三年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

2月1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法使热福理为请禁售天津教案板画事致奕沂照会称：

“近因得一实据，在天津传卖刻板画一事，即系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惨杀外国人、焚毁教堂一案。本大臣得此实据，并闻天津地面官于此但令卖画之铺柜房隐卖为已足。虽天津如此，近又得买一张在手，系由武清县贩来。此等之画，实污中国之面颜，本大臣亦不必深论。由此可生出多大关系，在贵亲王闻此，亦必有所测量焉。”

2月12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英使威妥玛为请示禁刻卖天津教案板画事致奕沂照会称：

“……昨据孟领事官于本月二十三日详报‘现有天津道宪于传卖绘图一节不愿张发示禁，反以“此图复卖，可知庚午年之告示并无成效；今若出示，诚恐转使津民心怀动摇”各等意为词，故此不发示谕’等因前来。

“本大臣窃思：中国治民，除告示外，尚有何法？官宪心意若不形诸示榜，下民何由得知？……惟思失和者既不止一国而在诸国，试问关系何如？盖各省动兵二十馀年，为因诸邑会匪大乱。今幸渐渐消平。……试思无论何大国，倘与贵国兴动干戈之际，各省逆匪势必乘机另炽，海内疆域复受大患。本大臣陈措斯词，并非意在恐吓；只因保全英民，原系本分。既念前辙凶案，岂能安待恶情效起之后？徒言无益，理宜事前直言，告戒无隐，方称尽任也。”

3月31日(二月十四日)法使热福理为接教士函译陈广平府教堂被抢事致奕沂照会称：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接准贵衙门来函一件，并抄直隶总督覆单一纸，均已阅悉，随将抄单送给广平府鄂教士查阅去后。兹据该鄂教士来禀所云，抄录于左：

办理广平等处教务司鄂覆稟钦差大人，为确切回明抢广郡教堂事。

窃年前十一月间接到照录咨文，内云“该县府道文武官员已经细勘，并无抢堂捆打情形”。敬铎细览咨文，与敝堂达知该县府道并总镇文内情词不符。所有弊端，显系该县王令平素嫉恶圣教，禀报不实，该府道据其浮词，未经细勘，即行驰报，蒙蔽殊深。据所云“并未捆打守堂人张起情事，亦未抢去什物、毁破窗户玻璃”，乃当时明明有堂内奉教人系该县属内龙泉村韩庆云，孔村之薄鹿鸣、张耀宗、刘家北，汪村刘玉魁，与守堂人王现青等，亲眼见兵勇与本城人等撞开堂门，硬指守堂人张起为匪类，揪住发辫拉出，有班役何先保在后唆使。随至官店拴在马棚柱上，抽刀群拥威呵，再三逼令诬认为匪。守堂人张起抵死不认，伊等方释刀持鞭毒打无算。至晚放回，查视堂中抢掠一空。维时通城啧啧，无人不知，何得云“并未捆打”？且张起被兵勇揪出之后，奉教诸村人等又亲眼瞧见县中班役杨富、刘彬、何先保并练局绅士李洛尚偕引指使兵勇人等十余人一齐拥入堂中，将窗上玻璃砸坏，箱柜打开，抢去金银、蜡台、新时辰表、金色花样杯盘、洋枪、洋灯、洋蜡、洋胰等物。敬铎来堂，亲经查看确实。未移开失单之故，以向年堂中什物被抢，该府县委办指物作价包赔，拮据斤两，过于刻核，成何体统，是以失单未具，何得云“未抢什物”？什物原属一空，且前经报府。该府长守飭该县王令进堂查验时，亦岂不亲见窗上玻璃砸坏，箱柜打开，破纸狼藉满地，屋内屋外俱是砸碎玻璃，至今从未收拾？乃反言守堂人张起并未受伤，且责其隔县诣府喊报。不知守堂人

张起素惧该县王令威势，非敢隔县，实不敢诣县喊报。况鞭伤逾时，焉有伤痕可验，何得云‘未指供报案，亦未受伤’？又据所云‘细诘地邻人等，佥称并未抢砸、诬拿捆打各情，所称均无异词’，此更易辨。向年堂中两次被抢，悉由挨邻墙垣跳入。委办之后，如再抢闹，定例坐罪地邻，该府县俱干处分。今复抢掠，地邻谁敢担认？此不待言。何得云‘均无异词’，便作实据？复谬云澈铎诬听张起一面之词，捏控抢掠捆打，以故远扬，并不到案；不知张起身受惊悸，有人寄信暂令藏避，非不到案。且年前十一月间，澈铎诣广郡堂中，数次询问明确，亲带张起到案听讯。以被告人等传催不齐，致延时日，两次过堂，并未讯明深究此案。今复到案候讯，该府县托故不问，何得云‘屡催张起，并不赴案’？又前年广郡十月间，陡有兵勇数十人进堂借住，将堂内锅釜器具什物毁坏，盗弄失迷，不计其数，澈铎悉行隐忍，未经禀报。且澈铎在广郡数年，屡次查诫守堂人，并无伤害四邻、与本街人等吵闹语言，缘何广郡绅役人等屡次侮辱圣教，欺污澈铎？不堪胜述。伏思中国抢掠定例：失物究赃包赔，按律治罪。本国通省皆是如此办理，何独异方旅人遭害’计今四次？该县另具偏私，草草过堂，多方掩饰，蒙蔽上宪，并不包赃治罪，认真办理。似此王章何在？以后定复仍蹈前辙，抢闹更甚，澈铎身在广郡传教，设立教堂，何能存站？为此不得不据实回明，详陈抢堂情由，以白诬罔。伏乞本国钦差大人鉴明此案，妥贴办理是望。谨稟。

“本大臣照原稟所言，抄请贵亲王阅视详度，自必能格外关垂，平情飭办，而堂中冤抑之气可得稍伸于睿鉴中矣。”

同日法使热福理为高邑县摊派教民出钱修庙事致奕訢照会称：

“兹得高邑县卫令所出之告示一纸，仍系派摊教民出钱修理文庙等情，是以照抄送请贵亲王阅视。本大臣查去年在巨鹿县一案与此案相同，当时因恐劳烦贵亲王有为之神，故未淡请，而奉一函于直督李中堂，兹特照抄其略：

本大臣查和约与谕单所载，已明言不勒令天主教人强行别教之规，何以贵中堂覆函所称特重儒教？又云‘谕单所列，儒释道三教为同’，请问我天主教人奉事者仅一降衷惟皇，既不强行释、道之教，独欲强行儒教乎？且道之大，原出于天，即孔圣亦遵行天道者也。若谓‘天主教人因守不修庙之规，即为背君藐上，与叛民同’，不亦失措词之实乎？况贵中堂亦深知天主教人居心忠厚，深知恭敬皇上。如亲政之初，各省教堂主教、教士无不虔诚诵经祈祷，愿皇上帝国祚绵长，四方安泰。凡作奸犯科谋为不轨之人并无教中一人，因堂中主教、铎德时常谆谆训戒教民，劝其守王法，遵律令，绝非为，不使恶乱之萌潜滋。设若一省尽系教民，敢云比别省易治。凡天主教人所期望者，止此一件，即贵国允准任便入教，随意盖堂，并无勒令禁阻之事。倘若逼其出此入彼，殊不曲从，亦实背约。若天主教人出钱盖一庙与出钱帮修一庙，皆为顺从盖庙之教，幸获恭亲王明鉴，发出谕单，免天主教人为此非分之难心，仅得修其本教之堂。所有正定府戴主教替梁武魁出头，因系教务相关；况戴主教之为人，居心恭谨，立品端方，有该堂所属教民父母之责，焉能袖手？贵中堂责其多事，似乎太严。若非教务，妄干教民之私事出见官府，本大臣定加责备。举凡主教及教士出头，必关乎教务教事，与地方官葛然求商，原期从容易为办理诸多事件；不然案积不结，一经归入公务，往返迭商，其味变甘为苦矣！不知贵中堂何以不愿戴主教出来调和教务？

本大臣想戴主教年纪已老，事件经理必多。伊虽来自法国，现在言谈举动有七成类中国人。是以各省主教因在各省多年，该处官宦居民莫不熟识其性情，皆愿与之商酌事件。在贵中堂所筹，以教民之事归各口法国领事官办理，或交驻京钦差办理；殊不知若舍近求远，轻事可以成重事，小可以成大，何如就近而速结于主教之手也？

“请其就近即可办理。不意该县仍出此告示，既违悖两国和约，又不遵同治元年正月内贵亲王所出之谕单，亦不奉行李中堂传宣之命。是以本大臣不能再向贵亲王述告，仍请将从前谕单之意训海官民，俾知国家差徭正项无不恪遵，各庙之费永不摊派教民，而文庙虽属中国，所尚亦在谕中包含之矣。

“……(附粘高邑县告示一纸)”

所附抄录高邑县摊派教民捐修文庙告示载：

“……同治十二年九月廿二日蒙督宪李札^①开：‘为批飭事。据代理巨鹿县张令春熙详覆教民梁武魁一案讯供拟结缘由到本阁爵部堂。据此，除批此案既据该代理县张令集讯，梁武魁并无勾结集众抗差，咆哮公堂。惟堂讯被责，出言顶撞，实属冒犯，应照拟杖八十，折责发落，准予销案。至捐修文庙，本系地方极正大有益公事，与别项迎神、赛会、演戏、烧香等事迥不相同，无论民教皆应一律摊派。从前总理衙门谕单内曾提明：‘伊等不能因系教民，遂欲幸免各项公费。如有差徭及一切有益公项，应照不习教者一律停差摊派。惟迎神、赛会、演戏、烧香等事，与伊等无涉，永远不得摊派。’今梁武魁既愿将此有益修庙公费催令民教一体输将，尚知悔悟，并有文生高祥凤公保完纳，应令催缴，以符定章。……此批‘等因印发外，合亟[札飭]。札到，该司即便查照。此札。’……为此示仰闾邑教民人等知悉，嗣后尔等遵照督宪批飭定章办理毋违。特示。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实贴县前。”

5月23日(四月初八日)英使威妥玛为天津刻卖板画事已咨报本国事致奕沂照会称：

“案：查天津凶案复行绘图传卖一节。……嗣据天津道宪绝再卖各等情节，亦已用电线及缮文咨会本国……”

12月8日(十月三十日)法署使罗淑亚为请筹善法以变化百姓仇视外人之心事致奕沂照会称：

“本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大臣派师翻译官前往贵衙门，面谈论及数案……

“天津新近有三个本地人吃得大醉，清晨闯入教堂，正值堂中做弥撒念经之际，有领事官及外国人公同诵经，其三人开口大骂。当经狄领事官送文书于天津道台，至今亦未曾办理。又有一贼匪，盗砍领事官地面树株，当经报知天津道台，亦未办理。况且津郡匪徒旧习又萌，常常在街市之上辱骂外国人，是皆由于地面官不管之故。若如此放纵，其胆日张，不难风波又起……

“正定府戴主教来函，内称‘我心甚为忧闷，因所遇事虽细小，若地方官作主秉公一言，事即完结，奈多不肯，必须回禀大国钦差及烦琐中国大吏。如定州之西板村有一恶徒名朱洛恒，本系白莲教之头目，包藏毁坏天主堂之心，无恶不作。现在教堂教民受其窘困，危在旦夕，再不能破其词讼，夺劫冒犯欺凌之牢，是以无奈，缮有节略二纸呈阅’等语。再，戴主教有言，定州之官若再不得京都文函飭谕，则该主教不但身无所逃，命必尽于冬令矣。且戴主教人颇和平，亦颇良善，则其所言皆实，毫无疑意。是以本大臣即希贵亲王查看节略之情形，飭知定州之官，囑其妥速办理可也。”

《西湾圣教源流》第五章《圣母圣心会底副主教驻节西湾子》第五节《巴司铎任蒙古副主教》载：

“到了这一年(即一八七四，二，六)。德、费(RR. PP. De Vos et Verlinden)二位教士，从南壕堑起程，往西方蒙民处开教。……司铎驻南壕堑，只四年的工夫，那传教工作，就传开到很远的地方。过了几个月，即本年八月十五日，南壕堑底新大堂落成，主教举行祝圣大堂典礼。

“德、费二位司铎既去西方开教，南壕堑该有驻节底本堂，故此升任马司铎(R. P. Meyer)为南壕堑本堂司铎及西区底区长；马公自一八七零年已管理西湾子修道院，他赴西区时，有四位攻神学底大修生也随他过了南壕堑，为能继续读神学，所以马和王(R. P. Ottens)二位司铎共同管理南壕堑，同时也教授大修士。才来的方司铎(就[是]将来的方主教 R. P. Van Aerselaer)升为西湾子小修院院长。自从本会承管蒙古教区，直到一八七三年，西湾子底本堂职务，常是主教府理账司铎和一位幼年司铎代理，以后因为教友慢慢地增多了，该管的事情也多了，梅司铎(R. P. Muiteinan)奉主教委任就做了正本堂，时在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九日。次年季司铎(R. P. Guisset)接他底职位，季公三年的工夫，做本堂又兼任理账底职责。以后吕司铎(R. P. Rutjes)又做了西湾子底本堂。

“一八七四年，主教在附近村庄建筑了四个小堂：就是五号，小北沟、大北沟、头道营子(门扇川)，令魏、赵(R. P. Wilryckx et R. M. Tchao)二位司铎管理这里四围各堂口；他二位管三十四个村底教友，好几年的工夫，为那些信友，一齐下了大辛苦。”

^① 此札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发给按察司范的。由按察司转发清河道，由清河道转发赵州，再由赵州转发高邑县。

第六章《巴公为代牧时底经过》载：

“自从孔主教去世以后(一八五九)直到一八七四年,蒙古教区没有代牧,因为味增爵会底领袖有了意思把这个教区让给他会承管。传信部底红衣主教也向我会声明那时没有代牧的原由。一八六四年,红衣主教向南会主声称:‘关于圣母圣心会教区底事务,按明智的办法,当有该会底一位会友管辖该区;那一位虽不是主教,到底是代主教权位的。’这样,南怀仁、司牧灵、韩默理、巴普贤四位自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四年统理蒙古教区,称为副主教。……以后传信部……看着圣母圣心会在本国兴旺,九年中,也派二十二位会友到蒙古去,所管地教友总数也加增了,保守进教的也不少了,在蒙古传教的希望也厚了,所以在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选任巴普贤司铎为阿德拉(Adras)主教及蒙古教区底代牧。”

1875年 德宗光绪元年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旋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降生后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新皇帝嗣立,国号光绪元年。……皇太后垂帘听政。是年有仁慈贞女若干名不以津变为惧,由法来华,即在紫竹林新建之仁慈堂内居住。不久开设养病院二所,一所留养西洋病人,一所留养中国病人。前此,西洋兵弁泊于津者,偶染病恙,无人服役,困顿而死者甚多,至斯俱得其所。自此院开设后,为日无多,即大著功效,沾其实惠者屈指难计。院中又起小堂一所,长可十丈,正面妆饰亦颇轮奂,专为病院之用。每年至院内之施药局领药裹伤者不下三万馀人,收入病院医养获愈者亦七、八百名之多。”

《西湾圣教源流》第六章《巴公为代牧时底经过》第一节《巴普贤晋升主教》载：

“巴公做代牧底委任状,次年二月才颁来,教众即热切预备圣主教底庆祝。祝圣底那一日在西湾教史上当然是一很荣显地纪念日,但因为各样枝节,至六月六日才得举行庆礼。西湾子神长辈延请江主教(山西代牧,Mgr. Mocoagatta)来主礼圣巴公为主教。江公虽年老力衰(六十四岁),并未推脱,立即回报:于圣体瞻礼日要到西湾子。教友们就老早分工彩饰了大街和大堂:村门前建一牌楼,自村门至大堂,也搭有若干牌楼;在大堂里,除灯彩外,还有许多缎幛和旗帜;正祭台后面高悬一幅油画圣像,系百夫长用长矛刺耶稣肋旁,此像乃比国一位著名技师底作品,赠送这里教士的。修道士也预备了咏唱圣主教底经文。”

“到了圣体瞻礼,西湾子总堂布置就绪,有两位司铎和会长,连别的一伙教友,骑马去欢迎来宾。忽然有一位骑马差人来送信,他带来宣化本堂底信,信上说:‘江主教到了宣化,也有圣母圣心会底两位新教士,即蒋、白(RR. PP. Cheula et Depeter)二位司铎,内有一位病在宣化,故此今天他们没有前来,待明天才来。’客人虽然没来,教友并不败兴,过圣体瞻礼比往年还热闹。四围村子底教友和教外人都来这里赶瞻礼看热闹,街上也挽扎的很体面,所以圣体游街格外礼节隆盛。当日有一位司铎和十个骑马团先去张家口为接客。他们第二天进了口,预备两个轿子,一为江公,一为微疾的新神父,还有两辆轿车及若干毛驴骡子驮客人底衣箱。十个骑马人员为前站,头里走。到了榆树林子,遇见三十个骑马的欢迎团,穿著大袍子,戴著红缨帽,从西湾子下来了。他们一到,下马亲权,然后又上马在前头走着。离总堂不远有许多神职班恭候欢迎,以后他们在轿子左右侍卫前进。赶来到村底门牌楼前,有巴公和季、韩二位司铎,还有修道士和辅祭的穿著小白衣,都在那里欢迎。江公向巴公行亲抱礼,那时火炮与爆竹齐响,大堂底钟声、音乐会底乐声,以及信众高声欢呼庆祝之声,都震荡了耳鼓,响彻天空了。在祝圣主教底日子早八点,会长和辅祭底修道士,并由各处来的神职班,都来接主教;他们作游街式地往大堂进行,街上人山人海,颇为拥挤,甚至难(矣)[以]前行进堂。行祝圣主教大礼时,各团体人员本有预定地点,到底教友这么多,大堂再大过十倍,也难容那进堂底人数。堂中教众都热心诵经。祝圣礼完,新主教巴公穿著主教底祭衣,拿著权杖游堂,举行头一次降福教友。修道士热烈地高声唱《感谢天主诵》;教众心里大为感动,因为如今在西湾子又有了他们底新主教。赶江主教给新主教行亲抱礼时,有

许多的人,在堂里也禁不住的大声欢呼:‘万岁!’

“赶到圣伯多禄、保禄二位宗徒瞻礼,巴主教在本处大堂做头台大礼弥撒,以后往本区其他各堂口传赐天主庇降福。他这么二十年的工夫,热切地统治了这辽阔地教区。”

1876年 光绪二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六章《巴公为代牧时底经过》第一节《巴青贤晋升主教》载:

“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巴公亲手圣了三位神父,过了几个主日,又圣了一位神父;这四位即陆殿英、武刚、郑牧灵、贾阐道,他们终身布道于本区。”

1878年 光绪四年

《献县天主教志》第九章第二节《医药卫生》载:

“1877—1878年间伤寒病流行,法籍戴遂良^①神甫将总堂药房加以扩充,并开始采用小药包,在药包上注明用法,由传教员带往各处,使用数以千计。”

1879年 光绪五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一章《北堂迁西什库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一、天主教的五个区域

“在梵蒂冈大公会议时,圣座曾考虑在中国建立圣系统,曾请参加大公会议的中国宗座代牧研究这个问题,但没有结果。……一八七四年传信部曾研究过解决这问题的可能性,结论是不适宜,只求教宗庇护九世批准逐渐达到目标的决定,就是将中国分为教省。

“一八七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传信部部长以谕文执行这种决定,依此:

“第一区:直隶(北、东面、西部),满洲,蒙古。……

“共二十七代牧区。”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一册《河间 范家圪塔》的来历》载:

“现今的范家圪塔,居民众多,远近驰名,为河间东境的第一大堂口。溯其由来,不过但有一百几十年的历史。第十九世纪以前,阡陌纵横,南东其亩,但是一片庄田,并无一家一户。相传于嘉庆年间,南司徒村出了一位姓孙的御史官,手下有一个家人^②,原籍山东,本家姓范。……过了若干年后,孙御史上了年纪,告老辞职,离开北京,又回了南司徒本家。……因为这个本家姓范的家人多年供职(欣)[辛]勤忠信,孙御史为报答他的功劳,特开除他的奴籍,许他归宗姓范。除此以外,又将南司徒村北的良田数顷,即今范家圪塔的地址,白白地送给他……

“那个姓范的家人自幼当差应役,对于稼穡之事一窍不通。又因为地段宽大,共计数顷,他自己一人也难以料理,所以雇了些佃户代为耕种,但是到收割的时候平分粮草。那些佃户有些离家甚远的,来往不便,且有碍于工作,所以姓范的地主在庄田中央盖了若干土房,为安插那些佃户。佃户越聚越众,土房也越修越多。不多几年,聚集了一二十户,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因为地主姓范,所以四外的居民皆称之曰范家庄子。

“那姓范的地主原是山东人,家中有一胞兄,因度日勤俭,贸易营商,到这时候已经成了富户。……

^① 戴遂良(1856—?),字尚志,法国耶稣会士。

^② 原随文注,是当时奴才的别名。

决意要把胞弟赎回，得还本家。……到北京后，向人一访问，听说孙御史告老还家……就出京往河间县南司徒村来了。……见了他的胞弟，喜不自胜。……劝他的胞弟跟着自己再回山东。他的胞弟早就有这个心意，所以一经他胞兄说劝，立时将庄田归还故主，跟着他胞兄回家去了。

“……孙家将庄田收为己有以后，命自己的仆役耕种照管，不用那些佃户了。佃户们各回本家以后，孙家将庄子上的土房拆毁推倒。向日的小村庄忽然变成了一个土岗子。从此以后，四外的居民不称他为范家庄子了，都称他为范家圪塔。口传授受，以至于今。此该村名称之所由来也。

“过了若干年后，至咸丰中叶，有一姓王名天顺的穷苦人搬家来到了张各村，住亲戚家的房子，自己服苦度日。因张各离范家圪塔不过六七里路，每到春冬两闲不能为人佣工的时候，王天顺屡次往范家圪塔来拾柴禾。常来常去，心中生了一种计划。……拿定了主意，就托人向地主舒通说合，也没有费事就买了那个土圪塔，连四外的庄田，共计八亩，花钱不多。王天顺甚觉满意。到底光他一家人住在那荒田野冢之间，日久天长，不免的有些孤独。所以王天顺去劝他本家姓王的穷人也往范家圪塔来往。过了不多几年，王姓连外姓的穷人聚集了一二十户，又成了一个村庄，仍以范家圪塔为名。

“他们一二十家穷人都安分守己，自食其力，彼此毫无纷争，度日甚觉安乐。不料过了几年以后，有交河县王留信村的一个强盗姓王名造，因被人告发，怕受刑罚，遂高飞远扬，逃到河间县来了。某日走到范家圪塔村中，见那一二十家穷人皆贫无立锥，度日艰难，心中暗想：这一班穷命鬼，不难入我的圈套。我要钩引他们帮着我作那不下本钱的好买卖。主意拿定了以后，就花言巧语的欺哄村中的居民说：‘你们贵村中如此和平，人人都安居乐业，我也要搬家来往。不知众位肯收留我吗？’乡下人心地诚实，不知道他的奸计，就满口应承，收留了他。王造贼心不改，在范家圪塔小村中一得了存身之地，就按着他预定的计划，慢慢进行。白天他就对着那些穷苦的乡民委曲婉转的勾引，夜间他就出去劫道，抢夺行旅的财物。原来人性败坏，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范家圪塔的乡民见他整天家空闲呆坐，钱财竟来的那样容易，不由的就都眼热。于是听他的计谋、跟着他干那不正经勾当的一天比一天多。统计一二十家居民中守正不阿的，不过只有三家。小小的村庄，竟成了一个出名的贼窝子。

“原来范家圪塔离子牙河不远。自从该村的居民被王造勾引的变成了土匪以后，旱路劫车、水路劫船，来往行人大受其害。被劫受害的客商屡次往河间城里去告状，日久年长，河间县长以任职所在，看着非重惩办那些土匪不可。到底不动声色，先差人去暗中探访，将各土匪的姓名、年岁、相貌全访问清了以后，忽于某日夜间领着若干马队及全班皂隶马快，将范家圪塔小村层层围起来了……

“范家圪塔的居民既然十有八九都干土匪的勾当，经官家发兵剿拿以后，死的死、逃的逃，连土匪的妻儿子女也都分散流离要饭讨食去了。连守正不阿的那几家良民，因怕被挂累，也都搬到亲戚朋友家去了。第二次成立的小村庄，忽然人烟绝迹，房倒屋塌，又成了一片土岗子。过了好几年以后，那几家良民见大难平定，先前的盗案无人追究了，才敢返回故里，修理房舍，为耕种久已抛弃的庄田，生活度日。以后又有别的穷人贪住处的便^①宜，也去建房居住，愈聚愈多，不久就有了十四五户人家。

“以上所述是同治年间的事迹。延至光绪三年，亢旱成灾，籽粒不见，范家圪塔村中都是些仅能糊口的穷人，谁家也没有馀一馀三的存粮。所以都分散流离，有往外乡去讨饭吃的，有往天津去领官粥的。庐舍虽依然存在，然居民寥若晨星。范家圪塔小村又几乎灭绝了。及至光绪五年，即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该村的居民才有几家回来的。回家后，虽然雨水不缺，田原滋润，五谷杂粮皆可以播种，到底看看家中四壁萧条，农器牲畜一样也没有。个人都徒手空拳，如何能开荒种地呢？村中有一妇道人，人皆以王四太太称之，见别人都想不出法子来，他就走到一个奉教村中，见了当年在河间县传教的贺乐耽司铎，求借一匹小驴，为能耕田种地，且说：‘若蒙神父垂允，我们十来家人都一齐奉教。’贺司铎见他奉教的为头不甚高超，就婉言拒绝了。到底王四太太回去以后，贺司铎改变了意见，心中暗想：一匹小驴值钱有限，若能藉此机会添几家子奉教的，花得也不算不值。过了几天，就打发了一位先生往范家圪塔去走一趟，看看那些穷人是否诚心奉教，将来有成堂口的指望与否。先生奉命前去。一

^① 原随文注：音偏，下平。

到范家圪达,村中的人喜出望外,接待的很有礼貌,且明言他们都决意奉教,十几户人家没有一家不愿意的^①。贺司铎的先生看着他们是些忠厚老实人,为奉教毫无阻挡,他们愿意奉教的话说的又十分坚决,看来有大盼望。回来向贺司铎一学说,贺司铎非常如意,就打发他再回去,在范家圪达留居几时,给村中的人讲明道理,教他们学经保守。又给了他们一二十吊京钱,教他们自己买驴耕田种地。从此以后,他们十几家人信奉圣教的主意就越法坚固了。

“俗语说得好,无针不能引线。为使坐于死亡之影中的外教人认识天主、信从圣教,不用引子也是办不到的。贺司铎用一匹小驴作引子,引领着十几家外教人弃邪归正,成了一个全村奉教的好堂口。以后又提携栽培,使之逐渐发达,至庚子年间,竟成了数千教友的避难所,于开教之手续上,可谓能循循善诱者矣。然贺公之功德,昭昭在人耳目,无烦记者赘词表张。如今该记录的是范家圪达的望教人为学习经言要理不辞烦难,始终不懈的好表样。他们十几家人经贺司铎委派的先生一开导指引,知道为领洗进教,非先明白道理、学会经文不可。所以他们立时下手在这两件事上下工夫。虽然他们都是些庄稼人,未曾上过学、读过书,为学经言要理甚不容易,到底因为他们盼望进教的心盛,所以也不败兴失望。幸亏了他们当中有一个姓纪名连登的人通文识字,所以先生在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先生学习,先生去后他们就跟着纪连登学习。纪连登拿着贺司铎给的经言要理本,高声念一句,众人就一齐重一句。夜以继日,诵读不倦,不但春冬两闲的时候如此,连耕云锄雨的忙时候也是一样。往往有两三人一齐下洼锄地,锄过两三遭后,在地头上暂且休息的时候,也是彼此口递着学习经言要理。因为他们学的用心,又恒心不懈,所以不到一年就把早晚工课、四本要理全学会了。以后经贺司铎亲自考问,见他们应对如流,都熟习通达,就给他们付了圣洗。时在前清光绪六年,即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年。此范家圪达信奉圣教之由来也。”

1880年 光绪六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一章《北堂迁西什库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二、北京的第一区会议

“为此田主教 Delaplace 以主教中资历最深,乃召集了第一区的一总宗座代牧,于一八八〇年四月十八日开会。……正定的遣使会士戴主教 Tagliabue, 蒙古的圣母圣心会士巴主教 Bax, 满洲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杜主教 Dubail, 直隶东南部的主教出缺,由 Gonnet 副主教^②代理,每位主教带着二位神父至北堂举行会议。

“……会议的决定分为三大项,它只指出,不加详细讨论。

“第一项,论本地神职界,有五种命令。

“第二项,管理教友,有二种命令及请求建立一座专务祈祷及克苦的隐修院。

“第三项,统一传教的方法,有二种命令。

“会议历时三个星期,由一八八〇年四月十八日至五月九日。”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十五《中华本国教会的复兴》载:

“中华天主教还有近乎四十个女修会,或是善会,会员完全是生长中国的女子们^③。……一八八〇年,河北正定创立了若瑟会。……一八九四年,热河创立了圣母无染原罪会。……一九〇一年创立的,是河北永平的圣母会。……一九二九年,是……河北安国的德来院。……一九三二年,是河北献县的圣母救亡会和河北永年的圣神修女会。”

① 原随文注:云云。

② 即鄂尔壁,时任法国耶稣会直隶东南教区区长。

③ 原注:这些修、善二种会大抵都只限于所属主教区内的会,完全由各该教区的教长负责监督。

1881年 光绪七年

《山东教案史料·冠县、邱县教案》“梨园屯与邱县教案”辑：

5月3日(四月六日)法国公使宝海致总署函称：

“山东梨园屯地方，突有匪徒将教堂门打坏，率人闯进，在堂院中作戏耍玩意。当有教民数人见此，不能拦阻，著急即向该匪徒理论，即被殴有重伤。又邱县地方亦有此等事故，教民之妇女小儿均被打伤。传教士即至县衙将匪徒殴打教民各事相告，县官不为管理，置若罔闻。本大臣意今函达，贵衙门自必设法禁止了结。”

6月18日(五月二十二日)总署致法国公使宝海函称：

“兹于四月二十七日，准山东巡抚函称‘……查山东省城法国教堂充主教者系顾立爵，已历年所。每遇民教涉讼，接有致函，无不随时作答。一面饬地方官照约持平速办，从未稍有齟齬。顾主教客春曾往山西游历，省堂主教马天恩代办。旋於深秋返东，并无有李园屯匪徒将教堂门打坏，及邱县教民妇女小儿被打情事。既未据地方官禀报，亦未接教士函会。……至邱县仅查有花户程光合拖欠漕粮一案。程光合之子程二羊系习天主教，案经该县审结具禀，并无妇女小儿被殴之事，亦未接有教士函会。……’等语。

“续于五月十九日，又准山东巡抚函称‘据邱县知县刘嘉树禀称“遵查该县词讼，每逢告期，均系当堂亲收，间有随时喊控，亦即立刻堂讯。检查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该县到任起，至本年四月止，并无前项教民被殴来县具控未为准理案据。溯查前任廖令旧案，亦无前件卷宗。兹蒙饬查，理合禀覆”等情。除批饬“嗣后如有民教涉讼，务须迅速秉公办理，不准稍事稽延”外，特再肃覆’各等因前来。本衙门准此，相应据函布复贵大臣查照可也。”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

6月3日(五月初七日)美使安吉立为请免摊派耶稣教民迎神赛会等费事致奕訢照会称：

“前阅得贵亲王于同治元年正月间所发谕单一件，系为使奉天主教人民，于其不合教规之迎神演戏等事免出冗费等因，实为公平优待之至。……想此谕系专为天主教民，使其得以免出一切冗费。现据本国奉耶稣教教士声称，此等冗费亦系与其教规不合，往往有最忠厚习该教人民因此迎神、演戏等事颇受烦扰。耶稣与天主教事同一律，谅贵国不肯不于耶稣教民一体优待，是以敢将此事照请贵亲王查核。或为耶稣教传教习教之人再发谕单，或转饬地方官照发此谕，抑或另设别法办理，惟期得使耶稣教民亦受天主教民得受之益。果尔，则耶稣教民自必同深欣感，并益征贵亲王多年办理传教之事甚为周备公允也。”

《教务纪略》卷三下《章程》辑：

6月13日(五月十七日)清总理衙门咨北洋大臣《耶稣教照传教谕单内事宜一律办理》函称：

“今准美国安大臣照称前因相应咨行通饬地方官一体知照，所有同治元年本衙门所发谕单事宜，无论天主、耶稣两教，均应一律办理。光绪七年五月十七日咨。”

1882年 光绪八年

《山东教案史料·临邑、沾化、冠县、商河等县教案》辑：

1月22日(光绪七年十二月三日)山东巡抚任道镛致总署咨文附山东省教案已结清摺称：

“一、冠县教民王桂龄等被差送县责押一案。委员候补知县耿荣昌查得，邱县民程光合因拖欠钱漕，经县传案押追。程光合之子程二羊素习天主教，贿串同教之冠县人王桂龄赴邱县说情。王桂龄又邀同教之刘洛六即刘西长雇坐郝双魁轿车，行抵邱县，乘醉直闯县署喧嚷。该县出见，王桂龄等不服咆哮。该县将王桂龄等酌量责惩，同郝双魁一并递籍。王桂龄递至冠县，在保病故。经冠县验讯详报，并

将刘洛六等取保释放,案已早结,并无人续行控告。惟顾立爵所称‘左保元因见王桂龄已死,屡向教堂‘滋扰’一节,必须前赴冠县确查,方得水落石出。耿荣昌复又驰抵冠县,查得左保元与已故教民王桂龄居住之梨园屯村向有本处绅士公捐义学,义学后建有玉皇阁,并置地三十八亩,已历年所。咸丰年间遭匪扰后,学屋暨玉皇阁(殿)毁于兵燹。各首事无力兴修,议定四股均分,另图善举。该地三十八亩分作三股,地基作为一股。王桂龄等分得地基一股,执有分单,于同治八年间,转送教士建立天主教堂,并于教堂左近设堂供奉玉皇像。本年正月初九日,该村有玉皇神会,乡民雇得彩船小戏庆祝。经过天主堂门外,游人聚观拥挤,适将教堂大门挤开,堂中教民出而与较。其时人多口杂,有谓‘天主堂本系借用玉皇阁地基,将来重塑玉皇,还要送人供奉’之语。然亦不过空言争论,并未砸毁大门,亦无强迫教民住宅作戏子寓处,以及将土神送入天主堂情事。嗣经顾立爵在省向该县韩令告之。查悉前情,左保元等并无率众滋扰。而当时向教堂争执之人,即询诸在堂各教民,亦未能指定是谁,又未赴县互控,韩令未便因此微衅纷纷滋累。第左保元与习教之阎付东等同村居住,趋向殊途,彼此不免龃龉。剴切开导,并飭差查禁村民不准擅至教堂滋扰,阎付东亦不得恃教生事各在案。现复经耿荣昌传集两造,讯供相符。左保元虽未率众滋扰,究系好事,阎付东亦属恃教逞刁,分别薄责示惩。至该教堂地基,断令民教仍旧和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设立教堂,再议归还。取结完案。”

1883年 光绪九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六章《巴公为代牧时底经过》第三节《祝圣蒙古西南和蒙古东方两教区底代牧》载:

“那时巴公……就委派德明玉司铎(R. P. Alph os)为新教区河套地方底区长,一八八三年春,也委派吕继美司铎(R. P. Rutjes)为蒙古东部底区长。因此卜司铎(R. P. P. Boeck)接了吕公底职任,升了西湾子底本堂。

“一八八三年五月间,巴公向宗座提出建议,请分开蒙古教区为三份;传信部底部长认可他奏陈地理理由,于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十日颁行上谕,指定巴公为中蒙古教区底代牧(察哈尔),吕公为东蒙古教区底代牧(热河),德公为西蒙古教区底代牧(绥远、宁夏)。但谕旨于次年一月二日,才由电报传到西湾子。”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一章《北堂迁西什库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三、建立杨家坪苦修院

“田主教的另一项事业,为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座苦修院。”

“一八七〇年,一位著名的恩人,献了一笔款子,使田主教的这种希望得以实现。她是司都培伯爵 Stolberg 的千金司都培小姐——她父亲皈依天主教时,曾震动舆论——她将家产的一部分献给田主教,随她的意思,建立一座男女的隐修院。

“田主教乃寻找适当的人员,以符这位恩人的雅意。一八七八年六月,他写信给法国的好几座圣衣会会院,自以为必定成功,已在天津圣路易医院后边建立起隐修院;然而出乎他预料之外,他竟失败了。

“田主教失败后,乃停止已在天津开始的建筑。”

“田主教于是托当时在法国的樊神父 Favier 进行此事,他与好几座隐修院接触后,皆无效果,乃至七泉隐修院,终得所求。一八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他与院长签定约书,规定建立隐修院的主要条件。

“此后事情进行迅速,同年六月十一日,爱弗冷神父 Ephrem 及一位修士已至北京。选定建立隐修院的地点,为离北京二日路程西北的一村,名杨家坪。

“以后又来了几位神父及修士,帮助第一批来的。起初因为隐修院不能自己维持生活,困难重重,

乃买了一座满栽杏子的山及可开垦的山谷。最初二十年,北京代牧区当供给隐修院的经费。

“至于圣召,自起初时就相当多。隐修院在爱弗冷神父管辖下,能勉强维持下去。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成为分院,伯纳东神父 Bernard 被任为院长。以后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伯神父成为正式院长,隐修院乃取名神慰院,微小的种子已成为大树了。先设分院于日本,为法尔圣母院;以后又设分院于正定,取名神乐院。”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旋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当田主教治理北京教务时,传教之创设日见起色。其最著者,即圣若瑟贞女^①会与苦修会是也。缘西洋仁慈贞女为天津匪徒所杀,内地乡愚亦为流言所惑而甚恶之。且贞女服色皆从圣教修衣之制,内地之人不免诧异,故乡间之婴院、女学,仁慈贞女皆不能照城镇避埠之规模安心料理。田主教恐其各院久而渐废,特立圣若瑟贞女一会,以救其弊。入会之人皆系守贞之女,其节孀之有志者亦准入会,俱服本地朴素之服遣往各院,于教诲经言、抚育孤幼等事甚为便易。其总院则设于北京城内,修女等在内肄业。蒙主教准入会者,发愿后即往他院服劳。其院之数今已增至七八处之多,入会之人已有六十余名。总会费银乃法国某善女所捐,为数颇巨,可保此会久存是也。

“至苦修会之传入中国,亦系田主教创兴。苦修会士未入华时,传教士等于京西置得山林一区,四面以巖为界,周可五十余里。其中腴田无多,只宜树植。即于山麓暂起房屋数椽,俟苦修士至,再照本会修规起建。光绪九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洋历二月二十一日,有法国某处之苦修会长情愿承管此山,作本会友苦修之处。一月后即有苦修会士数人自法来华,营建苦修禁院。初时诸凡不备,艰窘异常。不久声名四达,即有多人求准入会苦修者。本会修士大司铎伯尔纳多^②蒙教皇擢为院长,旋升冠冕院总^③,得比主教之服制而无主教之权。现今院中已有苦修会士五十余名,大半皆系华人,每日照本会之规,于诵经祈祷外,俱力田苦作以自贍。

“绯衣宰相大主教西默阿尼于准定中国立苦修会时曾云:‘中华之幅(圆)[员]广阔,庵观庙宇遍于九(州)[州],其中僧尼道士行同无赖,既不自重,人亦轻之。今将圣教真苦修士遣于中国,如树高标,而僧道辈惑世诬民之虚斋戒,自必相形见绌。’今观苦修人克己力作,大主教之言,信不谬矣。苦修之人,每早按规出院,排成队伍,各荷锹钁。院总率众修士入山,剪除荒秽,疏凿涧溪,泉石林峦之美焕然一新。遂于山下起建禁院一所,局格宽敞,围以墙垣,修士在内安心苦修。一日众修士力作,有大石横路,欲移之而不能,爰于石上凿孔,实以火药,燃药轰之,訇然一声,远迹震动。遂有劣辈乘机播造流言。宣化县正堂闻之,亲来查验,始知其妄。苦修人攀留驹从,供以素斋,日暮宿于院中,宾主颇形款洽,自是无扰其静者。”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一册《河间 范家圪达的来历》载:

“范家圪达既然成了堂口,贺司铎就购买地基,为建造圣堂公所及男女学校。买后一盘算,觉该处的庄田价值甚低,远出乎意想之外。因想若多多买些贱地,以后雇人耕种,或租给佃户,虽年岁有丰歉之不同,然平均计算,也比放账行息得利更多,且更稳妥无虞,将来用田地的出产作传教的经费,不是极好的办法么?到底为这样重要的问题,贺司铎不得自专,所以将自己的意见呈明于当时当会长的鄂尔璧司铎。鄂司铎办事谨慎,接信后,不遽加可否。先往范家圪达去就地察验,然后才准如所请,吩咐贺司铎依计进行。贺司铎得了会长的准许,就将范家圪达四外的庄田由近及远尽量收买,数年之间共买了不下一、二十顷。起初买得有限,就雇用工人自种自收;到后来买得多了,就租给贫苦教友,平分粮草。到底起初几年因为置器具、买牲畜、雇工人、用先生费用浩大,每到年底将出入的款项彼此一比较,则见所得的利息为数甚微。以后又连年遭灾,凶荒旱涝,往往籽粒不见,更觉入不敷出。光绪九年即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阳历八月间,子牙河决口,不但庄稼尽被淹没,连范家圪达的房屋也全冲倒

① 原随文注:皆本地人。

② 原随文注:华姓范。

③ 原随文注:西音阿巴斯。

了。全村之中,但剩了十几间房,虽未倒塌,然已根本动摇矣……

“范家坨是新立的村庄,一来因村中的居民缺少经验,二来也是因为经济困难,没有垫土台子的财力,所以村中的房屋都是在平地上修盖的。……第二年春天,为一劳永逸之计,都不辞劳苦,先垫土台子,然后修房屋。贺司铎的公所、学房也全倒塌歪斜不能居住了,也按着一样的办法从新修盖。但因为间数太多,工程浩大,又因为除了公所以外,还要多修些宅院为安插种地的佃户,所以当年未能修完。到了光绪十四年,建筑之工方才告竣。自此以后,贺司铎一面招集佃户往范家坨来种地,房屋白住,种地的章程仍然如同平常一样——平分粮草;一面开设男女学堂,陶成佃户的子,使他们自幼受好教育,日后成好教友。居民越聚越多,教务也蒸蒸日上。一连好几年的工夫,又蒙天主降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佃户的日子过的都狠从容,传教的经费也省下了一大笔款项。贺司铎收买庄田的计划得了美满的效果。”

1884年 光绪十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六章《巴公为代牧时底经过》第三节《祝圣蒙古西南和蒙古东方两教区底代牧》载:

“……本年五月十八日,又在西湾子大堂祝圣了两位新主教。

“分开大蒙古教区以后,巴公在中蒙古教区还有八千七百二十个教友,十三位西教士,三位华籍教士,西湾子村有一千三百教友。自本会来蒙古传教,至分区那一年,计有五十二位本会会友来过西湾子教堂。”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施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大堂^①落成,田主教……即卧病不起,于是年洋历五月二十四日敬领圣教全礼而卒。……谨按田主教系法国阿舍勒府人,距生于降生后一千八百二十年洋历正月二十一日。至咸丰二年,降生后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升授浙江主教,后调任北京。……发捻为乱,中法订和后合兵共剿。田主教曾为随营司铎,不惟维持教规,亦且晓畅军务,率所属教民官兵指挥进退,每获胜仗,皇上屡加衔级以酬其功。又赐缴龙银牌各一面,凡拜会官员,皆佩于胸前。……及卒,各国钦使大员无不送葬,礼仪甚隆。……葬于正福寺,至今有碑存焉。”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章《天津教案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三、戴主教继董主教的位

“……光绪六年(一八八〇)遣使会总会长委任戴主教为特派员,巡视遣使会的所有宗座代牧区。他由南方开始,乃往上海,然后巡视北京,稍后乃返欧洲,作巡视报告。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十一月,经他多次请求后,终于得到了仁爱会修女,她们的第一位院长 Guerlain 曾领导工作多年。

“从此时起,望教的学校每年增加,教友的数字亦不断上升,光绪十年(一八八四)为二万五千零三十五名。不久,戴主教须到更大的教区作传教工作。”

第十一章《北堂迁西什库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六、戴主教为北京的宗座代牧

“田主教临死时,指定顾其卫神父 Coqset 为代理主教……

“一八八四年八月五日,教宗的诏书,将戴济世主教 Taglibue 由正定调至北京,他于同年十二月五日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正定,因为他上任时,正遇中法二国因安南东京为法国军队所占而交战,于是二国断绝关系。这次战事使北京教务发生恐慌,而实际上却毫无关系。无论由中国政府方面,或人民方面,教会都未受到磨难。”

^① 北京东堂,用天津教案赔款于1880—1884年建成。

1885年 光绪十一年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

2月6日……博白付译录北京主教来函^①载:

“顺德府前数月传播,惊闻有不肖之徒张贴揭帖,激发向称守分之民与教士、教民作仇。惟因顺德守令以此惊闻为末事,故已将此情节奉告责大臣。……果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夜间,有人堆柴薪于教寓大门,内有火药,半夜火起,经该教寓教士、更夫、邻佑扑救,而大门及门旁房屋均行被焚。”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一章《北堂迁西什库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七、北堂迁至西什库

“……都士良主教 Sarthou 一八四〇年四月二十二日生于法国兰特省大治地方。一八六一年七月一日进遣使会初学院,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升神父。在罗雪尔大修院任务四年后被派至中国,同治十年(一八七〇)抵达。他在北京代牧区曾任各种重要职务。当他为南堂本堂时,一八八五年正月十六日的诏文任他为米利非德的名义主教及正定的宗座代牧与戴主教的继位人。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四月二十六日,在正定由戴主教亲手祝圣……

“二十一、戴主教去北京后,正定代牧区的情形

“……在主教出缺时,代理主教梅慎思 Moscarella 管理代牧区。

“……都主教……任命梅慎思神父为副主教、账房、修院院长、若瑟修女会的会长。这是前任主教仿效田主教在北京所立的。只有一小分别,即正定的若瑟会修女属仁爱会修女管辖更久。

“都主教支持前任主教动身前有意将代牧区南部由家庄^②分出,以形成新区,其中心为顺德城。

“都主教命家庄的总本堂包儒略 Bruguere 神父在顺德城买地,以建筑圣堂及神父住所。

“城中的文人及绅士反对包神父在城中买地,然而因有条约,终能成功。

“这年,都主教去巡视五区,记录每区的情形及需要……

“我们列出都主教对将成为宗座代牧[区]的二区如何想法。

“1、赵州区((一八八六—一八八七年):‘这区为老教友区,为此信仰根深蒂固。然而除了几处真热心者外,其他各处则多斤斤于世物。’

“2、顺德区((一八八七—一八八八年):‘这区给我的印象大都良好,教友只有二十年的历史,但守规蹈矩,主日休工,进堂念经,虽然教友穷苦。特别钜鹿的教友,性情虽粗野,却很热心,若善加照顾,这区可能很好。在这区的传教士,当克苦大方。’”

1887年 光绪十三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一章《北堂迁西什库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八、天津的圣路易学校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间,戴主教在天津为日益众多的西洋人子弟设立了一座学校,取名圣路易。……起初有二位神父管理它,是刘克明神父 Guilloux,后为遣使会的省会长,及武致中神父 Guerts,即来日永平代牧区的武主教。当时的课程为法文、英文及商业各门,这是为当时学生独一有用的学问。圣路易学校后由圣母昆仲会接管,他们因北京遣使会士的邀请,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抵

^① 2月6日(十二月二十二日)俄使博白付为译送顺德广州等处主教来函事致总署照会附件一。

^② 原文如此。下同。

中国,成为北方著名的学校。”

1888年 光绪十四年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一册《贞女李苏撒纳致命传略》载:

“贞女李苏撒纳,年二十岁,献县城西南南立车村人,于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生于新奉教人家。其生平之嘉言懿行及其为保守童贞牺牲性命的各样情节,俱是他邻家的两个热心贞女一名王玛利亚、一名王玛尔大亲见亲闻亲口向本堂德、萧、顾、狄、席五位司铎述说的。德尼师司铎曾亲笔记录,其遗稿至今犹存,业已呈交于调查致命案件的委员手中。萧若瑟司铎曾据实撰述,于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寄至上海徐家汇,登载于《圣心月报》。此二位司铎所述各节,因同出一源,彼此对证,若合符节。故此传记之确实,毫无可疑。”

1889年 光绪十五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六章《巴公为代牧时底经过》第四节《西湾子村底教友和他底传教工作》载:

“一八八零年间,有好几家教友迁居他方。因为西湾子民稠,田地不多,故此有迁居到西方黑麻胡村的。神父往返的去劝勉他们并传恩赐圣事,他们底热心生活法也引领附近居民奉教。巴公看出他们底热心来,就在一八八九年指派一位司铎为黑麻胡村底本堂。又因为他们有迁居到临近地方的原故,在黑麻胡底南方和北方(张北县周围地方),又成立起几个大堂口来。

“又有几家教友,移居到东北方去。他们出去二百馀里,同五号和西营子两村底几家教友一同落户在平定堡村。因为那里离西湾子较远,起初神父没有多去传恩赐。到了一八八八年,巴主教和何(齐)[济]世司铎(R. P. Heirman)偕往平定堡,住过几日,就留下何公为那村底头一任本堂。这些老教友后来又做了别的堂口底根本,至到如今在黑土洼已有六个大堂口,平定堡竟做了他们底总堂。

“至于往西那一方面,教士在土木川开教,到一八八四年,土木川有了头一家教友。为这一川地方,巴主教也请了西湾子村底两位传教先生,即李秀和王庆。他俩在那里多相帮传教,也好几年给张维祺和南怀义两位华铎尽职,作了传教先生底模范。巴公这么样衔结各堂口,往东往西传扬圣教。到老年时,主教还绕了好几次中蒙古教区。他从西营子到岱海,常路过七苏木滩,也把这滩焦虑在心,因为这一滩地方没有教友;慢慢地因着刘振灵司铎(R. P. Rubbens)底劝勉,有了几家进教的。巴主教最后的一次出门,还是到七苏木滩,到一九零零年,已经有了几个教友村子。后来有西湾子修道院产出的司铎(其中有本西湾子人)和别的教士来此传教。居民有大同、阳高、四平府迁来底人,慢慢多有信奉圣教者。至到现在,七苏木已为一教友滩,也为集宁教区底中枢,还是西湾子村底一位主教樊恒安和数十位华籍司铎热心掌握。”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八章《宗座代牧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六、传教区的组织(省会长及宗座代牧区)

“……这种组织直至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这年起,遣使会派驻上海的主任神父(旧名账房神父)享有昔日澳门省会长的职权,因此中国全国只有一位省会长,亦只有一省;但宗座代牧区则为一会院,院长就是宗座代牧。”

《山东教案史料·冠县、邱县教案》“冠县教案”辑:

11月30日(十一月八日)法国公使李梅致总署函称:

“昨准山东主教马函称‘山东省东昌府冠县梨园屯一案,于同治八年,该庄人民入教者甚众。经该庄首事人等公议,将坡地玉皇庙宇义学按四股均分,各出情愿。该庄民人分得坡地三十馀亩,教民应分得地基三亩馀,立有分单可证。而教民无力修盖,即将此地基献于传教士梁司铎名下修盖教堂,共破烂住房十馀间。至同治十二年,民教为此互控。蒙前任韩公按照无强公议讯断,有县卷可查。自此民教

安谧,毫无异言。于光绪十三年春间,已逾十三年之久,费教士在该庄置买砖瓦木料,欲重建被坏教堂房屋。业已动工数日,突有该庄恶棍左见勋、刘长安等纠众数百余人,各执持器械,胆将木料、银钱等物抢掠一空等因前来。本大臣查,似此案件,甚为可惜。而堂基本料被抢物件,至今仍未退还。应希贵衙门转饬该省官员,将此案详查审明后,应将地基木料及被抢各等物交还教堂查收,勿再稽延为荷。此布。并将分单及冠县知县韩令移文一并附送查阅可也。”

所附冠县致教士文及民教互立地亩分单载:

“特用府即补同知直隶州东昌府冠县为移送事。案:据敝县河北梨园屯庄民人阎立业等与王贵令等互控‘拆毁义学庙宇,盖立天主堂’等情一案,当经敝县移准贵主教将分单及历年完纳银米串票移送过县,复经敝县提集两造,讯取确切供词,核与分单相符。此案既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控于后,殊属不合。除将滋事之阎立业等分别责押示惩,并经河北文生朱升堂等公恳保释外,所有前项分单、串票,拟合备文移送。为此合移贵主教,烦查文内事理,希将送去分单、串票等件分别查收赐覆,备案施行。

“计移送分单一纸,串票八张。

立清分单

冠邑北境梨园屯圣教会、汉教公因村中旧有义学房宅一所、护济义学田地三十八亩日久年深,风雨损坏,墙垣坍塌,无力修葺,今同三街会首、地保共同商议,情愿按四股清分。汉教三股应分田地三十八亩;圣教会应分房宅一处,上带破厅房三间、破西屋三间、大门一座,计宅地三亩零九厘一毫,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邀同各街会首、地保亲面较明,并无争论,同心情愿,各无(忌)[异]言,亦无返覆。恐后无凭,立清分单存证。同治八年新正月十九日。”

1890年 光绪十六年

《山东教案史料·冠县、邱县教案》“冠县教案”辑:

5月22日(四月四日)山东巡抚张曜致总署咨文称:

“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承准贵衙门咨‘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准法国李使函,“准山东天主教函称‘东昌府冠县梨园屯一案,前经该庄首事人等议将坡地玉皇庙宇、义学按四股均分。教民分得地基三亩余,献于传教士修盖教堂。光绪十三年春间,费教士在该庄置买砖瓦木料,欲重建教堂,业已动工数日,突有该庄恶棍左见勋、刘长安等纠众数百余人,各执持器械,胆将木料银钱抢掠一空’等因。希贵衙门转饬该省官员详查审明,将被抢各物交还教堂查收”等语’并将分单及冠县知县韩令移文附送前来。查此案前于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准山东巡抚任文称‘该处教堂地基,断令民教仍归和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设立教堂,再议归还,取结完案’等语,是当日办理此案,本未定义断给该教士永远承管。兹据法使所称各节,似与原案未符。至所称木料、银钱等物被百姓抢掠,亦难保无借端讹索情事。相应照录法使来函及分单并韩令移文咨行山东巡抚飭属详查原断案据及此次闹事缘由,持平办结,并回覆本衙门可也,等因,到本部院。承准此,当经札饬确查去后。兹据济东泰武临道王作孚转‘据冠县知县何式箴详称:“遵查此案,于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五日,据卑县梨园屯监生刘长安等联名稟称‘该庄向有人天主教教民。前因教民将庄内旧庙改建教堂,庄民不愿,屡经涉讼。现在教民王三歪等复将教堂拆修,扩充地基,庄众忿怒,拟往拆毁教堂,索地修庙,理合稟报’等情到县。卑职当卷,查梨园屯距城一百三十余里,居民近三百户,入天主教者只二十余家。往时常来法人传教教士则住武城县境,并不在此。庄内旧有义学一所,学后有玉皇阁数间,学地三十八亩。嗣经兵火灾伤,义学既废,阁亦倾圮。庄众随将学田均分,教民占得地基、破庙、改建教堂,以备教士来时栖止。厥后民教性情不投,屡以索地建阁为词,于同治十二年及光绪七年先后两次[上]控,经卑前县韩令光鼎断令‘教堂建有年所,未便遽令拆还,民教仍归和好,暂行借用。日后教民购得地基,另建教堂,再议归还’完案。此次事

仍旧衅，戒恐争执滋祸，随即飭差查传刘长安等堂讯谕禁。詎该监生等递禀后并不候批，即各回归。卑县正在督差前往弹压之际，即准法教士卫保禄函称以‘据教民禀报，该庄民晋城县禀时，一面即用教堂砖料在堂内盖瓦房三间，装塑神像。教民因其人多势众，各自避匿。堂内衣物并有失少，开送失单’嘱即传讯严究。卑职立即亲诣该庄，查验属实，当先勒令停止，谕飭听候传讯公断，不得恃众滋闹。并经禀蒙檄委即用知县杨令耀林下县会同集案，讯悉前情。因查刘长安等理屈肇衅，本应究惩，姑念衅非一日，议出多人，从宽详革监生，断令遵限拆还教堂即据该教民等先后上控。卑职旋亦奉文卸事。早前署县魏令起鹏到任，传讯两造，供词各执。复经禀蒙檄委卑职回县会同魏令传齐全案，正在提讯间，即据王三歪等与刘长安等各联名呈称‘案经绅潘涌光美等开解调处，伊等均各悔悟，不愿终讼。伊王三歪等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归与该村为庙；伊刘长安等与庄众亦情愿另购地基，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至堂内失少衣物，并如数赔还，言归于好，各自安度’。一再研诘，均无异词。卑职与魏令因思：此等案件人众心齐，法既不能遍加，理亦难以周谕。此案刘长安等肇衅理曲，本应仍照前断勒令拆还教堂，惟念该民教等居同里闾，若令嫌衅滋深，难保不别酿祸患；既经绅耆调停，两造悔悟请和，莫如就此完结，以期民教得以互释前嫌，永远相安。随各捐银一百两为之津贴，督飭克日兴工，照旧教堂格局修造完竣。所赔衣物，并飭如数缴案，分别验明，谕令教民当堂具领，取结完案，禀报在卷。迄今案结将近二载，该民教久已相和于无事。此斯案启衅构讼及处和完结之实在情形也。伏查此案原系民教互争庙地，本未牵涉教士。迨后两造请和，卑职与魏令因该教士曾函嘱严究，即恐遽予息销别生枝节，当向教民诘询曾否知会教士。据该教民供称，系与教士商酌妥协，始来具呈。则是此案和结缘由，该教士固深知而乐从矣。且查案情初起之时，该处教士系属卫姓，比息讼则已易李姓。今则案结年馀，教士闻又数易，实无别项胶葛未清之件。兹奉前因，拟合录案详请查核详请咨呈，实为公便”等情到道。据此，职道复查无异，拟合据情详请呈请鉴核，咨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等情到本部院。据此，相应咨呈。为此咨覆贵衙门，谨请查照施行。”

6月20日(五月十日)总署致山东巡抚张曜咨文称：

“光绪十六年四月初四日准咨称‘山东冠县梨园屯教堂一案，该县业已断结，别无胶葛未清之件’等因，当经本衙门据咨照会法国李使去后。兹于五月初四日，复准该使照称‘接山东马主教函称‘卷查此案前任韩令移文，内有‘既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控于后’等语，并将分单、串票移交教堂管业，未有‘暂行借用’之说，可见教堂并未霸占地基，地方官屡以此地为教堂产业。此次知县禀内称：‘教堂失少之方桌子等物，教民王福祥业已请领。’查王福祥等并无失单，凭何具领？且教堂亦未令其具结代领完案。至新建庄外教堂、王福祥具领、潘光美调处，教堂亦并不知情，该县何得因伊一面之词私行断结，致教堂正案并未彻查了局？请行知山东巡抚转飭冠县，将此案妥速持平办结，银钱物料查照失单追赔，发交教堂；并于教士在原有地基上兴工建堂时，严示该庄恶民，勿许滋扰’各等因前来。查该使所称教民王福祥与原咨所称教民王三歪姓同而名不符，是否即系一人？其领去赔还教堂物件，有无如数转交教堂清楚？至‘购地另建教堂’一节，如果与教士商酌妥协始来具呈，何以教士业经允许于前，复又翻悔于后？相应咨行贵抚飭下该县，务将上项各节彻查速办了结，并开导该堂教士勿再在原地基上兴工建堂，致民教不和，别生枝节；一面再将办结情形声复本衙门，以凭转覆法使可也。”

《教务纪略》卷四上《成案》辑：

9月13日光緒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洋大臣札天津海关道《深州等处教民应试晓谕廩生出保》函称：

“据法国总领事林椿面呈献县传教士葛光被禀词一件，又教士呈递节略一件，系为‘深州、饶阳、武强、安平各州县教民应试，廩生以该童生习教，不为出保，有阻上进。乞札行各州县晓谕，并无不准教民考试之例’等情，到本阁爵大臣。据此，除行深州并所属各县查明，剴切晓谕各廩生‘遇有教民应试，一律代为出保，以免哂读’外，合行札飭。札到，该道即便查照，一体飭遵。”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旋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田主教卒后，正定府主教达里布^①奉教皇命升为北京主教。……皇上……欲令北天主堂与附近居民二千余户迁移他处，退出隙地，以便修造苑囿。……以西安门内之西什库赐与传教士。……钦赐库银若干万两起盖新堂，以易旧堂。……降生后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洋历十二月初九日，达主教举行祝圣大堂之礼……”

“达主教于祝圣新堂后，年虽已迈而矍铄如故，犹可多年治理教务。不意甫逾一载即卧病不起，于光绪十六年，降生后一千八百九十年，洋历三月十三日子正二刻，恭领圣教全礼，卒于新署。属下司铎人等皆助善终焉。按达主教系法国艾斯诺府人，距生于降生后一千八百二十二年，于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入华。先在塞外张理厅西湾子村传教。后因教皇以塞外教务派比国圣母无玷圣心会修士掌理，擢达主教为江西副主教，后升直隶正定府主教，复于降生后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升为北京正主教。……皇上酬其劳绩，赏戴二品珊瑚顶戴，乃国朝从来未有之旷典也。”

“达主教卒后未久，塞外承德府有匪徒揭竿作乱，十分猖獗。京师为之震动。缘该匪徒等创立邪党，自称在理之教，讎恨天主教人，即以灭天主教为名，处处焚掠屠戮，残不忍言。伪帜上太书‘替天行道’字样。数日内教民附近村落俱被抢劫一空，且有全行歼灭者。时有中国司铎林之桂圣名伯多禄者，被匪首拿获，缚于庙中，恣意残伤，磔首剖腹而亡。教民之遇害者，统计八百余人。由是塞外各匪同时俱反，谋为不轨。朝廷闻警，即派李鸿章训练兵马，保护教民，兼弭寇患。教士等给予地理图一纸，使确知教民住处，以便救护。数日内，兵马器械一律整备，大军进剿。先于沿途教民村落及热河主教堂内留兵把守，后将贼匪渐次包（卫）[围]，绝其去路。不及两月，擒斩首要，解散胁从，官兵大获全胜。承德府一带不久肃清……”

“前此数年，遣使会在天津设有学馆，专课西洋生徒。又于北京市南堂另设一馆，教诲中国幼童学习法国话语。未几传教士等欲广其益，特延法国拉瓦肋城圣母昆仲会不膺神品之修士来华授学。光绪十七年^②，降生后一千八百九十年，修士抵京。不久二馆大著成效：天津馆内西洋学生习学中、法、英、德四国文字，兼攻格致等学；其北京馆内，中国学生计一百余人，专学法文，其中可充翻译者已有多人。”

“达主教卒后，辅助司铎皆退逊不前，是以接位无人八越月之久。教皇特将正定府主教都若翰调补北京。按都主教未升主教之前，恒在京邸传教，未于南堂充当本堂司铎时，教皇擢为主教云。”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一章《北堂迁西什库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二十一、戴主教去北京后，正定代牧区的情形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六月六日，都主教接到罗马的谕文，将他调至北京，因戴主教去世后出缺。九月他带着忧心离开正定代牧区，因为五年中，他得到不少的愉快。

“都主教去后，梅慎思神父在主教出缺时，又管理教区。”

^① 原随文注：一名戴济世。

^② 原文如此。

第四编

清朝末年基督教的传播与庚子教案

(1891—1904)

1891年 光绪十七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一章《北堂迁西什库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二十一、戴主教去北京后，正定代牧区的情形

“……一八九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罗马的论文，委命包神父为治纳的名义主教，及正定的宗座代牧。他如前任主教一般，愿在正定主教座堂及教友面前接受祝圣礼。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十二月十三日，都主教由北京来祝圣他。

“包主教 Bruguier 于一八五一年八月十二日生于法国阿弗隆省南特地方。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入遣使会，一八七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升神父，十月五日抵中国，即去正定。

“包主教……的第一行动，是给董主教更相称的坟墓。他命人在离城数公里的柏棠公墓中造一小堂，将正定第一位主教的遗骸以盛礼葬在小堂中。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

11月19日(十月十八日)热河都统德福奏报热河教堂被在理教徒焚毁并恳催兵援剿摺称：

“据各路差探回称‘该邪教妖匪因与散罕贝子挟有仇隙，致将贝子府焚烧，该贝子尚不知下落。现时贼匪众多，实难确查’，并据称‘三十家子天主堂于十五日亦被焚毁，伤害教民数十名。闻该邪匪因迁安县邪教匪徒与天主教有嫌，邪匪由蒙古外藩等处地方勾来。此等妖匪夜行数百里，突然啸聚多人，并声言焚烧各处天主堂。现在贼势猖獗，约有二、三千之众。因道路梗阻，实难悉其确数，亦未能探得匪首姓名’等情。……同日据天主堂教士葛崇德亦禀报‘十五日被匪徒将教堂焚毁，伤毙多命，刻下延至八沟’等情禀请迅为救援前来。查口外各处教堂林立，曾经奴才叠飭各州县妥为保护。然此股邪匪日行甚速，突然外来，以妖术煽惑，陡聚多人，仓猝起事，该州县亦有迫不及防之势。闻此等邪匪与天主教、蒙古有势不两立情形，所关殊非浅鲜。”

11月23日(十月二十二日)热河都统德福奏报平泉州教堂被焚并无杀伤教民等情片称：

“接据平泉州知州文卜年、八沟营参将杨兆云、佐领补用队官防御双禄等禀称，于十月十七日夜间突有匪徒数百人窜扰州街，该员等当即督飭兵役防守监狱、衙署以及天主教堂，一面分带弁兵亲赴街外迎截。不意忽从州街西北角山岔间又窜出一股匪徒入街将教堂焚烧。彼时火光之下，贼势蜂拥，约有数千人。该员等因地方监狱紧要，兵力过单，不能兼顾。迨集团移兵驰救，匪徒纷纷四散，当因兵寡匪众，未敢穷追。幸教士人等已先闻风逃避，尚无杀伤，州街居民、铺户以及监狱、衙署俱未扰害。文卜年复往教堂验看火迹，见地窖内有幼孩尸身无数，均系无眼珠、无心，当交乡牌收存。并有童男女十六人，亦各昏迷不醒，交留养局收养。”

11月25日(十月二十四日)热河都统德福奏报在理教、金丹教起事反对洋教近情请添兵援剿摺称：

“本月二十二日……接准直隶提督叶志超飞函告称：‘由热河行抵六沟，即闻距六沟二十里聂门子沟地方，于二十日夜间，有贼匪二百数十余人将该处天主堂拆毁，杀毙随教人家男妇老幼多人，夺取马

匹。复闻探报朝阳匪徒现在修墙挖濠，搜索军器，且各处所掳枪炮甚多。此股金丹教匪虽名为毁天主堂，而携取马匹亦非善意。若为连合，其患不浅。现在所带兵勇甚单，恐一时难以得力。除迅催直隶督臣李鸿章分调芦台步队四营速至八沟驻扎，就近四面剿捕，并由骡驼运过山炮数尊，多带子弹，以便进剿外，相应飞函查照。等因，准此。’又据建昌县知县章奏凯稟称‘连日侦探伙匪情形。据探报该匪头目刘千骸、杨姓兄弟等分路裹胁，愈集愈多，近由建昌迤北平泉所属之夜不受、朱碌科等地方焚掠蒙民，并分窜各处焚烧教堂。当即会同练军记名总兵蔺福喜于十八日五鼓迎剿，至三官营子村外，遇该匪二、三百人，当即施放枪炮，击毙数名，余匪分窜。因官军过单，未敢穷追，稟请派兵迅急进剿’等情前来。

“奴才查此项外来伙匪，分股肆扰，与天主教堂、蒙古人等势不两立，声扬复仇，然抢掳枪炮马匹，其心实不可测。况马贼、土匪从中勾结，乘势抢掠，朝阳股匪业已修墙挖濠，谋为不轨。亟应厚集兵力，迅即歼除。奴才德福、提督叶志超往来函商，万分焦灼。查口外地方教堂林立，各处匪徒乘机寻衅，狡焉思逞。防则兵少难周，剿又激变可虑。其如何保护教堂，消弭匪患，奴才再四熟筹，实难确有把握。且热河系属直隶一省，口内口外州县毗连，各处均有教堂，恐一衅相延，尤为可虑。”

11月28日(十月二十七日)热河都统德福奏报平泉金丹教起事情形并请多派练军驰剿片称：

“二十四日丑刻，又准直隶提督叶志超飞函，内称‘刻下平泉情形较朝阳尤为紧急，不得不深为筹虑。现在金丹教匪虽自称善类，不抢害百姓，只与天主堂有隙，挟恨报仇，刻下焚毁天主堂数处，杀毙男女老幼多命，仇恨已报，自当解散，各安本业；而该教匪犹任意携取货物，平泉乡镇骡马已牵掳殆尽，如有不与者，即行残杀。名为假借，实系抢掳。已在三十家子杀毙数百人，聂门子杀毙一百数十人，平郡街内乡村亦杀毙二百余人。刻下商民人等纷纷喊冤，有称抢去骡马者，有称抢去货物、焚毁房屋、杀伤人命者，人心惶惶，如坐涂炭，有不聊生之势。……现在已获教匪十馀名，打毙一名……’”

11月29日(十月二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添兵迅赴口外合力剿办等情摺称：

“近日朝阳、建昌商民逃避来津者，细询此次贼匪突起，皆由金丹、在理两教与入天主教之民素不相能，口外州县辖境辽阔，大或七、八百里，地方官耳目未能周知，防范亦所难及。现在各处土匪响应，股数甚多，自非各路兵勇合力兜击，大挫凶锋，不足以示惩戒。”

11月30日(十月二十九日)热河都统德福奏报现在合力搜捕起事金丹教徒并保护教堂情形摺称：

“伏查此次伙匪始由敖罕旗猝起，煽惑裹胁，分股肆扰，到处勾结，乘机蠢动，造言摇惑，因而波及教堂。……所有滦平县等处教堂业已严飭该地方官妥为保护。奴才仍恐力有未济，又添派绿营官兵二百名在各该处教堂左近严为防守，总期保无疏虞。连日叠据探报，该匪等聚散无常，飘忽不定，于官军未到之处，仍肆胆勾结，党徒千百成群；声言寻仇教堂、蒙古，不害百姓……”

《清末教案》第五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十八、东北闹教、直隶朝阳、平泉爆发反教及民变案(1891—1892年)”辑：

6月28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致美国国务卿布莱恩(James G. Blaine)函第1330号称：

“为了让阁下及时了解中国的事态，我荣幸地抄呈一位医务教士从满洲寄出的一封信，报道在当地百姓当中传播的一些反对洋人的消息。

“当地人们竟然相信这样的谣言：洋人在收买虱子，蘸上毒药，然后在老百姓当中撒播开来，此外还在鸡蛋里下了毒药。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些更为荒唐的传闻已经引起了二十次闹事的话，我们还会以为人们是不可能相信这些谣言的。我的看法是，在满洲正存在着深刻的不满情绪。

“秘密会党是不满情绪的根子，据认为其中以在理教最为重要。反对洋人的揭帖已在满洲张贴。但是一位姓左的将领^①相信自己有保护教士的能力，他前几年在救济工作中同洋教士有过密切的合作。

^① 即左宝贵(1837—1894)，字冠廷，回族，山东省费县地方镇(今属平邑县)人，历任清朝千总、都司、游击、参将、总兵、记名提督。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在朝鲜平壤城头殉国，谥“忠壮”。

他是个回教徒。”

11月28日四贝致布莱恩函第1434号称：

“我荣幸地向你报告最近在(内^①)蒙古发生一场很严重的动乱。

“本月17日，一伙属于在理教的五百名闹事者在三十家子村镇以东30里(10英里)地方烧掉天主教民的几所房屋，并把男人及妇幼全部杀死。这一伙人随后又到三十家子将孤儿院、教堂和教士住宅一起烧毁，把村镇完全砸坏。被杀害的超过300人，其中有一个是天主教华人神父。这伙人从三十家子到(平泉州)八里罕地方继续进行蹂躏破坏。当地的天主教民带着孩子逃往深山避难，教士们的住宅被彻底捣毁。虽曾向地方军事当局吁求，但其拒绝干预。暴徒随向聂门子和老虎洞挺进。那里是天主教的中心。19日这股人来到昭通子，该处计有40家教民。20日，八沟西南65里处的奈曼旗遭到焚毁，该处住有80家教民。21日，这一股人到了偏桥。他们烧了这一带的房子。孤儿院里的所有孤儿被活活烧死。

“有一个住在百子站河(Petze—Chan—ho音)的教士被杀并被毁的情形。在理教的头头们原籍山东。除了法公使提供以上消息以外，我还接到驻天津领事的报告说，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已在(内)蒙古爆发。他说造反军已行进到长城以南，控制着热河，以东至海滨，以南至长城间的蒙古辖境。中国政府的军队正在集中，战争迫在眉睫。李(鸿章)总督已派兵6,000名前往战场。如果政府军被打败，预料叛军将向北京进军。领事还报告他在天津听说，一个美国工程师已在热河被杀死，另外还有一名比利时神父。看来被杀的不是比利时人，而是中国人。这伙造反者的人数多达10,000人，而且组织得很好。我的同僚们不大相信从天津传来的这些消息，倒相信起事是地方性的，同二十年来发生的其它起事类似，中国政府的力量能够镇压这次叛乱。在北京不可能取得此事的任何确切情报，这些乱子发生地大约离首都200英里之遥。

“写完以上这些，又接到天津领事的报告，说他已接到中国官方关于在热河附近出现麻烦的消息，并要求在叛乱平定前，外国商人和教士不要在那一带游历。所有美国教士均已离开遵化前往天津。在北京以东100英里的遵化有一个庞大而兴旺的美以美教会。”

12月31日四贝致布莱恩函第1451号所附12月26日法国公使李梅于北京散发的传阅信件称：

“我荣幸地送上在八里罕地方发布的一道告示的抄件。八里罕位于蒙古东部，行政上则属于直隶省管辖。在那里，上月发生过骚乱，许多天主教教民遭到屠杀；房屋、教堂、孤儿院和教会的其它设施又被毁坏，财物被劫掠。阁下可以看出，在派去负责镇压叛乱的叶志超提督到达该地区以前，当地官员纵容暴徒屠杀教民而袖手旁观。为了为地方官员的行为辩解，叶提督竟认为在理教匪徒的罪行在发展到某一点以前情有可原。除此以外，他再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了。他在给告示的作者、平泉州知州的命令中说道：‘这些不逞之徒宣称，为了报仇，他们定要消灭天主教会。他们已经一个接着一个地焚烧该州(八里罕)的所有教会的房子和(建昌县)三十家子地方的一些教会设施。在这些地方的教会机构的地窖里发现了无数幼孩尸骨。另外发现的二三十名幼女，则已由亲属领回。叛党并没有在地方上劫掠。谁都可以从这些事实中充分看出，这些匪徒虽然同这些教会结有深仇，因此迫不及待地进行报仇。当时教会设施既遭焚毁，又发现幼孩的残骸，他们所显示出来的敌意不是无缘无故的。然而，此段话前面的一段却是这样说的：‘这帮匪徒在乡村抢劫放火，残害了许多老百姓。这些是确凿无疑的罪行。’把两段文字互相比较，岂不令人发噤？我认为阁下，我的亲爱的同僚，用不着敦促，就会同意有必要提请总理衙门注意叶提督这种令人作呕的行径，并向该衙门指出，这些弄虚作假的辩白，对教会——叶提督是奉派前去保护的——将要产生的新的危险。这些辩白的用意，看来是要预先宽恕对基督教会犯下的一切罪行。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僚们会愿意参加向总理衙门致送一封集体的公函，指出可能随着此类行为而出现的种种后果，并要求应予矫正。’”

① 译者加，下同。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一册《河间 范家圪达的来历》载：

“贺司铎创业垂统，已经有了头绪，以后一往顺利，大见功效了。天主也就要调他往别处去创建别的功业了。光绪十七年，即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九十一年，直隶东南教区的耶稣司铎都返回献县总堂，名为歇伏，其实是为清理财政教务的各种账目，并避静补养灵魂的神力。同时也分派或更调各司铎的传教职务。及歇伏之期将满，某日于午饭席间，分职单发表了。理家司铎高声朗诵曰：‘贺若瑟司铎传教于广平等县，其范家圪达之遗缺著巴儒略司铎补授。’闻者相顾惊愕，以为事出意外。天主如此安排，也许是为教贺司铎纪念：现世乃吾人之逆旅，不拘何等事物，不可有所系恋。贺司铎南下就职后，传教救人，至天主降生一千九百零五年，功全德备，去世升天。其遗骸葬于广平县张洞村圣堂中，至今尚在。”

1892年 光绪十八年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

1月8日(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热河都统奎斌奏陈热河之乱在于洋教亟须先筹办法以弥祸乱摺称：

“惟法国教民要索之事甚多，报复之念綦切，屡据教士葛崇德开列在理教民稟请拿究，并谓营员有意纵匪，与彼为难，当经批候查办。现据平泉州知州文卜年驰报，该州乡约、社首联名呈称，州境沙陀子洋教民郭春秀弟兄率领数十人，各持刀械，诬扳良民，抄抢粮石牲畜，殴伤乡民甚多。又据八沟营参将杨兆云稟称，有贾教士带同跟役，藉言赴各乡查看被害教民，借兵保护。即到丫头沟各处，将教民指为从匪之家，肆意抄抢，并将自行擅拿之人送州收审，而所抢衣物、牲畜并不呈交。现闻各乡教民在乡择肥吓索，声言‘当日被匪抢去之物，须令乡民包赔。如不遵依，即指为通匪，稟请教士抄拿’等语。……详查此次致乱之由，实因在理教与洋教相仇而起。凡入洋教者良莠本自不齐，平日侍洋人为护符，所行所为率多横恣，一遇民教涉讼，该教士必再四嘱托地方官，自顾考成，每每偏护，人心积怨，亦非一朝。适遇朝阳起事，在理奸民因得乘机煽惑，将教堂人众恣意焚杀，取快一时。此番乱萌，虽起诸在理之党，实由洋教民平日行事过差，有以召衅而纳侮也。……夫各项教民皆属中国赤子，安良除莠，朝廷本一视同仁。现在在理倡乱首从各逆业已歼除殆尽，若洋教民聚众滋事，扰害地方，岂宜置之不问？……总之，地方官有保护该教之心，该教士亦当思善全之术。如纵令教民欺凌百姓，激成众愤，迨至一发难遏，虽地方官亦无如之何矣。至派兵保护各教堂，原属权宜之举；若令常川驻守，非特无此兵力，实亦不成体制。应俟地方大定，再行撤回，但能民教相安，毫无猜忌，更不须官为保护，斯诚地方之福也。”

1月23日(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报遵查朝阳等处被扰情形并参处失职州县摺称：

“臣鸿章先接据该州稟报，即以‘情节支离’逐层斥驳，并批行该管道府严加查察。……德福旋即奉旨开缺，臣奎斌到任后，据该道府委员查明稟称，当日此股教匪与天主教民素有嫌隙。十月十六、七等日焚毁建昌三十家子教堂后，纠党乘夜来州^①，潜从北面闯入州街，勾结本处匪徒。十八日黎明约有二百余人奔赴教堂，纵火共烧教堂大小六十八间。教士先日避去，未相遇害。乌合之众，愈聚愈多，难以数计，并将致中和京货店、利益增粮食店抢掠一空。其时监狱、衙署有吏目张其昌率同捕盗营兵彻夜严防，该匪亦以大股未到，器械不齐，未敢动手。十八、九、二十等日分窜四乡瀑河沿、聂门子等处，烧杀教民多寡不等。二十日闻大兵将至，遂于二十一日五鼓向三十家子一带窜去。当夜事起仓猝，火光之下，未辨贼众多少，该州遽以约有数千具报，张大其词，已属意存捏饰。稟内复称‘前往验看火迹，见地窖内有幼孩尸身无数，均系无眼珠、无心’等语。臣鸿章当以日前南省教堂滋事，皆由匪人造作此等谣言，及细查皆无证据，批令该道府等派员详细检看。兹据覆称，止抄出孩骨三具，日久溃烂，并非挖去心眼，与

^① 平泉州。

该州原禀迥殊。乃德福遽据以上闻，该州并据以出示，摇感人心，几挑外衅。……臣等查该员文卜年在热河服官多年，年逾六十，著名巧滑，虽无实在劣迹，而遇事善于应付，工于文饰。教堂近在县街，不能实力保护，厥咎奚辞？”

2月21日(正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奏报《申明口外滋事人犯分别按律惩办摺》引述犯人杨悦春供词称：

“……至烧毁天主教堂，闻系建昌县三十家子牌长林玉山为首。先因教堂韩姓抢粮起衅，韩姓将说事之徐深用炮打死，并将林玉山杂货铺抢劫，林玉山起意报复。又闻平泉州获一马贼，系属天主教民，被教士强行保出，众皆不平。知伊等在贝子府起事，林玉山即纠邀伊伙佟杰等将三十字子等平泉州聂门子等处教堂烧毁。杀死平泉州州判于南筠亦是林玉山所为。此一伙人后在五官营子、榆树林子等处被官兵剿灭。”

《清末教案》第五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十八、东北闹教，直隶朝阳、平泉爆发反教及民变案(1891—1892年)”辑：

1月11日田贝致布莱恩函第1454号称：

“在1891年12月31日的函中，我曾抄送了一份关于平泉州知州发布的告示的传阅信件，该告示对匪徒对教民犯下的暴行曾加以原谅和遮掩。这件事已由外交团团团长提请总理衙门注意，该衙门列位大臣答复说，已咨行李鸿章对该知州的行为进行查处，除了发布上述告示以外，这位知州还犯有其它一些失职罪，李鸿章的咨复尚未接到，一旦接到，将即时向外交团团团长转达；此项告示业已撤销；叶提督不宜深责，因为他个人对当时事态并不怎么了解，而只是转述从地方官那里获得的消息。”

1月30日田贝致布莱恩函第1464号称：

“《京报》已于本月28日刊载了皇帝的一道谕旨，皇帝说已接到李鸿章及奎斌^①的复奏，报告朝阳县及其附近地区——最近爆发叛乱的地点——各官员的情况。皇帝说，早在实际军事行动开始以前各处匪帮即已成群出没，蒙民及教民备受扰害。各该官员未曾采取弹压措施，以致酿成巨变。

“平泉州知州系法国公使点名抗议之人。李鸿章等在奏折中对他的指责尤为严厉，说教堂即坐落在他的州衙街道上，但他未能提供保护，还在报告中夸大叛民人数，并轻信有关教民的种种讹言，据以捏报而发布告示，意图煽动老百姓的反教情绪。

“李鸿章与奎斌所请将各官员革职一节，皇帝认为罪重罚轻，因而谕令该三个失事官员除革职外，均发往边疆充军。”

2月1日田贝致布莱恩函第1470号所附《字林西报》刊载“蒙古叛乱”称：

“我们附上一位华人神父从北方恐怖事件中心地区寄来的一封信的译件。这封信寄出的日期为12月15日，它是刚刚寄到上海的。

“蒙古有两个教门，道教的在理派和‘学好派’^②的金丹道，它们的成员来自民间各阶层，文士、商人、劳工、官吏应有尽有。因为多行不义，声名久已狼藉……

“事情是这样：十月十六日(西历11月17日)，一群凶恶的暴民破门冲入在三[十]家子地方的教士住宅，抓住姓林的华人神甫，拿走一切所能拿走的东西，然后烧毁教堂、房屋和孤儿院，住在里面的成年男女和孤儿无一逃生，不是烧死在屋子里，就是当场被杀死。几个逃走的也很快被赶上，结束了性命。暴民四处分开，搜寻新的牺牲者，发现哪里有教民的房屋，就把住户杀死，然后盗劫财物，最后是把房子烧掉。

“恶魔般的行动并没有到此为止，两个受害者还被囚禁着。林神父被拖到一个庙宇，绑在庙前的一根旗杆上，逼他背教。但种种恫吓都不起作用，他一直坚定不移。他们终于朝他开了枪，他的身体被肢解，暴徒从他在喘气的躯体里掏出心、肝、肺。这些行凶者把这些可怕的战利品吊在旗杆顶端。还有一

① 译者注：当时任热河都统。

② 译者注：原文作“唯理派”。

个带着孩子的女人。他们把煤油浇在这个可怜的母亲身上，把她活活烧死。

“暴民屠杀了几百家教民。在完成了这第一个劫掠之后，他们向平泉州进军。教民又一次向该州知州文卜年呼吁保护，尽管反复请求，结果仍是徒劳。暴徒起先还没有胆量公然行动，他们向知州投递了一封信说，他们并没有拿起武器同政府作对，不过要求准许他们烧毁教民的房屋藉以报仇。这种奇怪的要求竟然得到许可。他们于是进入州城，边抢边烧教堂、孤儿院和教民的住宅。衙门里的官吏和兵丁不予阻止，还抱着分赃的希望，同情地鼓励这股强盗放手搜索所有天主教民。知州还贴出告示说，如有胆敢窝藏天主教民的，也将照天主教民一例对待。自鸣得意的文卜年同时散播谣言说，在天主教士的住处暗藏着一大堆骸骨——不消说是被食人肉的洋人吞噬剩下来的幼童的残骸——并把这条消息写信告诉叶志超提督，后者据说就是金丹道成员。

“叶提督一收到这封信，便连忙发布了一道反对教民的告示，并将其到处散发。中伤天主教徒的谣言，人们信以为真。人们对金丹道和在理教的人以及天主教徒同样恼恨，群起反对。先前闹事的人此时公然竖旗起事，叛乱由此而正式爆发……”

3月21日田贝致布莱恩函第1492号称：

“我荣幸地随函附上一道上谕的抄件，该上谕提供了最近蒙古闹事与叛乱的一份官方报道，根据的是李鸿章和热河都统奎斌就乱事发生前及当时那个地方文武官员的表现所作的奏报。从奏报中可以看出汉族移民与蒙古族土著以及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关系，向来很紧张。许多年来，互相结仇的情况愈演愈烈。地方官由于未曾采取确保安宁的措施，受到非常严厉的谴责。奏折称‘对他们绝不能有任何宽恕’。起事首先在朝阳县发生，蔓延到平泉州及建昌县时已成燎原之势。蒙古居民受祸最烈。教会的一个差会遭到焚毁，杀死了一些本地人教民。对教民的这些暴行是当地教门干的。群众纷纷集结在后者的旗帜之下，闹事于是演变为对政府的造反，而具有地方性叛乱的规模。对教民的暴行的借口，据说是在教会建筑物的地窖里发现了许许多多被挖掉眼睛和心脏的幼孩尸体，因此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勘查。结果证明知县就此事所作的报告纯属弄虚作假，他的这种谎报受到严厉的抨击。可以看出皇帝的谕旨基本上是根据李（鸿章）总督的奏报。上述地方官员由于失职而致使任令闹事发生，受到了革职和充军的处分。目前叛乱已经平定。据说因此丧生的达20,000人。没有一个外国人受到丝毫伤害。”

《山东教案史料·冠县、邱县教案》“冠县教案”辑：

5月31日（五月六日）山东巡抚福润致总署函称：

“窃东昌府属冠县之梨园屯旧有义学一所，学后有玉皇庙数间，年久倾圮，民教均分，教民分得地基、破庙，改建教堂，众情不服，互相涉讼，已历六年，屡结屡翻。上年腊月间，复奉贵署以准法国李使照催迅速商办了结。即飭东昌府李守提集讯明，断令‘将庙宇让与教民改建教堂。并恐民心不服，由该县何令捐银二百两、京钱一千串，听民另购地基，建盖新庙，设立义学。俟新庙工竣，再行拆毁旧庙，移置神像’，取结完案。嗣教民复扬言，必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甘休，以致众情不服。本年四月初间，遂有无知愚民勾来临清州人道士魏合意赴庙住持，并将昔年办因枪械移存庙内，意图守御。教民畏惧，纷纷逃避。即经福润访闻，密飭济东道张道上达亲往相机妥办，解散胁从，严拿首要各犯重惩。四月十五日，该道驰抵冠县，业据该县何令先将魏合意拿获。即经该道督同东昌府李守、临清州陶牧并何令传集附近绅耆，晓以利害，剴切开导，将滋事愚民全行解散。其安放枪械实只图恐吓教民，把守庙宇，并未别滋事端。现在该庄居民情愿遵照原断，仍将庙基交出，让改教堂。眼前各庄首事将庙内正殿三间拆毁，约同该教张通士验明查收，取具该通士亲笔收条据存案，民教均安堵如常。法国主教马天恩深知感激，作函致谢。已批飭该县将魏合意研讯确情，另行禀办。此案从此可期永断葛藤矣。”

6月3日（五月九日）总署致法国公使李梅照会称：

“山东东昌府属冠县梨园屯教堂一案，业准贵大臣照催迅速商办了结，当经本衙门咨行山东巡抚催办去后。兹准东抚称：（内容见五月初六日山东巡抚福润致总署函）查梨园屯地方居民现在愿遵原断将庙基交出，让建教堂，是此案业经办结，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销案可也。”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一册《肃宁 刘家坞沈明亮一家六人致命传略》载：

“沈明亮乃献县修道生沈保禄之父。一千八百九十馀年间，沈保禄奉步主教之命，往东蒙古松树咀子修道院去教授汉文，未及二年，染疫而亡。”

1893年 光绪十九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一章《北堂迁西什库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二十一、戴主教去北京后，正定代牧区的情形

“……大小修生一齐在主教府攻读。一八八七年曾考虑将神学生送至北京修院，院长董若望 Coursiere 神父带了八名修士。但他们离开故乡后，对北京的水土不服，次年都带着疾病回来……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包主教在柏棠公墓附近造了几间房屋，将小修院迁入，任马贤 Meineri 为院长，而哲学生及神学生继续在城中攻读。”

1895年 光绪二十一年

《燕京开教略》下篇《由遣使会罗施阁接理中国教务至光绪二十年之时》载：

“光绪二十年，降生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中国与日本因争保护高丽之权兴兵构战，次年中师败绩。有法、德、俄三国代为讲和，于是两国换约罢兵。法国钦使施鄂兰乘此顺便，请于当事，欲在朝中觐见中国皇帝。上嘉法人讲和之功，忻然允奏。

“施鄂兰所办各教案中，有四川焚毁教堂一案最著。……四川一省……中教民计十万馀，数主教分疆而理。光绪二十一年，降生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有乱党聚众滋事，杀掠教民，焚毁堂宇，渐至无恶不为，而川中各员皆坐视不救。幸有施鄂兰遇事勇决，又有成都府杜主教智于应变。……使臣界以川省副使之权职，由是川员恐惧，认真剿贼，不数日一律肃清。……于此一案，仍见各国修士在华传教必需法国保护，始得无虞。其保护之权，法人既不肯轻释，教皇亦无意夺而他予。恒见天主圣堂之旁必有法署以防（围）[卫]，十字圣架之上必有法旗以蔽护。法人之所以胜于他国者，盖为此也。由咸丰间，法人欲在极东各处保护教堂，兼振国声，特派兵轮若干艘恒往来于东海之中，以防不虞。驻京钦使每得其臂助之力。其水师提督、总副将官等率皆奋不顾身之士，竭力广传圣教，荣显本国，并无二心。”

《西湾圣教源流》第六章《巴公为代牧时底经过》第五节《巴主教在西湾子做的几件事业》载：

“巴公驻西湾子时，很操心于修道院。院内素有修生五十左右，其中以本村人居多数，计由巴公圣出十四位华司铎。方（齐）[济]众院长司铎因本会事务回国（一八八五年）后，卜天德司铎续任，十三年为院长。继卜公为本村本堂，系赵伯多禄司铎。大约赵司铎当任时，教友在大堂修造一大钟楼。那钟楼系按孔司铎（R. P. Drerickx）画的图样，极其美丽，因此拆毁大堂时，还保存了那个钟楼至今。

“一八七七年，巴公为孤儿院建筑新房，也建筑了新校舍为本村底儿童。主教不但结记总堂底教务，还操心四围地方底教友。……主教为四个小堂口盖了圣堂，到一八八七年，又为五道沟、二道沟、老虎沟、吴东窑各修了一座小堂。吴东窑底圣堂奉圣若瑟为主保。按巴公底主义，修那堂是为求大圣若瑟，使本会能够兴旺前进。”

第六节《巴主教逝世》载：

“一八九二和一八九三两年，中蒙古一带遭了荒歉。老年巴主教极惦念本教区。他二十多年传教，为天主下了大辛苦：他在任的时候，于中蒙古创立四十个小堂口，修筑四十五座圣堂，安插十位本堂司铎，设立六处孤儿院、十多个义学房……

“这些年中，主教多驻节西营子教堂，因那堂适扭在全区底中枢。德主教谢世后（一八八八年），宗座令韩主教离开甘肃，来作西蒙古的代牧（一八八九年）。当时宗座又擢举中蒙古一位司铎为甘肃代

牧,即陶福音主教(Mgr. Hub. Otto)。巴主教在西营子圣了陶司铎为主教(一八九一年),以后就在那里患得重病。……临终的时候,司铎们在他身边念《临终经》。……遂安然谢世,时在一八九五年一月四日。”

附表(四)《自圣母圣心会接理蒙古教务以来所有代牧和副主教的史略》载:

“巴省贤主教(Mgr J. Bax):巴公省贤,比国人民,降生后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生于比国安特卫普省(Anvers)未来得村(Weelde)。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领受铎品,第二年八月十二日被选为美林(Malines)教区孟太贵(Monlaigu)堂口的副本堂。以后公得了神长的准许入圣母圣心会,一八六三年七月六日来到本会祖前请求入会,第二年六月才得住于本会母院,本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发了愿。待南怀仁往中国起身后,公即在斯哥德修院及保守院充任院长。郎司铎(R. P. Vranckx)回来当总会长时,公任理账之职。一八七一年五月十四日被选为蒙古教区副主教。当年八月十四日从比京(Bruxelles)起身,十月三十一日到了西湾子。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传信部颁谕,选公为蒙古教区代牧,负啊特斯主教衔。一八八三年,宗座将这阔大地蒙古教区分开东、西、中三分,巴公即于本年十二月十一日接得宗座委任成了中蒙古教区的代牧。一八九五年正月四日寿终于南壕堑。”

1896年 光绪二十二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章《天津教案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十一、田主教任北京代牧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天津教案的二十五周年,圣母得胜堂尚未恢复原状,传教士及教友都觉痛心。田主教的条件总未实行,因为中国政府对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事件不愿认错。当时法国公使用尽外交手段,若得不到正式的道歉,至少一种外面的表示,何况已时过境迁,大家已记不清这事了。

“这种表示,是中国朝廷准许在圣堂附近竖立一碑,上刻同治皇帝(一八六二——一八七五)的谕旨,指责同治九年的屠杀,并命严办凶手。若与田主教的要求作一比较,这自然是微乎其微了;然而要一个朝廷在全世界面前认错,也似乎太过份。且照中国习惯,总不可逼一个敌人上天无路,即使有显明的错处,亦须让他有后退的馀步。田主教已于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去世,他若还健在的话,也会接受这个解决办法的。

“无论如何,可以开始修理圣堂了。一年以后,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它又依旧矗立天空了;在圣堂下面,埋葬谢神父及同伴的遗骸。”

第十一章《北堂迁西什库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二十一、由戴主教去北京后,正定代牧区的情形

“……包主教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给传信部的报告写说:‘正定代牧区有二十七位神父:十三位客籍神父,十四位国籍神父。在大修院中,七名神学生。在小修院中,四十五名修生在读中文及拉丁文,准备进大修院。我们能拣选儿童,将他们在十二至十四岁时遣往小修院。但有多名,或因读书的困难,或才能不够,当离开修院,只有少数达到升神父的地步。’

“虽然这批评有点胆小,但二座修院发生了良好的结果,包主教能升多位国籍神父,不久,数字就超过客籍神父,使他们不忽略教友的原则外,多去皈化外教人。”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辑:

8月3日(六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李秉衡摺又片称:

“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藉为遁逃之藪,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呵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

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

“至民教滋事之案,又辄以毁坏什物、焚拆教堂索赔款之费。不知各国传教虽多,要惟通都大邑建有教堂,其各州县偏僻村镇,皆由各国教士就教民之稍能识字者使为教师,即因其所住房屋为教学之所,名为教堂,实则破屋数间,室如悬磬。一旦有事,则教士以毁坏什物、焚毁教堂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而公使遂以诘责总署,百端要挟,异议横生,其实并无洋人房屋、器具。议给赔款,徒以长奸滑教民讹诈之风耳。”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一册《范家圪塔 的来历》载:

“……光绪二十二年……河间县长……上呈总督^①,说河间民人造反。……总督得信后遂派军官梅东益率领三千人米河间弹压……

“事毕之后,梅东益返回天津向总督一报告,总督见他智勇兼全,平乱有方,不但极口夸奖,还升了他的官爵,赐以军门职衔,也吩咐他自己派人去筑成那道中堤。梅东益就委派了自己部下的一个军官领着五百步兵来到范家圪塔,一半镇守地方,一半完成堤工。军官先征求了教士的同意,设公馆于教堂中。以后梅东益凡来查验堤工,亦以教堂为公馆,与教士谈论往来,感情很好。日久天长,对于天主教的道理规矩并传教士的品行人格,全明明看出来。至光绪二十六年,普中国的君臣士庶皆一口同声的以杀洋灭教相号召,独梅东益及其部下的各军官不随声附和,反尽力攻打拳匪,保护教士教民。虽同是中国人,却与其余的中国人见解不同,大概是因为他们同传教士常通来往,对于宗教毫无误会隔阂的缘故。”

1897年 光绪二十三年

《西湾圣教源流》附表(三) 在本区修道后供职于他教区的国籍味增爵会司铎一览表

姓名	圣篆	生年	晋铎年号	寿终地址	去世年 月 日
一 杨安德	安德肋	一八零三	一八三八	贾家疃	一八六二,八,(二)[廿]二
二 张(未详)	保禄	一八一四	一八四七	孟家坟	一八五八,六,廿四
三 吕景堂	茂禄	一八二六	一八五零	宁晋县双井	一八九七,三,十一
四 刘永和	方济各	一八二二	一八五三	刘家庄	一八八五,三,九
五 蔡国贤	伯多禄	一八二六	一八五三	正定府	一九零零,五,八
六 郑恒德	巴尔大撒	一八二九	一八五七	北京	一八九八,七,廿八
七 陈天义	伯多禄	一八三四	一八五七	北京	一八九一,十一,廿
八 侯穆远	恭德	一八四零	一八六五	正定府	一九零零,十二,十
九 张振铎	老楞佐	一八四零	一八六六	山东	一八九零,后?
十 郭笠原	伯多禄	一八四一	一八六六	顺德府	一九一零,一,八
十一 张延安	保禄	一八四二	一八六六	正定府	一九一四,二,十一
十二 武连城	若翰	一八四四	一八六九	宣化府	一八七八,十二,二
十三 郝正国	保禄	一八四六	一八七一	北京	一九一零,十,四
十四 张(未详)	弥厄尔	一八四三	一八七四	敦家庄藁州	一八九七,八,廿二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

12月6日(十一月十三日)左都御史裕德等奏报直隶文生控告教士联结官府霸夺民地摺称:

“据直隶文生孟士仁遣抱[告]朱义以‘官洋助势,夺田戮虐’等词赴臣衙门呈诉。臣等公同讯问。据朱义供称:年五十一岁,住山西丰镇厅边外古营盘。孟士仁写就呈词,遣递求阅便悉。查原呈内称‘山

^① 1892年子牙河再次决口,河水漫过河堤,但为了里外的另一高大堤埝所阻挡,两堤间洼田全被淹没。上游与下游居民因下游居民拟在范家圪塔村北约三、四里处两堤间筑一横堤阻水而发生械斗,呈控到官。直隶总督判令于二堤河套之间再筑一道中堤,以保护河套内的村庄。1896年开工兴建,因公款用尽,只筑了三四十里便拟竣工,于是又激发上、下游矛盾,上游居民一、二千人卧堤阻止施工。最后以将已成中堤延长20里了结。

西丰、宁二厅边外官荒，生等三百馀家报垦察哈尔正黄旗佐领下官荒一段，领有蒙古印据，又奉有部文。天主教民韩大成勾通三一教堂贿通蒙兵影射霸种，经前察哈尔都统奏准封禁。奈教民杨世望等勾通法国教士刘拯灵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诬控生等霸种，经都统委员会审，教民又贿通委员含糊禀请都统与教民分界结案。八月间众官又率教民令生等数百家拆房退地，教民又买出营兵并率领教匪各持火枪纵火抢掠，纵横三十馀里约地二千馀顷尽划入教堂界内。生等哭诉无路，叩恳奏请查办’等语。……案关民教相争，委员得贿偏袒如果属实，不惟民冤难伸，并恐酿成巨案，亟宜酌中办理，以息争端。”

“附件：直隶宣化府万全县文生孟士仁呈文”

具禀直隶宣化府万全县文生孟士仁，年三十六岁，因病遣抱告朱义，年五十一岁，俱住山西丰镇厅边外古营盘，距京师七百馀里。为官洋助势刻夺民田、残戮百姓、草菅人命，愿准奏请钦命廉正大臣据法查办，严正典型，以恤蚁命，以安世道人心事。

窃缘山西丰、宁二厅边外垦熟官荒万顷，或买之商人，或佃之蒙古，未有凭虚而得者。但因有司官利归中饱，不与查办，升科垦荒者多受侵扰。或教民势霸，或官吏夺佃另卖，民不聊生。生等三百馀户报垦察哈尔正黄旗第七八佐领下空闲官荒一段。光绪八年十一月间，商同佐领下官弁给领生等空闲长宽之印据地图令生报垦，长三十馀里，宽二十馀里。生于光绪九年三月间据文呈报丰镇押荒局委员，将生等蒙古印据批存丰镇厅案备查。生等又同山西民人赵业、王华楠承办部文在案。光绪十四年九月间奉准部文‘咨行山西巡抚察哈尔都统转饬丰、宁二厅，如果尚有空闲堪以续垦之地，迅即查明报部，以凭核办’等语。奈事久生变。有天主教民韩大成勾通三一教堂，贿买不法之蒙古，影射霸种五十馀号。旗下屡逐不克，延至十六年，合旗派兵，始将教民逐退。十七年复蒙前任察哈尔都统奏明，按法国条约，教堂不准私买官荒，札饬满、蒙、汉官员会审，将勾串教堂之蒙古，除革职受刑外，赔出银两，令教民领银退地，各具甘结存案。犹虑教民复霸，加以‘封禁’字样，以杜后患。累及生等承办十有馀年，赔累巨万。因教民侵扰，封禁之后，亦不敢试垦。

光绪二十年蒙古出兵之际，教民杨世望、阎大事、武明镜等承隙复霸，不服阻拦。生先禀明蒙、汉各衙门，不能驱逐，眼看所办之地尽被蚕食。生佃户各携牛犊到地试垦，逐年来屡被教民之侵害不堪胜数。本年六月间教民复霸生佃户刘守功之地，逼刘守功刎颈身死，每告厅主，不与审讯。去年三月间教民复勾通法国传教士刘拯灵来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诬控蒙古对换过教堂十里长宽地亩立有印据，已蒙前署丰镇同知会查详报，并无凭据。今春刘拯灵复来总理衙门诬控生等霸种教堂之地，与蒙员达尔玛得尔济使过伊银四千馀两，禀请驱逐查办。札文屡下，疾于星火。本年四月间蒙都统委员额勒浑、山西委员韩景琦会同丰镇同知刘景林、黄旗署总管巴图得勒格尔齐集丰镇厅会审。教民自知理屈，买通官长，不言凭据之有无，含糊与之，给地了事。众官既得洋贿之后，凭恃下民易虐，遂许之；又不敢直言指地，禀请都统与教民分界结案。都统仍飭原案官至地分界。众官俱至教堂，会商数月；生亦屡将始终情由禀明。都统屡批札饬同审官按生所呈各节逐件查明，秉公办理。

官长既得洋贿，惟听刘教士之指使，竟将都统屡次札饬视为具文。圈套既成，忽于八月初三日众官多带人马，相率教民数百，各持火枪，如行兵状。额委员胁制蒙古，刘同知胁制汉民，到地分界。除教民霸种数百顷全行指交外，又将生佃户垦熟禾成之地五百馀顷尽数指交教民收领，长宽二十馀里，约地千有馀顷，立限十日令生数百家拆房退地。生佃户男女大小马前跪乞，俱受鞭挞马蹶之苦，身被重伤者六七十人。指地未妥，众官恐有不测，连夜星散。教民复从丰镇雇出营兵四十馀人，八月十五日教民杨世望、郝洛四等率领教匪数百，各持火枪，相随营兵拆毁生等数百家之房屋，抢掠一空，不顺者纵火焚烧，将生佃户赵信押死房内。男女四散逃亡。有生之雇工者捆弃教堂六人非刑拷打，血流遍体，复以陈醋灌炙伤处死而复生者数次。教民复将此六人送到丰镇厅，贿嘱刘同知刑毙数次。恐生上控，复将受刑之人付入明火抢夺案内，以掩其非刑之咎。

教民贪狠异常。九月十五日勾集教匪，有持火枪、有持铁钺者，私挖壕界；又于二十里外，不论蒙古营盘、民人田产，尽数划入教堂界内，纵横三十馀里，约地二千馀顷。有张琦之佃户刘三等数

人阻拦,皆被教民枪打几死。生固知洋教之不可当也;但思国朝以法制定天下,黎民守之,坚如金石。空闲官荒例准报垦,并无教堂招佃之理。生等报垦官荒,既有本佐领出给印据,又有部文准与续垦。前因教堂私买牧地五十二号,已奉奎都统奏明退地,领银完结之案,今何故翻弄奏案,刻夺报垦者数百家之脂膏,十倍于五十二号而尽与之?且边外各教堂置地招民之法,不过十数顷。入教者百有馀家,入其教者即学其枪。今夺去良民数百家之产裨益教类聚党数万之后,边陲之地,非特为民患也。法即不及于洋人,而教民之抢夺逼命、官长之贪贿虐民,岂俱无法乎?

生等生死含冤,哭诉无路。若不据法惩治,必起祸端。今众官圈套既成,万非具文可破。叩乞奏请钦差廉正大臣,按临查办……”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辑:

12月22日(十一月二十九日)总署为冠县梨园屯教案应即查办事咨山东巡抚张汝梅文称:

“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准法国吕署使照称‘山东冠县属梨园屯地方于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有匪二千餘名执持刀械将该处教堂攻打,杀毙教民二名,受伤多名,捆绑三名,并拆毁教堂,抢掠该村教民房屋。除二家未抢外,约有二百教民一齐逃走。山东巡抚至今尚未设法补偿。请电令重办匪犯,给还教堂地方并所有物料,仍赔偿教堂亏累’等因,本衙门旋发勒电详达李前抚并令设法持平办结在案。……兹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复准吕署使照称‘冠县教案,顷接马主教电报,山东地方官并未商办,请严飭速办’等因。除由本衙门另电催办外,相应钞录来照咨行贵抚……严飭该县迅即查办……”

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二章《樊国梁主教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六、樊国梁升主教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十一月十二日,樊神父被任为本大哥米的名义主教及都主教的辅理主教,有继位权。

“樊国梁主教 Favier 于一八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生于法国金岸省马色纳地方。一八五八年十月五日进遣使会,一八六一年十月十八日在巴黎升神父,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七月二十四日抵北京。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二月二十日举行祝圣典礼……

“都主教因健康不佳关系,未能亲自行祝圣他的辅理主教。由正定的包主教 Bruguiere 主礼,直隶南部的耶稣会士步主教 Bulte 及蒙古的叶主教 Adels 辅之。”

“七、都主教去世

“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四月十三日都主教安逝于北堂……

“都主教病时,实际上教务由樊主教管理。”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

1月9日(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总署奏请赏给法国教士樊国梁二品顶戴片称:

“法国教士樊国梁在京城及直隶迤北等处传教多年,臣鸿章前在直隶总督任内迁移蚕池口教堂,以该教士在事出力,于光緒十二年十一月间奏请赏给三品顶戴在案。兹据法国署使臣吕班函称‘副主教樊国梁办理直隶教务,已非一载,人亦敦重诚实,现经法国升为主教,拟求天恩奖励’等语,臣等查(法)[德]国主教安治泰因在山东商结教案多起,前经臣衙门请旨赏给二品顶戴。于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具奏,奉朱批:‘依议。钦此。’今法国副主教樊国梁在京城及直隶等处传教有年,遇事维持,民教相安。既经升为主教,可否请旨赏给该主教樊国梁二品顶戴以示优异,出自圣裁。”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辑:

1月15日(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署为冠县梨园屯教案办理已有眉目事致法署使照会称: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准贵署大臣照称‘(项)[顷]接电,知山东梨园屯教案,不还给教堂自

有地段，将教堂所有物件等偷窃，在彼起盖庙宇，教民被驱，甚属困苦。照请了结：一、重办罪犯。二、地基并所偷物料还给教堂。三、赔偿教堂银两收领。另须地方官出示晓谕，并派兵缉拿匪类，保护良民。即速照复’等因前来。”

“兹据山东巡抚电称‘查冠县梨园屯教案’因教民共争庙基构讼多年。本年三月，民教滋闹，伤毙教民王太清一名。当飭东昌府洪用舟亲往查办，以庙基为始祸之由，议请归官经理，作为义学，另为洋人置买地基，建立教堂。因地基久未买妥，连经飭催。复据该府县禀，业经买地一段，并照原样房屋，估计工料共京钱一千串；又庄民用其砖料，失少物件，估京钱一千串，共计京钱二千串。由教士自行起盖转发。至已死王太清系在直隶威县，仍飭冠县协缉。经教士费若瑟应允，转商马主教’等因。是此案办理已有眉目，亦甚持平，并非地方官延缓不办。”

4月11日(三月二十一日)张汝梅为陈述山东教士欺压平民情形事致总署函称：

“……即如法国冠县梨园屯一案，民教为争庙基，杀毙教民一名。上年委东昌府查办，请将庙基充公，另为洋人买地建堂，赔京钱二千串；一面缉拿凶犯，已有成议。今主教马天恩不允。已飭派兵前往，枪毙凶犯二名^①，将民间所建之庙拆毁，一庙基还给洋人。复索赔款两万，现正与商办，尚未定义。”

6月17日(四月二十九日)总署为梨园屯一案希速拿犯赔款事致张汝梅电称：

“梨园屯案，法使谓‘十八魁所在，官民皆知，现已至孙庄杀害教民一名，吓死一名，洪守仍不拿究，应请撤任。教堂地基虽还，未赔所抢物料；教士收养教民二百人口，并飭须赔二万两……’云。”

6月17日(四月二十九日)张汝梅为义民会即义和拳已飭查禁事咨呈总署文附件6月8日(四月二十日)洪用舟为陈述办理冠县教案情形事禀张汝梅文称：

“查阜府所属境内教堂俱各安堵。即梨园屯教民眷属，俱已回家。……惟近日访闻直隶大名府有匿名揭帖，约于四月十五日与教堂为难之事。而曲周、威县又迭出劫案，均系教民之家。……况梨园屯本系孤悬直境，上年聚众，皆直隶威县、曲周之人居多。……且十八魁之名，系因当日十八村习拳，故有十八魁之名。其实仅有数人，并非有罪魁十八名。……此次梨园[屯]案内阎书琴等各犯，均经禀明在案，亦并无十八名之多。”

6月24日(五月初六日)张汝梅为孙庄教民被劫业已获犯事致总署电称：

“兹据东昌府洪守转据冠县曹令禀称：孙庄教民马玉琳即马洛风家闰三月被盗，拿获衣五、刘二小两名，讯供禀办。此案同伙四人，首盗已获，并无杀害教民及吓死教民各情事，亦非十八魁党羽。法使所称，当是传闻之误。”

6月29日(五月十一日)高燮曾奏为宜择地另建冠县教堂以顺民情事片^②称：

“再，山东冠县地方教士强毁民间玉皇阁为教堂；百姓不愿。前时知县劝导教士择地另建，教士听命，百姓欣然；后来地方官办理不善，取媚洋人，仍令以玉皇阁为教堂，遂致百姓聚众抗阻。大吏委兵弹压，暂时无事。是冠县百姓非不许其建立教堂，特不欲其强占公所，此而以违旨罪之，可乎？……臣愚以为宜照前议择地为之另建，不必以兵威钳制，显拂民情，庶于民地两有裨益。”

7月22日(六月初四日)总署为催办冠县教案事咨张汝梅文附件二法使所开十八魁名单载：

阎书琴 阎福来 阎书堂 阎书检 阎明见 阎书太 马廷凤 马廷梅 高五插子 高元祥 阎三妮 阎四妮 阎士林 刘三 阎二别种 姜宗山 高远达 马步月

“这就是十八魁名字，均是梨园屯的破落户。”

《筹笔偶存》附录《山东抚院收电簿残卷》辑：

十三、[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收总署电)

“法使照称‘山东迤北匪扰教堂，梨园屯案未结，教堂教民受累，官未阻止。请电山东：一、将官所素

^① 即李洛木、阎书琴，但阎书琴是“被枪洞穿肋膀”未死。见同书1898年4月5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张汝梅为陈述梨园屯教案办理情形事致总署函。

^②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作《御使高燮曾奏为山东冠县教堂应迁出玉皇阁择地另建片》。

知罪魁十八名,限三日全获。二、迤北教堂受累,应偿银二万两。三、东昌洪守与教士为难,应撤任。四、以张道换吉道’云。查罪魁十八名,迤北教堂如何受累,洪守如何与教士为难?署皆无案。法使现为永安州教案正在作难,恐其言有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辑:

6月17日(四月二十九日)山东巡抚张汝梅抄报东昌府知府洪用舟所上禀称:

“直境威县、曲周、广宗一带有盗匪抢劫教民之家,皆托名十八魁以嫁其祸。……查卑府所属境内教堂俱各安堵,即梨园屯教民眷属俱已回家,民教相安,并无惊扰。惟近日访闻直隶大名府有匿名揭帖,约于四月十五日与教堂为难之事。而曲周、威县又迭出劫案,均系教民之家。……该府县地方均与东省犬牙相错,匪徒藉端驾名东匪,或即所谓教堂受累之由。……况梨园屯本系孤悬直境,上年聚众皆直隶威县、曲周之人居多。”

6月30日(五月十二日)张汝梅摺称:

“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远近传讹,以义和为义民,遂指为新立之会。实则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难。现在冠县境内民教相安,梨园屯教民眷属亦已回家安业,实无出具传单揭帖约期闹教各情形。所云传单,系起自直隶之沧州;三四月间,大名府城闻亦出具揭帖,然皆愚民与洋教嫌怨日深,故造讹言,藉以泄忿。”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

7月8日(五月二十日)著直隶总督荣禄速结保定教堂被兵毁坏一案事电旨称:

“保府教堂被董福祥兵毁坏,两教士被殴,带至营中,法使昨已照会总署。荣禄电称‘此案由外设法拟结’,著即赶紧办理,务须速了。省城重地,甘军勇丁何得任意滋事?并著转电董福祥认真弹压。以后如该军别有滋闹情形,定惟该提督是问。”

7月21日(六月初三日)著直隶总督荣禄将甘军驻地酌量北移,以免与教堂生衅事电旨称:

“荣禄电悉。教案办结,尚属妥速。甘军驻扎保定,诚恐日久生衅。著荣禄就保定省北涿州一带地方酌量移扎,处所与董福祥电商妥办。”

《筹笔偶存》附录《山东抚院收电簿残卷》辑:

二十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收临清电)

“威境沙柳寨拳民聚众滋事,衅起威县,获一拳党。教士王德昌来请营,已专马禀陈。现探拳民又在冠威交界忽聚忽散,欲肆劫夺。乞如教士请,迅拨营保护。寿朋。”

二十九、[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收冠县电)

“威拳十八解散,忽有广平拳民姚洛奇等勾通红桃园匪类,于黎明放火并杀害教民二名、受伤一名。现已诣验,派队追缉。匪走曲、威一带,乞电直省会拿。倬禀。”

四十一、[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收总署电)

“奉旨:直东边境拳民时与教民为难,隐患甚巨。兹据裕禄电称,广平拳民姚洛奇于冠县、威县一带勾匪闹教,业经拿获审办。该党结会众多,一旦藉端滋事,势将不可遏抑……

“即将此次直境拳民无端滋闹教堂,焚杀东境教民,由曹令带同防营追拿。拳民拒捕,先开枪炮,伤勇多名。经各队击散,将为首姚洛奇当场拿获,并拿获某某名,由县讯明禀报。已饬将姚洛奇正法。并将被害教民查明,妥为抚恤。现均相安。”

《义和团史料·史籍汇录》辑曹侗^①《古春草堂笔记》(选录)载:

“光绪戊戌正月,余寓居东昌,得洪太守兰楫^②由省来书,相约即日赴省。及晤后,始悉冠县梨园屯

^① 原编者按:曹侗,字远模,晚号古春老人,江苏省江阴人,清末久官山东,历任冠县、长山、平度等县知县。辛亥革命后又任山东即墨、曹县及京兆昌平等县知事。

^② 原编者注:洪用舟,字兰楫,四川松潘人,时官东昌府知府。

教案，拳民占据其地，于六年前烧毁天主教堂，杀死教民二命，至今悬案莫结。十八村乃旧名也，后增六村，实有二十四村，居民万余户，素称殷富，孤悬境外，距城百三十里，与直隶曲周、威县毗连。中央有大集曰梨园屯，建有书院，每年派粮书在屯设柜征收钱粮。自被占后，书院停课，钱粮停征，实缺知县何式箴辞职，署事者不敢履任，已数月无官矣。司道会议，未得有相当人材，故(蔺)[荐]足下承其乏，此致书之意也。余曰可。……即日给委就道。

“所订幕友均不敢同行，惟张秩清相随抵冠。接印后，印出空白谕单、布告数十纸。……直达梨园屯。

“……访得本屯有高六者……命书房邀至，与之密谭。……高曰：‘……拳首赵洛珠——即三多，家有良田四顷，并开商店，其徒众误收匪徒，因缉拿急，被徒众架出，主持其事。……声势日盛，所谓欲罢不能也。’当询洛珠与本屯何人素识，则以团长杨昌浚对……

“于是邀请杨团长来见。……因邀各村团长连杨共八人会议，议定以八团长生命保赵一人，并许其带团丁自卫而来……

“越二日，赵至。……余问：‘汝家道殷实，儿孙成立，汝何不图自保身家，纵令徒众滋事？且杀人放火，另有其人，汝何必为他人作傀儡乎？’赵曰：‘义和团起于三十年前，正天主、耶稣两教入中国时也，宗旨在反对传教，有患难相扶之规约。先后凡八辈，洛珠居第五辈，故推为首领。梨园屯案中人投入团中，为徒众误收，无法摆脱。今洛珠为罪魁，倘一散归，身家不保，已处骑虎难下之势，奈何？’……余遂入室，将印纸撰手谕曰：‘梨园屯一案，拳首赵三多——即洛珠，一经本县开导，深自悔悟，自应网开一面，予以自新之路。与所有协从人等一并从宽免究，从此解散归家，各安生业，毋得再出滋事。’……

“次晨，赵登台演说。……拳民陆续散归，未五日而尽。

“旋探得本村滋事匪人及无业游民仍聚合二百余人避匿威境，遂星夜至临清晤林统领，请其率步队百名，并调本县马队二十名，于次日抵屯，跟踪追剿。……相距较近时，放排枪一次，枪中马腹，姚洛奇倒地，五人共擒之；临场击毙匪徒十余人，擒获十余人。……余电省请将姚洛奇正法，枭示犯事地方；获犯择其尤者五人分别监禁十年、五年，余五人保释。请由洋务局给予银一万两，作为修复教堂及抚恤教民之用，此案遂完全结束。计余到此越三旬之久，始得折回公廨也。”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辑：

11月3日(九月二十日)临清直隶州知州王寿朋为红桃园发生教案事致洋务局电称：

“今晨冠境红桃园忽又被火烧屋，杀教民二，伤一。据探系拳党，亦有匪徒，与赵拳先合后离，且为贻害而出此着。现走曲、威一带。省队一哨驻小卢，专顾教堂……”

11月5日(九月二十二日)署冠县知县曹倜为拿获拳首姚洛奇事致张汝梅等电称：

“辰刻率队会同飞虎等营追匪至沙柳寨。首犯姚洛奇纠众拒捕。当将姚洛奇拿获，并获从犯及格毙多名。”

同日王寿朋为陈明红桃园教案情形事致张汝梅等电称：

“拳民为首赵洛珠实于十九日散归，余党亦散。独广平素不安分之拳民姚洛奇即怂恿赵拳者，心怀怏怏，仍常与伊党聚会，并有伊滋事仍是赵拳之意。故又胁同党勾匪类，于二十日赴红桃园杀烧滋事。”

11月17日(十月初四日)张汝梅为梨园屯教案办有端倪请照会法使允结事咨总署文载：

“案：据洋务局彭道虞孙、潘道延祖会详称‘案：查东昌府冠县梨园屯地方民教相争庙基一案，迄今二十余年，屡结[屡]翻，总未允服。光绪十八年，教民在该屯庙基上兴建教堂，虑及百姓拦阻，遂以梅花队阻工谋叛为词向冠县投递信函，因此群情不服，前往教堂理辩。教民见人多势众，闭门不纳，并上房抛掷砖石，开放洋枪，致激众(怒)[怒]，群起相(设)[攻]，以致互有受伤。越日，教民王太清毙于直隶威县境内，经威县验明通报。即经东昌府督饬冠县协缉正凶，并经该府洪守用舟传集该庄教民王太和、王金铃等九名，讯据王(大)[太]和供称，曾领过杨教士修堂银二百两，其家亦失少京钱二百千文，连其馀失物，统共约合京(银)[钱]一千串。此梨园屯教案起衅之实在情形也。上年冬，职道等……飭局员……会同该府县妥为办理去后。该员等……用能解散梅拳之众，不与教士为仇，庙基仍判归教堂，教民已悉

还乡。并该主教马天恩以该员等办理平允，情愿将原索(赏)[偿]款二万金让还一万，仅索一万，业经由该府县如数筹出，交付该堂……’等情到本部院。”

11月24日(十月十一日)总署为红桃园教案已飭查明事致法使照会附录11月19日(十月初六日)法使为红桃园教案请将吉道等撤换事致总署照会载：

“据马主教来信称‘九月二十日黎明，梅花拳与十八魁匪将冠县之红桃园教民杀毙三名，房屋被烧若干；并将小李固教堂与配房共烧毁八间，并陈家庄教民一家产房均被烧毁。’等情，并由直隶迤南步主教函告‘直属邻近地方住有教民处所，亦有滋扰烧屋情事’等语。”

11月26日(十月十三日)王寿朋为陈明红桃园教案抚恤情形事致洋务局电称：

“今日与傅教[士]商定抚恤教民房屋、衣物，及杀两命、伤一人包在京钱三千串文亦商定。惟教堂房屋十六间未电主教，却有函交州附寄，得复再议，并云决不致讹。”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二章《樊国梁主教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九、保定府事件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七月六日，驻在保定军队的二位军官强进保定北关的天主堂内，佣人要阻挡他们进去，就被严重殴打。在能控告上级军官之前，一位连长带了二百名士兵冲入天主堂内，打二位神父杜总本堂 Dumond 及王保禄副本堂，并将二位神父缚起，带至司令部。二位遣使会士不知前途如何，最后一次互相赦罪。

“知县听见后，就至司令部与军官谈判，将二位神父送上车子至他的衙门内，次日又送他们回天主堂。杜神父乃将案情的经过，告诉北京的长上。

“十、神父住所迁至保定城内

“直隶总督荣禄立刻写信给樊主教，请他和平解决此事！主教接受了总督的请求，给他和平解决的条件，即将城内适当的地点交换北关的天主堂，教会对神父被侮辱、物件被损害就一无所求。

“次日，荣禄回电，已接受了条件，只要派一位传教士至保定与当地官员商议，将条件付诸实行。乃选林懋德神父 Jarlin，因他曾管理保定九年。

“在三日内，一切都解决了，二方面皆满意。所选的地点乃一座城中久已放弃的衙门，因为有鬼作祟。教会乃得到久所期望的，即在城内建立天主堂！因为直到此时，禁止任何西洋人进城。而另一方面，中国官员解决此案未失面子。”

《近代史资料》(总第47期)裴淑兰整理《天主堂在献县等地的田产》载：

“互换合同^①于1898年7月16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签订。合同内容共六条：

(一)本大臣允将保定城内清河道旧署换给法国天主教作为教堂。其地基房屋四至应由保定地方官会同杜主教勘明绘图存案，嗣后归教堂随便使用。其四至外原有官民房屋铺户一概照旧。

(二)本主教允将保定北关外法国天主教原置地十六亩、房约四十馀间一并换给中国随便使用。原置文契均交与中国地方官收执，与法国教堂无干。

(三)清河道旧署与法国教堂互换后，法国教士自行择期迁移居住。中国地方官除护送并设筵款待外，不另给迁移之费。

(四)清河道旧署换给后只能作为保定天主教教堂公产，不得视为教士^②及传教士己业。

(五)清河道旧署现有中国办公人员及收存一切物件应于四礼拜内搬移干净，法教士亦不给迁费。

(六)清河道旧署房屋中国允为修饰干净，但只能将坍塌之处修补完整，不能改动。

“……经双方勘明后绘制的清河道旧署地图^③标明：‘衙署房一百九十间，(官)[关]帝庙一座，官

^① 裴注：河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大清国文澜阁大学士钦差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部堂荣、大法国天主教总主教樊议定保定城内清河道旧署与北关外法国教堂互换合同》。

^② 疑为“教徒”之误。

^③ 裴注：河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保定清河道旧署地图》。

地民房二十一间半,统计房二百一十间半,合计地十五亩四分九厘四。’”

《西湾圣教源流》第六章《巴公为代牧时底经过》第七节《季司铎代理中蒙古教区》载:

“季司铎(舍尔, T. R. P. Guisset)当时为本会寿数最高的司铎,他自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八年为中蒙古教区代理者。既是代理,所以他在任时没有什么另外设施。他也驻节西湾子总堂,但方主教来此以前,他已经回西营子住去了。

“在一八九八年,宗座委方(齐)[济]众司铎为代牧,统理中蒙古教区。”

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收》载:

“中蒙古三年的工夫没有代牧;到一八九八年五月七日,宗座才委了一位著名的教士为代牧,就是方(齐)[济]众司铎。他曾两次管过西湾子修道院,在河套传教数年;以后十年的工夫,在本国任本会总会长职。……十年既满……又接一新任,即中蒙古代牧,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被圣为主教后起身来远东就职……”

“方公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驾临西湾子。……欢迎方公底仪式也很热烈,也很荣耀:有八位司铎作欢迎团底先锋队赴张家口接主教;离总堂八里,又有八位司铎和八十个骑马团,及十二个著红袍辅祭员,还有五十二个老年人,坐在扎彩的大花车上,一齐出动欢迎去;来到村门前时,教友齐向主教敬礼,六十二个修道生和著小白衣底童子们,连拥旗帜和著军装底一队人,俱恭候于彩棚前;主教著本祭服,骑一骡,骡披白缎绣袍,一直向大堂进行,到堂内一齐唱《感谢天主诵》……”

第七章第二节《方、蓝、石三位主教底建设事业》载:

“一八九八年,有第一批方济格会修女到口外地方,方主教聘请她们为管理本村孤儿院和女校,也为传扬恭敬圣体底热心。她们来时在高家营住了几个月,以后才来到西湾子,赶修道院迁居到主教府内,她们便占用了旧修道院。”

《文物春秋》总第3期《法国传教士关于威县地区义和拳运动的信札》辑:

3月15日传教士文思安(Vinchon)^①于冀州方家庄致直隶东南教区主教^②函^③称:

“按照建立玫瑰善会的规章,总代表宣布,他指定的堂口主持人为该会领导,留有两处供领导签署。此外,在建会证书上又委托本堂主持人负责此事。因此,成了本堂指定自己为领导,此事应怎么办?”

“牛神父(P. Gniou)在他发未愿时,曾把他的6亩土地捐献给教会。现在,他又为此事给自己的兄弟及侄儿制造困难……”

“教徒们说:‘让他留在自己的屋内工作或祈祷,由我们来伺候他。’但教徒们不能容忍他成天哭哭啼啼,开口像个农民,围着小商贩做买卖。”

“这6亩土地为何又被教会弃之不管,而落到3个兄弟手中的呢?牛神父对此也不了解。很可能当初与葛光被(Becker)^④和埃茨莱(Heitzler)神父发动捐献教堂南侧的土地时,把这6亩地退还给业主作为补偿,因为这3兄弟想方设法不肯把这块对他们很有用的土地捐献出来。葛光被和埃茨莱两人了解原委,我请您就委派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前来处理此事。因为此人既非我的教徒,此事又非我本堂分内之事。他已经和我谈了两次。我乘车公出,他就跟在后面,把车挡在他那块想收回的土地前面,指手划脚地说个不停。近处一些非教徒看到了成何体统?说实在的,这样一个人物留在我的堂口内,是个不正常的现象,不知何时他能离开?”

“8天以来,人心恐慌。无数的车辆载运着粮食和衣服等物品,这两三天内不断从方家庄及附近地区涌进城内,并在那里租屋住下。因为听说义和拳造反,就要来了。教徒们还无动静,有人对教徒说:

① 文思安(Vinchon 1848—?),字希古。法国耶稣会神甫。

② 时任主教为步沃雷(1830—1900),字亦趋,1880.7.15—1900.10.14在任。

③ 原整理者注:这是1898年3月15日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文思安(A. Vinchon)从冀州方家庄寄给直隶东南教区主教步沃雷(H. Bulte)的信件原稿,法文,墨书,共4页,每页21×13.5公分。

④ 葛光被(Becker 1836—1918),字耀德。法国人。直隶东南教区第七任、第九任耶稣会长。

‘就要来人拆教堂。’这些都是帮会会徒们散布的谣言，其目的是在威胁恫吓教徒。”

附言：

“从江南来方家庄的商人说，为了成交生意，必得遵循一种习俗：有买客（官吏、商人、衙门的差役等）^① 前来，一进屋先请客人上座（屋内陈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按老风俗，向客人献上茶、烟，然后递上水烟壶。但今天，这些已经过时了，大商贾没有不吸鸦片烟的。因此，客人进屋，就得献上鸦片，桌上也应备有烟灯和烟枪。如果手头没有鸦片，就必须去买一些。这是招揽顾客的手段，非它不可，否则客人稍坐片刻，说几句应酬话就告辞了。这就叫做生意经。现在再也无法恢复以前商业上那种简朴的交际方式了。

“供应顾客吸鸦片有三部曲：（1）备置特制的烟灯；（2）备置特制的烟枪；（3）供应鸦片。

“我请副主教与江南和北京主教通信时，打听一下他们教区蔚州、宣化府（直隶北境）、苏州、芜湖、镇江、南京等地的传教士对这事所持的态度，使我遇到教徒为此事前来忏悔时也能有所遵循，或予以允许，或予以容忍，或加以禁止。

“离这里几里地的两个村庄正在加高村子的围墙。这是经过长时间的商量才作出决定的，并已于昨天动工，从16岁至60岁的男女都得参加修建工程。开始时，本想只要求教徒们出钱，因为这些工事都是为了洋人和教会才修建的（即Pei Tien Tchou Kiao ti hai）^②。隗龙（Koei long 译音）表示抗议，最后规定按拥有土地的亩数出钱，教徒与非教徒一律每亩出500个铜板。

“村上某富翁接到南[方]来的信说，人家的目标是针对洋人和教徒，要杀的也只是这些人。又说，方家庄的非教徒都在自己家门口撒上黑灰，使人能把他们与教徒区别开来。此信是真是假？是否有人以此信来恫吓教友？这里的外教人几天来也把黑灰撒在家门口。此外，听自南方来的人说，那里很平静，有不少士兵驻守着。许多互相矛盾的谣言不断还在流传。教徒很沉着，有人从小魏村、巨鹿等地到这里来，看教堂是否真的被拆毁。人们要求我在这里停留几天，因为一旦附近的会徒试图煽动群众起来举行反宗教的示威时，我留在这里可以阻止谣言变成事实。我们的钟楼在农村太显眼了，还是简陋的屋顶比较好一些，非教徒用毒眼去看教堂并非自今日起。”

5月5日大名府、广平府总本堂司铎范迪吉（A. Finck）^③ 于赵家庄致主教函^④ 称：

“为履行我担任的总本堂司铎的职责，在我得到了消息并采取了应急的措施后，我认为应把在我的总本堂区内刚发生的一些情况告诉您，对这些事情可能有烦劳您出面干涉的必要。

“4月23日或24日晚上^⑤，半夜以后，有一帮三、四十人的匪徒，持长枪、大刀侵入广平府曲周县的麦子乌营（即辛营）堂口^⑥。他们爬上屋顶，放枪，大声叫喊说他们是十八魁。这是一个匪徒的组织。当年在冠县梨园屯^⑦ 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传教士的教区专事烧杀抢掠，最后不得不请法国公使出面干涉。由于负责执行北京命令的地方官员采取恶意消极的态度，致使交涉的结果全部落空。匪徒们竭力声称不侵犯教外人士，也不妨碍伊斯兰教徒，而是专门反对天主教。于是，他们撞破教徒周清魁（Tcheou tsing koei 译音）家的大门，向周连斩数刀，虽然没有当场致死，但伤势严重。周妻也受刀砍，遍体鳞伤。接着，匪徒们就抢劫钱财（至少有400吊钱不翼而飞，其中的50吊是为建小教堂用的）、毯子、布匹、衣服以及在这个院子里15间房屋内能搬走的一切东西。最后，放火把房屋付之一炬。大火之后，仅存四壁。我亲自去察看了一遍，证实教徒们报告的情况全部属实，毫无夸张之处。匪徒们大功

① 括号内是说明文字。下同。

② 原整理者注：此句法语拼音，费解。

③ 范迪吉（A. Finck 1844—1911），字惠普，法国耶稣会士。

④ 原整理者注：这是1898年5月5日法国天主教司铎范迪吉（A. Finck）在威县赵家庄写给直隶东南教区主教步天衡的教务报告手稿。原件法文，墨书。共5页，每页26.5×21公分。其副本同时抄送1份（6页）给该教区大司铎葛光被（E. Becker）。

⑤ 原整理者注：农历一八九八年闰三月初三或初四。

⑥ 原整理者注：直隶省曲周县在威县城内的插花地（也叫飞地），今属威县。

⑦ 原整理者注：山东省冠县在直隶省威县境内的插花地，距冠县城130华里，今属河北省威县。

告成，就鸣枪向东北方向撤退。有一个齐会庄(Tsi hoei tchang 译音)姓周的老年妇女，因为拿不出钱财，也遭虐待。其他教徒见大批武装匪徒前来，就急忙躲避，不敢露面。有一些成年女子和年轻姑娘从后门溜走，藏在邻居教外人士家中。

“事情发生后，就有专差先到赵家庄，再到大名府来向我报告。村长周清肖(Tcheou tsing siao 译音)是个教徒，也立刻赶到曲周城里向县官呈报备案。县官在第二天也亲自到出事现场察看验证，对教徒们抚慰有加，对受伤的人赐给些药品，并答应立刻认真处理这次案件。这县官名叫王义献(Wang hi hien 译音)，是曲周县的正式官员，在当地以廉洁不阿、办事热心著称，严惩盗贼，确保治安，深受百姓的好评。

“我本人在接到赵席珍(R. Isore)^①和万其偈(A. Wetterwald)^②两位神父的来信，知道事情的经过后，当夜就写禀帖给大名府道台，要求他向下级发布命令，从速处理这个案件。道台立刻给我回复，答应要毫不延迟地照管此事。事实上，当晚他就向广平府知府和曲周县知县发了命令，并向总督^③作了报告。这位显要人物万培因，在第二天11时左右亲自前来作正式拜会，向我表示歉意和慰问，亲口答应将大力督促处理这次案件。我能证明他的确表示了他的善意和决心。他又亲自委派了一名候补知县吕长锁(Lü thángh cheou 译音)，到现场了解事实真相，广平府知府也派了一个姓郑的下去协助办理。曲周的县官亲自下去了两次……

“但是，现在又有新的情况。在万大人在大名府来和我会面的那天晚上，不知是谁在城里张贴红色小传单，声称大清帝国各省的英雄好汉，不能容忍洋人无法无天的越轨行动，激于义愤，应该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在农历四月十五日杀尽洋人，并烧毁全境所有的教堂^④。当夜，万大人就获得了一张传单，他立刻采取有力措施追根查底，防患于未然。同时，他也把这事通知了我们。第二天清晨，我就派两个人在城里兜了一圈，看能不能再找回几张同样的物证，结果他们从南门和西门各拣回了一张传单。其中一张，现在随信附上，还有一张内容全部一样的，我把它带往城里各个衙门，让他们逐个地过目。官员们立即开始行动，城区负责治保的头目以及所有没有负责的衙役都挨了鞭子打，出动了巡逻队，终归又暂时恢复了平静。同一天，当地的官员、我的老朋友董俊(Toung ts'iuén 译音)前来看我，无疑他是受道台的委派，向我做出忠诚的保证。……下属官员都接到在最短期间内出席开会的通知。凡设有教堂的村子的村长，都被通知必须重视确保社会秩序，并汇报各自区域内不法分子图谋不轨的动静。这些事都已做了。

“现在，如果目前的麻烦非经非正式(半官方)的干涉不能予以制止，我谨向你，主教大人，提出几点供参考和采纳。

“很明显地，依我看来——我敢说我看得大致不错——依大部分传教士看来，德国人对胶州的侵略行径在中国官员和易变的民众的思想中，产生了恼火的反感。洋人的大炮所轰不到的内地传教区，就难免不遭受到这股恼火的反感情绪的反击。

“看到邻近的冠县梨园屯的遭遇，我们这里可能比其他地方更感可怕。为此，我想应当向您，主教大人，指出能引起可能干预这件事情的人注意的下列各点：

“1、山东东昌府冠县梨园屯的事件中，不顾北京的命令，没有一个坏人受到逮捕和法办。

“2、中国官员们不仅不追究十八魁匪帮暴行的罪责，反而与匪徒妥协。威县的沙而寨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官员与匪首赵老周^⑤达成协议，答应不加追究，条件是匪徒们保证现时保持安静，不肇事生

① 赵席珍(R. Isore 1852—1900)，字希贤。法国耶稣会士。音译作伊索勒，见后文。

② 万其偈(A. Wetterwald 1860—?)，字希贤。法国耶稣会士。

③ 原整理者注：直隶总督王文韶，字曼石，浙江省仁和人。光绪二十一年上任，二十四年四月召京。

④ 原整理者注：参阅《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初四，义和拳趁大名府府考之机，在大名城里散发传单：“各省爱国志士，睹西人无法无天之行，已决于四月十五日集合，屠戮西人，焚毁其居，其不与我同心一致者，男盗女娼。阅此告示，而不为传播者，亦如之。”

⑤ 应译作“赵路珠”。即赵三多。

非。

“3、全境众所周知的匪徒，从扰乱开始以来，一直胆敢公开地不断恫吓教徒，几个月来还到处扬言要抢劫和烧毁教徒房屋，而不曾受到任何阻力。

“4、事实上，几个月前，匪徒们就在直隶威县崔家陈村烧了两座教徒的房屋。前几天，又在我们邻近的堂口孙庄大肆抢掠。最后又轮到我上面讲过的曲周县麦子乌营了，受重伤者多人，教徒们的财物被洗劫，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匪徒就擒。

“5、……这些暴行的罪魁祸首都是义和拳、梅花拳和十八魁的成员。这些人联成一气，逗留在被他们蹂躏的土地上，五十，八十，一百，甚至二三百，结伙成群，造塔焚香，享受着抢掠得来的果实。……在周围二、三百里的范围内，他们都向追随他们的信徒发出集合的号召。……这些运动的目标总的说来是针对欧洲人，特别是反对传教士和他们的教徒，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他们有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称号叫‘洋鬼子’……”

附记：

“我还遗漏向您报告一事：十八魁还抓了两个教友，用绳子捆好后对之举枪瞄准。我们以为他们二人一定无法生还了，但他们却遇上了一个不很残暴的匪徒，结果把他们放了。这两人，一个是魏村的李伟俞(Li wei iu 译音)，另一个是潘村的董某。”

5月15日(星期日)传教士万其偈(A. Wetterwald)于威县魏村致主教函^①称：

“痴心妄想的追随者们接踵而来。昨夜，钟官营遭三、四十名匪徒袭击，情况与三周前麦子乌营所发生的事相仿，同样凶残狂暴，危及教友生命。所幸，众人均避至安全场所，无一人受伤。仅王多才(Wang tau tsai 译音)家遭殃，银钱、衣饰、被褥等，凡能带走之物均被洗劫一空。

“教友们追击匪徒，并抓获其中一名。

“在麦子乌营，齐会庄的周正卿(Tcheou tchen tsing 译音)在那灾难之夜的骚乱中因烧伤而死去。周清魁(译音)因伤终生致残，右臂不能动弹，肩部碎裂，伤势沉重，无药可治。这些情节使事态更加严重。

“我在各堂口发动教友们同时举行了‘进教之佑’圣母的九日敬礼。

“……潘村、马家庄形势十分危急，而且匪徒们一旦认为人多势众时，也定将进袭魏村和赵家庄。

“对我们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帮助教友们组织自卫，购买上等枪支。教友们定将欣然分担甚至支付全部费用。匪徒们当因此而有所畏惧。在江南，就有一类似组织。

“又及：被教友们抓获的那名贼人，招认了他就是袭击麦子乌营的那一伙的。他的差使是在房顶上放哨并叫喊：‘杀死教徒！’他招供了二十多个贼人的姓名。……我想，我们应该要这些不法之徒的脑袋，这是完全公正的。……对于此等卑贱恶劣之徒，无仁慈可言。”

5月15日献县天主堂大司铎葛光被于天津致主教函^②称：

“5月12日星期四晚8时，我安抵天津。星期五我见到了维西哀(Vissière)^③先生。他当天就写信给直隶总督，要求向该省南部各地方官员拍发电报，勒令切实保障传教士及教徒们的安全，并负责赔偿所蒙受的损失。他写信给法国公使，告诉他我已来到天津，并介绍了梨园屯事件的经过……

“明天，我将去北京。……我已准备好呈报给公使的有关材料^④。”

^① 原整理者注：这是1898年5月15日法国天主教威县传教士万其偈(A. Wetterwald)写给直隶东南教区主教步天衢的函件手稿。法文，墨书，共4页，每页21×13.5公分。

^② 原整理者注：1898年5月中旬，法国天主教直隶东南教区献县总堂大司铎葛光被率主教步天衢之命，到达天津、北京，为曲周县麦子乌营事件向法国驻天津领事和法国驻华公使团告状。这是葛光被15日和19日在天津写给主教的函件手稿。原件法文，墨书，共4页，每页21×13.5公分。

^③ 原整理者注：法国驻天津领事。按：两周后(5月29日)回北京法国使馆任一等翻译。

^④ 原整理者注：即1898年5月17日葛光被代表直隶东南教区主教步天衢起草的《直隶东南教会致法国驻北京公使阁下关于山东东昌府梨园屯事件的报告》。

同函5月18日(耶稣升天节)附言:

“我已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我拜见了我们的公使。……我呈送给他的报告,他已过目。我现在把报告的底稿寄给你保存存档备查。随报告我还附上一张地图,把属于山东的插花地都用红色注明,公使看了定能一目了然。我……已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它以电报向各地发布命令。维西哀先生已接到(直隶)总督的回信,他强有力地鼓励地方官员拿出诚意来,事实上这些官员一直到现在都表现得很好……”

“今天,大家都在等杜士兰^①先生。我就将赶回教区。这里收到由欧洲寄给献县的15只箱子。

“毕盛先生已收到你的信,托我向你致谢。他很高兴与传教士在一切机会中保持联系。”

5月17日直隶东南教会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关于山东东昌府冠县梨园屯事件的报告^②称:

“这次事件业经山东意大利籍传教士呈报法国公使团,并由吕班(Dubail)先生处理,但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受东昌府知府洪大人之命,一些士兵及文武官员已进驻梨园屯,但对于聚众闹事、伤害教民及损毁传教士房屋的义和拳、梅花拳、十八魁徒众们未作任何逮捕。

“中国当局……已宣布对住在威县我们教区境内的一名首领(沙而寨的赵老祝)免于惩处,只要他手下的人今后不再胡作非为……”

“会众们不断地在当地施虐。他们成群结伙,五十名、一百名,甚至二三百名聚集在一起,在地方上任意横行,以烧、杀、抢相威胁,使散居在十五个村里的四、五千名教友和该区的三名法国传教士时常惊恐不安。

“然而,匪徒们并不以恫吓威胁为满足。仅在我们的直隶教区,他们就在两三个月前抓走了我们在威县任用的两名职员,一个姓李,一个姓董。他们曾把这两个人捆绑起来,准备枪毙。幸而有一位较为开化的会徒从中调解,方得以保全性命。

“同一时期,也是在威县,他们在威胁恫吓之后,放火烧毁了崔家陈村教友的两所房屋。

“终于在不久前,即闰三月初三、四(阳历4月23、24日)夜间,午夜后不久,他们突然进袭辛营村。辛营俗称麦子鸟营,在广平府曲周县境内。当地的八、九十名教友正在我们协助之下,筹建一所小教堂。匪徒共三、四十人,配备着大刀、火铳等武器,有些人登上房顶鸣枪示威,并高喊:‘我们是十八魁,凡不是教民者,都不要害怕。我们是专门来消灭那些欧洲人的教徒的,他们胆敢在这里造教堂。’与此同时,匪徒们冲进教友们居住的地方。大部分教友均逃避隐匿起来。有个教友周清魁(译音)被他们在家中找到,并被盘诘兴建教堂的经费所在。一刀砍在其颈项上,斩断了长辫,并在肩头留下一处巨大的创口。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拳打脚踢,使这个不幸的人仆倒在地,奄奄待毙。其妻也遭痛殴。随后,其住所也遭洗劫。匪徒们在屋内找出四、五百吊钱(2又10分之三吊合一两银子),其中50吊是用于建造教堂的。最后,他们一边扬言还要再来,一边鸣枪往东北方向撤退,朝着相距25至30里外的山东梨园屯方向扬长而去。

“迄今为止,开州知州、广平府知府和大名府道台等地方官均表现良好。天津领事维西哀(Vissiere)先生刚刚致函直隶总督,要求切实保护教民们及传教士的安全,并赔偿所受的损失。但是,由于事情发生在属于山东的梨园屯,直隶当局不能随意处置。为此,我们向公使团求助,使你们知道由于梨园屯的难题未曾解决,而给我们带来了危险。山东的传教士们或许还会举出其他的事情来,我们则限于提供与我们有关的事。”

5月22日献县天主堂大司铎葛光被于天津致主教函^③称:

“……您的信使今天上午10时才到这里。11时,我去找维西哀先生,他就把抄写员叫了来,今晚

^① 新任法国驻天津领事。

^② 原整理者注:这是葛光被代表直隶东南教区主教步天衢写给法国驻华公使团的报告手书底稿原件,法文,墨书,全文共4页,每页21×13.5公分。

^③ 原整理者注:这是葛光被写给主教步天衢的信件手稿,原件法文,墨书,共2页,每页21×13.5公分。

他将把钟官营新发生的谋杀案告知(直隶)总督,使威县的官员们能及时接到命令,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准备在星期三或星期四动身前往疙(疸)[瘡]^①。我将雇一辆车,这样比乘船更快更便宜。”

《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附录二《外文资料(二)德军占领胶州的后果^②》辑:

5月16日耶稣会士克赖(du Cray)写于天津的信称:

“今天早上,我送葛光被神甫上火车前往北京。他此行将去找法国的新任代表,请求对刚发生在我们教区南部的骚乱造成的后果给以援助。最近有四十餘名外教匪徒晚上侵袭一个有若干教友家庭的村子,万其偈神甫正在该村建一教堂。匪徒们进村后,叫喊他们只与教徒过不去,要阻止教徒盖新教堂并要处死教徒。

“教徒都逃走了,只有一人因酣睡不醒而被抓住。匪徒们限令他交出为盖教堂所募集的资金,他不从,就挨了一刀,辫子被砍掉,肩上留下一个大伤口。匪徒们用刀砍他,打他的妻子,抢掠他的财产,拿走了他相当于六百法朗的银子,最后把他的十五间房屋付之一炬,临走时还扬言要再回来。

“这仅是中国发生的叛乱,德国人(制造的)事件在一些地区使传教士深受其害。主张黩武的人洋洋得意,但要动武,也应粗略地了解中国的事情。除了侵犯他人的权利以外,侵占胶州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居住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5月26日耶稣会士马泽轩(Maquet)^③的信称:

“不祥的谣言不断传来,外教的帮会分子甚至议定了屠杀全体传教士和教徒的日期,因为他们把传教士和教徒视为德国人侵占胶州的原因。他们到处张贴煽动性的布告,一直贴到大名府的城门上。已经发生两起灾祸,我们必须为此向北京求援。前天,赵家(祖)[庄]堂口遭到夜袭。幸亏值夜的人及时发觉,鸣钟报警,两分钟内勇敢的男教徒都起床集合了,强盗们听到警钟声和鸣枪声就逃之夭夭。我们的教徒无法安居。……昨天,万其偈神甫离开威县到这里来休息几天,他的教徒因此晚上就没有睡觉,恳求他马上回去。”

6月15日耶稣会士鄂铎宣(Gouverneur)^④写于献县的信称:

“中国人,除了若干思想特别开放的人以外,对外国人的入侵,不论是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都怒目相视,不会有丝毫的好感,一些秘密组织(一帮匪徒和亡命之徒)尽力在各地进行扰乱。

“将近4月底时,居住在离这里180里的魏村的万其偈神甫,派一名信使从大名府来到我们这里。

“晚上,一帮匪徒侵袭距魏村几里路的一个堂口。这帮家伙大约就是‘白莲教’或称‘十八魁’,也可能是‘大刀会’的成员。他们晚上出现,像魔鬼般地大嚷大闹,扬言只和天主教教徒过不去。我们可怜的教徒惊惶失措,只得四散逃命!匪徒们攻打一个最富的村民的房屋,他们用刀乱砍屋主的背部,用棒打他的妻子;放火烧毁了房屋,抢走所有细软的东西(约值500吊钱)。临走时,还扬言要再来。一位老年教徒想从大火中找回他藏在房中的银子,结果烧伤了脸部。几天后,他因烧伤和受惊而一命呜呼。

“万其偈神甫清晨就赶去察看抢劫的现场,并给在大名府负责与官吏交涉的神甫写了一份报告。大名府的官方答应尽快行动。……但我们是在中国,到我写信时为止,实际上还不见有什么动静……

“这一事件刚告结束,万其偈神父派出的信使又来报告说,匪徒在晚上又攻打了一个村子。这一次,村民已有所准备,夜袭并未造成巨大的损失,匪徒偷走了一些东西,只使人虚惊一场。但从这两次夜袭后,这个离大名府180里的地方人人惊恐万状。不论教徒或外教人晚上都不敢安睡,整夜有人值班防盗。各村由于不能指望军方提供有力的援助,就努力贮藏枪支和生锈的老式大炮……修建土墙……在房屋平顶上堆置砖块……这就是四月底发生的事情。”

“阴历三月初七(1898年4月27日),上千名好闹事的考生聚集在县城内进行乡试,大名府四周

① 即范家坨。

② 原编者注:本通信见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通讯刊物《中国与锡兰》(法文)1898年本。

③ 马泽轩(Maquet 1843—1919),字霖浦,法国人,直隶东南教区第四任主教。

④ 鄂铎宣(Gouverneur 1859—1906),字匡时,法国人。

的墙上出现了一张布告。

“教徒们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我们就派传教先生去扯下一张布告，并通知了官吏。

“下面就是该布告的全文：

布告

鉴于西方洋人按他们的做法到处越轨行动(乱窜)，各省的勇士(中国十八省)决定于阴历四月十五日集合起来去杀洋人并烧毁他们的房屋。凡不赞成我们的人都是盗贼和淫妇，凡读本布告后，不为之宣传者也是盗贼和淫妇。足矣，无庸多言！^①

“县令采取了措施，发布一道命令以保持局势的平定。但这些布告引起的谣言仍到处流传，许多中国人真的相信四月十五日将发生大屠杀。为此人们采取了预防措施，大名镇的总兵(军事首长)派士兵到处设防，县令亲自下乡视察有教友的村子，劝告乡民和睦相处。

“5月3日教会学校的磨坊管理员像平时那样，驾‘水车’出去为我们采购日用必需品。在距东门两里地的一个井旁，找到一个装有若干铜钱和一封信的丝绒钱包。

“他回家后，把信出示给一个识字的中国人看，这人已把信转交给我，说：‘神甫，这信中包藏祸心。’

“这信词句晦涩，是出自密谋者的手笔，其主要内容是：

老兄，前天所作的决定，应予以执行，我将前往贵处共商大计。……如果我不能启程，则你务必在阴历四月十五日之前光临寒舍。注意，别作声！X村及Y村已征集了不少人。

愚弟×××

“这封信似乎与布告有关，我把信转交负责与官吏交涉的神甫。几天后此信又转交给县令，他很高兴知道这些消息，并说，事实上X与Y村子早已成为那些坏家伙的贼窝。

“我不知道此事将如何发展，但如果这封信真能使当局得到追查罪犯的线索，则可能这是出自天主的安排使这信刚巧遗失在路上，又被一教友拾到，最后落到我们手中。

“阴历四月九日我前往距大名府东北70里地的教徒村子刘来河，主持圣神降临节。

“一切都正常，但我们的中国教徒由于受谣言的影响，有些坐立不安，情绪容易激动。某夜，传教先生神秘地来对我说：‘神甫，当你在邻村与某神甫在一起时，有一个穿百衲衣，但举止风雅的人在教堂周围转来转去。……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山东人。我问他想干什么，他说要见神父，毛遂自荐想在这里教书。……根据这人的回答，我认为这家伙是一个暗探，前来察看情况以便下毒手。我对他说，这里没有神父，你可以走了。……但我怕晚上有人来攻打教堂，我将叫教徒们值夜，保持警惕，让他们睡在神父房间周围的院子内。’我回答说：‘随你的便吧，但我不相信有人会前来攻击我们这个都是教徒的大村子。’这个晚上过得很平静。第二个夜晚，我就叫这些勇敢的男教徒睡在我的‘纸窗’下(即房间的窗外)……

“圣神降临节过后，四月十五，预定进行大屠杀的日子，我离开大名府去献县。……事实上，我八天的长途旅行，一路平安……

“这一次，我改变了行程，以便去探望几个新开的堂口。

“第一天，我在葫芦营吃的午饭。在这个村子里以前白莲教很猖獗，村民以富有反抗精神著称，被杀的很多，部分房屋被夷为平地。今天，这里已成为一个很虔诚的教友村子。

“晚上，我在南里窑^②(位于大名府西北100里)歇脚。第二天清晨3时，我做完弥撒就赶路争取到威县吃午饭。

“威县城内，我们有一栋房屋，但看房的人不在，我只得在客店内用餐。中国明显地在西化：人们领我进入一间房间，四壁贴的是欧式的糊墙纸，菱形格印有朵朵红花，这是很大的进步！不像过去的客

^① 此文字和下文信的文字是从法文转译过来的，读起来很别扭。

^② 应译作“南里岳”。

店,用泥墙隔成小间,被烟熏得乌黑,墙上涂满乌七八糟的字样。

“晚上,我抵达魏村,遇到了万其偈神甫。

“万其偈给我讲了新的插曲。匪徒们向距魏村四、五里地的堡镇发起了新的攻击,但由于当地一名教徒秀才事先组织了一支值夜的队伍,购置了枪支并把枪支发给了一些忠实可靠的男子,因此匪徒的阴谋无法得逞。警报钟声一响,全村立刻处于临战状态。

“离魏村2里地的赵家庄也有过一次警报。这里是一个教徒众多的大堂口,常住着二、三位神父。约有80名匪徒在田野里徘徊,首先被两个守夜的人发觉,发出了警报。……顷刻间,全村处于临战状态。该村共有六、七百名教徒,匪徒们不想和他们较量。

“第二天,我在赵家庄过主日(星期天),看到神父们因熬夜而疲乏不堪。村上的人从土中挖出三尊老式大炮,装上了炮架。这些不伤人的装置给大家增添了安全感。因为在中国,叫喊得最凶的人就是强者(最有力的)。

“我终于又回到了献县。

“今天我暂不向你详细汇报关于一年内传教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尤其在本省的南方。皈依天主教的运动方兴未艾,但愿唯利是图的欧洲人不要弄糟我们的事业。占领几个海口真不错,但这要付出传教士的生命为代价,更坏的是这可能阻碍了外教人,尤其是乡下人皈依天主教。”

《外文资料(三)处于临战状态的赵家庄堂口^①——耶稣会士伊索勒的日记^②》载:

“义和拳暴动

“1898年10月25日,星期二。上午10点钟,有人将义和拳敌对派的暴动的消息告诉了我。……他们同官吏妥协,只进攻基督徒……

“10月27日,星期四。由于发烧支撑不住,我让罗泽溥^③神甫和孙玉德^④神甫轮流负责查夜。土匪没有来……

“晚上,我……将院内的工友武装起来,派他们站岗……

“10月28日,星期五。教徒们恳求我给当地官吏送个信,要求采取措施,组织防卫力量。对所有这些懦夫,我庄严声明:既然在你们这儿我受到的只是缺乏诚意,既然你们把防卫的费用与操劳都让我一个人承担,那么罗泽溥神甫、孙玉德神甫和我,就要卷起铺盖到魏村去。那里的人们心眼好,也通情达理。‘什么,神甫要离开赵家庄吗?’‘是的,我要把一切都带走,甚至连大炮也带走了。’

“组织民团

“我的威胁起了作用。附近4个村子的教徒们召开了大会,组织起一支民团以卫护他们的利益。几名骑马的侦察人员挎着枪,在我为他们祝福之后便出发去侦察土匪们的踪迹。民团的后勤部门也设立了,战事委员会就设在神甫的住宅内,他们当着坐在走廊里的三位神甫的面号召大家参加。有166个男人响应号召,受到了鼓励。罗泽溥神甫说的那句鼓励话是‘唯命是听’,颇有军人气概。晚上九点了,值夜的人们分派了站岗的钟点。

“10月29日,星期六。一夜无战斗,也没有睡觉。土匪们一村又一村地进行抢(劝)[劫]、威胁。白天我们忙于听神功,教徒们都涌向神功架进行忏悔。我时时受到前来送信的人的干扰;今天进攻就要开始了,人们惊慌失措,挖地窖掩藏自己贵重的东西,女人们想逃走。我告诉他们要是有一人开小

① 原编者注:本文译自法文《中国与锡兰》1898年本。《中国与锡兰》是法国耶稣会香檳省传教士通讯集,1898—1900年每年出版一本。伊索勒神甫是法籍耶稣会传教士,1898年在直隶威县赵家庄传教。威县赵家庄堂口属于耶稣会直隶东南代牧区管辖。直隶东南代牧区是在1856年从北京教区分出,总堂最初设在这里,由郎怀仁任主教。1861年总堂迁至献县张家庄,赵家庄只成为一个重要的大堂口。这篇日记,详细记载了1898年10月25日(阴历九月十一日)赵三多义和拳起事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赵席珍是伊索勒自取的汉名。

② 落款为:耶稣会士伊索勒。

③ 罗泽溥(1852—1902),字润民。法国耶稣会士。

④ 孙玉德(1863—?),字宝林。河北深县人。耶稣会士。

差，我立即就离开这里。

“威县的官吏派来了他的代表人和10名巡夜的士兵。明天星期天，得对教徒队伍举行盛大检阅，炫耀一下军事实力。

“检阅武装队伍

“10月30日，星期天。教堂里人群拥挤，大家集中注意力聆听讲道。我藉此机会大讲罪人悔改，我让全村的人来作良心的反省。当时人人都很感动；恐惧，又缺乏自白的能力，使他们的心都在颤抖。弥撒后，大家都来忏悔，真是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呵！万其偈神甫来同我们一道共进午餐，在他们那里也是同样的情景。因为是星期天，教徒们中午来教堂作祷告，罗泽溥神甫主持点名。那些异教徒正从四面八方赶来。好极了，土匪们将会知道教徒们人数甚众，而且装备精良。

“晚祷之后，教徒们在魏村和赵家庄之间的田间又重新集合，商议军火问题，所有的中国式的鸟枪和炸弹均被征用。静悄悄的夜晚枪声大作，不久炮声齐鸣……

“突然有一个倒霉赶来了，这个名叫殷吉祥的人……想把未捆扎的火药上装到还发烫的炮膛里面去，反倒炸到了自己身上。罗泽溥神甫马上赶去抢救，听这位负伤者的忏悔，并给他进行了临终涂油仪式。

“10月31日，星期一。今天早晨我给病人送了临终圣体。他毫不抱怨，虽则他痛苦难受。他想，他的不幸遭遇会使他在天堂内赢得花冠，因为他是为了宗教而献身。我们全天都在听神功，直到深夜。

“11月1日，星期二，这是一份我们军队的人数清单：赵家庄，有作战能力的为166人；魏村，196人；潘村、陈家庄和其它4个村子共117人，总共477人。中午，有人郑重其事地给我拿来了写在大红纸上的军队守则。经神甫签字后，这些守则就产生法律效力。我在8条条款下签上了名，8条的结语都是：如有违犯，罚款3吊。

“发生这些事件对我们的教徒不是没有好处的。多年不说话的冤家和好了，欠债还清了，对宗教冷淡的人也去领受圣事了……

“11月2日，星期三。夜格外宁静。白天为学校女教师们的启程安排一切，有8辆大车将她们送往各地。

“备受洗劫、焚烧的堂口

“11月3日，星期四。山东省的一个名叫红桃园的堂口遭到袭击、抢劫和焚烧。至少有3名教徒被杀戮。土匪们向其中一个人问过8次：‘你还是天主教徒吗？’他始终回答：‘是的，我是天主教徒。’在第八次上，他们杀害了他。这不是一名殉教者吗？另有一个教徒双颊被长矛刺穿，其它部位负伤也很严重。我们都得有所准备。

“中午，发出了警报，有人敲响了警钟，大家奔去拿武器。只见东南有一大股烟，这是第三口——罗泽溥神甫管理的堂口起火了。少顷，逃亡者来了。他们是在乱党进村时离开村子的，惊恐万分。很快大炮进入阵地，但魏村的196人尚未来到。我一个劲[儿]派人给万其偈神甫送信，最后我亲自穿过田野去那里，我遇到了万神甫和他的人马。

“回到赵家庄，我派人去通知官吏说敌对行动又开始了。他答应救援，可是毫无动静。将近下午4点，我写信告诉官吏今天必须救援。晚饭后，我跑到万其偈神甫处，同他商议女校和孤儿院的命运问题。我们都同意把孤儿们分散到一些家庭中去，女教师们回到各自的堂口去。

“然后，我们便等待官兵的到来。第一名骑马兵和我们的人遇上了，要求别朝后面赶来的人开枪，说完他又策马奔回。半小时后，另外两名骑兵又出现了，官吏派他们来问问紧急救援是否绝对必要。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们又回去了。

“这个时候，我去看望操练场上我们的人，鼓励他们并为他们祝福。末了，将近11点半，听到号角声，官吏的军队来了。哎！无用的军队，即使在我们同乱党激烈战斗将要结束的时候，他们也仅仅局限于自卫和绕着教徒村庄巡逻而已。

“11月4日，星期五。早晨我去城里拜见大官吏。我等了3小时，仍没有见到。返回途中遇见冯

广济^① 神甫……

“11月5日,星期六。今天早晨我欣然向多年来与圣事疏远的人们送了圣体。我给人家补办了宗教婚姻仪式,中止了这事造成的恶果。确实对我们的教徒来说,这些考验相当于一次传教运动。

“中午,到城里去的送信人给我捎回来了消息:官吏不相信有什么危险,他说那些人不是土匪,而是一群想闹着玩的人。……这样说来,纵火和屠杀教徒仅是在开玩笑的儿戏而已。简直是哄人!

“请看罗泽溥神甫的堂口遭受抢劫的一些细节:11点钟,一伙骑马的人突然出现在第三口。……一声枪响,他们就冲进了村子。乱党朝着教徒的家和教堂跑去,抢劫便开始了。粮食、铜钱、食品,所有的动产统统被抢劫一空,所有不能带走的东西都被付之一炬。到处逃命的我们教徒,只好眼看大火烧毁新盖的教堂、神甫的房子、讲道所和他们自己的房子。有一位寡妇是堂口的善士,目睹她慷慨解囊的果实被毁灭,痛苦万分。所有这些勇敢的人们无家可归,身无分文,没有被子,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再没有别的衣服。他们纵然流着眼泪,但仍然逆来顺受。他们中有一个人对我说:‘我有天主、圣母保佑,就足够了。’即使是一位圣人恐怕也不能回答得更好。

“唯有一个教徒表现不很忠诚,这是一个最近才信教的老头。他所有的亲人都是不信教的。……他失去了殉教的荣誉,现在正捶着胸膛承认他犯了重大的罪恶。

“战胜乱党

“……在若干里地以外的山东士兵向沙寨一伙大约200人的土匪发起进攻,有30或40人骑马逃跑。战场上留下了其中一人,其他的人躲藏到朋友家中。更有几个想不出好主意的人躲在柴堆或麦垛里,一枪打过去便着了火,有两个家伙在里头活活烧死,其他的人被逮捕住。总计,打死3人,俘虏10人,这便是胜利的捷报。

“这就足以使我们的教徒欢天喜地。……暂时,我以为危险是解除了,但是还必须继续站岗。唉!我们就是遇不到几个有魄力的官吏敢于干脆禁止土匪聚众闹事。在吴书恩^②神甫和贺乐耽^③神甫处,一切太平,这都多亏遇上有警惕性的官吏啊!”

《中国基督教史略》第六章《中国的东正教》载:

“1898年……中国东正教会的事业全面展开。东正教会在直隶永平府创办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1915年有583名中国信徒受洗,1916年全国东正教徒总数达到5587人。”

1899年 光绪二十五年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辑:

1月16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张汝梅为红桃园各案已办理了结事咨呈总署文载: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据洋务局详称‘案:据临清直隶州知州王寿朋、署冠县知县曹侗稟称“……遵查此案,前于九月十二日,被烧陈家庄教民李长忠等两家房屋十四间。十六日,被烧小里固教堂房屋七间。二十日,被烧红桃园教堂房屋九[间],教民朱北为等七家房屋三十一间半。共六十一间半。曾经卑职亲诣勘明,飭据团长协同教民将被烧房屋、衣物及与孙家庄教民马玉林一家失少衣物等件开有失单可凭。二十一日,拿获匪犯十九名。……又,教民业已回归……等情到局。……俯赐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销案……’等情到本部院。”

1月23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裕祿为陈明冠、威拳民闹教缘由及办理情形事咨呈总署文载:

“据大顺广道庞鸿书详称‘……因本年九月初间,闻有讹传山东文武各衙门出有批票要拿拳民,都

① 冯广济(1848—1901),字慈舫。法国耶稣会士。

② 吴书恩(1849—1915),字敷仁。河北深县人。耶稣会士。

③ 贺乐耽(1839—1905),字如瑟。法国耶稣会士。

各害怕，疑系山东临清小卢等处教堂指使所致。姚洛奇随即起意传帖聚众，拟合教堂拼闹。威县沙而寨即沙柳寨拳民赵洛珠即赵三多与姚洛奇系属素识。姚洛奇因其不愿随同出来领众滋闹，随叫人于九月十二日将赵洛珠架到直、东交界处所，逼胁出头。姚洛奇复向各处添裹拳众，敛借马匹。当经万前升道据禀咨请大名吴镇率带马队前往弹压，并……谕飭三县^①团总、绅董前往开诚布公，晓以利害，向拳民极力劝谕。赵洛珠随向姚洛奇合拳众们当场叩头，亦请解散。该拳民等深知悔悟，即于十七、八日纷纷解散回家。……诂山东冠县红桃园教民向解散回家之拳民用言刻薄，姚洛奇复心怀不甘。……又复逼胁邀聚共至七、八十人，突于十九日夜五更后到红桃园放[火]烧教堂及教民房屋，并杀死教民二人，击伤一人。二十日，路过威县第三口村，姚洛奇复又喝众焚烧该村教堂及教民房屋二十餘间，并未伤人。二十一日，该县威令^②会同大名马队徐营官辅廷及委员高令、张主簿并邱县李令暨移会冠县曹令各督勇役，追至威县侯未村地方。合力拿获首犯姚洛奇及从犯十五名，格斃四名，并马一匹。……二十三日，该府……亲诣第三口村勘明被烧小教堂平房九间，教民杨兴凤、石景行家平房各九间属实。……范教士迪吉亦于十月初四日来威。……初五日，议定赔偿教堂一切房屋及屋内器具等物，共估赔京钱一千二百吊。又抚恤被烧教民杨兴凤、石景行等京钱三百吊。当由该县将钱如数备齐，交由委员赵巡檢、陶经历面交范教士收清，作为一概了结。……此外，威县西钟营教民王多才家被劫钱、衣等物一案，除……不计外，其由该县威令缉获逸贼……六名……已经提省审办，并由道批飭该府勒缉逸贼苏洛行即苏六等。……共曲周县辛营村教民周清宵家被贼劫去钱物并烧毁房屋暨事主周治清旋即因伤身死一案，除被烧房屋十餘间……当由该府筹给京钱二百吊并交该教士^③收领，作为此案了结之款不计外，计由该县先后缉获，正贼……四犯，已经讯明从重正法枭示并蒙宪允批飭该县严缉逸贼于玉等，……’等情到本大臣。”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

1月22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裕祿奏陈遵旨妥办交涉事件各情摺称：

“查华洋交涉，以通商传教为大宗。天津口岸近年展拓租界，各国恃强横索利益，任意刁难，办理备形棘手。而各属教堂林立，入教之人往往欺压平民。教士不问事理曲直，多方袒护。迨至民间积忿已深，铤而走险，则又归咎于保护不力，借端寻衅。此等案件地方官无不力与争论，设法了结。乃彼族要求无厌，动辄电告驻京公使径向总署饶舌，致多周折，外间固无如之何也。”

《教务纪略》卷三下《章程》辑：

《总理衙门奏定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④载：

“近以民教多不相安，叠次钦奉谕旨严飭各省地方官切实保护，不啻三令五申。而各省教案仍复层见叠出，办理殊形棘手。因思地方官切实保护教堂、教民，必须平日与主教、教士善为联络，情意相通，而后彼此悉泯猜嫌，小事可消化无形，大事可和衷商办。昨由臣等与法国主教樊国梁商订地方官与教中往来事宜各条，并由樊国梁送交法国驻京使臣毕盛阅看。据称所订甚为周妥，应请奏明照办。该使亦分行各主教遵照。等因。兹特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通行各直省地方官切实遵行，或亦消弭教案之一助。

兹因天主教现在中国各省建立教堂，久奉国家允准奉行，欲使民教相安，便于保护起见，议定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各条如下：

一 分别教中品秩。如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相同，应准其请见督、抚；倘主教因事

① 直隶威县，山东冠县、邱县。

② 署威县知县戚朝卿。

③ 范迪吉。

④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作《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1899年3月15日)庆亲王奕劻等奏陈地方官与教中往来事宜并缮清单呈览摺》，内容多二条，分别涉及教案由法国驻华官员与清朝官员商办了结和民、教双方平时应各受约束等项，其它文字亦互有出入。其“分别教中品秩”条于1908年3月12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奉旨撤销，文见《清末教案》第三册辑该日《庆亲王奕劻等奏为改正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等片》。

回国或因病出缺,护理主教印务之司铎亦准其请见督、抚。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请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请见府、厅、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

一 总主教或主教应将所派端与官长交涉办事之各司铎名姓、教堂住处,开单报明督、抚,以便飭属照章接待。凡请见地方官及专派办事之各司铎均应泰西人充当。或有时西司铎未能熟悉华语,可暂令华司铎帮同传译。

一 总主教或主教居住外府,无事自不必远赴省城请见督、抚。遇有新督、抚莅任或总主教、主教更换新任或贺年节,均准其向督、抚修书或寄递名刺致礼,督、抚亦如礼答复。至各司铎更换新到,应持有主教函据,方可照品秩请见司、道、府、厅、州、县等官。”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一章《北堂迁西什库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二十一、戴主教去北京后,正定代牧区的情形

“……皈依外教人有重大困难,因为没有能干的传教先生。不易找到从前的好教友,不受薪水,而尽忠此职。皈依的人愈多,愈需要许多的传教先生。而另一方面,教友大都穷苦,不易离开家庭,因为当赡养一家大小,而教会自身穷苦,给传教先生的薪水不敷用,于是乃以圣保禄会来解决这问题。

“二十二、圣保禄会

“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一位传教士,在教区中已传教十五年,名孟爱理 Morelli 建议创立一个男子会,以帮助神父的一切工作,特别对教外人讲道及培植新教友方面。包主教立刻赞成这个主意,并愿新修会以圣保禄为主保,取名圣保禄会。

“包主教乃召集了几位有资格的人,命他们守孟神父订定的规矩,由陈世骏神父负责管理……

“最初他们只发贞洁、听命二愿,以后加上了神贫愿,为期一年。他们的服装,为中国人普通的黑色布衣。

“他们主要的热心神工,为念玫瑰经及默想。

“……主要工作为望教学校、经言学校及小学。

“法典公布后,保禄会完全照法典所规定,约有五十名发愿的修士。

“……包主教弄到几笔基金,以应付紧急的用处,而不动用每年的经常费。

“在他管理十五年中,正定代牧区组织完备,分成八个总本堂区,每区有一位总本堂,由二、三位传教士助之。

“在四百四十村庄中曾宣讲过道理,大教友区才有圣堂。一九〇〇年共有八座圣堂,二百四十座小堂。在许多村中,设有聚会念经的场所。”

第十二章《樊国梁主教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十一、樊主教的布告

“……因樊主教建议,一道皇上的谕旨规定天主教的正式规则,为此亦名樊主教的布告……

“此地我们提出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三月十五日这谕旨的要点:

自我朝廷准许天主教传教后,在中国各省,教堂林立。现在我们希望人民与教友和平生活,为此决定地方长官与传教士间拜谒如下:

(一)1、在教会阶段中,主教等于总督及省长,可请求会见总督与省长。2、副主教可会见财政厅及省法官。3、神父可会见知府及以下官员。

(二)教会发生案件时,主教与神父可与地方长官直接交涉,以解决之。若案件重大,主教及神父可请求教会授予保教权的国家之公使或领事加以干涉。

“十二、樊主教的布告受人欢迎……

“十三、二位新主教

“一八九九年……教宗良十三世……将直隶北部代牧区分划,以形成直隶东部代牧区,任命武神父 Guerts 为这代牧区的第一任主教。

“樊主教已六十二岁，自觉精力日衰，请求有一位辅理主教帮助，亦得所求。乃任林懋德神父 Jarlin 为主教……”

“十四、武主教与林主教

“武主教 Guerts 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九日生于荷兰马雷地方。一八八二年十月八日进遣使会，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九月十九日抵中国，一八八七年五月一日在正定升神父。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诏书，任他为利脑角的名义主教，及直隶东部的宗座代牧，一九〇〇年二月四日在鲍立地升主教，因中国有拳匪之乱，光绪廿七年（一九〇一）三月三十日他才能上任。

“林主教 Jarlin 一八五六年正月二十日生于法国爱罗省寒特地方。一八八四年五月七日入巴黎遣使会，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十一月四日抵中国。一八八九年正月二十日在北京升神父。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廿八日的诏书，任他为法培多的名义主教及樊主教的辅理主教，有继位权。光绪廿六年（一九〇〇）四月廿九日，樊主教祝圣他为主教。

“十五、中国遣使会士的代牧区的教务情形^①

“一八九八年——一八九九年的遣使会士教区的人事图^②：

	直隶北	直隶西
教友	43894	32263
宗座代牧主教	1	1
客籍遣使会神父	23	10
国籍遣使会神父	16	9
国籍教区神父	20	10
大修士	23	9
小修士	88	47
辅理修士	2	2
保禄会士		9
仁爱会修女	31	36
若瑟会修女	63	52
成人领洗	1711	447 ”

《西湾圣教源流》第六章《巴公为代牧时底经过》第七节《季司铎代理中蒙古教区》载：

“一八九九年，西湾子村为一区总堂，计有五个本堂属地，兹列表于下：

“西湾子 一五零九教友、八十个修道生、四九六孤儿；属下一六堂口，本村和周围各村共计三一零零教友。

“高家营子 二四二教友；八个送弥撒堂口，共计六八九教友。

“五号村 三九二教友；七个送弥撒堂口，共计七五一教友。

“白桦沟 一六四教友；六个送弥撒堂口，共计五七八教友（头一位本堂在一八九四）。

“黑麻胡和它底两个送弥撒堂口，共计七九九教友；

“平定堡和它底三个送弥撒堂口，共有九八九教友。”

《文物春秋》总第 4 期《法国传教士关于成安地区大刀会活动的报告》辑：

9 月 27 日孙汝舟^③ 神父关于成安县、魏县、元城县的教务报告^④ 称：

① 此行原书排版时误植于上一段（“林主教 Jarlin”云云）之前。

② 直隶省以外的不列摘入。又，原数字为汉字。

③ 孙汝舟（1853—1913），字广济。法国耶稣会士。

④ 原整理者注：这是 1899 年 9 月 27 日直隶东南教区负责大名府成安、魏县、元城县教务的总本堂孙汝舟（Neveux）从威县赵家庄写给主教的亲笔信。原件法文，用色格纸蓝墨水书写，共 20 页，每页长 19、宽 13.5 公分。

“不管大刀会今年如何在我区积极宣传,成年领洗者及申请人教者的数字并不低于往年。从一个相当奇特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匪徒最盛之处,也正是以前领洗及申请人教人数最多的地方……

“成安是全区大刀会最多的县份,仅在城里就有二千多名。……他们听从一名教官的指挥。……在成安,他叫‘刘胜先’;在山东,他尤以‘刘二疯子(刘家第二个疯子)’闻名。……他是率领一伙杀人匪帮杀死两名德国神父的头头。这两名德国神父的死曾导致了胶州的被(德国)占领。……一年内,刘或他手下的人找过我们一些麻烦,但都和平地解决了,或者由于起诉不易而逐渐平息下来。去年,为了一桩危及要毁掉一处很有前途的会口的诉讼,我曾许下誓愿:倘若事情按我的意愿解决,我将把整个县份奉献给圣约瑟^①。事情并不好办,因为当地助理传教士的愚蠢和轻举妄动,几乎把一切全搞糟了。后来,我如愿以偿,于是已将我的允诺付诸实施,一副美丽的圣约瑟大画像被供在城里教堂的祭台上。然而,今年大刀会又在两个村里挑起事端这两个村庄是除了县城和县把总所在地大堤西以外,匪徒最多之处,是在大寨和刘胜先即刘二疯子的总部所在地林里堡。我依旧向圣约瑟求助。不到八天功夫,圣约瑟在他的月份(3月)里,调停了这两件事端,及在这两件事情结束时又发生的第三件事情。那是在野庄,也是一个匪徒众多之处,大堤西、大寨和野庄的大刀会劫掠了成安及其附近地区我的教徒的家庭。值得提出的一件事情是:几乎全部我们在成安的房屋都未遭毁坏,而别处都成了一片废墟。我说‘几乎全部’,是因为在西彭留、县城、大寨、西范町、林里堡,我们的房屋大都安然无恙,只有艾束的房屋被毁掉了。匪徒们在我的住所和厨房放了火。他们也想在教堂那座大建筑上放火,但没有成功。这样,他们撤走后,留下了五间完整的房屋。村里的教外人士怕匪徒再来,就在次日拆掉了这几间房屋,但把材料保存起来,以便在骚扰及教难结束后归还给我。……至于教友们,他们蒙受了沉重的灾难,他们的房屋几乎全部被焚毁。在大寨,教友们还被勒索,硬要他们缴纳1300吊铜钱。在成安,一个申请人教者被迫花费1500吊铜钱赎身。在艾束,教友们与非教徒之间的关系处得极好,因此教友的数量逐年增加。最近发生的那些非教徒与教友们通力合作抗击大刀会的事例,推动他们更进一步地精诚团结。

“在大寨,尽管处于城里大刀会的经常威胁之下,今年还是有许多人领受洗礼。教友们的信仰既明确又坚定。

“在西彭留,也有一定数量的领洗者和许多坚定的申请人教者,他们都属于一些人口众多和有名望的家族。有十几名妇女跟随一名女助理传教士在学习祈祷,其余的妇女对正在酝酿之中的骚乱心有余悸。

“在林里堡,有二、三十人受洗,有四、五十个坚定的申请人教者,他们几乎都属于同一个家族,其中很少有穷人。由于家人的传授,妇女和女孩子们也都学会了一些祈祷经文。

“在成安城里,除一人以外,教友们的举止可称典范,但有不少申请人教者慑于城内大刀会人多势众而退缩了。我曾看到我们城北街那位邻居的事情又在一名相当富裕的糕饼铺老板身上重演,那位邻居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他被敲了1500吊铜钱竹杠,由衙门里的人、大刀会和被视为保护他的调解人坐地分赃。

“尽管城里的会口教徒人数不多,由于有一名助理传教士的经常到来,所以每天都吸引了许多人来听布道。在骚乱爆发时,正有不少村庄提到要请助理传教士来布道。

“西乡义和白范町会口的教务没有什么进展,这是些几乎没有发展前途的老会口。

“在结束关于成安的报告时,我要加上刘胜先的事情。这个杀死两名德国神父的凶手已在当地伏法,上帝的裁决终于使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是使他致死的一个偶然因素。……春天,我在此人的总部所在地,离成安城三里的林里堡购置了一处房产,由于钱不够,不能全部付清房价,房东同意我在秋天再偿付那尚欠的180吊钱。……刘胜先觉得在他的总部所在地竟然还有一所供祈祷的房屋安然无恙,这对他是一件丢脸的事,于是就率领手下的徒众前去毁房。那位房东不许他们这样做,说由于我

^① 应译作若瑟。下同。

还欠着他一大笔款项没有还清,所以这所房子还是属于他的,如果把房子拆毁了,受害和破产的是他而不是那个欧洲人。刘胜先根本不予理睬,房东就破口大骂。于是,刘胜先令人拴住房东的大拇指,赤条条地吊在房梁上,狠命抽打。他越打得凶,听到的骂声越厉害。他听不下去了,就令人点燃起火炉,烧红一根铁条,烙遍受害者全身。而后者却骂得更厉害了,直骂至精疲力尽为止。这时,受害者的儿子跑到城里请求知县干预此事。知县回答说,他怕招来麻烦,不敢干涉。儿子于是跑去向他父亲的朋友。一名秀才求助。他父亲原是个庠生。秀才派人将名片送给大刀会首领,请求饶恕他的朋友,刘胜先将名片掷在地上,一面使劲践踏,一面说:‘对待秀才和庠生,我就这样!’另外,秀才自己到县衙门去要挟知县说,倘若知县不干预此事,他将召集当地全体庠生,决定不再派生员赴考。这一举动在中国有其特殊的严重性,它定将导致官员下台,因此知县害怕了。但为了不过分得罪那匪徒,知县没有发传票去传他,而是发传票去传那房东。刘胜先见到传票后,对于知县想带走他的战利品十分恼火,于是更痛加鞭笞;随即又改变主意说,他将亲自押送该人前去见官。这样,他毫不延迟地牵住房东的脖颈,拴在马背上,由随从们簇拥着,飞奔前往县城。这种失礼的举动,惹火了一些衙役,他们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刘胜先大怒,说他的权力比县官大得多,对他来说,杀一条狗,杀一个县官,杀一个贡生,都算不了一回事。听到头领这番胡言乱语,随从们怕事情弄僵会使自己首先遭殃,就纷纷溜走了。‘大刀会逃走啦!’人们叫喊着。这时,一个原来是大刀会的年轻人,过去受刘胜先虐待,这时见到他身边无人护卫,就想戳他一枪。刘胜先用他那把从不离身的大刀,由肩至手砍下这个年轻人的半支胳膊。另一个仇人把枪拾起,刺进匪徒肋部,把他打倒在地,气息奄奄。衙役们慌忙进去禀报事情的经过。‘他死了吗?’知县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不安情绪问道。‘没死,’衙役们答道,‘但也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要看到死的而不是活的。’一听到知县这句话,衙役和民众一涌而上,扑向匪徒,用砖头、军刀、长枪等,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割裂其身躯,捣碎其头颅,片刻之间,只剩下一堆变了样的、完全不具人形的东西。他的头部仅留下拳头般大小的一块颅骨,身躯成了一堆可怖的破布和碎肉的杂烩。这个曾经领头残酷迫害宗教,企图蹂躏中国教会的恶魔就这样在7月26日一命呜呼了。

“现在,谈谈魏县的情况。在县城南郊,教徒人数还不很多,但有大批申请入教者,这些人分布在如今依然荒芜的旧城区周围。在县城四郊都有申请入教者,北郊、东郊和东北郊(东小门),还有西郊、西北郊(西小门)。城西数里的赵而寨^①有五家大户申请入教,城东4里的房而庄^②有100多名申请入教者,其中60多人属于同一个家族,都是些安分守(纪)[己]靠劳动发家的农民。在南郊,只有四、五家人家有发展前途,其余大都是充数的。附近的受洗教徒和申请入教者每星期日都集合在一起做祈祷,把4间祈祷室挤得满满的。还是应该在城内造些房子,使周围的各教徒居民点之间都设有位置适中的教徒中心,以便神父能在那里建立中心学校,定期前往。西郊距附近各教徒居民点约有7至9里之遥。

“除了魏县近郊外,最有希望的地方要数南沙口及其邻近地区了。南沙口确切地说只有大约40多名受洗教徒,其中30多名都是一个家族的人。然而,在总本堂的簿册中,人们可读到的数字却是100多人,这是因为这个会口包括着好几个即将成立的新会口。今年,我已经从那里分出一个会口,就是漳河村,俗称漳行(Tchang hang 译音)。那里的教徒十分虔诚,与教外人士相处得也很好。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教难中几乎没有吃什么苦头,这使我感到这个会口将很有发展前途。去年,我曾经从南沙口分出了一个会口,就是熟生町^③。那里的教徒们信仰很坚定,而且对于想要入教的人选择相当严格,讼棍、赌徒、名声不好的,都不吸收。

“离熟生町4里的西营子是一个教徒居民点,今年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会口。但那里的教徒和申请入教者缺乏生气,而且还几乎都做些迷信阴阳之类的蠢事。

“在寺庄,家家都是教徒,但由于那个负责召集教徒的人办事没有条理,又爱挑毛病,所以经常造

① 原整理者注:即赵寨。

② 原整理者注:即房庄。

③ 原整理者注:即生熟町。

成各家之间的不和。好像就他一个人懂事和能说会道，会口有任何一点小事，他都要大家一起来评议，但必须由他拿主意，并叫别人都听从他。就在数月之前，只因为一个教徒跟他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口角，他的儿子就在那教徒晚祷后从屋里出来时，把人家打得要死。

“邻近的一个会口相公庄情况良好。除了一名寡妇品行有待改进外，其他教徒都很好，并已吸收了若干人申请入教。这个会口属元城县。

“属于寺庄的侯庄教徒居民点，有 15 名受洗者。那里的申请人教者表现得很坚定，而且在那次风暴中也坚持下来了。我想，这里一年后可以发展成一个会口。

“来二庄^①是两年前建立的一个很好的会口。尽管有几个教外人士爱找麻烦，但那里的人尚能和睦相处。由于申请人教的人很多，所以很容易成为一个六、七十人的会口。今年，我已在那里造了 3 间房屋、一道大围墙和一扇大门，教徒们自己花钱买了大门并负担了一半工程。

“三家村^②会口由于每年有人死亡而使教徒人数减少。那里的主要执事苗金钟(Miao tsin tchong 译音)为人圆滑，两面讨好，使教会的威信受到损失。贾町(Kia tan 译音)^③的情况并不如当初成立会口时那样的理想。

“孟家冈^④是一个很好的会口，只是那里的执事是个财迷，一心只想增加自己的财产而经常在礼拜天不停止地工作着，并老是忽略教堂的星期集会。

“在北高屯，教徒们都是些正直的人，但他们之间还需要进一步团结。为此，应该派一名能干的助理传教人员到那里去。原先那位助理传教先生，人并不坏，但太没有经验，他听信了执事老婆的抱怨而使那个主要的家庭产生不和。

“在杨柴曲，教徒们都属于两个人口众多的家族。尽管教外人士不断找他们的麻烦，但他们的信仰始终坚定不移。他们与其他会口的教徒家庭有许多姻亲关系。

“西上村会口由于两个主要家族之间的不和而没有什么进展。最近几个月来，他们似乎言归于好了。

“李口大屯是个很有前途的会口，教徒人数已超过一百人，还有二、三十名申请人教者。在教难期间，有一个 30 口人的教徒家庭曾抵挡住匪徒们的多次进攻。在附近的一个教徒居民点，一名 70 岁的老人和他的侄儿打退前来抢劫的三、四百名匪徒。他俩一个拿枪，一个拿一把铡刀，当场杀死 7 名强人，打伤多人，其余的都逃走了。

“在郭圪，增加了两家很体面的人家，可惜他们住得离一家好教徒的家庭太远。这户教徒，全家除一人之外，全都是模范教徒。

“在河南村会口，缺乏有影响的人物。这个地方经过十几年之后才开始有了一些起色，那里有一些十分聪明能干的孩子。

“在李家辛庄，老一辈传下的信仰是保存下来了，但男人们的态度有待改进，他们不认真祈祷而喜欢看戏赌钱。

“在高村，那个在 30 年前刚建立会口时就在的方文元(Fang wemr yuen 译音)是个嫉忌心和怀疑心很重的人。两年来，他一直在村中散布不和，他的堂兄方文秀(Fang wemr siou 译音)行为恶劣，今年由于贩卖妇女而差点被杀头。

“前高村是个小会口，教徒们做祈祷时表现得十分虔诚，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喜欢赌博。

“在申桥，教徒人数不多，但对于做礼拜十分重视。当会口遭劫时，有一名老年教徒，虽已弯腰驼背、老态龙钟，却独自一个人与那些前来拆毁我们教堂的匪徒对峙了好几天。他手中挥舞着一把很重

① 原整理者注：即来庄，或北来庄。

② 原整理者注：魏县西南有杨、陶、李、中、苗等三家村。

③ 原整理者注：魏县无贾町，可能是贾冈，位于三家村西南的孟冈附近。

④ 原整理者注：即孟冈。

的铡刀在村里大街上奔走，吓唬那些想要接近教堂的人。最后他横身于教堂大门之前，谁也不敢走近，人群也散开了。当他回家后，有人把他的手足捆绑起来。他先挣开了脚上的绳索，把脚伸进捆住他双手手腕的绳子当中，然后以一种年迈之人所无法具有的超人力气，猛然用脚把绳子蹬断，肉皮都整个揭了下来，并引起溃烂，12天以后老人死了。这时，那些非教徒才敢重新去执行他们的破坏计划。

“现在来讲一讲元城县^①的情况。这是我所辖范围内最穷最没有希望的一个县。

“上面我已提到过相公庄。离那里5里，有个会口叫杨庄，由于教徒们全部是同一家族的人，所以显得很集中。这个会口对周围的教外人士起不到什么影响，因为教徒们既穷又不和睦。

“李凝的教徒十分虔诚，因此，好几年来他们受到非教徒寻衅，吃了不少苦头，他们精心装饰的一座教堂如今已被摧毁。

“辛寨会口自从跟李凝分开后，只有两家教徒了。王金玉(Wang kin iu 译音)是一名根本没有什么信仰可言的教徒；另外一家又过于关心物质利益，因此不可能在星期天一起去做礼拜。

“王儿庄的情况尚不理想。那里的妇女很多，我打算秋天派一名女助理传教人员到那里去发展妇女入教。教徒们大多很贫穷，只有一家比较富裕。这一家的家长对信仰十分淡漠，但孩子们却很好。教徒们全都在细木作坊里跟非教徒一起专心干活，因此要他们学习祈祷和到教堂去祈祷都很困难。

“黄家炉的教徒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有那么几个脾气古怪的教徒总是爱指责旁人，往往因此而引起不和。

“龙化的教徒人数不多，全家入教的家庭只有三家，而且主要的一家还是从外地来的。

“魏县屯会口只是在勉强维持着。有几名坚定的教徒过去曾是小偷，他们的转变使我们脸上增光。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退缩了，但由于它跟一个十分虔诚的教徒家庭有联姻关系，因此，它还是会回心转意的。

“齐固会口近年来进步很大，教徒们中间有些男孩子信仰十分虔诚。此外，有几个很好的家庭申请入教。

“在马二寨^②，一名最早的教徒阎伟楨(Yen wei tcheng 译音)败坏了教会的名声。他贪婪成性，靠放高利贷发了财，还依仗教徒的身份，瞒着我们跟教外人士打官司。结果，正是他的房子最先遭到洗劫和焚烧。而堂里却在一名十八、九岁的男子保护下，十天内一直安然无恙，只是当那个人不在时才被拆毁。在这个村子里，很多年以来，人们总是三心二意，不少人先说要求入教，后来又无缘无故地退掉了。

“在齐二庄^③，男人们很积极，他们组成了一个很好的会口，但女人们却由于执事的漠不关心而没有什么进步。

“在大名府北面25里的南马头^④是未来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会口，村子不大，却有三分之二的人申请入教。新年时，我派去一名助理传教人员，到麦收时就有三十几个大人和孩子学会了祈祷和教理，有十几个人学会了苦难经和玫瑰经，全体妇女都学会了一些祈祷经文。离此不远是北马头村，那里住着将近200名大刀会，但没有人敢来攻击这些申请入教者。当匪徒们前来时，申请入教者手持长矛、棍棒和几支长枪涌到街上，他们的勇气救了他们，成了我所辖堂区内唯一得以幸免的村子。那里的教徒照常一起做晚祷和礼拜。

“在教难期间，教徒们的表现如何呢？在相当数量的村子里，教徒们十分恐惧，并口头上宣布叛教，有时甚至匍伏在佛像之前。其罪过是明显的，但我相信绝大多数教徒这样做是为了哄骗教外人士，而且都决心一旦教难过去后再重新入教。这是所有那些到赵家庄来看我的人给我的印象。尽管相隔三、四十里，但没有一个村子不派代表来的。由此，我确信真正叛教的人数是极少的。”

① 原整理者注：元城县，旧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明初移治今大名县。1913年并入大名县。

② 原整理者注：即马寨。

③ 原整理者注：即元城县齐庄。

④ 原整理者注：属原元城县，与大名县接壤。

孙汝舟神父日期不详的另一份报告^①称：

“饥荒给我的教徒们带来的损害较之义和团尤甚，因为义和团^②在我们这里除了成安地区拥有近5000名的追随者外，其他地区没有征募和扩充队伍。那些洗劫我们教会、拆毁我们教堂的人，无非是本地被煽动起来的已断了粮的灾民，他们的带头人还往往是当地的绅士。教徒们流离失所、四处避难。暴徒们肆无忌惮、无所畏惧，因为政府对抢劫予以默许，所以谁进入教徒家中就可以随意伸手拿走粮食、衣服、农具等东西，抢来的东西不能充饥的可以转手出售换取粮食。由于缺乏燃料，所有的门、窗、桌、椅以及茅屋上的草都被充作烧火之用。有钱人乘机廉价收购穷人无法利用的东西。总之，不分贫富，都能从教徒家抢掠来的赃物中获得好处。这就是当时到处出现的令人惊讶的情况。短短几天之内，我所管辖的会口都遭洗劫，所有的教堂都被彻底捣毁，片瓦不留。在这次浩劫中，成安城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义和团把我们教堂作为司令部，统管本县西彭留和艾束。在西彭留，团头终于有力地制止了一二千名狂热分子正在着手进行的拆毁工作。在艾束，我们的房屋部分被烧掉，其余的也被捣毁，仅存四壁。在大寨，我们租的房屋已归还给原主。在白范町，我们的房子安然无恙。只有在西乡义，我们的房屋被全部拆毁了。在直隶南部这个义和团人数最众又作恶最多的县内，教堂却受损失最轻，这真是稀奇，耐人思索。我们在其他地区的房屋都被彻底拆毁，而这里是个例外，这恐怕不得不说是受到了圣约瑟的特殊保佑吧！因为在几个月以前，我曾把成安全县奉献给圣约瑟。在成安发生过一件使义和团气馁和狼狈不堪的事件，这就是一个从山东来的首领的凶死。此人原是1897年巨野县杀害两位德国神父的主要凶手之一。当时德国政府要求严惩凶手，地方官吏乃判他死刑并如期执行，其实暗地把他放掉，另外找了个替死鬼。这人名叫刘胜先，或刘布衫子，也就是在山东为人熟知的刘二疯子。他率领了一支仪仗队在全县内耀武扬威，视知县如儿童，竟敢当面传授其意愿。他选中了我的一个会口作为他的寓所，这房屋是我不久前才买进的，尚未付清全部房价。原屋主不愿房屋被拆，故据理力争，声称因屋价未付，房产应归原主所有。刘胜先虽固执也不易折服他，反遭这庠生（屋主）恶言相讥。刘胜先于是令人把他抓住，赤条条地悬吊在大梁上，用火烤他，并用烧红的铁条烫他。被害人的儿子立刻奔赴距出事地点仅3里路的县城向官吏诉苦。县官承认自己无能，只得劝诉苦人与人妥协和解。有一位秀才也出面为被害人向刽子手求情，结果徒然。县官试图插手此事，但刘胜先拒绝出庭。最后刘终于决定自己带了庠生去见县官，他把庠生拴在马颈上径直往衙门奔去。到了衙门口，他傲慢无礼地说：‘我要见这里的小官。’‘小官！’衙役们带着讽刺味重复说，‘小官？’‘对，小官！在我看来，杀一个官吏和杀一条狗差不多。’这帮随从的匪徒听见这些话感到事情的发展可能不妙，乃纷纷拔腿溜了，剩下刘胜先一人被困在衙役们中间，四周还有一批好奇看热闹的民众。‘义和团逃了，义和团逃了。’民众欢呼着。有一个刘胜先的仇人手执一支长枪，想刺他一下，结果被刘用马刀猛斩，从肩膀到手肘砍掉一大截手臂。第二个人重新拾起长枪，又被刘用刀在手臂上砍了个大创口。第三个人终于用长枪刺进刘的肋部，把他打倒在地。衙役们急忙去向主人报告，主人也早已知道这个恶魔的无耻狂言。‘他还活着吗？’他问道。‘还活着。’‘我要见他死的，不要活的。’众人听到这句话，群起而攻之，手头有什么就扔什么上去，拳打脚踢，又用棒，又用砖，不一会儿，他已成了一堆肉泥，头部只剩下一块拳头般大小的骸骨。杀害德国神父的凶手落到了这样的下场，对我来说，我感到荣幸，虽然我间接地与此事有些关系。首领在衙门前的恶死，对匪徒们震动很大，他们也许是出于害怕，也许是为了讨好这个曾经规劝过他们的县官，从此在这个县内再也没有杀过人。‘去吧’，他向他们说过，‘烧抢随你们的便，但不能要人的命。’匪徒们为了消遣作乐，竟把一个瞎眼老人抓来划破他的脖子，使老人相信他们真的要杀他。可怜的老人第三天真的死了，不是因伤重而是被吓死的。这帮人碍于县官的面子，不能尽情地发泄对天主教的仇

^① 原整理者注：原件法文，共6页，每页长21、宽13.2公分；用浅蓝色小方格纸蓝墨水书写。原题注明1901年，但撰写的具体时间、地点未详，正文结束后亦未署名。

^② 原整理者注：原文Boxeurs，指1899年成安大刀会(Grands Couteaux)。

恨,因为县官曾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衙门内,并编制在自己的团局中。他们投奔到正定府^①的沙河县和河南省的武安县,与当地的义和团会合共同攻打教徒村子。沿途,他们和平地穿过金道宣(Gaudisait)^②神父的会口,但在我们的邻近地区抢劫了若干会口,也屠杀了50余名教徒。但在沙河县的北掌,他们碰了钉子,有30余人受伤,丢弃了10余具尸体。从此他们比较谨慎,停止集体的长途跋涉。

“大名府的人民不很仇视天主教,因此除一些物质损失以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不幸的是出现了强迫教徒宣布叛教的情况,衙役们和坏人认为这是敲诈发财的良好机会,竞相利用。为了达到恫吓教徒的目的,他们比地方官吏们更积极推动教徒叛教。他们向教徒勒索巨款,作为保持缄默的代价。一些贫穷的居民借口保护教徒,就与教徒家庭合并,其实为的是吃几顿好饭。也有一些村庄的教外人士出于同情,自己向官吏保证说同村的教徒都已叛教了。这类事情在艾束、熟生町^③发生得最多。在大寨,教徒们知道了内情,就要求旁人在请愿书内不要谈及叛教一事。由于这里是义和团的主要集中地,又加上这里的官吏秉性不坏,因此这样一张符合教徒要求的请愿书竟被接受了。以前,义和团为了担保村上教徒们的生命安全而索取巨款,教外人士往往乐于用些模棱两可的双关语作类似的尝试。有时他们要求教徒们张贴迷信图像或供奉偶像,借以掩人耳目,顺利过关。在有些村庄,如李家辛庄、仕望^④、李凝、来庄、马寨、柴曲、申桥等村^⑤的教徒们的作为还不断地惹人注目。只有两个村子提出了叛教的请愿书,可能这些人是我最不满意的,他们是王家冈和孟家冈^⑥。我不得不承认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徒没有忠于自己的职责,尽管我们过去早已讲过关于禁止敬邪搞迷信活动,但他们中还有许多人以为可以利用谎言来作为权宜应付的策略,可以用外表的公开叛教来掩护自己真正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虚伪的表白也和同乡们在搞诉讼或经商时随便说谎一样,觉得无所谓,因此他们自信自己还是教徒,并继续每天早晚诵念祈祷祝文及玫瑰经。这些人在良心上究竟应负何种责任,让天主去判断吧!今天我可以证实的是在我管辖的会口范围内没有一个教徒不回头的了。也许有人要说这些人回头的动机是为了想得到赔款,而不是为了信仰,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许多在动乱中没有遭受过抢掠的人今天根本得不到赔款,这些人中间也没有一个不裹足不前的。在出现了一批表面临时叛教变节的情况下,有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这就是申桥一个名叫薛正(Sue tcheng 译音)的人之死。就是这个人和他的堂兄薛保安(Sue pao ngan 译音)一起,在30年以前推动了传教运动,其结果是在大名府我们有了近5000名的教徒和近2000名的候补教徒(申请入教)。去年这人整70岁,老态龙钟又加上风湿性关节炎,行动不便,已不能离开自己的村子。听说义和团来了,浩浩荡荡号称有300人,他就拿了一把足有20斤重的铡刀,跑到教堂门口去站岗,扬言谁敢闯进教堂就将被劈得身首异处。一连三天,他坚守岗位,仅在晚上夜深人静后才回家吃些东西,便餐后又立刻返回原岗位,就在那里和衣而睡,直至天明。老汉的儿子得知邻近地区的教堂都已拆毁,又见到自己的父亲也已被弄得疲劳不堪,焦头烂额,乃乘父亲磕睡时用绳子把他捆住运送回家。老人醒后非常不满,又嘀咕,又痛苦,又暴跳,但力不从心,最后只得佯作安心服贴了。第二天清晨,睡梦初醒,他听到马路上人声喧哗,就趁人不备,用尽平生气力,双手在墙上磨擦,弄得皮碎鳞伤,染满了鲜血,好不容易才挣脱了绳索的束缚。他也顾不上自己的创伤,径往教堂飞奔。到达目的地,见教堂大半已被拆毁,遍地瓦砾,他一阵心酸,就昏倒在地,旁人只好把他抬回家中。他躺在床上一连多天呜咽哀哭不已,伤口逐渐溃瘍,十天以后,终于致命。临死时,他对病痛毫无怨言,只专心为教外人皈依天主教而祈祷。

① 原整理者注:原文如此,应是顺德府之误。

② 金道宣(Gaudisait 1854—1938),字仁铎。法国耶稣会士。

③ 原整理者注:艾束属成安县,熟生町属魏县。

④ 原整理者注:原文 Wantye,查魏县无此地名,疑为仕望村或仕望集之误。

⑤ 原整理者注:以上村子均属魏县。

⑥ 原整理者注:王家冈,原文 Wang Kia tang,疑为魏县的王冈,位于孟冈以北。

“不把被教外人买去的30个女教徒计算在内,我一共损失了近200名教徒。根据往年的统计,每年约有60人正常死亡,扣去这个数字,教难、饥荒和疾病使我共损失了约140名教徒。这个数字远少于我原来的估计,也远少于饥荒原来会造成的损失数字。很多人依靠我们的及时的、不断(地)[的]救济渡过了饥荒的难关,保全了性命。我估计今后只消用一年时间,我又能争取到教难以前的教徒数字,因为目前准备入教的人数很多。艾束今年就将有60人领洗,这样,这个村庄的教徒数字就将达240人之多。在大名府以北20里的元城县南马头,今年将有70至80人领洗,全村有一半人申请入教,大家都在几个月以前早已表态,至今仍很好地在进行,没有变化。从我所管辖的各会口中,我很容易地招收到损失掉的200个名额,使我的教徒的总数达到两年前曾拥有过的2000名的数字。到处能看到教徒们对宗教的坚定信心。……今天,从四面八方传来消息说,有不少的村庄愿意信奉天主教,在有些地方,我们原来只有少数几个教徒,今天教外人士都在谈论如何欢迎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证实了公元初世纪先哲戴尔都良(Tertullian)^①的名言:‘殉教者的鲜血是新教徒的种子。’”

《义和团史料·史籍汇录》辑《献县天主堂资料》·一、献县天主堂往来信》载:

“七

敬覆者:十九日未刻,有敝州土路口村人萧进善来署喊告‘伊系教民,被本村王洛欣等强派唱戏钱文,请传讯追还’等语。弟深知教中规矩向不摊派唱戏钱文,而查看萧进善人颇诚实,谅无虚语。当即出票派差,谕令随同原告回村,押令被告退回所派钱文完事。只要如数还钱,不必来城候讯,免致耽误农忙,原、被均受讼累。并令萧进善免写呈纸,又可省却数百文之费。萧进善欣然而去。弟退堂后时已头炮。接到惠函,敬悉一切。承嘱前件去差如能办妥,似可毋庸传质,免致两造受累;倘被告不遵还钱,再行传集讯究。弟与阁下共事多年,彼此性情皆已深悉,质之高明,当亦为然。

再,敝署章程,非人命、盗案、殴伤、拐逃等案,只可三、八呈告,不准随时喊冤,违者责处。此次萧进善因未谙悉章程,遽尔喊告。因弟与阁下交情最好,是以仅将违章情形详细面谕,免其薄责。该教民亦甚知感激。顺以附闻……

愚弟名片肃。光绪廿(六)[五]年八月二十(1899年9月21日)灯下。(朱璋达)^②

“六

敬启者:本月初八日,据州属西河头村贵堂教民吴崇修等呈报义和拳会匪将该村堂内墙垣门窗窗砸毁,家具陈设全行抢去等情。适弟先期因公进省,当经吏目朱秀峰兄派差勒缉,一面由该吏目会管亲往勘验。次日午后二钟又报王乐寺教堂亦被毁坏。弟于是日掌灯时六钟回署,得悉前情,不胜诧异;奉读来示,更觉抱愧。现已多派署中练勇、差役分往有堂各村,协同该村乡约人等,竭力保护。东阳台堂内,闻系婴孩,更为紧要,业恳城中驻防马队酌派兵勇,前往该堂设法保卫,必可无虞。该处附近各教堂,即令该兵勇就近一并防护。马队章程:驻扎之兵,非奉本管统领札调,不准移动。因弟与阁下多年至交,不比恒泛,是以力恳该队官长从权通融。弟明日亲诣西河头,转至王乐寺;逐细查勘情形,并至各处教堂,督饬练勇马队巡查弹压,实力保护。闻拳匪现下在武邑县龙王庙窝藏,弟拟面见拳头设法解散。暂顾目前,再议常年保护之法。弟身任地方,遇此为难之事,

① 又译作特土良或特图里安,德尔图良。德尔图良(约160—240)是一位罗马百夫长的儿子,他在北非行省迎太基长大并接受了一流的教育,然后他学习了法律,来到罗马,成了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三十多岁的时候皈依了基督教。他娶了同教的一位信徒,带着僧侣的指令(当时的僧侣不是独身的),回到迦太基,并在那里写了大量激烈的护教作品。他是教父中最早用拉丁文写作的人。德尔图良确认基督教的信仰为最高真理,要求在思维结果与信仰发生矛盾时不肯定任何与信仰矛盾的东西,这种观点对后世基督教神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此外,把世界划分为可知世界和不可知世界,不可知世界只能用信仰来把握,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的思维模式。

② 原编者按:原件存河北省博物馆。信稿用花箋和红白信箋书写,入卷时未收撰信人名片,只将姓名附记于信尾。

③ 时任深州知州。“(朱璋达)”是献县天主堂加的说明文字。“(1899年9月21日)”是本书编者加的说明文字。下同。信中所述是义和拳传入该地以前的事,可推知“光绪廿六年”为“光绪廿五年”之误。

揆之公义私情，两有歉然。惟有坚定心志，尽吾职分，以副国家保护教堂之条，以对阁下保全教民之意。但不知此后事机何如耳。该匪等声势颇盛，人数不少，是否真实，容俟明日赴乡便知梗概。鲍神父^①来署面谈片刻，一见如故。渠本拟即日回堂，弟因城中较为安靖，留请暂住数日，以便遇事熟商。知念附闻……

愚小弟名片肅。光绪廿(六)[五]年[十一月]^②初十(1899年12月12日)灯下。

(朱璋达)

附上鲍神父洋文信一封。”

“一

敬启者：日前差回，接奉覆书，敬聆一切。弟于十一日驰抵有堂各村，督饬练勇、兵役以及会董、乡(月)[约]^③人等竭力保护；并至西河头、王乐寺两处查勘各堂被砸情形：家具杂物搬抢一空，房屋未被拆损。查访拳匪俱在武邑所属之龙母庙，与州属王乐寺相隔不远。弟与阁下至好多年，非比恒泛，是以单骑越境冒险前往，拟与拳头见面，设法解散。及至庙中，该匪业已先期转至圈头镇，亦系武邑所管。当遣妥人前往传谕，飭令来见，弟在王乐寺相等。至十三辰刻，拳匪六、七百人，半执刀枪，半执徒手，见弟不跪，亦不去刀，目瞪眉竖，似有疯疾。弟先责以煽惑引诱，砸毁教堂；并将‘各处传教均系劝人为善，迭奉上谕一体保护，不准匪徒借端扰害’各节详细开导。连劝带吓，自辰至未，几乎舌敝唇焦。该匪孙凤岐一味哓哓，狂悖不堪。未后，孙凤岐说：‘既蒙劝导，以后深州境内不再与教为仇。’弟尚欲有言，孙凤岐等一哄而散。

此番躬冒危险，苦口劝谕，原因各处教堂均系阁下握理其总，满望借此口舌之劳，散其胁从之党，保全各处教堂，而慰悬念之念。今该匪仍不醒悟，不胜抱歉之至。……弟于十四回署，又闻拳匪聚集二千余人欲来城中拆毁教堂。……是晚二鼓，孙凤岐到，彼始各退散。自此以后迄今旬余，境内尚无拳匪滋事之案。……鲍教士尚住城中，自当竭力保护，无论如何为难，决不使该教士致有意外之虞，其余教堂近日亦均安靖，可请放心……

愚弟名片肅。光绪廿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99年12月26日)自深州发。

(朱璋达)”

《劳乃宣^④自订年谱》(选录)载：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在吴桥任。义和拳教门者，白莲教之支流也，其源出于八卦教中之离卦教。嘉庆间惩禁有案，而根株未能尽绝，直、东州县犹有潜相授受者。上年，其党类在山东冠县以仇天主教为名，聚众为乱，而官民皆目为义民，纵容姑息，其势日盛。予考出其教派源流，出示谕禁。又引据嘉庆十三年谕旨、嘉庆二十年那文毅公奏疏，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城乡，广为劝导，县境初尚无信从者。而邻近之故城、景州、阜城、东光等邑皆有焚毁教堂、聚众抗官之事。景州请兵督师，遣乐字营往，与战胜之，留防于景。

“十一月晦，县属庞家桥突有德州拳党勾结县民聚众二三百人，焚教堂一所，教民六家，杀不奉教平民一人。予急调景州兵至，其众已去，获余党十余人。十二月五日，又聚数百人于辛集，声将报复。予遣兵往，彼列队迎敌，击杀九人，生擒十余人。内有节小廷者，其党之二师兄也，号称能降神附体。予升堂鞠之，启重门，任民纵观，令其当众实验：踞坐，口作神言；摔下笞之，号呼，不能复作神状。请诸上官，戮之，与阵歼诸人皆传首示众。余治罪有差。民间有被诱习者，改悔免罪，各村皆取结不得信从，阖境

① 鲍体乾(1846—1919)，字寅恭。法国耶稣会士。

② “光绪廿六年”为“光绪廿五年”之误，信中称“明日赴乡”，下一封信说“弟于十一日驰抵有堂各村”可推知两信写于同一个月，即旧历十一月。

③ 此为原整理者所校。

④ 原编者按：劳乃宣字玉初，浙江省桐乡县人，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吴桥知县。编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等书。

随皆绝迹。予以所刊《源流考》遍呈上官，具牍力陈防范惩禁之策，请奏明请旨施行，而上官置不省。”

《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附录二《外文资料(六)义和拳在直隶东南^① (1899年7月—1900年3月)》

1900年3月25日任德芬^②写于献县张家庄的报告载：

“1. 义和拳的起因及其宗旨

“在开始叙述直隶东南教区为义和拳(英文称为 Boxers)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以前，我们有必要把有关义和拳的起因及其宗旨的几个问题叙述一下。

“义和拳起源很早，因为在1808年即嘉庆十三年就曾发布上谕禁止过。

“宗旨总归以下两个口号：扶清、灭洋。

“我们看一下吴桥知县劳乃宣在其所撰的一本小册子中[的]一段话：‘按：义和拳一门乃白莲教之支流，其教以练习拳棒为由，托言神灵附体，讲道教拳，诡称念诵咒语能御枪炮。其为邪教，形迹显然。’‘其党自嘉庆年间惩办以后，根株迄未尽绝。直、东两省各州县所在多有，初犹敛迹，近渐明目张胆，无所忌憚’，‘上年(1898年)彼党扬言专仇教民，良民遂多为所惑，因而忘其降神诵咒之为邪术。其实此项教门名目于嘉庆年间已见章奏，是时天主、耶稣教犹未通行，其非因仇教而始起’，‘若其本意，则实有谋为不轨之心。愚民无知，误被诱惑。’

“1899年12月《字林西报》扼要地谈到这个最近的事件：

5月份时，在直隶东南已经发现叛乱，有一个村庄突然遭到严重破坏，这个村就是肖张，在那里有伦敦布道会的一个座堂。……9月份，传出风声，要在各地设坛立团。人们一致感到一种意外威胁……赶紧给英国驻天津领事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山东官府派兵。这是制止这个叛乱的最好办法。如洋人财产能免遭破坏，则离平原55里的很多基督教徒家庭也可幸免。可是由于我们没有预先的估计，所以现在全部教民家庭已被洗劫一空。地方官府知道这一情况后，很为难，下令迅速阻止这种抢劫，结果失败了。……

“在同一处还记载着：

天主教徒比基督教徒人数多，他们受的灾难也就更多更久。事实上，在12月份的一个月中，仅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一个教区就有五千多天主教徒无家可归，处于绝境。

“12月29日，上海法文报纸《中国之回声》……报导了有关义和拳的问题：

造反者、叛乱者、土匪同时借口攻击新的罪恶，实际上他们无非是无政府的叛党。在近几年的政治事件中，德国人租借了胶州湾，这个乱党便披上了政治外衣。他们极力地攻击天主教徒，控诉教徒是中国灾难的祸根……

“以上所说那些严重情况，在我们教区内已经证明完全是事实……”

“2. 开端

“1898年，义和拳在威县境内进行骚扰，到1899年春开始在河间府城内首现。他们张揭帖、写标语攻击洋人及其追随者。

“这个地区的任德芬神甫将此情况报告给吴桥知县并提供一份义和拳主要头目名单和他们集合的中心点，要求设法阻止这个组织的蔓延。在6月的最后几天，义和拳声称：要毁灭张敖桥村教堂。义和拳发现这个村子里有一支行进的队伍，可是我们的教友情况差不多同往常一样，那里只有县里派来的十个衙役。义和拳看到这种情况，未敢放枪就散了……

“同年8月，葛光被神甫写信说：

^① 原编者按：这份通讯是河间府传教士任德芬(L. Mangin)于1900年3月25日在献县张家庄写的。通讯原用法文写的。1965年路遥到张家庄总堂发现的，托神甫译成中文。由于文化大革命，献县张家庄总堂的资料已散失，这份法文原稿亦已无法寻觅。译文中不妥之处，待日后查核。

^② 任德芬(1855—1900)，字孔修。法国耶稣会士。

义和拳在山东骚扰并粉碎了安主教(安治泰)的教徒村庄后,来到我们这里。毕如春^①神甫在开州的五个教徒村庄也已被抢。这些义和拳要消灭基督教。洋人都在口岸上,他们不能来内地保护我们;而中国政府由于越来越软弱无能,它在百姓心目中已经丧失了信心。

“不久以后,裴省三^②神甫给马纯嘏^③神甫写信说:

我们直隶省在一两周时间内就被义和拳所侵入。他们从山东来到这里,他们传播很快,如同火药桶爆炸一样。为什么这样呢?这就是由于德国人侵占了胶州湾。他们对我们也不会友好。你知道,在中国人的心中燃烧着多么炽热的烈火,他们攻击我们教会是洋人的先遣队,并说是教会把洋人叫来的。在这里人们都在议论:洋人要瓜分中国,他们已经潜伏在中国各地,现在同法国还挑起了新的冲突;11月末,皇太后给各省督抚和将军两个上谕,其中一个措词激烈,限洋人于一个月内出境,敕令对于拟插足于中国的西洋势力要以武力对待。

我们的教徒罪过也不轻,他们对待非教徒的无知往往很厉害,这样非教徒势必寻找机会要彻底清算他们……

“3. 景州首次冲突

“7月间,义和团大批地出现在景州的西南部,他们屯集在重镇河渠,在这里有一个教堂。

“时间过得很快,教徒们当时和往常一样住在家里,没有发现义和团到这里的征兆。一个教徒在街上受了凌辱和殴打。一个教徒走进一家客店,发现那里有一群不相识的人。其中一个人向别人说:‘这是个教徒。’可是我们的人并没有理会已被发觉,结果遭到包围、撞倒、殴打。当时他逃跑了,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杨木村的教徒。

“知州^④知道后也来到了,听说任德芬神甫正在出事地点。……神甫声明:‘必须惩办肇事者。’州官回答说:‘毫无疑问。但他们人数众多,而我只有几个不够忠实的衙役,因此没法处理。明天我去河渠,我要向总督报告请兵。’事情果然这样做了,王州官返回河(渠)[渠],把绅士们叫来并劝告他们要反对结社聚会……官兵来到义和拳的集聚点,要拳民去见县官,结果拒绝了。然而,他们的最高头目王庆一同意向被挨打的教民假道歉。他带着一个20人的卫队来到一个绅士家里,双方敬礼言欢,事情就算完了。

“4. 大月庄的圣堂被焚

“为了给绅士及州官留个面子,义和团的首领们决定从他们活动的中心——景州迁移出去。他们受邀请去故城县大月庄,住在两个财主家里。这里的基督教会建立已经有四、五年的历史,我们在这里也已有10家教徒。

“在起初时候,他们没有发出什么煽动性言论。以后由于同一个基督教徒发生了口角,义和团传出话来,要把两个圣堂全部焚毁。事实上,在31日夜间,我们的教堂被包围、抢劫、烧毁了……

“义和拳由于没有受到惩罚,聚会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胆量亦与其人数俱增,武装队伍到处游窜,真是威风凛凛。

“我们教区的会长们对于这种形势确实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们给河间知府送去一封急函。葛光被神甫去拜见,知府表示惊奇与不安,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来此公函关于故城这样重大的问题,我尚一无所知。明天我把你们的呈件交给总督,请他谕示。’……

“总督通过一位使者陶先生进行答复。陶先生是在穆先生率领的20人卫队护从下来到了着火地点,由县官伴从……

“11月2日,有几个教徒同几个义和拳一起出庭。特使问义和拳:‘着火时,你们在那里?’‘在田

① 毕如春(1849—?),字泽长。法国耶稣会士。

② 裴省三(1856—1916),字存诚。法国耶稣会士。

③ 马纯嘏(1849—1908),字天锡。法国耶稣会士。

④ 名王兆骥。

间。’‘谁放的火?’‘我们不知道。’‘对教徒有仇恨吗?’‘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控告我们;另外,洋人所列的人名单中有好多根本就不在拳。’……

“特使愿意结束此事,他请任德芬到他那里去。为了不失信用,任决定前去。11月8日,特使协同陶先生^①一同接见。这个人虽然未任过官,但在北京任职有二年了,他曾出任中国驻德全权大使……

“谈话刚开始,显然不用等待什么有效措施,他拿出一封公文并指给任德芬看,两个字:‘解散!’这是总督用红笔批示的。他说:‘我的使命有限,即修复焚毁的教堂,禁止义和团进教堂同教徒闹冲突。然而,我知道王庆一是义和团主要首领,可以拘留。叫王去天津,不准再回这个地区,至于其他人我不能怎样。’……

“任德芬神甫回到了故城,为处理一下四个月来所积压[的]问题,他力争在几天内处理完毕。11月25日王庆一被特使邀请,他许王不予以任何处分,但要写一个简单的陈述。会晤是在县官的私人客厅里举行的。在大人们出面以前,有一百多义和拳早已闯进衙门;另外,无数的人群在城里巡行。他们身带刀枪,如有不测之事,准备营救师傅。穆先生站在窗口,伸开两臂,尽力阻挡他们进入客厅。陶先生正在同王庆一促膝谈话时,发现人们从内衣里露出武器来。看来特使搞的这次会晤已经成了难题。他作了简单训示后,就叫王庆一回去,同教徒们和平相处。

“第二天,特使写了公告给义和团和教徒们送去。在他完成使命后动身去天津的途中路过我们的主教府总堂张家庄。在这里,他许下要将这严重形势报告给总督。在河间府有一个普遍的传言,说河间知府仓促出走,向总督求援,还说这是人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事。

“5. 宋门,刀枪不入

“五月中旬,在冀州所属枣强县,义和团试图抢掠一个基督教座堂,没有成功。两个月以后,传说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两个相距不太远的(聚)[据]点。任德芬神甫将此报告给武邑县官,县官还不知道……

“10月2日,是宋门大集的日子(宋门是景州西边三十里的大镇),义和拳设立一场子并声称在下次集上大练刀枪不入。

“那天……义和拳师傅指示两个徒弟跪在桌子前面,桌子上面写着义和拳的保卫者——神的名字。他们一个劲地磕头、作揖、烧香、诵经念咒。可是神也没有下来。最后,在午后四点钟,拳首忽然站起来,变了颜色,他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控制。那两个徒弟也站起来,端着枪。师傅脱去上身,露出胸膛。只听一声枪响,人们看见他难受的样子跪下了,随后全身倒在地上。这一枪是打透了,伤势又深又宽。拳民们盖上他,运走,没等多久就停止了呼吸。

“这个开场戏遭到重大的惨败,他们势必不惜牺牲任何代价转败为胜。第二天,他们的哨兵在义和拳(聚)[据]点周围巡逻,并发出话来,说天主教徒害了我们的头目。于是,所有的义和拳在11月1日全部都请到宋门来,要叫教徒的血来补偿。

“在10月31日那天,人们看见无数武装的人群奔向宋门,凶祸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村镇。任德芬神甫去县衙,那时县官^②还不知道。当他知道以后,立刻给军官下令,去宋门联合绅士,想尽一切办法同义和拳头目进行调解。

“于是军官来到宋门,他协同绅士们谨慎地来到一千多义和拳民面前,劝他们放弃复仇怒火,静下心来,暂时解散。调解进行了很多日子。最后,我们知道了经官方同意的议妥条件就是:义和拳首领将于11月13日去宋门,县官出银两摆宴款待;县官拿出三百吊钱唱戏;官兵要在神位前叩头;一个村民非教徒犯有私通教徒之罪,应科以戴枷之刑。

“对于这种完全是中国人的调解议案,任德芬神甫表示严词拒绝,并且声称:‘如果县官没有新的保卫措施,明天就去献县,把我们全部财产交付官吏保护,你要负完全责任。’

^① 此处翻译有误。特使就是陶先生,名式璧。见后文刘春堂《畿南济变纪略》文稿。

^② 即前文所称“王州官”。

“第二天县官未通知就来了。他向神甫说：‘我来要求你，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不然还不知要出什么问题。我要向总督禀报，我希望你们这方面要请示公使，我们地方官没有好办法处理这些问题。’最后县官决定不唱戏了，并且认为如对百姓处理不义，将是最大的遗憾。神甫说：‘为了摆脱你的困境，我同意失掉自己面子，我们教区同王先生打交道已经有十五年之久，关系不错。王先生诚然知道，同善武好斗的义和团相对立，不仅是无用的，且是危险的。但是，正如他常常说的，总督有命令：约束舆论，不要拘留人，更不要诉诸武力。上级这种不严肃的规定，实在是产生祸害的根由。

“正在这个时候，朱家河的教徒们为了保护他们生命财产进行自卫。他们购置枪支，组织了一个50名青年队伍正在操练。

“6. 掠夺与纵火

“任德芬神甫正在故城了结大月庄的问题，忽然有人来给他报信说阜城县临(镇)[阵]教堂和三家教徒被抢夺了。在十五天当中，县官得了一个报告，说这村有一位大学士邀请义和团在他家立坛，他们的(聚)[据]点离我们的房屋很近。11月24日，太阳落了以后，一伙义和拳来进攻我们。他们拆毁门窗，撕碎圣像，把其余的东西弄到庙里。对那三家，更是为所欲为。可以让人逃出，但全部财产如藏起来的粮食、衣服被褥、家具等都成了他们掠夺的胜利品……

“几天以后，又有五家发生了同样的遭遇。11月27日，这个问题发生在景州的两个教徒村庄。28日，阜城县的徐家铺教堂发生了同样遭遇。30日，一帮义和拳在东光县常庄掠夺了教堂。12月4日，有两个和尚，一名瑞章，一名成章，他们成了义和拳头目，并去抢掠阜城县耿家庄教堂及三家教徒。8日，景州的苏古庄也被掠夺。16日，义和拳的头目不满意对阜城县八里庄的单纯掠夺，他们推倒了教堂，弄走了门窗樑木。11日，义和拳又回到了已被洗劫的苏古庄，放火烧了教堂和教徒的房子。第二天，他们看到一间空房子，纵火烧了，同时也引燃别的房子，一直烧成灰烬。无人救火，他们住在我们的房屋里。当时，有一个教徒想抵抗这种侵犯，结果重重地挨了三刀，义和拳叫一个粗野的人在将死的人身上放上劈柴点燃了火。当县官来到这里时，只不过是验证一些损失。(深州幸免)。①

“正当西河头村教徒去附近村庄望弥撒时，义和拳闯入了教堂，进行捣毁并带走了一切东西。第二天他们去王老寺村捣毁了圣堂并全部抢走了八家教徒的车子、家禽、牲口、谷物、衣服等物。其他的教徒村庄也都付出很大代价才保存下来。

“知府对此很感不安，他请鲍体(诤)[乾]去城里暂避一下，并许诺保护他。官府还派了兵去保护阳台的孤儿院(向保定府要求请兵)②。

“葛光被神甫在信中说，在他那里有七百多名义和拳，对他很不客气，并厉声厉色地问他你敢对我们怎么样。官府要求他们散去，不要在其管辖范围内骚扰。

“12月10日，步天衢主教正在武邑，他是在教区南部刚作完坚振回来。小李村的教徒来报信说义和拳抢了他们的教堂和一家教徒，同时又有人来告诉今晚城里城外的义和拳要掠夺我们的财产。主教将此事告诉了县官。县官派兵在我们房子周围巡逻警戒。第二天，主教安然返回献县。

“武邑县的石海堡、阜城县的小营以及其他地区也都受到了同样遭遇。12月14日，景州的岔道口着了火，教徒遭受抢掠。这个时候，离那里有两公里驻扎着官兵，正在保护着教徒村庄和教徒。

“7. 法国领事及中国总督的干预

“我们的长上们总在想找个办法来阻挡住弥漫教区大部地区的逆流。事情果然没等多久。11月11日葛光被神甫报告给法国驻天津领事。他上呈请书，陈明实情后下结语说：‘如官府不下令阻止义和拳，不派兵镇压他们，你的国家将遭危险。’聪明的官儿们都认为最后这几句很英明。

“11月24日，直隶总督裕禄回复法国领事说：我要派出部队，并带着命令去保护教会，镇压叛乱。

“领事又向总督去了一信。总督在12月1日回答说：“我荣幸地接到你的来信，从信中获悉河间府

① 似为衍文。

② 同上。

临(镇)[阵]发生抢案。我已派梅统领带着三个连队去审视此事,在所有教堂地方都驻军进行有效保护并恢复秩序。”

“三天以后,领事进行了新的诉讼,总督也作出新的诺言:‘我已下令梅统领在所有教堂地方派驻军队并认真加以保卫……’

“他迅速地给部队下动员令并立即出发,一路去景州,一路去献县。梅统领走在行军前面,行军速度值得称赞,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在出乱地方转了一遍。12月12日,他来到了献县,把视查情况告诉我们。关于梅统领我们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在这里担任防务很称职,已经有四年的历史了,他在我们的教徒村庄范家疙疸住过很久。事实证明,梅统领有过人的能力和毅力。从此,他的访问是非常友谊的。第二天他去沧州催促部队,奔向天津给总督汇报这首次巡视的情况。

“8. 总堂危急

“形势迅速地恶化了,正如教区总会长马泽轩神甫所写的:

(12月15日)^① 一个普遍的叛乱已经迫在眉睫。

任德芬神甫、周神甫^②(中国)、路懋德^③神甫都返回总堂,因为他们不能在自己的传教座堂里住下。

教区的南部地区还未发生什么事,虽然毕如春神甫在那里受了些惊,但那是五个月以前的事了。我们解散了公学校,只有30个小学生留在校里,因为他们家庭非常困苦。关于贞女们,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一营义和拳在离我们只有两里的地方驻下了,总堂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带着武器进行操练。他们知道我们有几支枪,总想来要。

官吏知道后,便假装有所行动,同时又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向上级请示的话,那将如同往常一样,只是在(我)[你]们遭受损失后来看看罢了,我们心里完全平静,因为我们托给天主保佑。

在这个时候,义和拳公开宣扬:要在阴历十五(阳历12月17日)抢总堂。很多教徒村庄发生了不幸的遭遇,总堂绝不可[能]幸免。唉!梅统领告诉我们,官兵来到这里最早也超不过十五。我们不能耽搁一点时间,因为总堂被抢,是传教事业最大损失或是大屠杀的象征。因此我们决定尽量武装起来,教书先生、工友们在辅理修士率领下每天练习射击。过去叛乱时购置的老炮也搬出来,安放在炮台和屋顶上。其次,任德芬神甫去天津将发生事件的经过报告给法国领事,并购买枪炮、子弹、火药及其他作战物资。另外,县官很不放心,接二连三地派人报信,催兵速来。

从12月18日介始,领事向总督进行交涉。法国总领事杜士兰伯爵向总督陈明了形势并要求总督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以防不测。裕禄大人回答说:‘当我才接到报告时,认为你们有点言过其词,如同非教徒常做的那样。但是现在,形势已经明朗化了。我已调遣八营兵力分赴河间府、冀州、深州,并通过电报给地方官府和军队,也给他[们]讲明义和拳确实是强盗,应该按强盗对待。’总督最后告诉我们,他接到一份电报,说是16日夜间,义和拳同教徒在献县西边发生了争斗。这就是东大过战斗。东大过处在总堂西边。

我们说献县形势很紧张;义和拳集合起来声称要去总堂张家庄,他们希望获得丰富的胜利果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布置了三个中心(聚)[据]点即武邑县的(全)[圈]头、武强县的小范及阜城县的临(镇)[阵]。驻在小范的这部分要在东大过打一仗,那里的圣堂是新建起来的,形式也很漂亮。

“9. 东大过战役

① 原文如此。据上下文,可能是抄写者把下一节首句误抄于此。整理者加以括号。

② 周凤岐(1856—?),字鸣盛。河北献县人。耶稣会士。

③ 路懋德(1847—1900),字懿恭。法国耶稣会士。

“12月15日,义和拳靠近了村庄,可是教徒们在战斗以前都愿意做一次忏悔,于是席鸿勋^①神甫给他们听神功,随后教徒们出来迎战并击溃了他们。夜深了,大批的义和拳又来袭击并高声乱喊。

“教徒们大概只有50人,30支老枪。他们用枣树刺枝进行防堵,站在屋顶上监视,脖子上带着念珠,嘴里念玫瑰经,手里端着枪。有一儿童举着一个木十字架站在他们前面。义和拳开了枪,但是他们枪法不准,子弹都从头上飞过去了。一次新的射击很成功,路上卧着30个死、伤者,活人把他们弄走。当时,妇女们正在教堂念经。

“战斗进行三、四小时以后,进攻者逃跑了,遗尸四具。人们由于怕出事,谁也不敢来认尸。官方把这些赤身露体的人好像埋土匪一样,把他们掩埋了。这样一来,给那些心火过盛的人浇了一瓢冰水。教徒们战胜了,无一人受伤,他们齐聚教堂感谢天主。

“义和拳在附近的村庄里敲锣集合,又在准备新的战斗。当时号声响彻营地,好似在驱逐敌人似的。一个骑马的人给县官送去了葛光被神甫致县官书。骑兵们正在路上奔驰。只要骑兵这次取得胜利,就能把集合起来的敌人赶散,卒使教徒们免于这场不幸的战斗。

“第二天,皇帝的侍卫兵来到了。忽然间在东大过建立起一个百人的驿站。另一个在邻村,我们总堂周围还有四个,这样我们便得救了。希望耶稣圣心继续保护我们。

“非教徒们都在议论说,正在东大过进行战斗时,人们看见一个女人身穿白衣,容貌美丽,还有她的随从也都穿着白衣,翱翔于教堂之上,进行护卫。可是教徒们谁也没有看见……

“教徒们操练有时按欧洲的方式进行,传令也用法国话,不过他们发音不很正确。

“这些人(指教徒)只有几杆老枪,但他们的勇敢完全超乎我们想象之外。我们的教士们能在许多村庄举出事实证明,比如鄂铎宣神甫叙述的:

一天晚上从东大过来了一个报信的说义和拳又要准备打仗了。我们勇敢的教徒经研究以后,决定从他们31支枪里带着19支当夜起程,赶在敌人前边。晚八点,有人找我去降福战士并给他们赦罪。我到了堂里,我们的人正在持枪诵经祈祷,真心忏悔,以后就起身了。老实说,当时我很感动。在堂后边,忽然听见有人痛哭,原先我认为是个妇女,但那里根本没有妇女。这个哭声原来是一个教徒的忏悔声。这一次东大过村防守住了,义和拳未敢同近二百名英勇奋战的教徒进行较量。

“……从此以后,这一带的义和拳就解散了……

“10. 新的磨难

“我们说,义和拳屡次威胁枣强县肖张村的教堂,因此来了一部分官兵进行保护以防止打仗。刘庄的义和拳们则注意到这个县属的两个天主教村庄。12月13日,他们来到邹街,掠抢了教堂及三家教徒,15日在三岔仅掠抢了教堂,教徒逃跑了。

“与此同时,景州仍然处于恐怖之中。人们相信地方官在他们村庄里所许的诺言。可是岔道口村的教徒们并不认为能够幸免,12月14日夜,他们忽然被抢劫之声所惊起。一刹那间,教堂被抢掠一空,所喜爱的东西都被带走,剩下的砸烂以后堆在只留下四堵灰墙的教堂里点着。当可怕的火光燃起来以后,强盗们拥上教徒家中,教徒们已经跑了。他们把大批的东西都抢走了。他们好像贪图胜利品成了癖,到处作乱。

“只有两个大教徒村庄即青草河和朱家河在这大风浪中仍然挺立着。不过别处的遭遇不久便会来临。在朱家河,人们正在准备自卫。每天晚上在村子周围巡逻放哨,以防突袭。这种预防(惊)[警]惕不是没有用处。有些正直的非教徒们说,一天晚上大批的义和拳从宋门奔向朱家河,在路上遇见了一位老人。老人问他们:‘你们往那里去?’他们说:‘去朱家河,打倒天主堂。’‘哦!不要去,那里的教徒(们)很多,武器也很厉害,你们相信我(吗)[吧]!如果你们去冒险,谁也活着回不去。’他们相信了他的话,退回去了。那天晚上,朱家河被这个老人救了,非教徒们谁也不认识这个老人,可是教徒们说,这是

^① 席鸿勋(1850—1906),字振廷。法国耶稣会士。

本堂主保大圣若瑟。

“岔道口被烧以后，恐怖的气氛仍然存在着，显然这不是一天的问题。17日有信说，要在第二天抢掠我们的陆家庄和景州的朱家河。好，当天晚上梅统领的兵来到景州城，有骑兵和一个步兵连带着两个[门]大炮调遣到陆家庄。

“18日清晨，教徒的哨兵发现大批义和拳从西边来了。妇女、孩子、孤儿去天主堂避难。他们在堂中诵玫瑰经，已经泣不成声。朱家河的青壮年拿起武器协助官兵。营官给他们说，你们留在这里守卫村庄；景州的步兵奉命来此，不得有误。

“范营官……下了马。……和尚(晤)[悟]^①修正由几个义和拳护卫前来。营官拱手问候，(晤)[悟]修请安致礼。营官问他：‘你到这里做什么？你抱什么目的？’‘打倒天主堂，保卫皇帝，消灭洋人。’‘皇帝派我来保护教堂和教徒，今天你不给我个面子吗？取消你们的计划，退回去吧！’‘不可能。’‘那好，这是你给我不客气。’营官使了个暗号，官兵立刻拥上来逮捕了和尚(晤)[悟]修，把他押下去了。

“结果，几个义和拳被杀，80多人被捕。少数人逃到附近的村庄……

“(晤)[悟]修同其他囚犯被押送到景州进了监狱。

“正在这个时候，故城的教徒村庄还在遭受迫害。陶先生走了以后，王庆一及其叔父王新堂又回到那里，继续骚扰，重新立团设坛，特别是王庆一计划在城里大唱反洋人的戏——天津教案(1870年，火烧望海楼)。县官尽力防止这种复仇举动，但毫无效果。12月18日，在西关戏班子组织起来，这天正是朱家河打胜仗的那天。从第二天早晨起，如同狂欢一样，唱开了大戏。20日，可怜的知县，还有我们的教徒正在束手无策，任和穆的军队奉命到来。官兵们又到教徒村庄去了，义和拳也没敢再动。

“在同一时间，故城官兵也捉住一个和尚，名叫大贵，是本城东边义和团的主要组织者……

“在景州，吴营官处事不利，他奉命来逮捕魏书田。魏是抢、烧刘八庄教徒村庄的煽动者。当骑兵来到时，魏书田早已逃之夭夭……

“梅统领给我们说在他第一次巡视受义和拳蹂躏的县份后，就去天津述职，带来了总督的命令。12月22日他回来时，到总堂慰问教士，并许给他们；惩罚罪犯，镇压土匪……

“11. 吴桥

“在叙述前，我们首先向吴桥县官劳乃宣表示敬意。劳县官很英勇，而且总在义和拳布置好以前有所准备。雷纯藻神甫在12月11日曾写道：‘人们在东南面经常操练；关于抢掠景州而不受惩罚的问题，确给义和拳一个很大的鼓舞，而对教徒们则是一桩可怕的事情。如果不是无原罪圣母践踏了魔鬼的头，我们将会遭受灭顶的灾祸。我们的县官忠诚厚道，著书攻击义和拳；同时对义和拳非常残酷，如来这里，必将付出重大代价。’结果是到处贴满揭帖，上面写着：‘愤怒的义和拳要剥县官的皮，消灭天主教。’还有在散发的小册子里争取群众反对洋人侵略，消灭天主教及其放毒的从犯。在这种流言蜚语发出后，可以见到非教徒们到处挖井，为避教徒扔在井的‘邪袋’。吴桥有一个卖药的生来就很奸诈，他为了卖解毒药，在几天时间内卖了一百多吊钱。

“12月31日，在正直的人群中有一位和尚，他在城南十七里路的庙中住持，暗地里报告县官说大批义和拳要进城捉拿县官。县官立即关闭城门，在城墙上放岗哨。老百姓也武装起来，并彻夜看守。义和拳夜间踏着路上的雪直奔县城，拂晓到了庞家桥，这是城西南的一个教徒聚居的村庄。彻夜看守的教徒们便高声呼唤并鸣枪报告进攻的人来了。没料到教徒们能够尽可能地保卫了自己，一个老人被斧头砍死，一个十五岁青年受了轻伤，一个教徒工友挨了一刀。在进攻那个方面，也死了许多人，受伤的就更多。教徒们挽救了教堂和房产。人们说，看见两个老人站在教堂顶上屡屡吓唬土匪，使他们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反击力量。可是教友们没有看见堂顶上有什么人。在我们取得这个胜利以后，义和拳撤回山东边境。”

^① 又作武修，见后文。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一册《献县 张家庄被围记》载：

“献县城东约二、三里，有村名张家庄。虽系小小村庄，然自前清咸丰七年设立总堂以来，为直隶东南教区之中心点，本区主教常川驻居该村，立有修道院、公学院，以及仁慈堂、育婴堂、印书馆等。地址宽阔，建设齐备，在传教事业上关系非常重要。光绪二十五年秋冬之间，义和拳邪党自山东窜入直隶，在故城、景州、阜城等处扰害教民，焚毁教堂，声势日益扩张。以后又沿途北上，来至献县。总堂教士咸有戒心。当年阳历十一月十七号葛光被司铎上书于驻天津的法国领事官名戛亚尔的，将本教区的教难据实陈明以后，末后结尾说：‘总督若不下令剿办拳匪，驻防的军队若对于拳匪乱党仍然袖手旁观，将来中国国家必受大害。’^① 法国领事接信后立即备办公文，照会直隶总督裕禄。阳历十一月二十四号，裕禄答覆领事，谓‘已委派梅东益军门率领大兵前往河间等处保护教堂、平灭乱党矣’。梅东益主意决断，办事认真，一受总督委派，就吩咐部下的兵卒赶紧动身。有往景州去的，有往献县来的。诸事布置好了以后，他先领着数十马队直奔献县来了。阳历十二月十二号亲来总堂拜见教士。按梅东益号如云，四年前监督子牙河堤工，驻扎范家坨数月之久，与教士感情甚好。这一次他奉命剿匪保教，所以先同总堂教士商议办法，然后才着手进行。拜会后第二天，梅东益去沧州催迫迟迟其行的兵卒兼程进发，不准逗留，并差人来总堂送信说：‘本军门所部兵卒准予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即阳历十二月十五号开到献县，决不迟误。’^② 恰好此时阜城临阵村、武邑圈头村、武强小范村三处的拳匪布散空气说，将于阳历十一月十五日去烧毁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堂中教士闻信之下惊惶万分。虽明知梅东益言语诚实，不久必有官兵来到，然恐事出意外，亦不得不自行戒备。殊不知拳匪是虚张声势，至阴历十一月十四日未敢冒昧前来；但乘着黑夜去骚扰东大过村教堂，被该村教民打得落花流水，纷纷逃散去了。

“自此以后，献县城内连城外各重镇上都有梅东益的军队驻扎弹压。”

《献县 拳匪攻东大过教堂记略》载：

“献县境内，教堂林立。首先被拳匪攻击者，为东大过村教堂。……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一月十四日……拳匪齐集于聂家庄村中，扬言要烧毁东大过村教堂。……西大过与东大过以河为界，近若咫尺，南立车村亦相离不远。二村的教友念同教的关系，皆协力帮助。本村连外村的壮丁共计四、五十名，虽人数不多，然一心一德，都报定了效死勿去的决心。入夜后，不过一更天时光，果有无数拳匪蜂拥而来。……两军浑战了有三刻钟之久。拳匪中饮弹毙命倒地而死者，不下三、四十名。……他们四、五十人，连一个受伤的也没有。败退的拳匪……遂匿迹销声，不复蠢动矣。”

“当拳匪进攻之时，本堂席鸿勋司铎正在东大过村中。事后给总堂神长写信说：‘本月十四日，刚一没太阳，就有一班拳匪狂呼乱叫的进了东大过村。当时我正在圣堂中听神工。因为教友们见大难临头，生死难保，都预备办妥安神工。头一班拳匪败退以后，过不多时又来了一班，人数更加众多，鼓噪之声也更加凶猛。教友们有站在本家房顶上的，有升到圣堂顶上的。个个人都颈上挂着念珠，此唱彼和的公念串经。一个十几岁的孩童手中抱着十字架，赖着天主的大能及圣母的相帮，与拳匪对抗。’^③ 又事后据外教人传说，当教民与拳匪交战时，在大堂顶上发现了一位美貌女神，身著白衣，首蒙白帕。其左右上下有许多同样装束的仙家陪伴着，高悬于空中，作卫护教堂的架势^④。”

第二册《故景阜三县拳匪发难记》载：

“枣强县有一无赖棍徒，姓王名景益，年二十八岁……自称大师兄，于光绪二十五年阳历七月间在景州西南河渠镇设立了拳厂。……该镇有誓反教^⑤ 堂一座，奉誓反教者亦颇不乏人。某日适遇集期。有一誓反教人在大集上被拳匪寻衅殴打。又有一天主教人照常去赶集，刚一进村，即被拳匪戏弄曰：

① 原随文注，云云。

② 同上。

③ 原随文注，云云。

④ 同上。

⑤ 基督新教。

‘这也是一个二毛子。’教友刚一还言，又被拳匪毒打。……遂成了官司。经县长强迫，连绅士们调停，……王景益离开景州，往故城县去了。……又在大刘庄招集棍徒，教授邪术。原来大刘庄有天主及誓反教堂各一座。两教的人与义和拳同乡共井，出入往来自然不能和平无事。起头的时候，拳匪先指鸡骂狗的向教友挑战，以后又各执凶器与誓反教人动武斗殴。虽然拳匪未受委屈，然犹愤愤不平，扬言非将本村的两座教堂全一一烧毁不可。……阳历八月三十一号即阴历七月二十六日夜，义和拳匪果然将两座教堂先抢掠砸毁，然后举火焚烧了。总本堂任德芬司铎得信后面见故城知县，葛光被司铎致书河间知府。总督接到知府的公文以后，特派委员前往故城，就地查验。到底大官小员，皆敷衍从事。一连数月之久，毫无结果……

“当年阳历十月二号，在景州城西三十余里宋门镇设立了拳厂……

“有一心地狡诈，名叫武修的和尚，自夸拳术高妙，在景州刘八庄村中设立了拳厂。……未几阜城临阵村有一姓赵的文秀才将武修和尚请去，又在该村设立了拳厂。……阴历十月十二日就成群结伙的将临阵的教堂砸毁抢掠，将圣像、经本全撕裂破碎，将其余凡能搬运的物件全搬到他们的厂子中去了。过了不多几天以后又来抢掠教友的住宅，将衣服粮食、牲畜家具全搬到厂子中，彼此分赃去了。教友们一来因为人数太少，力不能敌，二来因为祸起仓促，未曾（堤）[提]防，所以都纷纷逃命，谁也不敢抵抗。拳匪见此光景，更肆无忌惮了。月之二十五日，景州的两座教堂皆被焚毁抢掠。二十六日阜城许家铺教堂、二十八日东光县张庄教堂、十一月初二日阜城耿家庄教堂、初六日景州苏古庄教堂、初八日阜城八里庄教堂、初九日武邑小里村石海波两座教堂并阜城小营村教堂、十一日景州刘八庄圣堂连奉教人家皆先抢后烧。教民刘希贵出首拦挡，竟被拳匪连砍数刀，然后投于火中烧成了灰烬。同日枣强县紫结村教堂、十三日三岔村教堂皆蒙拳匪光顾，先后焚掠。又刘八庄教友遭难后之次日，景州岔道口的教友也遭了同样的患难。半夜三更之间，若干拳匪忽然闯进了该村，将圣堂抢罢点着以后，就起头焚掠教友的住宅。教友从睡梦中惊醒，纷纷逃避，刚没有丧了性命。至于家中的一切财物，全落于拳匪手中了。自此以后，景州全县的各堂口，除了黄古庄、青草河、朱家河以外，其余皆焚毁的焚毁，逃散的逃散，教友们都不能存站了。

“拳匪将各处的小堂口全平灭完了以后，就召集同党，联成一气，定于十一月十六日一齐向路庄进攻，欲将该村传教士的庄子、学校占据以后，就乘胜去平灭朱家河教堂。因该二村南北对立，相离不过一二里路。……恰好梅东益军门保护教堂的军队，不先不后，于十五日午后就开到了景州。步兵住在城里，军官范天贵领着一百马队来到路庄，扎了营盘。……十六日早晨……西北方面两股拳匪，一眼望不到边，都一直向朱家河进行。范天贵传令军士，全营出发，前去迎敌……

“待不多时，两路的拳匪都一齐来到，为首的一个就是武修和尚。彼此行了个见面礼以后，范天贵问和尚：‘领着这班人众，来干何事？’和尚答说：‘是来拆毁教堂，杀灭随从洋人的二毛子，保护大清皇帝。’范天贵说：‘我奉皇上的命，来保护这座教堂并全村的教民。请大住持给兄弟留脸，领着众人回去，不用骚扰这个小小的村庄了。’武修和尚不肯依从，范天贵……吩咐护兵说：‘给我捆起来。’护兵闻命，一齐下手把那个骄横无礼的和尚捆起来了。……转瞬之间，战事告终，胜败分明。统计拳匪中当场毙命者不下五、六十人，负伤逃走者不可胜数，束手就擒者八十余人。……官兵将拳匪抛下的大旗并武修和尚等俘虏、全带着回了朱家河。……范天贵问出口供来以后，就命秘书预备公文，将武修和尚等俘虏送交景州县长王兆骥暂且囚禁起来了。以后梅东益军门……定了他的死刑，当年十二月初二日斩决正法。”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辑：

12月15日(十一月十三日)直隶总督裕禄片称：

“现在山东边界时有大刀会及义和拳匪徒与教民滋事之案，渐及于直隶河间、深、冀等处。”

《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辑：

12月30日(十一月廿八日)《汇报》^①第141号载：

“河间府至天津一带大刀会近日力攻景州县，猖獗异常。彼处有英国教堂一所，教士请地方官保护，地方官以无力婉告。英(领)[教]士乃请天津梅统领率兵一千五百名驰往办理。”

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

《剑桥中国晚清史》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传教事业·传教的方法和结果(1860—1900)》载：

“天主教徒

“……到1900年，中国有七十馀万天主教徒，包括大约四百五十至五百名本地牧师^②。在入教时，这些人被要求放弃中国生活的许多特征，例如放弃全部‘异教徒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不许贩卖和吸食鸦片烟，不参加民间节日(包括戏剧演出)，星期日工作，不纳妾，尤其要放弃祖先崇拜。这样一来，天主教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的和自外于中国同胞的团体。如果获悉这些人几乎完全来自最不幸的阶级，即贫苦农民、小店主、零售商和流浪汉，那也没有理由感到惊怪，因为正是这些人在现存中国社会中的命运最不能经受波折。

“新教徒

“……到了1900年，虽然新教的传教士团体比天主教的传教士团体庞大得多，但是，受过洗礼的中国新教徒总计只约十万人，而由不足三百名授予圣职的中国牧师主持着宗教仪式。如果把把这些数字和天主教徒的数字作一个比较就应该记住，新、旧教对怎样才能做一个基督徒的看法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无论如何事实始终是……中国新教徒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与他们的天主教同胞一样，几乎总是很低的。”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二章《历史》第一节《定县的起源及沿革》载：

“光绪二十六年又有拳匪之乱，拳匪是人民愤于外人侵略日甚，国势日见陵替，因而聚集党徒，仇杀外人。初设坛焚香，藉迷信以资号召。党徒既众，遂大举杀戮教民，烧毁教堂。后竟乘机掠夺，行同强盗，人民苦之。定县北车寄村有天主教堂为定县最大之教堂，拳匪乱起，各地教民多避集于此。教民亦作防守之策，负固抵抗，拳匪攻之未能破。教民复时出扰城南筑义团，难民逃奔县城，求救于官，县中有团勇百人，派往攻车寄教堂。教民度不能支，夜间率男妇老幼数百人，欲逃往真定。黎明行抵高蓬镇，又被镇中拳匪截住，有被杀戮者。”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四章《直隶省的教难》载：

“二、北京以外的教难

“1、在天津区

“在天津区内，亦是到处荒凉。天津城，特别法国租界曾被围困。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只有法国、德国、英国租界，都在白河边^③。在租界内，绝大多数居民自然是中国人，特别是商人。城垣及堡垒均在河的右边，在城东北，得胜圣母堂为同治八年(一八六九)谢福音 Chevrier 神父所建之堂，于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天津教案时被焚。天主教不愿修理它，而于同治十年至十一年(一八七一—一八七

^① 耶稣会士李欣1879年在上海创办《益闻录》半月刊，自第11期起改周刊，1898年与《格致新报》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每周出二次，1907年更名为《时事科学汇报》，1908年简称为《汇报》。按：李欣(1840—1911)，原名浩然，号问渔。江苏省南江县西李家(今属上海市川沙县)人。1862年入耶稣会，1872年升神甫，曾任震旦学院院长、南洋大学教师。1887年还创办过《圣心报》月刊。逝于上海徐家汇。

^② 应译作“神甫”。

^③ 原注：天津解围后未久，美国、俄国、日本、义国、奥国都纷纷至白河左右，建立租界。

二),在法租界内造了一座圣路易堂,至今存在。天津被困时,白河左面,盐袋山积,拳匪与清兵就在盐袋后面向当时的租界,特别向充斥受伤的平民与士兵的圣路易堂及医院开枪。遣使会账房及修女院中,也有许多受伤及避难中的教友……

“在这区内神父稀少,但遣使会士聂春元及教区神父包多默,在盐山被拳匪杀害;三位若瑟会修女亦被害。

“2.在保定区

“在保定区中,拳匪比别处都有势力。由山东而来的拳匪首领住在此区中收纳弟子。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三、四月间,他们在庙中练武,戴红色帽子及腰带。

“四月二十日拳匪开始攻击:一万拳匪围困保定南面三十公里的张家村,但一败涂地。他们怒气冲天,五月十三日又来围攻。杜保禄总本堂(Dumond)神父写说:‘我们听见离保定五十公里的胥各庄有五、六十位教友为拳匪凌迟烧死,三个村庄亦被焚。’

“六月初旬,在东闾附近村中,五十几名教友遇害。同时在许多地方教难未息,村庄被焚,教友被害。于是教友发觉四面楚歌,乃决定集体生活,以防御攻击。保定北部,有许多儿童纷纷避至北京,而南面的教友则避至东闾村。他们在村中掘战沟,将泥土放在里面,形成围墙。别人则至最老的教友处安家庄,如在北京一样防围起来。

“传教士不离开他们的教民,与他们一起躲在村中;但他们一旦离开,教堂就被拳匪付之一炬。

“杜保禄总本堂神父希望拳匪不敢围攻北京。但六月十八日,他知道北堂已被围后,就奔(住)[往]安家庄。他在保定毫无用处,因为教友早已逃至他处。

“拳匪格外攻击东闾及安家村;七月二十四日及九月四日猛攻安家庄,教友约五千,但武器甚少;然而因天主的特别助佑,好几点钟,受枪炮的打击后,他们忽然起来驱逐拳匪,杀了他们五百人,夺了他们的大炮、枪、战车及其他武器。

“东闾亦竭力抵抗,教友四千聚集在此,勇敢无比。被围困初期,他们只有二尊野战炮,五、六枝快枪,五十枝土枪;而八月十六日,他们竟有八十尊大炮,五十枝快枪,刀剑无数。这都是他们见敌人疑惑不断时,出去抢来的。

“他们曾受拳匪及清兵四十次的攻击。死者二千,拳匪当在保定设立医院,以治疗东闾的受伤者!而教友只死二人,他们由信仰中而得到勇敢。杜保禄神父写说:‘在教难期中,在我们忧虑时,我们的安慰,是教友的信心、勇毅、恒心,连新奉教者内背教者亦甚少;被害者都高声表示他们的信仰,连不少不热心的教友亦以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升天机会。在教难初期,教友就决定为卫护传教士而死亡!许多的望教者在危险中请求领洗。’杜神父最后写说:‘我们的教友真是小英雄。’

“3.在宣化区

“宣化区在北京的西北面,共有六个本堂,德懋谦神父 Vanhersecke 是总本堂,驻在宣化城中。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四月二十九日他去北京参加林主教的祝圣典礼,听说有人反对外人及教友的运动。回来后,他听说在宣化城中亦尘嚣且上,教友被欺侮,受恐吓。

“德神父乃请县长禁止这类事件,以免发生命案。县长乃出命令禁止练拳,但县长的命令已不发生效力了。六月十日与北京已不通消息,德神父乃计划召集教友保护宣化的教堂。他叫了三十余名青年人,但他不久就懂得在宣化城中是不能自卫的,乃遣散他们。谢嘉林神父 Catheline 乃与遣使会士张德安神父商议,决定谢神父至西湾子,因宣化的许多教友已在此地,虽然该地已不属遣使会,而属圣母圣心会。

“张神父住在城中,以护卫圣堂与神父住宅,而德神父自己去张庄组织抵抗。

“当日晚上,他们一齐动身。道路危险,德神父不愿离开他的年(青)[轻]同会士,乃伴他至西湾子,比国神父热烈欢迎他们,乃休息数日;六月二十五日,德神父至张庄。此时在教友村中已有人被害,张神父乃离开宣化教堂!他一离去,七月五日暴民及军队就将圣堂及教友住宅付之一炬,抢掠一空,于是拳匪及清兵开始攻击一总区内的教友……

“三、永宁教堂被攻

“永宁是离宣化一百公里的本堂区，管辖三县，共有教友一千七百名。因它离北京较近，所以最早感觉中国北方的波动。

“光绪廿六年（一九〇〇）四月底，由山东来了几位拳匪，召集门徒聚会、习拳大呼：‘杀尽教友，洋鬼子滚出去。’

“一个名叫麻子的木匠成为首领；他至北京拜谒北京拳匪的负责人端王，得到文状，训练神兵，能要求地方官长供养新兵。

“这事使教友大为震惊！永宁的本堂（遗）[遣]使会士周^①玛尔定关闭了学校，将学生送回家中，并请能执枪的青年人来保护圣堂及难民！因为有许多人从各处来堂，求神父帮助他们善终。

“教友决定自卫，但以为在城中不能抵御，因为当防御的地方太大。六月十六日，周神父与教友商议后，决定自城中退出，至一二公里外孔涧村^②去，因为该地背山，易于防守；次日，周神父便率领逃难的妇女儿童及城中的教友避至此村。

“六月二十一日是永宁的集日，拳匪将圣堂付之一炬，并烧尽教友的房屋，将二位未能及时避难的生病老人在屋中杀死，并将他们的死尸在街上焚烧。这事使附近的教友大为惊慌，纷纷离开家庭，四处分散，躲在山洞中。

“教友一到孔涧村，与本村教友一齐约六百名，他们知道敌人近在咫尺，乃积极从事防御工作。妇女与老人常常在堂中求天主保佑，而男人则磨枪擦刀。一位教友用木头作了一尊大炮，以绳捆之，将它放在屋（项）[顶]，以恐吓拳匪。教友亦开始造围墙，但未能完成，于是将魏姓教友的房屋变成堡垒。

“六月廿二日，麻子率领拳匪由三面围攻此村，另一面是山。

“教友由屋顶上可以看见缠红巾的拳匪遍野皆是；他们先叩头三次，然后举起宝剑大呼‘杀，杀’，山鸣谷应。

“拳匪冲入村中，初时不利。他们原想借用他们的符咒，枪刀不入，但教友一排枪开来，就打死十余人，伤者三十余人！交战一点钟后，他们乃引退。

“几点钟后，麻子率领着县内的警察重来反攻。他们人数虽少。但因带着洋枪，教友阵亡者不少，因为他们不能由屋中出现，不然就是一枪；于是拳匪逐步逼进，将逃亡者加以杀戮。

“拳匪逼近魏家及圣堂，这是最后的阵地。不幸，周神父以为一切都完了，劝人快逃。该村背山，所以这面不受攻击，由是周神父与几位教友就由此逃去。教友^③一逃，匪举刀大杀教友，有的在在家中，有的在街上，有的想由村中逃出时被杀；许多在屋中被烧死，也有的半死半活，被投入井中。

“在交战时，女教友常在堂中祈祷，她们看见火烧至圣堂时，愿意保护圣堂及圣物，乃将苦像摘下，朝着祭台上的苦像及物件，齐声唱着圣母祷文走出圣堂。几分钟后，她们都被杀死。逃至山中的，没有人追逐他们，她们乃各自分散，所以当日她们没有遇害，但我们下面要看见，得救者为数甚少。

“次日拳匪搜查没有烧尽的教友房屋，他们找到几名隐藏的教友，乃将他们杀死。

“四、羊洞被困

“许多教友逃避救难，躲入山洞内。羊洞长四十公尺，宽十八公尺，进洞处有月台。数百教友与妇女儿童躲在这洞中，有几个是由孔涧逃出来的。自六月二十日，拳匪就开始抄搜附近的山谷，杀死八十名左右教友。

“七月九日，麻子杀尽周围查出的教友后，乃召集了许多战士来围困羊洞。他先占了泉源，使山上没有水。教友只有几枝土枪，由善射者操着；别人只靠石头，以对付攻击者。

“七月十日，麻子想以武力占据羊洞，然而弹石如雨，打伤不少的围攻者。这天他不敢动了。

① 误译。应为“褚”，见后文。

② 误译。应为“孔化营”。见后文。

③ 似为“神父”之误。

“七月十一日，拳匪想以小炮攻击羊洞进口处，然而发射者不知预防炮的后退，反被压死。麻子乃收集了许多捆柴，带至山上，将柴点火后，滚至洞口，将教友烧死熏死！教友设法推开，而拳匪不停地开枪，继续滚捆柴，终而洞口被堵，使教友不能忍受火热及烟。

“次日拳匪又来攻，然而晚间一阵大雨使拳匪躲开。百馀教友趁着黑夜四散逃命，然而他们日后却一一被杀。

“七月十三日，拳匪整日以烧柴封洞口。夜间，四十岁的贞女王玛利向其他女教友说：‘我们当视死如归。最大的祸患是被拳匪抢去污辱。若天主要收我们的灵魂，我们将在天堂永享真福。’大家都流泪赞成她的话。王氏乃向她们说：‘现在时刻到了，我们走出山洞，去致命吧！’

“被困的教友所受的痛苦极为重大，死亡反较易受，于是大家都赞成这主意，走出羊洞。她们刚走了三百公尺，就遇到拳匪的前锋；他们见女教友出来投降，心中大悦，向她们说：‘若愿背教，可平安回家。’王玛利劝大家不要接受。于是她们不接受这条件，拳匪乃挥刀杀尽她们。

“羊洞被围只五日。”

第十五章《拳匪教难后》载：

“四、永平代牧区

“……一九〇〇年二月四日他^①在荷兰被祝圣为主教，因拳匪之乱，不能立刻回来。在他未来前，永平教区由北京的传教士高若翰 Capy、富成功 Fabregues 及一位国籍遣使会士管理。

“他们驻在黄花港教友大村庄中。武主教偕三位荷兰籍同会士来就职时，教友数字不超过三千名。数月后，上面所提及的二位遣使会士又回到北京代牧区。

“又因为在此区内教友稀少，拳匪乱时，只有少数教友被害。

“五、直隶西部代牧区，即正定代牧区

“……乱事由顺德开始：本堂张淑世，遣使会士，去付临终圣事，六月二十九日他们的住所被抢一空，拳匪亦抢掠了同一城中的基督教堂，将牧师、他的太太及儿子加以杀害。

“张神父不能回至顺德，乃至北掌，临近的代牧区的教友已聚集在此地勇敢防御，打退攻击者。七月清兵帮助拳匪，乃开始总攻击，因为在七月初，慈禧太后出了谕旨，命西洋人离开中国，教友若愿保存性命，就当背教。

“诏文曰：‘我国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恃我国仁厚，一意因循，彼乃益肆桀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②又说内地教友通敌。诏文结束说：‘我将消灭西洋人，义和团则剪除附和者。’于是拳匪大胆妄为。

“正定教堂由铁路工程师指挥抵抗；城内文官表示善意，他们向包儒略主教 Bruguire 建议，若他有意与传教士离开教堂，将派兵护送。包主教虽不怀疑他们的善意，但未加接受；因为他知道基督教的牧师也被护卫，但未能保全性命！此外，传教士不愿抛下教友。

“包主教的办法甚为明智；他知道不能保护一切教堂，乃命令只保护有难民的重要教堂。在各区中，他指定八个中心。在一切交战中，教友常胜利，连清兵来攻时亦能打退他们。零星教友未能避至中心而被捕者，都被杀害。包主教计算约有一百五十名教友被害。与北京比起来，自然数目很小。原因是正定的拳匪没有北京的多，清兵也未积极支持他们。亦当注意，教友的防卫的中心为数既多，普通亦组织完备，所以能有效地抵御。

“六、特奇事迹

“……孟爱理神父 Morelli 记载：在许多地方，拳匪猛攻教堂时，外教人看见在堂顶上站着一位白衣妇女及穿白衣的人，大约是天神帮助防御工作，在北京及东间皆如此……

“东间离保定三十公里，我曾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在此地传教，屡次听见被围困的教友说，教难

① 武教中主教。

② 原注：原文见戴玄之的《义和团研究》一〇六页。

平息后,围攻人曾告诉教友,在激战时,他们看见一位威严的白衣女人站在堂顶上,使他们惊惧不已,顿时丧胆,而教友总没有看见过。

“七、法军恢复秩序

“一九〇〇年十月巴由 Bailloud 将军率领军队至正定……”

“因有军队驻扎,当地官员就与(政)[教]会商议善后办法。包主教不愿受中国政府的任何赔偿,他情愿与当地官员直接交涉,以得到闯祸人的赔偿教会团体及个人所受的损失。为被杀害者,他不愿接受任何赔偿。他派遣传教士至每处解决本地案件,如计算损害数量,决定每村当出的款子数字。

“这并不是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教友在教难时固然勇毅可风,但谈判赔偿时,往往不可理论,他们估计损失的数字往往过份!负责的传教士,不时当减轻教友的仇恨心,以保护外教人。教友方面固然亦有其理由,因为大家纷纷讨论案件时,他们都食不饱腹,他们当等待一年,才可获得一点款子,二年后才能得到全部损失的赔偿。而外教人亦尽力避免赔偿教难所造成的损失。”

《义和团史料·史籍汇录》辑《劳乃宣自订年谱》(选录)载: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与教士议结拳党毁教堂及教民家屋之案,命工匠实勘。估计教堂赔银二百馀两,教民六家共赔银二百馀两,责诸拳党家属。是月,奉旨示禁义和拳,各长官皆出示颁行。予刻为《奉禁义和拳汇录》,于识语内痛陈其害。五月,义和拳党入京师,上下皆纵容,予知不合于上,于义当去。”

《筹笔偶存》卷三《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二起至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载:

“十二月初九日(1月9日):

“四、为札饬事。本月初八日,据德州知州宋森荫电禀,吴桥拳匪勾德匪,在吴桥焚教堂、拒官兵……”

“五、马天恩函^①:

“……临清各属拳匪揭竿灭教。

十二月初十日(1月10日):

“德州禀^②:劳丞称,吴桥南县时有拳匪设厂。……前月二十九夜,二、三百匪将庞家桥教堂烧毁,并焚抢教民六家,伤教民二人、杀平民一人。

“十二月廿二日(1月22日):

“一、邱县禀^③:

“……本月初六常屯来匪二百余人^④与教民为难,再三央恳,未烧房屋。初九夕复来,匪首系威县拳民王洛金,即王玉振。是夕放火烧教民房屋,并将教民许兴发捉去。烧毁法国华式教堂一所十一间及教民随文明等七家房宅,拆毁魏永思等六家房宅,共七十九间。”

卷五《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起至二月二十二日》载:

二月初二日(3月2日):

“三、临清州禀^⑤:

“马天恩函称,……仓家庄距城七十里,与直隶清河、威县接壤,该庄共有教民十九家。十二月初十,匪十九人至庄,经教民姚金城、张同举、房兴盛、王廷桂等四家出钱二百千息事,未报案。”

卷六《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三月二十八日》载:

“三月初八日(4月7日):

① 原随文注:洋务局。

② 原随文注:初十到。

③ 原随文注:廿一到。

④ 原随文注:初七窜清河。

⑤ 原随文注:廿八。

“四、直督咨：英教士史礼门、孟恩赐、雷实礼、费约翰、古约翰由津赴河南、山东、直隶游历。”

“三月初九日(4月8日)：

“二、东海关……又申：英女教士李崇光赴山东、直隶、江苏游历。咨直督、江抚，照例分行。”

卷九《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起至六月二十一日》载：

“六月初四日(6月30日)：

“九、方志祥禀^①：

“直境范家寨掠杀教民三人，距梨园屯五十馀里，闻已传帖不日赴梨园屯。

“六月十二日(7月8日)：

“惠民禀^②：

“直隶逃入东境教民数百人，赴郡城强求保护。如遇拳匪，恐难相容。无兵弹压，解散为难。

“六月十八日(7月14日)：

“五、乐陵禀^③：

“十四日，直隶宁津土匪窜入张家桥等处，烧杀教民。

“沧州聚二千馀人，于十五日夜分窜入李名(扬)[杨]庄，焚毁教民房屋数处，生捆教民十数人，携至三间堂，齐行斩首。”

卷十《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起至七月初五日》载：

“七月初一日(7月26日)：

“七、冠县禀^④：

“十一日威县、馆陶匪徒分路入境之小王曲。因丁人少，不敢抵御。十一起至十三止，将小里固、孙家庄、固献村、蒋家庄、陈固、陈家庄、红桃园、梨园屯、宋家屯、中兴集、赵村、小王曲、小庄、鸭窝等处教堂、教民房屋，分别焚拆无存。分股盘踞威县之沙(兜)[儿]寨及河北红桃园地方。”

卷十一《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起至七月二十四日》辑：

“七月初七日(8月1日)载：

“二十七、临清禀^⑤：……十三夜，外匪至小炉，将教民教堂全行烧毁。……教堂华式瓦房九间、教民四十馀户。”

卷十五《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二日起至九月十四日》辑：

“九月初一日(10月23日)载：

“一、马天恩来电。行冠县。

“……冠县红桃园教民被戮者有十九名。

“二、复马天恩函

“……冠县红桃园，前据该县禀称‘有外匪在彼窜聚，并有教民一百馀人屯聚小(李)[里]固庄，彼此相持不下，互相寻仇劫杀’等情，惟未据禀报教民被戮十九名情事。”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辑：

1月9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给事中王培佑摺又片称：

“近日直隶景州、献县一带民教相哄，势已蔓延。闻带兵官效尤平原，又有滥杀情事。”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辑：

2月19日(正月二十日)著裕祿等严禁拳会并秉公办理教案事上谕附录1月27日(光绪二十五

① 原随文注：初三。

② 原随文注：十二。

③ 原随文注：十七、此禀另抄。

④ 原随文注：廿七。

⑤ 原随文注：初三。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国公使毕盛致总署照会称:

“照得山东北境与直隶中南境一带可惨之情,一月以来,迭经本大臣文致或与贵大臣面谈各在案。查此等情形为寰中有教化邦国可耻之事。推原其故,盖有二端:一系无法匪徒乌合成会,名为义和拳,又名大刀会,肆行凶暴,到处焚掠。一系地方官素餐尸位,驯至纵容酿患,以致该会匪党与教民为难,到处将教堂及教民房舍抢毁,以及堪憫妇孺咸遭涂炭。且匪党旗上大书‘灭洋’二字,是宜请贵王大臣再三留意者。本月十一日所奉上谕以‘会亦有别’等因,恭译此旨,惜使多人以此类大刀、义和等会为朝廷所嘉许。是以该会之人显著厥欣,气愈炽而胆愈壮,恣其闹教之凶。窃以为上谕之意决非如此,盖前已言明该会叛逆情形,实属可恶至极。本大臣切请中国朝廷审慎体察以上情形,及时认真设法,尚可挽救。否则致匪党妄想其行为为国家所许,日益披猖,于交涉之情大有危险。合请贵王大臣先行奏请明降上谕,指明义和拳、大刀会名目,飭令将该会剪除净尽,并声明凡入该会之人及容隐入会之人咸为中国律令所禁。是为切盼。”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辑:

2月19日(正月二十日)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等摺称:

“山东各属义和拳会以仇教为名到处滋扰,初尚仅与教民为难,渐且扰害良善,绑人勒赎之案层见叠出。近已波及直隶南境深、景一带。”

4月5日(三月初六日)御史李擢英片称:

“近又有山东义和团匪党散布京城,潜通南宫、冀州一带,无知之辈,明目张胆,到处勾劝。”

同日御史许佑身片称:

“近闻新城、固安境内亦有匪徒踪迹。”

4月16日(三月十七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直隶总督裕禄电报称:

“昨据俄使告朕芳云‘接友人函称“义和团、大刀会等月前已至涿州、易州等处,近日又至卢沟桥一带,约有百余人,昨忽在该处会议,并皆暗带兵器,散布揭帖,专以杀害教民、仇对洋人为词。卢沟桥一带教民今早纷纷进城,避在南北教堂内。”……俄国在此并无教士,特以友谊相关,故请中国政府赶紧派兵弹压……’等语。”

4月20日(三月二十一日)给事中冯锡仁摺称:

“窃查先年小民入教,类皆穷苦至极、顽钝无耻之流,教士以小利啖之,始能笼络归依。其时尚不敢与士君子抗颜行也。自近年地方官办理教案往往伸教屈民,桀黠之徒窥其情弊,于是有思逃刑罪而入教者,有思避捐输而入教者,有思挟制官长而入教者。始而弱民,继而富户;始而氓隶,继而绅衿;始而受钱以充徒,继而输金以领照。此教民日益蔓延之故,而亦教案日益繁多之由。然非尽教民之罪也。凡教案之兴,无不由州县之畏葸无能,不敢与教民反复辩论,以至于此。夫彼教固劝人为善,非纵人为恶也。若彼诚无理,而我执有辞,彼亦有血气心知,亦安能出于情理之外?自事事迁就,渐至相援为例,于是州县不堪其扰,而相与隐忍安之。盖犹以为彼完钱粮如故,诣讼狱如故,非有他也。而不知彼能于公堂面斥官长矣,彼能向官长指斥本朝矣,则是教民即叛民也。其所以犹完钱粮、诣讼狱者,彼其势尚未甚盛,非藉官长之权力,不足以欺压平民而陵夺之也。官长不之悟,反多方为之袒护,将使教民日蹙日盛,而渐成漫天之势,则必有不纳钱粮、不诣讼狱之一日……”

“然臣又以为此不但中国之不利,亦西人之不利也。……凡民之从教者,彼亦不过藉西教以为护符,非中心悦而诚服之也。若教民势盛无所复忌,则彼能抗中国官长者,即其能抗西国教士者也。彼二百余年教养之恩无故而可背,谓区区小惠遽能得其死心,有此理乎?”

4月22日(三月二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直隶总督裕禄电报称:

“顷法使函称‘接保定府电,该府属安家庄拳匪攻击教民,被杀数人,焚毁房屋,情形危急,请派兵救护’等语。”

同日裕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称:

“……查此案今早据藩臬来电以‘该处拳教各聚多人,互相械斗,已派营官张泰带队前往,会同该

地方官查办’等情……”

4月28日(三月二十九日)给事中胡孚辰片称:

“近来直隶、山东一带民教不和,多有学习义和拳会与教民为难者。……臣以为拳会党与既众,其中原不尽良民,而揣其结会之由,实因各处教民欺侮过甚,地方官又复一味袒庇,不足以服其心,乃藉拳会以资保护,并无与官为仇之意。”

5月16日(四月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直隶总督裕禄电报称:

“法使昨称‘涞水县属高柳庄有匪首严老福杀伤教民六十余人,情形甚重,请飭查办’等语。”

5月17日(四月十九日)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称:

“接该县^①禀报‘十五日夜北高洛村拳民在南高洛村与教民互斗,伤毙男女大小约二、三十人,是拳是教,尚未勘验明确’等语。复闻定兴县属之仓巨村附近涞水,亦有拳匪焚烧教民房屋之事。均已由津派令道员张莲芬、分统杨福同带领兵队驰往,会同省中委员及派往营队迅速查办”

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直隶总督裕禄电报称:

“据樊国梁函称‘保定一带拳匪蠢动,日甚一日。上月二十二日,清苑姜家庄圃村民教房屋焚毁;本月十四日,涞水高乐村教民杀毙六十八名,房屋财货焚掠一空;十五日,定兴仓巨村教民房屋焚烧罄尽,杀毙教民不知其数。逃难来京就食者男女已占满堂院,其逃奔他方流离失所者不知凡几。又安肃县安家庄村有洋式大堂一座、教士住宅一所、洋教士数人、育婴堂一处,邻村拳匪日久覬觐,颇形危险。已令林副主教往谒藩司,酌商办法。……现闻宣化府属延庆州,京东蓟州、邦均、宝坻、丰润以及天津等,处拳匪甚夥,均皆预备起事,等语。查姜家庄一案闻系教民先行起衅,此外各案,本署尚未知悉。”

同日直隶总督裕禄摺称:

“窃为乡民习学义和拳,皆由外来匪徒所诱惑。教民倚恃洋人庇护与乡民结怨者,到处皆有。乡民谓此可以抵制教民欺侮,因而传习渐广,匪徒即借此散布谣言,与教为难。地方文武一有所闻,立往查办。其所报之处,有事出有因,有全系谣言者;并有教民与乡民向有嫌隙,欲藉此中伤者;亦有彼此相疑,群(众)[聚]防备者。”

《清末教案》第四册(《法文资料选译》)二、《传信年鉴》辑:

5月18日(四月二十日)动笔,5月30日完稿的中国北直隶樊国梁主教的书简^②载:

“我在法国的逗留时间流逝的非常快。……我庆幸自己及时返回了我的宗座代牧区,因为我预感到正在策划着某些严重事件,一场风暴可能已经掀起……”

“为了更好地理解如此迅速地产生的暴乱和反洋教运动,则必须研究其原因……”

“当皇太后发现光绪皇帝无能力成为皇位继承人的时候,特别是当她发现他在策划反对皇太后的阴谋以让她放弃垂帘听政时,便拥立了另外一位新皇帝,或者更应该说皇位的一名指定继承人(皇太子)^③。这位未来的中国皇帝年龄只有12—14岁,是晏驾于1860年的咸丰皇帝的五弟敦亲王的孙子。”

这位(敦)亲王[的]儿子^④也拥有同样的尊号,他是新皇帝的父亲,充满了仇恨欧洲人及其宗教的思想。这种仇恨和敌意是很容易解释的。事实上,恭亲王(六王子)于1860年夺取了摄政权,其弟七王子作为光绪皇帝的父亲而继承了他。他们二人都是敦亲王的幼弟,敦亲王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地从1860年亲政。此外,当涉及到选择取代无嗣而晏驾的同治皇帝的王储时,大家选择了七王子的儿子,而本来完全应该选择敦亲王的儿子。这两次不公正行为严重触怒了敦亲王,他于是便率领其全家返回

① 涞水县。

② 译者注:译自《传信年鉴》第72卷,1900年。

③ 即溥儀(1885—1908),1900年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册封为大阿哥(皇储)。次年11月(十月)该封号被撤销。

④ 即载漪(1856—1922),嘉庆第三子。敦亲王瑞恺无子,以道光第五子奕谿过继。载漪是奕谿第二子,被过继给嘉庆第四子,端亲王绵忻之子,后被封为瑞郡王(原作瑞郡王,因述者失误,误瑞为端,遂因之)。1900年6月(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900年9月25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二日)被撤职。

了盛京(沈阳)。对于皇位继承人的这种选择,使敦亲王目前在皇太后面前具有了一种很大的影响。他怀着对欧洲人、[对]中国人与欧洲人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自1860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之深仇大恨而返回北京。此外,他也是以对欧洲事务、已出现的发展、已形成的租借地的绝对无知,充满着对40多年的中国全部旧思想而返回来的。由于中国的元老派和上层人物一方始终都保持着对欧洲人及其宗教的满腔仇恨,所以他们都迫不及待的与端亲王^①联合起来了。由此产生了两个界限分明的阵营,也就是以该亲王为首的一派,以其他亲王和自1860年以来相继主政的官吏为首的另一派。这后一派势力接受了进步发展的思想,故起草保护宗教的圣旨和法令,一直到作为其大获全胜的1899年3月15日的诏书颁布为止。皇太后本人正是这一事件的唆使者,她本人署名,而且从未撤销这份诏书。

“中国的元老帮最终获得了胜利。大多数派系集团都会集于‘义和团’、‘大刀会’等的旗帜之下。这些会社的起义诞生于山东,自6—7个月以来,已经开始在直隶传播并直指北京。

“‘义和团’确实是恶魔般的秘密会社,乞灵、念咒、魔鬼附身和甚至是着魔中邪,这一切于他们之中应有尽有,无所不为,其信徒中的奇特行为原来可能是被学者们归咎于磁性或催眠术。大家称之为歇斯底里(癡病)患者,或者痉挛病患者,但我们却认为魔鬼的作用是明显可见的。

“对于基督徒名称的仇恨促使这些‘拳匪’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分散在各个村庄中,于特定的日子汇集(合)起来以攻击某一基督教会口。5月12日星期六,他们烧毁了高乐村,那里共有70多人被杀。此后的几天间,其它许多村庄也被烧毁,基督徒们四处逃散并抛弃了其家产。北京城本身也不安全了,义和团大批人马进入那里,到处张贴揭帖,宣布要烧毁教堂和灭洋人……

“……高乐的屠杀……共有80多名受害人。幼童受刑,妇女被烧死在教堂中或被乱刀砍死,男子汉都被长(予)[矛]刺死或者是被枪打死,甚至传说有数人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共有20个人得救了,因为他们在发生屠杀时并不在那里。有一个18岁的青年人蔽身于井底并在那里滞留了近48个小时,当杀人凶犯离开后,他才从井中出来,刚刚到达我们之中。在一个村庄中,两名基督徒被碎尸。在第三个村庄中,又有数人惨遭屠杀。至少有30个村庄被基督徒们遗弃了,有6个村庄以及他们的教堂都被完全烧毁。我的那些受到追捕的可怜中国人逃亡于深山中,或者是避难于我们的大住院中。我们已经收留了这些人中的2000多名。”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辑:

5月19日(四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称:

“清苑姜家庄一案现将起衅之教民王洛敏、民人张洛提归案审办,飭即讯取确供,持平办理。涑水高洛村一案……于十七、十八两日拿获拳民李勤等二十余人,查讯系属拳民起衅。……惟教民被烧房屋,昨樊国梁函称约十八家,法领事函则云三十余家,究系若干家,应与被杀教民一并查明确数核办。”

5月22日(四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称:

“乃闻近畿一带派出之带勇员弁办理不善,甚至纵容兵勇以查拿拳匪为名,择肥而噬,勒索乡愚,以至闾里骚然,良民不能安堵。”

同日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摺称:

“义和拳会,始自山东,渐及直境。……近畿一带,如清苑、涑水、定兴等处,屡有焚毁教堂、伤毙教民之事。”

其又片称:

“四月十七日俄国使臣格尔思邀臣衙门翻译官道员联芳前往该馆,密告以现在保定一带义和拳会又有焚毁教堂、杀害教民之事。闻杀死男妇老幼六十余名。”

同日御史许佑身摺称:

“臣维近时之患,莫大于民教之不安。民教之不安,由教士偏护教民,挟制州县。凡民之未入教者,受教民之侮而无所控告,于是相率仇教,鼓动愚民,此义和拳之所由起也。……以臣近日所闻,直隶境

^① “端郡王”之误。

内河间、保定、任邱、定兴等处民教相哄之案层见迭出，甚至互相仇杀……”

5月23日(四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称：

“本月十五日涞水之高洛村、定兴之仓巨村拳匪滋事，伤毙教民，焚烧房屋，当派道员张莲芬、练军分统杨福同带领兵队前往查办，旋在高洛拿获拳民二十名……并搜获教民尸身数具，高洛、仓巨村匪徒渐已解散。复又闻定兴县属之石亭地方有匪徒众设立拳厂之事。二十三日分统杨福同前往劝解查禁，该匪抗拒，当经拿获二名，余众均散。二十四日又散而复聚，杨福同带队七十人复往劝导。詎该匪等均聚村外，于杨福同甫抵村外，匪众数百人突起围住，持械猛扑，用长矛将杨福同连扎致伤堕马，旋即殒命。”

5月28日(五月初一日)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称：

“二十九夜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距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餘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三河店所住洋人二十餘人现尚不知下落，丰台黄村势甚危急。”

5月29日(五月初二日)督办铁路事务盛宣怀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称：

“长辛店逃回工头与华、洋人均在长辛店山上自守，不得出围。”

其又电称：

“保定洋人均已赴津避乱，长辛店洋人尚无下落。”

5月30日(五月初三日)盛宣怀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称：

“顷据比总工程师司沙多稟，接比使电，长辛店洋人二十餘名初二戌刻到京。”

同日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书翘等摺称：

“前因涿州双柳树村、宫村出有逐杀教民二案，虽由涞水余匪波及，所伤不过二三人，该牧事前究属疏于防范，立予撤任。”

其又片称：

“民教不和，由来已久。各国传教之人，虽有天主、耶稣之别，究其命意，要不外劝人为善。无如人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恃教师为护符欺压乡里者，亦复所在皆是。往往以钱财细故动辄涉讼，甚且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地方官亦明知审断未平，不得不含糊了事；小民受其鱼肉，积不能平。此等情形，各国主教焉能得知？无非听教民一面之词，动谓民曲教直。于是小民之冤无处申诉，酿而为义和拳会矣。……且查涿州双柳树一案，仅伤两教民而逸，室中一物未失，真有古侠士之风，其非甘居为匪，已可概见。”

6月2日(五月初六日)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电报称：

“卢保铁路洋工司二项等三十餘人自保定雇民船十一只回津，由省拨队护送。初四午前行(自)[至]雄县小龙王庄，突遇拳匪多人拦截河岸，施放抬枪，将船头击坏，弁兵众寡不敌，洋人男女均上岸逃避，未知下落。……适间闻已有送回洋人八名至津，其余各人仍飭赶速寻找。”

6月3日(五月初七日)御史许佑身摺称：

“臣闻直隶涞水县拳匪戕害武员杨福同之事，当事之初起，该处匪徒并未敢列械抗拒。涞水县知县祝蒂，既不能消息未形，迨事起仓猝；又复张大其词，遽请调兵。督臣派武员杨福同带兵驰往，同时提督聂士成所派之兵亦到，以拳匪尚属安静，按兵不动。而该令怂恿杨福同诱杀十餘人，以致匪徒反噬，身被戕害。”

6月4日(五月初八日)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称：

“现查明比公司被难西人三十六名，于初六日午间到津二十七人，初七寅刻续到两人，共到二十九人，内受伤七人，其余七人刻下尚无下落。……今日已刻接大城县稟报，该县王口镇地方又救出洋人三人，留署雇船送津，请拨队迎护。”

6月5日(五月初九日)督办铁路事务盛宣怀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称：

“保正路工洋人避难，舟过任邱，被拳众冲散，尚有七人未到津。比使电称，总管倭松等四人先失，

恐已遭难。”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

6月5日(五月初九日)三点钟英使窦纳乐为永清教案事来总署问答节略载:

“窦云:我日昨来署,言永清教案洋教士一人被杀、一人被掳,贵堂官四人并无惋惜之意,但称由直隶总督办理,总署毫不在意。故我特见王爷,询问此事。

“答以:昨晚接直督复电初得闹事信,即派马队三十名往永清弹压。旋知洋教士被杀,遂加派何镇乘鳌带队前往查办。顷已发函相告。英教士猝被杀害,实为可惜,俟接有续信,再当知照。

“窦云:现闻被掳教士已为匪首李振方所杀。

“答以:我们尚未接信,容再催令缉凶办理。

“窦云:中国派兵弹压拳匪全无效验,前晚黄村车站又被焚毁,各国看中国兵力有不能弹压之势。

“答以:聂提督昨晚已到天津,现拟调兵十二营前来保护铁路,可无他虑。

“窦云:连日派出之兵皆目睹拳匪不打,若聂军仍然照样,无济于事。

“答以:并非不打。拳匪忽聚忽散。官兵所扎处,该匪四散,即是本地居民无从寻觅匪踪。且该匪本与教民齟齬而起,却未扰害平民,所以彼等若不抗拒,实不能骤施攻剿。

“窦云:现涿州、永清皆拳匪自行作主,官不能管,与占据城池无异。照我们看法,中国政府已经无权。我们公使均已报知本国,只好自行添兵剿办。

“答以:弹压土匪乃中国内政。应行攻击与否,聂提督必有权衡,断无庸各国预闻。

“窦云:此两三日来京内外拳会愈聚愈众,若贵国政府执定不打拳匪,如数日间再有焚抢之事,各国主意一定,即径行剿办,亦不来与贵署商量了。我为交谊起见,特先奉劝中国,至此万不可不打为要。

“答以:如应行攻剿,我们兵力自敷,你们切不可妄动。

“窦云:我不能不声明。再,永清县教士案,请速查办。

“答以:诺。

“窦遂辞去。”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辑:

6月6日(五月初十日)直隶总督裕祿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电称:

“拳匪自焚毁铁路电杆后,匪势顿形猖獗,涿州聚匪尤多,勾结党类,肆行滋扰。如任邱、霸州、东安^①、永清等处与教寻仇,迭次烧杀抢掠,甚至戕害洋人。近则静海、青县亦属响应,明目张胆,不服劝谕,竟敢在天津县属之郭家村焚杀教民,官兵前往查禁,列队抗拒,虽经队击走,而天津静海附近一带尚未解散。……目睹情形,拳匪如此鸱张,不止专与教民为难,断非仅恃劝导所能解散。趁此匪势初起,必须剿抚并用,尚可克期而定。”

6月10日(五月十四日)御史管廷献摺称:

“拳民为徒既众,良莠不齐,恐以畏罪之情迫为负隅之计。兼闻教民往往逃聚一处筑圩自守,枪炮充斥,人数众多。拳民虑其报复,不免迟疑观望,恐非空言所能为力。”

“近来遇有民教争讼地方官稍欲持平,教士已登堂恐喝,略不满其所欲,则赴督抚署恐喝矣,则赴总理衙门恐喝矣。虽欲持平,乌得而持平!且教士为外国人,略加优待,犹可说也。教民亦民也,乃与平民争讼到堂,平民长跪,教民则不跪;居乡,平民有差徭,教民则无差徭,平民有厘税、杂派、酬神、演剧等费,教民则一概全无;乌得为平!势至于此,不惟教士颜面不全,即性命亦不敢保。究何益乎!”

“抑臣更有请者:骚扰固干宪典,而激变溃败,厥罪尤重。闻拳会激怒之由,由于吴桥县知县劳乃宣索奉天主教,不敬神像。县民祈雨,恭请关圣神像,求其拈香,伊不行礼,反将粪桶加於冕旒之上。民恨刺骨。久旱不雨,皆云该令辱神所致。又无故严拿拳民,杀戮多名,甚至斩棺戮尸,以媚教堂。故民纷益甚,饕教益深。至在任邱县无故激变之署河间府知府王寿堃与涞水县激变之知县祝蒂,尤彰明较著

^① 1914年改名安次县。1983年3月3日撤销安次县,并入廊坊市。

者也。”

6月11日(五月十五日)守护西陵大臣奕谟等摺称:

“四月十四日涑水地面拳教构衅……实系民教为仇,并未扰害良善。查易州向无教堂,各村人民奉教者少,是以奴才等再四商酌,未敢张皇入告。”

《清末教案》第四册(《法文资料选译》)二、《传信年鉴》辑:

某日直隶东南部张家庄住院的会长、耶稣会士谢内沙^①神父致亚眠耶稣会士省会长神父的书简:

“耶稣会发现其殉教者们的队伍于6月19日又增加两位‘上帝的选民’,这就是武邑城的安德鲁埃^②和伊索雷^③神父。”

“尊敬的会长神父尚未确切理解到北方形势的严峻程度,将伊索雷和李西蒙(Li Simon)两名神父派往本处,让他们在此略作休息。”

“这两名神父于星期六16日到达住院。由于义和团又开始侵犯直隶南部,所以现在很容易预料到已经再没有能通过此地的任何办法了。大家向尊敬的神父伊索雷建议重新启程赴其辖地,以便领导那些很快即将面临义和团袭击的基督教机构。他本人自己提出要再度离去。由于沿途有危险,我留给了他充分的自由。但这位忠诚的神父对我说:‘您的意图对于我便是一种命令,我今晚即将出发。’

“尊敬的伊索雷神父自己提议要经由武邑,这是一条不太安全的道路。他于清晨一点钟左右出发,于九时左右安全无事故地到达武邑。但他刚刚进入住宅,一个叫作圈头的大镇的义和团成员便进入了武邑县,以要求释放他们的某些被囚的同党。该官吏立即令人关闭了大门以阻止他们的活动,但为时已晚,义和团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一切。”

“当获悉有两名欧洲传教士(尊敬的伊索雷和安德鲁埃神父)在场时,他们就企图射击。”

“约在下午5时左右,门房便意识到大队开来的义和团即将炸掉车辆通行的大门,于是便向正从侧门上了望的安德鲁[埃]神父指出了这种危险。神父返回了院子中并关上了侧门,但该侧门也无任何抵抗作用。义和团砸破大门并且冲入内宅。这两名神父于是便前往小教堂,他们必须在那里跪着等待其刽子手们的到来。大家发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长矛戳穿了身体。我们的任何人都未曾见到过他们。但住院有两名友好的异教徒邻居,他们叙述了自己曾见过我们的两位神父做这种姿态。他们声称安德鲁埃神父还显示过某种活着的迹象,这就有些令人质疑了。由长矛刺下的伤口可能会很多,因此这就是我们的两名殉教人。”

“过了某些时间之后,有一封电报通报了另外两名耶稣会神父的被害,这就是尊敬的邓恩(Denn)^④和芒金(Mangin)^⑤神父:

尊敬的邓恩神父于1847年诞生于里尔,很晚才进入修会。他最初供职于斯卡贝(Scabett)银行,后于1869年受赴遥远地区传教活动的吸引,于是便投考于亚眠的使徒学校。1872年,他便进入了耶稣会初修院,于同一年出发赴华时尚为初学修士。他于1878年被授司铎神品,先被任命为司库,又于以后数年期间领导张家庄的教会学院,接着又主持传道员师范学校,他为这些学校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仅是在数年前才离开这一职位被派往(古)[故]城县,在那里接受了作为其最高愿望之圣宠的殉教。

尊敬的芒金神父属于梅斯地区的一个贵族家族,于1855年生于维尼(莫塞尔)。他成长于梅斯的圣一克莱芒学院。在该学院附属亚眠省之后,他于1875年进入了圣一阿瑟尔的初修院,在一段时间曾于列日(比利时)的圣一塞尔韦学院任教授。但他很快(1882年)又出发前往中国传教

① 即林道昌(1853—1906),字启泰。法国耶稣会士。时任教区总堂张家庄会院院长。

② 安德鲁埃,“路德德”的音译。

③ “伊索勒”的另一音译。

④ 即汤爱玲(1847—1900),字怀宝。法国耶稣会士。

⑤ 即任德芬。

区,充满着活力和决心。他于1885年在那里接受司铎神品。于是,立即便将(古)[故]城这个重要的县托给他了。他的管理才能使他很快就占据了一个很明显的职位。他于1890年被任命为河间府南部的司铎。这些职务使他与中国当局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他以其坚强的性格赢得了中国当局的高度评价和尊重。在近期,他又迁居景州并主持(周)[朱]家河附近的育婴堂。他在那里因保护其基督徒而死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辑:

6月20日(五月二十四日)直隶总督裕禄摺称:

“天津义和团民近已聚集不下三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①。”

6月21日(五月二十五日)上谕称:

“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

同日裕禄摺称:

“现在紫竹林一带连日鏖战,洋兵势已穷蹙。……其杨村所阻洋兵,昨夜带同教民共约千余人,乘船窜下。”

6月25日(五月二十九日)裕禄摺称:

“二十六日,官军与洋兵在北仓力战,将洋兵击散。有洋人带领教民约数百人入西沽武库土围墙内,负固力守。”

6月26日(五月三十日)东陵承办事务寿全等片称:

“薊城西南十二里墩庄旧有洋人教堂一处,现时远近教匪聚会数千人之多,内有洋人数十名,在该庄迤南现渠庄深挖堑壕,叠垒土围,周匝约有四里之馀,竖旗燃放枪炮。并在墩庄教堂内洋楼以上悬挂大炮六尊,小炮约计数百杆,排列四面。其势甚凶。并用重利买人,在各处井中下药,门首抹红迷药拍花。城乡附近居民均皆慌惑。……再城东南六十里下仓镇迤东少林口亦有洋人教堂一处,聚集教匪亦有千馀,洋人尚不甚多。其势与墩庄相似,均属可畏。”

6月28日(六月初二日)察哈尔都统祥麟等摺称:

“口外东沟门一带,向有教民聚处,近复纷纷避集……”

6月29日(六月初三日)东陵承办事务寿全等摺称:

“近日四出侦探,据报,教匪窜及石门一带地面,必须赶紧严防,以期有备无患。”

同日御史陈璧片称:

“京城教民过多,闻旗兵亦复奉教不少。现经义民焚杀,大快人心。而诛之不可胜诛,且不予以自新之路,转为洋人甘心效死。除罪恶重大照章查办外,相应请旨飭下王大臣,设立自新公所,转令义民将所拿教民送至公所,使其跨十字架,尽反所奉天主、耶(苏)[稣]之教,可以免死,取具五家连环保结存案。如敢阳奉阴违,五家一同坐罪。至于拿送公所申明后始终固执,不肯反教,然后阖门尽焚,杀之无赦。”

6月30日(六月初四日)直隶总督裕禄摺称:

“五月二十九日……早,有洋兵数百名,并教民多人,由火车站缘铁路窜至锦衣卫桥,意图接应窜扰武库之洋兵。”

同日安徽巡抚王之春摺称:

“近畿一带,民教寻仇,匪徒混迹其间,乘机烧抢。”

^① “1900年6月14日……晚十二点时,天津城内的团民就在清军杨寿臣等部的率领下,把仓门口、西门里、镇署前三座教堂同时焚毁。次日午后,又焚毁了天后宫北教堂,晚上又烧了望海楼教堂、马家口教堂等。”(《中国教案史》第520页)

7月1日(六月初五日)军机处寄山西巡抚毓贤上谕^①称:

“现闻直隶献县黑风口^②教堂集聚教民甚众,意图滋事。著毓贤速带所募两营星夜前往,纠合义和团民相机剿办,勿稍迟缓。”

7月4日(六月初八日)热河都统色楞额摺称:

“热河所属厅州各县处处均有教堂,平日聚集教民实繁有徒。前因拳教相讎,业经分饬各防营及地方文武严为防范。近日风声所播,竟有各教堂制造枪械、挖壕演练情事,正在派兵密查。即据署朝阳县知县董文诰电禀,县属松树嘴子教堂现聚教匪千余人,以自保为名,挖壕演枪。又据署滦平县知县文星禀报,县属老虎沟教堂聚集教民,整顿洋枪大炮为先发制人之计。又据该县禀称,六月初四日申刻,大店子汛接到古北口城守营文称,由南甯来洋教匪千余,将大水峪烧毁,并烧毁虎什哈一带,往东骚扰。查虎什哈系滦平县辖境,距热河二百二十余里。当经奴才札饬佐领荣升、国瑞督带强胜前营步队二百名、炮兵五十二名在于滦平,昼夜巡缉,如有教民聚众滋扰,立即剿拿。并派佐领富龄督带强胜左营马队五十名驰往滦平县属之鞍匠屯,侦探逃来教民究有若干、作何情形,飞速禀覆。一面札饬承德府,通飭出示晓谕以‘内地教民被义和团杀害者皆系附和洋人,抗拒王师,咎由自取。口外教民系属本地居民,果能迁善改过,朝廷自必格外加恩。倘敢乘此聚众生事,必定重兵剿除,不留根蒂,并由该府派员驰往譬晓,冀其解散。’

同日东陵承办事务寿全等摺称:

“现探闻前甯石门之教匪,业已由遵化州驱逐南甯。”

7月5日(六月初九日)军机处寄南北洋大臣上谕称:

“各国与中国衅端起于传教者居多,教民为洋人勾引,最为心腹之患。乘此事机,杜其传教之根株,实中国一大转机。”

同日军机处传谕直隶布政使廷雍称:

“有人奏‘保定府南北各村间有教匪滋事,宜剿抚兼施’等语。著廷雍遵照明发谕旨,剴切晓谕,准令该教民悔过自新,不咎既往,务期化莠为良。俾畿辅先行廓清,毋任滋事。”

同日御史陈璧摺又片称:

“闻香河、宝坻两县交界之大合屯教民聚众千余,筑围抗守,团民攻之不下。”

7月7日(六月十一日)给事中李擢英摺称:

“义和团之杀教民,未免过甚。盖教民既多,苟无生路,必结死党。其已从洋人者,既难望其逃散;其未从洋人者,且将乐为依归。臣闻东交民巷洋人前夜劫营,竟数千人,其多系教民可知。又闻京外如武清、定州等处,各聚有教民万余人,劫杀拒捕。一旦洋兵麇集,皆必为之腹心。”

同日安徽巡抚王之春电报称:

“保定四关莠民拒守北门,册报毁教堂、戕害教士接踵而来,势难结束。”

7月8日(六月十二日)直隶布政使廷雍片称:

“保定乃各省通会要区,为京师西南屏障。刻下虽无夷患,而清苑之[东]间村、安肃之安家庄两处教堂各聚万众,招会土匪,筑垒掘壕,操练枪炮,时常四出焚杀劫掠,形同叛逆。且河间、正定、深、冀一带教民亦均负隅抗拒。若不及早扑灭,日久声势联络,内而伏莽丛生,外与洋兵响应,必至掣动全局,不可收拾。前奉六月初四日谕旨,令张春发、陈泽霖带队到保,与奴才面商,速行剿办东间村、安家庄教匪。……惟张春发队伍到保尚需时日,而东间村在省之南、安家庄在省之北,相距各五、六十里,设有会合,则省城腹背受敌。奴才……拟先攻东间,再剿安庄,以分其势。已于初七日商令督标副将张士翰带领马步练军各一营驰近该处,相机剿办。适有天津饬调之正定镇练军马步三营过省,当经奴才禀留,陆

^①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所辑题为“著山西巡抚毓贤速带所募两营前往直隶献县剿办教民事上谕”。

^②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张家庄被围记》:“自从洋兵攻破天津、占据北京以后,拳匪的势力渐渐衰败,有一班迷信最深的拳匪欲作最后的挣扎,谓献县总堂为黑风口,非中秋八月八日其友协力进攻,不能取胜。”

续前往该处接应。已力攻三昼夜不下，足见其濠垒坚深，军火利用。但省防向归张士翰，所带马步练军三营又多未经战，制胜难期，非有大枝劲旅不可。虽奴才已禀准督臣添募步队四营，奈军械匮乏，甫成一营仍难展布。……刻下顺直各属州县所报教民聚众已成敌寇者，现有十九处之多，粮械充足尤有甚于东闾。总之，内地留一教匪，即外夷伏一援兵，实心腹之大患也。仰仗天威，迅将东闾匪巢铲除，即应接攻安家庄。惟闻该处匪势更炽，埋伏尤多，未可轻于一试。拟令练军阻其四窜之路，俟张春发等军到后，奴才与之商办，务期一鼓荡平。并请飭下张春发、陈泽霖各军酌留数营，将各处教匪次第剿办，俾免内顾之忧。”

同日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长萃摺称：

“奴才久闻东路教民各县俱有，而宝坻县属之大口屯、通州属之贾家疃两处筑圩掘壕，防守甚固，实为肘腋之患。近日大口屯教民时出肆扰，焚烧村庄，居民异常惶骇。义和团民结队往攻，复为所败。适分统武卫左军右路等营李大川部领三营由蓟赴津，道出宝坻，经地方百姓迫切攀留助剿，初六日已四面合围，可期扑灭。而贾家疃附近州城，虽踞伏不出，而深沟高垒，俨同敌国，实已不堪劝谕。近复有逃兵携带军器窜入其中，已聚有数千人之多，诚恐将来或为敌人内应。

“在奴才未经奉到寄谕之先，初九日清晨，团民已集众万馀进攻贾家疃，至晚纷纷败归，受伤者百馀人。据称教民枪炮甚多，不能进步。初十日复攻，亦不得利。十一日虽将南面攻破，而洋楼巍然，其中污秽丧葬之物甚多，团民又无枪炮，断难取胜。奴才以为攻打洋人教匪，必兵团相辅而行，乃能有济。若不设法接应，团民一散，教匪必出而相雠，州城守备空虚，为害不可胜言。应请飭下大学士荣禄，无论如何为难，抽调炮队一营，辅以步队一二营，迅速来通助剿，得以净绝根株，免生后患。一俟该疃荡平，仍令该营回京，听候调遣。”

7月10日(六月十四日)直隶总督裕禄摺称：

“初十日聂士成在于小西门围墙土台上安装八生七脱炮两尊，布置已定，即燃炮轰击，焚毁紫竹林洋楼一座。……是晚……至跑马厂，将近子刻，见有洋兵及教匪三百馀人，遂用手雷抛击，伤毙甚夥，余俱惊溃，我军哨官柴得贵亦被地雷轰伤甚重，当将该处洋楼三座焚毁。……是日晚间，复有洋兵多人向马家口潜进。其地系淮军营官蒋顺发、周行彪防守，适义和团张德成亦率团民数千在彼处驻队，登时并力击退洋人，即乘势追下，直抵紫竹林交界，将附近租界一带之洋楼焚烧多处，洋人窜匿楼房一所，抵死守御，至夜半始行收队。十一、十二两日，我军仍三面燃炮环击紫竹林，击焚洋楼不少。”

同日仓场侍郎刘恩溥摺称：

“闻武清县双树村教匪有万馀名窜至宝坻县属之大口屯、大宝殿等地方盘踞，若不速行歼灭，恐内外勾结，患不胜言……”

“探闻六国每柴日挨班打仗，前敌尽用教民，故洋兵从容闲暇，并不疲于奔命，合并陈明。”

7月11日(六月十五日)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长萃摺称：

“现在贾家疃内洋人教匪火器甚利，团民一无枪炮，受伤者甚多，实难进攻。现经飭令筑围守之，专候调到火器再行攻打。”

7月17日(六月二十一日)上谕称：

“此次中外肇衅，起于民教之相哄。……朝廷谊重邦交，仍不肯轻于决绝，迭经明降谕旨保护使馆，并谕各直省保护教士。”

同日河南巡抚裕长又片称：

“探闻沧州薛家湾地方已有匪徒假冒义和团名色，以查禁洋教为由在彼拦河、捆绑商民、劫掠焚杀情事。大名府开州一带则饥民千百成群，阻止行旅。其德州、临清等处，匪棍亦所在响应。运河两岸积尸满道，杀戮之惨，目不忍睹，地方官无从过问。因而商旅断绝、舟楫不通者，已经一月有馀。”

7月18日(六月二十二日)仓场侍郎刘恩溥摺称：

“六月十七日……有探报云团民退缩，被练军杀毙三十馀名。……时值南门外练军团民同时溃散，

守御空虚，敌人即于十八日寅刻扒城^①而入。闻真洋兵只有四十余人，其百余名皆系教民。”

7月20日(六月二十四日)察哈尔都统芬车等摺称：

“据有探报，距口九十里之西湾子地方，聚集教民男妇两万多人，垒壁挖壕，暗藏枪械，内中设有炮台，如防大敌。相传洋教士摆列阴魂阵，专于夜晚操练。初举此事，曾自杀毙男妇幼孩一百余名口，以为布阵之需。由北往南直至口内，节节散置奸细，窥我虚实。其居心叵测，大可概见。又据察哈尔正黄旗总管详报，所属新地南壕堑、牌楼沟、萨巴尔等处之教民，皆聚於南壕堑，操练邪术，惊吓蒙民。馀有口外黑水河等处，教民不少，大略情事相同。”

“奴才等伏查，张家口为京师门户、北路咽喉。东如独石口适中之地，有夹沙坝、马莲口、青便口各隘；西如新平口适中之地，有旱诺尔坝、水关、神威台、冯家窑、小水泉各隘。此外沿边小口为数尤多，路径纷歧，头头是道。况口外西湾子、南壕堑等处，相距匪遥，竟聚教民不下三、四万，人心惶惧，昼夜惊恐，亟宜剿抚兼施，先除腹心之患。”

其又片称：

“奴才等查西湾子地方在张家口迤东，相距九十里；南壕堑亦距口匪遥；其馀牌楼沟、黑水河等处，均有洋人教民纷纷麇聚，心怀叵测，以致口内外居民日夕数惊，人心惶恐。是此洋人教民一日不为歼除，则口内一日不得相安。奴才等恭阅邸钞，钦奉谕旨：‘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既往。’仰见圣恩广被，一视同仁。奴才等现飭张家口抚民同知宣布皇仁，剴切晓谕：如能革面洗心，俯首受抚，岂不甚善？倘该教民始终怙恶，罔有悛心，亦不得不痛加剿除，勿留馀孽，以期根株悉绝。但该教士教民专恃邪术，梗顽难化，官军恐难制胜，似非义和神团不足以破其妖术邪法。相应请旨，飭下督办团务王大臣拣派团民一千名，飭令迅速来口，以资防剿而免他虞。”

7月22日(六月二十六日)翰林院侍讲檀玘呈称：

“天津开战一月以来，互有胜负。洋兵为数无多，我之兵力非遽逊于彼也，彼不过善用教民为汉奸耳。”

7月23日(六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寄察哈尔都统芬车等上谕称：

“总兵万本华……既已到口，该都统等务与熟商妥筹，即就现有兵力将各处聚集教民妥为弹压，设法解散；如敢列队抗拒，应即相机剿办。”

7月24日(六月二十八日)直隶总督裕禄等摺称：

“钦奉谕旨：‘联络义和团民，当将其头目张德成、曹福田加意抚循，约其相助’。乃该团野性难驯，日以龀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而教匪亦乘间效其装束，以红黄布裹首，混迹城乡，暗埋地雷，无从分辨。十七日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藉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大军奋勇直前，忽四处地雷轰发，数十里内木石横飞，天地变色，当是之时，义和团已不知去向。且值居民惊避之际，或掠良家财帛，或夺勇丁枪械，甚至抢劫衙署、焚烧街市，事后则解去红布，逍遥远避。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

7月28日(七月初三日)御史郑炳麟片称：

“清苑县南境东间村教堂，始不过千余人，后加以贼匪散勇并四远教民，已不下万人。昼则踞伏，入夜四出抢劫，十里以内村庄烧杀殆遍，团民攻之月馀不下。六月中旬藩司廷雍派正定官军助剿，已垂破矣，忽有督标中军副将张士翰用炮轰毙官军数十名，因之解围。先是，廷雍屡催张士翰往攻，迁延不赴；迨不得已而出，又复反攻我军，其为汉奸无疑。又统领邢长春与被团裔割之杨福同系属儿女姻亲，有意报仇，与团民屡次交仗，互有杀伤。尤可恨者，高北店、北河一带良民均被伊兵烧杀抢劫，甚至用巨炮轰毁两村，人民庐舍荡然一空，惨酷直不忍言。相应请旨飭下直隶藩司一并切实查核交刑部治罪，而派兵资巨炮速破东间教堂，于大局实有裨益。”

其又片称：

^① 天津城。

“宝坻县知县王忠荫一味袒庇教民，与百姓为仇。其二子皆奉洋教。此次团民起事，该县为之胆落，先将其二子送入教堂，招勇自卫，不敢出衙门一步。”

7月29日(七月初四日)察哈尔都统芬车等摺称：

“近日据龙门县^①知县张趾麟禀称，西湾子教民意将扰犯龙邑，占据城池，请拨兵防守。复据察哈尔马队统带奇莫特哩克津等飞报，口外马贼充斥，教民勾结抢掠，请分兵捕拿。”

7月30日(七月初五日)热河都统色楞额摺称：

“奉上谕：……杨玉书所统练军，著准其酌留两营，以固边防。其余六营，仍著调赴北洋。

“自该军开拔后，民心惶惑。兼以內地拳民、教民纷纷出口，口外教民亦闻风屯聚。……滦平老虎沟教堂；经前派出之佐领富龄等督兵往查，教民当时解散。传讯该堂教士，供称‘实因畏拳民杀害，自行防范’之意。奴才复将六月初六日恩准教民报明地方官听候妥定章程分别办理及保护教士回国之谕刊刻告示，遍行晓谕。于是各属教民稍为安靖。

“忽于是月二十六日，据围场厅禀报，厅属之十六分地有拳民焚杀教民情事。”

8月1日(七月初七日)仓场侍郎长萃摺称：

“前任通水道沈能虎奉准招募之一营到通……编作潞军前营。……因新募之人多不善枪，是以选带五成队伍并协标左右营兵百名，于二十五日^②进攻贾家疃。该疃周围约五、六里，四面密树环绕，不见围墙，东南及西北树木稍稀，露见围墙高约一丈，墙内外各有一濠，宽深各七八尺不等，墙内树木亦多。但见洋楼高矗，大炮初震，即将洋楼顶十字轰落，而楼墙坚固，轰击不开。转而攻击围墙，仅止一炮一孔，不能轰倒。疃内教匪即在围墙孔内施放快枪。……疃内匪众全集，西南枪子如雨，绿营弁兵及前营哨勇阵亡受伤者二十馀名。该副将先令各团^③分持秫秸土袋，一俟兵勇进攻即便填濠。及见兵勇受伤，各团即将秫秸土袋弃掷于道，各自散归。然阵亡受伤者亦有三十馀名。维时天已黄昏，只得撤队驻扎近村，以图再举。”

“奴才复亲至该处激励各团，晓以厉害。共时在疃共一百三十六团，四千七百馀人，告奋勇者二千一百馀人，并分给云梯、挡牌、火弹、火绳、铅丸、铁沙、洋药、铜帽、快枪等件，议定七月初三日进攻，各团以红、黄、黑三色头巾，分攻东、南、西三面，兵勇专攻北面。……弁兵攻附围墙，枪炮轰击，疃内群房摧毁甚多。而教匪隐身围墙之内，时发一枪辄伤一人。总哨刘文海越濠乘墙，登时受枪阵亡。兵勇阵亡受伤者几二十人。而当兵勇附墙之时，各团仍在围墙二里之外，亦有稍近围墙之团，不过声喊助威，虚糜火药，一见有受伤之人，立即纷纷撤队，阵亡受伤者亦二十馀人。遂使疃内教匪又复麇集北面，全力抗拒。

“统观两战，皆由团民不能得力，以致无功。

“侧闻宝坻县大口屯教民多于贾家疃，已经宋庆偏师剿除殆尽。奴才现已咨请该提督拨营助剿，以期迅奏肤功。”

8月2日(七月初八日)上谕称：

“昨据宋庆报称，宝坻县大薄洵教民，经该军剴切晓谕，该教士等均愿呈缴军械，平圩填濠，自行解散，各就屯居住。是该教民等非尽甘心为匪，亦可概见。所有各处教民如有感悔投诚者，著该将弁及该地方官一体照此办理，不得概加杀戮。”

8月3日(七月初九日)直隶总督裕祿等摺又片称：

“前准顺天府兼尹臣赵舒翹等咨称‘据东路厅、宝坻县会禀，宝坻县教民于大口屯坚壁扼守，时出与拳民挑战，团民大败，死伤甚多，乞分兵暂驻双旺寺，相机剿办’等情。奴才庆道出该处，查知该教民负隅固守，未敢出扰。时天津正在吃紧，仅留一营在彼，防其扰及后路，暂示羁縻。嗣因义和团民屡次

^① 1914年改名龙关县。1956年取消龙关县建置，其辖地分别划归赤城县和宣化县。

^② 六月。

^③ 义和团。

往攻,均为教民击败,先后伤亡不少,附近村庄亦颇受累。且查大口屯系通梅厂、徐庆埠之路,相距仅数十里。徐庆埠现有洋兵麇聚。若该教民铤而走险,勾结洋兵,则大局何堪设想!不得已,于六月二十六日抽调马步各一营,会合前次留驻双旺寺之营,开炮攻击。该教民始犹驰出千余人抗拒,经各营迎战,毙其二三百人,始退回圩内,具呈乞抚;我军亦即撤队。询其头目,据称“圩内男妇老幼共有一万余人,初因义和团民烧杀,不得不团聚自保。官兵初至,尚疑系拳民寻衅,故尔出战;实则不敢拒敌官兵,涕泣哀求保护,并愿解散”等情。揆夺情形,尚非虚饰。当令缴出枪炮二百余件、战马十馀匹,将圩平毁。教民男妇尽令解散归家。内有法国教士戴德荣一名,遵旨保护,容设法遣送回国。其中国之传教头目等,应即分别核办。”

8月8日(七月十四日)团练大臣李端遇等摺称:

“近闻天津失守,亦系倭人装扮拳民模样,夜赚城门,守门者不察,遂为所乘。盖日本岛屿与中国毗连,生人面目亦与中国大致相同,无复深目高鼻卷发碧瞳,加以教民汉奸纷纷内应,稍不留心,最易疏忽。”

8月9日(七月十五日)军机处寄仓场侍郎长萃上谕称:

“刻已派神机营枪炮队五营前赴通州,会同剿贾家疃教匪^①。”

同日直隶布政使廷雍摺称:

“外患既日逼而来,教匪又孳祸无已。其敢于犷悍者,快式枪炮助其羽翼,洋人又间为谋主,焚掠劫杀,民不聊生。该教民已知罪无可逭,因而筑垒挖壕,纠约死党,负隅固守。其最者为正定之大教堂,清苑之东间村,安肃之安家庄,沧州之张官屯、叶家、三拨庄,献县之张庄,宝坻之大口屯,张家口之西湾子;次则威县之赵家庄,柏乡之贾庄,宁晋之邱边村,藁城之乔寨,蓟州之敲庄子,通州之贾家疃,独石口之平地脑、黑土洼等处,亦啸聚数千人或千余人。此外,任邱之段家坞,赵州之杨户村,冀州之冯庄,或千余人不等,难以枚举。”

8月20日(七月二十六日)上谕称:

“近日衅起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至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今以往,斡旋危局,我君臣责无旁贷。……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齐,苟无聚众作乱情形,即属朝廷赤子,地方官仍宜一体抚绥,毋得歧视。”

同日军机处寄绥远城将军永德等上谕称:

“教民聚集教堂,岂能以风闻无据之词遽指为‘包藏祸心,逆形已露’?近来地方官急功近名,往往冒昧兴戎,激成巨祸。”

8月22日(七月二十八日)大学士荣禄等摺称:

“近日风闻洋兵有占据获鹿县以图入晋之意,固系教匪散布谣言,竦动人心。然如安肃之安家庄、清苑之东间村、河间之黑风口,及正定府左近等处教民,现因洋人得势,颇形蠢动,时出扰害,深恐蔓延。”

9月1日(八月初八日)山西巡抚毓贤摺又片称:

“保定以北,教民匪徒乘机扰乱,无所不至,以至道路梗塞,文报不通;保定以南,地方尚属安堵,惟是溃勇抢掠车马、财物并抢驿马,动辄伤人,扰害地方,民心惶惧,多有迁移,遍传道路。”

9月17日(八月二十四日)暂护直隶总督廷雍摺称:

“现查顺直各属拳匪众多者,共计三十馀州县。拟就现有兵力先从拳匪猖獗之区办起;涿州一带……白沟河一带……河间府一带……静海一带。此外如大名、广平、宣化、冀州、深州五^②府二州所属,匪势稍轻。”

9月22日(八月二十九日)护直隶总督廷雍片称:

^① 原编者随文注:《实录》作“乱民”。

^② 疑系“三”之误。

“本月二十四日接准大理寺少卿盛宣怀上海来电内称，大学士李鸿章于二十一日由沪起身时，令其告知以‘各国联军将到保定，以剿匪为名，实因正定等处洋人被困，欲往迎护。飭令提督吕本元带队驰往正定，将该处及省城各洋人护送到京，一面阻止洋兵’等语。当派候补知□左运珩前往会同该府县与该堂各洋人告以保护之意，并先派现驻定州之振远先锋统领刘璠即带一营驰赴正定，会同正定镇董履高亲督营队，妥慎保护来省。……再将省城现住之获鹿英教士五名口及安肃县属安家庄内洋教士一并送至长辛店，知会使馆派兵接护到京。但究竟各洋人愿否进京、中途有无枝节，难得十分把握。”

其又片称：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奉上谕：‘近闻保定之东闾村、安家庄等处教堂，仍有兵团攻击，殊与朝廷办理情形相背。总之，教民麇集一处，其有恃众出掠者，自不能不惩办，若仅只因疑生惧，负隅自保，此时办法，惟有切实开导，俾之坦然无疑，自可相安无事。其团民即著速为解散，毋任聚众横行……’”

“查安肃县属之安家庄教堂，前曾派兵保护，嗣因兵力不敷分布，六月间始调回省防，从未派兵围攻。据该县禀报，拳民屡次聚围，多被伤亡而散。至清苑县属东闾村教堂，向无洋人，于三月间即聚众招匪，酿有重案，旋复肆出烧杀，民不聊生。于六月初间派兵前往弹压，屡屡抗拒，伤亡士卒。于七月下旬以来，仅有营队远防，并无近攻。迨闻议和之信，奴才即将驻彼各队分起撤调，并飭地方官及防营分别劝谕拳教各释前嫌，勿相残杀。刻下各处拳厂久散，教民亦允不再出围滋事。然拳教仇深，终归隐患，所以该处军队仍不能尽撤，既防教民四出扰害，尤恐其附近之拳民复仇。”

9月26日(闰八月初三日)甘肃布政使岑春煊摺称：

“今直隶溃军遍地，杀烧抢夺，村落为墟。小民一死于拳匪，再死于教民，三死于洋人，四死于溃勇，畿疆黎庶，所餘几何？”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辑：

10月13日(闰八月二十日)直隶布政使廷雍禀称：

“本月二十日午刻，法国杜统兵掣同欧教士等由容城县陆路率队百餘名来省，随至司署拜会，当即接晤。……始言兵队不入城中，继则反复其词，并云：‘德国、日本将联军而至，必用力攻取，伊此来系为保护’，迫令‘本日午二点钟于四城门楼、通衢、街巷悉插红、蓝、白三色旗，以免他人蹂躏’，兼‘欲于城上置守旗之兵’等语。”

“职司临事筹思，与其决裂而无济大局，不如委曲求全，或可保全省城仓库、监狱暨数万生民之存活。复再四与之婉商，令其缮写凭函，以为‘真心保护，决不骚扰’之确据，旗则我国龙旗与之并插，均经该统兵允诺。餘则依违其词，毫无定论。”

10月16日(闰八月二十三日)直隶布政使廷雍禀称：

“……接奉李中堂十八日由京递到函谕‘飞启者：顷抵京，甫经下车。据翻译委员面称：‘今午晤英国使，称赴保联军因雨迟发，现定十九日由京起程，各国队伍约合万人，系德统帅主谋，高令英提督领队，前往保府。……如不迎敌，可派弁目执白旗相迎。……彼此商定扎住之地，议明将保府现存教士及正定教士、监工人等交其带还，敌队可不进城，但将城外房屋或城楼毁伤数处，以示薄惩。’……至正定教士等，务须电飭该镇府星夜护送至定州，搭轮车进省，以期迅速。此事……望照办……’等因。”

“查此次接应法兵，恪遵李中堂十二日天津舟次手谕，令各军勿得迎敌。……城内院署、丰备仓等处彼已贴条，大有进城盘踞之势。闻霸州城内昨夜到有洋兵二千餘人。顷接探报，北河又到洋兵三五千，沿途抢掠，日内来省……”

10月21日(闰八月二十八日)直隶布政使廷雍禀称：

“窃查二十六日英提督贾思尔到保。……昨晚与贾提督约定今日十点钟在北门聚齐，会同职司查看各处兵所……迨贾思尔骑马径游城一周，要移驻督署。职司前往拜谒，未及见面。贾提督率带英、德、意三国兵官驰至藩署，将司库把守。”

其又禀称：

“二十八日巳刻……德国兵队多人拥入职司内署，将大门外龙旗拔去，悬挂德旗，逼迫立时退让。职司莫可如何，邀请英参赞杰弥逊来署，与之婉商，德参赞部驷亦来，乃将兵队飭去，辎重一并运往，撤去德旗。据云：‘宅门以内各国不许侵犯。’向索凭据，亦未允给。”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辑：

10月20日(闰八月二十七日)奎顺等为查明张家口厅教士平安事呈奕劻文^①载：

“兹于闰八月二十六日据张家口抚民同知呈称：‘……遵查卑厅所属口外地面，自五月间拳匪初起，当经分飭各汛弁认真查禁，并令将各处大小教堂一律妥为保护。一面卑职亲诣西湾子等处各教堂，开导教士人等毋稍自惊，并给告示张贴堂门，以使民教各自相安。是以数月以来，所有厅属如西湾子、南壕堑、太子城、台路沟、兴和城并分堂头、道营子、石窑子、白化沟等处大小教堂及各处教民均得平安无恙，亦无匪徒扰害情事。至以上各处堂内教士，现闻多在西湾子总堂。日前因厅属地面有逃兵经过，卑职第恐匪徒扰害教堂，是以即日亲诣弹压，并为保护。维时经过台路沟，面见该教堂教士王达文，言及“西湾子堂内，各国教士尚有十余人，知其名姓者，主教方济众、教士蓝玉田，并有武官韦托玛”等语。至奉比馆洋文一函，当经卑职加函差派外委送投，嗣据函覆以“西湾子等处教堂现在均甚平安”。惟送去洋文一信，未据详细作覆，仅给方济众名片一纸。兹奉飭查，除再行飭派外委即赴西湾子收取洋文回信另文申送，一面仍将各处教堂随时设法保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辑：

10月29日(九月初七日)军机处寄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旨称：

“兹据锡良等探称：‘洋兵入保定后分段占据，我兵枪炮均被收去，法国前队已入定州。’”

11月2日(九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电报称：

“本月初三日据直隶藩司廷雍禀：‘前月二十六日英提督贾尔思^②到保。该司以礼延接。次日忽至司署，将库把守。计存银十六万两尽失’，九月初三日据保定府禀‘初二联军约两司赴公所，先问臬司各教案，旋听回署，仅守以兵。廷藩司被留，至今未释’，又据卢龙县禀‘俄兵突入永平，将知府重燠执赴旅顺’各等情。鸿闻廷藩司于五月间纵容义和拳焚杀洋医及杀教民数十命，最为外人所恨。”

11月3日(九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电报称：

“昨电奏、保定藩司被拘各节，顷据洋人由保回京，现办大略。谓留省教士控告，六、七月间拳奉廷雍命，杀戮教士男女廿余人，百般陵虐。联军提督怒极，已将廷雍及地方官文武六员正法。臬司沈家本解送天津，与受伤教士质讯。”

11月5日(九月十四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电报称：

“顷据英参赞哲美生由保定回案回称‘藩司廷雍、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庇纵拳匪戕杀教士多人，确有证据，均拟死罪，禀经瓦统帅批飭抵偿，闻已照西法用枪击毙。署臬司沈家本留本衙门派兵看守，候发落。德、法兵仍留省城’等语。是德帅欲藉以立威，无可挽救。”

11月7日(九月十六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电报称：

“盛宣怀转保定孙钟祥文电‘道署教堂并非沈臬派人自焚，当日拳匪纠众屡欲焚烧城内教堂，廷藩阻之不得，恐因此延烧衙署、民房，故首县雇人将楼撤去，并与教士杜宝祺说明事后造还。英、意两国兵已于初六、七撤回京。……完县王令开运及典史、汛官均被洋兵杀害。正定、祁州等处均有德、法兵，将往获鹿、大同等处’云。”

11月8日(九月十七日)督办铁路事盛宣怀电报称：

“保定孙钟祥删电‘今日洋人忽将廷藩司、城守尉奎恒、王占魁等围赴城东南隅杀害。王占魁被敲死。德、法、英、意四国出有告示云“廷、奎纵庇拳匪，罪尤应杀；其沈臬职小罪轻，拟以革职”等语。顷闻

^①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此文作第1321件，题为“察哈尔都统奎顺等为查明比国方主教等人行踪事致庆亲王咨文”。

^② 前作“贾恩尔”，未知孰是。

沈泉被洋圈至北街福音堂……’云。”

《义和团史料·史籍汇录》辑龙顾山人^①《庚子诗鉴》载：

“卷一

“梅如筠提军见匪势日张，亟劝英侨牧大卫、潘尔德等由海道归国，而自遣兵护送之。事为拳众所闻，咎其通洋纵敌，勒罚百万，又屡围攻梅营。”

“卷二

“景州拳围攻朱家河教堂未下，适陈雨人^②廉使率兵勤王过此，徇拳众请，发巨炮轰之，立破，屠戮甚惨。故后来议和索罪魁及之。见《霞峰笔记》。又《拳匪闻见录》谓：陈助攻未克，嗣李鉴堂军至景，悬重赏力攻，始破。咫尺间所闻已互异，未知孰确，姑并存之。”

“沧州范家疙瘩教堂，圩墙四周防守甚固，拳众数千攻之，月馀不克。忽有新拳数百挟巨炮来助，众大喜，果一击而下。寨门既破，新拳先入，旧拳蜂拥继之，突倒戈反击，欲退则门已塞，死者千馀，始知新拳非拳，教民饰为之也。”

“卷四

“联军入保定，竟插其国旗以示夸耀。劭民^③力争国体，以龙旗与之并插，触犯其怒。被逮时，犹疑以此督过。不知外人责言，乃指五月间拆毁东间教堂，冤杀数十人。谓廷有纵容之迹，且疑其曾作义和团师兄。李文忠^④为之剖争不得。”

“沈子敦^⑤侍郎时官直臬，与廷等同被逮。盖因清河道任内，尝自焚署旁教堂，冀免拳祸，致为西人指摘。讯问时有教士在侧，沈曰：‘若当日意在仇教者，君等已葬于火中，那得在此饶舌。’教士语塞，于是释令回署，仍遣兵监之。……得内用，官至法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

“王占魁之处死则以不救穆姑娘为罪。穆为奉教西女，居保阳；久行惠施药，人咸德之。拳匪攻教堂，穆逸出诣王营乞庇，王不顾，且执付拳众，戮于市。将死，呼号于众曰：‘吾所为皆有益华人之事，为诸君称许。今遭奇祸，受惠者忍不我救耶！’即又曰：‘吾有银数万存银行，孰救我者当以为报，我且嫁之。’观者堵立，莫敢应，须臾遇害。”

“沈顾庵政为青县令，以保教禁拳为匪所恨，诬其通洋。嗣捐金济匪，谤始渐息。迨京师陷，匪惧，乞给资散归。沈又资给之，邑内匪氛乃绝。既而联军数百犯青县，勒索官绅巨金，无以供，遂与邑绅崔、张同拘繫，民间集金赎之不得。寻挟沈等至蚕庄，剥其衣，断其发，痛编之，垂死弃于道。家人寻得，载以归，气已绝矣！”

“庚子诗鉴补

“拳乱中，畿辅教民弃家窜避，流转沟壑者无数。独通州贾家墩屯聚至数千人，固垒深濠自守。仓场侍郎长萃募孱卒数营，与拳众协攻之，累月不克。遣使招降，亦不纳。迨洋兵至，进攻京师，墩中教民首为之导，所谓贾家团也。《叶鞠裳日记》云，通州之陷，教民如虎出柙。有大孤屯贾六者殿洋兵之后，周麾而呼曰：杀人者我也！即纵火恣杀无算。行路相遇，互疑为教民，彼此窜避。州城为墟，或亦贾家墩之健者欤。”

“朱家河教堂，由陈泽霖军助攻而破，前已述之。胡漱唐谓：‘景州牧洪寿彭乞陈部协攻，泽霖犹豫不决。幕客陈鸿遽矫令遣裨将率五营以往，教民筑圩固守，相持六昼夜不下。鸿跃马独出，指裨将骂曰：‘朝廷倾帑豢尔等何为者。今见小敌尚怙怯，安望向战场杀贼乎？’督将士并力攻克之，教民死者千馀。”

^① 原编者按：龙顾山人原名郭则经，字啸麓，号蛰云。福建闽侯人。清末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民国初年曾任北京政府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

^② 雨人，陈泽霖字。

^③ 廷雍字。

^④ 文忠，李鸿章谥。

^⑤ 子敦，保定知府沈家本字。

后泽霖以仇教攫遣，鸿卑微，惩究不及’。”

“杨村一带，始也官军剿拳匪，继而拳匪杀教民，迨北仓沦失，敌骑长驱直下，军团死者四、五万人。”

佚名《综论义和团》载：

“团匪纪略

“……至三月，微闻遵化州有烧毁教堂之说。至四月，保定有闹教之谣，则竟实有其事，教堂之在该处者，不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复与教民为难，见教民即杀，不留一人。又波及洋人。保定铁路向归洋人经理，是时义和团烧铁路、毁车站、坏电线，专与洋教为难，犹未及南人。洋人见其势凶横，急致书北洋大臣，请调兵保护。裕制台即派马队统领杨军门^①带马队百名，到该处弹压，相机办理。杨至保定，见团匪众多，且皆蠢愚无知，劝之不从，欲用威压之。将团中练拳幼孩二名，拘之至营，谓之曰：‘尔等向谓能使枪炮不入，今日请一试其技。’当即放枪，将该二孩轰毙。义和团见杨军门用武，一声号召，团匪数百名将杨军门围住，一时仓卒无措，军门及马队百名均为团匪所害，全军覆没。团匪自伤杨军门后，其势更盛。洋教之在保定者，概被杀害。铁路烧毁，火车不通，洋教人等均乘鱼船逃难。至半途，又被围住，杀害不少。团匪又恨南人刺骨，意为南人在该处者均受役于洋人，以及电报局、铁路车站等处与洋人声气相通，故亦欲害之，呼南人曰‘二毛子’，南人遂被害，逃出者无几。保定一带洋教人等已尽。

“至五月十六，闻北京日本书记被董军所杀。斯时天津义和团日多一日，且不畏官兵。至十八晚十一点钟，城内教堂三所被匪焚毁。……盖自五月廿一起，至六月初五止，天津城外以及河东，火光连天。接连半月，所焚房屋，所死兵匪、人民不可以数计。”

“记京都团匪丛事

“……拳匪不过贫民乌合耳。彼等多属天津工人，因设铁路而绝其生业，而铁道工役又多属教民。彼等蓄怨于衷，久思报复，遂至联群结党，酿成大变，至创千古未有之奇祸。加以北方久罹河患，今年又久旱，不能播种，农夫仰屋兴嗟，束手无策，以致附从团匪者实繁有徒。

“曩之为拳匪者，今多自称奉教，恫吓愚弱，诬指曰：‘尔是拳匪，将扭送外国衙门。’愚弱者惧而赂之，即免，又顾而之他。

“西兵此次在北，其不满人意处实为欧洲所仅见，故亦义和团之强暴有以开之。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剝春、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斩，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其绝无人理如此。嗟乎！人有虎狼之心，平时则隐而不见，及相感召，俄顷悉发。东西教化异同，徒虚语耳。

“联军因闻保定曾经杀害教士，且尚有教士在保，故特兴问罪之师。以英提督宝星介斯星率英、法、德、意四国之兵前往，于闰八月十九日由北京、天津同时拔队。及大兵到保，则已先有法兵在，于各要处悬有法旗。……四国提督遂据有保定，……将布政使廷雍、奎恒、王占魁三员正法，谭文焕发往天津查办。……除治地方官罪外，联军复将各城门楼及城墙东北角城隍庙、三圣庵等处轰毁，以志罪城之意。臬司沈家本亦定监禁五年之罪^②。”

李超琼^③《庚子传信录》载：

“初六日^④，长萃请特派劲旅助攻贾家疃。疃距通州十数里，教民所聚居也。墙垣颇坚，地易扼守，教民自各乡逃死者多归之。长萃初命刘煊先督拳匪往攻，数为所败，故有是请。然益兵往，终不能破。厥后通州既陷，城中杀戮之惨，几无孑遗，则贾家疃复仇故也。”

① 原随文注：福同。

② 原随文注：五、六月中，一教民被沈凌辱，至是控之西官。该教民在旅顺，故沈由西兵押赴旅顺对质。

③ 字紫璇，四川合江人。清光绪朝举人，历任江苏吴县、上海、无锡、阳湖等县知县。

④ 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

张黎辉辑《义和团运动散记》载：

“周挫庵述(教民问答)

“客有问于周挫庵，曰：‘吾闻天津之陷也，教民混迹入城，举火内应，故以失守。每战又登先陷阵，锋锐不可当。居乡堡为拳民仇杀，毙及全家妇孺，无号哀求免者，苟族盛而党强，聚众掘堑以死守，何其顽梗至此，甘为夷狄死乎？’

“挫庵曰：‘嘻！此督抚之过也，长吏之过也，师儒之过也。教民何责焉。……上泽不下流，民于是不知有君而仇吏。……入教之后……得教士之庇而官不敢问……民于是不知有吏而只知有教士。……今闻阎生计日蹙，读书者少，人思逐末，乡学多废。……民于是益轻师儒，薄缙绅读书，而教士愈忻然得志矣。民不读书，何事不可为？无先人者为之主，何说不可动？……民于是不知有圣教而只知有教士。……平素争讼，官畏教士如虎，多袒教而抑民，以期蔽事。畏之愈甚，则教之欺民愈甚，民之入教者亦愈甚；抑之愈深，则民之怨教愈深，而祸之积者亦愈深。此拳民之起衅所以一发而不可遏也。教民知人恨入骨发，断不可解，而又日恃教士为活，一旦反服无所攫食，不死于兵亦死于饿，其所以轻死而不悔者亦势也。’”

寄生编《庚子苜蓿录》(选录)载：

“沧志详

“距沧城五里许旷野无垠，屋宇突起，是为耶稣教之总堂，规模最宏敞焉。英人牧大卫牧师也，潘尔德医士也，两君来主斯堂素谦抑，邑人德之。然与官绅无交际非夙好也。五月事变起，拳匪环门外伺察严樵汲绝，势殊汲汲。淮军统领梅公、州牧高公^①偕邑绅刘君^②谋保护无善策，乃谋出洋人于险。计既定，无以通声息，刘君任之，密遣人订约。届时盛减从，驱车疾至，寒喧毕，道来意。洋人未敢遽信也，谓‘居则死于堂，行则死于途。与其出遇害，毋宁死此，犹有勤事之义焉。’刘君殷殷劝驾，计画周周，料无意外虞，始改容谢，益哀吁。潘夫人抱婴儿至，初周岁，挽之屈膝俯首作谢状。刘君(侧)[侧]然相与泣下。当门初启，匪徒百余人闯入，及辞出，匪益麇集，洋人股栗。刘君叱之，乃退。幸匪首犹未至，至者疑有伏不敢深入。且事机密，非乡愚所及料得以从阱救人，然亦危矣。越日求车，重值不能得。乘夜深，急以己车迎入城，守门者以卫兵众，弗敢拒。至周易装，潘之妻女外又一女护士、一仆妇，合六人，两车强能容，露其足，则华人靴也。复以马队步兵分节卫送，疾行百六十里，至海口浮海去，此十七日事也。

“翌晨，匪首王之臣率党来，既掠教堂而焚之。……以有所庇，伤兵辱官，激成二十九日之战。……梅公下令剿。……俄顷间歼二千人。闻风丧胆，在斯一举。……嗣梅公解贵州提督任。……商公擒著匪一疯子祁邦浩等及党羽数十人，先后戮于市；罪轻者罚钱，即以恤教民被害之家。”

刘春堂《畿南济变纪略》载：

“方伯^③廷杰

“方伯名廷杰，字用宾，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丙子成进士。……二十四年擢直隶布政使。”

“庚子春，省南习拳者渐众。……三月，遂有张登^④之事。

“初，谢庄附生张玉谔为南乡望族，尝与教民构讼不得直，村民为之调停，亲诣教民谢罪，备受凌辱，忿不欲生，日思所以报之。然蓄怨未有以发也。会山东义和拳蔓延直隶，乃迎师立厂，与教民格斗于张登镇，杀伤数十人，伏尸流血，远近震骇。方伯饬陈大令^⑤亲临谕解。……以陈大令仁柔寡断，非治剧才，立解其任，以署武邑县张大令炳喜调署。

“张大令尝步行街市，苦口劝诫。闻省东南四十里东阎村教民筑圩自保，拳匪攻之，亲往劝谕。行

① 商作林，字辰卿。

② 刘元禧，字祉庭。

③ 方伯是古代的一方诸侯之长，拥有对该地方其他诸侯的一部分政治控制权。明朝和清朝被借用作为对布政使的尊称。

④ 原随文注：张登距省五十里，为省南巨埠。

⑤ 名鸿宝，时任清苑县知县。

近十餘里，忽炮声震激，不得近而返……

“正筹议间，忽涞水县祝大令带稟称，县东南十八里与定兴接界之高洛村拳教构衅，焚毁教堂，杀教民无算，请兵弹压。方伯稟请天津巡防营务处张观察莲芬带兵前往。匪势日炽，张观察兵单不能制。旋稟请杨协戎福同、邢协戎长春、杨协戎慕时、张协戎士翰等会防。……未几，杨协戎福同阵亡于涞水县北三十里之石亭驿……

“已而松林店、方顺桥、北河、固城等处铁路相继焚毁。比、法工程师大惧，男女数十人议回津避乱。……卒派兵四十名护送。行至任丘之苟各庄遇匪截流，大呼‘专杀洋人，中国人速远避’。华兵徐步而归。洋人登岸开枪奋击，毙匪无算。洋人亡四名，伤数名，狼狽旋津……

“当是时，省城内外拳匪充斥，扬言某日举事焚毁天主堂，杀大员三人：一为方伯，一为张协戎，一为莲池书院主讲吴攀甫先生。……保定府知府沈家本建议，令天主教士杜保禄率教民暂避于安肃之安家庄，其城内教堂由官看守，因拆其洋楼改设巡防营务处，以免拳匪焚毁。

“五月十九日，天津兵衅开，邢、杨诸军调赴前敌，城内拳匪公杀教民，官不敢问。

“六月初四日，廷雍公奉檄抚用拳匪，赏顶戴助钱米。是日焚北关教堂。次日冒雨焚南关教堂。廷雍公闭城严备，派张协戎督兵弹压。教士、教民数百人焚杀净尽，无一脱者。内地会贝教士见公理会火起，急携其妻子逃至刘爷庙中求救。营官王占魁惧罪不敢留，送交拳匪，诣城内献俘。教士曰：‘死无所吝，但愿一见方伯。’当事者不许，仍舁出城骈戮之。由是省城纷纷立厂。不数日增至十餘团，焚杀无虚日，腾煽蜚语侵方伯益急。方伯惶惧不知所为，乃出示悬赏，募人攻东闾以自解，略云：‘……自出示之后，无论拳民、兵勇，有能激发忠义往攻东闾者，本司捐廉赏银二钱两，俟大功告克，再行赏银二千两，以示本司绝不袒护教民之意。’示既出，兵与匪围攻东闾，迄不能拔。既而有诏来京，以廷雍公代之。……更代之日，闾署相庆。

“……未几联军踞省，是非大明。议者皆追思方伯之先见，而悲其蒙垢去官，不竟其用，致有此变。教士、教民尤感之，虽曾募攻东闾，然皆知其计出无聊，不之咎也。”

“高观察驂麟

“高观察名驂麟，字仲英，浙江仁和人。同治癸酉科举于乡。……光绪……二十二年直督王公文韶委署天津道，旋题补清河道。

“莲池书院主讲吴攀甫先生故与诸教士友善。六月匪众焚毁教堂，扬言当次及莲华池。先生避乱，转徙省南各州县，同城官僚无过问者，惟观察时见书院提调宋君朝楨，殷殷询问，关切殊甚。后访知先生侨居深州，时时寓书通候。

“闰八月二十三日，英、法、德、义四国联军到省，廷公迎于北关外，观察从焉。二十五日联军移入，分驻四城。九月廷公遇难。十月观察遂兼署布政使。

“时深州教民纷纷来省，诉知州曹刺史景廓率匪攻教，(杨)[阳]台村受祸尤惨。法大将巴尧欲率兵屠深州。观察闻之惧，急解曹刺史印，撤省查办，委吴刺史焘前往署理。法人怒解，深州得无恙。”

“陶太守式

“陶太守名式盛，字佩卿，浙江会稽人也。先世官直隶。……援例以兵部主事候补，旋改直隶知州。光绪丁酉……出洋派充驻德参赞。……戊戌……回国。直督裕禄公照案请奖，保升知府。留直隶候补，在津随办洋务。

“己亥，义和拳渐炽，由山东蔓延省南各州县，而景州、故城、枣强、武邑一带尤为充斥，所在仇教，官吏束手。大府以太守曾经出使，熟于洋情，特派往景州故城办理教案。至则持平听断，巨案冰释。乃手订民教善后第四条，回津销差，因上之大府……

“庚子四月，省南谢庄团长张氏与教民构衅，各纠党持械格斗于张登镇，僵尸满衢，两党汹汹不相下……

“……八月杪遂代理保定府。……有英教士清吉连者，向宣福音道于顺德、获鹿间；七月为拳匪所

得,并其夫人、稚子女各一、同国女教士一……传诣省城。拳匪露刃从之,欲送往天津李鉴帅^①处献功,不果,系之。……太守履任,访知之,备礼物亲往省视,抚慰之备至,清教士乘槛车驰数百里,凌虐惨毒不堪言状。所至地方官皆以囚虏待之,伤病甚重,疲羸无人色。忽太守以殊礼至,若藁苗湿时雨,感激泣下,逢人必称太守之贤不去口。

“闰八月……十九日有法国兵数十以查勘铁路为名由河路来省。……二十日又有法国马队约千名自新城来。……二十三日英、法、德、义联军大队约万余人由北京到省。

“初,太守闻联军将大至,往见清吉连,具道迎接联军之意,欲邀与谐往。清教士病不能行,乃代为手书,略云:‘今前往迎接联军之领袖陶太守,乃中国循吏,曾出使德国,游历欧洲,洞达中外。予困在囚,累溼荷殊恩。务祈诸军将帅眷顾太守之情,同敦睦谊。(预)[予]言属实,唯谅察焉。’太守持书,与官绅商民备礼品,于二十二日迎至安肃县南关遇焉。

“九月初一日夜间……廷公旋被系于北街福音堂故所,城守尉奎恒已先在焉。未几,统带王占魁亦逮至。太守与同官百计营救不可得。……廷公等三人卒于九月十五日巳刻在南关外戕杀教士处所遇害。

“省城各教堂恤款约十馀万金。太守入都见李傅相,为言户口凋敝,力请归入大赔款,于是省城得免重困。”

“吴大令国栋

“吴大令名国栋,字韵篪,浙江归安人也。……光绪十三年补衡水,历署静海、庆云、枣强、冀州、东光、河间等州县,所至有声。

“闰八月^②,大令遂署清苑县。

“十月,英、义两军回京,德、法留省。时洋兵游弋四乡,奸淫掳掠,甚或乘醉杀人,乡民苦之。大令与陶太守托德幕路子修向之理论,皆谓:‘采办柴草,势不能禁止兵丁下乡。若华官代备柴草,方可禁止。’大令、太守允诺,乃要以刊印华洋合璧护照颁发捐输柴草各村,谕禁洋兵、教民不得再行滋扰,由洋务局设立柴草厂。各乡以是渐就安谧。

“至于恤教,更为周至。南关公理会毕教士等遇害,尸骸残弃,教徒寻觅数月,查无踪迹。大令悬赏购求,卒得之。南、北关教堂焚毁,教会栖处无所,乃籍没南关拳厂以为公理会寓所;又代购墓园三十馀亩;于城内租民房数十间为长老会寓所。又劝捐巨款,在西关外代购高原地九十六亩,以备重构教堂。此皆不在赔恤正款之数。天主教民财产被毁,亦皆设法筹还。其抚恤教民之款,他县率皆派捐富户,或按地亩科敛,良莠无所区别。大令谓:‘拳匪肇祸,良民受累,殊(未)[失]平允。’乃专罚拳匪,不以丝毫累及良民。其恤教又有如此者。”

“吴刺史焘

“吴刺史名焘,字子明,云南保山人也。少负俊才,有滇南名士之目。光绪丙子成进士,十六年选高邑县。历任广平、清苑、邢台等县,所至有能名。二十二年升补开州。

“庚子署猷县,时拳匪倡乱,地方官多以义民目之,惟刺史与吴桥县劳大令乃宣不淆于众论,斥为邪教,嫉之如仇。县城东三里张家庄,旧有天主教堂,规模宏敞,徒党蕃盛,河间、深州等处教堂皆属焉。四方拳匪环伺待发,蜚语腾沸。刺史与主教^③葛光被往复筹商,护持之甚力。各处避难教民麇聚猷县,数逾万人,拳匪泉视狼顾而不敢发。是时畿南教民死亡殆尽,其幸免者匿名遁迹,流离颠沛,艰险不堪言状。惟猷县茗馆、酒肆,教民游憩自若,逍遥事外,怡然称乐土焉。六月杪,江西按察使陈公泽霖勤王北上,军次猷县,拳酋白书春等请会攻教堂,刺史力阻陈公率兵去,教堂得无恙。未几拳祸熄,刺史亦期满去任,教民讴思不置,言及刺史,有为之泣下者……

① 李秉衡。

② 清光绪二十六年。

③ 指主持教务的人。

“闰八月，联军到省。刺史奉派充洋务局委员，随办交涉。权保定府陶太守式盩器异之。自觉罗廷雍公被拘，日行公牍悉由保定府代拆代行，太守自不暇及，多委刺史襄理。案牍山积，剖决如流，太守深资臂助。各宪以其曾保教堂，久为外人所钦服，凡联络教士等事，悉以委之。天主教神甫杜保禄，端宇自峻，官绅罕得见；惟刺史至，倾谈移晷，相得甚欢。

“十一月，深州教民纷纷赴省控诉知州曹刺史景廓率匪屠教，至诋之为‘曹大师兄’，欲请兵复仇。曹刺史故有能吏才，常愤教民恣横，地方官畏之如虎，遇民教之案多反其所为，民气大伸，而教民衔之次骨。至五、六月拳匪肆行焚杀，曹刺史不能禁，故教民多归咎之，谤议交集，颇有过甚之词。法将军巴尧大怒，与将弁会议，调重兵由火车取道定州，长驱南下。时高观察骞麟兼理布政使，闻之大惧，以刺史有德于诸教士，乃将曹刺史撤省查办，急委刺史前往署理，命克日就道，以解深州之难。刺史先见杜保禄，为曹刺史百计排解，单车驰至献县教堂见葛光被，会议深州之事。葛光被者，巴尧之师也。适曹刺史已先在教堂，自白其枉。时有法兵驻守教堂，色动欲不利于曹刺史，刺史力为劝阻，密使脱去。因托葛教士函致巴尧，止其行。一面函禀高观察，然后赴州履任视事。方是时，法兵已至束鹿旧城，距州仅二十馀里，枪炮相闻，风声鹤唳，一夜数惊。莲池书院主讲吴攀甫先生避乱寓深州，托教董某带领绅民赴旧城代曹刺史剖白，以止法兵。法兵返旆回省，深州解严。

“刺史莅任，正值各州县办理赔款，他处率皆派捐富户，科敛地亩，惟刺史严罚拳匪，薄敛于民。良民、教民皆感之；而拳匪惧罪不自安，多方抗拒，并腾谤会垣，或投匭于权理司，思有以中伤之。适美教士路子修致书刺史，为其教民求抚恤。刺史故与路君友善，因复书述其办理赔款之难，略云：‘深州教民受害最惨，计耶稣、天主两教房屋被毁三千馀间，教民被戕三、四百命，更毁教堂三十馀座，约计赔偿之款需京钱四、五十万串之谱。如此巨款若一律按亩派捐，则良民受累与拳匪无所区别，殊非情法之平。故按亩派捐，每亩只派京钱一百二十文，约计得京钱十万串，仅敷赔项四分之一，所短尚多。其余或将著名拳匪房产变价归公，由绅董经手，官不过问，以避嫌疑而昭信实；或拳党中情节较轻并未杀人放火者，令其赴公议局认罚，罚项若干，即由教堂司铎与公议局绅董妥商办理，从无勒逼情事。……夫派民出钱自非人情所愿，然深州教民受害既重，则赔款自不能轻……’路子修复书，深题其所为，并许力为调护。”

“阮大令国桢

“阮大令名国桢，字梅卿，浙江会稽人也。以律例之学游幕直隶，报捐府经历，旋改知县。己亥委署天津。”

“附录《津乱实纪》：

“……初，保定洋人泛舟旋津，中途为拳匪所邀击，比至津失其九人。洋兵溯流踪迹之，以教民为之导。经静海境，幼童噪而尾之，洋兵怒，发枪毙十馀人。村众哗聚与斗，而拳匪即藉端而起，搜杀教民，焚其居……

五月十八日，拳匪夜焚城内教堂。……

六月十七日，洋兵百馀人突入南门外民房藏匿不出。……是夜运司三次上书告急而外救不至。四鼓时，被冠履短衣，徒步持刀巡至南城，见楼焚市烬。……候至黎明，急趋院署转至宋营求救不得。回顾城内火光大作，盖教民奸细已纳敌矣。”

“张大令日升

“张大令名日升，字晓峰，盛京凤凰厅人也。……由吏员报捐巡检，分省直隶，加捐知县……

“八月初间^①，拳匪约期会攻东闾，麇集省城。时廷公虑溃兵、土匪入城滋变，派兵防守四门，严禁溃兵、团众结伙入城。拳匪约千人驻扎南关外小校场，欲持械入城。……大令欲鸣角列队开炮轰击，地方官出为调停，准其释械零星而入购买什物，其党方散。

“九月官民接待水陆联军，大令皆从行。……旋奉派为省城总巡查……

^① 清光绪二十六年。

“一日往东关大营见法将杜以德，适遇教民多人罗跪营中，控诉廷公庇匪屠教。大令力辩教民言多诬妄，不可轻听，杜以德立将教民逐出之。

“十月，德、法设立权理司。”

“张协戎士翰

“张协戎名士翰，字西园，山东济宁州人也。……荐擢直隶督标中军副将。

“庚子……五月匪势益恣，扬言某日举事焚毁天主堂，并甘心于协戎。十九日天津开衅。六月初四日按察使觉罗廷雍公抚用拳匪，激以忠义。是日烧屠北关教堂，次日毁南堂。廷公派协戎率兵弹压，标兵开枪误中拳匪一人，毙之；其党大怒，索凶犯甚急，仇协戎滋益甚，阖署戒严。

“时拳匪久攻东间不下，而安州属之徐果庄亦筑圩自保。廷公谓协戎曰：‘今乘其筑垒未就，当急歼之。若旷日持久，围坚备严，是又一东间也。请速往攻之，以锄后患。’协戎曰：‘查徐果庄共三十六户，而教民仅二十户，徐皆平民。若遽兴兵攻剿，玉石俱焚，我不忍为也。’廷公促之不已，协戎曰：‘若必欲吾往，须有移文为据。’廷公乃致函协戎，略谓：‘自前月已奉大府密饬，内地教民奸细，命所在文武严拿正法，不必详请。足下为省城统兵大员，攻剿教匪自是职分之所当为，乃犹斤斤于移文，不亦泥乎？仍请迅速往剿，无须移文，即请以此函为券约之据。’协戎不肯往。廷公又派协戎率兵攻东间。协戎知东间不可破，不欲往，而廷公迫之益力。乃驻军东间附近张登、北宋、大庄等村，待时而动。廷公累牒趣战，急如星火，不得已会同拳匪合战。教民枪弹如雨，拳匪先溃，掣动官军不利。会协戎遭疾不能治军，于是谤议蜂起，有诋之为天主教者，有言与东间教民为姻戚者，有言受东间财贿潜通声气者。廷公以其战不力，飞檄撤回。振远军统领苏参戎长庆自请愿往，廷公壮之，许攻破东间保升中协。苏参戎激（厉）[励]士卒，昌言于众曰：‘吾兵一出，则东间无噍类矣。’既而围攻月馀，讫不能拔……

“闰八月……二十九日夕间，杰弥逊^①邀协戎计事，言及六月教堂被毁，咎协戎保护不力。……穷诘不已，协戎乃出廷公派攻徐果庄一函，杰弥逊故识华文，阅毕辞色渐和。时路子修在侧，亦力为剖白，尽欢而罢。未几，城守尉奎恒公与廷公等相继被拘，协戎不自安，乃往省南一带巡视地方。天主教士杜保禄与协戎有旧，光绪二十四年甘军闹教，殴伤杜保禄，协戎曾居间和解也。杜乃力保协戎无事，函请回省。

“次年正月，有人告候补通判胡君长为廷公之私人，六月总理保甲局戕杀教士，胡君与有力焉；且乾没福音堂什物甚伙。德兵破门而入，逮至权理司。辞连协戎，言教堂被害情形及毕教士首级所在，协戎知之最悉。权理司邀协戎对质，协戎历述前事，托路子修代为洒淥，以是得白。

“协戎……虽曾围攻东间，而教士、教民皆知其为人所迫，无怨之者。”

“杨协戎福同

“杨协戎讳福同，字云峰，直隶清苑县人也。以行伍荐保副将，加总兵衔，赏戴花翎。

“四月^②涞水县城东南约十七、八里与定兴接界之高洛等村匪势大炽，文生某为之魁，聚众焚教堂、杀教民无算……

“时城北石亭驿距城约三十里，拳匪盘踞。协戎侦知之。二十三日亲往谕禁，不听。……匪首梁珍自恃神术，持械作法直冲，官军排枪击毙之，擒获匪党二名，徐皆纷散。即……留兵三十馀名驻扎石亭驿，自带队回城。……

“二十四日匪党见留兵无几，合噪围之。协戎闻信，急带马队三十名、步队百馀名前来救援。……匪党先已传帖新、定、容、房、涿、易等州县，啸聚数千人。协戎知众寡不敌，意在解散，乃单骑而出，见匪首某僧，扬声劝诫。匪党不顾，举枪直刺。协戎左膀受伤，奋马冲突，手刃数人，力竭坠马，群匪乘势，刀矛猬集。差官卢屿燿、孙裕清出为救护，同时遇害……

“协戎……歿时年五十一，闻者无不痛惜之。其里第故居省城。未几天津兵事起，拳匪大盛，扬言

① 英国军队参赞。

② 清光绪二十六年。

欲肆毒其全家而甘心焉。一日，哗噪围其居，亲邻出为排解，责令焚香助资而免。及洋兵到省，教民以其家曾经助团，勒罚钱百餘缗。时权理司方出示禁讹诈，杨君楷走诉于美教士路子修。教民惧，旋以罚款送还。协戎死事最惨，其家既劫于匪，又厄于教民，议者多为之不平云。”

“宋先生朝楨

“宋先生名朝楨，字弼臣，直隶南宮人也。……故受知于莲池书院主讲吴攀甫先生，以现任教职兼充书院提调者十餘年。

“庚子五月，拳祸作。匪党日夜围攻东闾，炮声达省城，被创回省者络绎不绝。时谣言四起，南、北关耶稣教堂守兵撤回，危如累卵。吴攀甫先生夙善于诸教士，私忧窃叹而不能救。六月初间拳祸益棘，先生尝谓予曰：‘今教堂危在旦夕，教堂不保，则他日议款必有不可了之势，而其祸仍中于国家。吾有一策可以使教士、教堂安如磐石。按万国公法，凡各国交战，必有红十字会从事其间，不论本国、敌国将士受伤，一体收恤医治。今美教士罗子云为当代名医，有扁卢之目，义和拳攻东闾负创归就医者踵相接。诚使各宪聘为官医，设立红十字会；一面出示剖晰天主教、耶稣判然两教，将教士一视同仁之意遍谕拳民，受伤者一律医治，因以保护教堂，或可免意外之患。’予曰：‘夫以拳匪之冥顽不灵、长吏之刚愎自用，而与之论公法，先生计虽善，其如势不行何？’越数日而南、北关教堂相继毁，教士、教民数十百人骈死，其中无一脱者，时六月初四、五两日事也。

“先是吴攀甫先生以外国语言文字为当时急务，昌议设立英、东两文馆。……于是匪党谣诼蜂起，诬为天主教。至是吴先生避乱去省，以先生留守书院……

“闰八月各国兵先后到省。英军幕府路子修与先生有旧，因就先生寓居书院。十月英军回京，继为德军幕府。路子修在省城传道久，于中国风土人情洞悉靡遗，英、德将帅倚之如左右手，所言无不从。官民有急难不能自达，率皆托先生致意路子修转达英、德统帅。先生……代绅民求请护照，赖以保全身家者不可胜数。十一月法兵略地至易州娄山村，有天主教民乘势纠众虏其富绅王某；复入村横掠，被村民格杀二十餘人。教民愤，欲请法兵屠其村。王氏大惧，亟进省求先生出为调停。先生因路子修转托桑神父见天主教士杜保禄、席宾猷，力为驳辩，教士语塞，娄山以此得免。”

“路牧师崇德

“路先生名崇德，字子修，美国纽约人也，世传福音教。先生少肄业学堂，迭拔异等。旋推升为长老会牧师，简派入华，宣道于京师。光绪十九年，美教士怀定、医士罗子云等在保定设立长老分会。二十年，先生自北京移至，奉母与俱。

“庚子春拳祸起，其母感世变思归，四月奉之归国，送至上海而回。五月初抵天津。时铁路毁、电线断，欲回保不得，寓居紫竹林。未几天津开仗，困围中者月餘。已而各国兵大集，连陷津、京。闰八月，英统领罗堪伯率马队二千赴保定，以先生娴于华语，又旧游保定，夙习其风土人情，聘参戎幕，随军西上。二十八日抵保定，而北路联军已先至。先生故有名于省城，时洋兵云扰，人不自保，闻先生来，奔相告，争欲自结，倚为保障。时教民积忿之餘，乘洋兵之势，寻仇报复，波及良民。土匪藉端假冒教民四出滋扰。先生刊帖布告城乡，严禁教民讹诈，故耶稣教民独驯谨守法，官民称之。

“九月十四日，联帅邀华官集藩署会议处置廷公事，府县皆至，而未带翻译，言语不通。联帅怒，华官仆从多被殴辱。先生趋至，数语乃解。

“十月，英军回京，荐先生于德军幕府。德军兼管英界，总统葛德禄、副统领黎熙德等见先生皆爱重之，倚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以委之，翻译卷舌束手。先是，德军初至，骄悍淫掠，德界糜烂不堪。英军议欲回京，让德军代管英界。绅商大惧，群谒英帅吁留，冀免德人鱼肉。及德辖英界，设立巡捕厅，约束森严，顿易前撤，商民赖之，先生与有力焉。

“未几，德、法公设权理司。法官为杜姓，旋易哲幔；德官为黎熙德，先生兼参德国司政，弊绝风清，贿托不行。时洋兵暴横，所在躏扰，官民有急难，争走先生所求解，先生辄亲往拦阻，或邀德帅偕往，日奔走无暇晷。省城文武外至各州县办理交涉，皆倚先生居间调护，往来计事，舆马阗溢。求请护照者肩相摩于门，人人各如其意以去，德帅至呼之为‘护照公’。数月之间，保全地方，潜德高谊，不可殚述。今

略举之,约有四端:曰隐恶;曰扬善;曰急人之灾;曰恕人之过。

“方权理司之初设也,有人持呈词一纸,历诉候补县某君奸利事,并指其为廷雍公爪牙,七月间曾率兵查搜教民,欲求德、法统帅拿办。先生婉谢之,事乃寝。又洋务局某翻译致书先生,发函视之皆刺举某绅董阴事,欲求德帅案问。先生阅毕,火其书。其隐恶有如此者。天主、耶稣二教向称水火,交相诋讟。先生不分门户,与德幕桑神甫为忘形交,逢人必称其贤。平日见人一善,津津不容口,其扬善有如此者。省城罚款限一月催齐,而绅商不以时缴,迟至数月。西官谓陶太守有意延宕,聚议于权理司,欲派法兵拘诸幽室,公举吴大令国栋摄理府事。先生力阻之,密见太守劝其及早催齐,太守得无事;惟力阻法兵之语则未尝一言,虽太守亦不知也。德、法分设巡捕厅,禁夜甚严,定例九点钟净街,有民人赵某与回民马某犯夜,为德兵所执。赵某有狂疾,殴伤德兵,德兵拽送巡捕厅,二人坐大逆不道论死,行刑有日矣。先生见德将,力辩其枉,卒释之。其急人之灾又如此。五月北关教堂被难,附近村民乘机剽掠,几于比户有教堂之物。九月间为教民查悉,搜出砖瓦什器不计其数,村民人人自危,以为祸且不测。先生略予薄罚,各立字据,经官具结,严禁土匪藉端讹诈。拳匪之乱,候补通判胡君长年总理保甲局,查封北街福音堂,恐堂中器物为拳匪所得,悉运归其私第寄存。未几教民踪迹得之,又有人告其为廷雍公之私人。德将怒,逮至权理司严刑讯鞠,胡君自分必死,作绝命词以见志。先生恻然,为言于德将,释之。胡君深德先生,悉以原物送还,并订交焉。其恕人之过又如此。此外,保护房产、矜全人命不可缕数。十二月权理司以讼狱繁难,增设权理分司,法官为濮吉扬,德官为艾博,先生荐英教士叶守真佐艾博治讼狱。

“次年正月清苑县吴大令倡议劝捐在西关外购田九十六亩,以备长老会重建教堂。官绅商民索德先生,踊跃争输,四千馀缗顷刻而就。五月撤权理司,德兵班师,先生留省专管教务。自是先生德望日隆,一言路子修之名,识与不识无不爱敬者。四方贤士大夫、名卿巨人至保定,辄以一见先生为快。

“说者谓,先生遵救世之旨,躬行实践,以德报怨,名动三辅,自西人入华传教以来未尝有也。先生讲学,以推诚爱物、省躬克己为宗旨,善谈名理,言及救主宰世垂训立教之源流,亶亶不倦,奥指精义与儒道合者十之八九。尝语其徒曰:‘人之宜戒者,不一而足,而尤要者则有三端,曰骄傲,曰忌嫉,曰色欲,此三者人人所同具也。吾闻儒者之道,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我则不然,我所非诸人者,我皆有焉,不过愿与诸君共戒之耳。’又曰:‘人之大患莫甚于自是。主宰以外,岂有无罪之人?乃士大夫率皆以贤自处,而以不肖待人;以君子自处,而以小人待人。吾尝见中国人谈及时事,动曰中国风俗日衰,人心日坏。夫彼亦中国人,而顾痛诋中国不遗余力者,盖谓中国人心虽坏,而我却不在其列,俨然以众浊独清自命,此最足干神明之怒。人能反躬自责,则庶几矣。’其精理名论多类此。”

罗正钧^①《勸庵官书拾存》(选录)辑:

4月23日(三月二十四日)审结仓巨村民教争地一案嘉称:

“卑职境^②内仓巨村民教争地一案,蒙宪台谕令早为讯结。其事缘于光绪初年,该村洪庆寺僧人物故,遗庙产一百二十亩。有外村僧人图据其地。本村教民郑得禄出首控告,将僧逐去。遂倡议将其地六十亩作为村中办差之资,归十五家经管,立有碑据,相承已二十馀年。至近岁郑得禄之子郑起接办,与胡姓屡次构讼,亏空公款。村民但幸不出差钱,于庙产凭据用途久不过问。去年于村中敛钱归补亏款,乃起成讼,而前次同管十馀家大半零落无人质证。郑起乃私将碑文磨毁,别造碑文,底稿谓‘其地载明系奉教私地’。碑为村众所毁,互相抵赖。经钱令屡次集讯,抗不遵断,坚以赔碑为辞。卑职接讯,则称赔碑系出伊神甫之意,法教士席宾猷来书亦断断以碑文可据,必责令村民赔立,语尤恫喝。盖其注意在占地,既伪造碑文,碑赔则地不争而自占。卑职检查光绪三年旧卷仅有逐僧一节,不独无地断与教民之说,亦无作为村中办差明文。嗣密在该村访得办差旧册,载有原管十五家姓名。传郑起逐加研究,始

^① 原编者按:罗正钧,字顺循,湖南湘潭人。举人出身。光绪二十四年署直隶抚宁县知县,二十六年上半年署定兴县,三十一年署清苑县,继升署保定府知府,三十三年升山东提学使。辛亥革命前解官归里。

^② 定兴县。

一一供出,与原册相符。又先于无意中询悉,该村教民历来仅只四姓,互相质证,其地为合村公产,已不能复能狡辩。执此以与席教士两次辩诘,始不坚执,但言“因公亏空之钱须由村中摊出”等语。卑职当即应允。随传两造极力开导,断地本系庙产,仍归合村办差,公地按照向章择十五家公同经管;其郑起亏空之钱,查系为公花用,自责归村中摊出,当堂交领;至毁坏之碑,既不得毁碑主名,又无墨拓原文,另由卑职查照案情,出示刊之于石,以杜争竞而垂久远。两造俱各输服,业于本月二十一日具结完案。”

5月13日(四月十五日)外匪窜入焚毁仓巨村教民房屋禀称:

“阜县西北境与涑水高楼村紧相毗连,于本月十四日早,访闻该村聚有义和拳数百人,将与教民开仗。当以该村距阜县城仅十数里,深虞阑入,随移会本城营汛把总陈镇分率兵目干役前赴交界处所,察看防范;并遣役分飭各处教民以匪势鸱张,相离既近,应暂行迁避,免被扰害。至傍晚时分,探得高楼村教民被害多名,教堂房屋亦被烧毁,尚未波及境内。当将大概情形禀明在案。

“十五日已刻,各役回称,属境仓巨、庞各两村教民均已于昨日遵谕迁避一空。石柱村在教之辘重、妇女亦均搬赴他处,惟年老教民数人守住教堂坚不肯去。卑职立即亲赴石柱理谕。旋于中途探得高楼村匪众绕出县境,已向安肃安家庄一带而去。节询来往商民,语各相同,意谓暂可无虞。迨至本日下午,突闻‘仓巨村教民房屋被匪焚烧多间,该匪众旋即四散,幸教民日间先囑躲避,未伤一人;’等语。卑职现在会同营汛驰赴该村查验,并访教民现逃何处,以便设法安抚。”

5月26日(四月二十八日)撤毁仓巨村拳厂禀称:

“阜县境内仓巨村,于本月十四日夜被涑水拳匪窜入焚烧,教民房屋业经卑职正钩会委勘验禀明在案……

“嗣经卑职查知该村众于教民井内起有火枪多件,飭差勒令缴出,辄复迟延。乃会同副将占魁于本月二十日派队前赴该村相机查禁,慑以兵威。村民虽即出具停练甘结,而于交枪一节,犹借御外匪为词,不肯遽缴。当以其犹怀两端,有非口说所能晓谕。惟高楼甫经决裂,该村相处既近,若遽加以兵力,势必纷纷窜合乱众,为害滋大。当由副将占魁复飭前弁赴村谕令良善迁避,示以必剿之意;一面由卑职正钩觅请于该村熟悉之举人许孟松、(侯)[候]选理问张振甲前赴该村极力开示利害。其时附近各村相从学习者已渐觉悟解散,其势渐涣。至二十四日,遂将所藏教民抬枪四杆、火枪六杆缴送到县。是日,卑职正钩适遍请各乡士绅于县城晓谕利害。据称仓巨拳民实大有悔心,不复狡抗。次日,该村文生闻毓珠来县投称‘村中实皆诚心改悔,业将棚场拆毁,并自陈‘拳饬禁劝不力,实难辞咎’等语。卑职等于二十七日会同亲赴查验棚场,实已一律拆毁,村众学习者亦皆散尽,其地方、香头人等均出具永不练习甘结。”

6月19日(五月二十三日)请动用积谷餘款募勇城守附禀

“予正月莅定。其时练拳只牛李、仓巨数村。知患气所积已深,乃靖城乡知名各绅代为公函陈述利害,遍致各村,同告示布发。……至九月联军屯定,在鹿^①宅搜出练勇旗帜指为拳证,夜缚鹿氏一人至安庄大教堂处。席教士迎谓曰:‘此弗拘,此乃函内有名者。’盖当日予所代发公函以鹿氏诸昆名居前,其函有为教堂所得也。鹿氏后竟无恙。”

“附录(2月10日)上陈右铭^②文书称:

京、津、保于五月同时发难,而祸实基于涑水四月十四日之役,其地距定治仅十有二里。先是定、津皆有民教相仇积案。……前年威县教堂被窃,疑为拳会所为,构讼不已。遂藉其术以为仇教之信。直隶染教甲于他省。……河、天、冀、大^③数月间教案至四十餘起,皆旋起旋了,敷衍结局,

^① 鹿氏宥庵传霖(1836—1910),时为四川总督。是年护驾有功,在西安授两广总督,升军机大臣。回京后,兼督办政务大臣。1909年任东阁大学士。

^② 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举人出身。清光绪二十年(1894)任直隶布政使。次年任湖南巡抚,提倡新政,推荐谭嗣同等人人朝辅政。戊戌政变时被革职。

^③ 大概是河间、天津、冀州、大城的简称。

以是浸淫日广。……心知祸发必克，乃传属境民教积案，平心审讯，与法教士再三（辨）[辩]诘，始将教民所占公产地六十亩还之村民。民气稍戢，故仅得免为祸首。不二十日而涿水巨难作矣。

其日黑风扬沙，天日云蔽，烧杀教民六、七十人。越日省垣兵至，颇有诛擒；乃借兵力将定境拳厂撤毁。又数日涿匪麇集涿北，杨副将往剿被戕。

先是天津垂破时，拳民数攻安肃安庄教堂，与定接壤。”

孟继元编《遗民图》^①（选录）载：

“一、庚子之经过

按公理会年会在庚子五月初三日下午方毕会，因曾^②不能由铁路遣回保定。

“初四日晨乃携发妻崔氏德馨及未滿三周小儿广义，由运河雇用民船顺流而下，拟绕天津转赴保定。不料被逆风所阻，船行甚慢。方知主旨莫测，难中藏恩。

“至初七日上午方到天津红桥地方，恰遇教会所特派友人苏洁忱、李星斗二君几次前来迎接。今幸相见，喜乐难言。切嘱曾速到紫竹林公理会。曾听信后遂留妻子在船，孤身前往。及至会堂，见美国牧师万卓志君正领津北受惊逃难之男女信徒公同礼拜。会毕，万君言曰：‘前收到汝兄继贤及毕德经牧师自保定发来公电，略言法、比两国铁路匠人已于津、保河路遇险，万勿由河路回保定’，云云。下午回船，与妻磋商再四。

“次日初八上午，始离船而至公理会，与避难之男女信徒共处于教会之内。闲居教堂，无所事事。想三、五日或十数日匪定可雾散冰消；孰知竟酿成联军压境、京津失陷、两宫蒙尘之奇辱，贻羞千古。回顾往事，俨然一场大梦。

“十三日，友人张洗心君携眷自通县来津，始知视兄李德贵先生同眷属自永乐店教会逃出，被拳匪劫杀于途间。

“十四日，谢子和君携眷自通永道署来津。

“十八日，知北通县公理会被拳匪抢掠焚毁。

“十九日清晨得匪凶耗，遂同谢君恩增奔往天津南门，到鼓楼迤东盐道署前探听。传闻城内公理会仓门口外堂已被拳匪焚烧。吾二人疑信参半，但途中远望城中云烟高起，而沿路所见人定胜天之水会均不前往施救，殊多闷闷不解。又见群众拥挤由东往西飞跑，吾二人适自西徂东。忽然拳匪领袖大师兄亦自东方来，并有许多人乱喊说：‘跪下！跪下！’是时曾适来至盐道衙门照壁，遂从照壁南边东往，乃获避免意外之险，深感上神随时荫庇之恩。俟至仓门口，乃知拳匪多方纵火，始将会堂燃烧。

“二十日夜间，老龙头车站被焚，但听‘杀呀杀呀’之声乱喊，几乎震动天地。

“二十一主日。下午三时，适预备前往赴查经会，忽闻大炮之声，其弹自北而南，声声不断，此时方知大局已乱，莫可挽回，遂同全耀东君数人祈祷，并唱‘患难靠主’之诗歌。当时有某细心人计算一小时内大炮共响八十余次。其后方知此炮发自河北水师营，直向外人荟萃之英工部局射击，前数弹落于工部局空旷处未受伤害，犹不甘心，遂将炮位提高，而炮弹反落在南营门外野草地中。语云：‘人叫人死，天不肯。’又云：‘事由天定，何参巧设机关。’

“二十二日晨，忽传急令各人自带零星必需之物迅速逃往英商怡和洋行，以便保全性命。于是仓卒之间，男女老幼数百人，头顶大炮‘轰轰’之声，耳旁快枪流弹四出，狼狈逃至怡和洋行一大货房内，中以芦苇隔山，分男女二间。旋令少壮男子前往拉车，由某洋行将大包运至街口堆积如墙，以防拳匪突然攻入。工作数小时，曾同数人拉车回归时，忽见大炮弹落于栈房之顶上，即闻老幼哭号之声惊天动地。曾入大门，第见男女老幼自西门涌出，势如急流。注视良久，仍未见吾妻子，末后到房内始见其母子正在万分为难，时妻怀孕已六、七月矣。曾一手抱儿，一手提携被褥，甫出房门，忽闻巨弹轰炸，小儿骇忽

^① 原编者按：本文选自《孟公晓辉百年经过史》。该书系根据孟晓辉笔记和孟继曾口述编成，有1926年北华印刷局铅印本，1935年又增加续编，由协和书局重印。

^② 孟继曾。

大惊,哭号之声震动耳鼓。此番颠沛流离形状,实令人没齿难忘也。后同视弟黄树棠君并英人贝老牧师同到栈房巡视一匝,方知炮弹系在天空已经炸裂,只有炸破弹皮及零星铁屑由天空坠下,穿过铅铁房顶射入屋中。同人等饱受虚惊,万幸无一伤亡,不知上帝判断无微不至。及巡视妇女房前,忽见南窗之下卧一男子,腮旁鲜血涌出。后探知该男子乃武清人韩清和,因懒惰而逃工,藏身于其妻之背后以图苟安,竟忘却‘死生有命,天理昭彰’丝毫不爽、万古不朽的箴言了。愚夫愚妇诚可哀怜。

“又一日午,正枪林弹雨中,有张姓老妇欲出栈门,守门者赵明道云:‘门外如此扰乱,老太太为何要出门去?’老妇答云:‘我要吃饭去。’赵先生说:‘不久将饭桶担来,我们大家都要吃的。’勉强拦住。饭后老妇又要出门,赵先生问:‘为何又要出门?’老妇回答说:‘我要喝米汤去。’赵先生说:‘不久将米汤挑来,我们大家都要喝的。’又勉强拦住。第三次老妇又要出去,赵先生说:‘这样荒荒乱乱,为何总要去?’老妇回答说:‘我实在要寻找我儿子去,因我母子这几日总没有相见。’赵先生见无法拦阻,听其自去。老妇出门甫行至西房北墙,离两口大饭锅数步,忽有流弹自东北飞来,撞至山墙返射于西北,恰中老妇脑海,登时倒地身死。语云:‘不先不后,刚刚凑巧。’盖人之死生殆亦有定数也。故《圣经》云:‘人的生死,长不过掌。’如老妇三次出门,虽屡经阻止,生死亦只争片刻迟速。

“是日后,洋兵拳匪对垒相持,竭力攻击,拳匪日见消退。一星期后,曾同数家自怡和洋行又回至海大道公理会堂,此处较在怡和稍觉舒服,在该院内移居数次,吾妻子同山东焦老太太、保定苏老太太、北通县孙刘二位太太共住于美国安得文牧师一间下房之内,因是年安牧师已回国故也。曾与难友每日闲暇或研究《圣经》,或谈笑遣日,夜则宿于楼前廊下,地既高平,气又清朗,沉沉酣睡,几忘在患难中也。

“某晨日已高升,曾方睡醒,衣履尚未著齐,忽闻炮声隆隆,炮弹在天空中爆裂。曾欲查探弹来之方向,乃行至廊之东南隅,踏凳向空仰观;忽一弹炸裂,有一子弹自曾之左手大拇指、食指中间穿过。曾已不知所措,遂跪地祈祷。少时始知有烫伤一块,状如豆大,医治十数日始就痊。《经》云:‘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古人云:‘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经过此番警戒,举止更加慎重矣。

“某日下午,正在楼内游行,忽闻炸弹爆裂。孙老太太急大声呼曰:‘孟牧师,孟牧师!吾人所住之屋见焚矣。’乃出楼北望,但见红黄火烟向上飞腾。曾云:‘只可听命由天而已。’少顷火烟消灭,方知炮弹自北墙山穿入,炸于屋内,屋门一半崩入大楼地窖中,余一半尚挂门框上。小屋内外拾得炮皮炸弹一百五十余件,而屋内衣被等物均无伤损,东墙上所挂之时辰表依然铮铮有声。《诗篇》有云:‘虽你左边有千人仆毙,右边有万人死亡,灾却不到你身上,瘟疫不投近你帐房。’又云:‘敬畏主的人,四面有主的使者安营拯救。’证于今日,不信然乎!

“又过数日,安得文牧师住楼已被巨炮焚毁。曾同难友移居万超然牧师廊下。一日早三、四时,万君下楼询问夜间情形时,忽有炸弹响于楼内。俟炮烟消散进楼观察,方知此巨弹自东北盐坨方面射来,正穿入楼下仰棚与楼上地板之间炸裂,枕内羽毛被炸,飞舞楼中。颂主诗有云:‘无论日夜动静起坐,有主耶稣时常领我。’万君所遇,尤足证明。

“又一日上午七、八时之间,忽有极大之震动。斯时曾与数人正在叙谈之际,骤然惊作一团。群趋询问,始知子药局轰炸。后据保定方面人云:‘是日亦觉震动,并遥望烟云蔽天’云。

“六月十七日天津城被洋兵攻取。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吾妻崔德馨于美人山家立牧师下房内诞生男儿,母子平安异常。因念保定人口经此百般波折,伤亡相藉,今于天津大难之中竟得弄璋之喜。《书》云:‘天保定尔。’《圣经》云:‘将国保定坚固。’故命名此男曰‘天保’,以为庚子在津百余日颠沛流离之恩鉴焉。

“闰八月十九日,随同英国军队至保定府。恰有美国长老会故友路崇德牧师为翻译,一路上经过独留镇、王家口镇、文安县、高阳县等处。

“二十六日下午,来至保定东南隅刘守庙之陆军营盘。曾遂告别路牧师而至南关公理会教堂左近询问,幸遇故友李中和、李金亮诸君。相见之下悲喜交集,倾谈至夜深,方知英、美、华三国之教会领袖及男女信徒、童年子女一切守死善道、舍生取义者皆为吾道中之嘉美仪型焉。兹分述如左。

“二、拳匪仇杀

拳匪自庚子春猖厥于保定，即仇视教堂。省城东南四十余里之东间村，又西北四、五十里之安家庄，均有罗马教堂，四面以土为墙。拳匪再四攻打，终未攻破。至于基督教方面，历年普宣上天真理，广播救世福音，且设医院以救痛苦，立学校以启愚蒙，窃念拳匪虽愚鲁，当不涉及我福音堂也。孰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火炎昆岗，玉石俱焚耶！先是省城南二十八里之田各庄屯教友郝玉良君被匪人乱刀刺死。

“六月初二日下午，公理会先兄希三孟继贤牧师方在南大街福音堂内同信徒张英林君、霍洛士君收拾书籍家具，赶备将房屋退交房东。时突有拳匪蜂拥而至，不容理论，立将牧师掠至南门迤东之七圣庵拳厂内，当夜即被残杀，弃尸于城根沟内。

“初三日，内城西北隅五仙祠内之拳匪又将孟希三牧师之岳父张秀泉君及岳母并幼女崇恩自唐家胡同仁记药房内曳去；复到荷包营将高郑氏及养女思克拉出，步行到五仙祠拳厂内。

“初四日下午，北门外美国长老会又被五仙祠拳匪焚毁。当日殉难者有罗子云大夫、莘格思牧师同师母及二子一女，又有侯德祚大夫及夫人，并中华信徒数名。

“初五日上午，又将南关公理会及止筋头迤东之英国内地会俱焚成焦土，且将美国毕得经牧师之首级(Rev. Hortace Tracy Pitkin)携入城内，献功领赏矣。

“甲、九人一穴。公理会女执事即胞姊杜孟四美及其女秀贞，子逃城、双成，曾之次侄孟彼得、三侄孟约瑟，侄女淑莲，及山西过客张小酉姑娘，共八人，均被乱枪乱刀刺死，连同毕得经牧师之尸身，合葬于公理会教堂东北隅一穴之内矣。

“乙、七人一穴。公理会顾教士(Miss Annie Gould)被拳匪绳捆手足，木杠抬之以行；又将莫教士(Miss Mary Morrill)曳之步行，同至七圣庵审讯。又同时英人顾牧师同贝格鞠牧师与师母及幼女等，因长老、公理两会既均已均被焚毁，遂逃向东南隅之刘守庙陆军官长王占魁处请求救护。不意王某佯为允(若)[诺]，并许护送进城到长官以保安全，其实暗中与拳匪送信，使要于路。及送至半途，亦被拳匪曳至七圣庵内审讯。后与公理会莫教士、顾教士同被拥至城外东南凤凰台地方，以铡刀将首级铡下，与被害之华人谷得禄君共七人，葬于一穴之内。及曾偕友人起灵时，顾教士之尸身尚存，其余六人只有首级而已。

“三、显官被戮

“当德、法二国军官权理保定时，擒获纵容拳匪之藩司廷雍与保定城守尉奎恒、千总王占魁三人，即命世袭刽子手张荣以素日所用之斩刀戮于凤凰台下，又将三首级高悬拍照，留作纪念。噫！国耻孰甚焉。”

汪宝树^①《太行阻战记》(选录)载：

“小引

“……宝树前在饶阳痛剿拳匪，正定董镇、深州曹牧皆以庇拳仇教借为迎合之计，诬陷揭禀。廷藩不察，悬牌撤任查办。不数日，而廷藩遇害，董、曹亦皆为洋兵所逐，逃窜无踪。宝树则以无罪被诬，教民、西兵咸抱不平，极力保护。二小子昭晟又以素娴洋文，驻保德兵请于上宪，使为舌人之职，以便传宣言语，免致华洋齟齬，横生枝节。时宝树待罪来省，听候查办。上宪……使人澈局襄办华洋拳教各案。”

“一、饶川剿匪记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饶阳城内拳匪李昆等勾结西乡刘各庄拳首胡兰生，率领千余人突入县署，直至三堂。县官汪大令宝树始知，手执快枪，将出击之。眷属遮拦，使不得出。匪等亦知官有快枪，不敢入内，乃杀班管家人宋福，又欲杀其全家。同城幕友代为央求，给以仓谷钱一千五百千，而官不知也。匪等允情，当将旧存崇祯西洋大炮二尊用大车拉去，又抢去来福枪三杆、毛瑟枪一杆。自是攻教

^① 原编者按：汪宝树，字东集，山东泰安县人。光绪六年进士，八年任直隶饶阳县知事。二十六年九月，因镇压义和团被革职。二十七年二月，任广昌县知事。按：广昌县，1914年改名为涞源县。

堂,杀教民及平民,焚掠奸淫,无所不为。县官乃请兵。上宪檄调正定防营帮带许兆贵带部队五百人来县剿除。胡贼半途迎接,相见甚欢。该军入城,小住数日,四乡绅士跪恳,求其出队剿贼。许某答云:“胡兰生系好人,奉命攻打教堂,并无不合。”

“闰八月初九日,正定镇董履高带马队一百人由深州来饶,声言阅边。官往郊迎。既见面,公然以上司自居,大加申飭谓胡某系好人,不当剿除;并痛斥王哨长不应随从往打刘各庄。次日该镇去。拳匪闻听此言,气焰复张,散而又聚者数处。官设法解劝,散者颇多。独南乡深州交界北韩村聚集邻境深州等处拳匪甚多,待董镇履高、深州曹牧景(诚)[廊]为护符,抗违不散。

“十九日……讯问获匪,据供已发传单……又供‘正定帮带许某与胡贼同打清苑县东间村教堂,在谢村换帖’等语。曹牧景(诚)[廊]则于六、七月间亲率拳匪拆教堂、杀教民,并函谕汪大令亦同此办法。大令不从,曹牧挟恨,遂商同董履高,(误)[诬]以亲率诸子妄杀无辜稟于藩司,悬牌汪令撤任查办。

“二十五日,法兵数千入正定,将该镇枪械抢掠一空;且掌批董履高之颊,以枪刃刺其股。董某惧,乘夜脱逃。

“九月初,洋兵据保定,执藩司廷雍、统领王占奎、城守尉魁恒。十五日,均斩首城外东南隅。十月二十七日,法兵往深州捉拿曹景(诚)[廊],假道城西旧城镇。村民开炮,法兵怒,攻破之,杀数千人。曹某奉牌撤任参办,闻法兵至,逃跑无踪。衙署被土匪劫掠一空。汪大令由饶阳赴大城、河间,王敬舆太守守望及众绅士备舆马礼物延请,并其二公子昭晟往办应酬洋兵、安插教民事件。德兵官言于上台,请二公子昭晟允应翻译之职。汪大令由河赴省,岁杪遂有广昌之役。”

任植《庚子事迹记略》载:

“光绪庚子五月五日,拳民焚毁永清安立甘堂,伤及孙、孟两教师。邑众不解交涉,咸不保卫,石臣^①君独具隐忧,知祸将及,乃发蓄积以备缓急。

“九月九日午后,英帅李率全队马、步万余人,由保定骤至邑属之南关镇。先派马队绕城梭巡,拟先屠城,次及各村,以泄教师被戕之恨。俄有数十骑入城将高大令(俱)[拘]去。石臣君闻之,不顾身家会同诸绅急赴南关面英帅。英帅即责大令以‘纵容拳匪焚烧教堂,害教师,不为保护’之罪。石臣君力白其冤,云:‘焚教堂,杀教师,乃前县王任内事。高县尊自接篆以来,即欲剿除该匪……’英帅云:‘吾之来此实为二教师被害事,必须赔命银四万两……’……初十日黎明,英帅驱大队入城,诸官绅缴银四千两,皆取诸石臣君之家。”

《献县天主堂资料·一、献县天主堂往来信》载:

“二^②

敬启者:……敝处义和拳匪,自弟面见以后,迄今月余尚称安靖,各堂教民亦无续被扰害……

目下乡间实无设厂学拳之村……现于缉拿一事,外面佯作轻松之状,密访首要之犯,悬立重赏,飭令(暑)[署]中练勇(扑)[捕]役,不动声色,设法严拿。谕令拿获孙凤岐赏银一百两;拿获韩洛顺、田洛可赏银五十两;拿获冯六等每名赏银三十两。该练勇等买钱盘川另行发给,不在其内……

讹钱各案既有中人可问,昨已分别禀传,自当次第勒追。西河头、王乐寺两堂被抢物件,前蒙梅统领、张道宪督飭兵勇起获铜钟等物,解存武邑县署,弟立即备具函牍,委派练勇,护送教民胡金旺同至武邑查认具领,昨已领回。该教民赴武往返川资由弟给付;所领赃物系用大车拉回,应需车价亦弟照付,不使教民花费分文。盖弟与阁下多年至好,保护教民责无旁贷。今拳匪砸抢滋扰,虽在公出期内,弟心究属抱愧;若令教民再添意外花费,鄙意更觉不安。是以遇有此等花费,一概由弟筹备,聊以补过于万一耳。

鲍教士所说之魏四黑子家十字架一个,前飭饶阳县传解。昨据该县汪令禀覆,据称传讯魏四

① 朱梁之,字石臣,永清县人。作者在该书《叙言》中说他“故于辛丑五月,年四十有六”。

② 原书所排信稿序号,不完全合乎时间顺序,本书有所调整。

黑子并非义和拳，家中亦无藏有十字架。弟恐有不实，严饬该令速将魏四黑子申解来州，听候讯究。

又李二宝等三犯，札据武强魏令稟覆，各犯均已先期逃跑。弟已批饬该令勒限严缉解州，如果各犯实在远扬，即将各犯家属传案，勒令先还讹去之钱贰百馀吊，不得稍涉含糊。

至所获之满公和尚，前因乡间拳厂未肯尽散，是以将满公和尚与获案各犯分别枷号示众，意在设厂之人闻风生惧，改悔解散。(巨)[诂]满公乘间脱逃，事出意外，惭愧无穷……

弟名片肃。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廿一日(1900年1月22日)灯下。深州。

(朱璋达)”

“五十四

耀德先生仁兄大人阁下：……

顷奉手书，敬悉一是。查义和拳匪到处滋扰，实为地方之害。是以迭奉各宪严饬查禁，均经遵照办理在案。敝县境内有贵国设立教堂四座，虽无拳匪来此搅扰寻衅，弟亦时以保护教堂为念。……现查敝属各村并无义和拳场……至于梅统领与张观察所颁会衔告示，现已由州转发到县。除即派人张贴晓谕外，所有查明情形，特此奉复……

弟名正肃。庚子岁^①。(安平县正堂王葆琛)”

“三

敬覆者：……猥以致送鲍教士微物辱蒙远道函谢，益令抱惭无地。……回忆弟与阁下相交几及廿年，渥承盛情，心感曷可言喻？现在敝处后任家眷已到，弟约三月初十间当可交卸。本拟即日亲来献与阁下议结教案，因闻潘凤台说大旆来深在即，以是欲行又止。现则卸任临途，无暇分身，务望吾兄于月内莅深，俾得从容商定，面聆教益。弟于月初即可出稟，则感惠无既矣……

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二月廿四日(1900年3月25日)灯下。(朱璋达)”

“四

敬覆者：去冬拳匪滋事，贵国王乐寺、西河头两处教堂并教民十二家曾被砸抢，经弟先后勘明，并由尊处开送失单在案。昨弟已与阁下议明赔钱一千五百吊作为修理两处教堂；赔钱三千五百吊作为偿还十二户教民被抢各物。彼此商允，各无异言。今送上津钱一千五百吊，伏乞查收示覆。其被抢教民应领之三千五百吊，业由弟查照原单，分别等次，酌定钱数，望饬该教民等一同来署具领可也。从此民教相安，共享升平之福。望将收到钱数及允议缘由，一并示覆备案为荷……

弟名片肃。光绪廿六年二月三十日(1900年3月31日)(朱璋达)”

“五

敬覆者：……尊处阳台教堂与石槽魏村相隔不远，因该村设立拳厂，谣言四起，以致贵堂雇人看守，所费较多，自系实在情形。今于前获拳厂薛洛策、刘洛廷名下追钱二百千，又于各拳厂交出赔款内提钱一百千，共计三百千，今特送上，作为贴还阳台防守之费，伏祈查收。至押犯薛洛策、刘洛廷已饬该村乡约人等具保，令其出具永不学拳甘结备案。如薛洛策等以后敢再学拳，即将该乡约等连坐治罪。如此办理，似已妥当，即请放心可也。前者福躬违和，现闻早经痊愈，曷胜欣慰……

弟名片肃。光绪廿六年。(朱璋达)

送上钱票叁百千。”

“八

敬启者：刻闻在献联军有至景州之说，道路谣传不敢深信。弟侨寓德州，距景较近。携眷在此，差使羁身，未便远离。查德州系山东地面，此次联军是否至景州而止，抑或须入东境，贵教士必知详细；叨在至好，务乞密以告我，俾定眷属行止，决不向他人言也。顷因饶阳县叶君之事曾致一函，不日谅可邀览矣……

^① 从内容看，此函发自年初。

弟名片肃。光绪廿六年九月三十日(1900年11月21日)自德州发(朱璋达)”

“九

敬启者：深州一别，倏忽经年。……弟子(八)[七]月初间奉檄东来，提调转运局务，侨寓德州，瞬将三月。所幸贱躯顽健，公私顺平，足以告慰远注。景州阎刺史菊农仰慕丰裁，欲亲教益，托弟为之介绍。当泐寸函，奉候起居。迨阎君回来，知蒙推爱相待，无微不至，弟亦感纫同深。

兹有新调饶阳县叶梨轩兄与弟同乡至好，相交有年。……前在唐山县任内。该处民教甚多，向不和睦。叶君到任，剴切开导，分别劝谕。虽今年夏间拳势汹汹，而唐邑教堂未损一瓦一椽；教民之在唐者无不安居如堵，并未被抢一物，被伤一人。……今调饶邑，闻已遍贴告示抚恤教民，酌分等第，严搜拳匪。今之治饶，无异昔之治唐也。刻闻有人播散流言，谓其有请兵助拳，庇匪灭教，则大不然。尚望阁下体察情形，勿遽听信浮言，以致诬及好人。若叶君有带兵攻堂、无故害教之事，弟敢为之作保。……弟与阁下交已十餘年。……他日阁下与叶君见面，便知弟言之不谬矣……

弟名片肃。光绪廿六年九月三十日(1900年11月21日)自德州发(朱璋达)”

“十

林大司铎^①执事：

……敝州拳匪之起，根起于往年冬间，而祸烈于今年夏间政府之信任。自五月间即有蠢动之意，敝州闻信，即亲往查拿，并严传各该村乡长当堂具结，此固敝州教长潘生凤台所深悉，大司铎可问而知者……

至于教民，并不似他处凶横。教虽贵教，民实吾民。当妖风炽盛之时，亦烧亦杀，亲诣勘验，泪涕纵横，为父母而不能庇子女，负吾民、旷此官矣。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如能托大司铎之福，敝州教民得以全数归业，敝州便当解组回里，以谢死者。现在教民回州者，敝州自备川资派人送回本村，交由村正副借给房屋，以便各接眷属团聚。一面筹款，按照宁晋办法，分别赔偿房屋，计口大小授食。如虑拳匪滋事，一惟敝州是问。承嘱教中妇女被匪掳去者设法救出，敝州之责，肯不尽力？除孙墨林姐、女、侄女等四人已交杜家庄转送贵堂外，余如吴洛瑞之侄女、吴群喜之妻董氏(均西河头人)先后交由杜家庄转送。傅成文之姐系乡长傅昆琢领去(傅氏叔祖)。他如胡氏、安计宽妻女、孙墨林大女、吴盛德妻女、杜永和之女在本州者，已派受人持票往查；其在隔境，杜善之妻在衡水，郑氏、何德福子女在武邑，均已移(清)[请]查送，不致舛误，以负久嘱……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九月十二日(1900年11月3日)。(深州曹景邨)

敬再启者：敝州安抚教民归业……拟请教长潘凤台回州。此人稳慎公正，为合州人所信服。渠来州即住城内堂中，一切商量妥办，万无不谐，务望俯允……

(深州曹景邨)”

“十一

葛大司铎执事：

……武强周令前赴贵堂，敝州托致鄙意，计当转达一切。……敝州严治拳匪，不遗余力。保教即所以保民。相距百里，当在执事听闻之中。此后敝州如有拳匪滋事，全惟敝州是问……

前此拳匪充斥，地方官无兵无械，不能弹压；兼有上官号令，不能自由，遂致教民纷纷被害。敝境王乐寺教堂失火，焚烧至百餘人之多。……其幸存者亦皆颠沛流离，四散走避。敝州身为民牧，眼见赤子流亡，未能保护绥辑，责何可辞？往事已不可谏，只有补救将来。现在敝州业已遍谕各村，设法安插被难教民。一面函致宁晋裴大令，托其亲往唐邱教堂劝令敝州教民回家；其房屋焚毁者，一时遽难修理，暂由各村绅董借屋居住，并计口筹给衣粮。一俟查清境内焚毁房屋实在若干间，教民被难无衣无食者实在大小若干名口，房屋如何赔偿，大小灾口如何赈济，已与武强周令迅速查明筹议办法。武、饶、安三县为敝州属邑，州县一律办理，免致畸轻畸重……

^① 林道昌。

驻州鲍教士虽未见过，而贤声令誉洋溢州境，能得此君回深商同办理，尤为企幸……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九月十三日(1900年11月4日)。

(深州知州曹景廓)”

“十二

大司铎^①大人执事：

月前走谒台端，获瞻福范。……揖别后本拟小住一日，得以畅领教言，缘拳匪初解之时，当教民新归之会，不得不赶速回署料理抚恤事宜。曾托献县刘俊生兄道达微忱，谅蒙鉴照。

……至于抚恤教民，已于九月间迭次出示，并暂借西街教堂设筹抚局，各给一手条，交由各村绅地暂借房屋，敛给米粮。……敝州仍自行捐廉，散给初归教民，按名京钱五百文作为路费。俟陆续回齐，定期于本月十五日开仓放粮，以赈贫乏。前在贵堂承示飭派潘教长凤台回州，与敝州面定一切，本日已派马队接来州署矣。祈勿念。

……敝州与各村三令五申，不得容留拳党一人混在联庄之内。至于乡民联络，实为防守劫贼起见。……传者乃妄谓敝州联庄意别有在。无论现今方停战议和之时，即使战仍未停，亦岂有用此螳臂求挡车辙之理？……敝州虽愚，决不至此。但联庄既致流言，此时彼此和解，应以推心置腹解释嫌疑为第一要义。现已传谕不得演习器械，但只支更防夜，庶教民归业者可以安枕无忧。谨以奉告。

……敝州办理教拳一切细情，将来苏协台回河间时自能代为道达。先将办理涯略琐奉达，以释悬系……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月十三日(1900年12月3日)。(曹景廓)”

“十三

耀德大司铎先生大人阁下：

七月中弟交卸献篆，本拟赴贵堂辞行，兼以话别。因彼时拳氛正炽，并风闻若辈以弟劝阻陈总统、张统领与贵堂为难，谓弟嫉拳祖教，欲趁弟交卸后群起相攻，以泄其忿。弟趁若辈邀人之际匆匆离献，是以未及走辞，歉甚。……弟困守保阳，毫无佳况。兹有愿者：顷闻贵国兵官有带兵来保定之说。……兹特专函奉恳阁下推情格外，或给贵国兵官信函，或给弟护照、护旗，俾弟全家保护无恙。……再，弟尚有至戚夏、马两家，并请一并关照为禱……

愚弟名正具。光绪廿六年闰月十六日(1900年10月7日)。(吴焘)

保定府杜君庙东路南正任开州正堂吴公馆男女上下约六十口

保定府东街三晋会馆东边路北马公馆男女上下约三十口

保定府(局)[菊]胡同路南夏公馆男女上下约二十口”

“十四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前月专差回省，奉到赐书并护照一纸。……前月底各国联军到省，凡德、意两国界内，居民不免惊扰。弟有尊处惠赐护照，又居英国界内，妇孺不惊，几不知与敌兵逼处。嗣英兵撤退，归德国代管，弟遂迁居贵国所管界内，地名史家故址庵。自迁居以来，日日出门无忧无虑。间有洋人进内，一将护照与之观看，立即退出。舍亲夏、马二姓势难与弟同处，然亦藉惠赐护照之力，得保无虞。……昨晤保定社保禄司铎，谈及贵国某帅以弟保护献县总堂反致参撤，殊为不平云云。弟已说明并非因参撤离任。然弟虽无参撤之事，而省垣现无藩臬大宪，升迁调补无人主持。全眷数十口困守省城，饥寒交迫，诚不能不痛恨于酿祸者也。献县教民能否复业？与献交界之肃宁受害亦重，闻新任肃宁章君到任后严办拳匪，近复抚恤教民，未识已有头绪否？不胜悬念之至……

愚教弟吴焘顿首。庚子岁九月十八日(1900年11月7日)夜。

“十五

^① 应是葛光被。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函丈：

九月底手肃寸函道谢我先生关照厚意，想此时已经收到矣。……焘近来在洋务局帮办支应各国事宜。幸诸事均托庇平安，差堪告慰耳。

兹有愚者：焘昨奉委权理赵州直隶州知州，并催令速即到任。当兹有事之际，自当早日履新，以期不负上宪委任。惟畿眷侨居保定，上下有数十口之多，加以天时寒冷，衣物等件必须携带者亦复不少。若不带家眷，仅焘一人赴任，彼此均不放心；若带家眷同赴赵州，庶免心悬两地，而道路既远，车马又多，种种可虞，笔难尽述。当即持我先生所给护照亲谒贵国元帅巴大人，面达一切。焘极蒙巴大人奖许，并给焘执照一纸，以为沿路护符。因巴大人公事冗忙，未便细陈鄙悃，兹特专人赴献，并将巴大人所给执照寄与我先生一阅。究竟持此执照能保护全眷数十口行路无虞否？焘意拟恳我先生致函巴大人关照，或派兵丁数人送至正定，或再给执照数纸，以便沿途照料车马暨全眷多人；抑或我先生别有良法，致函巴大人商办，尤感盛情。总之，焘阖家等人全仗我先生保护，应俟大局安定，再当亲诣贵堂面谢一切也。

赵州兼辖宁晋、柏乡、隆平^①、临城、高邑五县，各处想皆有堂，刻下民教交涉之事必多，皆归正定府包儒略教主管理。若蒙我先生将与焘交情之厚，先致包教主一函预通声气，焘过正定时即亲往拜谒，庶以后赵州与五县之事皆好商办。琐淡清神，万分抱歉……

教弟吴焘顿首百拜。光绪廿六年十月初六日（1900年11月25日）。

专差回保，望将巴大人执照交该差带回为荷。”

“十六

耀德大司铎先生大人阁下：

……第二十六日申刻由献起程，至沙窝住宿。闻该处民人纷纷传说，贵国大兵路过某村，该村百姓竟敢开炮拒敌，现已攻破。该村在深州西面，距城仅二十馀里。……今日申刻抵深，旋即接印。问明开仗之处系束鹿所辖之旧城，攻破寨门后杀戮者甚多。贵国大兵旋即往晋州进发，距深州已有百里之遥……

愚教弟吴焘顿首百拜。光绪廿六年十月廿七日夜。（1900年12月16日）”

“十七

耀德大司铎先生大人阁下：

……前蒙费神致函巴帅托其关照，当专马径向大管探报。旋据该马夫回称：‘巴帅攻破束鹿旧城后，已拔队南下，无从探报。’当将原函呈缴。弟已交教友潘凤台探投矣……

愚教弟吴焘拜。光绪廿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三更。（1900年12月17日）”

“十九

耀德仁兄大人阁下：

……弟奉上宪改署深州篆务，于前月二十七日受事后，正与教民潘凤台商议抚恤教民之事；本月初二日又接贵国兵官辣迈礼公由正定军次寄来乙函，嘱‘将抚恤教民之事赶紧议妥，务于本月十一日差人到省城巴大帅营前述职明’等语。窃思深州境内教民被害最甚，房屋被烧最多，赔给修费等多项款项过巨；再加各村教堂一气赔修，力实未逮。今与潘凤台商酌，除教堂缓时另议赔修外，所有教民应领赔偿各款拟分作两次：头次年内，二次明年麦后。想大君子胞与为怀，定当俯允。今将所拟办法十条，抄呈台电，祈察酌示复……

愚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初四日。（1900年12月22日）（吴焘）

外抄呈章程清折一纸。”

“三十

^① 1947年与尧山县合并为隆尧县。

亦趋大司铎^①大人讲席：

昨晤教言，夙怀畅遂。……亿还署后，即就贵堂所发献县抚恤八条与绅董同商，略为增益，各就地方情事筹核，务求切实利行。惟安家钱文，每大口拟各给八千或十千，小口半之，统计为数已巨。仍希慨恤民艰，酌减填入章程空格为盼。……附寄章程一纸，并乞检阅……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九月初四日(1900年10月24日)。(武强知县周斯亿)”

“三十一

亦趋大司铎大人讲席：

初五日专马还署，知莞函已达左右，所拟条款八则原单给回。弟即差人往查教民住居村庄，或房舍照旧、或被焚拆户口人丁，均传村董询明，并谕晓邻佑一体和睦，勿得挟嫌争执。前在小范面告刘凤起等，时将立冬，在外寒苦，不如搬家回乡。其应需衣食居处，当即照前拟条规办理，决不致令失所。刘凤起等亦极称愿，并说遇事须求平福。足征我民久蒙教泽，(申)[深]明大义。若虑率尔归来栖止未定，即请阁下传谕敝邑教民先行到县，以便发给衣食、钱文，随令该村董妥为照料，用敦和好为盼……

愚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庚子)九月十三(1900年11月4日)。(周斯亿)”

“三十三

亦趋大司铎大人讲席：

前奉惠书，各悉壹是。旋于十六日亲赴张程、沙窝等处查拿匪党。询知沙窝教民房屋均皆仍旧，乡人亦愿来归。……前所以赔补房屋及筹给衣食，均非徒托空言借以塞责。现闻敝处各教民有在大郭庄者，有在贵堂者。仍希多费清神令其来县，俾教民早得栖止，以免流离。……适又接到宁晋与贵国林大司铎商办章程，平允可行，照抄呈上。如以为当，望即示知办理……

内附宁晋章程一纸^②。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庚子)九月廿二日(1900年11月13日)。(周斯亿)”

“三十四

亦趋大司铎大人讲席：

……适闻贵军士跋涉远来。……愚民无知，动多惊恐。未审作何办理？希即惠示福音，以便先行传谕，俾市井各安生业，均沐惠泽……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月十四日(1900年12月3日)。(周斯亿)”

“三十五

亦趋大司铎大人阁下：

……敝处所办抚恤事宜，前与贵杨教士面商，已经议有端绪；并约三、五日来武，偕敝处绅民一同趋赴贵堂，恳请商定章程。奈日昨又闻武邑王桥村匪徒滋事。查该村与敝处南境毗连，诚恐无知愚氓被其煽诱。弟已巡谕各村，令其照常安堵。无如敝县之教民来归者一闻此信，又为惶恐。现来县者皆令栖于衙署之旁，以便保护。……尚祈函达贵杨教士拨冗来武，以便速为筹商……

愚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初一日(1900年12月19日)。(周斯亿)”

“三十六

亦趋大司铎大人阁下：

奉接来福，聆悉壹是。其为安靖地方教民归业计者，足征慈祥普庇，筹画周详。至亿所云敝县教民尚多流离，皆亿失于抚驭之咎。清夜扪心，殊觉自愧。现已示谕归业，当即妥为调恤，俾之各安生业。……如遇敝县民人，望为传告还乡是荷……

附寄告谕一章呈阅。

^① 步天衢。时任直隶东南教区主教。

^② 原注：此章程未见。

名正肃。廿六年(周斯亿)”

“三十九

耀德仁兄先生大人阁下：

日前差回，接读还章，并承赐方药。小女之疾现已托庇痊愈。……顷闻贵国弁兵有来献之信，在张家庄教堂驻扎，似系为保护教堂并防剿拳匪而来……

现在贵国弁兵既已到献……当人心惶恐之际，用特专函奉恳，务祈推情设法，破格关照，以免予民受惊。则弟幸甚，闾境绅民幸甚……

光绪廿六年饶阳知县汪宝树顿首”

“三十八

耀德仁兄大人阁下：

……新任叶君已到城，定于后日接印。四小女病已痊愈。知关廛念，并以奉闻……

如小弟汪宝树顿首。光绪廿六年又八月廿九日(1900年10月20日)。”

“四十一

耀德仁兄先生大人阁下：

日昨差回，接奉手翰。……并寄来安置教民章程八条。……兹愚者：弟前因拳匪生事扰民，亲督兵勇认真剿办，原为除暴安良起见。詎正定练军步队许管带兆贵有心庇[拳]，意见不合，与正定董镇履高均以为办理过严，啧有烦言，致廷藩宪将弟撤任，调省查看，遗缺委唐县叶令溶光署理。……弟现已会同教佐，责成各该村绅董、地(月)[约]人等，恪遵台议定章，妥速筹办，安置教民回家。一俟办有头绪，即当飞函奉恳执事将各教民接回，俾得安居乐业……

愚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汪宝树)

附呈饶邑绅士所述节略一纸，伏祈尊阅。

敬再启者：

四、五月间拳匪起手之初，安平县何子宽大令(官印厚吾)请兵剿办。宪委许兆贵领兵到安平。乃许某不但不打，反商同董履高言于上宪，将何子宽撤任。自是拳匪披猖无忌，杀教民无数，杀平民无数，杀来往行旅又无数。攻教堂、焚庄村、扰天津、乱北京，皆董、许二人有以酿之也。此与胡闹生之事，向博野县陈刘氏教堂查问便知明白。”

“四十二

耀德仁兄大人如晤：

……前蒙关注，函托保阳杜神父，当即专人送呈，尚未接有回音。刻下仍株守此间，诸事不便。今拟全眷移住献邑，托庇宇下。特求转达贵国提督大人及各兵勇诸处，惠照保护一切，方敢动身。弟在任时，为保守衙署、城池，领有马、步各色洋枪数十杆。交卸后，因从前与各境盗匪、拳匪结有深仇，势不能不将所有洋枪雇勇携带，以资保卫；又恐行近贵处，遇见洋兵，诸多不便。如能代求贵提督赐以贵国旗一杆，则幸甚矣。

再者，弟之练勇现已无多，诚恐路途之中不敷足用。如能于贵堂中派勇十余人或数人前来同弟启行，更为万全。……即请教安……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九月廿四日(1900年11月15日)。(汪宝树)

专差已回，毫无成说，弟决意往献矣。”

“四十三

耀德仁兄大人如面：

……弟别后即日解缆。……暂躐居大城县城内。……兹蒙河间太守王敬宪邀令帮办教民、华洋交涉等事件，并小儿昭晟均辞不获已，即于廿八日驰抵河间。鄙眷仍住大城。……因忝附爱末，尚望鼎力于杜神甫及贵国提督面前代求多加嗑植，俾得一枝可栖。不胜企望，此请教安……

如小弟汪宝树顿首。光绪廿六年十月廿九日(1900年12月18日)(晨)[辰]刻。”

“四十四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弟在直省宦游廿载，前于十一年春间奉委赴献办理河工，曾与阁下晤谈一切，颇称投契。别后倏已十六年矣。今秋弟奉檄权篆饶阳，于九月初二日接印视事。查饶邑地面五、六月间拳匪入境，贵教之民无不被累。弟抵任后，首先清查。统计境内崇奉贵教者共有二十二村，户口若干，总数尚未汇齐，多有出外避乱。弟即出具详明告示，按村张贴。现在该教民等已陆续回县。有房、地一切前被拳民抢毁者，弟已传谕村董妥为安插赔偿。……上年弟在顺德府属唐山县实任，凡遇民教之案，无不持平办理。迨义和拳倡起，又极力禁止学习。是以及至八月底边交卸，境内如常安静。阁下闻之，当亦以为办理得宜也。

再，饶邑教民，弟到任不久，清查恐难周遍。如有遗漏，请贵处开单示知是幸。告示底稿录呈台览。……

附录呈告示稿一纸。

教弟叶溶光顿首。光绪廿六年九月廿一日。(1900年11月12日)(饶邑新任)”

“四十五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弟所属境内有教民各村庄实只二十二处。弟自尊处回署后，设法安抚。如南韩合、大邵村、曹庄、小官亭、曲吕、五盛口、王岗、河头、李岗九村庄，共计被害教民二十七户，均已安插妥贴，房屋一律赔偿。路同岳、葛同岳二村被害教民七户，亦均安插，正在取具本村民人甘结，约三、两日内可以竣事。至留楚一村，教民两户，系习耶稣教，被拳民讹去钱财，现均退还清楚。肖店村拳民与武强拳民拆毁武强县境教堂，已勒令该村民人自赴武强，与该处教民商酌办理，取有甘结，大约不久亦可办妥。其余各村已分饬绅董设法赶办，俟一律清结后再行奉闻。

再，敝前任汪东翁于本月初一日启行赴津，因道路不靖，商邀安平县教民护送，内有武毛营教民，因与敝境张家池村内张洛清有嫌，于初一日夜前往评理未遇。该教民等用洋枪将张洛清同院居住之张满堂误放致伤；折回村外，黑暗中有人开放一枪，致将教民武狗子肚腹放伤，延至初二日傍晚身死。经弟驰往安平勘验，缉凶究办。现有安平之梁小山出为说合，俟有头绪，再行酌办函告。弟思拳、教滋事以来仇怨颇深，如教民内实有被屈者，尽可自行来县呈告。弟当尽法惩办，妥为赍恤，决不稍涉含糊。务望阁下转饬各教民知之，免得别滋事端……

教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叶溶光)”

“四十六

敬启者：

敝县奉教各民，业已遣派妥靠员绅分别查察，按照昔日被害之轻重区别办理，总使教民无一户失所。至义和拳，连日明查暗访，现在实无一户再习者。……今有小官亭等村教民眷口，饬令该村派车先赴尊处接回，以安乡里。一切详细情形，另函奉布……

教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饶邑新任叶溶光)”

“四十七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敝处办理抚恤教民事宜，弟到任以后先派妥友赴乡清查，并请各路绅董至署面商。及至月初，始有头绪。现在议定简明章程八条，四乡分设四局，在城设一总局，彻底查办。总期习教者无一户失所，习拳者无一人漏网。再有月余，定能清结。章程录呈台电。至习教之民间有尚在贵堂中居住者，拟于三、两日内令在事绅董亲诣尊处查视，拨车往接，回村安插，统希关照是荷……

教小弟叶溶光顿首。光绪廿六年十月廿九日。(1900年12月18日)

附呈录章程一纸^①。”

“四十八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贵堂尚有敝县教民寄居多名，此次各绅前往，拟即就近查点明白，投车接回，以便抚恤，尚望关爱，感同身受也……

愚弟叶溶光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初四日。（1900年12月22日）”

顾恩瀚^②《竹素园丛谈》(节录)载：

“直隶数十州县人民平时受教民欺侮，地方官慑于外人气焰，凡民教涉讼，平民每不得直，积怨日深，以故拳匪一声呼啸，风靡全省。”

董作宾《庚子佚事》^③载：

“……桐翁记天津焚毁教堂的情形也很详悉。焚教堂是五月十八日的事，所焚有东街、镇署前、西门内各教堂。十八日记云：

十八日，戊午，晴热。……三更后，忽闻人声鼎沸，登房环顾，见东方火起。乃因东街教堂有人暗入，经阮大令诣验，见有炸弹一具，乱柴两堆，急上院面禀。好事者趁此知会拳师，竟为纵火焚毁，并将镇署前、西门内各教堂同时焚烧。传闻不延烧民房，未知确否。

“十九日，桐翁曾亲到教堂查看，在其日记中有：

天明始歇，稍睡即起，往看西门内教堂，果未延烧民房，亦属奇怪。惟东街之教堂，熄后经人复燃，致连烧铺民十馀家之多。

“据桐翁所记，天津并无屠杀外人之事件发生，仅见有外人被殴而受伤者，这是五月初六日事：

初六日，丙午，晴，有风，平夕。见有受伤洋人男女共十馀人，坐洋车从门前而过，询系苏家桥焚掠教堂，被拳民所殴云云。”

陈惟彦^④《陈氏家书》(选录)载：

“二(三哥^⑤七月十二日与二哥)

署中友人前接陈雨樵六月朔函云“天津官幕绅商及附近民人来保定避难者不下数万人，大米每石津钱十四千，大教堂已改为公所。清苑所属之东间村、[安肃]所属之安庄两处教堂附近，分住教民约二、三万人，筑墙挖壕死守。其中妇女较多，能打仗者亦有数千人。义和团围攻多日，迄未得手。定州亦有民教仇杀。各州县教堂大半焚毁。天津练军原与洋兵夹击拳民。……因兵衅已开，将拳民收为己用，骤有数万助战，均各视死如归。练军仅止三营与洋兵四、五千鏖战两昼夜，支持危局全赖义和团助战……等语。”

“九(三哥冬月朔与二哥)

……途中闻廿四午后董军溃勇将到，保定即闭城。旧道为团民公所。南关耶稣堂被焚，洋人妇孺皆被杀。直隶教案起自涑水。实缺高卓然，四川人，在任年久，因百姓拆教堂内花台砖赔钱数十千即可了结。上宪为赔款太轻，撤任改教委员署理，又撤任再委。祝少棠接署，判罚高洛村绅士武举阎洛福钱四百串。阎村不服，借此练团，并联新城。及山东拳匪起事，某武员带百人往剿，皆被团匪所杀，嗣复蔓延愈广，为祸愈烈……

① 原注：呈录章程一纸未见。

② 原编者按：作者顾恩瀚(1870—1927)，字涵宇，江苏无锡人。曾任芜湖关监督、天津常关税务司帮办。

③ 原编者按：本文系摘录汪桐采《庚子日记》写成。所记皆天津事。原载《逸经》二十二期，1937年1月20日上海人间书屋社出版。

④ 原编者按：陈惟彦，字绍吾(劭吾)，同治年间生人，安徽石埭籍。早年曾在北洋当差。光绪二十六年以浙江试用道员捐二品顶戴。民国元年曾任湖南清理财政局监理官、安徽省财政司长。

⑤ 原编者按：三哥不知名，字西甫。二哥陈惟彦。

张蕙亭《双青藤馆手录本》^①载：

“六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官北圣道堂前被徒匪拆毁，现在无地宣讲，是以本都统等暂将娘娘官借与圣道堂应用。为此出示晓谕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二日”

张廷骧《不远付斋见闻杂志》(选录)载：

“汇述两官蒙尘及亲友遭拳祸略情

“……五月十七日，拳匪烧津城内教堂。十八夜，烧城外教堂及大胡同教民药店，延及左右前后邻居，其势汹汹。上自制台，下至府县，置之不问。”

《义和团史料·方志辑录》辑《直隶省》载：

“《固安县志》(1942年铅印本)卷4《故实志》(第16~17页)：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之乱，本境肇于是年正月。惑是道者以黄堡、杨先务、方城、大褚林、李家营、白家村为先。三月，经县署示禁，稍熄。五月，复蜂起，焚烧韩家庄、康家务、白得碾各村教堂，劫索商富，蔓延迫胁。至六月，几于无村无之。”

“时在光绪二十五年冬季。先是新城属沈各庄村村民因田产，板家窝村民因铺房，迭与天主教讼，屈于官。至是首先习其术，以为泄忿地。而沈各庄村人张德成本攘窃小盗，板家窝人王成德旧为人佣，遂为畿南拳匪之魁，其名均见于奏章。”

“《涿县志》(1936年铅印本)卷2《第二编》(第13页)：

“二十六年，拳匪肇乱，涿县以双柳树村为导火线，该村首先设坛，未几即蔓延全境，拆毁铁路，焚烧教堂。嗣清廷派大学士刚毅、尚书赵舒翹来涿视察，匪特不令解散，反暗嘱拳匪勤加练习。

“《霸县志》(1919年铅印本)卷4《杂志》(第15页)：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作乱。……至五月初四日遂有仇教举动，杀善来营教民数家，弃诸河。以后借端仇杀，日有所闻……

“次年和议成，霸郡对于各教会损害赔偿七万七千元，均由地亩摊派。”

“《清苑县志》(1934年铅印本)卷4《人物下》(第195~196页)：

“杨福同，字云峰，邑人。由行伍受知直督合肥李文忠公，侍从二十馀年，积功至记名总兵銜尽先补用副将。……光绪庚子春，义和拳匪起，由鲁入直，数月间蔓延全省，声言击杀教士教民，官不能禁。时涿水城东高洛村焚杀日甚，公奉檄剿捕，率骑六十至，则匪皆伏匿，突起相抗，谕之不退。公不得已磨骑迎敌，擒九十九人、毙二十馀，众汹惧溃退，高洛以定。邑东北石亭镇距城三十里，与涿州、房山接壤，为匪啸聚之区。公率队往，周览形势，谓非重兵不足以慑之，暂留三十骑扼守，回城筹备御之策。自为书上大府，略曰：‘顺保各属莠民，自闻三月十八日《邸抄》，有《民间学习拳棒自保身家》等语，无不公然练习，即无教民之村亦皆迎师立场，不服劝谕。甚至红巾黄带千百成群，往来游荡，无处不有。一若官军不能惩办，教民理应杀害，视焚杀抢掠为无辜、抗官诬良为本职。高洛学仅十日，竟敢以数百乌合之众谋袭国家劲旅，并有“拆去铁路、杀尽洋人”之语。残贼行为，至此已极。若不早为分兵镇慑，设法解散，燎原大祸，恐在目前。拟请宪台飞速函致聂军门，令邢副将酌带马队二、三营赴保定，会同张中协三营分任保阳各属，将王营官迪义马队三哨迅速调回，与李营官瑞步队一营分布顺天西、南两路州县扼要巡察。如传贴聚众，固迅速开导，遏其乱萌；即使遇有抢掠，亦可立时救援，擒拿首要。若再任其猖狂，愈延愈广，愈惑愈众，举国皆成义和拳会，一旦同时起义，剿不胜剿，内乱外侮，势必交迫，大局何堪设想。’书上不报。

“是时，石亭四围约集新城、容城、涿、易、房山各州县乱民万馀，侦知官兵力薄，合噪围之。公闻警驰往，率马队三十、步队百馀，方至村边，乱民蜂拥而至。公知众寡，乃单骑独出与匪首晤语，苦口告戒。

^① 天津都统衙门布告汇录。

匪党有举枪刺公者，公怒马冲突，手刃数人，马伤而蹶。群盗大哗，刀矛猬集，体无完肤。差官卢玉璠、孙裕清殉焉。时庚子四月二十四日也！”

“《新城县志》(1935年铅印本)卷9《地物篇》(第14页)：

“……五月十一日韩家寨天主教堂，十七日杨家集耶稣教堂，匪相继烧毁。……次年，和议成。德神父、美牧师要赔款十万两并索祸首七人。再三磋商减至一万元……”

“《完县新志》(1934年铅印本)卷8《风土》(第1页)：

“庚子拳匪之变，县城之东街设有耶教堂一处，因各县捣毁致堂事甚多，乱民遂乘机思逞，酿成教案。”

卷9《故类》(第21页)：

“二十六年庚子，义和拳匪起，以仇教灭洋为名，设坛惑众，各处盲从者多。完县城西五里岗村有解某者，假名拳匪，于三月间攻毁南野天主堂，而大错予以铸成。”

“《晋县志》(1935年石印本)卷下《故事志》(第4~5页)：

“清光绪二十六年，县长刘藩系北司某君之婿，仇教颇甚，乃练游勇，招拳师，驻于文庙内演习神拳、红灯照，曾打彭头，一时教民大恐。及攻夺墩^①(即藁城兴隆店)为教民所败，寻即解职去。事后教民借端报复者比比皆是，境内骚然。”

“《无极县志》(1936年铅印本)卷19《大事表》(第7页)：

“二十六年，义和拳事起。山东卢某派徒来县，设坛煽惑。朱家庄张大环者，成立拳场，为拳民头目，(愁)[仇]视教民。六月间，拳率众赴庄里村焚烧教堂，杀死教友二人，又至黄台村，将教堂焚毁；率众进县城索款。适八国联军已进京，天主教徒聚至数百人围城西门，义和团由东门逃去。而教民复仇，多剿没拳民家产，良民多遭连累。”

“《广宗县志》(1933年铅印本)卷1《大事记》(第10页)：

“二十六年，大旱，七月十二日始雨。八月二十七日夜，气候严寒结冰，晚禾尽萎，大饥。是岁义和拳仇教事起，县属饥民乘机焚毁教堂，抢掠教民财物。闰八月，义和拳自广平府至板台村，知县张祖咏带队往剿，拳匪抗拒，勇丁被戕数名。”

“《邯郸县志》(1933年刊本)卷1《大事志》(第14页)：

“二十六年春，拳匪乱起，邑令钟灵率兵查抄教民。是年，义和团起事，清室误信端、庄二邸之言，用拳匪袭击使馆，且令各县查抄教民。邑之北张庄、陈三陵天主教民皆被害焉。”

“《成安县志》(1931年铅印本)卷10《风土志》(第2页)：

“庚子拳匪之变，自东、北两方波及至成。城东艾束村信教者较多，距广平甚近。是年六月三日突然广平教堂被拆，不信宿而艾束教堂被焚矣。该村教民大都闻风先逃，房屋什物多遭焚掠，差幸人未受害。其它如城内、大寨、野庄、林里堡、西彭留等村，财物微受损失，房屋大都存在。”

卷15《故事志》(第31~38页)：

“刘胜先，山东莘县人。清光绪二十六年佃耕于邑之南散胡。时山东拳匪以仇教起，慈禧太后与庄、端两亲王为所惑。直藩觉罗廷雍党以助乱，羽书饬下县查抄教堂、奖励拳民日数至。邑令孙天锦犹疑不能决。胜先扬言与众曰：‘吾幼习拳棒，山东某老师某大师兄皆吾同门友，屡接来函命我在此起兵，抄灭洋教。闻此间二洋人皆富而无礼，仗洋人势力欺压平民，民恨之入骨，今焚烧教堂，收没二洋人资产，报仇泄恨，以图富贵，千载一时也。’众为之动。适林里堡张建与其村天主教教民有隙，迎胜先于家，大聚党徒，名大刀会，号铁布衫，言入其会者能刀枪不入，枪炮不过也。不数日聚至四、五十人，遂焚毁艾束教堂，抢掠教民之稍有资财者四、五家，会徒大横。”

“六月朔，胜先衣新制鲁山绸单衫，仍著佃耕时白布单裤，乘无鞍耕马，率持刀者十余人至县署谒令。令不见。转谒邑汛王德安。王不敢置问，只诡随其词令去。已而后胜先乘马横行街市，徒众汹涌，

^① 又作“埃墩”、“躲墩”，见本书前文。

或踵其后，或道其前。识者知祸将不测，人人危惧。越日，邑令宣示省文，查抄西街教堂，纵民拆毁。已著手，邑绅等知事不合，密言于令将教堂房屋加封，暂没人官，拨兵驻守。教堂幸无恙，然门窗已破损不完矣。

“十七日，邑庠生韩璠与张建同村，素亦有隙，建言于胜先。胜先亦以韩左袒教民，即将韩掳至建家，反缚其手，痛加辱詈。一日，拥韩至村外伪斩者三，然终不敢加害。次日九钟，声言送县治罪。人自西门，胜先除衣绸衫外，又换新制鲁山绸单裤，惟耕鞋尚未换易，乘马率众三十余人驱韩至县。有持土枪者导韩前，行数武一放以示威。至十字街西，胜先下马入某商家饮酒，命建乘马送韩至县面交县令。俄至县署，令闻之久久不出，班役将韩接至班房，暂行看管。时观者塞街，人心大愤，建与其众皆面如土色。有从堂内出者曰：‘大老教捆，勿令逃跑。’众附和之，声如雷动。会徒皆持刀嘿嘿跃出，四散逃匿。建不得脱，遂被捉押。胜先在商家饮方酣，闻信急持刀枪出。时男女观者街为之满，胜先恐人拦阻，即在门内扣放，因不演放法，屡扣不响，乃掷手枪脱绸衫提刀一跃而出，逢人便劈。范儿庄高小集以手迎刀，被劈落无名指及小指二个，血淋漓，至县署报冤。有张林者亦与张建同村而有隙，乘势从后楼[楼]胜先腰，胜先转刃向后连劈，劈伤林背肉二片，约长三寸许，林忍痛紧抱之不撒手，拥至十字街团局门前中楼寺。李占林适至，胜先劈之不中，占林急取团局标枪，从胜先右肋冲入，至左肋透出，胸为之洞，胜先不能支，始掷刀伏于地。占林欲(举?)枪环刺，力猛枪杆出，枪头陷胜先肋内。胜先尚匍匐西行意欲逃死。妇孺砖石随步交加，约行二十余步，脑浆迸裂而毙。报至官，官犹以‘要打’，‘打死’为言。复报已死，令心始安，乃命地保异出郊外掩埋。一面押建治罪，一面出示宽免胁从，使得改过复业，乱遂平。”

“《天津政俗沿革记》(1938年刊本)卷16(第37~39页)：

“五月，裕禄调聂士成回天津，时候补道谭文焕在裕禄前称义和拳之神。西门内、镇署前、仓门口、天后宫、北马家口各教堂被拳匪焚毙。三岔河口教堂同治九年间被焚，光绪十二年教会许李鸿章即其地建病院。李鸿章去后，教会复立教堂，至是复被焚毁。”

“《沧县志》(1933年铅印本)卷14《事实志》(第16~17页)：

“青县三呼庄王之臣，拳匪之巨擘也。光绪庚子五月，率匪党万余人突入州，据河西菜市口为巢穴，令全城居民插红旗，向东南焚香叩头。凡地方富室，概指为洋教，焚劫杀掠，凶横异常。乐军统领梅东益、州知事商作霖虑祸及教堂，致碍国交，与邑绅刘元禧、陈其浚将英人牧教师、潘教医士暨眷属等护送赴津。及王之臣率众焚教堂，竟无所不得，始移怒于梅、商，声言必罚银百万为赔偿，遂围乐营、州署数匝。二十八日晓，乐营帮统范天贵由献县闻变率队旋沧。次晨，匪令扃闭五城，禁绝城内汲路，并不准卖给军人菜蔬，军人忿甚。范曰：‘可矣！’急请令出队痛剿，戮匪二千余众。惟王之臣潜逃，后卒骈诛于保定府，传王首至沧示众。”

“《南皮县志》(1933年铅印本)卷10《故事志》(第44页)：

“二十六年夏，各村男习义和拳，按八卦分八门；女习红灯照，设坛焚香，以‘辅清灭洋’为号召。愚民无知，附和者众。邑南境张彦恒、杏栢两村有天主教堂，教民被害男女二百余口，被焚房屋数百间，旋即剿平。”

“斯年十(年)[月]，德国兵进城，杀死二人，大索供给五日始去。”

“《盐山县志》(1916年刻本)卷18《故实略》(第10~11页)：

“光绪二十六年，畿辅民争习义和拳教，以八卦为号，红帕红带，烧香拜坛。盐山邻于山东，今总统方抚山东，主剿拳匪。匪不得逞，乃尽窜直隶。直隶总督裕禄纵之，期月而蔓延全境。夏五月，匪乃焚杀教徒，戕逐教士，凡稍殷实者皆目以教民，杀其人而分其财，土崩鼎沸，境内杀人无算，罹害数千家。城内聚集数千人，闻沧州官军来攻，率其丑类迎战于七里淀。梅东益击之，匪徒大败，死数千人，乃兽散，不复再聚。”

“《景县志》(1932年铅印本)卷14《史事》(第20~21页)：

“二十六年，习拳者益众，焚香设坛，人心若狂，官亦不敢(遇)[过]问。六月十八日，匪等蚁聚于朱

家河,围攻数日不克。适有(广)[江]西按察使陈泽霖统兵自南来助之,遂于二十四日晨刻攻破之,焚教堂,戕教民,教民自投水火而死者不下四千人。无何,联军自大沽口入,南陷青县、沧州等处,暂驻献县,声言指日下景州。州人闻之大惧,莫知所出。署州牧阎公骏业率邑绅数人直诣献县总教堂,求葛司铎见法将官磋商数次,许偿以巨款,事乃息。”

“《宣化县新志》(1922年铅印本)卷11,《宦绩志》(第37~39页):

“李肇南,字少轩,四川宜宾县,进士,出授宣化知府,光绪二十年莅任。……光绪二十六年,山东拳匪肇乱延及直省,宣化亦闻风响应。公曰:‘此八卦教之馀孽,无使滋蔓,蔓难图也。’公力禁之,而各官崇奉之。公乃卧阁不出,徒叹无可奈何耳。寻拳匪势益张,谓公为二毛子^①必欲杀而甘心焉。南关龙严寺聚众设坛召公至,不来则就杀之。公毅然往,甫至门首,杀声震动。公直趋入,焚香礼拜,从容而退,毫无惧色。公视此情形,恐危成大祸,与各官议保护教民出城,将其住屋封闭,以免焚戮,否则其祸蔓延,恐不堪收拾。各官不允,极形反对。不得已密令司城者夜出,教民所全活甚众。越数日,教堂火起,烧毁教民房屋殆尽,他官率领愚民齐声喝形……”

卷18《大事记》(第29页):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乱,男曰义和团,女曰红灯照,仇视教民,以杀人放火为能。

“六月,焚毁教堂及教民房屋,延烧三日。教民皆逃避,亦有被杀者。”

“《龙关县新志》(1933年铅印本)卷20《大事记》(第5~6页):

“九月二十六日未刻,德、英、意、奥等国兵约千余人到宣府。在于未[到]之先,口北道灵恐其开炮轰城,即商明在郡官绅飞呈察哈尔都统,借调熟悉洋务通晓洋语之军台效力。前江苏候补道沈敦和来宣迎与各国首将面议,允给保险费银一万五千两、皮袄一千件,连供应牛羊米面一切等项约需银三万两,先由道库挪垫;又连外兵在口索取细毛皮货,价亦由道筹付:共计实银四万两。除由宣城乡湊捐二万六千两归垫外,下余不足之数飭令各州县分别捐认。龙门认捐一千两。”

《阳原县志》(1935年铅印本)卷9《宗教》(第2页):

“庚子拳匪之乱,教堂被焚,教民殉难者三百五十余人。迄《辛丑条约》后,拳匪匿迹,然教徒报复,死者亦殊不鲜。洋兵且至东城,由教民领导,烧杀无算。自是民教相仇,久而未解。”

“《张北县志》(1935年刊本)卷8《艺文志》(第41页):

“光绪二十六年,因奉[拳]匪蜂起,仇视教民,到处扰乱。西湾子、南壕堽等处受害尤甚。”

“《卢龙县志》(1931年铅印本)卷22《故事》(第27页):

“方洋兵之初来也,迫我地方官布告焚烧洞山、迷谷庄、钟楼、城隍庙与四各庄之匪巢等处,未果。是冬,以城内新坡及火星庙之戏楼公地,外加牛痘局本银八百两,抚恤天主堂之高神父,又以东门外附近山坡一段抚恤耶稣教堂告一结束,民教由此复相安矣。”

“《迁安县志》(1931年铅印本)卷5《记事篇》(第17页):

“九月十七日,西军入县境,问烧杀教民之罪。官绅会商立抚恤局,捐商民银数十万两,以赔偿教民之生命财产,又被联军索去军费巨款。教案纠纷难如乱丝。二年之后,稍为平复。”

“《昌黎县志》(1933年铅印本)卷5《风土志》(第20页):

“耶稣教,光绪十五年始传入昌黎,租住东关,经庚子拳匪之变,教堂被抢。”

卷12《故事志》(第27页):

“二十六年,……县北街崇兴寺改归天主教堂。”

“《南宫县志》(1936年刊本)卷16《文献志》(第25页):

“李寿朋,字西伯,岳悦村人,豪爽仗义。光绪庚子拳匪之乱焚毁教堂,法教士要求赔偿甚巨,民众抗拒,祸且不测。寿朋慨将自己仓胡同房百馀间捐于教堂,价值约万元,祸乃寝,邑人德之。”

“《高邑县志》(1941年铅印本)卷10《故事志》(第6页):

^① 原随文注:时拳匪呼洋人为大毛子,呼教民为二毛子。

“义和拳起于山东，以仇教为名，托言符咒能避枪炮，于是民教不睦之村争设拳场，借图报复。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间，拳众麇集，与天主教为难，官绅相与排解。”

“《深州风土记》(1900年刊本)记5《兵事》(第32~33页)：

“先是明之季世，西方天主教始入中国，我圣祖皇帝兼综西学，有旨允其传授，其后稍益禁绝，而民间私传不止。咸同之世与外国约好，遂弛其禁。自是民教不和，讼端繁滋。朝廷恐失邦交，时减有司调护西教，未大生事。及此年倡乱之徒以仇西教为名，假白莲教遗术，称有神助，设坛传习，名为义和拳，用乾、坤、坎、离诸卦分立旗帜。所在聚党横恣，千百为群，旬日间声势猖獗，内动公卿，外劫疆吏，而中外之衅成矣。当是时，州境不逞之民纷纷竞起，与邻州县相应和，所至焚杀攘馘，西教师徒死徙流散，不敢与校。上下奉为义民，官不能制，或从而嘿助之。外国兵既入京师，分据保定，戕大吏。西侵正定，东略至于河、献。乱党蹊是潜解。保定、正定、河、献诸郡邑，外兵所过多受祸。而州境以不当孔道僻远，官亦竭尽智虑收恤西教流徙诸民。官吏私语窃幸以为偷免外侮矣。已而敌军忽出保定，声言州官尝助乱党，将至州而甘心焉。卒赖收恤教徒尽心力，教徒中有侠者，夜入敌军为游说。军已临境矣，竟不入，复引去。州卒无事。”

“《定县志》(1934年刊本)卷17《志余》(第23页)：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拳匪乱作，设坛焚香，以‘扶清灭洋’为名。而内地之基督教益当其冲，焚教堂，戮教民，波及定境。城南北车寄村有教堂，诸教民麇聚其中，负隅固守。而当时官绅因诏书奖励拳匪为义民，遂率所谓义民者并募勇数百人，炮攻北车寄教堂。教堂不支，乘夜率其男妇老幼数百人南下，将奔真定。黎明至高蓬镇，北沙河滩中镇之拳匪复截杀而屠戮之，至惨。”

《庚子记事》辑佚名著《庸扰录》载：

“(五月)^①保定府一带教堂，为匪所焚毁者二十六处。

“(五月)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祸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刻释之。

“(六月)直隶河间府有天主教民趁机起事，所有兵器，均系新式快枪，并有巨炮，或云实有西人助之。”

《高楠^②日记》载：

“卷一

“(六月，十三日……通州教团大战，团大败，长玉笙请兵……

“(二十日……涿州新往教民二千馀，与团开仗……

“(廿五日……俄兵将入津城之先，团杀教民，教民杀团，官兵杀团；团杀官兵，又带杀民人之逃而出者。……教团兵民所死者以十馀万计……

“(七月，二十日……义和在涞水高洛村起事，明明白白说是仇教^③。烧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写火车，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放火。及到涿，则曰：‘势不与洋人两立。’到京，则曰：‘洋灭孔教，天特寄权于团，以为扫除。’可谓愈唱愈高。团之初心不同，乃被物诱至此。”

“卷二

“(八月，三十日……德国以廷雍媚拳时曾杀洋人二十二名于保定，欲以大队轰保定。”

“卷三

“(九月，十二日……德兵之正法廷雍等也，以夏间逢刚、端时，纵容拳匪蹂躏教民妇至于无状，复褫其衣袴，游街毕，寸磔之。今教民胪列受害情形，控之德兵官。兵官曰：‘不信保定官员聒聒至此。’遂

① 据原书内容标出，下同。

② 高楠(1852—1904)字城南，四川泸县人，清光绪己丑年(1889)进士。历任山西副考官，河南道监察御史，刑、兵、工三科给事中等级。

③ 原随文注：四月十四至五月初。

杀之……

“二十日……吴子和熙自保定归，言廷雍却用中国刀手正法。各国兵官会审，曰：‘六月廿二以前，纵容拳匪不怪你们。廿二后奉有保护之谕，何亦纵使凌辱，而又惨杀？’廷曰：‘是武官某。’曰：‘不然。武官不过当刽子手耳。你署总督，生杀政令由你。’谓为‘纵容拳匪，违抗懿旨’。廷无言，乃杀之，并杀武官王占奎，刨坑埋之。城内法、德、义、奥四国划界。德、义搜括。英、日、美出兵一到遂去。藩库洋人封锁，用兵守之。有洋女木姑娘者，拳匪起投廷雍。廷雍送之王参戎。王参戎交团杀之。”

《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辑：

“4月4日(三月初五日)《汇报》第165号载：

“义和拳匪党颇信异端，谓诵咒书符可免枪炮，专与教中为难。直隶东明、长垣、开州、威县等处密迹齐东，被害尤甚。去秋，故城焚毁一堂，县令庭讯时，有匪百餘持洋枪前来恐吓。邑尊惧，给钱三百吊与之讲和。刘八庄教民恐纵匪殃民，皆纷纷迁徙，官虑上司记过，令教民迁回。未数日，匪人大至，教堂被焚，杀教民一人而投之火，被伤者亦有数人。匪人渐至献县东大过及张家庄两处行劫，教士约集教民数百名保护教堂。东大过村之南也家庄，有某家甚富，惧匪类之横，佯与交好，且留饭。正在观我(踪)[朵]顾，各匪忽持械出门，若有鬼附者，糜至大郭村教堂。教民均至屋上燃枪，未几，官兵大至，匪人即遁。时正初更，匪有大车数辆，本欲运取劫物，迨及不能施，遂载死尸而去。是役匪死伤甚多，皆大车运归，只留死尸五具，有人言共死八人。次日，小(苑)[范]地方集匪三千，意将复仇。大过教中人大惊，遍告外村教民聚集援救。越数日，匪集大过之东，幸樊屯营兵二百名驰至，又有马队百名自天津来，获匪六人。先是堂中已有守兵十二名，至是兵数既充，人心遂定。……逾匪围阳太西河头天主堂，鲍姓司铎离堂而逃；匪人入堂不见教士，乃繫司事而囚之，适县差至，方得释放。时近处六村庄，悉数被掠。西河头堂有李姓司铎，亦以匪乱而逃至东河头堂，方至行祭，西河头有急足至，谓某姓被擒。信人恐其遇害，结伴救之。各匪移怒东河头，意在要索，乃给青蚨二百五十吊，匪始解。李司铎以匪迹不测，东河头难以存身，乃易服宵遁至献县。后此股团匪亦至景州，先焚刘八庄教堂，杀一教中人。”

“4月14日(三月十五日)《汇报》第168号载：

“直隶任邱县于十日前，官兵与团匪交战，官兵败绩。……同时会匪又与天主教民开仗，胜负未详。”

“4月24日(三月廿五日)《中国旬报》第9期载：

“天津、河间府有拳党与官兵交战。……时有天主教民与该党互相格斗。又王家口地方，直督裕出有禁止会党抢劫教民财产告示，发贴一日，即被人揭去，另易匿名白贴云：‘各西国教堂知悉：本会限尔等一礼拜内退出此地，所有房屋，留与本会神人居住。若尔等不听此令，则本会会友必用法术将房屋烧毁、生人杀害，尔等追悔亦无及矣！’”

“5月9日(四月十一日)《汇报》第175号载：

“保定府张家村拳匪焚毁教堂，共聚二千名左右。幸教民各有准备，枪炮交轰，匪纷纷逃去，死者六、七十人，伤者无数。教中死一人，伤六人。”

“5月13日(四月十五日)《中国旬报》第11期载：

“又京友函称：昨得保定府教士信悉，离保定南境约五十英里地方，教民、义和团曾大战云云。嗣经总理衙门亦得该处地方官来电略同。是晚，复得某教士来函详示一切。据称是役党徒约有二千餘人，幸居民早有所闻，一切火器悉经严备。是日，自上午八点钟战至下午三点钟，团党受伤不计外，死者约六十七人，教民仅一死六伤。党等见势不佳，随亦奔散。当战时，教民高踞屋顶，且悉用枪炮，团党则用竹竿刀石为军器，以故胜负悬殊乃尔。”

“5月23日(四月廿五日)《中国旬报》第12期载：

“清苑县属张登镇义和团党闹教一案，日前经陈瑞伯县令将两造带到，详送臬署。彼此均各受伤。所有尸身经各尸属当堂领取殓埋。内有六尸无人承领，当伤地保棺殓浮厝。现在两造各有悔志，愿具

请永不再寻衅端。清苑县陈令于上月^①二十二日出城至张登镇一带村庄密查义和拳与教民格斗情形，税驾村中计八九日，而接收呈词至七十餘件，大半系拳党与教民两项。又闻二十八日陈令将起事之拳党、教民拘获二人，解送府署。二十九日晨由府详臬，业经讯问。”

“直隶拳党目下滋扰愈甚，且专与北京、保定中间一带之教民为难。闻已有教民六十餘人为拳党所杀，并有数人为所焚毙。……刻下有‘不日将众聚毁堂’之谣。”

“5月23日(四月廿五日)《汇报》第179号载：

“昨闻保定府至京师之路上，有义和团与教堂为难，伤毙教中三十餘人，沿途焚毁房屋多处；《字林西报》则谓信教者被匪击毙有六十餘名之多，且有为火焚死者。二说不知孰是。”

“6月1日《中国旬报》第13期载：

“北京访事五月十八号发来专函云：今晨曾电告，义和团党在距保定七十英里之来顺村内，将一村天主教民杀戮殆尽。所有详情至今尚未接到。唯知被杀者共七十三人，该村已无余类。”

“6月9日(五月十三日)《汇报》第184号载：

“附近保定一带义和拳匪，目下日夜演技，所用枪炮军械皆富户出资购济。上月十九日(5月17日)，直督派杨福(司)同带兵拿捕。……廿三日(5月12日)，匪队拥至，皆紫衣、红巾、红带，诱杨深入重地，伏兵卒起，杨身中数枪，喉中一枪，遂死。马队全军皆墨，步兵多负伤而逃。匪势大震，杀教民二百餘人。”

“6月6日(五月初十日)《汇报》第183号载：

“保定府避难西人，现已设法杀出重围，刻拟来津。闻与团匪争斗时，被杀毙一人，受伤多人。该西人等均系英、美二国教士，并有比国工程师在内。现在天津团练各西人，已带足军器前往迎接。”

“6月9日(五月十三日)《汇报》第184号载：

“义和拳匪纠众叛乱，群拥至保定府城外与西人为难。比国铁路工师夺路而逃，中途失去七人，未知生死。刻下比国工师二十三人已入京暂避，伤痕历历，狼狈不堪。”

“离津八里之某村，悉被焚掠；又离五里之远，有比国二人被害。且言今夜攻掠天津，故西人无不惶骇，华官反无所惊，幸保定一带教民尚安。”

“6月13日(五月十七日)《汇报》第185号载：

“北通州城南三十里牛堡屯地方，有团匪千餘，拥至美国公理会教堂，付之一炬。该处本有防兵，遇匪而逃，不敢与敌。”

“6月20日(五月廿四日)《汇报》第187号载：

“河间府卧佛堂地方，聚有拳匪数千，虽未杀害教民，而教堂已付之一炬。教民不得安居。”

“天津城内于十九日(6月15日)被拳匪纵火，教堂三处均付祝融，殃及居民亦甚多。至二十日黎明，火势仍未尽熄。”

“6月21日(五月廿五日)《中国旬报》第14期载：

“拳党肇祸已数月矣。五^②月中旬，易州属涞水县界，忽有拳党多人煽惑乡民，与高楼村教民为难，住堂教士报明，涞水县官协同汛弁驰往弹压。邑属各绅面禀县令，谓各教民如能立一凭据，此后不复入教，方能设法保护。县令略与辩诘，各绅以为有意袒教，忿语相侵，势甚汹汹。县令知不可理喻，率同营汛(王)[往]彼处弹压。经四昼夜，至第五日，以公事暂回城中。拳党忽乘间焚毁教堂，杀毙教民三十餘名，其匿于堂中之男妇七十餘口皆被烧死。附近定兴县等村教民闻难赴救，亦被格杀九人。……是时拳党蔓延于盐山、南皮两县及交河县属(伯)[泊]头镇之间。各县令纷纷请兵。涞水教民之人京避难者男妇老幼相属于途，亦有由教士雇车送入西华门外西什库总教堂者。”

^① 原编者随文注“[四月]”错，且导致下文以阳历“5月20日”注阳历“上月二十二日”之误，故均删去。下文“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后之错注“5月26日”和“5月27日”一并删去。

^② 原编者随文注“[四]”错，删去。

“初，有高楼村者，在直隶易州涑水县之南，与保定府定兴县毗连。村民奉教者众，某武举嫉之，久已积忿成仇。近与某教民讼于官不得直，罚出钱四百千文、酒肴二十席，武举以为耻，欲报之，苦无良策。适山东义和拳党起事，闻有异术，于是倾其家产，聘数拳师、二教师、三教师，诵咒焚香，几无虚日。”

“6月23日(五月廿七日)《汇报》第188号载：

“十三号，有拳匪五、六百人将天津天主堂产房屋攻毁。”

“6月27日(六月初一日)《汇报》第189号载：

“沧州之英教堂被匪抢劫一空，各教士由华官救护。”

“顺天府永清县团匪滋事，杀英教士孙、孟二君，政府派新任副都御史何润夫副宪(乃莹)于五月十一日(6月7日)起程查办此案。

“武清县属马家场、范庄、洪家坟、牛房、宛庄、韩村各处教堂及教民家，均为团匪所毁。”

“8月(七月)《万国公报》卷139载：

“浙江解饷某大令自京来函略云：‘四月廿三(5月21日)，余至德州，均平顺。廿四(5月22日)，到景州，即闻往北各州县皆有义和团与奉教人为难，并不伤害行客。廿八(5月26日)，至任邱，闻数日前义和团在此杀教民二百余人，烧毁房屋五十馀家，然尚未见义和团之面也。’”

“10月27日(九月初五日)《汇报》第224号载：

“直隶献县拳匪复攻教民，闻被害者惨目伤心。联军已派兵一营，由水程往剿。”

“12月6日(十月五日)《中国旬报》第31期载：

“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党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添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1901年1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万国公报》卷144载：

“兹将团匪滋事始末及天津大战情形笔录，以供众览……”

“三月(4月)中旬，微闻遵化州有烧毁教堂之说，而未知其详。”

“四月(5月)下旬，闻保定府有闹教之谣，则竟实有其事。不论耶稣、天主教堂尽遭纵火，教民悉受伤害，更波及办事之洋人。”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夜十一点钟，忽见红光满天，但知城内失火。”

“十九日(6月15日)，知昨夜之火，系团匪焚烧教堂。查天津城内向有教堂三所，团匪风声日紧，天主教神甫请天津县发封看守，此夜均付一炬。”

《拳祸记》下编《增补拳匪祸教记》载：

“直隶北境

“庚子难前教务

“北境有正副主教各一，总堂在京师西什库左近，所属教民四万馀。住堂二十有二，内五堂在京城，即北堂、东堂、西堂、南堂、栅栏堂；二堂在天津，四堂在京东，四堂在保定府，六堂在宣化府，一堂在霸州。全境会所五百七十七^①，大堂三十五^②，公堂一百四十五小堂一百有七^③。全境西教士二十四，华教士四十。京中有大小修院各一，大院生二十三，小院生八十五；小学堂共一百三十三，内男学堂六十九，男生一千一百六十八，女学堂六十四，女生一千三百二十九；中等男学堂二，一在北京，男生一百四十五；一在宣化府，男生二十一。天津有专教西生之学堂一，西生二十；训练司事之学堂一。中等女学堂七，二在北京，五在宣化府等处。又有学习教理之学堂二十^④；医院三，二在北京，一在天津；安老院四；育婴堂二；施药局四，三在京中，一在天津；收婴所九，收养教外孩童六百五十八，教内孩童七十二。杨

① 原随文注：会所俗称会口，即数十或数百教友集为一会之所。

② 原随文注：大堂谓屋宇宏(广)[教]规模较大者。

③ 原随文注：公堂谓教友公祷之堂，小堂谓一家一院之堂。

④ 原随文注：俗称保守堂。

家坪^①有隐修院一，内西士六人，华修士三十七人。仁爱会修女三十二，分住四院；圣若瑟会华修女六十，分住各处教经。又女师三百二十三。”

“直隶北境京外教难

“安家庄被围

“安肃县安家庄有教堂一座。自六月起，官兵拳匪时而数千，时而一万馀，围攻三月之久，接仗二十馀次，未破。兵匪被杀一千馀人，教友死三十馀人。庄中缺粮，众教民携枪出队，入拳匪设坛之村借粮数次，杀拳匪数百人，教友受伤者五、六人，死者一人，将匪屋及设团之庙宇烧去数百间。直至八月间，洋兵到地，兵匪始散。”

“东(关)[闾]村被围

“保定城南五十里东(关)[闾]村有教堂一座，在清苑县境。庚子五月初教友与拳匪接仗，匪死数百人。后增官兵数千，围堂三阅月，大仗四十二次，教友死十数人，伤二十三人，兵匪死伤二千馀。直至闰八月梢洋兵到地，匪始散去。”

“盐山教难

“盐山城內于数年前始筑天主堂、育婴堂各一座，以聂、鲍二司铎总理其事。聂，武清县双树地方人，年三十有八，洗名伯多禄；鲍，宛平县胡林店地方人，年三十，洗名多默。庚子五月拳民大乱，有劝二司铎率众逃命者，有劝备枪坚守者。然逃命则诸女孩无家可托，备枪则无法筹费，且不便购置。于是静守以待。旋有庆云县新奉教者欲受洗礼，请聂司铎去。聂往焉。未几，匪势益张，计不能免祸，鲍司铎令女婴避往杏行村^②。彼处教友颇多，似易保卫。无如盐山堂中婴多车少，不能尽去，乃留小婴二十口、残废大女孩四口，以圣若瑟会女长陆玛尔大与女师、女教友各一人守之。其他修女三人、婴孩十馀口、教友多人均往杏行村避难。闾日拳匪群集，闯进盐城教堂，将银钱、衣物搜抢一空，卒将教堂、婴堂付之一炬。残废四女孩皆致命；其他小孩被拳匪掳去，事平后如数追还，未失一口。匪初入堂，女长与女教友一人由后门出，向东北武庄奔避。武庄距城五里。二人致彼，适遇匪徒。匪殴女长甚酷，逼问银物藏于何处。陆以不知答。群匪呼曰：‘老毛子，万不可留！’乃将陆女长与女教友同时杀死。陆系蓝州人，年五十馀矣。”

“杏行村教难

“聂司铎前往庆云，行未半途，被拳匪围住，车为匪所夺。大窘。去长衫，只衣短衣走避，一人随之，折向杏行村前去。行若干里，疲惫已极，足不能举，乃就近至某姓教友家借小驴骑之。途中惊骇万状，饥亦甚，红尘拂面，汗流如雨。至杏行村，已面如土色，音亦哑，出语不明，不知自驴跃下。教友见之，为之堕泪。鲍司铎遣修女、婴孩往杏行村后，仍居盐城教堂。有一黄姓衙役^③来促司铎速避，谓祸将及，性命危矣。鲍听之，携一小包，令一人随之，出城避难。黄急入堂，窃细软诸物而去。鲍在途二日夜，囊乏川资，粒不下咽。迨力不能支，入小村乞食。一老者见而怜之，呼一童出水饭一碗，二人分食，致谢而别。路过某村，为拳匪窥破，率众追来，大呼：‘洋人缓步，当以头颅留下！’有一勇敢教妇，系刘九之母，适避难过此，急趋数武，跪地呼曰：‘求众位老爷饶命，不要追那位先生。’匪不听，将妇拳打足踢，推之道旁。无何，来一正人劝曰：‘那个书生非歹人，何为欲杀之？’匪乃止，不复追。鲍司铎徒步艰难，行抵杏行村，备述所遇。……聂司铎商于鲍司铎曰：‘匪势日张，此处军械太少，难于抵御。日前致信北京，迄无覆札……’言谈间，有人报拳匪已近，不下万人。二司铎急往南首婴堂，图维保护。教友一百馀亦往。此五月二十一日午后事也。匪至，纵火于神父住堂，顷刻烈焰飞扬，万金之制尽化为灰土。是夜，拳匪紧围婴堂。二十二日午后，匪移薪七百捆置婴堂四周。时至夜半，燃火于薪，向婴堂掷去，顷刻南、西、北三面皆火。东边与教外屋毗连，匪徒三百馀人携抬枪、快枪各数十柄由东来攻，教友拒之。然

① 原随文注：一名杨家沟。

② 原随文注：在南皮县城南五十里。

③ 原随文注：城北黄家店人。

堂中枪不满十枝，而投瓦掷棍皆不得力。少选，上房火发。……男女老幼十余人高声念《天主经》《圣母经》，卒至梁断屋塌，均死于火。……拳匪进垣，聂司铎已昏倒于地，匪举枪刺之，即死。鲍司铎携一孩在西房，被匪打瞎右眼，仍毅然立。……屋顶坍塌，死于火内。”

“张义恒庄教难

“南皮县杏行村之西北六里有张义[恒]庄……

“张义恒庄男女教友致命者三十六人。”

“宣化教难

“宣化府属延庆州及龙门、赤城两县，难前教友大小男女一千七百餘，难后仅存二百六十七人。因教死者一千四百餘，全家尽死者七十八户。庚子三、四月京南义和团起事，宣化尚安。至四月底，突来大师兄、二师兄各一人。……未十日，各庄皆立团坛。……褚神父住堂在永宁镇左近，教友仅百餘人。有男女学堂各一，因此堂不能保，将男女学生遣回家内，二三女师送往白坨教友家，距永宁百餘里。在深山之中有名孔化营者，距永宁堂二里许，教友略多，合于他村来者共五、六百人。五月初六日，谣言炽盛，褚神父至孔化营听神功。初八日早，拳匪二千餘人乘攻孔堂。教友持枪守候，匪至村边，两相开仗。不一时，匪死十餘人，伤者更夥，随即退去。教友受伤者四、五人，死三人，皆以放炮不合法自行炸毙。……翌日匪未来，惟将永宁教堂与教友之屋全行烧毁。初十日，拳匪偕官兵齐来，多至二三千人。匪充前队，为教友击退者再。官兵踵至，各持快枪，教友不能敌。退回村内，遥见村之东南二面业已起火，教友胆破心惊，各自逃命。褚神父在教友房上督战，某教友呼曰：‘神父速逃！村不保矣，匪与兵自东南进村矣。’无何，东南教友大声哀哭。神父不敢久留，与三十餘教友自村西逃出。未半里，拳匪追至，在后之二十餘教友全被杀死。神父与九教友善奔，匪不能及，回村抢财物。神父等驻足小山顶，距孔化营二里半。时营中尚有哭声，惨不忍闻。歇片刻，又来二教友，一见神父放声大哭曰：‘神父，不好了，教友全死了。神父出营时，吾二人本欲随后赶来，因见拳匪追至，将二十餘教友杀死，故待匪回后始自村旁俯行而来。’言毕又哭。……乃齐登高山，行至午时，到一绝顶，永宁各村皆在目中，教友村咸(兆)[遭]焚如。……已至晚，逃出五十里外，相去不远有一教友家，想可权借一枝。往就之，教友已遁去。问村中教外人教友何在，对曰：‘匿迹某山洞。’十二人寻踪而去。到洞，鸡已再鸣。洞中有男女教友二百五十六人，粮食可支数月之用。苦无水，须取汲于山下。神父曰：‘此洞不可久居。若拳匪断汝水路，将若何？’教友云：‘我侪方积水，苦无多器，所积之水足济八九日之用。若欲他往，一则无合宜之地，二则妇女幼童不少，如何往乎？不如在此俟天主命。’……褚住一日，翌晨携银少许，同十一教友前往后山。阅三日，拳匪来洞下，……守有水之处，三日夜不离顷刻。教友遥向拳匪云：‘汝等想断我水路。我等储水甚多，可应一年之用。’拳匪闻之，别生一计，绕道至洞之上峰，向下投草，以火燃之，立即大炽。众教友烧死洞中，无一出者。是年腊月官绅教友前往收尸，见大半枯槁，间有全身完好者，大都半跪半坐。

“褚神父自后山到白坨，教友五百人亦藏身山洞，洞极幽。山足至洞口约一里半，只容二、三人。两山壁立，洞前有平地一方，大可一亩餘。洞外两旁皆石壁。左近有一泉，汲用不能竭。洞深十二丈，广三丈至五丈不等，半系生成，半为人工所凿。褚神父居洞八日，见粮食无多，且闻拳匪将来，先劝教友坚持信德，后与十一人径向西湾子进发。诸男女教友不能他往，仍居洞内。褚过长城……行二昼夜始到西湾子。洞内教友，拳匪不能攻，因围守洞外直至二十一日之久，欲绝其水。本地匪人知洞旁有泉，促众匪以一半看守，一半登山樵柴，又自村庄运柴来山，多至数万斤，由洞上投下，尽落洞外，投火烧之，顷刻燎原。匪又对洞放枪，教友不能出。一时火力过猛，洞石皆裂，内有枪药自行轰炸，毙教友数人。相持一日夜，教友死百餘人。翌日傍晚拳匪大声呼曰：‘我功成矣……’即鸣金收队而去。此乃诡计，教友未料及。约三百人，内妇孺居多，一齐出洞下山逃走。不料拳匪守于要路，一见大喜，曰：‘尔中愿背教者烧香叩头，各自回家；不背教者杀无赦。’教友答云：‘我们都是天主教，杀就杀便了。’拳匪举刀乱斫，一转眼间杀二百餘人。有年少二十餘急足逃去。……杨伯禄，桑(郤)[峪]人，向为宣化堂中司事。六月初，德大司铎知宣化堂不能保，飭送圣若瑟会数修女及女婴若干同往西湾子避难。时谢神父病未痊，亦送去。其时候神父率深井数十教友往护宣化教堂，到后见本堂神父已遁。府尊李太守又函促连避，

乃回深井。兹以府尊函^①录左：

侯司铎大人阁下：

自贵教宣传，本属劝人为善，教堂几遍天下。初亦彼此相安；近虽偶有民教相仇，不过一州一邑，吾国家尚能保护，地方官犹可维持，从未有变动之奇、焚烧之烈、蔓延之广如今日者。此固吾国之不幸，亦贵教之大不幸也。郡城教堂，在尊意过事忧虑，必疑地方官不为保护；即力言保护，亦疑为敷衍之辞，不知本能保全，彼此俱有利益。缕陈其义，厥有三焉。中外虽开衅端，终久必归和好。毁一处，将来有一处之争执；全一处，将来有一处之交情。吾郡城教堂关系至为远大，不得不极力保护者，此其一也。吾国家向于焚毁教堂皆不惜重金，以全交谊。即取偿于本地，原以警彼将来。他处出产富饶，事后犹能弥补。吾宣郡民贫地瘠，设今日不能保护，他日何力填还，重累我民？（决）[绝]非地方官之所愿。此不得不极力保护者，又其一也。然此犹可曰为国为民，于地方官无关利害。吾国家向于民教相仇，凡不能保护教堂，地方官皆从严参劾。此次祸机息后，终必一一清厘。若他处焚毁，而吾郡独全，地方官且有功而无过。此又不得不极力保护者，又其一也。此皆情理之极，故敢剴切而详陈之。惟大可虑者：此次拳民之变，实为闻所未闻。不止呼召风雷，禁制枪炮，且能一咒诅、一指画，百步之外焰火旋生。故我国家始非不欲严拿，奈势力未逮，恐激之而其祸愈烈。诚以该拳民等不爱财以安民庶，不惜死以报朝廷，不犯淫恶以敬天奉神，不顾身家以冲锋陷阵，遂至愈聚愈众，愈练愈精。其锋既不可当，其愚又不可破，设郡城教堂该拳民等必欲烧毁，具此神通法力，地方官亦无可如何。此则心有馀而力不足者也。倘使激成大变，玉石俱焚，虽有拔山举鼎之雄，亦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奈之何哉！奈之何哉！再四思维，只有暂行趋避一法。台驾若去，则教堂犹可托故保全。盖拳民之烧教堂，为教民、教士在其中故也。如大驾率教友既去，即拳民无所措辞，而所余教堂遂可作团防公所，则地方官有言谕彼，谅得保全。保府教堂之所以独全者，即是此法，想阁下必闻之者也。且事以相比而明。京师东交民巷、西（市）[什]什库等处皆各国公使所驻，其墙垣坚固，其地方广大，其器械精良，其兵徒劲锐，其各公使之聪明智慧自必迥异凡庸。当未经焚毁之先，既有我国力为弹压；迨事渐紧，又有上谕令各公使出京，惜其不见信从，卒投于凶暴之一炬。使当日有明白人从旁提醒，尽可藉奉谕旨率众出城，则鹤举鸿飞，岂尚毙于弋人哉？由是言之，吾郡城何力何能，而足与拳民相抗？故今日望阁下运行者，又审时度势而出于此也。况智者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与弃城逃走、临敌先奔者迥然不同，特不与凶顽之徒仅较量目前而已。古之人如太王迁邠、元宗避蜀，以都城重地，且又舍而之他。即吾先圣、先贤如孔子微服而过宋、曾子闻变而出武城，亦以行一时之权宜，故为千古之明哲。阁下又何必与愚悍者拼此千金躯乎？即以泰西各国往事而论：拿破仑以困守而遭擒，华盛顿以见机而反胜，此尤在内而亡、在外而安之明验。斗智不斗力，阁下当早见及此矣。如其不然，不惟阁下身危，教堂不保，教民并其房屋概归焚灼，而且一朝变起，殃及池鱼。推之贵教劝人为善之心，当亦不忍，何况耶稣当日尚舍一身以救万民哉？所以勤勤恳恳劝阁下去者，盖以拳民、教民皆系朝廷赤子，地方官抱一视同仁之量，皆应保全。因今日势恐相（防）[妨]，乃以趋吉避凶为善计。区区苦意，想能谅之。至如以不能去为忧，则更不须过虑。现在据各处文报，惟怀来、延庆、万全及郡城拳匪渐兴，其他尚安然无事，且闻在教不在教惟老团始能认明。趁今老团未东，以阁下中国衣冠、中国言语，更可徜徉而去，是今日犹能出走，久则恐无驻足之区矣。缘拳民愈传愈宽，我国家勉强行权，现又有各省迅练义和团防之谕，将来步步荆棘，虽欲走而不能。属在同城，不惜沥胆披肝，尽其忠告。如得下采白菟，则启行亦当审慎，或分帮而走，或绕道而行。阁下熟悉地图，必能斟酌尽善也。惟望一路福星，吉人天相，并望天心厌乱，早赐平安，则旧地重来，教堂无恙，想阁下当亦轩渠大笑，始信余言之大有裨益也。此稿拟成多日，惜格于众论，致未转达。每一披阅，殊负余心，可为长叹。岂天心已定，大劫竟不可挽回耶？噫！

^① 首发于1901年7月3日《汇报》第290号。

六月初六日知宣化府事李肇南顿首

“太守信拳匪神技，不知其伪饰，自今思之，当亦哑然失笑。

“……德大司铎自西湾子回来，往上庄子，离宣郡二十五里，午刻望见宣城中四五处火起，想是天主堂被焚。午后有教友自宣郡南关来，言‘杨先生被杀于衙，今日欲拿教友……’德大司铎云：‘我欲往深井侯神父处。谁愿从我？或往西湾子亦妥。’问之各人，皆愿往他处。翌日，匪与兵将宣堂及教友屋全行烧毁。旋至上庄子拿教友，庄已空无人。寻于田禾中得妇孺五六十人，立即杀死……”

“龙门房村在宣郡南三十里，侯司铎自宣郡回深井，道经其地，劝教友躲避。村中十数家以刘姓为翘楚，家资丰富，不肯远扬。在教亲友逃来者亦不少。迨拳匪与官兵一到村中，众人无主意，大小男女八、九十人跪地求天主，同时被杀；惟少年十二人捷足而出……”

“西宁县^①于五年前始建住堂，在县东小庄上。宣化景神父管治此堂，男女教友共五百余。深井住堂先为兵匪所焚，西宁教友为数无多，均聚于小庄上。六月初，土匪勾引拳匪来庄开仗，教友胜之，无一伤者；匪中死伤数十人。但教友无多，又少弹药。阅三日匪大股至，约二千余；各庄之和附者又有数千人。教友寡不敌众，各自逃散。拳匪追之，半日之间杀教友二百有奇。其余逃入山洞，匪不复搜。至七月底，教友稍稍回家。景神父与二十余教友逃至桑干河之南岸山中，教友三五成群，日往山庄乞食，晚则聚于景神父处，以略好之食给神父，已则食劣者。十七日后景神父往西合营堂，是堂属董、佟二神父治下。董，宣郡人；佟，北京人。五月下旬各处拳匪焚杀教友，董、佟备御匪之策。本处原有教友二百余，自外来者又数百人，计男女教友、圣若瑟会修女及婴孩等共二千余人。初，土匪不敢来犯。六月底有外来之匪自言山东老团，能避枪炮，不妨一试。土匪恃其艺，集数十人将西合营堂围住。堂基故高，教友家在堂之东南两面，堂北为铺户，堂西为大街，低于堂基二丈许。拳匪四面呼杀，不敢近。……匪围数日罔效，且每日被教友击伤四、五人。有人请州官发兵攻堂，州官不可，曰：‘汝等欲灭天主教、杀洋人，本州不是不助；但天主教人众，一时不能杀尽。况本州家人昨日自天津来，言天津五、六日前已被洋兵攻破，不日即到北京。北京一破，我们皆死无葬身地。况西合营天主教素日不是好惹的，你们听本州吩咐，各自散去罢。’匪不服，哗曰：‘这官也是二毛子，给我拿下来！’州官见势不佳，速退。平日署中有武夫二十余人，至此仅能护官，不能平匪。大炮四尊为匪索去西合营，把总随炮而去。次日匪欲以大炮攻堂，把总云：‘这炮我没放过，吃药多少我也不知。你们自去放罢。伤了你们人，不要怪我。’缘是，匪未敢放。七月底，匪闻太后、皇上已蒙尘，始各散去。事平后，近邻教外人咸来求救，恐洋兵来剿故也，有送米粮者，有送银钱者，有欲奉教者。一寸许之十字像，可卖纹银十两，教外人佩于胸上以为护符，但教友无有卖者。匪徒自教友家抢去之《早晚课》，一本售银百两。教友知之，向教外人索回。”

“双树子教难”

“怀来县境有住堂二，一在双树子，一在纸房沟，在礮山堡南二十里深山中，共计教友一千五、六百人。双树子教难情形，包神父有法文日记甚详。兹译其大略。中历五月初九日，怀来县令道经双树子宿教堂中。初十日临行，见本村某姓秀才，知其在于拳党，面斥之。时拳匪蜂起，自山东以迄蒙古，在在皆是。十一日县令致包神父一函，责教友无端生事，欺抑平民，遂致众怒汹汹，不可遏阻^②。十六日，本村教外人不知何故迁徙纷然，将细软物携之而去。十七日早，拳匪集议于某山上大庙中，行将起事。是日二铺子教友有病重者，请包神父去。双树子教友阻之，不听，遂往。至则教友咸集，有忧色，求神父赦过。神父曰：‘诺。’方赦时，人人堕泪，盖知死在目前矣。……二十二日，包神父回双树子，接德司铎札，知天津四乡之堂俱成灰烬；京中东堂已毁，圣若瑟会三贞女致命，北堂被围甚危，南堂、西堂、栅栏堂相继焚尽。二十四日风声尤紧，教友穿垣墙作枪洞，以火炉上铁管改为大炮。二十五日，圣若瑟会贞女闻宣化教友往西湾子，亦欲前往，包神父听之。三十日，近方教友俱来双树子。濒行，将家中物寄外教亲友家，皆不纳，因拳匪有言：‘凡藏教友物者，皆将火之。’六月初一日，各店铺不肯卖粮于教友，检点围

① 1914年改名阳原县。

② 原随文注：(已)[以]上皆冤词，无一实者。双树子教友从未涉讼公堂，有案卷可考也。

中只有十日之粮，教友忧之。初二日，闻保安县^①匪作乱。……十五日，德司铎来双树子，包神父大快。盖前此惟一神父，而今有二神父，死前可告解矣。……十九日，保安县令来函，劝教友背教，自火教堂，或供设菩萨像数个，便可劝拳民不来。神父毅然却之。侯镇海司铎亦来堂，头裹以巾，所携惟大日课一本，别无长物。二十二日，侯向苦修院进发。二十三日，近方有惯作宵小者愿来相助，教友有不敢诺者。包神父曰：‘其人虽恶，而助我则善，何必却之？’二十五日孟家坟教友请包神父去，神父往焉，教友大悦。二十六日神父用早膳时，有人奔报拳匪已近。顷刻众心大乱，哭声载道，求天主声不绝于耳，男教友各往枪洞处守候，决意不能敌则逃。无何，有人报前来者系官兵五百人，已向北京前去，教友乃稍安。不料兵由大路折至双树子，奋力相攻。孟家坟教友登山望，见双树子终日烟起，不知胜负如何。众心为之大虑，皆曰：‘今日兵攻双树子，明日必来攻我。’晚六下钟，包神父忽起一念：鸡鸣山在村南，三面无路，西、南二面下临洋河，惟一面有小路，一人把守，万夫不能升；山顶有大庙，可居多人，往彼必能保命。乃决计迁往。当夜将人物移去。此令一出，七下钟已首途，各带值钱物及十日之粮，盖冀洋兵于十日前必到也。教友鱼串而行，长可数里，不出一言。小孩间出哭声，妇女念‘亚物’亦稍有声。忽有人言前路有人截阻。神父曰：‘教友持械者前行，外教来阻者执之，不任其回报他村。’旋知无人阻路，虚惊耳。行近山顶，神父先去，教友不之见，又乱。直至神父之乡导回报神父已登山，乃安然齐上。和尚问：‘何人？’神父曰：‘官们。’恐和尚闭门，故有此言。时山上有窃贼若干宿边屋中，闻‘官们’二字，立刻遁去。二十七日早接德神父信，知昨日双树子战十五下钟之久，教友死一人，兵死数人，一武弁殒命；今日早又战，至十下而止。傍晚德神父致函包神父，谓已患病，不能领教友，请速回助战。包神父当夜驰往。途中有多人疑为贼，开枪追之，神父以浮水得免；但不知路径，终夜摸索，甚苦之。二十八日早三下钟，行近双树子，急步入围，终日未战。二十九日五下钟，马兵大队自邻村出，大张旗鼓，得得前来。旋分二队。行既近，教友开枪击之即中。兵放大炮，第一弹经包神父头上，离三尺许；第二弹中堂上小钟；又一弹入钟楼，落于钟下。既而行愈近，教友放枪退之；又进，则又退之。如是者数四。教友胆益壮。若干人潜出围，隐身禾中，放枪击兵，举皆命中。兵乃不能支，立刻遁走，教友追之。至十一下二刻，兵匪尽退。七月初一日，教友制圣心旗以资保护。初二晚五下钟，兵匪各散。初十日拳匪七十人往孟家坟，将火其宅；幸他处壮年教友六人道经其地，放枪击之，毙五人，伤者不知其数，夺得匪旗五柄。孟家坟因以保全，而双树子之围亦解。

“……计永宁教友死一千二、三百人，宣化城内四百许，西宁三百馀，蔚州约百人。”

“大宝甸被围”

“京东宝坻县大口屯及小宝甸村，戴司铎，西人，史、王、张三司铎皆华人，传教其地。庚子四月，备快枪数十枝、炮一尊。其地在天津北百余里，为自津至京要路。五月底中外开仗，官兵欲保此路，四处云集：东有董福祥之兵数万，西有马玉昆之兵数万，北有宋庆之兵数万，南侧直至天津尽是官兵，莫计其数。拳匪更在在充斥。戴司铎先保双树庄，在大宝甸西三十五里，与官兵拳、匪二万馀二次交仗，毙兵匪一千馀，教民死者数人。后念此地不能保，令教民齐往大宝甸。路遇拳匪之坛皆焚之，教民无一受伤，拳匪死数十人。大宝甸教民已聚一千馀，又得双树庄来之四、五百人，胆为之壮。苦无房屋，支席棚以蔽风雨。先是，拳匪来犯数次，均被教民击退，匪中死伤无算。教民乏粮，向匪中设坛处借粮，所至无敌。匪败走，求助于兵。六月初四日，有马玉昆之兵五、六千自西北来攻大宝甸教堂，南有宋庆之兵三千，亦来攻堂。东南、东北尽是拳匪，每日来攻，欲灭此而朝食。教民由围内发枪，兵匪死伤不少，教民死伤亦日有数人。教民欲出外攻匪，司铎不可。一日，官兵一万四、五千自南、西、北三面来攻，离庄仅一里馀，皆用快枪，攻一刻之久。东二里外又尽是拳匪，约数万人。围内男女教友死伤数人。本处教民张七胆大有谋，谓司铎曰：‘……任我领数十人出外破营，可救众教友之命……’司铎不得已许之。张七乃选眼明手快之后生八十八人，分为三队，以四十人往西北，四十人往西南，张则领八人往正西。号令一发，众人齐出，各赴所派之地。距兵营二百步，燃放排枪，官兵倒毙数人。自是八十八人向西行，三步

^① 1914年改称鹿县。

一排枪，五步一排枪。官兵见教民猛如虎狼，有进无退，立即大乱，弃枪炮而逃。普西二里有一小河，官兵皆往河西。围内教民又出百余人助战，官兵乃大败，教民得全胜。官兵死数百人，伤而不能逃者遍地皆是。……东拳匪闻官兵已败，亦各逃去。是日晚李秉衡、宋庆、马玉昆领兵数万前往天津过此，闻教民英勇殊恒，恐为洋兵内应，欲招抚之。某员云：‘今晚我领兵数百，必破其巢，何必招抚？’……领三百兵前来，一更后，已到大宝甸一里外。此地南北有一土沟，三百兵排于沟内。……围内教民方喜今日全胜，张七云：‘我心尚不安。谅官兵今夜暗算我们。’有聂先生者，亦云：‘我心亦不安。不如派四、五十人前去探息。’即选三十人出围而行。至土沟边，闻沟内有人出话，三十人驻足细听。官兵闻沟东有人足声，问：‘是谁？’教民不答。一兵云：‘开枪！’聂先生令三十人皆伏地。官兵放枪五分钟之久，不下千数百响。后闻沟东无声，官兵曰：‘都死了。去给我把首级割来，一个脑袋赏银十两。’众兵齐将枪刀放下，一拥而上，已至教民所在，仅离八、九步。聂先生一发号：‘坐起开枪！’头排枪将官兵打倒数十人，二排、三排枪，官兵倒大半。后又放三、四排枪，官兵无声息，只闻远处有逃跑之声。又放数枪，顷刻无动静。三十人全起，往前数步，见官兵横卧一沟，约一百十余人。内有一蓝顶者，即领兵之某员。……教友共得枪一百六十馀杆，枪子数十粒。昨日天津城为洋兵所破，教友尚未知。夜间李秉衡等率兵南往北仓，此地之事归马玉昆办理。次日早，马玉昆领二万兵将大宝甸围住，离一里馀，大炮百馀尊，旗纛高悬，刀枪不胜屈指，列一弓字阵。教民正疑虑间，有一挑菜者来围下，言有一要信交戴老爷。戴神父云：‘拿来给我看。’拆而阅之，则马玉昆名片，上书小字云：‘本军门拜候戴教士安好。今大宝甸教民团聚一处，意欲抗官军造反耶？窃谓贵教士必无此心。今本军门欲与贵教士面谈其得失。若贵教士不疑本军门，即发驾恭请贵教士前来。’戴神父看后，不知所措。忽见三骑飞奔而来，亦到围下，云：‘教民等不该开枪。我们三人前来，欲与戴教士说话。快请贵教士前来。’戴神父云：‘姓戴的就是我。’三人一望，见戴公头缠白巾，用辫子盘住，身穿小裤褂，带有泥土，手携快枪，站立垣上。三人云：‘我们前来，并无别意，欲与贵教士说明利害，故寸铁不拿。若贵教士不疑，我们三人进围与戴教士讲话，如何？’戴神父云：‘可。’即将三人领入堂院坐定。三人曰：‘我们前来，不为别事，舍着性命，愿救此处教民性命。我们大人不是不能用兵力破此庄，只不忍见教民男女无辜而死。拳匪肇乱，本来可恨；教民又在此团聚，与拳匪、官兵相持不下，如何使得？此处教民虽多，焉能抵敌官军？我们大人本知教民不是造反，为惧拳匪故也。但各庄平民告到大人跟前，言教民至各庄烧屋，抢其财帛，我们大人不能不前来查看。而教民又杀官兵数百，这如何了得？依我们之见，请戴教士前去马大人前，听其安排。若有疑惧，可把我们二人留在围中作抵，一人与贵教士前去。’说话之间，有教民来言：‘官兵将庄子围住了。这三个人必是奸细，不如把他们捆了，再打官兵。’戴神父云：‘休要糊说！’彼三人云：‘贵教士主意如何？’戴云：‘我们不打仗，为什么官兵又来？是何主意？’三人云：‘我们今日之来，并不怕死，是为救教士、教民之命。官兵虽来，不能先开枪炮。或放我们回去，或把我们捆了；或是戴教士前去大人前说话，或是不去：就在今日。话也不必多说，请贵教士拿定主意。’戴神父与史神父作辣丁语互商云：‘不如我一人赴马军中，看其有何措置。’旋向三人云：‘既然马大人有意见我，我一人前去，听马大人有甚说话。’三人云：‘甚好。我们留二人作抵，一人随贵教士同去。’戴神父云：‘那倒不必。你们不怕死前来，难道我怕死么？’戴即乘车出围，同三人前去。又有张七、聂先生跟去。行至军前，官兵已退数里。马玉昆接见甚善，云：‘贵教士数日受惊矣！然使教民不散、围不去、军器不缴，我不敢任其事。鄙意将各教士送至京内，或至天津，必保无虞。教民则还其家，并交出兵器，我乃有颜见上台并见朝廷。’戴云：‘大人之意甚是。但教民群聚，非造反，实为拳匪所逼。’马云：‘教士之言是也。我二人立约，我发兵平拳匪，并派兵保护教堂、教民。’戴云：‘大人之言甚好。但当先平拳匪，我们始能去围、缴军器。’马云：‘就是如此。一言为定。待平安之后，贵教士看马某是否真心保护教士、教民。事不可迟，五日内照办。贵教士回去与教士、教民安排平围缴枪，我就立刻去平匪。’戴神父回后，果见官兵至各团庄拿拘拳匪，以为首者军前处死，为从者释回，各安本业，五日内果拳匪平尽。第六日有官兵数十前来保护教民。前来之三官又请教士回至天津，并云寄信天津堂内，请刘教士来租界外迎接。戴神父不得已交出旧枪数枝，伤即平围，一面与史神父、二人随官兵往天津。及至杨村，马玉昆已不在。哨官云：‘已往北仓。’无奈，又往北仓。是日随从之二人逃回大宝

旬，惟戴、史二神父住北仓某店。至夜，送戴、史之兵皆逃走。天明，二神父起，昨日数百兵不见一人。正疑虑时，忽有三兵进门，举枪斫戴公。史公在旁力阻，云：‘我们是马大人请来的，你如何敢行凶？’又一兵云：‘有银子没有？拿来！’史公云：‘银子尽在里头包内，你们自去取罢。’三人进屋抢银，戴、史二公立刻出外，各藏他处。一点钟后，询一老人，方知官兵已逃，洋兵将到。二人出店循运河西岸南行四五里，有日兵数骑当住去路，不许前行。戴公云：‘我是法国教士。’日本人摇首以为不懂。后有一日本武官能言华语，始放行。二人又前。未一里，遇俄兵数骑。又被阻止。无何，来法兵数骑，戴公言明来历。又南行，至河东桥边，为俄人所守，不准过桥。河西有刘神父与训蒙会二修士，见桥东二人与俄兵相语，刘神父想是教友之逃难者，过桥相近，始识戴、史二公，悲喜交集。是日洋兵攻破杨村。宋庆得马玉昆函，知戴神父已平围交械，立即电奏朝廷，遂有七月初八日上谕。

“综计直隶北境教友死于匪手者约六千人，以被难走避，饥寒困苦，抱病死者又二千人。兹将仇教官谕录左：

……(略)

钦命二品顶戴兼署直隶布政使、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通省驿传事务总统振远全军觉罗廷为剴切晓谕事。六月初九日恭奉上谕：‘自各国传教以来，各省屡有民教相仇之事，总由地方官办理不善，激成衅端。其实教民亦国家赤子，其中非无良善之徒。只因惑于邪说，又恃教士为护符，至种种非为，执迷不返，而民教遂结成不可解之仇。现在朝廷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忠义相勉，同仇敌愾，万众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践土之伦，岂真甘心异类，自取诛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网开一面。着各督抚通飭地方官遍行晓谕：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迫其既往；并谕知民间凡有教民之处，准其报名该地方官听候妥定章程，分别办理。现在中外既已开衅，各国教士应即一律驱逐回国，免致勾留生事。仍于沿途设法保护为要。该督抚当体察各处地方情形，速为筹办，毋稍疏忽。将此通谕知之。钦此’等因；本司又于初十日承军机大臣传谕，着本司‘遵照谕旨，剴切晓谕，准令教民悔过自新，不咎既往。钦此’等因。奉此。查教民本系中国人民，既蒙朝廷格外施恩，理应激发天良，及早悔悟，反教自新，共为盛世良民，各保身家性命。除通飭遵照外，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教民人等知悉：所有前奉天主教、耶稣教男女大小教民，准其一体悔悟，反教自新，即赴该管地方衙门据实呈首。告知家族邻右，邀人作保：一经反教，立即供奉祖先，贴门神灶主，虔心改悔，以示凭据。其各教堂中聚集之教民有愿解散逃出者，亦准一体悔悟反教，不咎既往。自此次示谕后，再执迷不悟，以后身家不保、性命不保，后悔难追。该团民如遇已经反教之民，应仰体朝廷德意，不得再视为仇敌，妄行杀戮。其各凛遵毋违。特示。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日。”

“束鹿县教难

“庚子春，束鹿县境拳民无几，邻邑则在在都有。综计束鹿县教民一千六百人，分十五会，各有经堂为行礼之所。教士住堂在刘家庄，居县城西南，附近教友四百馀，合于邻会教友共七百馀。其他八百馀人均在县城东北，以骆家营、吕家庄、赵家庄三处为大会，相去各十数里，地势崎角，有鼎立形焉。教友自拳乱伊始，知难将至，各备军械以待。……管会李司铎有才智。……五月某日天未晚，彭头村匪徒百馀人拥至骆家营，行将肆掠。教民能战者共二十许，内数人先自梦中惊醒，持枪出户。遇匪于村首，发枪击之，连中四五人。馀匪即退，往控于官，捏称乡人路过村前，为教民所杀。官来验，知所控非实，飭家族葬之，未罪教民。然教民惧，意匪人必来报复，因欲避往他方。李教士曰：‘东邻深州之教民咸聚于阳召。阳召未陷，尔曹可安枕卧也，教民听之，姑为静守。惟城西教民无所依庇，加以彭头之匪与日增多，声言前日之仇必报；而教友自深州来者言彼处大遭蹂躏，致命者已不少，妇女被匪(摠)[擄]去，更堪痛惜。李忧之，然计无所出。盖教民皆贫乏，欲集众自卫，无粮饷，无多械，无馀屋可居。祷久之，得一计：与其坐而待毙，孰若出搜拳匪，乘其不备而攻之，则其力衰、其势孤，教民可以保全。乃寄信保定，以此意告上峰。上峰不言可否，任李主之。李归，密约宁(静)[晋]县、赵州埭墩、刘家庄等教友四百馀，邀唐邱法教士亦至。五月二十二夜，教友一股自西路起程，一股自南路起程，各穿号衣。二十三日昧爽

抵彭头。村中拳匪多至一千馀，闻教民至，鸣钟集众排队齐出。先在村口叩头求神，既而汹涌上前。李司铎喝令教民放枪。数发之后，匪即纷纷倒毙。未旋踵，拳匪大股自村西来，匪目称五阎王者骑马前行。教民放枪击之，阎王堕马，馀匪惧而退。……仓皇之际误伤新教友一人，数日后即痊愈，重列行间。是役杀匪三十许。方两军接仗时，乡民来观者稠密如堵，幸而胜，否则无一人生还矣。……距彭头八里有一小会，教民无几。某日拳匪往扰，垛墩教民二百许驰往救援，至则匪已散。乃折往彭头，遥探一切，未敢即近。匪知之，携枪炮器械出战。一时炮声隆隆，俨然莅阵。教民伏地，久之。匪意教民尽死，络绎来观。教民忽起，杀其数人，馀匪胆裂，弃枪而遁。教民追之，直入彭头，烧其半村而返。自是彭头之匪不足畏矣。惟深州之匪益形猖獗。六月初六日阳召住堂为拳匪所围，深州刺史助纣为虐，以火炮济匪。教友惧，男女皆哭。李教士闻之，立派教民往救，自朝至夕终日与匪交战，教民死三人，匪死尤夥。匪既退，教民无论男妇乘夜往束鹿。内二十人因失路被擒，均为匪所杀。某日冀州冯家庄教友避往唐邱，道经曹庄，庄民截杀其数人。李知之，率教民往剿，烧其屋数座，取其粮接济唐邱教众。是役一教民死之。先是，彭头匪败后群集于晋州城内，约二千人，州尊助以枪炮往攻垛墩，未破，匪死数人，志犹未灰，拟以大队来攻。教友知李司铎善谋，请往襄助。李曰：‘诺。’……适有二教堂未毁，离垛墩皆十五里，一名赵围，距晋城八里。二堂与垛墩成鼎立之形。李发往各堂一百人。……阅二日，天方曙，垛墩闻赵围枪声，以为匪攻，垛墩人驰往救助。比至，无所见，安谧如常。少选，有人登楼遥望，见拳匪大股自州城来，转瞬将到。众友闻之，急登村外陵上。匪之前队携矛至陵下，其枪炮尚在后车。教民放枪击之，匪应声而倒。有人自树间发枪，直中拳匪后队，匪乃乱，急足奔逃。匪回，将入城，州尊命闭门拒之，寻即散去。自是北段无匪。而南段则仍复联络往攻雷家庄，教民力御，战半日之久。嗣以唐邱教友来援，匪始散去。”

“直隶东南境教务

“东南境于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始设主教一员，前此常由北京主教统理教务。庚子春，东南全境教友五万五百，守规未入教者五千人；住堂九，以张家庄为总堂，公所五百八十一，小堂一百十三；西司铎四十，华司铎十六，辅理修士十一，男教习四百三十八，女教习二百七十一；修院一，院生二十一；中学堂三，学生一百十五；小学堂十六，学生二百三十四；女学堂三，女生一百八十；蒙学堂二百十，小生二千四百八十；育婴堂八，收养婴孩四百馀；印书馆一。”

“献县张家庄教难

“献县张家庄总堂有西人三十，步主教亦在其中。时会长马大司铎在威县赵家庄，葛司铎代理总堂事务。接统领范天贵函云：‘奉军门来示“沧州拳匪滋事，凶恶异常，即将淮练各营调赴沧州，以便相机剿办”等因，敝营队伍只得撤回。所有贵堂之事，即请阁下设法保护，并谕各教民将东边墙子筑高，壕沟挖深，多备枪炮，妥为防范。幸勿以队伍撤回，人心惶惶不定也。弟到沧后即面请军门拨队前来保护。’又接献县吴焘来函云：‘顷接府宪王太尊来函，以“任邱八方村教堂被匪围攻焚烧，匪势甚众，并有任邱得手后即至河间、献县之谣。嘱即严密防范”，等因。窃思八方匪徒众有数千，一时恐难解散。张家庄为畿南总堂，匪徒最为注意。刻下杨玉山所带防军除各处分扎外，存城不过百馀。倘该匪大股来扑，断难抵御。敝处虽已飞禀督宪、梅统宪迅即添派大队前来，第恐缓不济急。贵堂教民迭与拳匪接仗，颇能得其情委。望即早为布置，以助兵力之不逮而保总堂。是所切祷。’既接官函，堂中立即整备，用抵拳匪攻突。但弹丸小庄仅容数百人，而逃难来者日众，增至四、五千人，席棚而居，处处皆是，有居带来之车上者，有露居者。昼暑夜寒，雨沦日晒，困苦颠连，笔舌难罄。堂中每日施粥三次，既而减至二次，每七日犹需米百馀石。司铎巡视病人，时而送圣体于席棚之下，时而傅终油于敞车之上。其因窘难、疾病死者，男妇孩童共二百馀，只计本会死五十六人。”

“初，外人传言有二百余人习法于九连山，各路神仙俱已请到。献县总堂乃黑风口或九龙口，非八月八卦旗全来不能取胜。堂中闻言，一笑置之。不料八月二十七日十下钟果有匪众前来，堂中鸣金聚众。适此日献县城中有大市，信友赴市者过半。午刻，众人未备，拳匪已近。阖堂之人奔走纷如，不知所措。戴司铎登钟楼，见匪已至，一发洋枪，匪队遽乱。速下楼，令教民出战。未十分钟，斩七十匪，馀

皆奔散。自是匪不敢来犯。然堂中日夜戒严，心惊梦寐。至闰八月二十四日法兵至，教民之心始安。至是四方外教大为惊惧，府、县等官送来牛羊果品殆无虚日，将以塞法员口也。”

“深州教难”

“深州教民最多，奉教最古，拳匪之乱致命者亦最多，众共三百六十四人。

“深州曹刺史景卿素恨天主教。乱稍平，亲至献县总堂，佯为保教，无惭色。谓葛大司铎曰：‘前奉上谕杀教友四百餘，今者上命保教，我即保教。然口是心非，回署后仍阴害教民。’

“大名府教难”

“庚子夏初，谣言日甚。六月初二日午后，突有千餘人集大名府总堂，声言欲入观看。闾人曰：‘人太多，不便同人。且教堂非庙宇。官尚不人民宅。’言讫扃门。众人怒。闾人奔告范司铎曰：‘事急矣！’范司铎遣郑先生稟报道台庞观察。庞即骑马街行，向众曰：‘事平后将不利于汝。’旋即往镇台衙门。郑自道署返至堂中，事已危急。奉范司铎命，逾后垣赴镇台署告急。王镇军命驾来堂，见范司铎。是时诸司铎方用晚饭，镇台来至饭厅坐定，谓诸司铎曰：‘现在皇上不主事矣。洋兵在京被义和团打死过半。虽他处教堂被毁，此处有予在，可保无事，否则予不姓王矣。’言已告辞，即出，向众曰：‘尔众何为？青天白日，藐视王章耶？’即速退去，否则拿汝戮汝。’一面召游击带营兵多名前来。众见镇台实意保堂，各鸟兽散。

“六月初三晚六下钟，上谕至大名府，着地方官招致拳民，整备战务，逼令西教士出境，教民则背教以保性命。不旋踵，二委员来堂，促教士速去。范司铎请发兵送往徐州，官允之。既而官差来言，送往徐州一事一时不能遵办，须俟明日起行。不料倏忽之间城中遍张揭帖，谓京内外洋人均已被杀，大名城内一堂亦当毁去，用绝根株而快人心。初四午刻，范司铎发杨、赵二司铎南行，皆华人。杨携钱一千，别无长物。饥甚，购饼少些将食，突来数人从旁指认，啧啧语。杨惧，立即他去。行未二里，一人自后来，呼曰：‘止步！’杨曰：‘何事？’曰：‘尔非堂中司事耶？’杨曰：‘谁谓我堂中司事？’曰：‘街上见汝者言之。’杨曰：‘有何惠教？’曰：‘尔未尝知耶？上谕已到，着灭教杀洋。众客寓奉有官谕不准收教民住宿，如有来者，报官拿究。’杨曰：‘果如是耶？’其人曰：‘然。且有人将来执尔，请行别路为妙。’杨谢之。由小路入一教友村，教友不能识，杨明告由来，始善纳之。初五日早，杨往开州，为其传教地。入住堂，遇徐司铎。城中谣言甚恶，相约出逃。至黄河右岸某姓家。无何，闻开州住堂为匪所劫。嗣从村董某君计，前往开封。……杨司铎……七月初五日离开封往江南进发。……初七抵亳州，徘徊五日。十三又起行。……直至八月初二日抵扬州。时已晡，觅久之，得天主堂，叩门入。闾人拒之，杨不听，径诣郎司铎所在，相见便识，喜出望外。越日乘轮东下，初四抵上海。先是，贺司铎避难来申，相遇甚喜。俟北事稍平，重回津沽。徐司铎来徐州，住数月而归。

“六月初四日，杨、赵、吴三司铎（皆华人）出大名城后，堂内尚有范、孙、齐、安、金西司铎五，又中国明司铎暨冀修士一人。是晚地方官突出一计，将教堂封闭，守以兵，教士仍居其内。王镇军来堂，信口铺张，力任保护，自云‘万一有难，则本镇不姓王矣’；不料王出前门，匪已破后墙而入，幸为数无多，立即驱出。初五日早顽徒又至，兵逐之。午后民众大哗，入屋抢物。两县令当众责匪，始得安谧。初八晚官言：‘奉上游谕，守堂之兵行将北上，贵教士必须出境方可保命，否则后祸堪虞。’爰议往山东曹州，发兵护送。初十早三下钟，六西人出城，以大车六辆装载人物，兵惟二十餘。六下钟，出城十餘里。及渡御河，兵大半回去，仅留十二人。登岸未久，突来乡民一群将车马衣物抢去；兵力劝，始以四车还之，已不堪狼狽矣。行至南乐县，范司铎入署请见县令，县令不纳。范言：‘吾侪此来奉道宪谕，地方官有保护之职。’县令不得已，增发数兵护之出城，饭店、客寓无一敢纳者。及至城外，顽童无赖辈揽路呼杀，不许前行。一介奋勇呼喝，始获出险。比至南乐边界，七、八兵又回。匪乃麇集，将前次抢剩之物席卷一空，所遗四车则夺其二。行未远，又有人来夺二车，至是不能坐，惟步行而已。住宿田间，以湿地为床，日藏荆内，夜行数里。卒至赵家庄，与会长马大司铎同处，静待机缘。大名府总堂尽拆，寸砖不留；地基掘深数尺，教民饿死者甚众。”

“威县教难”

“威县城北五里马家庄有教堂一，附近有教友十馀家。五月下浣拳匪将教堂烧毁。六月二十五日匪又至，以教民家财产房屋拆抢一空，将奉教男女十馀人掳至大宁村，是为拳匪群聚之处。比晚，本村教外亲属前来保释，但须先背教。三四人背教而归，其余老少十人于二十六日早拉至大宁村西首，举皆受杀。内有一十四岁之女孩，刚决殊恒。拳匪初不欲杀，劝其背教。询其有婆家否，女答云：‘已与魏村订亲。我乃老奉教，至死不背天主。’并劝他人甘受死刑。匪割其一肩，问：‘背教否？’女曰：‘否。’匪又割一肩，女仍不肯教，卒斩其首。此女姓王，洗名亚纳。”

“魏村战事”

“威县一带奉教最早、教民最多，县城东北约十八里，有村名魏村，教民千馀；正北四里有赵家庄，教民八百许；正东三里有潘村，教民四百许；三村鼎立。魏、赵二村皆有本堂司铎，时常驻守。……庚子年拳匪盛于北方，蔓延而南。魏村周围，教民之村为数不少，然村小人稀，拳匪大乱时力不能支，遂齐入三大村。六月中浣，拳匪大会于大宁村，距魏村仅五里许，声言灭教，势甚汹汹。魏村本堂万司铎召集本村首事人，授以战守方略，将兵器枪炮皆以圣水祝之，求天主助战。挑选壮丁六百馀人，分为四队，每队百馀人，各持精械利器，沿村护守。村中树上悬挂灯笼，以便夜间巡查。教民壮丁各以白布为冠，冠上绣耶稣圣心像，日间操演。六月二十一日午后四点钟，拳匪大出队伍，由大宁汹涌前来。教民遥见之，急忙整队而出，前往迎战。匪见教民有备，未敢轻犯，整队而回。二十二日九点钟，匪复出大队前来。时万司铎为众人念赦罪经，力劝死战，为天主致命。教民惧拳匪围村，亦排队而出，挺然相迎。相离半里许，各放枪炮，皆无甚死伤。惟一匪不慎，自燃其炮，旁有火药，伤炮手数人，匪即狂呼乱叫。时已日落西山，且以小雨濛濛，纷纷散去。教民亦收队回村，金曰：‘拳匪今未得志，势必复来，不可不严为防备。’……拳匪……乃求助于威县官长。县令孙某发兵数百，并出大炮数尊，前来助战。大宁富户出钱募得贼匪若干，大张声势。二十四日早六点钟，兵匪齐来。教民见之，急忙携炮持枪，阚如哮虎，出村迎战。时有潘村教民百馀人西来助战。督战者为文生张殿英，一马当先，大声誓众曰：‘弟兄们，世财无用。今宜献生命于天主，我等皆发上等痛悔，念天主耶稣云云，为天主致命可也。’时万司铎及本村李司铎安多尼同在阵中。……酣战至十点钟，兵匪死伤不少，势将败绩；忽别生诈计，遣数百人往钟官营村烧教堂。该村在魏村西南七里。匪意欲教民西去救火，便可乘虚直取魏村，杀妇孺，焚庐舍，则教民无遗类矣。岂知教民已窥破其计，见圣堂火起，忿勇有加，攻匪益力，连次开炮，毙匪数十人。匪放护城大炮，力能致远，然发弹过高，皆未中。有一善猎者，名李维兴，谓教友曰：‘匪炮甚巨，非拼命夺之，万难取胜。’爰率数人，自东面放枪，斜击放炮之兵，中而倒者数人。匪见事急，自沙西村东首开一巨炮，因纳药过多，霹雳一声，巨炮炸裂，击死多人。匪见村北炮手皆倒，村东巨炮已裂，死伤亦众，遂灰心丧胆，弃炮拽兵而走。教民乘势追杀。赵家庄教民遥见兵匪败走，亦出同追。是役，教民夺取大炮三尊，拾枪三十杆，长枪大刀不计其数，逃匪之履二百馀双，乃收队而回。……二十六日早五点钟，兵匪复携大炮来攻，教民迎战。兵匪分二队，一在沙西村之西，一在村东，两路齐攻；教民以炮弹相赠。大战移时。冯司铎亦在阵中，劝教友悔过死战。魏村教友不惟勇壮者陷阵冲锋，奋不顾身，即妇孺辈，亦多于弹雨中为交战之父兄送食送水，无所畏忌。……此番交战，教民得利，以七炮并发，声若雷震，且乘烟雾弥漫追杀匪人。匪不能当，遂弃炮而走，时约八点钟。赵家庄教民自北方来，如虎似狼。于是三村教友齐追，直至大宁村头，匪乃转身前来与教友鏖战。别有数十人追匪至大宁村之东，与匪苦战。……村北之教友亦拼命厮杀，匪力不能支，一败涂地，逃入大宁西头。教友连开数炮，拳匪惊走，巢穴已空。匪胆已破，自是不敢再战矣。统计三战，魏村得大炮三尊，潘村得一尊，又得大旗十馀杆，洋枪二十杆，枪刀子药无数。本堂万神父督队而回，入堂谢天主。按：拳匪三战三北，共死数百人；而教民除一广平教友外，无一亡者。”

“清河县教难”

“冯、张二司铎传教清河、南宫。冯司铎以教民困难万状，因忧而亡。张司铎助信友过劳，数月后亦去世。清河教堂被焚者三十馀座，教民受杀者数十人。”

“肥乡教难”

“肥乡教堂、公所凡二十馀，无一留存。贺司铎传教其地，自张洞逃至山东坡里，自坡里逃至胶州。后乘轮船至上海，避难数月而回。”

“浪子桥教友致命”

“……衡水县祝葛店乃司铎等由总堂往广平府、大名府必由之路也。村人见司铎等过路时每在车中念书念经，从不似官商等车中东瞻西望，心窃异之：始以司铎等为好人，教为好教。又有教堂送信人李维兴，每月必经其村、住其店，屡以天主教事相问答，李又善劝，遂有六、七家人入教。庚子春又添一学教者，名张怀禄，心甚诚切。……初乱时，匪执之，罚出钱即出钱。后匪势愈炽……卒被擒。匪问：‘是教友否？’曰：‘前数日尔辈罚我出钱，若不奉教，何为出钱？’匪遂杀之。”

“武邑县教难”

“拳匪闹教武邑，各处抢掠毁烧，杀死教友男女老少共一百三十八人。”

“赵、路二神父致命”

“赵神父席珍，法国勃邦克人，生于一千八百五十年西正月二十二日，洗名勒米。有兄弟二人皆授司铎，有妹一人入仁爱会。父为训蒙师。……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十月入大修院……后决意入耶稣会，遂于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西十一月二十日入会。……公晋铎后驻猷县张家庄九年。始为大学堂副办，后升为主办。学生百馀人，为他日传教指臂，学成而出，或为信人领袖，或为教堂司事，或入修院攻格致、超性诸书，卒成司铎：则公之职攸关綦钜，而公之供是职亦尽老尽瘁，余力不遗。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五月，公为总司铎，赴赵家庄一带综理教务，首尾历三稔。庚子春，拳祸顿作，有教友议购军械，力拒匪徒，请公为首倡。公曰：‘械斗非我所长。愿尔等善行告解，以备不虞，致命以邀天上荣；是乃上策，此外皆计之左者。’一千九百年西三月间，公犹致书西国云：‘教务似有转机，致命良（绿）[缘]又交臂失之矣。予一月以来行四规事，讲道听告，查问要理，日行不辍。中国教友之热心者伟行多多，未可竟日语。倘吾辈教士胥成大圣，如圣沙勿略，则中国外教早已归诚，而教友亦胜于今日矣。’是年西五月三十日，公发一家书，大旨谓：‘越来匪势稍挫，改名红灯照，随在广行。官长阳禁而阴纵之。加以大旱日久，至今未雨，男女教友守大斋以祈甘霖……’是年六月十六日，会长马大司铎念赵、李二神父积劳已久，召回总堂，藉以休养。时已拳团广布，在在劫掠。十七日午刻，张家庄院长谓赵公曰：‘匪势日昌，不久将不能行，不如速回赵家庄，毋任他教士无所禀承。然去留凭君自定可也。’赵公曰：‘鄙意亦然。’乃当夜起行。李神父欲随之，因只得一车，赵公独往，时已子夜一下钟。比至武邑城，匪势极盛。翌日午后五下钟，群匪入堂，杀公于祭台侧。”

“路神父亦法国人，生于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西五月二十二日，洗名毛代斯多。先后肄业于大小修院。年二十五入耶稣会。……一千八百八十年来中国，学语毕，传教于吴桥、武邑等县。……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冬，山东大刀会改名义和团，蔓延直隶。时公在武邑，艰苦不能悉纪，遇险亦至再至三。然未尝避，与教友数辈仍处武堂。乡间有教民家为匪所劫者，公请官究之，藉以稍安。五月初拳党横行，肆无忌惮。廿二日，群匪入武邑城，逼县令释在禁匪人。县令不得已，释之。是日早赵公席珍自总堂来，见拳众汹汹，抗拒官长，知教堂之难已在指顾间，作书报上游，备述壹是。廿三日午后，钟鸣五下，群匪蜂拥而来，喧闹击门。先以木撞，继以火烧。堂中先生与佣人五、六名亟取洋枪数杆，向前抵御。路公禁止曰：‘不必抵御。尔等各寻生路可也。’六人闻门外喊杀声不绝于耳，势极汹涌，行将入内，遂皆傍墙走，或匿邻家。路、赵二公入堂求主，献已性命。未几，有绅士董某令人举刀破门，门遂开。众匪一拥而入，不见一人。惟见二教士于堂中跪祭台前，立即枪刺刀砍，登时殒命，又割其首级悬挂东门上，埋尸于城墙下。迨事平后，董某亲诣猷县归二公尸，刀痕枪孔，凿凿可睹。行追思礼毕，与步主教棺材一齐发丧。时法兵犹在猷邑，高参戎率麾下兵送葬于云台山。二公致命处，县令建造一堂，规模宏（厂）[敞]，万分华丽。令撰联曰‘惨死同犹太罹危，惟闻十字归真、基督宗风尊大地；释仇是保罗遗训，尤愿九原垂鉴、摩西诫律化吾民’，扁额曰‘神依帝位’，取升天之意。虽与教理不甚合，姑存之，以昭郑重。又觅巧工绘二公像，高四、五尺，宛然如生，悬挂于壁。”

“景州朱家河教难”

“朱家河地方有大堂一，村中教友颇多。六月初六日始筑围垣，景州、东光、吴桥、阜城、故城、武邑、交河等县之教民齐来避难，多至三千人。任司铎见粮食不足，求售于教外民家，皆不允。十一日汤司铎自故城来，亦即寓此。十八日以后拳匪二千人携大炮来攻，连四日未破，反为教民所挫。二十一日江西臬台陈泽霖率勤王兵二千五百道经朱家河，景州刺史龚寿彭与城绅等请陈助战。陈许之，发兵来攻。时方午，值堂中用膳。闻报兵匪已来，教士等撤食赴垣，竭力防守。兵以克虜伯炮攻堂，未破，炮弹自堂上飞过。比晚，兵入邻村食宿。教友有洋枪百枚，愿携枪送两司铎回献县，两司铎不可，谓：‘我侪可去，汝辈何如？虽死不忍离焉！’二十二日，官兵大股至，将教堂围绕，放大炮不止。教友名朱三会长者，有干才，立于垣，方欲发炮，火自炮后出，适中其胸，登时毙命。任司铎立甚近，幸未及难。……任见兵匪云集，教民无粮械，不能持久，发一人递书禀报总堂。二十三日，兵开炮隆隆，不绝于耳。汤司铎所居之室，洞穿于顶，堂南之屋已不可居，妇孺皆入堂，饥则用干粮少许。二司铎日夜在垣，或劝勉或赦过，间时入堂，铺席更衣所，略为休息。堂中水井在垣外，不能汲饮，甚苦之。廿三夜，教友逃出者颇多，廿四日均为匪所杀。是日早七下钟，兵匪破垣入，先掷火药包，令人不敢前。俄顷，兵匪突至，见人即杀。垣上庭中，教民皆倒地死。有妇女在屋中场上者，多被抢去。堂中教友已满，而来者尚稠，不获入，簇聚于堂庭内。兵升屋放枪，顷刻尸横满地。任、汤二司铎分立祭台两旁，面向司事、教友等。任司铎一再劝勉，为之赦罪，汤司铎高声诵《悔罪经》，教友和之。不旋踵，兵抵堂门。一放枪，妇女惊甚，欲出逃者升人肩。任司铎喝曰：‘忍耐！勿慌乱！各在本处！稍分迟早，无甚关系。不久我侪天堂相会矣。’……兵放枪不止，烟雾飞腾。匪以火油灌草席秫秸上投掷堂中，俄而火作，烟气逼人，不能呼吸。教民未死者奔入更衣所，拆去小窗，向外投跃。为匪瞥见，次第杀之，惟数人得免。其述二司铎死状，大同小异。或谓二司铎各受二丸，登时殒命。或谓任司铎惟受一丸，倒于椅，司事扶之起，复倒而亡；汤司铎受一丸，或受二丸，咸谓其跪地而死。堂中之众或中弹死，或火闷死；在屋顶者或死于火，或顶颞而跌毙。难平后翻出二公尸，已不可辨认。计朱家河同时致命者一千八百人。”

“路家庄距朱家河一里，亦有一公所。陈泽霖与勤王兵驻扎此庄，朱家河男学生被掳至此。嗣有朱堂逃出之友五十人于廿三日午后受戮，葬之庄外……”

“距朱河不远有青草河教堂，归周、潘二司铎管理。曾与拳匪接仗二次。……六月廿六日陈泽霖发一告示，命青草河教友背教。教友不从，请人代却之。”廿七日陈带兵北上，将青草河女学生自十岁至二十五岁者皆带去，直至北京，后仍放回。女生言在途在京陈派兵善守，未任匪人入室。陈军至献县，有人请攻张家庄，陈以‘军火不足，急须进京’却之。

“朱家河女学堂中有一井。兵匪乱杀之时，贞女多投井死。井水既涸，后投者不得死，匪出而斩之，仍投于井。事平后捞出尸首数具，臭不可当。乃塞此井以为孤坟。”

“故城县共死七十八人……”

“吴桥县共死二百零九人……”

“东光县共死八十七人……”

“宁津县共死十一人……”

“综计直隶东南全境庚子被害死者：教士五人，教友二千九百余人，学守教规者百余人，孩童遭难及饥饿死者亦百余人。”

“直隶西南境”

“正定府一带，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始设主教一员。全境住堂九，总堂在正定府。会所三百八十八，公堂四十八，小堂二百五十六。西教士十三，华教士十九。修道院二，院生四十七。小学堂九十七，内六十为男学堂，三十七为女学堂，男女学生共一千四百十二。师范学堂二，一男学堂，男生二十一；一女学堂，女生四十三。又有小学堂七十七，学生八百零七；中学堂三，学生七十一；育婴堂六，收养婴孩六百廿五口。又有婴孩八百五十七口，寄养教友家。安老堂二。养病院二。施药局四。圣保禄会修士七，皆华人。仁爱会修女九。圣若瑟会修女五十二。全境教友二万七千余。”

“正定教难”

“正定主教共管三十二州县教务。十馀年来，民教辑和，教案稀少，从无焚杀拆抢等案。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有官庄村教友姜自发到孟家庄^①索迤，被拳匪拽入庙中，勒令背教。不从，为乱刀砍伤，命在呼吸。林大司铎请县令办理。县令胡明府锡纶请正定镇董军门履高督队痛剿，枪毙十三人，馀众悉散。……二十六年……四月底，东拳党将吕家庄教友高大霄、董老若两家房屋焚毁，官未之理。旋复将西曹家村、东里庄等教堂齐付一炬。匪渡滹沱河而北，将深泽之梨元石桥头、赵八庄、秀武与无极之庄里、大陈河流稔村等教堂或拆或焚，均成平地。北拳党自唐河而南，将定州所属之罗庄堡、唐城台、潘村、阜头庄子、位寨、里内化等四十馀堂，及曲阳之羊马、宿家庄、河柳、殿头、新庄，新乐之小吴村、都寺曹村、十三里等村教堂皆毁抢。芦汉铁路勘道洋工师李嘉乐、墨士德谷透、管理桥工恺梯毕纳第等均来正定堂中。时谣言甚炽，揭帖遍张，府堂岌岌其危，有朝不保夕之势。众教友见祸及燃眉，群聚于大教堂之村，冀保性命；在北者聚于车寄、桥寨两处，在东者聚于躲墩^②，东南之人聚于唐邱；而家中财物抛弃净尽。五月二十二日，北路拳匪一万馀，带炮六尊，枪刀无算，围攻车寄。教友能战者仅二百馀人，拼死抵御。拳匪败走，死者七十四人。教友惟死一人，且系误伤。相持七下三刻之久，夺得军械颇多。是日东拳因抢姬庄教堂被教友截击，亦大败而走，死者七人，有同胞三人齐歿焉。廿七日，东拳又被教友还击，匪死五名。是日之晚，府城铺户门首各涂黑圈，相传为红灯照仙姑所为。六月初二日，东拳一千四百馀人抢周家庄教堂。躲墩村教友往救，在捏盘村南首相遇，互击四下钟之久，拳匪始退。教友且战且进，直捣棚头村义和拳老巢，毙匪五十四人，伤者不计其数，教友只伤一人。初三日顺德城内教堂被焚。次日邢台之翟村、脑上、浅井，沙河之南部等教堂均毁于南拳之手。别有拳匪一股从山东来，将钜鹿、隆平二十馀处教堂全行焚抢。初五日，新乐拳匪被闵镇村教友还击，死者十三人。初十日无极拳匪围攻黄台村教堂，被躲村教友击死五人，拳厂亦即捣毁。……十四日九下钟，定州拳匪会同官兵及衙役人等约五千人又攻车寄村，炮声隆隆，终日不绝，至晚八下钟始散。次日清晨又整队而来，官兵更多，皆用十响毛瑟枪，颇能及远，教友中弹毙命者五人，伤者十一人，至晚九下钟始退。张司铎延安见火药将乏，人已多伤，遵主教前出之命，率同教友乘夜逃出。行三十馀里，到新乐之陈村，被高棚村拳匪截击，教友死二十三人，被夺大车四辆。旋有定州大股悍匪从北路追来，教友四散逃命。幸有桥寨村教友来迎，与拳匪大战，车寄教友始得陆续到桥寨。此六月十六日事也。是日东拳又与躲村教友大战，败北而逃。教友将西汪村拳厂剿除。宁晋之段家庄亦于是日匪来围攻，幸唐邱教友往援，得免于难。黄儿营教堂房屋全成灰烬。十七日正定迤南教堂全行焚抢。正定镇标兵丁出城迎接拳民，四门贴关羽像，派人把守，民人出入均须磕头。为限制教民地步，阖城之人皆首戴红巾。教友均逃入堂中，洋人李嘉乐等之随人潜行逃去。主教见势极危，一面伤备一切以资自卫，一面电告上海法领事设法拯救。至晚，正定镇台来堂，促洋教士即日出境；育婴堂女孩交县官看管，否则炮声起处，数百生灵无生活趣。正定县令与教士交素善，是晚亦来逼教士出境。二十日未见举动。后探悉十八日晚十一下二刻钟督办铁路盛大巨宣怀电飭正定镇军保护教堂，毋任洋人被害，故得稍安。此数日内，外间谣言谓教友均须反教，惟未见官谕。间有二、三处绅士劝教友反教者，教友峻词拒之。当官反教者，阖境惟一人。二十一日，正定县致信堂中，言李鸿章奉调直隶总督，天津业经停战。二十五日，东拳党不下万人，加以晋州马队来攻躲村教堂，势甚汹涌。教友冒死冲出，大败拳匪，得其物无算，除军器外，有蜡烛八百馀斤。盖拳匪来时皆誓言不破不休，当夜以继日也。二十六日正定镇军抄送京报廿四日谕旨，着保护洋人及教堂，铁路洋人闻之欣喜。

“七月初三日，有南来拳匪四千馀到平乡县闹教，朱大令家宝督战于范家庄，斩匪无算，馀众悉溃。自是南拳党不再成队矣。是日前山西臬台升允督兵过正定，派兵到堂巡查，以杜兵勇闹事。初六日北拳党七百馀人烧新乐闵镇村教堂，误杀二十二人，均系外教，因教友已闻风出躲矣。次日匪烧王村与行

① 属宁晋县。

② 即躲墩。

唐之安香两村教友房屋，因畏桥寨教堂出援，故匆匆散去。十一日孙中堂家肅过正定城，见天主堂尚在，谓众官曰：‘有此堂即有此城。’自是府城绅民保堂之意愈坚。十三日有教友送告示一纸来堂，乃新乐县孟广瀚抄奉觉罗廷雍之谕。他处间有贴者，类皆虚应故事。且有某县令召教友四人谓之曰：‘尔等万不可反教。如果反教，则自绝生机矣。’十六日，东拳党到赵位村闹教，经躲村教堂派人赴援，拳匪一败涂地。自是东拳党悉灭。七月初十以后，北来逃难之商民络绎于道，逃兵溃勇无日无之。北拳党、西拳党闻上游战败情形，亦即自散。教友乃各回本家，收割秋禾。各处官长亦即善待教友。惟定州、曲阳两处教友房屋多被焚毁，迟至十月中始回家安业。全境传教士无一受伤者。惟张司铎延安于六月十六日在陈村途次几遭不测，行李全失，亦止受虚惊而已。教友死亡及不知下落者共一百四十七人……

“统计教友房屋焚毁者四千二百馀间，失财物约值银八十万两。闰八月二十三日联军到正定……办理教案，地方官与包主教面商办法，将应赔之数竭力核减。未至年底，一律了结，并不^①立合同字据。”

“蒙古教难

“蒙古初无教友，后有直隶教友数家不知何年迁往其地，或以耕田谋活计，或避朝廷禁教之令。北京教士闲时一往巡阅，藉行教礼。一千八百三十年京中禁教尤严，教士无匿迹地，赴蒙古西湾子居之，教友随往者殊夥。于是教行日广，信友日繁。阅八年，教皇派方主教兼理满蒙教务。一千八百四十年专设蒙古主教，承其任者为孟司牧慕理。会北京主教辞职，教皇以孟主教兼之。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蒙古又设一主教。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比利时国圣母无玷圣心会司铎来华传教，教皇以蒙古教务委之。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又析蒙古为三境，派三主教分理教务，于是有东蒙古、中蒙古、西南蒙古之称。

“东蒙古

“东蒙古为热河一带地方，南界长城，东与北毗连满洲木柵，正北越辽河上流，西界直隶宣化府。东西约九百里，南北千馀里。全境教友九千馀人，新守教者二千五百人。住堂十三，会所一百十六，公堂十六，小堂十三。叶主教总理教务。总堂在松树嘴村。西教士二十七，华教士八。修院一，院生二十。中学堂二，学生六十二。男小学堂二十五。女学堂四。育婴堂六，收养女孩三百九十馀，寄养人家者不在此数。

“东蒙古教难出于权臣阴谋。此方民教素睦，二十年来无甚争端。热河全境害天主教者系拳匪及在理教人，蒙古人与八旗人参入其间，各居其半。……全境分南、北、西三段。南即朝阳县。……朝城南九十里松树嘴村，总堂在焉。

“西段为建昌县、平泉州、滦平县。建昌、平泉教民无几，散处各方，且奉教未久，信心未固，不可以恃。故该管司铎暂回总堂，以避锋镝……

“平泉一带教民未遭荼毒。惟教士住堂为逃兵抄掠，并欲焚之，因州官一再乞情，故未火。

“有分堂二，一在深井，一在塔博落洼。深井在平泉城东北，距城二百馀里。教堂落成未二载，为拳匪所焚……

“塔博落洼^②在平泉城西北，距城三百馀里。造堂未竣，悉归灰烬，被杀者十人。

“热河西七十里地名老虎沟，属滦平县。高宗纯皇帝出猎获虎于此，故名。孟主教慕理购地建堂，聚教民居之。其沟在两山间，草木蕃昌，最易避难。光绪二十五年秋，司司铎^③、武司铎^④奉派来此管理教务。二十六年五月，教友闻灭教之谣，商诸二司铎，购备火枪、长矛各若干，为抵御拳匪之计。匪以谋反控于官。滦平县令发差两次来访，知堂中无备，乃于六月十二日发郭姓武弁率旗兵五百名前来灭教。是日弥撒中，武司铎降福婚配六耦，皆婴孩院中女子。弥撒毕，有人报官兵大队至。司司铎登山逃避，

① 疑为衍字。

② 原随文注，蒙古语，译言平原广(厂)[敞]。

③ 原随文注：西人。

④ 原随文注：华人。

武司铎独留堂中，贞女及婴孩六十口早已投林。郭弁进堂拘武司铎暨教友八人，持鞭毒打，逼问金银何在，后押送滦平县署。司司铎则昼避山林，夜入教友家少觅饮食，安慰信众。婴女被外教抢去者七八口早经索回。十五日武司铎自县被解府堂，讯二次。府尊逼令背教。武司铎答曰：“我六世奉教，现为教中司铎。设我背教，其余教民更将如何？”官闻之大骂，污言秽语，不一而足。司司铎在老虎沟，官役查拿甚急。教友以贫乏无财，官差不甚顾问。然则教友可安，而神父不可安。于是司司铎与教友商议，不如往粮捕厅暂避危机。遂于六月十六日，司司铎率教友二人起行北往。为红旗大沟赵士奇所知，突令十二人追来。赶至石河连土沟地方，将司司铎与二教友捆绑，打骂交加，重伤司司铎之头。其捆绑之式，以右手连于右腿，左手连于左腿，中间穿以木杠，舁至辽营大庙中，绑于旗杆上，饱以老拳，绝其饮食。次日送交承德府图获奖赏。武司铎先在府署。府尊伤将司司铎锁以镣铐，与武司铎、八教友同禁一处。越二日，府尊将二司铎、八教友发解热河都统署。都统命去刑具，分押两处，不准相见，饮食则全无。幸有教友张真等扮作小贩供司铎等饮食，藉以度活。次日都统将四人发回府署。六月二十五日，府尊将司司铎发回滦平县，以二十兵护之，一路带有刑具。比至，县令文星下之狱。武司铎与八教友仍留府监，适管监者系北京教友，暗中待神父、教友甚好。至九月间，俄兵到锦府，叶主教请都统释武司铎与八教友，始得回堂。

“六月二十八日，文星提审司神父，诬以挖眼剖心、奸淫妇女。卒云：‘送你先回老虎沟，不日解你回国。’是夜一更后，有张、高、赵、戴、朱五人将司司铎拉入车中，推至滦河渡口。先凿一深坑，推司铎入内，填以土。司铎力撑而起。匪举铁锨砍其头，遂不能动，活埋而死。尸被水冲出至偏桥子地方，教友欲收葬，被人告发。官不许葬，复投之河，不知所之。”

“中蒙古”

“蒙古教务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分为三境，于是中蒙古特设主教管理教务。全境教友一万八千四百九十三人，新守规者四千七百八十四人。公堂二十八，小堂六十八。境分四乡，每乡有住堂、会所各若干，以西湾子为总堂，领四十八会，以八教士分理教事。西湾子教堂亦领四十会，以十一教士分理教事。岱海教堂领本处及土默特，共二十二会，以七教士分理教务。后坝教堂领十六会，以三教士分理教事。总计西教士二十九，华教士十四。修道院、公学院合为一所，院生八十。男小学堂四十，男生八百。女小学堂二十六，女生一百二十。育婴堂九，收养女孩一千六百二十口。男保守学堂四，教男保守人三百余。女保守学堂四，教女保守人亦三百余。教友散居三百余村。

“庚子拳匪仇教，将教民房屋焚毁殆尽，教友被害者指不胜屈。住堂十二、小堂三十、育婴堂四、学堂数十皆毁灭无遗。”

“张家口与山西之兵借各处拳匪均欲攻西湾子总堂。惟堂中聚教民五、六千，防守甚严，是以未敢轻犯。某日兵匪合聚出口下坝，欲赴西湾子，适河水涨溢，汹涌异常，未果。总堂既保，其分堂除高家营外，亦获保全。高家营在张家口东二十里。村中平民多于教民，为拳匪群集之区。本堂高神父见教民概避西湾子，已亦随之。六月十五日，匪首杨旺等串通裕库二兵与万统领部下二兵，领拳匪数千，将教民徐大贵放枪击毙，将其弟三贵举刀劈死；以堂中祭衣、祭器各种实物抢掠一空。……教堂及教民房物尽归灰烬。有圣婴会小孩七口，亦投火烧死。”

“姚巴尔纳伯神父传教于西湾子西南九十里。六月二十五日午后五下钟，神父方听工，突自二道河镇来拳匪五、六百人，手持刀枪，势甚汹汹。姚命闭门，教民齐登房顶。匪至半里之遥，大声呼杀，一拥而前，转瞬已至，距堂仅十馀步。姚一呼开仗，教民出战。匪不能支，立即奔走，堂中未伤一人。明日拳匪大队复自二道河来，约六、七千人；乡民随之，多至二、三万人。时在午前八下二刻钟。匪既近，复行开仗，匪又败走。然不即散，终日围绕堂周，有再战之意。比晚六、七下钟大雨，黑云布天，拳匪始散。

“地名廿三号者，小村也。距西营子九十里，聚男女教友一百二十人。有育婴堂一，内小孩一百七、八十口。去此不远别有一教友村，地名三十号。拳匪来攻时，教民聚于二十三号村，未伤一人；惟二十四号村房屋被烧数十间，教友未受伤。是役也，拳匪器械及大旗等俱为教民夺得，匪中死伤之数不知其详；教堂所失惟土房几间而已。

“六月十六日，宇嗣安神父在窑子沟地方接二道河某官函，逼令三日内回国，教友均须背教。神父不答。十五日拳匪来攻，官躬亲领队，教友力拒之。获胜仗，伤匪六十人，毙十七人，匪首与焉。……以后数日间，西营子相近与七苏木各教堂均被焚毁。有女教友若干藏身山洞中，匪强之出，不从；乃架木洞口，举火烧之，尽死于洞内。姚神父所营育婴堂一，颇兴旺。六月二十五、六日拳匪来攻，未陷。神父知力不能支，致书西营子，请教民往援。宇神父率教友百人持械往救，多备车辆，为载运妇女、婴孩之用。比至，孩若女悉行登车。时值多雨，行路维艰，不胜跋涉之苦。比夜，停车田畔，彻夜醒守。翌日到西营子，皆无恙。时西营子教民集至数千之多，拳匪未敢轻犯。”

“河南北境

“河南北境于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始设主教一员，管理二十五州县教务。教友共三千人，新守规者一千八百人。住堂九，会所五十二，公堂四，小堂三十。总堂在卫辉府……

“庚子五月大旱，粮食昂贵，贫民糊口维艰。山中教友千余人汲水于二十里外，其困疲可知。六月初二日，卫辉府太守突将本城二教士驱出。……初五日匪至武安高村，以大堂、住屋、学堂、育婴堂、习经馆等先抢后烧，顿成焦土，附近二百余教民之屋亦归灰烬。阅数日，远近四大堂、十小堂与一千五百教友之屋同遭火劫。教民无地栖身，入山图苟活。育婴室中女孩五十口与女师人均被出鬻。二教士扮作铜匠出逃，幸免于难。彼处有一教士坟，匪发之，碎其尸，为狗所食，十四日，匪拆涉县境大小教堂暨三百教民之屋，教士闻风颇早未遭害。自是数日间，武安、涉县、临漳、汤阴、内黄、滑县等处教堂尽行拆毁。……除林县一室外，无一存者……七月二十八日匪杀武安教民三十许。……十月初，大难始平、主教、教士回林县教堂。”

《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临清济宁沂州卷”辑：

“1901年2月14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廿六日)邱县会禀称：

“卑职瑞祺奉檄到县，遵即会同携带钱文亲诣被扰各庄，挨户复加查勘。查得县境共被扰教民三十四户，被伤人口共八名，焚烧拆毁砖土房屋共二百七十八间。惟其中有人口被伤死在外境者，有已报死而仍现在者，有屋被烧拆系在去冬今春已蒙抚恤者，有一户而分父子数户者，有直省教民在县境生理被抢者。虽核与陶副主教单开稍异，但体察情形皆属被扰。自应不计今昔，不分畛域，一律抚恤，以免向隅。虽卑县现在库无闲款，而事关大局，不得不竭力设措其抚恤之法，谨按本州抄发章程，以伤毙人口烧拆房屋者为极重房屋被毁并被抢掠衣物者为次重，房屋完好仅被抢掠衣物者为又次重。每户例恤京钱十吊，伤毙人口每名加抚京钱十吊，烧拆房屋一间至九间加抚京钱五吊，十间至十九间加抚京钱十吊，二十间至二十九间加抚京钱二十吊。查完一庄，即行抚恤，当场亲领，不假书吏之手，均具有领状附卷。计共放过京钱六百五十千文。该教民等皆喜出望外，俱欣然领款而去，并无争多嫌少情事，足以仰抒先廑。除由卑职惠霖再行详查，如有遗漏，后续行呈报，自当随时照章给恤，并严缉单内有名匪首牛九州等务获讯办外，所有卑职瑞祺奉委缘由，理合造具清摺驰禀大人查核。

“再，前次查封拳匪房屋既少且陋，急切实难变价，合并声明。”

《西湾圣教源流》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牧》第一节《论义合团时期中的西湾子》载：

“在庚子圣教窘难那一年，方主教已就职视事；那时拳匪也来扰害他教区底堂口。拳祸以前，中蒙古计教友一万六千；拳祸当时，计死去教友一千八百名，五位教士致命，几座圣堂亦被焚毁，好些教友遭大窘难，西湾子倒称无恙，但她这一分区有高家营和五号两村遇难。

“那年六月内，有极盛的谣言。主教勒命四围教士回总堂，司铎和信众作一相当防卫。到六月二十三日，有一比籍钱某原自西北返北京，因拳匪变乱，半途隔留来此。钱某原本一军队团长，他在此便帮行防匪事宜，令教友打岗子，挖战壕，组织年轻人为一队军人，也指定每人守岗位置；教友们因钱先生底指导，勇敢不怕了。有几次谣言传来，义合团要来杀教友，顶厉害的谣言是七月十二日。那日晚八点，有人来报告，在山坡上距此七八里有三几十个人马。站岗底守卫人喊说‘义合团来啦’，因此大堂就响钟，钱先生和教友都去预备应战，老幼男女及妇孺辈麇集大堂中。方公论此事变记云：‘我见着教友进堂，他们没有嚷唤，也没有张惶；好些人过来的时候，求降福和亲权。若这急难不是来在今日晚上，还叫

人估量他们是进堂过大瞻礼。’教友在大堂公唱《圣母祷文》。不多时，有人来报告，说前者的报告是假的，本堂也转向教友声明，以后教友更热心唱《圣母祷文》，为感谢天主。不知为什么原故，西湾子有偌大名声，始终拳匪没敢来攻一次。我们蒙天主破格护佑，不但本村没有遭难，连许多别的堂口教友逃难到此也得了护庇：先有高家营底信友逃来，次有宣化底教士们、修道士们、修女们、婴孩和男女信友都逃来这里。到了耶稣圣心瞻礼，本处人数加多一倍。正在瞻礼日，方公照教宗圣意，将人类奉献于主堂中底人们更热切求主垂佑。到了九月初旬，村中人数多至三倍，至于神长辈竟得筹措饮食。以后拳匪渐渐地平息，教友也慢慢地各回各家了。

“五号村与义合团抗战，间接的保障了西湾子村。义合团焚毁高家营底圣堂，杀了几个教友，就估计来攻西湾子。到底河水陡涨，不能过来。以后他们绕道过五号村，烧毁教友几间房，也就远扬了。不几天，这里信友们也到五号村助防，抵御力便更大了。

“时局稳定之后，于九月二十五日，有堂里底车头一次下口。本月二十九日为圣弥额尔天神瞻礼，正是钱先生底主保，司铎和信友都庆贺了他，以后他也回了北京。到底教友还记念他。

“义合团闹教的时候，教友为得平安，多向圣本笃、圣米厄尔祈求。后来为感谢天主及两位主保，主教和教友在村西部修筑一座圣堂，名曰西堂，特为纪念拳祸时所得的保护。至今每届二圣瞻礼，在西堂必行大礼弥撒。”

第二节《方、蓝、石三位主教底事业》载：

“方主教上任不多时候就聘请了一位甘肃教士，名唤和羹梅，系一工程博士，为在西湾子建筑主教府。一千九百年前开始兴工。这座主教府系西式楼房，计长二十馀丈，有膀子楼四个，分三层。全楼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主教室和领账司铎室；第二部分为会长司铎和铎曹居室^①。新来的西教士也住在这第二部分，他们一年的工夫，或学中国方言，或被长上引领传教^②。第三部分为修道院，有教室、自习室和寝膳等室，还有一座体面的小堂。堂底前墙上有一块纪念石，刻有辣丁字云：‘这一座圣堂，奉献于全能天主及耶稣圣心，在中国圣教窘难时开工，到一千九百年后落成。’

“一九零零年五月十日，本处创设一座印书馆，为教中印行经本圣书等；一九三六年，在主教府前院，又为印书馆建筑了一列新瓦舍；一九三八年为便利起见，那馆移至高家营。”

附表(四)《自圣母圣心会接理蒙古教务以来所有代牧和副主教的史略》载：

“韩默理主教：(Mgr F. Hamer) 韩公一八四十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荷兰国奈美痕城(Nimegues)，一八六四年八月十日在乌得勒支城(Utrecht)升受铎品。一八六五年八月十五日入本会，与会祖南公一同发愿，又一同来蒙古传教，先在西湾子，后于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去了关东黑水区。司牧灵副主教回欧洲时，公又返回西湾子充作代权者。至一八七一年，公赴北京接来新副主教巴耆贤司铎，于是韩公在西湾子尽理账之职。一八七三年三月间公又回了黑水区。一八七七年九月间调任于关东下庙沟。一八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圣座颁谕，委公为甘肃代牧，负太米米大(Tremita)主教衔。当时韩公正赴西湾子，于半途接得此委任状。当年十月二十七日在西湾子圣为主教。十一月内即起身往自己的教区去了。一八八三年也给伊犁、新疆的教友打发了几位传教神父。河套底代牧德明玉主教驾崩后，宗座即于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三日令公充任，公即闻命，于当年七月三十一日离别甘肃赴河套就职。一千九百年义和团起乱时公令众位司铎往他处避难，自己独留二十四顷地。七月二十日被匪众捕获，二十四日惨然致命于托城南门外。”

《清末教案》第四册(《法文资料选译》)二、《传信年鉴》辑：

某圣母圣心会修道院长贺歌南(Van Hecke)神父的书简载：

“韩默理(Hamer)主教、海芒(Heirman)和玛莱(Mallet)神父被杀。韩默理主教是蒙古西南部传教

① 原随文注：从前会长司铎兼任本堂，不驻总堂内，自卜天德会长才驻节主教府。

② 原随文注：这是一九二零年以前为新教士底措置法。自一九二零年，本会在北京城另设一学院，新来的司铎都先到此院学习中国言语。

区的宗座代牧,他是1885年从斯格脱修会(圣母圣心会)派往蒙古的最早四名传教士中的最后一位残余者。他于1840年8月21日出生于尼梅克,于1864年8月10日受司铎神品,于同一年加入我们的修会,1865年出发赴蒙古。

“1878年10月27日,该神父举行派立礼之后成为特雷米特的领衔主教,于次年出发前往甘肃。1889年,他被调任到蒙古西南部的宗座代牧区。在去年3月间,他将主教府从西部地区迁移到东部地区,因为后一个地方的归化活动更为突出一些。

“海芒和玛莱神父的^①“均属于中蒙古宗座代牧区的东部县。

“尊敬的海芒神父于1862年10月24日出生于特尔蒙德(Termonde)附近的贝拉尔。他于1883年进入了斯格脱初修院,于1888年2月出发赴中蒙古的宗座代牧区。

“尊敬的玛莱神父于1870年10月14日出生于赫特尔—勒—魏克玛(林堡)。他于1891年9月进入斯格脱初修院并于1891年9月出发赴中蒙古。

“9月16日,从大沽出发的东蒙古宗座代牧阿尔叶步司(Abels)大人签署的一封最新电报,传到了斯格脱神学院:‘司神父(Segers)殉教,被一名官吏杀害。王神父被下狱。5个住院被焚烧。八沟地会口几乎被毁。在围场,13个基督教机构被焚,100名基督徒被杀。400人既无家可归,又无食物充饥。在松树镇,有20多名教友继续处于危险之中。’

“东蒙古宗座代牧区共有28名传教士,其中8名为荷兰人。主教本人是荷兰林堡威尔人。司神父(Joseph Segers)于1869年10月20日出生于圣—尼古拉(瓦斯)。1889年9月,他进入了斯格脱初修道院并于1895年9月出发赴东蒙古。他的传教同伴王神父自30多年以来便一直是司铎。”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一册《献县教区义勇列传序》载:

“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义和拳,或曰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夷考其实,则专以杀害安分守己之天主教民为能事。教民中惨遭杀害者,不可胜数,但献县教区竟达四千余名之谱。”

《任邱 段家坞教难记》载:

“序言

“……任邱县居献县教区北部,去保定、京、津一带较近,故教民所受之害较本教区南部大名、广平一带更重不啻数倍。闾县各圣堂、教民各住宅皆被焚毁,无一幸存。……段家坞一村虽孑然独存,然被围百餘日,死者百餘人。”

“段家坞教友之历略

“任邱城西南,约一、二十里,有村名段家坞,北有石家营,西有赵家坞与谢家坞,东有长洋村。段家坞居中,四村环绕之,势若星拱。各村皆有教友,唯段家坞较多,共三百有奇。姓张者居大多数,刘姓次之,乔姓、连姓又次之,约占全村居民十分之四。自奉教以来,已二百餘年。相传于前清康熙年间首先奉教者为刘姓家人,张姓教友原为娄堤村人,徙居段家坞后,与刘姓教友家结亲,遂进教焉。村中教友素称热心,信德坚固,历年来各神长皆重视之。任邱全县堂口不下四十餘座,然论人数之众多,教务之发达,当推段家坞为第一。当拳匪闹教之前,该村教友因住址的关系,分为东、西二堂,东堂较小,为刘姓教友祈祷的公所;西堂宽大,为张、乔、连诸姓教友祈祷的公所。庚子年间,东堂被毁,西堂仅存。教友避难藏身,筑垒自守,皆以西堂为根据地。迨拳祸平定后,东、西二堂合而为一,于西堂旧址建一规模宏大之圣堂,为全村教友与祭诵经之所,以至于今。”

“正洛及东、西八方被拳匪攻击

“任邱县内首遭拳匪之祸者,是正洛村的教友。先是于光绪二十五年冬,拳匪发难于景州、阜城等处,烧毁若干教堂,被军官范天贵等率兵剿办。乃沿途北上攻击献县城南东大过村教堂,被教民竭力抵抗,志不得逞,乃复北窜至任邱郑州重镇。……无赖游民附和者甚众。……于二月二十二日,围攻正洛教堂。村中的教民……登房自守,以火枪迎击,相持终日。拳匪未能得手

^① 后面脱字,应是“传教区域”一类的话。

“五月初一日……拳匪进西八方村后，将教民的财物抢掠一空，将教堂房屋付之一炬……转向东八方扑去。……一时炮火连天，枪弹如雨。……驻防军队……急忙前来弹压。及官兵来到，天已黄昏，拳匪因力乏退去。教友……晝夜动身，男女老少都逃往献县总堂或段家坞村来了。教友逃走後，官兵进村，将财物器具抢掠一空。”

“教友避难逃段家坞

“……任邱及河间各村的教友……纷纷向献县总堂逃避。然当时拳匪遍地，几乎无村不有，教友男女老少、人马车辆的数百里逃难，甚不容易。故河间县小店村教友中途被劫，死伤过半；肃宁县尚村教友行至商家林村，被活埋致命。各处教友闻此凶信，恐蹈覆辙，皆裹足不前。故河间北境，以及肃宁、任邱各处的教友，不约而同，皆以段家坞为避难所。相率而来者，如归市矣。”

“县长绅士劝教民反教

“庚子年任邱县知事姓王名蕙兰……非特不仇恨圣教，且常暗中保护。对于该县的本堂杜汝梅^①司铎，亦以礼往来，感情亦颇不恶。当年四、五月间，杜司铎在任邱城内教堂中避难。……王县长……先请神父避往天津，被杜公严辞拒绝。以后又请神父返回献县，且明言愿派兵护送，担保一路平安。杜司铎不得已，遂于阴历五月十四日被军官范天贵拥护着返回献县总堂。”

“教民第一次出战

“自五月二十三日段家坞被围后，无数拳匪麇集村内。……教友们晝夜应敌，不得休息，受伤而死者殆无虚日。且拳匪的粮饷弹药有人接济，不致匮乏。教友们困在核心，孤立无援，粮饷弹药皆无处去购买。与拳匪相持，天长日久必归于失败也，不问可知矣。拳匪知其然也，故不欲列阵交锋与教民决一死战，惟四面围困，为持久之计。……教友们……分壮丁为两队。……半夜后三更与四更之间，一闻钟声，一队自南面出战……别的一队自西面出战……将拳匪逐出郊外。”

“拳匪卷土重来，围攻较前益急

“……过了不多几天，大队拳匪卷土重来，又把段家坞围困起来了。

“大约于阴历六月初一、二日之间……拳匪却乘着那月晦的深夜……来到寨前。……幸亏了守寨的人多，一闻警报，蜂拥而来，有开枪的，有抛砖的，冒死进攻。及离得近了，有用刀砍的，有用枪扎的。……拳匪……退到寨外去了。此时间掌炮的炮手……冲着寨南井北填满了拳匪的小路，鼓冬一声，一下子打开了一道胡同，成千累万的拳匪才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去了。”

“拳匪围攻稍解，教民困苦愈深

“……段家坞绝粮以后，教友们因迫于饥饿，出寨去挑取野菜，被拳匪拿住置之死地者，亦不在少数。”

“段家坞解围，杜司铎归来

“段家坞自阴历五月二十三日被拳匪攻击，直至六月下浣，一月之久，势甚猛烈。过此以后，惟四面包围，使教民不得出外觅食，饥饿困穷，终成饿殍而已。最后因教友们不欲坐以待毙，第三次出寨猛攻拳匪的炮台，激动了他们的怒火，所以他们又各处传单，召集同党，筹备器械，作最后的攻击，非把土寨攻破、将寨内的教友杀的一干二净，决不甘休。正在忙忙碌碌预备进攻之时，忽见官差来到，带着公文，谕令拳匪解散，勿得再传邪术，聚众滋事，扰害教民^②。盖当时京师业已失陷，皇太后于蒙尘出奔时，为息洋兵之怒，又颁布了严惩拳匪、保护教民的上谕。拳匪们一听，明知道自己造下了滔天的大祸，罪不容诛，皆惊惶失措，纷纷逃散，不复与教民为难矣。

“及拳祸平定之后，法国军队到了献县，占据保定府的英国军队又扬言不日开往任邱。县长王蕙兰惊惶万分，乃委派专差亲赴献县，卑词厚礼的央恳临时会长葛光被大司铎速派杜汝梅司铎返回任邱，应酬洋兵，维持一切。……于阴历后八月及九月之间，杜司铎又到了任邱。当时城内的教堂因被拳匪

^① 杜汝梅(1854—1938)，字守鹤。法国耶稣会士。

^② 原随文注：云云。

毁坏，尚未修理，杜司铎乃下榻于东关客栈，未几，又迁往城内盐店。休息数日，即启程往段家坞去顾慰被难的教友。甫至村边，即见东头的圣堂业已烧毁，教民的房屋倾颓倒塌，宅院、街道不能分辨，但见一片瓦砾。进寨后，则见西头的圣堂虽依然存立，然堂之四面被炮弹穿透的洞穴历历可数，已大非向日之局面矣。……及至来到堂前，一见寨内的教友男女老幼不下千百，个个都鸠形鹄面，衣服褴褛，仿佛些流氓、乞丐一样……令人伤心惨目。

“那时已经进了九月，眼看就到冬天。教友无衣无食，又无家可归，饥寒交迫，能不转乎沟壑，同归于尽也乎？杜司铎睹此情形，不忍坐视，遂商于县长：凡习拳设厂的村庄，权其轻重，各罚以款项若干，以赔偿教友所受之损失。凡认罚纳款者，则将其杀人放火之罪案一笔勾销，虽被害之教友亦不得追究控告。自此以后，民教相安，和平度日，实为两便。……王县长立时应允，以后也认真办理，为时不久，即将罚款交于杜司铎，杜司铎分于教友，庚子年拳匪之祸就从此结束了。”

“杜司铎救县长，县长领洗进教

“王君蕙兰系山东曹州府人，家族贵显，累世功名不绝。王君也是出名的进士，拳祸前三、四年，即光绪二十一、二年，曾奉命为任邱县知事。……居官不久，即被谗革职，调回天津……教读为业。乃不数年后，义和拳乱党出现，那拉太后欲用其邪术以杀灭洋教，乃擢其胞侄裕禄为直隶总督。裕禄亦素抱仇教主义，因与王蕙兰有旧，欲复其官职，仍为任邱县知事，为到相当的时机一得命令，尽杀境内的教民。”

“因为他心地正直，看事公平，不久就恍然省悟，改变了方针。……不久就出了正洛的教案：拳匪去攻打正洛村的教民……死伤多人，未能将村攻破。……乃上控于总督，诬枉教民。……裕禄闻言大怒，立时行文任邱县，飭令王蕙兰将正洛村的教民尽行杀戮，勿稍宽纵。……王蕙兰按着村董、乡长的口供给总督上了一道公文，救了教民的性命，自己也免了抗命的重咎，甚觉得意。

“迨至阴历四、五月间，拳匪日益猖獗。……杜司铎去后，段家坞的一千数百教友又有被杀的危险。王县长派潘老四为代表去劝教友们作反教的表示。……以后也常探访段家坞的消息。

“王蕙兰对于拳匪、教民两方面的邪正曲直看破了以后本着良心的驱使保护教士、教民的计谋，未尝禀报总督，连本县的拳匪大概也不曾知道；且于其接篆之初，因对于拳匪、教民多所误会，又受了裕禄的嘱托除灭教民，到任后给总督所上的公文中狠有些褒扬拳匪、谗谤教民的话语。到后来洋兵占了天津，总督弃城脱逃，各国将帅在总督衙门中得了王蕙兰上的那些公文，见他纵匪仇教有凭有据，就共同商议着定了他的死案。所以以后洋兵进北京、破保定，杀了袒护拳匪的臬台廷雍以后，就扬言要开往任邱，去杀县长王蕙兰。这个风声传到任邱以后，王蕙兰明知自己未曾纵匪仇教，但恐他自己徒口辩白难取信于洋兵，所以特派专差前往献县，央求杜司铎速回任邱，为救他的性命。

“杜司铎到任邱后才不多几天，英国军官名洛尔内·姓刚伯耳的(Lorne Campbell)领着一班印度兵也到了任邱。杜司铎写了一封讲情的书信，教王蕙兰拿着出城去欢迎。以后的光景，千钧一发，万分危险。按杜司铎亲笔记录的，也非常详细。

“据云：

县长出城后不久，方交午刻，忽见英国军官进了我的下处。握手问好后，就正色向我说，像这样的恶官，不可轻易饶恕他。如今我先把他捆起来，教他受一阵虚惊。稍待几时，神父去给他讲情，我看神父的面子饶他一死，好教他日后随神父的指导，赔补教友所受的损失。说罢，即告辞而去。我送英国军官刚一出门，忽见一个中国营长被印度兵追赶的气喘吁吁，向着我哀求说：‘神父救我罢。’我立时拉住他，领回下处来，安慰他说：‘你先在这里躲藏几时罢，洋兵决不能来骚扰你。’及至午后四点钟，我坐车往英国营盘去，刚一进门，果见王蕙兰县长在一棵椿子上捆着呢。他一见我，哭哭涕涕的哀求我救他。我先安慰了他几句，然后向着英国军官说了些好话，登时就把他解开了。解开以后却命他亲手立字，日后要照数赔偿教士、教民所受的种种损失。可好他当时怎么应许的，以后就怎么作了，所以为善后赔款一层，我与王县长商酌辨理，半点也没有费难。

从此以后，那向日待我冷情的王蕙兰就成了我的良朋密友。公余之暇，抽身来堂，开怀畅谈，

久而不厌。某日县长又来，略叙寒暄之后即请我将服役诸人暂且辞退，又请将门窗紧闭，然后低声向我说：“罪人今天有事请求神父，不知神父容罪人开口否？”我一听这话，甚觉奇怪。就急忙回答说：“这是乡下的教民对兄弟自称的名词。阁下身为县长，又不在教，为何竟如此自谦呢？”王蕙兰不慌不忙的向我说：“以前我不在教，如今我愿意进教，所以我才用这样的名词。今天我来拜见的缘故，就是为求神父收我入教。”以后王县长就详述他所以信教的原因说：“今年五月间拳匪抢掠贵教堂时，我把贵堂的书籍全命人带到衙门中去了。乘着闲暇的时候，我反复诵读，见贵教的道理纯正，足以维持世道人心。且所敬之天主就是我国古人崇拜的上帝，教民所诵的经文词意亦非常美妙，求主保佑亲友恩人、启牖帝王官长。这样正大光明的宗教，已足令人钦佩。更令我惊奇感动的是教民信教的忠诚。当拳匪仇教时，教友只须以“不奉教”三字虚言应酬，即能保全性命。然教友皆宁死不从，且父劝其子、母劝其女，皆以“头可断而教不可背”为原则，非至真至正、能降祥降殃的天主教，万不能令人信仰的如此真切。我决意要信奉天主圣教，另外是因为这个缘故。”^①

我听到这里，知道王蕙兰的话是出自诚心，就给他讲明进教的手续说：“按教中的成例，进教以前，先该保守。不是一言出口，马上就可以领洗进教。”王蕙兰说：“这一层手续我也知道，但是不拘何事，有常即有变。现今我年已就衰，又积有病根，不时发作。若一旦出了意外的变故，赶的神父不在城内，我不得领洗而死，不是耽误我身后的大事么？”我说：“为这一层，县长不必过虑。一来因吉人天相，这样的祸患来不到县长身上；二来若真遇见这样的变故，敝堂中不拘何人皆能行权，替我给人付洗。”县长又说：“请神父直言告诉我，到底我还能得罪赦，死后蒙天主赏我升天堂么？只要我还有一线的指望，我为进教恭敬天主，不拘何事我也不怕牺牲。就是辞官不作了，我也毫不顾惜。但我知道，贵教中人一夫一妇之外不得另置侧室。因我向日不曾奉教，故于正房以外尚有侧室二人，历年久远，皆已生有子女。此事该如何办理呢？”我见他进教的心十分真切，就直言无隐的告诉他：“天主教为一夫一妇的制度是不能更改的。至于阁下的侧室，因有子女的关系，当如何析居离散，兄弟不敢贸然决断；必须上禀主教，听其斟酌定夺。请阁下候信可也。”王蕙兰因听说他有教灵升天的指望，就心满意足的告辞回去了。

以后过了若干时日，某日早晨，忽有人来告诉我说，昨天晚上王县长忽得重病，昏迷不省人事。今天早晨其家中人雇车将他送回本家去了。我一得此凶信，五内感动，狠伤叹王县长无福，怕他临死前不得领洗。又过了两个月，忽有一山东人带着王蕙兰的书信来到献县总堂，向葛大司铎说：“任邱县前任县长归家后病势加重，欲领洗进教。邻近各处访问不着教士的下落，故特差我来请示办法。”葛司铎闻言乐甚，即将付洗的礼节经文全一一给他讲明，命他当面试验了几回。又怕他偶有遗忘，故将经文写在纸上，命他带着回去了。王蕙兰就藉着那个外教差役的手得领圣洗，成了天主及圣教会的义子。以后安然谢世，大约得救了灵魂。

“以上各种情节，都是杜汝梅司铎亲笔记录的，见《支那锡兰玛达加季刊》，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五年二百四十八页。”

《肃宁 尚村一百六十七人致命始末》载：

“尚村是肃宁县地，在本县城北十二里，离献县总堂不下百里。该村自立堂至庚子教难，约有六十年之久。庚子年阳历六月间，拳匪的势力与日俱增，仇教的风声日益紧张。尚村的教友都看着，若不搬家躲避，必难保全性命。当时各处的教友往献县张家庄来避难者已有四、五千人，筑垒自守，暂时可保无虞。尚村教友已有所闻，故四十家奉教人中，欲往献县总堂来避难者，有二十余家，共一百八十人。

“六月二十五号，商议妥了以后，急忙筹备一切，二十八号瞻礼二，就动了身……

“从早晨动身，一直走到天夕，十二点钟的工夫，不过走了五十里路……

“一宿的工夫，不过走了二、三十里。及至天明，将进魏家庄……

“绕过村去以后，又走了不远，将到李家庄的时候，相离不过一里之远，忽见后面千百成群的人向

^① 原随文注：云云。

着他们追来了，个个拿着棍棒，高声呼喊：‘杀！杀！’……远远望见十几个拳匪领着许多乡民，狂呼乱叫的从李家庄出来了。拳匪们手拿刀枪，乡民们各持棍棒。一见教友，如同见了不共戴天的死仇一样，刀剑齐下，棍棒交加，不把教友杀死不肯甘休。此时间临近各村的外教人，也都纷纷出来，为抢夺教友的财物……

“当着那个时候，教友都四散奔逃。……到底一百八十人中，高飞远扬，得逃了活命的，不过十人。至于虽未被杀，然未能脱拳匪之手者，四、五十人。其余一百余人，全因为奉教恭敬天主的缘故，被人杀害了。杀死之后，拳匪弹压着雇了几个乞丐，刨了一个土坑，八尺见方，四五尺深。把临近的尸首聚敛起来，就同穴葬埋了。

“商家林是献县北境的大镇，在李家庄东北六、七里，在张家庄总堂正北偏西三十里。午前约十一点钟，李家庄的拳匪将未被杀的教民四十六名送到商家林，交给了该处的大师兄。……及到天夕，看不见教友去搭救，拳匪才把那四十六个教友或刀砍，或活埋，全一齐杀害了。”

“过了二年半以后，于天主降生一千九百零三年，阳历一月间起尸迁葬的时候，在李家庄的坟坑中，找着了六十六个尸首，在商家林的两个坟坑中，找着了四十六[个]尸首，再加上逃了活命的十三个人，共计一百二十五人。……其余五十五人的尸首，大概是在李家庄外被人杀害。……迁葬以前……找着了十四个尸骸。

“将一百二十六个尸骸起出来以后，装在二十一个棺材里，李家庄同商家林套大车送到尚村，举行大礼，葬于圣堂后身，上边修了一座祠堂。这场风波，从此了结了。”

《河间 贞女杨依撒伯尔致命传略》载：

“杨店村是河间县出名的堂口，自奉教以来已有数百年之历史。庚子年避拳匪之乱，大多数都逃往段家坞去了。被拳匪围攻时，受伤而死者共计七人。”

《河间 范家圪塔被围记》载：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年，在范家圪塔当本堂的是巴儒略^①司铎，被拳匪围困两月之久，拳匪如何攻击，教友如何抵抗，种种事迹皆亲眼目睹。当年阳历十二月间即依次叙录，邮寄欧洲，登于《支那锡兰玛达加季刊》中。今特按原文翻译出来：

……原来范家圪塔是一个小小的村庄，滨临子牙河^②右岸，相隔不过二、三里。虽有两道大堤横亘其间，得免水灾，然居民贫苦，男女老少共计不过二百四、五十人。自贺司铎开教立堂以来只二十余年。有村如此，当乱离之世，本没有能令人望风归来的价值。但因为该村的居民都是教友，不奉教的人一家也没有，又因为该村中有广大的教堂，一年到头常有司铎居留看守，所以各处的教友一见大难临头，都不约而同的以范家圪塔为避难所，望风归来，为保全身家性命。

当年六月一号，即阴历五月初五日，萧、万二司铎正在乡间传教，忽然接到了献县总堂的书信，告以大难将临，见信后急速往范家圪塔去避难^③。两天以后，万保禄^④司铎先回来了。又过了一天，萧若瑟司铎也回来了。此时间我们听得说^⑤，在任邱传教的杜汝梅司铎被县长派兵护送着回了献县总堂。……杜司铎去后，第二天任邱城内的教堂就被拳匪捣毁了。以后闾县的各堂口也全被拳匪屠灭了……

……凡数十里以内的教友都逃到范家圪塔来了。我们见中国的军队官长都不出实力保护我们，所以我们给驻扎天津的俄国军官写了一封书信，请求他拨兵来保护我们。俄国军官接信后，本有意拨兵来救，但因为他们的兵马不多，拨一支队深入内地，恐被中国兵队围困，故有志未果。

① 巴鸿勳(1856—?)，字世植，儒略是他的教名，又作“如留”。法国耶稣会士。

② 原随文注：亦名沙河。

③ 原随文注：云云。

④ 即万其俊(1864—1903)，字毓才，保禄是他的教名。法国耶稣会士。

⑤ 原随文注：是巴儒略司铎的口气，后仿此。

本月十六号葛光被大司铎自献县来信，劝我们若看光景能以逃跑，更好是乘着黑夜，骑着马，带着枪，逃往献县总堂去。十七号又来信说明总堂不能救助范家圪塔实情，并访问范家圪塔的教友为抵抗拳匪，有足用的粮饷军器否，有死守的决心否，且说，若看着他们不能支持到底，不如强迫他们解散更好，因为都聚在一处，若被拳匪攻破，死的人更多。但现今的时局千变万化，难以预料。求天主圣神默启你们当拿的主意就是了^①。我们回信说，天主圣神默启我们的主意是留居于此，为振作教友的心火，增长教友的胆气，患难与共，生死不离。我们的书信送到献县后，院长林道昌司铎一见大喜，遂又写信，以耶稣会的名义降福我们。书信中有这几句话说：‘你们拿的主意实在令人钦佩。善牧不怕为羊舍命，全合了吾主耶稣的教训。盼望改日相见，或在现世，或于天乡，听凭天主随便安排就是了。’^②……

以前我们还能打发专差乘着黑夜往献县总堂去送信，从此以后，奉教人连夜间也不能走路了，因为到处都有拳匪，各村头路口上黑夜间也有人把守，盘诘来往的行人，不许教民通过。以前教友们三五成群的带着武器尚能赶集赴镇，购买应用的物件；到这时候，各村中都立了义和拳厂子，树着义和拳大旗，不拘多么大胆的奉教人也不敢再进外教人的村庄了。从此以后，范家圪塔合邻近各村全断绝了来往。换句话说，就是被拳匪围困起来了。拳匪们在外杀人放火毫无忌惮，拿获教友即置之死地，遇见教堂或教友的房屋即付之一炬。奉教人在内孤立无援，势若成擒。无论黑夜白日，升到高处往四外一看，即见此处烈火炎炎，彼处黑烟缭绕。明知道燃烧的是自己的宅院房屋，不但伤心悲痛，尚且还惊心害怕。此庚子年阳历六、七月间之大概情形也。

当时避难的教友逃到范家圪塔村中的不下八、九百名。村中的房屋有限，不能兼容并收，那是不言而喻的。远来的教友也颇能随机迁就，大概都以地为床，铺上一层柴草，以隔潮湿；架木为棚，盖上一层席箔，以避风雨。幸亏了当时正当夏季，如此安身，受的困苦还不狠重大。

范家圪塔被围以后，就到了最危险的时期。教友们……四面一齐动工，周围着范家圪塔修了一道寨墙，高约一丈，寨外有壕，宽深各约五尺。寨成之后，自远处望去略似方形，惟东北隅缺一角。村中的居民分为南北两处，中间设有圣堂，教士之宅院居东南隅，临近寨之东南门。此范家圪塔村内之形势也。

除建筑土寨外，教友们又置买器械，预备火药。当拳祸未爆发以前定作的十几尊笨炮，此时间业已铸成，也搬运来了。遂就赶紧造炮车子，安放好了以后，就瞄准燃放。别的人就铸弹丸，打药条，人人皆劳力工作，不敢休息。除了这十几尊笨炮以外，尚有抬枪二十六杆，猎枪一百一十杆，快枪六杆，手枪数杆，长枪四十五杆，此外无他军器；能进攻退守抵抗拳匪的壮丁共三百余名；此范家圪塔为据村自守所有之一切武备也。

兵家有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范家圪塔的教友见及于此，所以每天打发出四匹探马去观察拳匪的动静，也探听拳匪的消息。六月二十六号我们要给献县总堂送信。四侦探之中的两个不避危险，毅然应承了。夜间动身，前半路平顺。第二天早晨走到累头村，村中的人起了疑心，远远向着他俩放了几枪。可好他俩心机灵敏，气度沉静，回头看了看，故意装作惊奇的态度。那放枪的人见他俩不但不惊惶逃窜，反相似要回去责问他们，就估量他俩也是义和拳，或是差役，起了害怕的心，急忙藏在村中，不敢露头了。我们的两个信差平平安安的过去，当天就到了献县。第二天二十八号，又由别道返回范家圪塔，带着信件、钱财等项。我们一念信，才知道路、赵二司铎被拳匪杀害了。步主教写信降福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心火。信上有这几句话说：‘我巴不得用我一人的死救众教友的生命。到底天主拣选更好的牺牲替了我。为范家圪塔的安危，你们全托于天主的照顾，求他保护罢。因为在患难之中，天主往往等到事已失败、人力无可挽回的时候，方才施恩拯

① 原随文注：云云。

② 同上。

呢。’^①……

以前围困范家坨的拳匪大约在五千以上，寨内能出战的教友不过二三百名。我们以寡敌众，竟能大获全胜。受伤而死者只有一人……

七月二十七日，有一个信差扮作拳匪进了他们的战场，假装找他的胞兄。……乘着大雨倾盆的时候出了拳匪的战壕跑到我们的寨中来了。……葛大司铎写的书信……中给我们传报的，是朱家河村中的屠杀，并任、汤二司铎荣耀的死亡……

成千累万的拳匪将范家坨四面包围，过了若干时日。……我们……给法国领事官写了一封告急求救的信，差人送到天津去。幸亏了那个信差机智灵敏，能说会道，经过许多危险，竟能把书信送到了天津……

八月二十二号，教友们大开会议，讨论大举出战的办法。……我们赖天主的保护，占了上风，……

教友们既得了大胜，威名远震，所向无敌。攻破了天津、北京的洋兵又以剿灭拳匪为名，不久就开往献县，路经范家坨。四外各村的乡民都大起恐慌，怕被拳匪的挂累，都纷纷前来同我们说和，并求我们保护。我们虽然本着基督的精神不以直报怨，不用他们待我们的手段来对待他们，到底教友们的庐舍邱墟，田园荒芜，所受的种种损失非常重大。彼死者已矣；幸而未死者，饥寒交迫，嗷嗷待哺，岂能坐视而不救乎？救助之法，惟有使肇祸之拳匪湊集若干款项，赔补教友所受的损失就是了。我们一露这个意思，四外的乡民都看着这个办法极其公道和平，又极便宜拳匪，遂就推举了一位著名的绅士作公民的代表，来同我们议定详细的条件。议妥之后，他就按着各村拳匪的多寡、罪过的轻重分派赔款的数目。凡认罪受罚缴纳了赔款的村庄，我们就发给他们一幅保险的白旗，上书中法文字，声明他们是安分的良民，并未习拳仇教。无论教民洋兵，皆不得骚扰加害^②。从此以后，方圆四十里以内的村庄携带现款来领保险白旗的轮流不断。一连好几个月的工夫，我们为办理赔款，夜以继日，刻无宁晷。

阳历十月七号，即阴历[闰]八月十四日，法国军队从天津出发，一路上平灭了几座拳匪厂子。十四号来到了范家坨。以前有几个村庄恃强不服，不肯缴纳赔款。到这时候一见洋兵来到，都不敢抵抗了，急忙托人讲情，求领保险白旗，为免被洋兵骚扰。我们见他们央求的恳切，动了慈心，不谷既往，也都发给了他们保险白旗。法国军队在范家坨住了两天，十六号向西南开拔。十八号到了献县张家庄总堂。到底我们在范家坨办理赔款的事务，天天忙忙碌碌，直到阳历年底方才办理完毕。

大局平定之后，拳匪虽匿迹销声，暂时不敢蠢动，到底他们仇恨教民的恶业已深入骨髓，不知何时方能改革变化。为这个缘故，领了赔款的教友有许多愿意留居范家坨，不复返回本乡的。我们见请求的家数太多，范家坨一村不能尽数收容，就在村西约二、三里之远买了一片庄田，让他们建房居住，起名曰西坨，或曰小庄子，今则改名曰露德庄。圣堂、学校建设齐备，全村奉教，共睦一心，前途之发达，实有未可限量者。”

附录：

“某日法国耶稣会士巴鸿勳告示称：

“照得我西国教士远越重洋来中国传教，原以爱人为本、以劝善为怀，心迹事实光明正大，数百年来亦既共知共见，即教民与平民亦皆相安无事。不意今年拳匪倡乱，谣言四起。杀害我教民，焚毁我教堂，以致屋宇邱墟，家产荡失，教士、教民无容身地。向非天主潜扶默佑，我教几无噍类矣。近三、四月来，匪党败蹙，我教重兴。若乘此机会以图报复，谁曰不宜？然转而思之，仇可解不可结，民宜安不宜扰，不可逞一己之私愤报不了之冤仇。凡我教友，惟宜恪守教规，上体天主好生之德，下遵教会爱仇之训。

^① 原随文注，云云。

^② 同上。

凡事惟宜含忍，待人总要和平。况现值军门吕大人、太尊王大人与本县马大令悉心筹画并四乡绅董竭力商酌，务将教民财产、房屋一律赔还，人命亦破格抚恤，断不使尔众向隅独悲，含冤莫雪也。故凡我教友，惟当安静以待，不可下乡骚扰，私图报复；不可携持刀械，欺压乡愚；不可私剿私罚，勒索钱财。自今以往，凡有冤抑，先赴本堂陈明原委，经本铎查访明确，果有实据，即代为禀县，由官办理；不准私自赴县呈控。大局一定，教民与平民各安本业，永敦和好，本铎有厚望焉。如有违者，一经查实，即交官惩办，决不宽贷。”

“约12月3日(十月十二日)河间正堂告示称：

“河邑地方自拳匪创乱，经本县剿抚兼施，稍见安谧。所有逃散教民，亦曾谆谕各绅董甲长招回，各归本村，各安本业。凡无房屋、衣食，均令妥为安置。其房屋被烧被拆、产业被抢被占者，一律调处赔偿。并劝令既为邻里乡党，即宜和睦如初，切勿各怀旧恨，再滋意外之患。乃近来四乡昼夜抢劫偷窃之案层见迭出，而四乡之民皆谓‘教民挟制抢掳’等语，本县闻之，深为诧异。想诸教中皆以仁为本、以善存心，岂有明目张胆行同匪类之徒？其间必有他故。乃于十月十一日亲赴范家圪塔村，与巴、萧两司铎会晤。听其言谈，其一片慈祥恺悌之心令人敬佩，并云无论教与不教，凡有抢夺偷窃者，皆为匪类，亟应格杀勿论，严拿惩办’等语，可见教中实无其事其人。即有其事其人，并不存姑息之见，且为之恨。其中必有冒充教民藉端抢掠者。自今以后，仰河邑各村庄务即遵行保甲联庄，昼则巡查，夜则支更。凡在村庄之人，同心协力，一体保护。如有匪徒冒充教民及游勇、土匪聚众抢掠情事，准尔等严拿捆送究治。倘有抗拒，即飞报本县禀请官兵会同查拿，按法惩办，决不姑宽。尔等亦毋得妄拿无辜，藉图报复，致蹈反坐之咎。

《献县张家庄被围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阴历(五)[四]月间，拳匪未敢滋事，总堂景况尚称平顺。一进五月，局势忽然改变了。教内教外的人都纷纷传报说，拳匪已定于本月十五日围攻张家庄总堂矣。四方教友来张家庄避难者，大车小辆，源源不绝。数日之间，村中难民已达二千余名之谱。总堂教士见时局危险，遂解散公学，筹备自卫，将同治年间捻匪去后为抵抗骑马贼置买的来复枪，约百十餘杆，全如数拿出来，又将合堂上下诸人，连逃难的壮丁，编为军队，共一二百人。罗致和依理满^①、许砚田老先生二人为队长，天天排队演操，瞄准放枪。传道行善的教堂，忽然变成营盘了。

“当时驻扎献县保护教堂的军官姓范名天贵，也是梅军门委派的。……教士、教民莫不依为保障。乃未逾数日，忽接梅军门急信昼夜开拔而去。临行遗函于葛光被司铎云：‘顷奉军门来示，谓“沧州拳匪滋事，凶恶异常，见信后当率所部各营速来沧州，以便相机剿办，等因。奉此。”敝营军队只得撤回。所有贵堂之事即请阁下设法保护，并谕各教民将东围子筑高，濠沟挖深，多备枪炮，妥为防范。勿以军队撤回，人心惶惶不定也。弟到沧后即面请军门另拨军队前来保护。’^②……

“同时葛光被司铎又接到献县知事吴焘来函云：‘顷接府宪王太尊来函，谓“任邱八方村教堂被拳匪围攻焚烧，匪势甚众，并有任邱得手后即至河间、献县之谣。嘱即严密防范，”等因。奉此。窃思任邱等处匪徒众逾数千，一时恐难解散。张家庄为畿南总堂，匪徒最为注意。刻下杨玉山所带防军，除各处分扎外，存城不过百馀。倘该匪大股来扑，断难抵御。敝处虽已飞禀督宪及梅统宪迅即添派大队前来，第恐缓不济急。贵堂教民迭与拳匪接仗，颇能得其情委。望即早为布置，以助兵力之不逮而保总堂。是所切禱。’^③葛光被司铎接到了这两封书信，为预备作战，抵抗拳匪，主意更坚决了。曾对众声明说：‘我们将教堂改作了营盘，是奉官的，不是造反，是本县正堂用河间知府的名义，并范军官用梅统领的名义正式吩咐了我们掘壕筑垒、置买军械，以(敌当)[抵挡]匪徒，保护性命。日后若有人诬枉我们聚众作

^① 罗致和(1849—1901)，字芝轩，依理满是他的教名，又作恩理各。法国耶稣会上。

^② 原随文注：云云。

^③ 同上。

反,我能拿出这两封书信来对答他们。’^①

“到底过了工夫不大以后,阳历七月二号,县长吴焘将朝廷驱逐教士回国、强迫教友反教的上谕明明颁布出来了^②。虽然那道上谕并未实贴于张家庄村中,到底教友们不久也听得说了。自从出了这道上谕,拳匪横行是奉官的,教友奉教反倒是犯私的了。拳匪愈觉有恃无恐,教友反倒更无出路了。然自始至终,前后三、四月之间,都不如阳历七月二十三号陈泽霖攻破朱家河后率兵进京从献县路过的时候,教士、教友们更惊惶害怕。以前张家庄村中因难民拥挤,一天到头,常是人声嘈杂,扰乱不堪。惟独那一天,村中寂静无声,几乎变成了旷野。人人都面容凄惨,沉默寡言。有进堂念经的,有端坐出神的。大概都是因为知道死在眼前,各自考查良心,预备灵魂,等着面见天主去了。幸亏了县长吴焘看事明白,预料拳匪邪术不能成事,总堂中若干洋人若在他的统治之下惨遭杀戮,将来他不能脱离关系,所以用了一个计策,外面不得罪拳匪,暗中却救活了总堂的教士、教友。就是当陈泽霖未到献县以前,他先差人往富庄驿去递了一封密信,说明了自己的隐情,也请求陈泽霖千万不要攻打张家庄总堂。及陈泽霖来到献县,城内的拳匪都跪地攀辕请求帮打总堂。县长吴焘也随声附和的作同样的请求。陈泽霖因为接到了吴焘的密信,知道他请求的话不是出自本心,所以也但虚言应酬,说自己进京要紧,不能耽搁。一个小小的乡庄,不难平灭,请县长会同众位大师兄们斟酌办理可也。^③陈泽霖托词推诿后,在城内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就起程往北京去了。教友们远远望见军队北去,心神方才安定了。县长吴焘用的这个计策是否属实,记者无从考证,但当时之人皆如此传说,故特顺笔记之。

“经过此次大危险以后,张家庄村中的数千教友仍被拳匪围困,不能回家,不得种地。以前他们避难逃来的时候,仓促之间未能多带粮,所以不满一月,就有许多绝粮断炊的了。当时葛光被司铎给天津管账的苗履实^④司铎写信说:‘现今村中的难民仰赖我们的周济,得免饿死的不下二、三千名。我们尽力节俭,每主日还得施放一百四十三布袋粮食的粥饭。现今仓库中尚有一千七百布袋粮食,仅能支待三月。三月以后,纵然祸乱平定了,将来如何过冬呢?无衣无食,又无房屋可住,能不冻饿而死么?这些教友被本国人逼迫难为的到了这个地步,没有别的罪名,但是因为服从洋人的缘故。所以拳匪称洋人为“大毛子”,称教友为“二毛子”。至于信奉宗教,那还是附属的问题。虽然如今就有人提议将来必须使中国国家赔偿教士、教友所受的损失,到底中国人的狡滑诡诈在此次战争的前因后果上全明发露出来了。若不用兵力,他们决然是不肯赔偿的。请神父见信后将我们现今所处的景况告知我们本国的领事,也正式向他声明:我们既是因被法国保护的缘故受了窘难,也该当享受法国保护的利益。’^⑤以后又说:‘现今献县境内未被拳匪攻破、教友尚能存身的村庄,除了张家庄总堂以外,还有大郭家庄连陵上寺两处。其余各村的圣堂、各教友家的房屋,全被抢掠焚毁了。三处的教友共计约八千余名,皆以我们为保障。我们若抽身远遁了,不但这八、九千教友皆难保性命,连总堂的一切建设亦必被拳匪毁坏,将来不知若干年后方能恢复原状。所以我们宁愿冒险被困,也不愿意弃堂逃命。’^⑥

“张家庄总堂被拳匪围困数月之久,虽无一人被杀而死,然因住处窄狭,空气恶浊,困急染病而死者为数甚夥。其中与历史有关系者为步天衢主教与贝怀仁^⑦司铎二人。兹特略叙梗概。步主教已年逾古稀,向来就不甚强健。自从一年以来,见自己所属的教友死者死、逃者逃,将来还不知落何结果,愁肠百结,精神气力亦日益衰败。延至阳历十月九号,忽然无缘无故昏绝了一次。明知是死亡的先兆,遂即求领临终圣事。以后料理后事,仰合主旨。数日之间,言语行事,善表动人。于十三、十四号之夜间,时刻未详,安然去世升天。贝怀仁司铎在中国不满一年,言语尚未学通,即教授哲学。拳祸发作之后,

① 同上。

② 原随文注:原文见下卷《太后端王信任拳匪》节。

③ 原随文注:云云。

④ 苗履实(1856—1909),字克诚,法国耶稣会士。

⑤ 原随文注:云云。

⑥ 同上。

⑦ 贝怀仁(1861—1900),字履清,法国耶稣会士。

又制造爆帽，俗名炮子，法文曰 Capsule。因当时总堂教友为抵抗拳匪所用的兵器，(另外)是旧式的来福枪。至于快枪、大炮甚属有限。人都知道为放来福枪离不了炮子。火药、子弹总堂中存储的不少，惟独炮子缺乏。当时又无处去买。教士、教友们都作了大难，计无所出。贝司铎精通化学。为谋公众的利益，就细心研究，再三试验。不数日后果然成(工)[功]。将他制造的炮子扣在来福枪的炮台上，一搬扳机子，枪响弹飞，非常顺利。众人皆鼓掌称贺。贝司铎自己亦笑颜逐开，欣喜逾恒。以后又连日制造，劳力过度，积累成病，辗转床褥十馀日之久。延至阳历九月十五号，竟出离尘世，升天享福去了。阖堂之人莫不哀悼。

“步主教去世后第四天，阳历十月十八号，即阴历闰八月二十五日，法国军队自天津开到了献县总堂。总堂的局势立时改变了。不但拳匪敛迹逃散无踪，连安分的良民也惊惶不安，都争先恐后的来施礼拜见，表白自己未曾仇教的心迹。于是有送生牛活羊的，有献水果点心的，盈门塞巷，陆续不绝，以致总堂执事人员终日奔波，尚有应接不暇之势。过了十天以后，大队返回天津，但留下了三百步兵。一来为镇守总堂，二来为勉强设立拳厂的村庄摊派公款，赔偿教友所受的损失。迨至次年阳历四月十九号，诸事大体就绪，洋兵乃拔营北去，而总堂之拳祸历史亦自此告终矣。”

《献县拳匪攻西大过教堂记略》载：

“……光绪二十六年，逃亡在外的拳匪皆返回故乡，匿迹销声的拳匪又死灰复燃。献县城南，东、西大过一带，北有樊屯镇，南有菩萨村，西有参军镇，此外凡略大些的村庄，皆设有拳厂，传授邪术……

“延至阴历六月十三日，即阳历七月九号，各处拳匪齐集于樊屯镇者，众愈数千。早饭后，整队出发，携有抬枪、火炮，及长枪、大刀等兵器，势甚威武，直向北立车村扑去。当时南、北二立车村的教友有逃往大郭家庄去的，有逃往张家庄总堂去的。男子壮丁都被请往西大过村护堂去了，村中空虚无人。拳匪乃将该二村的圣堂及教友的住宅皆付之一炬，然后向西大过进发。……在教友一方面，也稍有准备。统计火炮两尊，抬枪四杆，其余俱是来福枪，火药千馀斤。除此以外，在圣堂顶上，还摆满了刀、枪、砖头、铡刀、犁耙等物。……能作战的壮丁共计四、五十名。……女教友七、八十名全聚在圣堂中热心诵经，求天主加佑教友，战胜仇敌。……自午前十点钟直战至午后四点钟，教友们气竭力尽，渐渐不能支持了……

“一到午后四点钟……雨脚下垂，布满天空，不久又打了一声霹雳，倾盆的大雨就奔腾澎湃的下起来了。拳匪的火炮、抬枪非用火绳不能燃放，火绳一经雨淋，失其效力，拳匪不能燃放枪炮攻打教友了。教友们手中大概都有来福枪，不论阴晴，常能燃放，趁此机会攻打拳匪，更觉得手。……打接营的教友赶到的非常凑巧。……拳匪避雨无地，秩序大乱。打接营的教友乘此机会涉水渡河，登到西岸上，放了一排子枪，就把拳匪打得惊惶失措，各自逃命去了。护堂的教友见救兵来到，拳匪逃散，都长了精神，立时从堂顶上下来，与打接营的教友里外夹攻。霎时之间，三、四千拳匪被一百几十个教友打得抱头鼠窜，只顾逃命，谁也不想抵抗了。”

《献县大郭家庄被围记》载：

“大郭家庄在献县城南约十七、八里，其西南两方面教堂林立。庚子年自四、五月间樊屯及小流屯等村一设立拳厂，小堂口的教友见大祸将临，自揣力不能敌，就起头搬家。有搬往张家庄去的，也有搬到大郭家庄来的。略大些的堂口就置买枪炮子药，欲与拳匪对抗。大郭家庄堂口为城南一带诸堂口之巨擘，教友众多，人心团结。为抵抗拳匪，据村自守，更不遗余力。计自阴历六月，直至拳祸告终，前后三四月之间，与拳匪交战最激烈者共有三次……

“于阳历七月四号、二十九号，并八月十三号三次与拳匪交战，以寡敌众，大获全胜，且未伤一人，其中必有天主暗助，人力不至于此。”

第二册《景州朱家河教难记》载：

“朱家河堂口的概观

“景州城西一、二十里，有东西两村，相离三、四里，皆名朱家河。西朱家河是外教村庄，奉教的一家也没有。东朱家河的居民，则十有八九皆信奉圣教，共计约三、四百人。自进教以来，已二百馀年。信

心坚固,敬主虔诚,在景州各堂口中当首屈一指。故历年来,景州及临近各县的传教司铎皆以该村为中心点,设有男女学校、育婴堂等。教务发达,颇极一时之盛。”

“教难的原因

“……陈泽霖带队入都,奉旨勤王,国事非常急紧,本不欲干涉地方事,耽搁时日,故攻打朱家河以前先派了一员军官^①……领着两个护兵往朱家河去调查明白:该村的居民是否有心造反,并看看能劝他们投降归顺与否。当时朱家河的教友与外边的人信息不通,但风闻着城里住有若干官兵,是为平灭朱家河的,所以日夜戒备,不敢疏忽。阴历六月二十一日,即阳历七月十七号,忽见三个穿军装的人自西南高家庄向朱家河前来,就估量是来探地势的,等他们走的临近了,猛然一枪把帮带打死了。两个护兵见势不好,转身就跑。回到城里一报告,陈泽霖勃然大怒,拍案高呼说:‘这还了得么!朱家河这些东西们真是反了。’遂传令各军官火速进兵,非把这些乱民杀灭了不可。”

“教友避难归朱家河

“朱家河既为景州及临近各县诸堂口之巨擘,故庚子年五、六月间,拳匪仇教之时,各处的教友见时势危急,遂不约而同,纷纷来朱家河避难。首先逃来的,是景州西境连武邑、阜城等处的教友。因当年阳历六月十九号路、赵二司铎在武邑城里堂内被拳匪杀害的凶信一传到景州刘八庄,该村的教民共十五、六家,约七、八十人,都惊惶失措,半夜三更就急忙动身,第二天早晨就到了朱家河。以后朱家河以西各堂口的教友,除黄古庄以外,都陆续陆续的赶到了。于一日之内,避难的教友就聚了五百多人。黄古庄的教友,因人数众多,愿意团结自卫,与拳匪抵抗。以后见拳匪的势力日益扩张,自揣力不能敌,才商议着搬家。但因为知道朱家河村中已无地可容了,不得已,就搬到青草河去了。

“过了不多几天以后,朱家河以东,连东光、吴桥、宁津等处的教友,也成群结伙的逃来了。他们……是因为得了庆云县杏行村聂、鲍二位中国司铎被杀的凶信。那两位司铎被杀的日期是阳历六月十八号。……聂司铎被枪刺死,鲍司铎被火烧死,情形极其残酷。……有些村庄虽然离朱家河不下一百馀里,也都束装就道,纷纷向朱家河奔逃。以后南而枣强、故城,北而阜城、交河,以及西南冀州、衡水等县,也有许多避难而来的。不满十天,朱家河村中,就聚集了三千多人。”

“司铎、难民分居两处

“庚子年在景州当总本堂的是任依纳爵司铎,法国人,讳德芬,字孔修,年四十三岁。当本堂传教的是周伯多禄司铎,献县齐家庄人,讳凤歧,字鸣盛,年四十四岁。及拳祸大作,在故城传教的汤保禄司铎,法国人,讳爱玲,字怀宝,年五十三岁,并在吴桥传教的潘奥斯定司铎,深州潘家庄人,讳凤辉,字安仁,年五十岁,皆自本传教区率领所属教友逃往朱家河来了。

“朱家河村庄偏小。……晚来的人不得已,就逃往青草河去了。青草河在朱家河东南约十二里。总本堂任司铎为照顾两处的教友,就吩咐周、潘二司铎往青草河去,命汤司铎同他自己住在朱家河。按当时的情形两村比较起来,论人数,连论财力、器械,青草河不及朱家河的五分之一。”

“任总铎最后的一封信^②

“中国近来的景况能令人惊惶。……路、赵二司铎被杀的电报,大概你们已经见着了。现今直隶北境杀人放火之事无处不有,教友来朱家河避难者轮流不断,其房屋悉遭焚毁,其家中诸人有被杀害者,有奔走逃散不知下落者。

献县总堂尚未被攻,此处亦然。然势甚危险。以常情而论,我们必被围困攻打,是万不能免的。到底我们的主意拿定了,必要竭力自卫,死而后已。现今在朱家河,除了本村的三、四百教友,又添了二、三千逃难的教友。我们思患预防,除了掘壕筑垒以外,还多买粮食,备办火药及别样自卫应用之物,以(堤)[提]防被敌人围困攻打。虽然如此,若天主不赏赐我们得胜,我们万不能保全性命。将来被杀或被烧,必要同归于死。

① 原随文注:按当时的官衔说,叫作“帮带”。

② 信的落款是“六月二十八号兄依纳爵芒然谨启”。

我如今就把我的性命奉献于天主，为救别人的灵魂，并为使我的本家得幸福。日后你们若接到我被杀的讣音，固然该为我祈祷，到底也该感谢天主属于从我们家中要一个祭献于他的牺牲。总而言之，大概我们是不能脱逃乱民之毒手的。现今他们还没有来到，盼望天主保护我们并愿主旨承行于地就是了……

“公同议决筑垒自守

“……阳历七月十四号，瞻礼七，六、七尺高的土寨已经成功了。

“土工告竣，拳匪来攻

“……第二天早晨……成千累万的拳匪仿佛一片高粱棵一样迎面而来。……混战了一天，拳匪们死伤的甚多。奉教人因有寨墙护围着，一个死的也没有。”

“连日交战，拳匪大败

“第二天，阳历七月十六号，拳匪们仍不死心，早饭后又来进攻。教友们……个个都在寨墙里边不慌不忙的装枪瞄准。及赶他们临近了，一声号令，砰叭乱响，如雹似雨的弹丸一直向前飞去。但见那些红巾箍首的匪徒有倒地乱滚的，有负伤呻吟的，其余皆抱头鼠窜，纷纷逃命去了。

“第一队败退了以后，第二队……又败退了。以后接三连四，直至五、六回合。拳匪们……纷纷逃散，都向着他们的巢穴路庄退回去了。

“教友们……大开寨门，整队而出，一直向南追去。……到了路庄，在拳匪的大本营中见有大炮一尊。……于是……好几个人用绳拉着，其余的众人前后拥护着，耀武扬威的回了朱家河。”

“朱家河被围第一日

“……阳历七月十七号午正，官兵与拳匪连成一气，将朱家河小村四面包围起来了。拳匪们……虽无确数，大约在一万以上。官兵号称三千，实数不过二千五百，到底都有新式的快枪并克虏伯大炮数尊。……教友们……拼命抵抗。……及至天已黄昏，官兵命拳匪罗列村外，小心看守，(堤)[提]防教民乘夜逃走。他们就往临近村中投宿去了。

“停战以后，村中执事之人齐集于堂院中，同任、汤二司铎商议说：‘……请神父乘着黑夜出走，逃往献县总堂，以保性命。统计寨中的器械，除长枪、大刀以外，光来福枪足有一百馀支。等到天过半夜给敌人个不(堤)[提]防，一拥而出，向北逃炮，大约必能成功……’任、汤二司铎答曰：‘多谢众位会长的厚情。……此事就目下说，万万使不得，试思我们突围出走，也许能逃活命，到底妇女孩童、老病残疾之人怎么样呢？……眼前这场大祸，不是我们自己招致来的，可以说是天主安排的，至少是天主准许的。我们只好将性命托于天主之手，患难与共，生死不离就是了。’”

“朱家河被围的第二日

“……已经夜深了，任总铎还强打精神，给献县总堂写了一封最后的短信，为教李庆三第二天带去。那封原信，献县总堂中珍重收存，至今未失。……大意略曰：‘我们已经两天的工夫被官兵、拳匪合力攻打，村中死伤的人甚多。我们何时死呢？惟愿主旨承行于地而已。’”

“朱家河被围第三日

“陈泽霖奉皇上的圣旨，率领精兵去护卫京师。……因景州的官绅、拳民跪地央求攻打朱家河，他当场应允。……不料进攻两日，毫无效果。……阳历七月十九日早晨发了严令，命兵将们于一日之内必须将朱家河打开，否则以军法惩办……

“自早晨直战至天将晌午。……进攻的人渐渐稀少了。李庆三早已预备妥了，一见机会可乘，立时纵身上马……溜烟的向着东南方面飞奔而去。……更深夜静以后，才投到一个朋友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绕道往献县来。走到阜城城南约一、二十里，回头向南一望，遥见黑烟缭绕，盘旋直上，高约一、二十丈，就知道朱家河被敌人攻破了。……当天下午就到了献县总堂，将这个凶信向众人一传报……堂里堂外的人都惊寒颤栗。”

“朱家河被敌人攻破

“阳历七月二十号，天一亮，官兵以拳匪为牛马，命他们拉着那六座有转轮的敌楼，从葛里庄出

来,一直向着朱家河西北方面前进。……那六座敌楼从从容容的来到村前,后边的拳匪猛力向前一推,六座敌楼横架在寨壕当中,将前后的板墙打开,仿佛六道木桥一样。……朱家河遂一败涂地,三、四千教友落于仇敌手中了。”

“任、汤二司铎皆死于火中

“……当着官兵连拳匪开枪攻打堂中众教友的时候,任、汤二位司铎在椅子上坐着,不断劝勉教友,也放临终大赦。汤神父声如洪钟,领着教友们念《悔罪经》,直到身中枪弹,跌倒在地,才不念了。汤神父受伤以后,任神父降福了他。以后就趴在祭台凳子上,到堂顶塌落的时候被火烧死了。任神父中枪弹略晚一些。……虽然立时倒在地下,大概也是堂顶塌落时被火烧死的。”

“堂外妇女投井自尽

“……有许多女教友……都逃到婴孩院里去了。……过不多时,忽见乱兵、拳匪也成群结队的闯进去了。那些热心贞女连青年妇女们……一见院中有一眼苦水井,彼此也没有商量;就都争先恐后的往里跳。一丈多深的水井,自下而上,转眼之间就全填满了。”

“凡死于主者惨死亦是善死

“堂内堂外的教友,共计约在三千以上。一旦之间,尽遭杀戮:男子壮丁大半都死于枪弹刀剑之下,妇女孩童大半都死于水火灰烬之中……”

“死中逃生者几等于零

“……据说,当初攻破朱家河的若但有官兵,三千奉教人中得免杀害的,至少要有一半,也许一多半。因为那些远来的兵丁与朱家河的教友无辜无仇,奉命攻打那个村庄,是估量村中的人聚众造反,扰乱地方。及赶攻破以后,一见那些妇女孩童,知道自己错误了,必不忍再下毒手,杀害那些无辜的良民。……朱家河被攻破以后,村中的教友大概都被拳匪杀害了。至于被官兵杀害的,甚是有限。”

“陈泽霖给青草河的告示

“陈泽霖……将朱家河平灭以后,不敢再领兵去攻打青草河,但出了一张告示,命该村的教友对天叩头,反教自新。也没有顾得等着教友答覆,第二天,阳历七月二十一号,就率领全军一直往北京去了。

“告示的原文如下:

钦命总统武右翼先锋军江西按察使陈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教民亦属华民,入教非尽本愿。只因民教不和,结怨日深,致成今日不解之仇。其中倚恃洋人欺压良善,在所必有;而不法匪类煽惑教民借端抢掠,尤在意中。本总统奉旨入都,带队过此,即据地方官绅恳求督队剿办,以安民心。因思教民之中不乏胁从,教堂之内无多洋人,大军所至,玉石不分,杀戮尽属华民;况妇女何辜,同遭惨死,本总统于心何忍?不得不先行出示晓谕。为此谕仰教民人等知悉:尔等入教于前,何难出教于后?本总统不究既往。倘有对天叩头,自愿出教,准其改过自新,免再诛戮。本总统为矜恤华民起见,勿再执迷不悟,始终梗化,致遭骈诛。改过之后,如有挟嫌擅杀情事,仍应照例办理,以重民命。其各凛遵毋违。特谕。

右谕通知。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实贴青草河村”

“收骨敛葬

“朱家河被敌人平灭以后,村中的景象十分凄惨。房屋悉遭焚毁,只剩残檐破壁。尸骸布满街衢,难辨张三李四。以前的圣堂原是平顶,死于堂中的人被塌陷的堂顶掩盖起来,自然比暴露于外被猪狗吞噬的略好一些。但因拳匪及临近村中的外教人都估量教友们的财宝或在身上带着,或在地下埋着,所以火焰熄灭以后,都争先恐后的去挖掘搜寻。当时青草河的奉教人,谁也不敢出村。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拳匪稍稍敛迹,时局略平定些了,教友们前去探望,分明知道死在堂中的人都埋于灰烬之中了。及赶进去一看,则见髑髅枯骨满地皆是,尚且还全明明摆着。从此可知,那些贪财的穷鬼们把教友的尸首不知道已经翻腾多少遍了。记者于当年八、九月间曾亲去探望,所见的就是这般光景。”

《景州总本堂全区教难记》辑：

8月21日(七月二十七日)东光县正堂告示称：

“查各村庄牌共具保呈传案讯准反教者为数甚繁，诚恐义和民仍前烧杀为仇，且恐另有小人藉此泄己身忿，合再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各拳民及诸色人等知悉：嗣后教民曾经公保呈准反教，供奉祖先、灶王悬贴者，任其安业。各拳民应体朝廷宽大德意，不得再视仇敌，藉言妄行杀戮。各宜凛遵。”

“《深州正堂曹景邨仇教证据》载：

“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当拳匪乱党恣意横行时，各地方官长能烛其奸邪，排斥捕拿，不遗余力者，惟吴桥县令劳乃宣一人而已。其余皆推波助澜，纵容拳匪，仇害教民。然其中纵匪仇教手段毒辣、证据确实者，直隶东南教区内，当推深州正堂曹景邨为巨魁。兹特将其布告公文附录于下，以资考证。”

“深州正堂曹景邨四言告示：

拳教相仇，平民遭难。自保身家，惟有团练。枪炮刀矛，设法备办。

早晚操演，手脚灵便。若闻警信，切勿逃散。半出兜拿，半守村境。

真教假拳，一体拿问。捉获领赏，格杀勿论。有教村庄，挨户查清。

稟报到官，一律抄封。不准隐匿，干罪不轻。谕尔各村，一律恪遵。”

“深州正堂曹景邨请兵剿拿教友文：

敬禀者：窃卑州东南东阳台村距城十二里，旧有天主教堂一座。该堂教匪聚众持械，图谋不轨。自与外洋开衅，该教匪等头戴白帽，剪发仿夷，浚池筑垒，意图负隅。若不设法早除，必为洋人内应。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三等日，有东南乡探亲妇女车辆在彼经过，被该堂教匪多人分持枪械掳入垒内，斩杀四、五人，意图镇吓，使拳民有技不能施展，令人殊深痛恨。卑州一无团勇，又无防兵，日夜焦愁，实出无计。于是激励民团，给以枪炮，与之子弹，付之饼饵，于初五日率众围攻该堂。教匪亦即开炮还击，相持不下。至初六日早，始行轰塌匪垒。该匪向西南逃窜，经义和拳民奋勇追赶，斩杀约有五、六百名，夺获器械无算。余匪向东鹿县吕家庄逃匿。伏思民团平日不食粮饷，又无军装器械，一旦以少击众，即能迅奏肤功，若不稟请加奖，不足以示鼓励。卑职拟请七品功牌六十章、五品功牌四十章到州，分别给与奖励。兹者该堂教匪既向东鹿吕家庄逃匿，探闻各处纠集教匪，意图回扑，以泄此忿。而团民等事毕各自归里，倘该教匪纠众回村，必致酿成巨祸。需得稟请饬拨一营来州，合同团民前往协力兜剿，务尽根株，以免蔓延日久，后患何堪？是否允协，理合驰稟查核，俯赐酌拟饬发，并酌拨队伍，以资防守而助擒摄。^①

“批：

据稟该州东阳台村旧有教堂一座，深沟高垒，意图负隅，经该州激励民团，以少击众，迅奏肤功。而该州素著勤能，殊堪嘉尚。所请拟发功牌，即行照发。惟所请拨兵之处，刻难照准。天津军情日急，各处援军均已调赴前敌。俟天津军情稍息，再行酌拟拨发可也。此批。

“观曹景邨所上呈文，颠倒是非，信口雌黄，以期蒙蔽上宪，诬枉教民，可谓天良丧尽者矣。庚子年间深州境内教难最为剧烈，教友被害而死者不下三、四百人，皆恶官曹景邨之罪也。”

《深州 王老寺教难记》载：

“……深州王老寺村与武邑县毗连。该村教友又素称热心，因见时局危险，遂决意据村自守，保护圣堂，兼保存身家性命，惟力是视，死而后已。然王老寺教友男女老少共计不过百名，势力甚觉不足。幸亏了临近各村的教友见大难降临，扶老携幼前往该村避难者络绎不绝，不多几天以后，人数大增。教友们都长了心火，遂一面置买军器，备办火药……一面又遣人往护驾迟连南网头去，与该二村的教友订立彼此护教的盟约……

“因当时该村圣堂是平顶的，教友就在堂顶上挖一窟窿以通升降，将火药、兵器全搬到堂顶上。……阳历六月二十六号，即阴历五月三十日，旭日初升之时，千百成群的拳匪……向王老寺扑来了。”

^① 原随文注：云云。

……教友……遂遣小吕邑村人王立江骑上走马往联盟的二村去求救。护驾迟的教友遵守盟约，立时前来搭救。到底南网头的会长李大河背约失信，不肯率领教友来打接营……

“教友们都是临时凑集的，既无统领，又无纪律。火药缸安放在堂顶上，人人能随便取用。有一粗心大意的教友取火药时，偶不经心，一星之火落于缸内，将火药全引着了。立时轰然一声，圣堂顶塌陷了一大片。教友们都没有经过战事，一遇见这样意外的变故，遂土崩瓦解，一哄而散了。拳匪乘机进村，如入无人之境，逢人便砍，见房就烧。……本村连外村的教友遭其毒手死于非命者，不下一百余人。”

《深州 东阳台教难记》载：

“……阳历七月二号，即阴历六月初六日，天一发亮，成千累万的拳匪将东阳台村的教堂团团围起来了。先用抬枪、火炮射击，曹景邨亲自督战。……午后四、五点钟之间……倾盆的大雨紧接着下起来了。拳匪们……见势不佳，都纷纷逃散了……

“及赶暴雨停止以后，已经到了深夜。教友们……彼此一商议，都看着非乘夜潜逃另找别的活路不可。到底……夜色异常黑暗，又加以道路泥泞，举步艰难，远来的外方人不识路径，妇女、孩童们力量虚弱，……所以教友中得逃了活命的固然不少，然落于拳匪之手惨遭杀戮者，计有三十名之谱。其中的十八名，据当时人传说，是被活埋而死的。”

《深州 护驾迟村教难记》载：

“前清光绪二十六年，深州县内奉教村庄受拳匪之害，除王老寺及东阳台外，当推护驾迟村为最剧烈。……当时奉教人东逃西躲，纷纷避难。别的村庄都闭关自守，不得进去，就都三五成群的往护驾迟村去避难。不数日之间，该村奉教人家填塞拥挤，为数甚伙。迨至阳历七月七号，大队拳匪闯进该村，挨门挨户，各家搜拿，不多几时，拿住了许多男女老少的教友。有领到村南场园中杀害的，相传共十三人。其实不止十三，通盘计算，大约有二、三十名之谱。其余全领到村北大庙前，一一杀害了。”

“护驾迟教友致命最晚的一个是郭俊恒。……阳历六月二十六号随其父往王老寺去助战。战败后逃往唐邱镇。迨至阳历九月初旬，洋兵业已攻破北京，各处的拳匪大半也都闻风逃散。郭俊恒估量太平无事了，乃返回护驾迟。到家后出入往来毫不隐藏，且对着外教人明明宣布洋兵得胜、拳匪逃窜的种种情形。拳匪听得说了以后，不但不凭信，反恨如切齿，于阳历九月八号，即阴历前八月十五日早晨将他拿住，用各样非刑治作难为了他好儿点钟的工夫以后，才结束了他的性命。”

《武邑 路、赵二司铎致命传略》载：

“路司铎讳懋德，号懿恭，圣名茂代斯都，法国人，生于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庚子年间是武邑等处的本堂神父。赵司铎讳席珍，号希贤，圣名来米日要，法国人，生于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庚子年间是威县等处的总本堂。”

“二位司铎被杀身死的光景，是路司铎的辅祭先生李凤常述说的。他得逃了活命以后，给总堂院长写信说：

路、赵二位神父致命前四天，罪人因见时势危急，曾请路神父给主教写信，求回献县总堂避难。以后接到主教的回信说不许回献县。致命前一天，阴历五月二十二日，赵神父从献县回威县，来到了武邑。第二天，因拳匪磨至，塞满城内，赵神父虽欲出城南去，而四门皆被拳匪把持矣。罪人遂进了衙门禀报县长说：‘东街天主堂内有两位外国教士，无人护救。我去把他们领到衙门里来。请大老爷保护，可乎？’县长答说：‘现今还不大要紧。等到急紧的时候，本县亲自去请就是了。’罪人回到堂中，向神父一告诉，神父说：‘县官知道我们在这里就毅了。保护与否，由他作主。衙门是我们不肯去的。’赵神父紧接着劝我们说：‘先生们，快预备致命罢。这个福分大概不久就要来到我们身上了。’

以后我们将临街的大门紧紧关闭，谁也不敢出去。午后四点钟，给二位神父送了茶去以后，我们五、六个人一齐进堂去念《圣心月经》。念毕，别人出堂，我独自在堂中预备第二天作弥撒的祭衣。及赶我出堂后，走到前边门房中一看，先生、车夫等全无踪影了，不觉大吃一惊。正惊疑之间，忽听见大街上人众喧嚷，势甚凶猛，砸门之声铿铿震耳，才知道是义和拳来攻打教堂，堂中的人全

纷纷逃散了。我立时转身跑到路神父屋中说：‘不好了，拳匪进来了。’路神父闻言惊起，立时跟着我出来观望。走到夹道中朝南一看，果见若干拳匪从过车门闯进来了。路神父急忙回去叫着赵神父，跑到后边小堂中去了。进去以后，将堂门锁上，跪在祭台两旁，各将自己的性命奉献于天主，并求天主相帮自己，能承当致命的苦刑。

此时间，罪人杂在人丛中，装作看热闹的，乘着机会挤将出来，躲到东邻买卖家，幸得不死。那时是午后五、六点钟之间。拳匪进院以后，知道神父们跑到堂中去了。先将堂门砸坏，然后进去，将神父的大衣剥去，将神父的手表等物夺去。以后就刀枪齐下，将二位神父杀死在祭台旁边了。杀人以后，紧接着就抢劫，将堂中各处的物件全抢掠一空。最后又放火，将一切的房屋全付之一炬，然后才得意洋洋的回到客栈里去了。末后这些残酷的情节，罪人虽未曾亲眼看见，到底是一个与我相认识的衙役入夜以后送我出城的时候，亲口向我述说的……

“二位司铎所受之伤，经武邑县长勘验后所存的案卷上记录的却极其详细。……一来因人命重案……不得不公事公办，备案存卷。……二来因庚子年间，马主教尚未荣升，但是耶稣会的会长。为巡回传教各区域的缘故，当拳祸未发作以前，往大名、广平等处去了。及拳匪作乱，圣教遭难，马会长司铎遂命驾北来，为主持献县总堂的一切事务。但因当时的拳祸北方更甚于南方，马司铎北归，来到冀州。教友们都说，北方遍地拳匪，神父想到献县去，那是万不能的了。马司铎不得已，就暂且住下探听消息。刚过了不过一两天，赵司铎的辅祭先生任振爱因原籍是威县赵家庄人，于路、赵二司铎被杀以前越墙逃走，走得逃了活命以后，就乘着黑夜，跑到冀州去了。将路、赵二司铎遭难的光景向会长神父一述说，马司铎看着路、赵二司铎是必死无疑的了，遂将冀州正堂请到天主堂内，说：‘武邑是大人的辖县，有两个法国教士，在该县城内教堂中被拳匪杀害了。请大人札飭该县县长将二司铎的尸首收殓起来，切勿抛弃失迷。’^①冀州正堂唯唯而退，大约他一定给武邑知县去了公事，命他勘验收殓被杀洋人的尸首。武邑知县……勘验后所备案卷及其上呈州官之夹单，拳祸后总堂中掌文案的先生从武邑县衙门要来，珍重收存，至今尚未遗失。原文如下：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刑北科一件勘验事

值快侯雨亭

勘验本城东街教堂被烧并杀死教士二名一案卷

勘得本城东街路北有教堂一座。走车大门向南开设。车门西有大门一道，亦向南开设。进内有东、西门土平房各一间，东土厦二间，西平房三间，南平房二间，均被拆毁。二门内有北平房五间，西平房一间。将北平房东三间烧毁，其余俱被拆毁。由东便门向北行走，有北腰房五间，西厦二间，南车棚一座，俱被拆毁。由腰房进入后院，有北房六间，尽被烧毁。东平房三间拆毁。土厦一间烧毁。已死路懋德、赵席珍在于腰房西间，头西脚东，仰身躺卧身死。该尸头颅均被砍落无存，难辨姓名、年岁。上身均穿白绵细小衫各一件，白绵细单裤各一条。腰扎白绵带各一根。两脚光赤。随飭差查找二尸头颅未获。勘毕。

五月二十三日

验得已死难辨姓名、年岁、洋人：量得身長四尺，膀宽一尺，胸高六寸。头颅死后砍落无存。致命咽喉食气嗓至合面项颈俱砍断，参差不齐。皮肉不卷缩。咽喉顺至项颈，围圆一尺二寸。两胳膊伸，两手微握。肚腹平。致命脐肚近下刃器扎伤一处，斜长七分，宽二分，深透内。脐肚近右刃器扎伤一处，斜长六分，宽二分，深透内。肾子全。两腿伸。不致命左右腿各有扎伤一处，均斜长七分，方二分，深至骨。骨不损。合面谷道粪出。余无别故。委系受伤身死。验毕^②。

验得已死难辨姓名、年岁、洋人：量得身長四尺一寸，膀宽一尺，胸高六寸。头颅死后砍落无存。致命咽喉食气嗓至合面项颈俱砍断，参差不齐。皮肉不卷缩。咽喉顺至项颈，围圆一尺一寸。两胳膊伸。两手微握，不致命右手腕刃伤一处，斜长二寸，宽四分，深至骨。骨损肚腹平，致命小腹

^① 原随文注：云云。

^② 原随文注：按赵司铎身中，路司铎身略长。此尸当然是赵司铎的。

相连刃器扎伤二处，均斜长六分，宽二分，深透内。小腹近右扎伤二处，均斜长六分，宽二分，深透内。肾子全。两腿伸。合面谷道粪出。余无别故。委系受伤身死。验毕。五月二十三日。

五月二十六日，在野地寻获头颅一具。须发脱落。面貌不清。现装于先验尸棺内。浮埋标记。

五月二十六日

稟州县夹单

敬禀者：顷奉宪谕，敬聆壹是。查卑县城内前被拳匪滋扰，焚毁教堂房屋九间，其余十七间以及土厦、车门，均被拆毁。杀害洋人二名，即经卑职亲诣验得：头颅均被割去无存，难辨姓名、年岁。一尸身長四尺，肚脐近下、脐肚近右、左右腿均被刃器扎伤。一尸身長四尺一寸，右手腕、小腹、小腹近右，亦被刃器砍扎致伤。随飭差查寻尸头未获。先行分别用棺收殓。一面复派差役各处找寻，仅获头颅一具，须发均已脱落，面貌辨认不清。装入棺内，飭地暂行浮埋标记。至卑县拳匪，现时已不知去向何处……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武邑县长将路、赵二司铎之尸首及头颅找齐之后，购买上等柏木棺材，托本城绅士董某送至献县总堂，行追思礼，与步主教同日发丧，葬于云台山后。于武邑城内二司铎被害之处建一祀堂。规模宏敞，华丽异常。县长亲撰对联匾额曰：

神依帝位

惨死同犹太罹危 惟闻十字归真 基督宗风尊大地

释仇是保罗遗训 尤愿九原垂鉴 摩西诫律化吾民

“此外又觅精巧画工绘二司铎之像，高四、五尺，悬于祀堂两壁，宛然如生。路、赵二司铎之命案，遂从此了结矣。”

《冀州 南墀等五人致命传略》载：

“庚子年拳匪邪术盛行于阴历五、六月间。教友被人杀害者，大概皆在此两月之中。至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次日六国联军攻陷京师，京津及各大商埠之拳匪皆匿迹销声，不敢再肆意横行、杀害无辜之教民矣。然离京师辽远之区，报章从未一见，邮局亦寥寥无几，于国家大事，毫无所闻。故乡间的拳匪仍有继续进行，振其馀威者。至阴历前八月初三日^①，冀州县境内五分里村又有教友五人被拳匪杀害之事……

“拳匪们将五个教友杀死以后，紧接着就拆毁圣堂，将檩梁抬去变卖。下剩的柴草同教友的尸首一齐点火烧毁了。……及拳祸平定之后，冀州的本堂雍居敬^②司铎按原地基从新修了一座小堂，规模与旧堂仿佛。又立了一座石碑，将致命诸人的姓名、履历全详细注明，永垂不朽。碑文如下^③：

五分里信友殉难记

光绪庚子、拳匪闹教、势若燎原。本村会长南墀依纳爵六十九岁，妻杨氏玛利亚四十八岁，长子永燮肋思三十五岁，长孙兰芳十四岁。七月初三昧爽，梦寐方酣，营台拳匪突来喝杀。著衣甫毕，即被擒获。匪欲拽至庙场，会长请就死于圣堂。匪允之。信友刘根常肋思，四十三岁，匿于邻家，为匪搜获，亦拽至堂中。乡人有议以钱赎命者，故匪缓杀。午刻，匪首至，下令举刀，遂皆遇害。加以薪，尸焚堂毁。呜呼！以身殉道，用征圣教之真；视死如归，实验信心之固。后世顽懦，当亦闻风兴起也。是为记。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逝世升天。

本堂雍司铎

本州正堂吴

“及圣堂落成之后，雍司铎并未依礼祝圣。特对众声明说：‘此堂经致命五人之血祝圣了，用不着我

① 原随文注：因当年闰八月，有前后两八月。

② 雍居敬(1863—?)字简齐。法国耶稣会士。

③ 原随文注：惟碑上所记之七月并南墀氏之圣名与藉司铎之原稿不符，未知孰是。

们再行礼祝圣。”

附录：

“7月7日(六月十一日)南宮正堂告示载：

照得本县迭接省中抄报：现在中外业已失和，天津官兵与洋人交战数次，幸得义和团与水会等相助，连获胜仗。是以特旨嘉奖，赦义和团无罪，不复令各州县保护教堂。此京津近日之情形也。兹因尔众乡团僻处偏隅，一时恐未周知，为此出示晓谕尔等。须知与洋人既成仇敌，则凡洋人之在我中国者，即当诛锄，以绝后患。此时杀之，尚何顾虑？其拳民既蒙恩赦，尔众乡团等即不得与之为难；但拳民既称义民，亦不能扰害尔等百姓也。总之，本县上为国计，下为民生。前日之出示禁止者，只以宪札严切，不得不然。今我中国既能振作，自应不复禁止，并准尔等齐心戮力，共灭洋人，以泄夙愤，抑亦大快人心之事也。惟此时之洋人、教民等概失所持，难保不(挺)[挺]而走险，窜扰各处。尔众乡团等亦宜先时防范。倘有洋人、教民聚众来犯，尔等务各协力兜击，毋令有一名漏网。本县实嘉赖焉。

《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附录二《外文资料(五)义和拳在直隶东南^①》辑：

9月8日(八月十五日)耶稣会士马泽轩^②写于威县赵家庄的一封信称：

“我们处在中国内地，完全与文明世界隔绝。从六月初，我们便没有向天津写过报告。即使同献县总堂联系，也是在非常困难情况下进行的。义和拳在所有的道路上进行骚扰，盘问过路的人是不是教徒，对于不叛教的人毫无恻隐之心，定杀勿赦。

“罗泽溥神甫已经放弃自己的教徒村庄张家庄，带着自己的教徒进入战壕和土围寨。他们那里，赶紧买了儿尊大跑、四十支大抬杆枪，还购买了很多一般枪支和长枪，并向义和拳进行挑战。这样，义和拳始终未敢来此攻打一下。而我们的人，有一天胜利出击，拯救在战斗中失败的教徒村庄鱼台。我们一个人没死，只伤了几个人。可是义和拳却死了很多人，丢掉了三尊大炮，还有许多枪支。神甫在那里坚持了三个月，还不时地给我们写信。他只有三个教徒村庄了，其余全部被毁。

“冯广济神甫是同我一起来赵家庄的，他连一个教徒村庄也没有了。他刚从方家寨出来，匪徒们便进了村，抢掠并烧毁了座堂、学校。在几天之内，整个总本堂区均被蹂躏，有很多教徒被杀害。

“芮卿云^③神甫——赵家庄公学的院长，未遭义和拳的迫害。不然的话，他会同我们一样，被包围，昼夜不安。公学院没有开学。

“万其偈神甫已经丧失全部小教徒村庄。这些村庄为义和拳所破坏。他的两座新教堂，在七月间被烧毁。现在他只剩下两个大教徒村庄，即潘村和魏村。这两个村庄相隔只有半里路。

“在魏村，教徒们在既没有战壕又没有围寨的情况下，同人数众多、带有大炮、枪支的义和拳打了三仗。这些人每次作战都是四个村庄联合起来，约有五百人的小队伍，为保卫他们的房子和教堂，以及他们的传教士，真有奋不顾身的精神。义和拳在第二次战斗中出了六千多人，时为7月20日。义和拳打仗全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我们的教徒头裹红十字，是为天主而战斗。老弱和妇女在教堂或村边诵经祈祷。

“22日，义和拳又来了，这次决意同我们战到底。他们已经抢掠了教徒村庄钟(管)[官]营并放火烧了教堂。而我们的教徒，看见火焰时，并不在乎，带着三尊大炮从赵家庄冲出去，杀向敌人。敌人退到他们活动的基地——一个非教徒村子里。教徒们拔除了这个村子，并把以前被义和拳抢掠的胜利品全部弄回来，包括所有军需和战争物资、小麦、牛肉、大炮和枪支。

“从这时起，我们就安静了。民团几乎一致要求同教徒和好。义和拳的残馀，便四散奔逃了。以后是否就不能再发生了呢，事实上，这个穷地方一直是充满着骚乱，明天怎么样，谁也不敢肯定。

① 原编者按：以下两份耶稣会士通信，见法文《学习》(Etudes, 耶稣会传教士通讯刊物)1904年10—12合订本。此处是摘译。

② 原编者按：作者马泽轩，当时系献县耶稣会(院)[会]长，以后升为直隶东南教区主教。

③ 芮卿云(1854—1923)，字世隆，法国耶稣会士。

“在范迪吉神甫的传教区域内,什么也没剩下。范迪吉、孙汝舟、金道宣、齐广照^①、明嘉录^②(中国)、吴书恩(中国)、杨纯和^③(中国)等神甫及冀炳业^④修士等八人均被驱逐出大名府城。7月6日,他们误入黄河以南。南乐离大名府只有几里路远,很快就被人抢光。他们逃跑是踏地走的,不敢从大路走。如同被人寻缉的野兽,这藏藏那躲躲,漂泊无定。有(的)[时]钻洞,有(的)时钻篱笆,有时住草棚。他们就是这样从一些勇敢胆大的非教徒那里或几个教徒家庭那里,获取食物维持生活达一月之久。除齐广照和杨纯和二人外,他们都是在8月3日才到达这里。样子是何等狼狈,身上只穿着一件裤权和衬衣。就在这个时候,匪徒们也消除不了他们喜悦的心情。神甫们虽然一贫如洗,可是仍然高兴、满意,特别是金道宣。

“毕如(喜)[春]神甫从开州跑到山东胶州。还有贺乐耽神甫,他们二人一起投奔德国传教士那里去了。

“我们赵家庄总本堂区原有我们十一个耶稣会会士,另外还有四位不在修会的中国神甫。我们不能接受献县总堂和天津的任何物质援助。我们依靠自己很小的经济力量和教徒们少得可怜的奉献,来维持我们的最低生活。因为今年大秋几乎颗粒不收,所以教友们都很穷困。

“山东南部教区(鲁南)代理主教福若瑟很了解我们的困境,给我送来了一百两银子,还有一封慰问信。”

1900年8月17日耶稣会士贺乐耽在上海写给法国耶稣会总会长的一封信称:

“我现在给你报告两件事情,一个是我的总本堂区肥乡以及广平县,直到我出来的情况;另一个是我旅行山东,从西到东直到胶州的情况。

“关于在中国近几个月期间流传着的一些流言蜚语,我不打算讲了。我要从这里开始,就是从金道宣神甫由这个衙门送到那个衙门,由广平府到大名府,俨然如同押送犯人一样——这个地方开始。

“6月26日,我到了广平县。第二天,三点钟左右,我听到一阵儿大车过路的声音,紧接着便停止了。忽然有人来敲我的门。开门以后,金道宣神甫的先生来到我的房间,很勉强很吃力地说:‘神甫,金道宣神甫正在衙门口,人家叫他上车去大名府。赵席珍神甫和路懋德神甫在武邑被杀害。’说完就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守夜的看见义和拳领着无数的要饭花子,打开了广平府的大门。抢粮食,砸家具,还威胁着要杀死神甫。神甫赶快跑到知府或知县处避难。晚上,有人叫神甫上车。他赤手空拳,连日课都没有带,这样就从广平府送到大名府。一路上,衙役们不断放出风声,说押送神甫到大名府去执刑。

“当神甫到了大名府,又被人送到衙门去。忽然间全城发出了呼声,要置神甫于死地。在同一时间,一大群人冲着我们住宅跑来,整整砸打了一小时。幸而我们的门、墙都很坚固。最后,一位教书的先生从园子里跳墙出去,跑着去报告指挥官。指挥官才把乱民驱散。

“正当广平府和大名府发生这些事时,我去了张屯(音译),它是我的一个主要教徒村庄。它的东边就是山东省边界。我打发了一位送信的去告诉范迪吉神甫:我在这里,是否去大名会聚。张屯离大名府有三十五公里。啊,三天过去了,还没接到回信。我继续等着,这时候送信的一个接着一个地告诉我关于教徒村庄被抢掠和焚烧的情况,计有:肥乡、广平县、东张寨、沈子营、东营、成谷、张家庄、王家庄、葫芦营等等。我的教徒村庄,几乎在一天内全部被毁灭。在成谷,义和拳把教堂根基都拆掉后,把他们的旗帜插在废墟上。在这个村庄,教书的贞女同她的大女生,躲到南韩村的一个教徒家里。他们以为在那里就可以平安无事了。可是到傍晚,匪徒们就去抢掠并烧毁了房子,并把贞女连她的学生一起弄走了。在18人中,有好几位才年满18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她们的消息。

① 齐广照(1857—?),字煦初,法国耶稣会士。

② 明嘉录(1855—?),字食德,河北河间人,耶稣会士。

③ 杨纯和(1858—?),字裕如,河北威县人,耶稣会士。

④ 冀炳业(1866—1935),字克勤,法国耶稣会士。

“我正在张屯反复考虑这些问题时，我的教徒来给我报信说：听他们的非教徒朋友说第二天黎明时，要抢劫我的房子。从赵席珍神甫和路懋德神甫被害以后，到处都流传着这样的话，说北京发出明文，一定要传教士的命。我的教徒们催我找个妥善的安身地方。可是，我往哪里去呢？大名府对我就好像一个投鼠器，进去容易，要想出来非常困难。另一方面，我的主要教徒村庄已经是一片瓦砾。于是我决定到郭庄去看看动静。郭庄是山东省马主教属下的一个小教徒村庄。我是在天亮三点钟以前动身的。我刚到郭庄，我的在张屯教书的先生们便跑来向我报告，说我的主要教徒村庄被洗劫和我住过的房子被抢掠的情况。馆陶的马快，第二天还准备去帮助破坏、烧毁教堂和房子。

“在郭庄，也差不多充满了义和拳。在教徒们的要求下，我决定去坡里庄——德国传教士的一个教徒村庄。动身前，我给会长马泽轩写了一封信，把我隐藏的大概地方告诉他。晚上九点，我去了坡里庄。

“在坡里庄，我遇到了吴书恩神甫。他是同他的教书先生骑驴来的。他根据范迪吉的指示，要在这里等几天看看事情的发展。他给我说：范迪吉神甫携同其他留在大名府的神甫，两三天内也要来这里，以便去江苏省徐州府，投奔我们在那里的传教士。同时，道台在夜间告诉范迪吉神甫，要派一小部分兵来保护他们，因为全城到处都是‘大刀会’。

“听到这个新闻以后，我考虑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上船顺运河去济宁州，再转徐州府……”

“我留在青岛，直到德国汽船把这帮山东的德国传教士运往圣地；等待时机好转。我也就到上海去了。”

《中国基督教史略》第六章《中国的东正教》第二节《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载：

“二、第二阶段(1861~1902)

“……这一阶段中，传教士团在张家口和汉口建立了两座教堂，但全国东正教受洗信徒并未超过700人。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也给中国东正教会带来了巨大打击，北京、张家口的教堂全被焚毁，彼得·卡缅斯基修士大司祭建立的极有学术价值的图书馆（其中收藏着巴拉第的珍贵的佛学研究著作）也被付之一炬，200多名东正教徒被杀。”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赵永生《法国传教士关于天津义和团运动的通信》辑：

5月25日刘克明(Guilloux)于北京致法国某传教士函称：

“……现在已经有若干教友被杀，许多村庄被焚毁。义和团不只仇恨教会，而且仇恨一切洋人。昨天和前天，他们切断了由北京通往天津和保定的两条铁路。

“……各国驻津使节几乎都已经致电海军将领，要求派遣军队来保护使馆和教会。

“至于我们……已经通知全体传教士将自身托付给天主。”

5月30日刘克明于北京致法国某传教士函称：

“和天津方面的交通已经恢复，明天我就可以回天津了。已有大批军队去阻止^①焚毁火车站和保护洋人家属；另一部分则环城设防。已经开始进行查拿……”

“中国政府如有诚意，是可以控制时局的。不幸的是它不能采取决策。今天早晨，《北京新闻报》(Gazette de Peking)登载了禁止义和团的上谕。这是过去请求了好久而未见允的一件事。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内地相当多的地方危机还在加重。大家担心北京附近失火的消息将会使混乱扩大，义和团也就要更加大胆了。”^②

5月30日富成功(Fabregues)于丰润县黄花港致巴黎遣使会总院函称：

“总督虽然派了一千官兵来保护教友，却不见效果……”

“15天以前，丰润县曾一度情况紧张，现在略为平静。义和团却在迅速发展，无人阻拦，县长拒绝

^① 赵随文注：义和团。

^② 赵注：以上两封信原载《遣使会年鉴》，1900年合订本，第531~533页。

过问此事。数日以来,有人在鼓动人们反对我们,并且还散布谣言,贴揭帖,说洋人在井里下毒药。有的揭帖说我们该杀,因为天主教使外教的神明不悦……

“法国驻津领事已催逼总督派来 250 名官兵,兵头应该在今天来见我。……他们一来会平静几天。我们在他们身上并没有什么信心。保定府有 1000 名官兵,然而他们却不打义和团,这里的 250 人又怎能济于事!

“这一切事情的祸根都潜伏在朝廷内部,有人保护乱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

“保定、易州、霸县、定兴、天津等地都是一片烧杀。人们烧毁教友村庄,杀害教友。北京也一度十分危险,致使有些档案都已经埋藏起来。现在那里有 75 名法国兵。高家庄的仁慈堂大概已经被毁。永平府的仁慈堂处境也很危险,应该迁往天津才是。离天津只有 20 里地,人们就在杀人放火。已有 600 名教友逃入租界。租界里正在准备打仗。有 100 海军应当下去。领事馆成了避难所,正在加强防御。大沽口有 20 余艘兵船。

“以上是罗德芳从天津向我报告的新闻。”^①

6 月 14 日刘克明于天津致步师嘉(Boscat)^② 函称:

“刚刚日趋繁荣的北京教区的全部事业尽成废墟。这种情况在北京教区的南部和北京附近地区已然成为事实。京东、宣化府等地不久也将如此,义和团正在向那些地区进攻。我们只剩下了几个据点,教友们在那里武装抵抗,直到今天。别的村庄许多家教友都逃进了这几个据点。可是这小小的堡垒也会接连失守,到那时,死人只能比别处更多一些。

“在北京和天津,我们已收容了一些逃出活命的难民。我们这里已有 1200 到 1300 人需要养活。北京方面,人数会更加可观。

“直到目前,西方列强为保护我们究竟作了什么? 没有作什么大事情,但又不好说他们什么也没作。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烧杀正在继续迅速进展。

“耶稣会士们的教区和我们的教区都经受着同样考验。我相信,正定府的教会一定吃了苦头。我们只有天主可以指望了。

“又及,没有新的通知,请勿向北京邮寄任何包裹,内地无法邮递,只能被焚毁或者被抢走。”^③

8 月 7 日顾英才(Corset)于日本长崎^④ 致步师嘉函称:

“7 月 4 日,从保定方面得到消息说,步主教(Butte)所属教区发生了骚乱。这是耶稣会士的教区,位于直隶南部。那里的教友们成功地自卫着。中国军队由梅将军^⑤ 指挥与洋人配合良好,协力打退了进攻。不久,北京朝廷对这位将军大加训斥。后来危险加重,耶稣会士再次向他求援,遭到了他的拒绝。

“在中国,由乱匪及叛民发动的此种暴动是经常发生的;在一般情况下,正规军会迅速予以平息。这一次却不同往常。本堂有两位住在农村的中国神甫告诉我们说,许多村庄的外教人都组织起来侮辱教友。不知是哪些大官或有名望的人给他们下了密令……

“5 月 27 日到 28 日夜里,义和团在京保线上炸断了一座桥梁,烧毁了许多车站。有一部分工程师回到了北京,另一部分逃往保定。然而他们认为保定不会安全,遂乘帆船向天津逃命。沿途受到了攻击,每走一步都得和义和团打仗,许多人受了伤,有 4 男 1 女中途掉队,被义和团杀了。

① 赵注:原载《遣使会年鉴》,1900 年合订本,第 534~536 页。

② 遣使会中国南省的会长。当时在上海。

③ 赵注:天津“首善堂”档案。

④ 赵注:顾英才在 1900 年 7 月上旬,奉刘克明之命离开了天津。他和由上海到天津探听风声的助理修士雷声远一起经烟台到了日本长崎,准备从长崎再去上海向步师嘉汇报中国北方的情况。顾英才听说上海也不安全以及中国军队要封锁长崎,不许外国船给大沽口和天津的洋人增援,他惊魂未定,就在长崎逗留下来。

⑤ 赵注:即梅东益。1899 年 11 月 17 日,献县的传教士葛光被报告法国驻津领事赛来德(Chaylard)说:“总督若不下令剿办拳匪,将来中国国家必受大害……”赛来德乃迫使直隶总督裕禄派梅东益率军门前往河间等地镇压义和团,保护教堂。参见刘毅孟多《义勇列传》,第 1 册,第 477~481 页。按:赛来德杜士兰的另一译名。

“义和团破坏铁路，此事非同小可，公使们开始求援了。第一批军队顺利地开到了北京。6月5日，义和团拆毁了北京天津之间的铁路。西摩尔将军的部下于6月10日从天津动身，被迫与中国兵开了火，幸有俄国军队助战，方能于26日退回天津。在西摩尔将军起身北上以后，义和团向教友们的进攻更加疯狂。

“6月13日，日本驻京公使被杀。

“北京和天津城里已经尽是义和团了。15日到16日的夜里，天津城郊共有12处起火，‘得胜圣母堂’^①也被焚毁了，这对教会和法国都是奇耻大辱。

“第二天夜里，我军组织进攻，杀义和团千余人。大沽口炮台在凌晨1点半钟开始向外国船开炮，到7点钟3座炮台都被打下来了。消息立即传到了在天津的总督耳中。6月17日^②天津的中国炮台也开了火。

“天津已有2000名教友自各地逃来，住于法国租界。中国的大炮在向我们的居住区散布着死亡。”^③

6月24日顾英才于天津致步师嘉函称：

“8天以来，我们已经陷于垂死境地。中国的大炮不断地向租界里轰击，真是吓人。中国兵躲在掩蔽物后面向我们洒来弹雨。若是他们有法国人那种勇气，我们早已经完了。

“昨天来了援兵，在中国城郊发生了一场激战。结果，俄国兵攻占了中国的军械局和望海楼教堂附近的炮台。

“我们正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下，医院里收容满了伤员。死亡掠走了它的牺牲品。教友们都吓呆了。最叫我们担心的是樊国梁和林懋德二位主教还没有音信。使馆已经接到了退出北京的命令，我们的主教是否也和他们在一起呢？野蛮的中国人是否已将他们杀害？……

“我们的修女照顾伤员十分热心，刘克明、罗德芳和我照料那些快死的人。多么悲惨！希望天主赏我们好日子过。

“有一颗炮弹在路易斯修女的脚边爆炸，她却没受伤。教堂也挨了一炮。外国军队将会用西方的现代化武器结束中国的野蛮。

“我在这里给你写信，远处就在打仗，可以听到大炮正在怒吼。”^④

6月29日顾英才于天津致步师嘉函称：

“近日以来比较平静……

“从北京来了一个教友，他告诉我们，东堂的艾儒略神甫和李神甫以及另外一个中国神甫都被烧死了。相信还有别人也殉难了。

“北堂安然无恙，外国人都逃进了英国使馆。许多使馆遭到烧毁。据说，德国公使在去总理衙门的路上被杀死了。

“对北京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希望，只能依靠天主了。”^⑤

7月法国传教士马良(L. Marion)写于上海的通信称：

“军队聚集在大沽口。由于给养缺乏，决定将没有作战能力的妇女、儿童送往上海。昨天已由一艘中国公司的船只送到了。另一部分在天津不能守卫租界的洋人由大沽口去了日本。

“步师嘉派雷声远弟兄去大沽口和天津探听消息。

“昨天，根据天津来的洋人说，天津的洋人还活着，只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法国领事的秘书，另一个

① 赵随文注：即望海楼教堂。

② 赵随文注：星期日。

③ 赵注：原载《遣使会年鉴》，1900年合订本，第537~542页。

④ 赵注：天津“首善堂”档案。

⑤ 赵注：天津“首善堂”档案。

是某英国商人的(用)[佣]人。他们还说,传教士和修女都平安无恙,修女们护理各国的伤员。

“天津的租界里共计有 16000 名洋人,相信他们是可以抵抗义和团和中国军队的。

“可惜的是军队太少了,因而不能去援救北京……”

“数星期之前,有北京耶稣会神甫拍来电报,向路克塞尔(Rouxel)报告耶稣会死了两位神甫,遣使会的聂神甫和鲍神甫也死了。

“天津似乎已经脱险了。”^①

7月18日刘克明于天津致步师嘉函称:

“7月14日以后,我们呼吸比较舒畅了一些。这天早晨5点钟,法国和日本国旗在中国的城墙上飘扬了。10点钟,俄国人攻占了那座使我们吃了许多苦头的炮台。

“北京方面迄无音信。……保定方面也没有消息,谣传那里的基督教的传教士都已经被杀死了。

“昨日知府转来一封中文信,这信确实地报告了我们堂区的聂、鲍二位神甫的死信。教友死亡人数在 200 至 300 之谱。”^②

8月27日刘克明于天津致步师嘉函称:

“林懋德主教来了一封信,带来了极珍贵的消息。同日,樊国梁主教也来了信。

“现在聂神甫的死已经没有问题,他是被义和团烧死的。他的同伴鲍神甫是在逃跑时被杀死的。

“使馆方面始终没有提到过教会方面的消息,原因是使馆和北堂断了联系。

“天津的电报还没有恢复。曾经给知府去过几道公函,需要两三天才能送到……”

“戴德荣^③(Dehus)已去北京,他的教友为他真是累赘。我也是这样,没有住处,没有吃的,我想从上海弄些米来,可是从塘沽到这里的运输又如何解决呢?”

“樊国梁主教要我去北京,可是在罗德芳回来之前,我是无法脱身的。”^④

9月7日刘克明于北京致步师嘉函称:

“这里比天津自由一些……”

“保定方面消息很不错。新建的大堂被拆毁殆半,社保禄却逃到了安家庄,教友们在安家庄自卫得很好。东间也是如此。似乎正定府还没有挨打。然而整个堂区目前只剩下了两个堂口。双树和西河营方面,德懋谦(Vanherseeke)^⑤已逃到双树包士杰(Planchet)^⑥那里去了。谢嘉林(Catheline)^⑦现在在西河营。……估计这个堂区至少死了 2000 名教友。

“蒙古方面的情况更加严重。荷梅尔^⑧(Homer)主教及其属下载教士,还有很多教友均遭杀害。

“我去查看了仁慈堂,情况太可怕了。谅来修女们已经向您汇报了这里的情况。……结局将会怎样?一切都很阴暗,特别是这里的情况。”^⑨

1901年7月29日^⑩步师嘉于上海致巴黎遣使会总院函称:

“天津地区之损失更是不可数计。

“先是天津发生了可怕的围困,特别是法租界,它和中国地只隔着一条白河。

“中国地一直向白河和运河的两岸延展开去,将外国租界紧紧地包围起来。在 1900 年的围困时

① 赵注:原载《遣使会年鉴》1900年合订本,第542~544页。

② 赵注:天津“首善堂”档案。

③ 赵随文注:法国传教士。

④ 赵注:天津“首善堂”档案。

⑤ 赵随文注:法国传教士。

⑥ 赵随文注:法国传教士。

⑦ 赵随文注:法国传教士。

⑧ 韩默现的另一译法。

⑨ 赵注:天津“首善堂”档案。

⑩ 此文摘内容时间下限是 1900 年,故至于此。

期,天津只有3个租界,即:法租界、英租界和德租界。3个租界都位于白河右岸。

“天津解围后,方才开辟了别的租界。河的右岸,美国租界和英国租界相连,日租界则位于中国地和法国租界之间;河的左岸是奥、意、比3国的租界。经过若干波折,俄国人在法租界的对面河岸上也开辟了租界。

“这样一来,白河的左岸也和右岸一样,落到了外国人的手里。如果一旦再发生义和团之类的暴乱和围困,外国人的居住区就比较广阔,而不致像去年那样四面受敌了。

“中国城位于运河和白河的右岸,正好是在运河流入白河所形成的夹角里。

“运河和白河所形成的另一个夹角里是望海楼教堂。这座教堂原是遣使会士谢福音所建,在1870年首次遭到焚毁。1897年,樊国梁主教在法国驻京公使施鄂兰的协助下重行建造,至1900年6月15日到16日的夜里,再次遭到焚毁。

“1900年和1870年,破坏者都曾多方设法,而钟楼皆未毁坏……

“在去年天津被围困的时候,白河左岸尽是大盐堆,真可以说是盐山。义和团和正规军躲在盐堆后面,几乎没有任何危险。他们向当时的外国租界,特别是向法租界的较近距离点开枪,满满收容着要死的人和伤员的圣鲁易教堂和圣若瑟医院正好处于火力之下。我们的办事处和修女院也满是死人和要死的人、伤员以及从外地逃到天津来的教友们……

“攻下了天津城,摧毁了炮台之后,租界才得到了保障。然而传教士、教友和教堂的情况却怎样了?……有两名中国传教士被杀死了,其中聂神甫是我会的会友,鲍神甫是不在会的。和他们同遭杀害的还有3位若瑟会的修女和很多的教友。”^①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②的回忆》载:

“我是甲午年(1894年11月30日)生人。

“那年的夏天,我不知是哪一天了,我的全家人,从我村黄古庄(景县)逃到了青草河去。这村在景县城西南、朱家(和)[河]东南。距县城十华里,距朱家(和)[河]也是十华里。那年(1900年)阳历7月20日,即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朱家(和)[河]被陈泽霖的官兵和义和团攻破了。当时青草河的人都很害怕。我那时却不知害怕,因为我那时不过是个七岁的孩子。

“我在青草河共住了半年多,记的同义和团共打了三回仗。因为没有官兵来一起打,所以青草河没有被攻破。我看见教友们在围子上放枪,也看见了义和团向围子内放的笨炮弹,是大圆铁球。

“那年在朱家(和)[河]住着两位外国神甫:任(P. Mongin)、汤(P. Denn)二人;在青草河住着两位中国神甫:周、潘二人。但为何在朱家(和)[河]住外国神甫、在青草河住中国神甫呢?我长大以后,听见人们说,是因为朱家(和)[河]的条件好,围子坚固,青草河的条件不好,围子不坚固。可是,结果朱家(和)[河]被攻破了,青草河却未被攻破。我后来也听见我家的人们说,我们全家人本来也想逃到朱家(和)[河]去,只因那里人住满了,不再收容了,所以,我们才逃到青草河。如果我们逃到朱家(和)[河]去,我也就死在那里了。”

《义和团运动史》第二篇《义和团极盛时期》第三章《京外各省之举动》附录:

“直隶省

京城外栅栏地方:焚毁教堂,杀教民一百数十人。

通州:教堂教民房屋皆焚,耶稣教徒被杀者一百二十四人,天主教徒无考。

宝坻县:官兵团民二万余,在大宝甸与教民大战二次,嗣经马玉昆劝谕,教民始缴械。

武清县:教堂教民房屋皆焚。

^① 赵注:原载《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361~364页。

^② 原作者赵振声(1894—1968),字化民,河北景县黄古庄村人,耶稣会士。1938年3月就任献县教区主教,直至去世。曾于1948年代理北京总主教区总主教。自1957年8月起先后担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和河北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是河北省人民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

密云县：杀教民三人。

保定府：团民官兵围东间村天主教堂三月，大战四十二次，团民死二千余人。教堂未破，教民死六十余人。

安肃县：团民万余。围安家庄天主教堂三月，交战二十余次，未破，团民死千余人。

束鹿县：团民二千余人，与教民相持月余不胜。

天津府：教堂皆焚，教民死者无考，教民房屋皆被焚。

南皮县：焚杏行村、张义恒庄两教堂，教民死四十余人。

盐山县：焚城内教堂，教民死六人。

滦州：焚教堂六所，死教民十余人，团民死数十人。

河间府：境内杀洋教士二十一人。

河间县：焚教堂四处，教民死一百五十余人。团民五千余围范家圪塔教堂三月，未破。又围蔡间村教堂，团民死数十人。

任邱县：焚教堂四十余所，杀教民三百余人。围段家坞教堂三月，掘地道，筑炮台，百计围攻不破。

献县：焚南北两立车村教堂。团民四、五百人攻东大过村教堂，死数十人。又团民三、四千人，围攻西大过村教民，亦不胜。又围郭家庄教民三次，团民死伤甚多。

交河县：团民、教民各死数十人。

肃宁县：杀尚村教民五十余人。杀王家庄教民三十八人。

景州：焚城内教堂。团民二万人围朱家河教堂，江西按察使陈泽霖率勤王兵助战三昼夜，破之，杀教民二千人。

阜城县：教民死二百余人。

正定府：正定府属拳民数万，焚教堂近百所，焚教民房屋四千余间。

顺德府：城内教堂打毁。

永年县：毁教堂一所，教民死一人。

威县：焚教堂一所，杀不肯出教之教民四十余人。团民、官民万人围攻教民六、七百人，大战三次，兵民不胜，丧失器械极多。

清河县：焚教堂三十余所，教民死二十八人。

肥乡县：焚教堂二十余所。

大名府：拆毁城内教堂。

宣化府：府城教徒死三十余人。

延庆州、龙门县、赤城县：教民共死一千四百余人。

西宁县：焚深井教堂，教民死三百余人。龙门房村教民死于此者七十余人。又围西合莹教堂十余日。

怀来县：围双树子教堂数日，未破。

蔚州：教民死约百人。

涞水县：焚教堂一所，杀教民七十三人。

冀州：杀不肯出教者四十九人。

枣强县：焚教堂一所，杀教民三人。

衡水县：教民死十三人。

新河县：拳民二百余人，杀不出教之教民九人。

武邑县：焚教堂一所，杀法国神甫二人，教民一百三十八人。

南官县：教民死二十三人。

深州：教民死三百六十四人。

饶阳县：团民穷搜各村，杀教民二十余人。

安平州：杀教民十八人。

丰镇：(略)

遵化州：杀女教徒五人。

山海关：教民死四人，毁教堂，拆教民房屋三十余间。耶稣教传教士在直隶途中被杀者二人。”

“山东省：

泰安、武定二府及临清州等所属三、四十州县焚教堂数百座、教民二千余家，杀教民二百九十余人。”

“河南省：

武安县：焚教堂十余座，教民房屋千余间，育婴堂中女孩五十及女师二人被掠卖。掘教士坟一，虐杀教民三十余。

涉县、临漳县、汤阴县、内黄县、滑县、辉县等处教堂皆毁。”

“内蒙古

热河一带，杀教士一人，焚毁教堂十余处。杀教民三百余人。焚毁教民房屋甚多。”

《中国基督教史纲》第十七章《庚子的教难》载：

“其次说到直隶，总督裕禄，臬司廷雍，都是毓贤一路人。四五月间，拳风已大炽，蔓延几遍全省，几乎没有一个村庄不习拳棒，老者黠者，充头目师兄，天天以搜杀教民为事。北京城内已闹得天翻地覆，其他各城各村，亦莫不风声鹤唳，杀人如麻。教友们无处逃，只好团聚一庄，掘壕筑垒，以备抵御。这种为保全性命的不得已办法，官厅不谅，倒说：教友聚众备械，抗拒官兵，形同叛逆，官兵乃助拳匪围攻。景州朱家河，成为教友避难[麋]聚的地方，遭李秉衡率兵北上，其部将陈泽霖路过其地，州官乃诬称朱家河洋人聚众谋逆，请其剿除，于是千数百教友与两神甫皆被惨杀，陈泽霖因此得着西太后的特赏。南皮县(吉)[杏]行村也发生同样的惨剧，被匪攻破，有聂、鲍二神甫与一百多教友同被杀。宣化府有数百教友避匿山洞中，被拳匪积薪洞口，悉数烧毙。献县地方，被活埋了一百多人。巩村地方，有拳匪一队来搜捉教会中人，将赵牧师及刘姓教友杀死，并开膛破肚，尸首扔在河里。保定孟继先牧师，他劝教友们都躲到别处，自己与西牧师等留待殉道，后来果然被拳匪杀了。美以美会的教友被杀死的，据一位海牧师当时报告，说在开平有45人。另外在逃到天津的路上杀了3人，因逃难而饿死的六七人。……在延庆有60岁的一个老牧师陈大镛一家4人，都被杀死。迁安一处惨杀死了91人之多。……在迁安把一个姓吴的女教友拴在庙里的柱子上，用一大把香烧她的脸，又把四肢剥下来，堆在门外用火烧。

“在蒙古天主教分三区，受祸之烈，不下山西、直隶。在东区因滦平知县三星仇教，有把司神甫活埋的惨剧。中区西湾子总堂，逃难教友五、六千。团结自卫，散处他方的十之八九皆被杀。被害的有三千二百多人，内有神甫5人。西南区殉难教友八百余人，内神甫4人。”

《中国天主教史》第十章《不平等条约时期》载：

“在这无数的被害人中，有一小伙可以就目睹的人确切证明他们真是为了信仰而致命的，教宗比约十二世将他们列入真福品：……在直隶献县教区殉教的有四位耶稣会神甫，五十二位年龄和身分不同的男女教友，于一九五五年列入真福品，其中一位十四岁的少女——王亚纳，生前即志行纯洁，德行不凡，真不愧称为中国的圣依搦斯。”^①

1901年 光绪二十七年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辑：

1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军机章京鲍心增呈说帖称：

^① 这是正文的一个注解。

“近闻保定来人述藩司廷雍被害情形，极为惨毒陵辱，甚伤国体。彼族以纵拳杀教为辞词。查廷藩司自护督篆后请剿拳匪各奏甚多，若执以辩论，即属无罪之人……”

“廷雍护督后剿拳摺片多交内阁发抄；八月廿一请剿办拳匪摺，又请拿办党拳之道员谭文焕片，廿七遵旨派队剿办拳匪摺，闰八月初三护送正定等处洋人到京片，游击范天贵等剿办拳匪情形片，又覆陈安肃等处教堂并未派兵围攻片，十二[日]请革办妄充团总之庶吉士杨锡霖片，又参城守尉奎恒纵容旗丁设立拳厂片。”

2月16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报载：

“顷接法国使臣函称‘本年夏间大乱，河北道岑春荣出有告示，致该省北境教会全行被劫。武安县教民多被残害，并有掘毁教士坟墓之事。现教士拟与新抚商办，既不接见，写信亦不回答。另有教士前往涉县，该县车令著名仇视洋人，毫不设法保护，若不严飭保护，则教士性命堪虞。……并飭赶紧拨发银五万两，将来由赔款内扣除。地方官亦应为该教士等从速寻觅相宜寓所，将来派兵护送前往居住’等语，并将岑道告示两张抄送前来。查该道告示援引谕旨激劝拳民灭教焚堂。现议约内第十款必须遵旨惩办。务飭著将河南北境乱时所出各教案会同主教商办完结，仍妥为保护，免其藉口寻衅。”

2月18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河南巡抚于荫霖电报称：

“查河北武安县教案，前经飭司委候补直隶州孔广聪前往，会同已撤县陈世伟与罗教士、司教士议定，共给赔修抚恤银一万三千馀两，仓谷三百石，已将银、谷交清，与各教士业经公同立约。旋于十一月间只据司教士来文一次，内称‘善后未协’，并无信件。……各教士并未有来省求见之事。涉县教案，已飭彰德府就近委员会同该县与教士议定，偿银二千两，并筹给房租米石，抚恤教民，并追出教民等所花社会钱文给领，亦立约画押。已将该县车均撤省查看。……兹又将河北道岑春荣撤调，另行委署。此河北教案已办现办之实在情形也。”

4月16日(二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抚于荫霖摺称：

“当上年夏间……彰德府属则有孤悬直隶境内之武安县，首被邻省乱民勾窜入境，焚烧高村教堂，困逐教士，掘动已故教士坟墓，以致境内教民仇愤愈深，旋有教民持刀纠党抢夺，激怒居民，放炮转斗，彼此互有杀伤之案。其余各县虽未杀伤教民，而涉县有温村教堂屋顶烧毁，教民失去钱物之案，临漳县教堂封顶锁，则有教民门窗被毁、数家失去财物之案……”

“恭奉电谕严催，遵即筹银五万两，发交候补道冯光元携款渡河，访晤司德望，妥为议办。现经该道一再酌商，所有教堂被毁之武安、涉县、临漳……八县估计共赔银十一万两。教民毁坏房屋、失去财物之武安、涉县、临漳……十县共赔银六万两，二共银十七万两。遵奉谕旨，先付银五万两。……其避患迁徙教民急宜抚恤。前已由司德望筹发银一万馀两议明无庸偿还外，再由各县动发仓谷：武安县一千二百石，滑县六百石，涉县、辉县各三百石，临漳、汤阴、内黄各二百石，交教士转发穷民分领。仓谷不敷，每石折银一两，照数核给。至案情较重之武安县，前经知县陈世伟捐赔修墓、赁屋、抚恤各项银一万三千二百两、仓米二百石。涉县境内，前由知县车均筹给购房银二千两，捐放小米二百石，及代赁民房养伤杂用约计银二百两，均已先经立约完案，交割清楚，不在此数。其案内滋事各犯，惟武安县最重。除命案要犯另行严缉外，余议查缉案犯至多不过十五名，分别轻重，枷责锁押。”

“至所指各员，查……涉县知县车均自行捐筹银三千馀两、米二百石，撤省后业已禀准开缺、回籍。武安县知县陈世伟自行捐筹银一万三千二百两、仓米二百石，早已撤省，均经先行专案议结，该主教又有致公使‘勿追究’之语，亦均请免其置议。河北道岑春荣先经撤任，办理未善，实属咎有应得，应请革职。”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二册《景州朱家河教难记》载：

“收骨殓葬

“……当年冬天，连第二年春天，因为这些人命的重案未曾了结，故殓葬之事亦无人提及。过了一年以后，于光绪二十七年阳历六月间，葛大司铎与河间知府，连景州知县，磋商数次，方拟定三款了结此案。一、在景州城里为传教士置买公所一座。二、以一万吊京钱在朱家河修圣堂一座。三、以一万吊

京钱殡葬死难的教友。此外惩凶赔偿之事，一概免究。

“条件议妥之后，当年阳历十月二十一号，万保禄司铎才奉命去收拾遗骸，装棺入殓。万司铎往朱家河去的时候，携带着照像机匣，一到堂门前，先将那些伤心惨目的景象就地摄影，以作纪念。然后修理房屋，制造棺材，招募工人，并置买器具、布匹等件，预备了一个月以后，诸事齐备了，于十一月二十一号才起头工作。

“收敛骨骸的时候，万司铎亲自监工，一天也不离朱家河。一来是因为他拿了主意，若找出囫囵尸首来，就用中国式的棺材各自装殓起来。至于零散的碎骨头，就装在他以先定作的躺柜中。二来是因为他受了上司的托付，务要尽心竭力找出任、汤二位司铎的遗骸来。到底这两个目的一个也未得达到，无论堂里堂外，连一个囫囵尸首也没有找着。至于任、汤二位司铎，据亲眼目睹的人都说他们死在祭台前边了。到底因为皮肉业已烂净，须发彼此绞乱，在一堆长短不齐的枯骨中实在无法辨认。

“将圣堂中的骨骸收拾完了以后，就去收敛街道上，连寨壕中的骨骸。暴露着的，就聚敛起来；掩埋着的，就搜罗出来。这两样工作虽然污秽烦难，进行的还算顺当。末末了为捞出婴孩院中苦水井内的骨骸来，可把万司铎连工人們的奋勇都叫短了。因为井内的水混黑臭恶，那时又是冬天，谁也不敢下去。不得已，就围着井挖了一个大圆坑。及赶挖的与水皮平了，刚一起头打掏井中的黑水，忽有一种腐烂污浊的气味从水中冒出来，臭恶难闻，熏得人人呕吐，东奔西跑的纷纷逃散，谁也不敢近前了。万司铎看着那番工作实在不能进行，就命人连坑带井一齐填塞，把那些骨骸埋在底下，当作一个孤坟就是了。

“将朱家河村内的骨骸收拾完了以后，又往路庄去收敛朱日新等四十九人的遗骸。因为那些尸首埋的不深，过了一年多的工夫，经了两次伏天，刨开一看，也但剩了一堆骨头，张三、李四也无法分辨了。

“阳历十二月十八号，把二、三千人的骨骸全搜寻聚敛起来以后，还有一段最后的工作，就是装棺入殓。按外教人的意见，若是把许多亡人的骨骸男女不分、乱三绞四的扔在棺材里，万万使不得。到底当着那个光景，除了这样装殓以外，谁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但为免得被外教人耻笑，所以万司铎为装殓那些骨骸，但用奉教人。外教人不但不用，尚且还不许他们近前。装殓以前，先在那些躺柜里糊上白花蓝布。装满了骨骸以后，盖上一层黄绸子。一共装了六十柜。万司铎亲自看着将盖钉上，并将各柜内的骨骸是在何处找着的，找着的时候是什么光景，全一一写明，贴在柜上。然后将那六十个大平棺材停放在露天的旧堂里，门窗全用砖堵塞住，以防有人进去移动。以后光等着举行大礼，殡葬入土一件事了。”

《庚子记事》辑《高楠日记》载：

“卷四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①十六日(1月6日)……德兵拉三河县郑某来。德官问其民何故杀教民。曰：‘教民欺之甚，故激而至此。’德官沉吟曰：‘此你心中之话乎？抑实事乎？’曰：‘需索钱财，皆有实据。’曰：‘究竟那面不好？’曰：‘两面皆非好人。’曰：‘你官做得不好。’曰：‘固然某做得不好，然一邑三、四百里，无焚教堂事。此次一经报案，某即拿犯。某日报案，某日拿，恰拿九人。遇德兵来，不知其详，将我拉至京。’……又问为首一犯曰：‘你们太爷喜义和团乎？’犯曰：‘太爷见团即逐，不喜也。’曰：‘你为何杀教民？’犯曰：‘教民勒索钱物，欺人太甚，忿不能忍，拼此一命，以杀之。’德官乃留犯而叫郑回三河。”

“(十二月)初六日(1月25日)……寇英曰：‘……现在高楼村之阎老虎与其子秀才皆正法，以其首延义和也。’”

“卷五

(光绪二十七年元月)十六日(3月6日)金波来。近来教案往往因道府督催速了，以致奸民怂恿教

^① 据原书内容标出，下同。

民，勒索赔偿，因事后均分之地。索赔愈多，民心愈愤。好勇斗狠者又布散流言，乘机起哄，以图家家打教，为劫掠之资。即如上年涞水县高楼村教案，起事不过口角，保定教士书函但曰：‘村民骂教为邪教，请斟酌责罚。’并无他言。清河道乃与易州朱乃恭飞文稠迭，紧催速了。其初需钱六十千，该道州嫌少，谓不似教案不好看。遂陡长为千数百金，且多格外要挟之事。此皆莠民闻道州之言，阴窥朱某之心为之也。该县坚持不加，将教案了息，后被劾去官。而高楼村原止教民六家者，遂骤添为数十家。村民愤而习拳，放火、杀人、戕官因之以起。此可见道府督催之有损无益也。”

“(二月)十三日(4月1日)……苏福到，言高楼村事皆阎老福及其子绍修所为。去年……七月后，团党遵示撤团。阎绍修不撤，团党殴之。绍修诉于官，反谓伊要撤团，团党不撤。须臾团众百余亦控于官，官乃置之法。乃父阎老福逃匿天津，缉之以归。夏辛酉军搆送到县。入县城时，阎老福曰：‘要见老爷。’押差漫应之，甫下车即行刑。其家中人分散逃去，其家产被教民分而有之。”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一册《任邱段家坞教难记》辑：

3月18日(正月二十八日)，任邱县正堂呈禀上宪文

“卑县地面辽阔，教民较多，被拳匪扰害情形亦较他处尤重。上年剿平拳匪，卑职即传集四乡村庄绅董，谕飭赶紧将流落在外各教民招回本村，先行酌给资粮住处，一面邀请教士回任商办安抚教民事宜。嗣据教堂查报：卑县境内共计教民八百一十户，被拳匪烧拆教民住房共计砖瓦土房八千零三十间，侵损一切什物难计其数。焚毁教堂房屋三十五处。卑职遂与教士以及绅董人等筹议赔偿章程。原议按照烧毁房屋办理。该教士以为未能公允。酌定教民有地一百者给钱若干，侵损一切什物均在其内，归教士自行查明散给。共计教民粮租地一百九十顷，连赔偿焚毁教堂，索要京钱七拾伍万吊。卑职以兵燹之后民力未逮，万难凑此钜款。再三与教士相商，愿其稍从末减，以恤民困。承教士让至五拾万吊，并准将各村酌给教民粮食钱以及教民私行讹索之款作抵。卑职尚以款项太钜，筹措为难；而各村绅董既恐教民私讹，又怕洋兵剿办，均愿照教士所定章程办理。即由四乡十二镇绅董在闾属三百数十村庄分别有团、无团，秉公派办。各村民亦知事不可缓，皆踊跃输将。计共收交现京钱贰拾四万馀吊，先行写给字据。本年麦秋后再行交付者共计京钱拾四万馀吊，此外尚有教民私讹之款以及各村自行恳求教士作抵者，共计京钱拾壹万馀吊。以上统共京钱伍拾万吊之谱，均由绅董人等送交教士，分别散给各教民领回安业。所有教民被拳匪烧掠讹索之案一律完结。惟杀死教民之案，果系确实正凶，或首要拳匪人所共知者，准其指名控究，否则亦一概不准混告。业经会同教士酌拟章程，出示晓谕。现在民教相安，地面尚属靖谧。”

《义和团史料·史籍汇录》辑《周馥年谱》(选录)载：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六十五岁

“……和约条款中最要者，以惩办京师祸首、议赔兵费为大端。而最急迫繁杂者，莫如京内教案及顺直通省教案。当拳匪乱时，教民房屋无不被焚，田禾无不被割，家具无不被抢。即为教堂服役者，为教民佃田结婚者，皆莫保性命。毁房殆数万间，戕害教民及平民牵连受害殆数万人。即教士茇地为国初以来奉旨赐祭葬者，皆被掘毁。康熙年间掳来俄罗斯人数十家久入旗籍者，亦被焚杀。先是，京中教案无人赔偿，各使请将教堂赔款归于兵费汇算；其抚恤教民一事，由中国派员查办。于是庆邸、李相国奏派余与张燕谋京卿翼会办京中及顺直教案。张系姻亲，因事赴津，余遂独任。余复奉旨派议民教永远相安章程；屡商各国教士及洋官，皆言各国无此章程，教民皆在法律之内。洋官不问，各教士皆不相辖，难出意见，迄无端绪。

“自二月至四月，勘视各处教堂茇地，屡与法国主教樊国梁等及英、美、俄各教士商订办法，计剔归国家大赔款四百馀万两；又京直两处各请部款二百万两；民间实摊捐三百馀万两；其民间私偿者约数十万两；教士亦减让二、三十万两。其杀戮教民凶手概取悔过甘结，不诛。于是京中、顺天、直隶教案全了结矣。余心力亦为之大耗。

“时各县教民藉洋兵势力报怨寻仇，无不鸱张横行。而黠民之先当拳匪者，遂不敢归家，亦结党劫掠。洋兵搜剿，玉石不分。……六月二十二日到保定接藩司印。时法国兵仍在省城未退，衙署颓败，无

门窗板壁，仅存数柱撑(柱)[拄]椽瓦而已。”

《献县天主堂资料·一、献县天主堂往来信》载：

“二十

耀德大司铎先生大人阁下：

……弟有致保定城内贵国总教堂杜主教一函，又致总巡捕樊大人名维阿一函，又致美国路子修牧师名崇德一函，统共三函，请费神附便寄至保定，分别转交为祷。

再，前蒙惠赐贵国文字便览一本，(贵堂所存直隶一省舆地图，若蒙惠赐一轴，愈感盛情。即未裱者亦可。)便于学习，亲友托购者多，务求掷下五、六本，交去人带回，以便转送亲友。该价若干，并希示悉为荷。……

愚弟吴^①焘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十五日(1901年1月5日)。”

“二十一

大法国马、高、葛^②大人阁下：

……弟任献县年馀，时与马、葛两位大人往还，叨教良多，莫名欣幸。前月因公赴献，趋诣贵堂商办各事，仅与葛大人畅叙渴悰，而高、马两位大人未得晤谈，即匆匆赴深州接印受事。……弟接篆以来，倏经半月。……前将抚恤教民暨赔偿房屋各事宜洋定章程，专函贵至贵堂商办。适葛大人因公赴郡，经马大人斟酌议定，弟即将章程开折，专差寄保定巴大帅行轅备案矣。现在清查教民被烧房屋。一俟查清后，即照议定章程办理……

愚弟吴焘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十八日(1901年1月8日)。”

“二十二

耀德仁兄大人阁下：

……前因武邑王桥、尚家庄一带匪徒聚集，以致敝处与该两村接壤之握幞头村蠢蠢欲动，敝处教民实有畏惧迁避者。当经敝处禀经吕军门、郑统领先后派兵剿拿，随即解散。……敝处发巴大帅信之时，事已大定，未敢再烦巴大帅清听。现在教民已渐回家……

名正具。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廿六日(1901年1月16日)。(深州吴焘)”

“二十三

耀德大司铎仁兄大人阁下：

……深邑抚恤教民之事，前经创拟章程，寄蒙马总司铎指示四则，已于折内更正，通禀各宪，迄今未奉李中堂批示，不(如)[知]何故。现已派令书吏会同教民前往四乡确查被毁房屋数目，大约再有数日可以查清。弟派差役、把什保护查房之教民，谅可无虞。第恐款项太巨，为期太迫，只好尽力捐办。顷据敝处公议局绅董蔡家张村张洛申面称，安平县槐林庄教民张洛化领人将伊家抢掠。查张洛申系弟派令帮办公议局抚恤教民事宜之绅董。张洛化无故滋扰，殊与近日巴大帅在省告示有违。且深州本境教民极为安静，乃张洛化越境搅扰，更恐与捐事有碍。用特专函奉恳，务望费神，严飭张洛化不得再行滋事，自取咎戾……

名正具。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初八日(1901年1月27日)。(吴焘)”

“二十四

耀德仁兄大人阁下：

前者两奉寸函，未获赐覆。是否遗失，深以为念。此处捐事，因查各村之地，未免耽延，现在甫有交钱者，惟有竭力催办。至罚款已有二万之谱。惟潘凤台处并未存有贵堂空白保险护照，无凭填发，以致各村观望。且近来时有洋兵南来之谣，民心甚为不定。若有贵堂保险护照，则罚款一节，定可格外踊跃。否则筹措数十万巨款，殊形棘手。特此专函奉恳，务望推情将贵堂保险护照酌发

① 时任深州知州。

② 马泽轩、高逸休、葛光被。高逸休(1849—1915)，字怀德，法国耶稣会神甫。

百数张。遇有罪名稍轻，实非杀人凶犯，果能竭力捐助以赎前愆者，即可填给护照，以示鼓励。或将护照即交潘凤台收存，商酌填发亦可……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腊月廿三日。(1901年2月11日)(吴焘)

敬再启者：前以教民讹索有碍捐事，当即函达台端，谅应察及。无[奈]教民讹诈良儒，日甚一日。弟处现已出示严禁，将来恐须酌办数名，方能挽回此风。兹将所出示稿录呈^①，祈查收。仍望费神，严谕各该教民毋再滋扰，是所切禱。潘凤台办事老成，深知大体……

外抄告示稿一纸。”

“二十五

敬启者^②：

本年拳匪滋事，其风系由南而北。有州境拳匪越境扰及他县教民者，而州境教民被他县拳匪扰害者亦复不少。若展转株连，互索赔费，不但影射堪虞，必致彼此纠缠，永无了结。以弟愚见，必须各办本境之拳，各抚本境之教，庶可早日蒞事。敝属饶阳县亦以前情具禀，务望费神函达保定、正定各主教，转飭各堂一律办理。

缘日前有束鹿县华教士李广明到深面谈三事：

一、因深境教民逃至束鹿老家营，计用饭食银一千五百两；

一、深州白浪寺村人管待拳匪饭食，以致各处拳匪均在该村聚齐，欲罚该村钱一千吊；

一、深州徐家湾徐洛可等随同拳匪烧抢束鹿小李老庄教堂，拉去稍门桌椅陈设等物，嘱追原物，并罚钱三百千。

弟以目下正在筹款赔还本境教民房产，力难兼顾。是以李教士所嘱束鹿之事，只好暂缓。一面差拿徐洛可等，均已逃逸。州境教民被毁房屋，现已查清三路，惟剩东南一路尚未查毕。其中扒成平地者固属不少，然尚有仅将房顶扒去，四面山墙丝毫未动者；有连房顶未动，仅止拆去门窗者。房屋被毁，既属轻重不同，将来赔款不可不量加分别……

前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廿三日(1901年2月11日)。(深州知县吴焘)”

“二十六

耀德仁兄大人阁下：

……前承寄来中西文字六本，本宜将书价奉缴。但弟前函所取系中西语言翻译之书，弟前次在献，曾荷高谊赐过一本，因为友人携去，故再奉恩费神，另祈代购数本。又贵堂坤舆图及直隶一省州县村庄图，如有存者，各检一幅，均祈掷交去差携下，其价若干，同中西言语书价，一并奉上。前次寄来之中西文字书六本，兹特奉缴，望即查收。再贵堂有无寄卖绘图机器及小式测远测高仪器，并单筒看及二十里之远镜？需价若干，祈赐示复，以便另专妥人备价走取。外土仪数色，望即晒收……

愚弟吴焘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廿七日(1901年2月15日)。

再启者：前闻包司铎^③有正月来深之说，拟于何日由献动身，务望先期示知，以便专车奉迓……”

“二十八

耀德大司铎先生大人阁下：

……弟与交河苏、侯两姓虽有瓜葛戚谊，然与老鸦村侯连璧即侯甄甫、苏凤瑞即苏集轩素不相识。去年冬间，该两家……托舍亲来函，谓老鸦村教民张永堂家妇女被害，实系该村匪首王亭勾串大树阎庄宋抛火所为。至大树阎庄苏凤瑞亦系无辜被累。舍亲曾托教士葛学曾、萧寿山代该两

①：原注：外抄告示稿一纸未见。

②：原书不著姓名。从内容看应是遣使会所辖教区(直隶北和直隶西南)的传教士。

③：鲍体乾。

家设法。葛、萧两君云张永堂持之甚坚，渠等无能为力；若托弟致函贵堂，移文交河堂中查办，再由公议局绅士会同葛、萧两君从中调处，酌令侯连璧、苏凤瑞两家给张永堂殡葬钱文，即可了此公案，云云。……兹特将舍亲来信缘由专函奉达，可否由贵堂移文到交河堂中查办，统候尊裁……

愚弟吴焘顿首。光绪廿七年正月十一日(1901年3月1日)。”

“二十九

耀德仁兄大人阁下：

潘凤台回深，奉到惠函，得悉一切。此处捐款，因上年奉到李中堂批示过迟，刻下正在催办。兹特遣车并马队四名迎请鲍司铎来深面商一切……

名正肃。辛丑正月廿二日(1901年3月12日)。(深州正堂吴焘)

鲍司铎前为先为致意。

再启者：月之十六日，据敝处南周堡村民人石金声呈报，十四日早，有王辛庄教民李立等及大于林教民于保全等率众前往伊村开放洋枪，致将伊年甫十三幼子石根旺放伤身死。当即往验属实。差拿李立未到，将李恒、李多、于保全获案提讯。该教民等出言强横，目无官长，当即各予酌责。旋据潘凤台等查明，此次滋事，李恒、李多实未在场，随即当堂开释。至于保全即于九柱一名，访闻实曾同往，究竟是否正凶，俟质审明确，照例办理……

名前具。光绪廿七年正月廿二日(1901年3月12日)。(吴焘)”

“三十七①

……弟本拟刻赴台端恭贺新禧，奈近来筹办抚恤，日不暇给。昨又拿获拳匪王洛万一名，虽系前岁鲍教士案内呈控之人，惟查该犯籍隶武邑，素为著名匪首，未便轻纵。或经解武邑，或押赴贵堂，统希裁酌示知，以便遵行……

愚弟周斯亿顿首。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正月十九日(1901年3月9日)。”

“四十九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敝处安集教民事宜，现已妥议章程八条。其赔偿各款酌中核定。计款已属不貲。饶邑地瘠民贫，加之历年水患，户鲜盖藏，筹办巨款殊不容易。然系境内民人自作之孽，究无所用其顾虑。若如弟在唐山任内，当拳教相仇之时，设法严禁习拳，彼此相安无事，何至于此？其款年内一准可以筹出一半，下俟一半开正以后亦必办齐。内以查封拳匪家产为一宗，拳匪罚款为一宗，余系按户摊派，宽假时日，庶可搭派公允。兹将章程另录一纸，特令翟绅持赴尊处与阁下面商。务祈核准照办……

教小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初一日(1901年1月20日)。”(饶阳县叶溶光)”

“五十

……敝处安集教民事宜，先于安绅回县时酌定人口，将回县教民给予仓谷每人六斗。至一切章程早已拟定，本拟派人亲赴贵堂商办，因大雪阻滞不果。至应交钱文，分派各局绅赶办，已有头绪。并将拟定章程令翟绅与安绅会商妥贴。现在催令翟、安两绅准于二十九日驰赴贵堂，将安集章程呈候阁下定夺签覆，以昭周妥……

愚小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初一日(1901年1月20日)。”(饶阳县叶溶光)”

“五十一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敝处安集教民事宜。弟前赴深州谒见州尊，并与潘凤台先生晤面，即由其另派王、李二位先生于十一日来饶，会同局绅下乡清查，散给恤款，一切数目悉照深州章程办理，约需十日方可竣事。顷闻贵国巴大帅由省起身赴献县，并往新集一带。经过何处，阁下想必早闻。务望费神开示路程

① 致步天衢函。

单一纸。如须经过敝处，语言互异，且恐无知民人心怀疑虑，并望赐给护照，庶彼此酬酢可以相通也……

教小弟叶溶光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十四日)(1901年2月2日)。”

“五十二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敝处安集教民事宜。前经阁下派出王、李二先生来饶会同查办，统计砖、土房屋被毁者五百三十间，应给恤款均照吴州尊所定章程办理，每房一间赔款若干，再将被毁家具赔给一分。计共应给恤款京钱六万八千余吊。敝处前次筹出款目，只敷敝处所定章程一半之数。现系仿办州定章程，致有短缺。当与王、李二位先生商明，先于年内酌给三成，于本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日分乡发给。计发过京钱二万三千吊。下徐七成给予执照，内将房、地并未发之款填写明白，待明春款目筹齐后再行定日持照具领。全局已定，堪告竣注。地亩籽粒，深州系统统酌赔，敝处亦当仿办。计被毁地三千零三十亩，应赔若干，明春发款时再议。王、李二先生在此办事，毫不袒护徇私，极为公允……

教小弟叶溶光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廿七日)(1901年2月15日)。”

“五十五

大司铎大人阁下：

……弟于前月十七日莅任安邑^①。……眼前时令严寒，所有被害之教民人等无衣无食，情殊堪悯。现在经弟各处察查，亟欲为其了结，以故事极纷纭，不克亲聆雅教，恨也何如。兹弟在于城内设立公议局，邀集城乡绅董并教民中老诚练达之人，共同酌议抚恤之条，赔偿烧毁房屋、器皿、什物等件。正在会商间，接奉本州来函，并与阁下订定章程十条。……弟即会同局董将原订章程按照地方情形稍行变通商酌，仍复循式开条，于本月十三日亲自持赴本州衙门面禀细底情形。拟将所议条款即行由州持趋崇阶，敬请酌夺定规，以便遵办。无如弟正在州，即于十三日晚刻接到敝署来信，以宅后寺等村教民聚众持枪，有放死宗家庄之曾学拳者并平民共计五名口及伤重而未死者几人，又烧毁房屋二十余间之案。见信之后不能不赶紧回安，亲往勘验弹压。是以次日一早回署，仍未赴堂聆教。现因此案未了，一时仍难分身，用特先行备函，并将议定抚恤教民章程一并专丁奉请裁夺。是否可行，祈速示下。弟拟三、两天后案件稍行清理，即速趋聆台教。乞恕迟延之愆是荷。

再有愿者：敝处抚恤教民之条，虽已议有头绪，但无镇摄之人。将来善后事宜，办理甚属棘手。务愿急由阁下派一教长，速令来安，以便由弟请其同为助勤，庶各局董均有所恃，此事易于了结。……另备菲礼，开单奉上，至祈查收，代为分给守护贵堂之兵勇人等具领……

愚弟名正肃。十二月十六日(1901年2月4日)。(新任朱贞保)”

“五十六

大司铎大人阁下：

……敝处分别赔偿教民一事，经弟设局邀董，并蒙执事派来杨司事一同入局会议，诸事已有就绪。所有章程概遵州式，早经开明，寄请查核在案。共计应用之款为数甚大。因查拳劫田房无多，商由各村绅董分别按亩摊捐，当面定于十二月廿六日一齐交清，以凭督同发领。

现据各村董会同来县[向]^②杨司事并弟处竭力恳求，以今年度岁匪遥，民间困苦已极，实难一律捐齐，务必施恩宽缓等情。……弟与杨司事因看各村情形年内集此巨款实有为难之处，不得不代民间转求阁下从宽，限至明年正月内由弟飭令清缴，再行分给各村教民一一收领。

惟现在时届年终，教民被难以后，度岁窘迫不堪，惟弟已于月之廿五日开仓抚恤谷石。但每人

① 安平县。

② 此为原整理者所校。

所得为数有限,不足以济其事。经杨司事议定,将局董缴来之钱先行分给教民。房屋被烧者每人京钱五吊,房屋未烧者每人京钱贰吊,庶几勉强可以卒岁,不至有呼冻馁之虞……

愚弟名正肃。廿九日(1901年2月17日)。(安平正堂朱贞保)

再,如果各村董明正捐钱误期,并村中倘有不肯慨捐之人,定将误期之村董暨不肯捐钱之人严传来案押缴。倘在押后仍未交清,定将其房屋封锁抵销,以禁效尤而惩不法。……”

《献县天主堂资料·二、赔款合同清单》载:

“一 阜城县赔款合同

“今将阜城县境内于光绪二十六年五、六月间被拳匪杀害教民、抢掠财物、烧毁教堂教民房间各节,现于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1901年7月24日)在献县总教堂偕同阜邑绅士与葛、周大司铎面为商定,并请府宪王谕示,除烧毁教堂八座,议定京钱六千吊,稟请归大赔款议结外,所有议定赔偿教民房间、什物,并被害殡资等项,总共京钱陆万吊。现已交付京钱叁万吊,下短之京钱叁万吊,准予八月十五日一律交清。兹立字据四张,各执一纸为凭。”^①

“二 故城县赔款合同

“今将故城县境内拳匪拆毁天主教堂,损失财物,并伤害教民人口,烧毁教民房屋,遗失财产什物等件逐一查明,秉公酌议赔款。于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1901年7月25日),在献县总教堂随同府宪王会商葛、周大司铎三面议定,除将城内拆毁总教堂一座,各乡拆毁枝教堂拾柒座,共计应赔京钱壹万柒千吊归入大赔款议结外,所有教民被伤人口、被毁房屋,以及财物家具各项应行赔抚之款,逐条核定数目,分期交付:

“一、被毁砖角房捌拾肆间,每间赔京钱壹百吊,并财物在内,共合京钱捌千肆百吊。

“一、被毁土房肆百伍拾柒间,每间赔京钱捌拾吊,并财物在内,共合京钱叁万陆千伍百陆拾吊。

“一、现存砖角房叁拾间,财物一空,每房一间赔京钱伍拾吊正,共合京钱壹千伍百吊。

“一、现存土房玖百叁拾间,财物一空,每房一间赔京钱肆拾吊,共合京钱叁万柒千贰百吊。

“一、赔还教民被匪讹诈京钱叁千贰百陆拾壹吊。

“一、赔还教民铺户数家买卖资本京钱壹千吊。

“一、人命拾贰名,每名给殡资银伍拾两,共合银陆百两。

“以上七款通共合银陆百两、京钱捌万柒千玖百贰拾壹吊。除伍月内付过京钱壹万吊,下欠京钱柒万柒千玖百贰拾壹吊,言明柒月初壹日交钱壹万吊,捌月初壹日交钱壹万吊,拾壹月初壹日交钱壹万柒千玖百贰拾壹吊。下剩京钱肆万吊,定期明年贰月内扫数清款,不得逾期。”

“三 献县赔款合同

“今将献县境内查明被匪烧毁各村教堂及堂内损失家具等件,现与葛大司铎并府宪王面为搏节估计,议定价目,俟稟请归入大赔款内议结。至教民被匪烧抢房物及被害人口酌给抚恤殡资各款,已于截至四月二十八日陆续一律交清完案。兹将各款数目开列于左。

“计开:

“一、赔偿被毁砖土房屋并酌给被害人口殡资,共京钱三十四万零八百吊文。

“一、修筑各教堂土寨并各州县赴堂避难教民食费之款,共京钱四万三千六百八十二吊八百文。

“以上共计京钱三十八万四千四百八十二吊八百文,均经交清,并无蒂欠。

“一、各村被毁大教堂十三座,并堂内损失家具等件,议定共京钱三万六千三百吊文。

“现酌议请归大赔款内办理遵行。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1901年7月26日)立”

“四 交河县已结教民命案清单

“交河县今将已结天主教民被害男女大小各命案开单请核。

^① 合同持有人落款名衔从略,下同。

“计开：

“一、教民张永堂呈报被害女大口三命，业经断给安葬费钱壹千贰百吊文。

“一、教民萧宗恒呈报被害女大口壹命，现已自行完结。

“一、教民李凤远等呈报被害男女大小拾命，已获匪正法；并断给安葬费，钱文已于上年禀明在案。

“一、教民李元东呈报被害男大口两命，除仍飭捕缉凶外，已断给安葬费钱捌百吊文。

“一、教民孟文安等呈报被害男大口壹命，现已自行完结。

“一、教民李洛八呈报被害女大口壹命，现已自行完结。

“一、教民梁福祥呈报被害人命一案，现已断给安葬费钱肆百吊文。

“一、萧留信村呈报被害男女大小陆口，共罚徘徊村钱壹万吊文，内除安葬费钱陆千吊外，余肆千吊已议定由该村应领房价内作抵。

“光绪贰拾柒年陆月拾壹日(1901年7月26日)”

“五 交河县赔偿教堂房款清单

“交河县赔偿被烧扒中式天主教堂房屋，以及抢掠供器家具开单请核。

“计开：

“洼里高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捌百陆拾伍吊。

“徐郭村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壹百玖拾伍吊。

“千里屯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叁百贰拾伍吊。

“韩官屯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壹百柒拾伍吊。

“王银庄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叁百玖拾吊。

“亭子河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壹百捌拾伍吊。

“马家村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叁百贰拾伍吊。

“豆庄屯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柒百柒拾吊。

“八里庄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陆百吊。

“以上九处共合赔京钱叁仟捌百叁拾吊文，除县属郝村在张庄教堂保险钱壹百贰拾吊作抵正款外，该净赔钱叁仟柒百拾吊，业于本月贰拾日如数付清。

“光绪贰拾柒年陆月拾壹日(1901年7月26日)”

“六 交河县赔偿教堂房款清单

“交河县被烧扒西式天主教教堂砖土房屋，以及抢掠供器家具，理合开单请核。

“计开：

“萧留信砖土堂房一座并供器家具，合京钱伍仟零肆拾吊。

“郝村砖土堂房一座并供器家具，合京钱壹仟捌百陆拾吊。

“陈辛庄砖土堂房一座并供器家具，合京钱壹仟零伍拾吊。

“苑马头砖土堂房一座并供器家具，合京钱壹仟零伍拾吊。

“西杨庄砖土堂房一座并供器家具，合京钱壹仟贰百伍拾伍吊。

“县城内砖土堂房一座并供器家具，合京钱肆仟柒百玖拾吊。

“以上陆处共合赔京钱壹万伍仟零肆拾伍吊文，业已禀请由上赔办。

“光绪贰拾柒年陆月拾壹日(1901年7月26日)”

“七 交河县赔偿教民房款清单

“交河县按照张庄教堂章程，赔偿天主教民被烧扒砖土大小房屋间数、钱文清单。

“计开：

“一、查教民被烧扒砖房壹百玖拾陆间，每间连屋内物件赔京钱壹百叁拾吊，共赔京钱贰万伍千肆百捌拾吊。

“一、查教民被烧扒砖角、砖面、砖帽土房共叁拾肆间，每间连屋内物件赔京钱壹百吊，共赔京钱叁

千肆百吊。

“一、查教民被烧扒土房共柒百伍拾柒间半，每间连屋内物件赔京钱捌拾吊，共赔京钱陆万零柒百陆拾吊。

“一、查教民被烧扒砖门楼共贰拾壹间，每间赔工料钱叁拾贰吊伍百文，共赔钱陆百捌拾贰吊伍百文。

“一、查教民被烧扒土门楼、门屋、耳屋共玖拾肆间半，每间赔工料钱贰拾吊，共赔京钱壹千捌百玖拾吊。

“一、查教民被烧扒棚子共贰百拾玖间，每间赔工料钱拾伍吊，共赔京钱叁千贰百捌拾伍吊。

“一、查教民仅被扒去砖房之门窗共陆间，每间赔工料京钱拾伍吊，共赔京钱玖拾吊。

“一、查教民仅被扒去土房之门窗共陆拾间，每间赔工料京钱拾吊，共赔京钱陆百吊。

“以上共合京钱玖万陆千壹百捌拾柒吊伍百文，除上年已赔京钱肆万叁千肆百零玖吊外，该再赔京钱伍万贰千柒百柒拾捌吊伍百文，于本月十五日如数赔清。

“光绪贰拾柒年陆月拾壹日(1901年7月26日)”

“八 东光县赔款合同

“今将东光县境内查明被匪烧毁各村教堂教民房间、被戕教民以及堂内损失什物并教民家具等项，应赔上项各款，业已一律议结，交付清楚完案，合将详细数目开列于左。

“计开：

“一、被毁教堂拾肆座并堂内损失什物等件，共京钱壹万陆千贰百伍拾伍吊。

“一、被毁教民砖房拾间并损失物件，共京钱壹千叁百吊。

“一、被毁教民砖角房贰百叁拾壹间半并损失物件，共京钱贰万叁千壹百伍拾吊。

“一、被毁教民土房伍百玖拾伍间半并损失物件，共京钱肆万柒千陆百肆拾吊。

“一、教民仅失去什物等项一共京钱陆千贰百叁拾柒吊。

“一、被戕教民男女大小共壹百拾玖口，酌给埋葬资费壹万肆千贰百捌拾吊。

“以上统共议赔京钱拾万捌千捌百陆拾贰吊，现已一律交清完案，并无蒂欠。

“又教堂执事卢万清续领交河县教民死于东光境内男女三名口埋葬银壹百伍拾两，已于五月二十七日领讫……”

“光绪贰拾柒年陆月拾壹日(1901年7月26日)”

“九 宁津县赔款合同

“今将宁津县境内查明被匪烧毁教堂、教民房间，被戕教民，以及堂内损失什物，并教民失去物什等项，业将上项各款一律议结，交付清楚完案，合将详细数目开列于左。

“计开：

“一、被毁教堂砖帽房拾伍间并损失物件，共京钱壹千伍百吊。

“一、被毁教堂土房柒拾贰间并损失物件，共京钱伍千柒百陆拾吊。

“一、被毁教堂车棚肆间并损失物件，共京钱壹百陆拾吊。

“一、被毁教堂棚子、角门拾叁间并损失物件，共京钱伍百贰拾吊。

“一、教民被毁砖帽房肆拾伍间，并失去物件，共京钱肆千伍百吊。

“一、教民被毁土房伍百叁拾贰间半并失去物件，共京钱肆万贰千陆百吊。

“一、教民被毁车棚拾肆间并失去物件，共京钱伍百陆拾吊。

“一、教民被毁棚子、角门壹百捌拾叁间，共京钱叁千陆百陆拾吊。

“一、加添议赔砖帽房京钱柒百拾肆吊。

“一、被戕教民男女大小捌拾伍口酌给埋葬资费，共京钱壹万贰千柒百伍拾吊。

“一、被扰教民抚恤衣食等款，共京钱叁千壹百叁拾伍吊。

“一、教民被匪讹诈财物等项议赔，共京钱柒千贰百伍拾陆吊。

“以上统共议赔京钱捌万叁千壹百拾伍吊，现已一律交付清结完案，并无蒂欠。

“光绪贰拾柒年陆月拾五日(1901年7月30日)”

“十 河间县赔款合同

“今将河间县境内查明被匪烧毁教堂教民房屋，以及堂内损失什物，并教民失去骡马、车辆、衣服、首饰、财物、家具、农器、粮食各节，合将议定各项数目细数开列于左。

“计开：

“一、教民被毁砖房玖百捌拾八间半并房内失去财物，共京钱拾贰万捌千五百零五吊。

“一、教民被毁土房贰千壹百玖拾陆间半并失去财物，共京钱拾柒万五千柒百贰拾吊。

“一、教民被毁门楼、棚子柒拾柒间，共京钱壹千五百贰拾柒吊五百文。

“一、赔偿教民籽粒，共京钱玖万贰千陆百肆拾吊。

“一、被毁中式小教堂肆拾贰座并堂内损失物件，共京钱叁万贰千贰百五拾捌吊(城内教堂失去物件赔款在内)。

“统共京钱肆拾叁万零陆百五拾吊零五百文，除付叁拾陆万贰千零五拾肆吊，下应找京钱陆万捌千五百玖拾陆吊五百文(言明八月十五日交清)。

“一、教民男女被害壹百五十二口，应即另行清理。

“一、被毁洋式大教堂九座，内除卧佛堂教堂已经修理外，仍应赔款京钱叁万壹千柒百三十五吊(归入大赔款结算)。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1901年7月30日)订”

“十一 肃宁县赔款合同

“计开：

“尚村、葛家庄教堂各一处，刘家坞、北答、王家庄诵经公所各一处，共砖房六十间，每间酌赔京钱一百五十吊，祭器什物等件在内。共土房三十七间半，每间酌赔京钱八十吊，祭器什物等件在内。以上两项，民间困苦，万难加捐，应请大司铎稟请归入大赔款核算，共计壹万贰千吊。

“教民砖房三百九十六间半，每间赔京钱六十五吊；遗失衣服、车马、零碎物件计加一倍。教民土房六百四十一间半，每间赔京钱四十吊；遗失衣服、车马、零碎物件计加一倍。杀毙人命共大口七十二口，小口二十六口，无论大小口，每口给埋葬银七十两。以上共赔京钱拾万零二千八百六十五吊，肃市平足银六千八百六十两。内除去冬散放过京钱二万六千三百七十八吊，教堂保险共钱六千七百三十三吊，银八百六十两。教民私自说息者，堂中准其归入赔款，现在飭查，俟查明数目若干，在于赔款内开除。下余抚恤银钱，分七月初一、九月初一两次散放。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日(1901年 月 日)”

“十二 武强县赔款合同

“今将武强县境内查明被匪烧毁教堂、教民房屋，荒芜地亩，被戕教民，以及堂内损失物件，并教民家具等项，应赔上项各款，业已一律议结交付清楚，合将详细数目开列于左。

“计开：

“一、被毁教堂四座并堂内损失什物等件，共京钱五千八百千。

“一、被毁教堂砖房三十九间半，连什物每间一百六十千，共京钱六千三百二十千。

“一、被毁教民土房一百三十四间，连什物每间一百千，共京钱一万三千四百千。

“一、被毁教民砖包面房十七间，连什物每间一百二十千，共京钱二千零四十千。

“一、被毁砖土棚子、大门、车门共四十间，酌赔京钱一千零八十四千。

“一、教民仅失去什物，毁败树株，并加恤无房地等项一切，共京钱七千九百八十二千。

“一、教民大口一百九十三名、小口六十一名赈济，每大口四千，小口二千，共京钱八百九十四千。

“一、教民荒芜地十二顷十九亩，每亩四千，共京钱四千八百七十六千。

“一、被戕教民男女大小九口，酌给殡资钱四千五百千。

“以上统共议赔京钱四万六千八百九十六千，现已一律赔抚清结完案，并无蒂欠。为此缮立清单，互存备查。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 日(1901年 月 日)”

“十四 安平县赔款合同

“大清国直隶冀州知州调署深州知州吴，大法国天主教会总理直隶河间、献县、深、冀等处堂务葛，大清国候补直隶州直隶深州安平县知县王^①，会议安平县属教案，业经持平议结。自议之后，均不翻异。合将拟议各条开列于左。

“计开：

“一、安平教堂、公所共四处，除宅后寺、大转村、槐林庄三处经上宪商议，允准剔归大赔款内划结。另有武毛营一处未列大赔款内，商明即照教民房屋章程议结。

“一、安平教民共计四十八户，其房屋有被毁无存者，有去顶盖门窗者，有未拆毁者。遵照本州前定章程，每四面砖房一间赔给修费京钱八十千，半砖半坯各照全砖减半。砖角土房一间，应赔修费京钱六十千。土房一间，应赔修费京钱五十千，仅去顶盖者减半。砖、土门楼各照房屋减半。棚子一间酌赔修费京钱十千。均由教民领去，修盖听其自便。

“一、教民什物遵照本州前定章程，除门楼、棚厦、耳房不计外，其砖房、土房每间照酌定之价计加一倍赔补。

“一、教民地亩因去年避难在外未得耕种及未收获者，遵照本州前定章程，每亩酌赔地租京钱四千文。共计地十一顷零九亩三分零九毫，合京钱四千四百三十七千二百三十六文。

“一、教民去今两年因乱被匪所伤人命大小共十九口，现定每口议给殡葬费银一百两，小口减半。俟捐款收齐，即按名付给。

“一、教民因乱贫苦无依，从前二次所发仓谷共五百三十五石五斗，此是抚恤之款，一概免其扣还，以示体恤。

“一、教民被讹钱文除事后已经归还不计外，如有曾经被讹钱文报明有案者，由局核议酌赔。内有教民私讹百姓者，蒙鲍教士至公无私，令将私讹之款在此项赔款内扣除归局，以抵教民被讹之款，用示公道。

“一、教民房屋已毁未毁及什物等件，并地亩恤款其人命亦已议结外，所有赔偿各款均已按户清结，开列钱数戳条，并造清册，送由深州胜世堂核明签字，转向保安局照数支领。计共房屋赔款京钱三万五千八百六十一千，地亩恤款京钱四千四百三十七千二百三十六文，二共合京钱四万零二百九十八千二百三十六文，均经发给。

“一、教民自此次赔偿后，各归本村复业，由县取具各该村董、地邻人等保护切结，倘有外来匪徒强劫，本村地邻袖手旁观不相救护，即惟村董等是问。一面由县严缉赃贼，不得私行藉端挟制需索，致滋仇怨。

“一、教堂公所由县督同各村董地人等公同认真保护，不得再任匪徒滋扰。倘有不然，即由司铎飞速函告，本县立派勇役弹压，决不迟误。

“一、教民此次赔款议结后，凡以前所控之案，既经了结，由县作主，不得翻控。其已控无从追究之案，亦应一律撤销。

“一、教民应完钱粮等项，自应照常一律完纳，不准拖欠。至迎神赛会照章不摊钱文外，应出杂差照常摊纳，以睦乡邻而尊国体。

“一、教堂教案此次公同议结之后，不可言而无信。从此中外一家，民教和睦，共享承平。恐口无凭，谨立合同，均各签押，各执一分，以凭遵守。

“主降生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初一日

^① 王锦阳。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王振声《庚子畿疆教案赔款记》载：

“教案赔款，罚出民间。合词乞恩，由振声预撰疏稿……奉旨俞允。后经直督筹拨核减列册，交直隶乡绅查照。乡长刘博翁将册特交振声谨收备考。……特刊布，愿乡人共鉴焉。光绪辛丑冬月。王振声谨识。”

“直隶各府州县教案赔款册(共九十州县)

“顺天府属

“宛平县：天主教案赔银十万两(归大赔款)。

“固安县：天主教案赔银四万一千两(归大赔款一万六千两)。耶稣教案赔银二千两(就地筹)。

“永清县：耶稣教案赔银四千三百四十六两(就地筹)。英国教案赔银四万两。

“东安县：天主教案赔银十三万两(归大赔款十二万两)。

“香河县：天主教案赔银七万五千两(归大赔款五万两)。

“通州：天主教案赔银四万两(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二万两(就地筹)。

“三河县：天主教案赔银六千六百两(归大赔款四千六百两)。耶稣教案赔银一万四千两(就地筹)。

“武清县：天主教案赔银十三万二千两(归大赔款八万两)，谷二千石。

“宁河县：耶稣教案赔银三千两(就地筹)。

“宝坻县：天主教案赔银三十四万两(归大赔款二十万两)。

“昌平州：天主教案赔银四万两(归大赔款三万两)。

“顺义县：天主教案赔银一千二百两(归大赔款)。耶稣教案赔银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两(就地筹)。地九顷二十九亩。

“怀柔县：教案赔银一千三百三十九两(就地筹)，地八十六亩。

“霸州：天主教案赔银十一万七千两(归大赔款四万两)。耶稣教案赔银二千九百六十四两(就地筹)。”

“文安县：天主教案赔银六千八百两(归大赔款)。

“大城县：耶稣教案赔银三千九百两(就地筹)。

“蓟州：天主教案赔银十一万两(归大赔款四万两)。

“平谷县：天主教案赔银五千一百五十两(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二千七百九十二两(就地筹)。

“遵化州

“天主教案赔银三万三千五百两(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二万六千九百七十八两。

“玉田县：天主教案赔东钱九百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七千两(就地筹)。”

“保定府属

“清苑县：天主教案赔银三万三千五百两(归大赔款)，京钱四万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五万五千两(归大赔款四万八千两)，京钱六千吊(就地筹)。

“安肃县：教案赔京钱十九万五千吊(就地筹)。

“唐县：教案赔银一万两(归大赔款)。

“博野县：教案赔京钱四万吊(就地筹)。”

“望都县：教案赔银一万六千两(归大赔款一万两)。

“完县：天主教案赔京钱六千吊(就地筹)。

“祁州：教案赔银三万一千两(就地筹)。”

“永平府属

“迁安县：天主教案赔东钱十七万四千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东钱十九万吊(就地筹)。天主教案赔银六万两(归大赔款四万两)。

“滦州：天主教案赔银一万二千两(就地筹)。”

“河间府属

“河间县:天主、耶稣教案赔京钱一万四千三百二十八吊五百文(就地筹)。天主教案赔制钱二十三万吊(就地筹)。伦敦会耶稣教案赔津钱三千吊。

“献县:天主教案赔制钱二十万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津钱四千吊(就地筹)。

“交河县:耶稣教案赔津钱三百一十吊(就地筹)。

“宁津县:耶稣教案赔津钱九千九百七十吊(就地筹)。

“东光县:教案赔京钱一万二千五百四十吊(就地筹),又京钱九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吊(就地筹)。

“景州:天主教案赔京钱二十五万七千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八千两、京钱二万八千吊(就地筹)。

“故城县:耶稣教案赔银七千五百两(就地筹),京钱七万五千吊(就地筹)。”

“天津府属

“天津县:天主教案赔银三十九万四千三百两(归大赔款)。

“青县:天主教案赔京钱二万一千零七十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京钱一万四千二百吊(就地筹)。

“静海县:天主教案赔银六万二千九百两(归大赔款)。

“沧州:天主教案赔津钱二万五千零六十吊。耶稣教案赔银六百三十四两,津钱二千六百八十吊。

“南皮县:天主教案赔银四万九千六百两(归大赔款二万两)。耶稣教案赔银二百五十两、津钱一千一百吊(就地筹)。”

“盐山县:天主教案赔银八万二千九百两(归大赔款六万二千九百两)。耶稣教案赔银二百八十两、津钱七千六百十吊。耶稣教福音堂教案赔津钱十六万七千吊。

“庆云县:天主教案赔银五万七千五百两(归大赔款三万七千五百两)。耶稣教案赔津钱五万三千六百三十二吊。”

“冀州

“摊赔总教堂银款一万两(就地筹)。天主教案赔京钱十万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京钱三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吊一百五十文(就地筹)。

“南宫县:摊赔总教堂银款一万两(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一万两、京钱二万吊(就地筹)。天主教案赔京钱二十一万吊(就地筹)。

“新河县:天主教案赔京钱二万二千九百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京钱四千吊(就地筹)。

“枣强县:摊赔总教堂银款二万二千两(就地筹)。天主教案赔京钱五万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京钱五万八千吊(就地筹)。

“武邑县:摊赔总教堂银款一万二千两(就地筹)。天主教案赔京钱十七万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京钱二万一千九百一十一吊(就地筹)。

“衡水县:摊赔总教堂银款一万四千两(就地筹)。天主教案赔京钱二万八千五百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京钱四万八千吊(就地筹)。”

“赵州属

“隆平县:天主教案赔制钱九千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五百两、制钱二千吊(就地筹)。

“高邑县:教案赔制钱一千吊(就地筹)。

“宁晋县:天主教案赔制钱一万五千八百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京钱一万六千吊(就地筹)。

“深州:天主教案赔京钱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二十吊。耶稣教案赔银一千两(就地筹),京钱三千吊(就地筹)。

“武强县:教案赔京钱三万六千三百五十吊(就地筹)。

“饶阳县:天主教案赔京钱六万六千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一千一百零七两(就地筹)。”

“定州

“天主教案赔制钱十二万吊(就地筹)。

“深泽县：教案赔积谷一千三百石（就地筹）。”

“顺德府属：

“邢台县：天主教案赔银一万四千两、制钱三千六百二十九吊（就地筹）。

“沙河县：天主教案赔银一百两、大钱六千吊（就地筹）。

“平乡县：教案赔制钱一千九百五十吊（就地筹）。

“巨鹿县：天主教案赔大钱九千吊（就地筹）。

“任县：教案赔制钱四千六百十五吊（就地筹）。

“南和县：天主教案赔制钱二千二百吊（就地筹）。

“广宗县：天主教案赔制钱一万吊（就地筹）。

“唐山县：天主教案赔制钱一千一百三十四吊（就地筹）。

“内邱县：天主教案赔制钱四百六十三吊（就地筹）。”

“广平府属

“永年县：天主教案赔京钱二万六千五百吊（就地筹）。

“鸡泽县：教案赔京钱五千一百八十七吊（就地筹）。

“邯郸县：天主教案赔京钱一万二千吊（就地筹）。

“威县：天主教案赔京钱十六万吊（就地筹）。

“清河县：教案赔京钱三十一万吊（就地筹）。”

“大名府属

“大名县：天主教案赔京钱七千五百七十一吊（就地筹）。

“元城县：天主教案赔京钱八千零八吊（就地筹）。

“南乐县：教案赔京钱五千七百七十三吊（就地筹）。

“清丰县：天主教案赔钱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一吊六百文（就地筹）。”

“宣化府属

“宣化、延庆、怀来、蔚州、赤城、西宁、怀安、龙门八州县：天主教案赔银一百四十四万两（归大赔款六十四万两）。

“万全县：天主教案赔银一万七千两（就地筹）。

“宣化、西宁、蔚州、万全四州县：耶稣教案赔银二万四千九百六十七两（就地筹）。

“延庆州：耶稣教案赔银四千五百两（就地筹）。

“怀来县：耶稣教案赔银五千二百两（就地筹）。

“张家口：天主教案赔银三万五千两（就地筹）。”

“正定府属

“行唐县：教案赔大钱一千四百吊（就地筹）。

“晋州：教案赔银三千两（就地筹）。

“无极县：教案赔大钱三万吊（就地筹）。

“新乐县：教案赔大钱五千吊（就地筹）。

“统计^①：

“现银共三百六十万零一千五百一十九两。

“京钱共二百一十九万四千二百八十九吊。

“津钱共二十七万四千三百六十三吊。

“大制钱共二十万吊。

“制钱共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四吊。

① 统计数字不准确。

“大钱共二十万吊。

“东钱共三十六万四千吊。

“积谷共一千三百石。

“银、钱、谷统共约银四百六十馀万两。

“拨归国家大赔款银二百零四万七千七百两。”

《双青藤馆手录本》《天津都统衙门的布告汇录》载：

8月19日(七月初六日)布告^①称：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上年拳匪杀害抢掠教民性命财物等项赔款，业经张道台与各国教会主教牧师等商办完结，嗣后教民不得复告”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辑：

6月13日(四月二十七日)周馥等为筹议顺直教案赔款事详奕劻文^②附录庚子教堂赔款案载：

“其顺直各州县教案，自洋兵到直，民情惶惧，地方官绅有私与教士议结者。筹款之法，先尽拳匪家产变抵，再由公款挪垫，如不足，再由地方摊捐。摊捐之法，或专取之习拳之村，或分摊各村，按亩计数。鸿章念近畿灾民困苦，不能再摊捐款，将顺天、保定、天津兵燹州县并其馀民力万难筹足之处剔出赔款若干，归入大赔款内，而抚恤教民之款，仍就近筹措。兹列各属教案赔款之数于后：

保定府：三万三千五百两。

宣化府：六十四万两。另由地方自筹八十万两，分年缴付。

霸州：四万两。另由地方自筹七万七千两。

武清：八十两。地方另筹者五万两^③。

宝坻县：二十万两。地方另筹二十万两。

香河县：五万两。地方另筹三万五千两。

蓟州：四万两。地方另筹七万两。

昌平州：三万两。地方另筹一万两。

东安县：十二万两。地方另筹一万两。

固安县：一万六千两。地方另筹二万五千两。

宛平县：七万两。地方另筹三万两。

统计二百二十一万九千五百两^④；皆天主教教堂、教民赔款。

右第一次议定。

天津县：三十九万四千三百两。

静海县：六万二千七百两。

盐山县：六万二千七百两。地方另筹二万两。

庆云县：三万七千五百两。地方另筹二万两。

南皮县：二万两。地方另筹二万九千六百两。

唐县：一万两。

望都县：一万两。地方另筹六千两。

宛平前后桑峪各村：三万两。

① 在原书内编号为二十三。

② 文末有“计详送清单一扣”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将该清单附于《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六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之后，内容较简略。

③ 随文有编者按：八十疑八千之讹。

④ 统计数字不准确。

顺义县：一千二百两。

文安县：六千八百两。

三河县：四千六百两。

宣化县杨家坪：八千两。

总计六十四万八千两^①，皆天主教教堂、教民赔款。

右第二[次]议定。

保定另给赔恤银七万三千六百两，天津另给赔恤银二十五万馀两，不入大赔款之内。

第一次议定后，周馥等与教士订立合同：1、教民得银后，应将占住他人房屋(近)[迁]让。二、义和拳首恶(者)[著]闻者，准教士于一月内开单交地方官访拿，讯明严办，其胁从附和者不究。三、此后不得再以人命、财产等事控告。各教士皆如议行。”

《义和团史料·方志辑录·直隶省》辑：

《固安县志》(1942年铅印本)卷3《官师》(第48~50页)载：

“王公继武，字叔贤，山东登州府蓬莱县人。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荐升署理固安县事……

“最系人思者，则有消弭英、法教案及调和拳民仇杀等事。缘固安有英国教会华牧师尤得海者因拳乱逃避。拳匪初平，即回固办理教案，其借仇教为名，肆意讹索，全境富民几无人能逃其指摘。公则多方解释，保全不少。而尤得海仍借英人之势，强占三佛寺为教堂，强租房契，强纳税金，并勾结匪徒，逼令四乡富户公送教堂牌匾衣伞等物，以示万民爱戴之意。公则一面与之交涉，一面将强占情形具稟议和全权大臣。开始与英国公使萨道义迭次折冲，该公使初则强词夺理，不允交涉；继则厉声厉色，几至决裂。公则不畏强御，面谒该公使及李文忠公，三面折冲有十馀次之多。又复稟呈纷驰，据理力争。稟中有云：‘佛教与耶教同为外国传来之教，或为佛寺，或为教堂，本无区别。不过中国人笃信佛教者多，若以佛寺为教堂，本地人民群起反对，假使再酿成民教巨案，地方官吏不负其责。至尤得海为中国人民，本国官吏本有管辖之权，只能问其人之匪不匪，不能问其人之教不教也。’又云：‘耶稣教徒向重公理，若只顾争持，不顾公理，是有伤民教之感情其事小，有伤耶教之名誉其事大也。’稟上，李文忠公为之动容，萨道义亦为之折服。遂于辛丑春间撤去尤得海牧师职务，归还三佛寺教堂，另购民房设立教会，此案遂结。此事起于庚子之冬，结于辛丑之夏，历时半年有馀始告结束……

“又有法国天主教徒李宝瑞者，为城南白得碾村人，拳匪起时逃于西什库教堂。拳乱初平又回固安招聚匪类，始而强拆佛寺，强号民间树木砖瓦；继而在各村强夺民女，强掠财物。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幸有固安县乙酉科拔贡生李芳园将其诱至家中，夺其枪械，并将其同党十馀人捆送县署。公则据情详请李傅相严行惩办，及至批令就地正法。在此十馀日之中，而宝瑞已为法兵劫去三次。如此三纵三擒，始将该匪正法。其同类十馀人，大半多为教友，公则从宽，概予免究。正法之次日，法国主教樊国梁、林懋德之公函至矣，内云：‘闻固安近出教案，杀害教民。’公则亲赴西什库，将该匪作恶及屡擒屡纵，不得已奉命正法各情形，向该主教详细言之。该主教遂无词以对。两案既结，耶稣、天主两教教徒无一人敢向地方民众再肆意索者。

“……其他法国教案赔款原索十二万馀两，经公与通水道刘云门观察向其主教再四磋商，由十二万减至四万，为地方减轻负担，诚非易易。”

《《万全县志》(1933年铅印本)卷12《大事记》(第10页)载：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联军占北京，德、日等国军队来张家口复仇寻衅，勒索赔偿费银三十万两。临去暗埋地雷，意图轰毁张家口。虽安置未妥，误触爆发，然张家口全市被震死人百馀名，毁屋数千间。十里之内疑为地球之崩裂，而百里之外闻声震惊矣！

《《龙关县新志》(1933年铅印本)卷20《大事记》(第5~6页)载：

“三月，奉札赔办教案。知县张兆龄复以‘查境内向无教堂，无从焚烧。所有外来拳民杀害过路教

^① 同上

民计仅二十三名，又无烧毁教房情事。而良民屡被教民丐匪肆扰，贫者固不聊生，富者尤不自保‘等语。张公再三为民请命，故原派赔案银数系七万两，旋减去二万九千五百两，共应捐四万五百两。自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立定草约之日起，扣至二十八年十一月底止，共分八批交完。

“按：教案赔款议明立约共银一百五十万两，除剔出六十四万两在京办理外，下余八十六万两摊归口北十县。赔天主教八十万，耶稣教六万。龙门捐四万五百两，较十万最轻。”

“《阳原县志》(1935年铅印本)卷16《前事》(第6页)载：

“清光绪二十六年，东城及附近各村拳匪倡乱，烧毁西小庄村天主教堂，并屠杀教士甚众。翌年三月十四日早，该堂教士率洋兵九名攻破东城，焚毁庙宅数百间，击毙居民数十人，大肆抢掠。于十五日午后始离城西去。全城居民逃避一空，损失甚巨。绅士王作霖殉难。其各村受洋兵之焚掠者以水峪口、大鳞沟、大渡口、三马坊、东小庄、鱼儿湾、辛庄等村为最烈。”

“《广宗县志》(1933年铅印本)卷1《大事记》(第10~11页)载：

“二十七年拳乱平，县内赔被害教民京钱二万串。知县王宇均筹办未结，因事撤任。继者浙人魏祖德，令各村每亩摊京钱四十文。乡民不明时局，目为洋差，推东召村武举人景廷宾为首抗拒。十一月，廷宾召集各村民合操于城外以示威。十二月，顺德府知府如松来县稽核卷牍，知教案赔款于祖德到任前已由书院存款及商民借款垫缴八千串，又县署存有赈银二千两可以移垫，不敷之数约京钱七千餘串。于是招集廷宾等谕令每亩摊京钱一十四文，或谷子二合，可得京钱七千串，不足尾数由己捐廉补助。廷宾欣然应命，即将东召厂应摊之款交足，他厂各村亦陆续交纳。”

“祖德以如松对廷宾宽容，大恚；且虑已以操切获谴，乃百方齟齬廷宾，必使陷于法而后快。如松回府后，祖德不饬差赴各村雇征，将全县三十二厂摊款责成于廷宾一人，廷宾弗敢应。时各村已交至一千餘串，见官府不催，亦多观望。祖德即具禀直隶总督袁世凯，谓‘廷宾仍行抗拒’。世凯令‘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并派大名练军到县镇慑。廷宾此时进退维谷，欲具状剖辩，其乡人刘永清阻之，遂传集各村民团，恃众自固。

“二十三日，前任知县王宇钧以废弛因循，匿灾不报；署知县魏祖德以借端派捐，众怨沸腾，均革职。”^①

“《庆云县志》(1914年石印本)《新政志》(第99~101页)载：

“二十七年，邑令欧阳公綉之设安抚局，延请邑绅刘鸿逵、王熙春等经理赔抚各教诸款项。而美国牧师某君、英国牧师牧大卫君、法国司铎戴君，偕同知沈君金鉴、六邑总绅宁君星普至县，队官于君桂林率兵保护之。戴始至即挟令先杀韩某，并抄没其家，以张威武。阖邑震动。遂会同官绅开议，商酌赔抚各教银钱数目。英美二牧师皆敦笃邦交，意主和平。惟戴司铎纯用强权，每一人命索银七十两，屋一间索钱八十吊，共为数十八万吊，不稍为退让。官绅堕泪，宁君以为数太多，忿欲辞归，欧阳公亦束手，势将决裂。人心惶惶，竟无善策。刘王三绅婉说以司铎至中国代教友索赔款，六邑均已告成，若因区区庆云议数不成，以累全局，料司铎必不其然。戴首肯，渐有转机，乃复请宁君出让钱三万吊，归十五万吊之数，且言系与道宪会商赔款数目所定条例如此，无可再减。官绅以国势孱弱，力不能抗，不得已允之。而教案始有结果，人心大定。其间任劳任怨，多方婉转以求济事者，固非事后所能尽知，亦不过略述其难苦之情状而已。计共赔耶稣教五万吊、圣道堂三万吊、天主教十五万吊。除罚款外，每亩令捐京钱六百文，先交三百。本邑地瘠民贫，何能堪此。幸所赔天主教教内提出十万吊归大赔款。至年底所捐之三百文尚未交全，而抚银二万两自津领至，民得稍苏。事后结算尚余银四千八百七十两，作为办理高等小学校底款，亦云幸已。”

^① 原随文注：袁世凯奏称：查有准补武强县知县魏祖德贪诈性成，公事贻误。在广宗县署任内，借端派捐，初不禀明立案，有劣绅武举人景廷宾因民情不服，纠众抗拒。该员张大其事，请兵准剿。迨营兵至境，正在查明妥办，该员复借兵声势，严立期限，出示勒捐。众怨沸腾，几至激变。广宗县知县王宇钧废弛因循，罔知振作。上年该县被灾甚重，该员并不据实禀报，玩视民瘼，莫此为甚。十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谕，魏祖德，王宇钧即行革职。

《山东省》辑：

《冠县志》(1920年木刻本)卷10《杂录志·纪变》(第17~18页)载：

“光绪十三年，德国郎神甫来冠，在河北梨园屯传教，宣传数年，信教者日众，折毁是村玉皇庙，改建教堂，村人大哗，群起抗拒。文生王世昌，武生阎得胜，纠合绅民，联名控至县署，继而府、道、抚院。官府畏外人势力，皆为左袒，遂致所有庙基未能收回，村民愈愤。

“时有阎书琴、高小麻等十八人，绰号十八魁，积不能平，号召民众，联络党徒，拟(素)[诉]之武力，拆毁教堂。事上闻，迭经上宪派兵弹压，防其暴动。军门夏辛酉、标统方致祥、东昌知府洪用舟，率兵往剿。十八魁等前仆后起，迄与顽抗。其后改名为义和团，自诩得有神助，能避炮火，有红灯照、蓝灯照等法术，煽惑愚氓，举赵三多为统领，啸聚数千人，蔓延十馀县，声势大振，风鹤频惊。教徒拆庙修堂，村民则拆堂修庙，更迭拆修，相持不下。

“县知事何式箴，以办理此案措置乖方，白简罢官。光绪二十五年，曹侗署冠篆，察知此案之连年纠纷，失于何令之优柔，下车伊始，即请兵于洪知府，再益以县勇，躬亲督剿。时十八魁纠合党羽，方严阵以待，糜集蜂拥，刀戟齐举。官兵攻以炮火百馀发。毙团五六人，团不支溃走，官兵追击之，擒获数十人，阎书琴亦被获，解至临清伏法，徐作鸟兽散，渠魁田宅悉没入官，由此而告荡平。

“二十六年，邑令程方德莅冠，差七班及县勇，拿获高小麻等，就冠正法。

“越年，丁兆德接冠任，详细访查，深知此案颠末，秉法处断，因应咸宜，并发还其查抄财产，以平民气，而河北教案始告结束，玉皇庙基迄未收复。”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一册《张家庄被围记》附录：

“9月8日(七月二十六日)谕示称：

“钦命署理直隶东南天主教事务代牧马为晓谕事。照得本主教负牧教民之责，本以劝善为本，即尔等必有向善之心，然后始有习教之举。然善之说非徒托诸空谈，务须践诸实事。必宜发善心、行善事、出善言、立善表，方不负吾教中善名。即如客岁拳匪肇祸，焚杀抢掠，无所不为，致尔等倾家荡产，四散流离，啼饥号寒，艰辛备历。惨苦情状，何堪设想？若衡以常情，固有非报仇而不甘心者。然而圣教中自有不可僭越之理在。宜以善化恶，不可以恶报恶。当知教中循规蹈矩之善人，即国家奉公守法之百姓。念尔等父兄子弟被拳匪杀戮，其情非不甚惨。岂知教中之理以忍耐、谦逊、爱人诸端为要务，深恐尔等宿怀忿恨，寻仇报复，以修德立功之机，反陷于罪戾而罔觉。况前日之拳匪，一变而为今日之土匪，每以教民报复为名肆行抢掠。分明盗贼之行，反遗丑名于教会，实情理所难容、千古所罕有者也。焉知非上主藉恶人以试炼善人耶？虽尔等前次被害，十室九空，各该管大司铎业经与本地方官长和衷商办，量子赔偿。至前所遭之奇祸、所受之污蔑，只可付诸流水，置之不问。如宿怨未除，希图寻报，此事焉有了期？尔等当知天主教并非洋教，原系万国公教。尔等本系中国赤子，宜遵中国法度。嗣后倘再出有事端，可忍则忍。如事关紧要，务宜据实禀官，听其秉公核办。切忌捉风捕影，肆行冒渎。即前任主教步，亦屡缮谕单，剖切开导，深幸尔等尚无违逆。犹恐始勤终怠，废于半途，尚望仍遵前谕，永释嫌怨，和睦乡邻，恪守教规，凛遵国法。在教中为善友，在国家为良民，庶不负本主教厚意”。

《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辑：

1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万国公报》卷144载：

“闻河间府属献县境内，拳匪复起，富户、教民咸遭惨害，联军派队由水路往剿。”

5月11日(三月廿三日)《汇报》第275号称：

“镶白旗记名骁骑校图萨本，前在张家口招集同党，自命拳匪头目，焚毁教堂洋房极多。”

6月1日(四月十五日)《汇报》第282号称：

“十二日(5月29日)，拳匪又攻静海县属独流镇天主堂，该堂在天津之南二百里左右。……保定府属南境数处被拳匪滋扰，系属确情。”

6月22日(五月初七日)《汇报》第287号称：

“前月初一日(5月18日)，临榆县令俞良臣明府在石门寨守口。恐匪徒来犯，因与该教堂高司铎

商议,函请法兵前来驻防,并命抬营大新寨奉教之民共来助守。初二日(1901年5月19日),法统领同高司铎均至抬营时,票匪附和益众,共二千余人。法兵等先占南山坡险要。未几,英、日之军亦至,遂即开战。……附近各庄被匪所毙之民,男女大小百有馀口。法兵获胜而回,英兵欲将抬营城洗荡,共毁二百馀家。玉石不分,池鱼殃及。

“……今南口至张家口尚有德兵驻守。延庆州褚司铎承官长保护甚周。前数日天主教杜司铎与官长议商,赔款共一百四十万两,以一年为期交清。永清赔四万两。桑峪先交三万两。通州先交一万两。霸州先交二万两。”

6月26日(五月十一日)《汇报》第288号称:

“现在张家口一带马贼甚多。……口外七苏木地方官兵亦起而闹教,将该处教民围困。枪云弹雨,剑雪刀霜,教民死者甚多。”

8月17日(七月初四日)《汇报》第303号称:

“保定南境土匪首目张玉璧,世居清苑县城南谢家庄,党羽极多,横行乡曲,专事闹教。六月初,该匪又在李八庄杀毙教民二人,伤者数人,事后遁迹他处。”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文档案(1872—1900)》)辑:

1901年1月4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察哈尔都统奎顺等为查明牛跳梁系宁条梁之误事致庆亲王咨文称:

“前准比国姚使函称‘北口外西湾子、牛跳梁两处教士人等危险,请飭保护’等因,当经本衙门咨行转飭地方官切实保护。于九月十四日接准咨称‘查明张家口厅属口外地面各处大小教堂、教民均平安无恙;并送到西湾子方主教名片一纸,先行呈覆’等情。当经本衙门转达比国姚使在案。兹于十月二十七日复准姚使函称‘牛跳梁教士现仍被困竟致绝粮,岌岌不可终日……’等因前来。查前准咨呈‘口外所属地面,凡有教堂处所,如西湾子、南壕堽、太子城等处’,并未叙有牛跳梁地名……”

“据张家口抚民同知沈守诚转准西湾子天主堂主教方济众函称,牛跳梁乃宁条梁之误,宁条梁系陕西延安府靖边县辖地……”

第三册(《中文档案(1901—1911)》)辑:

3月28日(二月初九日)承德府知府锡恒禀为查明教士司化隆被害情形事文称:

“……六月十六日据滦平县属红旗南沟乡民将教士司化隆扭送来郡,即经卑府详询。该教士回称‘伊系荷人,曾充县属老虎沟天主堂教士。因避难逃至红旗南沟,向乡人索作饭食,致被扭送来熟。伊情愿进关赴津回国,请派人护送’等语。因思此次衅端肇自拳民,咎不在洋教。……该教士既愿进关回国,亟应钦遵谕旨,认真保护。……查该前署滦平县知县文星奉檄护送教士出境,宜如何慎选妥役护解,乃竟漫不经心,致令教士司化隆中途遇害,实非寻常疏忽可比。”

3月28日(二月初九日)总署为教士司化隆在滦平县被杀事致承德府批文称:

“滦平县知县文星于奉文飭令护解教士司化隆出境,乃竟签差不慎,致解役赵士奇于中途任听被害。……自应如禀,先将滦平县知县文星奏参革职,飭发该府严密看管,勒令迅将赵士奇于一月内缉获。……正批发间,接各国公使照会,内开‘滦平县文星飭令兵役将泰西天主教士一名活埋之后,又将尸身抛入水中,经教民捞获葬埋。该县复飭取出,仍抛入水’等因。如果属实,荒谬已极。试问当得何罪?应由府先提该令将各公使文行各节讯取确切口供,先行稟覆,毋稍片延。”

7月9日(五月二十四日)著直隶总督李鸿章再行体察直隶地方情形迅筹妥办教案赔款事上谕称:

“御史吴煦奏‘直隶各州县赔恤过巨,责令民间摊还,力实难支,请筹官款拨补,以恤民艰’,又据内閣代递中书许枋条陈‘顺直各州县赔恤教案,均派民间捐款,筹偿为数太多,民不堪命。深州等处因之聚众二十馀万人抗不承捐,恐激事变,请将此项赔款并入公家代偿’各等语。前据刘恩溥等合词奏称‘直属教士索赔甚巨,请由地方官与教士公平议定赔恤数目,暂拨官款先行垫给;一俟民力稍舒,再行分年摊还’,已有旨谕令该督会商户部妥筹办理。”

8月3日(六月十九日)庆亲王奕劻等为顺直教案赔负数目事致西安军机处电称:

“顺直教案赔款承再拨一百万,连前请共二百万,如能速解到直,则诸事易于就范。查顺直被拳匪害最重,教案最多。截至五月底止,共计结案九十二州县,就地筹银三百三十五万,民间已付一百七十七万,尚欠二百十八万。仍有三十余州县尚在磋磨,案未议结,大约须添七、八十万。今承拨二百万,民间或捐或罚,仍须再筹百万之谱,只好酌缓钱粮差徭以调剂之。近日土、拳各匪被官兵击散,急须收抚安置,不免挪正款应用。至京城教案,前已请过二百万,不在此数。又划归大赔款,连京城教案约四百万,亦不在此数。”

9月6日(七月二十四日)著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应持平办理教案速为了结事上谕^①称:

“有人奏‘教民肆扰无辜,请飭地方禁止’一摺。据称‘直隶、山西一带教民往往殴打乡民、勒索银钱,近日豫境各属亦有此风,请飭严禁’等语。著李鸿章、岑春煊^②、松寿^③转飭地方官,遇有教案,务即持平办理,速为了结,毋任肆意寻衅。如有依托教民藉端滋扰者,即行严拿惩办,以靖闾阎。”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五章《拳匪教难后》载:

“一、二十世纪初叶,遣使会七个宗座代牧区的情形

“……教务的进步,使传信部在一省内成立新代牧区就以在省中所占的地点名之……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后,教友数字骤增,圣教会乃将旧代牧区分成许多新代牧区。

“东南西北及中央方向已不能指出代牧区来,传教士已以主教驻的城名来指点代牧区;而传信部只在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才决定此后以主教驻的城名作为代牧区的正式名字。

一、直隶北部:樊国梁主教 Favier,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三日就职。

林懋德辅理主教 Jarlin,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九日就职。

二、直隶西部:包儒略主教 Bruguiere,一八九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就职。

三、直隶东部:武致中主教 Geurts,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日就职。”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的回忆》载:

“那年秋末冬初,我不记的是哪一天,我全家人回到了本家黄古庄。因为房子全被烧了,所以又盖的新房。后来我才知道,那房子是用庚子赔款盖的。我记的那时在我村中,住的有些官兵为保护我们。那些兵都穿着黑衣服,头上蒙着黑包头。在前后心的黑衣服上,有一块黄色圆布,圆布上有黑色‘兵’字。我见他们天天演操,在他们吃饭后休息时,我去他们那里玩过。他们很喜欢小孩子们。第二年(1901年)周凤岐神甫为我村的奉教孩子们成立了要理学,我就上了学。我头一位老师姓李,他是青草河的,他就是李文素会长修女的大伯父。

“那年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我村准备盖天主教堂,因为先前的堂被烧毁了。我还记的回家后去看烧坏的那堂。只见有四面墙,墙全烧红了。为盖新堂,一冬天的工夫,在村西的窑上烧了砖和瓦。次年(1902年)春天,就开始盖堂,一气盖成了。堂的地基是老地基,在村西头。面积比以前的大,计有五间长三间宽,可容四百余人。听说这堂也是用庚子赔款盖的。

“我在本村上学。自1901年至1907年,六年之内共经过了四位老师:第一位是青草河的李老师,第二位是阜城许家铺的周老师,第三位是衡水郎子桥的刘老师,第四位是献县陵上寺的田凤鸣老师。”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辑作《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上谕》。

^② 时任山西巡抚。

^③ 时任革职留任河南巡抚。

1902年 光绪二十八年

《拳祸记》下编《增补拳匪祸教记》载：

“威县教难

“魏村李和振、沙尔寨罗梦笔与罗司铎死于刘庄，其事见下：

罗司铎致命

罗司铎，法国人，字泽溥，号润民。生于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正月十七日。束发就傅。学既成，入太医院习医理。毕业后入营充医官，升至三金线，亦显职也。年三十二岁，忽作修道想，视富贵如浮云，遂进耶稣会。阅五载来中国，传教于直隶东南境。其素志欲救援多人登之天府。庚子拳匪之乱，罗率教民自卫。匪屡往攻之，不下。匪切齿。壬寅春，当道以赔款派捐，民人不服，与官为难。官发兵痛剿，杀人颇多。兵返。匪徒谓赔款都入天主堂，遂迁怒于教堂。是年二三月间，罗闻毕司铎有病，亲往大名府诊治。及回至威县赵家庄，广宗县武举人景廷宾倡乱，聚众甚多，罗欲回张家庄本堂安抚其教民，但途中多危，司事与车夫皆不肯行。适有本属教民来请终傅，罗乃决意登程。教友罗梦笔自愿同行，前一日告解领主，后请于神甫，神甫允之。及登车，村人送行者谓此去必死。曰：‘死则死尔。’行至刘家庄，为匪所知，突出一人策马至罗公车前，故意迟迟而行。迨众匪齐出，向一卖盆者访明教士由何路行，即飞奔追来。车夫李和振若瑟，三十三岁，见无可逃命，遂哭。罗公慰之曰：‘勿哭。吾侪系天主子民，当喜，勿惧。’众匪一齐动手，将罗公及梦笔、和振乱刀砍死。后割三人首级悬于件只村大门上。直督袁世凯闻景匪杀教士，拨兵前来，擒景廷宾及匪首数人，散其乌合之众，乱遂平。说者谓非罗公之死，大兵必不速来，数县教民必遭涂炭。县令命交出三尸与其首级，暂葬于赵家庄。期年后始治葬事，县令及本城文武俱来。派营兵一队，自赵家庄送三棺至张家庄，约五十餘里，观者塞途。葛大司铎及七八司铎行追思礼，后乘车往张家庄。彼庄教友及音乐会出数里外迎三棺入堂，后安葬墓中。建一碑亭，高三丈餘；罗梦笔与李和振葬于两旁，各有碑记。又造经堂一，焕然可观。县令撰对联曰：‘说法在穷源，不辞远涉重洋，苦口代苍穹秉铎 见危能授命，何异归真十字，甘心蹈白刃如饴。’”

“景州朱家河教难

“光绪二十八年春，教案始结。会长葛大司铎订于三月十五日改葬朱家河致命之人。届期司铎八人、知府尹太守及所属县令五员、献邑音乐会、修道生等共二百餘人，齐到朱家河。西堂内停棺五十三具，分列两行。死于堂中者合葬于堂内砖穴，此穴直达正祭台下。其死于堂外及院中者合葬于堂北砖穴。葛大司铎行礼，知府县令在旁观礼。东光县知县挽以诗曰：

会葬景州朱家河蒙难任铎孔秀、教民五千。是日也，狂风飞沙，天地为黑。与胥江饕酒、文山罹刑同一景象。

茫茫天地昏，滚滚乾坤暗。嗟尔五千人，无辜身罹难。哀哉孔修君，同日遭凶焰。君子亦有穷，彼苍不赏善。沉冤郁难消，积忿结不散。天地起风霾，如哭复如怨。可恨狂且徒，冥顽无胜算。只能害善良，未闻弭外患。一见联军来，束手不敢战。遁逃乃上策，抱头竟鼠窜。误国又殃民，戎首徒敛怨。漏网虽今朝，毕竟有公断。报施终不爽，十年为一旦。尔众皆驯良，乐善久不倦。会生极乐国，普渡登道岸。毋为积痛伤，阴昏日不见。俚歌吊战场，聊具一杯饭。据诚告九泉，英灵庶几鉴。

知东光县事汪宝树未是草。

“汪令诗中有与教理不合处。姑录之，以存其美意。”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二册《景州朱家河教难记》载：

“殡葬礼仪

“光绪二十八年春，三月十五日，即天主降生一千九百零二年四月二十二号，为举行殡葬之期。前

一日,司铎八位、河间知府率所属县令五员、献县的音乐队、修道生等,共二百余人,齐集于景州城内。第二天早饭后同赴朱家河。村中搭有彩棚数座。圣堂内停棺六十具。众人都聚齐了以后,就举行追思大礼。葛大司铎主礼。官绅士庶并远近教民参观大礼者不下一、二千人。和音歌经之声凄怆婉转,追悼亡人之礼整齐肃敬。外教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自官绅以至乡民、差役,莫不瞠目结舌,惊讶出神。追思祝祷约一点钟之久。礼毕,官绅告辞而退,司铎等亦回城休息。以后就移棺下葬,将死于堂中的教友合葬于堂内砖穴。此穴直达正祭台下。其死于堂外各处者合葬于堂北砖穴。日后重修圣堂时,在淹死许多妇女的苦水井上修了一座亭子,高约二丈,以作纪念。那二、三千人的重案从此就算了结了。

“殡葬之日,狂风飞沙,天昏地暗。无灵之物仿佛有心抱不平的气象。东光县知县汪宝树回到景州城里以后,或因心有所感,或欲炫耀才学,曾即景赋诗,以吊任总铎等数千人之幽魂。其词曰:

茫茫天地昏,滚滚乾坤暗。嗟尔五千人,无辜身罹难。
哀哉孔修君,同日遭凶焰。君子亦有穷,彼苍不赏善。
沉冤郁难消,积忿结不散。天地起风霾,如哭复如怨。
可恨狂且^①徒,冥顽无胜算。只能害善良,未闻弭外患。
一见联军来,束手不敢战。遁逃乃上策,抱头竟鼠窜。
误国又殃民,戎首徒敛怨。漏网虽今朝,毕竟有公断。
报施终不爽,十年为一旦。尔众皆驯良,乐善久不倦。
会生极乐国,普渡登道岸。毋为积痛伤,阴昏日不见。
俚歌吊战场,聊具一杯^②饭。掏诚告九泉,英灵庶几鉴。

知东光县事汪宝树未是草

“按诗中字句,有违犯教宗禁令之处,亦有与圣教道理不合之处。此类字句出于教外人之口,虽不足深责,然吾侪奉教人不可袭取引用,不过玩其词、嘉其语意之顺利而已。读者不可不知也。”

《义和团史料·史籍汇录》辑《献县天主堂资料·二、赔款合同清单》载:

“十三 河间县赔款合同

“今将河间县境内查明被匪烧毁天主教堂,以及教民房屋并抢失财物各节,已照议定款目,如数依期赔偿。仍将原款数目开列于左。

“计开:

“一、教民被毁砖房玖百捌拾捌间半并房内失去财物,共京钱拾贰万捌仟伍百零伍吊。

“一、教民被毁土房贰仟壹百玖拾陆间半并失去财物,共京钱拾柒万伍仟柒百贰拾吊。

“一、教民被毁门楼、棚子柒拾柒间,共京钱壹仟伍百贰拾柒吊伍百文。

“一、赔偿教民籽粒共京钱玖万贰仟陆百肆拾吊。

“一、被毁中式小教堂肆拾贰座并堂内损失物件,共京钱叁万贰仟吊(城内教堂失去物件赔款在內)。

“以上统共京钱肆拾叁万零叁百玖拾贰吊伍百文,除查出各村庄经绅董私议,并拳匪自行认罚各款作抵,共京钱贰拾贰万贰仟零伍拾肆仟伍百文外,尚短京钱贰拾万零捌仟叁百叁拾捌仟文,已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如期清款完结。

“一、教民男女被害壹百伍拾贰口,应即另行清理。

“一、被毁洋式大教堂玖座,内除卧佛堂教堂已经修理外,仍应赔款京钱叁万壹仟柒百叁拾伍吊(归入大赔款结算)。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2年1月5日)”

① 原随文注:音阻。

② 疑为“杯”之误,见下文。按:杯,回手捧。

“十五 安平县赔款交清合同

“大清国赏戴花翎军机处存记在任尽先前补用府特授深州直隶州知州曹(景邨),大法国天主教会总理直隶河间、献县、深、冀等处堂务葛,大法国天主教会总理直隶深州等处堂务鲍(体乾),大清国侯补直隶州特授满城县署理安平县知县高(维敬)会议安平县属教案,前已持平议结。兹将原议应行赔抚各款一律交收清款,再行开列于后。

“计开:

“查原议安平教堂、公所除三处外,惟武毛营一处照章领款,共教民四十八户。其被毁教堂房屋、教民住房,遵章每砖房一间赔修费京钱八十千,半砖半坯者减半;每砖角土房一间赔修费京钱六十千,土房一间赔修费京钱五十千,仅去顶盖者减半;砖、土门楼各照房屋减半;棚厦一间赔修费京钱十千。其失少家具什物,除门楼、厦棚不计外,其余各屋所失什物,无论已毁未毁,每间照房价计加一倍赔补。至教民地亩上年有因避难在外未得耕种暨已种而未及收获者,每亩亦照章酌赔地租京钱四千。其被害教民,大小共十八名,每名议恤殡葬费银一百两。自上年起至本年止,均已飭令局绅按项开明钱条盖戳,先后如数送由教堂查收,一概清讫,别无短欠之项。经此次完结之后,不可言而无信。从此中外一家,民教和睦,共享承平。恐口无凭,谨立合同,均各签押,各执一分,以凭遵守。

“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年 月 日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月 日”

“十六 饶阳县赔款合同

“大清国赏戴花翎军机处存记在任尽先前补用府特授深州直隶州知州曹,大法国天主教会总理直隶河间、献县、深、冀等处堂务葛,大法国天主教会总理直隶深州等处堂务万^①,大清国钦加同知衔准补保定府蠡县署理饶阳县知县黄^②,会议饶阳县属教案抚赔各款,业经四面持平议结,自议之后;均不翻异。合将所议条款开列于后。

“计开:

“饶阳县天主教民九十六户,计被毁砖土房五百二十七间,地三千零八十四百半,以及家具什物,并酌给加恤,已经叶前任共议赔京钱六万六千八百七十一千零,此款已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并二十七年三月、五月分三次发竣。又二十六年天主教民大小男妇被害者二十七口,二十七年续行抢害教民者七口,又补给西沿湾周家下欠子种款项,以上三款由县分摊各庄筹措京钱四千零二十千,并禀蒙藩宪拨发津贴银二千五百两。周家子种现已议定,酌给京钱六百千。除内有挂匾折价京钱一百千议定由县自行筹拨外,其余五百千当在前项款内付给。所有赔抚人命产物已由县每名照议定数目,并按堂中来条照发。下余银数钱款一并送交献县总堂查收,酌量分给未领被害教民。新旧命案作为一律完结。自此次赔款议结后,该教民各归本村复业,毋得寻仇思报。凡系拳匪扰害之案,无论新旧一概作为了结。从此中外一家,民教和睦,共享升平。恐口无凭,谨立合同,均各签押为据,各执一分,以凭遵守。

“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年 月 日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月 日”

“十七 深州赔款合同

“为交清赔款公立合同事。照得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作乱,焚抢州境天主教民房产、家具一切,经前署州吴与本司铎议定,除赔修小教堂已支京钱九仟三百九十三吊三百文,其余未赔修大教堂禀归大赔款外,今净赔教民房产一切,共合京钱叁拾叁万贰仟柒百零伍吊陆百文,已先后发过贰拾叁万伍仟零陆拾柒吊九百文,欠支京钱九万柒仟陆百叁拾柒吊柒百文。兹于五月十二日公同发给,一律清结,毫无短欠。其人命已以库平足银壹万陆仟两议结,并发给籽种京钱叁万八千零二十吊;其未被烧房屋,仅被抢掠财物者,净赔京钱壹万壹仟四百九十五吊文。至教民未验房屋及已验拟酌赔,并拳户讹教民各款,

① 万其偈。

② 黄震。

统由拳户甘与教民说息款内拨抵清楚,再无胶葛,一律公议完结,为此书立合同备案,以昭信守。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1902年6月23日)”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辑:

3月27日(二月十八日)袁世凯为抄送奏请奖叙办理教案善后中外各员一摺事咨呈外务部文附件二《袁世凯恭请奖叙外国教士暨洋员清单》载:

“计开:

- 花翎·二品顶戴·法正主教樊国梁,请赏加头品顶戴。
- 二品顶戴·法副主教林懋德,请赏戴花翎。
- 正定府法主教包儒略,请赏加三品顶戴。
- 献县教堂法教士葛光被,请赏加四品顶戴。
- 清苑县东间教堂法教士任类斯,请赏给三等第一宝星。
- 英国耶稣教安立甘会教士鄂方智,请赏给三等第一宝星。
- 花翎·三品衔·比员林辅臣,请赏加二品顶戴。
- 英国副将古德,请赏给二等第三宝星。
- 善后局委员法员濮吉扬,请赏加四品顶戴,并赏戴花翎。”

5月4日(三月二十七日)外务部庶务司拟为景廷宾聚众戕杀教士事致法使照会载:

“……兹准复^①称:‘……刻接威县禀报,本月十九日,有法国教士罗泽浦由赵庄走张家庄传道,正当匪徒恣熾之时,未经知会营县选队护送。路过孙家庄,遇匪被害。现正悬赏购线,觅取尸首。该匪景廷宾左道煽人,谋为不轨,本非专为仇教。罗教士适逢其乱,中途被害,情殊可悯。已飞飭各营将匪徒赶即扑灭,并觅获罗教士尸首,妥为殓恤,仍将各教堂竭力保护。’同日又据北洋大臣电称:‘匪党现聚广宗县境件只村一带,罗教士被害^②,已调集各路营队迅往会剿……’”

6月4日(四月二十八日)刑部直隶司拟为袁世凯奏报剿办威县起事一摺已奉朱批事移文稿^③附5月31日(四月二十四日)《袁世凯奏报剿办威县反教起事情形摺》载:

“……嗣据署清河道袁大化、大顺广道庞鸿书、营务处道员倪嗣冲、统带。知府段祺瑞先后禀称:‘本月初九日,大化、鸿书据赵庄洋教士万其偈面(速)[述]:‘访闻劫杀教士罗泽溥匪首赵洛凤父子,现匿威县境鱼(提)[堤]村内,请为拿办。’因商嘱祺瑞派队前往查缉。……乃于十七日早间,忽接寺庄教堂函报,该处又聚匪四、五千人,谋攻该堂。祺瑞立即督队往援,遇匪于途,距教堂约三里。匪徒列众迎敌,异常凶悍,枪炮甚多,但不能取准命中,酣战两时之久,仅伤官军四人。各营奋力冲击,以马队抄袭其后,毙匪四百餘名,连毙骑马匪首数名,匪始奔溃。夺获前膛大炮三尊,抬炮八十一具,火枪、旗帜、刀矛二百三十餘件。是役也,该匪意在攻掠教堂,故悉集精锐,多携枪炮,冀可一逞其志。不图中途遇兵,凶锋顿挫,且连日三战三北。强悍者大半殄戮,附从者相率胆落,计穷势蹙,多已悔惧思散。’”

7月26日(六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奏报拿获景廷宾已尽法德办摺载:

“……遵飭营务处道员倪嗣冲设法购线侦拿。兹据该道禀称‘六月初九日在南官防次探得景逆逃至成安县北漳村。……即刻拨队前进,十二日驰抵成安。该逆先期逃逸……该道追踪前往,次日探明景逆在胡村东南四、五里之郭家小屯村刘姓家隐藏。即赴该处将景逆擒获,带回成安,验明无讹。该道会同大顺广道庞鸿书讯据景逆供认“拒敌官军,截杀新兵、教士,盘踞件只村,伪造印、旗、令箭,自称元帅,编列营制,出具伪示、伪檄,纠约各团攻打教堂。迨匪巢攻克以后,复至成安勾结河南、山东盗匪,散布传帖,煽惑人心,抢劫马匹,勒索供给,定期扑城戕官”等情不讳……’前来。臣查景廷宾逆迹昭著,罪不容诛,已批飭照谋逆例凌迟处死,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景绍汶系景逆之子,陈敬、霍添庆代散传

① 作复者是北洋大臣。

② 原注:此句后原有“首级悬挂件只村门”八字,复经删去。

③ 《清末教案》第三册《中文档案(1901—1911)》辑此件题为“刑部直隶司代拟为移会直督袁世凯所奏已奉朱批事呈堂稿”。

帖,同恶相济,均令就地正法……”

同日袁世凯奏为教士罗泽浦被戕案业已议结事片称:

“再,威县教士被戕一案,前经臣奏奉谕旨:‘教士罗泽浦无辜被害,深堪悯恻。著妥为殓恤。等因。钦此。’当即钦遵转飭大顺广道庞鸿书、署清河道袁大化督同印委各员妥筹抚恤去后。兹据该道等禀称‘委冀州直隶州吴焘迭次与教士金总铎往返会议,该教士尚能和衷,除已代为殓殓外,复估拨修祠立碑银五千两,立约议结’等情前来。臣查此案戕及教士,经该道委员与该教士持平商议,得以从速结案,办理尚属妥协。曾将办结情形委道员唐绍仪商告驻京法使,亦无异词。”

《义和团史料·方志辑录·直隶省》:

《新河县志》(1929年铅印本)本第1册(第20~21页)载:

“拳匪肇祸,中外签订赔款之约,新河县分派一万八千四百两,天灾人祸乃告一段落。”

《广宗县志》(1933年铅印本)卷1《大事记》(第10~11页)载:

“二十八年正月,知县魏祖德撤任,十三日知县赵愕接任。大名道庞鸿书、大名镇何永盛、正定镇董履高、顺德府知府如松俱至县。十九日,如松赴东召,以大义晓谕村民。二十一日,道镇会衔给景廷宾札谕,廷宾未复。二十四日大名、正定两练军赴东召,列队村南,开始攻击,以村东有援廷宾各村民团千余人,不得合围。有顷,新盛军自南官至,将民团驱入村内,节节进逼,始攻入村,团众死伤极多,廷宾与其党数人逸去。是时,兵无纪律,焚掠极惨。故乡民仇教而外,继以仇兵。”

“三月十六日,廷宾复在巨鹿境内厦头村聚众数千人,适武卫左军后营管带鲍贵卿由威县招常备新兵百余人赴省道经厦头,被廷宾戕伤大半。委员典史钱德葆、附生刘炳勋、千总吕孝申、把总赵登贵、五品赵俊均遇害,贵卿亦负伤。十八日移据件只村,有天主教神甫法人罗泽溥行至威县鱼堤村外,为廷宾党所杀。二十一日,廷宾率众围攻威县张家庄教堂,不克,退保件只。袁世凯以事奏,闻朝命尽法惩治。^①是月末,官兵大至。”

“四月初一日,刘永清率团民数百人出走,至南和县属史赵桥,南和知县朱家宝督队截剿,毙其党数十人。永清败窜至曲周县属河南疃,被大名练军参将马振武击溃,永清只身遁去。四月初二日,道员段祺瑞、倪嗣冲督武卫右军暨总兵张腾蛟督自强军攻破件只,团众死数百人,良民亦多伤亡。廷宾仍逸去。后在成安为道员倪嗣冲捕获,解赴威县,凌迟处死。”

《新城县志》(1935年铅印本)卷22《地愚篇》(第12~13页)载:

“光绪二十八年,拳匪孽孽韩三啸聚匪众,盘据邑境,东南乡一带受患甚剧。或十数人,或数十人,聚散无常,踪迹诡密。先劫教民,更扰富室;继而村民咸遭其害。每年秋间青纱帐起,即横行无忌。冬复散匿,或言逃避西北山中,荏苒六、七年。直省长官严檄新、雄、霸、固四县悬重赏,始将韩三及其死党王福捕获正法。”

《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辑:

5月14日(四月初七日)《汇报》第376号载:

“初四日(5月11日)新闻报云:接京友飞函知,广宗匪势现聚巨鹿,其众不下四万人之多。上月廿四日(5月1日),威县君寨村教堂被毁,死教士一人。近又围攻威县总教堂甚急。”

5月17日(四月初十日)《汇报》第377号载:

“直隶广宗之乱,所有被匪杀害之华兵,皆新时招募。……今匪党聚于一方,教民各备火枪,掘壕自守,教士除罗某外,无受害者。匪首景廷宾前曾为官,今已谋叛,其党间有从山东来者。”

^① 原随文注: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上谕:袁世凯奏称:直隶广宗县属匪首景廷宾聚众煽乱,旋经击散。乃该犯逃匿巨鹿,布散符咒,纠合煽惑,分投襄助;戕害官弁、委员、新汛兵至五十余人之多。又谋据威县、广宗两城,并有攻毁教堂、抢掠教民情事。本月十九日,有法国教士罗泽溥中途遇匪,被害。已飞飭各营赶即扑灭。并令见获该教士尸身殓恤等语。匪犯景廷宾左道惑人,谋为不轨,著袁世凯迅即添派营队,将该匪首擒获,尽法惩治。并将余匪从速扑灭,务绝根株。教士罗泽溥无辜被害,深堪悯恻,著妥为殓恤。仍将各属教堂及教士人等实力保护,毋稍疏虞。此次疏防地方文武官弁着即查明,分别奏参,以示惩儆。钦此。

5月21日(四月十四日)《汇报》第378号载:

“天津直报登有南宮、冀州诸客商所得家书云,拳匪乱后,地方官频年勒派捐款,民不聊生。于是亡命之徒联合广宗县所辖三百馀村,制造刀枪,暂与官军抗拒。继而邢台、巨鹿、唐山、内丘、新河、平乡等处,土匪闻风响应,争思据地攻城。其人大抵善放鸟枪,能击人于数十步之外。上月某日,省中所派洋操队将抵广宗,即与匪人接仗。匪人类皆奋不顾身,枪如珠贯,因之洋操队死伤颇多。匪人得胜后,即沿村筑垒,高插旌旗,大书‘官逼民反’四字。官军既败,复于某夜暗袭某匪村,纵火焚之,村中老幼千馀人无一生者,并焚去教堂一所,教民若干家。”

5月24日(四月十七日)《汇报》第379号载:

“直隶广宗、朝阳各处之乱,皆由官场勒派重捐,百姓当拳乱之余,家室荡然,不能供给,遂联合三百馀村制造军械。该处本皆连庄会党,训练有素,技艺已精,一与相联,声势张大。在巨鹿起事四万人,广宗三百馀庄得三万人,威县起事得二万馀人。山东柳林拳匪,本大刀会变名,为义和团最老之匪,又万人前来附入。兼之他处另股拳匪,或数百,或数十,次第归附。又有饥荒待食之民乘机而兴;且有被裁之兵、在逃之兵,本有快利之枪,方拟入绿林之党,至此亦来入股。四处响应,两项之匪可得十馀万人。……袁慰帅派去之洋枪队被匪攻败,死者极多。匪乘胜而下,沿村筑垒,以防后路。各县商民又竭力供给匪饷。官兵败后,散勇结队,夜袭某村,大肆淫掠,即纵火焚之,老幼千馀无幸免者。自是良民亦变,各筹方略,自为之防,与匪联络……

“上年巨鹿县有南北两团联庄会。景廷宾为南团之首。……景系广宗武举,家富轻财,喜施舍。岁歉时,乡里称贷不吝予,尝代闾邑完钱粮,故众皆服之。岁庚子,拳匪乱于乡,习符者众,景戒不可信异端,故该处教堂、教民皆得保全。事后官亦令推捐,众谓本境保护教中,了无干犯,何得与不肖者同认捐赔,遂拥入县署。景知之,急来劝散。县令以景得民心,勒令向民劝捐,众大哗,遂拥景为乱。……巨鹿匪炽时,有教士数人为匪所窘,后幸逃免。

“匪党所杀之教士为法国罗某,系威县总本堂司铎,同时教民被害者百馀人。……新有拳匪二、三百名由山东闯入广宗,文武各官被掳,新兵为匪所败,殊不可恃。被杀之教士已悬首示众。”

5月28日(四月廿一日)《汇报》第380号载:

“先是,匪首景廷宾广布传单,言为复仇雪耻起见,重行聚会,书有赏格:杀一洋人赏钱一百吊,杀一教中人赏钱十吊。三月十九日(4月26日),法国罗司铎自威县赵家庄赴张庄,道经匪巢,被匪截杀,复杀一车夫、一教中人。今罗首犹在见只村寨门上,共悬八人头,意必是教中人。……今威县一带教堂,皆有官兵保护。”

冀州知州吴焘撰《罗教士祠堂碑文》^①称:

“光绪庚子夏,燕蓟奸民假仇教之说,与欧美各国教士构难,奉教之华人受害者尤众。当事檄调诸军,且剿且抚,扰攘经年,始渐戡定。景廷宾者,广宗县武举,家居多不法,虎而冠者也。辛丑冬,假公事与邑令抗,令上其不法状。奉当事檄捕治之。索之急,仍假仇教为名,揭竿为乱。此壬寅正月下旬事也。时防汛诸军去广宗不二百里,金鼓声相闻。乱方作,兼程往剿,蹙之于广宗之东召村讨平之。景逆固凶狡,事急,乘间兔脱,蜷伏草泽间,潜结乱党,意图再逞。诸军甫撤归伍,突于三月中旬,仓卒起事。威、巨诸邑奸民纷起应之,愚民为所煽惑者更难数计,蜂屯蚁聚,不数日而逆焰大张。匪惟仇教,势且仇官,甚至募兵营弁与徒手应募新兵为所戕害者不下数十人,反状尽露,只托词于仇教耳。威县张家庄故有

^① 李华《从“重修张家庄保善寨碑”看景廷宾起义始末》(河北省文物局主办《文物春秋》总第4期);“罗泽溥的尸身找到后葬于赵庄总堂院外东边地里。移葬那天,在赵庄教堂内,由马总铎(即总堂神甫)主持了追思大礼和弥撒。赵庄、魏庄教会乐队随灵车运行,灵车到张庄后,张家庄继任神甫与吴县令以及邻村乡绅、教民早在村外迎接,随即召开了追悼会。次日,按照天主教的礼仪,举行了殡葬大礼。五千多教民参加了殡葬礼。……在祠堂院内,用青砖套砌成三个墓室,罗教士居中,李和振、罗梦笔一左一右,墓前各有碑亭,内立石碑。祠堂内另立石碑一通,记述自光绪庚子年至光绪廿九年间,义和拳起义、景廷宾起义以及罗泽溥被杀和奉谕埋葬诸事。”此文即抄自该碑。按:文内“光绪廿九年”似为“光绪廿八年”之误。

法国天主教堂。法教士罗君归自大名，与乱党适相值，遂为所害，弁从二人并死焉。当事飞章入告，檄调骑步诸军，刻期进剿。乱党麇集于广宗之件只村。我军攻克之，草雉禽猕悉就扑灭。景逆溃围出，未几，亦就禽，置诸法。当事以景逆虽伏诛，而罗君以传教远人，遂罹惨祸，揆之地主之谊，殊觉歉然。且奉有‘法国教士罗泽溥无辜被害，深堪悯恻，飭即妥为殓恤’之[上]谕，檄余与献县总堂主教筹所以殓恤之者。余以死者不可复生计，惟妥具幽灵，于义为当。张庄为罗君秉铎地，吾民奉其教者十居八九，议于张庄购地建祠，即于其地葬罗君，而以同难弁从二人附葬其旁，庶慰其生前劝人为善之心，且以示皈依其教者晓然于国家怀柔远人，无所歧视。予昔权献篆，与主教马君、总铎葛君故相善。两君不以余言为不然，悉如所议，复以鸠工之事相属。焘题其议，乃上所议于大府，蒙颁白金五千两，克日兴工。祠既落成，葬事亦毕。马君自献县致书，以刻石之文请。乃志其缘起如右，俾后之览者有所考焉。”

《清末教案》第三册《中文档案(1901—1911)》辑：

3月26日(二月十七日)兵部为起解滦平教案革员文星事咨外务部文称：

“查热河都统咨送已革滦平县知县文星自行声称系京城厢红满文海佐领下人，年五十九岁。既经奉旨发往极边，永不释回，自应照顺天府民人例，官犯文星发福建省极边地方。于本月十七日札行顺天府，即行起程。”

5月(三月)^①外务部庶务司代拟为照会法使暂缓派员往查直隶南境教案事呈堂稿称：

“本月十九日有法国教士罗泽浦由赵庄走张家庄传道。正当匪徒滋炽之时，未经知会营县选队护送，路过孙家庄遇匪被害。现正悬赏购线，觅取尸首。该匪景廷宾左道煽人，谋为不轨，本非专为仇教。罗教士适逢其乱，中途被害，情殊可悯。……匪党现聚广宗县境件只村一带，罗教士被害首级悬挂件只村门……”

5月15日(四月初八日)顺天府为永清教案获犯讯供正法等事咨呈外务部文称：

“前月三十日准贵部函开‘前准英国萨使函称‘上年永清县孟、罗二教士被害一案，现逾二年，尚未办结。请咨该管地方严拿首要各犯，并将已获人犯速定罪名’等因，业经本部行文转飭该县迅速办结在案’。……”

“兹据该县禀称‘遵查孟、罗二教士被害系在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之事，已经先后拿获匪首李振邦、伙犯李四即李玉山讯明正法枭示在案。复于去年腊月，续获拳匪韩辅清、张永发、李铁、袁福、林国肥、杜桂林六犯，迭经严刑熬审，各犯仅供认前曾在团，实无犯有烧抢教堂、杀害教士重情。复加研鞠，虽据张永发、李铁供认有砍伤教民情事，未便遽拟大辟。至韩辅清、袁福、林国肥、杜桂林四犯研审多堂，毫无确供，加以刑吓，极口呼冤，势难定罪’等情，稟覆前来。”

“查拳匪酿祸，教士被害，如讯有真正确供，自应及早从严正法，不容稍宽。此案将匪首正法枭示，抵有二命。续获之犯，虽用严刑，坚不供认。张永发、李铁二犯只供砍伤，拟定罪名永远监禁，遇赦不赦。其余各犯，现飭该县再行飭查证佐，悉心研究，分别拟办。”

6月4日(四月二十八日)著将疏防景廷宾起事之各员弁分别惩革事上谕称：

“管带大名练军参将马振武驻防广宗，乃匪首景廷宾由该县东召村逸出，复在巨鹿啸聚滋事。该参将毫无觉察，又不跟踪搜捕，迅往扑灭，实属庸懦无能，著即革职，永不叙用。署顺德府正任河间府知府如松，于已革署广宗县知县魏祖德擅自派捐，物议沸腾，并不据实揭参；迨亲赴广宗查办，复不能体察情形，豁免捐款，仍谕令减数交纳，疲玩颟顸，不知政体，著即行革职。署巨鹿县正任阜城县知县王伯鹤，当匪首景廷宾在该境传帖聚众之始，不敢出城晓谕解散，致使匪焰日炽，酿成巨案；开缺另补之威县知县程之翰，于匪徒拆毁教堂，不能保护，于法国教士罗泽浦道出该境，又复疏于防范，以致被匪戕害，著一并革职。署广宗县知县赵锜，于匪徒屯聚县境不能设法解散，咎有应得。惟据称到任未久，事后随营办匪，亦颇出力，尚知愧奋，著撤任摘去顶戴。广平府知府岑春煦，有管辖之责，亦难辞咎。惟据称平日颇有政声，亦无纵匪情事。著即撤任，以示薄惩。”

^① 约为5月4日(三月二十七日)。

同日英使萨道义为顺天府尹办理永清教案欠妥事致奕劻照会称：

“据本大臣所闻确凿之言，谓该县将查核此案情形报明陈府尹。因张、李二犯各供认用刀砍伤孟教士及教民武功峨，拟以即行正法。韩辅清、袁福二犯因伊等躬蹈乱场，拟以永远监禁。乃陈府尹竟未批准，并风闻以‘该两教士被害已有李振邦、李玉山二命相抵，该县拟以正法，殊觉情轻法重’之语明行批驳。夫此等聚众谋杀之案，孰为致死正凶，自属极难指定，想在贵亲王洞鉴之中。至所持一命抵一命之议，用于二人相斗者则可，而此案殊非其伦，乃共谋肆虐之行。按大清律例，应照强盗不分首从皆斩，之条办理。顺天府因何将该县原拟罪名轻减，殊不可解。如该二人犯非其罪，该县高座堂皇，岂能似此失人？”

6月10日（五月初五日）顺天府为永清教案又有两犯正法请照知英使事咨呈外务部文称：

“本衙门查该县稟内有‘逐加严审，各犯均供称并无犯有杀人不法重情，亦无烧抢教堂、杀死教士教民之事。因案内并无证佐可传，连日严刑熬审，始据张永发供认将孟教士砍伤，李铁供认将教民武功峨砍伤。惟韩辅清、袁福、林国肥、杜桂林仍坚不承认烧抢教堂、杀死教士教民情事，加以刑吓，极口呼冤。是否该犯等恃无证质，狡供不认，抑或委非杀死教士教民正凶，案情既涉游移，似未便徒事刑求’等语。……张永发、李铁二犯始虽四个月之久不肯认供，自近日刑讯后却认有用刀砍伤教士教民情事。……兹据该县稟请前来，当与直隶总督先后批飭，将张永发、李铁二犯先行就地正法，业已办结。”

6月21日（五月十六日）河南巡抚锡良为查照安阳泌阳桐柏等处民教相安事咨呈外务部文称：

“又据彰德府知府善守承禀称：‘……查卑府所属法国教堂安阳之水冶镇、林县之小庄、武安之高村、涉县之下温村、内黄城内共五处。司主教即在小庄居住，时出游历，自上年至今，并无土匪闹教之案。司主教于三月由卫辉至内黄，停歇数日，复至郡城，卑府与之晤谈，近来民教甚属相安。复由临漳至直隶大名一带回武安，卑前府许守奉局札委来漳，议结武安教案，其时司主教已赴涉县，专函相邀，仍回武安。现正在武会议，尚未定案。’”

6月24日（五月十九日）热河都统色楞额为滦平教案各犯应如何定拟事咨庆亲王文称：

“前道福谦查赵士奇系首先护送司化隆之人，司化隆既已送官，自应听官法办。乃一闻府中有放走之谣，该犯即来郡打听消息，迨将洋教士发县护送回国，该犯复商同班头陈明亮等押解，在途活埋毙命。其蓄意谋害，事属明显，然是该犯实为此案罪魁，按律罪应拟斩，应请从重即行正法，免致洋人有所藉口。董洛八即董俊，老部即郃万臣，虽随同赵士奇等护送司化隆一同行走，第该犯等与司化隆素昧平生，毫无嫌怨，事前并不知谋情，临时又无捆绑刨坑情事；不过随声附和，同行在途，不能置身事外。董洛八即董俊，老部即郃万臣，均应酌拟监禁十年，以示惩戒。在逃之陈明亮等获日另结。”

7月15日（六月十一日）兵部左侍郎贻谷等奏请将口外各旗除划留外尽数及早开放片称：

“口外教案最繁，教祸亦最烈。……推原其故，大抵牵涉地事。……缘察哈尔右翼四旗地腴于左，人争趋之。苟非有所凭依，则势力不张，即难遂其弱肉强食之计。因之教商日众，教产日多，有并未与蒙旗商定，领地即行垦种者。更有初佃人地后，遂据为己有者。强争越占，有恃不恐，不入教不足以得地，一人教并可以制人。至受制于人而藉入教以保其身家者，更不知凡几矣。”

“就现在论，教已多于庚子之前，再十数年，势必无人不教，无地不教。其在明理教民尚知安分，但其中不乏无赖之徒，恃护符以渔利，抗拒官长，挟制蒙员。小之缠讼不休，大则动酿命案。此日争端，将来隐患，教为之实地为之也。为今之计，惟有将各该旗地除分别划留牧地、详定里数若干外，尽数及早开放，俾领户不由地商之手，均可赴官局报垦，交纳押荒便行指拨，庶蒙地不尽化为教产，即教案亦不至日多一日。此亟应整理之实在情形也。”

“抑奴才等更有请者，教、民同系朝廷赤子，自应一视同仁，不必阻其领地。但争端多起于教商，而辘轳每出于教产，必须示以限制，无论为民、为教，不准指领大段，藉便私图。亦不得再立地局、户总名目，显以示无分畛域，隐以使就我范围。包揽把持之弊除，斯清丈升科，不难早收成效。”

7月29日（六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覆查席教士勒索易州教案赔款事咨呈外务部文称：

“据补用道晏振恪、徐杰禀称‘……职道振恪于上年十二月奉委查办署易州知州冯清泰被参各款。

……因该州城防局绅董……公禀内有“安庄席教士嘱定兴县卢令来函立索易州赔款三十万吊，冯牧以州境并无教堂，亦无伤害教士，再三驳覆，并率该绅等往见法兵官凤撒吉利非，请其代为磋磨，始克以库纹二千两批立合同了结”一层，是以于稟覆冯牧被参各款内一并声叙。迨职道杰今春奉委覆查，亦据该绅等禀及此事。……兹奉前因，复经职道等诘询冯牧究竟有无实据。据该牧禀称“此事系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接定兴县卢令来信，谓席教士令伊转致易州，须照安肃、雄县等赔款办法。安肃已议赔三十万吊。如不照办，即派洋兵前来为难。又有教民多人到州传说，一时人心惊惶。该州遂率绅士求驻扎州境之法兵官凤撒吉利非、德格密等从中挽回，均承允许，一面函覆卢令。旋又接卢令信云席教士不允。不得已于十一月初六日禀明前督宪李，求与法大帅说情，而凤撒吉利非等亦为函恳席教士；该州复求省中官吏四面托人说项，始承席教士允许以二千两订立合同了结。现在法兵官凤撒吉利非虽已回国，而德格密在天津及卢令等均可面质。且当时若无卢令信令照安肃等县赔款之数议赔，该牧岂能捏造”等情。职道等覆查无异……”

8月6日(七月初三日)河南巡抚锡良为请核查武安教案应办各犯情形事咨呈外务部文称：

“……查原卷内开‘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据县属西北乡高村地保侯自元禀称“本月初六日下午有外来义和拳会多人，将高村法国天主教教堂一座全行烧毁，扑救无及，教士罗物格业已逃避，物件被抢”等情。前县陈革令世伟据情禀报：“七月初七日并有下团城民人李不理、韩起城、师珠所等，将裴教士坟墓毁坏”。七月二十七日又据侯自元禀称：“七月二十六日教民杨成五等在村布散谣言，声称洋兵不久袭县，出帖邀人人教，可以保全。因无人随从，杨成五等纠众抢夺村邻粮物，与民人陈三的彼此争斗。”维时中外正尚开战，未得议和确音。该村民等又与天主教民积不相能，遂聚众向杨成五等族人社首杨光先告知情由。杨光先平昔仇视教民，率领多人，杀死杨成五等二十六命。续又查出被杀教民五名，尸身首级，或投入粪窖，或私埋灭迹。何人下手杀人，当时人多手杂，无从辨别。并将该村教民房屋以及邻近教民房屋拆毁焚烧，不计其数。教民财产多被抢夺，民人陈三的亦被教民杀死。尸亲、被害人等均各逃散，或被杀死，皆未报案，又无尸身。陈革令世伟无凭验报，据情具禀，并将首犯杨光先、从犯侯自选、侯存喜、侯自元等于八月初八日拿获，未及详办，撤任卸事。前署县朱正本到任，奉两司会委候补直隶州知州孔直牧广聪暨陈革令世伟来县会商，河北法国主教司德望^①、武安法教士罗物格公同酌议赔款，先行修理裴教士坟墓，包给银两，并给仓谷抚恤教民。所有滋事命案内人犯，除杨光先外，分别军流徒杖，各办十名；并声明所杀教民、所毁教堂及房屋被抢物件，另行定议，订立合同。……卑职到任，查前获首犯杨光先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病故。前署县朱令正本、林令裕焘复于二十六年十月十一、二十三、二十八，十二月十二、十九，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十八，五月初六，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三等日，先后拿获滋事应行锁押人犯刘在召一名，应办军流徒犯秦国杰、秦东来、杨拴和、韩长山、侯自崇、孙三仔、杨小青、杨金来等八名。并饬据下团城社首将韩魁城、李不里、师珠所等三名于二十七年四月十六、二十三，八月初六等日获送到县。迭提研讯各犯，供俱狡展，管押待质。杨拴和、秦国杰旋于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在押脱逃，当经拿获监禁。侯自元一名，查明系属无辜，该家属央求教士商允取保。侯存喜，刘在召、秦东来、韩长山、侯自崇、□□□、□□□、韩起城、李不里、师珠所等十名，据报于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九，二十七年二月十六、三十，五月初二、二十八，八月初三，九月十四，十二月十二，二十八年三月初十、十六等日先后在押病故，验明各该犯委系病毙，看役人等并无凌虐情弊，取具图结附卷。此外单开指定应行办罪人犯，有已经获案央求教士捐出银两房屋议明免其治罪者，有未经到案央人说合出资赎罪免其置议者，有央求教民恳求教堂允准取保免缉者。惟在逃未获，又未央求和结各犯，尚有应拟军罪之杨同兴、杨同先、杨文珍、杨牛牛、魏奇山五名，拟流罪之杨保珠、侯山所二名，应拟徒罪之杨所仔、杨心喜、杨绪章、杨双喜、侯金意、李梦九、白礼义、金福八名，应拟杖枷人犯杨青梅、杨玉和、杨迎喜、杨狗来、侯堂意、杨同和六名，并杨光先之子应拟军流之杨万和、杨秋和二名，共二十三名。以及原定应行锁押人犯秦清和、秦来功、秦就成、张满仓、孙小九、拐伍等六名，为数尚多。未获者

^① 司德望是意大利人。

不即弋获,已获者又未承招,以致教士啧有烦言,教民亦多不服。于是追溯从前容留各犯之户,与夫曾经庇护纵放或素知逃所之人,节次指拿……当经派委候补知府许葆连驰往河北,稟商彰卫怀道冯光之,会督彰德府知府美承、武安县知县刘瑞霖与河北法国天主教司德望、教士高士廉反覆商办,赶紧议结,以为曲突,徙薪之计。业经稟称:已与该主教妥商定议,将已获之犯分别发配保释,未获之犯分限暂禁回里。其馀免究。……从此一律完结永断葛藤’等情,批准照办。”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杜立昆《俄国东正教传入天津前后》载:

“二、东正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

“……伊诺肯提乙主教利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 1.8 万两白银,大力发展东正教会,把老俄罗斯北馆附近的房屋、土地及四王爷府^①大部分置买到手。首先建立一座‘教众致命堂’^②。把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中国教徒 222 人的尸骨收殓在六具石头棺材之中,埋葬在该教堂内地下。

“为建立这座教众致命堂,圣彼得堡教廷上奏沙皇尼古拉二世,把公历 6 月 21 日^③定为‘教众致命圣日’,并把 6 月 24 日这一天的前一天定为‘严斋日’。每年到这二日教会必须举行隆重的礼仪,以示纪念。伊诺肯提乙主教接到圣彼得堡教廷的通知,把在义和团运动中死亡的 222 位死者名单分发给各地东正教分会,命令每年这两天同时在教堂内为纪念死者做隆重的‘亡人祈祷’。……当时有些中国人为了使子女在教会学校读书或在教会工厂做工,因而信奉了东正教。

“东正教会的势力以北京为起点,向中国各地进行扩张,在北京西山、京东的通州,以及涿县、房山、永平、古北口的八达汗沟、张家口、天津、北戴河……等处都设有东正教堂、传道所。”

1903 年 光绪二十九年

《义和团史料·史籍汇录》辑《献县天主堂资料·二、赔款合同清单》载:

“二十二 献县教堂数字^④

“张家庄洋式总教堂一座。东山洋式教堂一座。

“总教堂东面

“陵上寺洋式教堂一座。尹照华式教堂一。尹屯华式教堂一。东双坦洋式教堂一(被毁未修)。张方华式教堂一。东郭庄东头华式教堂一。东郭庄西头华式教堂一。

“以上系法司铎伊宅师管理。

“总教堂东北面

“皮箱屯洋式教堂一。韩村华式教堂一。杜生华式教堂一。宋王大华式教堂一。小里村华式教堂一。淮镇华式教堂一。东留村华式教堂一。尚尔庄华式教堂一。

“以上系法司铎巴鸿勋管理。

“总教堂西、南两面

“东大过洋式教堂一。西大过洋式教堂一(被毁未修)。南立车村洋式教堂一(被毁未修)。北立车村洋式教堂一(被毁未修)。鲁家庄洋式教堂一。李家口华式教堂一。张村华式教堂一。郭家庄洋式教堂一。黄铁方华式教堂一。单桥华式教堂一。小流屯华式教堂一。齐古庄华式教堂一。杜梨花华式教堂一。老周庄华式教堂一。

“以上系法司铎席鸿勋管理。

① 原随文注:清乾隆皇帝四子之家产。

② 原随文注:此教堂建筑外型纯系俄罗斯风格。

③ 原随文注:俄历六月十一日。

④ 原注:原稿有法文一段:“献县,1903[年]元月 22 日。教堂数字:总堂 1 座,洋式教堂 8 座,中式教堂 27 座,全境共有大小教堂 45 座。”

“大梅庄洋式教堂一。孙家庄华式教堂一。齐家庄洋式教堂一。下淀华式教堂一(被毁未修)。八里庄华式教堂一。马家庄洋式教堂一。周家庄洋式教堂一(被毁未修)。南紫塔洋式教堂一(被毁未修)。南皇亲庄华式教堂一(被毁未修)。田家庄华式教堂一。蔡家庄华式教堂一。西韦家庄华式教堂一。付家庄华式教堂一。耿家庄华式教堂一。南邵华式教堂一。

“以上系法司铎德怀义^①管理

“除总教堂并被毁未修教堂外,现存洋式教堂八座,华式教堂二十七座。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3年1月22日)致献县正堂阮大老稿底。”

《清末教案》第三册(《中文档案(1901--1911)》)辑:

1月21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热河都统锡良为按照滦州教案合同建盖碑亭并送教案清册事咨呈外务部文载:

“据热河道锡恒详称‘案查前蒙前宪台札开“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准外务部咨:“滦平县法国司教士被害一案,准法吕使照称“被害司教士理应得有补偿,此层已载立合同内云,嗣后再行议商。其凶犯赵士奇委系捉获司教士及致伤该教[七]正凶,张孟年即外号黑张、老部、小赵、老戴、董八儿等均系活埋司教士凶犯,迄未办罪,请飭缉获,讯明正法。此案罪极重大,不得不格外补偿,请飭地方官会同主教,选择地土一段让给教堂,在其地建盖碑亭一座、学堂一所,留作纪念”等因。查此案前准咨称“活埋司教士毙命案内首犯赵士奇已于本年六月十八日正法,余犯董洛八即董俊,老部即部万臣,均予以监禁,以示惩戒”等语。兹准法使照称各节,本部业将来文所称办犯情形照覆该使。至所请格外补偿一节,相应咨行贵都统查照,飭该县会同主教妥商办理,声覆本部可也……’准此,查原定合同内载‘司教士被戕案内人犯赵士奇、董八儿即飭承审之热河道迅速按律重办。又司教士被戕情形甚惨,除将凶犯讯明惩办外,并于遇害之滦平县公同选择地方,建立碑亭一座,叙述其平日善行及遇害情形与惩办凶犯各事,以表遗念而儆愚民。此碑日后坍塌损坏,应该县县署重修’各等语。查首犯赵士奇已遵照部议正法,老部即部万臣,董洛八即董俊,均拟以监禁。至应建碑亭一节,条款内仅载‘选择地方,建立碑亭一座’,并无‘建盖学堂’字样。兹准来咨‘建盖学堂’一节,条款内既未载,碍难照办。且现值地方凋敝情形,实难格外添补。其应修碑亭一节,前据代理滦平县知县苏鼎铭面禀‘已与该堂教士商定,现已觅匠勘估兴修’,亟应札飭赶紧酌定勘估,迅速详覆,以凭一并咨报。……特札”等因。蒙此,当经职道转飭署滦平县苏令遵办去后。兹据署滦平县苏令鼎铭详称“遵查此案,前准宋教士绘具碑亭式样,会同勘得县治西南隅庄头地一处,计地见方一亩三分。一面飭传工匠核实,估计碑亭工料银一千七百两,此外购地书字篆刻,尚需银五十两,统共计银一千七百五十两。除有卑县摊捐银一百九十四两八钱六分四厘七毫可抵外,尚不敷银一千五百五十五两一钱三分五厘三毫。因筹款为难,当经禀蒙都宪批准筹给,业已具详请领。一面购妥地处报明,本月初六日开工在案。兹蒙前因,遵即详细造册,理合详覆查核”等情。据此,职道覆查无异,拟合将送到细册具文详送查核咨覆’等情。

“据此,合将送到清册相应咨送。”

1月(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外务部庶务司代拟为照会法使已咨行直督停稽教民、教堂事呈堂稿称: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准照称‘现闻直隶省有稽查教堂、教民情事。直省嫌疑未释,恐民教致生疑虑,并查分给军械,恐生意外之虞,请转达停止。’等因,本部当经咨行该督查照办理。至‘分给军械’一节,业据电覆‘直省团练早经禁止。惟每届冬防举办保甲,以防盗贼,拟即通飭查禁’等语,相应照覆贵大臣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法吕使。”

1月(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外务部庶务司代拟为札行顺天府尹查办永清教案人犯事呈堂稿称:

“准英焘署使函称‘永清县前年四月间本国孟、罗二教士被杀之案,乃李振邦、李文惠父子为首。李振邦业经缉获正法,李文惠在逃未获。现闻该犯潜回县境,该县令吴貽孙如肯设法缉拿,必能悉其隐匿

^① 德怀义(1853—1928),字永和,法国耶稣会士。

处所,乃竟置之不理。又闻永清县塔见营村有庙宇一处,呼为大寺。其住持僧人因附和拳匪,业经当时县令驱逐,不准回庙。今该僧人等均已复回。据永清县本国连教士禀称“前数日有该庙僧人二名在教士寓所门前骚扰。经教士往报,该县令仍不在意”等情。本署大臣查前岁之乱,永清县实为作俑。据报今情,若不设法拿办,深恐复蹈前辙,请飭防范,并将李文惠拿办”等语。

“相应札行顺天府迅飭永清县将该署使所称各节切查禀明核办,以免滋生事端。”

2月(光绪二十九年正月)顺天府为请将永清教案办理各情查核并照覆英使事咨呈外务部咨文称:

“案准贵部文开‘准英焘署使照称“永清县教案准覆函以顺天府覆称云云。查府尹所覆,在本署大臣之意殊不谓然,似府尹于干涉拳匪之徒不愿惩办。本署大臣前函已声明‘塔儿营村大寺僧人二名在教士门前骚扰’等语,府尹竟漠然视之,于覆文内毫不提及。难怪其轻信李文惠远扬未获,而永清无人不知其已经潜回。如官场有意缉拿,不难一索而得。该县令迎合上意,见尹宪虽知该处两教士被害,仍不以附和拳匪之僧在教士门前骚扰为意,则缉获拳匪头目必非尹宪所从。贵部如以府尹之意为然,嗣后倘滋不虞,则贵王大臣之仔肩难辞其责”等因。本部查该使前函所称“僧人骚扰教堂”一节,所言必非无因。该府尹本月十二日覆文仅有“将僧人光福札交发审局讯办”之语,所粘该县原禀,亦只取有“僧人不得与教堂为难”保结。其将光福惩责,系为擅收田租,均未将该僧骚扰教堂情形确切研究,声叙明晰。该使于此事甚为注意,自未便据该僧一面之词听其狡卸。现在该局如何讯办,应飭将骚扰教堂情节详加诘问,克日声覆本部,以便转覆该使。至拳匪李文惠潜回本籍,该使亦啧有烦言,应密飭该县认真查拿,并札令邻境会同严缉,务获究办,毋任远扬,致贻口实,是为切要。等因’到府。

“准此,查此案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接准贵部来文,以英焘署使飭拿李文惠及大寺僧人二名一案札行本衙门拿办。当经本衙门飞札严飭永清县立即严拿李文惠究办,一面切查大寺僧人提案讯究,并札委候補知县鲍同祖改装易服前往严密查访去后。先将僧人光福拿获审讯禀覆前来。……僧人光福连日严刑研讯,仅认讨索地亩,其前年附和拳匪及此次在教士门前骚扰,供词闪烁,尚未承认,须俟供词定后方能声覆……”

6月3日(五月初八日)刑部直隶司代拟为移知直督袁世凯拿获广宗教案逸犯一摺已奉朱批事呈堂稿附件直隶总督袁世凯奏报拿获广宗教案逸犯郝振邦摺称:

“……据郝振邦即霍振邦又名洛磁供称‘自幼出家为僧,曾在南和县史召村庙内住持。上年三月间投入景廷宾名下,为其筹画军事,并率众攻打威县张家庄教堂,焚掠巨鹿等县任家庄等处教民、教房,拒敌官军。复在成安县南掌等处与景廷宾及该处土匪立盟集议起事,伊见人少难成,劝令景廷宾入山躲藏,不允即独自走逸’等情不讳。”

“……于三月初四日将该犯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

8月24日(七月初三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开复大名知县苗玉珂革职留任处分片称:

“大名县知县苗玉珂前于光绪二十七年春间被法教士范迪吉指摘以该员驱逐教士,予以就害之机,经前督臣李鸿章奏参革职,永不叙用。是年秋间复经李鸿章查明教士避乱出城,并非该员驱逐,奏改革职留任。旋因广平、成安、肥县三县教案日久未结,经该教士面请大顺广道庞氏转飭该员调处,该员即为议结,民教得以相安。未几刀匪馀孽在于该县境内抗捐闹教,该员将首要吴代海等九名拿获正法,地方立时平靖。是其缉匪保教,成效昭然。现据该教士范迪吉以该员调和民教,实深感激。惟其革留处分,迄未开复,殊抱不安,函请署大顺广道晏振恪转请奏恳开复前来。

“臣查……苗玉珂……前得革留处分,属因人连累。同案革职之署元城县知县王锦阳早经开复原官,该员所得处分,较王锦阳为轻,至今尚未开复,不免向隅。既据教士(垦)[恳]求,……仰恳天恩俯准,将大名县知县苗玉珂革职留任处分即予开复,以昭激劝……”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著照所请。”

《西湾圣教源流》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牧》第二节《方、蓝、石三位主教底事业》载:

“一九零三年成立女子高小,即培华女子高级小学校,这女校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五年,建有新

铁瓦房。”

1904年 光绪三十年

《清末教案》第三册(《中文档案(1901—1911)》)辑:

1月18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查明定州等教案事咨呈外务部文载:

“前准贵部咨开:‘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准美康使函称“本国公理教会迭次来函声明定州、无极等处教友屡受逼迫,有多人到各家抢物,并有地方将教民驱逐出村,谓因其奉耶稣教,内有一人受伤毙命。本大臣先派参赞卫理前往考查,于本月十六日搭坐火车赴保定,十七日往定州。请飭定州、无极等处先期派定委员,以便同往确查详细情形。卫参赞应迅速旋京;并飭该地方官设法保护受逼之教民,免再被抢”等因。除已电达贵大臣预派委员偕同卫参赞前往并飭定州等处保护教民外,相应抄录美使原函,咨行查照办理,仍声覆本部为盼。’等因。业将派员会同查明保护情形咨覆在案。

“查此案据定州禀‘据耶稣教民范洛合等以天主教民赵洛贵等嗔伊信奉耶稣,借端滋闹,或谓门窗家具被毁,或谓钱米衣物被抢,呈请拘究。经该州访明系属耶稣教民谤毁天主教而起,滋事各人闻拿逃散;并据清河道禀美国牧师安得文等面述定州耶稣教民刘明瑞被天主教民殴伤致毙’各等情。业飭定州赶将命案严缉正凶,照例拟抵,以肃法纪。至无极县耶稣教民查有被天主教民讹索小节,尚无滋事情形。”

2月2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派员赴定州查办天主、耶稣两教滋事咨呈外务部文称:

“……据藩司电禀‘遵派重守煥待十六日卫参赞来省,十七日即令偕同前往定州、无极两处查明情形,再行稟覆。此案系天主、耶稣两教滋事,并非民教不安,现大致已有头绪,但一时以恤款未定,尚难清结。’等情。除分飭查明设法保护外,相应咨呈贵部,谨请查照转商美国驻京大臣妥为办理。”

《文物春秋》(总第4期)李金鹏《有关“景廷宾起义”史料的新发现》附录

“《重修张家庄保善寨》碑文:

自光绪庚子年拳匪倡乱之际,假为仇教,焚毁教堂房屋,杀害教士信友。……惟我村未受拳匪之难。是以闾村公议,创修土围一园。此项花费……暂借富家之资。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广宗县东兆村武举景廷宾……沟通十三县乱党,在蛇头寺蜂屯蚁聚。……于三月十九日,罗教士由大名府回程,撞遇永平团勇与教士为难,及从者二人俱蹈白刃而死,其苦甚矣。我村系教士罗君之本堂,而团匪量事万难处妥,因此先与我村为难。于月二十二、三日,景匪带领数万匪党将我村围攻,旗帜飘飘,炮响连天,杀声不断,凶险极矣。我村男女老幼同心协力,昼夜在围固守,方得胜战。幸蒙主佑,一人未伤;乱党毙命数百矣,撤留军器,回件只。董、贺二军门带领马、步练军数营住防我村护守。岑太尊电禀,奉直督袁官保谕,上宪诸位大人带领马、步、炮诸军四十馀营剿拿景匪。于四月初二日围攻件只,将寨破开,乱党又毙命两千有馀,而景匪竟复脱逃。乱党屯聚未散,与诸军战征数(镇)[阵],而匪毙之数千矣。是年六月,营务处伊在成安县擒获景匪,于二十四日在威邑将景匪及从者数人概[予]正法。又剿各团为首。邻村因在团助景,自觉有愧,邀请中人说情甘认罪,与我村重修寨墙,各助寨费,保全身家。特奉上宪执法营务处伊、统领段、道台庞、太尊岑、州尊吴、县令张诸大人与金总铎^①函禀主教马君会同商议,派出董事数员,设立保善局,收支从宽,办理调和民教相安事,已处妥。奉金总铎之命,重修寨墙,始画寨园太极之形;邀闾村人等(合)[会]同公议,购买地基长四百三十三丈六尺四寸、宽四丈五尺,周围共占地基三十四亩三分五厘,无论凸凹,均按每亩价京钱肆拾吊文。于癸卯年春……寨墙兴工,建立四门,派出监工数员,各分地段监管,协力经营,修之坚固。四月间,其工完竣,邻村恭赠牌匾旗伞数式,公颂大戏一台,庆贺新寨与

^① 金道宣。

邻村和睦。……下有馀资，添买地二十五亩八分，将地外租，收回租价，以需寨墙岁修之用……

清光绪貳拾玖年岁次癸卯腊月中旬(谷)[穀]旦^①立”

《西湾圣教源流》附表(四)《自圣母圣心会接理蒙古教务以来所有代牧和副主教的史略》载：

“司牧灵司铎：(T. R. P. Smorenburg)司公于一八二七年一月十四日生于荷兰国乌得勒支省(Utrecht)苏带阁(Soestdyk)城，一八五一年八月十七日于瓦门(Warmond)晋升铎品。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入味增爵会。一八五三年十月十七日起身来华，次年六月十九日到了宁波。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愿后，在直隶北方传教直至一八六七年，此年得了宗座的恩准入了圣母圣心会，遂于本年十二月八日在南公怀仁前发了圣愿。南公将起身巡阅教区时，委公为蒙古中区及蒙古西区底代权者。南公去世后，即于一八六八年四月五日圣座颁谕，擢公为全蒙古教区的副主教。一八六九年十一月返回欧洲，把自己的全权授予韩默理司铎。回欧后，在斯哥德(Scheut)逗留数月，即于荷兰魏比都斯代城(Wijk-bij-Duurstede)作本堂。于一千九百零四年五月一日终。”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俄国东正教传入天津前后》载：

“三、天津东正教会的建立

“……一直到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北京东正教总会才在天津河北小关大街租赁了一所平房作为祈祷所，派来一位姓赵的中国人讲道。每逢教会大瞻礼日，仍从北京总会派俄籍修士司祭阿乌拉阿木(Нероманх Авраам)带着诵经士、唱经班来天津举行宗教礼仪。在这个时期领洗入教的中国人约有200余人。”

① 吉日的代称。

第五编

民元前后基督教的传播与教会的本地化

(1905—1941)

1905年 光绪三十一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章《直隶省的宗座代牧区》载：

“二、保定区

“……田嘉璧 Delaplace 于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继孟主教位,将保定的传教中心迁至保定的北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林懋德神父被任为该区的总本堂,加强传教的工作,以致[至]一年间成人领洗者有六百六十人。他的继位者为杜保禄 Dumont 神父。他萧规曹随,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引起前面所说的事变;当时保定教友的数字为一万一千。

“事变的结果,使传教士进入保定城内;杜神父离开北关,在昔日的衙门处造了神父住所及一座美仑美奂的圣堂。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保定区已有六座教堂及一二〇二六名教友。

“拳匪事变一年后,在旧基础上,圣堂又建设起来了,然而传教士数字不足,当加倍工作,以恢复所毁坏的事业;然后乃开始传教,接收了许多的望教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成人受洗者为一三七〇名,次年一四〇二名,以后望教者还更多,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领洗者为四一九五名,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则为六六一〇名。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樊主教去世后,同年五月杜神父被召至北京,被任为林主教的副主教,富成功 Fabregues 神父被任为保定的总本堂,皈依者仍日甚一日。”

1906年 光绪三十二年

《清末教案》第三册(《中文档案(1901—1911)》)辑:

8月7日(六月十八日)直隶提督马玉昆为独石口司员呈控教民占开台地事致理藩院咨文引:“本年六月十三日,管理独石站司员噶拉炳阿呈称:

“窃缘司员所属蒙古奎腾卜拉克头台章京等于去岁八月间呈报有教民白明等在台界内肆行开地,盖房打草,复令闾台兵弁转年速为迁移,声言此地均系吾等由垦务局买到,势不容缓。不准台畜出牧。又有右翼太仆寺副固山达札木苏在界内东面安棚打草,硬行侵占,致本台人无栖所、畜无场牧,各等情,由台员等呈报到署并径报镶白旗转详外,司员当派官役往查,据覆侵占属实。

“再查教民系归独理厅管辖,随于八月间初次文行该厅,伤询真伪,领买何人,指分界限,有无照据。复于十月二次文行,延至四月之久,始据该厅两次回覆,概不声说何人出售,四至地数究应若干。只初次文到传询白明堂讯一次,后并未传讯,一味给白明开脱,其中显有情弊。惟言买地有照,现今转存张理厅属西湾教堂,越界碍难查办……

“今于本年三月初一日据头台章京等禀称‘现今节届夏令农民开地之时,委员尚未到台,再迟延不查,教民仍然肆行开占,取等无所栖身,牲畜无场牧养,临时诚恐有误公务。合再恳请转请速为查办施行’等情,当经转请察哈尔都统。蒙批:‘……札委独石口抚民同知龚庆霖就近往查禀核……’蒙此,司员即于闰四月二十一日至台,准抚民同知龚庆霖带领教民王桂林至台会同司员并镶白旗委派章京恩

克济勒噶朗公同查验。

“该台所设向在镶白旗地界，照图查得界内西南荒场，委员龚庆霖声称此处有教民双爱堂买地五顷，又有教民神工公会买地十二顷，均言有部照，并不示验真伪，亦不丈量多寡。虽指有四至，阔大无边，其所至东河，北山，西、南两面皆系教民百姓地界，此地亦在台站界内，又未审何时从何领买。该教民均归独理厅管辖，委员龚庆霖并不研讯根究。又查到西北界内有教民白明盖房一处，开地数顷，只言无照，实系霸占，上年所霸打草荒厂尚未计算。委员龚庆霖含混查毕，别无异言，即行回归。司员复询镶白旗来差，声称前画界之时，该旗并未指此官台作为空间。据教民王桂林供称此地系由何委员丈放。不知垦务局委员何宝树因何私售台地，是何意见？伏思若准教民私占此地，嗣后阖台官私各畜出牧无场，踏伤田苗，必滋事端。台站在此，势不能容。且所属六台历来均系效力充差，并不领食餉项，兵弁无处栖身，不能应差。该台定例以来即在此处，距独一百一十馀里。意欲另迁，又无明文，不但距独遥远，不能联络，尚且亦无可移之处。司员验訖，随于是月二十六日回站。

“复据台员等纷纷稟‘今遣派委查验，诸所含混，显有徇情，查办不实，强邻弱台，不能久立’种种各情，恳请示下。司员展转无策，除呈报理藩院查核外，谨将司员查验台界被占各情以及回站日期，理合具文，呈报究台查核。可否转咨理藩院饬知察哈尔都统迅飭垦务局将现有察哈尔左翼未放之地与教民迁换，勿容教民领授台地，以免骚扰而安台站之处，恭候檄示，以便飭遵，实为公便。”

1907年 光绪三十三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一章《北堂迁至西什库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九、顾主教被任为江西的宗座代牧

“……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罗马的谕文，任命顾神父为加地加的名义主教及江西南部宗座代牧……

“顾主教 Coqset 于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生于法国爱纳省安勃来尼地方。一八六六年十月一日进遣使会，一八七一年六月八日在大克斯城 Dax 升神父。……光绪元年（一八七五）三月二十一日他抵上海，即至北京，曾任数职，最后为南堂的本堂。”

第十七章《江西南部代牧区的教务情形》载：

“一、传教主要的几个障碍

“……顾其卫 Coqset 主教于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十月十六日在北京南堂祝圣后，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五日至江西南部上任。

“七、顾主教 Coqset 调任直隶西部，江西南部由徐则麟主教代管

“光绪卅三年（一九〇七）五月三日，教宗庇护十世由江西南部代牧区将顾主教调至直隶西部，即正定教区，因光绪卅二年（一九〇六）十月十九日包儒略去世而出缺。

“……一九〇七年顾主教六月至正定。”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的回忆》载：

“1907年的春天，我父送我往献县公学。那时还是清朝时代，所花的钱是用麻绳穿着一吊一吊的铜钱，为纳学费和饭费，公学每半年向每个学生要五吊钱，全年要十吊。为筹备这笔款项，我父亲得去赶集卖粮食，因为那就是农民唯一的找钱之路。每年两次住献县去，我骑在驴背上，驮着五吊钱，走一百三十多里路。我父是步下走着。在春冬两季天短，一天走不到家，就宿在阜城天主堂。在夏秋两季天长，一天能赶到家。我在献县公学共待了三年半。”

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七、一九一九年，正定代牧区的情形

“我们前面已说过江西南部，正在艰难时，换了主教。顾其卫 Coqset 主教调任直隶西部，他至正定上任时，江西正逢事变。

“顾主教至正定后，愿意视察教区；视察时，请一对教区颇熟识的孟爱理 Morelli 神父为伴，视察了最好的曹州^①后，来到顺德，他大失所望，主教对同伴说与以前所见的如何不同：‘曹州生气蓬勃，这里死气沉沉。’孟神父答说：‘不然，顺德刚出世，地方又穷；我还当说：顺德离教区中心点甚远，未免被人疏忽。’主教说：‘好，我亦是顺德的主教，我任你为总本堂，给你需要的一切。’

“就这样决定进行了。将此区分为三个传教中心，在八十个村中立了学校，于是皈依运动就开始了。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只有二千教友，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已有五千名。

“不久，在顺德立了仁爱会修女的会院，将来颇为发达。如在别处一样，拳匪不但没有使人轻忽天主教，反而引起外教人的注意。此外，北京许多人皈依天主教，在正定大家亦知道。正定的传教士亦想仿效北京传教的方法，但不采取传教给钱的恶习。顾主教曾劝数位传教士（希）[在]望教者研究教义时供给饮食，使能早日领洗。

“这是积极准备的方法，这样二、三年间，成千的人领洗；但教区的经费，不能继续养活望教者，乃仍采取老法子。”

1909年 宣统元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章《直隶省的宗座代牧区》载：

“二、保定区

“……由巴黎而至北京的青年传教士被派至保定区，大家都努力工作，以推进天国。光绪卅二年（一九〇六）受洗者为九〇六二名；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领洗者更多，在十六座教堂中，成人领洗者竟达一九五一九名。

“下列是保定区教友增加的表，先以十年计算，以后年数更短。

一八七四年	四八五八	一八八四年	六五二九
一八九四年	九四五四	一八九九年	一二〇〇〇
一九〇〇年	一二〇〇〇（被害者一千）	一九〇二年	一二七〇〇
一九〇五年	二六二八三	一九〇九年	六九八六三

“教务进行如此迅速，使保定的传教士都在预料直隶北部代牧区将分教区，大家都在等候消息。”

《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三编《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第八章《天津教区和新疆教区》第一节《天津教区》载：

“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发生义和团运动以前，就有不少俄国商人到天津进行商业活动。为了使这些俄国商人过正常的宗教生活，每逢圣诞节、复活节等‘大瞻礼’时，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就派神职人员和诵经士到天津主持宗教活动。当时，天津还没有东正教堂，这些俄国商人就租用了一节火车车厢，作为临时的宗教活动场所。直到公元1901年，才由人出面，在居留天津的二百多个俄罗斯商人中集资，于天津海河北小关街建立了一个祈祷所。公元1909年，又将祈祷所迁到当地人称为的‘俄国花园’（在今天津河东区的天津南站附近）内。这个祈祷所规模很小，只能容纳一、二十个人过宗教生活。”

^① 应该是赵州。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俄国东正教传入天津前后》载：

“三、天津东正教会的建立

“1909年(清宣统元年),关闭了小关祈祷所,迁移到俄国租界内俄国花园里^①的一座小教堂。这个教堂是为纪念八国联军侵略天津时,在战争中被击毙的108名俄国官兵而建造的,名为“救世主”堂。这个小教堂用汉白玉建造,只能容纳20人左右。住在河北小关的中国教徒因路途较远,进堂的人不多,因此进堂的只有少数俄国人。

“1970年6月,营建部门在教堂旧址施工时,挖出了一块当时纪念塔的奠基石及银牌铭文和七枚俄国沙皇钱币。

“奠基石埋在距地表约2米深处。石呈正方形,边长43、厚15.5厘米。表面凿一四方石槽,石槽边长25.5、深8厘米。石槽中央放有一长23、宽9、厚0.1厘米的银牌。银牌上阴刻俄文,内容是:‘基督降生之后1901年夏,全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在位第七年之六月三十日,为此纪念塔奠基,莅临者关东区首席长官兼关东区部队及太平洋海军司令叶甫盖尼·依万诺维奇·阿列克谢也夫参将,纪念塔建筑委员会主席捷谢利中将。设计者海军部校官安基波夫和建筑师、军事工程师格里戈连科中校。’银牌背后,有一长10、宽5、深3厘米的小石槽,槽内放有七枚俄国钱币(五枚金币、两枚银币)。共计四十卢布三十戈比。”

1910年 宣统二年

《西湾圣教源流》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牧》第六节《西湾子总堂下榻名客》载：

“一九一零年,圣母圣心会众主教亦集中西湾子总堂开教务会议。计有叶主教(热河教区)、闵主教(蒙古西南)、陶主教(甘肃北部)、蓝主教(甘肃南部)。他们和方主教开会议决教务事宜多项,都很喜欢。此外他们还喜欢又来到他们壮年时住过底老堂口西湾子。”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章《直隶省的宗座代牧区》载：

“三、保定成为直隶中部的宗座代牧区

“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九日,教宗比护十世,因直隶北部代牧区林主教的请求,将保定由北京划出,成为直隶中部宗座代牧区,由遣使会管理。

“三日,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教宗任命富成功 Fabregues 神父为亚拉利名义主教,及直隶中部代牧区的第一任宗座代牧。

“这二种文件,都由遣使会菲亚特 Fiat 总会长转给富神父;传信部部长在另一封信中,请总会长代致传信部恭贺林主教及富主教热心传教,因而皈依者众多,乃设立新代牧区。

“富主教 Fabregues 于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法国南部蒙白利爱城,一八九〇年十月六日入巴黎遣使会,一八九六年五月三十日升神父。十月一日抵上海,被派至北京。拳匪变乱时,他在永平,代替武致中 Guerets 主教,他因拳匪变乱,未能上任。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五月廿二日,由林主教在保定大堂中以隆重典礼祝圣他为主教。”

“四、主要事业迅速成立

“当在新代牧区中,设立主要的各种事业。由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学年起,在北京就读的大小修(院)[士],当在新代牧区中读书。大修士为数无几,暂时住在传教先生的学校中,学校则迁至安家庄。

“六十名小修士则住在城中,离主教府不远,若瑟修女会处;修女则在西关再找地方。

“当建设一座小修院,一座广大的主教府,能容纳六十位神父开会之用;一座若瑟修女会院,自数年来,她们已在主要的教友村庄中;最后当造一座大修院。

“上面一切的建筑,不能在主教府内,因为面积小,又在城中,不能发展;于是富主教在西关买了一

^① 原随文注:今河东区南站。

(片大)[大片]地,以建筑小修院。在受祝圣前数月,富主教请了一位精通建筑的传教士画了一小修院的蓝图,可容六十名修士。主教研究批准后,忽然变更主意,请将图样扩大,使能收容一百廿名修士。

“所买的地是麦田,所以当至收获后才能使用;先造了七十二公尺的二层楼,又造了一所自修室,先改作小堂,直至小堂完成。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圣母无玷原罪瞻礼,接收了第一批修士六十名,都是从保定来的。他们离开西关后,乃整理他们所住的房屋,以建立若瑟修女会的总院。

“富主教在西关车站附近,离小修院不远处,买了另一片土地,以建设一座孤儿院,先由若瑟会修女管理,并为她们创立了其他事业:诊疗所、学校等。

“主教的公署及神父的住所,于光绪三十四年(一九一〇)开始,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底完成。

“这教区的传教士大都年轻,年龄最大者只四十八岁,所以工作起劲。最初几年,每位本堂有一、二匹骡子,一辆车,日日使用,因每星期当视察儿童及望教者的学校;当屡次至教区中心保定,向主教请示买器具、食料等。脚踏车已出现,在这平原中,用起来既方便又经济。

“富主教上任后,皈依运动已少缓进,这是正常的,必要的;因为神父的数目未能与皈依的数目并驾齐驱;不少的神父当作管理教务的工作,或管理事业,或在大小修院任教。此外,建设方面,费用甚巨;为维持学校,已使传教经常费空空如也;所以传教士当限制望教者的数字,以完成成千教友的教育,他们往往受洗太快。”

“五、下面是一九一〇年分教区时的人员表

教友: 七二五三一

客籍遣使会士:一四

国籍遣使会士:三

国籍教区神父:二三

共: 四〇

大修士: 八

小修士: 六

若瑟会修女: 三四”

“六、保定的法语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富神父来保定任总本堂时,在堂中已有一座兴盛的法语学校,它的来历如下: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全直隶省为联军占领时,为平靖地方起见,约有十五名青年人请法国军队教他们法文。法军司令白由 Baillud^① 将军对这建议颇感兴趣,欲使它成功,乃请一位随军司铎田烈诺 Clero-Renaud 神父在一间租来的房屋中教这批青年法文。

“樊主教听见这事后,亦表示欢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他给富神父派了一位辅理修士,专为管理初立的学校。学生愈来愈多;在第一学年底,已有五十名,教友四名;第二年就有七十名。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学生更多,乃添另一位辅理修士;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又加上第三位。学校设宿舍,为教友及愿住宿的学生之用。

“学生的家境不同,有官员子弟,也有出身农家或商业的。保定是省城,候补的官员相当众多,有时与家眷等候甚久,故在学生中,亦有道台、知府及知县的子弟。

“除了官员的子弟想飞黄腾达外,法、比所建筑的京汉路亦需要管理人员。宣统二年(一九一〇),狄德绥 Denis 辅理修士已说有毕业学生六百八十三名。”

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十五、永平代牧区

“虽然初时困难,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武主教 Guerts 已写说:六、七位会士在五十个地方传

^① 巴尧的另一译名。

教,已给数百望教者领洗,造了一座小堂及十座公所;开了一座传教学校,有年龄十六至五十的学生十名。

“武主教采取了北京的传教方法一部分,即望教者学习教理时,供给他们膳宿,他说:‘我以为这方法最实用,因为中国望教者学习教理时,当抛开一切职业,圣宠就合每个民族及每人的性质。圣保禄在片刻中皈依了,这是稀少的。在中国人心中,圣宠当逐渐工作,同时使不忧愁物质生活。’武主教不采用哀矜方法,因为他没有需要的款子。”

“十六、小修院

“一九一〇年有十位遣使会士在永平,只有二位中国老年神父,自一九〇〇年已在该地;所以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武主教来到后,如在中国传教区一样,他就设法在三千教友中寻找圣召;他找到了;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就有小修院,有些修士还是殉教者的后裔。

“永平小修院的特点,是它的课程。武主教及一总同事都读过法文,且与法国会士一齐读哲学、神学。武主教发觉中国修士为读拉丁文有许多困难,于是他规定小修士初时一方面读中文,另一方面一齐读法文;修士读通法文后,再开始读拉丁文。他发觉这样读拉丁文进步更快,因为它与中文毫无相似处,而与法文却大同小异;读通了法文后,读拉丁文就容易了。

“这种方法,是永平小修院独有的,其他法国传教区不能采用这种方法,不然,就会有人说闲话了。荷兰人却没有这种顾忌,因为法文不是他们的本国话。别的大小修院,只将法文列为附属的自修课。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永平的教友已近一万,造了三十座小堂及公所;主教座堂是照蒙古工程师 Moerloose 神父的图样造的,他在中国北方曾造了许多美奂美仑的圣堂。”

《中国基督教史纲》第十八章《庚子后基督教的新趋势》载:

“……上海又有高凤池、谢洪赉等发起‘中国基督徒会’,不久,在香港设立了支会,逐渐推广到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处,亦先后成立支会,其后在天津则改称为‘中国基督教会’……

“一九一〇年时,天津徐君汇、张伯苓等联合当地五公会教友,发起一个自立教会。一九一八年又有长老会教友刘寿山等在山东烟台组织‘中华基督教会’,青岛、济南相继成立分会,推及到山东全省以至于直隶、山西等处,而成立华北的自立系统。”

《中国基督教史略》第九章《基督教新教大举传入中国(1842~1911)》第一节《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各省的概况》载:

“六、直隶省(今河北)

“郭士立^①曾于1831年到过天津,但未开始传教工作。1860年公理会在天津建立河北省第一所教会,1861年又进入北京。1861年圣道公会进入天津,同年进入北京。1861年,伦敦会的洛克哈(Lockhart)进入北京。同年,英圣公会的包尔腾(Burdon)进入北京。1863年北长老会的丁韪良(Martin)进入北京。1870年美以美会的刘海澜(Lowry)进入北京。1880年英圣公会退出河北,将其传教工作交由华北英圣公会继续进行。1910年之前,河北共有总堂46所:华北英圣公会(5所)、公理会(4所)、伦敦会(4所)、美普会(1所)、美以美会(4所)、圣道公会(4所)、北长老会(3所)、内地会(3所)、上帝教会(8所)、南直福音会(5所)、男青年会(2所)、独立牧师(3所)。”

1911年 宣统三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六、传教的方法

“传教士只有一个目的:传扬基督的福音。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当用适合时代及地方情形的方法……

^① 即郭实腊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德国人。

“在中国北方，二十年间在直隶北部、中部及东部，皈依天主教者甚多，当时用的方法是临时的方法，自然不能长久，亦不能适用他处。

“林懋德神父被派至保定作本堂时，在东间及附近地方皈依者日众，他就设法帮助他们。在冬天，乡民整天无事，他就设立望教学校，在校旁厨房中准备饭食招待望教者，使他们不必操心饮食问题，能整日研究教理。这是一种尝试，在别处总没有大规模地实行过，自然费用亦相当浩大。

“这方法立刻见效：望教者懂得教理更深，又在一齐生活、念经，所以准备的较好，成为良好教友。

“庚子年（一九〇〇）拳匪事变后，皈依天主教者更为众多。林神父升为樊主教的辅理主教，以后继他的位，没有忘了在东间传教的方法，劝其他教士采用：当时费用已不成问题，因为教会曾得到了赔款。

“林主教说：‘我们得到这笔赔款，不是为造大堂，更不是作为基金，是赔偿我们物质上的损失。不是我们的钱，当归还中国人，使他们得到益处，他们能皈依真教，这是最大的益处。你们去买麦，养活望教者，我将给你们需要的款子。’于是庚子年（一九〇〇）后，传教士都照着去做，但不久他们都忙得不可开交：每一堂都要用许多人买粮食、买木炭；买卖时就由居中人讲价议价，生出不少弊病。神父只能每星期视察望教学校一次，不能亲自督察一切，因为领洗前的考试、付圣事就占了他大部分时间。

“林主教懂得这个方法大规模的实行起来超出传教士的力量，但他亦不愿停止它；于是不得已他听了几位传教士的意见，即给望教者一批钱，叫他们自己去解决饮食问题。中国要理问答分为四份，望教者能背问答一份者，给银洋一元。这样，传教士不必操心饮食问题，能专心准备望教者领洗。

“这种方法，不久就在教区中到处风行，于是弊病丛生。原则上，当有伦理方面需要的准备，并大约知道四份要理，才可受洗，而实际上只有少数能达到这个目的，别人只能背诵二份、三份。

“年长的传教士豫疑用这方法，他们以为这方法固有刺激性，但亦有危险性，因为神父自己不能亲手分派款子，只得借手他人，他们普通是精明的望教者，就起贪心。别的传教士则怕在新村中，新教友没有见过老教友的生活，只成为冷淡教友。也有别人愿意新教友在专门学校中得到更完备的准备。

“林主教不以为然，他说：‘望教者既然到我们处来，就当收留他们：第一代可能不热心，恐怕还有背教者，这是没有疑惑的，第二代就会更好。’依林主教的意见，先当劝化群众，他说：‘有人当打基础，有人在上建筑。’他愿意的基础，是大批的群众只是未琢磨过的粗材，但可加以琢磨；他愿供给粗石，继位人可去琢磨切锉。对教区内外的批评，这是林主教的答覆。为不重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说：罗马方面总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指责过这种方法。^①”

“十三、一位工作不倦的传教士——雷鸣远神父

“庚子年（一九〇〇）拳匪之乱后，北京代牧区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间由巴黎得到了十一位传教士，其中数位尚未升神父，雷鸣远便是其中之一。他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三月十六日抵上海，同伴为文贵宾 De Vienne，他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九日已升神父，及艾六品修士 Gate。

“雷鸣远 Lebbe 于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九日生于比国冈城，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五日在巴黎入遣使会初学院……

“雷修士至北京后，孜孜不倦，学习中文，成绩惊人……可以（用）中文谈话。他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十月二十七日升神父；后被派至北堂修院任教。在最初上课时，他对修士说《论教会篇》是恶性循环 *gercle vicieux*；刘克明 Guilloux 神父听说这事，请主教将他调往他处。于是雷神父被派至京东作副本堂，总本堂是意籍遣使会士席宾猷 Scipione 神父……

“林主教对他有信心，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任命他为涿州的总本堂……

“雷神父……虽在涿州只有三年，但已倾向参加[与]宗教毫无关系的事情，且不先征求主教的意见；就如在一桩诉讼案件上，受到林主教的指责。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林主教写信给雷神父说：

^① 原注：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六月，林主教去世前一年，他的辅理主教满德盼 Montaigne 觐见教宗，详细向教宗述说林主教的传教方法，教宗庇护十一世听后说：“林主教办得对。”

‘你将罪人的名单写给官吏，是大错特错，你作了我们份外之事，最好是不要写。你若要保护这位富翁，若你知道一定的话，你可以说他无罪，这已够了。但你为何不先写信通知我？若先告诉我的话，我要命你不要管闲事。’

“他在涿州堂中立了一座新式的高小学校，龙旗临风飘扬。他不去视察教友及望教者的学校，而在这完全外教化的学校中教书，学生百馀，都穿着雷神父颁发的制服。三年后，雷神父被调至天津，学校停办，学生都喜欢不用花钱而穿上制服……”

“他将钱财借给困难的朋友，大多数借出去的钱再也要不回来了……”

“林主教……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秋天，任命他为天津的总本堂。……雷神父驻的教堂为望海楼得胜堂。他与九位神父，其中三位是西人，竭力工作。雷神父大用哀矜的方法，林主教屡次写信给他并劝告他。”

“1. 林主教写给雷神父的信

“……雷神父没有为修院找圣召。我们知道，雷神父在中国北方传教二十馀年，他没有（大）[打]发一个小修士或大修士至遣使会北省的任何修院中。他以大声疾呼说，他以前的传教士疏忽培植本地神职界，而自己却疏忽至此，岂非怪事？”

“账目是雷神父的恶梦。他常两袖清风，只好不征求主教的同意向别人去借。他欠人债不能还，是他手下乱花他的钱……”

“2. 一九一一年革命初期的天津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九月二十八日：‘对时局我对你想说什么？当作预防手续，我看不出；但当理会，别人并不攻击我们，我们不可并不能攻击一个党派。在这种光景中，不能作任何工作。’”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九月二十九日：‘总之，我们当随从圣文生的办法；随从明智人；我们不要在最先，亦不要在最后。最浅的理由：是我们当为自己及教友着想。’”

“自宣统二年（一九一〇），雷神父已设演讲所……”

“参加演讲的，有教友亦有外教人，雷神父以为他们的传教士，对宣传福音的方法大大的错误了。他用什么证据？”

“先用谄媚，这是他自己所承认的。有一位同会士，一天问他：‘你常抬举中国人，毁谤西洋人，岂不对中国的教会有害吗？’他回答说：‘我并不糊涂，但我有一原则：我只给中国人所爱的。’……他同样地答覆问他的人‘我依从我的听众’或‘我知道他所喜欢的’。”

“一日，另一同会士向他说：‘雷神父，你为何在中国人前说传教士不照教廷指示行事，特别是《夫至大 Maximumillud》通谕？你知道临近的保定代牧区，备修院有六十名修士，二年后入小修院的有九十名小修士，大修士三十名。’雷神父不直接答覆问题，他回答说：‘你嫉妒我得人心。你若愿意中国人爱你，依我的方法去作吧！’……”

“雷神父用的另一理由是极端爱国主义，正是上面所引教宗的通谕所禁止的。”

《中国教友与使徒工作》第五章《由义和团至抗战时期》“壹 新时代新方法：公教进行会”载：

“……义和团固然使华北的教会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为时不久，未能长久阻碍此进展。教友的数目由一八四〇年的二十万，到一九〇〇年已增至七十二万，十二年之后几乎又增长了一倍。”

“……‘工人的使徒当是工人，农人的使徒当是农人，水手的使徒当是水手，学生的使徒当是学生’，这曾是比约十一世在位（一九二二——一九三九）伟大的构想之一，却成了公教进行会的全部纲领：他曾下定义说：‘公教进行会是信友们的传教事业，在主教们的领导之下，从事服务教会，并帮助它完成牧灵的使命。’”

“传信会

“在中国首先实现这个构想的是雷鸣远神父，他在这方面一如其他方面，曾是开路先锋。一九〇九年他任盐山（河北省）堂区的主任时，曾同谢神父（Fr. Sclinka）组织了一个‘传信会’（后改名为公教进行会），会员分为指导会员和工作会员；指导会员是传教计画的决策者，工作会员每年要负责归化三家

教友。

“这样传教工作便变成了集体的：劝人奉教不仅是司铎和传道士的事，却变成了信友大家的工作。每位信友都有责任，且应晓得自己的责任。

“一九一一年（即民国前一年）公进会正式在天津成立，很快便扩展到天津所属的四个县，会员增至三百名。全天津的公进第一次大会，于民国前一年八月在天津紫竹林天主堂召开。从此公教进行会的目标就算确定了，即先圣化自己，方能引人归向天主，当打进社会各阶层，以便给他们灌输基督的精神，尽量运用一切超自然的方法。因为只有超自然的方法，始能确保基督的神国。”

1912年 中华民国元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一、天津代牧区的成立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四月二十七日，教宗庇护十世依林主教的意愿以诏书成立了一个新代牧区，同日另一诏书任杜保禄 Dumond 神父为百路皮名义主教及新代牧区的第一任宗座代牧，它的正式名字为直隶海边区。

“杜保禄 Dumond 于一八六四年四月二日在里昂出世，一八八三年四月三日在巴黎入遣使会，一八八八年八月十一日升神父，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十月十六日抵北京。他收到被任为主教的消息时，已为林主教的副主教七年。

“杜主教当暂住在望海楼本堂处。圣母得胜堂曾被焚数次，后又盖起来，以等候建设主教府及主教座堂。但因祝圣时不能收容许多贵宾，乃决定不在天津，而在北京祝圣。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六月三十日，林主教由富成功主教及武致中主教襄礼祝圣了杜主教。尚有其他三位主教、六十五位神父、圣母昆仲会修士、许多大修士及教友参加典礼；法国公使马热礼 Margerie 亦来与礼。

“天津区的中心为天津城，当时有居民二百万，现在更多。天津府管辖七县。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天津城的居民为七十五万，现在已有一百七十万。

“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及工业城，位于白河及运河的交点处，离海三十公里，是中国最大商埠之一。河边码头长二公里，使大小船只皆可停留，但最大的船只当停在河口外十几公里处。

“自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天津城完全改观：老城方形，长二公里，围以砖墙，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被毁。城向北部及东部发展，人民众多；城的南部池沼满地，几无人烟，中国政府租给外国为租界，为期九十九年。英、法、德、意、奥、比、日诸国乃大兴巨工：先当将河掘深，使大船能入；此外当填高城区，土填在池沼地区，太阳将它晒干，能使在上面建筑大厦。

“租界彼此间界限清楚，皆朝码头，而另一面大都界限未定，名为租界以外地区，但可以建筑。

“每国租界分成大小区，中外私人向租界国家买来建筑各种商业、银行、洋行、学校、别墅等。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池沼之地上，已建起一座国际性的城了。

“由此可见，天津代牧区是在商业中，外（外）[国]居民只想挣钱；为此宣传福音不易，传教士遇到在乡村间没有的困难。

“居民大都为乡村人，为找钱及职业而来。西洋人固然表样不善，但以教育及组织，使能平安及进步。”

“二、一九一二年天津的教友

“在光绪廿六年（一九〇〇）前，天津区的教务进步甚缓；我们已记述过初期的困难及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二位神父及十位仁爱会修女被害的经过，这自然使福音难以深入。庚子年（一九〇〇）拳匪之乱，更使教友的数字减少。光绪廿九年（一九〇三）只有教友三千；而民国元年（一九一二），教友已增至三万四千，神父廿九位，其中廿位是客籍，九位国籍。新教友中修道者甚少，为此杜主教为首之务是成

立一座小修院,共有大小修士十五名。

“在天津城中有二座圣堂,重要的一座在望海楼,另一座更小的圣类思堂在法租界内,建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有一座医院及一座孤儿院,皆由仁爱会修女管辖;圣母昆仲会修士管辖二座学校,甚为发达;此外,由北京来的若瑟会修女管理女生的学校。”

“三、一九一二年的革命,在北方:北京、保定、天津之影响

“……民国成立后,当时大部军队遣散;他们以为将丧失饭碗,回家前想捞一笔,于是在许多大城中如北京、保定、天津纵火,抢掠。

“……2. 保定

“二月二十九日在保定庆祝民国成立时,作者正在保定。

“群众并不兴高采烈,军队虽然亦参加游行之列,但不久就愤愤不平。三月一日,他们与革命军争辩后,就开始叛变。

“到处枪声密密,居民带着宝贵物件逃跑。在主教府中,急将大门封闭。因着建筑,集了不少的砖及沙,就用来堵住内里的道路。但逐渐枪声转稀,地方平静下来。

“官员都藏起来,好几位至教堂避难。下午一位下级军官拿着一封信说:‘若今日夜间枪声大作,不要害怕,不要参加,我们的卫兵不会开枪,我们保护教堂。’

“晚上七点,军人将东门焚烧,警察给他们开了城门,于是就开枪抢掠。七、八千兵涌入城内,只有数百荷枪及带刺刀的不断向空中放枪,别的士兵则进入店铺内抢掠货物,放在军中。抢掠完毕后,乃放火燃烧。由教堂钟楼上只见大火熊熊,如一条大龙在(吐)[吞]噬街旁的商店。天明后,大多数的士兵都已载着赃物至乡村里去了,还有少数散兵及市民窜进商店去抢剩下的物品。

“三月三日已看不见士兵;只有少数警察,他们并不阻止抢掠。三月四日法国公使传闻保定教堂已被毁,乃派了一位秘书及四十名法国士兵。得了队长及富主教的同意后,法国[士兵]吹着军号入城中,在堂中饱食后,晚间重回北京。居民因而有了信心,逐渐回来,和平恢复过来。

“教堂因上方的命令未受损害;但为何袁世凯准许或命令这次有组织的抢掠呢?他的政策阴谋,不易为人识破^①。

“3. 天津

“我们不多提,因为都在租界以外进行,曾发生战争、抢夺,但教友的商店都未受扰乱;望海楼圣堂虽远离租界在中国地区,也未受扰乱。”

“十三、一位工作不倦的传教士——雷鸣远神父

“……2. 一九一一年革命初期的天津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三月五日:‘感谢天主赏给我们教友的保护。没有任何处攻击教友,圣堂无恙,所以我想城外的教友不必跑至你处。在大小村庄内,富人能有危机;我们共苦同难的教友,无人去抢掠他们。我不相信你将被围,他们只围要攻击的人;但我说:不会攻击教会或西人,他们想抢富人的钱财。革命党人如在欧洲、美洲一样,他们只想均分;他们愿意有一切,凡不能毁了的東西都付之一炬,不能抢的东西在内。’^② ……”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五(年)[月]九日后,雷神父已属杜保禄 Dumond 主教权下。雷神父所管的天津总铎区已成为宗座代牧区。杜主教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六月三十日在北京受祝圣后,七月四日至天津就职。在天津只有二座圣堂,一是在城边的望海楼得胜堂,总本堂驻此;二为法租(男)[界]内的圣类思堂,遣使会北省账房神父居之,他有一位中国副本堂,帮他管理中外教友。

“杜主教在就职前,就有意驻在城中,所以他驻在得胜堂。

“杜主教曾为东间的总本堂,自光绪卅一年(一九〇五)为林主教的副主教,他并不认识天津新教

^① 原注:据说袁氏这次策动兵变,是为了证明北方不稳,他不能离开北京至南京就总统职。他居然达到目的。

^② 林懋德写给雷鸣远的信。

区。

“杜主教当有一位副主教。他虽听说雷神父性情有点古怪,但如林主教一样,对他有信心,任命他为副主教。”

“十八、保定代牧区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保定代牧区有了五位仁爱会修女富主教 Fabregues 将她们安置在西关,代替若瑟会修女,管理孤儿院。

“仁爱会修女们设立了一座诊疗所及女子学校。若瑟会修女则二、三人一(院)[组],去训导望教妇女及教友的儿童。”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雷鸣远》载:

“司铎雷鸣远,字振声,公历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九日生于比利时,洗名味增爵。民国十六年,呈准入籍,以久居天津,称天津人。……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十月二十七日,在北平晋升司铎,奉派宣教北直隶区。时教友英敏之先生华,谋以新闻纸之力启发民智、改良社会,创为《大公报》,公实擘画赞助。会美国颁限制华侨入境律,国人大哗,顾不知所以应付之道,公发起抵制美国货,是为我国抵货运动之嚆矢。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移铎天津,三月,创《广益录》,以灌输新智、昌明道德为鹄的,自兼编辑主任;旋改《广义报》;倡国民捐,献国家以行新政。是时,已故甘肃王近仁司铎远志、山西成捷三司铎玉堂(后任洪洞主教)、刘俊卿司铎锦文(后任汾阳主教)等,筹组中华教友联合会,旨以教友协助阐教,而公已先立传道会,性质相仿佛,乃起而声援,遂如群龙得首,弩矢有机;未几,全国响应,改称公教进行会,乃以《广义报》为华北通讯机关。……设总支部于天津。”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的回忆》载:

“1910年秋,我由公学转入了修道院,因为我愿意升神甫作传教工作。我在修道院中共待了三年整,即由1910年秋到1913年秋。在这期间,我又遇着一件大事发生;即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朝廷的统治。那时我们修道生们从心里是多么高兴!我们那时全愿意立时把辫子剪去,可是马主教(Mgr. Maquer)不许。我们只好耐心地等待到第二年,即民国元年,老主教才许了我们剪去辫子。但是他老人家一个法国人,却仍带着辫子。他还向我们说:‘剪去辫子容易,再长起辫子来就难了。’”

《中国基督教史纲》第十六章《道光以后更正教各宗派的活动》载^①:

更正教传道区域表

年份	会别	创立者	始立地点	传道区域
1807	伦敦	马礼逊	马刺甲	澳港 江浙 河北 湖北 厦门
1830	公理	裨治文	广州	粤东 福建 华北
1836	浸信	叔未士	澳门	广东 江苏 华北
1838	北长老 ^②	何君 宓君	新加坡	关东 华北 闽南 东广东 西广东
1847	美以美	柯林斯	福州	华中 江西 华北 华西 福州 兴化 延平
1848	英圣公	戈柏 路赐	宁波	浙江 福建 港粤 华北 山东 四川 湘桂
1860	圣道	郝[賚]廉	天津	天津 甬甌 肇庆

① 华北以外的地区不录。

② 同章第五节《长老宗》载:“坎拿大长老会在直隶的磁县与河南的汴梁、彰德、卫辉等处创立六处总堂,称为‘豫直长老会’,季理斐曾任其牧师。”

年份	会别	创立者	始立地点	传道区域
1864	美公理	儒理	北京	1909 并于美普会
1867	美普	马维廉	张家口	青圪塔 蔚县城
1891	北直隶	爱君	宣化	保安州 多伦 张家口 下花园
1911	清 洁	薄清洁	直隶濮阳	大名 濮阳 清丰 (车)[东]明 南乐 长垣
1912	中华基督教	孟省吾等	北京	天津 北京 烟台 青岛 济南 太原 星洲

1913年 民国二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雷鸣远》载：

“二年，公鉴于育才为兴业之基，遂返欧募款，创师范学校于天津，复以母校毕业生设小学七十馀所。会有倡国教之议者。公以其徒为乱阶，并于信仰自由有背，合佛、道、耶、回共争之，议遂寝。”

《献县天主教志》第十章《教会的事迹(三)》第二节《高等教育》载：

“1913年，法国耶稣会与罗马教廷商定用庚子赔款在华北兴建一所大学，本拟设在天津，但遭到遣使会士的阻止，于是选择直隶省河间县城西门外旷地为校址并开始为施工备料。次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工程被搁置。”

1914年 民国三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雷鸣远》载：

“三年，十月十八日，中华公教进行会开第一次大会于天津，公被推为监督，并续创女子公教进行会。”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的回忆》载：

“我是在1913年秋，进的耶稣会。第二年(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献县的法国神甫中，有回国当兵的，号称随营神甫。”

《西湾圣教源流》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牧》载：

“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传信部委蓝克复(Mgr. Ev. ter Laack) (那时他为甘肃底监牧)为中蒙古副主教，本年十一月十五日，方、叶、闵三位主教行祝圣蓝公主教之礼于西湾子大堂。

第二节《方、蓝、石三位主教的事业》载：

“主教时久了谋划在本处建设一座大堂，要比以前旧大堂更宏敞固实。到一九一四年，本会过传教五十年纪念周，就是南会祖和会友发愿来蒙古开教底五十周年，会友在西湾子也庆贺了这个周年。于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蓝主教编辑了一本小书，题名曰《论在西湾子盖圣母大堂》，那书上说：

圣母圣心会来蒙古地方传教，今年满了五十年了。在这五十年里头，天主因圣母赏了这蒙古地方灵魂肉身的大恩，实在说不尽有多少，单按前五十年和如今的光景比，就可以大概看出这些恩典有多大，有多少！前五十年有一位主教，如今有三位主教；前五十年有四位外国神父，有四位中国神父，如今有一百三十四位外国神父，有四十四位中国神父，还不算死过的一百多位中西神父；前五十年教友共有六千，如今有九万。单在我们中蒙古地方，前五十年还不足四千，如今有三万六千五百四十名；前五十年有四位本堂，如今有四十七位本堂；前五十年领圣体的数目不上一万，今年有七十一万四千七百。

“蓝公又说：

这个五十年的庆辰，正是格外纪念感恩的时候。为发显我们知恩的真心为做我们感恩的纪念，所以我们打算在西湾子盖一座圣母大堂当中蒙古底总堂，为做我们底一个知恩的大凭据，为留我们一个感恩的纪念。”

1915年 民国四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雷鸣远》载：

“四年，五月九日，倭迫我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公誓雪国耻，二十三日发起救国储金大会，大声疾呼，津民为之动容。旋以发动民众力量，增进民族意识，非藉宣传不为功，乃筹出《益世报》，力主多用语体，国内远近教友皆起而响应。六月，与教中耆宿马相伯、英敛之诸先生开中国社会改良会，均有沉痛演说，感人极深。……同年，冀省洪水为灾，公奔走呼吁，尽出所蓄以济哀鸿，款尽则割须以售，群相争购，一时传为佳话。国庆日，《益世报》问世，于赈灾救国诸端宣传尤力。”

1916年 民国五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雷鸣远》载：

“五年二月三日，改《广义报》为《益世主日报》；九日，前北京政府授公五等嘉禾章；五月，设《益世报》分馆于北京。十月十八日，法公使向我政府发严重警告，要求将天津老西开三十馀亩之地让与法国，二十日，限期既满，遂采自由行动。时公任天津副主教，集教内外人士通电反对，上书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外交总长唐绍仪等，请勿为所屈，乃大触法人怒，被迫出走，每到一地，教内外必夹道欢迎，以一睹丰采为荣。”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十三、一位工作不倦的传教士——雷鸣远神父

“3. 中国天主教的刊物

“……我们当提及一件事，《益世报》成立后，最初出版后，就走上不正当的道路。

“4. 老西开事件

“我们前面说过：杜主教驻望海楼是暂时性质，他愿意将主教座堂设在更合适更宽大的地方。不久，他以为老西开最合适，它就在法国租界旁边，于是他就以很便宜的价值买了一大块地，但当填高才可建筑。杜主教将在此地建起一座美仑美奂的主教座堂、主教公署及其他事业。

“不用的地，将转卖给教友，杜主教愿意他们住在主教座堂附近。

“民国(三)[四]年(一九一五)，依照中国政府的允许，在法国公使孔狄 Conty 及中国官员中订了一个草约，就要签字。

“英国租界已经扩大，面积还更大，且包含二个村庄，这是自然的，如在上面的租界，亦扩大了许多。

“一旦天津城中知道这块地将成为租界后，老西开的居民怕法国人来抽租，就议论纷纷，因为在租界内，警察及租税皆由外国人掌管。”

“《益世报》的经理刘俊卿在民国(四)[五]年(一九一六)六月的报上，发表了一篇侮辱法国天津领事步热 Bourgeois 的文字。法国在北京的公使孔狄以为教会支持《益世报》，给杜主教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

“杜主教知道了这事，但不知雷神父的参加及法国公使所提的文字，就在法国公使前谗过，并使雷神父将来对这问题不要过问。雷神父在答复书中，说在这种光景下，他不能从命。

“雷神父乃写信给法国公使，说对老西开地皮事他相反公义及权利。孔狄大怒，要求他离开天津。

“公使并以电报恐吓，将以武力使租界中的主教座堂及教会房屋搬出，若参加纯粹政治问题的雷

神父将来尚能害人的话。

“这是绝对的要求。民国(四)[五]年(一九一六),杜主教召集教区会议,雷神父以副主教名义亦参加,他懂得了当离开天津。杜主教让他自由选择退隐的地方,因为并非将他逐出中国,只离开天津,使他不发生影响。雷神父选了正定,虽然距离相当远,但有铁路可通。文贵宾 De Vienne 主教为顾其卫 Coqset 主教的辅理主教,上任已一年,愿意收纳雷神父……

“六月二十三日,雷神父乘火车至正定。他一动身,就有一批人至望海楼圣堂前,大骂法国公使的恶行及杜主教的不公正将雷神父充军,且呼‘打倒主教’。群众向法国租界进发,但警察林立,人民乃回家。

“以后数日,《益世报》漫骂孔狄公使及杜主教,词句粗鲁,不便引用……

“文主教不久觉得《益世报》继续为老西开事件发表言论,愿雷神父离开主教公署,派他至保定与正定中间的定州去;但在此地雷神父不时接待天津的朋友,给他们指示。

“民国(四)[五]年(一九一六)七月十四日,中国神父、教友及地方上名人写信给外交部,反对天津法国领事的活动;八月又写了一封信给罗马教廷,由汤作霖 Cotta 神父起草,中国神父及教友签字,请求以雷鸣远神父为天津的主教。

“遣使会北省省长知道雷神父及《益世报》的影响后,禁止他帮助《益世报》。雷神父答说:‘一切经过没有我在内。我未写任何文字。’……

“民国(四)[五]年(一九一六)十月十七日,天津的法国领事步热发表一个声明;对老西开土地,中法间已在条约上盖印。

“事件又动起来,人民揭^①起抵抗法国出品,在政治机关(服务)、电厂、商业、工业[服务]的中国人,都不做工作。

“十一月十五日,罢工正在进行,电厂关门及租界中的巡警,一切法国家庭没有佣人者一月余。

“十一月十九日,马戴给巴黎去电报,请将雷鸣远神父及汤作霖神父送回本国。

“汤作霖 Cotta 神父于一八七二年正月七日由埃及父亲、奥国母亲而生。一八九一年七月十八日进巴黎遣使会初学院,一八九八年六月四日升神父。……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五月三日抵达中国,被派至保定。宣统二年(一九一〇)保定成为代牧区后,他请求调至天津,以与朋友雷神父接近。”

《中国基督教史略》第十章《中国基督教传教事业的繁荣时期(1901~1937)》第二节《中国东正教的复兴》载:

在一九一六年又为本村男学生,建筑了新校舍。

“庚子之难,东正教和天主教、新教一样遭受了巨大创伤,北京、张家口一带的教堂都被破坏,但庚子赔款使教堂很快得到恢复。东正教会在直隶永平购买了房地产,创办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一位中国司祭在直隶开辟了 20 多个新传教点。……到 1916 年,中国东正教会拥有 20 多名俄国传教士、北京圣母安息修道院、北京西山高举圣十字架隐修院、北京女修道院及 21 所教堂和诵经堂、40 多个传教点、17 所男子小学、3 所女子小学、一所神学院;有 33 名男教师(包括 4 名俄籍教师)、5 名女教师(包括 1 名俄籍教师),男女学生总数 680 人;1915 年有 583 名新信徒入教,1916 年,信徒总数为 5587 人。此外,教会还开办了气象站、图书馆、印刷所、石印局、电镀厂、铸造厂、装订厂、染料店、木匠铺、蒸汽磨坊、蜡烛厂、肥皂厂、织布厂、养蜂场、牛奶场、砖窑等。”

1917 年 民国六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十二章《樊国梁主教时代的教务情形》载:

“四、天津的中法学校

① 原文如此。

“北(区)[京]教区给圣母会修士的第四座房屋,是天津的本堂学校。圣路易学校是专门为西洋人的子女的。当时没有一座学校教外国言语,却有不少人愿意学外国言语,使能帮助愈来愈多的西洋商人工作;于是都主教决定在数年前已成立的本堂学校中,亦教法文。

“教友很欢迎这事,因为供给他们前途;法国租界的政府亦加欢迎,乃与圣母小昆仲会修士接洽,由它帮助该校经费。民国五年(一九一七年),它迁至天津租界中主教座堂的旁边。学生百馀名,都是教友。”

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七、一九一九年,正定代牧区的情形

“……民国二年(一九一四)底,顾主教重中风,痊愈甚慢,并且不完全。顾主教知道自己的情形不能久于人间;当此时他已达古稀年龄,于是他请罗马任命一位辅理主教,选了文贵宾神父。

“文贵宾 De Vienne 一八七七年四月二日生于法国北部杜哀城,一八九五年三月九日入巴黎遣使会,一九〇〇年六月九日升神父,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三月十六日抵上海,被派至直隶北部。他传了几年教后,为教区修院的教授及修院院长,修院分成大小修院时,文神父被任为大修院的院长。以后他作过京东的总本堂。任为初学院院长时,他接到罗马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的诏书,任他为亚彼利的名义主教及顾主教的辅理主教。民国(三)[四]年(一九一五)十一月二十一日,林主教在正定祝圣了文神父为主教。

“由此时起,顾主教的健康一日不如一日,教区的重要责任都在文主教的肩上。在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二月四日顾主教重中风而亡。”

“八、一九一七年的大水灾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七月,大旱后,忽然大雨,数日不停,不久大小江河就一齐泛滥,整个直隶省都淹入水中……记不清在历史上见过这样灾殃否。传教士的报告书至中心区时都说:‘我们的地区及附近为水所淹,交通断绝,大家以为只有在自己处有大水,实际上连远处亦有之。’

“北方的教区都受了重大损失。北京城因为填高,没有被淹,但城外南郊都在大水之下。

“我们由文主教对他教区中大小水灾的记述中抽出下面的数行:

“为使人有对大水的印象,我当说,经过我们教区的铁路二百公里,有一百多处破坏,铁桥被水冲去。因河水,我可说,整个教区都被水淹了,数日间不能与外边的传教士通消息。逐渐信件来到,由各处告诉我同样的灾殃。

“一位传教士在山中为水所困所写说:

“连雨十五日,当经过河二十次。整个乡村被毁;许多人淹毙;土地冲去,代以大石,闻其大声波动。一个五百户的村庄变成三十户,后溪的官员在一处找到一千七百具的死尸。一位中国神父住在一百二十公里处,给我写信说:‘我不能养活骡子了;送还你。’

“我们可引保定及天津同样的报告书……”

“文主教给我们留下正定仁爱会修女的详细报告,可惜我们不能转载于此地;我们可以看出仁爱会修女院长 Guerlain 以爱德精神多年为大家服务,特别在中国灾殃期间。”

“十三、一位工作不倦的传教士——雷鸣远神父

“4. 老西开事件

“……刘克明 Guilloux 神父是遣使会中国南方的省会长,于民国(五)[六]年(一九一七)二月至天津,以巴黎总会长代表身份设法解决此事。他召集了全体会友,提醒他们所发的听命愿、传信部的训示、教宗的命令,禁止传教士参与政治,请求他们等待长上的决定,将来避免与任何党为伍,并不要谈及中、法二国的事情。大家一一应许服从,连雷神父在内。

“次日,雷神父召集教区神父,对他们说刘克明神父毫无权柄告诉他们总长代表所说的一切,决定上诉罗马教廷。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九日,巴黎的一个电报调雷神父至宁波、汤神父至南美基多城。”

1918年 民国七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十三、一位工作不倦的传教士——雷鸣远神父

“4.老西开事件

“……民国(元)[七]年(一九一八)八月十四日,杜主教至北京,带着一封奇特的信。传信部受了天津方面的影响,命杜主教从新收纳被逐的传教士,汤神父求宽赦后,亦宽赦他。

“杜主教考虑辞职,至北京主教处请教;北方遣使会主教知道后,林主教、富主教、文主教、武主教各发一电报,请求延期,将此事呈主教及修会圣部,它取消了传信部的命令^①。”

《献县天主教志》附录辑：

“六、罗马教廷传信部致刘钦明的信

可敬的主教：

由于传信部在各个方面关怀中国教务,又为了进一步发展,力求采取更合适的方法,特列以下10个问题,希望你以你的理智和传教热诚,把中国教务的具体情况和需要,根据你的认识,逐条简明地向圣部汇报一下：

1. 在全国范围内,一般的教务情况如何?
2. 一般外籍司铎怎样传教?有无热诚?有无成绩?由谁领导?
3. 怎样训练本籍神职班?修道院的纪律如何?修道生的天资如何?能读何书?人数多少?
4. 本籍司铎持身如何?文化程度、道德操行如何?在执行传教职务方面有无热诚?他们的威望如何?由谁领导?
5. 外籍与本籍司铎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能互助合作,本籍司铎如何隶属于外籍司铎?他们能担任或者不能担任什么职务?
6. 在教区的学校里如何教育青年?人数多少?读什么书?如何训练师资?有无不足之处?
7. 教徒是否虔诚?品行如何?是否遵守教规?
8. 教外人有无进教倾向或者厌恶教会,与教会为难?他们的借口是什么?为发展教务有什么阻碍?有什么更合适的方法?有什么危险?如何避免?
9. 望教人在领洗前是否受到相应的教育?新教徒是否恒心坚持信仰?
10. 此外,还有你认为需要向圣部汇报的资料,也要附带说明,并且指出你认为使中国民族归化特别需要的事项,也说明你的意见。

再者,天津教区最近发生了一些纠纷。对这事,你如果有所了解,也要附带说明。

在敬候你的回音时,求主赏你福寿无疆。

你的忠仆王老松^② 传信部长

1918年7月16日”

“七、刘钦明致传信部的覆信一

枢机主教：

9月下旬,接到了你本年7月16日的信……

1. 从民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传教事业,一般说是较前顺利了,外国人不再被视为蛮夷。虽然法律保障信仰自由,天主教不再受公开的攻击,但就思想感情说,地方上对它仍旧少有改变。在政府

^① 原译者注:教宗庇护十世于一九〇八年重组圣部,已将主教及修会部取消,分为二部。作者说一九一八年这圣部取消传信部的命令,或不可靠。

^② Van Rossum,又译作汪劳松。

和群众的思想里,认为信奉天主教就是信奉外国教。事实上,中国许可天主教存在,也只是一时的容忍。教会能以享受自由,教务得以进行无阻,这只限于表面。

就这种声势来说,耶稣教远远胜过天主教。原因是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成立了几个专科学校,在学校里组织了青年学生联合会,他们还拥有大量的印刷、出版工具,他们出版了《圣经》和其它教会书籍,大批地销售在全国各地;更由于中国目前需要现代的科学教育,他们就供应了学校一批科学教科书和一些英文译本名著。由于他们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步骤和措施,在城市内与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取得了联系,他们在中国的声势是我天主教望尘莫及的。

回顾我天主教由于经济困难,大部分的人力、物力分散在乡间,各自为政,缺少联系,天天与愚乡、穷汉共处,与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隔离。“穷人领受福音”的箴言;在中国又得以证实了。

2. 外籍传教士是具有热忱的。1900年的教难,证实了他们的英勇。他们获得了成就,证明了他们传教工作是有代价的。1905年,中国教友的数字只是84万;到目前为止,教友已增添到189万。若拿这个数字与近几十年日本教友的数字相比,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近数十年来,日本由于欧风东渐,传教工作陷于停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的情况是步了日本的后尘,唯有羡慕西方的文明,企图赶上西方的科学进步;而对信仰宗教则是甘于落后,保守原有的国教。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机,行动起来,不然,中国要蹈日本的覆辙。

外籍传教士,大部分是属于修会的。除了个别的有些缺点外,其余在这教外地区都是基督的使徒、罗马公教真精神的唯一的不可少的捍卫者。

3. 关于训练本籍神职班,各教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有以下三种困难:甲. 修道生的社会知识水平太低,他们一律出身贫贱,没有受过家庭教育,没有与中等知识分子来往的基础。乙. 修道生的天资不聪敏,一般地还不如欧洲的中等学生,在研究神哲学的同时,无暇兼顾他本国的文学。因此他们就中国文学说,不如他本国人;就哲学说,不如欧洲的最平凡的修道生。丙. 缺乏神修精神。大多数要求修道的人是疏忽懈怠、畏难苟安、反复无常,只知道求现代的名利,没有真的圣召。在他们看司铎圣召,仅是一种名利,不是一种牺牲。从入修道院能达到铎品的不到百分之二十。

所以,为了发展,训练一个称职的神职班,不可以重量不重质。必须严加选择,长期训练,认真考验。要使他们能自愿地学习他们的老前辈,只有担任属下的职务。再过若干年代之后,他们如果对教会的精神有了深刻的体会,在修养、文化各方面,达到了欧洲修道生的水平,那时他们才能担任较高的职务。目前他们傲慢成性,没有担任较高职务的资格,他们决不能胜任。如果仅仅注意数字,认为多多益善,那就不免要收一些有名无实的修道生,将来他们纵然盗取了铎品,也难免不被本国人唾弃。为今之计,唯有重质不重量。

4. 中国神职班的文化水平不如欧洲神职班,其中更有些非常愚蠢的。就他们的品行说,大多数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教友并不重视他们的品德。他们的传教热忱可谓一般。而实际上教友并不太重视他们,因为教友们认为他们出身贫贱,所有优点都是从升铎品而来。甚至教外的知识分子对他们也轻视,因为他们不精通本国语文。总之,中国神职班有他本民族的、尤其是乡间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需要领导。在精明强干的管制、扶持下,中国神职班是会俯首帖耳的,也会作出许多的好事来;脱离了欧籍传教士的监督,他们就怯懦无能,不能控制自己,天真地要贪高位、当大人,而他们确实没有魄力,不能得到本国人的重视。他们本国人有所要求,即在施行圣事方面,应该坚持的不坚持,应该拒绝的不拒绝(这样的事是有的)。

统观以上所述,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神职班,虽然想摆脱外籍传教士的统治而独立,然而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神职班所以能与罗马保持联系,的确是因为有外籍传教士的监督。按‘中国人的说法’,成立中国神职班,那就等于成立了中国教会;交由中国神职班‘任意’管理,也就等于交由中国教友任意管理。像这样一个‘国家教会’,不会长期隶属于罗马;教会及神圣的事业,势将随着形势的转变与中国的思想、习俗同化,整个信仰的前途不堪设想。这就是中国人升任主教

的大危险。

5. 外籍传教士与本籍神职班的关系一向是和睦的。自从天津老西开事件发生之后,在雷鸣远、汤作霖的煽动下,天津《益世报》再大肆宣传,从而掀起了反法运动。首先是在本籍神职班和各修道院内,以后又蔓延到教友中,给他们播下了不信任主教的种子。神职班不服从天津教区主教的领导;在修道院内通用一种暗语,任意污蔑欧洲人和主教;有些教区的教友,许下坚决不在外籍传教士跟前办神工。对以上情节,主教采取了严厉措施。过去有些教区表示过要求中国主教和宗座代表来代替外国传教士,现在由于《益世报》的宣传,再加上‘公教进行会’的赞助,这种思想更普遍发展到各教区和各修道院。此‘公教进行会’,到目前为止做了世俗人干预传教事业的活动,以致损坏了负传教之责的传教士的职权。

在天津老西开事件发生之前,中外亲善,一团和气。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中国神职班隶属于外籍传教士权下。如果这种隶属不复存在,传教事业就有裂教的危险。目前中国人没有领导的资格,我们这脆弱的神职班,极容易为中国人所摆布。因此我们又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若想得平安,就必须使中国人隶属于欧洲人。中国人即便当本堂,也要在欧籍传教士的监督之下。至于当总本堂、当主教,也许在很多年之后才有实现的可能。

6. 教育问题,的确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对此我们教区一向就非常重视。我们在献县、大名有2所完小,8所初小,43个住宿要理班,此外每村还有走读生。据统计:教友男生4471名,女生4474名;教外男生1271名,女生612名。他们都受到了公教教育。

其它教区不是这样。他们没有完小和初小,只有要理班;他们在本区请不到要理教师,需要出高薪到邻区聘请,而且不通过合法手续,使训练师资的邻区受到影响。我们没有中等学校,高等学校只有上海震旦1所,而耶稣教却有大学7所、医学院16座。传教事业的不足之处,我们主要是教育机构太少。

训练要理男教师是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由于教友们家境贫寒,成立学校相当困难。农村更没有多年读书的习惯,一般师资都成问题。若不分教师的文化水平高低,一律提高薪金,既不能养成他们不计报酬地甘心为教会服务,同时也加重了教区的经济负担。聘请要理女教师,目前还没有问题。但为长久计,必须在授课要理教材以外,增添教外人所需要的其它教材,使她们可以借教授语文的名义到教外学校里任教,通过她们的模范言行和影响,才能打开这个封建的妇女界。

7. 谈到老教友的情况,肯定地说,他们的信仰虔诚,信心坚定,在遵守教规方面已成习惯;他们勤领圣事,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勤领或天天领圣体。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始终不渝的好教友。具有影响宗教生活的三个主要障碍是:甲. 赌博。它是倾家荡产的原因。2. 鸦片、吗啡。这些毒品是由日本制造输入到中国来的,现已侵蚀了许多省份。这两种毒品的后果,是使民族生命与信德将同归于尽。丙. 婚姻。使教友与非教友结婚,在公教家庭中为度宗教生活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事情的处理得当与否,完全在传教士的灵活掌握。我们要尽力减少这类婚姻。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教友很难了解遵守主日休息的必要性。教友与非教友天天接触来往,赶集经商,集会有定期。在这些日期内应遵守主日休息的规则。在传教工作中,教友认为一切由传教士自己负责,从而对解决教育和传教经费的问题很难予以协助合作。

8. 中国还是一个非公教国家,奉教的很少,4亿中国人才有200万教友。

中国人特别关心他们的物质享受,不为现实利益而要求奉教的很少。穷人没有时间学习教义,富人自高自大,不肯进教,纳妾的不许可进教,现在和过去是一样。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在中国占优势。为打进这两个阶层,必须成立高等学校。通过青年联合会及教育事业,耶稣教在大城市内占有了优势。他们获得的成就,说明了他们的方法正确:他们有贫民学校、贵族学校、医学院、职业学校。世界大战结束,正是我公教发展势力的大好时机。‘应该向敌人学习。’一个教区办不到的,需要几个教区合作。除成立学校外,其次是出版印刷事业。而这些事业必须掌握在德学兼优,对中国文学研究有素的人手里,同时对协助的中国人要有慑服力。

在教育出版事业方面,各教区如果不能占有优势,我再说一次:中国将重蹈日本的覆辙,停止于原有的国教。到那时期无法挽救了。

关于教育事业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比国圣母圣心会士,他们在鲁汶大学毕业之后才来中国。圣母圣心会在传教区教育界是第一流修会。

9.在北方的遣使会教区内,望教的不少。其中一部分是花钱买的。领洗前不加训海,领洗后又无人教导,成了一些有名无实的教友。领洗以前,保守一年,这是很明智的规定。一个教区,在一年之内训练30000到35000以上的新教友,这是不可能的。

10.关于传教事业,我认为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在教育发展方面,缺少各等学校;第二是在传教工作方面,各教区缺少联系。各教区要协力合作,统一行动,集中经济和其它力量,兴办教育事业。否则精力过于分散,即使一个教区成倍地增加人力、物力,也是枉费精力心机,徒劳无益。

附天津老西开事件说明书一件

1916年11月,在天津法租界西部地区附近,法国领事与中国当地政府发生了冲突。在那里的直隶海滨教区新修建了主教府、教堂、大修道院、学校和医院。法国领事根据中国政府以前的默认,又因为在这个地区内大部分是法国教区所在地,便企图把这个地区划入法国租界,随即通知中国当地政府。因中国政府拖延答覆,法国领事下令以武力占据该地区,从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法运动。同时《益世报》又大肆宣传,更激起了天津法租界全体职工的大罢工。天津教区主教杜保禄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命令所属神职界对这纯政治问题一律严守中立。这是聪明和唯一可行的措施,只有这样,才不致触犯任何一方。如果天津神职界都服了主教这项命令,这种不平之气就会很快地消沉下去。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当时雷鸣远极力影响中国人,汤作霖和几个欧籍司铎同中国全体神职班一致攻击法国领事,并坚持斗争。

雷鸣远等数位司铎被遣使会巡阅使调往他处。只有汤作霖一人,拒不接受调任,于是被摘掉神权。杜保禄采取的行动,是他不得不表示的态度。他亲口向某教区神长表示:“我们是法国教区,受法国政府的保护,我们不能反对它;同时我们又是在中国的神职人员,在中国传教,我们也不能反对中国。所以我们应当保持中立。……可惜,人不服从我!”

枢机主教,以上是我对你提出的10个问题的答复,特此汇报。

在主前你极忠实的神子 刘钦明

1918年10月18日”

“八、刘钦明致传信部的覆信二^① 摘录:

“1916年12月,法国领事布尔热^②,根据中国政府已经许可而尚未履行的诺言,将法租界附近约有效公顷的地区——天津教区所在地强行占据。雷鸣远主办的《益世报》攻击法国,同时雷鸣远又亲笔给法国公使贡迪^③写了一封公函。而法国公使认为这是污蔑,在他不满此种行为的情绪下,问罪于天津教区主教,要他负责。杜保禄表示了无可非议的立场:他对法国代表负责,因为他是法国人,不能反对法国人,不能反对法国;他又是在中国的主教,不能(名正言顺地)惩罚中国人。况且问题是纯政治性而非宗教性的,所以他下令告诫属下神职班,严守中立,不准表示拥护或反对任何一方。但是雷鸣远、汤作霖不接受主教的命令,反而利用《益世报》大肆宣传,掀起了暴风雨般的反法浪潮,致使法租界的职工全体大罢工。《益世报》还反对天津教区主教,要求调撤,这仅是运动的倡导者的要求。而各教区的中国神职班一致参加了这一运动,甚至非法籍传教士所属的修道院也加入了这个斗争的行列,群起与主教为难。正当此时,遣使会的视察员刘克明从中国南

① 落款为1918年11月19日。

② 即步热。

③ 即孔狄。

方来到了天津,调查此事。巴黎遣使会总长根据刘克明的汇报,当即命将雷鸣远、汤作霖调往他处。雷鸣远先被调往正定,后又返回沧县,最后调往浙江。雷鸣远在遵令被调的同时,仍坚持不接受主教旨令的意见,并称主教的命令是不合法的。汤作霖本应调往上海,但他拒绝去北京见视察员。视察员曾两次用口头通知,而不用书面通知,原因是唯恐他不是法国人,而是奥地利人^①,所以不能去法国,最后命令他往基多^②。他仍坚持不去,留在天津本堂区。杜保禄以为他既不属本教区,便将付给他的职权一律撤回,而他对主教的命令置若罔闻,照常施行圣事。主教又容忍了他三个月。为了防止他恶行的影响,杜保禄命他离开教区,否则摘权。汤作霖一方面答应服从命令,另一方面不离开天津,并且几天之后,仍藐视主教的处分,不接受传信部批准的处罚,继续做弥撒、行圣事,使神职人员和教友受到他这种恶行的很大影响有一年之久。他答覆杜保禄的警告说:“我说了服从,就算完全服从了。我是根据法学家及有权威的神学士特别克苦而摘权的学说执行的,并且我已上诉到罗马,陈明了我的态度。”就这样他又等了几个月。每星期日,他在天津某大堂更衣所举行弥撒。汤作霖的抗拒,在天津是无人不知的。他这个学说也有被神职界认为是教规教律的危险。面对着这些事实,为了下面的几个理由,必要召回雷鸣远和汤作霖,我认为不能容许的:(1)召回雷鸣远和汤作霖,要引起一种正义的惊异和恶评,同时会出现一种不能允许的且又不合实际的场面。根据事实,汤作霖没有悔过,这是圣部为解除处分认为应作的悔改表示。雷鸣远在离开天津前,给杜保禄写信说自己不肯服从那种不合法的命令。这些都是公开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在遭到藐视的双重的权威^③方面,为了处理问题^④,却采取了仁至义尽的方法。召回雷鸣远、汤作霖,势将造成一种不能允许的、不合实际的场面:根据中国的风俗习惯,上级和属下起了矛盾,如果上级无理认输,那是大失体面,俨然受了污辱,有失尊严,无脸见人。所以若把雷鸣远和汤作霖召回,势必造成杜保禄退休,无人继任;或者被属下刺讥、嘲弄,这是与他的地位不相容的,有损于他的尊严。”

1919年 民国八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八、一九一七年的大水灾

“林主教需要人帮助他,乃请求传信部给他一位辅理主教,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四月二日,罗马任文贵宾主教为林主教的辅理主教。正定的神职人员及教友都舍不得文主教离别他们,文主教方面亦不忍离开他们。正定主教出缺二年整。

“一九一九年正定教区的情形

教友七〇八七五	客籍神父二〇	国籍神父四〇	教友区八五五
传教士的住所一九	大堂八六	小堂五五〇	大修士一七 小修士一一二
学校男老师二八五	学校女老师二七八	中学二二	学生七〇〇男子望
教所一七〇	女子望教所一四四	成人领洗者一七五三”	

“十三、一位工作不倦的传教士——雷鸣远神父

“5. 光主教作视察

“光主教 Guebriant 是广州的宗座代牧(一九一六——一九二一年),于一九一八年由罗马委任视察中国的一切教务。光主教先由南方开始,民国(七)[八]年(一九一九)十月他至天津。”

① 译者注:人都以他是埃及人。

② 译者注:厄瓜多尔的首都。

③ 译者注:修会和法典。

④ 译者注:双方相持不下。

“民国(七)[八]年(一九一九)十一月十八日,光主教给天津的全体神父一封拉丁公函,正式指责雷、汤二位神父及其同伴。

“最后光主教告诉汤神父,自己将严重处罚他,汤神父乃表示服从。十一月二十三日光主教带汤神父至上海。十二月九日汤神父乘船回欧,不久他出会……”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赵永生《教会禁止教徒爱国的一篇文章——光若翰〈致天津司铎书〉》载:

“现将全文译出:

致天津教区全体司铎信

余不久即将离直隶赴其他教区巡视教务,来年复活节将向至圣圣父^①复命。余以为在行前应正告汝等教语。

当至可爱之中国教会方兴未艾之际,唯天津一地之教徒不得平安。无平安,则天主之事业亦不能推行。平安之义在于秩序之稳定。无秩序,则平安亦无从谈起。而基督为使我等臻于平安之境所建立之秩序,乃教会之秩序也。依照此种秩序,教徒于灵魂之事服从神父,神父服从主教,主教服从教宗。

汝等遵从秩序,秩序亦将保护汝等。汝等不仅应以言以行,且应从内心服从领导。上级所赞许者,汝等亦赞许之;上级所反对者,汝等亦反对之。

汝等应训诲他人,而不可受他人训诲。

不可受世俗人之训诲。见彼等推翻旧中国之秩序,改帝制为民国,遂亦思改变教会之制度。其荒谬莫过于此。

不可受报刊之训诲,彼等报刊,纵系教徒出版,亦往往为吸引读者而信口雌黄,述事有欠慎重、诚实、确切,甚至全然谬误。

不可受善反教徒之训诲。彼等对基督之真理意见不一,以多种方法迷惑人心,为壮大一己声势,不惜危害公共秩序。

应停止一切政治煽动。回忆基督所立之表率,彼不欲为政治性之默西亚,亦不欲被犹太人举而为王。汝辈之中任何人不得主持示威游行,亦不可容许男女学生参加上述活动。

无论神父教徒,就其身为中国人,可允许暗中私自发表个人意见,以不违反教会法律为限;而禁止任何人,尤其是神父,以教会名义发表意见,即使是个人意见,亦在禁止之列。更不准煽动、派遣或引诱属下教徒,特别是男女学生,与外教人、异教人相混,参加游行。

纵使众人皆奔走城内,唯我天主教控制教徒、学生遵守固有之秩序,照常作事尽职求学。此绝非吾辈之耻辱,而应确信此事本身极善而有利于教会也。夫真正之爱国在于安分守己,并非争取权利,况对此种权利恐多有缺乏正确认识,或未曾学过。天主教之唯一体系即秩序也。

不可效某些人之不揣冒昧,竟亵渎教堂,在教堂内不讲教灵之道,而讲论昨是今非之人类见解。无主教允准,即于教堂之外,亦不得公然讲论政事。

教徒等如为教会之利益而结社,应密切注意,禁止彼等于集会之时从事任何政治活动;除传教、探望病人、救济等善举之外,不准研究其他事项。且此种社团应完全由本堂神父指导,并应取得主教之准许和节制。违此,则一律禁止。

必须制止教徒在自己出版之刊物上妄以教会名义议论自己之神牧,招致善良之怨恨。对此应一再劝戒;劝戒无效,即提交教会当局处理。教会对此种刊物可加以惩处、禁止;且此项权力不仅限于本教区,对其他教区亦同样生效。

应切记教会法典1386条之规定:“神职人员,不问其是否修会成员,无上级准许,一律不得出版世俗书籍或向报刊杂志投稿……”

^① 赵注:指罗马教宗。

对此类天主所禁止之事，如有教徒或神职人员敢于抗拒不从，众等可按情节轻重远离之，待其悔悟；切勿因汝等之宽容而使之傲气凌人，陷于彼邪魔之见解，而为他人树立恶表。

教宗对中国教会极为关怀，切望尽力推动本地神职人员德才之培养。万不可使圣父之心愿因某些人之傲慢而推延不能实现。

汝等可以确信，在此次巡视之后，余将以中国教会之需要禀明教宗，供其采取有效措施，以维护公共利益。

尚祈为余代祷。

宗座巡阅使光若翰

11月18日于北京”

《西湾圣教源流》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牧》第六节《西湾子总堂下榻名客》载：

“一九一九年，光大主教，全中国教区底巡阅使，也来了西湾子，他实在惊讶这么多的教友住在一个堂口莫可名言的赞美圣教会底广扬。本村众信友也另外欢迎了他。”

附表(四)《自圣母圣心会接理蒙古教务以来所有代牧和副主教的史略》载：

“季舍尔司铎：(T. R. P. Guisset)季公于一八三六年七月十三日生于比国那慕尔(Namur)教区上比阳(Champion)村，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于那慕尔府晋升铎品。先在堂普村(Temploux)当了三年副本堂，后于一八六五年九月间来求入圣母圣心会。第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始离开堂普村，入了本会会院。当年九月初五日起身往蒙古去，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到了西湾子。第二年(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西湾子发了圣愿，立时去关东(下庙沟)接任新亡者司公(R. P. Van Segvelt)之职。一八七三年主教命他回西湾子管理账务，公于第二年才得回来。一八七七年九月任西(子湾)[湾子]西区的区长总铎。一八八五年又回西湾子理账。巴善贤主教死后，公于一八九五年七月内由宗座得了掌管西湾子教区的权柄。自一八九七年后，公即固定常川驻(札)[扎]西湾子，并一心致力于圣婴会直至死期，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安然寿终。”

《中国天主教史》第十一章《茁壮时期》载：

“雷鸣远神父独树一帜

“……雷鸣远(西名 Vincent Lebbe)……发见所谓‘保教权’，在教外人眼中，使教会同西方文化联在了一起，无怪乎他们视基督教为‘洋教’了。他清晰地看出来传教的方法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照这样下去，万难使中国皈依。从此他便下定了决心，要以全力来从事改弦更张的运动……‘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这是他的口号。他见中国是那样大，人口又是那么多，只凭神父传教，绝对不够，于是他便创立了一个‘传信会’，组织教友传教，这是‘公教进行会’的先河。

“雷神父……提倡人民爱国，由爱国而爱教：这在当时新兴的中国，是传教最好的办法，可以一扫中国过去对‘洋教’的误解。不幸天津发生了‘老西开事件’，把他卷入了外交上的冲突。原来天津法国租界与老西开接壤，而天主教的总堂又适在老西开；这是一片洼地，葑菽丛生，如果把它填平起来，可成为一块大好的市区。法国领事对它早已垂涎三尺，但因是中国的领土，还不敢贸然占领，乃请求中国政府准他向该处扩展租界。中国为避免纠缠交涉，未予答覆，于是法领事以为是‘默认’，遂开始兴工填平。一时人心大哗，纷起反对，益世报也著论主持正义。雷神父平日既然提倡爱国，自然不能袒护法国，但碍于法国的压力、主教的禁止，又不能畅所欲言；他自称当时真是心如刀绞，痛苦万分。雷神父终于被迫离开天津，调往浙江宁波。消息渐渐传至罗马，当他于一九一四年返回比国时，曾访问枢机迈谢(Card. Mercier)长谈，枢机对他运动中国主教的主张甚表同情，且与汪劳松枢机(Van. Rossum)的意见不谋而合，教宗本笃十五世正好于一九一八年委汪枢机为传信部部长。一九二〇年雷神父被调回欧洲……得见汪部长，并蒙教宗本笃十五世召见。部长与教宗都同情他的奋斗，并嘱以暂时忍耐，保证祝圣中国主教一事，定要实现。”

“《夫至大》通谕

“一九一九年教宗本笃十五世……颁发了‘夫至大至圣之任务’通谕。……我们不难发见其中不少

的见解都同雷神父的完全吻合：传教士应绝对避免谋求其本国的利益，否则便要使传教的努力完全失效；关于本地神职人员，通谕明确地说：“有些传教区域，天主教已传入了数世纪，而本地神职人员至今只居次等的地位。……给他们以适当的栽培和教育，实属刻不容缓。……不可只求其能作外籍传教士的助手，却当使他们在自己的民族中有接收管理的能力。”

《中国基督教简史》第五章《回应时代的挑战》第四节《土生土长的教派》载：

“真耶稣教会

“原名万国更正耶稣真教会，1917年由魏恩波创立。魏恩波1877年出生于河北保定，1904年在北平磁器口伦敦会礼拜堂受洗入教，旋即加入北京基督教自立会，后又被自立会开除。1915年遇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传教士施列民，接受了安息日会的信仰。次年因久病不愈，在使徒信心会又受了浸礼，并在自己开设的绸布庄内设立家庭聚会，追求圣灵充满、说方言等神秘经验。1917年4月3日，魏恩波在北京郊区黄村禁食三十九天，自称耶稣向他显现，他按听到的声音，去永定门外大红门河中，面向下再次受了浸礼。受浸后改名魏保罗，并立志传道。此后便以万国更正耶稣真教会的名义开始传教，不久又改名真耶稣教会。因为信的人增多，又在南苑附近租房成立两处会所，并到天津、河北等地传教。1918年2月真耶稣教会在北京成立总会，魏保罗自任总监督，由华裔美国人劳整光任副总监督。1919年出版《万国更正教报》，免费散发。同年魏保罗因肺病去世，由其子魏以撒继承。”

1920年 民国九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十四、天津代牧区

“……一九二〇年七月杜主教接到国务卿加斯巴利枢机的电报，免去他天津代牧区的职务，任他为江西新成立代牧区^①的署理人……

“七月十二日罗马教廷以诏书任命林主教的辅理主教文贵宾 De Vienne 为天津的代牧。

“……杜主教由已管辖八年的代牧区，调至尚未成立的代牧区，离天津又远，言语不同；任命一位主教不为代牧，而竟为署理人，自然是一种降职……

“我们上面看见中国北方四位代牧请将宣布赦雷、汤二位神父的谕旨缓为执行，以后果然这谕旨收回了。而一九二零年，没有任何人为杜主教伸冤。”

“十二、宗座代牧区的新名字

“传教士早已希望教区的名字用通用的名字，民国九年（一九二〇）传信部决定，此后教区采用主教或监牧所驻城的名字。

“从此以后，宗座代牧区皆以下列名字取名；将来的新教区亦以主教驻的城而得名。

“遣使会北省教区的名字

旧名	新名	省名
直隶北部	北京	
直隶东部	永平	河北
直隶西部	正定	河北
直隶中部	保定	河北
直隶海边部	天津	河北”

《献县天主教志》第十章《教会的事业（三）》第二节《高等教育》载：

“1920年7月27日，传信部劳兰蒂枢机主教致函刘钦明称：

光比央主教在其视察中国的汇报中，只提到你教区在乡间的传教事宜，至于在城市开办高等

^① 赣州代牧区。

学校的问题则未涉及。我们打算重新划分直隶海滨教区的边境,将某一城市划归你教区,并在那里成立一所高等学校。目前时机已经成熟。天津主教杜保禄已调任江西,委北京教区副主教文贵宾为天津教区宗座总理。你可与他协商,相信事情会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对此事非常关心,并将大力支持。望你将协商的结果呈报圣部。

“7月30日,又写信给文贵宾称:

你的邻区没有一个大城市。希望你与该区主教刘钦明协商,根据传信部的建议,遵照宗座巡回使的意见,你们两教区交换一下教区边境,使直隶东南教区得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我们更希望你与刘钦明协商一下委托耶稣会士在天津成立一所高等学校的问题。

“11月13日,刘钦明覆函传信部说,只要能在天津开办学堂,就了了他的夙愿,无须再要天津城。12月8日,刘钦明与文贵宾在天津达成协议。12月9日,文贵宾以文字向刘钦明保证:

遵照传信部1920年7月30日的指令,许可献县教区耶稣会士在天津为贵家子弟开办一所职业学校,或一所高等学校,或两者并举。凡有关教会法典所赋予各大修会的权利,以及宗座颁赐给耶稣会士的一切特权和遵照教会法典的解释其所能享有的一切权利,一律照准。”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俄国东正教传入天津前后》载:

“三、天津东正教会的建立

“……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成批的白俄流亡分子——包括贵族、军人、地主、商人等——从苏联逃到中国,逃到天津的俄国人就有110余人……

“1920年他们向北京东正教总会主教伊诺肯提乙要求派一名常住的神父来天津主持宗教生活。不久北京总会派来大司祭巴维尔·拉足莫夫(Протоиерей Павел Разумов),为天津东正教会的第一任司祭,并选立了教堂堂长和兄弟会。”

《中国基督教史略》第六章《中国的东正教》第二节《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载:

“三、第三阶段(1902—1956)

“……天津的东正教会始于1904年,在海河北小关街建立了一个东正教祈祷所。后来,流亡的俄国信徒人数骤增,从1920年起先后建成了圣母大堂、圣英诺森教堂、圣尼古拉教堂、圣谢拉菲姆教堂、众圣教堂等。主持教务工作的先后有巴维尔(、)[·]拉祖莫夫大司祭、维克托尔修士大司祭、夏乌利伊勒修士司祭、米哈依尔·罗果仁大司祭、西奈斯基大司祭、奥西波夫大司祭,中国神职人员芮司祭、林润臣司祭、杜立昆司祭等;信徒人数最多时约有5000人;创办过医院、小学、图书馆等机构。”

1921年 民国十年

《献县天主教志》第十章《教会的事业(三)》第二节《高等教育》载:

“1月14日,传信部长王老松致函刘钦明,同意他在天津办学而不必把天津划入他的教区。7月21日,法籍耶稣会士于溥泽(1862.2.3—1930.4.8)被派至天津任耶稣会院代理院长并筹备建校事宜,8月上旬购得天津马场道清鸣台附近旷地100余亩为校址。12月20日委托一位比利时籍工程师绘制校舍建筑图样。”

第六章《教会的沿革(五)》第二节《外国修女会》载:

“拯亡会

“……1921年6月21日,7名拯亡会修女应刘钦明之邀从上海徐家汇总会会院来到献县张庄总堂成立会院,其中有法籍修女米慈智等3人,华籍修女袁双梅等4人。以后又来了4名法籍修女,1名瑞士籍修女,吸收了若干名华籍贞女入会。”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二十三、正定代牧区

“……自文贵宾 De Vienne 主教离开正定至北京作林主教的辅理主教后,正定代牧区二年间没有

主教,幸而有一位德才兼优的副主教,他是巴国范 Baroubi 神父。他是西利亚^①人,一八六八年生于白马京^②,一八八六年在巴黎进遣使会。……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抵北京。一八九三年五月廿七日升神父,被派至正定。……

“主教府所占的地很广,仁爱会修女的土地更为广大。巴神父以为若将这些土地好好耕种起来,可能得到许多粮食、蔬菜,以供神父及修女使用,因为他们常养活二千人左右。于是他利用孤儿及能工作的老人将地开垦出来,留下一大块作为菜园。他至巴黎买菜子,试验数年后,他可种植欧洲的一切蔬菜,当时中国尚没有这种菜。

“巴神父对他的成功不保秘密,反而在北京的《公教月刊》及《小农夫》Petit Jardinier 季刊上公布,并告诉传教士种植的季候及各种蔬菜的种植方法;他亦教人种葡萄及酿酒的方法。”

“二十四、文贵宾主教的继位人——文(继)[致]和

“光主教视察正定教务时,曾向罗马教廷推荐巴神父为正定主教。

“但巴神父绝对拒绝,不欲接受;一九二〇年圣座乃任命文(继)[致]和 Schraven 神父为亚米盖的名义主教及正定的宗座代牧。

“文主教于一八七三年十月十三日生于荷兰林埠省克本弗地方,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巴黎入遣使会。……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升神父。九月抵中国,被派至正定。传教数年后,至主教公署管理账目。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正定主教巴儒略 Brunniere 去世,文神父以代理主教的名义管理教区,直至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顾其卫 Coqset 主教上任。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他至上海为副经理,一九一一[年]调至天津,民国三年(一九一五)又回上海,继鲍维翰 Bouvier 神父位为经理,在上海他被任为正定代牧。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四月十日文主教在正定由表兄武(牧)[致]中 Guerts 主教手中接受了祝圣礼。”

《西湾圣教源流》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牧》第六节《西湾子总堂下榻名客》载:

“一九二一年,吕登岸司铎(那时值任圣母圣心会总会长)来到蒙古巡阅,在西湾子又邀集各区主教开会,特议决设立大同总修道院,也奏陈罗马传信部;宗座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指令照准设立总修道院。自从有了总修道院,主教会议常在大同或归化城。”

《河北省志》第 68 卷《宗教志》第四编第七章第六节《重点教堂》载:

“十四、大名教堂

“大名教堂:始建于民国 7 年(公元 1918 年),民国 9 年(公元 1920 年)竣工。座落在大名城内东大街路南,名宠爱之母堂。是闻名河北的著名天主教堂之一。

“教堂呈平面十字架形,占地面积 1220 平方米,可容纳 1000 余人跪堂。其钟楼高 42 米,大钟三面可观,及时报点,声传数里。钟下嵌有 2 米高的铸铜圣母抱耶稣坐像,小耶稣右手抱一地球,铜像两侧对联曰‘欲识其宠请看怀中所抱,要知厥能试观掌上何持’,匾题‘宠爱之母保障大名’。

“教堂北面有 5 个门,中间为正门,堂内穹隆拱顶,由 14 根高 6 米的圆石柱支撑。周围墙上有各式多格的窗户百十个,镶嵌着花形图案各异的对花拼缀的五彩玻璃。大窗高 7 米、宽 3 米,小窗高 3 米、宽 1.2 米,大小搭配,谐调壮观。大堂南面有大理石祭台一座,祭台上面装有耶稣苦像(十字架),高 4 米左右,台前上方悬挂 6 盏蜡灯,每盏灯插蜡烛 60 支。祭台前左右各有造型奇特、式样古朴的铜质镏金蜡树。树高 2.5 米,呈宝塔形状,共 5 层,层底周长 3 米有馀,每树用腊 200 馀支。祭台前面东西各有小祭台一座,东台上有耶稣圣心立体石膏像,西台上有若瑟抱耶稣立体石膏像。靠西墙设有木制祭台三座,中间为天使圣弥厄尔,左为圣人沙勿略,右为圣人方济格,均为立体石膏塑像。靠东墙也设有

① 即叙利亚。

② 即大马士革。

木制祭台三座,中间为圣母抱耶稣,左为圣女依撒伯尔,右为圣心德肋撒。均为立体石膏塑像。其高均近2米,塑工精细、逼真,栩栩如生。

“大堂东西两壁上悬挂着14幅用木框精镶的浮雕石膏像,记述了耶稣被捕、受押、赴刑场等一路上遭遇苦难,直到钉死埋葬的整个情景。这14幅苦路浮雕的制作实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另外还有记述耶稣一生传教事迹的12组油画像,每组3幅,称之为耶稣行事画像。

“大堂北端装有高6米、宽5米的特大管风琴。演奏时需2人相配合,1人按键,1人压气,琴声粗如沉雷,细如鸟鸣。

“大门外东北、西北两处,各立两座对称性的石碑,碑高为3.18米。东北处的石碑记载了建堂的时间及原因。碑记全文如下:

大名县天主教堂建堂碑记

粤洲大名东街路北旧有圣堂一座,厥后城乡信友加多,各院生徒渐众,旧堂狭隘,苦其难容,乃议重建圣堂于东街路南,高其闾[敞],增其式廓,(受)[鳩]工庀材,经方管位,于降生后1918年7月2号耶稣会会长郝司铎嘉祿祝圣筑基首石,维时教宗本笃十五御极,主教马公恩利格及副主教刘公恩利格司直隶东南教务,越二年于8月2号而功告竣,于9月26号肇举弥撒大祭,于1921年12月8号主教刘公恩利格祝圣新堂,献于宠爱之母。

窃以此堂规模宏大,功烈高深,恐其年远而就湮没,故叙其颠末,勒诸贞珉,永垂不朽,是为记。

天主降生1921年12月18号 立

“西北处的石碑详细记载了为大堂捐款资助的单位及个人名单。”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的回忆》载:

“自1921年到1925年中间,我们三个中国会士——刘、王、赵在欧洲比国读了神学,升了神甫。”

1922年 民国十一年

《中国天主教史》第十一章《茁壮时期》载:

“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①

“一九二二年继任本笃十五世的比约十一世^②……即位后的最先措施之一,便是派遣一位宗座代表——刚恒毅(Mgr. Costantini)来华。但显而易见的是,从此传教士——无论是那国国籍,都要直接隶属于圣座。教宗也是藉此表示他的意志是使教会摆脱国家的保护。”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载:

“十四 二十世纪的中国天主教

“……玛利亚若瑟女儿们(Daughters of Mary and Joseph)于一九二二年到了热河。

“为便利学生们求高深学问起见,法国耶稣会又于一九二二年在天津创办了工商学院。”

“十六 现下的组织工作和艰难

“……教宗庇护十一世……许多最先模猷中的一件,便是……在中国派遣教廷代表。……他登极后还不到六个月工夫,便于那年八月九日建立了驻华宗座专使的职位。同年十一月八日,第一任驻华宗座专使德奥道西亚府总主教刚恒毅(Mgr. Celso Costantini Archbishop of Theodosia)到了香港。”

《献县天主教志》第十章《教会的事业(三)》第二节《高等教育》载:

“1922年4月下旬,耶稣会拟在天津设立的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工程相继在其所购土地上奠基。6月13日,直隶东南代牧区耶稣会为未来的学校命名为‘天津农工商大学’,在教会内部则称‘天津圣

① 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

② 即庇护十一世。

心书院’，并通报华北各代牧主教。”

《西湾圣教源流》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牧》第二节《方、蓝、石三位主教的建设事业》载：

“全区的信友，另外本村教众，慨解义囊，输纳钜款，为建筑这座大堂。主教请石公画了大堂底图样，委姚正魁司铎和会长等监工。在一九二二年，方主教行了奠基圣礼；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蓝主教第一次在新大堂举祭；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八日，石主教行祝圣新堂典礼，这大堂底工程，可说是三位主教和众教友底大功劳。

“这座大堂为罗马式底建筑物，计长二十一丈馀。堂之中部宽六丈，堂之长廊长约九丈。圣台所又宽又高，中部跪凳能放一千二百人。至于过瞻礼，堂底宽大，能容二千人，男教友在右部，女教友在左部。正祭台后头有五座小堂，每小堂另有一祭台，台所周围有环廊。此外还有四个祭台，其中一为圣方济各沙勿略，一为圣女德肋撒，都用本地大理石精工制成。德肋撒台上，有自法国利济哦发来的圣髑；方济各台上，有全远东最大的圣髑，就是圣人底扁帽。这样，这两位传教主保在西湾子也受教友底敬礼。不多时之后，正台、旁台都改建大理石的，修正祭台底消费，为公教进行会向本村教友求得的哀矜。”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俄国东正教传入天津前后》载：

“三、天津东正教会的建立

“……1922年拉足莫夫离天津去美国。北京东正教总会又派修士司祭维克托尔(Иеромонах Виктор)继任天津教堂的本堂司祭。维克托尔出身于宗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东正教司祭。维克托尔在读神学院时被征入伍，后曾任沙俄军官。于1920年从苏联逃到中国新疆，又随一批白俄来到北京，被当时的北京教会主教伊诺肯提乙收留。以后升为修士，命名为维克托尔。后又升为修士辅祭和修士司祭。1922年他被派来天津任本堂司祭后，因天津的俄国人增多，原来的小型教堂已不敷应用，维克托尔在天津发动募捐，于1925年在小教堂原址扩建了一座能容纳数百人的大教堂，命名为‘圣母拏憐’堂。维克托尔把108名沙俄官兵尸骨迁葬在教堂前当中地下，在教堂门前墙上镶嵌了三块汉白玉的大石板，上面刻有死者姓名，为这些侵(国)[略]者树碑立传。北京总会主教伊诺肯提乙认为维克托尔建堂有功，当即奖给他修士金盃大司祭的职位。

“维克托尔在天津任本堂司祭时……为在天津的俄国人设立了俄国学校、俄国医院、俄国图书馆等福利设施。当时还把俄侨坟地迁到河东大直沽后台，扩大了坟地面积，并建立了一所灵堂。就在这个期间，维克托尔升任天津各教堂的监督大司祭，他所在的‘圣母拏憐’大堂便成为天津东正教总堂。”

1923年 民国十二年

《献县天主教志》第十章《教会的事业(三)》第二节《高等教育》载：

“1923年7月2日，天津农工商大学开始招生。共录取本科学生48人，预科学生51人，其中农科只有1人，于是将该生划入工科，取消农科，易校名为‘天津工商大学’。9月15日开学。于溥泽任校长。有教授9人。一个月后法国公使蒲乐留到校视察。该校接受罗马教廷教育部津贴，在该部立案并接受指导。”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十九、保定的本堂区

“富主教很快地就懂得，维持及推进教友生活的最好方法，是神父在教友中；因为教友若离本堂廿至六十公里，自然不易见到神父。

“我们将保定区及保定代牧区各代表本堂的数目列在下面：

一六〇四—一八四〇年一座本堂——安家庄

一八四〇—一九〇〇年新建六座本堂

一九〇〇—一九一〇年新建十座本堂

一九一〇—一九二三年新建廿二座本堂

一九二三—一九五〇年新建六座本堂

共有四十五座本堂

“由此表中,可见新本堂加增最多的,是富主教在任时。每一座本堂有一位常驻的神父,有时尚有一、二位副本堂。但不要想本堂常驻堂中,不走出他的村庄;本堂当至其他堂区,有时有廿区,或十五区,很少在十区以下的。以本堂区神父的数字而论,已不能再分了,并且也有不利处。只有大本堂区能有一、二位副本堂;别处只有本堂神父一人。单独生活,特别对年(青)[轻]神父而言,往往是神修退步的原因;因此后来有时将二、三本堂区合而为一,以推行公共生活,为传教士这是有益的。”

“二十二、保定的新事业

“一九二一年富主教由欧洲回来,带着许多计划。他曾在法国,特别在巴黎圣堂中作过多次演讲,提及中国的许多灾祸;他愿以此感动听众的心帮助传教士工作,他们因无钱,不能帮助穷苦教友及发展事业;他自己曾在圣堂募捐。

“法国教友大方,富主教带回大批款子;回来以后,即刻实行。他在保定南关买了一大块地皮,造了一座新式医院,病床一百张,为贫民特设一区,免费医治三十位病人,这是曹锟督军的捐献。

“在这块地的极端,他造了二座男女学校,完全一样,中有道路隔离;先是小学,数年后成为中国政府立案的中学。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一切事业都在进行中。医院主任医师,为上海耶稣会士所办震旦大学所培植出来的。男生学校由一客籍传教士管理,副院长为国籍神父;三位辅理修士教授法文,有多位中国老师。课程如公立学校一样;成为中学后,在中国政府立案。

“女子学校由方济各传教修女会管辖。以上二座学校,能收容四十名天主教寄宿生成守护者,及百餘名走读生。”

“二十四、文贵宾主教的继位人——文(继)[致]和

“……罗马教廷于杜主教离开天津至赣州后,任命林主教的辅理主教文贵宾 De Vienne 为天津署理主教,使北京林主教没有了辅理主教。

“林主教希望文贵宾主教重回北京,乃静心等候。但不久,他发觉这是幻想,乃向罗马教廷申请一位辅理主教,并表示他希望蒙准,但直至一九二三年,才达到目的。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六月十二日罗马教廷以诏书任命文贵宾主教为天津宗座代牧;同日任命富成功 Fabregues 主教为北京林主教的辅理主教,有继任权。

“富主教调任北京,使保定传教士悲痛不已,因为富主教在短促时期中,使这保定新教区非常发达。

“富主教于一九二三年九月离开保定至北京就职,保定由满德貽 Montaigne 代理主教管辖。过了一年,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十二月十八日,满神父被任为西地玛的名义主教,及保定的宗座代牧;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四月十九日他在保定由宗座代表刚恒毅祝圣为主教。”

第二十四章《遣使会北省的情形》载:

“一、正定教区

“我们前面说过,文致和 Schraven 主教开始尽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职务。

“以前他管理遣使会士的账目,现在他管理教区的灵魂账目,但为得灵魂方面的成果,亦当用现世的钱财。文主教以他实践的眼光不久就看出,在正定曾用大批款子为养活修士,他们一年比一年多,因为很久以来,他们常由教会赡养。文主教作一尝试,乃规定小修士每年当交廿元膳宿费。第二年,修士的数字并不减少;热心的父母,愿自己的子弟升神父,情愿作这牺牲。以后几年,修士的数目常在百卅至一百四十之间。

“小修院房屋不够用,文主教造了一座洋房,教室宽大,寝室中空气流通。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文主教以为主教座堂太小,瞻礼日不能容纳许多教友,乃照(Moerloose)神父的图样,将圣堂扩大,成为一座美仑美奂的圣堂。因为大理石矿甚近,因此能以廉价买得大理石,如在别处的普通石头一样。工

程师造了一座哥德式的美丽圣堂，堂中有许多祭台，以供多数神父举祭之用。”

1924年 民国十三年

《中国天主教史》第十一章《茁壮时期》载：

“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

“……刚大主教一到任，便立即建议罗马将两个教区委任中国人管理：成和德为湖北蒲圻监牧，孙德桢为河北蠡县监牧。这两位监牧且参加了在上海所召开的全国教务会议。”

“上海全国教务会议

“中国传教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全国教务会议，于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召开，参加的是各教区首长，各修会和中国神职界的代表。会议讨论各教区应一体遵守的正确纲要，要完全符合本笃十五世所给的指示。有整个儿一章严禁传教士涉足俗事和政治；‘决不可让脑筋简单的人视天主教为某一国家的教会，要使由神圣的创教者所昭示的大公无私的特征显耀于大众之前。’大会并规定本地神职人员可以担任任何职务；‘本地神职人员只要有资格，决不可拒绝他们担任任何职务。大会且有更高大的希望，并期望其尽可能早日实现，即由本国神父内选任主教。’”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载：

“十四 二十世纪的中国天主教

“加拿大宝血会修女们(The Adorer 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于一九二四年到了河北献县。”

“十六 现下的组织工作和艰难

“刚总主教就职后，便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在上海召集第一次中华全国公会议。各属外籍主教都莅会参与，计法籍十七人、意籍十人、比籍五人、班籍五人、荷籍四人、德籍二人。那两位最先的华籍宗座监牧也来与会。这回公会议一致的趋向，就在从速建立一个寻常、自立的本国教会。”

《献县天主教志》第六章《教会的沿革(五)》第二节《外国修女会》载：

“1924年6月4日，应刘钦明主教之邀，7名加拿大宝血会修女到达张庄总堂，以后又来了8名外籍修女，吸收了17名华籍贞女。该会修女除传教外，还承担缝纫、刺绣、看护病人等工作并负责音乐、美术教育，编有《指路民书》等传教著作。”

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牧》载：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方公逝世，蓝公升为正主教。”

附表(四)《自圣母圣心会接理蒙古教务以来所有代牧和副主教的史略》载：

“方济众主教：(Mgr Jer. Van Aertselaer)方公系比国人氏，于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一日生于美林(Malines)教区奥特登(Hoogstraeten)城。年长读书修院。及念了第一年哲学，始入圣母圣心会，当时即被遣入罗马传大攻读神学。一八七十年六月十一日于罗马得领铎品。后回斯哥德总院。一八七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发愿，第二年三月三十日起身赴蒙古，至六月间就到了西湾子。十一月间，即被选为修院院长。至一八七八年九月，除任修院教员外，又尽西湾子理账之职。一八七九年二月被遣往河套(Ortos)相帮石司铎开办小桥畔堂口。以后于一八八零年十月间离开河套去归化城创办师范学校，充任校长。一八八一年九月十五日复任西湾子修院的院长。过了四年，即一八八五年六月十三日，起程回欧，当本会总会长的参赞。当时美林底红衣主教高森(S. Em. Le Card. Goossens)派公去罗马商议圣母圣心会接受刚果传教区(le Congo Belge)事宜，同时也为商量本会开第二次大会、订正会规等事。一八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公又回到蒙古，特为参加本会于明年五六月间在中蒙古二十三号村将开的大会议。在此大会内，公即被选为本会总会长，亦经罗马批准，公即于一八八七年七月十四日离开西湾子回欧去了。一八八八年四月九日，比属刚果即交于圣母圣心会管理。方总会长在一八九二年六月六日就起身去巡阅这新教区，当时公也乘机相帮了各纱衣(Kasai)地方创立总座堂于鲁乐堡

(Luluabourg)。一八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自斐返欧。一八九八年五月七日,总会长之职已满,即被选为则拉衣(Zarai)主教,作中蒙古教区底代牧。本年七月二十四日于(比京不鲁舍拉)安代来特(Anderlecht)圣为主教,十月间即往自己的教区起了程,十二月二十七日就到了西湾子。一九一一年亲赴罗玛办公。一九一四年得了一位副理主教名蓝(克复)玉田(Mgr ter Laak)。一九二二年宗座赐公一个私人职衔,即管理外蒙古(Mongolie Exterieur)。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福终于西湾子。”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二十一、蠡县监牧区的成立

“富主教在教友多处添设本堂,使神父在教友中。在教友较少处,他也愿意这样做,然而他没有足够的神父;他看出只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即将代牧区分划,成立一、二新代牧区,由别的神父管辖。他将这个计划报告宗座代表刚恒毅主教,他不但赞成这计划,并鼓励富主教将这计划付诸实行。

“教宗庇护十一世以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的谕文,将保定代牧区分划,成立了一个新监牧区,名蠡县,管六县;谕文并说将来还要作另外划分。

“同日罗马任命孙德楨神父为蠡县的监牧,秋季,孙监牧至蠡县上任。

“孙德楨于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十一月十九日生于北京,光绪廿三年(一八九七)正月廿四日升神父;光绪廿七年(一九〇一)正月廿五日进遣使会,后被任为北堂小修院的拉丁文教授;一九一二年被任为牛房本堂,由此被任为监牧。”

1925年 民国十四年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十四《二十世纪的中国天主教》载:

“一九二五年,印五伤司铎会士们(Stigmatins)到了河北易县。”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二十一、蠡县监(代)[牧]区的成立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保定代牧区有十万二百〇九名教友,将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九名教友让与新监牧区。在此地工作的客籍传教士则回至保定;尚有国籍遣使会士及教区神父共有十八位,管理蠡县的十三座本堂。”

《河北献县志》卷十五《宗教篇》载:

“县境之有天主教肇自前明,而建堂则始于清之咸丰。咸丰六年,罗马教皇派主教来献择地,于城东二里之张庄建总堂一所,统辖直隶东南三十六县之教务。其礼拜堂为十字形,东西广二十馀丈。门楼高八丈馀,分三层,每层悬铜钟一,以铁轮击之。每晨行祭鸣其一以聚众。遇行大礼则三钟齐鸣,嗙嗙乎声闻七、八里。

“主教五人

杜巴尔主教:号厄督,咸丰辛酉至中国,同治乙丑升主教,光绪戊寅卒于吴桥。

年文思主教:号安德肋,咸丰乙未升主教,同治壬戌终。

步天衢主教:号亦趋,光绪庚辰升主教,庚子终。

马泽轩主教:号霖浦,光绪辛丑升主教,民国乙未终。

以上各主教墓皆在云台山之阴。

刘钦明主教:民国丙申升至今。

“本县神甫

张庄四人:张天禄 张镜明 李友兰 李友梅

大郭庄三人:徐问源 徐鸣凤 徐志远

马家庄一人:赵汝霖

齐家庄一人:周凤歧

西韦庄二人：苑桂华 吴金章
南紫塔一人：段绍昌
周家庄一人：孙天爵（一名玉德，号佩卿）
留路一人：冯仪珍（号荡之）
（城西）齐庄一人：刘希圣
单桥一人：杨希酬
陵尚寺一人：田瑞臻
田家庄一人：柳景文（号子惠）
东郭庄一人：何道隆

“中国他县修士来县境为司铎者

潘凤辉，号安仁，深州人	董济众，号博施，南官人
孙承益，号守谦，深州人	冀天爵，号体仁，冀州人
王永福，号吉甫，蓟州人	李林芳，号东圃，威县人
王永诚，号安德，深州人	吴正恩，号戴仁，深州人
萧静山，号仁天，交河人	萧瑞山，号壬类，交河人
穆敬修，号寿昌，河间人	

“各村教堂及教民人数

城北周庄 西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三十七名
田家庄 华式堂一座 教民五十四名
七里冢 华式堂一座 教民四十五名
下淀 西式[堂]一座 教民三百十二名
南紫塔 西式堂一座 教民三百二十七名
柏家庄 半西式堂一座 教民九十七名
留路 西式堂一座 教民三百五十八名
皇亲庄 半西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二十六名
八里庄 半西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三十八名
马家庄 半西式堂一座 教民二百十五名
齐庄 西式堂一座 教民四百六十三名
大梅庄 半西式堂一座 教民七十五名
西韦庄 西式堂一座 教民五百七十四名
傅家庄 半西式堂一座 教民五十六名
梅家庄 华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五十名
孙台庄 西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三十名
东郭庄 堂二座 教民三百余名
大郭庄 堂一座 教民三十余名
大双坦 堂一座 教民二百五十余名
小双坦 堂一座 教民三百五十名
陵尚寺 堂一座 教民二百余名
尚尔庄 堂一座 教民二百七十三名
西乡大郭庄 大堂一座 教民七百名
西大过 大堂一座 教民六百五十名
东大过 大堂一座 教民六百名
鲁家庄 中堂一座 教民三百五十名

周家庄 小堂一座 教民二百名
 李家口 小堂一座 教民二百名
 于家庄 小堂一座 教民一百四十名
 河西齐家庄 小堂一座 教民一百三十名
 单桥 西式堂一座 教民二百名
 万村 华式堂一座 教民九十馀名
 河街 半西式堂一座 教民八十馀名
 小屯 华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名
 李家庄 华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五十名
 尹屯 华式堂一座 教民二百三十名
 孔杨庄 华式堂一座 教民五十四名
 野马 华式堂一座 教民九十四名
 抛庄 华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四十七名
 孝李村 西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五十名
 李家洼 西式堂一座 教民二百四十名
 百姓庄 半西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三名
 淮镇后庄 华[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五名
 徐村 华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五十二名
 东留村 西式堂一座 教民三百二十五名
 北官 华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七名
 孙尔庄 半西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五十八名
 梭庄 华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七十四名
 小万村 华式堂一座 教民二百六十五名
 寨子 华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二十七名
 倪村 华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四十七名
 张方 华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五十七名
 杨吕家庄 华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九名
 尹召 华式堂一座 教民二百七十六名
 双陵 半西式堂一座 教民一百五十七名”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的回忆》载：

“1925年秋，我们三位新圣的中国神甫刘、王、赵就归回了祖国。但因为那年是圣年，我们回国前，先到了罗马，住了十天，为朝拜圣堂，并为参观罗马。以后又到了法国名区露德，为朝拜露德圣母。在露德只住了三天。到8月末旬，我们才由法国南方马赛港乘船回国。

“与我们三人同船的，还有现今上海的主教张家树^①，他那时也是新圣的神甫。”

1926年 民国十五年

《中国基督教史纲》第十五章《道光以后天主教的复兴》载：

^① 张家树(1893—1988)，上海人。1923年升神甫。1957年当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1960年当选为上海教区主教。1980年当选为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团长。

外国来华的女修会表^①

年份	会名	工作地点
1842	仁爱会	
1867	拯亡会	
1922	包勒杜玛利若瑟会	热河
1924	加拿大宝血会	河北献县
1926	加罗萨圣母会	献县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载：

“十四 二十世纪的中国天主教

“……一九二六年……匈牙利加罗萨圣母会(Sisters of Our Lady Kalo(k)[s]a)教学修女们到了河北献县。”

《献县天主教志》第六章《教会的沿革(五)》第二节《外国修女会》载：

“1926年9月28日10名匈牙利加罗萨圣母会(又称主顾圣母会)修女应刘钦明主教之邀来献县教区,在大名天主堂设立会院。1936年改属大名教区。”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一章《遣使会的北省》载：

“十七、遣使会成立新省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九日,遣使会总会长万尔典 Verdier 设立了荷兰省。……此后凡在永平代牧区传教者,就属荷兰省。”

“直至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武主教升主教银庆时,在永平教区,没有发生过重要的事件。

“此日,主教升了一位神父,是殉教者的儿子。武主教若将教区的初期与现在的业绩作一比较,正可感谢天主。

“一九〇一年,教友只有三千名;三位客籍传教士,主教包括在内,二位中国神父及一座学校。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中西神父共二十六位,大小修士共三十名,十馀位仁爱会修女,三十二位国籍玛利亚 Mariales 会修女,一座中学,学生一百名;一座女子宿舍,八十座男女小学,九座本堂,一万七千教友。”

“二十一、蠡县监牧区的成立

“……二年平安过去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六月廿四日,监牧区成立为代牧区,孙监牧被任为第一任代牧,领欧色朋名义主教衔。他是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廿八日在罗马由教宗庇护十一世亲手祝圣的六位中国主教中之一。虽然国籍遣使会神父在此区数目不多,然这代牧区仍托付遣使会管辖。”

第二十四章《遣使会北省的情形》载：

“二、宣化教区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五月十三日,罗马圣座立宣化为代牧区,任赵怀义神父为宗座代牧。

“赵怀义是北平教区神父,当时为宗座代表的秘书;他生于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十月四日,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进北堂的小修院,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二月二十四日升神父,在小修院任教四年,在宣化当副堂二年、信安本铎十年,后为西堂中学校长;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正月八日,刚恒毅主教任他为私人(私)[秘]书。

“赵主教以他的家世及职务而论,是北京教区的神父——他的胞弟赵怀信,亦为北京教区的神父,曾任北堂小修院的教员;赵主教的另一胞弟为杨家坪的苦修士;他的父亲于庚子年(一九〇〇)时殉教。

^① 不在河北的不录。

“赵主教精通中文，亦能说流利法文。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与另外五位中国主教在罗马受祝圣时，他如遣使会士胡若山一般，好几次有机会公开演讲，措辞适当，听者心悦。”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宣化教区的情形

教友	二七六四四
教区国籍神父	一九
大修士	二〇
小修士	四六
若瑟修女院	七
大堂	二一
小堂及公所	一七六

“杨家坪隐修院，亦在新教区中，有四十位神职界会士，五十位辅理修士。”

“这教区大都是老教友，为此曾为北京教区供给了许多神职界人员。”

第二十三章《教宗祝圣六位中国主教时，遣使会南省的情形》载：

“五、教宗庇护十一世任命六位中国主教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六月二十四日，教宗庇护十一世以诏书发表了最初的中国六位主教^①，在中国传教史上，这是意义深长的事迹。他们的芳名如下：

1. 赵怀义，北京教区神父，被任为梵伽名义主教及宣化的宗座代牧。
2. 孙德植，遣使会士，蠡县的宗座监牧，被任为爱思朋的名义主教，及蠡县的宗座代牧。
3. 成和德，方济各会士，蒲圻的宗座监牧，被任为高德纳的名义主教，及蒲圻的宗座代牧。
4. 陈国砥，方济各会士，被任为山西汾阳的宗座代牧。
5. 朱开敏，耶稣会士，被任为雷斯皮的名义主教，及江苏海门的宗座代牧。
6. 胡若山，遣使会士，被任为德陶西的名义主教，及浙江台州的宗座代牧。

“由此可见，有二位中国遣使会士升为主教。此外，赵主教为北京教区神父，是在北堂遣使会士管辖的修院中攻读的……”

“罗马圣座决定升中国主教时，在遣使会培植的神职界中，就找到三位，以后还不断地加增：

- 一九二八年程有猷，北京教区神父，宣化的宗座代牧。
- 一九三一年周济世，遣使会士，保定的宗座代牧。
- 一九三二年张弼德，北京教区神父，赵县的宗座代牧。
- 一九三六年张润波，宣化的宗座代牧。
- 一九三七年王增义，遣使会士，安国的宗座代牧。
- 一九三九年陈启明，遣使会士，正定的宗座代牧。
- 一九四七年王伯铎，宣化的宗座代牧。
- 一九四八年范学菴，教区神父，保定的宗座代牧。

“……以上教区神父或会士，皆由遣使会士管理的修道[院]中所培植的。”

10月28日天津益世报馆印赠《公教庆祝华籍主教特刊》辑^②：

“公教庆祝华籍主教启事

盖闻陶世淑人，全凭热心毅力；传教闻道，端藉清品高标。恭维我华六位大主教德履增休，神光耀彩，今年今日同膺吾主鸿恩，此际此时共邀教宗祝圣。作现在回澜拯溺之司牧，为将来功高德满之圣贤。是真我中华教民所应万口腾欢、普天咸庆者矣。肃此谨祝，敬贺。

^① 译者注：其实第一位中国主教是罗文藻，道明会士，一六八五年四月八日在广州受祝圣礼，直至一六九一年二月廿七日死时，他在重大困难中执行主教职权。他也是第一位中国神父，于一六五六年在马尼拉升神父。参阅《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55~67页。

^② 全文照录。

荣升

“公教全体教民叩”

《启事》栏载：

“公教特别启事

今日为我华六位大主教在罗马受圣之期。本报爰发公教特刊藉伸庆祝。各区主教、司铎所来庆祝函电以及教内惠稿美不胜收，惜本刊限于篇幅未能尽载。诸希鉴谅原。

本刊仓卒付印，不无谬误挂漏之处，乞阅者谅之是幸。

公教特刊部谨启”

《发刊词》栏载：

“发刊词

噫嘻！我国今日之时局，果何如耶？我国今日之政象，果何如耶？我国今日之社会，果何如耶？我国今日之教育，果何如耶？我国今日之民风，果何如耶？吾知才博学广，高掌远跖之士，一闻吾言，必喟然叹，而不能遽答；忧时念乱，悲天悯人之士，一闻吾言，必尽然悲，而不忍遽答；与世浮沉，同流合污之辈，一闻吾言，必哑然笑，而不屑遽答；管私务利，贪残卑鄙之辈，一闻吾言，必色作怒，而不愿遽答。然则我国今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果何如耶？时局为承平和乐之时局欤？政象为日臻上理之政象欤？社会为文明进化之社会欤？教育为美满良好之教育欤？民风为淳朴高尚之民风欤？曰：否，否。吾尝静观今日之时局矣，尝默察今日之政象矣，尝体验今日之社会矣，尝考求今日之教育矣，尝采问今日之民风矣。就其静观所得之结果、默察所得之结果、体验所得之结果、考求所得之结果、采问所得之结果，吾本诸吾之思想，本诸吾之良心，吾实不能为今日之时局讳，为今日之政象讳，为今日之社会讳，为今日之教育讳，为今日之民风讳，以无所可讳也，亦无用其讳也。试问一发千钧之时，尚能容吾讳耶？盲风怪雨之候，尚能容吾讳耶？不容吾讳，而吾强讳焉，吾非据焚薪以耐饮、坐漏舟以高歌者耶？准此以谈，则吾人对于今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诚不必讳矣。既不必讳，则吾请先言今日之时局。今日之时局，果何如耶？曰：螭螭喧沸，扰攘纷靡；蜗角蛮触，同室操戈。攫权夺利，残民以逞；烽火连天，血溢沟渠。锦绣河山，残缺破碎；庐舍村店，鞠为茂草。元气斫丧，国本动摇；水旱疫疠，萑苻不靖。外侮频来，惨案叠出；险象环生，千钧一发。请再言今日之政象。今日之政象，果何如耶？曰：变化无常，端倪莫测；此仆彼代，朝更夕改。排陷倾轧，暗潮屡生；护法护宪，意见各歧；南辕北辙，别有肺肠。万几丛胜，百端待理；政令不行，政客备员。请再言今日之社会。今日之社会，果何如耶？曰：昏暗齷齪，黑幕重重；尔诈我虞，钩心斗角。四维不张，小人道长；朋比狼狽，狗苟蝇营；附膻逐臭，如脂如韦；每下愈况。请再言今日之教育。今日之教育，果何如耶？曰：学究守旧，头脑颓顿；高头讲章，误尽子弟。迂执猥陋，庸俗胶滞；学术不讲，知识浅鄙。时髦翻新，数典忘祖；役志欧化，束书不观。掇拾糟粕，唾弃精华；矫枉过正，学无心得。请再言今日之民风。今日之民风，果何如耶？曰：纷华侈靡，相尚以丽；锦绣辉煌，纨绔成风。骄贫诈伪，荡检逾闲；道丧德敝，心术鬼域。廉耻溃防，邪说横溢；志夺神昏，失足泥淖。江河日下，莫知所届。嗟呼！我国今日之时局，乃若此耶？今日之政象，乃若此耶？今日之社会，乃若此耶？今日之教育，乃若此耶？吾不禁为之一痛，为之一叹，为之一恨，为之一悲，为之一哭矣。虽然，痛无益也，叹无益也，恨无益也，悲无益也，哭无益也。往者不可谏，来者或可追；见兔而顾犬，亡羊而补牢。于此时也，吾民应如何憬然觉悟，力谋刷新，力图振作，力挽颓波，力济艰危，思有以改造此时局，改组此政象，改进此社会，改良此教育，改变此民风，俾今日退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得一跃而为明日进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俾今年退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得一跃而为明年进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能如是，方不愧国民之所以为国民矣。吾国民其醒也未，吾国民其知也未，吾国民其信也未，吾国民其从也未？吾知吾国民有鉴于今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必共发其爱国之忧、本其救国之心曰：醒矣，知矣，信矣，从矣。吾民既已

醒矣,知矣,信矣,从矣,则当思所以能令今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进步之道矣。然则能令今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进步之道,果有何道乎?马、郑之汉学耶,程、朱之理学耶,达尔文之天演耶?曰:否,否,不然。马、郑之汉学,是困人于固者也;程、朱之理学,是导入于迷者也;达氏之天演,是趣人于怪者也;是皆邪说谬理,流毒遗害,而未始有极者也。是其对于今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也,直无一毫存在之价值,又焉能改进今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耶?然则能改进今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之道,究果安在?曰:在真道醇德焉耳,在有真道醇德之纯真宗教焉耳,在纯真宗教之我公教焉耳。此实能令今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进步之道也。阅者疑吾言乎?请言其理。夫道之所以能为真道、德之所以能为醇德者,必有其所以为真道、醇德之本源;而其本源,则必出于神,而不出于人,以出于人者必错谬,必诞妄,不能为真道醇德也。姑引数语以证之。老氏曰:绝(人)[仁]弃义,民复孝慈。庄氏曰: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吾人试平心论之,此非诞妄而何?宣尼出妻之训曰:一淫僻,二嫉妒,三无子,四窃盗,五恶疾,六多口舌,七不顺父母。夫嫉妒系女人之恒性,无子亦妇人所恒有,多口舌更为妇女之通病。果因是而即出妻,则妻之宜出者,不独孔氏三世为然矣,人伦尚堪问耶?吾人试平心论之,此非错谬而何?释氏轮回之说曰:羊死为人,人死为羊。死死生生,互相来啖。汝负我命,我还汝债。吾人试平心论之,此非诞妄而何?此外典册所载,古今流传,其诞妄错谬之语言更难仆数。准此以谈,真道醇德之本源,必出于纯真宗教明矣,必出于纯真宗教之我公教明矣。盖精粹完固者,我公教也;高尚纯正者,我公教也;历久长新者,我公教也;颠扑不破者,我公教也。此真道醇德之本源也。此有此真道醇德之本源之纯真宗教也。此能改进我国今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之道也。凡我国民,詎可不投袂而起,相率崇奉此纯真宗教之公教哉!真道醇德耶,纯真宗教耶?我公教中人,亦何幸而得此福音耶?非我公教中人,亦何不幸而不得此福音耶?虽然,我公教中人,既得此福音矣,吾为我公教中人庆;非我公教中人,既不得此福音矣,吾为非我公教中人悲。吾为我公教中人庆者,非值庆其得此福音也,且冀其能将此福音传诸他人也;吾为非我公教中人悲者,非值悲其不得此福音也,亦冀其一旦有以得此福音也。而今幸矣:圣教将广扬矣,亡羊将归棧矣,真道将遍布矣,四海将向化矣。溯自吾公教之入中国也,华籍司铎之得膺主教荣任者,惟罗文藻一人而已。而今则有六位矣,岂非可庆之事耶?岂非可喜之事耶?吾知六位华籍大主教,而今而后,必有以本其爱主救人之热心毅力踔厉发扬,将我圣教福音吹入我国四万万同胞之耳,俾我国四万万同胞,皆能自此引领倾心而入教焉,则我国今日之时局、之政象、之社会、之教育、之民风之进步,可计日而待矣。是则本报同人今日发起公教特刊之微意也夫。”

《特载》栏载:

“教宗关心中国教务——教宗比约第十一致诸位代牧及监牧之一函(朱增璜译)

“《欧洲通信》云:‘教宗比约第十一对于中国教务颇为关心,日前对诸位代牧及监牧特发一函。’节译如下:

宗座对于远东传教事业,甚为注意,在数月前所颁布的通牒^①,表示宗座关心于传教事务,指示教士及教友对于传教的责任,并有极重要的方法。为宣传信德的光明,所最注意者就是远东的中国。这中国的土地很大,人民又多,都具有美好的天性,都是有德行的分子,不但愿使他们得很好的生活,更愿使他们前途有大希望。望传教士都要向他们宣传福音,使归正道,庶不流入邪途矣。最可喜者,我最可敬爱的神昆仲和神子,你们亲眼能看见这许多教友们,其中有许多教友,或是他们的祖先,能为基利斯督的光荣致命,能为耶稣的圣名受苦。时至今日,传教事业,逐渐发达,所可惜者,尚有许多的坏评论深入人之脑筋,尤以一般青年为最甚。他们对此不甚明白。他们的评论,以为公教的事业不是为宗教的,都是利用宗教为外国政治的。这种评论,不惟于圣教会名誉

^① 原随文注:参观《益世主日报》第十八期译文。

有损,且足以阻人归入正道,是很可惜的。夫公教大公无私,可为深信无疑者也。公教是世界万国人民所公信,不分国界,不分种族。须知基利斯督即是天主。他是创立圣教会的第一人(在这里面,没有希腊人同如德亚人的分别,没有野蛮人同斯锡德人的分别,没有奴隶同自由人的分别,但是大家归于基利斯督),所以要宣传福音给万国国民。基利斯督的教训说:‘你们到各处去宣传福音。’因此传教士不是政治上的人,但是被天主圣召,去做道德的事业。这就是圣教会的责任和本分。传教士是属于天主的,不是为人类的。传教的事业,就是基利斯督传给宗徒的事业,是宗教的,是超性的;圣教历史是可查的,圣教会的圣律同天主的命令是有凭的,公教是涵养人民道德的,他的益世事迹是明显的。但是圣教会主持公理正义,如有政府侵犯教务进行,或有不平的政治,得与政府首领或管理人交涉冤事。所以传教士只管理圣教会的事务,禁止顾理国事以及关于自己的事。简言之,传教士只为光荣天主、救赎灵魂而已。虽圣教会的目的是这样,间或有一二传教士不守正路,事在不可必免。我们应当设一补救方法,只有添设本国神职班,用本国人管理本国教务,切不可本国教士做外国传教士的副手。难道我们愿意阻止中国教士的爱国心去管理中国教务吗?虽人数不多,但有建设的必要。宗座素谋中国人管理中国教务为目的,或以言语,或以行事,久可证明。前次通牒业已详细说明矣。

惟无论何国教务,都是先由外国传教士起首,依照天主自己说的话,‘到世界万国,去宣传福音’。他们都是弃舍了家乡,为传播福音于他邦。请看罗马归入信德,是圣伯多禄、圣保禄首行传教的。圣伯多禄是助尼人,圣保禄是大尔斯人。再看的特和的母德两主教,虽然是外国人,还传公教的真理给克内斯旦人及爱弗斯人。还有巴特利斯,生在英国,任为荷兰宗徒。更有白列法斯是不列颠人,挽回德国归入基利斯督的大圣。这种习惯,自古至今,无论中外人都是如此。圣教会所以派遣传教士到远方,为帮助本地教务进行,并培植几位有圣召的青年,使升为本地教士。不然,基利斯督的圣名又焉能传播于远方?宗座素来关心传教,时常劝谕。前任教宗本笃第十五有Maximumillud^①的通牒,数月以前,我们又颁出Rerum Declesoc^②通牒。圣教会在中国,现在非常进步,又有很多的中國神父,同为宣传天国的福音。更有中国神父,同你们一样的管理圣教会。宗座甚愿许多传教事业归于中国神职班管理。这是要感谢天主的慈佑,我们所引为喜慰者也。外国教士同中国教士各有所长,外国教士曾受过前辈外国教士的传授,具有很好的成绩。至于中国教士,对于传教事业,都是劳心劳力。除了公教以外,没有比他最公最美的了。外国主教和教士同中国主教和教士合作,同在仁爱兄弟行列之内,共谋发展圣教会的进行,以及中国国家的强盛。我愿意你们宣言这些事情给你们所在的地方以及所管理的教士,最要感动教友们,使不为异端邪说所煽惑,保全圣教会名誉,且免去国民仇视教友的事情。你们要实行宣布,或是口传,或是笔写,总要使外教人民知道公教是公的,并且用你们的爱德感化他们,归入正教,救他们的灵魂,将来得享永生的福乐。圣教会禁止参与国家政治,外国教士永不许其干涉其本国政治事项,藉宗教以为政府利用,这是格外禁止的。按圣教历史推究,皆足证明公教决不干涉政治,国家完全独立,凡国内人民,均受同等权利,尽同等义务。所以政治有碍教务进行的地方,或是政府同教友发生不自由的事情,圣教会为公理正义,得保护教务及教友的信仰,有时或有几处。政府的官员对于保护圣教会是他们的责任。圣教会不能自己处理本国人民的损失,只有交给政府官员依法办理。老实说来,这样的事情就是政治的事,其实不然,这是法律的公例。若地方官不肯保护教士,以致发生生命财产的危险,当然可以请本国政府交涉。不过只求公平处理的免受危害而已。本宗座对于教士的生命,对于教堂的财产,亦有维持保护的责任;然须要小心,千万不能利用外国政府,借生事端。我们承认亦有外国政府往往托词保护侨民,利用时机发生政治事端的,甚为可惜。以上的劝告,望你们传教士一致遵行,庶几使我们可爱的大中国,对于圣教会种种误会猜疑完全消释,对于传教士仇

① 即《夫至大》通谕,1919年11月31日发布。

② 即《余即位伊始》通谕,1926年6月15日发布。

视的成见从此化除,岂不是大家所希望的么?

六月十五日发自罗马”

《函电》栏辑:

“驻华宗教代表刚主教一九二六年致中国各区主教书

余慕喜为罗马圣父转达寄与中国各司牧函于各司牧之前,届时幸请注意。缘圣父对于中华教务,极欲藉此指明传教行动至属统一,并拟证明传教事业完全与政党分道扬镳,各自独立云云。

职是之故,为免除中国人民之妄断或诬捏,即将该函公布,用释群疑。刻下正从事翻译,俟翻毕再当寄奉。至于吾辈言行,理应遵照教宗圣谕,以教会不干预国政,不协助或图谋外国利益之行为为宗旨。年来教宗明白晓谕,更促进圣教普及。观教宗由中国司铎中选升六位主教之事,当可了然矣。教宗之言曰:‘此举令余至为欣乐,即中外传教士亦莫不同此感想。盖外国传教士之所乐者,为获得其先觉与彼辈劳苦所得之美满结果也。至于中国传教士得行素愿,则他日光耀将从此焕发,当亦必甚乐矣。’

余祝中国各区主教司铎等,协力同情,以求圣教广扬及中国幸福之增加。尤可喜者,教宗诏中国新选主教迨赴罗马,躬行祝圣典礼,益显其对于中国主教之恩慈焉。窃思教宗必将用圣伯多禄之言以祝彼等。圣伯多禄之言曰:‘也要如同活石,建立在他上头,成一座神殿;又作圣洁的司祭,藉着耶稣基督,献于天主所歆享的一宗神祭。’^①前教宗派教士东来中国,而今则中国传教士赴罗马谒教宗矣。前辈主教受罗马教宗之使命来华传教之盛举,令人惊欷无似。回忆宗徒之言曰:‘从前向你们传天主的圣言、作你们首领的人,你们要记念他们,观看他们行事为人的结局,该效法他们的信德。’此诚足纪念矣,吾敬爱之众神昆乎?际此惊惶扰乱之时,以上消息,实为良好之安慰。余顺贺诸君传教工作的进步。再者,众神昆得便,请嘱各司铎各教友祝其行将赴罗马新选之主教,求主使其成为中华民族之宗徒,承行耶稣之遗嘱,永传圣教于中华,为中华之荣光。

阳历八月七日”

“贺刚大主教电

宗座代表刚总主教钧鉴:

我主教泣华三载,备尝艰辛。承行宗座意旨,特简华籍司铎荣膺主教之职,巩固中华教会。如此创举,功振宇宙,均系我大主教之鼎力也。中华人民无任感激。特此奉电,藉表谢忱。

庆云县全体司铎教友及绅商学各界”

“贺六位新主教电

赵、孙、成、朱、胡、陈主教钧鉴:

敬悉教宗电谕,公等荣升主教,且赴罗马由教宗亲行祝圣,诚空前罕有之盛举也。大哉教会之荣,幸哉中华之福!敝铎等闻电之余,欣感奚似?谨掬至诚,特此电贺。”

“长辛店信友请刚主教转呈教宗函

宗座驻华代表刚主教大人钧鉴:

我国已蒙教宗简任本国主教六位,并经谕令主教携同六位新简主教趋赴罗马,由教宗亲行祝圣,实我华莫大之光荣,足征教宗爱护中华之至意,更系我主教数年以来运筹帷幄之结晶也。信友等邀听之余,无不颀首相庆。兹为仰报圣父之鸿恩,表示吾侪之欢感,并留纪念于瓦榱刚^②(官)[官],特制景泰兰炉一座,敬呈钧鉴,伏乞转呈圣父座前,藉祝圣躬康泰,德化日隆,行见中华教务蒸蒸日上,圣教广扬可期而祷也。谨此叩求降福,并请德安。不一。

京西长辛店信友叩”

“蠡县孙主教函

① 原随文注:两“神”字对有形迹音。

② 即梵蒂冈。

自遵德范，弥切驰思，依慕之忱，眷恋不已。顷得喜报，欣聆佳音。敬谥位邀宗徒之尊，职承主教之选；司牧宣府，播种武州。瑞现幽燕，华国肇破天之际；光满寰宇，汉族启动地之欢。圣多默之丰功，于斯继续；罗文藻之遗志，自此恢宏。异党恶徒，尽回头倾心教化；大羊小羔，齐俯首诚意归依。龙骧著望，雀跃欢腾。鄙才寡能鲜，忝居教职；识浅智陋，无补涓埃。抚膺兴嗟，扣心增感。况值稿少良农之秋，坐视谷粟委地；栈乏善牧之日，每见豺狼凶残。得公出而整顿之，定能天国临格，跻众生于乐土；冥狱封闭，投邪魔于深渊也。惓惓之忧，驰书为贺。肃颂

荣禧 敬候

勋安

鄙牧孙德祜启”

“长辛店信友与赵主教之来往函

主教大人赐鉴：

敬肃者。窃仆等夙钦我主教幼重伦彝，孝友笃于天性；长隆道德，神修根自诚规。前荷上峰之倚重充任宗座代表刚大主教秘书以来，厥职克尽；今又奉罗玛教宗谕旨升任宣化府主教，克日赴罗马由圣父亲行祝圣。仆等逸听之余，神形为之鼓舞，从此我中华教务之治理与夫祝圣神职之实权无须仰重他人，教务发展，行见实效。且仆等与我主教或属戚友，或属桑梓，敬闻佳音，咸深忭庆。谨具嘎吧一袭、宝石圣权一座，藉表仆等热烈之忧，伏祈哂纳。再，仆等因公羁绊，弗克躬亲上呈，谨举代表恭诣座前代达敬意，敢邀我主教赐予慈爱之降福也。肃此。虔颂

德安 惟祈

爱照 不备。

京汉路长辛店信友仝贺”

“赵主教复函

诸位乡谊钧鉴：

敬复者。迩来教宗提倡中国教务，有加无已。始则遣派宗座代表，驻节中华，以资办事便利；继而升任国产司牧，分区布教，而示圣教至公。惟鄙人附铎曹之末，德薄能鲜，既有忝于宗座代表秘书之职，复蒙圣父错爱，委以宣化教务。午夜自思，不胜惶悚。只以听命圣愿，摆脱无由，辱蒙藻饰，并承厚赐。具征盛意殷拳，却恐不恭，受实有愧。兹先命笔称谢，更于祭祷之中祈主赐以遐福，藉报诸君之隆情而伸鄙人之谢悃也。此复。

即祝

神行康泰 伏维

爱照 不宣。

末牧赵怀义敬复”

“庆云杨神父函

本主教赐鉴：

今阅天津《益世报》，悉知教宗电诏我主教至罗马亲自祝圣。美哉，教宗之盛意！善哉，教宗爱我中华之心！仆捧读此电，喜不自胜，并愿敬具微仪，以表谢忱。特此奉上。并候荣安。

杨叩 八月三日”

“正定府文主教片

直隶正定府主教文致和恭贺赵主教荣升之喜，并祝新教区诸事顺遂，圣教广扬。

“太原风主教片

山西太原府主教风朝瑞恭贺赵主教荣升之喜，并祝万岁。

“天津刘神父函

主教钧鉴：

顷诵明令，敬悉荣膺宣郡正式监牧之职。崇文硕望，有德必得荣位；胸罗万有，为教尤庆得人。

举国同庆，四海胪欢。仆尤不胜庆忱之至。……专肃数行，聊伸贺忱。敬颂德安，恭贺主教新升之禧

刘文贵叩 五月十六日

“庆云县众位神父函

赵大主教钧鉴：

本月十七号奉上一函，谅已赐阅。顷读北京《益世报》，敬悉阁下荣升宣化主教，仆等得此好音，雀跃莫名，并各饮酒三杯，欢呼中国圣教万岁、宣化府教区万岁，恭贺赵大主教万岁，以志庆祝。专此敬贺，恭颂荣禧。

仆等 常家天主堂杨若瑟、王若翰，纪汪桥天主堂李类思、李若瑟，大勾家天主堂张若瑟，何家天主堂李安当，庆云城天主堂王若亚，任家庄天主堂徐伯多禄 仝贺

“蓟县石神父函

顷读北堂公布，藉悉我神父现奉罗马简命升为口北主教，五中欢忭，尺素难宣。行见口北十县教化大兴指日可待，仔肩难重；然以神父之才之德承之，自必悠悠。仆本当匍匐都门，掏诚叩贺，只以道远见阻，有愿莫遂。谨为恭献大祭三台，代答天主鸿恩，更祝主宥，用表区区下忱，藉伸爱戴。此心倘蒙洞鉴，则草莽之人无任快慰也。肃此。恭泐寸稟，敬叩鸿禧。不宣。诸希爱照

罪仆 石静山 叩上 五月十七日

“山西成神父信片

昨阅《益世京报》五月十四号三张，快读我兄荣膺教宗电令简命特任本府（代牧）主教云云，喜贺不禁，不知所云。久钦我兄才德堪当大任，今果然矣。此为我华圣教前途，特贺并祝大展鸿施，以扬我华圣教之光。谨写一片，虽云不恭，聊表忱悃。何日受祝圣之礼，敢请命笔预报，可乎？敬叩荣任大喜，并求降福。

成捷三 五月二十四日

“金华郑神父函

赵神父尊鉴：

久仰道范，无缘识荆，怅甚。近悉神父荣升宣化主教，凡热心吾华教务者闻此喜信，莫不为中华教务前途贺。恭维神父才高德隆，他日戴高帽执杖权，对于一切定能措置裕如，况宣化为神父传教之故地，轻车熟路，将来教务之蓬兴何可限量，曷胜祝祷之至？弟才疏学浅，忝居铎末，要亦二百万同胞教友之一份子，幸逢二百餘年来未有之盛典，不可一无表示。用特不揣冒昧，聊具俚言，以表贺意。至神父晋牧之庆日，弟又当囑属下教友格外加祷。敝省宁波教区台州府前月刚总主教因便亦曾驾往该处。……近年罗马教宗对于吾华圣教异常注意，凡吾司铎暨诸教友宜如何奋勉，以副教皇远顾之盛意。特此读闻，尚希原宥。如蒙不弃，惠而教我，幸甚此颂升安。

弟 郑若翰 谨上 七月八日

“罗马大学修院中国修士函

主教大人惠鉴：

日昨传信部办事员某司铎以刚使秘书升任第一位华籍主教见告，好音天降，生等感谢主恩，弹冠相庆者久之。数十年来，仁人志士之认真提倡，热烈鼓吹，今果实现。开中华教史之新局面，振本国铎界之新精神，其意义与价值诚非等闲也。加以我公之干练精审，任职总署，既卓著勋劳，今后柄权执杖，领袖群伦，定将大展鸿猷，斩荆棘，披草莱，不惟致宣化区于兴盛，行见全华神秩利赖无穷矣。生等虽多未识荆，然令闻广誉，固时击耳鼓。当此千载一时之机、全国有光之举，难安缄默。爰特快邮代电，泐数行上贺，祈宣化区之前途顺利与我公之福、寿而康。如蒙赐以主教降福，且不以为不可教而辱教之，则更感激欢迎之至。专肃。敬请德安。

罗马传信部大学中华学全体鞠躬 五月三十一日

“奉天众位神父函

赵主教钧鉴：

末铎等前几日奉命齐集奉天总堂避静，当据柏司铎声称大人钦蒙教皇简任宣化府主教，遂听之余，曷胜雀跃！刚主教之识人可钦，中国教会之黑暗可除，教皇关念中国教务之前途将抱乐观。久仰主教才德冠首，学问渊博，矧通外国文语，对于传教一节成竹在胸，所辖境区，将来教务定能兴盛，不惟教会之福音，亦我中国司铎莫大之荣幸也。惜无缘一见，藉聆教诲。客岁闻刚大主教驾临敝处，料主教职充秘书，定能同临，乃竟大失所望，纵有千言万语，伊谁伸述？今虽有火车可通，宛若咫尺之近，其奈教规束身，不克躬亲往贺何？言念及此，曷胜悲感！惟于弥撒之际，尽竭绵薄，为主教代求，俾使教会广扬，普济群灵。铎等无物贡献，拟购迷特辣一顶，每人献奉大洋拾二元购买；大洋汇票附函呈上。因不谙尺码，乞主教自行购订。芹曝之献，聊表微衷，今特修函致贺，敬请勋安。伏乞降福。

奉天全省众华铎拜启 六月四日

“天津进修乐群会电

北京西城宣府大街驻华宗(坐)[座]代表公署赵主教钧鉴：

顷闻荣膺宣化大司牧之任，不胜欢忭之至。登电贺闻。

天津老西开全体会员恭贺

“天津杨绍卿先生函

主教大人钧鉴：

日前在京辱承训诲，并蒙大主教竭诚鼓励，罪人等当如何铭感勉效驰驱，以报鸿恩于万一也。兹有恩者：前次议决各案，请即飭筹备处择要从速记下，藉便发表。又庆祝特刊，罪人拟于十月二十四日罗马举行祝圣典礼日发行，愿乞我主教于起程前将各处所来贺电及六位主教并大主教玉照暨略历，一同惠下，以资表扬为禱。肃此读恩。敬请金安。

罪人 杨路加 谨禀

“宣化府若瑟院函

神父大人钧鉴：

敬禀者：近闻神父荣升宣化主教，不胜欣喜之至。肃此敬贺。恭颂荣禧。

会女玛利亚谨贺

“宣化众位会长函

主教大人座前：

久慕盛名，时钦道范。早切瞻云之望，同伸仰日之忧。倏闻荣升主教，不日来宣，此固我宣众信友所雀跃而欣慰者也。从此得近容颜，依恃之情弥切；亲承规诫，信望之念愈殷。既增我宣之光荣，益造同人之幸福。谨修寸楮，藉表欢迎。更有恩者：主教荣圣典礼，但愿来宣举行。一切施設，尽力担负；用输热切之情，以表诚恳之敬。伏乞恩准。并请勋安。谨呈

驻宣赵大主教

宣化会长众教友同鞠躬

《论说》栏辑：

“对于中国六位大主教之鱼言(傑氏)

我全国公教教民所企望、所祝禱、所仰盼之中国主教，今实现矣。夫以本国之人管理本国教务，则其对于教务之设施、之进行，自必左宜右有明也。惜吾中华本国司铎之得膺主教位者，自罗文藻而后，几同祥麟威凤，不再覩焉。兴言及此，良可慨叹，又孰知今年今日竟有中国六位大主教同在罗马受圣乎？吾中国公教前途之大放光明，一日千里，盖基于此矣！吾教民安可不额手称庆？吾教民安可不距跃三百？虽然，吾教民之对于六位大主教也，亦庆矣，亦贺矣；顾只庆庆而已，贺贺

而已，庆贺而外，无一毫之他种表示焉，则仍不足以尽我教民对于六位大主教之微忱也。坐是，故复有对于六位大主教之刍言。刍言惟何？曰：传教问题而已，传教之人才问题而已。良以有传教之人才，方足以取传教之效果。然则传教之人才，在今日固不可不注意矣。注意之道，约有二端：一曰选拔人才，二曰培养人才。请先言选拔人才。夫人才无多也，无少也。知人才而任用人才，则人才多；不知人才而不任用人才，则人才少。今之为上人者，每悍然谓人曰：无人才！无人才！果无人才耶？宣尼不云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泌水衡门、草茅坐诵之士，吾安知其必无哉？准此以谈，则为人上者之选拔人才也，首需降心以求，次须知人善任，则人才之兴也，必如挽水取火，无疑矣。请再言培养人才。管子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信乎人才之有待于培养也。今欲培养传教之人才乎？则请多设公教修院，多立公教学校，选高才瞻学之士充任教职，孜孜兀兀，实事求是，将见弦诵洋洋，人才蔚起矣。若如曾涤生所云，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冶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则非吾侪之所（敬）[敢]知矣。惟思我华六大主教，品端学粹，识迈群伦，对于以上问题，岂待吾侪喋喋？虽然，愚者千虑，容有一得；狂瞽之言，圣人择焉。斯则吾侪妄进刍尧之意云尔。”

“今后之中国公教观（溧县项来慧）

近世国家主义蓬勃异常，我国以积弱之邦，处于列强之间，鹰瞵虎视，蚕食鲸吞，屡受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欲求土地主权之不日见丧亡且不可得，更望已失者之恢复乎？乃今者于政府曾未计及、人民不动声色之中，居然得到一部分中国人管理中国教务之权，一月之间，有三位主教得膺荣任。虽诸先觉年来对于此一问题，敝精疲神，大声急呼，不无微劳，而公教能泯除国际观念，一本大同之主义而进行，固大可表白于国人也。夫我公教自教主耶稣死于十字架后，十二位宗徒乃本其爱主救人之热火，犯艰冒险之毅力，牺牲一切，努力宣传，历经磨难，颠扑不灭，发皇光大，以至于今。近年以来，士夫崇尚物质，浅识者流迷信科学万能，公然提倡无神之说，在彼等都以公教行至今日，万无存在之价值矣；而孰知一读近年之教务一览表，辄令人惊叹不置，盖非特无丝毫之退步，且呈蒸蒸日上之现象焉，此种情势，虽曰人力，岂非上主之默佑潜扶有以使之然乎？溯自公教之正式传入吾国，垂三百馀年矣。其间史事，散见于教内教外各书报，姑勿赘述；而环顾四万万同胞之信仰皈依者，竟属寥寥如晨星。彼欧洲以三百年对公教加以屠戮剿除，而圣教愈见广扬；华夏以三百年之宾礼教士、重视教民，而死影不灭，真道未光，此其故果何哉？无他，上至大人先生，下至贩夫走卒，大多数视公教为外国教耳。今则管理教务之权逐渐入于华人之手矣，‘外国教’三字固已不成问题；从今以后，或能异峰独起，一日千丈，以福音之光帚扫除暗冥乎？抑犹有进者：有权利即当尽义务，职位愈高，责任愈重；未有不尽义务，而能保持其权利，与不负责任而能保持其职位者。鄙人系公教一份子，对于新晋升之赵、孙、成三位主教，早已私心庆祝，喜极欲狂。适《益世报》有《公教特刊》征文之举，谨就感想所及，拉杂述《今后之中国公教观》一篇，深望公教神长及教内外各界，不弃刍蕘野语，加以注意，公教幸甚！中国幸甚！

一、神长 神长为公教中坚人物，乃谢绝尘寰，抱牺牲主义，终身服务于教会者也，其职权及地位，原无俟吾侪喋喋。虽然，圣保禄不云乎：就合一总之人，以拯救一总之人。关于信德之端，固当冒万死而不渝；而人情俗礼，凡与圣道不抵牾，且极合神贫（指俭朴与谦恭）之德者，自可谦谦然卑以自牧，不必盛修边幅，岸岸自高，致貽伊讥也。至于振兴教育，举办公益，种种慈善事业，皆当尽力提倡，劳心焦思，旰食宵衣，此我对于诸可敬神长不禁馨香祝祷，希望其专心致志，努力于荣主救人之事业，而为至圣纯洁之牺牲于上主之前，以期圣教广扬之微意也。

一、公教友 公教友为天国子民，其各人所操之职业，与所处之境地，迥乎不同，自不能拘于一隅之见，进以详慎密切之忠告。夫我公教之于世也，地无分中外，人无论文野，往往见仇触忌，诚以道大难容，曲高和寡，由来旧矣。然而尤人不如尤己。我公教友既为基督之徒，其立身行道，果皆与圣经相符而不相刺谬或背道以驰乎？且公教非一党派、一种族也，乃人人随时可以信奉之公教也。彼反对仇视者，朝为仇教最激烈之撒乌鲁（保禄宗徒之原名），诘不能使暮为宣传最力之圣

保禄乎？然我之所以感化彼外教者，非可以势迫利诱也；必须于公德、私德之间，丕显我公教之精神，一以爱德为旨归，则潜移默化，有不倾心悦服者欤？此我对于吾亲爱之公教友，所以日夜深盼切望者也。

一、国民 国民有信仰之自由，不能拘于任何宗教也。维以年来外势日逼，国事日促，同胞爱国救国之运动发生，如五四也，六一也，何莫非爱国救国之表示？而所得之结果，则除废学失业，腾笑列邦之外，几等于零。以我公教团体之不肯轻举妄动也，辄以异己而抵排之，庸詎知我教之苦心孤诣、深谋远虑，正枕戈以待旦乎？今者公教既已见谅于同胞矣，则各界应本其爱国救国之主义，对于中国主教、中国教区，加以经济上、舆论上之赞助，一如彼西人然，则庶几乎免外人之藉口讥谤，嗤华人为识短见浅，毫无远志也。至于政府，则更当格外注意及之，无俟鄙人多赘矣。”

“圣教广扬(张同道)

美哉吾公教也。圣事之奇，无妙不有；道理之深，无微不至。愈迫愈深，愈究愈奇。进一步而复一步，进一层而复一层。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前圣复出，亦不能淹贯洞悉，况小子之胸无点墨者乎？虽然，窃有所愿：愿我教友坚结团体，力斥邪妄，速筹圣教广扬之策，令普天之下、四海之内皆得以舍妄即真，同跻光明之路，日后群归耶稣圣栈。复愿本国人民各有本国主教管理教务。今教宗比约十一致世界公教主教之通牒有言曰：‘余今将余之意详示汝等，最先需要者，即应使各国人民管理其本国教务一事是也。’由此以观，则中国教民有待于中国主教也明矣。余今望吾教友恪遵教宗之圣谕，咸尽己力，以助传教事业之经济；苟有难事，开会公决；若遇需要，同心祈祷；多创本地之修会修院，以培植本地之神级班；广设教中学校，启发教友之智识，涵养其德性。人人皆有此心，人人即可以广扬圣教。盖三户之民可以亡秦，五千甲盾可以沼吴，岂有公教之伟，信友之众，不能使圣教广扬者乎？试观当日十二宗徒宣扬耶稣新教时，论教势之大、信友之众，未及今日万分之一；而古教之人恃其财足兵勇，刀戟皆利，极力抵制新教。乃十二宗徒，一无强兵，二无财产，徒以宣扬真道，万众一心，起而与古教抗。皇皇栖栖、拮据万难之中，筹御古教之策，每以宣扬之故，牺牲其身。后新教终得扩张，古教终归废除淘汰。此其明证也。假使公教无十二宗徒，新教何以兴？古教何所废？十二宗徒者，诚圣教之栋梁矣。设教友皆有此心，何患乎信之不广、教之不扬耶？且宗座对于传教之热忱，尤非他教士可以比伦；一闻某处有无数之人处于黑暗之地，辄慷慨解囊，踊跃输将，急遣教士，拯民于水火之中；近乃于一月之间，竟有孙、成、赵三主教得膺荣任矣。此种旷典，古今所未有也。乃回顾我中华，教务式微，当兴之事业不兴，当取之步骤未取；际此风雨飘摇，四面楚歌之时，挽狂澜、支大厦之法，莫善于有难相助，有事相持，有过相规，有善相劝，各尽兄弟手足之谊，同心并力，经营教务，使中华教务宛如一身，而以中国主教为首领、吾辈教友为肢体，共谋全身康强之任务。首领尽其责，肢体守其分，则中华教务有不一日千里者乎？”

“圣教广扬(张允中)

圣教者，独一无二之教也；但迷失者多，知津者少，虽遇于目前，行至脚下，多有冒昧而不顾。何也？皆因有所感于心而迷于途，不识真道之为真道也。我中国宗教至为庞杂，就人数多所尊仰者，亦不过儒、释、道三教而已。然释教、道教，自古即为明哲之士所诋斥；即儒教亦非绝对宗教性质，所言者惟人道而已，究未若吾主圣教之精微也。然迷信者多以伪为真，以虚为实；虽圣教之美如玉、明如珠，人多交臂失之，又焉足以望其广扬乎？原我圣教，自汉时即已传入中土，历代皆有；但随兴随止，障碍殊多，良可叹也。溯自各国司铎入中国传教者，不知几被摧残，几被诛戮，然杀者愈多，而传教之心愈勇，前仆后继，有加无已；待至来者渐多，信徒渐众，虽未有若何之危险，然犹未至圣教广扬之程度也。今幸有学问渊博、励精求治之刚总主教，奉教宗之命，来主中国教务；又有众主教施行圣事，作难民之救星，为渡津之宝筏，致令东亚半壁皆如久旱逢甘霖、幽谷遇光星，风动草偃，过化存神，东西南北皆愿离暗投明，士农工商无不弃邪归正，真可为万世不没之大功也。虽有儒、释、道与卑鄙不堪之邪教，岂无泰山邱垤、河海行潦之别？假使各国当局世味少淡，尊

重圣教，倡导和平，必能拨乱反治，革秽为清。五大民族皆能守诚行善，四亿同胞无不尊教立功，天下全无邪僻之事，村中遍有文明之风，是真圣教广扬矣。吾辈当默心以祝。”

“圣教广扬(常纪振)

圣教者，乃大公至正之道，吾人所须臾不可离者也。盖圣教之宗旨，原为劝善规过，救人民于危难，导斯生于和平，其有益于世道人心也大矣。惟世人多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果，以致巍巍圣教，而未能使其光被四表，风行一世，良可慨也。夫世风日降，人心不古；丧弃天良，毁蔑人格，无忌之心达于极点；于是肆意妄为，邪僻横生，向善之心早已泯灭。不惟对于圣教不知归向，即个人之灵魂亦皆置之度外，终日沉于声色，惟权贵是求，只顾一时之虚荣，忘却无穷之真福，倒置轻重，莫此为甚，何异自植荆棘以障其光明之路乎？如是而言圣教广扬，其不戛戛乎难哉？由此观之，圣教之发达与否，亦全视奉行者之力不力耳。倘使全国教友万众一心，不为非礼之事，常作向善之心，或谦忍以持已，或慷慨以济人，不念旧恶，感人以诚，吾知虽邪僻之士，亦必翻然归正。如是而曰圣教不能发达而至于广扬者，其谁信之？况圣教之传入吾国，屈指已数千年于兹矣，大率皆由西国教士传授，而吾国教士则寥若星辰。至于华籍主教，则更未前闻也。今幸蒙教宗代表刚总主教在华以来励精图治；复于本年五月初旬奉教宗钦命简升三位华籍主教。开空前之先例，建圣教之基础，皆刚总主教之力也。此即圣教广扬之先兆欤？吾人当虔心以祝。”

“圣教广扬(常纪斌)

夫圣教传入于中国也久矣。溯自汉唐以来，已将福音达于中土；沿至今日，殆有千年。夫历时不为不久，而竟不能光被四表、风行一世者，何哉？得毋圣教之旨过于深奥，为一般人所不能领悟欤？抑为吾人多为私欲所掩，而不知改邪归正欤？嘻！吾知之矣。夫中国传教士多来自欧洲，言语不同，性质各异，其不易使人听从也，其理甚明。如是而欲期圣教之广扬，不亦难乎？今刚总主教已奉到教宗钦命，简圣赵、成、孙三位华籍主教，俾其管理中国教务，其意洵属至善，盖非此不足以使圣教蒸蒸日上也。其广扬之日期，当不远矣。吾人宜虔心默祝之。”

《演说》栏辑：

“圣教广扬(懦夫)

有客问懦夫道：“你们圣教会各处传教，劝人为善；设立学校，教育儿童；建设养病院，施医疗治病人；遇有水、火、兵灾，又组织救济会救护难民。历经仇教的蹂躏摧残，不但不见衰落，反形踊跃。这是甚么原故呢？”懦夫答道：圣教会譬如一株树木，蒙天主的保护，好像雨露滋润，用为义致命圣人的血浇灌；那精修圣人的道德，又好像和暖的春风；修士、信友的祈祷，好象培养的材料。所以树干劲直，枝叶茂盛，开的花是清洁鲜美的，结的果是馨香甘甜的；所以圣教会每遭风波，必然发达广扬。这是定而不移的道理。请看庚子年吧：拳匪仇教，是何等的严酷？教士教友，不分本国人外国人男女老少，见着就杀，遇着就砍；教中的建筑，不论圣堂、住房，一概烧毁。经那样的蹂躏摧残，受那样的深痛巨创，以常情推测，必是一蹶不起，不能再振兴的了。岂知不然。如今奉教的比庚子年以前增加三倍以上，传教士主教、司铎更是倍增的啦！到处圣堂耸立，十字架高竖堂巅，一望便知是圣教广扬的景像。今又蒙教皇派总主教来华，常驻北京，训令本国人治理本国教务，在我国北方简拔赵、成、孙三位升授主教荣职。从此传教没有隔阂，圣教广扬，蒸蒸日上，可企足而待了。再说圣教根基巩固，已得广扬之实。举出数端，可为佐证：

一 十字架 这是钉死耶稣的刑具，杀人的凶器，就像刽子手的刀一样。耶稣为救普世古今的人民，流尽圣血，作赎世的牺牲，奉教人为爱耶稣，尊敬十字架是当然的。未进教的，做慈善事业用的旗帜都是十字，赴战地救护伤人有红十字会，天津八善堂救济难民灾民用的旗帜也是十字，老公所施材社用的旗帜也是十字，抬埋死的贫民旗帜用的也是十字。原来天主是仁慈万善的总根源。所以抱着救世的慈善家都愿效法耶稣，归功于天主。这就是圣教广扬的一个佐证。

一 纪年与年节 天主降生的日子是在冬至后三天，再过八天立耶稣圣名，是圣教会的年节。耶稣论人性是如德国无权无势的一个贫民，不想耶稣死后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世界各国不以

本国皇帝在位之日为纪年，而以耶稣的生年为纪年，又以立耶稣圣名的日子为年节，连我们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也用这日为年节，情愿归向天主。这又是圣教广扬的一个佐证。

一 守主日 古经《创世纪》上说：天主起初六天的工夫，从无中造了天地万物；第七天止了工，天主圣了这一天名叫主日。教中人过主日恭敬天主，都不做活。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以及人民各机关每到主日也全放假休息，但是他们闲暇无事，嬉戏游玩，不免生出犯罪的机会来，不但无益，反生弊害。所以若欲改善，莫若进教，可能得着罢工守主日的真利益。所以盼望星期日放假的诸君，好好研究圣教会的道理。进一步说，这又是圣教广扬的一个佐证。

在下是一乡下无知无识的愚民，说的对不对的，请诸君原谅。善说不如善听。吾虽说的不到，君系善听的人，因吾所说的，能悟到未说的。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我们都应当效法耶稣的良善而心谦。圣教广扬，定可指日而待了。懦夫祝祷而企望之。”

《颂文》栏辑：

“贺赵、孙、成三位主教(冠生)

盖闻澄氛济世，端赖圣贤；理乱拨烦，须劳俊哲。而经纶圣教，牧圉羊羔^①，则尤须有器大神宏、聪明睿智之杰矣。维赵、孙、成三位主教者，志纯才高，品端行洁；良玉精金性格，光风霁月襟怀。断绝尘情，挥慧剑破烦恼；蔑弃世福，以敞展视荣华。德迈人群，嘉誉久播乎各界；学超物表，清名夙重于铎林。鹤起腾声，龙骧著望；山岳共仰，斗极同瞻。近者喜报传来，佳音布遍。欣聆我三位中华主教，职邀司牧之选，位极宗徒之尊。数百年中，中国又膺盛典^②；二十世纪，亚洲大放异光。华胄承荣，赤县肇破天之际；禹域耀彩，黄族起动地之欢。百尺高竿，更进一步；十字圣架，又照九州。行见我三位主教，撑诺鸞船^③，拯济众生之溺；挥梅蕊^④杖，指点世路之迷。为地上盐，醃兹淡世；擎斗底烛，照彼暗隙。烈火投抛，炽热冰凉冷血；活水倾注，涤净垢污秽心。驱恶以鞭，起病用药。奋神镰刈禾谷，簸义箕以除秕糠。施天国粮，撒渔人网。播美种，遍布大地；取佳果，齐虔天仓。挽败子之回头，致亡羊于归栈。谈经说道，顽石闻而点头；悬镜燃犀，邪党见而低首。摧锋陷阵，以仁义为甲兵；斩将搴旗，用道德作干櫓。明官大启，冥府永封^⑤。默化潜移，行看聋聩瞥见；激扬淬砺，亦使懦立顽廉。景星荧煌，卿云灿烂。世臻上治，人醉醇风。此则吾四万万同胞之所宜馨香祝祷者矣。”

“贺中国主教(赵寿仁)

圣教会之传布中国，缓于西欧。溯厥由来，自汉至明传教士之来华者络绎不绝，若圣多默宗徒，若大圣方济各，若利玛窦，不胜指数。默念斯事，如天主植株于中华，后虽数经斫伐荒旱，荣茂如故。至于清代，汤若望、南怀仁为朝野上下倡，吾圣教会之在中华，始如春风布暖，雨露频施，树木因之萌茁，竞相争妍，而盛倾一时矣。孰意至亡清末叶，岁值庚子，拳匪乱起，圣教会妄被摧残；此诚吾国圣教会历史上之大不幸者也。或谓圣教会之在中国受兹创痛，无复萌蘖之机缘矣；孰意圣教会之传布于世界也，反因蹉跌而愈臻于盛焉。譬如水之就下，愈障而愈溃，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孟子云：‘持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则义和拳之祸我圣教会，正所以益我圣教会也。谓予不信，请观庚子年后传教士之来华者愈众，而神职班之成立者愈繁，教友之受洗礼者亦愈广；无论通都大邑教堂林立，即偏僻乡村，教友亦咸知在天我等大父焉。近刚总主教莅京，天主之使命降福中华我圣教会之发达，并于匝月之中三主教同膺荣任，真我中华教友所应手舞足蹈，同申欢迎之忧者也。是岂非圣教经拳匪之祸而基础愈臻巩固乎？因作此文以伸庆祝

① 原随文注：羊喻铎德，羔喻教友。见《圣经》。

② 原随文注：距今二百餘年前华人罗文藻曾圣主教。

③ 原随文注：喻公教。

④ 原随文注：亦译摩西。

⑤ 原随文注：“明官”“冥府”指天堂、地狱。见《景教流行中国碑序》。

焉。”

《颂辞》栏辑：

“颂赵孙成三主教(艺)

胜事初闻乐不堪，纷然巷语杂街谈。此番共说天荒破，一月荣升主教三。

宗座由来识力高，精心选拔尽英髦。中华布道人才盛，鼎足而三可自豪。

最难接踵被殊荣，万姓腾欢笑有声。中国平添三主教，伫看圣教放光明。”

“庆祝主教之颂辞(悟愚)

维兹日月，历行于天。维兹雨露，利济桑田。大哉主教，德化无边。惠光所及，润泽无偏。利人利物，乃圣乃贤。凡兹万姓，允赖保全。胞与为怀，痼疾在抱。天赋聪明，屦年悟道。信道惟坚，悟道乃早。跻顶登巅，百折不倒。主乃垂怜，锡以至宝。非玉非金，非花非草。如金斯坚，如玉斯保。如草长生，如花常好。得于乐国，蕴于心间。以利中外，以化荆蛮。鞠育黎首，指导痼顽。今膺重任，惠我同班。广传圣道，以济时艰。”

“颂孙赵成三大主教并序文(明东)

夫我圣教之传于世也，有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吾主有言：‘福音遍传于世。’又曰：‘往训万民。’即此可见圣教之至公，不可以时地限矣。故圣神降临之日，即有巴尔底、麦多、厄拉米达等多数民族之聆福音。其后宗徒弟子等分散天下，凡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竭力布化，甚至牺牲一切，舍身致命，亦所不辞焉；以故人民观感兴起，相率归吾圣教。一世纪末，罗马版图境内境外，业已传遍。自是门弟培增，圣贤继起，圣教广传更有蒸蒸日上、无远弗届之势。是以多默宗徒之东来虽无确据，而赤乌之时已遗有圣教之踪迹焉。唐元之时圣教重入中国，其迹更显，其据更确。然不旋踵而即中绝，至有明始克继续其统。今者教宗庇护第十一位，仰体吾主教世之意，俯察我国圣教进行之情，思有以扶助之而救其积弊也。遂于颁 Rerum Novarum 之谕后，即本其意，特简我赵、成、孙三公授以主教职衔，成空前之盛举也。

美哉三公，德化日隆。中华信众，得有所宗。主降遐福，万岁无穷。”

“闻中国新圣三位主教感书俚歌五章(秦国辅撰)

邦人久矣未归真，正教传来溯有因。多默宗徒开圣道，从斯渐见出迷津。

迁地为良忘弗良，楚材晋用久堪伤，何年得足获人愿^①，予播予收乐天乡。

春回大地一声雷，黄帝子孙也快哉！何幸三公同简命，伫看教务自今开。

灵犀一点灼同班，进颂俗情未可删。弄笔聊抄天保句，福如日月寿如山。

扞衣趋贺付空谭，迭韵述词初未谙。剩有心香诚一点，引歌遥祝北而南^②。”

“颂主教文：(张允公)

巍巍上天，荡荡莫名。旋乾转坤，赖有主成。我华主教，曰孙、赵、成。励精求治，锐意进行。降福普遍世界，宝镜大发光明。救失所于安宅，如醉初醒；指迷途以正路，去浊就清。从此弦歌声闻，普天下仰七星北斗；更庆振聋发聩，圣教中得万里长城。”

《教史》栏辑：

“中国教务史略(傑民)

(一)圣教入中国考

昔司马子长撰《史记》首轩辕氏，良以盘古、天皇、地皇、人皇之说荒渺无稽，故付之阙如耳。此实子长识见过人之处，司马贞不察，乃为之补《三皇本纪》，失其实矣。自子长而后，为史者渐不如古，非凭臆逞谈，即妄为穿凿，而事之失其真者遂更仆难数。宣尼生于成周之末，有文献不足之叹；子舆生于战国之时，亦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语。虽然，彼时掌史职者，设有史官，则典册经文当不

① 原随文注：用耶稣收获比喻。

② 原随文注：三公二居北一居南。

至残缺如今日也。按《周礼·春官》云：‘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又《周礼》云：‘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又《周礼·春官》云：‘小史掌邦国之志。’又《国语·楚语》云：‘左史倚相廷见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谤之。’此外尚有閻史、周史等官。据是以谈，则当日之书籍取藏，自必较为易易矣。惜祖龙无道，焚毁诗书，致令古代帝王之典谟不传于世。汉兴，访求断简残编，刘歆汇合群书，得三万三千馀卷，然伪者已不少矣。既而新莽乱作，祸起长安，于是图书数百万卷尽归祝融。光武中兴，虽抱残守缺，网罗旧闻，后以董卓之变，图书二千馀车又俱失于兵燹矣。南齐之时，火焚秘阁，亡书九万馀卷。隋宋遵贵迁书覆舟，亡书数十万卷。唐安禄山反，亡书八万馀卷。黄巢之祸，亡书一十二库。行至于今，古书所存者希矣。是故耶稣降生以前吾教之入中国与否，诚不可考。然按诸《六经》，亦时有偶合之处。《易·说卦》云：‘帝出于震。’朱《注》曰：‘帝者天之主宰也。’《礼》：‘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诗》言：‘荡荡上帝，下民之辟。’《书》言：‘维皇上帝，不敢不敬。’《诗》又云：‘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又云：‘昭事上帝。’《书》又云：‘肆类于上帝。’《孟子》云：‘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中庸》云：‘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此外若‘天生蒸民’‘天作高山’‘钦若昊天’‘克配彼天’‘天命之谓性’‘万物本夫天’‘顺天休命’‘乐天知命’‘自天佑之’‘天讨有罪’‘天命有德’‘获罪于天’等等，不一而足。然一细加思索，非造物之大主宰，谁克当之乎？吾故谓圣教于耶稣降生以前，吾国容有所闻，惜未详也。然则我圣教自何时入中国乎？其说亦至不一。有言圣教自第一世即传入中国，首来者为十二宗徒之一，即多默圣人也。观加尔大依国经典，载有‘圣多默宗徒在印度、中华敷教化民’之语；又西史载加尔大依国大主教亚格阿有设立教督总理中国教务之事^①。又前明刘子高《诗集》与李九功《慎思录》均载：明洪武年间，江西庐陵地方掘得大铁十字架，上铸赤乌年月^②。铁十字架两旁有对联云：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吾人只细味‘万民怀大泽’一语，非指耶稣救世而言耶？此外又有古十字架石碑三座：一系明万历二十三年在福建南安掘出者，一系在泉州东山寺旁掘出者，一系在泉州水陆寺旁掘出者。又明朝天启三年，关中人起土，得景教碑于败墙基下，妙词古篆，洵非近物。碑中所言，与天主教理若合符节，已故明末徐光启、李之藻、张麋虞诸先生皆以是《碑》为载道之文；泰西阳子玛诺译为论注，参以别论。近世掌故之学精益求精，于是博学西士又有谓景教系天教别派耐思刀党者，此碑即为党人所立。以故明季士大夫传诵纷如，如《癸巳类稿》《金石跋尾》《景教纪事考》《四库书提要》皆载叙述是碑之文焉。据此，则景教虽非圣教之正派，然圣教之教理，唐时人亦必有所闻矣。

（二）元代中国教务考

唐武宗时，诏令拆毁天下寺宇，景教亦遭大厄；复继以黄巢、五代之乱，降及宋世，我教之兴替，遂无从稽考矣。洎乎元代，圣教复入中国，崇奉之者虽未延及齐民，然通都大邑亦随在多有焉。兹按《元史》证之：钱大昕氏，素以考据之名震于清代者也，其所为《元史·氏族表》则云也里可温氏不知所自出。近人陈垣君因作《也里可温考》一书证明也里可温系天主教，仆曾一再披阅，见其钩核精详，先得我心，爰采录数则于左，以备留心中国教史者考览焉。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元世各教名考》则曰：‘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

至顺《镇江志》梁相《大兴国寺记》则曰：‘也里可温，教名也。教有十字，祖师麻儿也里牙。’

《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九年九月：‘杨廷璧招抚海外南番，寓俱兰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撒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顶牌一，药物二瓶。’

《元史·孝友郭全传》：‘马押忽，也里可温人，继母张氏，庶母李氏，克尽子职。’

《元秘书监志·题名》：‘秘书少监失列门，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上。也里可温人。著作郎雅古，赐进士出身，字正卿，也里可温人。’

① 原随文注，按：亚格阿系东晋安帝时人。

② 原随文注，按：赤乌系三国孙吴年号。

又有一事足资考证者：《马可游记》称大可汗每禁止基督教徒执十字架行列，谓‘耶稣圣人，横遭犹太人之惨戮，今犹以致死圣人之具行列街衢，为万目共睹，非所以重视圣人’等语，可见当时也里可温教徒有执十字架行列之俗。

以上皆陈氏据史考证之说。吾人试按其语，细加思索，当亦知也里可温之为耶稣旧教矣。

又法王类思第九曾遣多明我会修士隆如满等出使蒙古，并带有献大可汗之礼物。及隆如满等至和林，贵由可汗已前逝，皇后（斡）[斡]兀立海迷失垂帘听政，不识圣王传教淑人之本意，遂遣隆如满等归国。然圣人不因此失望，复遣罗伯鲁等至蒙古觐见大可汗，颇蒙大可汗优遇。吾人就以上所述观察，则知我圣教于元代固已传行中国矣。

（三）明代中国教务考

有明洪武君臣执定排外主义，以故西洋教士之在中国者无复有驻足之余地；加以西域大买尔郎之乱，遂至道路梗阻，中西不通，中国圣教会遂呈难乎为继之现象焉。故言明季在中国开教者，实以意大利利玛竇为第一人矣。初随罗明坚至肇庆建堂传教。后罗以事回罗马，利玛竇遂独留肇庆担任传教事宜，以其精通天文、地理、历数、格致诸学，故当时士大夫之造门请谒者络绎相属。后又建堂于韶州，时有礼部尚书瞿文懿公之长子瞿太素路出韶州，钦玛竇之德学兼优，遂倾心奉教，并求收为门墙（马）[焉]。无何，玛竇将韶州教务托于郭居静、龙华民，遂辗转至金陵，又由金陵至南昌，在南昌建堂开教。后乘机至北京。因不得志，复回金陵，遂在金陵立堂开教。然其进北京觐见明帝之志终不少衰，遂将南京教务托于郭居静司铎，已乃偕虎迪我北上。蒙万历召见，异常优礼，遂在北京立堂开教焉。时倡奉教之人为湖广监察御史冯应京。彼对于玛竇所作《天学实义》一书极为心折，因作序弁首，付梓问世。后冯以赴南京受洗，行至中途，忽溘然逝，论者惜焉。当时复有李之藻氏者，浙江杭州人也。因从利玛竇学地理，遂欣然受洗，并助利司铎著书传教。此外复有徐文定公光启、监察御史杨廷筠、进士李天经等，亦皆先后入教焉。中国之教务遂从此蒸蒸日上矣。中间虽叠遭魔难，然屡仆屡起，再接再厉。及徐文定公入相，圣教于是大兴。

光启既没，汤若望司铎复以天文历数之学受知于明帝，赐有《钦褒天学》匾额。此外若艾儒略、高一志、方德望、毕方济、利类思、鲁德照、林本笃诸大司铎，皆明季开教史中之卓卓者也。

（四）清代中国教务考

我圣教会于明季清初于戈扰攘之际颇遭魔难，教士被戕、圣堂被毁、教民被害者时有所闻。艾儒略司铎尚在，乃偕阳玛诺司铎避乱于延平。后阳司铎卒于杭州，今圣教所传诵之《圣经直解》、《经世金书》，皆阳司铎所著者也。当清兵之南下也，有统兵大员名佟国器者，系满清贵戚之臣。在北京时久已心折圣教道理，故于统兵南下之时，（偏）[適]历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各省，到处访问司铎，加意保护，并出资重建圣堂、刊布圣教经书。后佟以功授浙江巡抚，驻节杭州，乃相俸助卫匡国司铎重建大堂，宏丽为各省之冠焉。佟于康熙亲政后徙居金陵，始受洗入教。然此时此际，蒙皇上特遇之知者惟汤若望。若望于顺治元年即受钦天监官，后以勤劳懋著，加大常寺卿衔。八年，又诰封若望为通议大夫。按西史记顺治年十五岁时之所以得亲政者，若望与有功焉。顺治十五年正月，诰授若望为光禄大夫，并赐若望祖先三代一品封典，于是若望以异国之人竟为清代一品大员矣。时顺治虽不愿奉教，然私心向往久矣；御制《钦崇天道》匾额悬挂天主堂，又赐若望以“通玄教师”之美名并题天主堂匾额曰《通玄佳境》，其褒扬圣教之意可谓至矣。

顺治十七年，南怀仁奉诏进京与若望共修历法。及顺治崩逝，康熙尚冲龄，不能亲政，诸事遂决于四大臣之手焉。

当汤若望七秩之寿辰也，大学士金之俊、左都御史魏石生等均赠有推崇颂美之贺文，则汤公在当时之才望学识，可见一斑矣。不谓谗谄蔽明，邪曲害公，竟有无知之杨光先信口诋毁圣教，并作《辟邪论》《不得已》二书，用肆诽谤。利类思司铎乃作《天学传概》及《不得已辨》，力斥其诬。康熙三年七月，杨光先受某大员唆使，上章诋毁汤公及他西士，清廷遂下汤公于刑部狱；继复定以肢解之刑，以地震奇灾得免。圣教斯时复遭一场魔难。及康熙亲政后，乃遣近侍访问西士，并考究中

西历法优劣，深知杨光先之荒谬，遂斥之。于是大翻前案，圣教大行，南怀仁得升工部侍郎并钦天监官职。康熙复从南怀仁讲学，而当时之教士遂皆蒙优礼。厥后三藩削平，康熙南巡数次，对于圣教异常重视，而吾圣教之发达也，遂有一日千里之势焉。时罗马教皇以巴主教病歿，特擢罗文藻司铎升补，此我华籍第一位大主教也。罗主教系福建福安人，多明我会修士，康熙二十四年在澳门受圣，时已年届古稀矣。然主教精神不衰，对于圣教事务兼筹并顾，措置裕如。又以西洋司铎为数太少，乃择中国品学出众之教友授以神权，清代名画家吴墨井^①先生即其一也。厥后中国教务推行愈广矣。康熙既崩，雍正继帝位，力持排外主义，于是各省教难遂由此大作。雍正于十三年八月崩逝，四子弘历即位，改元乾隆，本无仇教思想；惜为近臣壅蔽，而各省之教难遂终不能免，于是致命之司铎时有所闻。洎乎嘉庆继位，其排外举动，较雍正为尤甚，故终其世得进京效力者止二三人而已。未几，司铎遂绝于京师。嘉庆在位二十五年崩，道光嗣位，一遵先朝故辙，蓄意仇教，以故主教、司铎、教友恒有致命者焉。及道光二十一年英将卜定格率兵进逼南京，于是清廷震恐，遂与英将议和，开五口通商。自是教禁渐弛。顾教禁虽弛，而咸丰年间仍时有教难焉。后清代又狃于僧王之虚捷，遂至排外益甚，而外侮乃日益至。卒招英法二国联军之祸，咸丰出狩热河，二国兵压北京。清廷不得已，乃与二国立约议和焉。自是之后，中国门户遂洞开矣。十一年七月，咸丰崩于热河。正官无子。贵妃那拉氏有子方四岁，名载淳，遂继承大统，尊其生母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不谓于同治初年有哥老会在长江流域散布谣言，匿名揭帖，极端谤教，遂引起一般愚民仇教之心理；而天津教难因之以起，致演成法领事遇害、仁慈堂被焚、修女被戕之惨剧。同治于十三年十二月崩，太后乃以醇亲王之子载湫入承大统，改元光绪。后此教难屡作，最烈者则为拳匪之役。

考拳匪本系白莲教之变名，专以邪说惑人，藉谋不轨，潜伏于直隶、山东。初称大刀会，后又改名义和拳。时李秉衡为山东巡抚，毓贤为按察司，久怀排外思想。见义和拳之仇教也，心窃喜焉，遂听其蔓延矣。无何，刚毅、徐桐辈皆为拳匪所惑，遂怂恿那拉氏信任拳匪，一意仇教；而教难乃大作，主教、司铎、教民之被惨杀者更仆难数，实中国教难中之一大痛史也。欲知其详，有李问渔^②司铎之《拳祸记》可考览焉。

清廷既如此宠信妖孽，遂致各国联军进京，造成清廷亡国之一大原因。乃反观我圣教，不惟不见衰退，且每进愈上焉，是岂人力也乎？

(五)近代中国教务略述

由清季以迄清亡，我圣教日盛一日。及革命成功，共和肇建，我圣教乃传遍全国，无远弗届矣。公教之学校则到处林立，公教之圣堂则随在多有。不亦盛乎！乃不虞极盛之后而复更盛；教皇复遣宗座代表刚大主教来我中华，而中国司(亏)[铎]得应主教荣任者，近竟有六位焉，是岂非我公教前途之厚幸哉！爰就闻见所及，缀《中国教务史略》一篇，俾我圣教中人得知圣教传行中国之原委，由此再接再(厉)[励]，发扬而光大之，则我圣教之广扬，可计日而待矣。凡我圣教中人，其各勉诸！”

《传记》栏辑：

“赵孙成陈胡朱六大主教传略(佚名)”

赵主教 名秉义，圣名斐理伯，北京人。生于1880年10月4日。1893年11月7日入北京修道院，1904年2月27日晋升司铎，即在修院教授四年。传教宣化二年有半，升京兆信安本堂，在任十年。其后充任北京毓英中学校校长四年。1923年1月8日升任宗座代表秘书。公学识渊博，并精通法文。

公父于1900年死于拳匪之乱。乱方起时，公全家逃避北堂，公父犹留家中，遂被匪执去，致命

^① 吴墨山(1632—1718)，名启历，号墨井道人。江苏常熟人。康熙十四年(1675)左右入天主教，二十一年(1682)进耶稣会，二十七年(1688)在南京升为神甫。

^② 李秋。见274页注①。

于西四牌楼北太平仓，公母经此变，双目渐致失明。惟现尚康健，暂住京西长辛店。其长兄系直隶怀柔县杨家坪苦修会士，数月前逝世。五弟亦充司铎之职，现充北京修院拉丁文最高级教授，北堂出版之《真道》期刊多赖其臂助云。

孙主教 名德楨，圣名默尔爵，北京人。生于1869年。十三岁入修道院，二十八岁升神父，传教于天津、盐山等处。1899年入圣味增爵会，后于北京小修道院教授拉丁文十二年有餘，继任为京兆牛房村本堂约十有二年，于1924年蒙教宗简任为蠡县监牧。今于1926年6月1日又蒙教宗电诏擢升为主教，所属神父、教友莫不欢欣相庆，以为中国圣教根基稳固矣。公娴于拉丁文字，且工于拉丁诗赋，故于北京小修道院充为拉丁文最高等教员。公自幼持已待人以‘温良恭俭让’五字括之，是以凡与公接近者，不分中外，莫不感其德而敬爱之。当本笃第十五教宗通牒MaXimumillud降下后，各处神父教友群相议论华铎中之堪称主教选者，非公莫属，故于1924年公蒙简为蠡县监牧时，中外司铎莫不折服教宗选得其人，可谓UacPōPWliuXQei天视自我民视也。公在蠡县本任二年之久，频遭困顿，而公终能擘画经营，屹然不摇者，依赖天主之心胜于依恃自己才能之证据也。‘赖主者如西婉之山’（《圣咏》百二十四首），此言信不诬也。今又蒙教宗擢升为中国主教矣。

成主教 字和德，号理阶。于1873年生于湖北老河口镇。幼失怙恃。负笈圣教蒙校，聪慧敦厚，不类凡童。时庚子年致命湘南之范主教总理校务，特加青眼，拔入小修院肄业，不数年进步甚速。作文畅达驰骤，具栋梁之观。1893年，已故主教南公赴罗马见教宗，携公与黄生方济往义国斗西亚省进圣方济各首会。1900年7月，超性学卒業，荣膺铎品。返国后，奉命传教于枣阳胡家楼、北山等处。未几，调充襄郟修道院汉文教习。越四年，辞教习职，出任樊城等处本堂。1911年秋，复任修道院中西文教授兼副院长。先是，院中华文课程率遵满清旧制。公至，即着手改革，渐次易以新学，俾修生成具普通知识。说者谓公之办学擘画精细、经验宏富，非过誉也。迨1921年秋，湘、鄂方济各主教合组大修院于武昌，简公襄办院务。23年罗马宗座划分蒲圻等县为宗座监牧区，升公为监牧。今春又与蠡县区孙监牧同时被简为各该区主教，将遄赴罗马领受祝圣大典于比约教宗之手云。

陈主教 圣名类斯，名国砥，号锡固。现年52岁。乃山西路城县安阳村人。陈姓大族，奉教祖传，不记辈数矣。幼读书于太原修道院，英才出众。分区后拨归路安教区。惟因得有圣召，求进圣方济各会，仍返太原，投入洞儿沟方济各修会。后升司铎，传教于临县等处，所至有功。嗣掌太原明原中学校长，迄于今职。为人果敢有为，志气远大，于传教魄力尤宏。7月25日刚总主教亲赴太原，即行宣布陈大司铎为临县主教，且应随同赵、成、孙诸中华主教同赴罗马，受教宗亲手之祝圣。刚总主教亲为引导，诚为异数也。

胡主教 名若山。原籍宁波。其家族18世纪时已奉真教，迄今十有一代。其时宁波为耶稣会会士传教区域，以年堙代远，不能□□□。奉教历史，惟知于十九世纪之初，家于□□□□□□□□□□姚江间。时有味增爵会士华铎，来自江西，巡视宁波信友，常寓其家，当时信友仅三十左右。此事以1836年时一传教士之记录可证。其言曰‘宁波信友常聚一教友家。其地背城临江，交通甚便，时事稍有不静，即可买棹他适，以避凶险’云云。胡主教1881年生于定海，1894年进定海北门外小修道院肄业，1903年升入大修院，1906年入味增爵会，1909年晋铎后奉赵主教命派往台州传教，1911年任为毓才中西学校校长及备修院院长。1914年任甬北七苦堂本堂，一年后奉命襄理保禄大修院，至1919年兼任浙东教务顾问员。在院十有一年，前后教授哲学、神学两科，蒙其陶成已登铎品者已十有八位，现居大修院尚有二十八位，其中属胡主教传教区域者居半；彼初尚不自料其所培植者，即将来于其本区域辅助其传教者也。1922年蒙赵主教委赴汉口，参与中华全国大预备会，刚总主教赏识其才，一见倾心；嗣又选为中华全国大会议顾问，且属意选为宗座代牧区域主教。今果诏书颁下，擢胡公为台州主教矣。

朱主教 朱公希孟字铭德，号季球，圣名西满。世奉圣教，已三百余年。原籍青浦诸巷会，迁

居沪南董家渡亦八十馀年矣。父讳朴斋。母马氏，乃马公相伯之胞姊，敬主热心；教子有方。生有子女共七人。新主教为第六子，生于1868年10月30日。年约十岁，行初领圣体避静时蒙主宠召，离家修道。十五岁入董渡小修院，学习拉丁文。后入徐汇大修院，攻格物等学。1888年9月7日进耶稣会，十年后晋铎，时年仅三十岁也。晋铎后传教浦东之川沙、金家巷等处。1903年2月2日发终身大愿。后传教于常熟之鹿苑、江阴之后厍等处，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在后厍创办崇真学校，成绩昭著。前韩省长嘉奖朱公教育之热心，题赠匾额‘育才锡类’四字。江苏姚大司牧知公能，因于民国十三年升授南通总铎，而后厍教友悲公之去不已。不久海门顾总铎逝世，公乃兼代其职。去秋乃实授通海总铎，兼茅家镇类思学校校长。今年刚总主教于圣母月下旬巡视崇海时即属意于公，擢之以膺主教位云。”

《志盛》栏辑：

“华籍主教赴罗马沿途备受欢迎

此次中国圣教蒙教宗特遇，选圣华籍主教六位，并蒙教宗亲行祝圣典礼，诚为我国圣教空前之荣幸。九月三日为华籍主教赴罗马荣行之日，兹将沿途欢送情形胪列于左：

北京方面 是日早由刚总主教率领三公由京起节，北京各堂会长如修道院院长修士、各本堂司铎、公教大学司铎学生等均佩带欢送标帜赴站欢送。当时军乐大作，脱帽致敬，而北堂富主教及比国公使、外交部秘书等亦均莅站送行，济济踰踰，颇极一时之盛云。

天津方面 是(三日)日上午十时，本埠总堂文主教率领中西各位司铎并各堂会长教友，诚正小学、西开小学、益世报、南善堂音乐队到东站欢送，均配带红花，恭立迎候。迨北京快车已入站时，中西音乐同时齐奏。刚总主教及孙、赵、陈三主教由文主教及众会长迎至候车室，茶点片刻，众教友大呼：‘罗马教宗万岁！’‘刚总主教万岁！’‘华籍主教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旋闻汽笛一声，车已开行南下云。

上海方面 迨九月十日，刚总主教偕同新任华籍主教六人平安抵沪。警厅警察、董家渡保卫团救火会均到埠欢送。江边搭彩牌楼。在岸欢送者，有交署交际科长王镜舜并朱志尧等男女教友数百人，均各乘拖驳送至杨树浦。当主教登轮时，鞭炮声与欢送声均甚为热闹云。

香港方面 宗座代表刚总主教偕六位华籍主教自上海登轮后第四日(十三日)午后五时抵港埠，当有该处主教 Mgr Valli 偕同神父及各会修士并信友多人在彼欢迎。主教团下船后至该处主教署，是晚由中华信友特备华式席。宴席中有香港主教、广东主教、江门监牧三公，各有极长演说；刚主教也有答词。席散后即赴青年会欢迎会，鸣炮奏乐、摄影(用火药法)茶点，直至次日七时，始开船赴玛尼拉云。

马尼拉方面 十六日七时船抵马尼拉，有该地宗座代表及其秘书、华侨多人均在码头相候。下船后即乘汽车至马尼拉总主教府，备受华侨信友及男女学校教职员、学生等之欢迎，并在女学校开欢迎会。毕会后同赴大同俱乐部晚餐，在座者除主教同行之九人外，有本地总主教及宗座代表秘书、司铎、华侨等约一百余人，洵盛举也。迨十七日午膳后，即分乘汽车五辆往玛[码]头登轮向新加坡出发云。

新嘉坡方面 廿一日午后二点抵新加坡，其时已有多数公教华侨在彼欢迎。下船后分乘特备汽车多辆至一葡国之教堂小憩，茶点后并摄影留作纪念。该处信友特送美金四百五十元补助路费。其欢迎之热烈，真令人感激莫名矣。(因出刊在即，故叙述止此。其他详细情形，容在日报中披露。)

按此次华籍主教赴罗马沿途公教信友欢迎之盛况，笔难殚述。就中华侨信友欢迎主教之热烈尤为仅见云。”

《小说》栏辑：

“圣教广扬(子谦)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春，大将军甘卫华，富有军事经验，博览群籍，熟读圣教历史。鉴于内乱不

已，思欲削平内乱，扫清野心的军阀，欲效达味圣王、亚力山大王、嘉乐大皇的轶事，专心依靠天主，战胜敌人。因此招集部属会议，讨论救国弭乱的方针，应用何法肃清宇内，统一全国。因宣布古人依靠天主显圣迹，战胜敌人，光荣归功于天主的故事，但恨我是教外的人，不知从何处入手。参谋富瑞昌道：‘这里现有一位本国主教伊爱华，何不请来咨询？’将军一听，立刻派他去请。乘着摩托车，开到首善路天主堂，下车拿出名片，交给阍人投入。阍人将他引进客厅，会见主教，说明将军教请的盛意。主教允诺，立即出堂登车，来至将军府里。富参谋陪着导入会议厅，将军降阶出迎，让进厅内。富参谋一一给主教引见。

将军请主教讲教中道理。主教因将人生重要问题阐明，将军及属员虚心敬听颇受感动，要求进教领洗。主教道：‘诸位既全信圣教的道理，就该弃绝各样异端，痛改各样毛病，全守圣教规诫并要紧的经言。为此种种，诸位先得保守几天，至主日（即星期日）再到天主堂领洗。’主教从将军府回来，打发人给将军送去许多书籍及要紧的经言要理。到了主日，将军率领将校参谋副官等到圣堂里，请主教给他们付洗。随又升座讲道，说：‘诸公既蒙天主的特恩，拣选进教，脱离黑暗，顿入光明，可庆可贺。但只领洗，信德还是软弱，未为健全教友。再等一会，虔诚领主圣体；再保守一主日，预备领坚振，就能得圣神七恩了。’这时主教离座，入更衣所，换上祭衣；堂中执事打钟念公经，他们新领洗的教友也能跟着同念。主教行祭献天主的大礼，头戴高冠，手执权杖。他们见了，越发敬爱天主，随班领主圣体，各自谢主，回家保守，预备领坚振。至期，将军仍率领部属到圣堂领受坚振，得着圣神七恩，信德培增，异常勇敢；承认自己是耶稣的徒弟，所立的教独一无二，至真、至正而至全；更以推己及人之心，劝令军士入教，又求主教分遣司铎于全体军士授洗。将军见军士一心一德，因呈请大总统，称为模范救世军。大总统批准，训令各将军一体遵照。甘将军会同伊主教派代表司铎至各省将军师旅长各管团讲演教理，解释疑惑，结果全国军界全体进教授洗。从此化干戈为玉帛，南北统一，政、学、农、工、商各界相率进教。从前庵观寺院的僧道也都进教。圣教广扬气象，为我国亘古所未有。

伊主教申奏教皇，陈述圣教发达情形。教皇览奏大悦，降福中国，升伊爱华为总主教，增添华主教八十位分理教务。提倡教育，广立学校，全国人民各守职业，奉公守法，每到星期日罢工，进堂诵经瞻礼。外人称许我国政治、教育、农工商业均入正轨，那种安和气象，令人起敬起爱。

甘卫华将军又首先提倡裁兵通电，国人因此全体解组归田。临行邀请部属，演说‘此次成功，绝非人力，实是天主的圣意。’富瑞昌道：‘我们进教初志，原为盼望天主显圣迹战胜敌人。不料想未伤一兵、未折一矢，全国军人悔过自新，一刹那间各省救平。’甘将军道：‘这个圣迹还小吗？往远处说，从元朝圣教传入中国，到如今六七百年，奉教的才几百万人。一转移间，增至数百兆。民国成立以来，干戈纷扰十五年。自从全国恭敬天主，转瞬间罢兵归田。若不是有天主的宠照，怎能有这样的大效力呢？我们（谈）[该]感谢天主，归功于天主。’”

“圣教广扬（求新）

求新在书宅阅新闻纸，被时事感触，心中昏迷，闷闷欲睡。忽听邮差送信来。将信接过来，信面写着‘自北京公教进行会 李兴华缄’。启视之，大意如下：

‘求新仁兄左右：敬启者。迩来战事紧迫，溽暑炎热之中，军士饱尝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健儿效命战场者，不知凡几。频闻各省大水暴发，人民哀号奔逃，生命财产受伤者无算。嗟乎！人民何辜？罹此荼毒。若不亟思拯救，必至壮者散至四方，老弱转乎沟壑。阁下素抱救国救民之热忱，请速来北京，联络同志，以谋救国救民之方法’云云。

余阅竟，不觉喜极狂跃。收拾应用物件，放在皮包里，提着出了门。雇一辆人力车，拉到总站。随即买票登车。忽听气笛一鸣，车就开了。晚八点三十分到崇文门车站下车，又雇一辆人力车，拉到西什库公教进行会。开了车钱，走进门房，正欲问阍者，恰巧李兴华君迎出来，与吾握手，接去皮包，道：‘你辛苦了。’走到客厅，同会的人，给吾一一引见。李兴华道：‘求新哥，这里明天开会。若有救国救民的妙策，可以提出讨论。’吾道：‘鄙人僻处穷乡，孤陋寡闻，日与牧豎为伍，能有

什么妙策呢？’兴华道：“开会时不要客气。有意见只管提出发挥，大家各抒己见，以浅易而能实行者为上。”言时，壁上時計已报十句钟。兴华道：“我们安眠去吧。”翌晨八点钟，振铃开会。会长报告开会宗旨，宣布会员条陈意见，宣言会员若有高见，尽可发言，以备采择讨论。这时吾起立发言道：“欲救吾国，非统一人心不可。近来战争激烈，干戈纷扰，尔诈我虞，此争彼夺，皆因人心不统一之故。欲人心统一，非宗教莫属。惟一之宗教，舍公教（即天主教）莫属。欲推广公教，当上书国务院，交参、众两院，乘公查考宗教，务将各教的道理教规、敬神的礼节、团结一教的效力一一比较，孰优孰劣，玉石自分。”大家鼓掌，赞成通过，举吾为起草员，条陈大意如下：

‘国务院总理救国伟人公鉴：诸公欲救国，非查（教）[考]信仰宗教不可。谨将敝教最显著者数端胪列于后，以供查考。一公教的道理。是从天主圣神保护默契来的，永不能错，非他教人定的道理昔是今非所可比拟。一教规。公教的十诫，是天主亲自写的，并印在各人的良心上，完全无缺，比法律的效力还大；教长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有天主亲授赦罪的特权。一敬神的礼。公教恭敬的是造天、地、神、人、万物的大主宰，祭献仍用当日吾主耶稣为救赎众罪，甘心受苦受难，被钉十字架上死的牺牲。一团结统一力。吾等原祖，系天主所造。世界人民都是一系相传，天主是我们的大父，我们都是他的子孙；无论何国何种，都是一祖的子孙，是真同胞、真兄弟。这样看法，自然减少战争。’

次日上书国务院，蒙批交参、众两院切实查考比较。两院选出博学鸿儒数十名，罗列各教书籍数十万卷，敦请各教的代表捐弃私见，根据教理，一一比较。结果公教遂占优势。同时参、众两院的议员全体进教授洗；他们是代表人民的，全国人民见他们进教，就也都进了教。那时添增华主教八十位，增添司铎一万二千位，新授洗的教友有八千多万。教会发出公电，劝大军阀解难排纷。那知居然息止干戈，全国统一。

于是成立合法政府，选出道德才能出众的大总统来。是日，全国人民庆贺新国。街市上有鼓乐，有提灯会，一队一队的排列整齐，群呼‘中华民国万岁’、‘共和万岁’，‘公教万万岁’。惟吾呼唱的声音更大，不料惊动家里的人，用手把吾拍醒道：“你怎么在青天白日说起睡话来啦？”吾睁开眼睛一看，仍在书斋；敢情是做了一梦，白喜欢了一阵。自己思想道：“吾的梦不知在民国什么年上可以发现，盼着吧！”

“圣教广扬（樵读野子）”

李国珍是个优秀青年，天资颖异，秉赋纯良；又得以在公教学校里受优美的教育，耳染目濡，心领神会，都是些至德妙道、嘉言懿行，置身芝室，久久自芳。临到毕业时，他本着良知的主张、诚恳的信心，毅然受了公教洗礼，成了公教的大好信徒。出校以后，他为着经济困难无力升学，免不掉就得在社会上觅生活。冷眼瞧见那万恶社会上的怪现象，不觉的触目惊心，在在引起他痛世疾俗、悲天悯人的观念。因此他励行誓志，意要挽回狂澜，作个中流砥柱。可惜他淑世有心，补天无术，魄力棉薄的李国珍，终不免失败。不到半年，便遭受了失业的痛苦，一肩行李，狼狈归家，当然难免俗人的白眼相加了。李国珍这时意懒心灰，神丧气沮，禹禹一室之中，非常的侘傺无聊，抑郁不乐。一日独坐在书案之旁，信手拈过架上书史，随意浏览，小作消遣。恰恰翻着一部《宗徒行实》，俯读仰思，颇耐咀嚼。也是他静极生明，豁然大悟，以为人生世上，成功不在财富；我既为物质战败，正可改弦（异）[易]辙，努力于形而上的事业，就如宗徒之坚忍勇毅，牺牲一切，专心救济人灵，比较得现世的财富，更是有价值。想到这里，他的人生观似乎确定，就是从今以后，要全心全力，一以传扬公教、广救人灵为事业，要在道德上建设他伟大工程的基础。但是立志非艰，实行维艰。欲救人灵，谈何容易？况且李国珍处在这样窘境里，也不好腆颜向人谈经说教去。然而他又一想，天下本无难事，况我取的路径确实有达到目的的可能，只要我能坐筹立行，什么脸热啦、遭人讥笑啦，都可以一概不顾。继又一想，虽说如此，也得定个步骤，取个手续，才较冠冕堂皇，牢固镇定。于是他便去见他本村的村长，说明自己在家赋闲，株守无聊，意要在本村成立一所学馆，藉以糊口。他本村乃是一个很不开通的小庄子，村人大半耕田牧牛，认字的很少，所受的教育也不过

是弹词上、戏剧上那些唐宋元明禅官小说里讲的忠孝节义、妖魔鬼怪的知识，别的一概不晓。李国珍得到了村长及父老们的赞助，不到两周就绛帐高悬，泉比独拥，做了孩子王了。他虽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也认真教训，按改良私塾的程式办理，半年来很得村人的称许。以后学生程度渐高，知识日长。他在教馀课罢，每每讲演圣贤的嘉言懿行，英雄的丰功伟烈，好引起学生的向慕心，杂着输入些公教知识，指以人生正轨。天真烂漫、良心纯洁的儿童，自然都倾心公教，有时在言谈间流露出来。国珍见自己目的渐次达到，非常欢喜。另外在冬夜灯前，夏天月下，聚请学生的父兄，以及村中人等，娓娓的谈讲，毫无倦意。二年后，闾村人都被了他的感化，立意要实行全体入教。正赶的他们那里划归中国主教教区，奉教是随外国一说早就不成问题，合村人领洗入教之后，行走于光明路上，作天国百姓，自然比前不同。不但灵魂受益匪浅，就是他们过日子的现象也是焕然一新。大众公议，摊钱盖了三间公所，每遇了主日瞻礼、罢工的日子，都去祈祷诵经，听李国珍演讲道理。到这时候，李国珍的村子上总算圣教广扬了。但李国珍的工作就此终止吗？”

“(夺标小说)圣教广扬(守愚)

文瑞向国华道：“不用提兵匪的慌乱了，那不过是有形的坏现象，就如皮肤疮疥之患，并非致命重症。所最令人痛惜的，是现在的世道人心已竟坏的不可救药了。上至官长，下及负贩，除了互相利用，求一己的利益之外，简直的找不出一二点爱德来。人类本来是应当合群的，然而所以能使他合群的原动力，就是一个爱字。如今世上既缺少了爱德，那么这互相屠戮、互相倾轧的现象，自然是免不掉了。这样递演递进，非进化到虎狼相残、鹰鹯互转的禽兽世界不止。”文瑞说时，蹙额皱眉，一种痛世疾俗的心理活现出来。国华也是长吁短叹，一似重有忧者。国华说道：“这样恶现象，真也没法挽救。旧道德呢，被一般轻浮的新进唾骂摈斥，毁灭无余，谁敢一提倡，立时就有有人把一些脑筋陈旧、顽固性成的名辞来给你加上。新学说呢，却又都是应合世人的恶性根，导人日趋下流的。就如那乐利派，虽也有片面的理由，究竟是太提倡人欲，所以实行出来未免的弊端百出。还有那思想简单、眼光如豆的人，只知现世色相，不知形而上者。你要合他讲有神原理、死后观念，他立时斥你迷信入骨、愚昧可笑。而他自己信果不信因，或是信非果之因、非因之果，颠倒错乱，人云亦云，一味的崇拜欧化，盲从谬理，以致弄得纪纲扫地，世道凌夷，而自己还沾沾自喜，以为数千年来的各种束缚人的宗教一下子都被我们打破了。他们曾设计及还有人群社会哩！若把他们的主义施行到社会上，必是陷社会人类于危亡的地步无疑了。”文瑞一面听，一面用扑蝇排子把书桌上一个蝇子打死，摇着手里的扇子，续答道：“章炳麟先生说“善恶一齐进化”，马相伯先生更进一步说“世界上物质文明愈进步，精神文明愈退化”。考之原理，证之事实，真是一点不错。但我们幸得真光之照、福音之沾，觉悟了这一层，总该想出一个方法来，以图挽救于万一的。”国华很绝望的叹息一声道：“寸胶焉能澄清黄河？精卫焉能填平东海？我们独善其身罢了。要想砥柱中流、栋梁大厦，莫说是拘于境遇而不能，就是得志于时，也恐怕蚍蜉难以撼树，白费心，办不出成绩来。”文瑞道：“这也言之有理。但我们救世的目的，范围不要太大，只是用公教的真理来讲与人听，救一人是一人，救一家是一家，以至一村、一镇、一县、一省，如同耶稣说的：“芥子虽微，滋长实大。”我们如果本著宗徒的精神毅力作去，不愁不天国临格，圣教广扬，一切邪说谬理自然无形打破，世道人心又焉得不达到文明的极轨呢？所以我的人生观，就是无论何处境遇，一以广扬圣教为职志。”国华道：“这样人生观，我不但极端赞成，倾心佩服，并且还要尽力步趋。现在我国已有主教。这广扬圣教的责任，是人人应担负的。若果公教智识份子都能负这责任，圣教广扬可立而待。这样还愁中国不强吗？将来世界大同都还要实现哩。”以上是暑假的一天，文瑞去访国华，二人闲谈时势，末尾的一段谈话。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志行来咧，比那相对终日言不及义的强多了。而且他们的理想如果能实践了，我想一定能圣教广扬。”

“(夺标小说)圣教广扬(梦樵)

四年的中学校学生生活眨眨眼就过去。毕业前一星期，学生们除了用心预备考试外，秦士英偶然提议了一件事，就是毕业之后，同学友们免不了要风流云散，劳燕分飞，要想再聚首同堂、联

欢一室，是极其不易的，看来形式上的分离是万难避免了。到底精神上、主义上未尝没有团结的可能。为此征得了十几位公教青年的同意，共同协议，组织了一个保禄团。团中大概的宗旨，就是团友出校后，无论是服务社会，或是继续升学，都要本着宗徒圣保禄之精神、之毅力尽心竭力宣扬公教，传播福音。每年到圣诞节后、阴历年前，通函向团长报告一年的成绩。一年后他们各把各界里品端行洁的优秀分子引入公教的约有百人。这一百新教友里，有大多数加入了保禄团，和他们一样传教救人。就是没有加入的，也是取一致行动，苦劝那摸索于死影、徘徊于歧途的可怜同胞同隶十字帜下。这样日增月盛，继续进行，保禄团渐渐发达兴旺起来。团长秦士英夙来本热心出众，也曾私心自誓过，甘心愿意牺牲一切、破釜沉舟的荣主教人去。后来因为团务纷繁，连任总是举他为团长，所以他也无暇服务俗职了。幸亏他家里尚称小康，穿衣吃饭不至发愁，所以他就专心致志、聚精会神的筹划团务的进行。他们传教的责任，是甘尽义务，毫无权利。名义上是为图报公教学校栽培之恩，其实善与人同。鸡见米而呼其群，蚁得食而聚其众。人得入公教，尝到了天国的滋味，谁肯不敦劝亲友、拉拢乡邻，把公教的福音向之宣布，挽一切人类同奉公教，同得真光之照呢？他们卒業之后，果然都拳拳恪守他们的团章，积极进行他们高大的理想、有价值的神业。对于自己，对于职业，对于亲邻友朋，尽其忠诚，叫人无瑕可指。本身的道德基础预先打定，然后或是口讲指画，或是潜移默化。有的虽遭了恶劣社会的蔑弃，就如当年圣教的广扬，他们的事业能否成功，单看十二位宗徒的芳踪芳躅，便可料到。但他们的成功，并不是财富与名誉。因为物质的财富与名誉尽可以耗散消沉，算不得是永久成功的。惟独他们这不动声色，化人于无形之中，这种精神上、主义上的成功，是能打破困难，不受环境限制的。这样的成功，不但公教青年能毅作到，就是男女老幼、智愚贤鄙，只要尽心力而为之，也没有不得到那荣誉花冠的。”

“圣教广扬(梦麟)”

雷声隆隆，雨下如注。风吹树头舞，泥泞路难行。于时蝇营狗苟之徒、求名趋利之辈，阻于风雨，率皆蜷伏室中，不得不暂为停止进行矣。忽见一扶杖老翁率小儿数名冒雨急行，虽水深及胫，满身淋漓，犹现喜形于色，勇气百倍；宛若目前某地有奇珍异宝，趁此俗人裹足之机前去攫取之态。继见三三五五，络绎追随，遥向一顶竖十字架之洋楼而去。阅者欲知彼辈为何如人乎？虽狂风暴雨，不为所阻，究至何处，有何急事乎？吾当为诸君叙之。老翁姓石名真理，隐逸村首屈一指之富户也。昔曾历经仕途，赋性苛薄，爱财如命，村人咸呼之为银豆。后因小事触怒上峰，被革归家。时已年近六旬，遂安居家中，静享田园之乐。某日忽接契友张某计闻，因触动轻世观念。细想人生如梦，事事皆幻，当其生时，争名夺利，勾心斗角，一若彼之事业将与日月并光，无暇有已时者。比及大限到来，则倏然不能肉其白骨，曷胜浩叹？思至此，万念俱灰。适见案头有《民国通俗演(易)[义]》一部，信手抽出一册翻视之，乃袁世凯称帝未遂气愤身死一段。因忆袁某亦世之人杰也。惜为贪心所误，身为总统，荣耀已极，犹以未足，复欲晋而称帝，致遭如此结局。悲夫！世福虚假，无一可以满足吾人之欲望者矣。光阴荏苒。候至岁暮，国人俗例难免，咸黏贴对联福字。吴翁见景生情，对彼‘接福迎祥’、‘抬头见喜’、‘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等字样，辄自暗叹，只以吃语目之。盖彼已有所悟矣。来年灯节后某日，有吴家所设各处商号执事前来缴呈红单，以盈亏各情详报东翁。翁特为诸人设筵接风。及入座，忽见辛镇天益号执事崔若愚君起立，以手点额及胸，由左而右，口内喃喃有词，片刻念毕，方入座就食。吴翁怪而问故。崔曰：‘余近交一公教友人，姓贺名志诚，劝余领洗入教。余初颇反对，因系至交，彼亦不恼，依旧絮絮不休。复送至余处圣书数卷。余见其用意恳挚，遂引动好胜之心，将拿来之《人生要务》《天主教》《邪正理考》《理窟》诸书乘隙一一悉心阅之。于是对于世事，恍然大悟，始知世间万事万物皆由天主造生掌管，并布天国真福待吾人于身后。可叹芸芸众生，徘徊歧途，舍本逐末；复作种种罪恶，大伤造物主之慈心，安能不降些许灾难以示薄惩乎？近来之兵燹、匪祸、水旱、疫疠，皆仁慈天主促人反省之药剂也。余深以识贺某太晚，未得早入正途以事此仁慈造物之主为憾。适者，乃念饭前经，感谢吾主生育保存之恩耳。’同座诸人，有暗笑其为腐儒之谈者，有私谓其曾服该教洋药迷住本性者；惟翁以有旧日观念，颇然其

说。须臾饭罢，翁与众执事略作周旋即辞退，惟留崔某，暂作数日盘(旋)[桓]，俾得啻听教理。崔某乃将天主当初造化天、(主)[地]、神、人、万物之本意及其屡施恩宠之明证，近人种种背主之罪恶及其舍本逐末之愚妄，进教如何紧要，公教之于风俗、人情、社会、国家，一一详为解释。于是荧绕于吴翁脑海之急待研究之奥妙问题骤然解决，遂决意入教，请为介绍。崔因问：‘附近有天主堂否？’翁曰：‘村西八里许有村名尚义集者，教民颇多，有教堂一所，并西教士二名。余因向日竞务名利，无退问津；且因志不在彼，亦不屑问津焉。近来株守在家，颇觉无味。某日忽接友人讪闻，遂引起余轻世观念，以世福难履吾人之欲望耳。适承明教，顿开茅塞。是余与君有同憾焉。’翌日遂同赴教堂请教，复经司铎殷勤开导，翁大悦。自是遂率全家进教矣。

翁既进教，复罗置各种圣书，以期透彻教中真理。未几领悟颇多，知古儒所谓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惟公教人庶可行之，因深以旧日之苛薄为非。于是广济贫困，扶危助弱，出私积以立学校，掷钜款以惠灾黎。复严教子弟紧守教规，专务德行，概以谦和待人，万勿恃富傲贫。此地期年，村人被化者颇多。翁乃语人曰：‘吾以多半生陷于此途，未事真主。乘此残馀之年，安敢不努力补赎前愆乎？’故虽风雨交加，泥泞难行，以有真味在心，行将与献弥撒大祭，得与仁爱大主结，乃合无上之荣幸、无上之珍宝，淋漓泥泞，何所惧哉？后因进教愈众，遂建堂于本村，上派司铎驻节于此。于是教务蒸蒸日上，大有广扬之象云。”

“圣教广扬(瘦鹤)”

庄严灿烂的天主堂巍然矗立，直薄云霄。洋洋盈耳的钟声、歌声、音乐声，音韵悠扬，听着令人肃然起敬。

公教友成千累万的走到公教宣讲室里。

一位公教友起立发言道：‘我教世主舍身成仁，博施济众。他那一种仁爱，普照五洲万国，(那)[哪]一国的人无有不崇拜我主的，无有不信仰我主的？我主的真爱深印在五洲万国人民的脑海中，作救世之明星，为济人之宝筏。我主的精神，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千秋万世，不可磨灭。这个真爱，可以化导政俗，消弭纷争，并且将来要把一切苦恼纷扰的环境渐渐从根本上打破，同臻于光明正大之域。这个善果，就是欧美近日朝野名流提倡的世界大同，也就是国际联盟最后一个美满之日了……’众鼓掌。‘教友们，我们幸为公教教友！我们幸为今日中国之公教教友！我们更幸为今日中国一月间有六主教得膺荣任的千载一时之公教教友！我谨薰沐顿首，希望我中国的教友们急起努力于推广圣教的工作，急起努力于宣扬圣教的运动……’众大鼓掌。‘这个责任，我们从今天起，大家都应当绝对的担负。将来我国教务自然比今日要发达十倍，也就可以仰副罗马宗座殷殷垂注的盛意了。’说到这里，大声雷动道：‘圣教万岁！’……‘罗马宗座万岁！’……‘中国主教万岁！’”

1927年 民国十六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雷鸣远》载：

“十六年，应河北安国孙德楨主教请，再度来华。公以谋教会完全适合国情，必自改造修院教育始，爰立耀汉(男)德来(女)二会。会士皆以兄弟姊妹相称，会首称家长，亦称公仆；入会者均废本有姓名，公自号‘万桑兄弟’。悬九字为祈向曰‘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更揭槩其终则曰‘打倒我’。而会士之训练，则区[分]为精神、技能、社会、生活等四类，并以各尽所能、自给自足为准绳，设印刷、缝衣、编织、木作等部，而以余力办周末施食会，及平民学校、盲人院等。”

天津宗教界编史委员会《史料选辑》第十三辑宋乐山^①《从一些信件看司义芳^②的间谍活动》引用的天津教区法国神父司义芳自苏桥致遣使会会长罗(得)[德]芳的信函内容有:

1月4日:

“为处理在中国内地的不动产,现在来说是不是已经太晚了?我所指的还不是圣堂和厅房建筑,因为这些不可避免地必将被焚毁。……近来献县总堂下令清理河间及任邱两县的教会产业,仅仅范家疙瘩就变卖了二十顷地,被认为已然无用的许多公所也卖了,甚至有一个中国神父的本堂区也被取消,把一切什物都运走了。”

4月11日:

“此处并无很特殊的情况,只是开始有了这样的传说:北京北堂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将被驱逐走,本籍的神职人员都回家,将发生一个类似1900年(庚子年)的骚动。……这些传说从哪里来的呢?是教友们从外教人那里得知的。……知识分子们(数目字还不大清楚)都秘密地报名参加南军,有的教友也参加了,盼望因此而得到安全保护。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具体情况。……在我们当中,假设看到情势不妙,我马上将冯道博遣到天津首善堂。至于我本人,将勉力随从应付。我们还是希望这不过是一场虚惊。但提前做些准备,还是比较好的。”

5月11日:

“应当认清当前的革命爱国运动其趋势只有一天比一天高涨,决不是武力刺刀可以阻挡得住的。假设到了那个必要的时刻,我们已然没有那些物资的累赘(金钱、股票、珍贵物品都已运走),只剩下人员就比较容易脱身了。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也不至于为此地方成为很大负担。这都是很重要并且应该解决的问题。在大风险面前,应当晓得怎样应付。房屋建筑被焚烧,我们的教会会址被毁灭……

“您不要想我也在准备逃走,决不是的。我是在想做些什么妥善准备,准备将来再恢复已被摧毁的事业,必要时在另外的基础上恢复。到那时至少我们手中还有别的基础,就是‘圣乔治的骑兵队’(Cavalerie de A. Georges)^③。这样从遥远的地方还可以给那些尚留在苦难中的本籍的有关人员(神职人员)寄来金钱。假设有朝一日各情报站^④外国银行都关门倒闭,又当怎样应付此局面?这也就是我近三年来常与巴神父叨念的问题。这是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

“1927年夏,南军北伐。那年经过献县的南军有一位总指挥是孙良诚,师长是吉鸿昌。他们有几个伤兵,抬到天主堂医院养伤。”

1928年 民国十七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四章《遣使会北省的情形》载:

“一、正定教区

“……1. 正定有一座隐修院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文主教去罗马向圣座述职,遇到苦修会的总会长,他有意在中国建立第二座隐修院;于是文主教由法国写信给他的副主教巴国范(Baroudi),说自己有意将近来廉价买人的河边一大片土地送给苦修会总会长,以建立一座隐修院。

“既然是赠送,事情就很容易地解决了。几位杨家坪苦修会的隐修士来暂时住在此地;它离正定二公里,乃建造需要的房屋。他们曾遇到很大的困难:工程已进行到相当地步,忽然大水,使前工尽费;水

^① 同96页注^②。

^② 司义芳(H. Ceny),遣使会士,1908—1929年间任涿州总本堂神甫。

^③ 译者注:法文成语,指经济力量。盖英国奉圣乔治为主保,“圣乔治”即指英国,而英国作战善于以经济力量制胜,视经济力量为一只劲旅,故有此成语。

^④ 译者注:指账房。

退后,先当筑堤以防御大水,然后再继续工作。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新隐修院落成,名神乐院,为二级隐修院,属杨家坪隐修院管。

“正定教区因军队来往曾受其扰乱,因为正定正当其冲,主教公署被占数月;外边的传教士因军队占据,也受了损失;虽然如此,教务正在进行中。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正定教区有八万七千一百六十八名教友,十八位客籍神父,五十七位国籍神父。”

“七、刘士杰为永平辅理主教

“永平武致中(Guerts)主教因年龄关系,请圣座任命一位辅理主教。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七月十六日,刘士杰神父被任为高南的名义主教,及武主教的辅理主教。

“刘士杰主教(Lebouile),于一八七八年二月七日生於荷兰吕蒙特教区,一八九七年九月六日在巴黎进遣使会,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升神父,九月十七日抵中国;他曾传教,作账房、小修院院长及副主教。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永平主教座堂,刘士杰由武主教手中接受了祝圣典礼。”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十四《二十世纪的中国天主教》载:

“中国人自己也创立了两个男修会:一个是一九二八年在安国成立的,定名‘圣若翰保第斯大小兄弟会’,一个是一九三〇年在宣化成立的,定名‘主徒会’。”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的回忆》载:

“我回国后,先在小修道院教拉丁文,后又在大修道院教授哲学。到了1928年秋,除教授哲学外,我还管理大修道院(当院监)。”

1929年 民国十八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四章《遣使会北省的情形》载:

“一、正定教区

“……2. 第一次划分:赵县

“文主教看见国籍神父年年加增,就请罗马圣座将教区划分,由国籍神父管理新教区;为此他选了教区中最好的赵县,此区教友的组织颇为完备。

“罗马圣座以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的诏书立了赵县监牧区,任张弼德为监牧;六月四日,文主教将新监牧安置在边村,它将成为新教区的中心。

“张监牧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正月八日生於宁晋县小营里,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正定升神父;先在小修院教书,后来传教,成为柏乡的总铎。

“划分教区时,赵县监牧区有二十位神父,都是本监牧区人,三万一百九十八名教友,三百零三个堂区,三十六座大堂,九十八座小堂,四十座道理厅;在栅栏大修院有九位大修士,在正定小修院有六十位小修士。

“由此可见这区的圣召众多,因为大多数为老教友;十七世纪时,最初的耶稣会士已来此传教。”

“十、东闾朝圣

“……保定东南廿五公里的东闾村,人口四千五百名。同治二年(一八六三),遣使会士刘永和神父传教热心,口如悬河,使许多村庄听到福音;十年后,东闾有二百教友。林懋德时为青年传教士,在东闾住了一年(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在东闾他开始了传教的新方法,即在研究教理时供给膳宿。林神父离开东闾时已有六百教友,他常记得这个方法。

“从此时后,东闾有常住的本堂神父,成为保定教区教务发达的堂口。

“庚子年(一九〇〇)拳匪之乱时,附近的教友约九百名都至东闾避难。他们被围四月,与拳匪交战四次,与拥护拳匪的军队交战四十四次。他们曾以突击方法抢了大炮及其他军器,常打胜仗,只有廿余人遇难。

“我们已提起过在中国北方教友与拳匪交战时所发生的奇迹。东间被围困时，外教人见一位白衣妇人在堂顶上。但无论如何，教友都相信被围时得到特别保佑，是因着圣母的转求。

“被围困时，教友没有时间筑坚固的城墙；太平后，东间及附近的教友一面依赖圣母的助佑，一面实行这句格言：‘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乃筑了一座高高的土墙，在村周围掘了一条深沟。他们做得对，因为自民国十七年保定及附近的地区成为战场，每次乡民都带细软物件逃至东间。如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北伐时，东间曾有教友及教外人难民三万名，皆免于破坏、抢掠。

“……光绪廿七年（一九〇一），拳匪之乱刚平息后，本堂任道远（Giron）神父开始利用庙宇的材料建筑了一座大堂，请画师画了一张图画，东间本堂穿着小白衣，在圣母前将所建的圣堂献给圣母。

“光绪卅四年（一九〇八），继任人孟雷诺（Flament）神父见教友热心恭敬圣母，乃请林主教准用下面字句：‘天主之母，东间圣母，为我等祈。’此后教友在堂中念经后，在圣像前三次高唱这句经文。

“教友喜欢这像，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更美丽的像，但实际上它却很平常。孟神父想画一张更美丽的像，以表现圣母的美丽，于是他与上海耶稣会神父的绘画馆接洽，将慈禧太后朝衣的照片给画馆的主任，告诉他自己的目的。

“这幅画十分成功，三公尺高，二公尺阔；将图画挂在祭台后面。教友见后，惊奇不置，因系中国画，他们非常喜欢它。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柯来盟（Clement）神父在北京月刊中写说：‘从各方面来函，教难时期中教友及教外人投奔东间圣母，热切祈求她；是天主的安排使东间成为朝圣地。’

“大家议论纷纷，戴牧灵（Tremorin）神父已任东间本堂十四年，久已有此意。宗座代表，许多主教及神父都希望东间成为朝圣地。

“一决定后，乃选了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五月七日为朝圣开始日。下面是记述：

五月六日，天津的文贵宾主教、保定的满德貽主教一同乘车来到。学生及教友至村门欢迎二位主教。奏军乐，开始游行，一路唱歌、念经赞美圣母。下午二点，七十五名小修士由院长林客鸾（Erkelens）率领步行来到，教友亦到齐；三十位神父也在场，其中一半去听告解。

四点，安国的孙主教与教友代表来临。教友由本堂率领从各处而来，为数三千余人。晚间六点，满主教主持大礼圣体降福。

五月七日八点半，保定满主教唱大礼弥撒，游行入堂；三百多名男学生拿着旗子开道，然后修士，最后神职界穿着白衣，大家唱圣母祷文，各处秩序井然，到处严肃；大家在主教后平安进入堂内；大家站着，因为没有座位，参礼者约四千人。

林客鸾神父率领修士唱经、福^①音后，文贵宾主教讲道，赞扬圣母。

堂内没有大客厅作为膳堂之用，主教及神父就在走廊用膳；为教友搭了一个帐棚，可容一万人。午后三时左右，在露天台上，四位神父给大家讲朝圣的意义。六点开始圣体大游行，有二座临时祭台，以作停放圣体之用。

十字架在前面，辅祭者、音乐、若瑟修女会学生二百八十名及男女教友四人一排。不参加游行的人则在路二边。

五月八日，文贵宾主教唱大礼弥撒，安国的孙主教带着信心劝教友爱慕耶稣及圣母。早餐后，主教在朝圣册上签字。

“戴神父说，这年尚有四次朝圣，人数比第一次更少。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东间的本堂写说：

今年我们有十三批朝圣的人，参加者有三位（王）[主]教、六十五位神父、二万五千教友，由正定、赵县及耶稣会的教区而来；为此一位法国传教士对我说：‘如在露德一样。’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五月二十八日他又写说：

^① 疑前面缺一动词。

我们有三位主教、百餘位神父、四十座本堂打发了二万教友。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

有三位主教、一位总修院院长、八十位神父、一万八千教友,圣体游行十六次。

“可惜,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中日战争爆发。东间的本堂说今年不举行朝圣;我们说不但今年不举行朝圣,后来几年亦不举行。最后一次朝圣是民国(二)[廿]六年(一九三七),以后就没有举行过。”

《献县天主教志》第一章第三节《教区的划分》载:

“1929年,从献县教区划出永年、曲周等10个县成立永年教区,由非会士中国司铎管理。首任主教为崔守恂。”

1930年 民国十九年

《中国基督教史纲》第十五章《道光以后天主教的复兴》载:

各修会来华工作表^①

年份	会名	传道地点
1842	耶稣会(重来)	江苏、安徽、河北东南部
1858	密良外方传教会 ^②	河南
1865	圣母圣心会	蒙古
1883	苦修会	河北杨家坪
1925	本雪尔凡尼的本笃会	北平
1925	印五伤司铎会	河北易县
1928	圣若翰保第斯大小兄弟会	安国(华人自立)
1930	主徒会	宣化(华人自立)

《西湾圣教源流》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牧》第二节《方、蓝、石三位主教的建设事业》载:

“一九三零年,用拆毁旧大堂底材料建设一所公学院于旧大堂故址。至一九三七年,公学院与修道院合并一处。一九三八年公学院底房院先作圣心婢女会底初学院。”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俄国东正教传入天津前后》载:

“三、天津东正教会的建立

“……1930年,中国人大司祭常锡吉,即常福(其父(正)是北京东[正]教会神职人员,出身于宗教家庭)在天津创立了中国第一所中华东正教会祈祷所,名为‘伊诺肯提乙’教堂。常福大司祭因是中国人,所以在宗教祈祷中和讲道中全部用中文进行,并组织了由中国人为主的教堂管理会。当时中国教徒都到这个教堂参加宗教活动。另外一批数量可观的俄国穷教徒也到这个教堂进行宗教祈祷活动。”

《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三编《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第八章《天津教区和新疆教区》第一节《天津教区》载:

“公元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大批的俄国流亡人员到达天津。公元1920年,巴维尔·拉祖莫夫大司祭在天津建立俄罗斯正教会。公元1922年,巴维尔·拉祖莫夫大司祭离天津去美国后,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大主教派遣修士司祭维克托尔到天津主持教务。公元1929年,可

① 不属于本书范围的地区不录。

② 即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

以容纳三、四百人的‘圣母’大堂建成,维克托尔也于该年晋升为修士大司祭。公元1930年,天津教区建立,它辖有:‘圣母擘幔’大堂、‘圣英诺肯提乙’教堂、‘圣尼古拉’教堂、‘圣谢拉菲姆’教堂、‘圣众’教堂等五座教堂和一所俄国医院,以及俄国小学等机构。这一年,在天津教区中发生了一件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史上,可以说是不平常的事件。当时,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的一名大司祭常××,宣布脱离‘北京总会’管辖,在天津建立了自办的‘天津中华东正教会’,并于天津郑州道(今胜利路)一号建立了一个祈祷所,附近不少中国籍居民成为这个祈祷所的慕道人,其中的一些人不久就接受了洗礼。这一事件引起了当时担任天津教区修士大司祭的维克托尔的嫉恨。他出于一种仇视的心理,故意把设在海河以东的俄国养老院迁到临近郑州道的上海道,并且在养老院旁设一个祈祷所,派常住本堂的司祭主持这个祈祷所的宗教活动。但是,维克托尔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影响大司祭常××主持的‘天津中华东正教会’的发展,中国居民中的东正教信徒几乎都到这个祈祷所去进行宗教活动。一些俄国侨民在教会的神职人员煽动下,竟在大司祭常××到郑州道一号来主持宗教仪式时,进行各种破坏捣乱活动。可见当时这个自办的中国东正教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的存在和自立的困难程度。”

《中国基督教史略》第十章《中国基督教传教事业的繁荣时期(1901~1937)》第三节《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的复兴》载:

“三、中国基督教新教的教育事工

“……教会除兴办各种大、中、小学校进行正规教育外,还致力于扫盲性质的平民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30万华工被派往法国战地去工作。这些华工多数来自山东农村,文化程度很低,文盲很多,他们连家信都不能读,更不会写,再加上语言障碍,在生活和感情上都很难。因此,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发起旅法华工青年会,征募了50余名留美中国学生如傅若愚、晏阳初等到法国去专门为华工服务。他们发现华工们急需教育,于是开办夜校、举行演讲会,出版周报,主要教华工识字、写信。这项工作成为后来国内平民教育的开始。1921年,傅若愚、晏阳初先后回国,即致力于平民教育……

“与平民教育运动相配合,1930年4月24日至5月10日,全国基督教识字运动研究会在平民教育运动工作卓有成效的河北定县召开,有来自全国11省的90多位代表参加,其中女代表25人,会议两周。第一周先参观了定县平民教育的实况,然后研讨识字运动本身的各种工作,如千字课基本单词的选择,教学方法,课程安排,义务教师的聘请,招生办法,学生的管理、考试等。会议对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的四项方针——攻愚、攻穷、攻弱、攻私——极表赞成,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

1931年 民国二十年

《西湾圣教源流》附表(四)《自圣母圣心会接理蒙古教务以来所有代牧和副主教的史略》载:

“南怀仁司铎:南公怀仁(T. R. P. Th. Verbist)系比籍人,一八二三年六月十二日生于安特卫普(Anvers)。于本城耶稣会公学及美林(Malines)小修院肄业。一八四七年九月十八日晋升铎品,本年十月十六日升为美林小修院的学监,一八五二年或一八五三年在比京(Bruxelles)军官学校(武备学校)任司祭司铎兼那慕尔(Namur)修女院的院长,一八(十)[五]六年被选为全比国圣婴会会长。那时公已筹备着立圣母圣心会,随召集几位同志司铎,拟了会的简章,给美林府总主教寄去。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该府红衣主教司太可(S. Em. le Card. Sterckx)批准立会,亦选公为该会之总会长。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又经罗马圣部亦暂行许可。一八六四年九月一日宗座颁谕将蒙古区托与圣母圣心会管理。会祖南公和数位同志于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美林府红衣主教前发了初次圣愿。一八六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南公从斯哥德(Scheut)起身赴罗马,受宗座委赐蒙古教区副主教之职权。本年九月十九日,即由玛塞海口起程来华,十二月六日安(底)[抵]西湾子。公于西湾子除整理教务外,尚兼理修院。一八六八年二月三日巡阅教区,于本月二十三日即寿终于关东老虎沟。一九三一年,将公的

遗骸移回比国,葬于本会母院堂中,在坟^①立了公的一尊体面青铜站像。”

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牧》载:

“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内,蓝公由西湾子赴张家口医疾。几天后,回至高家营堂,病势沉重,不多几天,竟溘然长逝(本年五月五日)。本处信众极痛悼蓝公底(促)[猝]死,五十个教友去高家营舁他底遗骸开追悼会;全村信众和男女学生好几天的工夫为他诵经祈祷。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宗座委石公德懋为代牧;石公在蓝公去世时已为会长司铎,在任代牧以前,也任副主教。葛、南、张三位主教于本处大堂行祝圣石公为主教底大礼,时在一九三二·四·一七。”

附表(四)《自圣母圣心会接理蒙古教务以来所有代牧和副主教的史略》载:

“蓝克复:(Mgr Evr. ter Laak)蓝公于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初五日生於荷兰国盖特力(Diedam)的尖塔村(Gueldre)。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斯哥德入会发[愿]。一八九二年四月初三日领受铎品。一八九二年九月十八日起身来中蒙古。初于修道院相帮卜院长神父。一八九五年去土木川传教,先驻于海留恩太。继于一八九九年,于二十家子作了区长司铎,管理土木川、后坝、代海等地。当年又升为西湾子的区长司铎。后自一千九百年到一九零二年做了西湾子的本堂。以后又到南壕堑立了一座公学院,专为栽培修道生。一九零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宗座颁谕,选公为甘南第一任监牧主教。一九一四年五月初一日,又被选为(玛塞道尼)巴米高包里府主教,当西湾子的副主教(有接西湾子代牧主教之位的权利)。当年十一月十五日在西湾子圣为主教,一九二四年即接任西湾子代牧方济众主教的位。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因了上海公议会)将自己的教区改名为西湾子教区。一九二九年二月初二日接了宗座的上谕,成立了集宁国籍神职班教区。一九三十年又接宗座上谕,将西湾子、集宁两区的分界画清。一九三一年五月初五日终于本区高家营子。”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四章《遣使会北省的情形》载:

“九、周济世被任为保定主教

“周主教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十一月八日生于正定小广扬村,民国四年(一九一五)正月廿四日在栅栏入遣使会,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六月廿九日升神父,先在正定作传教工作,然后回北平,就读于神学研究院,孟(电)[雷]诺(Flament)神父为院长,毕业后又回教区;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被任为栅栏哲学教授;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三月二十六日,他被任为格治亚的名义主教,保定的宗座代牧。

“七月七日,周主教与满德贻主教一齐至保定上任。

“祝圣典礼定于八月二日,但因军事及政治原因,乃将日期改变,因为交通可能断绝。曾向各处发请帖,请九个教区的领袖,七十位传教士。然而不久时局紧张,不能实行。

“当时内战正在进行中,阎锡山的军队已越过正定,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一)七月二十九日,在保定南面三十公里地方遇到中央政府的军队,乃交战。居民听到大炮及飞机的爆炸声,皆大惊失措。乡民由南而北走,时局紧张。周主教请该处传教士回到自己的(冈)[岗]位,他亦想将祝圣的日子后移,幸而听说七月三十日阎锡山的军队后退了。

“八月二日主[日]早晨八时,天气酷热,时局平静,乃举行祝圣典礼;由满德贻主教主礼,程有猷主教及易县五伤会会长马迪(儒)[儒](Martina)赞礼。不在战线内的传教士都来参加典礼,主教座堂内人山人海,若没有战事,人数还要多。

“教宗庇护十一世升中国主教的计划又实现了。但至此时,圣座给中国主教的教区大都为刚开教的新区。”

“保定成立宗座代牧区时,教务已相当发达,已有代牧区的主要事业。总而言之,这新教区的前途

^① 疑后面缺一方位词。

光明。^①

“民国廿年(一九三一)周主教祝圣时,保定代牧区的情形如下:

教友	七七八七六
客籍遣使会神父	一〇
国籍神父(其中遣使会士四名)	四九
在栅栏的大修士	二〇
西关的小修士	八〇
备修院	四〇
仁爱会修女(客籍七名、国籍八名)	一五
方济各传教会修女(客籍三名、国籍二名)	五
若瑟会修女	三八

第二十六章《抗战期中,北省的教务情形》载:

“四、正定的葛修女(Guerlain)

“……葛(Guerlain)修女于一八四一年生在法国加莱省圣阿梅城,幼时曾在乌苏林修女处受过良好教育。

“正定的宗座代牧戴济世(一八六九——一八八四年)请求巴黎总院(遣)[遣]仁爱会修女至正定教区,葛修女与五位同伴于光绪八年(一八八二)抵正定。传教士很乐意地将孤女交给她们,因为他们曾有过不少困难。在这孤女院中,一切当从头做起,葛修女尽力以赴,将它变成仁爱堂,一切慈善事业都逐渐办起来。……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五月十九日安然逝世。”

《献县天主教志》第十章《教会的事业(三)》第二节《高等教育》载:

“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高等学校呈报立案。鉴于‘大学’的规格为具备3院9系以上,该校自1933年3月起改名‘天津工商学院’。”^②

《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三编《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第七章《上海教区》第三节《上海教区神职人员简况》载:

“杜润臣,其祖先是‘阿尔巴津’人,俄国姓为‘杜比宁’,其‘杜’姓,系取俄国姓第一个音节为中国姓氏。该姓氏人口繁衍很多,杜润臣在族中按辈数排行,又名‘德七’。年轻时,曾在北京教会所属的印刷所公事房中挂名职员,不久取得神职,立为辅祭。公元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夕,曾到俄国彼得堡、莫斯科等地访问。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途经哈尔滨回到北京。当时驻北京传道团主教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风闻斐沃特(杜润臣的教名)与苏维埃政府有瓜葛(据传杜润臣曾去见过托洛茨基,不过,此事并不一定属实),下令禁止杜润臣进教堂。不久,杜润臣到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翻译官,每月能得官饷大洋百馀元。

“公元1931年,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都主教去世,杜润臣闻讯后即回北京,接着就到天津‘西奈斯基’教堂,在米哈伊尔·罗果仁大司祭手下担任辅祭。”

1932年 民国二十一年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十六《现下的组织工作和艰难》载:

“一九三二年间,天主教信友最多的区域,计北平区有二十六万五千六百三十一人,南京区有十四万九千五百八十六人,河北献县区有十万零六千八百八十七人。其他的区域都不到十万。信友在五万

^① 原注:保定代牧区的主教虽然是遣使会士,而教区则属教区神父。已在保定工作的中西遣使会士仍继续工作如前;戴牧灵(Tremorin)神父被任为会长。然而因死亡、调动,遣使会士的数字逐渐减低,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只剩一位国籍辅理修士。

^② 到1948年,该校已设有工学院、商学院和女子文学院共3院10系,遂于当年8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津沽大学”。

以上的,只有五区,就是:山东兖州区(九万七千三百)、河北保定区(七万六千二百四十三)、河北正定区(五万九千一百五十三)、江苏徐州区(五万五千五百二十六)和天津区(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九)。四万以上的有四区,就是山西潞安、浙江宁波、安徽蚌埠和河北永年。三万以上的,有河北安国、宣化和赵县……蒙古西湾子和绥远,……河南卫辉……等十八区……

“传教区中……华籍司铎最多的,是北平(一百零二)……和保定(五十一)。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一年中,新教友领洗最多的,是……献县(三万七千二百九十二)……和正定(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一)。比较信友们告解领主的勤惰,而知各教区中信友生活有最高标准的,是南京区。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的一年中……献县的比例:告解三八五——一次,领圣体一〇三九〇三四次。北平:告解三五一五八九次,领圣体七八〇八三一次。兖州、济宁、西湾子三区信众告解次数,约在二十万以上。……信众对于圣体圣事比较勤领的各教区,……如西湾子、绥远、香港和兖州,都在五十万次以上。

“各教区中,教育最发达的,是南京、北平、香港、汉口、兖州和天津。北平区内,共有男子中学校十处,女子中学校十三处,计男生一千一百八十六名,女生七百九十六名。……男童初级小学校最多的,只有兖州和天津两区,兖州二百五十三处,天津一百三十处。……教理小学校,要算献县最多(一千零六十九),其次是兖州(七百十二)、永年(五百二十二)和北平(五百十九)。读经男生最多的是献县(六千三百二十五),其次北平(五千四百四十九)、南京(四千九百四十六)和保定(四千六百二十);女生:献县(六千六百五十)、北平(五千四百四十九)、南京(四千九百六十三)和兖州(四千零二十三)。”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四章《遣使会北省的情形》载:

“一、正定教区

“2. 第一次划分:赵县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罗马圣座以诏书,将赵县监牧区成为代牧区。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正月十一日,张监牧被任为安底治的名义主教,及赵县的宗座代牧。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四月二十四日赵县的神父及教友皆乐也融融,因为这日在边村,他们的代牧将由文教和主教手中接受祝圣典礼,由安国的孙德楨主教及保定的周济世主教辅之;周主教与张主教是正定大小修院的同学。童蒙席(Antoniuti)代表刚总主教,许多客籍及国籍神父都来参加典礼。教友的数字,不易算出,只有十分之一能进入堂中,别人皆站在堂外;神父由警察帮助,勉强维持堂内外的秩序,唱经台因人数太多塌下,但无人受伤,只有风琴受了损失,弹琴者与风琴一齐跌下,足部受伤而已。”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十章《信仰》第一节《全县信仰概况》载:

“天主教自宁晋县传入定县。在1820—1840年间本县之东朱谷村大半皆为教徒。后大遭逼迫,驱逐教士,至今村人已无一天主教徒,但亦不拜偶像。后有董主教在1860年得恭亲王的帮助,准许随便传教。至1870年董主教死时,在正定府教区内,包括32县,已有教徒21594人,其中定县教徒有794人。1904年在定县之南车寄始建教堂。现在全县已有大小教堂42处,其中较大者为南车寄、会同、邵村、西建阳、大堡自疃、小召等处。目下本县教徒约有1100家、5800人,其中在城内者有36家、130人,在城外者散布于58村内。城内大教堂系在民国十八年建造,现有艾司铎,法国人,主持教务。此外有中国司铎1人、传道先生3人、守贞之姑奶奶1人。教友数目每年均有增加,贫家居多。全家人口或家主入教最为欢迎;妇女和少年不甚欢迎,恐其不能自由,半途改变。城内教堂设小学1处,学生四十余人。每遇兵灾时教堂热心收容妇孺,因此县人甚为感激。关于救济水旱灾祸及一切慈善事业,教堂均极力合作,因此村民往往因为要得便宜而愿入教。例如民国三年孙发绪强迫各村设立小学时,城东报名学道者忽增万余人。他们希望借教堂势力不办学校。后因艾司铎不随彼等之愿,结果真正教徒只馀五、六百人。关于经费的来源,从前大半出自法国,欧战以后多半来自美国。教堂现在每年经费约二千元,其中自本县教徒捐助者约百元左右。农村中各小教堂每年自教友所集捐款至多约七、八十元,至少二、三十元。赵县的天主教堂已能自立,而定县教徒颇贫,离自立的程度尚远。

“定县基督教公理会成立于1901年,为保定公理会之分会。现有孙牧师主持会务,外有布道员2

位。县内共有乡会13处,每处有聚会地点、职员及至少教友10人。全县共有教友525人,其中男子315、女子210。城内有36家48教友,城外320家、477教友。教友分布于58村内:第一区有6村,第二区7村,第三区9村,第四区26村,第五区1村,第六区9村。民国十七年该会曾设立平民学校5处,教友多系识字者。目下每年经费约一千二百元。每年每教友捐助会款五、六角。

“定县救世军为北平总司令部之一区部。城内北街有会堂1座,正副队长各1人。队长为一西人。全县内教徒共计四百左右。

“西关有神召会,亦为基督教之一派,有一瑞典牧师主持会务,外有布道员1人。现尚无会堂,租民宅办公。”

1933年 民国二十二年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十章《中国圣教史——自鸦片战争至今日》载:

“教皇本笃第十五世及庇护第十一世关于中国传教之通牒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教皇又在罗马祝圣第二批三位国籍主教,即河北集宁樊恒安主教,永年崔守恂主教,及四川雅州李容兆主教。”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雷鸣远》载:

“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马相伯先生倡不忍人会援助抗倭将士,登高一呼,捐资捐物者颇不乏人,而实行捐身者惟公与所率二百馀义士而已。二十二年春,长城战起。四月二十日,公立不忍人会分会,率子弟及教友六百馀人,组救护队工作于喜峰口等处凡半载。七月,出遣使会。”

《西湾圣教源流》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牧》第六节《西湾子总堂下榻名客》载:

“集宁国籍教区主教张、樊二公由罗马圣主教回来,都来过西湾子。一九三三年九月内,樊主教被宗座祝圣主教以后,他返梓西湾子,被同乡父老热烈欢迎!”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四章《遣使会北省的情形》载:

“一、正定教区

“3. 第二次划分:顺德

“波兰遣使会士亦有意至中国传教。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波兰省的省会长,遣了几位神父至浙江宁波及正定,希望有一天,波兰省能有传教区。

“这年先在巴西传教的葛乐才(Krause)神父与高司基(Gorski)神父来至正定。二年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又来了五位波兰遣使会士。文主教派葛神父为顺德区总铎,使能成为独立教区。以后数年,许多位波兰遣使会士来顺德帮助传教。

“顺德区以组织而言,没有赵县完备。这区的教友很穷,且奉教未久;但波兰遣使会士热心传教,不久,就将情形改善了。他们中有一位宣尉仁(Szuniewicz)神父,是医生及眼科专家。在中国,眼病很普遍,于是宣神父在主教府成立了诊疗所,开始医眼病。他真是华佗再世,着手成春,因而来就医者日众;他乃培植中国护士,为帮助自己治病,学成后,就至乡村医治普通的眼病,宣神父自己专医比较复杂及困难的病;几位神父由他培植医眼病,帮助他工作。

“波兰神父医治教友及外教人的眼疾而不收费,得到人民的景仰及爱戴,有助于他们的传教事业。

“他们亦请了波兰的仁爱会修女,她们作慈善事业,对传教亦有裨益。她们在顺德建立了一座新式医院,病人趋之若鹜……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罗马圣座立顺德为监牧区,任葛乐才神父为顺德第一任监牧。

“葛乐才(Krause)于一八九六年六月九日生于波兰米哀纳地方,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八日在波京克拉哥维城入遣使会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升神父。至中国前,曾在巴西传教十年。

“成立监牧区时,顺德有一五二四〇教友,十二位各籍神父,四位国籍神父。

“以行政而言,顺德管辖九县。”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俄国东正教传入天津前后》载：

“三、天津东正教会的建立

“……1933年，常福大司祭通过日本东正教的都主教谢尔吉(Митрополит Сергий 苏联籍)与苏联东正教会联系，承认了莫斯科教廷。……北京东正教总会自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一直不承认莫斯科教廷，而承认沙皇俄国在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流亡教廷。天津东正教会的维克托尔和在津的白俄流亡分子也承认塞尔维亚流亡教廷。就在这时期，维克托尔又被塞尔维亚流亡教廷升圣为主教，这就必然地形成了与常福神父的对立，他们称常福创立的中华东正教会为‘红党教会’。……当维克托尔升圣为北京东正教总会主教后，常福也不承认他。常福这一行动受到当时的中国教友和一部分俄国教友的支持，所以常福主持的中华东正教会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为中国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教会组织。天津的‘伊诺肯提乙’教堂一直以中华东正教会自居，这座教堂的历任司祭都是中国人，继常福之后，有芮宪章、杜润臣、杜立昆等人。

“东正教在天津逐渐扩展，增建教堂，教徒人数也不断增多。1933年在英租界三十二号路(今上海道)东莱里的俄国养老院内成立了一座‘谢拉非木’教堂。1944年，将原来位于英租界十一号路(今建设路)的俄国侨民俱乐部的健身房改建教堂，名为‘圣尼古拉’教堂^①。另外，将河东大直沽后台俄国坟地内的灵堂建成教堂，名为‘圣众教堂’，除为教徒举行殡葬礼之外，每年复活节瞻礼后举行为死者诵经仪式。

“天津东正教会先后增设到五所教堂。因天津地处交通要冲，工商辐辏，所以流亡到中国各地的白俄不断涌进天津，这就使东正教徒人数大增。再加上中国、希腊和其他国籍的教徒，天津东正教教徒最多时达到5000余人，其中中国教徒只有200人左右。教徒进堂人数最多时期是在1929年至1939年之间……

“每到东正教的大瞻礼日，俄国教徒男女老少都来教堂参加宗教礼仪和祈祷活动。俄国人的生老病死和婚配等均以东正教的礼仪进行，另外他们也过自己的民族节日和举办郊游等。东正教堂的堂长、兄弟会员、妇女会员也都从俄国教徒中选举产生。这就形成了以东正教为主的在津俄国人的小社会。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内容、生活来源、生活习惯，在天津生活了几十年。”

1934年 民国二十三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雷鸣远》载：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人自立耀议会，发圣愿。三月，宋哲元将军请公设残废军人教养院，慨然允之。款不足，则自为筹措。四月迁北平清河镇于庄，又建农场，命名八德村，取《圣经》真福八端意也。”

(《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的回忆》载：

“在我管修道院的期间(1928—1934年)有一件事值得叙述，就是从1931年到1934年夏，我兼任过天津工商学院的校长，另称法定校长(Director Legalis 这是工商学院拉丁文日记上写的)。所谓法定就是有名无实的意思。因为那时在学院真正掌握大权的人，是法国教士尚建勋等人。他们叫我做法定校长(一般说“名誉”校长)是出于不得已。因为那时工商学院正在筹备立案。南京反动政府要的先决条件是校长必须是中国人。……第二年(1934年)他们就把我换了，另请了一位土木工程师华南圭先生替了我当校长。”

^① 后文又载：“1944年，天津俄侨俱乐部改为东正教堂时，西奈斯基为纪念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将这座教堂命名为‘尼古拉圣堂’。并特请哈尔滨东正教会内的一位专画‘圣像’的女修士画了一幅大‘圣像’，把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七口的圣名‘圣人’全画在一起，以怀念沙皇，并把这个大‘圣像’放在堂内显著的地方，装饰着特制的大像框台，上边刻着沙皇一家人的名字和帝俄的三色国旗。”

1935年 民国二十四年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1927—1949)》第一编《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与十年内战(1927.4—1937.7)》之《文化》(二)“[九]宗教团体·(二)各省宗教概况”载:

“6. 天津市各宗教团体概况(1935年6月)

“……丙:天主教及耶稣教等团体,共三十一处,均皆以宣传新旧教义、兴办公益慈善事业、普救世人为宗旨。其组织范围较大者,或采监督制,分组办事;组织范围较小者,仅由主管人与执行部办事而已。其经费来源,或由各国接济,或有总会拨发,或由信徒捐助,情形不同,兹附表如左:

天主教团体一览表

区别名称	主管人	经费	兴办事业	信徒人数	地址	备考
仁慈堂	于良芳 (比国人)	各国捐助	养老院、育婴堂 及施医院	110	东浮桥南洋 货街	
望海楼	狄允让	西开教堂	淑贞女校及	6000	河北望海	
天主堂	(法国人)	拨助	诚正学校楼胡同			
天主堂	王宗劼 (宝坻人)	望海楼堂 拨助	无	350	西于庄大街 十号	
堤头村	李树林	教徒捐助	诚正第二校	33	堤头村富乡	
天主堂	(文安人)	胡同二号				
天主堂	贺德惠 (北平人)	总教拨助	义务学校	255	纪家庄教堂 胡同	
天主堂	贺德惠 (北平人)	总教拨助	无	300	贺家口经堂 后十号	
俄国教堂 克四根	则德年布 (旧俄国人)	教徒捐助	无	990	特三区第三 公园内	查俄国教堂为东正 教,系天主教之支 派,故附于此。

耶稣教团体一览表

区别名称	主(管)[管]人	(验)[经]费	兴办事业	信徒人数	地址	备考
福音堂	王约翰 (吉林人)	教徒捐助	无	100	西头如意巷前 街	
福音堂	张允喜 (天津人)	总教会拨	无	100	东马路	
福音堂	陶雅亭 (武清人)	自行筹办	培道小学	35	同善胡同一号	
美以美会	纪薪传 (玉田人)	总会拨助	汇文小学	196	西门内大街	
真耶稣 教会	范子贤 (天津人)	教徒捐助	无	80	官银号后身	

区别名称	主(管)[管]人	(验)[经]费	兴办事业	信徒人数	地 址	备 考
美以美会	李秉元 (天津人)	总会拨助	无	双街口 四四号	人民临时听讲, 故信徒无定数。	
真耶稣 教会	孙宝琦 (天津人)	教徒捐助	无	400	宁家大桥西怀 庆里三条	
中华基督 教会	余聘之 (天津人)	教徒捐助	无	610	鼓楼东仓门口	
中华基督 教会	杨悦斋 (天津人)	总会拨助	公益小学	181	鼓楼西大街三 十五号	
中华基督 教会	李在一 (北平人)	教徒捐助	平民学校与医院	80	河北沈王庄	
基督教会	张麟全 (北平人)	英人购造 并拨助	平民学校并 设眼科医院	30	河东小关医院 胡同	
中华基督	魏振玉	美国人	平民学校	80	第二公园北	
教公理会		接济	乡间小学 义务医院	210	便门对过	
华北基督 教公理会	陆文泉 (天津人)	总会拨助	西沽小学	500	西沽龙王庙东	
中华圣公 会救主堂	何质夫 (河间人)	教友捐助	无	250	特一区营盘路 一号	
天津圣经 学院	文垣德 (美国人)	中美教徒捐助	无	59	特一区汉口路 十三号	
基督教复临 安息日会	庚复光 (北平人)	北平总会拨助	三育小学	140	晒米厂小马路	
一位神召 会	刘席斋 (天津人)	自筹经费	无	50	宁家大桥西怀 庆里四条	
神召会	鲍乐道 (美国人)	教徒捐助	无	200	大经路七十六 号	
青年会	陈锡山 (天津人)	教徒捐助	电台夜校	250	东马路	
救世军	张蕴琦 (通县人)	北平救世 军援助	无	9	永宁大街十八 号	
救世军北 队	王记名 (正定人)	北平总队援助	无	37	城内府署大街 十号	
救世军	雷克森 (英国人)	万国捐助	无	200	南门西马路	
救世军支 队	蔡青田 (北平人)	总队拨助	初级小学校 及施医院	180	特二区柴家大 坟八号	
救世军	王文忠 (北平人)	万国总部助款	义务小学	133	特三区大玉庄 九纬3	

《西湾圣教源流》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牧》第三节《西湾子村的茔地》载：

“在圣味增爵会来西湾子村以前，本村教友们在后山坡上设有一块茔地，亡的司铎和教友都葬埋在这茔地里。这块茔地俗名曰圣地梁。在这茔地内，不止有味增爵会司铎底墓子，且有本会底四位司铎与一位华铎底墓子和碑碣，就是：

- (一)白司铎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八七五年，住中蒙古数月。
- (二)黄司铎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八八四年，住西湾子一年。
- (三)赵司铎伯多禄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八九一年，本村本堂。
- (四)陶司铎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零零年，西湾修道院院长。
- (五)赛司铎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零一年，本处领账司铎兼婴孩院院长。

“迨至西堂落成，即择定那堂左右隙地作为司铎和修女底茔地。如今有两位主教、十二位司铎安葬在那里，即是：

- (一)方主教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二四年，中蒙古代牧，在任〔二〕十六年。
- (二)蓝主教 终于高家营，时在一九三一年，任中蒙古副主教十年，主教七年。
- (三)邢司铎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零三年，本区区长和公学院院长。
- (四)潘司铎 终于白桦沟，时在一九零八年，传教于高家营。
- (五)董司铎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零八年，总堂领账司铎。
- (六)戴司铎 终于棋盘梁，时在一九一零年，西湾周围传教。
- (七)董司铎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一三年，住中蒙古数月。
- (八)阎司铎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一四年，传教于西湾子。
- (九)高司铎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二四年，住中蒙古数月。
- (十)樊司铎 甫“广益”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二五年，白桦沟本堂。
- (十一)高司铎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二六年，高家营副本堂。
- (十二)白司铎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二六年，高山庄本堂。
- (十三)戴司铎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二九年，西湾周围传教。
- (十四)张司铎 甫“维祺 雅各伯” 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三五年，住西湾子三十六年，著书流行全国，素负盛名。

“还有八位方济各会修女，就是：

- (一)玛利亚公撒格，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零九年，西湾子方济各修女院第一任院长。
- (二)玛利亚巴尔多禄茂，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一零年，西湾子方济各会修女院第二任院长。
- (三)玛利亚保但济亚，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二七年，西湾子方济各修女院第四任院长。
- (四)玛利亚高勒达，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零九年。
- (五)玛利亚罗西纳，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一四年。
- (六)玛利亚哈勒城圣母，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一五年。
- (七)玛利亚衣尔木，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一九年。
- (八)玛利亚衣肋玛纳，终于西湾子，时在一九三四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雷鸣远》载：

“二十四年，绥远战起，公撰为《实际的》一文，勉国人实事求是。十二月一日，傅作义将军聘公为最(为)前线救护队队长，组担架队四百人效力于玫瑰营子者三阅月，出入炮火，奋勇异乎寻常，号已死队。公出征日，适值除夕，或劝稍待，公怫然曰：‘前线惟二种人：或卫国，或盗国。卫国者身有殉职之虞，但灵魂更不可不救；盗国者出卖灵魂，更不可不救。抢救灵魂，急于星火，何能稍延？’”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的回忆》载：

“自1934年夏，我离开修道院，被调到耶稣会院当理家。第二年(1935年)夏，又被调往河间当总本堂，兼任河间城内教会学校的校长。”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一册《尚村一百六十七人致命始末》载：

“商家林为献县、河间两县交界之重镇，居民不下千户，商业非常兴隆，数百年以来未闻有奉天主教的。庚子年教民惨遭杀戮之情形，该村之人或亲眼目睹，或得诸传闻，皆知之甚悉。以常情而论，该村之人当以奉教为危途，一闻‘天主教’三字，必皆掩耳疾走，避之惟恐不速，孰肯报名入教自招杀身灭族之巨祸哉？乃自近二、三年来，商家林镇上竟有真心向化，决意奉天主圣教的，且不但三家两户矫情立异，兹于民国二十四年统计，领过圣洗的已有四、五十名之谱，望教保守者更多不啻数倍。教务蒸蒸日上。”

《献县天主教志》第五章第二节《人物简介》载：

“桑志华(E. Licent 1876—1952)，字泽民。法国科学院院士。1895年12月12日入耶稣会，1914年3月31日到献县，1935年回国，在华22年。曾从天津出发考察，向北走遍天津周围滦河、白河(海河)、子牙河流域，到张家口、内蒙古；向东北到过辽河流域、辽东半岛，抵大连，还去过哈尔滨；向西到过大同、太原、西宁、兰州、青海和西藏东部，行程达4.5—5万公里。采集地质和古生物标本数十万件。出版过两部专门论述考察成果的书籍，其中《十年工作报告》一书获得巴黎地理学会颁发的斐利克斯付尔聂奖金，作者亦因该书而荣获法国政府授予的第五等功勋奖章。曾任黄河——白河自然历史研究所所长兼北疆博物院院长。”

1936年 民国二十五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六章《抗战期中，北省的教务情形》载：

“五、民国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一九三五——一九三六)仁爱会修女在中国的事业

“……仁爱会修女在中国只有一省，她们的省院在上海，属耶稣会士。……修女则分在遣使会二省中。她们的会院及事业分散在十三个宗座代牧区中，是：

“北省：北平、天津、保定、正定、顺德及永平……”

《西湾子底公教慈善事业》第七节《西湾子底公教慈善事业》载：

“在本处底慈善事业里，方济各会修女占首位；她们明白黑夜用最大的仁德操心那大婴孩院。那些婴儿来的时候最可怜，但她们入院后受底教训也最好。五十年来，有好几千婴儿在孤儿院中得领圣洗；遇有荒年，屡次有穷人抱着她们的婴孩儿送交院中修女们教养。这些修女爱德的好表样也屡次感动本村信友底心，至于有若干家信友收养婴儿为他们底义子义女。

“修女院中也设了舍药施诊所。每天午后，有可怜的穷病人到修女院求药品及医治；修女们也屡往民户去看病。每年正月初五日，修女院给穷人过大年，就是给他们预备一顿好饭，叫男女老弱穷人和残废的教内教外人等来吃。

“有本村底贞女也立下爱情的善表，尤其对于收养老人。初，本处没有养老院；一九零八年于高家营设立一处养老院，这样本地方外教老人求养老，都得去高家营，很感不便。以后西湾子有一位张姓贞女，圣名罗撒，她立志收养本处穷困老人，遂于一九二九年收容一伙老人成立养老院，有别的贞女也来相帮院务。至到如今，有好些老人，都平平安安地在那院中养老。他们初来是外教人，以后看了别的老人的善表，慢慢地也领洗入教，生前善度余光，死后得享天福，真是极便宜的事啊！

“本村教友也多行哀矜，故此远近穷人多有投奔这里来讨食。他们知道谁肯施舍，就不断的上那家门口上去讨饭。

“去年本村过头一次谢庄户瞻礼。公教进行会沿门去为穷人讨哀矜，劝地户行善功以表谢主爱人之心。过瞻礼的时候，主教降福五谷，以后公进员把祈得哀矜施于穷人。”

第八节《西湾子底神修事业》载：

“(一)教友对于圣体圣事底热爱。据一八九九年教务统计表，西湾子村计一八四二教友，一年内领圣体数目计一四五四六次，修道院和孤儿院底圣体还不在于内。教皇比约第十颁行谕旨劝勉教友多领圣

体,并准许儿辈领圣体,以后领圣体底总数在本堂一年比一年多。一九零八年计教友数目为二三九五名,领圣体底次数为八四九五六次。于露德圣体大会(一九一四年),有人另外赞美中蒙古教区说:‘在中蒙古教区,就是圣母圣心会传教区,方(齐)[济](家)[众]为代牧,领圣体底人一年比一年多,其总数在全世界为最大底总数。’以上是一九一四年的记载。若查一九三六年份统计表,就有二零二八教友,一四二五三五次圣体。所以如今领圣体底人数和次数比以前又加增多多啦。

“儿童辈为领圣体没有限制,不过是在大堂内他们常亲眼见了大人底表样。教师也每年操心儿童底圣体和儿童开圣体底日子,这一日,为校内校外儿童都算过一个纪念日,也仿佛一个瞻礼:男儿穿著洁净地大袍子,女儿不但著大旗袍,还头罩纱绢和花冠,在堂中跪在父母或教师跟前好好的热心望弥撒、领圣体。这样,儿童能多明白这圣体圣事底尊威。

“于一九三三年,先有学界底教员,嗣有公进会底会员和别位教友等人(藉)[籍]比约第十底圣体军。这些会友定志每周至少领一次圣体,现在有三十多个军友。此外修道院也成立圣体军,军友系修道士,现计军友一百餘名。

“(二)善会。教友对恭敬圣母底热心另外表显出来在过圣母瞻礼,踊跃的入圣母会。一千九百年成立男圣母会(会友一百五十人)、女圣母会(会友三百多人)。以后又成立两个圣母会专为男女青年。直到如今,每主日有他们会友聚会底日子。

“一九零九年,已经有一百多个方济各三会底会友,同时也有几百个祈祷会底会友。又有一百七十二个圣体会底会友。更有好些别的善会底会友,难以殚述。共计有十九个善会,每会都有会友。

“(三)下会。每年复活瞻礼前后有下会神工。这神工还是照我从前所提的例子:在大堂两主日底工夫有道理。这两主日晚八点钟,全村教友都听大堂底钟响:这钟叫做罪人钟,唤醒和请求司铎与教友纪念西湾子底一种好习惯,就是在响钟时候,统念《天主经》《圣母经》《圣三光荣颂》各六遍,求为罪人善下会。

“(四)避静。避静神功常有举行的机会。这样,于一九三五年有百餘男教友行避静神功,遂后有三班女教友行避静,共计三百餘人。

“从此看出来司铎用什么法子指导教友在修德行的路上,也看出来教友怎么听从神长底领导。”

第九节《西湾子公教进行会》载:

“一九一二年上,虽成立过一个公进会,但没有持久。

“以后因着教宗比约第十一位底上谕和宗座代表底劝勉,石主教立意成立公教进行会。遂于一九三四年依照公教进行会组织大纲成立区指导会,其会员亦有本处的人员。一九三五年又成立公进分会,次年又成立公教青年会。一九三五年九月内,为全教区出版一个《公进月刊》,每月一份,全年十份。

“这两个公进会都按照定期开会,讨论本地方的公教进行事宜。刻下分会会员已经召集未就学底儿童辈,给他们讲要理,且又勉力和本地教外人多有交际,寻传教机会。因着这些会员底好表率,就是爱德和热心善表,预料这会底工作为本地地方将发生大好效果。他们随教士底指导、神师底引领,勤领圣事,也劝勉别人多增热心。这样,本村底成人已经多领圣体,品行也多表显出来他们底热心了。且说公教进行会,教宗注意爱护她,犹如爱护自己的眼珠,盼望公进会员多发勇敢爱火,不但使圣教广扬于本村,且要发展于大东沟,那才满足了公进会底最后目的哩!”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雷鸣远》载:

“红格尔图^①之役,教友以八、九十人,合骑兵二连,携土炮八尊,与敌万餘人战,指挥易司铎世芳,

^① 红格尔图属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1936年11月3日,由日本驻嘉卜寺(今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的伪蒙古军李守信部和汉奸王英“大汉义军”总兵力一万七千人,在日军数架飞机支援下,向绥远守军赵秉毅部发起猛攻,企图分四路攻占绥远。傅作义先后调集部队约三万餘人,令彭毓斌师长、董其武旅长为正副总指挥,以小部兵力和当地民众武装坚守要点,主力首先歼击11月15日进犯红格尔图之敌。18日,伪蒙古军6次冲锋皆被击退。是日晚,董其武率兵包围敌伪指挥部,彭毓斌率骑兵迂回敌后,截击援敌。次日拂晓将犯军击溃,毙敌一千餘人。是即红格尔图战役。24日,傅作义部北上收复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12月10日收复锡拉木伦庙,毙日军顾问20餘人,取得了绥远抗战的胜利。

春秋高迈,老而益壮,血战三昼夜,敌虽拥飞机、钢炮各若干,卒溃退,全国震惊。汤恩伯将军至谓其后百灵庙与大庙之克复,亦胥受教友退敌之激励。”

《献县天主教志》第一章第三节《教区的划分》载:

“1936年,从献县教区划出大名、南乐等6个县成立大名教区,由匈牙利耶稣会士管理。首任主教为查宗夏^①。”

1937年 民国二十六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雷鸣远》载:

“七七变作,全面之战乃起,公发表《我国现在需要什么人》一文,谓国人有三分之一肯牺牲,国即得救。而公主持之《益世报》,虽在津市沦陷后犹日斥敌伪,力攻奸邪,至经理被捕后始被迫中止。公初投第三师第三十六团,在易县训练担架队,时七七后才两周耳。八月二日夜,为耀汉会立遗嘱……。十二师师长唐淮源以卫生连连长相属,公以义不容辞,八月十九日下耀汉、德来二会总动员令,阅一日,救护队第一队即告成立。队员一百八十人,皆高阳、清苑二属教友,每月终受酬,必以之转向军需处缴作救国捐,或自购医药。此后辗转涞源、易县、涞水、高碑店、满城等地,历程数千里,未尝遗弃一伤者。九月二十三日,自保定退滹沱河。十月八日,敌渡河,遂入娘子关,战益烈,历十五昼夜不止。公昼夜率队员担架运送,遇重伤者、阵亡者,必亲负伏行。新关之役,我军突围而出,经阳泉、寿阳、榆次、太谷,大小数十战,至沁县,将士疲惫已极,军备亦散失垂尽。或要求换防休息,长官请公演说,乃以天堂大休息、医院小休息为勉,士气大振。固关之役,炊具已埋,犹为伤兵服务。时公已六十有一,军中念其老迈,予以马。公以马负弥撒祭具,仍肩行囊步行,囊储一日课,一日记、一衣、一裤、一袜、一履、一巾、一笔,合共体重不逾六十公斤。在阵中必设法日行教礼,一时有战地修院之称。12月,经安泽、洪洞而抵王和镇。”

《古常山郡新志》第十四章《故土沉沦》载:

“正定天主教被日匪摧残血泪史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阀发动芦沟桥事变,揭开中日大战序幕。平、津、保相继沦陷,十月六日逼近正定,遭守军英勇抵抗。八日开始向城内炮轰,九日侵入城内,守军寸土必争,展开惨烈巷战,敌我牺牲惨重,终于弃守。万恶日寇野蛮成性,逢人便杀,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居民多冒炮火奔向天主教堂寻求庇护。守南大门工友以窥视外情,首遭枪杀,日寇乘机冲入教堂搜劫,金钱、手表鲜有幸免。十一时许,有一日寇军官告文致和主教曰:‘我日军文明,绝不干扰教堂,请放心可也。’孰意下午六时,突来日寇十馀名,直入若瑟女修会院内。夏露贤与贝德良两神父闻报,赶来劝阻,被驱进门房,严加监视。守贞修女走避无地,哀号乞怜,哭声震天,亦难逃兽性奸污。十九时日寇八名冲进餐厅,不问青红皂白,以撕破桌布将迎立神父一一背手缚绑,连成一串,迫令登上煤炭汽车离去。中国神父相顾失色,召开紧急(合)[会]议,公推周志毅神父负责应付变局。十月十日国庆日,日寇对教堂严加搜查,于仁爱医院将已更换便衣受伤就医官兵九名拉出院外就地枪决,壮士成仁,见者泪下!又据新来难民报导,昨夜夜间,目睹木塔旁燃起熊熊烈火,历久始息,遥闻惨叫‘蒙丢蒙丢 Mon Dieu Mon Dieu’声,引起大家特别注意,辅理修士斐德利(Tirie Drilok)冒险往视,于灰烬中,发现念珠、圣牌、钻练及小剪等物,证明主教、神父已惨遭烧杀矣。兹将蒙难名单分列后:

1. 文致和主教 Schraven Tawucob^②六十五岁,荷兰人。
2. 夏露贤神父 Charny 五十五岁,法国人。
3. 柴慎成神父 Cheska 六十五岁,奥国人。

^① 查宗夏(1890—?),字光华。

^② 此文中外籍人士的外文名字与下篇文字的不一致,似应以后者为准。

4. 贝德良神父 Bemtnand 三十二岁, 法国人。
5. 卫德尔神父 Vouters 二十八岁, 荷兰人。
6. 艾德偲神父 Geerts 六十二岁。
7. 自来福神父 Brine 二十八岁, 波兰人。
8. 罗神父 Rolbial 苦修会士, 六十岁, 法国人。

9. 毕先生 Bisco Pich 非教士, 捷克斯拉夫人, 系由北平请来修理风琴者, 见日寇缚文主教, 乃大声呼曰: ‘不要缚文主教, 要缚, 缚我好了!’ (未言)[言未]竟, 亦遭缚, 连成一串, 迫令走出餐厅登车。仅有本笃神学院院长 Albric 老而有病, 幸免於难。

“日寇在正定疯狂屠杀, 惨绝人寰, 主教、神父在劫难逃, 而况居民乎? 在光天化日下强奸守贞修女, 而况一般妇女乎? 万恶倭寇, 禽兽不如。血腥未乾, 日寇成群结队转向大佛寺, 对我佛如来焚香罗拜。大佛有知, 岂不嗤之以鼻!

“日军野蛮残暴在正定表露无遗, 咸有不共戴天之恨。惨杀主教、神父, 奸污修道贞女, 尤使教友义愤填膺, 纷纷参加抗日行列。”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四章《遣使会北省的情形》载:

“十二、中日战争

“2. 正定的惨案

“……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十月九日早晨, 正定为日本人所占领, 不久, 军人冲入教堂内, 抢掠教友及外教的许多难民。日本军官曾来拜访文致和(Schraven)主教, 说将保护教堂。但晚间六、七点时, 十名日军至大门, 走往若瑟会女修院。

“当知正定教堂面积广大, 分为四区, 大小不一, 彼此分开, 可由外门而入。最小区为若瑟会修女院, 亦有围墙; 最大的为仁爱会修女院及其各种事业; 然后是主教府及神父的房屋; 最后为男子中学、工厂及一广大的花园; 而主教座堂则在一切的中央。

“知道十名日军进入修女院后, 夏露贤(Charny)神父及贝德良(Bertrand)神父有意赶上去阻止他们进入若瑟修女院, 即为二名日兵所捕, 关在门房中, 由二名日兵把守。

“七点后, 是传教士用晚饭的时候, 文主教及廿位神父来至餐厅, 八名日兵亦随之而至; 他们的领袖用中国北方话命大家起立、静默, 八人拿手枪对着神父, 以后几名日兵捕了文主教, 其余日兵捕了西洋神父, 遮了他们的眼, 以绳将手后缚, 用长绳穿着, 带出大门, 并将夏、贝二位神父一齐缚起, 使他们登上一辆煤炭汽车, 然后离开。

“他们是:

文致和主教(Schraven)主教, 六十五岁, 荷兰人。

夏露贤(Charny)院长, 法人, 五十五岁。

柴慎成(Cheska)副院长, 奥人, 六十五岁。

贝德良账房, 法人, 卅二岁。

(Vouters)传教士, 荷兰人, 二十八岁。

艾德偲(Geerts)辅理修士, 艺术家, 六十二岁。

自来福(Prinz)辅理修士, 波兰人, 廿八岁。

“以上皆为遣使会士。

(Robial)苦修会士, 法人, 六十岁。

(Bisco Pich)世俗人, 捷克斯拉夫人, 由北平来修风琴。

“(Bisco Pich)看见日兵捕文主教, 乃大声说: ‘你们捕我, 不要捉他, 他是主教!’ 日兵叫声闭口, 他如别人一样被捕。

“附近神乐院毛院长(Alberic)在堂中, 但因年老多病, 未至餐厅, 故未遭难。

“西洋传教士被掳后, 国籍神父看见他们被捕, 都惊恐不已, 如群龙无首, 不敢越雷池一步, 为此不

知教堂附近所发生的事,也不易查考。

“艾类思(Chanet)神父为正定与保定间定县的本堂及总铎,正在艰难中,城中官员已逃之夭夭,而教友一群一群地来至堂中避难。

“十月十七日艾类思神父看见由正定来了一个报信人,在他衣裳上写着主教及神父被捕事。他即派另一人至北平转告满主教及法国大使馆,他自己设法至正定。但日人不肯给他通行证,他只好冒险骑脚踏车而去。于十月二十二日他抵正定,看见神父们如惊弓之鸟,不敢聚在一齐;他提高他们的精神,乃下手查考这事的经过。主教、神父还活着否?若尚活着,是被人勒索,现在何处?

“由他旁边的人,他毫无所得,他们尚在惊悸之余,他们的述说不详细,且互相矛盾;人家都不知道日本兵如何对待被掳的人。最后十一月十日由乞丐处听到,十月九日晚上,他们看见在离主教府三百公尺的塔旁火光熊熊,并听见叫说(Mon Tiu Mon Tiu)他们不懂有何意义。无疑的是法文“我的天主,我的天主”(Mon Dieu)。

“日本人依他们的风俗,在塔上焚烧阵亡的将士;同样在此地被掳的主教、神父被害,但不知如何,然后被焚烧。因为考察了此处后,发现在灰土中有被烧的骨头、念珠、圣牌及神父常带的物件。乃将一切收拾起来,保存在主教府中。

“艾神父至正定时,他的副本堂温文炳(Vonken)神父骑[脚]踏车至北平;他抵达时,主教及神父被害的消息已传开了。

“教宗代表蔡宁^① 主教不愿正定教区没有领袖,乃任文贵宾主教为署理人,直至文致和主教能回来,若他只被掳为质的话;若他已去世,直至继位人上任。

“文贵宾主教与一位日本军官于十一月十六日来至正定。日本军官立即下手调查,第二日他即承认系由日本军队所作,情愿赔偿。他在主教公署召集了城中日本及中国长官,为使局势明朗化,及大家和睦。乃决定举行大礼安葬,以纪念被害者。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主教大堂内举行葬礼,追思则在北京圣弥额尔堂举行。

“日本军队并允许在正定主教座堂旁边立一纪念碑,且赔偿教堂因战争所受的损失。

“数月后,碑已建立了,是一块大理石碑,放在基础上,由二石柱支着,上有石盖,高二公尺,宽一公尺。碑上刻着‘为纪念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的牺牲者’,下面是九位被害者的姓名。

“单是这样,并没有表示忏悔;日本军官在文贵宾主教及中国长官前承认了错处,在碑上却一字不提。

“可以说日军并没有作过任何精神的或物质的赔偿……”^②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的回忆》载:

“当我正在河间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不到三个月,日本飞机就来轰炸河间、献县一带。献县总堂是那年(1937年)9月23日被轰炸的。有六架飞机扔下了四十个炸弹,幸未死一人,只炸坏了几间房屋。在河间城内,虽有几处被炸,在天主堂院内未落一个炸弹……

“1937年12月5日,当我有事来津,正在工商学院时,接到了由罗马来的电报,说我被选为献县教区主教。……

“12月14日,我回到献县总堂。……法文传教杂志《Chine(中国)、Ceylan(锡兰)、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上仅仅登载了几行说:‘耶稣会士赵振声司铎接了法籍主教刘钦明(Mgr. Lecvoavr)的位

^① 蔡宁(M. Zanin 1890—1956),意大利人。1913年任神甫,1930年任主教,1934年任宗座驻华代表到北京就任。1946年回意大利,后改任教廷驻智利、阿根廷等国大使。逝于阿根廷。

^② 苦修会神乐院会士则在院内为文致和主教等立碑,碑额刻“百世流芳可钦可敬”8字,碑文称:文主教方济各,正定教区代牧,前曾惠聘西督会苦修士来此,予以田产,用建本院,且一生至终对于院内修士特别表示爱护。悲夫,于一九三七年拾月九日竟借总堂忠勤理事夏司铎、本院会士雷司铎暨他司铎、会士等六位同罹于难。谨勒贞铭,用志哀悼,藉表报德永念云。

该碑仍存院内,河北省天主教神学院于1990年迁入该院。

为献县教区主教,特此致贺。’……

“我父母一听说我被选为主教,给我的信上写有这么几句话,至今我还未忘记。信上说:‘我们听说你被选为主教,我们又喜欢,又难受。喜欢的是你得了天主的如此大恩,难受的是你负起的责任太重了……’”

王明生、王维民整理《宣化县天主教发展简史》载:

各时期来宣化传教的外国神甫

时期	姓名	国籍	来宣化时间	职务
法国耶稣会士传教时期 (1687—1773)	张 诚	法国	1688	神 甫
	巴多明	法国	1698	神 甫
法国和中国味增爵会 士传教时期(1785—1926)	杨德望	法国	1788	神 甫
	薛玛竇	法国	1829	神 甫
	孟振声	法国	1835	神 甫
	林懋德	法国	1840	神 甫
	田类是	法国	1840	神 甫
	薛玛竇	法国	1848	第一任宣化本堂神甫
	卫儒梅	法国	1862	第二任宣化本堂神甫
	梁儒望	法国	1867	第三任宣化本堂神甫
	樊国梁	法国	1868	宣化总堂神甫
	德明远	法国	1871	宣化总堂神甫
	艾儒略	法国	1873	宣化总堂神甫
	德明远	法国	1874	宣化总堂神甫
	都士良	法国	1877	宣化总堂神甫
	文德会	荷兰	1881	宣化总堂神甫
	安作箴	法国	1886	宣化总堂神甫
	武致中	法国	1894	宣化总堂神甫
	德懋谦	法国	1899	宣化总堂神甫
	田聿登	法国	1908	宣化总堂神甫
	惠泽霖	荷兰	1915	宣化总堂神甫
郭茂林	法国	1920	宣化总堂神甫	
于惠民	荷兰	1924	宣化总堂神甫	
比籍(味增爵会士) 传教时期(1927—1948)	文德远	比国	1931	传教士
	任尔松	比国	1931	传教士
	(任望远)			
	葛慕兰	比国	1934	传教士
	雷震远	比国	1937	传教士

1938年 民国二十七年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雷鸣远》载:

“二十七年春,随军至晋东。二月六日,传有人出资购《益世报》,筹备复刊,公即郑重声明‘《益世报》为中国公教之言论机关,绝对不致对敌人屈辱降服,鸣远一息尚存,当不让一己创造之报纸有向敌人屈辱降服之事实发生’云云。”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的回忆》载:

“我是1938年3月27日,封斋后第四主日,在献县被祝圣的。主礼的是华籍主教崔守恂,襄礼的是天津文主教(Mgr. De Vienne)和献县教区会长鄂恩涛(P. Bovner)。祝圣典礼刚刚完毕,日本兵就进了堂院。

“那时在献县总堂有从法国新来的一位神甫,姓孙(Sontag),才学会了中国话,愿意到献县附近村庄去过宗教生活。在路上走着,因为出了误会,被八路军一枪打死了。那天是1938年4月8日,是苦难主日后的占礼六。赵师长听说此事,就由张敬介绍着来献县总堂,同我及总堂法籍负责人见了面。双方同意,为亡者做一个追悼大会,并立碑殡葬于云台山。云台山就是献县教区传教士们的坟地。”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四章《遣使会北省的情形》载:

“十三、孙德楨主教辞职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安国的孙主教因着环境的要求,不得已而辞职。并非因为年龄,他当时只六十七岁;也并非因疾病而辞职;但因雷鸣远神父的缘故,教务混乱,孙主教只好请圣座准他辞职。

“罗马圣座接受了他的请求,任小修院院长王增义神父为安国教区的署理。

“圣座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一日,任王增义为拉米亚的名义主教及安国的宗座代牧。

“王主教于光绪二十年(一八八四)六月六日生于保定大里各庄,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八月二十七日至浙江嘉兴入遣使会,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三月十八日升神父。在保定工作二十二年,有时传教,有时在小修院任教。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满主教任他为教区咨议。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调为安国小修院院长。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二月二十四日在北堂举行祝圣典礼。主礼人为孙德楨主教,他退居于北平耀汉小兄弟会的会院中,尚在世十五年。赞礼者为北平的满德贻主教及保定的周济世主教。”

《中国基督徒史》第24章《基督教爱国主义》载:

“从战争到和平:教会走向成熟

“……我们在北京天主教徒通讯中可读到这条历史注释:

1938年,宛平县组织抗日民主政府。赵神父被党和人民选为政府参议。他还是救护队负责人。抗战爆发前他就参加了民众斗争,和他们患难与共;他在教堂里接待地方和军队干部,和他们一起讨论拯救国家。”^①

《献县天主教志》第二章第三节《历任主教简介》载:

“1、郎怀仁 1856、5、27—1865、2、23

“法国耶稣会士。1843年12月与法国驻华公使团同乘军舰离法来华。曾任耶稣会江南教区代理会长。1856年5月27日,教皇任命他为直隶东南教区宗座代牧,顶衔为塞尔吉奥波利教区(法国尚巴尼教省下属的一个教区,下同)主教。1857年3月22日在保定安家庄天主堂(当时是北京教区主教座堂)由北京教区主教、法国遣使会士孟振声祝圣,1857年4月1日在威县赵家庄天主堂就任。1865年2月23日调任江南教区宗座代牧。

“2、杜巴尔 1864、9、22—1878、7、1

“法国耶稣会士。1864年9月22日,教皇任命他为直隶东南教区宗座代牧,顶衔为卡纳特教区主教。1865年2月19日在献县张庄天主堂由郎怀仁主教祝圣。1857年4月1日在威县赵家庄天主堂就任。1869年底至1870年10月出席在罗马举行的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因巡视教区时染上斑疹伤寒,1878年7月1日逝于吴桥。

“3、鄂尔璧(代理) 1878、7、2—1880、7、15

“法国耶稣会士。1843年与郎怀仁一同来华。1866年5月18日到献县。1878年7月以教区耶稣

① 原注:《北京教友通讯》,1988年第9期,第47页。

会会长身份代理主教。他提出并大力推行三种传教方式：一、包揽诉讼，即以全家和所隶属的人声明奉教为条件，由教士出面斡旋，使当事人在诉讼中获胜；二、开办学校，即用国内外教友捐助的钱开办走读学校和其它各类学校，学生免费受教育，甚至免费在学校用膳和住宿；三、施赈救济，即向遭遇天灾人祸的穷人施以物质救济或由教会置买土地，租给无地穷人耕种。有人认为，直隶东南教区成立之后的一切发展都应当归功于鄂尔璧（《在中国的耶稣会》）。1895年7月2日在献县逝世。

“4、步天衢 1880、7、15—1900、10、14

“法国耶稣会士。曾任江南教区董家渡耶稣会院理家、院长。在该院院长任上接到1880年4月4日教皇签发的任命他为直隶东南教区宗座代牧（顶衔为包特利教区主教）的诏书。1880年6月29日在上海由倪怀伦主教祝圣。1880年7月15日来献县就职。1900年10月14日逝世。

“5、马泽轩 1901. 7. 31—1919. 12. 23

“法国耶稣会士。1894年9月24日任直隶东南教区耶稣会长。1900年10月15日在威县赵家庄就任代理主教，12月回献县。1901年7月31日被教皇任命为直隶东南教区宗座代牧，顶衔为亚马东教区主教。1901年12月8日在上海接受江南教区姚宗李主教祝圣。1907年4月1日向张庄总堂的教士们做了《五十年来的直隶东南教区（1857—1907）》的报告。1919年12月23日逝世。

“6、刘钦明 1919、12、13—1937

“法国耶稣会士。1917年7月30日被教皇任命为直隶东南教区助理主教，1918年2月2日在上海由姚宗李主教祝圣。1919年12月23日继马泽轩任主教。1922年9月23日至1923年7月13日任安南各教区视察员。1925年9月17日至1926年6月2日到罗马出席教廷会议。1937年末逝世。

“7、赵振声 1937、12、5—1968、10、15

“耶稣会士。河北省景县黄古庄人，汉族。1923年8月26日在比利时杭间镇被圣为神甫并获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1925年9月回国。1937年12月5日被教皇任命为献县教区宗座代牧，顶衔为比西加城（北非突尼斯的一座古城）主教。1938年3月27日在献县张庄天主堂由永年教区崔守恂主教主礼，天津教区文贵宾主教、献县教区耶稣会鄂恩涛会长襄礼祝圣。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北京总主教区代理总主教。”

《西湾圣教源流》第七章《巴主教以后的代牧》第四节《修道院和学校》载：

“在一九零八年及一九零九年两年间，修道院有了一种变故，十年的工夫，也没有修士圣神父。

“以后有石德懋司铎（现任主教）为修道院底院长，十几年的工夫，热心整理，为修生牺牲了很大的精神，赶他告退的时候，竟把一个很兴旺的修道院交给接任底司铎。

“在一九二二年以前西湾子修道院内已有大小修士，在本年有第一批大修道士升入新成立的大同大修道院。这座大修道院到一九三六年改为专读神学底大修院，哲学院成立于归化城。这两座修道院为圣母圣心会教区底大修道院，到如今计有三十二位由西湾子小修道院升学大同圣了神父。如今还有好些西湾区底修道士在大修道院读神学、哲学。共计神学士二十多名，哲学士二十四名。

“一九零五年，主教指定在南壕堑成立一座学校，开始为初、高两等小学校及补习班；旋又成立淑范女子初、高两等小学校。到一九二八年改组为养正中学校，分男子部、女子部，这学校原来为造就本区子弟升学或小校师资。

“西湾子有高小两座，一为公学院，宗旨是为预备入修（院道）[道院]院底学生，但这公学院于一九三七年已与修道院合并；一为培华女子高小，专为预备女子升入养正中学校。还有一座完全小学校，目的为造就本地方子弟，预备升入养正中学校。还有一初级小女校，为本村学龄女流。

“除以上所叙各学校外，犹有一处男问答班，两处女问答班，专为男女孩童学习经言要理，预备开圣体。在大堂院中又有义学房，前已叙明，兹不复赘。大堂前又有一所女义学房，内有几位贞女，为教那女保守教友预备领洗，并为领工堂中底针线活。”

第五节《集宁教区和西湾子耶稣圣心婢女会》载：

“教宗论国籍神职班底谕旨，在中蒙古教区发生了好效果。蓝主教当时属下计有教友五万有奇，国

籍司铎数十名,因此向宗座要求由本教区划分一国籍教区。一九二六年,多半数的国籍司铎(二十一位)分派到西区,本会司铎到东区;一九二七年,西湾子本堂司铎刘明德选派为西区代牧者;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传信部文诰发表成立集宁国籍教区,擢任张智良司铎——在罗马晋升主教——为新教区底代牧。圣母圣心会和这新教区也没脱离关系;张、樊二位主教俱聘本会司铎到新教区襄理小修道院及献堂会,每年那里小修道院大班和二班修生且升入本区小修道院插入同级修生班,合并攻读。

“在西湾子总堂试办过男修会。当时方主教愿意成立此会,宗旨系造一般修士分派到各堂臂助司铎传教,但试办未久,竟未成立起来。蓝主教在高家营成立一个修女会,即耶稣圣心婢女会,他去世以后,石主教于一九三三年监收第一班修女底愿。那修女中也有西湾子底几位贞女,到如今那些修女管理三座女校,一座孤儿院和一处养老院。”

《西湾圣教源流》附表(四)《自圣母圣心会接理蒙古教务以来所有代牧和副主教的史略》载:

“石德懋主教:(Mgr L. De Smedt)石公于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初三日生于比国根脱教区(Gand)圣尼各老城(St Nicolas)。一八九九年九月初七日入了圣母圣心会。一千九百年九月八日发了愿。一九零五年七月十六日在斯哥德(Scheut)晋铎。次年十月二十二日来到西湾子,不多时即任南壕堡学校教授。一九一三年升为西湾子修院的院长。一九二三年作了会长司铎。一九二七年回欧任卢芳(Louvain)本会大修院的院长。一九三十年八月复选为西湾子的会长司铎。于蓝玉田主教死后,公即为西湾子教区的副主教。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宗座颁谕擢公为阿特拉主教,本月二十一日又委公为西湾子教区代牧。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在西湾子领了祝圣主教的典礼。如今热心管理西湾子教区。”

附表(五)《本区会长司铎一览表》载:

“本会于本教区设会长司铎一席,系由二十二号大会议决(一八八七)。至于首任会长司铎,当在一千八百九十年左右。以后常有值任会长司铎之职者。

“本区会长司铎姓名及任职起讫如左:

姓名	外国姓名	任职起讫年号
林司铎振	T. R. P. Gustave Teirlinck	自 ? 到 1894
何司铎济世	T. R. P. Amand Heirman	自 1894 到 1898
卜司铎天德	T. R. P. Pierre De Boeck	自 1898 到 1903
刘司铎振灵	T. R. P. Edmond Rubbens	自 1903 到 1913
凤司铎守仁	T. R. P. Maurice Lefebvre	自 1913 到 1918
蒲司铎德厚	T. R. P. Adolphe Brou	自 1918 到 1923
石司铎德懋	T. R. P. Leon De Smedt	自 1923 到 1927
德司铎维世	T. R. P. Alphonse De Decker	自 1927 到 1930
石司铎德懋	T. R. P. Leon De Smedt	自 1930 到 1932
蒲司铎德厚	T. R. P. Adolphe Brou (注一)	自 1932 到 1937

注一 降生后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三月会长司铎蒲公任期届满,本会总会长委饶公启迪为接任会长司铎。”

附表(六)《自圣母圣心会接理本教区教务以来,所有署理西湾子总堂教务司铎一览表》载:

“自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西湾子没有正本堂,那几年的工夫,或是本村修道院的神父,或是总堂领账神父,负责管理。赶到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巴主教才派出梅司铎为这总堂底正本堂神父。

兹将所有历任本堂神父及其任职起讫如下:

姓名	外国姓名	任职起讫年号
梅司铎	R. P. Gerard Muiteinan	自 1873 到 1874
季舍尔司铎	R. P. Martin Guisset	自 1874 到 1877
吕继美司铎	R. P. Theodore Rutjes (注一)	自 1877 到 1883
卜天德司铎	R. P. Pierre DeBoeck	自 1883 到 1885
赵仲相司铎	R. M. Pierre Tchao	自 1885 到 1891
庞孝爱司铎	R. P. Cesar De Brabandere	自 1891 到 1897
沃如渊司铎	R. P. Paul Warignaire	自 1897 到 1900 正月
邢永常司铎	R. P. Jean Sintobin	自 1900 正月 到 1900 十月
蓝克复司铎	R. P. Evrard ter Laak (注二)	自 1900 10 月 到 1902 正月
卜天德司铎	R. P. Pierre DeBoeck	自 1902 正月 到 1902 11 月
龚永昭司铎	R. P. Conrad Eyck	自 1902 到 1910
何维国司铎	R. P. Amedee Esquenet	自 1910 到 1913
蒲德厚司铎	R. P. Adolphe Brou	自 1913 到 1918
字嗣安司铎	R. P. Arthur Hustin	自 1918 到 1920
刘明道司铎	R. M. Paul Liou	自 1920 到 1927
邓维道司铎	R. P. Francois Joosten (注三)	自 1927 到 1928
何维国司铎	R. P. Amedee Esquenet	自 1928 到?

注：一 吕继美于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选任东蒙古教区代牧。后寿终于松树嘴子（一八九六·八·四·）

二 蓝克复参看第四表。

三 邓维道于一千九百三十二年选为大同监牧。本年六月十七日，传信部颁行上谕，成立大同教区，擢邓公为热尔满尼保理主教（六月十四日），并为大同教区代牧（六月二十一日）。在荷兰国，红衣主教王老松祝圣邓公为主教。

附表（七）《原籍西湾子司铎一览表》载^①：

“亡者

姓名	生年	晋铎年号	入会与否	任职区名	寿终地址	去世年月日
1 郑怀礼，保禄	1812	1838	在会	北京	宣化府	1873.12.30
2 樊明道，味增爵	1821	1849	在会	直隶	正定府	1883.5.20
3 郑恒德，巴尔大撒	1829	1857	在会	北京	北京	1898.7.28
4 陈天义，伯多禄	1834	1857	在会	北京	北京	1891.11.20
5 姚智，巴尔那伯	1840	1866	不在会	西湾子	高家营子	1920.3.27

① 原数字形式为汉字。

姓名	生年	晋铎年号	入会与否	任职区名	寿终地址	去世年月日
6 河 ^① 忠德,老楞佐	1840	1866	不在会	热 河	松树嘴子	1897
7 武连城,若 翰	1844	1869	在 会	北 京	宣化府	1878.12.2
8 郑牧灵,巴得利爵	1841	1876	不在会	热 河	山后热河	1919.6.20
9 武 刚,斐理伯	1838	1876	不在会	热 河	热河苦力吐	1930.1.12
10 樊广义,保 禄	1860	1888	不在会	西湾子	白桦沟	1917.1.23
11 赵鸿儒,盎不罗肖	1868	1893	不在会	西湾子	玫瑰营子	1906.4.5
12 樊 恒,多 默	1863	1894	不在会	西湾子	西湾子	1925.6.27
13 毕正心,斐理伯	1873	1901	不在会	集 宁	花桃力盖	1930.11.31
14 李秉彝,若 翰	1874	1902	不在会	集 宁	格花斯台	1932.3.19
15 姚 玺,保 禄	1876	1907	不在会	西湾子	迭力素	1920.2.28
16 樊恒贵,若 翰	1877	1908	不在会	集 宁	香火地	1936.8.17
17 李望真,保 禄	1875	1912	不在会	西湾子	什达岱	1921.10.17
18 毕成云,若 瑟	1894	1922	不在会	集 宁	玫瑰营子	1931.10.13

“现任者”

姓名	生年	晋铎年号	入会与否	任职区名	供职处 ^②
19 樊恒安,若瑟主教 ^③	1882	1910	不在会	集 宁	玫瑰营子
20 张 元,若 望	1868	1893	不在会	西湾子	公 会
21 王灵官,方济格	1869	1894	不在会	集 宁	官村子
22 易世亮,若 翰	1870	1899	不在会	集 宁	井沟子
23 姚振灵,雅各伯	1873	1900	不在会	集 宁	沙 (霸)[坝]
24 张 瑞,雅各伯弥厄尔	1875	1902	不在会	集 宁	玫瑰营子
25 易世芳,若 瑟	1875	1905	不在会	集 宁	和乐沟
26 易世兰,味增爵	1878	1907	不在会	集 宁	红格图
27 姚作霖,若 瑟	1881	1909	不在会	北 京	北 京
28 赵鸿逵,玛弟亚	1881	1911	不在会	集 宁	平地泉子
29 李树世,玛尔谷	1879	1912	不在会	集 宁	平地泉子

① 似应作“何”。

② 原注:表内供职处一栏,系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一月一日的驻节地址。

③ 原注:樊恒安选为卜甫主教及集宁教区代牧(一九三三·一·一零·)。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教宗比约十一祝圣樊公为主教于罗马。

姓名	生年	晋铎年号	入会与否	任职区名	供职处
30 张殿士,法比约	1880	1912	不在会	集宁	其老文古旗
31 卢正民,加禄	1902	1927	不在会	集宁	土城子
32 樊海清,保禄	1901	1930	不在会	西湾子	老虎山
33 宋连德,安当	1908	1934	不在会	西湾子	西大山
34 姚桂龄,保禄	1909	1935	不在会	西湾子	西湾子
35 宋连明,若翰	1910	1937	不在会	集宁	红格图
36 毕耀崇,玛尔谷	1913	1938	不在会	西湾子	西湾子
37 张老楞佐修士	1881		苦修会	河北	正定府

附表(八)《原籍西湾子修女一览表》载:

“亡者

姓名	入会名	生年	发愿	寿终地址	去世年月日
方济格会					
1 樊玛尔达	玛利亚若罗尼莫	1847	1905	香火地	1931.1.9
2 王罗撒	玛利亚依搦思	1884	1918	南壕堑	1923.3.8
3 张玛利亚	玛利亚罗撒	1880	保守者	罗玛	1913.5.18
现任者					
姓名	入会名	生年	发愿	供职处	
方济格会					
4 毕加达利纳	玛利亚加达利纳	1878	1910	南壕堑	
5 张亚加达	玛利亚玛加利达	1882	1912	保定	
6 樊亚加达	玛利亚方济加	1890	1913	香火地	
7 张路济亚	玛利亚耶稣圣体	1886	1929	哈尔滨	
圣心婢女会					
8 常伯尔纳德	玛利亚美拉尼亚	1913	1934	西湾子	
9 张玛大利纳	玛利亚方济加	1905	1934	高家营	
10 张依搦斯	玛利亚玛尔大	1911	1934	高家营	
11 郭加大力纳	玛利亚莫尼加	1905	1936	南壕堑	
12 刘依搦斯	玛利亚罗撒	1908	1937	高家营	
13 王罗撒	玛利亚若翰纳	1910	1937	高家营	
14 赵加拉	玛利亚儒利亚纳	1914	1938	南壕堑	

姓名	入会名	生年	发愿	供职处
15 郭加大力纳	玛利亚加拉	1911	1938	高家营”

附表(九)《最近西湾子教务统计表(1936年至1937年)》^①载:

公教教友	3074	圣婴会(婴孩院)	1
保守教友	28	在院婴孩	144
神职界:		乳哺者(雇奶者)	164
主教	1	施诊所	1
司铎	15	施诊数	17555
修女:		义学房:	
圣方济格会修女	9	男学经者	45
修士:		女学经者	23
小修道院修士	68	施行圣事:	
公学院学生	25	成人受洗者	47
学校:		成人临终受洗者	25
经言学房	5	教内婴儿受洗者	94
男女学生	297	教外婴儿临终受洗者	25
初级小学校:		婴孩院收养之婴孩受洗者	89
男校	1	坚振	248
男生	72	四规神工	2188
女校	1	恩赐神工	33965
女生	101	四规圣体	2170
高级小学校:		恩赐圣体	149000
男校生	12	终傅	74
女校生	33	亡者:	
慈善事业:		成人亡者	43
安老院	1	孩童亡者	81
收养男老人	16	婚配	65

① 原注:按如今的处境,统计本村所有修士修女如左:神学修士四名(罗马传信大学一名 大同大修道院三名),绥远哲学修院修道士三名,本村小修道院小修士六名,本村公学院学生四名,北京圣母会修院修士一名,圣心婢女会保守修女二名,求入圣心婢女会贞女一名。

“以上统计数目，只指本村。至于西湾子周围各小堂口，常派有两位神父管摄。这二位神父，计管五十个小堂口，共有教友二千一百五十五。”

1939年 民国二十八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四章《遣使会北省的情形》载：

“十二、中日战争

“3. 陈启明主教继位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正月二十六日，教宗庇护十一世任藁城总铎陈启明为贝大城的名义主教及正定的宗座代牧。

“陈主教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十一月八日生于王家庄，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九月二日于栅栏人遣使会，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六日升神父，在教区及小修院尽过各种的职务，自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为藁城总铎。

“正定的教友都希望在正定举行主教祝圣典礼，陈主教亦愿在自己的座堂中受祝圣，然而当时战争正在进行中，不能如此。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五月二十一日，乃在天津举行祝圣典礼。主礼者是文贵宾主教，他自二年来为正定教区的署理人，由保定周济世主教及赵县张弼德主教赞礼。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正定教区的教务情形

教友	五一—〇六
客籍神父	一五
中国神父	四八”

第二十六章《抗战期中，北省的教务情形》载：

“三、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一九四〇)河北省的水灾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成立的美国救济会，在一次灾患时，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在河北省的安国教区作一调查。由此调查中，得知一百三十二万居民中，四十万特别贫穷，若非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答应，则春天将有饥荒。

“传教士报告教友因饥饿而死亡，许多教友及教外难民在整个教区中寻找食物果腹：黍米、棉子、糖、草根，都是他们的食料。粮食迟迟而来，交通因着战争及大水，非常困难，传教士乃分施救济品。

“连在天津，其低处也受水灾之害。为此文贵宾主教与耶稣会士合作，以救难民。英国租界地势较高，乃建了一百五十间土屋，掩以草屑，一千人住在其中，一半是教友。在另一处，天主教亦设了一座避难所，亦一百五十间，专为教友。难民每日吃黍米二次，并为儿童设了学校。”

《献县天主教志》第一章第三节《教区的划分》载：

“1939年，从献县教区划出景县、阜城等12个县成立景县教区，由奥地利耶稣会士管理。首任主教为凌安澜。”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的回忆》载：

“在敌伪时期，河间城内天主堂的男女学校都不能开学，所以南北两院的楼房都空闲着。于是我就把献县总堂的修道院和炼灵主母修女会都迁移到河间城内。这是1939年1月的事。不料住在河间的日本鬼子正想占用那些楼房，所以他们屡屡向我们寻衅刁难，危险很大。修道院院长崔步云见势不佳，就提前放了暑假，使外教区的修道生们都回家，只剩下本教区的9名修道生，随便回家，或留居河间修道院中。修女们除了几个看家的外，也都回献县总堂。这是那年(1939年)5月间的事。到了7月中旬，日本人突然闯进院中，把天主堂的人一网打尽，共逮去24人。计其中有神甫3人，修道生9人，修士2人，先生4人，工友6人，罪名是暗通八路。不久又从西关逮去1名姓杨的老年男教友。据7月31日被放出来的王永凯老修士说，7月25日夜，日本人用非刑治死了薛清修神甫，他是修道院的哲学教授。修道生们有的受打，有的受灌凉水之刑，却没有一个当场死去的。再说王永凯老修士为何被放出

来呢？因为老李神甫（思永）已七十多岁，病重将死，日本人令王永凯伴他出监，返回堂里后，当夜就死了。这是1939年7月31日的事。这位老王修士在献县总堂又活了二十年，于1959年4月1日逝世，寿七十九岁。其余被捕的23人延至1939年9月29日在河间西关被日本人活埋了。这是河间西关的人给我说的，这人是河间西关被捕的教友老杨的妻子。”

“修道院返回献县后，于1940年迁移到景县城内，复于1947年夏迁移到北京王驸马胡同，终于1948年冬逃往国外菲律宾马尼拉去了。”

《中国基督徒史》第24章《基督教爱国主义》载：

“从战争到和平：教会走向成熟

“……慰藉圣母院这所中国苦修院……经樊国梁神父的斡旋……于1883年在北京西北180公里的杨家坪山谷深处建了起来。至1926年，那里有百名左右修士，多数是中国人，其中有26名教士，8名神学学生，6名初修士及50名杂务修士。修院颇具实力，因此于1928年派生了冀南地区正定县境内的欢乐圣母院。杨家坪修士们开发的种植园对该地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1939年，修道院每天救济着上千名受旱灾和盗匪之苦的难民。农民们称修道院为‘慈善机关’。

《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俄国东正教传入天津前后》载：

“三、天津东正教会的建立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以后，‘圣母拏憐’大教堂因侵华日军的军事需要于1939年被拆毁，改作日军仓库，天津东正教会又在小刘庄的俄国医院的院内（现河西区红十字医院）按原来的式样及规模建立起另一座‘圣母拏憐’大教堂。这座教堂于1941年落成。”

1940年 民国二十九年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三份《遣使会士至中国传教》第二十七章《八年抗战胜利后，遣使会南北二省的教务情形》载：

“四、任命教廷驻华公使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五月十四日，蔡宁主教被任为中国第二任宗座代表……

“蔡宁主教在艰难时期中工作着。中日战争打击他的计划及工作。……他走遍中国各传教区……由日军当局得到在集中营的七百位传教士及修女迁至北平或上海二城的自己会院内。

“蔡宁主教在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天津的津沽大学中，都添了女生部。他创立了宠光通信社，广播中国的一切消息。他主持了各省的十九次主教会议。

“有一次，蔡宁主教特别召集了中国主教是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栅栏总修院的大修士回家度暑假，蔡宁主教请了十一位中国宗座代牧。六月十七日这特别会议的工作就开始了……

“三日间每日开会三次，每次二点半钟，问题是传教。……周济世主教任秘书……

“来参加会议的宗座代牧如下：

江苏省海门的朱开敏主教

河北省赵县的张弼德

蒙古省集宁的樊恒安

河北省安国的王增义

山东省阳谷的田耕莘，即将来的田枢机

河北省保定的周济世

河北省永平的崔守恂

河北省宣化府的张润波

河北省献县的赵振声

河北省正定的陈启明

山西省洪洞的成玉堂

“……蔡宁主教……于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离别北平而回罗马。”

《中国基督徒史》第24章《基督教爱国主义》载：

“从战争到和平：教会走向成熟

“……雷鸣远神父在其河北教区组织了担架队救助伤员。自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起，他就招募了240名担架队员，其中约20人是他1928年在安国附近建立的真福修道院圣——约翰·巴蒂斯特新小兄弟会的成员。此外，他还在同期创办了一所圣泰莱丝女修道院(属加尔默罗派)。

“1937年，当日本扩大侵略后，雷鸣远神父与他的担架队员重新投入了战斗，并在山西山区组织救援。蒋介石提升他为高级军官并把在‘新生活’运动精神指导下重整道德的使命托付给他。1940年初，他与他的小兄弟会成员被共产党八路军逮捕^①。……他于4月获释。由于重病，他于6月24日在重庆结束了动荡的一生。这一天，正值圣施洗约翰纪念日。”

《献县天主教志》第三章第二节《直隶东南(献县)教区耶稣会的组织》载：

“自1857年至1937年在本教区注册的耶稣会士共365名，其中有中国会士120名(神甫109名、修士11名)，外国会士245名(神甫227名、修士18名)。外国会士中，有174名来自法国，73名分别来自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匈牙利、奥地利、德国、美国、西班牙、瑞士等国。

“历任耶稣会长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国籍	任期	备注
1	薛孔昭	法	1856.9—1858.12.15	调江南
2	德良弼	法	1858.12.15—1859.6.23	逝世
3	李秀芳	法	1859.6.23—1866.5.20	创广扬圣教会
4	鄂尔璧	法	1866.5.20—1877.8.25	
5	狄加禄	法	1877.8.25—1878.3.24	逝世
6	鄂尔璧	法	1878.4.18—1884.4.18	年迈卸职
7	葛光被	法	1884.4.18—1894.9.20	
8	马泽轩	法	1894.9.24—1901.9.8	1904.4.27—11月末 白孟若瑟代理
9	葛光被	法	1901.9.8—1909.5.8	被免职
10	金道宣	法	1909.5.18—1915.10.18	
11	郝裕修	法	1915.10.18—1921.7.6	
12	卜鸣谦	法	1921.7.6—1927.9.18	逝世
13	翁裕仁	法	1927.9.18—1928.1.28	
14	鄂恩涛	法	1928.1.28—1935	

^① “1940年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在涉县、武安、磁县、林县地区，伙同鹿钟麟部与退至漳河以南的石灰三等部联合，以3个军的人马，配合日军向太行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于2月18日，以两个团的兵力围攻驻磁县北贾壁、大湾村的先遣支队一大队及青年纵队三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二九师组织涉(县)武(安)磁(县)林(县)反顽战役，战役由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统一领导，由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指挥。……3月5日凌晨2时，磁、武、涉、林反顽战役同时开始。……3月8日结束，激战4天，共歼灭国民党九十七军及其它游杂武装1万余人，缴获长短枪数千枝、轻重机枪120多挺、八二迫击炮24门，俘获朱怀冰部第九十四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参谋长王斌、蓝衣社雷鸣远、魏安自卫军军长胡象乾、德国牧师即所谓‘十字军’军长和国民党军官太太150多位，其中包括朱怀冰的一位太太。”(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2月版《涉县志》卷十六《革命根据地》第三章《根据地武装斗争》第二节《军事活动》“反顽战役”)

序号	姓名	国籍	任 期	备注
15	方济民	法	1935—1938.5.1	回国
16	饶满恒	法	1938.5.1—1942.10	
17	尚建勋	法	1942.10.21—1948.7	

“各分会院负责人一览表

“一、献县会院院长

姓名	国籍	任 期	备注
孟若瑟	法	1897.2.5—1899.3.1	代理
林道昌	法	1899.12.4—1906.12.4	
金道宣	法	1807.2.7—1909.6.18	代理
郝裕修	法	1909.6.18—1915.10.18	
金道宣	法	1915.10.18—1916.2.13	
于普泽	法	1916.2.13—1921.7.21	
翁裕仁	法	1921.7.21—1927.9.18	
饶满恒	法		
甘墨林	法	1938.7.2—	代理
穆启华	法	1941—1945	

“二、天津会院院长

姓名	国籍	任 期	备注
狄光远	法	1914.10.6—1919.6.13	
于普泽	法	1921.7.21—1925.7.3	代理
裴百纳	法	1925.7.3	
尚建勋	法	1938.4.16	

“三、大名会院(1866年设立)院长

姓名	国籍	任 期	备注
于普泽	法	1911.5.10—1916.2.17	
雍居敬	法	1916.4.27—1924.6.25	
方济民		1924.6.25—1936	

“四、广平(威县——永年)会院(1866年设立)院长

姓名	国籍	任 期	备注
尚秉哲	法	1920.10.15--1924.6.25	
雍居敬	法	1924.6.25—1924.12	

“五、北京会院(1866年设立)院长

姓名	国籍	任 期	备注
毛 纶	美	1937.9.26—	

《献县天主教志》第四章第二节《修道院的兴衰》载：

“1860年2月4日，由李秀芳神甫创立的直隶东南教区修道院在威县赵家庄天主堂的6间土房里开学，首届学生13人。次年7月，修道院随教区迁到献县张庄。修道院归教区耶稣会士管理。1860—1869年共招10届学生，都是小修生。

“1871年9月7日，耶稣会初学院在张庄总堂开学，首届学生3人，属大修院性质。

“1873年，教区设立了修院预科班，后来该班附设在教区公学内。

“1878年，教区共有大小修生38人。这是教区设有大修院的第一次明确记载。

“1929年至1939年，献县教区逐渐被分成4个教区，但修院仍由献县教区主办，属4个教区联办性质。1940年迁至景县。”

1941年 民国三十年

《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三编《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第八章《天津教区和新疆教区》第一节《天津教区》载：

“公元1933年，维克托尔担任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大主教。‘天津中华东正教会’的大司祭常××于公元1934年通过日本正教会的都主教谢尔盖同莫斯科牧首区取得了联系，这就使当时一部份极端仇视苏联的俄国侨民恨之切齿，称郑州道一号的祈祷所为‘红党教堂’。公元1936年，大司祭常××去世后，这个自办的教会（也是公元1945年以前，在我国的东正教会中，唯一同莫斯科牧首区发生联系的教会）由芮司祭主持。芮司祭于公元1941年去世后，这个教会则由杜润臣司祭主持。”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辑《一个主教的回忆》载：

“1941年秋，在献县总堂，出了类似河间的一个惨杀案，并且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今述其事如下：原来在献县城东十馀华里，有个土丘，名云台山，是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大坟地，也在那里种菜园子。1941年9月8日正午，有八路军游击队暗藏在菜园子的围墙角上，开枪打死正在围子旁边修公路的汉奸。……几个钟头以后，在献县城里的日本人由电话知道了此事，立刻开汽车来，把云台山上所有的人都逮了去。五天以后，即9月14日，又把总堂的中国人——神甫、修士、修女，我也在内，都集中到云台山上，日夜有日本兵监视着。我们在云台山上共待了十八昼夜，每天必提出人来讯问，倒没有讯问过我。十八天以后，即10月2日，才把我们放回总堂。不料第二日，又把我和三位中国神甫（即田凤庭、徐志远、何道隆）叫到城内，囚禁起来。那时在献县城内，先我们四人被囚的，已有数十名了……

“我前后三次，也被提出去过。头一次是日本队长小川，问了我的姓名籍贯后，叫我在一张纸上签了字，承认在云台山上打死汉奸的事。第二次是在日本人前见了总堂的外国神甫们，因为他们要求了日本队长，愿见我一面，见面时，我只能说“我好，我无病，你们放心吧”，就完了。第三次是在翻译官前，见了蚌埠教区的主教Mgr. Casjini（意大利人）。他来日本司令部，要求见我，并给送来点心和酒。见我之后，他又领我去见日本司令，请求把我保出去，司令不准……

“正当献县总堂的人在城内坐监时，日本人把何松月神父、李万仓先生一同解到沧州去，因为照日本人的看法，他们是主犯。这二人在沧州，不知何日，都被日本人害死了，至今不知他们死尸的下落。这里我也把李万仓先生的历史说几句。他当时（1941年）虽在天主堂学校供职，饮食住宿却在自已家中，不在我们总堂里。为此，他没有同我们一起被集中在云台山上。可是他很关心被集中的神父、修士、修女们。他天天同给我们送饭的人去云台山上望看我们。这事不久被日本人发觉了，就把他逮捕了去……

“1941年11月22日，天主堂的数十名坐监的被释放了，其余17名仍留在监里。转年1月24日，日本人用大汽车把他们载到城东四十华里淮镇，用刺刀把他们全刺杀了。计其中有修士封金铎，有韦、周二位贞女，有先生韩天民、葛守礼等8人，有工友何松池等6人。他们的死尸全埋在日本岗楼附近的壕沟里了，这是当时给汉奸做饭的张维岭说的。”

《张家口文史资料》第十六辑(民族宗教专辑)辑:

崇礼县民族宗教局《崇礼县天主教历史沿革概况》附录:

西湾子教区主教与司铎姓名表(1941年8月)

号	华名	年 岁			国籍	现住址	备考
		生年	月	日			
1	石德懋	1881	12	3	比	崇礼县西湾子	
2	饶启迪	1898	7	4	比	同	
3	高乐康	1903	3	11	比	同	
4	顾秉真	1899	12	8	比	同	
5	隆德里	1904	12	29	比	同	
6	梅丽觞	1907	1	3	比	同	
7	盖师礼	1907	12	2	比	同	
8	彭好德	1905	9	12	比	同	
9	郭义海	1908	2	12	荷	同	
10	万世礼	1910	6	29	比	同	
11	姚耀恩	1911	10	8	比	同	
12	德满义	1911	10	15	比	同	
13	任玉然	1908	10	2	中	同	
14	姚桂龄	1909	6	28	中	同	
15	毕耀崇	1913	4	23	中	同	
16	姚白	1912	5	6	中	同	
17	贝耀中	1901	12	30	比	崇礼县高家营子	
18	计礼全	1892	6	11	比	同	
19	冯海深	1908	5	6	比	同	
20	刘慕义	1914	4	1	比	同	
21	郝进修	1907	2	15	中	崇礼县白桦沟	
22	魏宗佑	1902	4	6	比	崇礼县五号	
23	何维国	1878	2	12	比	崇礼县大圈圈	
24	薄循义	1887	2	28	比	崇礼县圪塔素	
25	邹广衡	1911	5	19	中	崇礼县棋盘梁	
26	李树实	1907	9	8	中	崇礼县西榆树坪	
27	米启蒙	1896	5	10	比	宝源县平定堡	
28	李祥	1912	4	9	中	同	
29	杨森	1906	10	30	比	宝源县千金堡	
30	王海楼	1912	3	16	比	同	
31	杜维礼	1880	1	30	比	宝源县高山庄	
32	隆达礼	1907	2	9	比	宝源县狐狸峪沟	
33	于文容	1913	6	2	中	同	
34	胡怀义	1898	2	14	比	宝源县头号	
35	尹恒明	1901	12	2	中	宝源县香麻沟	
36	善秉仁	1899	9	22	比	张北县公会	
37	张元	1868	12	31	中	同	
38	马德纯	1881	5	9	比	张北县石柱子梁	
39	安崇仁	1887	2	12	比	张北县落花营子	

续表

号	华名	年 岁			国籍	现住址	备 考
		生年	月	日			
40	罗维代	1877	4	19	比	张北县黑麻湖	
41	德维道	1874	11	17	比	张北县大圪达	
42	万德本	1911	12	20	比	张北县台路沟	
43	希化行	1896	9	5	比	同	
44	樊德屏	1878	1	30	比	张北县二泉子井	
45	奚来华	1913	4	21	比	同	
46	田开智	1894	5	29	比	张北县南壕堑	
47	雷有望	1871	9	18	荷	同	
48	顾茂荣	1887	4	5	比	同	
49	汤茂泉	1888	10	4	荷	同	
50	孟秉直	1898	12	25	比	同	
51	侯鼎业	1907	2	10	比	同	
52	包育仁	1907	12	2	比	同	
53	靳 江	1902	11	4	中	同	
54	徐步云	1903	4	19	中	同	
55	李向荣	1903	9	11	中	张北县南壕堑	
56	宋连德	1908	12	10	中	同	
57	姚德楨	1909	3	20	中	同	
58	步玉礼	1910	7	2	比	张北县老虎山	
59	戴尚德	1908	12	28	比	尚义县半圪塔碌轴	
60	樊海清	1901	11	1	中	尚义县北苏集	
61	张可兴	1914	1	6	中	同	
62	何志清	1906	9	18	中	康保县水泉子沟	
63	赵振民	1912	9	10	中	德化县二根土	
64	司律思	1911	7	10	比	商都县高鸟素	
65	黄傅贞	1891	9	3	比	兴和县城	
66	侯鼎宪	1913	4	3	比	同	
67	贝义朗	1913	3	31	比	兴和县喇嘛营子	
68	费立德	1904	3	15	比	兴和县二十三号	
69	段金章	1867	1	11	比	同	
70	李闻诗	1904	1	6	比	同	
71	姚正风	1911	12	12	中	兴和县姚子沟	
72	万隆德	1906	1	30	比	同	
73	富希永	1914	10	24	比	兴和县灶火口	
74	袁秉信	1897	4	25	比	兴和县六号	
75	惠立百	1905	11	24	荷	兴和县大囫囵	
76	王崇一	1912	3	7	中	同	
77	普陆思	1908	4	2	荷	兴和县薛家麻	
78	方希圣	1903	10	29	比	北京	学美术
79	万广礼	1912	4	10	比	集宁县玫瑰营	暂任教授

附 录

一 唐、元河北省境域及明清以来 河北省政区概述

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的北部、首都北京的周围。东临渤海,西依太行山与山西省相邻;西北、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东北部与辽宁省相连;东南和南部与山东、河南两省交界;中部与北京、天津两市毗邻。总面积 18.77 万平方公里。居民多为汉族(占人口总数的 96%以上)。还有回、满、蒙古、朝鲜等 53 个少数民族。全省分设石家庄、保定、唐山等 11 个市,分辖 172 个县(市、区)、6 个民族自治县。省人民政府驻石家庄,距首都北京 268 公里。

“河北”作为大政区的名称是在唐代才出现的,公元 627 年(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其中就有河北道。今河北省大部分境域在当时的河北道南部。

今河北省地方在元代主要为中书省所辖,明代为京师领地,清代主要属直隶省(治保定,即今保定市)。据《清史稿》,直隶省辖顺天、永平、保定、正定、顺德、广平、大名、河间、宣化、承德、朝阳、八府,赤峰、遵化、易、定、赵、冀、深七,直隶州和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直隶厅(口北三厅)^①。此外,今邯郸市西南部属河南省彰德府,今张家口市阳原今以西属山西省大同府,今石家庄市元氏县以西属山西省平定州,今邢台市临西县、邯郸市邱县属山东省临清直隶州,今邯郸市馆陶县属山东省东昌府。

1911 年,今河北省境域主要属直隶省,省会迁至天津。1914 年,改原顺天府为京兆特别区,置原承德等府为热河特别区(后改建为热河省),置原口北三厅及山西省五县为察哈尔特别区(后改建为察哈尔省),南部临漳、涉县、武安市属河南省,馆陶、邱县属山东省。

1928 年 6 月 28 日,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当时所辖南乐、东明、清丰、濮阳、长垣等县今已划归河南省。10 月 11 日,省会由天津迁至北平。1930 年 10 月 15 日迁回天津。1935 年 6 月,由天津迁往保定。1949 年 8 月 1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全省分设唐山、天津、通县、保定、定县、沧县、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 10 专区及保定,石家庄、唐山、秦皇岛 4 市。今张家口市属察哈尔省,承德市属热河省,沧州市东南部属山东省德州专区,北京、天津均为中央直辖市。

1952 年 9 月,河北省宛平县全部和房山县、良乡县的部分村庄被划归北京市。1953 年撤销察哈尔省,其划归河北省的部分设为张家口专区;1955 年撤销热河省,其划归河北省的部分设置承德专区。1958 年 2 月,省会由保定迁至天津;撤销通县专区,并入唐山、承德、天津 3 专区;撤销沧县专区,并入天津专区;同年底,撤销天津专区,原辖县划归天津市。1961 年复设天津专区和沧州专区(原沧县专区)。1967 年 1 月,天津市仍归中央直接管辖,省会迁回保定,1968 年 2 月又迁至石家庄。1970 年 10 个专区均改为地区。1973 年天津地区改名廊坊地区。1983 年撤销唐山地区,原辖区分别并入唐山、秦皇岛 2 市。是年底,全省分设 9 个地区(含 3 个地辖市)、9 个省辖市。1995 年,全省完成向市管县体制的转变,分设秦皇岛、唐山、廊坊、承德、张家口、保定、沧州、衡水、石家庄、邢台、邯郸 11 市。

^① 《清史稿》卷五十四《地理一》。

二 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 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表(永年教区)摘要

永年教区在1929年正式自治以前,是献县老教区三个总堂的辖地,即1、赵家庄总堂之一部:威县、清河及曲周东三区;2、永年总堂全部:永年、鸡泽、曲周、肥乡、广平;3、大名总堂之一部:成安、邯郸、磁县,一向受外国人管治。待至1928年,国籍总铎崔守恂由景县总堂调来,中国司铎及教友们呈请自治自传。次年(1929)蒙教宗批准,划上述十县为永年国籍自治教区,并委崔守恂总铎为首任主教。于是崔主教本自治的精神,除以身作则率领所属十七位国籍司铎努力传教外,更于总堂设立小修院,以培养中国化的传教士;创办圣神修女会,以造就中国化的修女,作医务与救济的社会事业。正在大步前进,开始收到效果之时,奈迭遭七七事变,经济冻结,以及1943年的荒歉,各业务陷于停顿状态。1947—1948年群运时,房产全部为政府借用,土地被政府没收,教会团体整个解散;崔主教独至邯郸北张庄分堂养老,其他四位司铎或回家自养,或转他方谋生。今春三月十五日,崔主教病故,委任年长司铎王守谦为代理主教,暂负教区责任(附《教区说明书》)。现有代理主教1名,司铎13名,修女27名,孤儿55名,教友32322名。1946年的组织概况:教区辖3个总堂,1个小修院,1个修女会,有教友50009人。赵家庄总堂辖4个分堂(现有教友7683名);永年总堂辖4个分堂(现有教友10620名);成安总堂辖5个分堂(现有教友9869名)和4个眼科诊疗所,附设孤儿院。

附:永年教区经济情况及教区近况说明书

1、经济情况:永年教区自1929年正式自治自传以来,力图自养自给,于是发动教友每年自动捐献经费,由少而多,由发动而习惯,每年所获不(为)[无]小补。但在1940年以前,大部分经济还是仰赖教区基金(这基金在天津托献县教区账房经营代管)及全世界传信会的资助。七七事变后,教区基金因了纸币折色,绝大部分毁于日寇,教会支出大感困难。1941年日寇更实行外汇冻结政策,传信会的资助遂告断流。至此教区经济与外国资助完全脱节。教区当局乃决议各司铎根据个人情况谋生自养。于是成安王子真总铎为了自己生活,为了群众服务,先后创立成安、磁县、邯郸、肥乡四处眼科诊疗所。创办经过与发展情况,已由医院部门详细登记过了,兹不多赘。

2、教区近况:自群运中永年教区教会团体解体后,仅成安、磁县、邯郸、肥乡四个教会事业跟着人民政府发展起来了,但在教会的行政上已失掉正式的关系。崔守恂老主教也为了生活问题来到邯郸县北张庄分堂养老,全部生活费除该分堂土地收入外,概由邯郸等处医院供给。当时因了各大都市未曾解放,数年中与教会领导机关未曾发生关系。今春三月十五日病故,逝前委任年长司铎王守谦暂负教区责任。但是全教区内现有十五位司铎,或居家自养,或搞医院自给,或游行生产;正式传教系统与机构也不复存在,遇有特别事故,则在邯郸公教医院临时操办。这是教区内领导方面的近况。至于教友,在七七事变以前曾到过五万余名;待事变、灾荒及教务停顿之后,尤其自司铎各自谋生以来,教友无人照顾,更无人统计,仅仅与司铎邻近者有时参加一点宗教仪式,故现在永年教区教友陷于自流状态。在登记表上所举教友之数字与会长姓名,因了时间仓促无法调查,概系临时估计及旧日的回忆,现在或生或死或在家或出外,不可详考。

永年教区临时负责人 王守谦 具

1951年6月27日

1. 赵家庄总堂

赵家庄在成立总堂之前,是永年总堂的一个直属分堂。自1902年以后,法国人金道宣总铎主持永年总堂,因赵家庄分堂教务繁重,每年大部分时间消耗于此。1916年因鞭长莫及,献县教区当局划威县、南宫、清河及曲周东三区为独立总堂区,总堂设在威县赵家庄,并委法国人萧司铎为首任总铎。从此大动土木,修建一座大楼,扩大公[教学]校,收生七八十名。1923年奥国人舒恩光总铎继任。1924年法国人雍居敬总铎继任,又重新修建公校,收到170名,盛极一时。1928年崔守恂总铎(中国人)调来。

此时南宮总堂成立,赵家庄总堂则直辖威县、清河及曲周东三区。次年(1929)永年教区成立,崔守恂升格主教,王守谦司铎任总铎职,十数年来没有变更。在教务上,七七事变以前都在展进,事变之后逐渐衰落。待至1947—1948年群运中,房产被政府全部借用,赵家庄总堂整个解体,各分堂司铎也各自奔前程去了。至今虽有几位司铎在家居住,或作木工,或务农业,但无总堂领导,也不复作传教业务了。

2. 赵家庄分堂

赵家庄的开教历史不可详考。(明)[相]传明末该村有人在临清经商,因与该地教友有亲友关系而领洗进教,归劝村人,相继进教。当时直属北京教区,每年多赴京参加宗教仪式者,有时北京司铎也来下会。约在1810年左右,由北京教区割分献县教区,从此司铎数字增多。某法籍司铎来赵家庄买地建房,成立正式分堂(约在1820年左右)历年相传,开展了威县一带的教务。后来永年总堂由大名总堂划分出来以后,则直属永年总堂。1900年反洋运动中,因赵家庄全村是教友,未曾受害。平定后,教务大振,开始成立小学。1916年赵家庄总堂成立,法国人萧司铎总堂兼分堂,大事建筑。以后分堂常由总铎兼任,管理威县南部及曲周中东区之教务,历数十年,也无显著的变化。待至永年教区自立以后,总铎王守谦兼副主教于1933年不使兼任,始添设赵家庄独立分堂。首任是赵保禄司铎,他一面养老一(方)[面]管理分堂。1942年赵行道司铎继任。时值日寇蹂躏,相继荒歉,教务渐渐缩小范围。待至1947—1948年群运中,总堂全部为政府借用,赵行道遂赴新乡教区了。至今教务无人主持。有分堂司铎1名,助理员1名,教友1251名,其中赵家庄教友587名。

3. 钟官营堂口

钟官营王姓某在1820年左右,因与魏村教友有亲友,相劝而进教。约在1820年赵庄分堂建立后,某法籍司铎来此布道,于是进教者日众,买地盖房。1900年毁于反洋运动。1903年左右教友们捐献巨款,教区资助一部分,遂修建圣堂,及宅院二所。此堂口始终属赵庄分堂,在教务上与潘村相同。1947—1948[年]群运中房产为村政府借用。赵家庄分堂崩溃,此堂口也(遂)[随]之停顿教务。会长王振堂,教友数目210名。附属村小集村,教友40名,房屋5间。

4. 陈家庄堂口

陈家庄与赵家庄最近,均在1750年因亲友关系进教。约在1820年后修建公所。约在1895年建造圣堂。1929年永年教区成立后曾一度成立小学、蒙学,高俊生则赴赵家庄公校读书。此堂口贴近赵家庄,在组织上无变动。1949年因荒歉出外谋生者不少。1947—1948年群运中房产为村政府占用,教务停顿。会长陈俊兰,教友数目154名。附属村小营,教友4名。

5. 潘村堂口

(约在1820年以后法国人某司铎创办。)自开教以来常为赵家庄分堂所辖。1903年魏村建堂,工竣将所余材料尽数运到潘村。1904年建造圣堂。1910年本村张老蕊明绅倡议教友捐献,自己提出一部巨款修建男女学院及司铎宅院等。1935年后曾由张耀曾开办一个小学。1947—1948年群运时赵家庄分堂完全瓦解,潘村房产为村政府占用,教务也随之停顿。会长张耀璜,教友数目约300。附属村小刘庄,教友40,房9间。

6. 张家庄分堂

相传明末张家庄有张姓某,因与邻村贤塔教友田姓女结婚而进教,(遂)[随]后族人相继进教。每年有人赴北京参加仪式,有时北京司铎也来下会。约在1820年左右有献县教区某法籍司铎来村主持,买地建房,成立分堂。1870年左右法籍司铎更集教友捐献,配合教区津贴,修建大规模的圣堂及男女学院,成立男女小学。1900年反洋运动中受害不大,但次年本村分堂司铎法籍罗梦笔由赵家庄归途中,死于广宗人景(庭)[廷]宾之暴动。教友为纪念罗公热心教务,修一祠堂。1929年永年教区成立之后,闫景成继法籍牟利叟司铎主持张家庄分堂,兴办学校,在四周堂口中修建经堂公所,颇显兴旺。此后1937年费振华继任,时值日寇临境,教务日衰。1940年李少虚、1943[年]刘道明相继主持,又值灾荒,出外谋生、饿死于家者不少,因之教友数字大减。1945年潘国盛司铎继任,教务日趋衰落。1947—1948年群运中全部房产为政府借用,潘国盛转往他处,宗教活动遂告停顿。张家庄及附属3个村教友

数字 735 名。

7. 鱼台堂口

相传明末开教,详细情况不得明白。开教后人数渐增。1870 年左右法籍纪司铎(名不详)协助教友建成小型圣堂,后经 1900 年人民运动亦未受害。1929 年永年教区独立,外籍人绝迹。向属张庄分堂领导。教友数目及今 200 余。迨至群运,教会形(成)[势]瓦解,教务亦告停顿。会长安存名,教友数目 230 人(1951)。附属村:小张山,教友 45 人;蒋庄,教友 39 人,房 6 间;臭张庄,教友 55 人;南张庄,教友 45 人;小李庄,教友 85 人,房 8 间。

8. 贤塔堂口

本村开教后即属张庄分堂领导,建堂时间可能在 1870 年左右,为法国籍纪司铎所主持。1900 年人民反洋运动中本村教友受到相当连累,杀死教友十数人,房屋未毁。群运后房屋被分配,宗教活动停止。会长田太祥,教友数目 147 人(1951)。附属村大幸庄教友 55 人。

9. 寺庄堂口

不详明末怎样开教。约在 1870 年成立公所,归张庄分堂法籍纪司铎管理。1900 年人民反洋运动发起后本堂口退教者很多,事后渐渐恢复。每年开教理传习学校,信教者日众。永年教区独立后,1933 年中国司铎闫景成发起教友捐资,建成 15 间经堂,教友 259 人。群运后房屋没收,宗教活动停止。会长严鸣武,教友数目 259 人(1951)。附属村徐店教友 65 人。

10. 小辛镇堂口

开教百余年,[不知]创办者为何人。教会资助建成公所。公所成立后先属威县赵家庄总堂管理,由法国籍鄂柏都司铎领导。1900 年为人民反洋运动所影响,堂口始终不见发展。1929 年永年教区独立后改归张庄分堂领导,及今教友 82 人。群众运动后一切宗教活动全部停止。会长柴振殿,教友数目 82 人(1951)。附属村:军寨 45 人,7 间房;马庄 55 人,4 间房;宋村 66 人,6 间房;康寺古 35 人,6 间房;元寺 35 人;邵良庄 55 人。

11. 花町堂口

1920 灾荒年中国司铎肖世光办理赈济,一时本村极形拥护,报名入教者百余名。厥后七七事变,因日寇之扰,大部教友相当退教状态。本村向属张庄分堂管理,不过早已失掉教会系统,更经群运,宗教活动于该村全部停止。会长张玉玺,教友数目 125 人(1950)。附属村:曹刘营 55 人,经镇 35 人,曹楼 55 人,刚李村 45 人,百悦 59 人,郝屯 20 人,房屯 59 人。

12. 曹营堂口

原于 50 年前 1900 年左右有教友十来人,不成堂口,每于陈庄赶堂。及至 1920 年灾荒肖司铎办理赈济,一时入教者百余人,由教会出资购得庄基建起房屋成立小学成为堂口。教区独立后属张庄分堂领导。及至事变后,形(式)[势]衰落。群运后房屋为群众占去,一切宗教活动停止。会长常中桂,教友数目 125 名(1950)。附属村:菜园 35 人,4 间房;大章台 55 人,3 间[房];小章台 35 人;红龙 55 人;杨庄 45 人;从峪 55 人。

13. 苏家林堂口

1908 年间,本村二三人得天主教教理书籍研究教理既久,投威县赵家庄法籍马泽轩,因以进教。1916 年左右买地盖房。及今教友 69 人,属张家庄分堂领导。七七事变后,全部房屋为日寇火毁。今村中宗教活动久已停顿,与教会已失掉联系。教友数目 69 人(1950)。附属村:庄村 55 人,6 间房;雷塔 38 人,5 间房;郑河 75 人,6 间房。

14. 东小城(属南官县)

本村本于 1879 年左右即有信教之人,不过为[数]不多,不成堂口。经常到赵家庄赶堂。1906 年法籍马泽轩司铎资助立堂。1939 年本村更由教会资助着捐资改造圣堂 15 间,后因日寇骚扰,教务不得进行。群运后房屋由群众占有,一切宗教活动全部停止。会长张成,教友数目 175 人(1950)。附属村:张牛村 55 人;赵牛村 38 人;马桥 75 人;东大城 85 人,11 间房;西大城 28 人;西小城 38 人;稣村 339

人,5间房;陈村65人,9间房;枣科49人。

15. 魏村(属威县)分堂

魏村开教的历史相传是这样:明末有孟和尚、李道士在京受戒,因研究道理而改信天主教,归劝村人,日久成一巨大堂口。约于1820年左右,有法籍某司铎来此主持,买地建房,成立分堂,教友逐渐增多。1900年反洋运动中,未受大害。1903年,刘钦明法籍司铎集中一部分教友捐献,配合教区津贴,修建一所大规模的圣堂。1915年法籍倪司铎来主此堂,无何建树。1923年中国人王守谦继任,扩大男女经言学校。1929年永年教区成立,王守谦升格赵家庄总(堂)[铎],费振华司铎继任。未几1931年赵保禄司铎、1933年李友梅司铎相继主持,没有特别的建设;只有一个仁慈堂女校,创自1905年,时有兴替,消灭于日寇临境之时(1937年秋)。1933年圣神修女会草创于此,1935年迁于赵家庄总堂,但修女会直属教区主教,与魏村分堂无关系。1942年游维道司铎继分堂职,建立医院一所,盛极一时。自1947年群运开始,房屋陆续为政府借用,诸事停顿,司铎不能存留,转往他处谋生去了。至今教务无人主持,一切宗教活动陷于停顿状态。有分堂司铎1名,助理员2名,工友3名,教友1457名,其中魏村及其附属村共743名。

16. 马家庄堂口

约在1860年,王姓某由魏村亲戚家进教,因之法籍某司铎遣人布道,修一公所,春冬设立经言小学。于是进教者甚夥,遂成立一个堂口。1900年反洋运动中公所被烧,教友数名被杀。1905年法人万司铎重建小堂及房屋。1929年教区自治以后,教务也无所展进,春冬两间只有经言小学、司铎下会而已。1947年群运时房屋为村政府占用,教友散漫,老会长死后更无人领导了。会长王金榜,教友数目60名。附属村五里台,教友50名,房7间。

17. (威县)城内堂口

1895年有刘姓某人接触了法国传教士鄂司铎,因以习闻教理,领洗进教。1906年法国司铎刘钦明来主持教务买地建堂,但教友人数并未发展,常年有一人住守房屋而已,教会方无何成就。宅院荒凉,房屋坍塌,教友人数渐减。1945年解放后房屋全部为政府占用。教友数目37人(1951)。附属村韩庄20[人]。

18. 枣园(属曲周县)堂口

1880年间逯老在因与魏村教友之亲戚关系曾闻教理领洗入教,时法国人马泽轩主持魏村堂口事务。1910年法国司铎刘钦明买地建堂,春秋农暇立学传教,信者日众,直到教区独立。常属魏村分堂。及至群运,群众分去房屋,教务停顿。教友数目130人(1951)。附属村:郭家村,教友43名,房8间;东台基,教友8名。

19. 麦子乌营(属曲周县)堂口

1850年间本村周姓某因与魏村连姻,得听天主教道理领洗入教,后信教者日增。1910年法国教士刘钦明来村买地建房,成为教友公所。向属魏村分堂领导。教会形(式)[势]始终无大开发。群运后,房屋被分配,宗教活动停[止]。教友数目50名(1951)。附属村:1、河北寨,教友4人;2、蔡寨,教友11人。

20. 沙河王庄(属曲周县)堂口

(1880年村人)王保真之父倡首立教,后信教者日众。1910年法国籍刘钦明司铎代马泽轩司铎主持教务,[用]外资建堂。自此本村立成堂[口],属威县魏村分堂领导。群运时房屋归群众分有,宗教活动全部停止。会长王献真(亡),教友数目80名(1951)。附属村:1、房家营,房7间,教友25人;2、铺上,房10间,教友29人。

21. 良善庄(属曲周县)堂口

本村王姓因与威县魏村有亲戚关系,习闻教理,马泽轩司铎领导开教。1911年刘钦明法国传教士出资建堂,属于魏村分堂。每年春秋农暇成立经堂传习小学,教友日增。1947[年]群运后,形成全部瓦解。会长王庆雨,教友数目80名(1951)。附属村:1、南刘村,房3间,教友30;2、路布寨,教友10。

22. 马庄营堂口

1890年王成林之父开始得到一本天主教教理书籍《天主实义》，读来读去，颇有心得。继而投到魏村天主堂访问，终得法国人马泽[轩]收入教籍。1912年法国教士刘钦明主事，教友渐增，乃买地盖房，成立堂口，属魏村分堂。群运后一切停顿。会长王成林，教友数目40名(1951)。附属村波流固，教友10名。

23. 清河县分堂

清河全县堂口，向属南宫县东区范家寨分堂(现为景县教区)。约于1900年后，有奥籍舒(司)[恩]广司铎，来清河县西街路北，购地二亩，建房立堂。后廿馀年中，堂内只设一看门先生，无其它工作，1921年，范家寨继任司铎，为法籍贝利永。贝于堂内东院，设立小规模之女子经言[学]校。1929[年]教区独立后，首任国[籍]司铎为安东岭，常住此堂，主持全县教区。1939年日寇将该堂全部拆毁，现只留一片残砖烂瓦。时该堂司铎为游维道，暂移城东北西高庄堂内。后继任司铎为闫景成，来往各村，即无定所，1947年群运时，迫回家养老，全县堂无人领导。有分堂司铎1名，助理员2名，教友1060名，其中清河县城35名。

24. 简家楼堂口

约在1635年，本村简姓某人(其名难考)奉教立堂。1929年前，属南宫东区范家寨分堂领导。1929年教区独立后，清河县成立分堂，即不属范家寨了。1936年后因连年荒歉，教民四散奔逃，教务大衰。1946年群运时，堂被政府占用成校，教务完全停顿。会长简才林，教友数目约190名。

25. 西高庄堂口

约于1800年刘修业之父(名不详)奉教开创堂口。1890年间，村中即有小堂。1900[年]义和团反洋运动时，全毁于火。1905年，复建瓦房七间，即今之经堂。后又成立男女经言小[学]校，陆续建筑十馀间配房，此时教友数目大增，盛极一时。会长刘希贤，教友数目约230名。有附属堂口武家那，约有25名。

26. 赵家庄堂口

约在1870年赵姓某人(其名不详)奉教立堂。约在1890年有法国冯司铎(其名不详)买地建房，成立本村经言小[学]校。1940年各处农村渐次破产，教民随之衰落。1946年群运时，堂房均被村政府占用，教务停顿。会长赵培茂，教友数目约80名。

27. 连冢屯堂口

1813嘉庆年间有村人林某(名不详)在简家楼奉教，归后劝村中多人奉教。1870年左右，法国鄂司铎买地建房。1900年毁于庚子大刀会之乱。1903年又在原地修房八九间，成立本村经言小[学]校。1947年群运时归村中借用。会长刘富德，教友数目约85名。附属村：连冢寺，教友40[名]，房5间。

28. 段二庄堂口

1910年左右，张经明在南宫范家寨分堂给舒恩广司铎做工奉教，家人因而全部领洗。后舒司铎买地建房，成[立]本村经言小[学]校，奉教者又添数家。1947年归村中占用。会长张经时，教友数目约50名。

29. 刘庄堂口

约于1903年奥国舒恩广司铎买地建堂后，成立本村经言小[学]校。1929年教区独立后，仍继续成立小[学]校。1937[年]日寇进入中国，教务几已停止。1946[年]群运时，瓦房被村中占用。教友数目约40名。附属堂口：大辛庄，约20人。

30. 大寨堂口

1900年后，各处奉教者风起云涌，该村即有人找奉教人介绍奉教。1905[年]奥国舒恩广司铎为之买地建房，成立本村经言小[学]校。后又添人数家。会长赵一恒，教友数目约50人。附属村：杨庄，约40名；简庄，约40名；大堤，约70名；邵固，约65名。

31. 永年总堂

永年县成立总堂的系统始于1894年。因当时地方教务繁杂,总[堂]远于大名城内,不易管理,乃辟永年为总堂。首任总铎为法国人马泽轩,统理永年、曲周、鸡泽、邯郸、磁县、广平、肥乡等地分堂的一切传教事务。1899年法籍金铎道宣任总铎职,乃大事修建,计筑成大经堂19间,成立一所小学校。此后继续。换来翁裕仁,起而代金道宣建设。1920[年]换来法籍教士肖某。1929年永年教区独立,已在本地传教之何道隆司铎接受总堂内一切事务并任总铎职。时教会上下极为兴(愤)[奋],乃将总堂内大加修整,全力发展教育,1928年改组小学校名曰“天永小学校”,深(深)[受]地方欢迎。1935年何道隆司铎调任成安,换来成安总铎张哲清,一切照常运行。未几“七七”事变,房屋一部为日寇破坏,一部为之侵占,小学校早已解散;张哲清逃居乡间,城乡关系隔绝,总堂与各分堂的组织亦呈瘫痪。1939[年]张喆清因病辞职。1941年将广平、肥乡并入成安总堂,派来张桂清司铎重来收拾,又遭铁匪据城之祸。1948年张桂清司铎与鸡泽分堂司铎费振华困死城内。至此永年总堂系统便告灭亡。有总堂司铎1名(张桂清),分堂司铎6名,传教助理员8名,工人4名,教友10620名,其中永年分堂6堂口464名、临铭关分堂17堂口4504名、南里岳分堂15堂口5164名、西屯庄分堂5堂口488名。

32. 永年分堂

约于1870年本城禁止开教,详不得知。据考查所得,开教后,即有法国人传教管理,详情不知。当时本堂形式未具备,传教士只是一年一度的巡视堂口。1876[年]始作临时住足之地,鄂伯多(柏都)法国司铎在城内南仓街购买庄房,是为本堂的最初形(势)[式]。1890[年]法人金道轩接管,教友人数未见发展。1902年教区为了工作方便设总堂办事处于此,同时本堂口就成了分堂的分位,管理着各堂口的教务。1916[年]换来了法人肖司铎到任视事,乃大事修建,本堂则消没在总堂的建设系统了。1929[年]教区成立,总堂形式变化,本堂亦随之而化为一方教会教育中心。事变后铁匪据城,更遭全部破坏,张桂清、费振华二位司铎困死城中。现在教会全部房产已归政府使用,亦无任何宗教仪式了,至此告以停顿。有传教司铎2名,助理员2名,工人2名,教友464名,其中永年县城18名。

33. 北沿村堂口

1925[年]何道隆(中国人)首先在此开创,教务颇兴。1929[年]新教区成立,教务更长进不止。(随)[遂]买地建堂,成立经言小校,教友很是进步。及至1947[年]群运时,房屋归农会分给群众占居,教务即不能进行而停顿矣。会长杨兆吉,教友数目55名。附属西七级15人。

34. 康庄堂口

康庄约于1840[年]法人鄂伯多开创。首先康姓因与友人言谈,闻道进教。始只三四家,后增至数十家。后经法人高、金二位相继主持,出资买地,盖经堂、公所,成立小校。1929[年]教区成立,归中国人何、张二位司铎继续管理,每年设立经言小校,学习教理。至1947[年]群运时,房屋被占用,教友不能聚念公经,(随)[遂]停顿。会长康举德,教友数目64名。附属:辛庄堡,6间房、26人;司郭庄,6间房、20人。

35. 马军营堂口

1900[年]金道轩开教于此,以后信教者日众。只因经言小校停顿,教友因之而衰。1929[年]教区成立归中国人,何、张二位司铎极力整顿,教务又兴。(随)[遂]买地建堂,教务盛极一时。1947[年]群运时,房屋归农会,教务即停顿。会长康举德、秦禹,教友数目35名。附属:北河庄,7间房、25人;余家寨,4间房、21人;李六寨,8间房、6人。

36. 沙屯堂口

1910[年]金道轩开教于此,教友心火颇盛,随成经言小校,教务大兴。1929[年]教区成立归中国人管理,进教者更多。及1943[年]因歉年,教友为顾生活对教务方面日见减色。1947[年]经群运时房屋归村农会,教务不进行,教友亦剩不多矣。会长杨玉林,教友数目50名。附属北中堡,15间房、15人。

37. 孔村堂口

1910[年]翁裕仁司铎(法人)开始在此传[教],成立经言小校,教务遂盛,买地建房。1929[年]分教区后即归中国[人]主持,何道隆、张哲清相继建堂成校,教务极盛一时。1947[年]群运时房屋被群众分

占,教务即不能进行而告停顿矣。会长郑砚田,教友数目 65 名。附属:河营,8 间房、12 人;大张村 37 人。

38. 临铭关(属永年县)分堂

本村开创于 1902[年],由曹庄传来。宋万祥之父首先入教,操持教务,往者日众。原来宋某是天爷乡头把椅子,对自己的道门,有相当的用心。后见外国人传教于此,莫(明)[名]其妙,就起了一种好奇的心,问天主教徒道理。一听条条有理,(随)[遂]弃旧从新,常向他徒弟说:“谁知天外还有天呢!我最近听说天主教的道理,胜似我们的道理万万倍。我不管你们改不改,我要信从真教哩!”因此他的道徒信者日众。及至 1925[年]永年总铎翁裕仁司铎见该堂教友日有增加,先盖大堂一所,后建房子多间,因此教务日益发达。1929 年后新教区成立,成归(任)[仁]及费振华(中国人)司铎传教于此,兴办初级小校,教务教育随之而兴。1935[年]刘西墀司铎继任。1937[年]敌人进攻中国,小校停顿,教务尚能进行。及至 1946[年]野战军第四师借住堂中北院,教务即不能进行。1947[年]夏群运时南北二院均归农会接管。以后北院归棉业公司借住,今又归供销社用;南院仍归农民分住。至此教务告以停顿。有传教司铎 2 名,助理员 2 名,工人 2 名,教友 4594 名,其中临铭关 87 名。从 1940 年起传教司铎为张成恩。

39. 中召庄堂口

1909[年]李堂只开始入教,时法人金道轩主持。1929[年]教区成立,改由中国人李、费、魏等司铎接管,出资盖房,教务亦不甚兴盛。1947[年]群运时房被村中农民分占,教友无处念公经,教务(随)[遂]停顿。会长李维只、李祥只,教友数目 78 名。附属东召庄,7 人。

40. 石碑口堂口

1921 年耿司铎在本村成校赈济,邓同德首先入教,圣教大兴,以后慢慢衰落。后因闫德荣、冯执敬在本村教经,当用房子一所,教务又兴,继续不断。及至群运时,经言学校不得成立,教务(随)[遂]停顿。会长邓同德,教友数目 68 名。附属:台口,9 间房,32 人;大油村,12 人。

41. 永合会堂口

于 1894[年]由法人金司铎开创,侯牛保首先入教,不甚兴盛。待 1929[年]归中国人接收,有李、费、魏等中国司铎相继管理,再有教会(献县老教区)助资购地盖房,成立经言小校,(觉)[较]为(少)[稍]兴。1947[年]群运时房子被群众分住,教务(随)[遂]停顿。会长侯良只,教友数目 45 名。附属:庄沟 21 人;高窑 10 人;冀窑,3 座土窑、35 人。

42. 李家湾堂口

1901 年中国人肖世光在此开教,翁司铎(法人)主持出资买地基一所,设校学习经言,教友日多。1929 年归中国人费振华、魏玉秀等管理,由教会助资建公所,教务甚兴。1949[年]土改时房屋被村农会分给群众,教友无处念公经,教务(虽)[遂]停顿。会长李献堂,教友数目 129 名。附属:温窑,9 间房,73 人;刘窑,22 间房,63 人;胡家沟,30 间房,23 人。

43. 洞头堂口

1873 年法人(俄)[鄂]司铎在本村开办经言小校一所,凡入校之学生皆有赈济,因此全村小孩全入校学经,即大人亦屡次听讲。此时领洗者不少,几乎全村奉教。(随)[遂]盖一大堂,教务甚盛。1900[年]义和团闹教,大堂被烧,教友遭难者亦有。1906[年]经法人金司铎重建大堂一座,教友随之又起。1947[年]群运时全部房子均被村农会接管,教务停顿。会长闫世修,教友数目 200 名。附属:西苏 35 人;李固,5 间房,20 人;马固,18 间房,60 人。

44. 大屯堂口

1890[年]鄂司铎(法国人)首先引闫成信入教,教友由少渐多,常年春冬两季成经言小校。后金司铎于 1906 年始建堂一座,颇胜一时。待 1929[年]改由中国人李友兰司铎接管。至 1947[年]群运时堂中房屋全被村政府占用,教务(随)[遂]停顿,无人(服)[负]责。会长高腾云、闫廷俊,教友数目 200 名。附属南刘固,7 间房,30 人。

45. 施庄堂口

1898[年]李司铎路中巧遇单之宣,二人谈道好久。之宣归后心中诚服,先劝本家奉教,未果,不得已自己先领洗入教。1915[年]成经言小校,听者日众。1929[年]归中国人费振华管理,买地基一所,教友一时心火兴起。1947[年]经群运时被农会一部分占有一部分拆去,教友不得齐念公经,教务(随)[遂]停顿。会长郭造保、单重贵,教友数目127名。附属:孟(?)庄,6间房,57人;苗庄5人。

46. 界河店堂口

1900年、刘吉苓因娶洞头教友武姓女为妻,(随)[遂]因之而奉教。后因无人照顾,[教务](随)[遂]衰。1929[年]经费司铎成立经言小校一所,教务即兴。1933(年)由教区并由本村教友自助,买念经公所,教务甚兴,继续不断。1947[年]群运时房子完全被村政府接管,教友无处念经,教务(随)[遂]停,无人负责。会长张金玉、李克良,教友数目125名。附属七里店,19间房、37人。

47. 周村堂口

1890年刘治民赴洞头串亲,初次听李司铎劝其进教。后不断去洞头听讲。1898[年]在本村成[立]经言小校一所,听讲者日众,教务(随)[遂]为之兴。于1929[年]后归费司铎管理,买念经公所,教[务]便前进不停。1947[年]群运时全部房子被群众分占,教友无处念公经,教务(随)[遂]停,并没人负责。会长程其祥、王国中,教友数目78名。附属:八汪,11间房、35人;赵固,14间房、25人;三塔26人。

48. 兴业村堂口

1896年吴景盛开(市)[始]入教,由曹庄传来,教友由少渐多。1929年改由中国人管理,有李友兰、费振华等主持。1932年由教会资助,买地建房,教务盛兴。1947[年]群运时,全部被农会接管,教务(随)[遂]停顿而无人负责。会长赵高奎、赵大马,教友数目109名。附:杜村,房子6间、38人;苏固,12间房、53人。

49. 刘汗堂口

1865[年]鄂司铎(法国人)在本村开始传教。虽当时领洗者不多,后却日增一日。1929[年]分教区后归中国人管理,教务大兴。后经费振华司铎建经堂一所,教友心火更起。1947[年]经群运时被农会分去,教务(随)[遂]停。会长李万同,教友数目195名。附属:刘营,9间房、59人;冀固82人;榆林83人。

50. 东滩头堂口

1865[年]法人鄂司铎开始兴办小校,听讲者日众。后男女经言小校均成立,教务颇兴。终于1929[年]教区成立,经中国人重新兴办,教务更兴。(随)[遂]建一念经大堂。1947[年]群运时堂房被群众分占,教务(随)[遂]停顿。会长赵诗礼,教友数目195名。附属:西滩头(?),6间房、67人;魏庄62人;龙泉,9间房、85人;龙槽63人;朱庄55人;瓜井35人;段庄85人。

51. 北尹固堂口

1865[年]法人鄂司铎在本村开教,教友很是慢散,不见长进。后于1929[年]教区成立归中国人主持,教务即大兴。后又买地建堂,教友心火大起,继续不断。1947[年]群运时房屋被农民分居,教务停顿。会长陈祥只,教友数目125名。附属:梁庄,9间房、85人;柳村,9间房、89人。

52. 小北汪堂口

1865[年]法人鄂司铎开始传教于本村,听者颇众,日盛一日,(随)[遂]建大堂一座。及后又慢慢衰落。1929[年]教区成立后归中国人管理,教务又兴。1947[年]群运时多数房屋被拆,即大堂亦不平整,其余未拆之房住农民,教务(随)[遂]停。会长张丙辰、赵德修,教友数目125名。附属:李解56人;讲武49人;张虎庄,9间房、38人;董庄42人;北卷子,9间房、55人;南卷子39人;李卷子49人。

53. 通头堂口

1865[年]法人鄂司铎始传教于本村,成立经言小校,听者日众,继之领洗者不少,(随)[遂]极盛一时。后因断了经言小校,教务即衰。1929年新教区成立归中国人主持,买地建堂,教务又兴。1947[年]群运时经村农会分给群众分居,教务即停顿不进。会长程满仓,教友数目75名。附属:东阳城49

人；西阳城 27 人；屯庄，40 人，9 间房。

54. 曹庄堂口

1860 年开教，确人不知。受过威县赵家庄任太显之姑母捐献产地十亩作兴学用费，现在积成 93 亩地。1860 年开教后即有法国传教士高据山周年巡行传教，信教者日众。1890 年本堂口归永年总堂领导，金道宣主管，成立女学校。1903 年金道宣出资建堂，赵女士捐款助学。厥后迭经更换主管人员。1929 年教区独立后本村便脱离了外国人。1940[年]有刘栖墀到本村半养病半主管本村教务。群运后土地房屋归群众分配，刘司铎返原籍，教务停顿。教友数目 522 名(1951)。

55. 西屯庄(属鸡泽县)分堂

1905 年村人有名慕三乐者，素在道门。及闻天主教为真教，心向往之，乃赴西柳村找人接洽。于是学经望教，准备领洗。归后与邻里商讨，自西柳下请传教先生，时永年法国金司铎许之，教务大开。遂买地一段，至 1912 年法国萧司铎为之建房数间，做为经堂。工未竣，萧司铎升为威县赵家庄总铎，中国杨印溪司铎继之，又增建东瓦房三间，为司铎住室。嗣后又盖女校三间，成立本村女子经言小校。至是仍为县中之一般堂口，属邻县南里岳分堂。1929 年教区独立后，尹志渔国籍司铎被遣为该县本堂，乃将此堂改为驻所，自是成为分堂矣。1942 年武修德继之。时日寇不时(搔)[骚]扰，教务几皆停顿。1943 年费振华继之，铁军据守永年时困死城内，全县教务即无人负责了。1946 年有分堂司铎 1 名(费振华)，助理员 2 名，教友 488 名，其中西屯庄 138 名。

56. 浮图店堂口

自 1868 年村人高庆云病愈归教之后，从邻县永年康家庄请来教友，教经劝教。不久高花方、高金玺、高安堂等数家领洗入教。1899 年法国金道宣司铎为买公所一处，作为临时经堂。至 1932 年，教区独立后，总堂拨款一部，与教友捐献合资建一大堂。1947 年群运时全部为村中仓库占用。因无人领导，教友冷淡。会长高俊杰，教友数目 55 名。附属村：焦左，房 10 间，占地 5 分，教友 50 名；朱庄，房 5 间，占地 5 分，教友 23 名；北庄教友 30 名；西庄教友 20 名。

57. 西柳下堂口

1889 年左右，村民李朝阳在邻村浮图店住亲戚，闻该村天主教为天下真教。归后不但自己毅然信奉，还劝村中多人信奉。1900 年后，永年法籍金总铎在该村买地半亩，建房十数间，成立了一方的小型公校(基金由献县李友兰司铎携来)，收生二三十名。七七事变后，土匪猖獗，扰乱不安，一切即告停止。群运时，堂房概归村民占用。会长苑(?)臣仲，教友数目 41 名。附属村东柳下，房 3 间，占地 2 分，教友 35 人。

58. 南辛庄堂口

1897 年史元勋创办。南辛庄本为曲周县属村庄，因距曲周南里岳分堂过远，在 1929 年教区独立各县分治后，即属鸡泽西屯庄分堂所辖。先是，1900 年间史元勋在时，领导得力，教友很为热心。1910 年史亡后，村中无人领导，司铎视临亦希，堂口遂陷入冷淡状态。至 1947[年]土改后，堂房成立村民小(学)校，教务完全停止。会长李法增，教友数目 22 名。附属村：赵堡，房 3 间，庄基 2 分，教友 15 名；于口(?)桥，房 9 间，庄基 3 分，教友 13 名；善堡，房 9 间，庄基 3 分，教友 10 名。

59. 永光堂口

1917 年闫重华、闫从善开创。1917 年永光村东牛尾河决堤开口，各村动员民众当水，惟永光村民坐视不动，因而被告成讼，当受重惩。村民闻永年城内天主堂司铎能管了无事，投之果然。归家劝多人奉教。1920 年左右，因见奉教无利可图，反教者不少，所剩无几。1929 年买成宅一所，上带老房木六间，即暂为经堂。1947 年群运时被村中没收。会长闫逢时^①，教友数目 55 名。附属村：康马昌，房 3 间，占地 3 分，教友 11 人；杨村，房 5 间，占地 1 亩，教友 5 人；砚池教友 15 人。

60. 南里岳(属曲周县)分堂

^① 登记表上有涂抹痕迹。

约在1840年,有法国鄂教士由大名往赵家庄,路过南里岳,住店中。村中因看洋人言谈闻道人教,设小学,习经言,人数渐多。后又有法籍教士贺斐尔乃于该村购地建堂。时四外尚无教友村庄,凡司铎、教友往来,皆以南里岳为中心地点。待1910年左右,始设常住司铎贝利永。后四外开教,支堂日多,即以南里岳为分堂焉。直属永年总堂。民国初年,为华籍教士杨印溪主持该堂教务,曾立一初级小学。1929[年]永年教区成立,改(有)[由]中国人接收,有任裕仁、刘达密、李少虚相继主持管理所属十四堂口。七七事变后迭遭日寇抢掠,教务即日见衰微。群运时,该堂房产被当地政府借用,教务即告停顿,教士回家谋生。1946年有分堂司铎1名(周弘人),助理员2名,教友5164名其中南里岳477名、大连砦309名、北马店172名、安砦188名、河固李庄328名、辛屯423名、呈孟61名、刘大砦236名、小第八914名、张庄498名、冀庄232名、田水庄185名、崔庄431名、牛町288名、北寺头412名。

61. 大连砦堂口

1915[年]贝利永开创,由教会津贴买得一所宅院。在房屋买好堂立成后,每年春秋两季成经言学校,男女教员负责训导,似觉兴盛。后经日人扰乱和群运影响,堂口渐渐衰败。会长张玉振(亡),教友数目297名(1950)。房屋已为农会分用,不复有宗教集会及宗教仪式,教友只在每人家中诵经。附属小连砦教友13名。

62. 北马店堂口

1915[年]贝利永开创,由教会津贴买得一所宅院。1929[年]间堂口极盛,因春秋两季屡次成立经言学校,有男女教员负责。迨1937年日寇扰乱,渐渐衰败。后又经1941、1942年之灾荒,更一蹶不振。群运时堂房均被分去占用。会长张风(?)河,教友数目157名(1950)。附属南马店教友15名。

63. 安砦堂口

约于1915年有法国贝利永司铎买地建房,成立本村经言小学校。1917年又盖瓦房三间,教务极盛。1937年日寇进入中国在彼村修盖炮楼,教友不敢在家,教务几已停止。1947年群运时堂房被村中借用。会长张鸿业,教友数目122名(1950)。附属:公城堡村39名,赵固村27名。

64. 河固李庄堂口

1919[年]杨若望(印溪)开创,由教会津贴买得一所宅院。初因上学者除每月受到大洋一元外,尚能读书识字。当时奉教极有心火。后因歉年灾荒,教会不能成学,(时)[始]热心大减,渐渐衰败下去。会长安景修(亡),教友数目137名(1950)。附属:1、贾庄村,房5间,教友82名;2、常庄村,房7间,教友78名;3、张八郎砦村教友31名。

65. 呈孟堂口

1919年杨若望创办。1919[年](由)[有]魏如明因赶集谈话闻道人教。每年冬季成小学,习经言,人教渐多。1929年教区成立由中国人接管,曾助资购宅一所。1947年群运时村人占用,教务停顿。会长魏珍,教友数目49名(1950)。附属朱砦村教友12名。

66. 辛屯堂口

1916[年](由)[有]孙姓因亲戚之介绍而入教。首由法人贝利永盖经堂一所,每年春冬成经言小学习经言。1929[年]教区成立后中国人刘大迷(达密)司铎接管。1947[年]群运时房屋由村中借用,教务散漫停顿。会长孙志先,教友数目357名(1950)。附属:1、南韩固村教友29名;2、卢营教友27名;3、南马庄村教友10名。

67. 刘大砦堂口

1916年间有法国教士贝利永因有刘大砦何里仁在本村劝人,欲进教领洗者过多,(随)[遂]准在该村买地建房,成立经言小校。1929年教区成后,仍继续成立小校。1937年日寇入中国,该村教务几已停顿。1947年群运时房被村中借用,教务涣散。会长何守德,教友数目75名(1950)。附属:1、史王庄村,房5间,教友50名;2、苦水堡村,房5间,教友48名;3、西韩固村,房5间,教友46名;4、槐後李庄教友75名。

68. 小第八堂口

约于1916年,杨若望司铎在附近河固李庄村用公教礼为安景修会长送殡,礼节动人。此村人前去参观公教礼仪者十数人,齐托李庄奉教者转求为彼等领洗入教。杨铎因准彼等人教,(随)[遂]亦准为彼等买了念经公所。当时教务极盛。现因公所为村中占用,教务亦随停顿。会长郭治帮,教友数目270名(1950)。附属:1、卜街村,房5间,教友187名;2、观岩村,房5间,教友168名;3、东魏村,房30间,教友209名;4、北马庄,房8间,教友123名。

69. 张庄堂口

1919年姚姓因亲戚谈话闻道入教,然教务不甚兴盛,每年成小经言学校,渐盛。1929年教区成立后更成立男女小校,四季不停,因之教务更盛。1947年群运时房为村中占用,教友散漫,教务停顿。会长姚光兴,教友数目137名(1950)。附属:石韩村,房18间,教友97名;2、弓庄村,房5间,教友83名;3、袁庄村,教友75名;4、郎屯(?)村,教友41名;5、第二町教友15名;6、第四町教友16名;7、于子口教友17名。

70. 冀庄堂口

1916年间冀庄有去南里岳赶集者数人,适遇[南]里岳大堂中行过大占礼仪式。参观者因见堂中礼节隆重,又听司铎讲道(随)[遂]心悦(而)[耳],专去堂中听讲,渐渐保守奉[教]。因求领洗者日多一日,杨铎(随)[遂]在1919年为彼等领洗,并为买地建房成小校,学经言,教务颇盛。现因堂房为村人借用,不能集会,教务亦涣散。会长张满柜,教友数目58名(1950)。附属:曲周城,房23间,教友30名;2、赵李庄村,房8间,教友56名;3、叶庄村教友49名;4、王庄村教友27名。

71. 田水庄堂口

1917年有名袁炳政者,因其母屡患负魔病,听说奉天主教能治此病,随[遂]托人代请奉教先生为其母驱魔治病,并许好后全家人入教,迨半月后母病果好,因而全家领洗。后又添数家。杨铎即为该村买地建房,成立经言小校,教务颇盛一时。现因房屋被村人借用,教友不便集会,教务亦停顿。会长袁炳臣,教友67名(1950)附属:1、四夫人岩村教友37名;2、马布村,房6间,教友40名;3、赵庄村教友18名;4、司砦村教友12名;5、大河道村教友5名。

72. 崔庄堂口

1917年崔庄齐泽润与外村人起讼,欲借天主教司铎之力取胜,(随)[遂]托张洞奉教者代求司铎。杨司铎令其去张洞大堂中诚心求胜,并言许在取胜后全家人入教。后官司果胜,因此全家人都在1919年领了洗。后因添奉教者日多,杨铎即为彼村买地建房,教务极盛。1947年房为本村农会借用。会长崔献业,教友数目187名(1950)。附属:1、侯村,房6间,教友57名;2、尹庄村,房8间,教友96名;3、益庄村,房6间,教友83名;4、杨固村教友8名;5、宋庄村教友35名。

73. 牛町堂口

(1919年)张洞奉教亲戚曾将牛町一教外亲戚劝入天主教。迨半年后此奉教之亲戚张凤举又劝了其村五六家亦奉了教。杨若望(随)[遂]在于1921年为彼村买地建一小大堂并司铎室,教友因此甚有精神办理教务。迨1947年群运时将堂及司铎室均被村政府拆散,因之教务亦停顿。会长杨墨林,教友数目152名(1950)。附属:军砦村教友17名;2、西来村教友28名;3、戚砦村教友19名;4、花屯村教友37名;5、前王庄村教友17名;6、后王庄村教友15名;南陈村教友14名。

74. 南寺头堂口

当时(1915年)有名孙殿禎者(寺头人)因与张洞张司铎(奉教者)交好,不断谈听天主教道理后心悅,(随)[遂]领洗入教,并劝其全家人都领了洗。因村中无公所,司铎去了即在孙殿禎家中住。后于1918年贝利永为彼村买了三间瓦房做念经公所,教友颇有精神为教务事。现因村中将房借用,教务亦停顿。会长孙殿奎,教友数目157名(1950)。附属:1、东三塔村,房7间,教友97名;2、五塔村教友42名;3、大屯村,房7间,教友41名;4、申屯村教友29名;5、樊庄村教友27名;6、西张庄村教友19名。

75. 成安总堂

成安总堂开创于1930年,张喆清司铎为首任总铎。该氏力求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自动捐献一部

[分]私产,并向教友发出建校捐启,兴建教堂与学校,成立志成完小一所。教务方面直辖成安、邯郸、磁县三个分堂的传教事务。1935年张哲清调任永年,换来何道隆任总铎。1937[年]日寇侵华,学校解散,校舍与教堂的全部设备尽遭破坏无余,何司铎被迫游行乡间,总堂与分堂的组织便呈涣散。1940年何总铎辞职返献县原籍。同年由肥乡换来王子真司铎继何道隆而来主持教务,因王子真当时是肥乡、广平一带之分堂司铎,又因了日寇的骚扰,教会各区交往不便,所以此时更将肥乡、广平二个分堂又并入到了成安总堂,以便由王子真易于管理。王子真乃收拾残存房屋,又为了解决生活问题,靠了教友的力量经营起一所营业性的眼科诊疗所,称“公教眼科诊疗所”(已另行专门登记)。1945年胜利后,王子真司铎赶赴邯郸接收为日寇侵占的教会房屋,成安总堂便告绝迹。1946—7年间地方情况已不容教会继续进行,各分堂司铎乃各自去职而谋生,本总堂遂成为土崩瓦解。1946年统计:总堂司铎王子真,成安分堂司铎张化民、北张庄分堂司铎郝勤民、彭城分堂司铎党国范、肥乡分堂司铎薄守礼、张洞分堂司铎王东海,医院院长陈柏庐,住成安县中艾束天主堂司铎安冬岭、陈世尊,有传教助理员8名,教友9869名,其中成安分堂22堂口2276名、北张庄分堂11堂口1212名、彭城分堂14堂口1801名、肥乡分堂11堂口1820名、张洞分堂10堂口2760名。

76. 成安分堂

成安乡间开教虽早,但城内于1897年间始兴教会,开创于威县人任天增游行布道员。他来到城内,因无处居住,便住在西关薛老文店里。开始向店主乘机讲道,不久店主薛老文心入奉教。再得东大街勤行人遯老大信教,并赁得遯老大空庄一所,居内布道,信者日众。1899年间由教会购得西街宋家老庄一段,带旧房九间。至此,始略具一公所形式。当时成安地区教会方面属大名总堂管理,而成安一带直接传教任务却已由中国司铎赵保禄担任。此后迭经更换,年代详不得查。据悉,经赵保禄而来(得)[的]有贾保禄,河北任丘人。1922年张(吉)[喆]清继来担承。1928年张(吉)[喆]清移居本堂,增购庄基,添建房屋,本堂就成了成安分堂的所在地,管理本县境内与广平西南区各堂口,其中或由总堂直接管理,或经副堂司铎管理。至1947年传教系统脱节,房屋除经堂经常开会利用外,其余一部归群众分住,一部归眼科诊疗所使用,已不复有分堂的形势。有分堂司铎3名,助理员3名,教友2276名,其中成安县城内212名、中郎堡40名、东大姑庙68名、河町68名、西彭留146名、林里堡39名、沙窝40名、西乡义44名、杨庄44名、大堤西114名、大寨402名、东辛集85名、中艾束450名、吕庄25名、西南温32名、北罗营80名、南高曲45名、柳林60名、胜营141名、南乡义25名、东乡义51名、东野庄52名。

77. 西彭留堂口

1850年前开创。开教后百年,教友人数不断增加。1920年左右,由教会出资购得宅院一所,带有瓦房14间,又于1927年间本村绝户教友捐献土地14亩。从此本堂口开学等一切经费概归自己解决。群运后瓦解,土地房屋为群众分有。会长王起寿,教友数目146人(1951)。附属北郎堡教友20名。

78. 林里堡堂口

1888年西彭留亲戚开创,外国(法)传教士代购庄房一所。自开教至1900年人民掀起反洋运动村中教友受到株连后以至今,不见发展。现有庄房除大部坍塌外,仅余二间,已为群众分有。教友仅39人,教会形成散沙状态。会长曹光俊。

79. 大寨堂口

1894年本村人刘占冠创办,本堂司铎资助建堂。自刘占冠信教后,教友日增,每年于春秋农暇设校讲道,传习经言。1925年由任丘人贾春庭司铎资助,改建七间长三间宽之经堂和一部住宅,从此堂中略具规模。又为了村中子弟的教育问题,本村教友更于1939年集资一部并合上本堂口常助献金;购得耕地23亩5分。不过一因灾荒,又因群运,竟告破产。本堂房屋为政府占用作仓库,地产为群众分有。宗教集会被制止,宗教仪式又无传教士来主持,上下形成一片散沙。教友数目402名(1951)。附属村:落町教友32人,北乡义教友25人。

80. 沙窝堂口

自1904年间魏老正进教之后十分积极,自愿出资帮助本村信友共同购得一片老庄草房三间,不过教友人数不甚发展。本堂口向属城内分堂领导。现有教友39名,因文化低落不思进步。现经群运,一切宗教活动都告停止。会长魏万信。

81. 中郎堡堂口

1920年赵保禄开创,由教会津贴购得一所宅院。买房立堂后,教友日众,每年春秋暇(秀)[季]成教理学校习研教理。其间虽经张喆清司铎大力发展,亦不见有兴盛气(芬)[氛]。经日寇骚扰和群运影响,堂口情况(随)[遂]一败涂地。会长冯竹鸣,教友数目70名(1951)。附属:1、後斐理,教友18名;2、武吉村,教友12名。

82. 河町堂口

1921[年]本村人宇老宠创办。奉教后逐年集资购地盖房,至1929[年]添购产地三亩,新建草房4间,堂口情况日有起色。后随日侵衰退。群运后土地房屋归群众分有,一切陷于停顿。会长宇连成,教友数目68名(1951)。

83. 西乡义堂口

1935年本村人张巨人教后在张(吉)[喆]清司铎领导下自修草房六间。考原在1850年左右本村尹家已在外奉教,不过在本村直至1935年才发展起来。此时成立教理传习学校,因以教友数目增加。事变后陷入停顿状态。群运后成瓦解形(式)[势]。现有教友44人。会长张臣。

84. 大堤西堂口

自1921年朱彬人教后,1929年由教友自动集资购得庄(二)[土]一段,上带草房三间、瓦房五间。1935年增建瓦房三间、大门一间、草房二间。1940年更买地七亩四分。群运后教务停顿,房屋土地为群众分有,教会形(式)[势]已成瓦解。会长朱彬(亡),教友数目124人(1951计)。附属:1、闫(?)村教友3名;2、固子教友12名。

85. 杨庄堂口

1924年李绅会长(建筑工人)因多与教友接触,习闻道理,因而奉教。后在刘希池中国司铎(副本堂)的资助[下]建起草房九间、车门一间。奉教后无变化。群运后一切停止。会长李绅(亡),教友数目44名(1951)。附属:1、孙庄,教友7人;2、百寺营,教友4人;3、郑庄,教友3人。

86. 东大姑庙堂口

1935年大寨人张善文开创。信教后1938年信友集资购得庄院一所,带草房八间。更由长年捐献积至1942[年]合购产地5.2亩,备常年信友教育用费。及至七七事变,再经群运、土改,房地产为群众分有,宗教活动被制止,教会形成涣散。会长陈万新(亡),教友数目68名(1951)。

87. 中艾束堂口

遼世臣1889年因张洞游行布道员张书林之讲劝而信教,随时讲道随时发展。1900年人民掀起反洋运动,本村仅于财物上受到株连。1903—4年由(大名总堂)法国教士孙某购地盖堂(六间)。群运后宗教集会与宗教仪式被制止,教堂被用作仓库,房屋一归群众分有,一归村校占用,教士已不起领导作用。现在仅安冬岭老司铎1人在堂休养占得三间房外,其它尽无。一切宗教集[会]与宗教仪式全部停止,教会方面已毫无组织之可言。会长遼鸣朝,教友数目542名(1951)。附属:1、西艾束教友35人;2、东艾束教友7人;3、岗上村,教友20人,房5间,庄0.8亩;4、南庄,教友20人,房6间,庄0.6亩。

88. 柳林堂口

1894年本村人王寿春入教后未甚发展。旋遇人民反洋运动,二三家教友受到株连,未伤人命。事后常借教友家集会。民国初年购得旧庄房一所,带草房三间,增筑草房四间,教会形(式)[势]大振。民国20年(1931)后为成学方便,协力修三间草房。近群运时四间东房被拆,其余归村中小学校占用,宗教活[动]被制止,遂成涣散状态。会长王国兴,教友数目60名(1951)。

89. 胜营(属广平县)堂口

自1902年村人刘某开教后,信教者日众。1904年由外国(法)教士孙某(大名总堂地方传教司铎)

兴建房舍，(随)[遂]被认[为]一方传教中心，常年有传教士居住，乘时巡视教堂，办理小学校。其中迭经更换教士，但仍作分堂行事。1928年张(吉)[喆]清司铎将分堂移至成安城内，本村形(式)[势]则日见下降。事变后为日寇破坏，房产(一)[亦]损(外)[坏]。群运后房归群众，宗教活动停止。会长刘鸾岭，教友数目141名(1951)。附属：1、王党，教友20名，房3间，庄6分；2、苗庄，教友30名，房7间，庄1亩；3、吴町，教友21名。

90. 南高曲(属广平县)堂口

1902年间王学敬在艾束教友家教私学，乘暇习研教理，心悦进教。归村向邻里讲劝，信教者日众。1904年间赵保禄资助购庄一段，带旧房14间，无大发展。民1931[年]左右旧房损毁大半，其余群运时归群众分有。会长王珍殿，教友数目50名(1951)。附属村王庄教友5人。

91. 东辛集堂口

1903年进教后，因教会(大名总堂)资助买庄盖房十三间。时该地区为法国籍教士孙某管辖，赵保禄(中国司铎)助之，每年开学习听教理，进教者日众。后迭经更换传教人员，本村堂口则无甚变动。群运后房屋为学校占用，宗教集会与宗教仪式被制止，堂口成散沙状态。会长杨凤寅，教友数目85名(1951)。

92. 西南温(属广平县)堂口

1904年本村人申维成在教会学校读书，研究教理，心悦进教。在本村积多年之讲劝，略形开展。1915[年]左右本堂司铎赵保禄代购庄宅一所，带草房六间，1933[年]自(起)[已]拆去旧房，改建七间新房，情况振发。群运后宗教活动被禁止，情同涣散。会长申清堂，教友数目32名(1951)。

93. 东野庄堂口

1905年间苑茂兴在艾束亲戚家习闻教理，因而进教。回村广为传扬，渐增教[友]数目。1907[年]由本堂司铎赵保禄帮盖房立校开教。事变后为日寇(搔)[骚]扰，已成颓废。群运后庄房被占用，宗教活动被制止，堂口已成散沙状态。会长赵新泰，教友数目59名。附属东漳河，教友30名，庄分房7间。

94. 北罗营(属广平县)堂口

1903年间尤如清在艾束作工时习天主教理，决意入教。回村后先从家中发展起来了。民国七八年间得传教[士]赵保禄之提助买地盖房，遂成为一堂口，及今五十年。最近因不得参加宗教活动与学习，情况颓废。会长尤良贵，教友数目80名(1951)。

95. 东乡义堂口

(1912年)时田化普因艾束亲戚之讲劝，明白教理，决心奉教。1925年间由本堂司铎张(吉)[喆]清之资助购地盖房，每年春秋立学讲习教理，信教者日多。1947[年]群运后教堂归群众分有，宗教活动被制止，教会形式几乎消失。会长田化普，教友数目51名(1951)。

96. 南乡义堂口

1921年本村冯某(不知名)在艾束亲戚家居住，日久习闻教理，独自奉教。回村后劝导亲邻，信教者日众。后得本堂司铎张(吉)[喆]清之帮助购地盖房，虽经更换传教人，但本堂口无甚变化。群运后房舍为本村小学校占用，教会无领导人员，宗教集会与宗教仪式被制止，堂口形式亦就形成了瓦解状态。会长冯刚昌，教友数目45名(1951)。附属路固教友18名。

97. 吕庄堂口

1931[年]吕九和创办。时前吕九和于大名教会学校读书，抽暇学习教理，日久心入，领洗入教。先本村已有几人奉教，不过无堂口形式，吕九和在村中乘机破除迷信，进教者日众。乃买村边地一段，盖成三间土房。1935年村人愿子弟入学，乃商同协力建瓦房四间，立学收生，村人极欢迎。(即)[及]至事变，日寇(搔)[骚]扰，又经群[运]，宗教活动被禁止，教会已成散沙。会长吕九和，教友数目25名(1951)。

98. 张洞(属广平县)分堂

约于1850年左右，广平、肥乡一带，南方秦卦，在王大中倡首之下，暴动成乱。及平息后，改奉天主

教者，一时颇多。时张洞村张兴旺等三四人，即赴邻县南里岳，找奉天主教人介绍入教，归后又联络多人，一同入教。其目的在改奉天主教后，支应门户，不被逮捕。约在1890年时，有法国鄂司铎（其名不可考）遂在村中买庄基一段，建立一小规模教堂，斯时村中已有教友数百名。1900年义和团反洋运动时，将堂内财物，收拾一空，司铎外逃，主持无人，教务暂行停止。1901年后，教友数目，日增月盛。法国贺司铎（名亦不可考）乃改建廿餘间之大堂，又陆续置地三顷，前后收养数十孤儿。1910年间贺司铎亡于大名，法国贝利永司铎，调任来驻，将司铎住院，大事修建。1929年教区独立后，为李友梅司铎，李成立一女子师范。1939年王子真司铎代理该堂，添设眼科诊疗所。1940年秋简备德司铎到任。1947年土改时，政府命令将该司铎住院全部拆毁。时本堂司铎为王东海。王回家后，一切遂告崩溃。1946年有分堂司铎1名，助理员3名，孤儿10名，保姆3名，工人3名，教友2760名，其中张洞965名、留女固600名、北下堡110名、平固店80名、常尔寨130名、蒋庄235名、杜村65名、寺郎固120名、闫小寨220名。

99. 留女固堂口

约于1890年法国鄂司[铎]创办。继张洞奉教之后，本村刘姓数十家人教，（遂）[随]后建立小规模经堂。1903年，又改建大堂。时村中教友已达三百多名，每年春冬成立男女小[学]校。至1929年教区独立后，费振华司铎添修配房数间，校内收生更多，亦较完备。1940年后，堂内屡受日寇抢掠，教务大受影响。土改时，房间均被村中占用，宗教仪式皆已停止。会长刘治公，教友数目约600名（1951）。

100. 北下堡堂口

约于1885年间，村民党姓某人，与张洞张书林交往甚厚，因而奉教。后又规劝同姓多人，一同领洗。1900年后，法国贺司铎在村中买地约三亩，建瓦房七间，每年春冬成经言小[学]校。1911年教友自动捐献，买堂东成宅一所，成为正式女校之地。1927年岁大歉，教友大受饥荒，自此一蹶不振。群运时房屋均被村中占用。会长党国花，教友数目约百餘名（1951）。

101. 平固店堂口

1884年张洞张鉴与本村李正岁之妹结婚，因而李正岁全家领洗入教，以后又劝导邻里多人奉教。1889年左右，法国贺司铎为之买成宅一所，成立经堂。1927年成立初级小[学]校，添新教友不少。1938年小堂被日寇一火焚毁。次年王子真司铎代理广平县，又兴工修起。1947年土改时尽归村中占用。会长李淇清，教友数目约50餘名（1951）。附属村南王封，房6间，占地3分，教友约30名。

102. 常尔寨堂口

约于1901年后，郭耀先之家，与张洞教友交往，因而奉教之后，后街李白营、王修业弟兄亦归奉天主教。郭王二家在大名公[教学]校读书者甚多，人口甚旺，教友数目，已达百名左右。1910年左右，法国贝利永司铎为之建堂五间及配房五间。1935年闫景成司铎买女校一所。群运时尽被村中占用。会长郭耀先，教友数目约130名。

103. 蒋庄堂口

1900年前，村中即有少数教友。至1915年时，法国司铎贝利永，为之买成庄一所，上带十数间西房。此时从张洞请来传教先生，成立男女小校，教务大开。1933年教友自动捐献，翻盖北房三间，又在路南添置一所小宅，专成女校。1937年间，经日寇迭次扰乱，教务渐衰。1947年土改时，房间尽被村中占有。会长班立凤，教友数目约120名。附属村：小未庄，房八间，占地一亩半，教友约50名；大未庄，空地半亩，教友约35名；潘尔寨，房五间，占地2分，教友30名。

104. 南盐池堂口

约在1910年间，本村徐国兴和杨文焕在大名天主堂公校读书入教，归后又劝其家人，一同领洗。1918年法国司铎贝利永为之买成庄一所，作为经堂，春冬成立经言小[学]校。直至今日，堂口无甚变化。群运时房间亦被村中占用。会长杨文焕，教友数目约90名（1951）。附属村：北盐池，房5间，占地半亩，教友30名；孙村，房7间，占地3分，教友45名；金安村，房7间，占地2亩，教友80名。

105. 杜村堂口

1917年间,本村高升堂在大名天主堂公校读书奉教,毕业后在该校教书。此时全家老幼,皆已领洗入教。1920年左右,赵保禄司铎为之买空地一段,因村中教友无多,至今未有建筑,但将其家宅一段,捐献堂口,作为经堂。土改时一并归村中占用。教友数目约35名(1951)。附属村泊头,房7间,占地1亩,教友30名。

106. 寺郎固堂口

1917年赵保禄司铎开创。1917年寺郎固一带,岁饷民饥,天主堂成校放赈,村民因而奉教者十数家。1920年左右,李友梅司铎为之建北房五间,成为正式经堂。1929年分区后,本村教友自动捐献,又建西房三间,作春冬小校之用。此外另有南宅一段,专成女校。群运时,皆被村中占有。会长闫志堂,教友数目约90名(1951)。附属村铺上,房4间,占地1亩,教友约30名。

107. 闫小寨堂口

闫小寨村民1917年荒歉时,见到邻村寺郎固天主堂成校放赈,有利于村中,亦请求成校吃赈。数年后添十数家教友。赵保禄司铎遂为之买地建房,成一正式堂口。因地基过小,只有北房三间、东房二间,仅可于春冬时成立男校,长久29年分区后,又买堂北地一段,拟筑女校。群运时,亦被村中占用。会长杜学书,教友数目约80名(1951)。附属村:大留,房10间,占地半亩,教友30名;田庄,房2间,占地2分,教友30名;广平东关,房4间,占地1亩,教友约30名。

108. 肥乡城分堂

1900年前,城内只有桑家少数人奉教,此时城内尚无教堂房屋,故传教司铎来视查时很少。至1905年左右,有河间县明嘉禄司铎,始来此城购地,构屋数椽,为城内教友临时经堂,而司铎仍不驻之。以后数十年中,因城内教友无多,所有邻近堂口,或属于永年城内总堂(距肥乡城廿馀里),或属于广平县张洞分堂,无甚变化。至1929年永年教区独立后,王子真司铎被遣该城,主持全县教务,肥乡城始成为正式本县分堂。于是王司铎鸠工庀材,惨淡经营,先后建房数十间,成立幼林完全小[学]校。当时收生七八十名,成绩斐然。1937年日寇进入中国后,此城大受蹂躏,幼林停顿,乃于1938年转成眼科诊疗所。1943年大歉时,自磁县迁来十数孤儿,分养于此。1946年城内解放后,政府将东院天主堂全部借用,诊所移于路西孤儿院,孤儿则移于民间房屋,教务几陷停顿状态。1946年有分堂司铎1名(薄守礼),助理员2名,孤儿17名,教友1820名,其中肥乡城50名、新化营290名、孟郭庄290名、北高170名、张家庄260名、南长桥130名、相公庄145名、陈固245名、东张寨130名、贤店50名、西屯庄190名。

109. 孟郭庄堂口

1920年本村张万朝、张怀清等数人,见天主教各盛行,乃亲赴南里岳亲友家,介绍入教。次年即1921年法国贝利永司铎为之买地一段,建房数间。1935年王子真司铎又为之建瓦房七间,做正式经堂。1937[年]事变后,因肥乡城大遭日寇蹂躏,幼林停顿,乃在此村暂成初级小[学]校。土改时房间均被村民占用。会长张万朝,教友数目约190名(1951)。附属村:贾北堡,房3间,占地1亩,教友约30名;赵云堡教友约30名;高庄教友约50名;白落堡教友约30名;杜堡教友约30名。

110. 相公庄堂口

约于1926年前后,贝利永司铎遣广平县闫小寨村教友杜学诗去相公庄教经,一时报名学经者十有馀人。此后村中虽无教堂房屋,而每年春冬两闲时,照例成校,因之教务渐渐兴盛。至1935年时,王子真司铎乃与置成庄一所,始有正式经堂。群运时被村中分配占用,教务完[全]停止了。会长石修叶,教友数目约35名。附属村:萧庄教友约50名,焦营教友约60名。

111. 北高堂口

约在1910(年)左右,村民秦荣华之父,经人介绍,学经入教。后又劝导本村多人奉教,联名请贝利永司铎,来讲道开教。贝司铎乃与置成庄一所,做经堂。从此春冬成校,一切经费,均由自己捐献。1947年群运时,村中堂房亦被群众占用。会长秦荣福,教友数目约50名。附属村:南庄,房5间,占地1亩,教友约30名;郝辛寨教友约30名;王赵家庄,房11间,占地1亩半,教友约60名。

112. 西屯庄堂口

1900年反洋运动后,各村奉教领洗者,络绎不绝。那时西屯庄村民苑东敬及吴凤鸣之母,求道心切,乃乘机见贝利永司铎。司铎许以学经若干后,方准领洗入教。约于1905年间,贝司铎为之买地建堂,成立堂口,时随苑吴二姓入教者,已大有其人矣。该堂房屋于群运时被村民占用。会长苑天禄,教友数目约80名(1951)。附属村:彭固教友约40名;城南堡教友约20名;户部李庄,房11间,占地1亩,教友约50名。

113. 东张寨堂口

约在1906年时,村民戴万寿去肥乡城内闹词讼,乘暇屡往城内天主堂拜访,研究道理。不久自认天主教为真教,乃决然领洗入教,并力劝其家人乡里等亦学经奉教。至1933年,教区独立后,王子真司铎为之修建经堂一座。1946—7[年]群运时为村政府分配占用。会长宋富文,教友数目约40名(1951)。附属村:後黄寨,房3间,占地1亩,教友约45人;柴庄,房5间,占地3分,教友约45人。

114. 南长桥堂口

自1910年,各处荒歉,教会乘机成校施赈以来,本村居民托人去肥乡城天主堂介绍入教,要求在本村成立学校。段司铎慨然许之,乃遣传教先生前去立校。不久(1922)有一班领洗者,即予买庄基一段,准备盖堂。直至1933年王子真司铎始给修盖经堂。群运时为村民占用。会长张贵德,教友数目约40名(1951)。附属村:毛演堡教友约40人;贺堡,地3亩,教友约50人。

115. 贤店堂口

1902年间,村民白姓女与新化营教友结亲,来往介绍,学经入教。其家人等,渐亦随之领洗。1921年国籍贾司铎为之买空地二亩,建房十数间,成一正式堂口。随后冬春两季成经言校,教友数目增添不少。群运时房屋均被村中分去,现教友无处集会念经了。会长白兴云,教友数目约50名(1951)。

116. 陈固堂口

本村距新化营不远。王大中南方柰卦暴动时(1860年左右),随之者颇众,王被平后,其徒侣皆在被剿拿之例,故为平安起见,亦随新化营信奉天主教。孙司铎亦在1870年左右为之买地建堂。此堂亦毁于庚子年之变。1920年教友捐助一部分,重建大堂。现全部房屋均归村政府分配占用。会长侯树行,教友数目约130名(1951)。附属村:南刘(?)村,房5间,占地1亩半,教友约35名;韩旺,房5间,占地1亩,教友约50名;席尔寨,房6间,占地2亩,教友约30名。

117. 张家庄堂口

约在邻村新化营奉教之后,本村张家见奉了教,可安生无事过时光,即托人去该村介绍奉教。一时在名者数十家,法国孙司铎(1870年前后)为之买地建房,成校送先生,教以经言,预备领洗。1900年全部房屋亦随之毁于反洋运动中。1905年重建新堂。19(4)[3]7年日寇将堂炸毁,次年教友捐款重修,1941年日寇又烧之。其余房屋群运时为民众分占。会长张万月,教友数目约130名(1951)。附属村:大寨,房5间,占地1亩,教友约30名;南阳(?)堡,房7间,占地4分,教友约60名;王庄,房8间,占地5分,教友约40名。。

118. 新化营堂口

约于1860年间,南方柰卦之首王大中叛乱在此村。叛乱之后,村民大半奉了天主教。时有一法国孙司铎为之买地建房,设立堂口,如此持续了数十年之久。1900年反洋运动时,堂房全部被毁。1903年后又建一新堂。之后又陆续建设房屋多间,春冬成经言小校。1936年游维道司铎整顿该校,扩大为一完全初级小[学]校,收生六七十名。1938年教区独立后,崔守恂主教拨款若干,教友自动捐助,合力建造了堂北女校。群运时区政府将该堂房全部占用。会长张良,教友数目约250名(1951)。附属村胡堡,房8间,占地3分,教友约40余人。

119. 北张庄(属邯郸县)分堂

1870年间,本村由村人孙公堂倡首奉教,当时为法国人金道宣司铎主持地方教务,当然为之接受领洗入教。日久教友日众,乃由金司[铎]出资买地立堂,成为堂口,每年一二次有司铎巡行讲道,举

行宗教仪式,1900年人民反洋运动中教友仅以财物受累。1905—1907年金司铎复出资建成今日尚存之大圣堂。从此成为分堂,常年有传[教]司铎住居于此,管理周围各教会堂口,首任分堂司铎为中国人李友兰。当时山区一带有溺女之风。为救济失怙婴儿,曾附设一所孤儿院,曾一度与彭城孤儿院合并,今犹分别教养于邯郸、磁县、肥乡等地(已由各该所在地登记)。李友兰司铎之后,其弟李友梅派来主事。厥后有任隆训、任裕民、郑勤民继来主持教务。最后张化民司铎于巡视堂口时为地方政[府]捉押返送原籍,分堂事务(随)[遂]无人主持,惟永年教区崔主[教]则留居本分堂休养,病逝于此。今本堂房屋仅一小部保用外,其余大部都归本村占用了。有分堂司铎1名(张化民),助理员1名,教友1212名,其中小张庄148名、军师堡215名、裴家堡125名、孙庄122名、唐屯98名、北张庄181名、董二庄70名、陈窑90名、羊井18名、柳林248名、贾村78名。

120. 皮条屯堂口

1912年间李振明因唐屯亲戚之讲劝向(望)[往]教会,更经当时中国司铎之讲劝,决心进教。1916[年]李友兰司铎劝教友集资买地,果然买得四分树坑。1934年卖树立堂,教友很是兴奋。群运时房屋归群众分有,宗教活动被制止,已不存教会形式。教友数目111人(1951)。附属村:1、苏里村,教友35名,房11间,占[地]1亩;2、召贤村教友20名;[3、]吕固村教友15名。

121. 唐屯堂口

1907年间村人唐三品、唐树龙等好道心切,四处奔寻。一日到北张庄天主堂听李友兰司铎讲道,心悅,深研教理,领洗进教。1914年间司铎提议,协资购得一段空地,带树十馀株,卖树建房。群运后一切宗教活动被制止,传教士亦断足迹,教友形成散沙。会长唐坚宗,教友数目73名(1951)。附属村:1、绍庄,20人;2、范庄5人。

122. 孙庄堂口

1902年村人石树琴首创。时石树琴与西上宗教友陈化平交好,不断谈听天主教教义,心悅皈依,领洗奉教。时村中无公所集会,即以教友家临时举行宗教集会。后于1943年得本堂郑勤民司铎之(彭)[鼓]动集资,于教友常好山之空庄盖起六间平房为祈祷处。群运后公所为群众占用,教会涣散。会长张九如,教友数目77名(1951)。附属村庄:1、吴藏营20[人];2、屯头3[人];3、上壁17[人];4、西孙庄15[人]。

123. 裴家堡堂口

1906年村人王化龙首创,李友兰司铎资助建堂。1906年间村人得闻道理,首先奉教,向邻里讲劝,教友日众。后于1918年买得一段庄房,作为公所。后虽传教人员调动,本村却未受什么影响。及至七七事变为日寇(搔)[骚]扰,不得正式进行。群运后房屋归村中学校占用,教务停顿。会长张新德,教友数目105名(1951)。附属村:1、贾堡,15人;2、李庄,10人。

124. 军师堡堂口

柳林奉教亲戚劝得王士奎奉教,逐日增多教友数。首先于王士奎家。后于1906年本堂司铎李友兰资助建会所:买空庄一段,带小树二百馀棵。1916年卖去树,盖成了今日的房屋。现因群运,已不复有宗教活动了。会长王士奎,教友数目163名(1951)。附属村刘庄,教友52人,房5间。

125. 小张庄堂口

1904[年]李友兰司铎创办。开教后经李友兰司铎之协助,自成堂口,属北张庄分堂领导,一直平顺,教友数目不大发展。七七事变后因日寇之(搔)[骚]扰日渐衰退。及至群运后,宗教活动全部停止,房产为群众分有。会长张殿荣,教友数目75人(1951)。附属村:陈家岗,教友32名;廿里铺,教友36名,房6间。

126. 董二庄堂口

1904年李友兰司铎创办。本村开教后教友数目未甚发展。1912年左右李友兰司铎资助并由当时会长靳奎文协力,加上一部分教友献仪,建成今日的形势。直至事变(1937)本堂口无甚变化。及今群运后,房产归群众占有,宗教活动停顿,呈衰退现象。会长李升堂,教友数目50人(1951)。附属村白家

村教友 20 名。

127. 陈窑堂口

1904 年陈尚典听李友兰司铎讲道，回村连合邻近数家习教理，受洗入教。后由李司铎协同教[友]买得一段庄基。1930 年左右教友自动协力建起房屋，作为本村教友习文化学教理之处。群运后房屋为群众分有，宗教活[动]被制止，教会组织瓦解。会长陈太安，教友数目 90 名(1951)。

128. 羊井堂口

开教于 1904 年间。开教[后]人数不大发展，向为董二庄的附属村庄。民国十年间，因教会出资协力购得旧宅一所，成为正式堂口，归北张庄分堂直接领导。群运后房产分散，教友组织瓦解，教务停顿。会长张金铃，教友数目 18 人(1951)。

129. 柳林堂口

1902 年间勤行人李富因在上宗接触信教人开始奉教，再劝得张大福等人，以教友家为公所。1906 年本堂司铎李友兰帮助半资买地建堂。及今一经日祸，又因群运，房产被占有，教会失领导，形势顿成涣散。会长周泰昌，教友数目 195 名(1951)。附属村：1、简庄，14 人；2、西上宗，23 人；3、春厂，6 人；4、北苏曹，6 人；5、小屯，4 人；6、东柳林，5 人。

130. 贾村堂口

1917 年间李友兰司铎传教路过该村，因雨休息，与某姓老人谈起教理。厥后便成交情，随时进行讲道，结果心入进教，人数相因日众。就在李司铎的帮助下买地二亩。厥[后]连接盖房 28 间。群运时房产为群众分有，宗教活动被制止，宗教形式等于瓦解。教友数目 74 名(1951)。附属村贾河口 4 人。

131. 彭城(属磁县)分堂

约于 1885 年间有一法籍孙司铎(名不详)传教于成安、磁县一带，即于彭城买成庄一所。当时入教者不过二三十人。1900 年后中国司铎李友兰继任传教，但不常住彭城。1919 年间，其弟李友梅司铎在磁县传教，乃建筑彭城大经堂及东院配房多间，成立一小规模之公[教学]校。1929 年永年教区独立后威县人陈逵司铎正在磁县传教，又添设校房多间，兴校立教，收容学生七十至八十名，盛极一时。1937 [年]事变时土匪猖獗，堂内财物受害不小。随后连年荒歉，该地商业日衰，教民外出谋生者不少，教务大受影响。又因日寇数年盘(居)[踞]于此，(搔)[骚]扰不已，更成一蹶不振。1944 年简备德司铎调任该堂，收拾残局，兴起向日小[学]校，添设眼科诊疗所，一切(少)[稍]有起色。1947 年群运时堂内财物统归平分，全部房间均被政府借用成校。1948 年党耀汉司铎返原籍，教务无人主持。有分堂司铎 1 名(党耀汉)，医生 1 名(于子温)，助理员 2 名，堂口教友 1801 名，其中彭城镇 120 名、脑子 90 名、义林 150 名、索井 100 名、淘泉 125 名、成子 140 名、孙庄 95 名、南神岗 107 名、李家岗 202 名、东城基 202 名、西城基 113 名、野狸岗 158 名、西佐 95 名、黄龙 104 名。

132. 脑子村堂口

1915 年藺万邦开创。1920 年前村中只有藺姓教友数人，其后添孙怀祖兄弟数人。1935[年]左右陈逵司铎鉴于村东土地肥沃，宜于浇灌，乃买地卅余亩，并于村堂旧基建房数十间，创办孤儿院，先后收养百余名。1937 年尹志渔司铎又建路北司铎住室四间。日寇来后，堂中屡受大害，院内事宜一落千丈。1947[年]群运时，孤儿院被解散，房地亦被均分。会长藺万邦，教友数目约 40 名。附属村宿风山教友 50 名。

133. 义井堂口

1915 年村民冯九子由外闻道，归而奉教，其家人等不久亦随之奉教。1920[年]左右，李友梅司铎买成庄一所，暂作经堂，春冬成立经言小校。1929 年教区独立后，教友自动捐献小米若干，买堂南邻院一所，成春冬女子小校。1947 年群运时全部被村中分用，堂内宗教仪式俱已停止。会长冯金才，教友数目约 110 名(1946)。附属村下拔剑，房 7 间，占[地]2 分，教友约 40 名。

134. 索井堂口

约于 1917 年村民王日良闻永年城天主堂已设立公校多年，成绩很好，即赴彭城天主堂请求介绍，

入永年公校,事果如愿。王日良入校奉教,归后又劝同姓里人多名。1920年李友梅司铎为之买成庄一所,上带楼房一座,房间一半出赁,一半做经堂。王日良住门房数间,为本村会长。1947[年]群运时皆分散给群众。教友数目约60名(1946)。附属村田庄,房15间,占地1亩,教友40名。

135. 洵泉堂口

约于1917年旱潦成灾时,彭城本堂李友梅司铎乘机遣人去该村成校放赈,村民因而学经领洗者十数家。李司铎即为之购成庄一所,北房五间做经堂,东西数间做经言小校。1920年又予置买堂东成庄一座做女校。北房年久欲塌,教友乃大集捐献,自动修建新房。1942年日寇扫荡时此房被焚。群运时他房亦被充公。会长索本惠,教友数目约90名(1945)。附属村王庄子,房9间,占地3分,教友35名。

136. 成子堂口

1920年左右,村民赵永利去大名天主堂公校读书,课余学经奉教。放假归家后苦劝家人一同领洗。时彭城本堂司铎为李友梅,即与赵永利商量如何建立堂口。1931年教区划分后,陈遼司铎出钱一部,本村教友捐献一部,置买成庄一所,上带砖房十数间,从此成一正式堂口。群运时被村政府占用。教友数目约70名(1945)附属村:砚瓦沟,房10间,占地1亩,教友约40名;白土,教友约30名。

137. 孙庄堂口

约于1900年义和团之后,许多村庄纷纷入教,斯时村民冯天金去彭城天主堂托人介绍奉教。1903年国籍李友兰司铎为之置买成庄一所,除北屋成经堂外,其余配房可成春冬经言小校。1932年陈遼司铎大事修补,又与之置买女校一座。1947年两处均被村民分住,从兹已不成经堂了。会长冯天金,教友数目约80名(1946)。附属村:界后城教友5名,黄山教友约10名。

138. 南神岗堂口

于1917[年]岁荒时,村民赵姓上学领赈准备入教。不久(约1920年左右)李司铎为之购买成庄一座,成学颂经已有定所。1930年村中赵春光、赵玉昆等在永年城天主堂公校读书,毕业后在本堂教书,一时堂口勃然兴起。1940[年]后日寇修堡盘居[踞],差重役多,村民大受影响。群运时堂房被村民占用。会长张乾元,教友数目约80名。附属村:水鱼岗,空地半亩,教友约20人;南大峪,教友7人。

139. 李家岗堂口

1913年李友兰司铎纳出一部分款项,本村教民牛祥、李得顺、张勤等捐献若干,建造经堂五间。1918年李秉钧、张云清等又捐献若干,建造男校房舍及司铎住院。1920年遂正式请来教员开校上课。群运时除五间上房成为本村小[学]校外,其余分配给群众。会长李万和,教友数目152名(1946)。附属村:袁家庄,房9间,占地3分,教友35名;贺兰,教友12名;王家庄,教友3名。

140. 东城基堂口

本村李姓数家于1887年入教后,即献地皮四亩,次年即兴工修建大式经堂十五间。1900年义和团反洋运动时全部拆毁。1902—1903年由临村花官营等集资若干,重建经堂五大间、瓦房十二间。1921年教友又捐款修建东院马棚四间、平房十间。解放后群运时均分配给群众占用。会长李成良,教友数目142名(1946)。附属村:花官营,房11间占地约1亩,教友45人;马头镇,房53间,占地约4亩,教友15人。

141. 西城基堂口

1887年李司铎创办。开初奉教时,只有村民史万良兄弟二人。因李司铎苦心领导,教友数目日增月盛。时至今日,已增至十几户了。史兄弟因鉴于念经无公共堂房,自动献地若干,做经堂地基。1889年间建房数间。1900年毁于义和团。1903年重建瓦房五间。嗣后又建其他房屋。群运时归村公所占用。会长史万(良)[良],教友数目约60名(1946)附属村:郝村教友35名,南城教友18名。

142. 野狸岗堂口

自1912年开创以来,直至1929年教区独立时,尚无公共经堂。1930年会长路维成商之于彭城本堂司铎,本村教民自动捐献地亩八分建造经堂,本堂司铎赞助许之。1932年又捐钱若干,兴建男校及

司铎来时暂住办公室。乐捐好施,兴校立教,大显教民热心。群运后房间成为本村仓库。会长程申美,教友数目78名。附属村:陆开,教友约20名;羌村,房5间,占地半亩,教友约30名。

143. 西左堂口

1932[年]尹志渔司铎创办。本村堂口是1929年教区独立后新开的堂口。开创时教友心火甚大,自动捐献200元购地建房,春冬并成立男女小校,一时入教者日增月盛。日寇进攻中国后盘(居)[踞]矿区,遭扰特甚,堂口中衰。群运时房间均被分给群众。会长江景和,教友数目约35名(1946)。附属村:花庄,房10间,占地5分,教友约40人;龙泉,教友约20人。

144. 黄龙堂口

自1906年李友兰司铎开[教]以来,常受彭城分堂所辖。最初领洗入教的,为武壹方、武壹材兄弟二人。后因每年春冬成经言小校,入教者渐多,至1915年已增至九家。教友自动捐款买公地公房,成正式经堂。群运时分给群众,教友停止宗教活[动]。会长武印堂,教友数目约45名(1946)。附属村:小西村教友15名;中马头教友14名;佐良教友30名,房8间,占地2分。

145. 河北省成安县私立公教眼科诊疗所

本诊疗所占有的房屋系永年教区成安分堂自己成立的小学校旧址,为中国人张(吉)[喆]清司铎集资兴建于1920—1936年间,学校为日寇所毁。1940年中国人王子真司铎招集信友收拾残存旧房,更从教徒中募得一部[分]资金,约伪联钞3000元;又从邢台眼科医院招回自己送去的练习生王立民先生修理了一部[分]旧桌凳,更零星购些药品卒于1941年5月1日本诊疗所宣告成立开诊。1943灾荒年生活困难,为了谋生,王子真率领二三职员和一部[分]药物到磁县设分诊所。1944年本所全部事务交归今日的负责人陈柏庐接管,情形仍极艰困。1945年日寇投降,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成安,城乡交通了;更经过土改、大生产运动,人民的生活改善了,诊疗所的业务亦随之走向发展。施設方面亦渐趋改进,现已由大炕改成了木床,增辟了化验施設。1948年春季,为了接近肥乡县一带病人,便派了一位学成的练习生,携带一些药品到肥乡设分诊所一处,一年后自己独立。

146. 河北省磁县私立公教眼科诊疗所

本诊疗所宅院在磁县西城街行政村西湖街三号,系1935年本教区崔主教(中国人)所购。1937年为敌人东棉洋行侵占。1943年秋该行他迁,始得接管。同年春夏,天气(炕)[亢]旱,因磁县是水地,四方难民多来谋生。成安公教眼科诊疗所创办人王子真也为了生活问题率医生等三人并携带应用药品,来磁赁房开办公教眼科诊疗所,于四月廿五日正式开诊。同年八月十九日张安泰医生到本诊所辅助进行。是年十一月廿四日,因了散居邯郸、彭城之孤儿无法生活,王子真遂将一部分孤儿迁至西湖街本院,惨淡经营,几经断炊。王、张二人多方募集,苟延残喘,以维生活。待1945年日寇投降,王子真赴邯接收房产,次年由本所带去一部分应用药品,在邯开办公教医院,留张安泰医生在磁县独立经营。于是辞退赁房,将诊疗所迁回本院,以便集中经营。后自广大农民翻身以来,一般病人治疗有力,医务乃逐渐发展,而有今日之情况(附《磁县公教孤儿院说明书》)。

147. 河北省肥乡县私立公教眼科诊疗所

本诊疗所房产是过去教会的女校地址。1948年成安公教眼科诊疗所派王恩章医生等四人来肥成立分诊所于此。1949年成安业务发达,无暇兼顾,乃归我们独立经营,仍令王恩章医生主持。继因业务不振,生活不能维持,王恩章辞职。于是由磁县公教眼科诊疗所请到医生任勇德修女,继续维持,努力经营,另外附治妇孺疾病,渐有起色。惟本所原有孤儿十二名,生活仍在困难中,(须)[需]要临时的小型资助。

148. 河北省邯郸镇私立公教医院

1945年9月中旬邯郸解放,中国司铎王子真由磁县赶至邯郸,接收了为日寇多年所侵占的教会房产,计土房六十二间半,略加修改,从磁县取来一部[分]药物并从邢台眼科医院聘请了张万桑医生,乃于1945年3月1日正式开诊。未及一年,因经[济]困难,张万桑医生辞职,由磁县招来医助张克宽继诊。同时因生活困难,又因当时解放区医药缺乏,在政府奖励协助下自制廿余种注射药品,补助了经

济的困难。1950年又请到在成安学习成功的萧益民医生,改进医疗业务,医院情形日渐发展,经济状况亦渐趋稳定。

附:

圣神修女会说明书

缘起 崔守恂主教自永年教区自治伊始,鉴于所属地区风俗人情与洋式修女会总不相合,乃召(集)教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化的修女会,和广大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以便辅助教务进行,而使救济事业顺利展开。于是集合有志服务之贞女,施以严格的训练,课以教义的陶成,乃于1935年永年教区圣神修女会宣告成立。

性质 圣神修女会是永年教区的附属机构,直属主教管辖。它的目的是辅助传教办理救济事业。

沿革 自1935年正式成立之后陆续收入进会。待至1943荒歉年,教区团体无力自养,圣神会更难生存,于是遣散初学(保守进会者)一部分修女回家自养或转外方[谋]生,另一部分散居成安、磁县眼科诊疗所内服务;留于会院中的修女则卖衣服、搞生产过活。此后跟着成安、磁县、邯郸、肥乡诊疗所兼孤儿院发展的情况,相继加入上述四院服务。1947—1948年群运时,会院被政府借用,地土与动产为地方没收。所有修女除少数在家自养外,概归上述诊疗所内服务。

磁县公教孤儿院说明书

1、起源:1931年,因磁县西山彭城一带向有溺女弃婴之风,永年教区中国主教崔守恂曾在彭城地区创立孤儿院一所,收容弃婴80余名。

2、经费:永年教区拨给一部分基金,在彭城地区脑子村购买井田30余亩(群运中为地方没收),经费不足时由教区临时补给。

3、磁县公教孤儿院缘起:1941年后教区停止补给,彭城孤儿院陷入困难绝境,于是分给广平与邯郸教会各一小部分。(19)43年各地饥荒,邯、彭两地教会无力再为支持,王子真司铎乃毅然先后将两地孤儿迁至磁县。生活费初由募集维持,诊疗所补助。1945年后孤儿实行纺织生产运动,诊疗所收费也逐渐增多,于是互助工作自力更生起来了。

4、现在情况:孤儿结婚者已有5名,现在院内还有24名,4名念高小课本,其他读初小课本,教员即本诊所职员及练习生。甲班生兼习医科(不在练习生数),实习帮助医务;乙班生兼学女红,分担诊所小型勤务。这样孤儿在诊疗所中如一家子女,生活、学习、工作均密切结合着,分离不开。

磁县私立公教眼科诊疗所负责人张安泰

1951年6月8日

邯郸公教孤儿院说明书

(一)起源:1946年为了减轻肥乡与磁县孤儿院之负担,特自两处分出孤儿19名加入邯郸公教医院内。

(二)现况:19名孤儿中有9名读高小课本,10名读初小课本。高小班午前上课,午后参加医务工作;初小班午后上课,午前参加医勤工作。教员由本医院中职员兼任。这样生活与学习工作与院内职员密切联连系配合,像一个大家庭况态。这样组织学习、实习工作,以便造成适合新社会的人材。

邯郸公教医院负责人 王子真

1951年6月7日

登记时间 1951年6月左右

登记人 王守谦 等

三 天津工商学院简史

(献县总堂1964年9月译自拉丁原著)^①

开办前的种种

献县教区的传教士,老早就计划创办一高等学院;关于此事,葛光被著的《鄂尔璧传》内,有很详细的记载(La Vie Du P Gonnel, parle P Becher)。不久前(1913年)为办此事,狄志远(Cn Petit)由法国来津,只因当时情况不好,未完成任务,又返回法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至1918年)罗马传信部给耶稣会总长写信,要他使会士在天津成立一高级学院。总长答复说得待大战结束后再办(原文见下给刘钦明主教的信)。

终究大战结束了,于1919年传信部委派了光主教(Mgr. de Guebriant)到中国各教区视查后,于1920年7月27日,传信部给刘钦明主教(Mgr. Lecroart)写了一封信说:“光主教在您那教区作完宗座视查之后的汇报中,只记述了在乡村中所发展的许多事业,未提到在重要城市中,关于青年教育方面的事业,特别是未提到对于社会上层的教育事业。在直隶滨海教区(指天津教区)的边界上,可能把其所属某个重要城市让给阁下管理;也许可能在设有宗教高等教育机构中,添设适当的专业学校或学院。现在正有一个顺当的机会,您可以在预定时期商酌此事。因为天津教区的代牧已调往江西省一个新教区去了,同时又委任了北京教区的助理主教文贵宾(Mgr. de Vienne)为天津教区的宗座总理。阁下能够容易地同文贵宾主教进行商议,并做出具体方案,送交我部审查批准;他一定是很关心和乐意协助的。同时也请您将此事向您教区修会会长郝裕修(Cn Heraulle)说明,他一定乐意地要在罗马谈起。传信部部长枢机主教 Laurenti 署名,1920年7月27日。”

1920年9月13日,刘钦明主教给罗马传信部复信说:

“部长:我很荣幸地接到您7月27日的信。信中的内容是要我与天津教区宗座总理文贵宾主教商谈在天津市成立一高级学院,并将滨海的某重要城市让与我教区。

“在欧战期间,贵传信部曾通知过耶稣会总长,要他在天津创办一所高等学院。总长也答应了照办,唯须等到停战后才可能开始办理;那时所提的,只是成立一所高级学院,而宗座视查使光主教的汇报却与以前稍有出入。现在不仅是在天津成立一所高级学院,还要把天津教区的某重要城市让于我献县教区。

“请贵部长原谅,让我说一句话,为完成以上所说的那双层任务,我们的力量薄弱,不能实现。我认为先把割让城市问题放下不提,而只与文贵宾主教商议在天津成立高级学院,附着着许可修会中能享受的一些公共特权,这样更觉符合贵传信部初次的意见。我希望您同意所选择的这一事业(指成立学院),因为这一事业符合大众的利益,又为天主有更大的光荣,并且也与我们的力量和办法相适合。”

同年11月12日,文贵宾主教给刘钦明主教的信上说:

“今天我接到7月30日由罗马给我的信。信上说:“您的邻区直隶东南(指献县老教区)没有一个重要城市,希望您与该教区主教刘钦明商议,根据宗座视查后的意见,遵着本传信部的建议,你们互相

^① 这是河北大学历史系吕志毅教授提供的300格稿纸(右页脚注有“宗教志编辑室”字样)手抄本的复印件,共228页,装订为2册,封面均注明“献县总堂1964年9月译自拉丁原著”字样,又分别注明“1~12页”和“122~228页”。第一册封面还写有“天津市‘工商学院’(最末改为‘津沽大学’)简史”,首页前2行居中为“天津工商学院历史(1923年至1924年)”,第2行右顶格为“由拉丁文译出”等字。文末有如下说明文字:“此稿乃赵地同志于2000年2月交给宗教志编辑室的。据赵地同志说,是献县教区主教赵振声的翻译手稿,在60年代交给赵地同志。译稿开端称译自拉丁文原著,但未标出著者。从行文口气来看,著者当系曾主持工商学院的耶稣会士。译文系典型的‘直译’,几乎完全按拉丁语法行文,但意思当属明白。抄录时除个别明显错字予以纠正外,均依原稿照录。2000年4月14日”。

交换教区的界线,使直隶东南教区有个人物众多、商业繁华的重要城市。同时您也与刘钦明主教商议,在天津市为那些贵家子弟成立一职业学校或高等学院,并把这学院交于耶稣会士管理……’

“我不知罗马是否也给您写了信,无论如何,我确知我们二人所追求的是为天主愈大光荣。这样说来,我们在这两三个问题上是很容易合作的。我把罗马传信部的意见写给您,以供参考。待我们见面后再做协商。12月8日我就返回天津。”

刘钦明主教在他亲笔复信中写了下边的话说:

“12月8日我定要到天津来,为成立学校。我并不需要什么重要城市……”

文贵宾主教11月13日的复信上说:

“是的,我们二人的信件在路上互相交叉了。我不明白怎么11月13日罗马的信件才来到我这里?这点倒不关紧要。主教,您认识我,请您相信,我一定坚决执行罗马传信部的愿望。12月8日我要返回天津,乐意与您相见。我们要面谈你们的这一新事业。”

1920年12月9日,文贵宾主教交给了刘钦明主教一封公函说:

“照1920年7月30日给我来的信,传信部既是要在天津市为贵家子弟们成立职业学校和高等学院,并把管理权交于耶稣会士,那末为天主愈大光荣,我们准许照耶稣会总长的请求,在天津市成立或是高等学院,或是职业学校,或是同时成立上述两种学校。并且耶稣会士完全享有该修会特殊的权利,并由宗座所赐的破格特恩,一切悉照《圣教法典》的精神解释领会。”

1921年1月14日,传信部长在答复刘钦明主教的信上说:

“我接到您11月13日的信。信上说,您即将与文贵宾主教协商关于在天津市成立高等学院的事;至于把直隶滨海教区的某重要城市割让给直隶东南教区的问题,就放下不提了。这在本传信部方面毫无意见。请您尽管与可颂代牧进行协商,并把你们协商以后的结果和互相同意之点,都汇报上来。传信部长枢机主教 Van Rossum。”

开始办学院

1921年7月21日,声明了于普泽神甫(P. Jubaru)为天津开始学院的代理院长。于普泽于7月25日来到天津,住在崇德账房。12年前,柯茂德(L. Duquesme)——献县教区的司账神甫,为将来建设新校舍,曾在马场道买妥了地基,此处的环境为校舍十分适宜。

第二年(1922年)春天,桑志华神甫(Em. Lieent)开始建筑他的北疆博物院,同年的秋天,博物院落成。以后又开始建筑工商学院预科校舍,于1923年8月,预科校舍落成。于1922年在马场道校址附近,也买了两所小楼房,同年12月1日,于普泽、郇国华(Ed. Desreumaux)、葛道昌(S. Jacquart)、桑志华、尚建勋(R. Charvet)诸位神甫都搬到那两座小楼上去住。

1921年11月24日,斐百纳(A. Bernard),1922年12月23日步青云(H. Dubns)和林翊汉(P. Duriez),1923年5月22日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同年9月21日叶慕华(E. Aizier)和籍满良(M. Laplazie)诸位神甫由法国来天津。

传教工作

1922年3月21日,文贵宾主教请了尚建勋在法国兵营任随营神甫之职,在那里举行弥撒圣祭,给人付洗,给男女教友听告解,给病人行终傅,给死亡者送殡。

1923年至1924年

初次开学

1923年9月14日,文贵宾主教降福了新建的校舍。15日开始上课。在51名学生中,有8名奉教的。以上学生分班如下:预科一年级33名,二年级18名。有3位中国教师,即孟正秋和孙桂华都教授法文,另一位教授汉文。有一位意国教师D. Sirk先生教授图画。

D. Eleuiiau 来参观

1923年10月13日,在天津市,法国人初次开展览会。乘此机会,法国驻北京大使和其他著名人士也来参观了我们的新校舍,并表示满意。

博物院落成。

1923年4月3日,为庆祝博物院落成,在天津市开了一个科学研究会,会上桑志华和德日进二位神甫在负有名望和权威的人士前都做了演讲,并把多年来在内蒙地区蒐集的历史古物展览出来。第二天,博物院就正式开放了,来参观的人很多。

建筑神甫楼

在开始时,只有9位神甫,分别住在学校内,或住在上边说的那两座小楼上。于1924年春,才开始建筑神甫楼。过了几个月后,神甫楼盖成。在1924年至1925年之间,已有几位神甫住了新楼。这楼的蓝图和建筑是远东宅基信用银行承办的。

人位增加

1925年10月5日,读书修士狄守仁(E. Petic)来津学华语。

1924年至1925年

开学

1924年9月8日,本校第二次开学,在80名学生中,38名是新生,20名是奉教的。以上学生都分到预科3个年级内。神甫们还如上年一样,教师先生又添了两位,即D. Latimore教授英文和陈波教授数学。

建筑本校大楼

为建筑这大楼,本院院长和咨议员们绞尽了脑汁,整整计划了一年。蓝图是由Sirk先生画的,工程是由名Brossard et Mopin的公司承办的。他们将原图稍加校正,并在修建大楼时,由他们监工。照合同,是1924年10月1日开始修建,1925年9月开课时交工。可是届时未能交工。这或是因为那年吴、张直奉战争打乱了步骤,或是因为工程师未能精打细算,以致延长到1925年年底才交工。

新亡者

路裕信神甫(J. B. Thoret)于1924年12月抱病来津,医药无效,于1925年2月10日逝世,亡者小传见教区史。

驻北京法大使来校参观

1925年5月17日,驻北京法国大使D. de Martel路经天津,来本校参观了大楼的建筑,并参观了北疆博物院。他对我们表示了重视,并公开声明,他今后要依其职权,尽力支援我们。

意外的停课

1925年5月间,因为在上海日本工厂里驱逐了工人若干名,遂引起了各学校的学潮,并为此事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学联),由该会议决声明全国学生罢课示威。我校学生在开始时虽不大注意这个声明,但本市的各校学生(除北洋大学例外)照学联的声明,都一起行动起来。6月7日晚9点钟左右,我校的几名学生代表来见院长,说明他们不能继续上课。8日,院长就声明,本校暂时停课,学生一律回家。

博物院又建筑楼房

北疆博物院于1923年冬又建筑西部房舍,于1924年冬季前就完全竣工。

袁克定

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曾一度做过83天皇帝,他的长子袁克定于1924年曾请过我们中的一位给他上法文课,并讲哲学;因为当时人不敷用,没有答应。今年6月10日,答应了他的邀请。

人位增加

1924年12月21日,费德隐(M. Verdun)和斐化行(H. Bernard)二位神甫从法国来天津。

首次领洗者

在本校头一名领洗的学生是张成璞,山东人,预科第二年级。他是于1924年10月5日在本校圣堂由院长手中领得洗礼,圣名达尼老。他因在年终考试不及格,又转了学校。

首次唱大弥撒

1924年11月1日诸圣瞻礼,献县教区会长神甫在本校圣堂内唱了大弥撒。

1925年至1926年

人位调换

1925年7月3日,裴百纳神甫升任工商学院院长,尚建勋任商科系主任,斐化行任工科系主任。9月10日,邵德基神甫(P. Achotegui)和读书修士暴安良来津。

开学

本校第三次开学,是在1925年9月8日。在95名学生中,40名是新生,33名是奉教的。本年开学后,入商科的学生6名,入工科的学生10名。又添了两位外国教师:Metz先生教授专门技术,Gisaim先生教授几何学。

学华语

在本学年期间,值得记录的是来华的外国神甫们学习华语的热潮。照例,新来的欧洲神甫和修士一到天津,先要在普爱堂学习华语。本年(1925)10月9日,从安庆教区来了一位法国神甫,姓de Cabo。12月6日从蚌埠教区来了一位意国神甫,姓马(P. Marchesa)。以上这两位都是为学习华语来到天津。在普爱堂学华语的方式有二,即集体学习和个人学习。个人学习时,是同中国教师直接谈话。集体学习每星期两次,即星期三和星期六。时间是下午5点半至6点半,学员一般地说是6位至8位。有时院长、会长也来旁听。他们学习的热潮是这般高涨,以致1926年1月1日也未停课,连其他假日也照常上课。

传教工作

从去年(1924)在法国兵营,每月两次,尚建勋神甫去作弥撒。今年(1925)12月13日,美国陆军中尉 Bulter 的胞兄是耶稣会士,他在文贵宾主教前求得了类似的准许,即在美国兵营内每月也举行两次弥撒,此外也给男女教友听告解。在美国兵营内,望弥撒的官兵和他们的亲友共有40多人;在天瞻礼日,人还多些。从1942年2月14日开始,每主日也有弥撒了,并且弥撒中还大合唱经文。

学生募捐

本年冬季,冯玉祥、张作霖、李景林在河北省打内战,闹的乌烟瘴气,冯张互打,循环不绝,枪声炮声日夜不绝于耳。但在天津市,本校却未受遭扰,在乡间则大不同了。因连年内战,老百姓遭受逃兵的抢掠;又因天气寒冷,无衣无食无住所,人民生活困难达于极点。这时在老西开成立了圣肋思公撒各救济会,为救济难民,这会也请了院长神甫许可本校学生参加工作,协助为难民在天津市劝捐。本校学生得到院长许可后,立即行动起来,奉教生与不奉教生共40余人,不怕寒冷,不怕艰险,3天3夜完成了任务,共募捐了240元。但因我们开始工作的晚些,所以走在其他团体后边。

电影

本校从一开始就不断放映电影,这为学生们是一种娱乐。有些教士认为电影为传教工作有大帮助。不过这项事业,一人之力是达不到的,需要把中华各教区的教士们组织起来,(为)[以]本校为基地。凡在组织的,每人先捐100元,为买合适的影片。以后,按定时为各单位放映电影。有不少的主教、神甫赞成此事,并且已有照例纳上款的。

传教工作

本年3月间(1926年3月11日至19日)马神甫(Marchesa)给意国医院修女们讲了避静。

救灾委员会

在闹大水时,英美基督教人[士]成立了救灾委员会,他们也邀请了天主教教士参加,院长神甫答应了。天津教区主教也同意,故在开会时常有我们的人去参加会议。

垫满水坑

在本校南部附近有一大水坑,这坑也在校基之内。本年(1927)4月初,从海河用机器打出来了很多淤泥,用这淤泥把大坑垫满了。这可用了一年的工夫,直到1927年。

学潮

本年四、五月间,因为冯玉祥的兵进驻天津,各学校都闹了乱子,这多少是受了激烈党的影响,在本校也有闹乱子的,为此开除了3名学生。

教育联合会

本年6月4日,在西开教堂主教府,传教士们开了一次会议,大家讨论了有关教育问题,特别是如何加强并开展中学教育。在与会的神甫中,有本校院长和斐化行二位神甫。

自1926年至1927年

开学

这次开学时,共有120名学生,其中40名是大学科。今年(1926)开始有大学第二年级了。

祝圣圣堂

文主教来举行祝圣圣堂礼节,本圣堂主保取名耶稣圣心。从此本校圣堂就算为教友公开的圣堂。

账房迁到本校

崇德堂账房本在十二号路(今营口东道)办公,今年9月间迁移到本校来办公。

著作出版

1926年11月间出版了第一期《天津通讯》活页。以后于1927年又出版《北京公教杂志》(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从一开始,这通讯刊印的大部分资料都是耶稣会士写的。但为了避免双方起冲突,遣使会艾神甫(Chanet)被推选为通讯主编。耶稣会士仍大力支持他。这通讯的主要作用是促使把中学教育办好。

公教青年会

11月7日,开始成立了天津公教青年会,斐化行神甫与五六名会员每月2次在星期六开会。

学生领洗

12月24日,本校学生李宗礼,正定教区人,领受了洗礼。他是学校圣堂中第二个领洗的。

初次向外演讲

9月21日,籍满良神甫在天津市学生同志会上向各学校的学生们讲了话。

与校外交往

10月17日,南开女中行开学典礼时,本校教师们被请去参加,院长和籍满良二神甫同去参加。

来校贵宾

11月12日,瑞典国王的太子Gustave Adolph偕其夫人——英皇公主玛丽及其侍从人员来参观了北疆博物院。又12月25日Lacroix博士——法国巴黎科学院秘书兼博物院矿物学教授来参观了北疆博物院和本校。

建筑校舍

3月9日,开始修建本校学生第三宿舍,至1927年8月暑假时才竣工,是双层楼房。

大获荣誉

1月14日,由法国兵营(天津东部)传来无线电报道:“博物院桑志华(E. Licent)获得法国政府奖授十字勋章。”路透社在各报纸上也报道此消息。

4月19日,法国领事D. Saussine 在本校大厅当众宣读了贺词后,将勋章给桑志华(带)[戴]上。那天在场的有200多人,其中有别的领事们和天津教区的主教。以后这来宾们参观了北疆博物院西面建筑的新房舍。

出版校刊

5月26日,本校初次出版了两种刊物,一种是一切学生的,另一种是专为奉教学生的。

华牧来临

3月6日,有两位中国主教,一位是宣化教区的赵怀义主教,另一位是安国教区的孙德桢主教,他们都是去年在罗马由教宗亲手祝圣的六位主教之(二)[一],今天来本校参观。奉教学生们用各种语言祝贺了他们。又有本校的一外教学生去西开天主教学校内又祝贺了这两位主教。

新风琴

4月20日由法国送来大风琴一个。

大钟表

这大钟表是今年7月安装在本校大楼上的。

内战

因为在张作霖和蒋介石之间发生了内战,人心恐慌,地方不安,路途遥远的学生顾虑不能回家,故于6月初在定期考试前提前放了暑假,使学生们早回家去。

发大愿

8月15日,有安庆教区的一位神甫 Balirach 在本校圣堂发了大愿。在本校圣堂这还是第一次举行此种礼节。

学华语

在普爱堂或在本校,每日学习华语的外国神甫和修士共9人。有从北京请来的专门教师指导安庆、蚌埠、献县、大名诸教区的外国教士学习华语。

自1927年至1928年

9月5、6、7这3天,是入校考试,8日正式开学。这次开学共有学生110名,其中有45名在大学上课。

人位调换

葛道昌神甫(E. Jacquart)任商科系主任。尚建勋另有任务。凌安澜神甫(L. Brellinger)为神甫院理家。

建筑

8月24日,开始建筑神甫们的新饭厅,到10月7日新饭厅建成。

改用英文

8月8日,耶稣会法国北省省长神甫答应了在本校可以改用英文教授功课,并只限于预科一、二年级,以后逐年增加英文。

著作出版

《天津通讯》社的主编本是艾神甫(Chanet),他在5月间返回正定本教区,他的职务由耶稣会士代理。

人位增加

10月7日,从欧洲来了11位神甫,其中5位是法国北省的,其他6位有奥^①国的,匈^②国的,比^③国的;又有在本月底从班^④国来的3位,都是安庆教区的神甫。因人数骤增,住屋不敷分配,故将旧饭厅改成了小圣堂。

新亡者

11月13日下午6点45分,吉本思神甫(Gibens)病逝于西开医院。他原是比较安文斯城圣依纳爵大学教授,本年10月9日来天津,在本校教授地理,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偶得伤寒症而亡。他这一死给我们带来了痛苦,因他之死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他死后埋于马场道公墓里了,息止安所。

尚接葛的职务

本年9月底,葛道昌神甫忽得重病(吐血),在西开医院住了两个星期,10月26日回法国休养。尚建勋神甫在暑假期间本去威县张家庄传教,于9月初回到天津,又担任了商科系主任,教授地理,并兼任教区司账员。

圣母会

11月21日,圣母献堂瞻礼,成立了圣母会,共有4个会员,其中2人是献县公学圣母会会员,其他2人是大名公学圣母会会员。此外还有11名求进会的。刘斌神甫主管。

人位调换

王永凯辅理修士从献县来天津,为代替林多禄(Maegling)辅理修士,帮助桑志华神甫管理博物院。

事业

大名老同学们于1927年底在本市成立了经济互助联合会,只限于天主教的同学。这会的主任是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司账神甫。为组织此会,斐化行神甫出力很大。见《北京公教杂志》1928年2月份。

教育联合会

此会是1924年由上海会议所希望的,1928年2月8日在北京实现了,并且本院院长神甫被任为主席。

大愿

2月2日,安庆教区的班国王光焕神甫(Garcia)和奥国神甫侯汝才(Holzer)在本院小圣堂发了大愿。

学习华语

本年从法国来了许多神甫修士,为学习华语以后不再去普爱堂了,而是在本校。有安庆教区的顾怀仁神甫(de Cabo)任华语学习主任。

新建筑

5月4日,开始建筑博物院的图书室和实验室。5月5日,在许多来宾和观众前举行了博物院公开部分的开幕礼。

填满水坑

5月1日,将本宅基南部的水坑填满了。

宅基伸展

5月27日在本校南部有12亩地,东部有17亩地,划为我校的宅基地。

① 奥地利的省称。

② 匈牙利的省称。

③ 比利时的省称。

④ 西班牙的省称。

杂志

5月31日,本校第二次出版了中文的《工商杂志》。

内战

5、6月间,南北内战爆发。北有张作霖,南有冯玉祥和蒋介石。本市许多学校停课,令学生回家。本校则始终没有停课。

毕业

自1927年至1928年度,大学生共有45名,其中11名毕业期满,只有3人获得毕业文凭,其他8人仅得肄业证书。

大愿

8月15日,班国田神甫(Guttierez)发了大愿。

自1928年至1929年

本学年度(1928—1929)本校学生共132名,其中69名旧生,63名新生,大学生76名。

学习华语的神甫共3人,即班籍、奥籍、匈籍各1人。学习华语的读书修士共5人,即班籍、奥籍各2人,匈籍1人。

网球场

本年9月在我校校房西部,即5月27日新开辟的花园内修了一个网球场,为神甫、修士们打网球。

填平水坑

在本校楼房南边有个大水坑,于11月底填满了,改成一个大广场,分南北两个部分:南边较大,为学生操场;北边较小,为神甫花园,在四面围上了铁丝网。

新建筑

5月开始了以下的几种建筑:(一)筑了一道围墙,为把我们的花园和西面刘家的花园隔离开。(二)在博物院修了两座大厅,为在里边存放化石和矿物。(三)在马路道边上盖了8间小房,作小商店,其中6间为出赁,并为存放车子和汽车。以上这些小房都可用低价出赁。(四)修建了账房崇德堂。

祝圣祭台

4月3日复活瞻礼后星期三,文主教赠与我校圣堂1个白石头大祭台,并由他亲手祝圣了。

《北辰》杂志

在学年开始,本校出版了第一期《北辰》杂志,是奉教学生们编写的,是由我们中的一位神甫指导。此刊大受教士和教友们的欢迎。共印了700份,还不敷分配。

6月底,学习华语的神甫和修士们都归回自己本教区去了,以后就在此处学习华语了。又几位本校的神甫修士,也都住在神甫楼上,这样本校的楼房就可预先计划的专为学校使用了。

7月8日,司账神甫都搬到新账房崇德堂去办公。他们住的本院东部空房也归学校使用了。

暑假

6月23日到7月10日,凡在本校任职的神甫修士都至献县去了,为在若瑟山(云台山)上休息15天。但一两天后,因在饮食住处上有许多困难,于是上级改了主意,大家都很高兴地被请到主教府去休息。

6月25日晚上,院长神甫由西伯利亚铁路往欧洲去了,为同有关部门商讨本校的几个问题。与院长同行的有巴志永修士(Patyn),为到比国Enghien去读神学。又有田执中神甫(Thery),为往比国鲁文(Louvain)大学去考商科博士。

6月末,学生们举行了毕业考试,有的获得毕业文凭,有的只获得肄业证书。

自 1929 年至 1930 年

9月9日开学,共有120名学生,其中15名是奉教的。在大学科有67名。为奉教学生在开学前3天讲了避静。

9月底,田执中神甫戴着博士帽回到本校。

12月31日,院长神甫回到本校,他在回途中经过了美国,为在那里多参观几个耶稣会立的大学。

今春,在本校南边的大广场内为学生们修建了一个运动场。这时由上海来了一位姓龙的神甫(Gherzi),给本校带来一很宝贵的仪器,这仪器能记录极微极远的地震。但博士们讨论了好久,在本校没有找出合适的地点为安放它。到6月底才决定了为那仪器得另建一所小房间。这小房间就建在本校圣堂和北疆博物院之间,四外与其他建筑隔离开,为不受任何扰乱与微小的震动。

考试

本校学年底举行了考试。受考试的学生共100名。但毕业生中,9名得了毕业文凭,3名考得了肄业证书。

传教工作

本年主日、瞻礼日听告解共2000人,送圣体共2400人,每主日用英语讲道理,每3个或4个主日用华语讲道理。

《北辰》杂志

这杂志今年共出版了10次,每次印1千多份,至多到1300份,将来还有增多的希望。

自 1930 年至 1931 年

本院状况

本院共有神甫12人、修士3人、辅士3人,在本校教书的神甫7人、外国教授17人、中国教授12人。学生共123名,其中奉教的12名;大学科的63名,高中预科的60名,其中奉教的12名。

所有大事

(一)文主教在我们的小圣堂中,给学生们讲了避静。

(二)刚恒毅大主教(Mgr Costantini)回欧洲时路过天津,参观了本校和博物院,大加称赞。

(三)桑志华神甫被日本博士们请到日本皇宫大学去演讲古生物学的问题,大受各界尊重和欢迎。

(四)德日进神甫被黄色巡洋舰上人请去陪同他们找一条能从法国到中国通行汽车的路。这次旅行是科学性的,也是商业性的。

(五)美国经济代表团参观了也极口称赞了我们的博物院和本校的商业科。他们本是美政府派来东方调查有关纺织商业的。据他们在报纸上报道的。他们或在上海,或在天津,还未见过像在我们的博物院所陈列的有关纺织品更好的东西。

(六)圣神降临瞻礼后第二天,为表示与各修会合作互助友爱的精神,请了驻津各修会会士来本校聚餐。这本是已往的旧例,从未间断。这天请了文主教作主席,他蔼然可亲地坐在首席。在来宾们中有遣使会的,有圣母圣心会的,有方济各会的,若论国籍则有法国的、意国的、班国的、荷兰国的、中国的,大家在天主前欢集一堂,欢乐达于极点。

本校发展

(一)预科即高中又添了一年级,学生数字也随之增加。只奉教者就有24名。

(二)新建筑。在神甫饭厅北部,新建一所校舍,为在10月内招收中学生60名,就没有问题了。报纸上一登了本校招生的消息,从各处都来信要招生简章。

著作

(一)《北辰》杂志的订户日益增多,现已超过了1900。今年纪念良十三世^①的《劳工通牒》^②第40周年,为此《北辰》杂志写了些社会问题的东西,印成了专刊,共4千份,大受读者们的欢迎。

(二)博士田执中神甫将中国新出版的法律译成了法文,即1924年12月30日的《保险法》,1929年12月30日的《海上贸易法》,1929年12月26日的《贸易公司法》和中华民国的《民(事)法》卷四《家庭法》、卷五《继承法》。这些译本大受人们的赞评。

圣母会

每星期一次,会友们去监狱给犯人们讲要理,有30名犯人领了洗,奉了教,这说明他们受益非浅。

传教工作

在圣母无原罪瞻礼前一日,给本校工友们讲了避静。圣瞻礼七,在本校圣堂有一学生领了洗。今年一年内听告解4750,送圣体27500。

考试

学年终毕业考试,大学生13人毕业,其中11人考得毕业文凭,2人考得肄业证书。即工科毕业生共5人,只有3人考得毕业文凭,2人考得肄业证书;商科毕业生8人,都考得了毕业文凭。

自1931年至1932年

本院状况

神甫11人,修士2人,辅士3人。在校教书的神甫6人,修士2人,中国教师19人,外国教师11人。

本校发展

本校的新校舍于9月底都准备妥了。在开学时又添设了初中,学生的数目也增加了不少。工科31名,商科26名,高中117名,初中90名,共264名。

所有大事

(一)筹备立案。经过考虑,认为本校立案事关重要,因为只有通过立案,才能享受立案学校应得的权利。为此,把有关本校的人、物、事等都向教育部呈报上去了。该部经过整年的详细调查后,认为一切条件具备时才准予立案。最近得知此事成功有大希望。愿天主玉成此事,为使本校获得名副其实的利益。

(二)中日发生战争(指九一八事变),在许多地方,连在天津市秩序紊乱,以致各学校都停课了。而本校则仍照常上课,未受影响,这事引起了中国各报纸的称赞,并把本校称为模范。

(三)月底由华北请来几位负责教育的传教士,有德国圣言会的1位,有比国圣母圣心会的1位,有意国教士1位,又有圣母会修士两位。没有请献县公学和大名公学的负责人。大家一起讨论了如何统一安排学校课程,为使学生容易升入工商学院。大家都很满意这次的会,希望每年能照样开这样会才好。

(四)日本天皇通过军界最高参谋长写信给桑志华神甫,请他把关于北疆博物院所有著作都寄送日本,为能出版。

(五)在菲律宾农业美术科学社内,有田执中神甫的几位同乡朋友,赠给了他一个金牌,为庆贺他在1930年后所著作的光荣,因在菲律宾有口皆碑了。

(六)圣体瞻礼日,在本校又举行了会餐,请了天津教区文主教作主席,来与会餐的有遣使会的,有方济各会的,有圣母圣心会的,有意国教士,有圣母会修士。

^① 又译作利奥十三世。

^② 又称《新事物》通谕,1891年5月15日发布。

(七)旧历五月间,有天津《大公报》和《晨报》的新闻记者齐来参观本校和北疆博物院。第二天在他们的报上大加称赞本校与博物院。

(八)为使本校神甫修士在暑假期间都好好休息,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究在北京北边附近,向遣使会租到了1所房舍,租价也不高,该地幽静雅致,为我们歇暑假很合适。

本校发展

如上所说,自1930至1931年,本校为预科即初中生三年级添设了新房舍。今年又修建的新房舍,为此前的更大两倍,一直修到院基西头;又在西头修建了学生饭厅,也比以前的大两倍。

著作

斐化行神甫在“公教教育从刊”(Commissio synodalis)上写了以下几篇文章:(一)为纪念《劳工通牒》四十年,他一连写了6篇文章,为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二)论中国、日本是否都沾了天主教的光。(三)论16世纪末叶内斯多略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他又在北京公教杂志(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m)上写了以下三篇文章:(一)《在明朝天主教会被消灭》,(二)《论十六世纪末叶内斯多略教和天主教传教士》,(三)《耶稣会士在肇庆府》。他还在北京辅仁大学英文月刊上写了《明末哲学运动的来源》。

田执中神甫也在辅仁大学英文月刊上登载了他所译的中国法律书,都是华法两国文字对照本:(一)《船舶法》和《船舶登记法》,(二)《中华民国土地法》。

德日进神甫用英文写过以下的文章,见《中国近代化学史从刊》(1931年)、《中国晚期新生代化石学手册》、《中国地质学会报》。

(一)关于在四川及河南西南部红沙岩地带出现的一种奇蹄哺乳类动物问题。

(二)关于晚期寒武系那种莫名其妙的翼足软体动物类型的化石问题。

(三)关于在齐齐哈尔附近蒐集的考古资料的观察报告。

桑志华写的关于博物院的书,皆先谈该院出的专本,此处从略。

圣母会

每主日有3名圣母会友和本市几名教友去监狱讲要理,今年成绩不错,有60名犯人领洗。

传教工作

每年9月是学生们,10月内是工友们行避静。在本校圣堂每主日讲两次道理,中文的一次,英文的一次。本年内共讲道理64次,听告解5900次,送圣体29500次,给学生们及其他人讲要理262,学生领洗32,坚振38。在法国兵营讲道理46,听告解275,送圣体275,付洗儿童4。

毕业考试

工科毕业生5人,其中3人得毕业文凭;商科毕业生6人,其中4人得毕业文凭。

自1932年至1933年

本院状况

神甫11人,修士3人,辅士3人;在本校教书的神甫5人,修士3人。教师先生:外国人15,中国人19。学生:大学生63,高中生185,初中生139,共计学生387,其中奉教的共93。还有校生32人。

所有大事

(一)我工商学院请求立案的手续和文件业已呈报教育部。该部已派下人来调查了,认为一切合格,故只等待教育部正式批准立案了。

(二)中日战争引起了多人的恐惧,我校却每日照常上课,一个学生也不缺,而其他学校的学生多有逃散回家的。

(三)在复活瞻礼后星期二,本校照例举办会餐,来参加会餐的教士们有会士、非会士,以示互相团结友爱。我们请了文主教做主席,他对我们十分友好。

(四)本年我校领洗的学生共 47 名,其中在圣沙勿略瞻礼由文主教手领洗的 19 名,在圣诞节私下领洗的 2 名,在圣瞻礼七由院长神甫手领洗的 14 名,在圣神降临瞻礼由云南省荣主教(Mgr. de Jongue)手领洗的 12 名。耶稣升天瞻礼日,文主教给本校 37 名学生行了坚振。

(五)3 月 14 日,法国驻华大使 Wilden 先生和法国著名历史家 Pelliot 选择被院长神甫邀请,从北京来津,为参观工商学院和北疆博物院,先在本校大厅欢迎了他们,中外的大人物们,尤其是法国人都齐来欢迎他们。以后就参观了本院和博物院,末后在西湖饭店用午餐。被请赴席的法华来宾共 20 余人。这次请客自始自终很是顺利,为本校和耶稣会实有莫大的荣誉。以后,本校的声望已传遍了天津市。

(六)5 月初,有位法国神甫姓 de Reviers 来住在本校,他去年在巴黎京都很成功地组织了也指导了所谓殖民地展览会,他管的是关于传教事业的那一部分。他在天津先后两次用法语讲演,每次讲两个钟头,使本市懂法文的听众们很喜欢听。他演讲的题目是:《殖民地展览的光荣之日》。听他讲的人都不胜惊奇教会通过传教士们从始至今所做的一切事业。

本校发展

在大学的东面,又为住宿生们修建了 18 间楼房,其样式与先前盖的宿舍一般无二。

杂志

《北辰》杂志的预订户已达到 2000 户,从 1933 年改为半月刊。此外,5 月间又添设了一个刊物名《导光》,其文法浅显易懂,更适合青年人的口味。

著作

桑志华神甫出版了博物院的《近代化石蒐集》《博物院的鸟类》《集宁县的地质志》。

田执中神甫出版了他所译的《民事诉讼法》《民事调解法》《法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上诉法》。

圣母会

大学生圣母会员共 20 名,只有 3 名会员和几名公进会教友每主日去监狱讲道理。本年犯人领洗的有 40 名。今年初中学生也成立了圣母会,会员共 19 名。今年 6 月间,得到总会长神甫的特准证,是 1933 年 5 月 6 日发给的,定本校的圣母会为第一等会,其主体是无原罪圣母和诸天神。

传教工作

9 月间,工商大学生和高中学生共 47 人,一齐行避静。初中学生 46 人在 9 月底行避静。工友 23 名在 10 月行避静。又有公进会男女教友 40 名在西开行避静。

在本校圣堂内,每主日(平日例外)用华语和英语讲道理。年内共讲了 95 次。听告解 6160 次,送圣体 31490 次,讲要理 325 次。学生领洗 47 名,坚振 37 名。

在法国兵营内,讲道理 38,听告解 190,送圣体 210,行终傅 3。

毕业考试

工科 6 名毕业生都取得了毕业文凭。商科 2 名毕业生,只 1 名得到了毕业文凭。

自 1933 至 1934 年天津本院历史(包括账房、博物院)

本院状况

神甫 13,修士 2,辅士 3。在本校教书的神甫 7,修士 2。由外边请的教师,外国人 13,中国人 25。工商科学生共 95 名,其中奉教的 24 名;高中生 224 名,其中奉教的 45 名;初中生 221 名,其中奉教的 61 名。共计学生 540 名,其中奉教的 130 名。此外还有 72 名夜校生。

在崇德堂账房有秘书 1 人,工友 4 人

在大学和中学,秘书共 2 人,管图书室者 2 人,《北辰》杂志编辑人和助手共 6 人。

在全校及神甫院,工友共 22 人。

所有大事

(一)立案:为向南京政府呈请正式立案,我们已完全做了当做之事。因非正式立案,本校不得享有与其同级立案学校所享有的权利。然终究教育部批准了本校正式立案。此消息一传来,教职员、学生和朋友们莫不欢欣鼓舞,以为今后本校学生们数目定要骤增,前途更加光明。至于立案后所有的难处和麻烦总比所得的好处要小得多,那些麻烦就是受政府人员的视察和填写些详细而无用的例表及其他一些类似之事而已。

此外,华南圭先生代替赵振声神甫为本校的法定校长。这位华先生本就是本校的总视查员,在董事会方面,也须有些变更,但这不过是形式上的而已。

为庆祝本校顺利地正式立案,在西湖饭店设了盛筵,前来赴宴的有本校的职员们和神甫们,大家都互相庆贺了一番。

(二)省长神甫视查:9月10日,献县教区会长神甫鄂恩涛(Bornet)伴着法国耶稣会省长神甫杜甘棠(Thoyer)从欧洲来中国视查教务。他先从教区南部和献县地区开始,10月17日回到天津视查会院。至11月3日视查完毕。以后又往南宫、献县去视查。12月6日又回到天津,12月8日在圣母无原罪瞻礼,他给本校13名学生付了洗。12月10日他往上海去了。

依照视查神甫的提议,在本校成立一个“宗教调查局”,拟定3位耶稣会士担任其职务。他们要注意各色报刊杂志,凡有关宗教问题的事,务使其有正确的认识,并要把外国有关辩护真教的和正确的哲学书籍尽量翻译出来。

(三)据近来报纸上公布的巴黎科学院赠与暴安良神甫2000法郎,为奖励他在研究电学上和附带研究的所谓向风力学上的新成就。3月14日,这位暴神甫在本市许多有名的大人物前精彩地演讲了一种新仪器,名Stroboscopium。这仪器与物理学相干,并且可把它用在工业上。例如把它放在任何旋转极速的机器上,就可清楚地感觉出该机器上的毛病;亦如该机器旋转缓慢时或静止时一样。

(四)6月1日宗座驻华新代表蔡宁大主教来津,在本校圣堂作完弥撒后,神甫、学生和教职员及朋友们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并用法语和华语致了贺词。大主教用意语做了答词,由华铎于斌博士作翻译。这位新代表蔡大主教文雅、诚朴与和蔼的态度,获得了大家的非常爱戴。

(五)学生领洗、坚振。12月8日给13名学生付了圣洗。第二年望复活日,院长神甫给25名学生付了圣洗。耶稣圣心瞻礼,院长神甫给2名学生付了圣洗。圣类思公撒格瞻礼,院长神甫又给1名学生付了圣洗。

学生领坚振的共有49名,工友共有2人,是由文主教手在耶稣圣心瞻礼领的。

本校新建筑

3月初,在马场道临街,开始建筑初中的校舍,长达51米,三层楼,并有地下室,且安装上了暖气炉。这校舍可容纳480名学生。同时又安装了些物理教学实验仪器,并且这些仪器不是购买来的,而是在本工学院工科物理实验室自己制成的。其价值约合10万法郎,合华币2000元,这是专家们估计的。

著作

桑志华的著作:

(一)自1914年至1934年20年内北疆博物院典籍批评。

(二)又自1928年至1933年他和助手们做的禽鸟蒐集。

田执中的著作,即翻译的中国法律书,有《民事裁判集》第二、三、四、五年(1929至1932年)的裁判案。

还有几种华译书籍,其价值虽不甚大,其益处却不在小。即由几位初中中国教师所翻译的以下几种:

(一)《露德圣母发显记略》(1933年刘宝华译);

(二)《奥园记》(1933年巨景昌译);

(三)《真福德约法·文纳尔致命》(1934年刘宝华译);

(四)《奇城之王》(1924年巨景昌译)。

《北辰》杂志的订户达到1643个。《导光》半月刊的订户达到1266个。

圣母会

本校工科、商科学生并高中学生入了圣母会的共28人。初中学生入圣母会的36人。

传教工作

9月初,大学生和高中生避静的共69人。9月末,初中生避静的共61人。10月内,工友们避静的共23人。本年在本校圣堂内,除平常日例外,每主日用英语和华语讲道理、行别的圣事次数如下:讲道理150,听告解10068,送圣体42870,给学生和工友们讲要理304。学生领洗41名,学生坚振51名。

在法国兵营圣堂讲道理46,听告解158,送圣体230。

毕业考试

工科毕业考试者共7人,只4人得毕业文凭。商科毕业考试者共3人,都得了毕业文凭。

此处附加德日进的著作:《亚洲中部、沙漠地带的地质勘探报告》(西特伦——哈特科学考察团在巴黎大学地文学杂志发表的一种回忆录),《中国褶皱砾石》(法国地质学会公报第5集,卷1,第527页),《山西省古生界基准》《关于海拉尔附近白垩纪化石层的存在问题》《北京史前时代的文物发掘》《中国史前时代大纲》。

自1934至1935年天津本院历史(包括账房、博物院)

本院状况

神甫15,读书修士2,辅理修士3。在本校教书的神甫9,修士2。世俗教师:中国人30人,外国人10。

学生:在工商大学的123名,其中奉教的37名。在高中的共240名,其中奉教的58名。在初中的共250名,其中奉教的53名。学生总数共613名,其中奉教的148名。又有夜校:(甲)中国现代法、统计,(乙)外国语,学生共202名。此外还有崇德堂账房秘书1人,助手4人。在大学和中学秘书共3人,图书管理员2人,在博物院,秘书1人,助手2人,工友6人。以上共计工友23人。

所有大事

(一)去年本校既正式立案,以后与国立学校享有同样的权利,但不承担同样的义务。为此,高中生须受军事训练,高中一二年级每周两次有军事训练,由中央政府派来的军事训练官。

另外,为将来能当兵,从现在须习惯吃苦,遵守兵营的规矩。我校高中二年级学生全到保定受3个月的军事训练,生活在兵营中。这样学业不能不受损失。每月两次有本校神甫去保定探望并慰问他们,使他们不感觉孤独无靠。

(二)成立了工商学生校友会,专为工商科学生毕业后在各部门供职的,使他们与本校仍不失联络。

(三)又成立了公教青年会,凡圣母会员比较年长的都入了此会。

(四)近来奉教学生逐年增加,为此指派了两位神甫给他们当神师。一位神甫专管大学生和高中生,另一位神甫专管初中生,这样,为讲道理也更有益处。

(五)今年在天津举行全国运动大会,我校学生获奖不少。

(六)10月14日庆祝辅理修士林多禄(Maegling)来华25年。他在校尽职已10年了,鞠躬尽瘁,10年如一日。为此,在饭厅备了盛宴,大家在赴筵时,作诗唱歌,向他表示了热情的谢意。

(七)9月18日,贾容光神甫(Cannepin)在医院平安逝世,寿58岁,在会31年,来华24年。他生平在清丰、濮阳一带热心传教,曾亲手付洗了临死外教小孩达2000名之多。他尽心竭力给外教人传布了福音。他在生病时,从不怨天尤人,给后人立下了好榜样。追思他的弥撒是在本校圣堂内做的。把他

葬于附近坟地。送殡的人群中,有本市各修会会士和教友,并本校学生。

(八)11月5日,日本天皇的妹妹名 Kuni 的和她的爱人名 Otani 的亲参观北疆博物院。这位 Otani 是日本僧人的最高领袖,以致俗称他为僧人的爸爸。随从他来的还有许多侍卫人员。博物院主任和本院人等很好地接待了他们。他们也很感兴趣地听了博物院主任所解释的话。这些话当时就由人译成日语。

(九)今春在天津市有一种时疫名猩红热,本校许多学生被传染了,并且还死了一名学生。为此,初中生 8 天的工夫放假回家。

(十)乘着深夜人们熟睡时,小偷由窗户入神甫楼,偷去了自行车等物。又一次小偷潜入训育主任室及会客室,把学生在运动会上得的银杯偷去。还有几次,小偷来了,但没有偷了什么去。从此,我们就在窗户上安上铁棍子,并派了 3 名打更的,手持武器日夜看守。

(十一)今夏为了经济困难,暑假期不去西山避暑。

学生领洗,坚振:三王来朝瞻礼日,蔡宁大主教给本校 25 名学生付了圣洗。圣瞻礼七有 4 名学生,圣神降临前日有两名学生由院长神甫手领了圣洗。在圣三瞻礼日,文主教给以上的学生们行了坚振。

避静:今年在开学前后行避静的有大学生和高中生 95 名,有初中生 53 名,有工友 27 名。

本校发展

3 月初开始建筑初中校舍,11 月内竣工。在此校舍的三层楼上设有很宽大的圣堂,在这里除圣体降福外,举行其他一切宗教仪式。

在博物院地下室又添了两个暖气炉。这样,博物院各室可以过冬取暖了。

著作

(一)杂志:《北辰》杂志以后归北京光启学会出版、写稿、校阅和管理订户并经济问题。《工商杂志》本校每年出版两次,专为研究工商业问题。《导光周刊》仍由本校出版,今年已达到 1500 份。

(二)桑、汤二位神甫的著作:《山西省中部有些最新的地质》(The pliocene la custrime series in contral shansi)。

(三)田执中翻译:(1)《中国司法第五年度民事案》;(2)《户籍法》。以上都是华文、法文对照本。

传教工作

在圣堂中讲道理 100,听告解 10766;送圣体 54570,给学生和工友讲要理 374,领洗的学生 31,坚振的学生 31。在法国兵营讲道理 50,听告解 410,送圣体 430,讲要理 8,付圣洗 5。

毕业考试

工科毕业生 6 名,4 名得文凭,商科毕业生 4 名,3 名得文凭。

自 1935 年至 1936 年天津本院历史(包括账房,博物院)

本院状况

有神甫 7,修士 1,辅士 3。在本校教书神甫 10,教书修士 1。由外边请的教师:中国人 39,外国人 12。大学生 139 名,其中奉教的 34 名。高中生 220 名,其中奉教的 74 名。初中生 194 名,其中奉教的 38 名。学生总数共 554 名,其中奉教的共 146 名。夜校外国语生 95 名。此外,还有在崇德堂账房,秘书 1 人,助手和工友共 3 人。在大学和中学,秘书 3 人,图书管理员 2 人。在博物院,秘书 1 人,助手 2 人,工友 6 人,共计在神甫院和学校内工友有 23 人。还有警察 3 人日夜轮班护院,以防小偷潜入花园和住宅,就如前几年所遭遇的那样。

所有大事。

(一)10 月底,账房神甫搬回原处崇德堂(营口道 12 号)。司账神甫共两位,一位是院长,一位是理家。因他们经常不在本院,由本院到账房每天往返两次,故又派一位副理家,当他们都不在本院时,替他们照料一切。

以前账房所占用的本校那两间房,如今打开中间的墙,作了神甫们的散心厅。这厅比邻近饭厅的那个散心厅宽大多了。又有西边的那些小房子。空气、光线都不充足,初中生在那里上课不合适,完全拆毁后,种上了花草。

(二)南京教育部照准工商学院从成立以来的毕业生都能得正式毕业文凭,亦如从立案后这3年一样,连本学院所附设的预科的中学,也同样享有立案的权利。这证明政府重视本学院了。

(三)10月17日,著名的古代人种学博士 Schmidt 在本校大厅内很精通地演讲了古代人种,很多听讲的是本市各大学的教授和博士。

(四)今年在本校多次举行了公开演讲会,讨论了各种科学问题。是本市各大学的教授和博士们在广大听众前讲的话。

(五)5月3日,庆祝金道宣老神甫进修会60年。中午请来赴宴的有天津教区文主教和西开医院大夫 Benjamin 我们的好友。

(六)5月8日,毛纶神甫从罗马来天津,他是耶稣会总长派来为视察本会在华各教区的。几天后,视察本院毕,辞了我们往上海去了,为在那里同在华本会各位会长讨论视察的目的。

(七)本年度北京、天津各大中小学都陷于混乱状态,因为中日国际关系恶化。这为学生们的学业大受损失,但在本校仍能照常上课,平安无事。

(八)今年在天津开了一次学生运动大会,有跳高、赛跑等项目。参加这次运动大会的还有法国、英国、美国的士兵,会场上观众有3千多人,都惊奇鼓掌,庆祝大会成功。

(九)桑、汤二位神甫(Cicent et Trussaert)这次旅行回来,带了不少的奇珍化石,特别是有个整套象牙骨,这在欧美各博物院内也找不到。

本校发展

(一)在东边外人住的第三排和第四排楼房中间,我校修建了一所特大的厂房,命名为机械房,把本校所有电力机器都运到里边去,为(砌)[切]断穿孔钢材之用,并为验证其抵抗力之大小。

(二)在博物院东边修建一所小型房舍,为在里面陈设化石及博物学的公开展览。

(三)在校西部和南部的水坑,完全填满了,学生们的球场以前太小,现今扩大了。

(四)在本校圣堂弥撒间加修了领圣体栏杆,是用大理石做的,又美观又适用。

学生领洗、坚振

领洗的学生在12月3日圣沙勿略瞻礼有4名,在4月11日圣瞻礼七有5名,在5月31日圣神降临瞻礼有4名。以上共计13名。领坚振的学生是在6月19日耶稣圣心瞻礼,共有20名。

避静

本校大学生、中学生和工友们,在开学前后,每年照常行避静。今年文主教也要求使一位耶稣会神甫给教学先生们和会长们讲一次避静。

著作

田执中神甫翻译的中国法律:《南京最高法院的判决》(第5年度,1933年民事)及《破产法》(此法是1935年7月17日公布的,当年11月1日生效)。以上皆是中文、法文对照本。

桑志华神甫写的:(1)《十年来寓居和勘探黄河白河及北直隶湾地带的记述》(自1923年至1933年),共3册,另有一册目录和一册地图,共1600页。(2)《在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满洲、内蒙、新疆)二十年的勘探记述》(自1914年至1933年),一册,共42页。(3)《直隶省(河北省)平原的机井问题和天津老西开喷水井记述》,共70页。

德日进神甫写的科学论文如下:(1)《长江流域的新生代序列》(《中国地质学会公报》卷14,1935年第161~198页),(2)《关于广东和广西的新生代岩层问题》(同上书第179至210页),(3)《(湖北)宜昌地区红岩层内的一个恐角兽》(同上书,卷15,1936年),(4)《关于中国史前时代的科研现状》(《人类学》,1935年),(5)《揭开过去的内幕》(《学术研究》,1935年11月份)。

记录:(1)《安阳的哺乳类化石》(《中国考古学》),(2)《周口店9号发掘区位的哺乳类化石》(同上

书)。

杂志:《导光周刊》出版了 1500 份。《工商学志》是本院出版的,每年两次(见 1934—1935 年)

传教工作

讲道理 119,听告解 14773,送圣体 46749,讲要理 338。学生领洗 13 人,领坚振的共 20 人。又在法国兵营:讲道理 43,听告解 650,送圣体 600,讲要理 3,付圣洗 5,终傅 2。在三德里:听告解 929,送圣体 379,讲道理 15。

毕业考试

得文凭的工科学生 10 名,商科学生 6 名。

自 1936 年至 1937 年天津本院历史(包括账房、博物院)

本院状况

神甫 17,修士 4,辅士 4,在本校教书的神甫 9、教书的修士 2。从外边请来的教师:中国人 33,外国人 12。学生:大学生 141 名,其中奉教的 33 名;高中生 160 名,其中奉教的 32 名;初中生 154 名,其中奉教的 33 名。学生总数共 455 名,其中奉教的共 98 名。

此外,还有在大学、中学当秘书的 1 人,图书管理员 2 人。在博物院当秘书的 2 人,助手 2 人,工友 6 人。在账房崇德堂当秘书的 1 人,助手 1 人,工友 2 人。共计为本院神甫和学生所用的工友 30 人。此外,还有 3 名警察为日夜防备小偷。

所有大事

7 月 4 日,冀子岭神甫(Ghyselinck)做完卒试来津替雍居敬神甫(P. Jung)管理中学。雍神甫把事交代后,于 7 月 6 日就回到献县。他从开始办中学至今整整 5 年(1931—1936)。同冀神甫一起来津的还有两位中国修士:齐振国和王峻德,是为帮助冀神甫管理中学。

6 月 26 日,刘迺仁神甫离津去芜湖做卒试。

7 月 24 日,程慰先神甫从上海来津,为代替刘迺仁神甫当训育主任。7 月 14 日,奥国耶稣会省的雷神甫(Buchler)来津,因病回国,8 月 9 日启程。

8 月 20 日,荣神甫(Doyon)由徐州教区来津,为在本校教授英文。他是由视查神甫毛纶(Marin)——他的会长派来的。

9 月 5、6、7 这 3 日,梅志洁神甫(Hopsomer)给学生们讲了避静。

9 月 21 日,视查神甫毛纶视查本院,几天后视查完毕。

9 月 21 日,徐保和、王振生二位修士来此,不多日又去北京辅仁大学,为深造汉文学业。但不久又回天津本校,因经过 5 个月的实习,知不相宜,故回津。这是 1937 年 3 月 6 日的事。

10 月 1 日,不久前被祝圣的南京主教于斌来津,下午 3 点半,神甫们、学生们开了个欢迎大会。晚上,有不少人在公教进行会大厅专为这位新主教设了宴席。

10 月 2 日,声明了饶满恒神甫(Jomin)替尚建勋神甫(Charvet)为工商学院院长;沈诚斋神甫(Schante)替郇国华神甫(Desrumant)当理家。

10 月 6 日,法国特派驻华大使 Naggiar 先生来参观本校。他完全赞成本校用英文教授各种功课。

11 月 7、8 日,我校学生选手与各校学生选手进行了运动比赛。11 月 10 日,偶由教育局派来视查员视查了我们的中学。

1937 年 2 月 2 日,冀子岭神甫发大愿,午饭时请了文主教和两位比国圣母圣心会神甫并 Javal 先生来吃饭。

2 月 25 日,会长神甫方济民(Vagner)来津视查会院,于 3 月 4 日返回献县。

3 月 22 日,南京教育部派来视查员视查了本校。

4 月 2 日,会长神甫方济民路过天津往上海去。

4月24日,在本校开运动会,成绩优越。

5月2日,在本校圣堂明供圣体,为庆贺耶稣会祖圣依纳爵。乘此机会,请了几位神甫和各修会会士来用午餐,以表示团结友谊。

5月31日和6月1、2日,天津市开各中学运动会,我中学的运动员去参加。

6月6日,有7名初中学生领洗,几年后又有3名初中学生领洗。

6月18至22日,本校公开考试,这些都汇报到法国大使馆商业部门去了。

今年,多次请了专家们向本市名人们和本校学生们作了演讲。

在今年来参观北疆博物院的知名人中,首推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Takunaga de Waseola 和东京皇宫大学教授 Masuda,还有两位美国教授 Elisseff 和 Hume,他们是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考察团团员。

著作

田执中翻译的中国法律书,都是华文、法文对照本。26号《法院裁判解释》一集(自1929年2月至1935年1月民事诉讼),八开本,共298页,1936年在天津印,价值6.50元,28号《中国裁判年南京最高法院裁判案。1934第七年度·民事》八开本,共362页,1937年在天津印,价值7元。

桑志华著的《北疆博物院向导》,邓建岩(Teng chien yen)著的《中国北部旱地兽类》(The non-marime castropode of north China, Mai 1937),德、汤(Trassaert)二位合作的《山西西南部的长鼻兽类》(The proboscidiens of southcastern Shansi Mars 1937),冀子岭著的《中国言语典籍学》,见《教育(丛)[丛]刊》1937年4月。

杂志:《工商学志》每年出版两次。《导光周刊》在1937年6月末停刊了。

传教工作

讲道理117,听告解11412,送圣体46150,讲要理180,学生领洗10。在法国兵营讲道理47,听告解610,送圣体650,讲要理5。在三德里讲道理30,听告解1760,送圣体1800。

毕业考试

获得文凭的,工科有23名,商科有8名。

自1937年至1938年天津本院历史(包括账房、博物院)

本院状况

神甫21,修士4,辅士3。在本校教书的神甫12,教书的修士2。从外边请来的:中国教师52,外国教师6。学生:大学160名,其中奉教的40名;高中256名,其中奉教的39名;初中288名,其中奉教的46名,共计学生704名,其中奉教的共125名。

大学和中学秘书1人,图书管理员3人。博物院秘书3人,助手2人,工友6人。崇德堂账房秘书1人,助手1人,工友3人,全院为神甫和学生共有工友33人。此外还有3名警察。

中学发展:为高中学生另设了图书室,买了800卷书。为初中学生也设备画图室。又为高中教师们设了休息室。

学生领洗、坚振:领洗的,3月19日有高中的8名,此外还有耀华中学1名。4月16日有初中的4名。5月26日有高中的7名、初中的9名,还有洪德学校的1名。6月5日有初中的2名。坚振的,6月6日共49名。

所有大事

7月7日,刘迺仁神甫做完卒试又回本校再当训育主任,替下程慰先神甫来。

7月19日,会长神甫方济民由白修士陪同着,从献县来天津,第二天就入了医院;因为病势严重,依大夫诊断需去上海。8月12日由田执中神甫陪伴着,坐船去上海。因当时上海有战事,不能上岸,就继续乘船去香港,在那里医院中住了10天,于8月30日又乘船往法国。但由天主措施,在比国下了船,住在比京 Bruxelles 医院中,于次年6月4日逝世。他勇敢地忍受了巨大的痛苦。

7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天津市。

8月2日,当时留在本校的学生为危险环境所迫,有的就逃走了。31日,校长华南圭先生辞职而去。

9月3日至5日,50名学生由刘迺仁神甫领导着,行了避静神功。8日,沈诚斋神甫因病住院到9月27日。

9月20日,德日进神甫去北京住德胜院。这院是为来华耶稣会士学中国话的一所新宅院。

9月3日,桑、汤二位神甫由兵士们保护着,从大同回到本院。他们在中日开战前照常出外做科学旅行去了,路上遇着了不少的困难。

10月1日,本校奉教学生开始作九日敬礼,求平安。

10月3日,由欧洲来华住在本校的有3位神甫,即杜安德(Deltour),贝兴仁(R. Petit),王兴义(Roi);还有两位读书修士,即马兴智(Mathieu)和明兴礼(Monsterleet)。

10月5日,斐化行去上海,那里新成立了一所著书院。

10月6日,新账房崇德堂楼房建成,也开始住人。这座新楼房就建在老崇德堂楼旁。

11月19日,院长神甫饶满恒被选为代表去罗马参加耶稣会全体代表会议(为选总会长)。

11月29日,庆祝郇国华神甫来华25年银庆。

12月2日到6日,住在本校的有余裕仁神甫(Joliet)和赵振声神甫,他于5日晚已秘密得知自己已被选为献县教区主教了。6日,饶满恒去欧洲开会,会长神甫委任尚建勋做本校临时代理院长。8日,公开发表赵振声为献县教区主教。15日和16日两天停课放假,为重整秩序,免遭困难。16、17、18三天,王峻德修士给工友们讲避静。26日,代理院长给某助教和4名高中生付了圣洗。

1938年1月5日,斐化行神甫于11月24日由上海回津,今日去献县,于本月22日返回天津。12日,沈诚斋神甫升为北京德胜院的代理院长,这样为使毛纶神甫因被总会长之召能赴罗马。15日,毛纶神甫来津,17日启程赴罗马;沈诚斋去北京就职。25日,斐化行神甫去日本,为做许多演讲。29日,在本校圣堂,由教友们花钱,设置了两个小祭台,是用很美的大理石做成的。

2月2日,今天发大愿的神甫有:王兴义、房如晦、杜安德、刘迺仁。8日,会长神甫来津视查会院。

2月14日,鲍神甫 Borch 因精通日语,由总会长神甫许可,来天津,属本校,为应付可能遭到的困难。18日,由上海来津两位神甫,一位是 Valensim,为在19日给北京德胜院的人讲避静;另一位是梅怀义(Merreille),他为养病。

3月1日,会长神甫去北京德胜院视查,7日回津。10日,他偕同那位从去年10月27日就住了医院治病的卢修士回了献县。19日,9名高中生领了洗。21日学生们的饭厅建成。

4月16日,4名初中生领了洗。

5月13日,桑志华——北疆博物院创立人被其上司召回法国。23日,饶满恒尚在欧洲未回来,就被总会长任命为献县耶稣会的会长。26日,9名初中生、7名高中生、1名洪德学校学生都领了洗。

6月2日,2名初中生领了洗,6日,文主教在本校圣堂给48名学生、1名工友行了坚振。13日,读书修士李多然安逝于医院,有我们中的一位神甫帮助了他。

6月14日,为环境所迫,学生们提前考试。16日,放假回家。18日新会长神甫饶满恒从欧洲平安抵津。19日,发表了尚建勋为工商学院院长。

6月28日,读书修士王福宁(振声)入了医院,为能在7月5日在医院动手术(锯去脚)。

今年来参观北疆博物院的有日本国亲王 Oyama 和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陆军中佐 Rousselle。

著作

田执中翻译了《中国法律裁判案·南京最高法院的裁判案·第八年度民事案》,中文、法文对照8开本,共298页,1938年天津印,价6元。

桑、汤二位联合英文著作《山西西南鲜新期的长颈鹿类和鹿类》,1937年7月;《北疆博物院哺乳类·齧齿类》,1938年4月。

冀子岭著作了《中国语典籍学·事物典籍》32页,见北京酒兹府《教育丛刊》杂志,1938年2月份。本校杂志;《工商学志》每年两次出版,

传教工作

讲道理 108,听告解 15494,送圣体 51500,讲要理 511,学生领洗 142,领坚振 49。

在法国兵营:讲道理 34,听告解 500,送圣体 440。

在三德里:听告解 2518,送圣体 2550,讲道理 26。

给日本教友讲道理 15,听告解 80,送圣体 100,讲要理 20,付圣洗 2。

毕业考试

得文凭的:工科生 20,商科生 13。

自 1938 年至 1939 年天津本院历史(包括账房,博物院)

本院状况

神甫 23,修士 1,辅士 6。在本校教书的神甫 9。教师先生:中国人 58,外国人 6。

学生数目:工科、商科共 290 名,其中奉教的 55 名;高中共 329 名,其中奉教的 52 名;初中共 369 名,其中奉教的 62 名。共计学生 988 名,其中奉教的共 169 名。

此外,还有在大学和中学生当秘书的共 3 人,图书管理员共 3 人。在博物院秘书 2 人,助手 2 人,工友 4 人。在崇德堂账房秘书 1 人,助手 1 人,工友 3 人。共计神甫和学生用的工友共 31 人。此外还有 3 名警察。

本校发展

为了学生增多,房舍缺少,又把神甫饭厅旁的那 3 间房改为高中的自习室了。

学生领洗、坚振

领洗的学生:12月18日有77名,4月8日有22名,5月20日有17名,6月4日有1名。坚振的学生:5月29日有49名。

所有大事

今年夏,由7月初到8月末,在北京德胜院学华语的耶稣会士们,因为有战事,路途不通,不能往他处歇暑假,而来天津本校,共有23位神甫,是8个国籍的人。这事为我们虽属偶然,却不无兴趣。他们是分班来津,每班人住十几天。这次歇暑假,不但在饮食上给他们留下了好的印象,连在互相友爱爱上,他们也是忘不下的。

今冬自11月23日到第二年3月6日,本校开办了避难所,为收容难民。在本校地基上盖了200间小房,为使贫民过冬御寒。我们供养着206家人,他们中有奉教的,也有不奉教的,共计有1173口人。其中有400多名男女孩童。也为他们盖了学房,由本校学生们教书。而学生们的家中却为此花钱很多,因为在学生们所捐的14000元中,仅仅2000元是赈济会拨给的。学生们在一定日期还给难民们分馒头,这一部分款是由罗马来的赈济。可是不但避难所的人沾了光,连其他难民也沾了光。因为冬季一过,难民们就离开本校回了家,学生们把所剩下的物资就分施给其他难民了,其数约有2000名左右。并且学生们不但救济难民,还愿与遭难者共欢乐,因为在圣诞节,想不到他们为难民们买了许多点心,并亲手分给难民吃。这种欢度圣诞节的事,也值得记一笔。

人位调换

邵德基神甫(Achotegui)任本院理家。开学后仅仅1个月,卫如多神甫(Villavicemix)来替冀子岭神甫管中学。读完书并做完卒试的罗学宾(Leroy)神甫从欧洲回来,被任为北疆博物院代理主任。

柯守义神甫(Klok)被任为副管账员,为使尚建勋神甫更有工夫尽本院院长的职务。来养病的牟理藻神甫(Moriseaux)住在崇德堂账房,为更便易见大夫,同时也给邵国华神甫作伴。鄂恩涛神甫(Bornet)被任为本院神师。葡国神甫 Guerra 和班国辅理修士 Arana 被他们的公司派来,为一年之久

在本校帮忙。汤道平神甫回欧洲,为在地质学上去深造。

零星小事

7月16日,彭柏年神甫(Dupont)来津查账,他是教区的查账员,伴他来的有叶慕华神甫(Aizier),是为治腿伤,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月。18日,包神甫(Borsch)返回日本,为休养,并为在他本教区做周年避静,一个月后再回来。这一天暴安良(Pollet)和王兴义(Roi)二位神甫去内蒙旅行。

7月25日,邓(Denis),巴(Pattyn),房(Wattine)三位神甫去西湾子(内蒙),并于8月6日三人一起回来了。

8月5日,金道宣神甫前天领了终傅,今天13点半于本院逝世。因为今天是主日,出殡迟至本月8日。来送葬的有文主教,是他给亡者行了安所礼;还有法国领事及军官,他们在望完弥撒后步行送殡到坟地。

8月6日,罗学宾神甫从欧洲回来,他当读书修士时曾来过中国,并在北疆博物院做过桑志华神甫的助手。

9月3日,来此参观本校的有越南河内大学的教授和一位红十字会的代表。4日,学生们开始行周年避静。因战事被阻,赵振声主教来不了,文主教请甘代之讲了避静。6日毛纶神甫从欧洲回来,12日就回到北京德胜院。7日,高中、初中开学;第二天,大学也开学了。这天是文主教来做了弥撒。

13日,罗学宾、德日进、汤道平三位神甫去日本,为讲述有关北疆博物院的科学问题。20日,王兴义神甫从内蒙回来,这次旅行收获不小。

25日,斐化行神甫去印度支那,为讲述各种历史问题,尤其是为讲述先代传教士和他们所做的[一]些事业。

10月2日,鄂恩涛神甫从北京回来,他在北京德胜院从7月9日到现在为各种事务所系。12日,荷兰人柯守义神甫由欧洲来天津,并在崇德堂账房做助理管账员。13日,罗学宾、汤道平二位神甫从日本回来。15日,距我们的花园不远,有日本人的棉花堆着起火来,因此次日他们派来40名日本卫兵伴同着法国副领事 Couillard 先生,三个钟头之久把学生宿舍查看了一番。因为没有找出可疑的痕迹,所以就释疑而去了。26日,献县教区主教赵振声从北京来此,并在此住了两天,于28日在奉教学生前做了弥撒,并接受了学生们的祝贺。27日日本人的棉花堆又着了火。第二天,两个日本人由特别裁判所来视查。30日,耶稣君王瞻礼,有复发圣愿的,是神师神甫讲了默想题,整日明供圣体;有1名学生领洗。这一天,有申自天神甫(Archen)伴同着7名学生去北京,为由宗座代表那里领受奖赏,因为他同这些学生翻译了向教外人讲的书籍。

11月9日,孟敬安神甫(Gasperment)来津,给工友们讲避静,是由本月10日到13日。19日,鄂恩涛神甫去北京德胜院,是为给准备复发圣愿的讲道理。以后就住在那里,直到毛纶神甫回德胜院,因为他为办公事往上海去了。20日王兴义神甫去上海,到12月24日回来,是为参观上海教区设立的博物馆,馆名 Heude。

12月5日,饶满恒会长神甫来津视查会院,从6日起到18日完。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刘焕文修士,他是为在医院动手术治盲肠炎。

12月9日,汤道平(Trassaert)神甫召回欧洲,为进行地质学研究。18日,7名学生领洗。26日,宗座代表的参赞高主教(Comisso)来参观并慰问了学生们所照管的难民们。28日,包神甫(Borsch)去徐州,为办理几件事情。

1939年1月15日,罗学宾神甫久已准备好出去做科学旅行,他走到山海关就不能前行了,并被兵们迫使回到天津。19日,贝兴仁神甫在北京圣米厄尔医院住了一个月后返回天津本院。23日,鄂恩涛神甫去北京,为给本会会士们领导避静。

2月2日,鄂恩涛神甫回到本院,当天就给法国辅理修士领导避静,讲默想题。还有北京德胜院的米(Schmilt)、孟(Munch)两位辅理修士也一起听讲默想题。11日,卫如多神甫发大愿。15日,为已亡教宗做大弥撒,虽然是在寒假期间,竟有30位教师来望弥撒。今天,冯文昆和马昌武二位辅理修士去

献县,为同那里的中国修士们一起行避静。韩笃祐辅理修士(Haser)也一起同冯、马二位修士去献县,以后不再回博物院尽职。

3月6日,Lacoste先生为办理法国人的事从北京来津。他在回法国前来向我们告别,在我们这里用了午餐,有北京副领事 M. Bouffanais 和天津领事 M. Lepissier 二位先生作陪。31日,有 Caussette 神甫由北京来此,为行避静。

4月5日,班国神甫 Mola 本是在北京学中国话的,由教区主教照准,来津给班国教友在法国人圣堂内领导避静。8日,有22名学生领洗。

4月12日,会长神甫和梅神甫(Merveille)一起来此。

4月13日在本校圣堂内,有日本领事的一个儿子领了洗,并且有两位日本领事在场。

4月18日,斐化行神甫在印度支那科讲完课又到日本去了,今天回到这里。25日,赵振声主教由献县来津,并住了医院,直住到5月9日。

4月27日,法国新领事 M. Colin 来参观工商学院。

4月29日,在本校开运动比赛会。

5月6日,中学生们也开了运动比赛会。

5月15日,开始作3天小避静,预备在耶稣升天瞻礼复发圣愿,是神师神甫讲默想题。

5月17日,开滦煤矿的主任领着天津市的40多名机械精巧匠们来参观了工商学院。

5月19日,正定府陈主教伴同着艾类思神甫(Charet)——他们都是遣使会士——来参观了博物院,22日又参观了本校。

5月28日,在圣神瞻礼,有17名学生领洗。29日,文主教在本校圣堂内给44名学生行了坚振,并两次乐意地向他们讲了道理。

5月30日,Guerra 神甫偶遇汽车,因躲不开被撞倒,幸未被害,只他骑的车子撞坏了,他在医院里休息8天后,就出院仍尽其职。31日,Arana 辅理修士返回本教区,他是从11月20日来本校尽职的。

6月2日,田执中神甫返回本校,他是上月17日乘船到上海,为搜集法律各种参考资料的。4日,有1名学生领洗。14日,日本兵封锁了英法租界。为去火车站就困难了,食粮少了也贵了。16日,学生们开始避静,20日令学生们回家。21日,巴神甫(Pattyn)去内蒙西湾子。22日,140名学生去火车站上车,由6辆大汽车载着,事先已与领事官们说妥,故丝毫不阻地过去了,同日开始掘地脚,为建新房,使中学向西伸展。28日,刘神甫和房如晦神甫伴同着读书修士 Dailey 去献县。冀子岭神甫移住崇德堂账房,以后要接管郇国华神甫的职务。29日,邵德基神甫去献县,为到河间会院去当理家。

著作

(把1937年所遗漏的再写在此处)

申自天写的《人生基本问题的解答》,华语第二次出版,16开本,共107页,价2角。又华法语对照本,第二次出版,16开本,共107页,价4角。《耶稣真徒的生活》,译自法文本 Sullerot,16开本,共120页,价3角。

狄守仁写的《九十三题》,16开本,31页,第二次出版,价4分。又用罗马字母拼写过,16开本,28页,价4分。《天主教教义提纲课本》:第一册,第3次出版,16开本,129页,价1角2分;第二册,第二次出版,16开本,223页,价3角。

以下是1938年至1939年的著作:

申自天写的《科学方法论》,293页,16开本,价1.2元;《玛竇传的福音》,179页,32开本,价1角5分;《玛尔谷传的福音》,128页,32开本,价1角2分。

鄂恩涛写的《北京法国传教士》(自1688年至1775年),此书由北京天主教法文月刊出版,1938年10月和11月份,共77页。《直隶传教史》(自1743至1749年),由以上月刊出版,1939年3、4、5月份,共26页。

田执中写的(都是中文、法文对照本)有以下两种:(一)《法院民事法解释》,8开本,共340页,

1939年天津印,价7元。此书包括(1929年3月到1935年1月)第二部分民事诉讼、第三部分法律和
各种规定。(二)《法院民事裁判案》(第10年度[1937]),8开本,共153页,天津印,价3.5元。

传教工作(1938至1939年)

本学院:付圣洗64,行坚振49,听告解14328,送圣体56500,讲道理67,讲要理2328。

在法国兵营:听告解1000,送圣体1000。

在三德里:听告解3487,送圣体3400,讲道理36。

在方济各会修女圣堂:听告解100,送圣体100,讲道理30,付圣洗4。

在德国修女圣堂:听告解360,送圣体2600。

自1939至1940年天津本院历史(包括账房、博物院)

本院状况

神甫20,修士6,辅士3。在本校教书神甫18。教书先生:中国人64,外国人7。

学生数目:工科、商科共377,其中奉教的56;高中生共322,其中奉教的37;初中生共373,其中奉教的53。学生总数1072,其中奉教的146。

此外,在大学和中学秘书共7人,助手6人,图书管理员4人。博物院秘书1人,工友4人。在账房秘书1人,工友6人。在本院,为神甫和学生用工友共28人,此外,还有3名警察。

学生领洗、坚振的:领洗的在1月6日有3名,在3月23日有7名,在5月12日有6名,在6月2日有11名。坚振的在5月12日有22名。

所有大事

6月末叫了2人修中学房舍,向西伸展,在下层楼上有训育主任室和副训育主任室,此外还有神甫们的大厅。在第一和第二层楼上临时可以做学生宿舍,将来再改成各科的课堂。为了学生数目增多,将向西敞着的学生散心游廊安上窗户,改做3个课堂,为初中的3班学生之用。

4月20日收到电报说,总会长神甫照准了把博物院搬到北京去,博物院主任罗学宾神甫于6月27日离开了这里,为在北京大使馆附近重建新博物院。该院与德胜院距离(的)[得]相当远。在天津的博物院北面的下层楼和上层楼改为高中生的寝室。关于最上的那层楼原封不动,直到把博物院的各种蒐集物品尽数搬去北京后再做安排。楼房的南面的上层做为更广大的图书室,下层则为学生们阅读书报之处。这样,把先前的图书室与阅报室整个地全归本校学生所用了。此外,把训育主任和秘书们的各种办公室分配妥后,楼房的尽头就成了更宽大的会客室了。

这一切虽在11月中间完成了,但不无困难,因为这工程开始之后,屡屡中断。今年秋季,天津市被大水淹了。从8月20日到9月6日,甚至有的地方到9月20日,在街上行走还用小船。我们也买了两只小船,一只专为本校用,另一只为两位神甫出外给各处受水灾的村庄分配药品。从8月23日起,我们收容了难民,住进中学的有730多名。为操心救助他们,另外是罗学宾和房如晦神甫头开学就又把难民从中学移出,以便在[开]学日能住学生,为难民们,就如去年一样,盖了些小房子叫难民住。为养活823名难民,学生们和恩人们捐了款项。难民们直到次年3月10日才走。

本校法律科学生共17名,为了外在的缘故,在这添设此科的第一年就被取消了。

人位调换

刘酒仁替了邵德基做本院的理家神甫。籍满良替了申自天在本校当学生们的神师神甫。申神甫回本教区做传教工作,管理教友。赵元俊调到本校做第二个学生圣母会指导司铎。杜安德去献县,次年初又从献县回到本校。邵国华神甫离开天津账房而去北京,为在德胜院当理家。戈神甫(Guerra)去芜湖作卒试。狄守仁神甫去北京为不少的中学生讲要理。盖斯杰神甫属于本院,为学习华语。德辅世修士(Tritz)去献县读哲学。为替他在校尽职来了3位奥国读书修士,即:德树爱(Ginthor),高树标(Hochsrrasser),黄树堂(Konig)。又有两位中国读书修士封和高。这几位全是在中学尽职。在大学尽

职的读书修士是明兴礼。以上这几位读书修士的职务是副教育主任。两位辅理修士也召回献县，即马昌武，他是6月末走的，韩修士是次年2月13日走的。牟理藻神甫为养病，二年之久住在崇德堂账房，于3月22日也回到献县。柴古直神甫原是巴黎省耶稣会会士，去年来天津，有时住医院，有时住本院，尚未完全恢复力量。鲍神甫(Borasch)是德国人，从日本耶稣会教区来此，为帮助我们，因为他精通日语，现今他回了本教区。他是1938年3月14日来此，到1939年12月4日走的。他在我们这里对人人都是蔼然可亲的，请他不论到何处去帮忙，常是现成。

读书修士高树标和明兴礼在此待了一年。现今去上海本会神学院开始读神学。

零星小事

7月8日来本院的有凌安澜，他本是徐家汇神学院的院长，现被委任为奥国耶稣会新教区的监牧。他本月11日往献县去了，从那里再往他本教区去上任(景县教区)。12日，申神甫去献县。16日，赵元俊神甫来此。22日，又有狄守仁神甫来此。28日，邓惠达和贝兴仁二位神甫去青岛。8月2日来本院的有封金铎读书修士，他已读了2年神学，现已中断。9日，读书修士德辅世(Tritz)去献县，为在那里读哲学。伴他去的有一学生(即刘定汉——译者注)，这是本院头一名求进耶稣会的。20日夜间10点钟，河水进入楼下神甫室。神甫们全搬到楼上去，在楼上住了两个月。22日，读书修士们都去北京，在那里他们更容易休息和生活，因为这里食粮过于少了。过了几天，在各处临时安置了饭厅、厨房、小圣堂，等待水下去。在这期间，把中学房舍改成收容所了，有许多人很希望住。10月11日，在本校除了原先的大图书室太湿外，一切别处都安置好后，叫本校原有的学生们回校听课，并在出人意外的这个长期暑假后开了学。但是新生们23日才来到本校。10月29日耶稣君王瞻礼，1位神甫、6位读书修士复发圣愿。10月30日正当我们前三天做小避静时，同时学生们也行了周年避静，为初中生是何松月神甫领导，为其他学生们是赵元俊神甫领导。这天晚上来了两位主教，即蚌埠的赵主教(Cassini)和景县的凌安澜主教。前一位第二天就走了，后一位在本校住到11月3日，因为他曾做过本校的教育主任，所以学生们为了环境所迫只向他做了三个简单的祝贺，贺他升了主教。11月2日到5日，工友们做了周年避静，是由何松月神甫领导的。21日，会长神甫来视查会院。12月4日，他去北京视查德胜院会院。12月5日，大名公学的院长聂神甫来津为接从匈牙利来的新传教士。14日，崔守恂主教来此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走了。

1940年1月6日，工科的3名学生领了洗。7日，杜安德神甫来帮助巴志永(Pattyn)神甫工作。11日，在新建的楼房尽东头为神甫设置的大厅已建设妥了。13日，两位辅理修士卫秉仁和林多禄去北京，为在那里更自由、更安闲地做避静神功，本月22日就回到天津。21日，刘迺义读书修士来休养。25日，赵振声主教来此，住到本月28日。2月5日，同去献县的有刘迺义读书修士和冯文昆辅理修士，在那里做完周年避静后于本月18日就回来了。18日，北京德胜院院长毛纶神甫来津行避静。并于29日回到北京。

3月15日，冀子岭神甫来本院行避静。17日，有位老(俗)[熟]人在我们这里住了3天为行避静。23日，正在我们用晚饭时，有从前管过我们小圣堂的工友，因为知道圣爵和圣盒的存放处，偷了两个圣爵和一个小圣盒去。过了4天之后，又还给了我们所偷之物。29日，会长神甫来此住了两天。31日，王兴义神甫去上海，从那里再去印度支那。他于7月30日又回到这里。4月3日，凌安澜主教往北京去路过天津，在此住了两天，并于本月10日由北京回来，11日又回他的本教区去了。18日，罗学宾神甫由印度支那回来了，他是12月2日离开我们的。27日，开学生运动会，如每年一样举行的。5月2日复发圣愿。27日，巴志永神甫去东北(东三省 Moukden)，于6月1日回来了。6月21日，把拘留在租界的学生们释放了，他们是本月20日被拘留的，他们为往火车站上去也没有困难。23日，读书修士黄树堂去日本学日语，为在这战争时期学会他们日本话的要领。今天从北京来的有海门教区的朱主教和他侄子，他们在此过了一宿。24日往献县去的有籍志逊神甫和封金铎读书修士，他们在献县将有新任务。6月27日，罗学宾神甫去北京，在那里新设立了博物馆，以后我们这里就不再写关于博物馆的事了。

著作

田执中写的法文书:Elements de droit civil chinois (Premier fascicule; livre I du code civil, principes generaux), 8开本, 79页, 1939年天津出版, 美金 0.90元。

张正提著:Les titres de location perpetuelle sur les concessions de shanghai, 8开本, 178页, 附3张照片, 1940年上涨出版, 美金 0.90元。

以下是耶稣会神甫们的传教工作(1939至1940年)

- 1、在工商学院:听告解 10384, 送圣体 10100, 讲道理 89, 讲要理 862。
- 2、在三德里:听告解 3427, 送圣体 3500, 讲道理 20。
- 3、在法国兵营:听告解 400, 送圣体 400; 讲道理 40, 讲要理 10。
- 4、在德国修女圣堂:听告解 1300; 讲道理 14。

自 1940 至 1941[年]天津本院历史(包括工商学院和崇德堂账房)

本院状况

神甫 18, 读书修士 5, 辅理修士 4。在本校教书神甫 14, 其中一位是圣言会会士, 他每周从北京来天津为在本校教授哲学。教书先生: 中国人 74, 外国人 7。

开学时学生

在工科、商科共 429, 其中奉教的 62。高中共 319, 其中奉教的 57。初中 420, 其中奉教的 46。以上共计全校学生 1168, 其中奉教的 145。此外, 在大学和中学有秘书共 7 人, 助手 7 人, 图书管理员 4 人。在崇德堂账房秘书 2 人, 工友 5 人。共计为神甫们和学生们的工友 31 人。此外, 还有 3 名武装护院的。

学生领洗的: 12月24日有 9 名, 5月17日有 25 名。坚振的: 6月1日 42 名, 6月8日 3 名。

所有事件

1、今年因战事的缘故, 本校经济很感困难, 往年由本省来的款项, 例如募金、献金和助金, 全都不来了。又加上去年由于水淹所用的花费把建筑金也搭上了。特别是因为物价膨胀, 生活更加困难了。因此, 本校只得向外借钱生活, 担负很重。幸有院长神甫或自己、或使本校教师们和学生们的本市各处劝捐, 同时他也命我们求大圣若瑟不无功效。因为从 3 月底到 6 月底, 本院经济状况好转了, 虽然借的款尚未还清, 我们大大地感谢了大圣若瑟。我们也感谢那些捐助我们的恩人们, 大多数都是不奉教的人。

2、今年初次为毕业生们讲了避静(关于此事见下边 6 月 21 日)。

3、今年(1940)年底, 在圣诞节出了《公教学生》刊物, 是每年出版 4 次的。又在今年 6 月出版了《工商生活》刊物, 这个刊物每年出版 10 次。

人位调换

匈牙利国读书修士翟光朝(Tisgai)8月16日来此, 为在工商学院做教育主任。陶天经(Staudinger)修士在中学做训育主任, 替了高树标修士。刘勤修神甫从前是传教士, 今来此担任给学生讲要理, 替了籍志逊。2月初, 刘洒仁本是本校的教育主任, 同时还是理家, 事情太多, 忙不过来, 所以把理家的职务让给狄守仁神甫了。6月末, 柯成林神甫来替卫如多神甫, 因为这一位病重不能尽职。

零星小事

8月16日, 不少的读书修士们, 尤其是加拿大国的, 在此度过暑假后, 回到北京去。同日有两个本校的学生去献县进耶稣会初学院。19日晚, 奥国修士们做周年避静, 由柏世贞神甫领导, 他是用德语讲默想题。9月7、8、9日, 学生们照旧例行避静神功, 大学生们有 80 名, 中学生有 70 名。谈神甫给大学生讲, 赵神甫给中学生讲。10日, 开学亦如往年。9月28日, 梅守忠(Gmeimer)在德国医院逝世。给他助临终的有卫如多和冀子岭 2 位神甫。卫神甫本是 9 月 4 日来天津治病的。又 9 月 28 日, 辅理修

士林多禄得了同样的病,入了法国医院,住了1个月。10月内有许多本会会士来行避静。本月7日,有大名公学院院长聂孚远神甫开始行避静。17日和18日,有从北京耶稣君王院来的罗学宾和王兴义神甫开始避静。13日晚,院长神甫去上海,14日就回来了。24、25、26这3天行小避静,为在耶稣君王瞻礼复发圣愿。11月8日,狄守仁去上海休养,他在本会的震旦大学住了两个多月。本月10日,工友们避完了静,是刘勤修神甫讲的道理。12月24日,9名学生领了圣洗,其中2名是工科生,1名是商科生。

1941年1月7日,我国辅理修士们行避静,是杜安德神甫讲的道理。本月19日,凌安澜主教去北京,途中在此住了2天。本月23日,中国辅理修士们去献县行避静。这是已往的旧例。他们是跟院长神甫去的。同时,这里的学生们就放寒假。2月3日,北京德胜院神师神甫虞来宾(Muller)来给6位读书修士讲避静。6位中的2位是从景县来的。还有2位神甫也一齐行避静。2月19日,新传教士卜相贤来津。他一路来之不易,因为战争的缘故路途不通,但在此住了2天,就去北京德胜院学中国话。3月14日,毛纶神甫来此行周年避静,24日就回到北京。从今天开始到3月底,加念《向圣若瑟祝文》,求他帮助我们,因为为了中日的战争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了。本月18日,顾怀仁神甫在此住了5天,他来此给30名班国教友领避静。本月21日,查宗夏主教伴同李法尼神甫、赵振声主教和凌安澜主教在此住了几天。他们是一同去北京见宗座代表蔡宁主教去。本月29日,崔守恂主教和赵振声主教由北京回来,在此住了一天。4月1日柴古直神甫在法国医院试用了许多药法无效。今去北京请一位他很信任的中医治疗。本月11日,卫如多神甫患脑膜炎入(医)[意]国医院,13日领了终傅圣事。但通过大夫和护士修女们的照管,病势好转了,仅仅住院一个月就好,于5月10日回到本校,真是出人意料之外。本月26日,照旧例开学生运动会,因午后下了雨才结束了。本月29日,柯成林神甫来此,为在中学替卫神甫做训育主任。5月2日,北京会院院长毛纶神甫受卧病的会长神甫饶满恒委托,来视查会院。中断了两次之后,终于本月10日结束了视查。本月4日,弥书堂辅理修士发大愿,是尚建勋神甫收的愿。本月5日来参观本校的有比国圣母圣心会的4位主教,伴同他们本会的4位省长神甫。本月16日下午5点钟,在神甫大厅中欢迎宗座代表蔡宁大主教(Mgr. Zanin)伴同他来的是他的秘书陆主教(A. Bruniera)。蔡宁大主教同我们蔼然可亲地谈了一个钟头的话。本月17日,蔡宁大主教给25名学生付了圣洗。第二天弥撒时又给他们送了圣体。这一天上午10点钟,学生们组织了各种音乐和演讲,为庆贺耶稣会成立四百周年,这个庆祝会是在本校大厅中举行的,用了两个钟头的工夫。午餐时,请了文贵宾主教和本市各修会的会士,有神甫的,也有修士们。这天整日明供圣体。傍晚,蔡宁大主教做了圣体降福。18日下午5点,宗座代表同他的秘书辞别了我们而去。他在此住了三天,真会就合一总的人,他的和蔼大得人心。他还在经济上帮助了我们不少,这事值得记述一笔。本月22日,尚建勋神甫替会长神甫去北京视查会院,完毕后30日回津。本月27日,虞来宾神甫从北京来给将在圣神降临瞻礼复发圣愿的讲默然题。6月6日,法国驻华大使德·高思末(D. cosme)由天津的法国领事陪伴着来参观本校。大家欢迎他到大门上,然后引他人本校大厅内,在那里有教师们等候着,院长神甫先向大使致欢迎词和感谢词;然后大使向院长神甫和悦地致了答词。以后就开始参观本校直参观到正午,对于一切甚是满意。本月7日,有些日本人来参观了本校。本月20日,考完了书,就使学生们回家去了。大学和中学的各20名学生为了特殊的缘故不能回家,就住在本校了。本月21日,赵振声主教给考试毕业的学生们讲避静,这是初次试办的。但是如圣经所载的,也有未被请过的学生也来加入其内行了避静,共计有24人。在第四日,赵主教在公开圣堂内给避静的人在弥撒中送了圣体。这样,就把避静神功结束了。

著作

田执中神甫写的 *Elements de droit civil Chinois; Livre I. du code chinois, Obligation*, 8开本, 1751页, 1941年在天津印, 价值美金2.80元。

关于狄守仁神甫领导所翻译的中国书籍, 先记他于1939年和1940年印的, 然后再把那书的第二次出版, 又第三次出版的书。

1、1939年第一次出版的有《自尊》, 原著人 Glorieux, 16开本, 252页, 0.60元; 《我们的领袖》, 原

著人 Glorieux, 16 开本, 306 页, 0.50 元。1940 年出版的有:《路加传的福音》, 32 开本, 206 页, 0.25 元;《若望传的福音》, 32 开本, 184 页, 0.25 元,《师主篇》, 原著人 Lubech, 32 开本, 386 页, 1 元;《耶稣的言行》, 原著人 Chabat, 16 开本, 142 页, 0.60 元;《宗徒大事录》, 12 开本, 193 页, 0.30 元。

2、第二次和第三次出版的有:1940 年出版的《九十三题》, 第 3 次出版, 32 开本, 0.20 元;1941 年出版的《耶稣真徒的生活》, 原著人 Sullerot, 第二次出版, 16 开本, 124 页, 0.50 元;《天主教教义提纲》, 原著人 Glorienx, 第二次出版, 16 开本, 224 页, 0.55 元。

以下是 1940 至 1941 年神甫们的传教成绩:

1. 在工商学院内:听告解 13572, 送圣体 43500, 讲道理 65, 讲要理 1194。
2. 在三德里:听告解 3176, 送圣体 3000, 讲道理 29。
3. 在法国修女圣堂:听告解 120, 送圣体 1200, 讲道理 35, 讲要理 20。
4. 在法国兵营:听告解 500, 送圣体 500, 讲道理 40, 讲要理 40。

1941 年到 1942 年天津本院简史(包括崇德堂和账房)

院内状况

今年的人数:神甫 8, 读书修士 4, 辅理修士 4。在本校教书的神甫 12, 另有王通儒神甫每周由北京来讲哲学课。从外边请的教师先生:大学有 33 位, 中学有 42 位, 以上都是中国人。此外请的外国教师先生:大学有 3 位, 中学有 1 位。

今年开学时学生的数目如下:工科和商科共有 485 名, 其中奉教的 61 名;高中生 354 名, 其中奉教的 54 名;初中生 524 名, 其中奉教的 40 名。学生总数 1363, 其中奉教的总数是 155 名。

本校大学和中学秘书共 7 人, 助手 10 人, 图书管理员 4 人, 工友 32 人, 还有 3 名护院的警察。在崇德堂账房有秘书 2 人, 工友 3 人。

今年领洗的学生共 11 名, 其中 7 名是在圣诞节前夕, 1 名是在圣瞻礼七, 3 名是在耶稣升天瞻礼。领坚振的学生, 在圣神降临瞻礼日有 13 名, 在圣三瞻礼日有 2 名。

考得毕业文凭的学生:工科 62 名, 商科 37 名。初中毕业生 96 名, 高[中]毕业生 125 名。

人位的调换

11 月 17 日, 尚建勋被任为教区的代理会长神甫。叶慕华被任为本院代理院长神甫。杭建德神甫(Hanion)任管账职务, 到来年 1 月 27 日, 以后由梅怀义神甫代替了。鄂恩涛神甫调往北京, 替虞来宾神甫当神职, 每月两次来津讲神功问题, 并讲院训道理。世界大战开始后, 为讲院训道理, 神甫们轮班担任。刘迺仁神甫辞去训育主任职务, 在本校当神师, 替刘勤修神甫, 他回了献县。本校训育主任之职由纪书年(Jacgy)和廖迺迺(Real)二位神甫担任。7 月 30 日, 梅志洁神甫来此, 他老当益壮地在圣堂讲道理、听神功。齐振国神甫帮助柯成林神甫(E. Bruknerau)在中学当训育主任。田执中神甫去献县教哲学。黄树堂修士去上海读神学。

寒假期间, 李芳荣辅理修士替弥书堂辅理修士, 因为这一段被调回献县去。

零星小事

9 月 5 日学生们开始行避静。大学的 40 名, 由梅志洁神甫领导; 中学生的 50 名由叶慕华神甫领导。11 月 17 日, 叶慕华神甫被任为本院代理院长, 他是本月 25 日才来到本院的, 本月 27 日学生们在大厅内庆祝了他。12 月 6 日庆祝中学成立 10 周年。12 月 8 日, 因日本向英、美宣战, 路皆不通。

2 月 4 日, 读书修士们和辅理修士们一齐开始行避静神功。2 月 21 日, 有多明我会的一位神甫 Domingues 来此研究建筑工程。5 月 24 日, 因本市有时疫, 本校放 4 天假。6 月 1 日, 牧树和(Muth)由日本来此为帮助教区。

所有大事

- 1、在暑假期间, 不少的神甫修士到山海关去了, 在那里住一处赁的房, 可以住开 8 个人。

2、在暑假期间,本院把厨房移到饭厅附近处以防水患。

3、从9月8日在献县总堂我们的人3月之久遭受了大危险和委曲,我们同他们一齐忧苦。

4、今年经济困难比去年更严重了。为了同去年一样的缘故募款越来越少了。

5、今年来往的宾客特别多,兹记其梗概如下:有献县赵振声主教、永年崔守恂主教、蚌埠赵(Cassini)主教、景县凌安澜主教,又有教区视查使毛纶神甫、献县代理院长甘墨林神甫(Kammerer)、景县代理院长蔡同仁神甫(Lehetner)、辅仁大学的院长雷神甫(Rahmann)、辅仁大学教育主任伏神甫。有威海卫的Lucci神甫来此行避静。

6、传教区会长神甫照例视查了本院,从1月2日到19日结束。

7、在法国医院逝世了2位神甫:梅志洁和廉道真(Burietz)。梅神甫是2月21日入的医院,24日动了手术,病情严重,3月9日领了终傅圣事,当天下午3点很平安地逝世了。给他助临终的有狄守仁和柴古直二位神甫。3月12日行殡葬礼时,文贵宾主教和法国领事与军官的代表也在场。廉神甫是1月20日入的医院,一连给他做了3回手术。4月29日由会长神甫的手领了终傅圣事,6月6日逝世,守他死的有我们中几位神甫。6月9日在本校圣堂中行了殡葬前的宗教仪式。

8、住在医院的有我们中的好几位,即:杭建德神甫、房如晦神甫、齐振国神甫、杜安德神甫、狄守仁神甫、辅理修士林多禄和献县的读书修士贾书元。

9、学生们多次举办了音乐会,受了公共赞赏。

以下是耶稣会神甫们的传教工作:

1、在本校圣堂内:听告解13339,送圣体44100,讲道理78,讲要理1457。

2、在法国兵营:听告解600,送圣体600,讲道理40,讲要理40。

3、在三德里:听告解4285,送圣体4300,讲道理36。

1942至1943[年]天津本院历史

本院状况:

今年本院神甫19人,读书修士2人,辅理修士4人,在本院教书的神甫13人。在大学教书的中国先生27人,外国先生4人。在中学教书的中国先生45人,外国先生1人。

开学日学生的分配如下:大学493名,其中奉教的37名;初中405名,其中奉教的49名,高中528名,其中奉教的36名。学生总数1426名,其中奉教的122名。住宿生:大学190名,中学150名左右。

此外在大学和中学当秘书的共7人,助手5人,管图书室的4人。在崇德堂账房,秘书2人,工友5人。共计神甫们和学生们用的工友共31人。还有3名护院的警察。

学生领洗的共16名:在圣诞节前夕有10名,在2月22日有1名,在圣瞻礼七有2名,在5月23日有3名,以上16名在圣神降临瞻礼都领了坚振。

学生终考得毕业文凭的,工科54名,商科32名,初中104名,高中180名。

人位调换

刘迺仁神甫又替廖雅尔神甫当大学的训育主任。廖神甫于7月8日回献县。4月1日,刘迺仁神甫被宣布为本校院长,卜相贤神甫(Bonningke)为训育主任,并私下仍学习中国话。徐保和与朱光二位神甫为第一和第二圣母会指导司铎。赵元俊神甫回了献县。王峻德和德辅世(Tritz)修士都在中学帮助训育主任。大名的读书修士拉达尼(Ladaniy)则在大学帮助训育主任。去神学院的3位读书修士有Tiszai、Ginthor、Staudinger。

10月13日,饶满恒神甫来此担任神师、管账及解答良心问题之职。

9月1日,巴志永神甫去北京,为更方便完成他多年开始的编《华语理论字典》的工作。杜安德往河间去传教,冀子岭神甫于3月28日被日本人拘了去,同许多别的传教士囚禁在山东省潍县。柯神甫虽然是荷兰人,因为崇德堂账房很需要他,例外未被拘禁。4月份,辅理修士杨金科来帮助管账神甫和

训育主任神甫。

所有大事

1、暑假休息所仍如去年是在山海关。

2、为了经济状况日益困难,为花费问题上司们认为应限制如下:①暂把土木工程建筑科一年班和二年班停办,并缩减助手教师。②在饮食上取消咖啡和酒,只用两样菜,唯在很少的机会上才例外。③关于为本校募捐问题,大家都要努力去做,神甫们、教师们、学生们一齐下手,有著名的恩人们请求我们在校添设新科目,并增加班次,他们许下要尽力帮助我们。

3、今年学生们仍多次组织了音乐会,一次是为感谢恩人们,三次是为感谢本市的官长们。

4、我们中间有两位患了重病,其中一位是暴安良,他住医院一月之久,患的病症是伤寒。他出院后又去北京住了些日子,为扶养身体,于10月11日回本校授课。另一位是林多禄助理修士,他病弱已极,在医院长期休息,由5月3日到15日,由5月21日到29日,又由6月25日到7月底。

5、在本院的许多客人中,只记其主要的如下:有献县赵主教、永年崔主教、保定周主教、山东阳谷牛主教(他在献县小修院读过拉丁文),又有景县凌主教、耶稣会代理视查柴神甫(Drexel)、大名代理会长吉凤祥神甫(J. Takacs)、景县会长蒲敏道神甫(Burkharit)、上海会长姚神甫(Henry)。

6、会长神甫照例视查本院,由2月27日至3月15日

零星小事

7月8日,廖迓迓神甫去献县。7月23日,刀敏乖斯神甫由北京回到这里。7月31日,徐保和神甫来此。

9月4日,学生们开始避静,狄守仁神甫领导大学生,朱光神甫领导中学生。

9月29日,上海无线电台台长哥洛德利韦耶尔夫人来参观本校,以后她在电台上广播时称赞了本校。法国大使哎·呆高斯末由天津领事高兰陪伴着来访问我们。

11月13日,复发圣愿,3日小避静是由谈天道神甫讲的。

4月1日,刘迺仁神甫被宣布为本院院长,是在午饭时宣布的,叶慕华神甫已于今天早晨起程去徐州,为在那里担任副主教之职。

5月14日,为近亡于献县的雍居敬神甫做亡者大弥撒,因为他是中学的创立人。

以下是本会神甫们的传教工作:

在本校:听告解 10214,送圣体 51700,讲道理 88,讲要理 755。

在法国兵营:听告解 500,送圣体 500,讲道理 40,讲要理 10。

在三德里:听告解 3087,送圣体 3300,讲道理 25。

1943 至 1944 年天津本院历史

本院状况

有神甫 20 位,读书修士 1 位,辅理修士 6 位。教书和管事的神甫:在大学有 12 位,在中学有 4 位,教书的先生;在大学有 63 位(日本人 3,其他外国人 2);在中学有 42 位(日本人 1)。

本校学生:在工商科有 493 名,文科 85 名,初中 404 名,高中 770 名。奉教的学生:大学 44 名,中学 78 名。以上学生共 1667 名,其中奉教的共 122 名。

住宿生:大学 200 名,中学 160 名。

崇德堂账房:秘书 1 人,助手和工友共 4 人。本院工友 33 人,警察 3 人。

得毕业文凭的:工科 76 名,商科 30 名,初中 91 名,高中 181 名。

人位调换

7 月间,饶满恒神甫回献县,在那里当读书修士们的神师。

8 月 21 日从上海来了邱多廉神甫,为在本院当神师并管账。从安庆教区让给我们 1 位王通儒神

甫(F. Jaureguizar)在大学给学生们当神师。徐、齐二位神甫去芜湖做卒试。房如晦神甫当理家,狄守仁神甫当副理家。卜相贤仍在大学做教育主任。申自天回天津教授哲学。由大名教区来了张裕如辅理修士,为代替有病的林多禄辅理修士。林修士后只管厨房和圣堂。

所有大事

董事会改组:在这经济和政治日益困难之际,为更便易妥善前进,上司们都以为请本市的著名人物加入本校董事会为最适宜,于是做了长期的准备之后,终于7月10日除主教们外还邀请了本市的几位名人,如龚仙洲、曹汝(林)[霖]、张建伯、徐世章、王湘书等,宣读了董事会的决议,推龚仙洲为董事长,文贵宾为副董事长。以后董事会正式选了刘迺仁神甫为本校校长。

添设文学科

为在工商学院添设文学科,前已酝酿了数月。只是因为房舍困难,不便一齐招收男女文学生。终于由董事会决定,只招收文学科女生,又经过长久的讨论后,并取得耶稣会和教会上司们的同意,决定先试办添设女生文学科。圣功女子学校让给我们一处房舍,租价每月1500元,遂于9月8日开始招收文学科女生90名。经过一年的试办,全部满意,请了孙家玉为一科的主任,她在美国留学毕业。

零星小事

9月30日,由董事会决定,邀请了20位本市名人来参观本校,其中有很著名的王揖唐。天津市警察局局长闫家琪来本校作旁听。他这一来,有许多困难解决了。

今年本校大学生亡去两名,即冀希勤,他是奉教人家的唯一子;和齐福,他在临死时由王通儒神甫手受了洗。王通儒神甫两三次把自己的血输给给学生董裕德,这学生现在很健康。今年为贫苦学生们收了不少的捐助,这款是由徐树强、闫家琪和黄树培诸位来的。

10月13日,我们的董事长龚仙洲逝世。29日,在本校大厅开了悼念他的大会,来与会的人有亡者的友人很多,又把本校图书室命名仙洲,以志不忘。

龚董事长逝世后,徐世章被推为董事长。他是前民国总统徐世昌的胞弟,他赋性仁善,于2月24日应邀来与我们同餐。

8月15日高神甫(Colbach)、2月2日卜相贤神甫发大愿。

寒假期间,王通儒神甫率领不少的学生去北京给他们讲了三天的避静。

3月20日,有不少的教师和学生被日本人逮去,并有两位教师和7名学生被日本军队判了多年徒刑。

6月26日有令,使本校学生都受军事训练。后来通过友谊的商讨,只使住天津市的学生受军事训练,闫家琪局长给我们派来了了4位军官为训练学生。

传教工作

在本校:听告解12317,送圣体18000,讲道理120,讲要道1219,付圣洗32,坚振19,婚配4,终傅8。

在法国兵营:听告解450,送圣体500,讲道理40,付圣洗3,临终付洗1,终傅2。

1944年至1945年天津本院史

本院状况

神甫20,读书修士2,辅理修士6。还应添上牧树和(Muth),因为他整年常同我们住在这里。在本校教书、管事的神甫和修士:在大学的12位,在中学的7位,还应添上两位耶稣孝女会的修女。教书先生:大学43位,还有助教20位,中学130位,4位助教。

今年学生:大学486名,文学科女生140名,高中465名,初中775名,共计1866名。

工友共32名,还有3名武装护院警察。

崇德堂账房有1名秘书,4名工友。

今年领洗的学生共 42 名,其中大学生 9 名,中学生 26 名,专读生 7 名。

今年得毕业文凭的:工科生 48 名,商科生 30 名。

人位调换

王峻德神甫去芜湖作卒试。朱光神甫去安平县帮助余裕仁神甫。8 月 11 日,刘照民神甫来此,第二天赵俊彦神甫也来此。赵神甫为给学生们当神师,刘神甫为管规矩。德辅世修士去上海读哲学,替他当训育主任的是景县教区的于善训修士。卜相贤神甫被调往献县教授哲学。齐振国和徐保和二位神甫作完卒试回来:徐神甫在大学当训育主任,齐神甫在中学亦如以前一样尽职,并管本院的账目。辅理修士林多禄从本校开始就在此尽职,为天主愈大光荣做事很多,今被召回献县,为更便易养病。他本来病弱,又怕路上困难,于 11 月 15 日离天津。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安逝于主。

贾书元修士曾去徐家汇完成他读的书,近又由那里依纳爵公学回来了。当他不在本校时,是由于士铮修士替他尽职。

工商学院的新帮手

今为成立女子文学科需要修女们来帮忙。首先同上海的耶稣圣心会修女们商议了,因她们目下不能立即前来,就请了班国的耶稣孝女会修女。她们于 8 月 16 日先来本校看了一番,于 9 月 9 日两位修女就自愿地来尽职务了。并于当年冬季又回到北京。本校这些女生都是天津市好家庭出身,她们中有不多的几个人稍知些基督教教义。

本校大事

徐世章先生仍为本校董事长。3 月份又请了两位教师为本校教务长,即高敬英先生和张学兰先生。这是因为在印度支那出了政治问题(怕日本人以法国神甫们为敌人而禁止他们在本校教书)。孙家玉仍为女子文学科主任。

几件小事

院长神甫的主保庆辰不过了,因为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死了。

3 月 7 日,穆·德·马尔折利先生和他的夫人来参观了本校和图书室。

出版了两种刊物,即狄守仁神甫的《灵修法》(圣依纳爵的《神操书》)和贝兴仁神甫的《科学与宗教》。

辅理修士卫秉仁似乎患了胃病,他在北京某医院住了几时,今回到天津为动一小手术,为此先给他输了血,是王通儒神甫慷慨献了自己的血。他的病势加重后,6 月 13 日入了西开医院,9 月 30 日领了终傅圣事,后于 12 月 17 日安逝于主。

在本校圣堂,2 月 2 日柯守义和齐振国二位神甫发了大愿。

传教工作

年假时,赵振声主教不能来给教师们讲避静,由院长神甫刘迺仁代劳了。圣主日内,申自天神甫给大学生、谈天道给中学生讲了避静。由法国驻日大使的寡妇夫人倡议,并由文贵宾主教准许,狄守仁神甫给一些上等社会的妇女们讲了避静。她们在仁爱修女会圣堂差不多全都领了四规圣体。以后狄神甫又给她们讲了几次道理。

徐保和、贝兴仁两位神甫——宗教辩护会的指导,前后十几次和男女教师们开研究会讨论宗教问题。

传教成绩表

在工商学院:听告解 10307,送圣体 48563,讲道理 143,讲要理 1469,付洗 42,坚振 31,婚配 4,终傅 2。

在法国兵营:听告解 400,送圣体 400,讲道理 30,付洗 2,终傅 1。

利用花园

因物价日益高涨,管花园的除了种菜外,又在园的一角养了些家畜,这样按时在饭厅内可以吃肉、喝奶了。

此外,暴安良神甫在他的试验室内用花瓶孵了小鸡小鸭,这样在我们的花园内也养了些家禽。

1945年至1946年天津本院历史

本院状况

学年开始时,本院有神甫23位,辅理修士6位,在大学教书或管事的共12位,在中学共6位,有2位耶稣孝女会修女管女子文学科。

教师先生:大学5位,还有14位助教;中学30位,有6位助教。大学学生518名,文学科132名。中学共1331名。奉教学生:大学17名,文学科3名,修女2名,中学133名,共155名。

工友共33名,还有3名武装警察,这3名向来服务不要钱;因以后需要大量薪金,于是同公安部门商量把他们撤退了。这是5月5日的事。

崇德堂账房有1位秘书,8位工友。

本年领洗的学生:中学10名,走读生13名。

人位调换

7月11日,卫如多神甫景县本教区,被任为南宫的院长。

7月6日,于善训修士被召回景县,为在来年去读神学。王峻德神甫作完卒试之后回津,在中学担任教学和训育主任。黄树堂神甫在徐家汇读完神学回津,在中学教书,并在大学担任指导运动。

9月5日初学神甫周若愚来本校管账。

在本学年期间离开本校的有申白天神甫,被委任在传教区做传教工作。杜安德神甫在11月7日登小船离开了他传教之处,因在该处传教日益困难了。

11月20日,裴化行神甫坐不要钱的飞机去上海。徐保和神甫为休养早在北京居住了些时,于12月底辞别了我们。

牧树和神甫在中日战争期间,为传教士们如工商学院,并为献县教区的利益做了许多事情。他计划由津(蒲)[浦]路去上海。10月15日走到山东,宿在法国传教士处,于11月5日又回来。他终于1946年3月3日辞别了我们,乘船往上海去了。

明兴礼神甫先于11月由献县来此,于今年4月7日乘船往上海去了,他预备到法国巴黎大学骚尔包内(Sorbone)考得博士学位。

高尔拔神甫从去年12月就在天津崇德堂账房,于今年6月9日回法国,他是同住在天津的法国兵们乘军舰一齐走的。法国兵们同中国政府立了新协定,以后再无留华的理由,也不许再回中国,他们乘的军舰,一名Le Suffran“勒徐夫兰”,一名Le Emile Bertin“勒米尔伯尔坦”。

今年来津的人员:景县教区的王怀恩神甫来养肺病,住在仁爱会修女的医院中。潘寿山修士来本校读书,因为也有肺病住了医院,以后又去北京养病。2月8日上海教区的朱者赤神甫来此做大学的教育主任。辅理修士张富有在2月底替了李芳荣。这位辅理修士被遣往献县。甘墨林神甫在崇德堂为管教区的账。3月14日,田如峰神甫来此。19日被宣布为本院理家。不幸不多几日后中伤寒症,在西开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冀子岭神甫经过天津,在本院住了几天,他是从山东潍县被长期囚禁后出来的,大家很欢迎他。他在避完静于10月16日到北京去担任理家之职。穆启华神甫去献县路过沧州,正遇战争,被军队打伤腿部,5月13日回津住医院工夫不小,腿上的子弹也未能全起出来。5月14日,鄂恩涛神甫来津住了两个月,为整理本院的账目,使周若愚神甫去北京休养。

今年的几件事简录

圣功女子学校在二年前赁给本校的房舍为成立女子文学科的,现今该校又愿收回那房舍为在1945年7月内开设医院。我们必须把本校东南角的房舍暂且让与女子文学科使用,本校的保护人主教们同意了这个办法。

9月17日,刘迺仁神甫坐飞机去看望民国的委员长,但因路途上的困难,于10月21日以前未能

回到本校。毛纶神甫已坐飞机回来，在此住了一个星期。12月17至18日夜间的半夜前，卫秉仁辅理修士安逝于仁爱修女会的医院里。在本校圣堂内为他做了亡者弥撒，崇德堂账房的神甫全来参加了礼节。12月21日，赵振声主教因为在本教区外传了教，身觉乏倦，来此休息，也是因为本教区甚是扰乱，因此他在这里逗留很久，直到来年9月。他在圣母献耶稣于主堂瞻礼前给辅理修士们讲了避静。2月2日，王峻德神甫——中学的教育主任发了终身大愿。从12月后，献县总堂就被驰名而众多的八路军围困，这为我们的青年修士们怕有被捉拿的危险。于是会长神甫尚建勋就决定使哲学院和初学院的修士们都暂且逃到北京石虎胡同去。他们逃走的时候，哲学修士们先于12月25日晚上来到本校，28日初学修士们也来到了。不久以后他们都往北京去了。在这个期间来的过客如是多，有本教区的不在会神甫们或住在西开主教府，或公共住在中学学生宿舍内，这是1月份的事。

1月30日，于斌主教来此，他接受了作我们工商学院的董事长，并同我们用了午餐。饭后在散心厅内向我们谈了许多话，说他将来的计划，并说了圣教会在中国的前途。2月6日，中央农业局副局长刘××先生来参观本校，他是四川省的天主教人，他在散心厅中用了晚饭；数日后赠给本校600万元。在不同的时日有些法国朋友们在至少暂时离华回国前来辞别了我们，并在我们这里用了午饭或晚饭。同样也带了美国兵营里的随营神甫们到我们这里吃饭。又请过法国军官韦迈尔(Weimel)上校，他最近由法国来华，他给我们述说了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情况。这是3月7日的事。

各种讲避静的经过

如上所说，赵主教给辅理修士们讲了8天避静。赵俊彦神甫给在这里中学上学的拉丁班修生讲了避静，这是在寒假期间做的。在复活节后不久，周若愚神甫给本院奉教学生和中学的望教生们讲了两天道理。10月3日，邓惠达神甫和赖仁安神甫在来津的两只兵船分别做了弥撒。又为美国兵的方便，每主日和瞻礼日在本院圣堂，上午10点半有美国神甫给美国兵做弥撒。他们从10月7日到第二年耶稣升天瞻礼常是这样。每主日弥撒时，美国兵们为天主教传教事业给钱不少，也屡次帮助了本校钱。在圣枝主日前，高尔拔神甫在西开仁爱修女会圣堂里给住天津的法国妇女们讲了避静。从今年春天，法国兵就准备回国，已不在天津住了，而移到山海关去。所以每年去法国兵营每主日做弥撒的房如晦神甫，此后不再去做弥撒了。

本年一年内的传教成绩

听告解 12591，送圣体 65000，讲道理 124，讲要理 1405，付洗 23，终傅 3，婚配 3，坚振 29。

1946至1947年天津本院历史(包括本院和账房)

本院状况

7月初，本院有神甫20位，读书修士2位，辅理修士4位。在本院教书的神甫9位。教师先生：104位中国人，4位外国人，在教师先生中19位是奉教的。在女子文学科管事的有两位耶稣孝女会修女。

学生数目：工科260名，商科281名，文学科180名；以上大学生中奉教的41名。高中生439名，初中生701名；以上中学生奉教的，高中生8名，初中生90名。大学生总数721名，中学生总数1160名，奉教的178名。

助手们：大学和中学共有助教7位，秘书12位，图书室员4位，杂差3人，为神甫们和学生们的工友37人。崇德堂账房助手2人，工友4人。

领洗的学生：8月13日有9名，又有2名走读生。4月5日有15名，又有走读生1名。

坚振的学生：5月25日有14名，又有走读生17名。入耶稣会的学生2名。

人位调换

赵俊彦神甫被遣往北京当初学的副神师，不久又回到天津养病。邱多廉神甫(Couturier)回上海，鄂恩涛神甫替了他。刘景福和刘乃义二位神甫做完卒试，于7月6日回到这里。辅理修士张富有回到献县。王通儒神甫回安庆本教区。邹国华神甫去北京，替他管账的是甘墨林神甫。田如斌神甫卸了初

学副神师的位,来天津初中当神师。来天津的还有工商学院前任院长神甫斐百纳,他是1947年2月20日来的。有加拿大国南省的黎神甫(Lavariet)于3月23日来此。5月17日,辅理修士孙诚意来津替近亡的冯文昆修士。往欧洲去的两位神甫,邓惠达在8月6日经过美国回到天津,他在外待了1年;裴化行神甫9月9日起程经过上海。

本院大事

因为住在献县总堂不妥当,赵振声主教有时住在我们这里,有时住在北京德胜院。他的不在会神甫们,有的住在本校,有的住在崇德堂账房。世界大战停止了,本市的一些学校又开办起来,那些学校的学生以前曾来本校为续读功课的,如今又召回去了,为此,本校学生数目减少了。为了不使学生减少过多,又作了招生考试,在10月间招了新生,以补充离开本校学生的空位。为帮助本院缺人缺钱的困难,决定派人去欧洲劝捐,把这个任务托给了邓惠达神甫办理。2月11日,法国耶稣会北省的尚巴尼省会长神甫,由教区会长神甫尚建勋陪伴来到中国。他在上海待了几天,坐飞机来到北京,又由北京坐火车来到天津我们这里。4月28日祝贺尚建勋神甫来华25年。来参与庆祝的有才被祝圣的景县教区主教凌安澜,有省长神甫Jannet,有景县教区会长蒲敏道神甫,有哲学院院长廖迺迹神甫,有献县总堂代理院长崔步云神甫,有初学神师张思谦神甫,赵振声主教和毛纶神甫都被阻未能前来。席间向他举杯致贺的或各种唱歌的,全都尽力表示谢忱或孺慕之情。5月9日尚建勋神甫由北京来。10日,他同我们大家欢迎了枢机主教田耕莘,他是初次来天津参观。天津市全体神职人员同许多本校学生迎接他先到西开主教座堂住下。13日,田枢机在本校圣堂做了弥撒,是上午7点钟。正午,伴同他的两位秘书同我们一起用了午饭。13日下午两点半,中学生组织了音乐,为欢迎枢机主教。6点20分,在本校圣堂田枢机做了圣体降福,堂中教友满的几乎容不开了。

为加强团结,照例每年两次邀请各大学教师来本校聚餐。我们的教师们,有在大学讲课的,也同样被他们邀请。

关于建筑,这里只记此事,即靠近厨房东面的屋子本是个淋浴室,今让给厨房和管饭厅的工友们住用。在神甫们的楼房东面尽头处掘了个地窖,在内不难安上热水管,通到上层屋内,做神甫们的喷水淋浴,这工程是4月中旬开始的,到四月末旬就完成了。

本校小事(1946年)

7月1日,暴安良神甫率领20名大学生去西山,为教他们学习测量,至14日回了本校。

7月3日,天主教徒刘副部长是农业部的,来参观了本校,并赠给本校一大笔款——500万通行币。

7月11日招生考试,在本校420名,在辅仁230名,在青岛47名,共计697名,其中113名女生。

7月14日,穆启华神甫(即去年5月13日所说的那位)在医院住着的,开始做弥撒了。

7月15日中学招生,考试生共985名。

7月18日做完避静,崔步云神甫先是初学神师,今回献县总堂做代理院长。他是本月3日由北京来到本院的。上边(本月3日)说的那位刘先生在我们这里用了午饭,陪他的有文贵宾主教,还有各教区账房负责的神甫。

7月31日,在圣祖依纳爵瞻礼日请到我们这里用饭的有:遣使会的视查神甫,有3位是他账房负责神甫,有两位圣母会修士。晚饭时又请了两位美国兵营的随营司铎。

8月6日,邓惠达神甫坐飞机去上海,从上海去欧洲。

8月15日弥撒前,付洗了7名学生、两名走读生和两名妇女。

8月23日,于斌主教由北京来此,为主持开本校董事会。

8月27日,马光普修士哲学毕业后,由北京来此做中学教育主任。

9月7日,中学生60多名开始行避静。

9月9日开学,院长神甫做了弥撒,很多学生望了弥撒,连不奉教的学生也有来望弥撒的。

9月10日,杜安德神甫从8月26日就来到本院,今避静终了回到北京。

9月16日,大名教区的会长神甫吉凤祥在本院住了3天,今天由此去北京,转回大名。

9月21日,宣布了耶稣会新总会长神甫是J. B. Ransens 让三思。

9月29日,斐化行神甫上船去上海。

10月4日,由文主教准许,初次在修女院圣堂由院长神甫做了弥撒,并供上圣体。以后要天天有弥撒了。

10月13日,刘斌神甫由献县来为照管给本教区印瞻礼单,在本院住到12月2日。

10月15日,请了本市各大学校长来赴宴。

10月17日,周若愚神甫在本院神甫圣堂发了初愿。10月21日,甘墨林神甫从12日来此行周年避静。今日返回崇德堂账房。

10月24日,法国大使迈利埃(Meyrier)来参观本校。今天开始复发圣愿前的3天避静。

10月26日,代理会长廖迺迹由北京来此主持教区会议,因为会长神甫尚建勋代表我们去罗马开会去了。

10月28日耶稣君王瞻礼复发圣愿。

11月6日,有从法国来的两位新传教神甫柏若望(P. Petit Heyden)和郎若石(P. Theodorus Pilat)已到塘沽,打发杨金科辅理修士去接他们。他们在此待了2天,就去北京学中国话。

11月12日,有中学生和13名大学生庆祝了院长神甫的主保庆辰。当天晚上,院长神甫请了60位教师赴宴。

12月6、7、8这三天,中学庆祝成立15周年。

12月25日,为庆祝圣诞节,来望弥撒的教友很多,赵振声主教讲了道理。

12月27日,毛纶神甫从北京来此做避静。

12月30日,在北京和天津的各大学学生开运动会反对美国兵。本校的学生虽然被南开大学的学生呼喊、劝说、扰乱、引诱,竟能照常平安上课,这真是本校的称誉与光荣。

本校小事(1947)

1月11日,有政府派遣的两位视查员来视查了本校,并称赞了学生们功课好。以后同几位教师 and 神甫一起用了饭。几天后,即1月16日的《大公报》上说,工商学院的设备在私立学校中是最完善的,但在教师方面尚有当补充之处。

1月19日,辅理修士冯文昆暴病逝世(见亡者小传)

1月15日,甘墨林神甫在账房病了3个星期,今天入了法国医院。

2月3日,9位荷兰籍遣使会神甫是新到天津的,今天在本院同我们用了饭。

2月4日,赵俊彦神甫因久病不愈入了乐仁医院,为恢复身力,直住到3月24日出院。本校的工友张秋来白天在本校做完工作,晚上回家去时,其家距离本校不远,被人重重打伤,不(醒)[省]人事,晚10点钟拉入乐仁医院就逝世了。他是因为常带着所受的不少工资被贼人知悉才被害命,把钱抢去。

2月12日,法国耶稣会巴黎省省长神甫毕特(Bith)和上海耶稣会会长神甫格寿平(Lacretolle)在北京见完了他们在德胜院学中国话的传教士们,来此住了一天就走了。

2月18日,任神甫(Rannet 法国耶稣会北省长)今晚讲完院训就开始视查本院,中间3月5日至21日去献县视查,后来回津继续视查本院,至3月27日才结束了。

3月27日,有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哥洛斯布瓦(Grosbois)由法国领事德席居来(D. Siguret)陪伴着来参观本校,整整用了一个后半天。他后来写信向大使并向我们满口称赞了本校。

4月2日,院长神甫给女生们,黎神甫(Lavariere)给男生们领导避静。

4月5日圣瞻礼七,任神甫由北京来付洗了16名望教者,第二天返回了北京。复活瞻礼日有许多教友来参加礼节,本校圣堂几乎不能容了。

4月9日,凌安澜主教来此,为去北京于本月20日被祝圣为主教,主礼者是献县主教赵振生(因田耕莘主教有病不能主礼)。参加祝圣典礼的除北京的耶稣会士外,还有我们会长神甫尚建勋、刘迺仁

院长神甫、裴百纳神甫与徐保和神甫。4月24日，凌主教由裴神甫陪伴着回到天津。于本月27日在本校圣堂内做了主教式的大弥撒，是尚建勋神甫襄礼，刘迺仁神甫讲道。

5月10日，裴百纳神甫乘船去上海参加天主教出版事业大会，7月10日回到天津。

5月13日下午5点钟，在本校大厅我们与天津市诸优秀人物举行欢迎田耕莘枢机主教大会。这次应邀来与会的共300余人，其中有各界人物：政界的、军界的、各学校校长、各银行主任、本校的全体教师及美国军营中的两位随营司铎。

5月19日在不少的学校里做了游行示威，说是反对打内战。在开始，本校学生没有参加；可是21日以后，渐渐由(西)[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的学生催促得本校大学生们停止上课，也参加了这一运动。

5月24日中学生临时停课，学生回家，怕他们也随从了扰乱分子们去。

5月26日，本校大学生们全同意再上课。到本月30日，神甫们为防患再起，就决定由6月2日到7日暂时停课，准备考试。这样，在本校就当时的情况说，总算平安度过了这一学年，被各处所赞许，在其他学校内，当地政权早就该加以制止学校发生的扰乱。

7月1日正午12点，宣布了军法戒严，为使共产党所准备的扰乱不能得逞。7月2日，武装军队在本市各街巡逻，警察们检查一切行路人和所带之物，反对政府的预计示威终究未能实现。

永年教区的修道生当在本校圣堂升铎品的，因火车不通未能从北京来津。

传教成绩表

听告解 12591，送圣体 65000，讲道理 197，讲要理 1840，付洗 60，终傅 4，婚配 6，坚振 31。

亡者小传

辅理修士冯文苑，河间冯家王化人，生于1884年1月1日。1913年10月15日入耶稣会，在郝裕修神甫领导下做了初学。郝神甫当时是献县总堂的院长。冯修士在献县发初愿后二年之久帮助了工友监督，后被派往教区南方尽职，在大名总堂管厨房，直到1922年又回到献县管理家务7年之久。他于1924年2月2日发了大愿。1929年来到天津本院。他除做他的事外，另外还管理衣裳房。他待人温和，勤劳，爱神贫，他患了脑充血症，人全不知。他是下午4点钟到地窖拿弥撒酒时忽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偶然被人发觉，遂给他行了终傅圣事，抬入乐仁医院，有理家神甫守他。时至半夜，安然逝世。那天是1947年1月19日，他才过了63周岁，在耶稣会35年，息止安所！

考试毕业后取得文凭的学生：工科43名是土木工程师，13名是建筑工程师。商科的26名是财政会计师，17名是出口人口技术。女子文学科有11名汉文博士，19名外国语博士，8名地理博士。以上都是大学学生。

在今年年终，政府为表示满意，特奖赏了本校3300万通行币。

1947至1948年天津本校历史(包括本校和账房)

本院状况

7月1日有神甫22，读书修士1，辅理修士4。在本校教书神甫12。教书先生：中国人114，外国人2，其中奉教的32。在女子文学科教书的修女2，女先生8。

本校学生：大学工科268，商科287，文学科女生206，共计761。其中奉教的男生46，女生16，共(26)^①[62]。高中生428，其中奉教的67，望教的17。初中生779，其中奉教的76，望教的37。共计中学生1207，其中奉教的143，望教的54。

助手们：大学和中学助教7人，秘书12人，其中女人3。管图书室的4人，杂差3人。在本校为神甫和学生的工友共38人，账房助手2人，工友4人。

① 译者随文注：应为62。

人位调换

7月6日,刘景福神甫和陶天经神甫一同做完卒试并同日来津。

8月6日,耿文斌神甫神学毕业后来津。

8月7日,肖先义神甫要去蚌埠帮助传教神甫们,今回到本校。

10月6日,明兴礼神甫由法国回津。

10月16日,邓惠达神甫由美国回津。

8月10日,派徐保和神甫去美国。派黄树萱神甫(Konig)去卒试。为此,10月来本院有神甫26位。但是12月24日王通儒神甫去美国。本年1月16日派肖先义神甫去北京。

本院几件大事

7月2日有信说,1500名新兵要住本校,为歇暑假。当天就有兵士百名左右来校安置一切为收容兵们。第一批来的兵们共有至少500名,这些兵们,其中除去少数的,大半全是本年各中学的毕业生,他们总算勤慎规矩,好守了纪律。为此事,院长神甫他们和军官们(有10几位军官)帮忙不少。7月7日院长神甫还准备了宴席请了军官们。8月18日军队走了之后,又留下几名士兵把所占过的校舍都打扫得一干二净,以致到本校开学时也没有耽搁什么。

7月26日,由南宫会馆被共产党驱逐来的本会奥国神甫们来津,他们的东西完全被抢了。第二天在饭厅里我们庆祝了他们得逃活命。

此处把献县总堂所受的一切略加记录。6月7日会长神甫尚建勋和献县总堂代理院长神甫崔步云离开天津往献县去了。尚神甫去献县如他自己所说,是为安慰神甫们和修士们。在本月底还要回天津尽自己所担任的职责。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照以后我们听说的,尚神甫和其他三位神甫,即潘汝霖、李诗堂和贾书善(不在会神甫)比其他人更严厉地受了待遇,把他们3位每人各自拘留在屋内,有兵看守着。不久,共产党又把尚神甫的职务解除了,使不在会的田凤庭神甫担任起来。这时,穆启华神甫不在北京小修院教书,受命到献县,如果可能的话,替出潘神甫来。8月19日穆神甫离北京来津住了几天,于8月26日在天津上了小船,由水路去献县。他刚到献县,不但替不出潘神甫来,连他自己也严厉地被看管起来,因为从前他做过总堂的院长,要他交代这笔账目。1948年4月21日刘兴富神甫来津,并在此住了几天,我们方才知道了献县总堂的真实情形;以前只是听的谣传,不想信以为真。刘兴富神甫是由共产党许可出来行终傅的,他乘机会逃了出来。5月13日,出人意料地来了两位辅理修士,即韩笃祐和张洪起。他们是共产党由献县派来买各种药品的,另外为给法国领事送一封信。这位领事原来担任着把加拿大国宝血会修女们叫回天津的。前几天他曾用飞机向共产党送过办这事的信件。5月26日,两位修士雇船回献县,带着领事给共产党的复信。6月13日,邵海声修士来给我们并给领事报信说,修女们坐船来了。伴同她们来的有步青云神甫、韩笃祐修士和张洪起修士。修女们的东西很多,因为她们求得了带东西的允许。张洪起修士取得共产党的同意不返回献县了,就在校本替了张万成。这位修士因患了骨痛重病住在医院,看来没有病愈的希望了。

6月26日,韩笃祐修士和邵海声修士返回献县总堂,探望法国神甫们,这事是否求得,难以预测。

本校这一年过得总算平安。学生们不愿罢课游行,就如在其他学校那样,尤其是在学年终期更是如此。

暴安良神甫12年之久在三德里每主日给教友们做弥撒、听告解。以后把这职务留给天津教区不在会的神甫去做了。

我们中有3位神甫天天出去做弥撒、听告解,就是圣功女校修女那里,又到若瑟会修女那里,还到从献县来的加拿大修女那里。

1947年7月1日,我们的19名小修道生回北京小修院来此住到8月11日,请了9位永年教区的新神甫在我们这里用午餐。本月7日,任神甫(Ranner)来此。他不久又辞别了我们,于本月13日伴同张思谦神甫回了北京。

7月10日,廖迺迹神甫和张思谦神甫从北京来此,廖神甫住此至8月26日。

7月15日暑假开始。

7月18日,柏世贞神甫上船去上海,并从上海回欧洲。

7月21日,中学新招的学生考试。

7月31日圣依纳爵瞻礼,请了各团体共15位神甫来我们饭厅用饭。

8月1日,宗座公使来津,由津又去北京,在本月底将回这里。

8月11日,赵振声主教由北京回到这里,他是7月9日去北京的。

8月12日,于斌主教由北京来,为次日主持开董事会。开完会,赵主教同刘院长一同去北京了。

8月17日,景县凌主教来津,18日去北京。

8月30日,宗座公使黎培里来津,排排场地受众欢迎。次日,把天津教区主教文贵宾由代牧地位升为本牧地位,所谓正统制,人人莫不欢欣。这一天,我们4人到主教府去用饭。

9月1日下午4时,本校欢迎宗座公使。来参加这次欢迎大会的有本市上级社会中外人士200多位。大会后,宗座公使和他的秘书赵神甫同我们一起用了晚餐。第二天,公使住沈阳去了。这天,中学开了课。

9月5日,徐州的会长冯神甫(Gaznon)来津,6日去北京见他在德胜院学汉语的教士们。10日,他同毛纶神甫一起回津。11日,他乘船去上海,转本教区。

9月9日,大学开课。

8月15日,廖迺迺神甫来津,次日返回北京。

9月25日,院长神甫去北京见于斌主教问主意,26日回津。景县会长来津,在津住了两天,于27日又回北京。

10月4日,赵主教来津,5日开始给天津教区神甫们讲避静。10日,讲完避静回到本院,19日又回北京。

10月22日开始复发圣愿的3天小避静,鄂神甫讲默想题。10月26日复发圣愿,有5位神甫、1位读书修士、两位助理修士。院长神甫今天唱了大弥撒。晚上,凌主教做了圣体大降福。他第二天即27日去北京,30日又回到天津。

11月3日,为追思已亡信者灵魂,许多教友来本堂为得全大赦。

11月12日是圣达尼老瞻礼前日(院长神甫的主保庆辰),大学生们为请院长神甫备了午餐,中学教师们备了晚餐,大学教师们第二天在瞻礼本日又备了午餐。

11月14日,廖神甫来津,两天后又回北京。

11月15日,天津市长、他的夫人和其他不少的中国人土,在神甫们的饭厅备了盛宴,一同坐了席。

12月2日,苏孔昭神甫由献县来津,在此住到本月16日。以后,他同其他本教区不在会神甫住在一起了。不久,又被本教区主教立为神甫们的院长。

12月3日是献县教区主教的主保良辰,午餐时同我们共餐的有赵主教、凌主教,并献县和景县的神甫们共10位神甫。

梅叶尔(Meier)神甫(东方礼仪),上海教区的,本月6日去北京,20日又回到这里,21日用东方礼仪做了弥撒,有许多教友望了这弥撒。第二天,他又回到北京。

12月8日大弥撒前,院长神甫付洗了10名学生、1位中学教师、1名女学生、1名先在辅仁大学读书的学生。

12月24日,王通儒神甫和聂孚远神甫同去上海。

12月27日,初学院神师神甫来此行周年避静。

12月30日,张万成助理修士入了乐仁医院,住到来年1月9日。回自己本屋后病势加重,于3月5日又把他抬入总医院。

1948年1月1日,院长神甫付洗了两名学生。

1月4日,廖迺迺神甫和卜相贤神甫由北京来津,6日又都回去了。在这年假期间,我们的神甫全都行自己的避静神功。

本月24日,刘景福神甫、刘恩培神甫和明兴礼神甫为准备发大愿,还有陶天经神甫将去北京发大愿,并且有3位辅理修士,都已开始行避静。

2月1日,柴古直神甫付洗了两名学生。今由北京来的张思谦、苏培英和辅仁小修道院的主任李本良神甫,是为向明天发大愿的致贺。2月2日,上边说的那3位神甫和孙成义辅理修士在本校圣堂发了大愿,来与礼的人不少。午餐时,请来了献县教区和景县教区不在会的神甫们。

2月17日,法国领事和他的两位秘书被请来用午餐。

2月20日,赵俊彦神甫从去年12月10日入了总医院,今晚11点15分逝世(见亡者小传)。

2月21日,廖迺迺神甫由北京来,他于23日唱了亡者大弥撒,于25日返回北京。

2月22日来我们这里用午餐的有:从热河逃出来的3位圣母圣心会比国神甫,5位法国人士,其中有拉都士(Latouche)博士——印度支那银行的总经理。

3月1日,大学开课,中学生在上月23日开课。

3月9日,教育局的7位人员在我们这里用了午餐。

3月18日,雷震远(de Raegher)伴同高尔日(Gorge)神甫由北京来此。这位高尔日神甫19日向大家谈了苏联国内的形势。20日,他们两位返回北京。

3月20日,冀子岭神甫伴同江文也先生来此。这位江先生是中国音乐家,他正在将《圣咏》和其他经文用中国音乐配合起来。

3月22日,廖神甫来视查本院,他留在这里直到4月5日。

3月26日圣瞻礼六,赵振声主教讲了苦路14处。复活瞻礼日,他又讲了道理;大弥撒是廖神甫唱的。

3月31日,卜相贤和张思谦二位神甫由北京来此开会,第二天返回北京。

4月4日,庆祝工友唐保禄和王保禄在耶稣会院服务50年,非常地忠信。一切工友同他们两位一起赴了宴席,院长神甫给这两位保禄许多礼物,一来为作纪念,二来为表示谢意。

4月14日,有台湾的校长们和教师们(共17位)来参观我们的中学,并访问了我们的教学法,为能在他们的学校里也能仿效一些,因为直到这次大战结束,在台湾常用了日本国的学校制度。

4月21日,赵振声主教由北京来津,26日又返回北京。

5月2日,庆祝圣依纳爵,明供了圣体。

5月6日,复发圣愿的有两位神甫、一位读书修士。辅理修士张万成在医院私下复发了圣愿。在本校圣堂,圣体降福前,文贵宾主教行了坚振圣事,他也做了圣体降福。

5月8日,向圣母中华之后做敬礼,求平安,由神甫小圣堂把圣母像抬到本校圣堂内,并整天的工夫教友或学生轮班在圣母像前公念玫瑰经或唱圣歌。末后行圣体降福,结束这一敬礼,把圣母像又抬回神甫小圣堂。

5月24日,两位辅理修士米恩波(Schimitt)和王来义由北京来津看望由献县才来的辅理修士们,如上边所说的。

6月18日,赵振声主教由北京来给毕业生们讲避静。

6月23日,朱者赤神甫回上海他的本教区,他来此当大学教育主任已经二年之久了。

6月24日,廖神甫去北京,27日又回这里,为在29日开咨议会。张思谦和卜相贤二位神甫这天早晨来的,30日就返回北京。

传教成绩表

听告解 12329,送圣体 71550,讲道理 118,讲要理 2119,付洗 66,坚振 78,终傅 9,婚配 2。

毕业文凭

今年毕业生取得毕业文凭的:工科 30名,建筑 9名,商科出口入口 17名,财政会计 21名,文学科

家政 20 名,历史地理 8 名,共 105 名。

神甫写的书或文章

狄守仁译的《识己篇》275 页,32 开本;《天主教义提纲》一册,5 次出版,三册,3 次出版;《师主篇》《自尊》《天主实义》《文言对》。鄂恩涛写的法文文章在《北京天主教法文杂志》上登过,有《顺治、康熙时的天主教》(见 47 年 7 月到 9 月份,13 页,8 开),《在栅栏的圣母圣堂》(见 47 年的 10 月到 11 月份,8 页,8 开本),《在中国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教友传教》(见 48 年 3 月份 27 页,8 开本),《1820—1821 年时俄国教务调查》(见 48 年 4 至 5 月份),《两个历史碑在栅栏》(见 48 年 4 至 5 月份,28 页,8 开本),《法国传教区的根源和开始》(见 48 年 6 月份 21 页,8 开本)。

亡者小传

1948 年 2 月 20 日刚不到半夜,赵俊彦神甫在两位神甫看守下在总医院平安逝世。他是去年 12 月 10 日入的医院。他多年来患了肺病。神学他是在献县总堂开始的,在景县总修院读完的。他于 1940 年升的铎品,1941 年神学毕业,遂即去芜湖做完卒试,又在北京读书。1942 年至 1944 年在景县做修道院和公学学生的神师。1944 年至 1946 年在天津工商中学做神师,并且成绩不坏。他的身量和秉性更适合于学生们,为此,第二年即 1947 年被任为初学院副神师往北京去了。但是他的体力太弱,不能胜任,过了不多几个月就被迫返回天津休养身体。他给我们留下的好榜样是忍耐、勇敢、爱守公规和内修。他是献县马家庄人,生于 1908 年 10 月 14 日,1928 年 8 月 14 日入耶稣会,息止安所!

贝兴仁神甫:1、用英文写了一小本书,并瞒下自己的名字。这书的标题是“Natal processing”,石印本,专为工科学生用为研究土木工程的,共 84 页,出版 200 本。2、用法文写了一篇论文“La genesse ouvriere catholigne”,是在“China missionary”杂志上出版的,1948 年 3 月和 4 月份共 27 页。3、用华语写了一小本书《科学与宗教》,已两次出版,80 页,出版 1000 本。1945 年第一次出版 500 本,共 50 页。

关于建筑

- 1、本校东面的院墙是完全圈围住本院地基的,但以前未能完成,现已完成了。
- 2、神甫们的花园以前是大敞四开的,不能遮人眼目,现今已筑上园墙了。在花园内,为帮助我们热心敬礼圣母,也筑了一个假山洞,供上露德圣母像。
- 3、在中学安上了电机。用此电机,教育主任神甫可在自己屋内向全体学生通知事情。

1948 年至 1949 年天津本院历史(包括本校及账房)

本院状况

在今年学年开始时,院中有神甫 23,读书修士 2,辅理修士 6。在大学教书的神甫 11,教书先生 121,外国先生 2。其中奉教先生 23。在女子文学科有修女 4。

学生数目:工科 334,其中奉教的 34,望教的 13,不奉教的 285;商科 312,其中奉教的 38,望教的 13,不奉教的 261;文学科 233,其中奉教的 14,望教的 14,不奉教的 205。大学生共 879,其中奉教的 86,望教的 42,不奉教的 751。

高中 447,其中奉教的 59,望教的 21,不奉教的 367。初中 848,其中奉教的 65,望教的 39,不奉教的 744。中学生共 1295,其中奉教的 124,望教的 60,不奉教的 1111。

助手们

本校有助教 5 人,秘书 14 人,其中 2 位女的;管图书室的 5 人,杂差 3 人。共计为神甫和学生所用工友 50 人,账房助手 2 人,工友 4 人。

人位调换

王峻德神甫由中学升入大学当教育主任,替了朱者赤神甫,因他被召回本教区。马光普读书修士是王峻德神甫的助手,替了耿文斌读书修士,这位于 6 月 25 日往北京去了。齐振国神甫在中学当训育

主任,替了王峻德神甫。孙化远神甫是大名教区的,于7月24日来此,为帮助齐振国神甫。读书修士贾书元哲学毕业,于7月16日由北京来津,在中学替了读书修士马光普。申自天神甫7月13日离开北京来津,住在账房。同日,裴百纳神甫去北京。9月2日,郎若石神甫(Pilat)归属于大学。明诺连神甫(Cser)是匈牙利省会士,2月10日来此,为教学生们英文。刘迺仁神甫在本院当院长已满6年,于1949年1月8日辞了职。暴安良神甫从此时代理职务,直到1月20日卜相贤神甫来到。可是刘迺仁神甫直到2月21日才辞别了我们。3月23日,刘景福神甫也跟刘迺仁神甫之后走了。刘景福神甫在中学管过规矩。柯守义神甫先在大学教过书,在这学年的下期,就不教书,退躲到账房去了。

1948年7月15日,教育部副部长田沛霖从10点开始到傍晚参观了本校,并在此用了晚饭。7月19日,邵修士和韩修士来津,为报知法国领事许可了他去献县探望被拘留的法国神甫们(见上边去年写的此事)。

7月21日,领事伴同上边说的那两位修士起程赴献县。本月31日晚9点,由一样的两位修士陪着,领事把4位被释放的神甫领到了本院,即尚建勋、潘汝霖、穆启华、李诗堂,可是他们已被判决由中国当被驱逐。

8月1日中午12点半,在本院小圣堂举行圣体降福,为感谢天主。午饭时在饭厅也欢庆了一番。

8月6日,被救出的神甫们去北京。几天以后,尚神甫又回到天津,终于本月27日向我们讲了在中国最后的一次道理,就返回了北京。他们于9月4日都回了欧洲。

8月30日中学开了课。9月6日大学也开了课,9月19日,廖迺迹神甫昨天从北京来,今天初次被我们当正式会长致敬。22日他又返回北京。

10月2日,刘迺仁神甫坐飞机由北京到南京,在那里有于斌主教帮助,拜见了教育部朱家骅部长。多年来开始准备的大学正式立案事宜本月4日实现了,命名为津沽大学。这件正式立案的公文于本月26日在天津才接到。

11月27日,凌主教由欧洲和美国回来,在这里吃了午饭。过了几天(即12月12日)在本校圣堂内,由被宗座出使委任的文贵宾主教当众声明,凌主教从今以后是景县教区的正统主教了(以前是代牧)。

12月18日,天津市戒严,从早晨8点军法开始生效。因此本校学生们不能来本校上课。第二天仍然如此。所以就停了课,12月23日中学的北楼、25日大学的正楼被伤兵们占用了。

1949年1月6日在天津附近,不久又在天津市内打开了仗,终于1月15日天津市陷落。以后产生了新的秩序。2月17日晚10点半左右有不少的男女学生来闯入神甫们的房院,直到过半夜两点半,细查了房院的各个角落,把神甫和工友们日用面粉都抢了去,两天后就都分施了。

2月21日成立了一种委员会,从此以后学生们就不属我们管了;然在许多事上,我们得属学生们管。2月23日,在学校住的我们的人,本是为管学规的,当离开那里。在我们饭厅中不能再守旧例了,禁地之规也只减缩于个人私室。并且在本院有几位我们的人,不久以后我们全都不再穿大长袍了,不拘是外国式的或中国式的。

5月3日以后,弥撒时间是下午4点35分,并在我们的小圣堂做。这样,使男女学生更便易领圣体。6月8日,王峻德神甫被选为大学校长。

1948年至1949年的零星小事

7月4日半夜时,王志荣工友追赶小偷时,挫坏了脚,抬入医院。7月5日,暴安良神甫伴同25名大学生去北京,为在西山地区使他们做测量实习,于8月1日就回来了。7月15日大暑假开始。7月19日,柴古直神甫到账房去,直到31日。7月25日,田如斌神甫去北京给圣母会修士们讲避静,于8月7日就回来了。7月26日,狄神甫去北京,为在德胜院更便易休息,将于8月2日回来。8月2日邵海声修士、次日韩笃祐修士去北京。8月5日,廖迺迹神甫,他是本月1日来的,为庆祝以前在献县被拘留过的神甫们今天回到北京。8月12日尚神甫、刘迺仁神甫和邵、韩二位修士(这两位将于本月16日回献县)被领事请去吃晚餐。8月16日,房如晦神甫行避静到本月23日。又明兴礼神甫去北京,将

于21日回来。8月17日理家神甫行避静到23日。8月24日,邓惠达神甫去北京休息到9月4日。8月30日,法国领事和副领事并秘书来我们这里用晚餐。9月6日,请本大学的教师们赴了晚宴。9月12日行5周年考试的神甫有:明兴礼、刘景福、田如斌、陶天经。考问他们的3位神甫是申自天、鄂恩涛、甘墨林。9月25日到10月3日,鄂神甫做了周年避静,9月26日,在本月22日从法国来的两位读书修士莱斯特文(Lesteven)和伊外尔欧(Yvernav)今天去北京,要在那里学中国话。

10月8日,宗座公使黎培里今晚到津,次日就回北京了。

10月13日,于斌主教从南京来津,14日去北京。

10月14日,本院会士们庆祝狄守仁神甫来华25年,来参加庆祝会的有会长神甫和裴百纳神甫。这一住在此做了避静,到26日出静,并于29日回北京去了。10月31日耶稣君王瞻礼复发圣愿的有周若愚神甫、读书修士贾书元和马光普、副理修士王来义。孙化远神甫讲了默想题。11月3日周若愚神甫去北京,在那里待到8日。11月6日,鄂恩涛神甫被抬到总医院,为防止脑溢血,给他两次放了血。不久病愈,8日回到本院。11月11日,四天之久为庆祝大学立案,学生们组织了多种多样的游玩、戏剧和运动会。11月12日开鸡尾酒会,从上午10点10分开始,有许多人来祝贺我们,赵振声主教和会长神甫,又有英先生和杨先生同我们用了午餐。晚6点,老学生们也有不少的一起坐席。11月13日是院长神甫的主保庆辰,大学生和中学生们比赛了游戏。晚6点,请大学的教师们赴宴,这天下午从1点半到4点半,人人都能来参观津沽大学。11月14日,中学教师们在我们这里吃了晚餐。11月15日,本校放假一天,这样,就结束了庆祝大会。

11月22日,从北京来的陈若瑟和穆启蒙二位神甫住在本院,饶满恒神甫和10位哲学修士住在账房。12月4日,廖神甫返回北京。12月25日为圣诞瞻礼的半夜弥撒,神甫们都做了,但是教友们未能来望弥撒。

下边是1949年的事。

1月初旬直到15日,每天只有一定的时候能到街上去,然不出门更妥当,因为有大危险。1月14日,代理院长暴安良神甫给鄂神甫行了终傅,因他又如去年11月6日犯了一样的病,但他又脱出病险,本月18日竟能做弥撒了。

1月20日,卜相贤神甫已于本月4日被指定为本院代理院长,本月16日离开北京,今天晚11点来到本院。在本院行避静的有狄守仁神甫,是从1月27日到2月5日。又有暴安良神甫,是从1月29日到2月5日。2月1日至9日,赵元俊神甫行周年避静。2月14日,中学开课。4月3日,田如斌神甫给方济各会账房的工友们讲避静到本月6日。9日到16日,又领导副理修士们行避静。本月8日到17日,田如斌神甫自己也行避静。4月22日马昌武修士、26日张富有修士都去北京行避静。马修士于5月3日、张修士于5月7日返回天津本院。4月30日,廖神甫来视查本院,到5月7日完毕。5月6日,廖神甫给张万成修士行了终傅。5月7日到22日,朱光神甫去北京行避静。5月26日耶稣升天瞻礼复发圣愿,田如斌神甫讲了默想题并家道理。晚上有38个坚振的。6月2日,廖神甫来此,待到本月11日。6月13日至22日,柴古直神甫行避静。6月30日,中学的学年结束,大学开始考书。

亡者小传

6月4日正是圣神降临前天,午前11点钟在总医院,张万成辅理修士平安逝世。他于1913年12月17日生于交河县赵家庵村,1939年10月9日入耶稣会。他在神师崔步云神甫领导下做完2年初学后,就需在献县总堂中尽职。1941年到1946年初,中间不多几时曾去过北京学习厨师的手艺,他的职务是管厨房。在中日战争期间,那年是1944年5月末,他和廖神甫并弥书堂修士被日本人逮捕,先在献县,后又在北京坐过监,并在监中受过许多重刑。终究18天以后把他们一起释放了。他于1946年2月末被叫来天津,在中学管工友们。他忠信尽职仅仅两年。在1947年末患了不治之症——胃痛。1948年3月5日入于总医院,一连住了15个月,给内外诸人留下了勇敢和忍耐的表样。他倒异常心地清醒,因为他头咽气前还拿苦像来用口亲。当着田如斌神甫的面就平安逝世了。他进会还不满10年,为此未曾发大愿。息止安所!

本会神甫们的工作

申自天神甫著的《新经全书》，16开本，453页，1948年12月出版，共4000册，每册1元。

卜相贤著的法文书：“Etudiants Chinois—silhouettes et tendances”，16开本，130页。外国出版Alsatia。“Etudiants catholiques en chine”1页，是“Pax romana”出版的。“Thearre chinois”10页，“Famille chinoise”10页，以上二者是“Aujourdhui”出版的。“Visite des hopitaux”10页，“Partir”3页，以上二者是“China missionary”出版的。

鄂恩涛写的以下几篇文章都在《北京公教杂志》（“Bullton catholique de pekin”）发表了：“Fes biens des anciennes missions de chine”（只是文科）纪念表，共33页，见1948年12月份。

明兴礼神甫著的《现代中国的两位贤士》，32开本，55页，1949年5月出版2000本。

狄守仁神甫译的《正义之友》，原文是“Le justicier par Bourger”，32开本，80页，出版2000本。

郎若石神甫写了一本《是因为找不着太太吗》，论司铎圣召问题，6页，印了1000份。

考得毕业文凭的

工科生：土木18名，建筑10名；商科：经济会计11名；出口入口8名；文学科女生：外国语6名，历史地理3名，家教7名。

传教成绩表

听告解16578，送圣体87300，讲道理134，讲要理1223，付洗77，终傅4，婚配1，坚振38。

1949年至1950年天津本院历史（包括本校和账房）

本院状况

本院在学年开始时有神甫23位，副理修士5位。在本校教书的神甫13位，其中3位在下学期已被免职。教书先生共115位，其中23位奉教的。女先生共8位，其中2位奉教的。

学生数目：工科380名，其中31人奉教的，349名不奉教的；商科339名，其中23名奉教的，3名望教的，313名不奉教的；文学科206名，其中奉教的16名，望教的2名，188名不奉教的。共计大学生925名，其中奉教的70名，望教的5名，不奉教的850名。

高中学生412名，其中奉教的44名，望教的5名，不奉教的363名。初中学生804名，其中奉教的41名，不奉教的763名。共计中学生1216名，其中奉教的85名，望教的5名，不奉教的1126名。

助手们

在大学和中学有修士2，助教12，秘书16，管理图书室的7，杂差1。在本院为神甫和学生用的工友共39人。账房有工友4，助手2。

人位调换

9月9日，由天津教区来了一位不在会神甫孙志鸿当训育主任，他是辅仁大学毕业的。

5月12日，王来义辅理修士去崇德堂帮助管账。

3月15日离开我们并离去中国的有邓惠达神甫。4月6日离开我们并离去中国的还有狄守仁和郎若石二位神甫。4月5日离开我们并离去中国的有柯守义神甫。

所有大事

7月1日在中学、7月6日在大学开始放暑假。

7月11日，郎若石神甫被声明为本院理家。

7月13日，赵元俊神甫去北京辅仁大学为监考新招的学生。在各地报上名的新生共1612名，只收下517名。还有166名到别处考试去了。

7月30日，公安局给我们来信，令非中国人都该走。

9月30日，盖斯杰(Ghesquieres)由监狱被释放出来。他是被中学生告发的，被判决做8日拘留。

10月12日，廖迺逊神甫从北京来；他回到北京数日后被逮捕入监狱。

11月12日,卜相贤神甫、王峻德神甫和沈晞先生被召去北京见教育部长。

12月29日,学生们要赶走校务长卜相贤神甫,因为他极力反对在大学宣传无神主义。学生们终究强迫他辞卸校务长的职务。我们一知此消息,就都到教育局去辞职,有辞去教务长职的,有辞去教授之职的。局长为解决这一意外的难题,就去请市长解决。市长于1月2日把我们叫去,这样解决了问题:在大学宣传什么主义,校务长不用管,叫我们仍旧要各尽其职。

1950年的事:当注意,在学生的第二季度,特(另)[别]在大学的学生数目减少了。因为离开大学的有147名。他们感到厌烦的是几乎每日出些困难问题,不能安心读书。离开中学的学生只有37名。

2月16日,由徐州来了两位神甫,就是程慰先和杨振华。这一位在此住到3月10日,那一位只住到本月22日。

4月3日,赵元俊被声明为本院理家神甫。

5月18日至27日,田如峰神甫给修士们讲了避静。

5月28日圣体降福以后,在我们的小圣堂内,凌主教给44名学生,其中有走读生,行了坚振圣事。

6月11日,学生们庆祝了文贵宾主教升铎品50周年。

6月26日,张思谦从上海回来,27日被宣布代理会长神甫。29日他去北京。同日,崔步云神甫回献县。

建筑

暑假期间在中学盖了3间饭厅。1950年6月中旬,在北楼的东面开了两个窗户。8月末在神甫住院把衣裳房搬到楼上边去了,把原来的衣裳房做为会客室。把本院的正门关闭,在东面又开了个门,有二人看门。这样,禁地之规又能守了。从3月23日开始,把会长神甫从前的住屋,就是在那座小楼的上层改成神甫们的散心厅了。

著作

申自天著的《人生基本问题的解答》,100页,16开本,2000份。《耶稣真徒的生活》,第三次出版,110页,16开本,2000份。《圣母月》,初版,120页,16开本,2000份。

卜相贤著的《原子弹与宇宙精神》,22页,两次出版,每次1500份。《圣奥斯定》,40页,初版,1500份。短篇论文《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实体主义》3000份。《社会进化》2000份。

明兴礼著的《巴金的生活与著作》,初版,212页,13×18,3000份,卖9500元。短篇论文已出版17种(其中1种是卜相贤写的《葡萄园》),《现代神修文集》,每种论文有10页,8.50×12.50,1000份,卖500元。《公教是否属唯心主义》,4页,8.50×12.50,1000份,卖400元。

狄守仁著的:《天主教教义提纲》,第三次出版,130页,16开本,2000份。

历年学生总数并奉教学生与领洗生的总数(表)(略)